独家首发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套装共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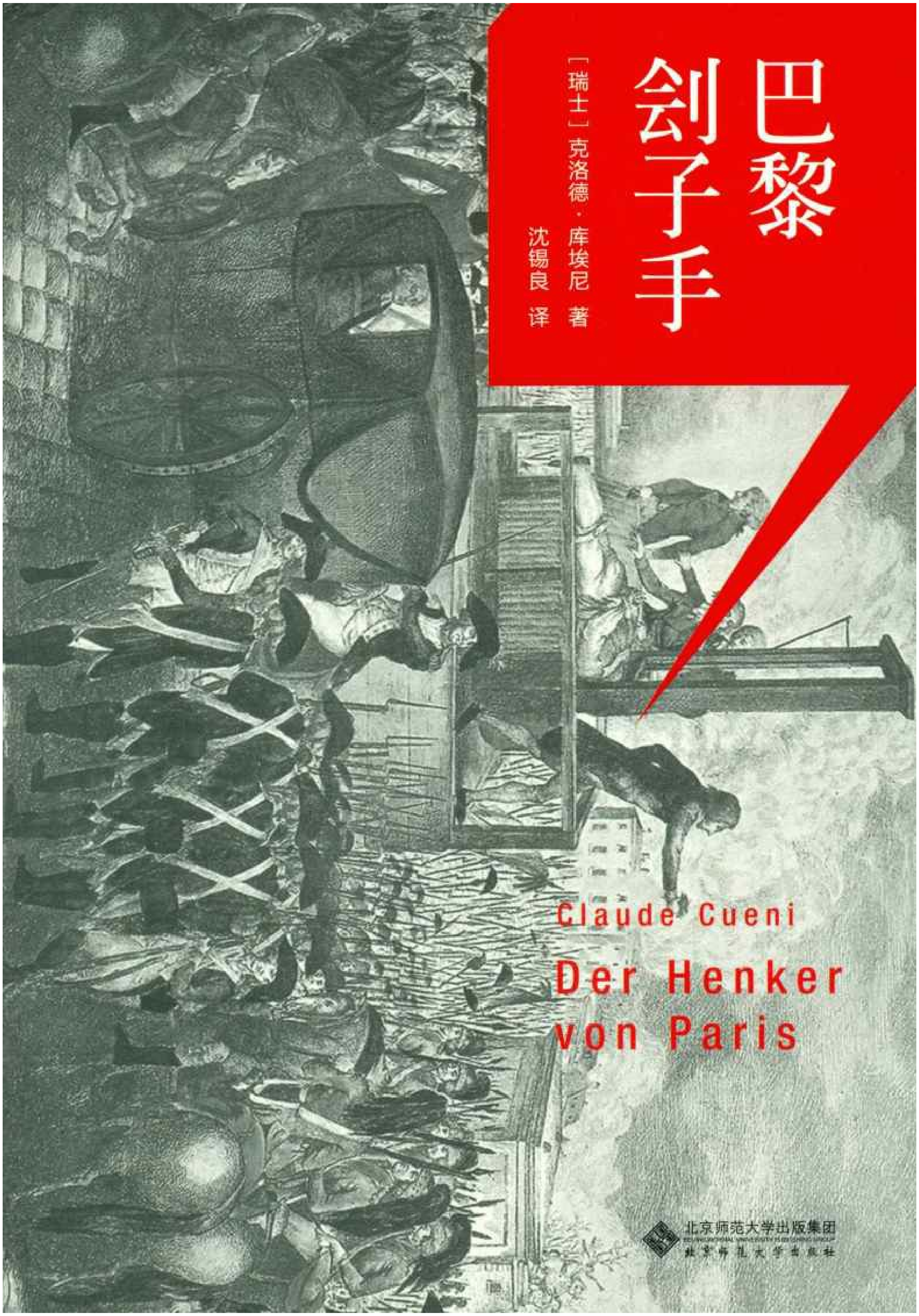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巴黎刽子手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法国大革命史
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出逃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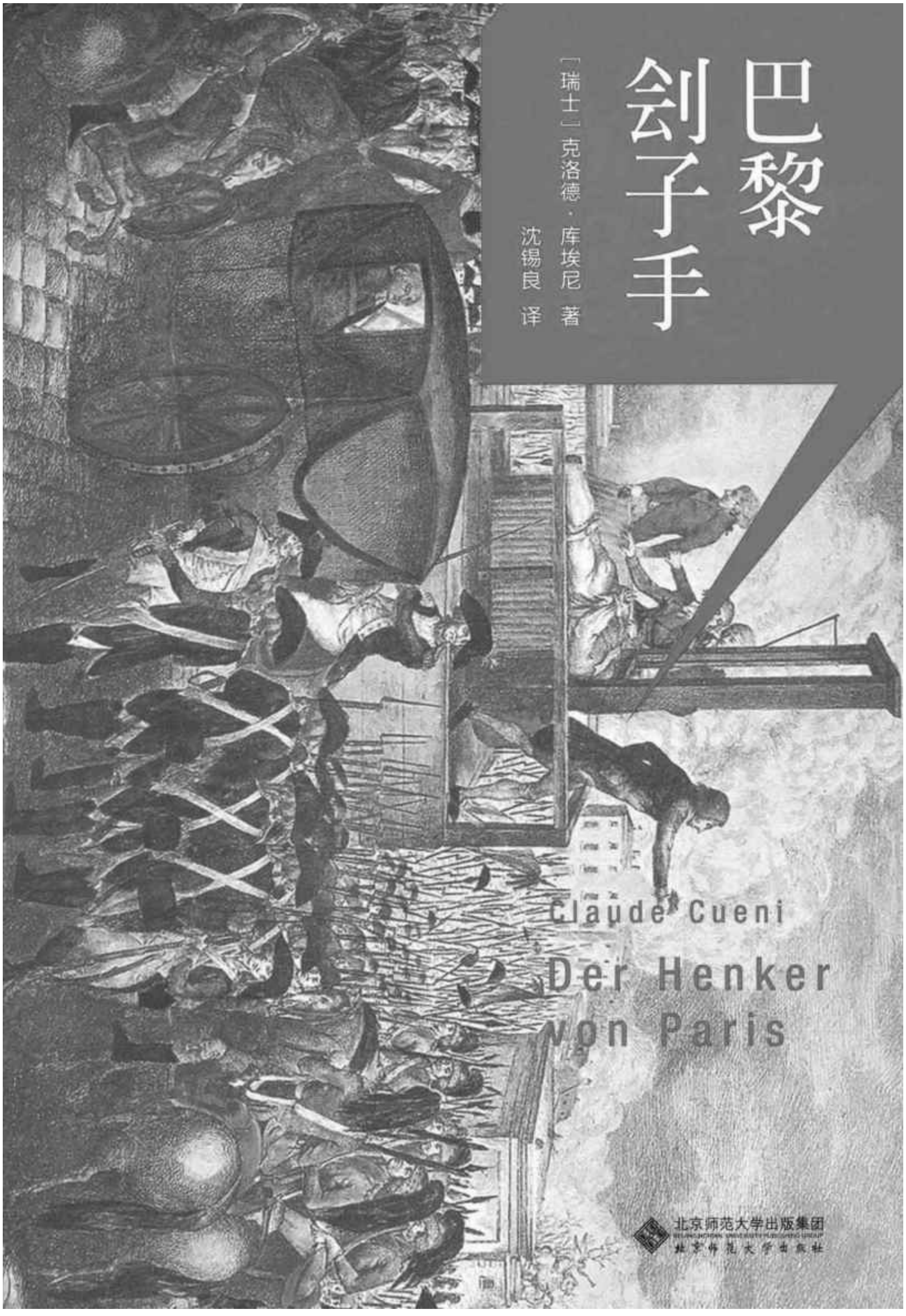
巴黎刽子手

[瑞士] 克洛德·库埃尼 著
沈锡良 译

Claude Cueni

Der Henker von Pari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巴黎刽子手

[瑞士] 克洛德·库埃尼 著

沈锡良 译

Claude Cueni

Der Henker von Pari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刽子手/（瑞士）克洛德·库埃尼著；沈锡良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3-21926-1

Ⅰ.①巴… Ⅱ.①克…②沈… Ⅲ.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Ⅳ.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588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BALI GUIZISHOU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印　张：10.125

字　　数：210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谭徐锋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周伟伟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译序

八年前，也就是在2009年，经华东师范大学德语教授曹乃云老师引荐，笔者有幸翻译了瑞士作家克洛德·库埃尼的《大赌局》。严格地说，《大赌局》并不是叙述现代纸币由来的小说，而是以西方纸币发明为主线，再现主人公约翰·劳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的有益尝试。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小说，熔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于一炉，其历史场景恢弘大气，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读来妙趣横生，让人久久难忘，不由得为作者的妙笔生花拍案叫绝。小说写的是历史，但并非历史的简单重复，更注重的是对人性的探讨。但尤其令笔者惊叹的是作者如此娴熟地驾驭史实的能力。从国内外的一些历史资料看，我们认识的约翰·劳是一个基本被否定了的人物形象，而《大赌局》的出版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人物的全新形象。历史是一面明镜，人们可以从中反思自己的“原罪”，可以照见自己的丑陋形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从中寻找到未来正确的道路。整整三个半月，从舒适凉爽的春天一直到盛夏酷暑如期而至，笔者始终沉浸在这部杰出的历史小说的翻译之中，被约翰·劳一生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深深打动，也对人性和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笔者还根据原著中留下的作者电子邮箱与其联系，每逢遇到翻译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时，总能及时收到回复，有几次尽管回复迟了，作者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是人在医院。交稿数月后，出版方来信说，是否请作者给中国读者写点文字，及至收到他的中文版序言，笔者顿时如雷轰顶：

……遗憾的是，这将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在妻子因癌症去世十五个月之后，我同样得了绝症——白血病。

笔者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只有默默地祝福他，并请他相信现代医学的奇迹。之后，一直关注他的健康状况，后来得知他成功地进行了骨髓

移植手术，笔者由衷地替他高兴。而《巴黎刽子手》正是他病愈之后创作的最新历史小说。

巴黎有一个传奇式的职业刽子手家族——夏尔·桑松家族，拥有七代人二百多年的行刑历史，尤以第五代夏尔-亨利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最为引人注目，《巴黎刽子手》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夏尔-亨利·桑松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位著名的“巴黎先生”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大夫，不幸的是他生长在一个刽子手家族，一重诅咒笼罩在他的家族身上，也因此成了他的灾难，人们想当然地给他贴上了刽子手的标签，最后他不得不子承父业，成为职业刽子手。杀人如麻而非救死扶伤，他成了命运的俘虏，对死刑犯的折磨变成了对他自己的折磨。白天他在断头台上从事杀人的行当，晚上弹奏钢琴，到了深夜则解剖尸体以钻研人体解剖学。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恐怖时期，共有三千多人成为他的刀下鬼。路易十六被处死，行刑的是夏尔-亨利；丹东被处死，行刑的是夏尔-亨利；罗伯斯庇尔被处死，行刑的依然是夏尔-亨利。巴黎城淹没在鲜血的海洋里，夏尔-亨利也渐渐失去了理智，他绝望地四处寻找人性所在和他人的认同。是一个女人的爱给了他坚实的依靠，直至她同样被列入断头台的名单之中……

克劳德·库埃尼通过阅读大量的法国大革命史料，特别是精心钻研这位巴黎刽子手的日记，对其人物性格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巴黎刽子手》是继作者2006年的长篇历史巨著《大赌局》之后又一部扣人心弦、耐人寻味的佳作。

克洛德·库埃尼，1956年生于瑞士巴塞尔，在欧洲各地求学和漫游之后，于1980年出版首部小说，著有侦探小说、广播剧、电影及电视剧本，而真正奠定其优秀小说家地位的则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多部历史小说，其中尤以《大赌局》最为畅销，迄今已被译成十三种文字。2010年

1月，《大赌局》中译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后曾产生广泛反响，并于次年12月和余华的《活着》、莫言的《蛙》、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一起入选“阅读城市·城市阅读”推荐书目（文学部分共三十种）。

2013年初，笔者在第一时间收到了作者寄来的《巴黎刽子手》，因当时另有翻译任务，直至两年后才腾出翻译该书的时间。2015年3月12日，上海翻译家协会安排一年一度的采风活动，活动间隙跟青年才俊章乐天先生谈及这本新作，热心的乐天当即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打去电话，想不到一拍即合，立马敲定在该社翻译出版该书的计划。如今，《巴黎刽子手》中文版在金秋季节出版，笔者谨向乐天和徐锋君表示谢意。

去年8月，笔者到德国参加德语文学翻译交流活动，作者携新婚妻子专程飞抵柏林，请笔者共进晚餐，又在次日将包装精美的瑞士巧克力送至笔者所住的旅馆，以了却多年前到邮局寄送巧克力却惨遭退回的遗憾。今年6月，笔者获德国博世基金会资助前往位于瑞士苏黎世郊外的罗伦译者之家潜心翻译，临行前曾和作者相约重聚，可惜后来因为时间冲突未能见上一面。获悉作者最近身体欠佳，很可能要进行肺移植手术，笔者依然默默地祝福他，让我们继续相信现代医学的奇迹吧。

沈锡良

2017年8月于上海虹口现代公寓

- 第1章
- 第2章
- 第3章
- 第4章
- 第5章
- 第6章
- 第7章
- 第8章
- 第9章
- 第10章
- 第11章
- 结束语
- 后记
- 致谢

返回总目录

第1章

1737年。约莫午夜时分。一场强风暴正在诺曼底上空肆虐。大雨滂沱。轰隆隆的雷声击中了森林覆盖的小山，瞬间照亮了在夜色中疾驶的骑兵。他疯狂地敲打他的黑马，仿佛想要摆脱那泼洒到大地上的特大暴雨。此刻，雷电一下接一下地劈开夜空，轰隆隆地从群山上打落下来。树木像火柴一样纷纷折断。途经一座小农庄时，那匹黑色牡马突然急促地吼叫一声。那被岁月侵蚀的外墙涂料似乎是血红色的。骑兵重新用靴刺刺马的侧腹。马已受尽折磨，它不乐意地扬起头，喷出的白沫飞溅到夜空，又随即消散开来。怒吼的雨水劈头盖脸地落到骑兵身上，他在被雨水淹没的公路上继续疾驰。那是一条通往布雷地区纽查特的路。突然，他看到树林之间有一盏淡黄色的灯火摇曳不定，认出是一家乡村客栈的轮廓。就在同样的时刻，马前腿忽然跌倒，无奈惯性使然，骑兵冷不防从马头上面飞了出去。飞出去的弧度很大，他的身体啪嗒一声掉入水洼里，继而又被滑出去好几米远，直至最后，他的头砰的一声撞在一根被风暴折断的树身上。相当长的时间过去之后，他才发觉自己竟然安然无恙，幸运地逃过一劫。之后，他感觉到了疼痛。他的黑马躺在路边，已是奄奄一息的模样，不断地呻吟着，试图站起来，却已经无能为力了。它无助地摆动腿，嘶鸣着抬头张望。最后一次抬头张望。然后啪嗒一声，掉入淤泥里，再也动弹不了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骑兵慢慢站起来，保持了一会儿弯腰的姿势。他气喘吁吁地瞧了瞧那匹马，然后注意到他的马褡裢：马褡裢躺在他的脚边，显然从皮带上被扯下了。他打开马褡裢，从中抽出一把很沉的车轮锁双管手枪，那是他玩法老牌赢来的。突然，他失去平衡，重新滑倒在淤泥地里。他跪着寻找，找到了从自己手里飞出去的那把手枪。他心情轻松了下来，跪着靠近黑马。他几乎温柔地抚摸它的鼻孔。他举起手枪瞄准它的太阳穴，接着扣动扳机。没听见枪响。火药湿了。一声强有力的惊雷重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附近的闪电接二连三地发出轰隆声。骑兵站起来，雨水顺着他湿透的制服倾泻下来。他骑马跑了那么远的路，可不是到这里来放弃的。

他跺掉身上和脚上的烂泥巴，一步一步地走到那盏淡黄色灯光前。他的唇角掠过一丝微笑。难道是上帝听到了他的祈祷了吗？他一把撞开客栈的门。店堂里一张长桌旁坐着几个脸色阴郁的伙计。其他桌子旁没有人。除了一张桌子：在一个角落的一张小圆桌旁，独自坐着一个高个子男人，他的面前放着一只木制酒杯。

骑兵随手关上门。此刻，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他身上。因为他的身材也是异常高大。他身体笔挺，走路姿势充满自豪感，棕色头发不长不短。他这才注意到吧台后面的店主。店主看他的眼神并不友好。坐在长桌旁的伙计们打量这位迟来的客人的裤子。裤子上虽然已被泥浆弄脏，但还能认出是布瓦西埃侯爵团部制服的颜色，从腰带直至下面被泥浆溅脏的靴子也可以看出来。那是一条军官裤子。

“我们这是在哪儿？”骑兵问。

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

他转身对店主说：“给我来点喝的。”

“我们没有喝的。”店主稍后说道。

“酒。红酒。”

店主拿出一瓶酒，把酒杯倒满。骑兵从口袋里翻出一枚硬币放到吧台上。店主打量这枚硬币。他没见过这样的钱币。

“这是在新法兰西铸造的，”那位军官说，仿佛想要最终赢得应有的权威，又补充道：“我是德·隆瓦勒骑士少尉，让-巴蒂斯特·桑松·德·隆瓦勒。”

店主不知所措地低下头，毕恭毕敬地后退一步。他慢慢将酒杯推到

吧台上，问道："你在印度打过仗吗？"

"我们把它叫作美洲，而把那里的土著称作印第安人。我不知道正确的说法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明白。"

店主点点头，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们这里不喜欢陌生人。"

"我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或许才一年吧。"

店主摇摇头。"我见过去过那里的一些人。可他们回来后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们谈论一些傻事。因为在大洋彼岸，他们没有国王。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国王。我听说过这种事。"

"是啊，"桑松少尉喃喃道，"甚至还有些人，他们想要分裂法国，于是上了战场，然后战死了。他们希望自由。"

店主怀疑地打量他，转身离开了。回来时，他给坐在长桌旁的客人带来了一大罐葡萄酒。

"你们部队的其他人呢？"其中一个伙计挖苦地问道，说话时露出自己黑乎乎的烂牙。酒友们开始哄堂大笑。那是一种粗鲁而失礼的哄堂大笑。他们就像准备阴谋策划的敌军一样坐在桌旁，急切地期待他的回答。

"做了逃兵，"有一个问道，"还是你要带我们上战场？"

少尉一口喝尽杯中酒，走到长桌跟前。"先生们，我所属的部队就驻扎在迪耶普附近。那是布瓦西埃侯爵团部。我受指挥官委托在外办事。我有一份紧急公函要送到巴黎去。"他做了个立正的动作，将右手搁到他那支长剑的铁制护手罩上。"我需要一匹好马。"他挑战似地注视着店主。

“你看到这里有马了吗？”

“他只有我们。”有一个伙计发出怪叫，其他人只是晕乎乎地咯咯笑个不停。

“你究竟是如何到这儿来的？”店主问。

“我的马陷入外面的泥潭里。马腿断了。”他慢慢急躁起来。“我本想给它仁慈的一枪结束它的性命，结果火药湿了。”

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那个客人，他正孤零零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那张小圆桌旁。可此人并没有抬起头来，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的酒杯。他的头光秃秃的。

“你问问他吧，”店主没好气地说，“或许他可以给你一匹马。反正你没法待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客房。”

“我还需要一把武器，我的马必须得到解脱。”

“难道我看起来像个贩卖枪支弹药的商人吗？”店主咕哝道，“你问问他。他善于和各种各样的动物打交道。他知道怎样使一匹垂死的马得到解脱。”

坐在长桌旁的所有人又一次哄堂大笑。

“5个苏[1]。”坐在角落里的那个高个子嘀咕道。

桑松少尉从口袋里掏出几枚硬币摆到吧台上。

“你自己给他吧。”店主用一种异常轻蔑的口吻说。

“不，”高个子回答，“就搁到吧台上。让他再给我来一杯酒。”

少尉将自己的空酒杯推到吧台上。“给他倒上酒。”

店主拿起杯子，重新放回原处。“他喝自己的酒杯。”

少尉朝长桌旁的几个伙计望过去。他们一个个不吭一声，默默无言地看着他。他拿起那只玻璃酒杯，慢慢走到坐在角落里的那名男子那里，在他的桌前站住，为他斟上酒。

“那头畜生在哪儿？”那名男子小声却粗鲁地问道。

“您沿着林子方向走就可以看到它了。”

那人点点头。“我会给你弄来一匹马。不过那匹老马属于我了。你沿着那条路走回去。你看到那个小农庄了吗？刷成红色的农庄。在农庄后面你可以看到有一间祈祷室。你到那里找我。你可以睡在我的仓库里，骑士。”

少尉疑惑地看着那个人。

“你先走，我喝完酒要关心一下你的马。”

“您不能马上处理这事吗？”

那个人此刻抬起头来望着他。他的目光咄咄逼人，他的眼睛黯淡无光。他的脸就像铁砧，强硬有力、棱角分明而坚定不移，仿佛有人朝他砸了一拳，却丝毫看不出他的脸上有纹丝的表情变化。少尉拿着葡萄酒杯又重新回到吧台，对店主说：“我想洗一下。”他指了指自己的脏手。直到现在他才看到左手上有血迹。

“你在院子后面可以找到一只木盆。”店主用头示意吧台后面的那扇门。外面泥泞的地上摆放着木板。少尉洗了自己的手和脸，将就着擦洗了一下他的制服。他不知道鲜血从哪儿流出来。

他重新回到酒馆时，高个子已经不在那里了。

“那我现在也走了，到红色的农庄去过夜。”

坐在长桌旁的人哈哈大笑。其中有一个人大声叫嚷道：“我们管它叫作该死的农庄。”大家全都扑哧笑了。

“嗯，是呀，”店主咕哝道，“只是谁也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做客。”又是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又有一个人补充道：“那里非常非常安静，尤其在仓库里。”此刻，伙计们又怪声大叫起来，用拳头猛击桌面。店主不动声色。

让-巴蒂斯特·桑松走到野外，向上拉起大衣领子。他在夜色中果断地往回行进。倾盆大雨依然在下。他在路上看到了他的黑马。马已经死了。它躺在血泊中，尽管血一直在流，但仍然被雨水不断地冲洗掉。他突然想起那只马褡裢来了。他找了一会儿，可在黑暗里怎么也找不到了。

一刻钟之后，他到了那座该死的农庄。他看到房间里有一盏灯亮着。房子真的被刷成了红色，仿佛鲜血在雨中闪闪发光。他一路走过去，发现仓库后面有一间小祈祷室。它的入口处被一支蜡烛点亮。蜡烛在风中发出啪嗒声。他小心翼翼地顺着小石阶往下爬，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这又湿又滑的石阶上。他在入口处站了一会儿，瞧了瞧那座小小的圣母祭坛，烛光在那里闪烁不定。他发觉并非独自一个人在那里。他马上看到有个黑影。他缓慢地走过嘎吱作响的木地板，跪在之前在酒馆里和他攀谈的那名男子旁边。他把两肘支在祈祷用的长凳上，双手合十。他试着祷告。可他不愿去想任何祷告的事。这消逝的岁月使他感到疲倦。或许他的祷告也让上帝感到疲倦了。高个子转身面对他，注视他。在祈祷室做祷告似乎改变了他的模样。此刻他显得温顺而宁静。或许这也是因为酒精在起作用吧。祷告或者酗酒，两者几乎都有同样的效果，

桑松想道。

“您看到我的马褡裢了吗？”他问，盯住那个人看，目光咄咄逼人，仿佛在威胁他千万别对他撒谎。

“骑士，你的马褡裢搁在仓库那边。我已经打开看过。毕竟我想知道在我仓库里过夜的是谁。但马褡裢里并没有送到巴黎去的紧急公函。我担心你是因为私事才骑马出去。我在你的眼里看到你想要出去的愿望很迫切。不幸就在你的脚下。或许这是一种诅咒。有些人是被诅咒的。他们度过一生才能摆脱这种诅咒。可诅咒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们。他们失去了上帝之剑。上帝诅咒蛇诱惑夏娃，上帝诅咒该隐杀死了同胞兄弟亚伯，上帝也诅咒尘世和他的子民。”

“您别胡扯了，我不相信诅咒！”

“那你为何要在这种鬼天气里，像疯子一样冒着黑暗骑马远行？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你也会相信魔鬼，而如果你相信上帝和魔鬼，那么你也会相信诅咒。你究竟想要逃避什么？”

让-巴蒂斯特沉默无语。

“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命运，可无法摆脱这种命运。这就是诅咒。”

让-巴蒂斯特的手碰到了右半身。当他注意到自己的手时，才发现手上全是血。

“到仓库去，”高个子说，“我们必须清洗伤口。否则你永远看不到巴黎了。”

他举着蜡烛照亮了前面的路。马厩里的马匹开始急躁起来。有几匹马站起来，把头举得高高的。它们闻到了陌生的气味和血腥味。他在最

后一格马栏后面铺上新鲜秸秆，将一只棕色的粗羊毛毯垫在上面，请让-巴蒂斯特脱光上身。“我拿清水过来。”他说，将蜡烛摆在地上。

让-巴蒂斯特躺下来等他回来。他的耳畔只听到马蹄声。高个子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带来了干净的毛巾。一名年轻女仆手里拿着一只研钵跟在他后面。她跪下来，将几棵药草捣碎。“这是西门肺草，”那名男子说，“它可以减少炎症，防止化脓。”

“您是大夫吗？”让-巴蒂斯特问。

高个子没吭声，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清洗伤口。

“对，他是大夫，”年轻女子稍后说道，“他是好大夫。”她将药草重新放到研钵里，用训练有素的手将它们捣碎，然后把药膏糊上水，将这个混合药剂叫让-巴蒂斯特喝下去。尽管药味闻起来可怕，但他还是喝下去了。

“这种药草对你有用，”高个子低语道，“萝芙藤会夺走你的恐惧。它可以使你的身体和你的性情镇静下来。你不再感到疼痛，可以安心睡觉。”

“我不会害怕，我在新大陆战斗过。我见多识广。”

高个子似乎不为他的话所动。“明天醒来，你到仓库四周看看，或许会感到害怕。你还没有看到命运赐予你的所有一切。”

让-巴蒂斯特本想直起身，站起来，他想或许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为妙，可是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的思绪迷失在不可捉摸的感觉里。他还感觉到自己心里产生了恐惧，之后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外面，天色破晓。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一缕阳光从硕大的天花板开口透射进来。让-巴蒂斯特醒了。他慢慢站起来，打量着四周。他是睡在最后那间马厩旁。那里总共有四间马厩。马已经站在那里不耐烦地等着有人给它们喂草吃。它们好奇而烦躁地用头撞击马厩门。他把它们打量了一番，他喜欢马。可它们几乎没有成为骑兵马匹的能力。它们是被淘汰的对象，大概顶多还能为停放在院子里的马车拉拉货物而已。他在仓库周围东瞅西瞧。仓库很宽敞。木板墙上挂着马具。钩子上挂有铁制物品：火钳、脚镣和手镣、撬棒，地上的柳条筐里装满了皮带，一根炉条，几只中等大小的木桶里存放着动物脂肪、软膏、药粉、木炭、润滑油、肥皂、麸皮、沙子和锯屑，以及一只巨大的轮子。角落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布上放着什么东西。他拉住桌布的一角。染成淡青色的手指露出来了。他扯掉桌布，看到了一只胳膊，前臂、上臂乃至肩关节。胳膊肘被剥了皮，可以看到露出的骨头、肌腱和关节。

他被这可怕的恐惧攫住了。他重新想起了诅咒。他必须离开这个仓库。他的人生很有可能是要被诅咒的，可这个地方同样要被诅咒。他几乎刚做出逃离的决定，便陷入了惊惶失措之中，他担心自己会在最后一刻留下来。他急匆匆地走到仓库门口。外面的院子里响起了连续跺脚的马蹄声。想必至少有六七个骑兵吧。他将门扇打开一条缝。看到那些骑兵就是所谓轻装上阵的轻骑兵。他们身上带着滑膛枪，穿着白色制服。从制服的领子、袖口翻边以及翻领的颜色，看出他们属于布瓦西埃侯爵团部。对面住宅的房门打开了，高个子走到外面的院子里。

“你们的马需要喝水吗？”

“我们在寻找一名逃兵。你看到有人在这里闲逛吗？”

“谁也不会迷路到这里来。而且谁也不会自愿找到这个农家小屋来。”

领头的人用力把缰绳拉过来。他看上去时间很紧，然后又一次转过身来。“我们继续向巴黎进发。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会找你。好生留意着吧。”

轻骑兵用靴刺刺马的侧腹。马腾空驶离院子。其他骑兵紧跟在他后面。他们沿着森林方向去了。

让-巴蒂斯特屏住呼吸。等到轻骑兵走远，他才完全打开仓库门。可高个子挡住了他的路。他壮硕的上身遮住了阳光，使仓库变得昏暗起来。“别动，”他说，“只有这里你才会安全。整个冬天你应该待在这里。你可以帮我修缮屋顶。”

让-巴蒂斯特在秸秆里翻寻。“您是谁？”

“你在找你的马褡裢吗？”高个子问，走进秸秆。他一脚将那只袋子踢到让-巴蒂斯特跟前，让-巴蒂斯特立即打开翻寻。可袋子里空空如也。他怒不可遏地盯着高个子看，“袋子里什么也没有。”

“还有，我的军官证在哪儿？”

高个子从上衣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撕成碎片。他的双手粗大结实。

桑松想，这个人可不是坐在写字台旁挣钱的。

“那就是你的军官证，骑士。你现在用不上它了。你是逃兵。你到哪儿都找不到工作。你喝不到热汤，居无定所。你帮我，我也帮你。初雪马上降临，仓库里的秸秆就会潮湿而霉烂。我会帮你，但你必须发誓，你一定要待到春天才离开。”

“我向您发誓……”

“你不必向我发誓，骑士。应该在上帝面前发誓。如果你违背自己的誓言，我不会杀死你，但上帝一定会惩罚你。而上帝的惩罚要比死亡更恶心。”

“我向上帝发誓。只要我能在这里安生，我会做好您要我做的一切，直至我的团部撤离为止。”

“这个说起来容易，可是你愿意和魔鬼订立一份契约吗？”

“可以呀，”让-巴蒂斯特舌头有点不听使唤了，“可您又不是魔鬼。您可以减轻疼痛。”

高个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急切地观察他。稍过片刻，他说：“我可以减轻痛苦，因为我也可以叫人遭受痛苦。我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焰。它可以治愈伤口，但也可以叫人受伤，导致痛苦。如果你进入了我的世界，那么你就进入了痛苦的世界。”

让-巴蒂斯特盯着高个子那只残臂看。高个子会意地笑笑，走到桌子那边。年轻人跟在他后面，说道：“我会在初雪降临之前帮你把这屋顶修缮好。”

“你将和我同桌吃饭，睡在同一个屋檐下。为此你应该作为助手为我服务，直至那些树开出花朵。只要你的团部还在这个地区，你也可以多待上一段时间。我急需一名帮手。”

“找到一名帮手有那么困难吗？人们都在忍饥挨饿。在这种阴郁的日子里，人们只希望自己拥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工作。”

“但不是这种工作，”那人回答，“我们不只是修缮屋顶。”

“您究竟从事怎样的一种工作？”让-巴蒂斯特问道。怀疑写在他的

脸上。

“我是司法官。而你现在是我的助手，骑士。我是被社会唾弃的人。他们也会唾弃你。”

让-巴蒂斯特脸色煞白。他渐渐产生了阴森可怕的怀疑：“司法官为何遭受社会唾弃呢？”

高个子在黑暗中抓住挂在墙上的一件物品。他走到灯光处，让-巴蒂斯特看到那是一把双手剑。高个子将剑尖刺入木地板，双手握住剑柄。

“我是皮埃尔·约翰师傅，是沟得拜冈沟地区的死刑执刑官。我为鲁昂市和迪耶普副伯爵领地工作。”

“不！”让-巴蒂斯特绝望地咆哮道，“不！不！不！”

他从约翰旁边一路冲出屋外。一匹马站在院子的饮水处。他抓住缰绳，跃上马背。说时迟那时快，他正想用靴刺刺马的侧腹，尖锐刺耳的口哨声顿时在院子上空响起。那匹马马上待在原地不动了。让-巴蒂斯特顺着马头向前坠落，一声喊叫之后，跌倒在坚硬的石子路上。

约翰挑衅地站在他面前。“下次可别再干这种蠢事了，我会一直追踪你到巴黎，叫你吃尽苦头。我知道如何叫人生不如死。不要逼我。不要现在。我刚刚开始喜欢你。”

让-巴蒂斯特艰难地站起来呻吟着。他本能地抓住约翰前一个晚上清洗过的部位。那里又在出血。“我逃到新大陆去，可不是为了回来再做刽子手的，”他叹息道，“我去当兵是为了摆脱压在我们家族身上的那重诅咒。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所有我的祖祖辈辈，他们都是刽子手。他们来自庇卡底的阿贝维尔地区。”

“你应该为生在这样的家族感到自豪。”

“这不是我的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每个人必须占有上帝分派给他的那个位置。没有其他的世界。你必须满足事先被确定的条件。”

“曾经有过一个先人，他是绘图家……”

“尼古拉·桑松。”约翰说。

让-巴蒂斯特感到很惊讶。

“难道只是因为我是行刑官，你就以为我那么愚笨，那么没有文化吗？”

“不，约翰师傅。”让-巴蒂斯特撒谎道。

“你给我好好听着，骑士，你认为一重诅咒压在你的家族身上，你想要摆脱它。你离开你的家庭，你在部队里承担自己的义务，你去了新大陆，并且在那里战斗过。你幸运地活下来了，又回来了。你成了逃兵。你想要逃离家族的诅咒，可现在你成了我的助手。你认识到这种诅咒了吗？它就像你自己的影子那样紧随你。你可以认识到你的命运，可你无法摆脱它的纠缠。松树和暴风雨抗争，结果被连根拔起，可柳树宁愿弯下腰来，于是坚强地活下来了。你就接受这该死的人生吧，并且学会遗忘。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痛苦就产生了；当你想到未来的时候，恐惧就开始在你心里发芽了。试着只看到今天的日子。今天你不缺少任何东西。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约翰回到仓库，从桌子上拿起那只可活动的胳膊，指给让-巴蒂斯特看，后者吓得后退一步。

“你好好瞧一下这个东西：肩关节从这里开始。它由肱骨头与肩胛骨构成。肩关节几乎难以通过骨头结构被锁定，而大多通过肌肉系统达到稳固。这是一种魅力。唯有解剖这个部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这一点。唯有知道手关节如何发挥作用时，你才可以帮助我。普通的炎症在肿胀时会占据太多的空间，导致受感染者无法转动手关节。也就是说，必须让这炎症消退，而不能让它残留在胳膊上。任何一个刽子手都要比凡尔赛宫里的宫廷大夫更了解人体解剖学。

让-巴蒂斯特点点头。

“我可以教你很多东西，骑士，但你必须想学才行。”

“我会做您的帮手，约翰师傅。但如果明年春天我的团部离开这个地区，我也会离开您。”

约翰短促地笑笑，径自来到外面的院子里。让-巴蒂斯特待在仓库里。他走到自己的干草床铺上，捡起那只马褡裢。马褡裢里面还缝了一只小袋子。他摸了摸袋子。袋子里面也已经空空如也。他奔到院子里，对着约翰嚷道：“那只袋子里面也有东西的！您偷了我的东西！”

“不，”约翰说，没有转过身来，“我把它当作抵押物保存了。”

让-巴蒂斯特怒气冲冲，咚咚咚地回到仓库，将马褡裢扔到干草上，自己也躺在上面。

“约翰师傅从事解剖学研究。”一个女人和气地说道。让-巴蒂斯特转过身来，眯起眼睛看她。站在他面前的是那名女仆，她手里拿着一大杯红葡萄酒。这个女人大约三十岁了，穿着破烂。衣裙里面可隐约看到两只乳房的轮廓。她两腿细长，身材高大。他站起来，渐渐向她走近。昨晚他根本没有看清她的模样，竟然如此楚楚动人。

“上午他接待病人，”她说，“他开了一家小药房。他熟悉大自然的疗效，可到了傍晚，他执行刑事判决。”

约翰重新进入仓库。“没有我，整个秩序将会大乱；没有我，国王的宝座将难以为继。”

让-巴蒂斯特倚靠在一只啤酒桶旁。那里面漂浮着分辨不清的东西，看起来仿佛是人的手指。它们用绳子固定住。

“这就跟你看到的东西完全一样，”女仆说，“手指。被斩首者的手指。它们使啤酒变得更加浓郁芳香。所有被切下的四肢都具有神奇的力量，包括各种植物在内，只要夜里满月时被摘下，它们就可以在架子下生长。”

让-巴蒂斯特害怕地盯着她看。“这可真是神奇呀。”

“我叫若斯菲娜。我不是巫婆，”她会心一笑回答道，“我是约翰师傅的使女。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无法解释清楚的。我们唯有相信它们。我们相信死后有生，尽管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死后回来过，我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童贞女受孕，尽管在我们这个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相信死人复活……”

“而且我们相信霉运，相信上帝的恩赐，相信奇迹和诅咒，”约翰说，然后严厉地注视他，“你还可以有一天的时间出去酗酒，桑松，然后我在外面的院子里等你。下午两点。下午四点整，我们要在盐井广场执行一次判决。受国王的委托。我是人民的复仇者，而从明天起，你就是我的助手。好自为之吧。到场的人将会非常之多。他们期待看到一次庄严的轰动事件。戏有第一幕、第二幕和第三幕。到最后，主角丧生。巴黎的任何一个戏剧都比不过这样的戏剧性。”

盐井广场上空喧天的鼓声停下来了。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站

立在两米高的木制平台四周，位居平台中央的则为绞刑架。有一些人为了看清整个现场，像鸟儿一样爬在树上或者楼上。约翰师傅威严地爬上台阶走到绞刑架前，慢慢察看那些木板。这就是他的舞台。他穿着一件深红色料子做成的紧身上衣，上衣外面套着一件无袖皮制大礼服，那大礼服就像是一件护胸盔甲那样将上身扎紧。黑色马靴一直高至膝盖。此外，他还穿了一件宽松的血红色长大衣。他把大衣领子翻起来，看客们只能看到他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的一部分。人群开始鼓掌。喧天的鼓声再次响起。约翰耐心等待人们安静下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书面判决书，他的目光以命令的姿态从人群的脑袋上面扫过。大家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广场上的紧张气氛。观众们害怕他。可他们也喜欢这个两米巨人给他们带来的毛骨悚然的感觉。当喧天的鼓声再度静寂下来，让-巴蒂斯特·桑松带着不幸的布维耶爬上台阶来到绞刑架前。犯人穿着一件无袖红衬衫，双手反绑着。这名刽子手的助手头戴黑色风帽，齐眉高度上有两个开口，也为鼻子和嘴巴留出了一只小孔。所有这些都自愿演变成了化装服，因为它可以提高表演的价值，但也是为了让-巴蒂斯特不被人认出来。当然，要让一个爱凑热闹的人认出他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约翰曾经说过，一旦一重诅咒压在他身上，那么一切皆有可能，说完他心不在焉地盯着乌云看，它们在该死的农庄上空渐渐消散而去。

现在，约翰以可怕的雷鸣般的吼声宣读判决。先给布维耶上火刑，然后再绞死他。他偷了面包师的面包，愤怒的面包师穿越整个小城跟踪他，结果被他杀害。鼓声再次敲响。根据这个暗号，让-巴蒂斯特将死刑犯拉至木制平台中央的桩子那里。他把布维耶按倒，强迫他跪下，撕破了他的红衬衫。用于打上烙印的铁块已经在火盆里烧红。约翰师傅握住铁块，在灼热中转动了多次。紧接着，他将铁块压到囚犯的右肩上。皮肤嘶嘶地被烧焦了。布维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让-巴蒂斯特简直无法制服他，紧接着，一股恶臭飘荡在盐井广场上空。约翰师傅伸出头察看绞刑架。人群在鼓掌。让-巴蒂斯特从后面抓住布维耶的上臂，

让他回到原位。广场上突然寂静无声。他把绳索套在布维耶的脖子上系紧。布维耶几近麻木不仁地站在关闭的陷落活门上，闭上了眼睛。当约翰大声地问他是否还有话要说时，他只是有力地摇摇头。他希望尽快了结自己的生命。让-巴蒂斯特想确认自己并没有站在陷落活门上。约翰朝他点点头，心里平静如水，没有任何激动，对布维耶的命运不掺入丝毫同情的成分，于是让-巴蒂斯特触发了那个机械装置。陷落活门打开了，只听见嗖的一声，布维耶就像一袋面粉那样飞速掉入深渊，直至绳索猛然阻止他继续坠落。掉下去的身体重量紧压在他的喉结上，勒紧了他的气管。接着，他的脖颈断裂了。布维耶手脚还乱动了几下。他的身体松弛下来，尿液随即哗哗地流出来。人群发出大笑，又一次鼓掌。约翰显然对自己的表演感到很满意。他的准备工作做得无懈可击：他根据犯人的身体大小和体重核算了绳索的长度。只要犯一个小错误，就有可能导致布维耶尸首分离。这在判决文件里并没有做出预先规定。

骑兵出现在广场的末端。他们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他们是轻骑兵，穿着布瓦西埃侯爵团部的白色制服。他们将绞刑架团团围住。让-巴蒂斯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站在敞开的陷落活门前。被绞死者的尸体依然在那里摇摆不定。约翰向指挥官走去，后者恰好爬上台阶，走到绞刑架那里。

“我们有一份通告要宣读。”指挥官态度生硬地说，然后从约翰身旁走过。他展开一张羊皮纸，向人群宣读通告。轻骑兵在寻找逃兵。有一些在新大陆就逃走了，还有一些回到了法国领土才逃跑。其中有些人被指控在新大陆偷窃了团部的军饷，还杀死了两名卫兵。“对为逮捕逃兵提供线索者，布瓦西埃侯爵本人将提供两个金路易的赏金。”

指挥官重新卷起羊皮纸，以审视的目光朝那个蒙脸帮工瞥了一眼，然后疑惑地看着约翰。

“他是我儿子。”约翰用坚定的声音说道。

指挥官离开了绞刑架，重新腾空一跃跨上马。他给了其他轻骑兵跟他走的暗示。他们慢慢地在人群里辟出一条通道，离开了广场。

约翰和让-巴蒂斯特默默地坐在马车的木凳上。当他们俩将城市甩在后面时，约翰问道："你偷过团部军饷吗？"

"没有，"让-巴蒂斯特回答，"很有可能我悄悄离开部队时，有人白天干了偷窃的事，但我没干过。"

"那我从你马褡裢找到的金币，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您是说您偷我的那些金币吗？那是我玩纸牌赢来的。"

"我不会想到是这种情况。"约翰叽里咕噜道。他不相信他说的话。"那你为何要离开部队呢？"当注意到让-巴蒂斯特没回答时，约翰向他投去严厉的一瞥。

"我曾经驻扎在新大陆，在伯夫河畔。我们和法国的传教士们一起试图阻止英国商人和当地印第安人进行商贸往来。我们逮捕印第安人，用船只将他们作为奴隶送到我们加勒比海的种植场去。最后，我们得到命令，要把他们像兔子一样杀死。而这些印第安人实在太多了。后来，英国人来了，和一些部落结成了联盟。我们和契卡索人战斗，和纳齐兹人战斗。英国人派遣新的船只和士兵，建造堡垒。为了消灭他们，我们只好收买其他部落。可后来很多人病倒了。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想拿赏金的人剥掉了他们的头皮。那些神职人员为一个英国人的头皮支付一百镑。那真是罪恶。我们的团部人数因此锐减，幸免于难的人变成了觊觎赏金的人或者淘金者，或者成了逃兵回到法国。我看见过太多血腥恐怖的场面。"

"那你今天可以更容易忍受这样的场景吗？"约翰讪笑道。

“你在新大陆用步枪对逃亡的印第安人扫射，一把火烧掉他们的村庄，可你永远不知道是否把人弄成致命伤了，你也永远看不到一个被烧伤的孩子。可在您的绞刑架上，约翰师傅，当犯人的脖颈断裂时，我们甚至还能闻到他们身上的尿味。”

“还有一个区别，”约翰说，“在新大陆，你们杀人可以拿到军功章，可作为刽子手你只能遭到鄙视和唾弃，尽管你只能执行法庭命令你执行的任务。一个人只是完完全全做了社会要求他做的事，他们怎能唾弃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们希望看到绞死那些谋财害命的凶手，可他们自己却不愿意助人一臂之力。”

“谢谢。”让-巴蒂斯特稍后说道。

“我并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约翰撒谎道，“要是他们绞死了我的帮手，那我就没有帮手了。而且我想到我的帮手最终已经认识到，在布瓦西埃侯爵解散他的团部之前，他只有在我这里才会安全。”

“我会待在您身边，戴上黑色风帽。”

约翰朗声大笑。“这里的人喜欢这个。他们平时在这里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只面包要干上好几天活。唯一打发时间的消遣活动就是观看处决现场。因此他们的期望值很高。”

让-巴蒂斯特点点头。因为他对轻骑兵寻找逃兵的事还一直心有余悸。“我们为何不把尸体带走呢？”他之后问道。

“市政厅愿意做这件事，它可以起到威慑作用。只有尸体腐烂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它们取下，再埋葬掉。但并不是埋葬在墓地。”

让-巴蒂斯特考虑自己是否还有一条路可以摆脱命运的摆布。他现在不是可以直接从马车上跳下去吗？可他马上又想到了轻骑兵，他突然

有了一种印象，仿佛所有的一切必须服从整体。他可以溜之大吉，藏匿起来，尝试任何可能的一切，但他终究会死在绞刑架下。他没有别的选择。这一可怕的念头使他感到苦恼，他迷迷糊糊地凝视着那条乡间小路渐渐消失在马蹄下。

“到家后，我给你演示如何计算绳子长度。那是数学。”

让-巴蒂斯特没有吭声。

让-巴蒂斯特更感兴趣的，不是被绞死者的尸体解剖，而是药房，是植物药学和制造药物。也许恰恰是因为若斯菲娜常常待在药房里的缘故。她掌握一些植物疗效的知识，乐意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让-巴蒂斯特。有时他们一起徒步到森林里采摘药草。若斯菲娜教会他如何寻找植物，如何识别植物，以及如何收藏它们，以便它们不会失去药效。他喜欢和她在一起。他喜欢她沉静的性格。她给了他平静和安宁。他也不在乎她从不向他透露自己的过去。他也从未刨根究底。或许他是害怕重新失去宁静的生活吧。偶尔他完全没有好好听她说什么。他凝神谛听她抑扬顿挫的声音，而不是注意她在说什么。

约翰、若斯菲娜和让-巴蒂斯特，三个人相守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旁，一起玩纸牌度过漫长的冬夜。在那些美妙的夜晚，他们还一起品味葡萄酒。让-巴蒂斯特发觉约翰和若斯菲娜的关系非常亲密。可他弄不清他俩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对一名女仆而言，难道这是一种慈父般的关怀吗？难道她就是他的情妇？他在这方面没有想得太多，因为他只是等待布瓦西埃侯爵能够最终解散掉他的团部。可有时候，他会突然冒出赶紧消失的念头，但内心深处总有某种东西在抗拒着。他担心触犯一个崇高的准则。他必须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且因为这里还有若斯菲娜。总算还有若斯菲娜。他从不知道她是否喜欢他。或许在她看来，作为一个女仆的生存要比和一个逃兵不确定的将来更好。另外，完全无法肯定的是，是否她有朝一日会离开约翰师傅。她属于那种为了服务于他人宁

愿牺牲自己生活的人。他们放弃过自己的生活，这一点难以解释。很显然，也有一种诅咒叫行善。

“打牌！”约翰打破了他的沉思。让-巴蒂斯特这才意识到自己洗牌时间用了太久。他尴尬地笑笑，开始发牌。他们总是玩牌至午夜时分结束，然后最后一次举杯互道晚安，年轻人回到仓库，很快沉入了梦乡。

春暖花开时，约翰获得了奥吉地区的一份刽子手工作。他为此感到很自豪。他暗地里满怀成为一名伟大的刽子手的梦想，就像是一位著名演员在其他城市和地区进行访问演出一样。酬金丰厚，这个不言自明。他不希望让若斯菲娜单独留在这个所谓该死的农庄里，便通知那里的市政厅说，想聘用当地的一名行刑助手，并想借用奥吉地区那位重病在身的刽子手的刑具。假若能这样，让-巴蒂斯特就可以陪若斯菲娜留在家里了。

临行前，约翰回到自己的药房，将两棵洋蓟捣碎。再加上苹果酒和几个士兵从新大陆带回来的育亨宾树皮粉末。最后他还添加上玛卡根粉，玛卡是印加人的一种神圣植物，是由西班牙航海家率先带到马赛去的。“今晚试一下，”约翰对让-巴蒂斯特说道，“然后告诉我，它的效果有多迅速和强大。它对你的胆汁和肝脏有帮助，并且促进供血”。当他看到让-巴蒂斯特脸上的怀疑目光时，他哈哈一笑。“你吃了可不会死掉，骑士。它不会对你有损伤。最坏也就是不起作用罢了。”

约翰在一本黑色小册子上对如何调制这杯酒做了详细记录，然后告辞了。

夜幕降临，让-巴蒂斯特过去照顾马匹时，若斯菲娜踏进了仓库。若斯菲娜显得心情舒畅，兴高采烈。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怎么的，她要比平时更漂亮了。难道他到现在才发觉她实际上有多么美丽动人吗？

“现在就剩下我们俩了。”她突然说道，冷不防站在他面前。她请他跟平时一样到厨房去。她做好了豆饭，配上了熏板肉和洋葱。他们一声不吭地吃着晚餐。

“我们彼此心心相印，不用说什么大话。”若斯菲娜说。他点点头。

稍后，她递给他那杯洋蓟酒。“喝吧，”她嫣然一笑，“为科学干杯。”

让-巴蒂斯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酒喝起来有点儿苦涩，但因为加上了白酒，口感好多了。当他重新搁下杯子时，她伸出了手。他一把抓住她的手，她接着说道：“睡到房间里去吧，让-巴蒂斯特。”他犹豫不定着。“夜里还是挺冷的。”她说，微笑起来有点笨拙，然后站起来。她还一直拉着他的手。她慢慢把他带到屋顶下挂着的亚麻袋后面，正是这些袋子将厨房和睡房分隔开。她解开裙带，脱下衬衣，满怀期待地注视他。他也几乎同步地脱下衣服，先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继而越来越迅疾，充满着激情。在脱下自己所有的衣服之后，他停顿了下来，直等到她也同样脱光身上的衣服。他喜欢她直奔主题。

他们一起坐在厨房里，吃着卷心菜和约翰临走前用铁锹砸死的那只鸽子。

“我感觉自己吃撑了。”若斯菲娜说。

让-巴蒂斯特微笑着回答，注视着她好久。

“我会是个好妻子。”她轻声道，仿佛猜出了他的所思所想。

“我知道，”他说，“你很能干，也很可爱，而且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若斯菲娜满意地微笑着：“你也是，我们会合得来的。”

“或许现在还太早吧。”他沉思着说。

“太早？”她生气了，“孩子必须早生才好。你还想等什么？”

“等待命运的暗示。”

“我不相信命运。一切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决定自己想要走的路。”

她的话令他感到吃惊。他握住她的手点点头，温柔地抚摸她的手背。

他们的爱情并非没有结果。若斯菲娜怀孕了。一天早餐，她在房屋和仓库之间的井边晕倒时，约翰急忙奔过去救助她，把她抱到屋里，抱到她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出屋子，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仓库那边。他一把打开嘎吱作响的木门。灯光使让-巴蒂斯特晃眼。他依然躺在干草床铺上。约翰抓住门后的那把大斧子，走到他跟前。

“若斯菲娜怀孕了。你要跟她结婚吗？”

让-巴蒂斯特默默无言。

“你好好听着，骑士，我会关心我的伙伴和助手。如果他们老弱病残了，我会让他们留在我身边，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地，也给他们提供热菜热饭，这是刽子手的传统。我们砍下罪犯的脑袋，绞死犯人，可我们为自己人的命运承担责任。”

让-巴蒂斯特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做出妥协。就在这一刻，他讨厌起约翰来。有人又想要决定他的命运了。他又一次想到了那只马褡裢。是约翰偷了他的马褡裢。“是的，”他听到自己在说，“我要跟她结婚。”紧接着他压低声音补充道，“等孩子出生后，我要带若斯菲

娜和孩子一起搬到巴黎去。”

约翰把斧子搁到地上。他显然搞糊涂了。“你想和她结婚这很好，可你想离开这个农庄就不对了。你想去巴黎干什么？忍饥挨饿吗？去偷去抢吗？巴黎就是一个大粪坑，一个垃圾场，污秽不堪，到了夜里，巷子里不安全，人们没有工作，面包太少，他们都快要饿死了。待在这里吧。你可以成为我的接班人，将来有一天，你的儿子也将成为你的接班人。”

“我希望我的后代避免遭到诅咒。他们应该成为自由人。过那种遭受唾弃的生活可不是人人都喜欢的。”

“别匆忙做出决定，骑士，再好好考虑一下吧。过几个晚上，或许你就会改变想法。刽子手待遇优渥。而在这里的乡下你总能找得到几个土豆。可你并不需要它们，因为你是刽子手。在这里法律允许我们：只要你两只手抓得住，你在市场上尽可以随便拿走多少水果、蔬菜、鱼肉，甚至鸡蛋。统统免费。”

“我知道。您难道忘记了我也是来自刽子手世家吗？您难道也忘记了我度过我迄今为止的生活，只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吗？”

“骑士，”约翰以非同寻常的慈父般的口吻说道，“我会传授给你植物药学的所有一切。我们不仅执行判决，甚至还要种植土豆”。

“我还以为只有新大陆才有土豆呢。”

“不，”约翰大笑一声，“他们已经在勃艮第种植土豆了。我的院子里就有一些。它们味道好极了，而且土豆皮可以减轻灼痛。”他的脸部表情开始舒缓下来，变得温和了。他非常希望让-巴蒂斯特能够留下来，他们可以一起组成一个家庭。“骑士，别忘记我当时在那间祈祷室里跟你说过的话。你可以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可你无法逃脱命运的安

排，这就是诅咒。而如果你想抗拒它，那生活就会制伏你。”

“不，不，”让-巴蒂斯特固执地说道，“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他就可以摆脱它。人是自由的，约翰师傅。”

“人还从来没有自由过，”约翰以不祥的声音说道，“人一辈子做事，却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做。他就像一只动物，留下足迹后再也无法被抹掉。”

1739年2月，最初的阵痛开始了。约翰请让-巴蒂斯特骑马进城叫一名助产士上门。

“我还以为刽子手也可以干这活。”让-巴蒂斯特惊讶地说。

“我缺乏训练，”约翰回答，“假若这是某一个女人，那我会这么做，可遇到若斯菲娜就不行了。她需要城里最好的助产士。”

让-巴蒂斯特策马奔向邻近的小城，他们就是在那里的盐井广场上执行判决的。和平时一样，那只绞刑架已经在上一次处决数日后被拆除。此刻货摊上可供选择的水果和蔬菜少得可怜。无以数计的人们在广场上闲逛。绝大多数人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今天清晨，这些人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薪饷后光荣退役。他们就是来自布瓦西埃侯爵团部的人。侯爵终于解散了自己的部队。让-巴蒂斯特试图明白过来：他自由了！他不必回到那个该死的农庄。他可以选择，可以决定。自由了。

城里最好的助产士名叫莫尼克。她和年长好多的哥哥一起居住在一栋崭新的木框架结构的房子里，那些拓荒者从新大陆回到法国之后都建造这样的房子。承重梁由一根根染成黑色的清水梁组成，而梁与梁之间的间隙则由黏土和砖瓦堆砌而成。德国木框架结构房子有着几近几何图形布置的清水梁，然而和这种房子结构相反的是，这座城里的这些房子排列得混乱不堪，好像那些建筑师永远喝醉酒似的。

让-巴蒂斯特敲门。他没法弄明白，一个助产士竟然住得起这么大的房子。一名使女打开房门。

“我要找助产士莫尼克。她住在这里吗？”

“对，她和大夫先生住在一起。大夫是她的哥哥。”

他被带到那间宽敞的客厅里。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坐在客厅里一张木椅上，椅腿上装上了轮子。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机械装置可以让他独立挪动位置。

让-巴蒂斯特稍稍鞠了个躬。“您好，我想为约翰师傅的女仆找一个助产士。”

“约翰师傅，”老人讪笑道，“他还一直住在那个该死的农庄吗？”

让-巴蒂斯特点点头。

“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有女仆了？”他听到一个女人刺耳的声音在他身后嚷道。让-巴蒂斯特转过身来。在他面前站着一个丰满的女人：莫尼克。她实在是太胖了，一说话连呼吸都感到困难。“那个女仆究竟叫什么名字？”

“若斯菲娜。”

老人顿时大笑起来，可他的笑声随即变成了令人恶心的咳嗽。

“快点呀！”让-巴蒂斯特叫道，“阵痛早已开始了。”

“我们的若斯菲娜怀孕了，”莫尼克朗声大笑，“那孩子的父亲是谁？”

“是我。”让-巴蒂斯特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

“我当时把小若斯菲娜带到了这个世上，”年迈的大夫和蔼可亲地摇摇头，然后对他的妹妹招手，说道，“给我倒一杯苦艾酒，也给这位年轻人来一杯。”

“您现在过去，还是不过去？”让-巴蒂斯特坚持道。

“我是不会帮任何一个刽子手接生的。”莫尼克说。

“说得对，妹妹，如果你给一个刽子手女儿的孩子接生，谁也不会再上我们家来了。那好，您喝了这杯苦艾酒就走吧。”大夫家的使女递上了两杯酒。

“您是想暗示，若斯菲娜是约翰师傅的女儿吗？”

“暗示？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吗？让他女儿受孕，这只老狐狸已经等了多年了。我了解约翰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哪怕只被搞过一次，所有的女人都会怀孕。仿佛连大自然都知道，她们只要一次性生活就够了。而那些男人，不错，这个家族里的男人都会成为刽子手。您必须承担这一职务，先生，您之后就是您的儿子。这就是这些人的传统，您就生活在他们之中。”

“您搞错了，先生！”

“不，”年迈的大夫说，然后举起他的空杯子，好让人再给他斟上酒，“正如我在我的眼里看到黄疸病一样，我在您的眼里看到许多鲜血，这个您早已看明白了。不，年轻人，谁也不会为一个刽子手的出生而离开这个屋子。”

让-巴蒂斯特把莫尼克推到一边，仓促地离开了客厅。

他疾步奔向院子，骑上马。回家路上，从当时的士兵小分队飞驰而过时，他听到有人呼喊他的名字。有一些人想跟在他后面，可他们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他们发出怪叫声和狂叫声，而让-巴蒂斯特希望他们马上离他远去。他策马疾驰，希望尽快回到那个该死的农庄。他在院子里就听到了令人哀怜的呻吟声。他冲进屋子，走到若斯菲娜床前。她在睡觉，脸上全是汗。床脚摆着沾满血的床单，还有一只双把大木桶倒满了热水。约翰师傅坐在一只凳子上，手里抱着一个小襁褓。他轻轻地说道："我有外孙了。"

"我知道，师傅。"让-巴蒂斯特说。他想抱起自己的儿子，可是约翰回绝了，仍然抱着这个新生儿。"我有外孙了。"他喃喃自语。让-巴蒂斯特开始不乐意了。毕竟他是父亲，而不是随便一头给老迈的约翰传宗接代的种马。

"我想现在就要我的儿子。"他终于发出尖锐的声音。

约翰向他投去疑惑的一瞥。他还从未领教过骑士这种态度。他只好表情漠然地将婴儿交给让-巴蒂斯特。

几天后，让-巴蒂斯特和若斯菲娜结婚了。这是一个静悄悄的婚礼，没有任何客人光临。

他们彼此爱慕，琴瑟和谐，生活得非常幸福。

对约翰师傅来说，所有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丈夫，并赐给他一个外孙：夏尔-亨利，又名夏尔。家族的香火得以延续。约翰知道他的女婿把生活想象成另外一种模样，可他认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并非为了使自己幸福，或者为了实现某种梦想。不，人生由痛苦和折磨组成，而幸福就在于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并且担当这个位置。

“我要和夏尔骑马出去，给他看那条河。”让-巴蒂斯特走进约翰的药房时说。小夏尔坐在地上和动物木偶玩，这些玩具是外公特意为他雕刻的。

“你就让孩子先待在这里吧，”约翰说，头都没转过来，“他正在玩呢。”

“我想和我的儿子一起骑马出去。”让-巴蒂斯特重复道。

约翰这才转过身来，摇摇头说：“你怎么了？这孩子喜欢在这里玩。他现在不想出去。”

“我想和我的儿子一起出去，难道还要征得您的同意吗？”

“你可用不着那么敏感。”约翰说完，又重新沉浸到自己的工作中。

让-巴蒂斯特一把举起小夏尔。“他是我的儿子，”他说，“按照原订的计划，我们要到巴黎去。”

“他是约翰家的骨肉，”老人没好气地斥责道，“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液。”

“他是桑松家的人，”让-巴蒂斯特反驳道，“他的身上流着我的血液和若斯菲娜的血液。我们仨都要搬到巴黎去。或许最终您会把我那只马褡裢里面的东西还给我！”

两个人彼此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若斯菲娜试图出面调解，过了好几周后，她强迫两个男人一起玩牌度过了一个晚上，就像他们原来有过的好时光那样。可眼前的气氛变得很压抑。他们一言不发地玩牌。快要就寝时，若斯菲娜给酒杯倒上酒。

“我知道，”约翰稍后嘀咕道，“他是你的儿子，但他也是我的外

孙。”

若斯菲娜脸上显出一副担心的样子，越来越紧张不安地观察两个男人。“你们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忧心忡忡地问道。

“我们要搬到巴黎去。”让-巴蒂斯特回答。

约翰惊恐地扬起眉毛。他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他害怕变化。“我以为这个话题已经了结。我们不是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吗？如果你到巴黎去，那你就是选择了贫穷。你要到巴黎去干什么？”他问道，口气明显很恼火，“在巴黎你可以做刽子手。骑士，可要是这样，那你同样可以待在这里。”出于习惯，他还一直将他的女婿称为骑士。

“我希望从事某一种职业，”让-巴蒂斯特固执地回应道，“车工、商人、鞋匠，任何一种职业都可以，除了刽子手。”

约翰不解地摇摇头。“我跟你说这话你会有点不乐意，骑士，可你真是个笨手笨脚的人。你只能干干粗活。你得干些其他人干不了的活。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采集肥料，每一个傻瓜都能干这种活，而傻瓜之中的竞争最激烈。你还可以学很多东西，比如在解剖学或者植物学方面，但你在这里还得待上一段时间。我不会永远活着，骑士。到时你们再去巴黎好了。”他表示和解地结束了自己的话，然后朝小夏尔那边望了望，小夏尔正在地板上玩木制士兵游戏呢。可想到女婿坚持不让步，他几乎感到绝望了。他再也不能给他的外孙雕刻小动物了。“不，不，”他大声地说，“你待在这里，慢慢就会习惯了。”

让-巴蒂斯特显然生气了，他不想再等下去，不希望再这么耗下去，这样空等下去很可能就要遥遥无期了。

“你真以为巴黎人愿意让一个来自外省的刽子手卖给他们面包吃，

卖给他们酒喝吗？”约翰重新激动起来。

“父亲说得对，”若斯菲娜小心翼翼地说，“你找不到工作，没有比刽子手的职业能拿到更好的薪酬的了，让-巴蒂斯特。我们的小夏尔将来应该做什么？你必须成为刽子手。为了你的儿子。”

“可不是在这里！”让-巴蒂斯特坚持道。他知道得很清楚，约翰这辈子永远不会搬到巴黎去住。“如果我们现在不走，那我的渴望将不复存在。我不能一辈子按照他人的愿望行事。否则当年我也不会逃到新大陆去了。”

约翰将他的牌扔到桌上，将酒杯里的酒喝完。他拿起杯子离开了厨房。

让-巴蒂斯特想不惜一切代价到巴黎去。他并非用梦想消磨时间，每到夜里，他就让自己的梦想醒着。他瞪着大大的眼睛盯着黑暗处看。他的要求始终无法得到满足。

自那天晚上起，这个该死的农舍变得更安静了。约翰尽心尽力地为女婿传授新的医学知识。要想让外孙在药房里度过时日，他必须做出牺牲，他让让-巴蒂斯特了解植物药学的奥秘。可事实上他将这些奥秘也都教给了小夏尔。小夏尔求知欲极强。而且总是有问不完的各种问题。那些药草和它们的作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马上就熟悉了所有的药草，这些带来神奇疗效的药草，他也很清楚何时以及在哪儿可以采摘到它们。这倒是挺中让-巴蒂斯特的意，但他嫉妒岳父拥有那么渊博的知识。他不久就发觉他在药房里只是一个陪衬，只是为了让约翰和夏尔待在一起。夏尔喜欢外公。由于他的周围没有同龄的玩伴，他自愿在药房度过绝大部分时间，并将外公搁在工作台上的一切磨成粉末：药草、香料、叶或茎、花朵、树根以及树皮。夏尔的记性很好。他会注意到它们的芳香、颜色、稠度，尤其是合适的剂量。因为只要有机会，外

公就会苦口婆心地告诫他，任何一种混合而成的药剂既可以救死扶伤，也可以叫人一命呜呼。仅仅视剂量的不同而定。

小夏尔年纪很小时，约翰外公就教他读书写字，指给他看那些有关植物学和药学的书籍，特别是那两本带有精美插图的巨著。夏尔每天都要翻一翻那两本书。他可以长达数小时之久地告诉母亲自己学到的知识。母亲倾听儿子说话时颇为自豪，几乎是聚精会神地，不让他注意到其实他说的这些她早就知道了。那段日子很太平，约翰和让-巴蒂斯特不必经常到盐井广场公干。日子过得很太平，可让-巴蒂斯特感到不满意了。他要搬到巴黎去的愿望始终未变，这种渴望强烈而又充满挑战性。偶尔他试图和若斯菲娜谈谈巴黎的话题。可每次她都是万般温柔地拥抱他，对他报以微笑。“我们在这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我们什么都不缺呀。”碰到这样的时刻，他就觉得，对若斯菲娜的爱和无条件照顾好夏尔要比巴黎更为重要。对若斯菲娜作为已婚女子听从父亲的话，即便他没有任何吩咐她也会顺遂父亲的心意这一点，他同样表示理解。他实在太爱她了，因此根本不会做出令她感到伤心的任何事情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完全听命于她的。因此，他继续为自己戴上黑色风帽，耐心地等待约翰老死。他认识到约翰也会越来越老，他渴望自己将来有一天甚至能够看到约翰去见上帝的那一刻。他希望自己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成为夏尔的父亲，可以单独拥有若斯菲娜。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1744年夏天，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小夏尔五周岁生日不久，若斯菲娜突然去世。约翰师傅也不清楚她死于何种疾病。或许上帝也不知道吧。若斯菲娜似乎睡得很安详。约翰认为或许她发生了内出血。动脉有时会在体内、头部或者心脏发生爆裂。这种事在约翰家族出现较为频繁。人犯困了，睡着了，失去了知觉，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若斯菲娜被埋葬在祈祷室后面。夏尔尽管一声不吭，可眼泪却顺着

脸颊汩汩而下。他紧紧抓住让-巴蒂斯特的手，仿佛希望确信父亲不至于也会回到亲爱的上帝那里去，让-巴蒂斯特很诧异，他的小夏尔竟然还把上帝称作“亲爱的上帝”。唯有那位邮递员出现在葬礼现场，可他并非出于哀悼，而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封约翰的信。约翰连看都没看就把信塞进自己的短上衣口袋里。他想喝酒。上午喝，中午喝，晚上喝，整个夜里也喝。约翰师傅从地下室里拿来最好的葡萄酒，他和让-巴蒂斯特一连喝了好几天，神志不再那么清醒了。夏尔坐在沙发上，翻阅外公的那几本珍贵的植物学著作。他时而会稍稍抬头瞧瞧。看到两个男人还在喝酒，于是继续看书。

一天上午，约翰师傅跌跌撞撞地走到院子里，从马厩里牵出两匹马，将它们驾在车前，然后重新走进厨房。让-巴蒂斯特趴在桌上睡着了。当约翰昏昏沉沉坐下，冷不防弄翻酒杯时，他才如梦初醒。他感到头痛欲裂。他知道出什么事了，恍然想起若斯菲娜已经不在人世。

约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交给女婿。“前一阵子，我给巴黎法院写过信，申请巴黎的空缺职位。现在那位巴黎刽子手死了。”

让-巴蒂斯特仔仔细细看完信，却只是默不作声。

“这可真是意外的惊喜，”约翰咕哝道，“我原本以为，如果我们一起搬到巴黎去，你会感到高兴的。我是特意为你们申请的。”

“巴黎法院皇家委员会任命您为新的巴黎刽子手了吗？”

“是的，而且不仅任命我，也包括你。请抓住命运递给你的手吧。别犹豫了。”

对让-巴蒂斯特来说，这一切完全在预料之外。

“你必须在9月23日到达巴黎。别再等了！到了9月，天又湿又冷，

马路会变软。”

让-巴蒂斯特倒上酒，问道：“那你呢？”

“我开始经历人生之秋了。我发觉冬日已临近。不过你不用在意。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将获得一万镑的年收入，这是我工资的三倍。”

让-巴蒂斯特沉默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多想着你的儿子。巴黎的租金很高，你还需要一个女仆。”小夏尔坐在约翰的怀里，担心地看着他。约翰把他重新放下。“现在，既然你去意已决，那就赶紧走，”他没抬头看一眼让-巴蒂斯特，继续说道，“马车已在院子里准备好了。马我也已经套好了。我不会再用到它们了。另外，你走的时候别忘记把书带上。书是给夏尔的。他是聪明的孩子。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你就把他送到学校去。总有一天，任何诅咒都有结束的时候。我想他不会接你的班。你没有得到的机会，就好好提供给他吧。”

约翰拿起酒瓶，离开厨房。然后他又一次将头探进门里。“你的金币放在若斯菲娜的床头柜里。马褡裢在仓库里。现在你真的可以告诉我，你的金币是从哪儿弄来的。是偷的吗？”

“不，我是在新大陆的泰瑞罗杰战场上从一个死去的军官身上搜来的。”

“盗尸者。”约翰轻蔑地说。

“钱这东西，死人可带不走，”让-巴蒂斯特说，“我要把金币用在夏尔的教育上。”

约翰转身走了。他穿越院子，消失在仓库后面。让-巴蒂斯特和夏

尔待在厨房里。他把前一天的土豆烧热，然后把它们和新鲜的蒜头、洋葱、罗勒和乳酪放在一起煎。约翰师傅没有回来。让-巴蒂斯特决定过去找他。他们应该一起吃上最后一顿饭。

他走到院子里。约翰已经在马车里铺上了一条粗羊毛毯。此外，他的几本药学参考书也已经用绳子捆紧放进了车里。让-巴蒂斯特突然闻到一股焦味。他起初以为是土豆烧焦了，可马上想起自己已经把锅子从炉火中端走了。烟雾从仓库后面袅袅升起。夏尔从屋子里奔出来，大喊道，肯定是哪儿着火了。他们急忙奔到仓库后面。烟雾从那间祈祷室里冒出来。入口上方有一根镌刻着铭文的横梁。约翰师傅吊在横梁上来回晃动。

“这真是诅咒啊，”让-巴蒂斯特喃喃道，拥抱夏尔，“我希望你将来只有女儿。不要有儿子。闹鬼的悲剧必须终结。”

“那我呢？难道我也必须成为刽子手吗？”

“时辰一到，你自然会知道。”

---

[1]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1/20镑，后来相当于1/20法郎。

第2章

让-巴蒂斯特·桑松和夏尔驱车前往巴黎。约翰师傅那些最珍贵的器具他都已经装入马车里了：除了工具之外，还有整个药房、昂贵的书籍以及一堆血迹斑斑再也无法洗干净的衣服。让-巴蒂斯特在策马扬鞭时想到，等到将来有一天，衣服上面全变成红色时，就会看不到那些斑斑血迹了。当你用刀将犯人的头颅从躯干中分离，你早就看不到从他们身上溅出来的血迹了。他在约翰的地下室里发现小罐装的苹果酒，他把这些酒也放到了马车里。他肯定需要酒喝。自从和夏尔离开那个该死的农庄以来，阴郁的想法始终在折磨他。诅咒这种东西究竟是有还是没有？约翰说过，如果你相信上帝，那么你也必须相信诅咒。而假如诅咒是上帝的一件工具，那么这就近乎要和亵渎神灵抗争了。他真的怀疑，世上发生的一切是否源自臆想中的上帝的旨意。可他不敢陷入这样的沉思之中。那种为此必遭报应的恐惧感太过强烈。于是，他们只好默默地穿越森林。小夏尔有时低声道："这是栗子树"或者"这是金合欢树"。说完他抬头看着父亲，一直等到他颔首为止。外公把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他。夏尔认识这些山毛榉——白色的、红色的山毛榉——那些槭树——花楸树、篠悬木槭和穗花槭，以及那些紫杉和橡树。树木开始凋零，林地上落叶缤纷，覆盖了一层橘黄色，好像是为了保护道路不被渐渐来临的冬天冻坏。他们中途还稍停片刻，因为夏尔要小解。他仿佛做梦似地四处游荡，俯下身去探看在树叶中找到的东西。"一条蠕虫，"夏尔说，并指给父亲看，"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蠕虫。"

让-巴蒂斯特无力地微笑着，示意夏尔重新上车。"让这条蠕虫自己忙活吧。它和螨虫和虱子一起将树叶加工成腐殖质层。所有的一切都有存在的意义。"

夏尔点点头上了车。他们驶离森林时，他突然问父亲为何现在想要到巴黎去做刽子手。他不是从来都不喜欢这份工作吗？让-巴蒂斯特若有所思地看着儿子。最后，他越过那两匹小跑的马重新向前远望。"我不想做刽子手，夏尔，可是我必须做。我没有其他选择。"

“你不是可以做其他事吗，谁也看不到你，谁也不会知道。”

“你可是大大地搞错了，”让-巴蒂斯特很不高兴地说，“难道河流有选择吗？它在自己的河床里流淌，有时越过河岸，可它无法改变流向，只能终结在大海里。”

他们沿着苹果种植园向巴黎方向迈进。让-巴蒂斯特时而谈起他的青年时代，谈起新大陆的经历，可夏尔只是沉默不言。尽管如此，让-巴蒂斯特可以肯定儿子在仔细倾听他的话，他的声音可以让他放下心来。

“我会成为刽子手，”让-巴蒂斯特忽然说道，“这样你就永远不必成为刽子手。我爱你，夏尔。你比我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我会竭尽所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几年之后大夫的职业还是你的理想，那你应该成为大夫。”

他们远远地看到有两名男子站在马路边上。让-巴蒂斯特出于本能将一只手放到自己剑柄的把手上。当马车抵达那两个陌生人身边时，他们请求搭个便车。他们是准备到巴黎寻找工作的临时工。他们衣衫褴褛，饥饿使他们的身体显得很消瘦。可他们刚上车，看到刽子手的行刑用具，又赶紧惊恐万状地下了车。“他是刽子手！”其中一个嚷道。“他为什么不作自我介绍？”另一个满腔怒火地吼道。让-巴蒂斯特坚定不移地继续赶路，任凭几块石子从他的头顶上飞越过去。“你看到了吧，”他对夏尔说，“你在尽自己的责任，可那些人却因此瞧不起你。我们将生活在责骂和耻辱中。”

儿子抬头望着父亲，抓住他的胳膊。“我将来做了大夫，你就不必再去工作了，爸爸。我要发明一种能治好母亲疾病的药。她会为我感到自豪。”

“有计划当然是好事，夏尔。人们预先确定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可那些人一旦制订计划，上帝就发笑。整个老天在发笑。因为有人从那上面嘲笑我们。”

夏尔点点头，尽管他没有真正明白父亲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忧伤。他搂着父亲的脖子，将手压住他的胸口。“你向我保证永远不离开我。”

“我向你保证，夏尔，上帝是我的见证人。”

两日之后的早晨，他们驱车途经巴黎的一座城门，在税务站等着海关关员检查。让-巴蒂斯特出示了巴黎法院的通行证，马上又畅通无阻地继续前行。有个别农民为了要把他们的牲畜赶到市场上去，索性起了个大早。天色破晓之后，他们再赶着牲畜就不会被放行了。让-巴蒂斯特向行人打听路。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发觉，人们不断地将他带到最不堪入目的住所。“你是在找那个去世的刽子手的家吗？”有一个人问道，“我们把它称为刽子手旅馆。”该旅馆坐落在巴尔塔街，隐藏在对面那些楼层更多的房子的阴影里。这是一幢阴森森的房子，一座八角形的钟楼耸立在房子上面。这幢楼位于集贸市场边上，据说每到夜里，大楼里可以听到被绞死者和被砍头者的灵魂在呻吟，而在市场上，日日夜夜都能闻到热乎乎的血腥味和鱼下脚的臭味。流浪狗在污浊的水中东奔西窜，污水把它们的爪子染成血红色。这里至少有人吧，让-巴蒂斯特想。就算他们想要回避他，他也不可能完全是孤身一人在那里。因为整个白天，那里一直处在喧哗之中，它促使人想到自己不会是孤家寡人。自从若斯菲娜去世后，他讨厌孤独。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为他们打开门。“我叫让娜，博勒加尔街上那个车工的女儿。”她热情地微笑道。可小夏尔的脸蛋愣是一动不动。当她向他伸出手时，他却向后退缩，仿佛对方有一把烧红了的钳子在威胁他。让娜没再坚持。她中等身材，看起来非常结实，脸形滚圆，可以看出她花在厨房里的时间非常之多。她把自己的棕色长发编成两条

辫子，它们将她的脸围了起来，使她的面孔看起来更加丰腴。她领着让-巴蒂斯特和夏尔穿过窄小逼仄的房子。起居室的木制天花板用的就是绞刑架那边的地板，而一到集市日，窃贼和罪犯就会在那儿的耻辱柱旁示众。房子后面有一个院子。和院子相邻的是一间马厩、一个药房以及一间工具棚。让娜解释说，除了死去的刽子手本人外，这间工具棚还从未有人进去过。此刻他们仨站在院子里。一条狗摇着尾巴向他们走来。夏尔重新抓住父亲的胳膊平放在他的胸口。狗嗅了嗅他的裤子。

“我能看一下那间工具棚吗？”让-巴蒂斯特问。

“您别问我那个老刽子手究竟在那里存放了些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里有时候可真是臭气熏天。”她悄悄地瞅了一眼夏尔，其实是想让做父亲的明白这间工具棚并不适合给孩子看。她用右手挡住夏尔的眼睛，和他一起后退。“我们在外面等。”

让-巴蒂斯特走进去。一股可怕的恶臭扑面而来。那是一股甜腻而刺鼻的腐烂味。敞开的窗户下面有一把躺椅。躺椅上面有一具无头尸体。那个脑袋躺在两膝之间。让-巴蒂斯特想，显然他的前任和约翰师傅有着同样的嗜好，他要先解剖被处死者的尸体，第二天才派人把尸体送至墓地。他走近尸体。看到一个没有脑袋的身体，总是让人觉得怪异。这是违反常理的。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让他感到害怕。他知道命运毫无怜悯之心。他在美洲新大陆和欧洲旧大陆看到过人是如何死去的，他们死亡时无异于猫狗虫鸟。他经历过巨大的苦难，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还能激起他的同情。唯有小夏尔时而还能博得他的一笑。他爱儿子。亡妻若斯菲娜依然活在儿子的眼睛里。当夏尔依偎在他怀里时，他觉得离她最近。

“我很愿意照顾好你们俩，”等到让-巴蒂斯特重新走进院子时，让娜说道，“您的前任对我非常满意。他喜欢我做的饭菜。每次行刑之后，他都会饕餮一顿。他实在太大腹便便了，安葬人员只好给他预订了

一口更大的棺材。”

让-巴蒂斯特点点头。“好呀，”他像在自言自语，“夏尔需要人照顾。他在以某种方式隐居到另外一个世界，我找不到通往那个世界的入口。那个世界可怕而昏暗。”

“我还有鸡蛋、熏板肉和蔬菜。”让娜说。让-巴蒂斯特感激地注视她。她的声音里充满甜言蜜语和似水柔情。而她沉默时，脸色显得还要温柔可爱。他真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拥抱。

这个新家表面上显得极其和谐而宁静，可小夏尔却无法从心灵的牢狱中脱身。他可以像同龄的孩子那样说话，可是他始终保持沉默。他难以和他人分享自己的心里话。他只是偶尔需要父亲的爱抚。他最喜欢在院子后面的药房里度过自己的时间。这里的一切依旧维持不变，就像让-巴蒂斯特的前任留下的那样。夏尔喜欢药房的气味，喜欢药用植物的芳香和蒙上灰尘的旧书的气息。

在此期间，让-巴蒂斯特干着自己的工作，和从前任那里接收来的助手们一起执行判决。他获得了来自司法机构的好评。晚上，他喜欢坐在厨房里，看着让娜做饭。可他常常忍受不了多久，因为她的细心照料不禁让他越来越热切地思念他亲爱的若斯菲娜。但他感到愈来愈费劲才能回忆起她的面部表情。那幅画面就像一张褪色的纸那样变得苍白。他已经开始慢慢忘记她的音容笑貌。这使他变得无比痛苦，宛若他背叛了伟大的爱情。可是时间显得比一切更为强大。仿佛天边的云彩那样，记忆从他身边飘然而过，散开了，难得再现。他只是还能在自己的梦里看到她的脸蛋，听到她的声音，在这个隐蔽的世界里亲吻她，重新肌肤相亲。可巴黎取代了诺曼底的位置。他越来越沉浸在那些尸体中，尸体在他的想象中占据了巨大的机器的空间，人们可以逐一破译它们，并且领会它们。他从不和让娜谈论尸体的事。她不知道他解剖过那些尸体。

有一天，她问他是否还需要卷心菜汤时，他回答道，如果她愿意，他想和她结婚。他把婚姻的想法看得非常实际——只要和让娜结了婚，她就不会离开这个家。“只是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当然。”他补充道。

“可是桑松先生，”让娜假装气愤地回答道，整个脸上洋溢着春风，“您还从没有亲过我，却要和我结婚吗？”

他离开盘子抬起头来，匆匆从她脸上一瞥而过。“我难道必须亲你才能和你结婚吗？”

“是啊。”她斩钉截铁地说道，嫣然一笑。

他从桌旁站起，慢慢地走到她跟前。他拥抱她，紧紧地抓住她。

让娜用力搂紧他，闭上眼睛。“您必须现在亲我，桑松先生。”她低声道。见他没有反应，她松开他，以怀疑的眼光注视他。“您在哭吗？”她低声问道。

“没有，”他不动声色地低语道，“我不哭。人的身体不仅由皮肤和骨头，而且还由水组成。但有时候它会失去水。它无异于水，让娜。它把年龄冲洗掉。现在新的东西可以开始了。”

“您究竟爱不爱我，先生？”她问。

“我会好好照顾你，让娜。”

对年轻女人而言，这可比爱的表白更为珍贵。巴黎的每一个女仆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能给她提供经济保障的丈夫。这要比爱情重要得多。爱情不能排除在外，但它不是一生拥有美满婚姻的前提条件。年龄差距起不到任何作用。年长的男人更为心平气和，更值得信赖，他们不再沉迷于床第之欢，而且他们在床上也会表现得更为优雅。

在征得母亲同意后，让娜和让-巴蒂斯特在博讷努威尔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母亲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她的女儿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她不用再担心将来谁来养活她了。

对父亲和让娜的婚姻，夏尔一点儿也不快乐。他虽然对饱尝过苦难的父亲有了新妻并不妒忌，可他觉得仿佛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最后的依靠。他不愿意和任何人，也包括和让娜分享自己的父亲，虽然她还是女仆时，他就已经学会爱她。他和她的关系明显恶化了。她想做个好继母，可夏尔拒绝了她的努力。在此之前，他和父亲拥有的是一个女仆，而现在女仆成了家里的老二。她问他什么，他不再作答。而当她变得果断坚决时，他盯着她的脸告诉她，你又不是我妈。这一点可把她气坏了，因此她要向这个孩子证明，在这里是她说了算。可让她更为气愤的是丈夫纠结的态度。她早就希望让-巴蒂斯特偶尔也要批评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小家伙，以便桑松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家里有着怎样的等级制度。

有一天，让娜表示希望搬入另外一个住处，她希望在那里，被斩首者的鲜血不会从绞刑架的厚木板之间滴落到客厅里。她不想再居住在刽子手旅馆，而是想居住在一个典型的市民阶层的房子里，房子里有着一个典型的市民阶层的住处，也和其他诚实本分的人士一样。另外，她还要求让-巴蒂斯特承诺购置一架钢琴。

他对她的逼迫做出让步，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人家，得到的租金为整整五百九十镑。这比一名临时工一年挣的钱还要多。他用这笔钱购买了位于地狱街的一处房产，那是一个带院子的漂亮庄园。夏尔因此失去了自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感觉自己无法在新房子里呼吸。这里不是他的家，这里没有他的药房。外公的那些书籍摆在阁楼里，院子里生长的不是药草，而是浆果和蔬菜。

随着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相继出生，他反正已经失去了任何意

义。现在作数的只有可爱的小孩，他们每到夜里就会啼哭不止，让他难以安然入睡。桑松一家就是桑松父亲、让娜继母和他们共同的孩子。与此相反，他——他就是这样的感觉，他就像是旧时光里失去了爱的小鸟。他是一个陌生人，谁也不愿意想起他的出身。他讨厌这个家，他讨厌这样的生活，他希望他的外公约翰师傅能够回来，可以恢复原有的家庭秩序。

可他的外公没有回来。相反，有一天，门口响起剧烈的敲门声。他们刚好在吃晚饭。外面天还亮着。让娜打开房门。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毅然决然的老妇，她将目瞪口呆的让娜推到一边，径自踏进屋子。

“我的孩子在哪儿？”她高声而嘶哑地嚷道。

让娜关上房门，跟在陌生女人后面，后者已经站在了厨房里。

“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找到你！”她叫道，然后站在让-巴蒂斯特面前，让-巴蒂斯特只是惊慌失措地打量她。她在桌旁坐下，端起他面前的酒杯，一口气喝完了酒，匆匆瞧了瞧那三个小孩，他们在厨房地上到处嬉闹，把果酱抹在脸上。“他们是你的孩子吗？”

让-巴蒂斯特点点头，尴尬地瞅了眼茫然不知所措的让娜，让娜这时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您饿了吗，太太？”让娜彬彬有礼地问。

“是啊，快拿点吃的给我，”说完她重新转身对着让-巴蒂斯特，“你知不知道我当时多么为你担心？嗯？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因为你不想做刽子手！可你现在成了什么？一个该死的刽子手！曾经这整个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你完全可以不必过的。而你带给我的所有烦恼我也完全可以不必有的。难道你在部队里会更走运吗？你们在新大陆不是也同样在大规模屠杀野兽吗？你父亲从没有放下你这个人。我不得不在他临终

时向他发誓，我一定会找到你，好让你继承他的遗产。他说，我应该告诉你，你逃不出这重诅咒。这是桑松家族的原罪。”

让娜给女人端来一盘汤，在原来的座位上坐好。“您是母亲大人吗？”她战战兢兢地问道。

“他大概从来没有对你提起过我吧？这符合他的个性。”她朝儿子轻蔑地瞥了一眼，三下五除二便将那盘菜汤一扫而光。她稍稍抬起头来，说要面包吃，还想再来点酒。然后她看到夏尔站在门框上。“他是谁呀？”

“他是我儿子夏尔。他母亲去世了。她是约翰师傅的女儿……”

“哦，诺曼底的巨人。你瞧吧，这个孩子也会成为巨人。我从他的手关节可以看出来。过来，我的孩子。”夏尔迟疑地走近她。她握住他的手关节，喃喃自语道：“不错不错，他会成为巨人。”她盯着夏尔看，“我是你奶奶。你不想给我一个吻吗？”夏尔站在原地纹丝不动。她几近不被察觉地耸耸肩，继续吃起来。

“你父亲去世后，我又结婚了。嫁给了刽子手杜布。他整天酗酒。他说一个人是无法清醒地从事这种行当的。他也经历过丧妻之痛。他是一株柔弱的小植物，在寻找一支强有力的臂膀。寒冬腊月的一天，他不慎滑倒在积冰的圣路易木桥上，不幸坠入河中。人们把他从河里打捞上岸，将遗体安放在客栈的院子里时，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根冰柱。我说你们不必等他解冻然后晾干，就直接把他埋在地下吧。自此以后，我对男人感到厌烦了。男人们年轻时可以逗人快乐，可随着年岁陡增，他们就会惹人讨厌，而一旦不再工作，他们只会傻乎乎地闲站着，希望找个人为他料理家务。他们甚至连煮个鸡蛋都不会。”她短促地朝让娜瞧了瞧。“再给我拿点吃的过来。我的旅途够长的了。你到底会不会做菜？”

让娜点点头，又给她添了些饭菜。“你的骨盆适合生育，姑娘。你们还会送给我更多的孙子。到时你们就需要我帮忙了。”

一听这话，让-巴蒂斯特、让娜和夏尔大为吃惊。杜布奶奶愿意提供帮忙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种威胁。她注意到谁都没有对她的到来感到兴奋，可她觉得无所谓。

“妈妈，”让-巴蒂斯特轻声说，但语气非常坚定，“我不再是你的小孩子。我曾经参加过大洋彼岸的战争，作为军官。我指挥过一个营。请别跟我说我该做些什么。”

“哦哦。就算你是将军，你也还是我的孩子。而且我还要跟你说的是：我不是那样的老女人，可以一言不发地躲藏在一个角落里，把施舍来的面包泡在热牛奶里。你们这里需要的人必须有经验，并且愿意向你们伸出援手。”

从那天起，桑松一家的家政由杜布奶奶掌管。尽管年事已高，可她依然精力充沛，她粗暴对待家人，好像他们统统是假想中的在橹舰上作苦役的囚犯，她总是用沉重的击鼓声催逼他们拼命干活。杜布奶奶就像敌方骑兵一样侵占了巴黎。现在她在这里。她也想待在这里。说也奇怪，让-巴蒂斯特无法反抗这个老太太。他对家庭的尊重和服从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这个家就像上帝和他的天使那样神圣不可侵犯。人无法反抗它。夏尔现在对他的继母让娜几乎稍稍起了怜悯之心，因为她在这个家已经难以发出声音了。她重新回到了使女的角色，只是一个能够生产的使女。这个家里的新将军已经把她降级了。

在为让-巴蒂斯特生养了七个孩子之后，让娜离开了人世。她的去世仿佛是她想要摆脱杜布婆婆的统治似的。这时候，夏尔也想着彻底离开这个可怕的家了。他渐渐明白自己生长在怎样的家庭里——统统是刽子手，这是一个可怕的家族。岁月更迭，他认识了所有的亲戚，父母的

兄弟姐妹，所有的堂兄弟或者表兄弟。杜布奶奶都把他们接到了巴黎。他们一个个对夏尔施加压力，并且颂扬刽子手的工作是一种无上光荣的职位。他们将夏尔希望成为一名大夫的想法视为是对家族的侮辱。夏尔讨厌他们所有的人。他明白自己无法挑选另一个家，他只能拥有这个家。没有这个家，他就像是新大陆的逃兵，只能躲藏在美洲北部高耸的森林里或者哈德逊湾两岸某个帐篷里。孤身一人生活在陌生的部落里，必须遵守陌生的风俗习惯，还要独立养活自己。相反，家庭就是一座城堡，但同样也是一座暗无天日的地牢。而给他带来光明的唯有音乐、那架钢琴以及从这个乐器里奏出的美妙动听的旋律。他的妹妹多米尼克为他开启了音响世界的大门，她教他弹琴。他俩常常并排坐在木凳上，让乐器发出亲切温暖的乐声。有时候，仿佛他们在用键盘窃窃私语。他们诉说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音乐成了夏尔忠实的伴侣。恰恰在他经常停留的琴凳旁，他总是能听到美妙悦耳的旋律，感觉和他最喜欢的妹妹多米尼克是那么亲近。

时间一到，夏尔请求父亲把他送到学校学习医学。尽管私立学校的学费不菲，让-巴蒂斯特还是马上同意了夏尔的要求，因为他希望家里因此能够拥有更多的安宁，但也是因为他感到问心有愧。说实话，他不得不承认对儿子关心太少，自从若斯菲娜去世后，他感觉儿子陌生得形同路人。

但是，杜布奶奶对孙子的主意完全兴奋不起来。她认为这纯属浪费金钱。可或许她也担心，夏尔有朝一日回来，却拥有了她从未拥有过的教育。她虽然对每一种知识都要掌握话语权，可她的知识实在贫乏，因而只能用顽固、施压和恐怖死守。她认为知识通常是无用的，常常说一棵树在耶稣在世时就是一棵树。人类还能从新知识中发现什么呢？对她而言只有体力劳动，只有纪律，只有尽职，而她将任何的感情流露抨击为懦弱。

让-巴蒂斯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决定把夏尔送到鲁昂的修道院附属学校。学校前身是始建于1605年的医学院，是培养未来大夫的摇篮。

第3章

夏尔立即喜欢上了鲁昂。这是通往陌生世界、其他大陆以及新知识的大门。神甫们要比巴黎教堂那些愤怒的神职人员更放松，因为后者会从教堂的布道坛上对着下面穷困而胆怯的教友吼叫。在鲁昂，大家可以互相倾听，交换各自的论点，即便观点有分歧也会欣赏彼此的交谈。像杜布奶奶这样的人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夏尔每天早上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美好时光。他和其他六十个修道院附属学校的学生一起睡在一间大厅里。每天清晨，他们被一只闹钟叫醒。他们必须默默无言地找到院子，在那儿的水井边洗刷。之后，他们将集中到祈祷室进行晨祷，再一起到餐厅就餐。所有的一切都被严格规定下来，而发生任何偏差，都将遭到惩罚。可即使受到处罚也不是怒气冲冲，而是和颜悦色地说出来。夏尔对自己崭新的日常节奏并不反感。他想学习。他想学习知识。他想了解人体。

另外，在鲁昂，立即激发夏尔热情的还有一样东西。餐厅里摆放着一架钢琴，可供学生晚饭后使用。可谁也没用过它，夏尔也不敢用。可是，有一天晚上，等到所有人用完晚餐，一位神甫敲钟示意大家可以离席时，夏尔却依然干坐在那里。他的眼睛死死盯着那架钢琴。一个瘦小的男生已经坐在琴旁，开始轻柔而温情地触摸琴键。可是，一等到大厅里空无一人，男孩却越来越狂野地敲击琴键，发疯似的胡乱踩踏踏板。夏尔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他在钢琴旁站住，聚精会神地观察他的指法。这位同学也早就注意到了夏尔。他享受着夏尔给予他的注意力，突然，他连头都没抬起，嚷了一声：“你坐下吧，我知道你会弹琴。我叫安托万。”

夏尔并没有犹豫不决。安托万挪到琴凳的一边。夏尔坐下，马上弹起琴来。安托万做了个鬼脸，强化了他原本冲动的演奏。此刻两个人尽情地弹奏，专心致志，一丝不苟。他们偶尔朝彼此看上一眼，然后放声大笑。接着，他们重新加快了弹奏速度。真是妙不可言。

“你在哪儿学的钢琴？”安托万问。

“我妹妹多米尼克教我弹琴。”

“她的奶子大吗？”

他们接下去弹了一个多小时，直至最后走廊里锣声响起，提醒学生们必须回房休息了。安托万从凳子上一跃而起。“你叫什么名字？”

“夏尔。”

“你的姓呢？”

“就叫夏尔。”

“那好，夏尔，明天我们继续弹琴吧。或者你宁愿到小教堂里祷告？”

“不，我们弹琴。”

“好，”安托万说，然后坏笑道，“亲爱的上帝已经厌倦我们总在瞎扯。顺便说一句，我叫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对了，你究竟姓什么？”

夏尔感到很困惑。他不习惯这种幽默。

两人在音乐方面很投机。和夏尔不同的是，安托万缺乏对解剖学和药物学的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音乐、父母每月寄给他的钱以及一家巴黎印刷厂的广告单，该印刷厂每月印发巴黎几家百货商店的新产品。那是一些有顶棚的集贸市场，一百多家小商贩在那里兜售他们的商品。其中包括许多无用的东西，可安托万对任何一架拥有异想天开的功能的机械装置并且可以使用的新机器都会着迷。他可以对此没完没了地举办专题

报告，因为他喜欢夸夸其谈讲个不停。由于他特别喜欢夏尔，而夏尔又是一个耐心而沉静的听众，因此他一直盯着他的新朋友不放。不管去哪儿，他总是跟在他后面。两个人成了一个奇特的二重奏组合。夏尔个子高出所有同学一个头，他在同学中间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尽管保持着克制，但他依然体现出身强体壮的优越感和存在感，这似乎给矮小瘦弱的安托万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站在夏尔的一边，安托万才敢嘲笑他的同学。夏尔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都无法躲开，虽然他完全不喜欢这一点。可他还是不去管它，因为到了晚上，他们又会一起坐在钢琴旁。他想，对于一种友谊而言，分享所有的兴趣和看法是毫无必要的。只要有一种激情就够了。在他们那里就是音乐，就是钢琴。

“我不喜欢你取笑其他几个同学贫穷。”一天晚上弹完琴，夏尔对安托万说。

“哦，”安托万回答，笑笑，“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一个人生来贫穷，这可怪不了他本人，学生的家长理应得到大力赞扬才是，因为他们节衣缩食，为的是能够给自己的儿子支付学费。”

“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安托万叹息道，开始扮演绝望者的角色，“他们最好别送孩子上这样的学校，因为他们将来缺乏金钱去给自己购买一官半职。除了贫困之外，学校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

“一个人生来富裕，这可算不得有什么丰功伟绩。”

“那可是有区别的，究竟我叫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或者夏尔——你的姓究竟叫什么来着？”

“我是桑松·德·隆瓦勒骑士的儿子。”夏尔回答，马上又后悔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我父亲是大夫。”他还撒谎道。

“桑松·德·隆瓦勒？从没听说过。”安托万做出一副表情，仿佛刚刚把胃反酸的东西呕吐出来似的，“不过你父亲从不寄钱给你。他是没有钱，还是把钱花在了妓女身上？”

“我的钱够花了，”夏尔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学习。”

“你似乎对穷人有一颗爱心，夏尔。是因为你的家庭一无所有吗？除了饥饿，以及你妹妹的大奶子。”

“我们是医生世家，我们的任务是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们爱人，不管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

“我在这里只喜欢你，夏尔，我喜欢你沉静的风格。我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你仔细倾听我的话。我偶尔会冒犯你，可你总是保持沉默。有时我在问自己，我该如何惹你，你才会反抗呢？难道你从未勃然大怒过吗？”

夏尔一声不吭。

“我恰恰说的就是这一点。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失去自制力。有时我甚至真想打你的脸，只是想看看你有怎样的反应。可我的胳膊恐怕太短了吧。”安托万高兴地哈哈大笑，“而且我不是胆大的人。不如说，我很害怕。虽然我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吓得屁滚尿流。这个你能明白吗？”

夏尔点点头。

安托万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可别跟人家说，我刚才向你透露了一个秘密。”

夏尔又一次点点头。

“星期六晚上我想到那家金色酒桶小酒店吃饭，那里有新鲜的野味。你陪我去吗？我请客。”

夏尔迟疑不定。

“你就答应吧，夏尔，钱我有的是，但我需要一个朋友。”安托万重新鼓励性地打了一下他的肩膀，“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诚邀，敬请光临。”

此刻，夏尔也禁不住微微一笑。

从那时起，安托万定期给这位新朋友送上礼物，而且格外慷慨大方，他甚至为夏尔购买并不十分廉价的医学专业书籍。“送给我未来的家庭大夫。”他习惯这么说。他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家庭大夫，因为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大腿上有针刺的伤口，呼吸困难，内脏气太多，耳朵有啸叫，原因不明的背疼，或者就是噩梦。对朋友的几乎所有问题，夏尔都会给出一个答案。安托万因此越来越依赖夏尔。夏尔也因为有了安托万而加深了对每一个器官的认识。正因为如此，除了音乐之外，安托万的忧郁症也加深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没过多久，夏尔就拥有了人体方面的全部藏书。安托万还要从母亲那里索取更多的钱，他花钱起来大手大脚，仿佛那是毫无价值的废纸。那么多的钱对他毫无用处。他是一个可怜的学生，没有夏尔的帮忙，他连第一学年都熬不过去。他心里明白，有时让他非常伤心的是，他觉得需要恶意伤害夏尔，可夏尔却也平心静气地忍受着。他从来没有学会抗拒，抵抗不是他的保留节目。他习惯于悄悄地受苦受难，和他所有日常的厌恶一起忍受命运的折磨。夏尔专心致志于学习，他是一个好学生。可他的好成绩并没有激励安托万。相反，妒忌宛若恶性肿瘤在他的胸口肆意生长。

“你不适合学医，”有一天他们一起学习血液循环时夏尔说，“我很

坦率地告诉你，安托万，你爱他人太少。你只爱你自己，而对一名大夫来说这还远远不够。”

“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安托万疼痛得脸上变了形，喘着粗气说，“你建议我将来做什么呢？”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夏尔说，那天晚上，他们重新坐到了钢琴旁，“你必须想想自己特别喜欢什么。你自己最擅长的，别人不在行的，或者说他们做不到那么好的是什么？”

“演讲，歪曲人家的话，嘲弄他人。难道我应该做演员吗？”安托万锤击琴键，在踏板上乱踩一通，“自杀或许是一个解决办法。或者我在巴黎找一个漂亮的妓院，在那里坐等我的遗产。母亲不久前写信给我，说老头子在咳血。她希望我和大夫谈一谈。她应该问她自己，我们的皮夹子还能支撑多久。”

“律师，”夏尔灵机一动突然说道，“你应该做律师。你不仅可以为谋杀者辩护，也可以为受害者辩护，运用同样缜密细致的方法。因为你感兴趣的唯有胜利，而不是公正。”

安托万会意一笑：“伟人，你把我看透了，我的武器就是语言，我的脑子，我的记性。我享受把人变成蜗牛，最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大舞台面前。我喜欢出人头地，我想成为大人物，这一点我承认，而且我也会坚持下去。那又怎样？难道这样很难堪吗？这个又和谁有关呢？”

“难道你从来不需要平静，需要安宁……”

“你现在千万别说和谐就好，那是多么丑陋的字眼。我喜欢争执、冲突、辩论。火热的战斗可以唤起我对新生活的热情，它可以极大地鼓舞我，甚至比一个裸体的美女更让我心动。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文字游

戏都要比一个好朋友更为亲切。不过，你先告诉我，在妓院里会招来那么多龌龊的东西吗？我说的是龟头上的真菌和类似的东西。”

“溃疡在逛妓院三到四周后出现。没有痛感。”

“那我真的心安了，”安托万说，可以听得到他呼气的声音，“我以后真的需要一个家庭大夫，夏尔。”

“然后淋巴结肿胀……”

“哦，那是一开始吗？真见鬼，这个淋巴结又是在哪里？”

“然后就变红，接下来会有无色的液体排出来。”

“可不会是从我的小鸡鸡那里排出来吧？别说了，那可真是太恶心了。”

“接下来的症状就跟得了重感冒一样。你的头发会脱落，身体被严重的炎症损坏。一旦危及脑子，你就会渐渐丧失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重新回到四岁孩子的智力水平。你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你的视神经衰退，你的身体将会瘫痪。”

“你现在要说，我之后就再也没有勃起功能了。”

“看你的心境，一切都有可能。”

“那好吧，”安托万拒绝道，“那我可能就做律师了，夏尔，而你将是一名小小的乡村大夫。也许光做乡村大夫你还无法过日子，那你只能做个兽医，在消瘦的母牛屁股里翻找，整天闻着粪便的味道。”他对着夏尔的肩膀拍了一下，愉快地哈哈大笑。刚才这一拍不是特别友好，有点无情和好斗。而且他的眼睛发出危险的光芒。夏尔预料到安托万的肚子里藏着另外一个黑暗的灵魂。

由于学业成绩优异，夏尔得以和科林神甫一起前往勒阿弗尔，购买新的药草。神甫一路上告诉夏尔，维京人曾经怎样偷袭鲁昂，诺曼底曾经怎样落入英国人之手，当他们途经集市到西门，他还指给夏尔看圣女贞德在1431年5月被判处火刑当众烧死的现场。

勒阿弗尔港里停泊着船帆很大的商船。为了不被倾覆，船需要一个粗大的船身。难以相信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从这些船里冒出来：各种各样的人、装在笼子里的野兽、充满异国情调的木材、五颜六色的衣料、瓷器、价值连城的丝绸、雕像、圆桶以及木箱子——而从木箱子里挂出了半枯萎的植物。人们尤其渴望获得的是茶叶、咖啡、调味品以及可制作药品的植物。这些商船大多属于法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合法的股份公司，每个人都可以购买股票，股东们可以参股，并且分享公司的利润。法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家非常重要的企业。它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和非洲、阿拉伯国家、马达加斯加、东南亚、中国以及新大陆开展海运贸易的权利。法国王室给予这家贸易公司巨大的特权。因此，这家公司不仅垄断了法国之外所有被征服领土的贸易，而且也有权配备自己的战舰和自己的军队。他们拥有自己的审判权，铸造自己的货币。

夏尔怎么看也看不够。在那些商船后面停泊着该公司的战舰，它们日夜跟随着商船，船上也配备了大炮。因为这些商人不仅要抵御外国人的侵扰，还要抵制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竞争。那些荷兰人和英国人偶尔在公海上，在远离文明的地方，升起海盗旗，受他们国王委托从事抢劫和掳掠。

夏尔和科林神甫沿着滨江大道闲逛。一艘船紧连着另一艘船。他们在一艘雄伟的商船前停住脚步。这艘船的船帆上绘有巨大的徽章，蓝色的背景上是国王的金色百合，再上面是王冠。

船帆上写着“Florebo quocumque ferar”这几个拉丁文。“我在哪儿被种植，我就在哪儿开花结果。”神甫微笑着给夏尔做翻译，“我想，会有

那么一天，商人要比王冠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四海为家。”

“那么教会呢？”夏尔问。

“教会？它将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图书馆将取代宗教信仰，如果不再有无法澄清的问题，那么也就不再需要上帝了。宗教无异于无知。”

非洲黑人戴着镣铐被驱赶到滨江大道上。夏尔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在他心里激起了好奇和恐惧。

“你瞧瞧从船里出来的那些人吧，”科林神甫说，“你想到了什么？”

“他们牙齿坏掉了。有些人嘴里出血，唇边有溃疡。许多人瘸着腿，走路姿势很可疑。”

“他们受坏血病折磨。如果三个多月一直在路上，吃不到水果和蔬菜，他们的体内就会缺乏某些东西。黏膜开始出血，牙齿脱落。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找到了一个更好地保存食品的方法，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革命。”

“但这也会延长战争的时间。某些战争因为缺乏补给和食品而被迫停止。”

神甫微微一笑。他喜欢夏尔。他向站在一艘大型商船栏杆旁的一个人招手。这艘船配备了五十门大炮。这是按照荷兰商船仿造的，具有巨大的载货能力。这种类型的船只有点笨重，在对付印度洋上的海盗方面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因此，它们总是让易于驾驶的小型军舰陪伴在身边。站在舷栏杆旁的陌生男子向神甫挥手以示回应，请他上船。此人穿着一件轻薄料子做的橘黄色披肩，感觉富有东方色彩。夏尔跟在科林神甫后面。他们从行李搬运工旁边挤过去，然后上了船。

“这是热比云神甫，”科林说，“他受国王委托访问暹罗王国。他是来自巴黎的耶稣会会士。”

两个神甫热情地拥抱。热比云皮肤黝黑，性格开朗。他的动作有点装腔作势，就像是要符合凡尔赛宫廷礼仪似的。他穿着一件长至踝骨的披肩，仿佛一只极乐鸟那样引人注目。

“这是夏尔，我最好的学生。”科林神甫不无自豪地说。热比云赞许地打量着身材高大的夏尔，他的唇边露出一丝可疑的微笑。从他的眼里你看不出他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他的眼里流露出其他东西，有点阴谋的味道。这可把夏尔搞糊涂了，他还从没有见过像热比云那样的人。热比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您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科林问。

热比云指了指船头。那里站着十几个年轻人，他们个个穿着长袍。他示意他们过来。他们便急匆匆地赶到热比云那里，围着科林神甫和夏尔，然后各自在胸前合十相互致意，恭恭敬敬地低下头。“这些都是我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暹罗王国，”热比云解释道，“他们将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学习。作为交换，法国的年轻人将到暹罗学习。国王祝愿本次交流项目取得圆满成功。”

“他们不是很年轻吗？”科林问。

“您搞错了。他们都已经十六岁以上，可看起来就像是十二岁的孩子。”

夏尔仔细观察这些年轻人。黑皮肤和黑长发深深地吸引了他。他们长着文雅的面孔，他们的嘴唇漂亮而丰满，充满诱惑。

“您还要去暹罗吗？”科林问。

“肯定的，”热比云微笑着说，“暹罗天气很热，那里的饭菜美味可口，暹罗国王也是一个热情的学生。我把我们这里实际应用天文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他，可他还想学习更多的东西。他看到我们从巴黎带给他的仪器非常兴奋。而且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我们要第一次绘制精确的航海地图，它将缩短通商路线。要是我们因此逃过荷兰人和英国人的追击，那完成整个工作是值得的。”

“那么上帝呢？”

热比云作了几个卖弄风情的动作。“那就更艰难了，上帝很难对抗佛陀。这虽然是同一个东西，但他们的佛陀要更友好些。我在想，假如我们想要征服暹罗，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宗教。罗马人当时也是这么干的，并取得了成功。而且佛陀不像我们的上帝那样古板。”热比云笑笑，“他们不知道害羞，他们爱的时候感觉不到羞怯。”

“您怎么会知道得那么详细？”

“有人悄悄告诉我的。”热比云无辜的表情意味深长。和许多长期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一样，他放弃了很多祖国的风俗习惯，而接受了外来文化。

工人们在船腹上抬着笼子。关在笼子里的动物酷似巨猫，它们的皮肤呈黑黄相间色。当一只动物发出呼噜声时，可以看到它可怕的嘴巴和巨齿，而这张嘴巴可以撕咬任何其他的动物。

“这些是老虎，”热比云说，“据说老虎可以驯化，但我没有试过。我希望我们的国王会喜欢它们。他想为他的动物园增添一些罕见的动物。”

“你能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吗？”夏尔问其中一个女孩。她是所有的人中最矮小的，可尽管如此，她似乎是他们中的领队。她脸长得格外标

致，颧骨清秀，嘴唇丰满。她的眼睛像夜一样黑，她的眼神似乎能穿透夏尔的内心。她的身上散发出温暖和好感，但无法忽略的是，她很坚强，并且浑身是劲。女孩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道："兰纳泰。"

"这是我们的小丹曼莉，"热比云不无自豪地说，"她是所有的人中最聪明的。她的记性就像图书馆，过目不忘。她会很快学会我们的语言。"

"兰纳泰是什么意思？"夏尔问。

"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将暹罗称为兰纳泰，兰纳泰是'百万稻田王国'的意思。"

夏尔微笑着，激动地朝丹曼莉点点头。他已经明白了。他简直怎么看她都看不厌。她微微突出的下巴令他着迷。它有某种性冲动的、危险的、色欲的东西。

"您给我们带来桂皮了吗？"科林问，然后急切地凝视着夏尔，好让他最终别再盯着那个暹罗姑娘看了。

"不仅是桂皮，"热比云耐人寻味地含笑道，"我还第一次带来了姜黄，那是僧侣需要的植物，他们把这种黄色的根茎研成粉末。它可以治愈像花椰菜一样生长在女人乳房里的肿瘤，对于其他恶性肿瘤也有疗效。姜黄在山里疯长，但只有生长在柚木附近的姜黄才有疗效。你试试看，明年春天告诉我情况。"

那些年轻人提着箱子和篮子，站在热比云神甫身后。他从一只篮子里拿出一根树皮。"这是桂树皮。"他转过身来对夏尔说，"树皮是干的，你可以把它捣碎，研成粉末。"

"它真的可以促进消化，"科林神甫说，"我亲自尝试过。你也可以

把它蒸煮后做成调味汁，它可以使饭菜别有滋味。”

“在暹罗，我们先要把肉包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宫廷里的人全都疯狂地喜欢吃烤肉。价格因此增加了两倍。”热比云朗声大笑。

夏尔点点头，然后偷偷地转过头去。他不得不再次注视丹曼莉。之前还从没有一个年轻女人像她那样如此吸引过他，他也回应她那羞涩的微笑。尽管她来自一种他完全陌生的文化，可他感觉自己被她施了魔力般地迷住了。他觉得她同样也是一个离乡背井的人，孤独地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寻找着宁静和安全。

热比云神甫重新转向夏尔，他似乎已经把夏尔锁到心里去了。“待你学成之后，务必到巴黎来看望我们，”他说，“我会指给你看所有来自暹罗王国的药草。”

“可别夸海口了，”科林开玩笑道，“否则他最后不想做大夫，而是想当厨师了。”

不，夏尔一直想做大夫。为了讨他母亲欢喜。在母亲的病床边那种晕厥的感觉始终在他心里活灵活现，他想象如果自己成为大夫，可以做些善事弥补一下。他意识到母亲早已去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改变结局。这是毫无逻辑性可言的联想，却已经牢牢扎根在他的思维定式里。可夏尔行事并不总是很理智，他有点过头了。他常常沉湎于那些气味，它们会让他想起母亲。比如，当她温柔地把他搂到她柔软的怀里时，那是一种他喜欢的气味。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芳香，却是母亲的芳香。

学校里的学业赶不上夏尔的学习步伐。他的工作热情从未消减过。他总是担心会有什么意外事发生，命运的大门会突然关闭，然后一切结束。他还来不及对什么事情感到高兴，恐惧就已经侵袭了他——那种失

去心爱之物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恐惧的恐惧也开始侵袭他，他开始怀疑好消息，以至于难以为那些好消息感到高兴。

他和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每个月必须到医院去一次，打听有没有尸体。尸体可以很便宜地搞到手，然后用手推车运到修道院附属学校。这个任务总是由夏尔和安托万负责完成。

“你说得对，夏尔，”当两个人推着车子走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时，安托万说道，“医学专业恐怕不是最适合我。不过你还是做做我母亲的思想工作吧！她跟所有的人说我要做大夫，也就是说我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了，我真的不想给她丢脸。可她知道得很清楚，我在实际操作方面非常不灵巧，我完全可能伤害到我的病人。上帝创造我的时候，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的脑子上，却出于疏忽让我变成了笨手笨脚的人。我并没有因此而指责他。脑袋要比双手占优。即便坐在轮椅里，你还可以指挥千军万马。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着我指指点点，叫我该干些什么。我永远不会做士兵。至少也要当个将军吧。”

“可你总是听你妈妈的话。”夏尔以一以贯之的毫无感情的方式说。

“我们不是都听妈妈的话吗？而且我还特别爱听妈妈的话。因为一旦我家老头子回到造物主那里去，我会继承他在人间的财产。如果是这样，我还是恰恰能够从我的出身中获利的。你知道吗，夏尔，你虽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可你或许来自一个普通家庭。”他阴笑着继续道，“你父亲可能是家族里第一个有出息的人……哦，我说什么来着，你们肯定根本没有根基……也就是说，他是学会了一个中不溜秋的职业的第一个人：大夫。可是在巴黎，唯有出身和财富才作数。你以后用什么买到一个职位呢？很悲剧，不是吗，鲁昂最好的学生在堕落中毁灭，而我，一个娇生惯养、懒惰成性的贵族后裔……”

夏尔停下手推车。尸体的一个胳膊滑出了盖布，此刻在承载面上摇摆不定。安托万抓住手臂，又把它推回到盖布里面。他们继续向前。

“就连这些尸体也想在我面前悄悄溜走，”此刻他神情严肃地思考了一番，说道，“我希望我说的话不至于让你太过沮丧，夏尔。真相有时很痛苦。你是更好的学生，可我将来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我能成为大夫，”夏尔说，“我就很满意我的生活了。我不需要更好的生活。”

“哦，你现在倒是让我感到吃惊了，夏尔。人总是渴望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和动物的区别。我们永远不会满足，我们总是贪得无厌，而当你有朝一日有了足够的金钱，你就会想要荣誉和地位，想要权力。世界应该为你建立纪念碑，用你的名字命名广场。”

“我不希望人们为我建立一座纪念碑，”夏尔喃喃自语，“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别害怕，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发誓：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贫病交加，敲响我家的大门，那么我的佣人会给你一碗热汤喝。钱我不会给你一分，因为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是一个成绩比我优秀的学生。”他哈哈大笑，“我本来想请你做我的家庭大夫，可我无法忍受每天看到这个在鲁昂证明我平庸的人。”说完他友好地将自己的胳膊搁到夏尔的肩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夏尔。没有你我无法忍受这儿的生活。我有时有点恶搞，可我喜欢你。”他又一次放声大笑，然后盯着刚刚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的两个年轻女人看。

“哦，这个黑头发女人让我觉得好刺激，你觉得如何，夏尔，这两个女人会选择谁？是选择有钱的安托万，还是选择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好心人夏尔？”

“你的客人来了。”夏尔低声说。

安托万马上听出夏尔一本正经的声音，朝前面望去。那两个女人已经拐进一条小巷子里去了。在路的尽头站着三个和他们同龄的年轻男子。

“你认识他们吗？”夏尔此刻减慢了速度。

“只是一面之缘，”安托万无法隐藏自己的焦躁不安，“我只认识中间那个家伙。我把他的妹妹称作婊子，把他称作进化论的渣滓。你认为是我错了吗？”

“你为何总要侮辱其他人呢？”

“你会帮我，夏尔，是吗？你知道，上帝给了我一副笨肚肠。”

那三个小伙子已经站在手推车前面，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们需要你的道歉。”其中一个说道。

“给我们让路，”安托万说，“否则我的朋友会失去耐心的。”他很害怕，非常害怕，求助地看着夏尔。

“我们现在要狠狠地揍你，好让你的朋友把你装进他的手推车里。”话音刚落，三个人猛然冲向安托万。两个人揪住他不放，第三个人立即把他击倒在地。夏尔飞快地放下手推车，急忙帮安托万突围。他把第一个人击倒，往第二个的脸上揍了一拳，再用力抓住第三个人的脖子，直至那人呻吟着跪倒在地。看到其他两个人逃跑了，夏尔才把他放开。安托万仍然跪在地上，盯着他手上的血。

“只是鼻子流血了。”夏尔说。

“只是鼻子！”安托万叫道，“你干吗等那么长时间？他们把我的鼻

子打断了。”

“没有，”夏尔平静地说，“你的鼻子没有打断，只是流了点血而已。”

“流了点血！你大概是在寻我开心吧？也许我会失血过多死在这里！”安托万站起来，没等夏尔，径自沿着那条巷子走下去。从那时起，安托万和之前判若两人。他感到羞耻，因为夏尔领教了他的恐惧和无助。他因此开始讨厌他了。

尸体解剖室位于体育馆对面的大厅里。有些学生看到展示的尸体时害怕地转过脸去，可夏尔在这些毫无生命的身体里并没有看到任何不自然的东西。他的眼睛只盯着浅蓝色肿胀尸体的结构。他仔细检查它们，就像在检查稀奇古怪的机器，他移动他们的四肢，仿佛它们只是门的铰链而已。可对于安托万来说，尸体那里只有阳具或者乳房。他嘲弄那些身体部位，试图为同学们助兴。当夏尔对他置之不理时，他怀着极大的遗憾说道，夏尔必须好好学习，他父亲是演员，还要在巴士底狱待上十年呢。

夏尔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学业。每过去一个月，他的自信心就会大增：要想弄清楚一个人的身体还是有可能的。只要你能理解它，你就可以“读懂”它，你也可以给他的身体治病。这一想法日夜萦绕在他的心里。可他的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想再次见到那位年轻的暹罗姑娘丹曼莉。他知道她才十六岁，可她会慢慢变老。几年之后他就会完成自己的医学学业，然后回到巴黎。她甜美的形象始终在他心里挥之不去，在他想象的世界里正式扎下了根。他不了解这个神秘的暹罗姑娘，他还从未和她有过真正的对话，可只要有她一个眼神交流就够了，因为那个眼神在告诉他，她会等他。

一天早上，他们搞到了一个流浪汉的尸体，此人在学校门前跌倒后

丧命。神甫们决定将尸体安放在大厅里，让学生们直接观察一个人身体死亡的全过程。起初这个流浪汉似乎在睡觉，可马上他的脸颊凹陷了，随后他的鼻子四周形成了一个深陷的三角。血液停止循环然后沉淀了。就在尸体平放的地方留下了深蓝色污渍。

“那是夏尔的父亲吗？”安托万装作害怕地问道，“那个桑松·德·隆瓦勒骑士吗？”他看着夏尔，“我还以为你父亲是大夫。”

“现在究竟又是什么让你鬼迷心窍了？”一个同学问。

“那有什么错吗？你们不是全都知道我的出身……”

“我们听得耳朵都长老茧了。”夏尔咕哝道。

“对，因为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可是夏尔，你的沉默成了大家最大胆猜测的根源。谁也不知道有一个大夫，他……你老爸究竟叫什么名字？”

“难道我应该每天把我的出身挂在嘴上吗？”

“恐怕很难。非常之难。因为你没有出身。”

今天可不是夏尔的好日子。他神经紧张，心想他们可能会把他家的家谱一直追溯至15世纪。“我的一位先祖是绘图家尼古拉·桑松·德·阿布维尔。他出版了很多地图册，给路易十四国王上过地理课。”

“什么都不用告诉我。”安托万闷闷不乐地打断他。

“当然不用啦，”夏尔取笑他，“你缺乏所有的教养。”

其他同学都大笑起来。

“明白，”安托万撒谎道，“要是一个人既没有金钱也没有贵族出身，那么他当然需要教养了。我要是和我的朋友出去打猎，谁也不想听地理方面的知识。我们谈论我们的田地、我们的情妇、我们的阴谋诡计以及我们每天尽情享用的所有东西。可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要绘制地图，用无用的知识使他周围的人感到无聊。”

“你最近不那么爱吹大牛了，”夏尔说，“将来会有人过来，堵住你的狗嘴。”

“你们注意到了吗？我们触到了他的伤心处：他的出身。谁知道呀，说不定他出身于猴子家族呢，他们住在山洞里，吃着生熊肉。周末就是家长接待日。我很好奇是否他父亲过来。他那个大奶子的妹妹也过来吗？”

让-巴蒂斯特·桑松来了。这一天是学生家长接待日，他们将先听几堂课，然后从神甫那里了解儿子的学习情况。家长们首先聚集在学校的内院里，问候自己的孩子。来自隔壁修道院的两名修女为家长们端上了面包和苹果汁。夏尔的父亲是和他的奶奶杜布一起过来的。他在其他父母亲中间显然感觉不舒服。他难以掩饰自己低微的出身。夏尔看到安托万在向年迈的父亲问候。安托万的父亲似乎闷闷不乐，情绪不佳，他在安托万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不知有什么事情似乎不合他的心意。而安托万的母亲似乎一副心情很放松愉快的样子，她多次把儿子紧抱在怀里，吻他的额头。安托万不是特别喜欢这一点，他挣脱了她的怀抱，然后走到夏尔那里。夏尔正在和父亲聊天。

“那是我父亲。”夏尔说。安托万稍稍欠了欠身，向让-巴蒂斯特·桑松伸出手去。

“我是您的一位先人的敬佩者，”安托万假惺惺地说，夏尔马上知道要有恶毒的高潮发生了，“他的结局很悲剧。他起先为国王绘制地图，

给路易十四上过地理课，后来却被刺死在巴黎的巷子里。”

让-巴蒂斯特不露神色。他不习惯这类幽默。他不懂讽刺，那些双关语令人生疑。

“而您是大夫。”安托万说，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让-巴蒂斯特·桑松一脸茫然地看着儿子。杜布奶奶疲惫地歪着嘴说道：“让我们进去吧，在这外面待着我要感冒了。”

科林神甫正在教室里谈论中世纪的垃圾药房。如何把晒干的蟾蜍、烧焦的鼹鼠以及山羊的粪便研成粉末。他谈及最早的医学书籍，它们早在16世纪作为药草插图课本出版。他谴责体液病理学说，因为它以权威而不是以效果或者完全来自经验的知识为基础。他谴责放血、灌肠以及刺激呕吐的恶习。他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有必要深入探讨药用植物的合理药量。“今天好好研究的人，明天就可以改变世界。”科林神甫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课。

在座的家长们赞许地点点头。他们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到这么好的课，尽管他们自己对这方面的知识懂得很少。

安托万用肘碰了下夏尔。“能够向你父亲致意，这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时刻。你说，他有很多病人吗，我是说固定的顾客，那些一再回来的人吗？”

夏尔困惑地看着他。他在寻找出人意料的效果。

“是这样，”安托万似乎心情沉重地低语道，“当你的父亲砍下一个病人的脑袋，那么把他作为病人留下是很难很难的。难道他们中有些人将被砍下的头颅夹在腋下再回来吗？”

夏尔快要透不过气来了。他真想对他发怒，可还是忍住了。

“我本以为充实自己的教育不会有任何坏处。因此我在图书馆里作了一些研究，而我的一位叔叔，他是巴黎的律师，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你为何要对我隐瞒呢，夏尔？我们可是朋友呀。”

夏尔本能地寻找和他父亲之间的眼神交流。他看到安托万的父亲向他走来，他似乎气势汹汹。他说了不知什么话，用他的拐杖多次敲击地面。此刻大家全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安托万的父亲身上。其他的父母开始悄悄议论。有一些人围住了科林神甫。

“科林神甫，”安托万的父亲突然大叫道，“我是富吉埃·德·坦维尔侯爵，想在这里宣布，那儿的那个人，”他一边说话一边指着夏尔的父亲，“是巴黎刽子手。”整个教室的人全都被震住了，纷纷窃窃私语起来。学生们偷偷地看着彼此，试图抬头朝那个巴黎刽子手瞄上一眼。“难道巴黎刽子手的儿子在上这所修道院附属学校吗？”另外一位访客大声问道。安托万装作遗憾和震惊的样子，可他的整张脸上在幸灾乐祸地笑着。

“亲爱的家长们，”科林神甫大着嗓音说，“请诸位安静。我们会澄清这件事。”然后他转身对着让-巴蒂斯特·桑松：“您能证实一下吗，先生？”

夏尔的父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是巴黎的行刑官。”杜布奶奶声嘶力竭地说。她的声音很刺耳。

“先生们，”其中一个父亲嚷道，站在黑板前，“如果我的儿子和巴黎刽子手的儿子一起上课，我不会付半分钱学费。”

“先生，”科林神甫和解地请求道，“我们给儿子上课，而不是给父

亲。他的儿子学的是医学，绝不可能打算从事行刑官的工作。”

此时，七嘴八舌的喊叫声越吵越凶，最后引发了闹事。在座的学生家长们提出强烈抗议。科林神甫在愤怒的来客中辟出一条路，走到让-巴蒂斯特·桑松跟前。他在他耳边轻轻地嘀咕了几句，随即离开了教室。夏尔有点胆怯地观察着乱哄哄的场面。他父亲朝他点点头，头指了指门口。夏尔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了。人群忽地散开了，仿佛他同时染上了鼠疫、霍乱或者天花似的。

“科林神甫，”夏尔在走廊上告别时问道，“难道真有一重诅咒，它会笼罩着整个家族吗？”

“诺亚诅咒孙子迦南——含的儿子。可在《旧约·创世记》中写着，上帝最最先诅咒蛇，然后诅咒土地。如果相信上帝，那么你也相信诅咒。”

“那要是我不再相信上帝了呢？”

“那就不再有诅咒。那么你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将是一个寻找者。”

安托万在教室外的内院里等着，他趁夏尔不注意同样离开了教室。夏尔从他身边走过时并没有注意到他。“你瞧，”安托万在他后面喊道，跟着他走了好几步，“金钱万能。没有显赫的家族你什么都不是。你好好考虑吧，到时你肯定会有热汤喝的！”

夏尔停住脚步，威胁性地站在安托万面前。“现在谁也不会再保护你了。”

安托万哈哈大笑。“谁会惹我呀？”

“我，”夏尔说，“比如我！”说完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安托万目瞪口呆地捂住自己通红的脸颊，迅即退后一步。“你会后悔的。”他急匆匆地回到了教学楼里。

他们默不作声地踏上了回巴黎之路，这是一段漫长的旅途。夏尔非常气愤，家庭的遗产已经成了他的灾难，他再不希望和它之间有着任何瓜葛。让-巴蒂斯特垂头丧气地坐在马车里，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窗外看。初雪降临大地。凛冽的寒风透过马车的裂缝吹入车内。地板冰冷。让-巴蒂斯特对发生的一切深表遗憾，人们竟然如此排斥他，伤了他的心。伤了他和他整个家族的心。

后来，杜布奶奶说，她始终为自己是巴黎刽子手的母亲感到骄傲。“你不是随便哪一个刽子手，”她发起火来，“你是巴黎先生。”让-巴蒂斯特沉默不言。然后，她转向夏尔：“你应该为你的父亲、你的祖父以及所有桑松家族的人感到自豪，他们一直行使着刽子手的职务。这个遗产不是负担。难道一万镑成了一种负担了吗？”

让-巴蒂斯特和夏尔一声不吭。他们俩在想着同一个问题：她为何就不能闭上嘴呢？

“一年一万镑，这是三百名工人的月工资，”她继续道，“法国其他刽子手的年收入为二千四百镑至六千镑，视城市的大小而定。”

夏尔真希望奶奶立即倒地毙命，她就可以永远沉默了。就连她的声音他也难以再忍受下去了。

“你好好考虑是否还要做大夫，夏尔。这个社会永远不会喜欢你。你永远是刽子手的儿子，直至你将来有一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刽子手。巴黎先生。”

“我想做大夫，”夏尔固执地说，“我想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用刀子杀人。”

杜布奶奶做了一个生硬的手势。“砍掉一只手可以挣到二十五镑，今天你从哪儿挣到那么多的钱？全巴黎的人都抢着想要谋得这样一份职位。”

“爸爸，”夏尔说，请求似地转身面向让-巴蒂斯特，他父亲还一直目光呆滞着，“你把我送到别的学校去吗？”

让-巴蒂斯特转身看着儿子，并且点点头：“我们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夏尔。下次你最好冒充自己是孤儿吧。”

“他难道可以否认自己的家庭出身吗？”杜布奶奶呵斥道。

第4章

夏尔感觉在家里不再受到欢迎。杜布奶奶在发号施令，指挥着那名女帮厨和那群孩子，宛若在指挥一支小型部队。她始终在儿子身边转悠，每一位女访客马上意识到，鳏夫桑松身边没有新太太的位置。让-巴蒂斯特对肌肤相亲失去了兴趣，他也对女人的芳香失去了渴望。他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孩子。他看重的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氛围，以及美食。他的母亲是出色的厨师。女帮厨跟她学了很多，尽管杜布奶奶从没有对她满意过。她对任何人都不会满意。让-巴蒂斯特不干预她的事。不执行判决的时候，他就躲在书房里看书。他母亲认为读书百无一用，书上只有灰尘而已。可她也听他自便。她像对待孩子一样对他百般呵护。

夏尔刚回到地狱街，就去寻访那家耶稣会修道院。一位和蔼可亲的神甫为他开门，请他稍等片刻。神甫说是要去找一下热比云神甫，他可能还在祈祷室里祷告。不一会儿，神甫回来了，请夏尔跟他走。他带他走进修道院院子里。那里布置得像是古罗马住宅里的前院。院子呈正方形，由拱廊围绕着，院子中央有一口水井。水井四周辟有一片药草园。一位神甫跪在一个苗圃前，当他听到石子路上的脚步声时，他便站起来，在围裙上拍拍双手。

“太高兴了！”热比云神甫满面笑容，张开双臂走近夏尔。“你瞧，我的朋友，这是安眠浆果。古埃及人早就用它做镇静药，它可以让人镇静和放松，哪怕他知道自己的脑袋马上被砍掉。”

夏尔吓了一跳。他问自己，是否神甫已经知道他不仅是刽子手的儿子，而且刚刚被鲁昂的修道院附属学校开除了。

“但这个浆果在这里生长得不是很好。我们做得更成功的是用鼠尾草治疗咽峡炎，用茴香治疗咳嗽，用颠茄治疗腹痛，用车前子治疗头痛。尽管头痛时建议少饮酒更有益。”热比云神甫自豪地指了指这几个浆果。

之后，他领夏尔到了他的药房。一张偌大的木桌上放着人参根。“人参，”他说，“在暹罗是万灵药。有些人服用它是为了放松，还有一些人服用它是为了供血更流畅。”他像小姑娘一样咯咯笑着，“它也可以增强男人的力量。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从发明印刷术以来，每年出版各种各样植物作用和功效的医学书籍越来越多，人整辈子都看不完所有的书籍，更别提整理和使用这些知识了。随着印刷术的出现，一个堤坝被冲开了。在欧洲，每一个人都可以查阅、验证、改进以及重新出版他人的研究成果。”

药房里排列着大量的瓷器盘和容器，还有研钵、图纸以及包括研究成果的图表。

“你告诉我，是什么原因让你回到了巴黎？”

“我在寻找一所新的学校，我想或许您能帮我推荐一下。”

“一所新的学校？”

“我父亲是巴黎先生，”夏尔坚定地说道，“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家长接待日那天认出了他，我因此不得不离开了这所学校。”

热比云似乎并没有感到讶异。“一个人是无法选择自己的父亲的。可是任何的不幸都会为新的机会打开大门。你就忘掉它吧。你去莱顿大学上学吧，那里正在发生一场医学革命。欧洲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和莱顿大学相匹敌。莱顿大学甚至要比鲁昂的那所修道院附属学校好得多。”

他请夏尔到他漂亮的工作室去，亲自为他端上了一杯咖啡，里面没有加奶，但放了很多桂皮和糖。房间和咖啡的效果出人意料。夏尔突然感觉自己很清醒，对知识充满着强烈的渴望。神甫会心一笑，说道：“如果能到莱顿读大学，你到时候再过来看我。我给你另一种植物

药剂试试。”

“所有那些从暹罗过来的年轻姑娘都在哪儿？”

热比云神甫得知夏尔有这方面的兴趣感到很高兴。“她们白天在路易大帝中学读书。这是我们和暹罗国王达成的协议。她们学法语，研究自然科学，晚上我们想让他们熟悉上帝的福音，可要想让他们信服很难。他们认为我们的上帝是军人上帝。确切地说，他们害怕他，可他是爱之神，是不是？他们只喜欢他们的佛陀。佛陀和耶稣：这不是一样的嘛，他们都是太阳之子，光明之神，只是同样的酒装入了不同的瓶子罢了。”

夏尔在路易大帝中学对面的修道院围墙那里等着。他考虑自己该如何表白，可他太激动了，理不出头绪，想不出计策。一听到学校的钟声响起，他慌忙从围墙边蹲下，像一只被逮住的动物那样来回奔跑。年轻人从校园里冲出来，各自分散开了。最后出来的是来自暹罗的学生。他们一起说说笑笑地走出来，要想从这群快乐的人中分辨出人来几乎不可能。对一个欧洲人而言，所有的亚洲人长得都一模一样。这群人走到了大街上。就在此刻，夏尔看到有个人站住了。她有点孤单地站在敞开的校门口。丹曼莉。她看到了夏尔。她兴高采烈地向他奔来，在他面前突然停住脚步，仿佛因为泄露了自己的情感而感到羞怯似的。

“我想告诉你，我要上莱顿大学了。我想做大夫。可我会回来的。”

丹曼莉点点头。夏尔不是很清楚，他说的话她是否全听明白了。可她看起来那么严肃，几乎有点伤感，以至于他相信她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会回来的，”夏尔说，然后犹豫地补充道，“我会在这里等你。”丹曼莉又是点点头，然后双手在胸前合十，使劲地上下点头。然后她抬头望了一眼，有点羞涩，露出狡黠的微笑，说道：“丹曼莉等

你。”说完飞快地追上其他同学。

事实上，荷兰莱顿大学是一所在医学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等学府。该大学成立于1575年，已经踏上了一条崭新而革命的道路。他们提倡临床课程。莱顿大学的医学不再由神学家，而是由科学家和专业大夫授课。而且踏破门槛想到莱顿来的不仅有来自整个欧洲的大学生，而且还有有钱的病人。

夏尔立即喜欢上了这里的课程。他和其他大学生一起跟随拉克鲁瓦博士穿过医院狭小的走廊，经过天花治疗大厅后，他们来到宽敞的楼梯间，从这里可以爬上四楼。数不清的病床靠着第一大厅的墙壁一排一排地彼此相连。由于床位紧缺，躺在同一张病床上的可以多达四人：病人、濒临死亡的人以及死人。人们仅仅将孕妇剔除出去。所有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一周后大家都会出现相同的症状。下一个大厅里躺着刚做完手术的病人。而那些疯子就被安置在相邻的大厅里。在莱顿，不是简单地捆绑这些疯子，而是对他们进行研究。这是新鲜事。可有些疯子整天咆哮如雷，怒气冲冲，到处敲敲打打，在这层楼里谁也休想睡上安稳觉。最后面的大厅是手术室。他们用锯子截掉大腿，在场的病人能够切身体会到他们接下来面临的遭遇。人们也在实施一种极其痛苦的膀胱结石切除术。在采用手术将折磨人的小石子取出的尝试中，有些人在手术成功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

在莱顿大学，学生们不再躲藏在教科书后面，只是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理论知识，这里的人注重实践。老师们对着活生生的对象给学生授课。工作课程极多，年轻的学子们必须按照顺序做好老师的助手。在这里，每个人都要在专业的观察下运用自己的理论知识。他们要做手术，学会用绷带包扎。病人必须忍受像玩具娃娃似的被胡乱捣鼓。有些学生大多高雅地克制着，还有一些脸色煞白，坐在一张人满为患的床上，好像马上需要大夫的救治似的。夏尔总是站在第一排。他可以看到淋漓的

鲜血。他不会烦躁不安。他从不会感到恶心。鲜血只是人体中的液体，偶尔也会流尽，就像酒桶里的酒一旦打开，总有一天被喝光一样。就算碰到肢体不自然地扭曲着，他也不会感到不舒服。他像一个需要验证铰链的工匠，喜欢亲自动手。他也很快明白了其中的规律，像海绵一样将他耳闻目睹的一切悉数吸纳。莱顿大学符合他的口味，他为能在这里求学感到自豪。他是这个崭新的实验医学的一部分，这种医学仿佛勇敢的航海家们希望开辟出新大陆一样。夏尔心想，热比云神甫说得对，倒霉和幸运有时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遭受厄运的打击之后将会迎来意想不到的好运连连。

然而，幸福往往稍纵即逝，又一次挫折接踵而至。这次起因是杜布奶奶的一封信。夏尔一眼认出了她的笔迹，那文字让他想起了刺刀和大鱼叉。这封信的内容无异于宣战。她在信中写道，让-巴蒂斯特突然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夏尔必须立即回到巴黎去。他应该在收到信之后马上收拾好行李，乘坐下一趟的马车回家。

夏尔好歹把他的东西打好包，然后前往下一个邮政驿站。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临走前，他偷了一打的空练习本。他是怀着冲动去做这事的，这完全不符合他的个性。他感觉到无力的愤怒，于是去偷了本子，为了能收回一些人们正从他身上夺走的东西。人们正要夺走他的一切，而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为了抚慰自己，他带走了几本可怜的空本子。他想从此以后要将发生的一切统统写到本子上去，直至他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一名大夫。他之所以偷走这些本子，是因为他完全意识到，他在巴黎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倾诉自己苦难的对象了——除了这些空本子。因为在那些人中他将继续是陌生人。他决定要把自己的一切写出来，因为没有几个人可以预料到他们究竟是谁。那是命运的考验，这些考验让一个人突然而且往往痛苦地注意到：他究竟是谁，他有能力做何事。绝大部分人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连蚂蚁都不可能踩死一只，可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用灼热的钳子从同类活生生的身体的

骨头里撕开肉来。你不能草率地把有些东西透露给其他人，你可以默默地把有些东西写到本子上去。没有欢乐的人，至少应该拥有一个空本子吧。

第5章

当邮政马车颠簸着驶过尘土飞扬的公路时，夏尔重新感到一种无尽的忧伤在他心中升起。那是桑松家族的疾病，是原罪的一部分。他们先是变得满怀愁绪，然后就会中风，身体无法动弹。他们只是为了遭受折磨才苟延残喘。

夏尔远远地看到弥漫在巴黎上空的灰色雾霾。许许多多的教堂尖塔耸立在阴沉污浊的天空中，因为无以数计的平炉将浓烟喷向空中。然而，雄伟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那哥特式塔楼却傲然屹立在无数的教堂尖塔之上，犹如罗马教皇被红衣主教簇拥着一般。

夏尔越接近这座城市，他的忐忑不安就越是强烈，他的喉咙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他讨厌巴黎。他喜欢莱顿。莱顿是文化与科学之都。伦勃朗在那里生活过，包括细菌的发现者安东尼·凡·列文虎克也曾在那里留下过足迹。荷兰人一开始那种坦率又不复杂的处事方式要比巴黎人略显粗鲁而自负的行为举止更讨他喜欢。不过，他之所以讨厌巴黎，还因为那是他奶奶玛尔泰·杜布的城市，她就像巴黎圣母院栏杆上那众多狰狞可畏的神魔精灵石雕一样，时刻提醒压在桑松王朝的那重诅咒，好让那诅咒得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她的野心也应该是所有桑松家族孩子们的野心。她把持着所有人的想法。唯有她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尽管她还从没有看过一本书或者至死都没有听进去一种不同的意见。这是人的悲剧，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夏尔想道。他们没有预料到自己懂得那么微乎其微。

1757年3月的一个早晨，邮政马车途经巴黎市海关，在百货商店后面停了下来，身前身后都是打工者、残疾军人、穷困的农民以及瘦弱的村姑。他们在巴黎找不到幸福，因为他们知道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幸福。他们寻找摆脱农村的不幸。他们全都遭到了明显疲惫过度的士兵粗鲁而大声的斥责，又像牲畜一样被分类和驱赶。来自欧洲各地的马车在海关聚首，大家各自交流信息和传闻。那天，人们都在谈论罗贝尔-弗

朗索瓦·达米安。据说达米安用一把折刀刺伤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大家都对这样一种行为表示不可思议。有人竟敢让国王流血？国王不是离上帝最近吗？

想要到巴黎的人，都必须经过二十四个海关大门中的一个，将受到士兵认真仔细的盘问和搜查。无以数计的商人在他们的马车、手推车以及货车前烦躁地等待税务官助手们办理货物进口手续。这些人从国王手里买下了这个官职，根据个人的判断确定进口税的多少。这些税务官不顾廉耻地提高苛捐杂税，导致食品价格飞涨，一名临时工必须拿出自己半日的工资才能买到一只圆面包。对穷人而言，食品价格翻倍就意味着穷途末路，而对不用缴纳任何税费的贵族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他们总是有足够的钱。

夏尔想，可能也会有人觉得这个欧洲最大的城市很美吧。可要是你没有钱，只能饥寒交迫，那么任何一个城市都会变得丑陋不堪。

差不多等了一小时，夏尔和其他乘客可以继续往香榭丽舍大街进发了。林荫大道摇身一变成了有钱的贵族阶层的大街，他们在此建起了富丽堂皇的城市别墅，附属花园里风景如画。邮政马车在杜伊勒里宫前停了下来，那是国王的城市宫殿。从这里步行至地狱街，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夏尔不想回去。他心里一切都在抗拒。他真想大吼，可他没吭声。他不知所措地站在城堡前，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几个士兵赶走了一群临时工，示意夏尔同样赶紧离开。他溜达到塞纳河畔，然后沿着河岸慢慢往巴士底狱方向走去。他可以掉头回去，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可他必须回家。靠自己挣钱过日子，他根本没有能力在莱顿继续攻读医学专业。没有了家，他什么都不是，正如鱼没有了水，正如狼没有了狼群。血缘关系是唯一生存下去的基础，是安全的保证。而谁要是不尊重狼王的权威，会招致整个狼群的愤怒。夏尔决定正视现实，回到地狱街

去，虽然怒气冲冲而且心里极不情愿。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似的，他继续向前走着，他在问自己，是否有一种自由意志，或者他是否仅仅被自己不明白的力量驱使然后实现他都觉得陌生的计划。夏尔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渐渐迷失了方向。石子路上蒙上了厚厚一层变干了的淤泥，在一些背阴的地方甚至要深至踝骨。四处乱串的野狗野猫在为争夺人们肆意扔到马路上的来自屠宰场里沾满血迹的垃圾而大动干戈。商人们将他们难以驾驭的动物赶到巴黎大堂方向去了，而收集肥料的人将一堆堆混杂着秸秆和垃圾的粪便收集起来，再装到他们的驴身上。为此他们需要一份必须在海关赎回的许可函。巴黎都在销售他们的破烂货。巴黎变了。巴黎变得敏感、疲惫而毫无指望。成千上万人在逼仄的巷子里游荡，从绝望的人群里艰难地穿越，他们想随便找个白天打工的地方，只是为了能买上一只面包养家糊口。谁都不会怜悯他人，自己的遭遇已经够不幸的了。人们毫无同情心地踩踏路边乞丐的残腿。人们无动于衷地从教堂的台阶旁匆匆走过，遭遗弃的新生儿就躺在那里，他们哭喊着，无助地摆动着胳膊，被大胆的街头野狗嗅着舔着。墙上挂着嘲弄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蓬帕杜夫人的招贴画。

国王的刺客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成了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人们说，他是因为不忍看到老百姓忍饥挨饿，才想着要惩罚一下国王。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老百姓忍饥挨饿，他们的国王是否有可能不被唾弃。有人介绍说，达米安长达数日躲藏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当夜晚来临，他隐匿在一个台阶下，等着国王的到来。当路易十五及其随行人员爬下台阶时，他从藏身之处跳出来，冷不防从用滑膛枪装备的步兵中间穿过去，用他的折刀刺伤了国王。一些人声称，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叫喊道：“为了自由！”其他人则声称，他咆哮道：“以人民的名义！”可谁也不清楚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说这些话的人没有一个当时在场。刺杀事件发生迄今已过好几周了，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被关押在巴黎的一座地牢里，每天遭受审讯和拷问。

让-巴蒂斯特纹丝不动地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怀疑地盯着儿子看。他半身瘫痪已有好几周了。夏尔敢于对父亲说“不”了。杜布奶奶威严地站在瘫痪的儿子后面，用锐利的目光看着孙子。她的眼里明显透露出不耐烦，期待他收回自己的决定。可夏尔却一声不吭。他最喜欢的妹妹多米尼克坐在壁炉前的长凳上，目光低垂着，每当空气中弥漫着怒火时，她总是表现出这样的神情。夏尔其他几个弟弟妹妹似打翻了五味瓶般怀着复杂的感情打量他。有几个坐在厚厚的木地板上，背靠着温暖的棕色壁炉瓷砖。低悬的木制天花板被巨大的横梁支撑着。横梁上面挂着需要烘干的湿衣服。夏尔的三个妹妹很高兴她们的大哥回来了，可他的四个弟弟却对他很生气，责怪他引发了父亲和奶奶对他的不满。

“这可是严重的背叛行为。”杜布奶奶稍后说。夏尔依然沉默不言。“难道我们被社会唾弃和仇恨还不够吗？”她接着说，“难道我们自己的骨肉现在还得避开我们吗？”

父亲坐在那张破旧的安乐椅里，给人一种凄楚的惨象，害得夏尔几乎不敢正眼看他。他显出一副完全无助的样子。夏尔用目光扫视安乐椅棕色椅套上面的狩猎主题。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数过鹿、狗和骑马的猎人。带着猎人号角的男子缺了脑袋，那脑袋的地方裂开了一个洞眼。“我难道没有足够多的弟弟吗？”夏尔听到自己在问。他发觉自己发不出声音。他感到羞耻。可如果他现在认输，那么他将一辈子受罪。他必须坚定信念不动摇。他的两个弟弟自豪地伸长脑袋，因为只要能够佩上正义之剑，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可他们太年轻了，搞不明白这一职位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还从未见过一个脑袋怎样从人的身体里分离，鲜血又如何从喷泉里喷出来。

“你是长子，”杜布奶奶说得很简洁，“此外，法国还有足够的城市可以将职位提供给你的弟弟们。他们会和刽子手的女儿结婚，再生出刽子手来。他们完全没有其他选择。”

“哦，不是，”夏尔反驳道，“布里吉特姑姑嫁给了一名音乐家。”

“布里吉特姑姑，”杜布奶奶话音里带着辛酸，“你知道她的两个儿子后来做了什么吗？他们都成了刽子手。这是桑松家族的遗产。这不是诅咒，夏尔，这就是命中注定。”

“可我更喜欢音乐，而不是打开绞刑架下的陷落活门。我想做大夫，晚上弹琴。我就是如此设想我的生活的。”

“莱顿的那些荷兰人把你变成了什么？你设计你的人生？这是什么样的新想法？你变成了一个多么无耻的捣蛋鬼！你想自己决定你的命运吗？上帝决定你的命运，设计你的人生，而你必须服从上帝的安排。履行义务决定了你的道路。这世上没有比听从和服务家庭更伟大的义务。”

“我不想，”夏尔说，“我不能。”

家庭成员的目光全都落到他的身上，那种目光是那么沉重，充满对他的责备，他的膝盖禁不住地颤抖起来。他不仅感觉到奶奶和他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压力，而且也感觉到了来自父母所有兄弟姊妹的压力。父母的兄弟姊妹居住在奥尔良、图尔、第戎、南特和瑟堡，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他们都会定期到巴黎举行大型家庭聚会。他也感觉到了所有他的堂兄堂妹表兄表妹的压力，他们永远不会对家庭法则产生怀疑。这种无条件顺从家庭的法则要比教会乃至王室的权力更强大。因为这是保护他们成员的家庭，他们不是国王那些用滑膛枪装备的步兵。

“靠近我点。”让-巴蒂斯特严肃地说，极力举起两只胳膊，想拥抱儿子，可没有如愿。多米尼克想用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手绢擦拭父亲右嘴角上的唾液，可杜布奶奶走到她的前面，用一记粗鲁的手势摸了一下瘫痪者的嘴巴，然后又把他流在上臂上的口水蹭干净了，她的手终于停

留在那个地方不动了，好像她想要示威一下这个人是属于她一个人的。

“我起先想的和你一样，”让-巴蒂斯特放慢语速道，“我原以为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太沉重了。而且这淋漓的鲜血……”

“鲜血我无所谓，”夏尔说，“大夫也必须忍受目睹鲜血。”

“那你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杜布奶奶责骂道，“那你真的简直太适合刽子手的职业了。”

让-巴蒂斯特粗暴地动了下左手，想让杜布奶奶保持沉默。他的脸涨得通红，试图把头别过去。

“我真的已经很平静了。”杜布奶奶说，用手抚摸他的肩膀好几下。

“夏尔，”病人用几乎温柔的声音说道，“我也害怕血。我逃到新大陆，就是想摆脱命运的安排。可是命运追上了我，把我带到了那个该死的农庄。我在那里认识了你母亲。她的父亲，约翰师傅，对我精心指导，帮助我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而我可以说的是：我充满自豪地行使了这一职责，很满意自己作为行刑官的使命。如果这个该死的疾病将我……”让-巴蒂斯特想重新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可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了。杜布奶奶恶狠狠地瞥了夏尔一眼，好像他对父亲的不幸必须承担责任一样。

“我想要做大夫。”夏尔回答。他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力量，竟敢忤逆整个家庭。“我想给人治病，父亲，而不是掐死他们，绞死他们，将他们斩首，或者四马分尸。我想救死扶伤，而不是杀人如麻。”

“刽子手也是大夫，”让-巴蒂斯特说，“他切下我们社会有病的部位，他治愈我们的社会，使它健康成长，受司法的委托，受国王的委托。”

夏尔急切地伺机反驳，可面对父亲提出的理由，他找不到话说。他明白父亲绝不会和他商量。他想让他信服。他不想和他辩论。

“夏尔，”让-巴蒂斯特继续道，“在这个王国只有两种世袭的官职：一是统治者的官职，二是刽子手的官职。对鲜血你会慢慢习惯，如果你不是出于信仰，那就为了你的家庭去做这个职位吧。你看看我们，夏尔，你看看我，你的父亲，你的奶奶以及你的所有弟弟妹妹。要是你拒绝了这一职位，你就使我们所有的人陷入了贫穷和饥饿之中。因为桑松最后一代人关闭了世界的大门。我们根本没有选择，夏尔。我们整个的希望，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你的弟弟都还太小，无法担任这一职位。你是老大。至少你该试一试吧！”

这真叫杜布奶奶气红了脸。尽管对孙子越来越恼火，可她还是镇定地让儿子说话。“外面有人在喝西北风，像苍蝇一样地死去，”她用责备的语气说道，“如果一个人有工作，他可以一年挣到三百镑——假如他一年时间一直有工作的话。三百镑！可刽子手的职位一年可以挣来一万镑。一万镑！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职位。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担当这一职位。如果你拒绝了这一职位，明天就会有来自外省的刽子手递交他们的申请。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巴黎先生。”

“唯独你不想！”他的一个弟弟用责怪的声调嚷道，其他弟弟妹妹赞同愤怒者的合唱，只有多米尼克沉默着。她始终站在夏尔一边。

“我不能，奶奶。我不能使任何人遭受痛苦……”

突然之间，房间里被一阵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让-巴蒂斯特变得烦躁不安起来。杜布奶奶忧心忡忡地将双手搭在他的肩上，做了一次深呼吸。他给了母亲一个忍耐的信号，然后他重新转向儿子。“夏尔，生活并不总是善待我们，我们一起忍受了很多苦难。更何况我很尊重你想成为一名大夫的愿望。我把你送到鲁昂，后来又把你送到莱顿大学，

这可是花了我不少钱。我们都是节衣缩食才给你省下了学费。可现在上帝作出了另外的决定，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夏尔，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现在究竟何以为生呢？”

房间里死一样的静谧无声。

“我的仆人将完成那些肮脏的活儿。”稍过了一会儿，让-巴蒂斯特继续道。他的声音此刻听起来更强硬、更果断。他这样说话，好像夏尔早就默许了似的。“你看不到鲜血，夏尔，你不用登上绞刑架。你站在通往绞刑架最下面的台阶旁，用你的到场证明执行判决的合法性。这难道是对你提出过高要求了吗？”最后一句话他是吼出来的，他用嘴巴做了个怪模样。多米尼克想重新悄悄地擦去夏尔下巴上的口水，可杜布奶奶又一次走到她前面，迅即说道：“我已经和普律多姆师傅说过了，他是他所从事的那个专业的行家里手。他将代替你行使这一工作，直至你长大成人。”

“直至我的弟弟足够大吗？”夏尔不相信地问道。

“巴黎先生。”让-巴蒂斯特低声道，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紧接着，他的脸色重新变了样，口水从嘴角流出来。多米尼克站起身，她一直没吭声。她慢慢地走到夏尔跟前，温柔地拥抱他，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这让杜布奶奶非常反感。夏尔爱他的这个妹妹胜过一切。即使在莱顿，他也渴望被她温暖地搂抱，吸入她身体的芳香。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我亲爱的夏尔，”她以温柔的声音说道，“这个职位你直接从国王手里获得——从国王本人。你从宰相那里获得你的工资。在军队里只有最好的军官才享有此宠幸。夏尔，你这么年轻就能行使这一职位，这是深为荣幸的事。而且我向你保证，现在，因为你又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每天晚上一起弹琴。你有音乐天赋，它将永远陪伴你。每天晚

上，在你工作了一天之后，当你回到家，你会需要它。”

夏尔恳求地看着妹妹，可她的微笑让他停止了所有的反抗。他简直太爱她了。她还那么年幼，可那么聪颖，又那么博学，他多想整天听她说话。他在鲁昂或者莱顿的时候，当他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他就聆听她教他弹过的钢琴曲。他的想象力太强大了，他就觉得她坐在他的床边弹琴，只为他而弹。夏尔有时问自己，是否其他人也会在他们的脑海里产生如此美妙的图画和旋律，而这些图画和旋律又是如此真实可信，简直无法将它们视为幻想而搁置一旁。可是，这不是特别美好的天赐礼物，因为可怕的幻影在想象中慢慢膨胀，变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怪物。夏尔知道，这是桑松家族的疾病。敌人就在自己的脑袋里。

“你是桑松家族的人。”杜布奶奶发出难听的叫喊声。在听到多米尼克温馨而充满旋律的声音之后，再听到她的声音，真的犹如恶魔在发出沙哑的声音。“桑松家族很强大，因为他们必须强大，”她闷闷不乐地说，“而且他们姓桑松，因为他们默默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桑-松。没有声音。[1]”

夏尔迄今经历的一切，此时此刻在他的眼前都化为乌有。从此以后，绞刑架下的鼓声将取代细菌和血液循环的学说，被处决者的喊叫声和恳求声将淹没维瓦尔第的《非凡》乐曲。他的弟弟妹妹们冲到他跟前，喜形于色地拥抱他。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点了点头。弟弟妹妹们对他的喜欢打动了他，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激动让他感到得意洋洋。他们是他的家人。他又回到了家里。现在他笔挺地站在那里，夏尔-亨利·桑松，桑松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像一名大力士那样，高大威猛，仪表堂堂，可又像个孩子那样可怜无助。

翌日清晨，杜布奶奶和夏尔来到巴黎检察院的铸铁大门前，等待进入。约莫九点，总检察长在一名穿着蓝色制服的中年男子陪同下走进大门。他们沿着宽阔的石阶爬上三楼，踏进总检察长办公室。总检察长是

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男子，蓄着蓬松的连鬓大胡子，胡子略微灰白。他穿一件黑色西服，宽大的肩章和袖子带子深受军服的启发。在他身后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上是一座横跨塞纳河的大桥。那些书橱装点着对面的墙，书橱的门是玻璃做的。夏尔还从未看到过如此美轮美奂的家具。就连总检察长坐的那张桌子，也被雕刻得充满艺术色彩。桌面是用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制成，桌腿非常细小，弧度轻轻地朝外面伸展，并被装饰上了金属花边。总检察长似乎很熟悉杜布奶奶。当他握住她的手，并且很长时间一直不放手时，他至少非常亲密地微笑着。他露出那种密谋似的目光，夏尔马上明白，这两人之前有过男女关系。现在杜布奶奶太老了，没法再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了。总检察长打量着年轻的夏尔。他似乎对他身强力壮的外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难道夸海口了吗？”杜布奶奶有力地问道，自豪地期待总检察长的回答。可总检察长一直沉默着。“他可是又高大又结实！谁也不会知道他还那么年轻。而且他还没有停止发育。他酷似他的祖父，我丈夫是个巨人，像熊一样强壮，还始终沉着冷静。”

总检察长呵呵一笑。“外省有很多人想申请这一职位，”他说，“巴黎先生是全法国薪酬最好的刽子手职位。”

杜布奶奶做了一个轻蔑的手势，很激动地说道：“那究竟是些什么人呀？流浪汉？刑事犯罪分子？被释放的在橹舰上做苦役的囚犯？或者像蒙彼利埃刽子手那样的人，每次处决犯人时，总是昏厥过去，然后在圣母玛利亚升天日时和皮革匠的山羊交配？”

夏尔暗地里希望杜布奶奶会和总检察长发生争执，可他却是显得很有趣：“他们是您的远房亲戚，太太，约翰家族，您孙子的表兄弟们。”

“约翰家族？”杜布奶奶吼道，“可是见鬼，谁会站在巴黎的绞刑架上：约翰家族还是桑松家族？我们受到国王的宠爱。谁也没有抱怨过我

们。我的孙子夏尔将是所有人中最好的。上帝给了他所有的才华，好让他继承这一遗产，尽心尽责地效劳国王。人民会喜欢上他。”

“约翰家族给了我二万四千镑。”总检察长不露声色地微笑着。

杜布奶奶做了个生硬的手势，从裙子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子。“二万四千镑，这真是可笑。您可以看出他们太不把这一职位当回事了。”她把皮夹子倒空。沉甸甸的金币哗啦啦地滚落到桌子上。

总检察长不再微笑，他看起来非常严肃。“我把约翰家族的人打发到夏特勒那里去了。”他喃喃道，目光恳切地打量着夏尔。夏尔挺起胸膛，做了一次深呼吸，然后屏住呼吸，好让胸腔显得更为有力。他出于本能地做着这个动作，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么做恰恰是起到了支持奶奶的作用。她沉着脸将金币重新塞进皮夹子。她感到很受伤，可她不是那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的女人。遇到这样的情形时她要怀着满腔仇恨做出反应，以便转移遭受斥责的耻辱。“我还从未求您做过什么事，”她急促地说道，以密谋似的方式倚靠在桌子上，“您瞧瞧我，先生，上帝赐给了我漫长的一生，只是为了允许我维护并且继续传递桑松家族连成血脉的遗业。为了王国的幸福。”

总检察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现在难以看出，他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决定。“杜布太太，”他就事论事地说道，“您从没有想过到法兰西喜剧院那里去申请职位吗？”

她不懂何为幽默，只是以几乎庄严的语调说道：“我在此恳请您将他父亲让-巴蒂斯特的职位传给站在您面前的我的孙子夏尔-亨利·桑松。”

“您希望确保桑松家族拥有绞刑架的统治权，太太，”这不是一个问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论断，“那好吧，太太，您的孙子应该穿上

血红的大衣，配上正义之剑。在您的儿子，尊敬的让-巴蒂斯特·桑松去世之前，您的孙子夏尔将临时代理这一职位。之后他就可以正式成为巴黎先生。”他在桌上操作那只小钟。没过多久，一名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男子走进房间，在总检察长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给了小伙子一个指令，负责签发任命证书和刊印此决定。等到仆人重新离开房间，总检察长转向夏尔说道：“你才回到巴黎没几天，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是谁吧？”

夏尔点点头，可杜布奶奶替他回答道：“他当然知道达米安是谁。”

总检察长目光严厉地责备杜布奶奶。“我问的是您的孙子而不是您，夫人！您还不是我这个司法机构的成员。”他微微一笑道，“您这张嘴巴到现在还是能说会道！”此刻她沉默了。有人敢于指责这个雌老虎，夏尔为此暗自高兴。总检察长从最上面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件递给夏尔。杜布奶奶本能地想拿走这份公文，可总检察长威胁性地伸出食指，她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他早已对上面的文字烂熟于心，根本不用再去看判决书，因此目光始终紧盯着夏尔：“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昨天被巴黎法院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之前他经受过痛苦的审讯。”他停顿了一下，恳切地注视着夏尔，“你知道这种刑讯意味着什么吗？”

夏尔点点头。这种施刑手段包括各种各样残忍的方式，自从建立宗教法庭之后基督徒们可以想象到这一点。

“而且另外，”总检察长补充道，“达米安将遭受钳刑。判决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现在，就连杜布奶奶也一声不吭了。钳刑太残忍，早已不再施行。谁能够掌握并且实施这种痛苦的刑罚呢？她朝夏尔同情地瞥了一眼。夏尔只是轻轻地动了动睫毛。他也不再言语。

“你需要助手，年轻人，”总检察长以一本正经的口吻说道，“你可以聘用凡尔赛的刽子手，你的叔叔尼古拉·桑松。他还从没有出过差错。他完成的工作完美无瑕，漂亮而高贵，和所有桑松家族的人一样。布雷斯特有一个出色的钳刑施刑者，你也可以聘用他。他叫苏比斯。我期待你完成这一杰出的工作。整个法国，不，整个欧洲都在关注你。如果你顺利地经受住了这一关，那么你将一朝成名天下知。不过我觉得你得确信不会晕过去。人们可绝对不喜欢这一点。”

那个夜晚是夏尔和多米尼克在钢琴旁度过的。他们弹奏巴赫的《华丽曲》，那是父亲最爱听的音乐。父亲安静地坐在那把棕色的靠背椅上，头垂落在胸前，双眼紧闭。他并没有睡觉，他在享受。他为儿子夏尔获得任命感到高兴。当遇到未成年人时，这种临时任命很常见，同时也是对现任刽子手表示尊重，因为尽管他已经无能为力却可以保留这个职位，以此给了他应有的尊严。

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对父亲生气，可是那天晚上，除了和妹妹一起弹奏钢琴，他没有更大的愿望。他饱含深情地为这个人演奏。恰恰是这个人，先是促成了他的梦想，后来又毁灭了他的梦想。

次日，夏尔叫了一名助手，吩咐他骑马赶赴凡尔赛，向尼古拉叔叔报信。他派了第二名助手到布雷斯特叫来苏比斯师傅。夏尔的弟弟妹妹们都为他们的大哥感到无比自豪。他将处死全巴黎都在谈论的那个人，他将杀死刺伤国王的那个人。夏尔将因此走出国王陛下的阴影，亲自成为国王的复仇者。而他们都是执行此判决的那个人的弟弟妹妹。

没过几天，一名法警带来了一份书面判决，判决书上对即将实施的刑罚进行了详细描述，看完整个行刑细节，不觉让人嘴巴发干，呼吸中止。夏尔感到难受得想要呕吐。他发觉上腹部有一只拳头，简直掐住了他的气管。就在尼古拉叔叔将手搭在他肩上时，他愤怒而又痛苦地注意到弟弟妹妹们坐在壁炉长凳上窃窃私语。尼古拉叔叔似乎感觉到夏尔身

上发生了什么事。让-巴蒂斯特也感觉到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可因为瘫痪，他不能动弹，也就没法触摸并安慰儿子。尽管让-巴蒂斯特非常尊重弟弟尼古拉，却在嫉妒他现在离儿子最近。多米尼克把弟弟妹妹们从壁炉长凳上赶下来，就连那几只猫也从棕色瓷砖上跳了下来。弟弟妹妹们虽然对他们的大哥担当的使命感到愉快，但谁也不会在处决的那天站在绞刑架上，目睹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慢慢地折磨致死。

“我们不是施刑者，”让-巴蒂斯特一再重复道，“我们用绳子或者用刀审判，但我们不施刑。这种活让其他人做。”

夏尔不相信父亲说的任何一句话，可他不敢反驳。他完全意识到，他必须以公正的名义执行法庭的判决。可他也清楚，大家希望对达米安这样的人公开动刑，因为世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看到这样的刑罚了。人民在忍受着饥饿，而一旦谋杀犯达米安被视为人民的复仇者，那么国王肯定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夏尔不敢肯定，这样的杀一儆百是否已经足够。他本能地感觉到，达米安使某些东西复活了。有些人秘密地将他奉为英雄，因为他们也像他一样饥寒交迫，像老鼠一样在小巷子里艰难度日。夏尔相信小达米安们有着千千万万，难以想象的是，一旦将来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从暗处走出来，那将会是怎样的局面。夏尔觉得离达米安更近，而不是离国王。他崇敬国王，可要是此人和安托万持有同样玩世不恭的态度，那么他就是一个糟糕的君主。达米安开始使夏尔思考，可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和他谈谈这件事的人。唯有他的日记。

尽管时间很紧张，可夏尔还是找到了路易大帝中学。他渴望见到丹曼莉。她立即发现他在对面马路上，急忙奔到他跟前。她喜形于色，怯怯地触摸着夏尔的胳膊。然后她激动地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条，对着上面的字读道：“我想你。我在学法语。我们以后就可以交谈了。”

夏尔殷勤地点头。他在寻找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简单词汇，可在马

路对面等着的女友们叫了丹曼莉一下，她拼命朝她们奔去。她又一次回过头来，胆怯地挥挥手，直至消失在围墙后面。

“告诉他事实真相，”尼古拉叔叔坚持道，“你的孩子必须登上绞刑架。首先是第一个助手上去，然后是他，再然后我带上达米安紧跟在后面。在开始钳刑之前，他可以重新下去，在台阶下等。但在宣布执行判决时，他必须出现在民众面前。他要取代你的位置，站在绞刑架上。”

夏尔害怕地看着父亲，可父亲却回避他的目光。

“给我弹会儿琴吧，”让-巴蒂斯特说，“我更想念钢琴而不是绞刑架。”

夏尔和多米尼克忐忑不安地坐到钢琴旁，开始弹奏起来。他弹得很差。强迫他在这种心境下弹琴真是很残忍。他为此讨厌父亲。可他无法违逆他的意志。杜布奶奶看到了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可她不懂得怜悯之心。她好似宣传一种宗教一样地宣传强硬。可她已经做好了夏尔爱吃的烤猪肉。这让他深受感动，因为这是他曾经从她那里得到喜欢的唯一标志：一块含汁的烤猪肉，那肥肉凝结成糊状，而且上面还有含奶油的蘑菇汁。这个蘑菇汁里含有的白兰地恐怕比奶油更多。他的弟弟妹妹也很喜欢他，因为他第二天要做的事将带给他们享受。

吃完饭，杜布奶奶躺下休息，请夏尔到她床前。自从拜访过总检察长之后，她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完全注意到，他已经看出她曾经和那名官员有染。这一点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在孙子面前丢了脸。仿佛她暗地里指望他保守机密似的，从那时起她很少对他动粗。就连和钱有关的那件事，也使她感到受辱，因为这件事也是在他眼皮底下发生的。他了解到，出了这个家，他可怕的奶奶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只是一个老妪。不过，夏尔现在能确保家庭收入，肯定也很有意义。不久之后，他就要领导这个家了。不久之后，她就要失去她的权力

了。她盯着他看了好久，好像企图从他的眼里读出点东西来。最后，她抓住他的右手，给了他一个护身符。那是一只开裂的钟。

“夏尔，”她以平静而严肃的声音说，“你的曾祖父脖子上戴着这只小银钟，后来把它传给了他的儿子。直至今日，这仍然是一种习惯。这只开裂的钟是桑松家族的纹章。这是一只没有槌的钟，这只钟不会发出响声。我们的钟永远不会发出鸣响。这是桑松家族的钟。无论你的痛苦有多大，谁也不会去听。桑松家族的人沉默不言，只是尽他们的义务。”

她将这个小小的护身符塞到孙子手里。“握紧它，”她低语道，“明天你站在绞刑架上，你会感觉到桑松家族的力量。别害怕，夏尔。折磨我们更多的是我们的幻想而不是现实。和所有桑松家族的人一样，一旦忧郁的想法让你备受痛苦，那么你就走到森林里去。你的所有祖先都从骑马和狩猎中享受到快乐。音乐和文学也可以给人带来慰藉，尽管我认为这两样东西毫无用处。但你尤其要避免孤独。孤独给桑松家族的某些人带来了灾难。因此你要娶一个强大的女人。桑松家族的男人需要强大的女人，夏尔，因为到最后他们全都会瘫痪。”

“奶奶，”夏尔低声道，“你为何要对我说这样的话？”他预料到灾难临近。此时此刻他希望明天晚上处决完达米安回到家，她会在家里等着他。

“或许你有时恨过我，”她轻轻地说，“你从来没有特别喜欢过我。可我确保了桑松家族驾驭死亡的宝座。现在你们是不可侵犯的。因为从现在开始，你们永远是国王的刽子手，是人民的复仇者。你是所有桑松家族的人中最伟大的。因为有了你，你和你的弟弟将会成为这个社会受人尊敬的成员。我知道这一点。你们所有的人我都看到了。你是所有的人中最强大的也是最有胆量的人。桑松王朝尚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说最后几句话时，她已经闭上了眼睛，松开了夏尔的手。他轻轻地站起来。他不想叫醒她，离开了卧室，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多米尼克坐在那儿的太阳底下。他在她身旁坐下。

“你说说看，多米尼克，一重诅咒笼罩在我们家族头上吗？”

“我不知道，夏尔。我想巴黎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被诅咒了。因为他们过着贫寒的生活，没有任何希望。我想那重诅咒就在于他们生而为人。”

“那就是说，达米安的尝试是对的。”

“是的，夏尔，国王对他的臣民不闻不问，任由他们饿死。可上帝更爱他而不是巴黎的平民百姓。他保护国王，将达米安送上西天。”

“你怀疑上帝了吗，多米尼克？”

“是的，夏尔。”

“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也就没有诅咒。”

多米尼克点点头。

“如果爸爸和奶奶不在了，我就重新放弃我的职位，然后做大夫，多米尼克。”

她发觉，他需要某个可以赦免他的人。这将会给他力量，让他挺住在绞刑架上的那段时间。“是的，夏尔，将来有一天你会是一个好大夫。”她说，然后温柔地用她的手指抚摸他的拳头。他松开拳头，多米尼克看到护身符，然后粲然一笑道，“现在你是巴黎先生，夏尔。”

“临时的。”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种请求。

巴黎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漂亮的概念，可难以和法庭托付给夏尔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东西一致起来。巴黎先生，这听起来很高贵，很高雅，它散发着名贵料子、诗意和杏仁皂的味道。可在1757年3月28日，它有股人肉烧焦的味道。

凌晨四点，夏尔套上了父亲的蓝裤子，穿上了有着绣花绞刑架和绣花梯子的红夹克衫。他的右腰上佩上了利剑。他没有戴上红色三角帽。他将帽子折叠起来夹在腋下。他和叔叔登上了第一辆马车。第二辆车里坐着十五名穿着浅褐色皮制围裙的助手，他们是从法国各地的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绝大多数是从外省过来的刽子手。四匹马拴在他们的车上。这些马都很强壮，被挑选出来派作四马分尸用。他们正走在前往监狱的路上。

他们就像送葬的队伍慢慢出发了。他们一句话都不说。曙色微明，巴黎已经苏醒。大老远就可以看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高耸的圆形塔楼。这些塔楼散发出权威和暴力的气息。向上变尖的黑色塔顶和早已等待囚犯出现的身材魁梧的刽子手们相似。达米安在其中一座塔楼里受尽折磨快三个月了。该塔楼名叫蒙哥马利塔楼，是根据蒙哥马利伯爵的名字命名的。蒙哥马利伯爵曾在一次竞赛时给亨利二世造成了致命性的创伤。夏尔和他的助手们通过了那道宏伟的铁门，从这道铁门可以通往行政事务大楼。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远不只是一座监狱，法院也在此办公。因此，法官们可以随时火速赶到被关押在塔楼地下室的囚犯那里。监狱里站立着全副武装的警察。门卫将刽子手带到一个属于圣礼拜堂的小院子里。他们一起爬下笨重的雕花石板螺旋楼梯前往那个痛苦的世界。

这名在法国被看管最严的男子，被关押在蒙哥马利塔楼最下面的地牢里。地牢里有股陈腐味，空气明显更清冷。忽明忽暗的光线看起来像是幽灵发出来的。每走一步，都会在拥挤的破屋里发出回响。突然，一

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响起，然后又复归沉寂，人们不禁要问，刚才是否真的听到过人的吼叫声。终于，他们站在了一道高耸的牢门前。达米安的土牢由多名宪兵看守着。当包上了金属的栎木门被撞开时，被烧焦的人肉味顷刻扑面而来。地牢里很热，空气污浊，满是尘埃，犹如一只拳头挤入肺里那样叫人喘不过气来。没有穿堂风可以缓解一下。达米安躺在受刑的架子上。人们用皮带将他牢牢拴住，使他无法动弹。他在这只架子上已经苟延残喘了好几周。架子下面垫放着秸秆，好收拾他的粪便。法医布瓦耶博士跪在他身旁，从他的大腿那里解下浸透鲜血的羊膜。达米安的小腿像烤香肠那样裂开了，左腿骨折，脱臼得很可怕。床头坐着四名近卫队卫兵，盯着一动不动的达米安看。布瓦耶博士吩咐其中一个卫兵用蜡烛代替浓烟滚滚的火炬。他担心达米安会在令人窒息的空气里虚脱，导致无法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被处死。他用几近慈父般的关怀检查囚犯的身体状况。大夫对法庭负责，确保达米安能够活着经历判决书中列出的所有折磨。其中一名卫兵随身带着一条狗。他用脏兮兮的燕麦糊喂狗，专心致志地观察它吃。过了片刻，他用三只手指端起碗。现在轮到达米安吃了。该卫兵接到指令，当心达米安被毒死。他应该活着，他应该受尽折磨。达米安身子没有动一下。燕麦糊粘在他苍白的嘴唇上。

罗贝尔-弗朗索瓦·达米安，四十二岁，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子。据说他父亲死于酗酒，母亲死于坏血病。他的一位叔叔好不容易将他拉扯大，让他有机会接受教育，可达米安一向不安本分，独自闯荡江湖，曾经在欧洲的战场上浴血奋战，还为一名瑞士军官做过短时间的随从，最后病倒了，带着一身疲惫回到了巴黎。很多高贵的家庭当时都争相聘用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大家都管叫他“西班牙人”，先是把他当作性玩具使用，后来觉得无聊了就把他扫地出门。之后他又振作起精神，在一个伯爵的宫殿里找到了一份差事。可是一天夜里，国王派人劫走了他的主人，因为那些贵族宾客们在他家的社交晚会上讨论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学说，那些女士们先生们突然对饥肠辘辘的百姓表现出恻隐之

心。伯爵一直送给达米安衣服和金钱，到后来达米安居然有能力在新桥开设了一家小杂货铺。然而伯爵的革命思想从没有让他的精神停止过工作，自此以后，只要看到遭受折磨和食不果腹的民众，他就会义愤填膺。当整个巴黎被极度的饥馑笼罩时，达米安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的小店。谁也不知道他何时做出了谋杀国王的决定。达米安很有可能并非完全处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但无法改变的是，他出于同情，出于对勉强维持可怜生计的法国人民的同情才做下这种事，而国王却肆意挥霍工人农民的税金，和他身边的贵族们一起寻欢作乐。也正是这些贵族们最近几周在凡尔赛宫里陪着他，伺机在泛黄的著作里寻找适用于特别残忍地惩罚达米安的行刑手段。他们甚至还研究过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可他们在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那里发现了人的思维所能想到的最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方式，对每一个人，只要是怀疑他们那个有着强烈报复欲望的上帝，他们就会痛苦地折磨和杀死他。基督徒把天堂搬到了彼岸，而把地狱安置在人间。

布瓦耶博士离开了土牢。一名法警进来，准备向失去知觉的达米安宣读判决。他首先通知他，他即将被送到朋贝克塔接受痛苦的审讯。

“他没有听您说话，”夏尔说，“他失去了知觉。”他为达米安感到无比惋惜。

“这没有任何关系，”法警固执地回答，“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它的道理。规矩就是规矩。”

四名卫兵把达米安从格栅上解开。当他们从他裂开的大腿上松开皮带时，他重新发出可怕的吼叫，可怜地呻吟着。法警命令达米安跪下，可他没有任何反应。两名卫兵按住他的肩膀，强迫他跪下，他马上累垮了，膝盖骨断了，他不可能再坚持住。两名卫兵抓牢他的胳膊，而他的小腿像是陌生的肉体在膝盖下摇来摆去。第三个卫兵则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拉回去，好让他看得到法警。法警向他宣读判决时，他不动声

色，就连宣布他将遭受四马分尸酷刑，他依然无动于衷。达米安目光呆滞，眼睛罕有的似痴似醉，好像看到自己四周所有的人都感到很惊诧。他的眼白呈黄色，他的皮肤有着尿液浓缩后的颜色。他发出越来越奇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可那些话却真的一句也听不懂。

一名少尉警官和一名神职人员一起进入土牢，达米安变得镇定了些。卫兵把他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刚才给狗喂过食的那名男子给了达米安一杯葡萄酒，可他只是闭着眼睛。他不想喝酒。

那名神职人员跪在死囚面前，用他的长袍擦去犯人额头上的汗水。就在这时，达米安的脑袋耷拉在他裸露的胸脯上。他重新失去了知觉。神职人员站起来，依次打量法警和尼古拉·桑松。之后，他的目光落在夏尔身上。他似乎知道这个人高马大的男孩是谁。他几乎不声不响地朝他点点头，微微一笑，似乎是想表明，他会通过帮助达米安而对他伸出援手。他脸色温和，充满善意。他似乎既不抱怨，也不愤怒，而是被一种不可动摇的对上帝和人类的博爱主导着。大家叫他戈马尔神甫。他曾经是一名神职人员，在一家修道院里隐居多年，现在又成了绞刑架的神甫，是濒临死亡者最后的朋友。

少尉警官询问戈马尔神甫是否已经完成祷告。神甫羞愧地垂下头，说是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祈祷室里祷告，在那里等待达米安。少尉立即命令卫兵将那个昏迷者带至朋贝克塔的刑讯室。夏尔和尼古拉叔叔一起跟随士兵来到朋贝克塔。刑侦科的成员早已等候在有拱顶的昏暗的地窖里。他们想最后一次审讯达米安，因为还没有人相信谋杀者是独自一个人采取的行动，所有的人仍然认为背后有共谋。他们认为达米安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暴动的头目。这些刑事法官们坐在一张长桌后面。微弱的灯光从落满灰尘的圆锥体上落到他们的头颅上，仿佛他们被上帝照亮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们悉数到场了，莫普、莫莱、塞维

尔、帕基埃、罗兰和朗伯林，布瓦耶博士也来了。夏尔看到多石的地上那粪便状的污物时，不由得朝上面的拱顶望去。密密麻麻的小蝙蝠聚集在天花板上，好像此刻在无声地观察下面即将发生的事。卫兵们让达米安坐在一张长凳上。布瓦耶博士将湿冷的布巾缠绕在他的脑袋四周。达米安不一会儿又恢复了知觉。他用异常出神的目光重新打量着周边的环境。他不安地来回滑行，试图避免两脚着地。现在可以很清楚地听懂他的话了：他在恳求上帝救助。他重新单调并且毫无中断地说话，好像现在是连续不断地、铿锵有力地说出自己的话才不至于被人遗忘的时候了。主任法官站起来，向达米安透露说，他因为没有招认自己的罪行，将要遭受痛苦的折磨。他要求拷问师弗莱米给达米安穿上西班牙靴子[2]。一名之前根本没被注意到的男子，从最后面的一张凳子上站起来。他踱着方步慢慢地走到被告跟前，在他面前挺直身子。他手里拿着两块打过孔的铁板。达米安直愣愣地盯着他看，烦心地转动着眼珠。然后他叫嚷道，他是无辜的，是巫婆对他施了魔法。“她住在盾牌街。您把它记下来，因为这条街中了邪，大家连这个地名都记不住。盾牌街。一天夜里，她把光屁股贴到我的脸上，我看到黑色蛤蟆从她化脓的阴门里钻出来。”拷问师弗莱米马上转过身来看看刑侦科的成员，他们正坐在桌子后面好奇地倾听着。他们点点头。弗莱米随后也点点头，三名助手从半明半暗中走出来。其中两个一把抓住达米安的胳膊，第三个随即抢起一只小板凳，压到达米安的右脚上。达米安重新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他不停地问，他怎么会到这里来，申明自己没做过任何坏事。

弗莱米跪在达米安面前，给他的小腿套上两块金属板。他用绳子把它们固定住，小腿就像被夹紧在老虎钳上。达米安又一次疼得怒吼起来。结痂的伤口又裂开了，鲜血汩汩直流。弗莱米将两块金属板彼此压得更紧，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抓住达米安不松手。可达米安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起来。鲜血从他的嘴角流出，他的头重新耷拉在胸前。主任法官给大夫招招手。布瓦耶博士从颈动脉那里触摸达米安的脉搏，用拇指

揭开他的右眼皮。“没有危险。”他说。一名助手随后递给弗莱米一只大钉子。弗莱米毫不犹豫，浑身使劲，把钉子钻入那块铁板的第一个孔眼中。钉子刺穿了这个不幸的人儿的肉体和骨头，直至从第二块铁板的孔眼中重新露出来。第一只钉子刺入之后，达米安又苏醒了过来。他睁大眼睛抬头盯着那拱顶望，大吼一声：“拿酒来！”弗莱米和他的助手回头向尼古拉·桑松看去。夏尔不知把酒带给达米安是不是他的事。可当叔叔朝他点点头时，他才明白那是他分内的活儿。一种无法描述的疲乏感向夏尔袭来。与此同时，他觉得嘴巴发麻。他想能忍则忍，可咽喉里的每一处肌肉痉挛似地收缩起来，仿佛弗莱米用西班牙靴子压住了他的脖子。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桌前，将玻璃瓶里的酒倒入杯子里。他缓慢地走到达米安那里。每迈出一步，就好像在攀登一座高山一样。他将一只手搭在达米安的肩上，用另一只手把酒杯送至达米安嘴边。达米安只是润了润嘴唇。夏尔一松开酒杯，达米安头朝前一仰，然后轻轻张开嘴巴。他想喝更多的酒。夏尔又把酒给了他。接着，达米安睁开眼睛，凝视着夏尔的脸。他转动眼珠，低声道：“把省下的酒留给巴黎人民吧。把酒留给穷人吧。我将为他们而死。为国王和君主制而死！”

达米安话音刚落，弗莱米把第二只钉子敲入那块金属板上。他敲入的力量太猛，达米安的胫骨骨头裂成了碎片。达米安大喊着、咆哮着、恳求着，可弗莱米又将第三只钉子和第四只钉子连续敲入达米安的小腿中。他的吼叫似乎在高耸的穹顶下面发出回响，像飞弹一样劈里啪啦地落到大家身上。他现在不能保持片刻的安静。他疼得发疯一般地呼喊着、咆哮着，夏尔看到连莫莱法官整个身体都在颤抖不止。莫莱已经靠近达米安，想问他第一个问题。他想问他有哪些人的名字，想知道是否有密谋，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行动。“是的，”达米安以近乎喜悦的声音嚷道，“巴黎的大街上全都是。你们没有足够多的士兵，没法杀死他们所有的人，因为达米安有千千万万。”莫莱显得非常激动。他希望听到名字。“名字！”他坚持道。可达米安只是恶意地笑笑，又谈起巫婆来，声称她不是骑着扫帚，而是骑着大阳具，因为她是魔鬼撒

旦。“撒旦！”他吼道，“你们到大街上去吧，你们会发现我说的千真万确。你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蛤蟆从她的阴门里钻出来。你们大老远就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因为她放的响屁就像管乐队吹出来的一样，而从她屁眼里吹出的湿气将会导致尸横遍野，沃土变成荒野。”

当弗莱米敲到第七只钉子时，达米安发出罕见的尖锐刺耳的叫喊，而且这种叫喊再也不愿停下来，然后哇的一声，呕吐物吐到了弗莱米的脖颈上。达米安全身颤抖着。“取下他的靴子吧。”有人说。这人是莫普。他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桌子后面，目光无神。莫莱坐在他右首，身体显然虚弱无力，布瓦耶博士刚给他诊治过。弗莱米取下了达米安的西班牙靴子，他的助手们将达米安摆放在担架上，一直抬至外面的院子里。

桑松家族的两辆车停在院子里，都已经套上了马。黑压压的人群早已站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大门口，等着在一个漫长的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即将被处决的人。马车是敞开式的，配有两张面对面坐的凳子。武装人员一路护送马车前行。他们是骑警队——法国国民警察的成员。大家都在等着达米安的到来。戈马尔神甫坐在第一辆车里。他低着头，看起来既悲伤又疲惫，好像他自己的丧钟已经敲响。助手们把达米安安排在第一辆车里。弗莱米擦掉裤腿上的血迹，不带任何感情地说：“他现在属于我们。”夏尔跟着尼古拉叔叔到了第一辆车那里。一些法院成员坐在他们边上。达米安躺在他们腿脚之间的木地板上。第二辆车里坐着刽子手的助手们。车辆出发了，可马上又停滞不前了，因为数不清的骑警队员挡住了大门。终于，他们让出了道路，让达米安的车辆进入绞刑架所在地。

成千上万人高声欢迎达米安的到来。他们呼喊着，怪声大叫，乱吼着，唱着歌，放声大笑。数百名士兵、警察和一群简直难以想象的爱凑热闹的人围在街道两旁，就好像有人散布谣言说今天有人买到了价格公

道的面包一样。圣米歇尔桥街、新市场码头、帕卢市场街，黑压压的全是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歇业。全巴黎的人都想一睹敢叫国王流血的人长什么模样。两辆车费力地穿越骚动不安的人群，他们就像是因海啸引起的巨大海浪涌入了大街。宪兵骑着马在圣母院大教堂前徘徊，把通往教堂的台阶预留了出来，可还是难以阻止潮涌般的人流。骑兵们一再奔向那些围观者，试图把他们向后推，可他们很难后退了，因为他们被身后的成千上万人持续不断地向前推挤。一路跟随车辆的国民警察，此刻组成了一个队列，向空中投射了几发子弹。人流顷刻间散开了。

那两辆车停在圣母院的台阶前。法警要求尼古拉·桑松把达米安从车里拉出来。几个刽子手助手一起将这个不幸的人儿抬出了车。他的大腿已被打伤、被撕裂、被撕碎，因此每一次触摸和移动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疼痛。夏尔想回避达米安的大腿，可还是目睹了那副惨状。法警在大教堂的台阶上焦急地等待着。“跪下！”他说，眼睛却越过人群看过去。他也不忍心看到达米安的那种样子。助手们试图放下达米安，强迫他跪下，可他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喊，人们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人群几乎虔诚地保持沉默，像是现在才意识到原来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刽子手的助手们把达米安往上拉，并且抓住他的胳膊。他的脚碰不到地了。他不该遭受不必要的折磨。达米安以细若游丝的声音向法警重复自己说过的话，那是他悔过自新的话，他请求上帝和国王赦免他的罪。当助手们把他送回车里时，他任凭自己的泪水哗哗地流出来。他现在似乎已经神经错乱，痛苦导致他快要精神崩溃了，以至于他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大小便已经失禁。

车子继续前行。离格莱夫广场越近，人群就越危险。他们都想看到达米安最后的路程。有些人对他骂骂咧咧，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还有一些人把垃圾扔到他身上，可也有一些人却是默不作声地站立在路旁，对他满怀恻隐之心。一大批警察和卫兵已经驻扎在所有的十字路口。当车队终于拐进格莱夫广场时，已坚持等候了数小时的人群以暴风雨般的

喧哗声迎接他。夏尔本能地将头转向一侧，寻找和尼古拉叔叔的眼神交流。这位凡尔赛的刽子手，也还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群众集会场面。沿着广场的所有房子的窗户都已敞开着。围观者在后面挤来挤去，而从他们的衣服可以看出来，最好的位置都被贵族阶层占领了。五十个苏可以买到一个窗口位置。就连根据他们的举止、衣着和风度更可能出现在文学沙龙里的人，也是长达数小时之久地等候在城市宫殿的阳台上，一睹这个世纪最残忍的处决现场。他们阅读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却还是愿意喜欢这个达米安，见证他的死亡。

人群在绞刑架前散开了。卫兵们开辟出一条通道，形成了一个列队。尼古拉·桑松向在绞刑架上面等候的助手们挥挥手。看到了自己人，他们显然轻松地舒了口气。在这些渴望血腥的不可揣度的人群中间等待了好久，使他们陷入了万般恐惧之中。他们胆怯地爬下绞刑架台阶，偷偷地朝那两辆车瞄了一眼。达米安像是一只残缺不全的蠕虫蜷缩成一团。

“把他抬到上面去。”尼古拉叔叔吩咐道，然后将侄子拉到一边。他们又听到了达米安的叫喊声。他绝望地高声求助妻子，请求赦免。“你可以在台阶下等着，给我暗示就行。”尼古拉叔叔说。他显然将行刑过程想成另外一种样子了。可夏尔只是摇摇头。这位新的巴黎先生不想躲藏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人们强迫他接受了这个该死的职位，可他要向所有的人证明，他们无法毁灭他。夏尔高昂着头颅爬上绞刑架。当踏上木平台，向乌压压的人群举目望去时，他终于实现了继承桑松家族遗产的重任，从此以后他将成为绞刑架的一部分。

紧跟在第二辆马车里的助手分散在绞刑架的周围。有一些人登上了台阶。他们已在绞刑架的中央连夜搭建了一座小平台，一座大约一米高的木制祭坛。他们把达米安平放在祭坛上面，将他身体绑住。他的脑袋搁在草褥上，任凭火盆里袅袅上升的灼热的硫黄蒸汽不断侵扰。在烧红

的木炭上面摆着一根筛条，一只平底锅正在上面加热。呛人的气味飘向整个广场上空，简直使人群陷入不可思议的兴奋之中。火盆旁边摆着一只狭小的餐饮桌，桌上铺设了黑丝绒桌布，桌布上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物品：钳子、屠宰用的长刀、一把锯子以及一把斩首用的刑具。有一根绳子，卷起来了，几乎看不见，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采用减刑方式用它勒死犯人。戈马尔神甫试图好好劝说不停吼叫的达米安。他擦掉达米安毫无血色的额头上冒出的冷汗，拿出一小瓶圣水，洒到这个濒死者身上，还说着赦罪的话，而达米安却像是精神病发作似的，又开始老调重弹，反复说那几句话。戈马尔神甫在做临终祷告，法院特使催促他赶紧做完。广场上空乌云密布，似乎老天也讨厌这下面正在发生的事。

“苏比斯在哪儿？”尼古拉·桑松问道，不安地环视四周。可那些应该给桑松家族提供帮助的刽子手助手们，穿着浅褐色皮制围裙默不作声地站着，无所适从地东张西望。突然传来响亮的打嗝声。大家全都条件反射似地朝台阶那里望去。那个起了个洋葱汁名字[3]的老人显得异常难受。“苏比斯在，先生。”他口齿不清地说，摇摇晃晃地走在木地板上。他站在不幸的达米安面前，拿起那把钳子。

“油在哪儿？”尼古拉·桑松嗓音尖锐地问道。他威胁性地走到酒鬼苏比斯那里。苏比斯用钳子做了个粗暴的动作，却不小心碰到了自己的额头。夏尔当机立断夺走他手中的钳子，向助手们发出赶走苏比斯的命令。“把油给我们拿过来！”助手们一阵风似的散开了。戈马尔神甫乘机重新走到达米安跟前做祷告。法官们脸色阴沉地站在那里等候。天开始下雨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第一个助手冲破人群赶过来，拿着油重新出现在绞刑架上。这期间，火盆里的火已经熄灭。一名助手想重新把火点起来，可是没有成功。

“我们需要干木柴。”尼古拉·桑松说。他此刻变得心烦意乱，满怀

愁绪。当助手们重新艰难地穿过人群寻找干木柴时，他盯着他们看了好久。半小时过后，第一个人回来了，说谁也不愿意给他们干木柴。

“为什么？”尼古拉·桑松问道。

“不知道。好像大家并不赞成我们在这里干的事。”

夏尔命令用斧子砍下绞刑架下栅栏墙上的木板，重新把火吹旺，给油加热。没完没了的等待也在慢慢折磨他。达米安又恢复了知觉，发疯般地咆哮着。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了。他恳求地注视着他的刽子手们。

“我们要让苏比斯再试一下吗？”夏尔轻声问他的叔叔。叔叔脸色苍白，可他依然知道，苏比斯在第二天中午之前是不可能再清醒过来了。执行钳刑不是刽子手的任务，可要不然谁也不可能去做这件事了。那名法警和布瓦耶博士目光坚定地催逼桑松家族的人开始这一惨不忍睹的程序。

六名助手站在达米安周围，默默地等待新的指令。夏尔只是点点头。看到他的暗示，一名助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达米安的手臂，将它伸展开来，直至他的整个手突出在木制祭坛的边缘之外。就在第二个助手从筛条上拿走烟雾腾腾的平底锅时，第三个助手将火盆推至达米安的手下。达米安本能地想抽回自己的手。他圆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的手看，仿佛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手究竟怎么了。尼古拉·桑松用热油浇到他的手上。达米安咆哮着，夏尔还从未听见过一个人竟然会叫出如此恐怖的声音。达米安嘴唇开裂，鲜血顺着下巴流出，牙齿卡在一起了。没过几分钟，那只曾经刺伤国王的手，只剩下烧黑了的残干。

尼古拉·桑松站在达米安面前，吓得六神无主。那只灼热的平底锅仍然抓在他手里。夏尔脸色煞白，呼吸急促。他发誓过要在绞刑架的台阶下面完成处决。可此刻他已经站在了上面，被成千上万人打量着。整

个人群似乎像危险的黑色海洋围住了绞刑架，夏尔也知道，只要此事未了结，那么他就没有脱身的机会。他无法逃逸。否则那么多的人肯定非把他弄死不可。他必须挺住。他伸进口袋，摸到杜布奶奶给他的那件护身符。

他果断地走到其中一名助手那里。此人名叫安德烈·勒格利，是奥尔良刽子手，如果他愿意承担钳刑的任务就给他一百镑。尽管安德烈·勒格利年长夏尔很多，而且在他所在的城市里德高望重，他立即接受了夏尔的提议，认为他在这里只是一名助手，而尚未成年的夏尔·桑松掌控着绞刑架的大权。“好的，巴黎先生。”他回答并且点点头，毕恭毕敬地低下头。他几乎是匆匆忙忙地拿起那把长长的钳子伸进火盆里。夏尔从叔叔手里拿走那只灼热的平底锅，重新放到筛条上。戈马尔神甫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达米安那里，精疲力竭地抓牢木制祭坛的边缘。他重新擦了擦达米安脸上的冷汗，那张脸因疼痛而变形。神甫说了些什么，可谁也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他的喉咙也好像被卡住了，说不出话来。布瓦耶博士也向达米安靠近。看来他突然感到晕头转向，像一匹年迈的驽马不停喘息。他颤抖着双手触摸达米安的脉搏，朝法警点点头，法警又朝桑松家族的人点点头。夏尔给了安德烈·勒格利一个信号，后者随即将灼热的钳子塞进达米安裸露的胸部。不幸的人儿无声无息地抗拒着，听凭钳子从他的身体里撕开一大块肉和乳头。那位里昂刽子手，到了巴黎也只能做一名助手，他将沸油浇到达米安鲜血淋漓的伤口。燃烧的油脂发出嗞嗞声，广场上空重新散发出人肉烧焦的气味。奥尔良刽子手撕扯达米安胳膊、腹部和大腿那些裂开的伤口。另一名助手把燃烧的松香倒入一个伤口，又把燃烧的硫黄倒入其他伤口。最后，拿着钳子的刽子手抓住达米安的男根，一把拔出来。所有的助手们疯狂地完成了对一个垂死身体的判决，而达米安就像酩酊大醉似的痛苦地嚎叫。听起来仿佛是一只发情的鹿交尾时的叫唤，可紧接着又仿佛是一名婴儿在撕心裂肺地呻吟。可他突然像是发疯似地吼道：“再厉害点，给我再厉害点，我喜欢，我喜欢！给我再厉害点！”他的吼声犹如飓风在广场上空回响。

它不再具有人声的特点，不禁让人群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声音是来自痛苦与炼狱王国的魔鬼撒旦的吼叫。

达米安又一次失去了知觉。一种异样的静寂笼罩在广场上空，只听到绞刑架脚下那四匹马的嘶鸣声。四名助手各自牵着一匹马，各自把守在绞刑架的一角。他们将长长的缰绳扔向绞刑架下的同伴。同伴们接住缰绳，动作麻利地将它们固定在即将凄惨地命丧黄泉的达米安的手臂和大腿上。广场上依然是死亡一样的静默，就连有人清清嗓子的声音现在也能听得见。雨停了。夏尔给站在马匹旁边的助手发出开始的信号。他们取下马笼头，带着马驶离绞刑架。没走上几步路，他们就停下了。达米安的身体在抵抗。他们又试图重新开始。六百公斤重的四匹马同时努力从一个垂死之人的躯干中撕下手臂和大腿。达米安的左腿关节只是脱臼，却没有被撕下。本该撕下他右腿的那匹马，支撑不住跌倒在地。人群中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恐惧的喊叫。达米安的大腿如何能抵挡一匹马的力量？马重新开始行动。达米安的右腿和两只手臂关节脱臼了。可他的身体仍和之前一样在抵抗。马又一次行动起来。它们开始奔跑，可达米安的四肢始终在他的躯干上不离不弃。夏尔放开胆子看了一眼达米安。他看到达米安的手臂和大腿怪异地变长了，可肌肉和肌腱却依然使他的四肢黏附在躯干上。这简直难以相信。目睹达米安的身体被剥皮、被撕碎、血流如注、不停地抽搐，就像一块被烧焦的熏肉，真要把夏尔的知觉夺去了。他觉得好像脚下的绞刑架木板塌陷了。戈马尔神甫跪在濒死者面前，双手颤抖地划着十字。他越来越响亮地说着祷告，宛若想用自己的声音消除他的所有念想。他闭上眼睛，因为他不想再看到他们看到的情景。他的脸上噙满泪水。他抬头对着天空绝望地吼出祷告。夏尔从桌子上拿走细绳，询问那名法警，司法代表是否允许减刑。这是一个秘密的附加条款，常常包含在刑事判决中，也就是在被处决者的所有骨头被折断或者被处以车裂之刑之前，刽子手有权用一根细绳悄悄地勒死他。法警只是一声不吭。他表情茫然地越过夏尔的脑袋。夏尔后来才注意到，法警已经失去知觉。他直挺挺地跌倒在地。他的脸被砸中了，

淋漓的鲜血顺着嘴角汩汩流出。夏尔让他侧躺在木板上，好让鲜血流下来。布瓦耶博士跪在他旁边，不是为了帮助他，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大腿早已不听使唤。他双手支撑在这个昏迷的法警身上。这可能给人群一个假象，好像他正在给他医治。可布瓦耶博士自己也需要大夫的救治。

此刻，人群中开始骚动起来。起先听起来像是远方的喃喃自语，可之后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猛烈。它就像暴风雨那样很快席卷到绞刑架那里。“把肌肉分开，把肌腱切开。”布瓦耶博士喘着粗气道，催促夏尔使劲点头加快速度。安德烈·勒格利拿着斧子站在夏尔后面。夏尔朝他点点头。这位奥尔良刽子手迅疾走近奄奄一息的达米安，用可怕的斧子从他的躯干上砍下胳膊和大腿。四匹马重新出发，将达米安撕成碎片。他的左腿在空中飞扬，啪嗒一声掉到已经苏醒的法警的脸上。

达米安的躯干仍在微弱地发出生命的迹象。他眼睛睁得很大，目光对着多云的天空。泡沫一样的鲜血从他的嘴唇里渗出来。他乌黑的头发突然变得像雪一样白。后来，全巴黎都在谈论这件稀奇古怪事，欧洲所有的大报都在头版提到这种灵异现象。但这什么都不是，尽是些灰烬而已。

人群胆怯地鼓起掌来。天色将晚。尼古拉叔叔暗示侄子察看一下绞刑架。夏尔对着这个木制的四角形缓慢地察看一番，与此同时，人群里富有韵律感地呼喊着“桑松，桑松”的名字。之后，他在西侧站住，抓住栏杆，就像凯旋而归的罗马统帅抓住战车的架子检阅部队入城一样。广场上雷鸣般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夏尔脸上毫无表情。他稍稍低下头，似乎是想要谦卑地向人群表示感谢。“桑松，桑松”，铿锵有力的呼喊仍然经久不息。此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名乖乖听话的古罗马角斗士，仅仅凭借魁梧的身材和健壮的体格就可以令人群激动不已。夏尔的目光一再对着格莱夫广场上的人群扫视，渐渐意识到巴黎在为他庆贺。他感觉到有股非同寻常的力量传遍全身，他觉得自己突然变得坚强有力而不可

征服。他缓缓转向北侧，又重新赢得从那儿传来的喝彩，然后他缓步转向东侧，最后转向南侧。他也在这里迅速地鞠了个躬，然后转向那些司法官们。司法官们对他赞许地点头。他们很满意。他的叔叔也朝他点点头。他似乎感到很纳闷，人群向这位新的巴黎先生告别时竟然会如此激动。

助手们将达米安的身体扔进火堆。黄昏像灰烬一样笼罩着他们的头颅。喜欢血腥场面的一大帮人渐渐作鸟兽散，消失在附近的大街小巷里。人们回到了自己的别墅或者自己贫寒的陋室。雨重新从天而降时，许多爱凑热闹的人依然闲站在那里。现在，行刑业已结束，一些人乘机从近处打量起绞刑架来。助手们开始拆卸。当被折磨致死的人的尸体正在火化，刽子手们被裹在呛人的烟雾中时，夏尔还一直站在绞刑架上面的台阶上。

夏尔闯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可怕的世界。他发觉从此以后他的祖辈流淌的血液也必将在他的血脉里流淌，也必将永远玷污他的家族。他发觉自己很孤独，为刚才秘而不宣地享受人群的掌声而感到羞耻。他的行为令自己作呕。因此在那一刻，他发誓从今往后要回避那些人。他不想生活在他们中间。他想独自一人待着，避开这群可怕的人。他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感到害怕的是，他有能力做这事，而且他曾经偷偷设想的一切比这还要可怕得多。难道这就是一切吗？难道我的心是用石头做的吗？难道我还太年轻，感受不到真正的同情和悲伤吗？他扪心自问。一个不懂得痛苦的人，也感受不到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这一点他知道。或许这就是如此，或许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恶心和自豪之间迷失了方向。

广场上的人很快散开了。而就在撤离的人群中他发现了丹曼莉。“哦，我的上帝。”他不禁脱口而出，急匆匆地爬下绞刑架的台阶。他想拦住她，想把一切解释给她听。这个该死的诅咒难道要摧毁他未来

的人生里遇见的所有美好的东西吗？难道他今天做出的牺牲还不够大吗？难道他在还没有得到丹曼莉之前就该失去她吗？“丹曼莉！”他嚷道，可这个娇小可爱的暹罗姑娘并没有转过身来。人群将她淹没了。他想跟在她后面，可站在绞刑架下的一名男子走上前来截住他。他显然在恭候他。“掌声献给您。祝贺您。”年轻男子也许要比夏尔大十岁，个子矮小，人很瘦弱，面色苍白。他上身穿着一件淡褐色燕尾服，一件价值连城的凸纹马甲，下身穿着一条深黄色鹿皮裤，脚上穿着一双翻口靴子，嘴里吸着一只陶瓷烟斗。他装模作样地说道：“我是《凡尔赛邮报》的记者，我叫高萨。”说完他凝视着天空，仿佛他是一个多么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在摆好姿势给人画画似的。“您肯定听说过我。或者看过我写的文章。我叫高萨。我在文章里总是署上我的名字。”他将烟斗重新塞进嘴里。他的整个举止有点可笑，好像一个孩子在模仿大人的样子。

“很遗憾我还有事要做，高萨先生。”夏尔转身想走，可高萨疾步跟在他后面，重新挡住他的路。他从嘴里掏出烟斗，俨然恩人似的轻轻拍打夏尔的肩膀。

“别走得那么快，巴黎先生。跟我们的读者说说，达米安被四马分尸时您是怎样的感受。”

“我本来希望一切很快过去。”

高萨用力点点头，马上露出一副痛苦的神情。“对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恐怕不容易，”他说，“可是人民喜欢您。您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先生。您身材魁梧。您可知道，绝大多数人不会白白送给别人任何东西，而把自己裹在高贵的衣服里。可您，您甚至光着身子也可以让人钦佩。后会有期，巴黎先生。我会关注您的。”

夏尔重新将目光瞄准丹曼莉，可在片刻之后又放弃了念头。他究竟

该跟她说些什么呢？也许她看到了整个行刑过程，一直在盯着他看。那他就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她大概早就对他做出了判决。可他并没有看清她的脸，可能她根本不在现场。毕竟巴黎还有好多来自暹罗王国的女人。可他担心那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丹曼莉，他担心极了，因此感到无地自容。

那天晚上，夏尔不能马上回家去。尼古拉叔叔说他先监督助手们拆除绞刑架，再邀请刽子手和助手们上让-巴蒂斯特家里共进晚餐。这个安排是杜布奶奶早就决定好了的，而且所有的刽子手都将在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大家再各自踏上归程。“你今天成就了一项伟业，夏尔，”他还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刽子手。你父亲始终缺乏执行这一职位的力量。这实在是太难为他了。可你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夏尔本想回应几句，因为他有话要说，可还是沉默了。也许他不想让刚刚获得的赞美失去光泽。他不知道。当人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装作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他以为知道的一切，在今天晚上随达米安的尸体一起被烧得灰飞烟灭。而且，丹曼莉意外地出现在现场，让他注意到自己再也不会有机会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了。丹曼莉看到他了，这种念头始终可怕地折磨着他。

夏尔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绝不想回家去，不想看到父亲、祖母以及所有弟弟妹妹们脸上的快乐。那只会让他觉得更受辱。因为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东西，已经深深地伤害了他，使他震惊，真的令他心碎。他一如既往地难以理解，为何人们能够使自己的同类遭受如此多的折磨和痛苦。而对他来说难以置信的是，全巴黎的人都希望看到这一幕人间惨剧。他不希望看到它。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烦躁不安地在皇宫花园附近转悠，心想这里有那么多的赌场，是否找上一家赌上一把。可他身上几乎没带钱。这附近也有很多的大咖啡馆，可他就是没有心情

往那里坐上一会儿。他不想听到人们七嘴八舌地谈论行刑的事。他们离得那么远，究竟能看到什么？格莱夫广场上的绞刑架和那些人，都不会比一只拇指更大。他们听得见吼叫声，可看不到达米安本人。他们碰不到达米安被撕碎的身体。可他，夏尔-亨利·桑松，他从最近处看到了一切。这一切也是他干的。

一路上，夏尔遇到了那些显然观看过行刑现场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朝他点头，有些人换到街对面走路，但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他现在成了大人物。夏尔不得不慢慢承认，这确实给他带来了某种满足感。尽管由于丹曼莉的缘故他有过抱怨。人们对他心怀钦佩、尊敬、尊重，或许甚至还有害怕。权力感使他完全洋洋得意起来。那种不可侵犯的感觉，不可战胜的感觉。

不知不觉中，他走到了酥皮儿小径。他有了逛逛妓院的欲望。他想要作践自己，糟蹋自己。他想向自己证明，他并不需要丹曼莉，永远不需要她。可他马上又失去了进去的勇气，于是继续向前走。他决定漫无目的地一直走下去，直至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路，想躺下睡觉为止。

午夜时分，他感到万分疲惫。他的不安已经远去。他放慢脚步，打算离开他现在所处的贫民区，往回家的方向走去。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一个门拱里移开，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先是想到发生了突袭，本能地抓住自己的利剑。可然后他看到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看到一张年轻的黑脸，而那张大嘴巴露出温柔的微笑。她长着一副美丽的白牙，这样的好牙在巴黎很少能看到。她示意夏尔随她进屋去。她应该来自新大陆，他想，她是如此迷人，如此热情，和今天在格莱夫广场上耐心等待数小时的所有白人毫无共同之处。她领他穿过一个狭窄而昏暗的过道，过道里闻到一股黄油的哈喇味，然后走进一个闷热的房间，穿着轻薄的黑人姑娘守候在那里，她们全都在一张大桌子周围闲站着。桌子上方挂着一盏油灯，油灯用一只红色灯罩盖住。因此，微红色灯光映射到天花

板上，也使姑娘的脸蛋变得半明半暗。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几乎掉光了牙齿的老妇。黑人姑娘把夏尔领到桌前。“三镑。”老妇用生硬的语调说。他将硬币搁到桌上。老太从堆在桌子上的打过补丁的脏毛巾里拿出一块递给他。黑人姑娘握住夏尔的手。其他姑娘目送他们离去。她们似乎羡慕她。他们顺着楼梯爬下去，到了一间地下室。因为有一个狭小的采光井以及点燃的十几支蜡烛，地下室里显得亮堂堂的，房间里还有股破旧的葡萄酒酒桶的气味。夏尔听到轻轻的呼吸声。房间里还有其他人。大多数人像野战医院的伤病员那样仰卧着，安静地享受着妓女们的手艺。他们几乎没有一丝声响地沉醉于情欲中。那个姑娘领着夏尔到一张垫着垫子的草席那里，然后跪下。草席的周围地上全是垃圾。夏尔站着不动。她轻轻地将他往她的身下拉，又把裙子从头上捋下来，抱住他在她的胸前停留了片刻。然后她微微一笑，把胳膊放下来。夏尔这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裸体的黑人，之前只在书本上看到过这样的画面。……她搂住他时，他开始哭泣。夏尔将头埋入她的怀里。她温柔地抚摸他的头，低声说着他听不懂的话语。她就像抱孩子那样将他揽在怀里。他在哭泣，可他没有发出声响，他在无声地哭泣。他不知道是否要重新停止哭泣。人的一生太过短暂，根本无法用眼泪洗掉他今天看到的所有苦难。他让眼泪尽情地流淌，他内心的痛苦消失了。……在缓慢的节奏中，她来回摆动自己的骨盆。她直接盯住他的眼睛看，几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仿佛在暗示，现在一切都挺好。

---

[1] Sanson，桑松。拆开来San-son，意为“没有声音”。

[2] 一种夹腿刑具。

[3] a Soubise，“苏比斯”这个名字在法语中的意思是“用洋葱汁、黄油、奶油制成的调味汁”。

第6章

夏尔回到家，父亲独自坐在厨房桌上。空气里有股烤肉味和南瓜汤味。

“有人忘记你了吗？”夏尔问。

“不，”让-巴蒂斯特回答，“我坚持等你回来。你可以待会儿带我回床上休息，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和我的儿子一起喝上一杯，因为我为你感到自豪。”

夏尔坐下来。

“我替你担心，因为你迟迟不回来，”让-巴蒂斯特轻声说，“他们把一切都跟我说了，有一些没做好，但不是你的错。你做事干脆利落，给司法官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也要对其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

“苏比斯总是酩酊大醉，十年前就是这样。我问自己他是否有过清醒的时候。”

夏尔拿起玻璃酒瓶，朝两只杯子里倒上葡萄酒。两个男人相互祝酒干杯。看到父亲可以不用他帮忙也可以喝酒时，夏尔便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干完活回到家，你可以给绳子上上油或者把刀磨磨快，这也会有好处的。我总是给绳子上上油。而假如这还不够的话，那么我就把用过的旧绳子剪开来。你可以挣到十个苏，就那么小的一根绳子，累加起来就不得了了。我认识很多人，他们在裤袋里放上一根绞刑架上的绳子到外面乱逛。他们声称它会给人带来好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收集了好多绳子，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如果你干完活润滑一下绳子，至少可以把安宁带到你的心里。”

夏尔点点头。他不相信让-巴蒂斯特的任何一句话，可是他让他说话，毕竟他是父亲。他稍稍抬起头来，突然有种冲动，想打他的脸，因为恰恰是他毁了他的一切。做一名刽子手已经够惨兮兮的了，夏尔想道，可要是再失去丹曼莉，那就是太悲催了。父亲说得倒轻巧，他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却因此毁了儿子的一生。

让-巴蒂斯特突然显得抑郁起来。他盯着夏尔看，然后低下头，说道："有时候，如果我心绪不宁，我会去逛妓院。"看到夏尔没有反应，他继续道："那位凡尔赛刽子手有次跟我说过，他每次执行完处决，都会去逛妓院。压力简直太大了。"他指了指桌上的玻璃酒瓶。"给我们再倒上一杯酒，儿子。这对每个人都不容易。你奶奶跟我说过，我应该等你，然后告诉你，这酒是为你准备的。你理应得到美酒的款待。奥尔良和里昂的刽子手都是名闻天下的刽子手，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伟大的刽子手。你完全拥有其他人缺乏的优点和决断力，行动的力量。"

夏尔把酒杯重新斟满。

"但不要太多，否则你奶奶夜里得起床了。"让-巴蒂斯特哈哈大笑，"她威胁过我，假如我没有戒掉晚饭后喝酒的习惯，她就让我尿到床上去。不过晚上喝酒太多会损害到肾脏。"他又一次哈哈大笑。看得出来，他现在对这次成功的行动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真的感到很自豪。可夏尔笑不出来。他父亲笑起来倒轻松。他也讨厌他这一点。他更加讨厌自己的是，因为他也逛过妓院了，和父亲一样。他做了他之前所有桑松家族的人做过的事。可他并不知晓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不就是桑松家族的人吗？

"我就喝你杯子里的酒吧，"让-巴蒂斯特平易近人地说，"桑松家的人都是这么干的。"

"我一直想做大夫，"夏尔固执地回应道，"别忘记这一点。这是我

的天职。”

让-巴蒂斯特喝着夏尔杯子里的酒。然后他说：“夏尔，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如果这是你的天职，那你将会是大夫。可你暂时还是巴黎先生。”

“临时代理的。”夏尔说，带着某种不乐意喝着父亲酒杯里的酒。

一直到凌晨时分，夏尔才带父亲上床。父亲和杜布奶奶以及夏尔的四个弟弟妹妹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老太太还醒着，可不说一句话。让-巴蒂斯特请夏尔向杜布奶奶道声晚安。夏尔走到她跟前。她的床很大，木腿高耸着。他在她床前站住。他闻到玫瑰油的味道。老太太在和瞌睡斗争。她呼吸急促，皮肤因为蜂蜡太多而显得苍白发亮，为了保护皮肤她每晚都会抹上蜂蜡。

“从今天开始，”她低声道，“国王朝不保夕了。每个人都看到王朝有多么脆弱不堪。只要地基出点问题，整个大厦就会倒下。总是会来一个人，他会把一切砸掉，直至国王的紧身上衣被撕破，国王只能裸身站在大庭广众之中。”

老人们总是认为，世界将在他们之后毁灭，夏尔想道，他们因此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身体也渐渐衰败。这不会对事物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这一切他都不想听。他希望的是，她还会跟他说几句话，向他表示庆贺，感谢他从此以后可以照顾这个家了。可她谈论的居然是国王。她感觉不到孙子的心灵困境。她根本没有给一只病猫送上新鲜的牛奶。她拯救了桑松王国，或许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的子孙后代都要永远地感激她，向她的名字表示敬意。她继续喃喃地说了几句国王的话，然后睡着了。她刚才在和瞌睡斗争，因为她想等着孙子回来。现在，所有的人都回来了。现在，她可以安心睡觉去了。她确保了桑松家族的统治地位。现在她不用再醒来了。夏尔发誓要在她去世那天截短她

的床腿。

阳光让夏尔晃眼。他睡过头了。他起床时，昨日已被新的光明取代。他虽然完全享受着他人的掌声，却未曾改变自己的想法。一旦他的其中一个弟弟长大成人，他就想交出自己的刽子手职位，好做大夫去。他为自己的思路突然如此清晰感到惊讶，可在昨天夜里他还觉得一切难以解决。只有丹曼莉这事还没有解决方案。他怀着忧伤想起了这个娇小的暹罗姑娘，却又因为她观察到了他整个行刑过程而感到非常气愤。这之后，他想起了杜布奶奶。真奇怪，她竟然没有招呼他。他走到弟弟妹妹们玩耍的院子里，在木盆旁洗漱了一下。他的一个弟弟说奶奶今天没有做早饭。

“哦，”夏尔开玩笑道，“她忘记自己义务了。那她肯定病得不轻了。”

他回到屋子里，敲了敲卧室门。让-巴蒂斯特躺在床上，在看一部医学书籍。“她还在睡呢，”他轻轻地说，“让她睡吧。”

夏尔走到她的床边。她仍然像昨夜那样躺在那里。她的眼睛睁着。他摸了摸她的手，打了一个寒战。她的手已经冰凉。他毫不迟疑地触摸她颈动脉上的脉搏。那是他在莱顿大学学到的知识。她已经没有脉搏了。她死了。他真希望她早就去世。他感觉不到悲伤。他从没有喜欢过她，是她毁了他的梦想。一个人可以烧掉谷仓，可以把猫狗扔到河里淹死，但不应该毁掉他人的梦想，他想道，然后走到父亲那里去。

“她只是在睡觉而已。”让-巴蒂斯特说完把书放到边上。那本书名为《思乡病》，是一个名叫尼古莱的大夫五年前出版的。夏尔坐在床沿上，盯着他的脚看。“爸爸，”他说，“奶奶死了。”

对威力无穷的母亲去世，让-巴蒂斯特感到非常悲痛。好在那位女

帮厨已经学会了她的厨艺。唯有美食和阅读现在还能带给这个病人快乐。他又聘用了一名女仆，可杜布奶奶的幽灵消散开了。

第二天，夏尔收到了来自司法机构的祝贺。一名信使送来了一封信和一份特别奖金，以对他完成出色的工作表示肯定。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挣来钱。报纸也称赞这种处决充满庄严，策划得信心十足，并称赞那种高雅的克制。尤其是高萨对夏尔赞许有加。他写道，夏尔的名字将永远和路易十五国王和他的谋杀者联系在一起。

夏尔也为此着迷：一方面他对完成这项任务感到自豪，可另一方面，他感到抬不起头来。他高兴的是这辈子第一次挣来自己的钱，可他不想作为刽子手赢得名声。他在一夜之间一跃成为桑松家族的领头人，可他失去了丹曼莉。

这一念头深深地折磨着他，以至于一天晚上，和多米尼克坐在钢琴旁时，他禁不住讲起了丹曼莉。他的妹妹似乎觉得很有趣。

“请别取笑我。”他用责备的语气请求道。

“我伟大的哥哥恋爱了，这可是太奇妙了。”

“可她不知道这事，”他忧郁地说，“而现在，她知道我是刽子手，肯定不会再喜欢我了。”

多米尼克拥抱他。“夏尔，听着，许多人在无意识中就已经失败了。你就过去看她一次，当面问问她！或许她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你自己都说过了。”

他们开始弹另一首曲子。弹完琴，多米尼克问：“你还喜欢她吗？”

他摇摇头，然后低声道：“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她来自暹罗王国。”

多米尼克拉长了脸。“你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也娶个巴黎的女人做妻子吗？难道她必须是来自世界另外一个角落的人吗？他们可是有着完全不同的风俗习惯，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你们究竟如何沟通交流呢？”

“我们根本不用说话，”他说，显然很尴尬，又轻声补充道，“我们只要看着彼此就行。”

“夏尔，”多米尼克叹息道，“那你们真的根本无法相互认识。”

夏尔多次探访耶稣会修道院，可就是不敢在入口处露面。虽然他很想再见到热比云神甫，分享他的知识，可他私下里希望能遇上丹曼莉。他不得不承认，热比云神甫只是一个幌子。

一天早晨，他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敲响了修道院的门。一名中年神甫请他入内。夏尔觉得这座修道院要比他上次来时更雄伟了。那是一幢华丽的建筑，有着高耸的拱门、偌大的窗户以及宽大的白石楼梯。夏尔心想，这些神甫居住在这里，他们劝诫众人要勤俭，自己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那名年迈的神甫在二楼敲了敲那道双扇的木门然后打开。他请夏尔进去。展现在夏尔面前的是一间布置奢华的工作室，那也是一间巨大的藏书室。能光临此地，夏尔深感荣幸。这使他想起凡尔赛有一间皇家陈列室。热比云神甫坐在一张普通的栎木桌子后面。他正忙着写一封信，只是匆匆抬头望了一眼。他似乎对看到他并不感到奇怪。“我一直在恭候你呢，夏尔。你请坐。我马上就好。”

夏尔坐下了。在这座知识的寺庙里，他简直怎么看也看不够。到处都是书籍、报纸、文字、图片、绘画，靠窗口还有一只巨大的地球仪，它可以让每一个客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结束在凡尔赛或者诺曼底。

“是人家告诉您的，还是您有预感？”夏尔怀疑地问。

“不，不，”热比云笑道，“经验和常识。你在寻找。在巴黎这里你难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这里只有鹦鹉。你可曾见过鹦鹉？”

夏尔摇摇头，坐在椅子上不耐烦地动来动去。

“在我们这里，鹦鹉被古怪的贵族们视为家畜，但在暹罗王国却为视为有害动物。除了乌鸦之外，鹦鹉恐怕是最聪明的鸟了。这些畜生可以注意到人类的语言及其意义，然后跟着模仿。你要是问我，我想说，这就是一种行为障碍。不过话说回来，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

“您相不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个人制订了一个计划，我们必须去实现它？会不会有一种预先规定好的命运，以及压在人们身上的诅咒呢？”

热比云神甫真诚地笑笑，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夏尔，你大清早地跑到我这里来，难道是为了向我提出一个如此哲学性的问题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需要一罐子波尔多红葡萄酒。可现在天还太早。”

“难道这个问题那么难回答吗？”

“夏尔，运用你的常识吧。你真以为上帝为千千万万的人制订了个人计划吗？哪怕为我们两个人制订一个计划，他就必须写满整页纸。世上的树木太少，我们无法将所有的计划一一记录到纸上。世上本无计划，夏尔，但会有人的需求，它要比暹罗的森林里一只傻里傻气的鹦鹉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使命。你若是数学家，夏尔，你就会相信这种偶然性，但我们不是数学家，数学不提供任何安慰。因此我们寻找神圣的相互关系。假如一个可怜的男人丧妻三次，我们相信从他的命运中看出一种结构。我们称之为诅咒。但这没有价值可言，夏尔。没有上帝，没有计划，没有目标。”

“那么也就没有诅咒。我独自一人决定我的命运吗？”

“不完全是，总有强迫的实际情况发生，家庭的强迫，经济的强迫，政治的强迫。但人有选择。如果他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没有选择。”

夏尔沉默着。稍过片刻，他说：“我很想和来自暹罗的那位年轻姑娘聊聊。她叫丹曼莉。”

热比云神甫竖起眉毛。“哦，这个可以安排，不过眼下她正在小教堂里做祷告。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用她的佛陀拯救她。她将我们的耶稣视为佛陀的另外一种形象。我完全可以理解她。佛陀有着更好的故事，佛懂得宽容，佛教徒可以奉献爱，而丝毫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我们则相反，我们老是盯着吱嘎作响的床上面那耶稣十字架看，连勃起的功能都没有了。”

夏尔不相信地凝视他。

“如果我让你震惊，那我感到很遗憾，夏尔，但是到陌生的大洲去旅行可以帮助你认识到你迄今为止的世界观有着局限性。你要是看到过暹罗王国，你会用另外一双眼睛看待一切。”

“我何时可以和丹曼莉说话？”夏尔依然坚持道。他此刻对热比云神甫的唠叨不感兴趣。

“这个会有难度。她的法语知识还很有限，而且她将随下一批的考察团回暹罗去。但她还会回来。她喜欢巴黎，我也很喜欢这个姑娘。我真想把她留在我们修道院里。她做的饭菜味道好极了。我们保持联系吧，夏尔。将来有一天，你会再见到丹曼莉。”

“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见到她呢。”

“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热比云神甫说。

这件事对夏尔来说已经彻底了结了。事后他觉得很为难，或许对这个年轻姑娘而言他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他自以为是的想象罢了。愿望、希望、梦想，他为自己的幼稚可笑感到羞愧。为了忘却，从此以后他要把目光转向那些向他鼓掌的人。这段时间并没有轰动性的行刑安排，而且行刑的时间向来不会很长，因为夏尔总能够精确地核算出绳子的长度。鸡毛蒜皮的刑事罪犯——比如小偷，因为饥饿和绝望而行窃，在市场上偷几只鸡蛋、一只面包或者一只苹果——对这些人，那就要用灼热的铁块在他们的额头上或者胳膊上打上火印。每次执行完刑罚，巴黎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都要向他的观众鞠躬致意。他越来越赢得人们的钦佩。在他眼里，这些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人一生中可以抵御很多东西，但很少能挡得住赞美的诱惑。几乎谁也不会对赞美具有免疫力。而且夏尔固执地享受这样的钦佩。如果丹曼莉因为他的职业而拒绝他，那么他更想要做一个伟大的刽子手了。他不希望长久地隐藏自己，否认自己的职业。不错，他是刽子手，巴黎刽子手。而且薪酬相当丰厚。要是有人在清贫的经济环境下长大，一辈子生活得非常俭朴，那他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知道像安托万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有些人居然声称金钱不会让人幸福，他无法证实这一点。它肯定不会让人不幸，金钱意味着自由和独立。一旦有人找上门来请他看病，难道这不是一种引以为豪的伟大幸福吗？夏尔赢得了某种安宁。难道这就是纵情吗？他在王后街的裁缝店里定做了一套很有风度的浅色料子西装。从此以后他就可以像骄傲的孔雀那样在巴黎的公园里闲逛，享受着年轻妇女含情脉脉的目光和普通人钦羡的神情。有时，当独自一人坐在家里的药房，他为自己的转变感到羞愧。他感到很难理解自己的行为，更遑论去接受它。可他遭受痛苦折磨最深的却是，人们一直以来对他和他的家庭不理不睬。他想穿着精致的服装行使刽子手的职权，这是一种报复行为。他是巴黎先生，穿着和蔑视他的人一样的昂贵衣服。他不准备像父亲那样悄无声息地行使职权，使自己消隐在默默的人海中。巴黎城应该

认识他。他是她的刽子手，他为她杀人。而在家里等着他的是一部新鲜出炉的《百科全书》。在巴黎，有谁能买得起狄德罗的《百科全书》？

夏尔常常到皇宫花园散步，渐渐学会了女人们的神秘语言。一天，一名来自贵族家庭的女士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名贵妇人玩弄她的扇子，目光一直盯着他那边看。她已是徐娘半老。他完全懂得扇子发出的卖弄风情的语言，于是接受邀约坐到了她的桌旁。他们兴致勃勃地聊起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人们想以此表明自己的身份，他们不仅会看书，而且很有钱，还有着某种修养。大家在交流时，会悄悄地引出一些语言和提示语，从中可以更多地泄露自己的社会阶层，比如顺便提及到郊外打过猎，到戏院看过戏，或者和具有影响力的名流一起参加宴席等。夏尔很快就知道，这位女士是一位侯爵夫人。他只是回应说，他是司法机构的公职人员，然后她马上切入正题，问他是否愿意和一个女人共进晚餐。当他做出否定答复后，她显得很轻松，请他陪她回家。她说是咖啡馆的椅子引起了她的背疼。她又微笑着补充道，她必须躺下休息。他们乘坐马车，前往她的城市宫殿。她告诉仆人，她不想被打搅。之后他们穿过装潢奢华的会客厅，踏进了卧室。

“您懂得按摩吗？”

“是的，”夏尔回答，“我熟悉人体的肌肉组织。我应该给您按摩吗，夫人？”

“您想做吗？”她问道，她的脸因为疼痛而变了形。

“当然，”夏尔笑眯眯地说道，“我无法忍受漂亮女人受苦。”

侯爵夫人也不由得莞尔而笑。“您从哪儿开始呢，先生？”她呻吟了一声，躺在床上，“我脱下衣服更好吗？”

“好得多。”夏尔说，朝她弯下腰去。

她吻了他，只是非常短促，用她的舌头润湿了他的嘴唇。她用手抚摸自己的大腿，然后低语道：“您折磨到我了，先生。我原以为您要减轻我的痛苦。”说完她抓住夏尔的裤裆，以有力的声音说道，“您就脱下裤子吧，先生。这样下去可不行。”

夏尔脱下衣服，她在全程观察他。“我喜欢像您这样的男人。每一个雕塑家都喜欢有您这种模特。亲爱的上帝创造您的时候，不知道他究竟想到了些什么？”

“他想到了您，夫人。”夏尔开玩笑道。

“您以为他想要让我们女人变得疯狂吗？难道您就是伊甸园里的那只苹果吗？我让您难堪了吗？”她突然翻了个身，趴下躺着。夏尔开始按摩她的脖颈和肩胛骨。

“我喜欢后入式，先生，像我们一万年前的祖先那样。您就猛烈一点儿吧，就像是犯罪或与一个小荡妇那样。如果您还能扯开嗓子骂我，您将有可能成为我未来的情人。”

夏尔迈开大步走下弓形楼梯时，遇见了一名年轻男子。看到夏尔，他显然吓了一跳。无疑他认识这个年轻的刽子手。夏尔在楼梯口站住，抬头朝楼上张望。侯爵夫人穿着粉红色睡衣微笑着站在那里。

“我的姐姐，侯爵夫人，你是在和巴黎刽子手喝茶吗？”

侯爵夫人骤然恼火起来，以怀疑的眼光看着夏尔。他的沉默被她视为对他的身份的肯定。年轻男子旁若无人地从夏尔身边走过，兴高采烈地爬上最后几级台阶，直至来到姐姐跟前。

“你骗了我！”侯爵夫人禁不住发出压抑的尖叫声，她的声音很刺耳：“早知道你是刽子手就好了，我的天哪！”

“您因此遭受损失了吗，夫人？”夏尔彬彬有礼地问道，即便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自负的口吻，然后继续他的步伐。

“我的律师会通知你，可以肯定，巴黎先生。”她高傲地甩给他这句话，从栏杆那里消失了。

回到家里，夏尔感到自己好可怜，心里空荡荡的。他觉得好像自己仅仅是出于固执才做这事，是为了报复那些蔑视他的贵族人士。和侯爵夫人的风流韵事让他事后很失望，他本来期望更多的满足、快乐和愉悦。

夏尔习惯躲到药房里，阅读从巴黎印刷厂买来的书籍。有机会买到知识，这是一种庄严的感觉。他一再埋头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之中。他沉浸在植物和药物的世界，忘记了之前遭受的折磨。可他的梦想让他想起自己在大白天还在用一些事情愚弄自己。夜里，他还一直梦见丹曼莉，甚至到了第二天还能想起他俩说了些什么话。这可真稀奇，因为他完全清楚地知道，他梦里的那些话源于他的幻想。

时间悄然流走，夏尔渐渐忘记了和侯爵夫人的那件事，越来越熟练地行使他在绞刑架上的工作。看到夏尔已经胜任了自己的崭新角色，让-巴蒂斯特决定带上使女和几个年幼的孩子搬到布里-孔特-罗贝尔去住，他在那边的乡下置有一座小庄园。他觉得死亡日益临近。他有着可怕的幻想症，日复一日地迷失在杂乱无序的想象中。他说，一旦命运加害于某个人，那么仅仅让他瘫痪是不够的，还得让他尽可能活得长久，好让他学会怨天尤人，学会悲痛欲绝。

多米尼克也从家里搬走了。她嫁了人，住在博讷的铁制品贸易商丈夫家里。夏尔独自和刽子手助手巴雷、菲尔曼、德马雷和格罗留在家里。这四个人负责关心马匹、工具以及修理等一应事项。格罗也负责做饭，他做的饭菜虽然不好吃，可他是唯一适合此岗位的人选，因为他之

前在一家面包房干过活。他是一个和气的人，个子矮小，脸胖嘟嘟的，是一个好心肠的家伙，他在家里总能为大家找到鼓舞人心的话。

巴雷和菲尔曼是年轻的屠夫，曾经在一家屠宰场干过。两个人总是一起度过他们全部的闲暇日子。巴雷同样个子矮小，但身体往横的方向长，上臂像水手那样有力。他常常看起来愤世嫉俗，给人一种好像对某些事情很恼火的印象。在酒馆里，他简直是在暗中观察是否有人拒绝对他表示尊重。一旦得到证实，他就突然关上门，对他一通拳打脚踢。相反，菲尔曼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一张脸瘦削得出奇，额头向后倾斜，人长得有点傻乎乎的。巴雷和菲尔曼经常发生口角，但两人始终形影不离。他们有时让人想起金婚夫妇。

最后一位是德马雷，他是波尔多刽子手的孙子，是这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擅长计算和写作，夏尔便将家里所有收入和支出的财务记账事务托付给了他。德马雷也开具有人买下被绞死者或被斩首者的衣服清单，和司法机构一起处理来往信函。

夏尔曾经有幸聘用过很多助手，但在这些日子里却很难找得到值得信赖的正派人。可或许除了德马雷之外，他和他们也不可能进行高品位的对话，在夏尔看来，他们常常太粗暴了。因此他又开始将他的所思所想交给日记。他写了很多，不作任何修改。他不会第二次去看写过的记录。他发自肺腑地写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写作变成了夏尔净化灵魂的神圣东西。等到写完日记，他会格外小心翼翼地将日记本夹到那两本厚厚的医学入门书籍中间，然后，总是在上床之前，喝上一杯葡萄酒。之后他虽然可以很快入睡，但他睡得既不长久，也不能恢复自己的体能。

每天上午，他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到病人身上，病人们冀望经他疗治后减轻自己的病痛。令他吃惊的是，他的医术水平要比他父亲高的说法传开了。就连科班出身的大夫们有时也会将一些毫无指望的病人送到他那里去。不久他就被视为治疗关节痛和肩膀僵硬的权威。下午他会在研

读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在他种植药草的院子里度过，或者骑马到附近的森林里待上一段时间。自从杜布奶奶去世和让-巴蒂斯特搬出去之后，家里变得寂寥起来。他突然想念起叽叽喳喳闹腾个没完的弟弟妹妹们来了。那些熟悉的声音早已久违。

有一个星期五，夏尔要绞死一名来自凡尔赛的宫廷侍从。夏尔割下死刑犯的头发时，犯人承认曾经和国王的一名情妇有染。“如果我不能使用它的话，为何上帝又要给我配备如此好的玩意呢？”他问夏尔。

“我请你安安静静地坐着别动，否则我还要给你吃刀子。”

宫廷侍从哈哈大笑。“就用这把小剪刀吗？”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这书是我写的，巴黎先生，受国王的委托。”那本小册子被保管得很细心，用红色封皮装订好。这是整个巴黎的妓院指南。“恐怕我现在用不到它了，”犯人用怀着忧伤的语调说，“可是您，谁知道呢，或许您会感兴趣。我听说刽子手在每次残忍的行刑后都要去逛妓院，以摆脱自己的紧张情绪。不过要小心了，您如果太过频繁地去那里，那些刺激感就会逐渐消失！到最后非得动用整个歌剧院里的裸体女人，那小家伙才能活跃起来。而如果将来有一天需要律师，您也可以在那个地方找到。有头衔有声望的人都会在那里聚会。遗憾的是，谁也不愿意为我辩护。”

夏尔将指南塞进紧身上衣里，点点头表示感谢。

“这样我的人生还不至于毫无意义。”宫廷侍从苦笑道。

“你以为人生有时还有意义？请站起来，我要把你的双手捆住。”

两小时后，夏尔在绞刑架上把绳索套在宫廷侍从的脖子上时，后者还轻声道：“我的装备就像一头种马。”他刚说完，脚下的陷落活门打开了。

晚上回到家，夏尔将那册赠书和父亲收集的珍品搁到一起。他很少有兴趣翻阅那里面的东西。

隔了些时日，夏尔收到了法庭的传讯。侯爵夫人果真起诉他了。她要求法庭判处夏尔-亨利·桑松在脖子上套上一根绞刑架的绳子，以示向她道歉，另外她还要求，为了更好地保护公共社会，他今后必须通过衣服和胸章的标志表明自己的刽子手身份。

现在，夏尔真的需要一位律师，他想起了凡尔赛的宫廷侍从送给他的那本妓院指南。他也在里面作过标记，巴黎最好的律师经常在哪些妓院露面。可夏尔心里一直反对这个想法，因此从来没有拿出这本小册子看过。他想找一个可靠的律师，而不是在那种地方厮混的律师。晚上吃饭时，他在情急之下说起了这件事。德马雷说，有一名律师经常出没在金色酒桶小酒店里。他每天早上坐在最后面的桌子旁喝咖啡。夏尔可以直接到那里去找他，提出自己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夏尔走进那家小酒店。

“你请坐，年轻人，我能帮你什么忙？”坐在最后面桌子旁的那名男子，是一个中年人。想必他已经好久没有洗过澡了吧。他在吧唧吧唧地喝着黑咖啡，眼睛却始终没离开过夏尔。他面颊凹陷很深，皮肤布满皱褶而苍白。从他嘴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很恶心，让人猜想他的整个肠胃功能出现了紊乱。

“我要找一位律师。”夏尔开口道，然后坐在那张破旧的长凳上。

“好好，我可以接受。不过你听好了，我每半小时收费四十苏。喝咖啡的钱要算在你的头上。你付得起吗？你有工作吗？”

夏尔点点头。

“什么样的工作？”

“我是巴黎刽子手。”夏尔直截了当地回答。

“别再说下去了，”律师说，“我们的谈话到这里是免费的。你现在站起来，给我立马走人。如果我要为巴黎刽子手辩护的事到处传开了，我的客户就要全部跑光了。”

“那您可以给我推荐一个人吗？”

“即便是推荐，也可以毁掉我。如果我把他们推荐给刽子手，我的同事会怎么看我，你究竟想过没有？滚吧，刽子手！”

夏尔站起来，走到门口。

“你到古尔丹太太府邸试试吧。”律师在他身后喊道。

古尔丹太太府邸坐落在双门街。有钱的企业主和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此相聚，律师、新闻记者、贵族、艺术家以及神职人员是这里的常客，而且在这里没有任何一点征兆可以表明民众被划分为保皇派和共和派。所有的人都喜欢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同一种东西。古尔丹太太的妓院有好几栋楼。世上没有一家妓院比这家更庞大、更奢华。夏尔去了妓院的主楼，门厅里展示着精雕细刻的性玩具，可谓琳琅满目。古尔丹太太经销所谓的色情用品，是全世界最大的供货商。欧洲各大修道院的修女和女院长是最忠实的客户。宗教首饰是这种成人用品的暗号。

玛丽-吕斯，一个穿着单薄的小姐，带着夏尔来到一间小会客室，房间的墙上挂着色情图案的织花壁毯。地毯很厚，可以压低任何一种声响。那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妓院老鸨就端坐在这里。“先生，”她说，“我很高兴您能光临舍间。我们会竭尽全力满足您的需求。玛丽-吕斯马上会给您介绍小姐，以及我们的价格。我们也提供一些特别的东

西，比如魔鬼似的小房间。”她嫣然一笑，“本店有一些规矩：尤其是机密也包括在内。您会在沙龙里遇到一些名流，您必须保持沉默，正如其他客人也同样必须保持沉默一样。您不能伤害到我们的小姐。肛交和鞭子只能在征得她们的同意，并且在您支付附加费后才被允许。”

玛丽-吕斯领着夏尔踏进一间圆形大厅，大厅被高耸的玻璃拱顶遮盖，可以透过拱顶看到星空。大厅里以圆形的排列方式摆放着小桌子和舒适的红沙发。桌子之间保留着恰当的空间，以便大家可以互不打扰地进行私密性交谈。客人们到了这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有一些人穿着丝绸睡衣，还有一些人穿着不加大衣的家居服，看样子只是出来抽根烟、聊个天或者看一看半裸的小姐。年轻的女人们沿着一张铺上了黑色桌布的吧台引诱性地站着，用明确无误的目光寻找和客人的交流。夏尔指了指一位女人，她穿着蓝色内衣，披着同样颜色的透明披肩。

“祝您在这里过得愉快，先生。”玛丽-吕斯说，把他交给了那名蓝衣女子。蓝衣女子领他走过吧台后面，那里沿墙有许多厚实的红色门帘遮住了雅座入口。蓝衣女子选了最后那个房间。墙上和天花板上均配上了漂亮的镜子。夏尔在一面镜子前站住，看起来仿佛他成了油画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镜子都配置了带有花纹装饰的金黄色镜框。此外，房间里陈设不多：一只盥洗盆、一条毛巾、一张床，一切都是金黄色的。一盏油灯将光线映射到镜子墙上。

“我要找一位律师。”夏尔说。

“玛丽-让娜，你就叫我让娜吧。”

“这是你的真名吗？”

玛丽-让娜朗声笑起来，笑声很迷人。“玛丽-让娜·贝库，不过在这里我是玛丽-让娜。”

她年方十八，有着高耸的乳房，长着一张胖乎乎的热情的脸蛋。相对于圆润的面孔而言，她的嘴巴略小，嘴唇又太窄，可她却是古尔丹太太最喜欢的高级妓女之一。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先生？您很有钱吗？”玛丽-让娜哈哈大笑地问，“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这里遇见我的白马王子。如果他娶了我，他就可以省下本来要在我们妓院花的一大笔钱了。再说我还烧得一手好菜。”她脱下蓝色披风从她的肩飘落到地上。

“我在找一位律师，小姐。没有别的。”

“您不是害怕吧？”

“不，”夏尔不耐烦地说，“可我需要一个律师，让他到法庭上为我辩护。”

“拱顶大厅那里坐着几个律师。我带您过去。”玛丽-让娜重新将披风披在肩上，重新陪着夏尔回到大厅。“那我们俩今天晚上就没事了吗？”她失望地问。

夏尔和气地摇摇头。“没事了，小姐，我很抱歉。”

“不过您别忘记我的名字呀。玛丽-让娜！”

“夏尔！”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叫道。一名男子从大厅后面的一张沙发上站起来。夏尔没认出他来。那名男子走到他跟前，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酒。“原来是你，我的孩子。”

“安托万吗？”夏尔怀疑地问道。他依然矮小瘦弱。他的连鬓胡子很长，使他的脸显得更窄小，他那引人注目的鹰钩鼻更显特色。“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夏尔轻轻地说。

“你怎么会到我们这里来的？难道是到了我要给你提供一碗热汤的时候了吗？”安托万哈哈大笑，随后从上到下地打量了夏尔一番。“你又长高了。那么除此之外呢？你做大夫了吗？”

“没有，”夏尔说，“那你呢？”

“正如你给我预言的那样，我成了律师。”然后他充满蔑视地补充道，“我不喜欢血淋淋的双手，巴黎先生。”

“我在找一名律师，让他到法庭上为我辩护。”

“是什么事？”安托万问，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他把夏尔带到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夏尔谈起了和这位侯爵夫人的故事。“你们究竟干了没有？”安托万坏笑地问。

“这个不重要。”夏尔严肃地回答。

“我认识这个侯爵夫人，每一个人都认识她，那么说你们肯定干过好事了。”安托万噗嗤一笑，“侯爵夫人和刽子手在床上，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你能为我在法庭上辩护吗？”

“那当然。下周五开庭。”

夏尔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如果你生在一个高贵的家庭，那么对你来说巴黎没有任何秘密。这不用在鲁昂学，只需要一个家谱，夏尔，古老的贵族血统。”

夏尔点点头。至少他找到了一个律师，尽管他比先前更加不喜欢安托万。

“这已经很悲剧了，”安托万假惺惺地说，“一名风流倜傥的小伙子想成为大夫，他有才华，有雄心壮志，却终老在绞刑架上。”

“你结婚了吗？”夏尔问，想以此转移话题。

“还没有，不过快了。我想娶我的表妹为妻。她很有钱。财富吸引财富。而且她拥有巴黎最美的脚。我特别喜欢脚，夏尔，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激动。那你呢？结婚了吗？”

“我没有结婚。”

“恐怕对刽子手来说结婚也比较困难。但或许你会在这里找到一个。对这些女人而言，刽子手也还是一个过得去的对象，你说是吗？”

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准时出现在法庭大厅。夏尔立即走上前去。“情况怎么样？”他悄声说。

安托万整个脸上洋溢着春风。“你会输掉官司，夏尔。”正在这时，侯爵夫人和她的随行人员进入法庭大厅。“因为我代表侯爵夫人，”安托万补充道，“你承认自己有罪，那只是稍稍受点损失而已。如果你要违抗，我就把你像一只虱子那样捏死。我可以因此拿到报酬，夏尔，并不是代表我个人。我和侯爵夫人还有一些事要处理。像这种喜欢惹是生非的蠢婆娘不是每天都能遇上的。”

夏尔难以理解这一切。他惊愕地盯着安托万看。

“这世界很糟糕，夏尔。那天我们见面后，我马上拜访了侯爵夫人，愿意为她提供服务。我是说，”他低语道，“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他走到侯爵夫人那里，向她彬彬有礼地鞠躬以示问候。他们一起坐在最前排。

夏尔还一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曾完全信赖安托万。他坐下来，烦躁地等待开庭。

爬上去两个台阶，有一张长桌，长桌摆在一张木制平台上。平台后面坐着几名法官和一名书记员，他们显得很无聊。片刻之后，庭长用锤子敲击桌面，示意站在入口旁的两名士兵关上门，确保没人再进入法庭。长凳上坐着控辩双方和观众，就像被安置在教堂中殿。左首，在最前面一排，坐着原告方，骄傲的侯爵夫人、她的弟弟以及安托万。右首坐着夏尔，独自一人。坐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数十名爱看热闹的观众，他们要么是认识侯爵夫人，要么是想近距离瞧一瞧刽子手本人。对于案情事实，侯爵夫人只是说，他们一起喝过茶。观众们轻声地呵呵一笑。

夏尔并没有否认这一事实，却只字不提这起风流艳遇的真相，完全一副绅士的做派。他重新镇定下来。他坚持陈述有关他的职位的原则性问题，然后走到法官跟前。夏尔果真是一表人才，身材魁梧，骄傲而自信，不畏恐惧，泰然自若，沉着冷静。“为什么我要杀人？”他以洪亮的嗓音问道，“是出于个人的动机吗？是为了消遣吗？不，法官大人，你们按照我们的法律作出判决，而我只是在执行这一判决。那么，法官大人，假如我不执行你们的刑罚，那将会怎样呢？因为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法律必将成为社会的笑柄。请允许我对这件事说句话，而且对于此事，我是出于敬畏对你们负有义务，也就是说，你们判处的那些犯罪分子，他们并不是害怕你们的判决书，也不是害怕你们以书面形式把判决记录下来的墨水，他们害怕的是我的手，刽子手的手。那么，是谁，我的先生们，给了我行使这一职位的权力？是国王，是陛下大人。在他的王国内赎罪并且保护无辜者，这是任何一个国王的历史使命。我受国王委托执行你们的判决。我因此也是王国的一名公职人员。不错，我杀人，但和士兵不同的是，我不杀穿着陌生制服的士兵，我杀的是你们定罪并且根据我们的法律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士兵保卫外部的和平，而我是保卫内部的和平。为了保卫外来的和平，我们的国王需要动用数十万

的士兵，而他只需要动用唯一的一个人，就可以保卫内部的和平：刽子手。士兵杀人受到嘉奖，可我杀人却遭受唾弃。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侯爵夫人荒唐透顶的诋毁而辩护。我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让人们向我证实：我是司法官，而且位居军官之列。”

法官们开始窃窃私语，他们万分诧异地交换彼此含义丰富的目光。观众席上已经骚动起来。安托万显得很恼火。无论如何，他不再发出嘲弄的讪笑。

“我要在此申请，基于我父亲——桑松·德·隆瓦勒骑士的贵族出身，我可以从今以后在我的名字里拥有德·隆瓦勒的贵族称号，而且我的后代也可以拥有这个称号。”

法庭感到惊愕万分。他们本以为来到法庭上的是一个怯懦的刽子手，他会为自己的生死问题辩护，可是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自信十足的小伙子，他并不是过来祈求，而是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假如命运迫使他成为刽子手，那么他想要成为世人还没见识过的与众不同的刽子手。最后，他对着法官喊道：“如果你们判定我有罪，那么你们就是判定你们自己的行为有罪。”

“夏尔-亨利·桑松先生，”庭长说，“法庭大厅只能使用一个小时。您的陈述结束了吗？”他看起来神情紧张。

夏尔恭敬地点点头。

“您的陈述，”法官继续说，“并不是诉状的对象，因此没有重要意义。”

“如果我有反驳您的地方，那我请求原谅，但假如我是皇家卫队的长官，那么侯爵夫人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正因为如此，我的陈述完全是有意义的。”

法官毫无表情地回答道："法庭休庭进行合议。半小时后宣布判决。判决的法律依据将以书面形式下达。"法官们纷纷站起来，离开了法庭。

法庭驳回对夏尔的所有指控，宣告他无罪。侯爵夫人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在法庭里大发雷霆，呵斥安托万不能对这件事置之不理。夏尔离开法庭，走到外面的入口大厅，多米尼克突然站在他面前，热烈地拥抱他。她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因为高兴而欢呼。她的眼里充满自豪。

"你在巴黎吗？"夏尔吃惊地问。

"当然，夏尔，我陪我丈夫，他正好在这里有公务。夏尔，法庭里的所有人都对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她轻声道，"他们充满钦佩地谈论你，说你用词多么聪明而优雅，你出现在法庭上时多么自信而沉着，而且阐明你的立场时有多么客观，却又不带任何的羞怯。你使所有的人都信服了，夏尔。"

夏尔将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时，侯爵夫人和他的律师一起走出大厅。她想找话说，可安托万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到出口方向去了，动作尽管很轻柔，却很坚定。他们从夏尔身旁坐过去时，安托万悄悄说："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此刻，一名矮个子男子离开了法庭。此人穿着淡褐色燕尾服、价值连城的凸纹马甲以及深黄色鹿皮裤。夏尔一下认出了这身怪异的打扮。他叫高萨，报社记者。

"太棒了！"高萨赞许道，从口袋里掏出烟斗，往一根柱子上敲了敲。

"可您的要求提早了一百年。时代没有成熟，我们宁可废除死刑，

也不愿意接受您这要求。她是您太太吗？”

“不，”夏尔回答，“是我妹妹多米尼克。”

多米尼克马上鞠了个躬，客气地行了屈膝礼。

“您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已经喜欢上您了。”高萨说完，稍稍点点头告辞了。

几天后，夏尔到他的裁缝那里定制了一套新的西服，这次挑选的是浅蓝色。他第一次穿上衣服走上街头，心满意足地在皇宫花园溜达，恰恰碰上了侯爵夫人，她刚好在和一名年轻男子调情。她站住了，嚷道：“先生，蓝色是贵族色，演员、犹太人、刽子手以及不入流的流氓无赖是无权穿上这种颜色的衣服的。”

“谢谢，”夏尔含笑道，“我应该聘请你做女仆，这样你就可以每天早上帮我挑选衣服了。”

“您的刀剑功夫和您的伶牙俐齿一样干脆利落吗？”

“我原以为你会对我在法庭上保守秘密向我表示感谢，侯爵夫人。我们毕竟当时在你家里不只是喝过茶呀。”

她气得涨红了脸，挽起男伴的胳膊，对他使劲一推，让他明白得继续往前走。“我要跟他决斗吗？”年轻人用发颤的声音问道。

“在床上您更有用，先生！”她小声道，但说话的声音故意让夏尔听得到。

夏尔又有时间思考自己的未来了。他决定最后再去一次耶稣会修道院。他必须做这件事，那是内心的驱使。热比云神甫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地接待他，马上领他到药房去。药房里有几个暹罗女子忙着在研钵中

捣碎干药草。夏尔立即发现了丹曼莉，简直喜形于色。热比云看到此情此景，笑嘻嘻地说道，他马上回来。夏尔鼓起勇气，走到丹曼莉跟前。她微笑着，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低下头以示欢迎。然后，他们就这么面对面站着，注视着对方。尽管互相不说一句话，但夏尔感觉好像彼此在滔滔不绝地交谈。

过了一会儿，她说从暹罗回来以后自己能说流利法语了。他愉快地回答道，很乐意在语言方面给她提供帮助，如果有个说话的伙伴，她学起来会更容易。她不停地点头，显然他的话她都能听懂了。然后，她越过他的肩膀望过去，她的微笑瞬间凝固了。热比云神甫已经回来了。他向夏尔展示从暹罗带来的新的调味品，可夏尔的眼睛一直没从丹曼莉那里离开过。

“热比云神甫，如果我每周一次和丹曼莉一起练习法语，这个主意不错吧，您觉得可以吗？”

热比云迟疑不决起来。“让我再想想吧。”他最后说道。

数日后，夏尔收到了法院的一封信。他原以为是一份判决执行书，不料却是法院重新受理的一份新的传讯，是由侯爵夫人提出的起诉。安托万说得对。这个百无聊赖的女士，她每天在游乐场所消磨时光，真想把官司永远打下去。她有的是闲暇时间和花不完的金钱。

这一次，夏尔及时请裁缝做了另一套绿色料子的西装，穿着这身打扮出现在法庭前。安托万马上向他走来。“只是出于朋友交情，”他诙谐地说，“你倒是说一下，夏尔，侯爵夫人说你穿蓝色衣服。她难道分辨不出颜色吗？”

“有些人红绿不分，他们是色盲。但蓝绿不分，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这个你当然知道了，”安托万表情严肃地说，“因为你比我更聪明。”说完他以一副施主的模样敲了敲夏尔的肩膀。“我不生你的气，夏尔，我因为你有了这一个新的当事人。她有钱却不怀好意，她每天需要法律咨询。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男律师和女当事人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侯爵夫人埋头于一件事情，然后开始给她的女友们出主意，她因此总是需要我。这一点我要归功于你，夏尔。哦，顺便说一句，让我今天赢吧，否则今天审理完案子我不能上她的床了。”他仰天大笑。与其说是自发的笑声，不如说是一种尴尬勉强和卑鄙无耻的笑声。

侯爵夫人走进法庭，马上走到安托万身边，没正眼瞧一下夏尔。

还没开庭，庭长就已经打起了哈欠。他用单调的声音宣读侯爵夫人的控诉，接着请夏尔做出简短的陈述。夏尔向法庭解释说，他出身贵族，父亲是桑松·德·隆瓦勒骑士，死刑执行官的职位大概不至于使他失去贵族头衔。也就是说，他是可以穿蓝色衣服的。此外，他还解释说，他之所以不受判决影响不想再穿蓝色衣服，是因为这种颜色和他的脸色不般配。他这么一说，听众中马上爆发出骚动似的哄堂大笑。许多贵族都在场，其中包括雷托里尔侯爵，他似乎特别开心。夏尔微笑着转向听众，可当他发现第三排的座位上坐着热比云神甫时，他顿时神色慌张起来。现在毫无疑问，这位耶稣会神甫知道夏尔是巴黎先生。而假如他知道了这一点，那么整个修道院就会知道他的事。如果是那样，热比云神甫这辈子就绝不会向夏尔透露药物学的秘密，他这辈子也就绝不允许巴黎刽子手给丹曼莉上法语课。法庭以案件无效宣布诉讼被驳回。对夏尔来说，这是一次以付出昂贵的代价赢来的胜利。

热比云神甫在出口处等夏尔。“我原以为你会讨厌你父亲的职业，会想做个大夫。”他说道，显然感到很失望。

“我一直想做大夫，”夏尔倔强地回答，“可我不得不做这个工作。

我是被迫的，我并不想做。”

神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最后，他搭住他的两肩。“你处在远离社会的地方，夏尔，这种生活不会容易。”

“我不会再打搅您了。”夏尔说。

热比云神甫和解地微笑道：“我也处在远离社会的地方。我又如何能对你横加指责呢？”

“耶稣会神甫可不是处在远离社会的地方。”

“有时候却是一样。”

“我还可以看望您吗？”

“你是说是否可以看望丹曼莉吧？”

夏尔窘迫地用手指抚摸头发，仿佛撒谎恰好被逮了个正着一样。

“或许这一段时间你不过来会更好些，”神甫说，“你现在已经闻名遐迩。我们马上就要回暹罗去了，恐怕没有必要发生第二次争执了，夏尔，你最近确实更喜欢穿绿色衣服。一个人要知道适可而止。”

没过多久，雷托里尔侯爵穿着同样绿色的服装出现在公共场合，人们很快就将这种时装式样称为“桑松时装”，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巴黎男子都定做了这种绿色服装，好像他们想表明：我们都和夏尔-亨利·桑松一样，我们和他一起行刑，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都是夏尔-亨利·桑松。可实际上，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它只不过是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怪癖，他们百无聊赖而又容易满足，或许有些贵族后代是想让他们的亲人愤怒，可谁也不是真的想做桑松这样的人。

夏尔想验证热比云神甫的说法，站在路易大帝中学的马路边耐心地等待着。当塔楼大钟敲了五下时，学生们从大楼里鱼贯而出。暹罗姑娘们是逃不出人们的视线的。她们要比其他女同学矮小得多，而且她们总是同进同出。丹曼莉走在这个小组的最前面，一看到夏尔，她马上走到他跟前。可突然之间，她又对自己如此公开地显露情感而感到尴尬，于是不得不放慢脚步。她的女伙伴们静静地等着。

“我想再见到你！”夏尔说。

丹曼莉笑容满面。

“自从当年第一次遇见你……”夏尔在搜肠刮肚地寻找词句，“我很想经常见到你，每一天。”

丹曼莉点点头，怯怯地摸了摸他的手臂。“我要回到国王那里去。回暹罗去。”

“你说我们的语言已经非常好了。”

“语言就像音乐。只要认识声音，你就可以说话。”

“你可以待在我家里，住在我家里。”

“或许在另外一种生活里。”

夏尔苦苦思量自己该如何表达。在那里等着的暹罗姑娘都在咯咯地笑。

丹曼莉摇摇头。“我属于热比云神甫。我答应过妈妈。神甫在帮助我的暹罗家人，我很感激。只要热比云神甫需要，我就要到他那里去。没有我，我的家人就会挨饿，我的家人需要我。佛看得到一切。佛知道一切。”

“佛是一个善神吗？”夏尔问。

丹曼莉将手臂交叉在胸前，敬畏地低下头，“佛长着很多脸。”

“他有时会诅咒人吗？”

“佛会惩罚你，如果你做了坏事的话。”

“他会诅咒你吗？他会诅咒一个人一辈子吗？”

“佛可以惩罚一个人一辈子。”丹曼莉准备回到她的女同学那里去。

“等下，”夏尔嚷道，“我们何时再见呢？”

“在另外一种生活里。我要去暹罗。”

“那我们永远无法再见面了吗？”

丹曼莉使劲摇头，似乎很绝望。她沿着耶稣会修道院方向跑去。她的女同学迎上前去，开始安慰她。她没有再回头。

夏尔不需要任何人安慰他。他已经多次不得不体会到，生活很艰难，命运毫无怜悯之心。生活和磨难比邻而居，他不知道在哪儿看到过这句话。可此时此刻，他想起它来了。很有可能有人在巴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这不是普通人的生活。凡人的生活充满缺衣少食、失败的梦想以及流血的心灵。

夏尔花了好几个月，才将这件事慢慢放下来。他越想勉强接受无法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事实，他就越想念她。他感到痛苦。可不知什么时候，在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之后，难以和她在一起生活的认识占了上风。他以他们之间的文化差距太大安慰自己。与此同时，他知道他爱她，他还从没有如此爱过其他人。在母亲早逝后，她是他愿意无条件地

为她献出自己一切的第一个人。为了丹曼莉，他甘愿奉献自己的生命。

第7章

夏尔总是独自一人骑着马到蒙马特高地附近的森林里去。谁也不愿意和刽子手一起打猎。森林后面，肉眼所及，有一大片菜园，而在南边，如果往巴黎方向走，就可以看到蒙马特圣皮埃尔修道院租用的简陋房子。园丁朱杰尔家的房子就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他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客栈，夏尔有时会在那里休息。朱杰尔有两个女儿，玛丽-安娜和玛丽-吕斯，约莫三十岁。父亲天天坐在屋子前的一只摇椅里，或是睡觉，或是观察在他们家菜园里做工的园丁们。他的右首摆着一瓶土豆白酒，他准会在夜晚来临之前把它喝完。有时他会突然一跃而起，大步流星地走到某一个打工仔那里，给他示范该如何干活："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要好好努力，用心干你的活，这样时间才过得更快。"那些打工仔每次只是点点头，他们了解这个人的暴躁脾气。有时，如果酒喝得太多，他会直挺挺地摔倒在地，打工仔们设法把他抬出菜园。每次他都会非常生气，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不需要任何帮助。他的妻子个子矮小，喋喋不休地希望徒步旅行者到这里歇歇脚，简直让他们感到心烦，而绝大多数人只是满足于给他们的狗要点儿水喝。一旦这对老夫妻单独在一起时，他们不管为了什么事总能吵个不休。男人实在不是好斗的人，可女人却像只毒蜘蛛那样在他的摇椅周围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企图唆使他反对某事或者某人。"让我太平一会儿吧！"他之后习惯这么说，然后到菜园里去了。"总有一天我会给你太平！"她在他身后嚷道，再一次将桌子收拾干净。在此期间，她会不经意地左右张望，往一只挡她道的狗的肋骨上使劲踩上一脚。狗吓了一大跳，汪汪叫着走开了。她讨厌狗，"它们只会拉屎撒尿。"她说。可要是没有了狗，她就无法醉心于她的宗教：打扫，再一次打扫。

那天看到夏尔时，她手里正拿着一壶水和一只杯子，然后将这两样物品摆在最外面的桌子上。这是夏尔特意挑选的桌子。他坐下来，陷入沉思地打量着一帮打猎者的到来。他甚至在这里也被排除在外，这一点深深地伤害了他。他愿意放弃戏剧和歌剧，尽管他觉得要做到这点不容易，可是马呀，狗呀，骑马到大自然中去呀，他不想放弃。可在这里，

偏偏在这里，他依然是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尽管女人们喜欢夏尔，可他几乎没有机会找到一个女人。因为只要他提及自己的职业，她们立马转身走人。他的职业令她们反感。虽然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女人丹曼莉，可她已向他说得明明白白，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那层关系。他还一直想着她。即便他坐在这儿外面，从他的桌旁观察园丁之家的大门时。姐妹俩大多一起走出屋子。玛丽-吕斯很热情，脾气也好。她蓬乱的火红色长发和她坚强有力的步伐尤其引人注目。她和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工头结了婚，他的后背被沉重的田间劳作留下了痕迹。因为在野外劳动，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他也是一个整天笑呵呵的人，乐于助人，喜欢唱歌，喜欢和打工仔闲聊。玛丽-安娜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她沉静，也和她的父亲一样具有天生的威严。和她亲近很难，因为她几乎不开口说话。谁也无法猜出她的心思。她虽然很苗条，但身材高大，目光异常敏锐。人们总是有一种印象，她想要说什么，可是无法说出来。她很愤怒吗？她会马上失去自制吗？她看起来大多时候很紧张。她提着一壶水过来时，脸上温情脉脉，充满妩媚，可当她一转身，以为没人看得到时，目光却立刻暗淡下来。她的眼睛重新变得咄咄逼人，满含威胁，似乎准备施暴，似乎她可以讨厌你，可以永远对你耿耿于怀。她好像因为有人把她生下来而感到伤心和愤怒。就是这么回事。因为有人把她生下来而感到伤心和愤怒，夏尔想。可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在吸引着他，那是一种神秘的魔力。他在她身上感觉到的不是那种通常在女人身上感觉到的性的吸引，她并没有在他身上唤起猎艳的激情。夏尔并没有渴望看到她裸露的身体，并且亲吻她。不，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那是一种莫名的魔力，这种魔力在困扰夏尔。有时他觉得好像他在她那里寻找慰藉，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丹曼莉。可她真的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她似乎只对生意感兴趣。于是，夏尔在她那里买了水果和蔬菜，尽管他的助手格罗一看到食物几乎没有了任何招架能力。

“您想要把这全部东西都吃掉吗？”她微笑着问。她似乎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不错，如果事关生意，她甚至能够微笑。

“这是这一带最好的水果。”

她抬起下巴，有点大大咧咧，自高自大，然后低声说：“我不相信您的话。”

“我很少看到你爸爸醒着。”夏尔突然说。他想转移话题。

“他睡得多，”她说，“要吃饭了我就叫醒他，等吃完饭他大多又睡去了。老人就是这样，他已经八十多岁，这是两种人生。总有一天他不会再醒来，永远地睡去。”

狗们狂吠不停。它们都是些耳朵很长的白色猎狗。那六个猎人正向园丁之家骑来，狗们急匆匆地跑在他们前面。玛丽-安娜暂且不理会夏尔，等着狗们过来。它们兴高采烈地在她身旁蹦跳着。她跪下来，以便更好地和狗们亲热一番。一只狗开始舔她的耳朵，让她觉得好玩极了。她似乎认识这些狗，也很喜欢它们。夏尔还从未碰见过这样的人。一个人怎么只是对着狗们充满朝气，却对人类那么冷若冰霜？或许问题出在他身上吧。或许她知道他是刽子手。是啊，估计就是这个原因。

夏尔骑上马，慢慢出发了。他从那些打猎者身边走过。男人们默默地打量他，谁也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仿佛想要用他们的目光驱逐他似的。夏尔明白自己以后不用再在这里出现了。他们肯定向玛丽-安娜透露了他的职业，胡扯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故事。倘若自己不希望单身、没有孩子，那么对他来说唯一可能的就是娶一个刽子手的女儿，或者是来自双门街的玛丽-让娜·贝库。夏尔决意再也不会到这里来了，他想另找一个骑马散步的地方。

夏尔回到家，便将蔬菜和水果交给助手格罗。格罗问夏尔那位女店员是否很漂亮，说是每次出门打完猎，他都会把那么多的商品带回家，可以马上自己摆个货摊了。

“她很漂亮。”他稍后说道。他站在厨房里，看着格罗将蔬菜在木盆里洗净，“可她沉默寡言，你摸不清她的态度。”

“要是想懂得姑娘们的心思，你得仔细瞧瞧她们的爹妈。”格罗大笑。

“她父亲是一个好心肠的家伙，在家里他说了算，有点好酒，但所有的老年人大概都喜欢这个。可她母亲是个泼妇，总是唠叨个没完没了。”

“那么，”格罗问，“她像谁？”

“从体格上看，很像她爸。”

“您别搞错了，先生，因为有些人常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也许她有父亲的体格，却有母亲的泼妇脑子。而且您想想吧，等到姑娘变老，年轻时任何细微的性格特点都将会放大。您现在得到的并非是您在二十年以后会拥有的东西。”

夏尔把肩上扛着的两只兔子放下摆到桌上。“给我们做兔子肉吃，格罗。我又需要好好吃顿肉了。”

“时间太晚了，先生，今天我们有鸡肉。”

巴雷、菲尔曼和德马雷进入厨房，坐到桌旁。他们已经饥肠辘辘了。几个男人默默无言地吃着晚餐，喝着掺过水的红酒。那天晚上，每个人都感觉到家里空荡荡的。家里缺少一个女人。夏尔的沉思让所有人不再吱声。谁也不想用任何一句愚蠢的废话引发巴黎先生将不满情绪发泄到自己身上。夏尔下定决心寻找一个女人。他想要一个女人，想要好几个儿子，也想要女儿，为何就不能有女儿呢？

夜里睡不着觉时，夏尔总是弹琴，而且是在午夜时分，他的助手们知道刽子手在饱受煎熬。可不久，钢琴和他一样发出不和谐音。但因为他肯定还想继续弹琴，于是叫来了德国管风琴制造商托比亚斯·施密特。他家的钢琴就是他制作的。

托比亚斯·施密特性格沉静而谨慎，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由音乐和他发明并设计的奇特机器组成。和所有真正具有独创性的人一样，他不仅仅拥有才华。夏尔对此人早有耳闻，这个将来某一天有望成功地保存食品的人想要的是征服世界。他研究蒸馏法和含树脂的胶水，人们可以用这种胶水密封玻璃容器。他约莫四十岁，独自一人生活在圣母大教堂后面的一个老厂房里。他骨瘦如柴，几乎已经谢顶。他的脸始终苍白而毫无血色，因为他营养不良，几乎从不离开那个黑漆漆的厂房。他是夜猫子，是一个喜欢刻苦钻研的人，自从发明液压机以来，他声名鹊起。他唯有一次对刽子手职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总得有人做这事，先生。"音乐将这两个男人紧密相连，他们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他们不需要很多的言语沟通。施密特调好音，他俩并排坐在琴凳上弹琴。弹完琴，两个人还不忘在厨房里喝上一杯葡萄酒。共同弹奏的音乐犹如一顿丰盛的晚餐，让他们感到过瘾极了。

"您应该结婚，我的朋友。"施密特突然说。

"那您先结吧。"夏尔哈哈大笑道。

"我和我的机器结婚，和液压机、钢琴、管风琴以及谁也没见过的机器结婚。问题是，我不知道机器究竟好不好，因为我往往在人家还没需要用上的时候就把它们发明了出来。唯有对长期储存食品的问题，我倒是信心百倍。有些航海家把玻璃瓶带到船上，可遗憾的是，瓶子常常在大海上碎裂。不过要是我能将蔬菜和水果储放在铁皮罐头里，那将不仅帮助人类安然度过歉收之年，而且还能根本性地改变战争。哪怕直至世界的尽头，人们都可以计划好各种战役。因为时至今日，战事中断，

更多的是被腐烂的食品而不是被敌方士兵牵制。只要行李箱里放上罐装食品，任何军队都可以漂洋过海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将来还会有世界性大战。”夏尔说。

“如果一种思想一开始很特别，它是得不到支持的。可您真的应该找一个女人。您并不适合单身。您的职业够艰难的了，您需要一个在家里等着您的女人。”

“我知道，”夏尔回答，“但对一个刽子手来说，要找到一个女人并不容易。”

“它未必是爱情，”施密特说，“它也可能是理智。我知道您喜欢孩子，需要有后代。因此您需要一个女人。”

夏尔想好好考虑一下。

数日后，他收到记者高萨的邀请，相约在双门街的那家妓院见面。蓝衣女子玛丽-让娜在入口处恭候他，陪他踏进玻璃穹顶的大厅里。

“您找到您的白马王子了吗？”夏尔好奇地问道。玛丽-让娜挽着他的胳臂，脸上焕发出梦幻般的光芒。“是的，他是杜巴丽伯爵。他给我制订了伟大的计划——他要把我介绍给国王做情妇，他希望藉此可以改善他在凡尔赛的地位。国王已经年迈，可如果我这么做，下半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再也不需要丈夫了。为何我就不能每天早上给这个老人口交呢？我觉得这比大白天想要多次和我交尾的年轻公羊们更好。另外，您的职位，先生，请允许我这么说，也真不是好受的。”

夏尔禁不住朗声大笑。从某个方面看，这种注重实际的头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他还是警告她：“没有贵族头衔，凡尔赛的大门不会为您打开，小姐！”

“伯爵希望我嫁给他的弟弟，那样我就成了杜巴丽伯爵夫人。”

“哦，听起来不错，杜巴丽伯爵夫人。”

“您有什么心愿，先生？这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晚。”

“我和记者高萨有约，”夏尔轻声道，“他在吗？”

“他就在您身后。贝库女士，他现在归我了。”高萨哈哈大笑，玛丽-让娜行了个干脆利落的屈膝礼离开了。“您过来。”高萨低语道，领着夏尔走到一个有着石门拱的木门前。夏尔心存怀疑。“您相信我。”高萨咯咯笑着。

他们一起爬下旋转楼梯。呻吟声和淫笑声从楼下传至楼上。

“他喜欢有人围观。”高萨耳语道，然后眨眨眼。他小心地将沉甸甸的黑色门帘拉到一边。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间拱顶地下室，没有任何装饰，就像一间地牢，或者更像一间刑讯室。这不禁让夏尔想起了达米安。有一只大十字架固定在墙上。一名年轻男子被绑在十字架上，全身赤裸。这人年龄和夏尔相仿，身材苗条，相貌堂堂，头发呈深黄色，从那闪闪发光的蓝眼睛里看出他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此人脸形瘦削，面色苍白，嘴角流露出冷嘲热讽之意。他看起来轻松愉快，无拘无束，当女人的鞭子抽打他时，他笑起来很享受。

“那个被绑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侯爵，他在为他的色情小说汲取新思想。另外一个人，是弗龙萨克先生，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儿子。”夏尔又要想走，可高萨把他拉住了。“我们这里是一个隐蔽的大家庭，您可以参与进来。谁也不会出卖您。”

两个戴着黑色面具的裸体姑娘松开十字架上的萨德，强迫他跪下。

“您邀请过我了吗？”夏尔问道，然后转过身来。他爬上螺旋楼梯，想找到出口，可高萨追上了他，说：“我有话跟您说。我们找个安静的小角落喝杯香槟吧。您是我的客人。”他向一个姑娘示意，伸出两只手指。很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大家都认识他。他俩坐在两张厚实的皮沙发椅上。在他们之间摆着一张小桌子。高萨密谋似的向前弯下身子。“先生，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理性的文化。去基督化必须走在它的前面，因为一个理性的人不需要上帝，他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神圣的太阳可以取代上帝，太阳是一切宗教的源泉，因为太阳是光，上帝之光，它是最高的本质。您对用最高的本质的祭礼取代我们的神像和守护圣徒有何看法？我们从此以后要崇拜大自然，我们赞美大自然。可是我们为此必须毁灭僧侣，否则他们就会企图驯养最高的本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种密谋吗？”夏尔怀疑地问道。他心里明显感到不舒服，他不想把自己卷进去。

“有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建立了法国共济会，暗中举行会议。他们头上戴着红帽子，太阳神密特拉的帽子。密特拉是史前时代的猎人之神，也是所有宗教的起源，他代表着神圣的大自然。法国共济会的成员们相信所有的人生来平等。我们相信自由、博爱和平等。”

“您希望来一场革命吗？”夏尔问，“或者您只是想检验一下我的立场？”

“不，不，”高萨拒绝道，“我当时在法庭上观察过您。有人委托我和您取得联系。您是刽子手，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您有勇气、毅力以及透彻的分析问题的理解力，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女子也可以加入法国共济会，因为在将来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

“我会好好考虑，高萨先生。”夏尔说，以便结束他们之间的对话，好迅速离开这个地方。

“不过别考虑太久。您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有些东西正在巴黎酝酿。任何暴风雨都有它的预兆，巴黎先生。我已经看到了最初的预兆，它已经出现在空中。”

夏尔决心再也不踏进这家妓院一步。他曾经也下定决心再也不会骑马远足到那家园丁之家，可现在他又来了。他说服自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区。骑马到蒙马特附近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射死了一只狍子。回家途中，他在园丁之家停下来。他的狗需要喝水。没有人在。可有一些人聚集在漫无边际的菜园里。他认出玛丽-安娜·朱杰尔，她显然在忙着给大量的季节工人进行指导。他将自己的马拴上，并且确定那只死狍子已被固定住。他在屋子前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来。

没过多久，玛丽-安娜来了。她走到夏尔跟前，问他是想喝杯水还是喝杯酒。夏尔请她来杯酒。喝杯酒不会损害到他的计划。

玛丽-安娜拿着一瓶酒回来，在夏尔对面坐下，说道：“我父亲上周去世了。”

“上周？”夏尔重复道，“太遗憾了。”他们开始无声地喝酒。

玛丽-安娜沉思地望向远方。她似乎喜欢这种甜蜜的忧伤之痛。夏尔放下杯子，她匆匆地对他看了一眼。她想把目光重新伸向远方，却是在夏尔身上停住了。“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她像是在自言自语，“现在我们喝着他最喜欢的红酒，他一直把这红酒小心珍藏，只在特别的日子里才拿出来喝。这大概是所有好酒的命运吧。它们总是太宝贵、太昂贵，人们不会出于毫无意义的理由去喝它们。正因为如此，它们最后由它们的继承人喝了，出于毫无意义的理由。”

“这个理由或许不是那么毫无意义，”夏尔说，稍后又问道，“你还从未考虑过结婚吗？”他睁大眼睛和颜悦色地注视着玛丽-安娜。

她尴尬地笑笑。“有时会想，”她说，“如果上帝愿意，他会派一个人给我。现在他夺走了我的父亲，或许会派某个人到我这里来。”

“假如上帝派某个人给你，你会认出他来吗？”

“我不知道。上帝一定还会给我一个信号，否则他派某个人到我这里来真的就毫无意义了。”

夏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一定会向我求婚。我从未注意到有人喜欢我。如果是喜欢过我的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我总是要多年以后才知道。而且我一直待在我的菜园中间。”

“那你从不渴望爱情吗？”

“可是先生，您上这儿来，可不是为了和我进行这种离谱的对话吧？”

“本来就是。我想问你是否可以设想和这样一个人结婚：这个人和你的身份不般配，他老实本分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可他也同样不符合任何一个人的身份。”

“这一定是一种很奇特的职业，如果这个人真的爱我……”

“那就是我，小姐。”

此刻，两个人脸上红彤彤的，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了。

“我打中了一只狍子，”夏尔没有任何拐弯抹角地说，“我这就回家去，我的助手巴雷会取出狍子的内脏。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在明天早上把最好的狍子肉捎给你。里脊肉。我相信你会把它做得很好吃。”

“只有您随后跟我和我母亲共进晚餐，我才会答应。”

“好，”他说，“然后我就可以马上跟你母亲提向你求婚的事了。”

“您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她问。

“嗯，我是巴黎刽子手。”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

1765年1月20日，夏尔-亨利·桑松在蒙马特圣皮埃尔教堂迎娶比他大六岁的玛丽-安娜·朱杰尔。他快到二十六岁了。外面正是冰天雪地的景象。夏尔不知道自己结婚，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理智。他喜欢亲近玛丽-安娜，喜欢她沉静而温柔的举止，这种举止总是充满迷人的忧伤，可以唤起怜悯之心。他渴望她的拥抱，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应该保护她，还是要从她的怀抱里寻找安宁。她话不多。有时他觉得好像她更想和养在院子里的狗说话。看起来好像她和那些猎狗达成了默契，它们使她显得非常快乐。她另外一个爱好就是药草和菜园，她照料它们很有耐心和爱心。她也喜欢夏尔，全身心地喜欢，但用的是她自己的方式。她做他喜欢吃的饭菜，哪怕他回家再晚也总是等着他。一旦对他有渴念时，她就把房间里的窗户遮蔽起来，径自躺在床上。他黑灯瞎火地摸索着扑到她的身体上，热烈地亲吻她。她似乎很喜欢这个，可他不敢亲吻她的下体。她将下体视为不洁之物。总之她给他一种印象，似乎她为自己的裸体感到羞耻。她达到高潮时，只是发出低沉的呻吟声，而她的指甲却深深地掐进夏尔的肩膀。有一回，他早上站在院子里的水槽前，她一脸惊讶、完全蒙在鼓里地问他的肩膀究竟怎么回事，是不是老鹰突袭了他。

夏尔先是以为她在开玩笑，可玛丽-安娜并不懂得幽默，不喜欢谈论她的情感。可他们常常做爱。夏尔学会了对此一声不吭。这简直是黑暗中的一种神圣的性行为。

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两个人兴高采烈。整个生产过程却非常艰难。是一对双胞胎，哥哥亨利，大个儿，差不多有五公斤重，弟弟加布里埃尔，却是一个瘦弱的婴儿，体重过轻，两只脚奇怪地弯曲着。助产士说这个会慢慢好转，可是一切没有任何好转。他的脚始终像不成形的镰刀那样，当亨利早就迈开两腿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时，加布里埃尔只能用四肢爬行。这对玛丽-安娜打击很大。她以为是自己不中用。她感觉自己丢了脸。夏尔永远无法理解这一点，他爱他的两个儿子甚于一切。可玛丽-安娜和加布里埃尔的关系却是莫名地疏远了。她不愿意接受残疾的事实。

“你没有责任，”夏尔反复地说，“并不是每棵树都像蜡烛那样生长，这是天性使然，玛丽-安娜。我们有了两个儿子。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可玛丽-安娜高兴不起来，而且她悄悄地指责这个无辜的孩子长着一双畸形的脚。她没有把它表达出来，可谁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玛丽-安娜继续力图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和妻子，用她的厨艺宠爱夏尔。可她不愿再和他同房。一开始她总是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到最后他才明白是她不想再和他上床了。她太担心自己再次怀孕了。

“或许这就是诅咒。”一天晚上，等到孩子睡觉了，和夏尔一起喝红酒时，她喃喃道。他起先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恍然大悟。很显然，她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因为你是刽子手。这不会带来好运。我母亲警告过我。她说上帝会惩罚我们。”

“我不再那么确信，是否上帝可以计划一切。一旦碰到所有的人，一个人很快就会失去概括能力。”

“别再说讽刺挖苦的话了！”她嚷道，重新给自己的杯子倒上酒。

夏尔从她手中拿走杯子。“这是葡萄酒，玛丽-安娜，你现在别再喝下去了，赶紧上床睡觉吧。”

“我爱喝多少就喝多少。”她怒骂道，从他手里夺回酒杯。

只要晚上一喝酒，她到第二天早上都提不起精神，直叫人受不了。她四处乱吼，几乎不再关心自己的孩子。亨利和加布里埃尔大多躲在药房里。夏尔结束了研究工作之后，便带两个孩子到客厅。那里摆着钢琴。他让他们坐到凳子上，教他们弹琴。亨利学琴的兴趣不大，可加布里埃尔却被这架乐器发出的旋律迷住了。于是，他们俩晚上开始合奏，而玛丽-安娜则坐在黑魆魆的厨房里喝酒。她不需要光，她像种植植物一样种植她的忧伤。

夏尔感到万分诧异。他拿孤独换来了地狱。他越来越频繁地睡在药房里，因为一大清早就被卷入某些好斗的对话中，他会感到厌烦。每一次和解的尝试结束于反反复复的责备中，而她最精彩的论断就是，夏尔对加布里埃尔畸形的脚是负有责任的。夏尔可以忍受妻子各种各样的责骂，日复一日的喧嚷，不要命的酗酒，可他无法忍受加布里埃尔和亨利在家里听到他们母亲的话。他知道动物有时会把它们的孩子赶出家门，而这种事发生在人类中间，他觉得很新鲜。他越发投入更多的精力关心他的两个儿子，开始在药房里为加布里埃尔的脚设计滑轨。他做了一个皮制支架，可以让他的双脚摆正位置，并且提供足够多的支撑。亨利为此很兴奋，帮弟弟扶起来。他一连几小时和他待在院子里，努力教他学会走路。渐渐地，他们敢走到外面的马路上去了，可石子路高低不平，而有的路上缺了好多石子，害得加布里埃尔在马路上难以走动。他觉得

坐在琴旁最安全，更何况还有哥哥的鼎力相助。

这种处境对亨利而言绝非易事。他母亲反反复复地想使他相信，他对弟弟的残疾负有责任，因为他在母亲的子宫里占据了太多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再把母亲的话当真，而一旦生气，他就会说，无论是加布里埃尔，还是他，都没有表达过生下来的愿望。这句话更加刺激了玛丽-安娜，她气呼呼地说道，是他们的父亲要对这一切承担责任。他使她怀的孕，不，是强奸了她。因为他从来没有问过她是否想要孩子，所以这就是强奸行为。亨利从此以后远远地躲避她。加布里埃尔没机会回避，他索性逃避到音乐中，对音乐产生了敏锐的感觉。他隔三差五地请托比亚斯·施密特上家里来，让他给钢琴重新校音。玛丽-安娜不喜欢这个德国人。她认为他的工作和音乐本身一样毫无用处。可夏尔在这方面不肯迁就。他几乎放弃了他在药房的研究，腾出自由时间关心加布里埃尔。一旦加布里埃尔有需要，他马上会叫来托比亚斯·施密特。

一天晚上，跟往常一样做完工作，施密特又和夏尔一起喝上一杯酒，他说道："巴黎先生，我看到加布里埃尔的滑轨了。我们可以把滑轨做得更好些。请让我试试吧。这不会花费您一分钱。我们必须加重皮鞋的分量，让脚后跟拥有更多的支撑。我父亲做过鞋匠，他曾教过我一些手艺，可我对发明新生事物有着更浓厚的兴趣。但我会看脚。我没有把这个活荒废掉。加布里埃尔有一只弯曲的平足、弓形足，此外还有一只扇形脚。我们应该给他定做一双特别的鞋子，可以从鞋子里面把他脚的位置抬高。只有这样，他才能站得更稳。"

夏尔点点头。

"可这样我就得求助一名鞋匠，"施密特说，"这就要花点儿钱了。"

"这个没关系。"夏尔回应道。加布里埃尔的脚可以恢复正常，这个念头让他激动不已，以至于夜里辗转难眠。

那天晚上之后，玛丽-安娜尽可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而格罗开始重操旧业，干起了厨师的行当。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和患病的母亲在菜园里度过。一天早上，她从娘家回来，夏尔知道她母亲去世了，尽管玛丽-安娜一句话都没说起过。她退回至卧室，关上窗户，在黑暗里出神。他只是偶尔在夜里听到她的脚步声，那是她到厨房拿酒的时候。她在自己阴森森的世界里徘徊。夏尔认为这一切很快会平息。可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数日之后，她离开了昏暗的房间，关心起她家的狗来。她觉得夏尔没有能力给他们的狗喂食。她大多坐在院子里，和她的四条腿动物呢喃细语。然后，她在药草和菜畦之间巡逻，拔掉这边的一株坏死的叶子，或者给那边的植物浇点水。若是夏尔踏进院子，她就会摆出一副充满不屑的愤怒的面孔。如果哪一只狗想要迎候他，她就会发出制止它的某个命令。然后她会暗自窃笑，因为狗听了她的话而没有向夏尔问候致意。可尽管如此，狗们还是对他不停地摇头摆尾。夏尔有几次试图跟她说话。可她不愿意。他问自己，是否她有病。脑子有病。

几个月之后，她突然又开始大发脾气起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越来越频繁地和邻居吵闹不休。之后她又指责夏尔爱她太少，可当他想要柔情似水地抚摸她时，她又畏畏缩缩起来，好像他得了瘟疫似的。玛丽-安娜这种可怕的转变让夏尔感到很伤心。他没有料到情况会是这样。他无法理解的是，他竟然要用自己的独身来换取这样的东西。玛丽-安娜越来越需要她的妹妹，尽管她经常和她吵架，因为遗产。夏尔觉得在他们的婚姻中唯一可能真正引起争执的问题却并没有成为问题：刽子手的职业。她对他的工作给予全力支持。拥有良好的薪金就已足够。她永远挣不够的就是金钱。她把金钱慢慢积聚起来。她并没有享受到金钱的快乐。就连那两个茁壮成长的孩子，她也没有享受到。夏尔爱这两个孩子甚于一切。他愿意为了他们把这个工作再好好做一段时间，让他们将来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来说，两个儿子的幸福要比实现他自己的梦想更为重要。不久，亨利要比他的同龄小伙伴明显高出许

多。他喜欢到塞纳河游泳，喜欢和夏尔一起骑马远行和打猎。他真的为父亲感到自豪，感觉越来越依赖父亲，因为母亲的冷淡很伤他的心。她从来没有像对待自己的狗那样拥抱或者亲吻自己的儿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完完全全从夏尔手里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

亨利对父亲的职业越来越饶有兴趣。他看到鲜血未曾感到过烦躁不安。血不会比一摊酒更令人可怕。要是巴雷在院子里取出一只猎获的狍子的内脏，他会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个究竟，而他的同学则害怕地用双手挡住脸。姑娘们对亨利痴情，因为他长得英俊，有男人味，肩膀很宽，因为日复一日的游泳使他的臂膀坚实有力。

加布里埃尔没有宽大的肩膀。托比亚斯·施密特花了数月精心制作专用鞋、鞋垫以及护腿支架，使他外出自由活动成为可能。但他几乎不利用这种新的自由。他已习惯和一名同龄的邻家姑娘一起坐在钢琴旁弹琴。多年的残疾使他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宅男。尽管他的身体不便已被部分排除，但他的恐惧依然存在。他害怕大的动物。他大概从未碰过马的鼻孔。他也害怕水，回避江河和其他湖海。他觉得只有在家里的钢琴旁才安全。

亨利第一次提出将来也想做一名刽子手时，夏尔几次从夜里惊醒，全身大汗淋漓。他想到那重诅咒又回来了。玛丽-安娜支持亨利的打算。夏尔不是完全能肯定，她说这话是出于信念，还是仅仅为了让他恼火。因为和她去世的母亲一样，玛丽-安娜最近已习惯于始终代表对立的观点。她好斗成性，对她而言让她吵上几天架或者干脆一声不吭，没有任何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她似乎并不觉得受苦。因为她的内心没有任何愤怒。如果有什么事情不合她的心意，这个从前如此忧愁伤感的女人现在可以马上咆哮如雷，如果觉得吃得不对胃口，她就可以摔盘子或者将饭菜扔到院子里去。有了玛丽-安娜，他们家里仿佛有了一座活火山。她恐怕从没有说过自己过得不好。不，她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担忧，

不必饱受饥饿之苦，她有四条狗，她喜欢它们胜过一切。这些日子里，巴黎在忍饥挨饿，一个人还能想要更多吗？

玛丽-安娜不需要任何人。如果一家人和助手们一起在大客厅里用餐，她几乎不说一句话。有时，她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夏尔看，他感觉看到了杜布奶奶的目光，他感到毛骨悚然。可是夏尔退缩得越多，玛丽-安娜就越是蛮横地揽下已经空出的领地，实施一种不逊色于杜布奶奶的暴政。夏尔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的儿子亨利将承担起家庭的重任。

夏尔重新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药房和他的病人身上。他的助手们承担起了家里越来越多的工作。玛丽-安娜对此很反感。她重新开口说话了，提到钱的事。夏尔乘机改善了家庭的气氛，使他们的关系正常化了。玛丽-安娜似乎需要孤立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到自己。这段时间显然也有助于她接受加布里埃尔残脚的既成事实。她又开始做饭了，为夏尔、亨利、加布里埃尔和助手们赞美她的厨艺而高兴。可是，夏尔结束工作，晚上很晚回到家，搂住她的腰身，想亲吻她时，她却把头别转过去。她禁止任何身体上的亲近。夏尔感到很伤心。他不明白玛丽-安娜究竟怎么了，有什么恶魔闯入了她的灵魂，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第二天早上会遇到哪一个恶魔。夏尔无奈之下只能接受既成事实，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一天晚上，他在药房的沙发上发现了他的枕头和被子。从现在开始，他们开始分房睡了。两个人的疏远迅速加剧。夏尔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中，而玛丽-安娜在完善她的纪律意识，若是有人哪怕仅仅在萌芽状态搞乱了这种纪律，她就会大发雷霆。夏尔好说话，不喜争吵，他都统统接受了。他的好说话成了她的优势，谁也不能反对她。她剥夺了所有人发表言论的权利。

然而，夏尔离开她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他并不渴望其他女

人，他在药房里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因为玛丽-安娜从不踏进这个房间一步。她坚定不移地避开他所能逗留的任何地方。倘若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她就请德马雷转告。有一次，那是在一个复活节星期一，在喝了两杯红酒后，她有了一丝多愁善感的举动，用食指碰了碰夏尔的肩膀。这已经是她表现出来的最大程度的激情和好感了。

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遇到这种处境使他苦恼。在执行完艰难的行刑之后，回到家里，还要感受这种冷漠，真是不容易。在那些万分沮丧的时刻，夏尔怀念起自己的父亲来。可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于是他到父亲的长眠之处圣罗兰教堂寻找他。最后一排的椅子后面是墓穴。石板上面没写上任何字。可夏尔知道父亲的残骸在其中一块石板下面，他可以在这里清醒地了解自己的想法。他想，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帮助他保持平衡的朋友。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一语不发的朋友，甚至是一个已经去世的朋友。他不必回答什么，只要在那里就好，有了这样一个人，你就可以想象着和他说话，倾听他的劝告，即便这些劝告也是由那个人自己杜撰出来的。但一个人必须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可以因此向一条河、一匹马、一只木制十字架、一本日记本或者一棵花椰菜诉说自己的痛苦。唯有你能够用言语理解自己的痛苦时，这种痛苦才会保持一种外形，你就像对待一块黏土那样对它进行加工。因为答案也隐含在每一个痛苦里。夏尔深以为然。

一个无家可归者，在一块石板上打盹。看到夏尔时，他吓了一跳。

“你知道，谁埋葬在你下面吗？”夏尔问他。

“一个虔诚的人，先生，他从来不会不给任何施舍就从我身边走开。”

“他究竟给你多少？”

“一镑。”那名乞丐说。

“那我同样也乐意为之，”夏尔说，随后给了他几枚硬币，“先父一定愿意这么做。”

年迈的乞丐这才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原来正是乐善好施的刽子手让-巴蒂斯特的儿子。“先生，”他埋怨道，“普罗大众死于饥饿，谁也不去关心他们。难道上帝仅仅是国王和贵族们的上帝吗？”

“无可奉告，”夏尔说，“或许上帝已经匆匆离去，不知道去了哪儿。”

夏尔卖掉了地狱街的房子。他现在快五十岁了，想为自己重新准备一个单独的住房。另外一个原因却是：他想卖掉房子赚点钱留给加布里埃尔。他们搬进了新圣让街。新房子没有旧房子大，但也有一个院子，和古罗马的前院类似，从右首可以到达大厨房和客厅。而在左首，有一个独立的入口通往接待室，夏尔就是在那里给他的病人治疗。接待室后面是药房，再后面就是实验室，基本上不允许任何人进入。院子入口的对面依次有地下清洗室、仆役室、家禽棚、工具棚以及木材间。二楼，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为夏尔、亨利和加布里埃尔以及助手们的卧室。玛丽-安娜则拥有自己的房间。

夏尔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在新的地方感觉挺不错。可巴黎的经济境况日益萧条。最近几年的冬天过得非常艰难，收获的庄稼大多腐烂了，面包又贵又紧俏。非常紧俏。巴黎人食不果腹，群情激愤。路易十六国王和挥霍成性的王后——可憎的奥地利女人玛丽·安托瓦内特，贵族和僧侣：谁也没注意到民众的愤怒。直至那一天的到来，让-路易·卢沙尔本该在那一天痛苦地死去。

第8章

让-路易·卢沙尔的愤怒事出有因。他的父亲酗酒成性、残暴凶狠，他出于正当防卫杀死了他。父子俩有次为本杰明·富兰克林越吵越凶。富兰克林是避雷针的发明者，也是美国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独立宣言上写着，人人生来自由平等。所有的大街小巷里都能买到富兰克林的画像。巴黎人喜欢这位从前的外交官，也喜欢他的同胞——他的继任者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目前作为公使居住在塞纳河畔。他俩聪明谦逊，穿着寻常朴素的黑西装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因此被视为普通民众的一部分。没有任何奢华装点他们的衣服，没有扑过粉的假发，也没有镀过金的纽扣。

在激烈的争执中，父亲抡起锤子威胁儿子，儿子因此离开了谷仓，大吼道，他要到城里找份工作，再也不回来了。话音刚落，父亲将锤子扔了出去，嗖的一声从儿子的头旁飞过。让-路易捡起锤子扔了回去，满腔怒火。不幸的是，他砸中了父亲的鼻根，砸破了脑袋。凡尔赛宫因此想要公开地处死他，因为老卢沙尔曾经是凡尔赛赛马饲养场管理员。那些人享有特别的保护，对他们的每一次袭击均被视为对宫廷的袭击。

夏尔对这次的死刑判决深表厌恶。他知道，作为一个特别残忍暴躁的人，老卢沙尔很可怕，既不宽恕动物，也不宽恕人类。可他也觉得，卢沙尔事件更多地是一起家庭悲剧。它是狂风骤雨来临前的预兆。人们愈发公开地谴责各种不良现象，他们就愈多失去对君主制度及其维护力量的尊重。大家不再对教会寄予希望。人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好失去的了。

行刑日那天清晨，两辆马车离开了凡尔赛小城的监狱。一大群人早就盼望他们的到来了。可是当大门打开，夏尔-亨利·桑松的马车出现时，既没有听到讥讽的笑声，也没有听到大喊大叫声。人群在沉默。这是一种危险的沉默。那些人目光阴沉地凝视着夏尔，他像统帅那样笔挺地站在第一辆马车里。头发他已经小心翼翼地梳理过了，也扑过粉了。

他穿一件扣上纽扣的深绿色小礼服。他也参照英国的时尚戴了一顶黑色大礼帽。法国的其他刽子手还在穿着战靴和血红大衣出场，而夏尔却试图以他的服装赋予这份职业额外的尊严。这种尊严应该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手拿斧子的屠夫，而是一名司法官。在他后面坐着德马雷、巴雷、菲尔曼和他的儿子亨利。亨利也来到了现场，这是他的心愿。

骑兵给他们辟出了一条路。车队缓缓而行，穿越凡尔赛来到圣母教堂。人群依然在沉默着，可夏尔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预示着不祥的奇特氛围。他简直可以感觉到那种群情激愤即将引发的爆炸性威力。他帮卢沙尔下车，从口袋里掏出那份书面判决。这个死囚犯赤着脚，穿着一件血红衬衫。他的头上套着一根绳索，双手紧握一支蜡烛，低着头跪在教堂门前。“……对让-路易·卢沙尔的判决是，胳膊、小腿、大腿以及脊柱断裂，再在绞刑架上处以车裂之刑。在圣路易广场执行。”人山人海的观众群中顿时窃窃私语起来。他们之中的某种情绪开始流露出来。夏尔从人们的脸上明显地看出了这一点。他匆匆瞅了瞅亨利，可亨利却是不露神色。尽管出于安全原因行刑被指定在早晨五点进行，可成千上万人仍然准时赶赴现场。他们满腔愤怒，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作案人这么做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被儿子砸死的粗暴父亲的故事。当助手巴雷重新请卢沙尔上车时，观众中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它类似于一头猛兽发出马上出击的危险叫声。通常情况下，人群鼓掌欢迎，然后讥讽作案者，可这一次巨大的人群似乎怒不可遏。人们明显感受到了怜悯之类的东西。这倒是鲜有所闻。恐怕可以认为，他们一定是看过卢梭的书籍。这样的一群人中还从未对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产生过怜悯之心，或许民众对国王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怜的卢沙尔误以为群众的愤怒是针对他的。他显得烦躁不安，愈发感到恐惧。这时已经站在车里的神甫搂抱他，赦免他的罪。“您告诉他，法官已授权可以补充采用减刑方式行刑。”夏尔低语道。

马车在萨托里街的出口处停了下来，车辆再也无法通行。卫兵们试图留出一条路，可是无济于事。突然，一个温柔的声音从观众的耳语和怒吼中传出来。“再见，让-路易，我的爱人。”原来是埃莱娜姑娘，死囚犯的恋人。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纯洁而绝望，实在叫人心碎。她穿过人群艰难地向那辆车挤去。谁也不想挡住这个柔弱女性的道。她终于到了车那里，紧抓住木栅栏。她的脚被绊了一下，可手并没有松开，随后被车一起拖着走。突然，一个高个子男人又出现了。只见他迈开大步围着车辆跑，腾空一跃跳上车辕，撕开喉咙吼道：“让-路易，谁也没有权力杀死像你这样老实本分的人。”一名骑兵把巨人挤到一边。巨人是凡尔赛宫里的一名锻工，认识老酒鬼卢沙尔。吵吵闹闹的场面一直持续至车辆抵达圣路易广场，而在广场上举办活动开始变得愈来愈危险。人群围住绞刑架，拆除栅栏上的木板。夏尔和亨利以及助手们一起揪住卢沙尔，急忙爬上台阶来到绞刑架那里。可那个巨人早已站在上面等候他们，他手拿战斧将用于车裂的刑车砍成碎片。夏尔把儿子拉到身边，尽管亨利的身材比父亲更高大结实，而且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恐惧。大家向巨人鼓掌喝彩，并开始拆除绞刑架。“太太平平待着，刽子手，你就不会有事。”巨人解开卢沙尔的枷锁，把他抬到自己的肩上。他仿佛走在凯旋的队伍里那样爬下台阶，人们为他筑起了一条小巷。“让刽子手和他的助手们走过去吧。谁要是弄弯了他们的一根头发，那就要遭殃了。”

夏尔和亨利还没来得及离开圣路易广场，绞刑架的残余部分已经在他们身后熊熊燃烧起来。他俩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助手们，他们拼着命使尽浑身解数才从人群中脱身。他们脸色苍白，双手握住两匹马的缰绳。有一辆车也已经在燃烧，只能留在那里了。

“究竟出什么事了，爸爸？”亨利问。

“古老的秩序摇摇欲坠，你是见证人。这还只是刚刚开始。谁也无

法阻挡它。”

他们一个个爬上这辆仍然完好无损的马车，回巴黎去了。

“他们点燃了正义的宝座，”德马雷过了片刻说道，“他们很快会把国王的宝座交给火焰。我不明白为何国王不作为，他有的是士兵。”

“他应该让整个巴黎血流成河吗？”菲尔曼问。

巴雷点点头，表情阴郁。

“他必须防微杜渐，”德马雷坚持道，“他一旦显示自己的软弱，巴黎将失去尊严。”

“当一种思想来临，你无法阻止它的蔓延，”夏尔说，“巴黎在挨饿，而王后却在她的衣服上面几乎耗资二十万，这可不行。”

“国王难道对粮食歉收承担责任吗？”德马雷问。

“不是对粮食歉收，”菲尔曼忿忿不平地答道，“而是对面包价格承担责任。”

城市淹没在黑暗中。人们没钱购买蜡烛和柴火，靠栗子面包充饥。面包价格重新暴涨，国王并没有为减轻百姓痛苦做过任何事，却用关税制度将面包价格的一半流入自己的腰包。起义和抢劫越来越频繁地在农村爆发。歹徒们到偏僻的乡村作案，甚至还袭击小宫殿。有些人胆敢闯到巴黎，偷袭面粉市场和面包市场。他们要求采用国王价格，也就是采用给国王的扣去捐税之后的面包价格。他们攻占和抢劫巴黎市区的一千多家面包店。可绝大多数人，只要头上还有屋顶，依然会待在自己家里。随着最后的蜡烛燃烧的烟雾消失，他们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就好像魔鬼亲自来到了都城，吹灭了人们的生命之光。巴黎陷入黑暗之

中。

1789年5月，对所有的人来说，王国的崩溃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最近数十年的海外战争耗尽了国王的金库。无独有偶，王后以每次连续数夜的庆典活动肆意挥霍，每夜耗资竟达四十多万镑。更为昂贵的是她为了维系友谊而必须支付的那些养老金。她送给波里纳公爵夫人一百多万镑，送给她的情人三万镑的退休年金，只是为了让他参加她的庆典活动。国王在一旁无所事事地观望，不，他掉转目光，仍和从前一样犹豫、等待和懒散，唯一专注于自己的业余爱好狩猎以及作为锁匠的古怪激情上，他还设计出了漂亮的门锁。而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王国政府接受了十亿多镑的贷款，并且考虑再次提高税收，然而只是考虑对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临时工提高税收。僧侣和贵族几乎不支付任何税费。赤贫者要为富豪们负担生活费用。形势急转直下，似乎已处在走投无路的境地，在一百七十多年之后，要求重新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吁越来越强烈，因为唯有整个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说贵族、僧侣和市民才可以做出提高税费的决定。

在大街上，当愤怒的人们在抑扬顿挫地发出“绞死富人”的口号并且闯入宫殿的时候，他们却又喜欢散布恐惧和恐怖的气氛，可是向前推进改革的恰恰是那些贵族，因为贵族们心知肚明的是：一旦不稍稍做出让步，他们失去的将是一切。于是，他们和犹豫不定的僧侣们一起加入市民队伍里，要求取消三大等级制度，宣布他们自己才是国家、也是国民议会的唯一代表。

夏尔像平时一样沉浸在工作中。他听从安排，对判处死刑的人进行绞刑或斩首，在小窃贼们的额头上打上烙印，他还要履行所有其他托付给他的义务，以完全取悦他的上司。他早就听不到人群的喝彩声了。假若一个人仅仅偷了一只发霉的面包，而你却要往这样一个体弱多病的家伙的额头上打上烙印，你为何还要感到自豪呢？

搬入新居后，夏尔又开始思念起丹曼莉来了。他的欲望重新苏醒了。他常常问自己，她现在大概会长成什么模样，她在祖国的生活会是怎样。尽管和她没说上几次话，但在他的记忆里，他赞美过她。他心里突然只有一个念头，想马上再见到她。

几日后，快要走到耶稣会修道院时，他远远地听到叫喊声。辛辣的烟雾向他迎面而来。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手拿石子和燃烧的干草球向修道院扔去。愤怒的群众辱骂神职人员，要求他们交出储藏的粮食。当骑警从大街的另外一头出现时，这些攻击者立即如鸟兽散。一名神甫被激怒了，冲出修道院，抓住一名骑警的缰绳。“法兰西王国必须保护我们和我们的财产！”他嚷道。

“为什么？你们难道交过税吗？”骑警大笑，将他的马拉到边上。

夏尔对着神甫嚷道：“暹罗的姑娘在哪儿？”神甫一脸惊诧地转过身来。夏尔向他冲去时，他举起手以示拒绝，然后飞奔回去。夏尔追上他，抓住他的袈裟。“丹曼莉在哪儿？”他吼道。神甫伸出双臂反击。“她早就不住在这里了。”夏尔惊愕地放开他。神甫跨上最后几级台阶，随即消失在修道院围墙后面。夏尔这才意识到，自从最后一次见到丹曼莉至今，几乎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他扪心自问，难道不是他彻底疯了吗？

夏尔迷迷糊糊地回到家，坐在加布里埃尔旁边弹琴。可任何旋律都无法减少他的愤怒。最后，他退回至药房，拿出日记本。他没有记述丹曼莉。那么多年过去，他觉得要写她太难了。他写的是那些起义，它们渐渐达到了革命的规模。民众宣布富人是他们的敌人。“谁不愿给予，就从他手里夺走，”夏尔写道，“可现在人人都成了偷盗者。”

偷袭修道院和富人的事件愈演愈烈。早上有一百个人走在街头，晚上就已经聚集起好几百号人在义正词严地高呼“绞死富人”。奇怪的是，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偏偏盯上了造纸厂老板让-巴蒂斯特·雷威永。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曾经做过工人的雷威永，给他的员工支付了社会福利费用，而巴黎的其他企业主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数十名卫兵守卫着他的宅院，起义暴动人员只好冲进隔壁的那栋城市别墅，将那里的全部家具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扔到马路上烧了个精光。令人惊讶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将家具攫为己有或者变卖给他人。不，这里充斥的是盲目的摧毁癖，纯粹的憎恨。谁叫嚷得最响，人群就跟在谁后面。一周之后，一万名示威者重新冲入雷威永的别墅。当警方增加警力并投掷火炮时，三百具尸体留在了别墅花园里。损失惨重。可那些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一起齐步前进时，任何部队都无法阻挡住他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是他们上路了。

1789年7月14日，夏尔邀请亨利一起参观皇宫。玛丽-安娜几天前到她妹妹家去了，她常常会在那里待上好久。甚至连两个儿子二十二岁生日也错过了。亨利已经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他的身高超出了父亲，同样是一个真正的桑松。女人们见到亨利，总要转过身来忍不住对他咯咯笑，这种事情以前在夏尔身上也发生过。只要人家愿意听，他都会对每一个人说，他是刽子手的儿子，不久将成为巴黎先生。他充满着自信。皇宫离巴黎大堂中央市场只有一小段路。在中央市场上，数以千计的一袋袋面粉倚墙堆放着，被附近居民从窗口倾倒下来的夜壶里的粪便溅得肮脏不堪。袋子里的面粉就这样在这里慢慢变味变烂，而在其他地方，人们却快要活活饿死了。

皇宫曾经归奥尔良公爵所有，“太阳王”路易十四于1715年去世后，奥尔良公爵临时担任摄政王，因推行毫无节制的纸币试验，使法国濒临破产。和太阳王一样，他喜欢女人、美酒和赌博，习惯过着奢靡堕落的生活。他向公众开放皇宫，皇宫自此以后被誉为欧洲最大的公共游乐场。只要花上几个苏，就可以怀着惊奇注视世上所谓最肥胖的女人或者长着巨大阳具的外国男子，在一个帷幕后面凝视色情的图画，欣赏讽刺

歌曲，观看戏剧表演，瞅一眼简易幻灯机，或者赞赏一下伯尔尼医生兼蜡像制作师菲利普·科特斯的蜡像陈列室。应孔蒂王子的邀请，科特斯医生定居在巴黎。科特斯让他所谓的外甥女玛丽·格劳舒兹从瑞士搬到了巴黎，教会了她制作蜡像的技术。至于这个玛丽姑娘是他的情妇、他的私生女，或者真是他的外甥女，却始终是个秘密。皇宫里是没有等级制度的。拾荒者、妓女、有钱的女公民以及贵族们都是这里的常客。任何警察都不允许踏进这座庄园，这也使它成了最受民众喜爱的地方。在巴黎哪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销售如此数量众多的反对国王的非法诽谤性小册子。哪儿都找不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如此迅速地获悉巴黎和凡尔赛发生的一切。

那天，夏尔想和亨利讨论继任问题。他准备交出自己的职位，从此以后将精力全部投身于医学。他想给这次谈话赋予一个庄严的环境。因此他们选择一起坐在巴黎的一座咖啡馆里。咖啡馆里人声鼎沸，夏尔问自己是否选错了地方。邻桌的一名男子突然开始激动起来。他说瑞士出身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尔遭路易十六国王即刻解职。好像所有的客人突然一起商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抑扬顿挫地呼喊着内克尔的大名。他们希望他留任，他可是从私人腰包里掏出两百万镑购买面包，然后免费分发给挨饿的百姓。就连教会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善举。

“因为他的慷慨大度，内克尔在宫廷里极不受欢迎，”夏尔对亨利说，“他要强迫一部分的贵族和教会长老们做出解释。假如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可以奉送两百万镑的面包，那么贵族和教会为何就不可以效仿呢？”

有人嚷道，国王之所以把解除内克尔的职务故意安排在一个星期日，是因为国民议会不会在星期日开会。

“这个结局真是不幸，”夏尔说，“没有内克尔法国又要破产了，法国的公债将因此一文不值，而且有些贵族将失去全部的财产。”他站起

来。“来，亨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他们正要离开皇宫，可好几百人却突然挡住了他们的路，纹丝不动地站在蜡像陈列室前面。那里的人也在声势浩大地呼喊“内克尔”的名字，要求提供这个财政大臣的半身蜡像，他们好在盛大的游行队伍里带上它穿越巴黎的大街小巷。一个娇小的年轻女子出现在门口。她手里端着内克尔的蜡制半身塑像。她把塑像交给了他们。可现在这群人又想要奥尔良公爵的头像。年轻女子声音尖锐地吼道，这不行，因为头部和躯干无法分开。群众意外地接受了这个回答，继续向前迈进。陈列室里还有一个干劲十足的年轻姑娘，她才十七岁，名叫玛丽·格劳舒兹。在她后面的一名男子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室外。他就是工程师弗朗索瓦·杜莎。“你赶紧给我回来。”她呵斥他。可他失去了平衡，屈膝跪倒在地。他本想抓住她的手臂，可玛丽躲开了他，回到了陈列室里。“我该如何向你求婚呢？”杜莎悲叹道，“难道你不想做杜莎夫人吗？”

外面，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数千人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共同庆祝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几乎有一百名炮兵投奔到他们的阵营里，他们从那家残疾军人旅馆临阵脱逃，没有人制止他们的行为。这座城市似乎没有了领导人，任凭混乱无序的局面肆意发展。

这时，二十九岁的年轻律师卡米耶·德穆兰爬上桌子，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和他的表兄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一样，德穆兰也普遍被视为一个饭桶。他之前处理的所有事，都没有成功。“公民们，”他吼道，“你们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内克尔留下来。可现在他被解职了，就像狗被轰走一样。难道有人可以更无耻地向你们发起挑战吗？”趁他的煽动性讲话还没被淹没在听众的吵闹声中，他接着又嚷道：“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这句大胆的口号像野火一般，经迷宫似的小巷和臭气熏天的阴沟，迅速地蔓延开了。那些巷子里和阴沟里塞满了牲畜、手推车和贵族的马

车。乞丐们把新闻带到下一个住所，那些新闻又被小摊贩听到，再传至他们的顾客那里。没过不久，全巴黎五十四个海关城门中，有四十个已经烧起来了。有一个失去控制的团伙偷窃了海关商品，一把火烧毁了保存在办公室里的征税单和税务登记资料。圣拉扎尔和其他修道院的僧侣们也碰上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他们的储藏室里堆满了小麦、葡萄酒桶、黄油桶以及乳酪。修道院图书室被清空，图书在大街上堆积成山，然后一把火烧没了。最后，马上又放上一把火，把整个大厅烧没了。夕阳西下时，起义变得越来越残暴。在火炬的护卫下，愤怒的群众犹如正在喷发的火山一样，辗转在一个个面包房和一个个武器锻造工场之间，偷窃面包、滑膛枪、手枪、长矛以及刀剑。巴黎的那一半人准备把那另一半人洗劫一空。新的谣言甚嚣尘上：国王的部队正在路上。鼓手们行进在大街上，要求大家加入国民自卫军。他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佩戴上紫红色帽徽作为识别记号，那是巴黎的颜色。警钟敲响了。

夏尔和亨利跟在愤怒的人们后面，他们向圣奥诺雷街涌去。在旺多姆广场附近，朗贝斯克亲王所属的德意志王家军向他们迎面而来。人群立即冲向那些士兵，而开小差的宪兵也赶来帮助民众。枪炮声突然响起，可并没有吓跑群众。相反，他们因此更加恼火了。夏尔和亨利跟随起义人员一直走到残疾军人旅馆。他们想到那里偷走武器。他们打破大门，守卫并没有反抗。他们就像老鼠一样冲进地下武器库，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已经难以回去了，因为其他的人正从大街上挤进来。抢劫者们陷入了慌手慌脚之中。为了打通去楼上的路，刺刀朝自己人刺去。在拥挤的旋转楼梯里，不管撞见什么，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刀刺过去。好几十名男子，有些带着被刀割或者被刀刺的重伤，不断哭喊着和呻吟着，重新拖着脚步从兵营里逃窜出去，好像他们直接来自地狱一样。武器被分发出去了。有一些人硬是把大炮从院子里扛出来，其中就有一门特别珍贵的大炮，大炮上面银光闪闪。愤怒的人群叫喊得越发愤怒，变成了复仇者，变成了没有头脑、没有领导的复仇者。

夏尔和亨利正怀着好奇的目光，观察十几个男子将银色大炮拖到大街上，却突然发现有一名女子站在这个银色武器面前。她的肤色比法国女人的肤色要黑，她的乌发一直飘落至腰身。她呼喊着，疯狂地打着手势，夏尔即刻想到了丹曼莉。她越来越靠近夏尔时，他发现果然是丹曼莉。他简直不敢相信。她依然还是那副清秀的面容，有着代表着谦卑和坚强的神秘莫测的身体语言。一名起义人员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身边拉。夏尔立即冲向那名男子，一使劲把他打倒在地。那家伙想重新站起时，夏尔的拳头垂直地落到他的头上。他屈膝地站着，恍恍惚惚地趔趄着行走。丹曼莉用怀疑的目光凝视着帮她的这个身材高大的人。她冲向夏尔，抱住他痛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昆底。”

“丹曼莉。”夏尔轻声道。

“小心，父亲！”亨利一边叫道，一边勇敢地挡住那些人的去路，这些人正想赶过来帮助他们那个跌倒的朋友。亨利保护性地站在父亲面前，调皮地冷笑着。他的脸上洋溢着那么多的自信，倒让进攻者搞糊涂了。

“你们想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动手吗？”夏尔吼道，抡起拳头对准一个人的脸砸去。那个人应声倒下了，躺在地上。他的鼻子被打断了，鲜血从他的下巴流出。他的战友们此刻围住了丹曼莉、夏尔和亨利。

“你是谁？”一个人装腔作势地嚷道，其他的起义人员站住了。

“巴士底狱就在那里，”夏尔对着他们喊道，“如果你们想冲进去，那就冲进去吧。”他保护性地拥抱丹曼莉。她颤抖着身子紧抓住他。

桑松父子俩让起义人员感到迷惑不解了。人如何能具有此等勇气，竟然不支持这整群暴徒？一个人高马大的人挤到了前面。“别打搅他，

我认识这个人。惹他麻烦不会带来好运。”此人是来自凡尔赛的那位锻工。人群渐渐地散去，那些人举着被缴获的闪闪发光的火炮继续行进。

丹曼莉又想阻挡他们，可夏尔不让她靠近。“大炮是我们暹罗国王送给你们国王的礼物。谁都不允许窃取它，否则恐怕是对暹罗的巨大耻辱。”丹曼莉说。她腼腆地抬起头来看他，直至她的唇边掠过一丝尴尬的微笑。“昆底！”她重复道。

“昆底？”夏尔微笑着问。

她擦掉眼里的泪水。

“你学过我们的语言。”他赞许地说。

“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逢。”

亨利跟在愤怒的人群后面走着。夏尔不想和他分开，于是对丹曼莉说：“来，我们到巴士底狱去。”他将胳膊搭在她肩上，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一种迄今为止陌生的暖意向他袭来。他又找到了她。

巴士底狱原本是巴黎东部一座建有城门的堡垒。在这段日子里，它用作巨大的监禁堡垒。它共有八个塔楼，犹如石制巨兽高耸云天。巴士底狱是国王令人可憎的权力的象征。它的指挥官是贝尔纳-勒内·洛内侯爵。在他手下做事的大约有八十名残疾军人和整整三十名瑞士卫兵。夏尔指着那些售货摊的屋顶，它们沿着宏伟的外墙搭设起来。商贩们似乎并没有因为几百号起义人员踩踏他们的桌子和商品而受到打搅。不，他们甚至还帮助其中的一些人爬上围墙。那些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了第一个前院，然后放下吊桥。洛内很快失去了镇静，叫人用大炮向人群开火，而那群人此刻正满怀必胜的信念冲向院子，准备放下第二座吊桥。他酿成了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夏尔、丹曼莉和亨利正想往后退，可为时已晚。两支开了小差的卫兵连向他们迎面而来，封锁了大街。这

些逃兵将大炮瞄准巴士底狱。突然，洛内出现在一座塔楼上，挥动白手绢。不一会儿，一名瑞士卫兵将一支长矛和指挥官的一封信塞进一个炮眼。洛内愿意投降，请求以能够顺利撤退作为对策。起义人员同意了他的请求。可他还没有走过巴士底狱的最后一座吊桥，就遭遇来自四面八方的刺刀的围剿。尽管浑身的伤口都在流血，可洛内仍然坚强地继续缓缓而行。突然，他发出鬼哭狼嚎，对着四周挥拳踢腿。他踩到了一个厨师的下身。厨师枪杀了洛内，拔出军刀，开始切割洛内的头颅。可他的军刀太钝，最后他掏出小刀，切下了他的脑袋，仿佛它是一块香肠一样。鲜血就像哗哗流淌的喷泉喷向空中。厨师拿出长矛，刺入洛内的头颅。起义人员继续行进。大街重新畅通无阻了。

丹曼莉闭上了眼睛。这样倒好，因为一路上他们还碰见了其他被刺穿的头颅和残缺不全的尸体。夏尔朝亨利瞥了一眼。亨利似乎无动于衷。这些恐怖的行为虽然可能令他感到震惊，但它们既没有让他悲天悯人，也没有败坏他的兴致。他说："你说得对，爸爸，这不是起义，这是一场革命。"

起义人员想到了数以百计的囚犯，想把他们从巴士底狱地窖那些黑乎乎的土牢里解救出来。可牢房里几乎全都空荡荡的。他们只是在舒适亮堂的楼上牢房里发现了几个囚徒：七个小偷小摸的犯人。多纳西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已不在那里。他长达好几周地请求民众帮助他。"帮帮我们吧，他们在屠杀囚犯！"他经常如此吼道。这一切纯属杜撰。他因此在几天前从巴士底狱被移送至沙朗通-圣莫里斯疯人院。他只留下了一部以极小的字体写下的稿子，书名为《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

夏尔忽然看到左手上的血迹，是从丹曼莉身上流出来的。有人用长矛刺中了她。"跟我来，我给你看下伤口情况。"他说。

丹曼莉抬头望着他，不相信地问道："你能减轻我的疼痛吗？"

夏尔感到很惊讶。难道她不知道他是巴黎刽子手吗？处决达米安时他以为观众中有她，难道有可能是他当时搞错了吗？

他带着丹曼莉回家。亨利还想待在那里不走。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药房。丹曼莉躺在床上，她显得疲惫不堪。

“你得脱下衬衫。”他说。

她毫无羞怯地脱下衣服。长矛从她左乳下面轻轻穿过。伤口不深，夏尔给她的伤口消毒，包扎上一块干净的纱布。“我早就盼着我们重逢了。”他低声说，坐在她身旁。

丹曼莉点点头，似乎想说她也在盼望着。

“我们俩都变老了，我有了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可没有一天我不是在想你中度过的。有时我在你学校门口等着。”

“我知道，我当时必须回暹罗去。可我又回来了。我想见你。这是我们的宿命。”

“你说我们的语言真的很流利，你有语言天赋。”夏尔微笑着。

“我可以记住一切。一个单词只要听过一遍，我就永远不会忘记。”

“你是想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还是马上回暹罗？”

“我或许再也不回暹罗了。我的家人希望我留在巴黎，我可以多为家人考虑。我的家庭穷困潦倒，没有热比云神甫定期偿还费用的话……”丹曼莉欲言又止，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这对我来说很难。我想重新见到我的家人，可我必须待在这里。我到巴黎来是为了学习，而我现在却是热比云神甫的使女。他喜欢暹罗的饭菜。”

“我要和他说说吗？”夏尔问，“你也可以到我这里干活。我们要把植物和药草弄干，从中制作出药物来。”

她摇摇头。“别跟热比云神甫说，他会生气的。不能让他知道我们见过面。”

夏尔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可他不想使丹曼莉陷入困境。“我再也不想和你失去联系了。”他最后说。

丹曼莉点点头。“我现在得走了。热比云神甫不喜欢我离开太久。”

她站起来，目光里含着遗憾，低着头，双手托住下巴。她好想再待上一会儿。即便她早就离开了院子，夏尔依然目送她好久。

从现在开始，夏尔成了一个着了魔似的人。他的思绪一刻不停地围绕着丹曼莉转动。他看到她的微笑、她的眼睛，他神思恍惚地暗自微笑。他希望天天看到丹曼莉，他希望她能住在他家里。他的愿望太过强烈，他完全没有想到究竟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巴黎，一场大地震即将来临。在唯一的一次夜间会议上，国民议会取消了贵族的税收特权、狩猎权、捕鱼权以及贵族原本拥有的司法权。一切都被取消了，甚至包括教会什一税。整个欧洲惶惶不可终日，因为只要法兰西国王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那么所有其他国王也将面临同样的厄运。

拉法耶特侯爵是国民议会副议长，同时领导着国民军。组建国民军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住巴黎的起义人员，并设法保护好国王。拉法耶特时年三十一岁，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统帅，曾站在乔治·华盛顿一边为美国独立战争而战，并且成了大西洋两岸的英雄。他提交了根据美国《独立宣言》范本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初稿。当年曾经提携过他的并不是小人物，而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所有报纸热情洋溢

地刊登宣言的全文。夏尔将宣言逐字逐句写入日记中。人人拥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这真是妙不可言的思想。

可是仅仅剥夺贵族和僧侣的权力，远没有达到人们的目的。他们认为给一棵树装饰上蓝白红的法兰西国旗色，并给它命名为自由树还不够。他们想要更多。他们反感的是，现在所有权力掌握在国民议会而绝不是在起义人员手里，而这些起义人员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着商店和宫殿犯下烧杀抢掠的勾当，还散布谣言说，外国军队为了要救出法国国王，已经向法兰西方向进军了。不久，一支群龙无首的队伍形成了，他们向凡尔赛方向进发，对卫兵采取突袭，直至闯入国王的寝宫。他们强迫正在和其家人用膳的路易十六将三色旗贴在他的帽子上，然后跟他们一起到巴黎去。他们想将国王带在自己身边。谁也不去关心躺在宫廷花园里的士兵尸体。仿佛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权刺杀国王卫队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有一部分起义暴动人员一如既往地希望处决所有富人，收缴他们的财产。有一些人则更为激进，他们要求取消私有制，并要求对任何他们认为不爱国的人判处死刑。

在一次由三万多人参加的凯旋队伍里，巴黎的公民们带着他们的国王走进首都街头。路易十六变成了臣民，因为他总是犹豫不决，不作出任何决定。可就在国王失去尊严和权力的同时，他恰恰也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失败使他有了人性，夏尔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心里萌生的一个想法，让他难以入眠。他在半夜里起床，给总检察长罗德雷写了一封信。人权宣言的通过使他有了勇气。有了改变的勇气。

只要时间允许，夏尔就会拜访耶稣会修道院。可是修道院的人总是让他等在入口处，回复他说，热比云神甫正在祷告。一个真正虔诚的人。那么丹曼莉人呢？据说她工作期间不能接待私客。那么她何时结束工作呢？答曰每天都不一样。他得问热比云神甫，可是刚才已经提到，他总是在祷告。

一个细雨蒙蒙的星期五下午，有人敲响了桑松家的大门。夏尔本能地以为是丹曼莉，急奔到门口。令他大失所望的是，站在他面前的是国民议会的一名议员，腼腆的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医生。他的来访让夏尔感到荣幸，因为吉约坦医生和御医安托万·路易医生可是一对好朋友。作为皇家委员会成员，吉约坦正在研究根据弗朗茨·安东·梅斯默尔的学说发展起来的动物催眠术。作为法国共济会会员分会的创始会员，他始终是谣言四起的对象。

夏尔请他进药房，给他提供喝的东西，可客人烦躁地拒绝了他的好意。吉约坦坐在夏尔对面，等着他将注意力完全集中起来。“我看了您写给总检察长罗德雷的信件。您要是把这封信同时寄给昆廷就好了，他因为这个感到非常气愤。”

“昆廷？”夏尔问，“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

“对，”吉约坦回答，“他也申请了检察官的职位。他是继承到了这个职位。不过天哪，请您别再称他为富吉埃·德·坦维尔。他自称安托万·昆廷，以掩盖他的贵族出身。巴黎的民众是难以估量的。时代就这样变了。我们这就谈谈您的信件吧，先生。这封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因为我们也在研究解决处决的人道主义问题，不论被处决者是怎样的身份。”

“这是难以实现的，”夏尔回答道，“因为即便所有的罪犯都是被刀剑处死，这种处决和其他处决永远不会有任何迥异之处。绝大多数人都会颤抖，他们嘴巴干燥，无法说话，突然坐立不安，导致行刑人员难以完成干净利落的刀口，尸首无法分离。为了遵守法律，行刑官必须完美地掌握自己的手艺，而被处决者务必保持安静。”

“这个要求有点过了。”吉约坦彬彬有礼地喃喃道。

“另外一点是费用。每次行刑完，刀没法再使用了。把满是缺口的刀磨快和打磨是不能接受的。有时刀还会断裂，如果把断裂的刀刃投向公众或者击中站在身边的助手，就有可能出现恶性事故。这是一种非常残暴的处决方式。您得好好想想，一旦第一刀刺过去没打中，头部的一个个肌腱组织还和躯干黏附在一起，一名助手必须用刀将它切开，直至头颅最终脱身。这是可怕的屠杀。我头一年当刽子手，一次需要四次尝试。我在想，如果还要做第五次尝试，民众一定会用私刑处死我。”

“究竟哪种处决方式最人道？哪种处决方式符合我们的革命理想？哪种处决方式可以缩短被处决者的痛苦？”

“最好应该是那种可以操纵断头铡的机器。每一个罪犯将忍受一模一样的处决方式。死刑执刑官只需解开卡住斩首刑具的销子。”

吉约坦微微一笑，随即露出一口褐色牙齿，它们不由得让人想起那腐烂的园圃篱笆来。

“我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模型，”夏尔说，“托比亚斯·施密特会帮我。”

“拜托您了，”吉约坦说，“两周后我再到您府上来看看。”

次日，夏尔长时间站在耶稣会修道院门口似乎有了回报。一辆马车缓缓而来，热比云神甫从车上下来。他已经年迈。夏尔立马冲到他跟前，叫他的名字。

“巴黎先生！”热比云神甫会心一笑，指了指楼梯口的那棵自由树。树上装饰着蓝白红的彩带，还戴了一顶红色自由帽。“您知道那上面是什么吗？”

“不，”夏尔不耐烦地说，“我得跟您说话。”

“这是一只象征自由的红色圆锥形帽。革命者们误以为这只红帽子在古希腊罗马时期是由获得自由的奴隶戴的。但不是这么回事。”热比云一边说，一边和夏尔一起进入修道院的入口大厅。“那些人没受过教育，煽动革命。这是太阳神密特拉的帽子！这是吉约坦大夫给我们捣的鬼。共济会成员不相信上帝，他们相信神圣的力量，相信太阳是我们这座星球上一切生命的源泉。实际上，他们这样的信仰并非全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有光明之神。就连佛陀头上也戴着一顶光环，太阳花冠。可是光有太阳你没法挣到钱。宗教需要一张脸。而一张脸需要一份光彩照人的生平业绩。萨德侯爵可以向您证实这一点。您知道他的书吗？”

“我想跟您谈谈丹曼莉。”

热比云神甫请夏尔到他的办公室去。“那好吧，我让您感到无聊了。我能为您做什么，巴黎先生？”他有趣地问道。

“我要找个人帮我照应我的药房，”夏尔直截了当地说，“我就想到了丹曼莉。”

“哦，”热比云神甫自负地答道，“刽子手恋爱了吗？是我搞错了，难道您结婚了吗？”

“丹曼莉上我那里干活究竟可不可以？”

“很遗憾不可以，”热比云神甫说道，“暹罗国王亲自把她送给了我。为了偿还国债，国民议会决定将教会的所有财产充公，自此以后，我唯一剩下的就是她了。现在，我们的革命者要发行有利息的公债，他们将它称作有价证券，并且用掠夺来的教会财产作担保。可谁还敢相信这种纸头？难道真如伏尔泰所说的那样，‘任何纸币总有一天会拥有它真正的价值：零。’您瞧，我正在看伏尔泰的书。”

“我会付钱给您，”夏尔以庄重的声音说道，“这样您可以另请一位

使女。”

“您究竟用什么付我钱？用那个有价证券吗？它们已经贬值三分之一了。这种刚出炉的纸币一开始可以刺激经济，可现在他们又抹去了这种有价证券的利息。您想用什么付我钱？用黄金吗？个人拥有黄金最近又被禁止了。谁也无法防止通货膨胀。”

“拥有奴隶也是禁止的，热比云神甫！”

热比云哈哈大笑。“什么时候开始禁止为教会服务了？顺便说一句，我们的革命者不关心女性。平等、自由、博爱，女人被排除在外。必须承认，这里稍稍缺少一点逻辑，但我们的革命者现在就是这样。您究竟对革命持什么态度？”

“我希望我们的国王能够认清时代发出的信号，按照英国榜样知足于君主立宪制。唯有如此，他才能安然度过这次革命，作为我们这艘神奇船只的船头雕塑。”

“您知道我在做什么吗，巴黎先生？我在畅饮最好的葡萄酒。法国修道院里的所有神甫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我们不再祈祷，我们酗酒。”他在桌子上敲了敲钟。不一会儿，门打开了，丹曼莉进来了。“给我来一杯加桂皮的咖啡，”他说，没有抬头朝她望一眼，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夏尔身上，“不过稍等，你待在这里，直至巴黎先生离开我们修道院，否则他还会想引诱你。”

丹曼莉寻找夏尔的目光。

“巴黎先生，”热比云说，指了指门口，“很高兴再次见到您。但我更高兴的是以后不再在这种茅屋里见到刽子手。”

夏尔又一次抬头看着丹曼莉，和气地微笑着。他没有理会热比云的

咯咯笑声。他离开了修道院，一头扎入他的药房里。稍后，有人敲了敲房门。玛丽-安娜探头进来。“明天我和狗们一起看妹妹去。她需要帮助。或许我会待上几个星期。”

夏尔点点头。玛丽-安娜又在门口站了会儿，可他还是沉默着。当外面过道里不再听到她的脚步声，夏尔找出日记。“巴黎在纸币中窒息而死”，他写道。“他们付给我纸币。可我的助手们不想再要纸币了。然而，革命者印刷越来越多的纸币，好为新的债务筹措资金。因此，那些所谓的有价证券还会失去更多的价值，而人们开始储藏食品。价格疯涨，任何法律都无法阻止它。人们无法凭空创造出钱币来。纸只是纸而已。”

听到琴声飘入耳朵，夏尔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他把日记搁到一边，坐到客厅里加布里埃尔身旁的凳子上。他们一起弹琴，不需要任何其他语言。

第二天，夏尔到托比亚斯·施密特的工场去。他敲了敲门，可没有人回应，尽管他可以听到里面清晰的锤击声。夏尔径自走进工厂的老车间，站在原地不动。他大着嗓门向施密特问好，后者被吓了一跳。他还穿着睡衣。车间的墙上塞满了已成为废料的木材件、金属件、皮带、腰带、铸铁制成的蒸汽锅炉以及各种尺码的细齿边木轮。墙上还挂着稀奇古怪的机器草图，尺码超大，机器的用途只能猜测。

托比亚斯·施密特马上带夏尔到了车间的后面部分。“我不是跟您说起过我在研究如何长期储存食品吗，如何不失去美味或者营养价值，而又能阻止变质变味？谁要是找到解决方案的话……”

“……就可以征服世界，我知道。”夏尔会意地笑笑。

“所言极是，”施密特坚定地说，“我在尝试煮熟蔬菜和水果，然后

把它们储存到铁皮罐头里。可我还没有找到焊接罐头使之密封的解决办法。为具体的食品找到最佳的沸点也并不容易。这需要好多年时间。好多年！”施密特在一个大锅里搅拌，那里面的苹果飘浮在沸水中。“我的实验需要成千上万只罐头。目前尚不清楚，蔬菜最好应该储存在油里还是醋里，是酒精里还是糖汁里。而结果最早要在两年后才能看得到。”

“我想和您讨论一个更小的项目。”夏尔说。

“难道我让你感到厌烦了吗？我很抱歉，可我已经好几周见不到一个活人了。”施密特迷惑地摇摇头，佝偻着身子拖着脚步走过车间。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沙发罩子已经裂开。白花花的鸡毛露了出来。

夏尔走到他跟前。“吉约坦大夫找过我了。”

“这个共济会成员。我跟您说，他们想要指挥革命。这个还会发生的。他们首先要废除僧侣，然后再废除上帝。因为现在一切必须得到合理解释。这将是我们革命的成果。罗伯斯庇尔要求一种平民宗教的理性礼拜，他计划举办一个最高的本质节日庆典。那么这个最高的本质是什么？大自然！罗伯斯庇尔声称。我们应该像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崇拜大自然。不久之后我们会在日出时跪下，感谢太阳给了我们光明。”

“施密特先生，”夏尔坚持要把话题转过去，“我必须跟您谈谈吉约坦机器的事。”

“好好，我在报纸上看过他提出的想法。人道的杀人机器。我本来对此也有想法。人人愿意支持我的想法，可谁也不愿意掏钱。像我这样的艺术家总是一无所有，唯有依靠我的钢琴的收入才够购买新的铁皮罐头。”

“如果您发明出一种以同样的手段杀死任何人的机器，那么您将会成为富翁。你有没有兴趣，出份能让外行也能看得懂的草图？”

“好好，”施密特激动地说，“我有很好的想法，如果能让我拜访宫廷的话，那就太好不过了，我就可以向国王说明如何保存食品。他可以带着军队远征俄罗斯，到非洲或者印度，军队还能总是粮食充足。他是那么喜欢发动战争。”

“施密特先生，现在只谈杀人机器的事。假如您的设计方案被采纳，那么您也许可以为每个省建造这样一台机器。”

“哦，那就是我毕生的生意！我对新机器有那么多的想法，可没有买材料所需的资金。我会永远感激您的，先生，还有，我会给您分红。”

夏尔微微一笑。“您的友谊是对我的最好回报。”

“加布里埃尔的情况怎样？”施密特问。

“他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也没有变得更糟糕。因为走得多，肌肉更有力了，走起路来也更稳了。”

施密特拉动一根从天花板向下吊着的绳子。可以听到远方一只闹钟铃声响起。绳子沿着天花板通往墙边，接着从墙上的一只孔眼通往另一个房间。稍后，一名约莫六十岁的胖女人出现了。她走路时不停地来回摇晃。夏尔马上注意到，她的胯部有过损伤。

“给我们拿红酒来。”施密特说。

“可您从昨天早上到现在还一直没吃过东西。”

“你是我的大夫吗？”施密特呵斥她，“我雇的是一名使女。然后我还需要一只面包，而且要快。我把胃吃坏了。”

“又吃坏了吗？”女人叹息道。

夏尔给自己买了一本新日记本。自从写完了那些练习本之后，他一直把日记记在书上。他记下了许许多多的犯罪者：一名制作纽扣的人，一名马贩子，一名宫廷仆人，一名锁匠……他写满了两页的名字。那是星期一。到了星期二，写上了三页。许多死刑判决看起来非常可怕。可这些判决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巴黎街头和农村的不幸太多。贫穷创造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被处决人数急剧上升。夏尔执行判决时表情淡然，可他对这些即将被处决的人绝不是无动于衷的。相反，他对他们寄予同情。他不明白为何挤在绞刑架四周围观的公众们很少表现出怜悯之心，他们所有的人不是都在分担同样的痛苦吗？假如没有亨利，夏尔恐怕早就丢下一切不管了。可他想到，如果儿子真的想要接任这一职位，那么他应该按照规矩移交给他，而且在总检察长同意更换之前，还得一直站在绞刑架上。

一天，他们下班回家，托比亚斯·施密特和加布里埃尔坐在客厅里弹琴。“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把他称作有天赋之人。”施密特赞许地说。

欣闻此消息，夏尔向加布里埃尔致意，在他的额头上慈爱地吻了一下，然后请施密特进了药房。施密特从口袋里摸出一本书翻开。“您瞧，巴黎先生，这是阿希尔·博基作于1555年的一张图。它显示的是一根木头框架，它由两根平行的垂直木柱组成。在有凹痕的柱子之间挂着一把尖刀，它用一根绳子固定住，可以阻止其落下来。只要绳子自由的一端松开，断头台就会呼啸着在两根柱子之间落下，将不幸者斩首，他的颈项恰好处在断头铡瞄准的地方。”

夏尔仔细看着那张图，稍后说道：“这个还不够。问题在于，死囚犯临死前无法保持平静，他们一跪下，马上失去支撑。正因为如此，必须强制性地固定住他们的身体，这样一刀切下去才会干脆利落，否则必将以一次大屠杀告终，而围观者看到这种场景也不会感到高兴。”施密

特点点头。夏尔从他眼里看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新方案，于是补充说道："快点了！如果我们不干，路易和吉约坦这两个大夫就要设计机器了，可我是站在平台上面的人，一旦机器无法运转，我是要承担责任的。施密特先生，我相信您。"

施密特微笑着。"没问题。这事我会去研究。而且就在今天晚上。不过我们可不能完全没有音乐就度过今晚的时光。"他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坐到钢琴旁。弹到第三首曲子时，施密特突然停下了。"我有解决方案了！您让我回家吧。我必须画个草图出来。"说完急匆匆地走了，消失在大街上。

夏尔和亨利一起到了药房。他们喝着酒，谈起了那台新机器。夏尔解释了具体细节。

"它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亨利说，"但它始终还需要一个人，他凭借自己的到场证明其合法性，还要操作机器。"

"是的，但它不再带来正义。你虽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处死所有的人，但或许被你处决的那个人是受了冤枉。也许他是无辜的，也许这个判决是被收买的。如果你杀死了某个人，那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对此我们没有责任，爸爸。"

"有可能是，亨利，也有可能不是。任何判决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我们运用法律，但不主持公道。"他很突然地问道，"你还记得来自暹罗王国的那个女人吗？"

"那个扛着银色大炮的姑娘？"

"她不是姑娘，亨利。暹罗人不像我们长得那么老。他们吃的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不会那么胖，他们的皮肤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弹

性，显得青春永驻。她叫丹曼莉，我想再见到她。”

亨利注视了父亲良久，然后说道：“你爱上她了吗？”

“亨利，”夏尔几近起誓般地说，“爱情不分年龄。在此之前我只是从道听途说中认识到什么是爱情。我的整个一生都在做别人要我做的事，家庭要我做的事，社会要我做的事，而现在，因为爆发了革命，自由的渴望已经在我的心里点燃。我也想要一种全新的生活。”

“妈妈知道这事吗？”

“不，亨利，和她说这个毫无意义。”

玛丽-安娜在妹妹家里待了好几周，一起帮着照顾病危的妹夫。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得了什么病。他难以呼吸。渐渐地，只要在床上坐起来，他就会吓得说不出话来。结果他悲惨地窒息而亡。任何一只幼犬，如果有人要把它淹死在马槽里，它会死得更快也更容易。

玛丽-安娜回巴黎取衣服准备参加葬礼，夏尔便问葬礼安排在何时举行。

“他们没邀请你，夏尔。他们不希望有刽子手出席葬礼。”

他无言以对。他帮她把几件东西装进马车，她只是勉强同意了。当她消失在大街的尽头时，夏尔终于舒了口气。生活本来可以如此平和，他想到，然后走进药房把月桂叶捣碎。他突然发觉有个念头萦绕在脑海里：他悄悄地希望丹曼莉下次去集市时能够顺便到他那里去。可或许她在担心暹罗的家人失去热比云神甫的定期资助吧。夏尔好想承担这个角色，可他该如何向她倾诉衷肠呢？他日思夜想的就是她。即便只是在白日梦里让她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可他感到自己平静而安全，那是一种从孩提时代至今从未有过的感觉。尽管丹曼莉无法为他做任何事，可她

给予他所渴望的一切。她只是必须待在那里。没有别的。

有一天，夏尔刚从院子的水井边洗完澡回来，看见她站在药房里。她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装着软膏的小容器。

“你怎么进来的？”夏尔吃惊地问。

“从门口。”她调皮地微笑着。

他慢慢向她走去。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着她，可突然又羞怯地垂下目光。他不想让她有任何难堪，于是指给她看那些小陶罐。“那是紫杉根。我们这里有百里香、蜜蜂花、莳萝。这是烧成炭的芦苇杆，用于治疗坏死的身体细胞组织。这些植物和药草生长在我的花园里。我把它们捣碎，然后用油或油脂搅拌，就可以做成软膏或者浸剂。你可以帮我忙。”

突然，她拥抱夏尔，紧紧地拥抱他。“昆底，”她说，“我很痛。”她的眼里噙满泪水。

夏尔请她躺在床上，给她检查。她脱下衬衫时闭上了眼睛。伤口已经有了轻微的炎症。夏尔给她消毒，抹上可以治疗伤口的软膏。他闻到她擦遍全身的一种微甜的油味。她坐到床沿，将他拉到身边。她希望他坐到她旁边，她抓住他的手放到她怀里。她微笑地注视他。“这样挺好。”两个人朝外面的院子里张望。

“昆底是什么意思？”夏尔问。

“好男人。”稍后她说，“热比云神甫又要到暹罗去了。他得给我们国王带去天文仪器。他被任命为你们国王的御用数学家，将在暹罗观察星空，以便编制新的航海图。将来有一天，你们国家会用到这些航海图，派去许多船只登陆暹罗，好征服我们的王国。我们的国王以为你们

的御用数学家都是他的朋友。可是热比云神甫对星空并不感兴趣。他喜欢年轻的男孩女孩，所以他要到暹罗去。他又想带我一起去。可我不想。我讨厌他。”说完她投入他的怀里，像个孩子似的嚎啕大哭。

夏尔亲吻她的额头。“你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丹曼莉……”

她不让他继续说下去。“我不久会回来。”说完她突然站起来，奔了出去。

第9章

清晨，夏尔走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查看下午是否有行刑任务。他从庭院的左边爬上螺旋楼梯，敲了敲那位新任检察官的房门。他对再次见到安托万感到好奇。

“还得等些时候，”有人在他后面说到。夏尔转过身去。记者高萨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墙边凹角处走出来。“里面没人，但他喜欢有人等他。”

“您怎么会在这里？”夏尔问，怀疑地打量高萨。

“他让我心神不宁。可能他不喜欢我的文章。他要告诉我今后我该写些什么，以满足新闻自由的要求。我会写他继承了一笔小遗产，以此买下了一个检察官的职位，又把剩下的钱花到了美酒和女人身上。等到他重新清醒了，又把他富有的表妹搞大了肚子，一共五次，而自从他个人破产之后，他开始极端讨厌富人。”

“那您想把它写下来吗？”夏尔怀疑地问道。

“认真对待新闻自由的人，将会躺在您的绞刑架下，巴黎先生。您知道吗，很多革命者是因为自身的失败才形成了他的思想。可像安托万·富吉埃这种人，您完全可以送给他一个养鸡场，却没有一只母鸡可以生出一只鸡蛋来。您可知道，那个坚定不移的卡米耶·德穆兰是他的表弟吗？德穆兰为他谋得了检察长的职位。”

夏尔重新敲门。

“谁？”安托万·富吉埃叫道。夏尔踏进他的办公室。富吉埃马上向他伸出手掌，好让他明白得再等会儿。他正在和总检察长罗德雷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富吉埃变化很大。他的脸上写着失败的愤怒。这不是一张英俊潇洒的脸。他长得就像是一只老鹰，形容枯槁，鼻子尖尖长长又弯弯曲曲。他的嘴唇不会比一笔画出的线条更宽，仿佛从他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的吝啬似的。他蓄着连鬓胡子，而这连鬓胡子修剪得太狭窄，

反倒使他的脸形显得很长。安托万·富吉埃很可怕。因为当人们赋予那些饭桶权力的时候，他们大多毫无仁慈之心，冷酷无情。他当着罗德雷的面大吼道："如果不想彻底消灭这种无赖，您究竟想要拿这种社会渣滓干什么？难道您还想浪费国家钱财供养他们在我们的监狱里吃上五十年吗？巴黎有些正人君子过得可没那么舒心，能吃上面包，喝上菜汤就很知足了。"

"我们派他们到我们的海外殖民地去。您为何要杀死一个还能在我们的矿井里干上四十年活的人呢？"罗德雷朝夏尔看去，向富吉埃暗示，有这个人在场，他不想再讨论下去了。

和罗德雷和富吉埃一样，国民议会里的绝大多数议员也是法律行家。难以相信的是，究竟有多少在外省混不出人样的律师来到了巴黎，千方百计地利用机会去巴结革命者中的领袖人物。当然，他们所有的人都想成为领袖，谁也不想做个普通公民，而且所有的人都将政治视同为权力和金钱的跳板。绝大多数人对革命理想完全无所谓。他们沾沾自喜于成为大人物的感觉，享受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革命。

"他是刽子手吗？"罗德雷轻蔑地问道。富吉埃点点头，然后冷笑着朝夏尔看去，他显然在享受这样的场景。相反，罗德雷是属于这种人：从不微笑、不会白白浪费善意，不会把任何表情带到生活中。他的脸上始终不动声色，不管他听到的消息是快乐还是悲伤。可他的目光似乎在说：你想干嘛，你这个混蛋？他可以把这种表情演绎得惟妙惟肖。他总是咬紧嘴唇，好像刚好有人侮辱过他或者有人在狠狠地反驳他。他看起来很紧张，心里很郁闷。

富吉埃转身面对夏尔。"我们没有你的工作，桑松公民。顺便说一句，下次你要给我写信的话，拜托把我的名字写对了。若是下一回再发生这种事，恐怕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辱骂。不，下一回我甚至肯定理

解这是一种辱骂。”他严肃地注视着夏尔，又补充道：“将来我们要支付给你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我们有那么多。”他哈哈大笑起来，手指向门口，“你可以走了。我们毕竟不会把整座城市的人统统处死。”

夏尔本想说点什么，扯扯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旧时光，可他发现富吉埃想和罗德雷单独待在一起，而且明明他们一起上过鲁昂的同一所学校，可富吉埃并没有重视和夏尔之间的同窗情谊。出门时，他听到罗德雷说，大概过不了多久法国的刽子手都要失业了。

高萨还一直等在外面。

“您喜欢就可以写上，今天没有行刑。”夏尔说。

高萨呵呵笑了。“因为您去过那里，或许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您是赞成还是反对死刑？”

“拥有看法没人付钱给我。”

“我的读者会对此感兴趣，”高萨装作发出很痛苦的声音，“巴黎先生是怎么想的？他们想知道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刽子手像您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地登场。您是一个机构，嗯，让我们合作吧。也许您需要我的帮助。”

“很遗憾，”夏尔说，“我按照规定行使我的职责，但在其他方面，我不会对公众感兴趣。我不喜欢成为公众兴趣的焦点。”

“那么说您拒绝接受我的美意了。”高萨拿腔拿调地说。

“不，先生，我不想当众冒犯您。”

“哦是的，哦是的，您拒绝了我的美意。”夏尔爬下旋转楼梯时，高萨从后面叫道，“也许不久之后您将会更多地成为焦点人物，您都受不

了的那种。”

夏尔并没有直接骑马回家。他绕了个大弯，去了蒙马特高地森林。然后，他寻找塞纳河的河岸，坐在堤坡上。他五十二岁了，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最近一段时间，她在他眼里已然陌生。他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心，可首先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感到担心。他努力为自己鼓起勇气。假如死刑真的被取消，他肯定不会马上失业，他想到。总是需要刽子手和助手给刑事犯罪分子打上火印，或者将偷窃者绑到耻辱柱上。有人还得一大清早赶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拿判决书，然后在当天晚上对他们行刑。也就是说，他不会失业，但他会比之前挣得少，此外国家支付给他的是有价证券。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艰难。夏尔决定把他从不使用的那间小工具棚出租给年轻人。他们前段时间还问过他，是否可以把他们的印刷机安装在那儿，然后印刷传单。传单已经成为很时尚的东西。他们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托比亚斯·施密特画了一张新草图，很自豪地展示给夏尔看。“我尝试过制造一台非常简便的机器，”他解释道，“连任何傻瓜都能操作的机器。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傻瓜操作它。您，巴黎先生，您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刽子手。”

“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夏尔不为所动地说，“有一些人，他们手脚笨拙，哪怕有了斩首的刑具也干不出漂亮的活儿。”

“这是重量和下落高度的问题。如果呼啸着下落的斩首刑具足够沉，那它会成功的。我们可以用尸体作下试验吗？”

第二天，夏尔将此消息告知了吉约坦博士，吉约坦立即赶过来了，请他们解释这张草图。他几乎怀着孩童般的兴奋，仔细察看这个设计。“您怎么想，桑松公民，被切下的头颅还有意识吗？一个被斩首的头颅还能感觉到痛苦吗？”

“那种痛苦在一刹那间很巨大，死囚因此会失去知觉。失血过多也会带来一点不良影响。”

“那这个机器能够运转吗？”吉约坦不想让自己出丑。

“可以。它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运转，现在也可以运转。我看到有文献记载，甚至恺撒大帝时代也使用过类似的机器。”

“它真的可以运转吗？”

“我们首先用绵羊试试。”

没隔多久，吉约坦博士向国民议会介绍了这台机器。他对机器的优点大加赞赏，并且强调说，藉此可以非常接近于平等和博爱的要求了。这台机器体现了仁爱的行为。它满足了革命的需要，承认了每个人生来平等的主张。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亡，谁也不会受折磨很久。“受刑者只觉得脖子周围被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人头就从肩膀那里掉落了，”他说，“这种机械装置看起来就像闪电一样迅疾，人头落下，血流如注，人就一命归西了。”由于他用词精妙，话音刚落，国民议会里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会议宣布，外科教授兼国王御医路易大夫将撰写一份专家鉴定。一位年轻律师随后的否决发言几乎谁也没注意倾听。他名叫罗伯斯庇尔，他反对死刑，因为这是不公正的惩罚，是残暴的封建制度的残余。

加布里埃尔在弹琴，夏尔和德马雷在编制前夜被绞刑者的一份家当清单。引人注目的是，近来被判决者的头发和胡子变长了。巴雷每次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剪下他们的头发和胡子，然后把它们放进家里的一只大箱子里，再到月末交给假发制作者。所得收益将转交贫民院、养老院以及其他贫困者。

“头发变长了，可尽管如此，到手的钱还是不如以往多。”德马雷强

调说。

“假发已经落伍了。”夏尔沉思道。

“宫廷失去了影响力。从真正的革命者那里看出，宫廷已经放弃了任何排场。就像那两位美国外交官穿着俭朴的黑色西装一样。”

突然，有人敲窗户。德马雷走出门外。不久，他带着丹曼莉回来了。

“我一个人继续。”他说，重新坐回他的凳子上。

夏尔带丹曼莉到药房。“伤口现在结疤了吗？”他问。

“我不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丹曼莉说。她看起来非常严肃，“我想见到你。我可以躺下来吗？”

没等他回答，她就已经躺在书架下面的床上。她躺下来时动作有点烦琐，好像移动身子就会引发她疼痛似的。她示意夏尔同样躺下来，她握住他的手，闭上了眼睛。“别出声。”她低语道。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在床上躺了很久。

忽然，一辆车停在他家门前。夏尔立即想到是玛丽-安娜回来了，可他觉得石子路上的响声很陌生。他站起来探出窗外。那是一辆带有国王标志的马车。巴雷敲了敲门，然后叫道：“外面有人在马车里恭候您，巴黎先生。”

“叫他进来！”夏尔对着门嚷道。

“他不想进来，”巴雷回答，“他说是过来接您。路易大夫请您过去。”

夏尔走出门去。坐在马车里的是吉约坦。他显得出奇地烦躁不安。“您上车吧，”他说，“我们接到了路易大夫的邀请，准备前往杜伊勒里宫他的办公室去。他想要鉴定我们的新设计。”

丹曼莉跟在夏尔后面走到了大街上。“我会回来的。”她低声说，疾步离开了。

这段期间，杜伊勒里宫成了被关押在那里的皇室家庭的居住场所。一名穿着蓝色制服的仆人陪同客人穿过巨大的大厅和前厅。昔日的辉煌早已失去了光泽。宫殿里看起来冷冷清清。夏尔从没有比在这些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更能强烈地感觉到君主政体即将成为明日黄花。相反，路易大夫的那间办公室却是装饰得很奢华，布置着贵重木材的家具，这里的家具和地毯还在清洗和保养。路易和吉约坦彼此彬彬有礼地招呼致意。

“那我希望现在看到那张设计图。”路易说。

吉约坦将图纸放到桌子上。

路易向前弯下身子。“谁加的注释？”

“桑松公民，巴黎刑事判决执行人。”

路易朝夏尔匆匆瞥了一眼，重新专心致志地研究那张图。他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突然，夏尔听到一阵细微的声响传来。他转过身来，看到墙上有一道不易察觉的门打开了。一名男子走向那道裱糊门时，路易立即站起身。他的形象威风凛凛。他缓慢而自信地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那张图。他将头稍稍搁到一边，撅起嘴唇，可无论对夏尔还是对吉约坦都不屑一顾。

“嗯，路易大夫，你对这张设计图持何意见？”他问。

“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

“我很怀疑，”那名男子说，“一个圆形的断头铡是否适合于每一种脖颈。每个人的脖子都有不同的尺寸。”

夏尔本能地瞧了瞧那名男子肥胖的脖子，心想圆形的断头铡真的不合适。

“他就是这个人吗？”他问，头指着夏尔的方向，却并没有朝他那里看。

“是的。”路易答道，然后毕恭毕敬地低下头。

“你问问他，他如何把最好的断头铡设想得最好？”

路易转身对着夏尔说：“您听到了问题。请您回答。”

“他说得对，”夏尔说，“半月形的形状有时候会制造意想不到的困难。”

尽管他的淡蓝色马甲上并没有戴上任何勋章或者其他奖章，但这名男子无疑就是路易十六国王。他满意地微笑着，在这张图纸上添加上有力的线条。他修改了半月形刀刃，直至断头铡显示一把斜口坠下的刀，它在掉落时将会实施一次切割运动。“我可能会搞错，”国王微微一笑道，“你可以试试。”他彬彬有礼地和夏尔握手，随后无声无息地穿过裱糊门消失了，正如他来时无声无息一样。

国王提出的修改倡议，让夏尔豁然开朗。他想，现在哪怕放进去一只牛脖子也够了。

路易大夫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催逼，要求加速制造机器，有一部分人希望尽快采用人道主义的处决方式，其他人则要求提供更多的机器，

以便可以处决更多的死囚犯。

1791年9月，几个年轻人搬进了桑松家那间空荡荡的工具棚。夏尔对租金感到很满意，尽管这笔租金也还很微薄。他们带来了一台印刷机、印刷油墨盒子以及许多印刷纸。夏尔看着他们搬进来，问其中一个人："你们想要印刷什么？有价证券吗？"

那名年轻人哈哈大笑，打开一张传单。"那是革命歌曲歌词。我们拿到皇宫去卖。它们很好销。"

"那好吧，"夏尔说，"还是一样的老规矩：租金要准时在每月的第一天支付。"

加布里埃尔被这台印刷机迷住了，只要刚好不在看书、弹琴或者在药房里帮夏尔的忙，他就会穿过院子到年轻人那里去。他们喜欢他，自从有一次他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之后，他们也会帮助他。几十年下来那个木地板已经变形很厉害了。因此，年轻人中只要有哪位看到他走过院子，都会迎上前去，扶住他的手。

夏尔非常看重这一点，他把它记入日记。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人世以后，儿子能够和朋友们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网。他在日记中还记下了，路易十六现在叫卡佩公民，他已经对新宪法作出宣誓。他失去了权力。虽然他现在还可扮演国王和代表国王，可已经没有任何发言权了。现在是议员说了算，他们想趁权力真空的时候扎下根来。他们试图展示独具风格的一面，有一部分人提出的发言要求荒唐可笑，竭力为自己推荐更高的职位。他们做出谁也无法遵守的毫无意义的承诺。一切只是为了获得重新当选的目的。新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但马路上的那些人可不希望和他人分享权力。千千万万人依然醉心于谋财害命。法制已经崩溃。只有极少数人才敢反抗这些愤怒的群众。国民议会里高雅的议员们采用各种巴结手段，只是为了自己不被怀疑为保皇派成

员，然后更多地投奔到极端的阵营，投奔到控制马路的无套裤汉阵营中。无套裤汉是激进的工人和伙计，和贵族们不同的是，他们不穿灯笼裤，而是穿着很实用的长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给自己取了个“无套裤汉”的名字。

谁也不会更持久地保护人们通过浴血奋战而取得的自由权。和君主制度期间一样，人们重新听命于同样的专制统治。街道的无政府状态取代了古老的秩序。谁也不会再喜欢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学说。突然之间，任何一个不在大街上扯开嗓子表达思想的人都会遭致怀疑。举报告密业欣欣向荣，有些告状可以清偿早就该支付给邻居的一份账款。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快接近法国边境了。国王企图逃跑，穿过封锁奔向正在蜂拥而入的军队。可是国王铩羽而归。他重新遭到拘押，作为惩罚，他几个代表性的职务被临时解除。

“你把什么写进这本书里了？”丹曼莉一边问，一边心不在焉地在一个研钵里将干树皮捣碎。

“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的事。”

“你在里面也写到我，写到我们了吗？”

“没有，”夏尔说，“这我不会在这本书里透露。”

“我可以在这里睡上一个小时吗？”

夏尔点点头。“你在耶稣会修道院里没法睡觉吗？”

丹曼莉无精打采地微笑着，坐到了床上。夏尔又一次注意到，她避免移动某些部位。

“你哪儿有痛？”他问。

丹曼莉看起来很惊讶。她摇摇头躺了下来。夏尔在他的日记本上继续写着。那么多东西必须记录下来。“巴黎在挨饿，”夏尔说，“我现在要把它写下来。”

“修道院里没人挨饿，”丹曼莉说，“神甫们的储藏室里有的是充足的粮食，可他们不会和穷人分享一粒粮食。他们布道时喝水，之后再喝酒。现在我总算弄明白这句格言了[1]。神甫们晚上喝很多酒，常常酩酊大醉。有时他们甚至争吵不休，而且声音很大。他们害怕未来，他们害怕革命，害怕马路上那些饥饿的人们，害怕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外国军队，害怕货币失效，他们害怕一切，除了上帝。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了。我有时对着他们的上帝祷告。佛不会有妒忌心。”她微笑着，“躺在我身边，然后闭上眼睛，我马上得走了。”夏尔于是躺在她旁边，紧握她的手。伏案写作太久，把他累坏了。

他重新醒来时，丹曼莉已经走了。他很认真地想了想，是否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加布里埃尔站在药房里。“妈妈回来了，”他不安地说，“她在外面的院子里。”

“丹曼莉在哪儿？”

“她听到院子里的马叫声，迅速离开了家。”

夏尔走到外面的院子里，洗了洗头。玛丽-安娜正在给她的马刷洗。她并没有和夏尔打招呼，只是朝他匆匆望了一眼。“睡得好吗？”她带着责备的语调问道。因为她本人只需要很少的睡眠时间，她讨厌所有需要更多睡眠的人。夏尔未予回答。他知道这种小把戏。

玛丽-安娜怀疑地打量他。“刚才是你的那个暹罗女人吗？”

夏尔点点头，走进厨房。玛丽-安娜跟在他后面。助手们在场不会打搅到他们。

“她多大了？”此刻她的脸上写着痛苦。

夏尔坐到桌旁。格罗已把所有人的汤分好了。

“我没有问过她。”夏尔说。他拿起一把勺子，可马上又放下了。汤太烫了。

“她年轻吗？”

“你不是看到她了吗？”夏尔喃喃道，此刻舀了一口汤放进嘴里，“刨根问底干什么？”汤的味道棒极了。他本想夸奖格罗两句，可还是没说。“她叫丹曼莉。”

“丹曼莉？怎么会叫这样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在暹罗听起来或许也不是非常亲切。”

玛丽-安娜坐到桌旁，气氛马上变得如弓上弦。助手们对他们夫妇之间的讨论渐渐感到尴尬起来。他们彼此交换着眼色。

“我们很久没有夫妻生活了，”夏尔说，“你从来不关心这个。我有了人，你为何现在变得有所谓了？你不是有你的狗吗？”

“你跟我在一起不快乐，是吗？”她窝火地问道。

“我不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感到快乐的男人。一句善意的话有时要比一碗热菜汤更重要。”

玛丽-安娜忽地从凳子上跳起，怒气十足地离开了餐厅。巴雷不禁

咧嘴笑了，看了眼正埋头喝汤的菲尔曼，想把自己的笑声压下去。德马雷把自己的盘子推到一边，把那份《凡尔赛邮报》拿起来看。他的脸色显得很忧悒。

“有新闻吗？”夏尔问。

“您认识那个高萨记者吗？”

夏尔点点头。

玛丽-安娜重新走进餐厅。

“哦，你又回来了。”夏尔说。

玛丽-安娜从木炉上拿走一只圆面包。“如果我不关心，你们就让它烧成炭了。”

那只面包香气扑鼻，散发出舒适温馨的感觉。可气氛依然寒光逼人。

“你给她多少钱？”玛丽-安娜问。看到夏尔不言语，她又继续问道：“难道你根本不付钱给她？”

“你骑马赶远路过来，就是要问我这些问题吗？”

“不，我给你送这份报纸过来。否则你是巴黎唯一蒙在鼓里的人。”

德马雷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将那份报纸推到夏尔身边。“您看一下那篇社论，”他语气坚决，意在让夏尔听他说下去，“高萨文章里写到，保皇派准备策划一次旨在取消革命的颠覆活动。”

“所有的人全都这么写，”夏尔说，“好让我们忙个不停。”

“可是他写到，恰恰是法国的刽子手们准备策划那场颠覆活动。那么谁是这个国家的刽子手首领呢？”

夏尔抬头望着妻子。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看，仿佛他犯下了某种过错似的。

“他写到，反革命传单是在您的工具棚里被印刷出来的。”德马雷说。

夏尔这才拿起报纸看起来。果然如此，高萨在怀疑他，并宣布将告发这个巴黎刽子手。玛丽-安娜无言地给他们倒上咖啡。看起来她好像马上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亨利和加布里埃尔走进餐厅。站在身强力壮的兄弟旁边，加布里埃尔显得娇小柔弱，他还没坐到夏尔旁边就停下脚步。亨利箭一般飞快地站到他身后，因为他知道，有时候只要加布里埃尔太过激动，就会出现抽搐的症状，很有可能会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腿，导致摔倒在地。

“假如我有个三长两短，”夏尔说，“亨利将负责绞刑架的工作。你们，”他看着助手们，又补充道，“要像平时一样做你们的活儿。你们就像听我的话那样听他的话。”他握住亨利的手。“当心别让任何人拿走被处死者的衣服，否则我们会丢掉饭碗。”

德马雷严肃地点点头。“我们会像以往一样将清单登记在册，然后把所有的一切交给当局。您可以相信我们。”

“你干吗这么说？”玛丽-安娜满怀怨恨地问，“难道你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了吗？”她责备地注视他。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有人有力地敲响大门。巴雷站起来开门。

国民军的卫兵们冲进餐厅，将夏尔团团围住。“你被逮捕了，”为首分子说，“根据检察官富吉埃的命令。有人指控你从事保皇派的阴谋活动。”

“我至少还能把咖啡喝完吧？”

“不行，”那名官员回答，“那台印刷机在哪儿？”

“德马雷会带您过去。”夏尔暗示他的这位助手，示威性地将他的咖啡喝完，为此烫伤了自己的嘴巴。德马雷带几个士兵到院子里，而其他人则把夏尔带走了。

他们把夏尔投入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他远远地看到了黑乎乎的巨大围墙和装有栅栏的窗户，它们就像史前时代的怪物耸立在塞纳河北岸。他从未想到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危险。可现在，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这种危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人一旦有了恐惧，一切都很危险。他们顺着铁门走到院子，士兵们一把揪住他的胳膊。

“这个没必要，”夏尔说，“我没有理由逃跑。”

他们就像对待一个重罪犯那样将他带到安托万·富吉埃的办公室里。这位共和国的首席公诉人只是匆匆抬了一下头，然后做了个轻蔑的动作，示意这些士兵可以走了。安托万向后靠在椅子上，毫无感情地打量夏尔。他并没有给他凳子坐下。

“作为犯罪嫌疑分子的刽子手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谁会想到竟有这种事。”富吉埃喃喃道。

“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安托万？”夏尔问。

“安托万？你又忘记正确的称呼了吗？”富吉埃很失望，夏尔居然没

有表现出恐惧。富吉埃眼神呆滞。他的脸比之前更瘦削了，尽管众所周知的是，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他也从来不会对美酒和美食不感兴趣。“桑松公民，在你家的工具棚里我们确证有一台印刷机，那些反革命的诽谤性小册子就是用这台机器印刷出来的。”

“我不用这间工具棚，我把它出租出去了。”

“桑松公民，国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外国军队驻扎在我们的边境上，担心我们的革命会波及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的革命将征服全世界。一旦思想的时代来临，那么这种思想是阻止不了的。那么内心呢？贵族们在策划阴谋诡计，他们想要回归君主政体。可是这个君主政体，它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为什么，桑松公民，你要帮助那些想要毁灭革命成果的人呢？高萨在报纸上指称的，法国所有的刽子手已经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这是真的吗？”

“不，法国的刽子手不会有同样的目标。”

富吉埃哈哈大笑。“千真万确，每一个刽子手都有自己的目标。”

“我不知道那些年轻人在我的工具棚里印刷什么。他们说是革命歌曲，想拿到皇宫里出售。我也不对这事感兴趣。我是巴黎先生，不是某一个当局的密探。”

“你搞错了。警觉是永恒的信条。而且谁不为我们服务，谁就是在反对我们。不过请告诉我，桑松公民，你的工资难道还不够，你非得出租你的工具棚吗？”

“他们支付给我的是有价证券。等我回到家里，这种纸币已经毫无价值了。我的工资反正算得很紧。因为上绞刑架的死囚犯越来越多，我的支出增加了，但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我目前有十六个人需要供养，我的家人，四个助手，仆人，车夫，马掌匠每匹马也得花上五十镑。其

他的额外津贴和膳宿都要从我的工资中支出。另外，多年来我一直受到众多穷人的纠缠，救济穷人是我们家族的传统，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急迫地依赖我们的救助。因此对每一次额外增加的收入来源，我都会感到高兴。”

“我怎么听着你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判决的数量越来越多呢？桑松公民，革命一发威，那将是万人人头落地。我们必须清洗巴黎，消灭贵族阶级。一场革命就像婴儿在鲜血中诞生一样，而它的孩子必将接受血的洗礼，直至革命结束。”

“我希望还能剩下一个人来执行那些刑事判决。”夏尔说。

富吉埃不动声色。“万不得已时我来做这事。别把嘴巴张得那么大，桑松公民。你的职位保护不了你。”

“我要起诉高萨和《凡尔赛邮报》。”

富吉埃耸耸肩。“随你的便。但别忘记你的机器，我们需要它。我们远没有走到路的尽头。这段时间你将在圣拉扎尔监狱里度过几个夜晚。或许你还会想到一些想对我坦白的事。地下土牢里老鼠很多，你在夜里是没法睡着的。你好好想想吧。”

“想什么？”夏尔问道，不让他察觉自己的怒火。

“我们对所有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感兴趣。你认识保皇派吗？肯定认识。你把他们的名字报给我！”

“你不是知道得很清楚……”

“你？按照我的职位你应该称我为‘您’，难道是因为我们曾经是同班同学吗？”

“您知道刽子手没有朋友。他把他那简单的饭菜和狗和马一起分享。待在刽子手的那个社会里是不值得人们去追求的。”

“有可能，”富吉埃回应道，“但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你是巴黎先生，而许多人对你的医术评价很高。顺便说一句，我的左胸有时有痛感，就像被针短促地刺了一下，是心脏吗？”富吉埃原本冷漠的语调消失了，真的在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起来。

“神经过敏，绝对没有危险。”

“那好吧，”富吉埃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我相信，你到了圣拉扎尔之后会想起那些名字。”说完他抓起放在他书桌上的一捆有价证券。“法国革命的纸币。”说完他用那捆纸币当扇子。“只是很遗憾，全是假币。那么这些假币是在哪儿被印刷出来的呢？”他咧嘴笑着。此刻，夏尔的脸色真的煞白起来。“很有可能是你的租客印刷了那些革命歌曲。但不仅仅如此。这是烟幕弹。”富吉埃哈哈大笑。“你瞧，夏尔，我一直在警告你。你是鲁昂的模范学生，可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还会见面，而你将在百般痛苦之中明白，一个来自阴沟洞里的人闻到的永远是粪便味，而一个血脉里流着贵族血统的人永远占有优势。能把你亲自扔进地牢，我感到万分荣幸。”

“我惹你什么了，安托万？”

“安托万？又来了？我是富吉埃，共和国的最高公诉人。我起诉，而你是执行判决。你是屠夫。”

圣拉扎尔监狱：在这家昔日的麻风病医院里，有人被拘捕、遭拷打以及在没有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被处死。这里没有单独的牢房。好几百号犯人穿着他们遭逮捕时穿的衣服，硬挤在监狱那些漫无尽头、暗无天日的地下过道里。尽管情况恶劣、前景暗淡，但仍有为数众多的犯人，在

玩牌中消磨时光。一些人在唱歌，另一些人试图引诱异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绝望地盼望有一个能使她怀孕的男子。一旦怀孕，她就可以安然逃脱死亡之路。

过了些时日，夏尔听到有人传唤他的名字。他走到栅栏口，在栏杆之间寻找熟悉的面孔。玛丽-安娜突然站在他面前。她给他带来了一根香肠、一只圆面包以及一罐子啤酒。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出去？”她问。

“不知道。”夏尔回答，接住她从栏杆之间塞过去的食物。

“我按照我母亲的做法做了这个香肠。”

“我一直厌恶她做的香肠。”夏尔低声道。

“这你从没和我说过。”

“你是不会听的，不过你给我带来吃的东西我很感谢你。我没有想过你会过来。”

“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我有好多年没有责怪你了，玛丽-安娜。我们真的难以见到面。”

“他们指控你什么？”

“什么也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要拘捕你？”

“不知道。”

“有没有起诉书？”

“没有，这恐怕就是革命的成果，我们不再需要起诉书了。这地牢里有一些人竟然受到孩子的诽谤而被关押起来了。”

“德马雷应该给你找一位律师。”

“我无权请律师，玛丽-安娜。目前被关押在这地牢里艰难度日的甚至还有革命之父们，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整个形势已经失去控制。每个人走在马路上都会感到压力巨大，以至于为了生存下去，任何中庸人士不得不投奔到极端人士那里。为了不让自己惹上中庸的恶名，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日复一日地跟在他们后面鹦鹉学舌。每个人都担心遭到逮捕。”

两人相顾无言。稍后，玛丽-安娜说：“假如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说了，那我就该走了。”

夏尔点点头。“我们曾经有过二十多年时间可以说说话，玛丽-安娜。可我们没有这么做。对了，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

玛丽-安娜疑惑地看着他。

“如果我能重新从这里出去，丹曼莉会住到我家里。而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真的只有一个共同的屋檐了。这个可以继续下去。”

“一个女人知道她何时失去她的男人。我祝你在这地牢里腐烂下去，然后我会想方设法让你那个邋罗荡妇离开我们国家。”她转过身，消失在访客之间那阴暗的过道里。

一周后，夏尔重新被带至安托万·富吉埃面前。

“你有名字了吗？”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正着手做呢。”夏尔说。他想以此赢得时间。

“你是否知道他们在你家工具棚里印刷的那些传单内容？”

“不知道，”夏尔说，“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他们声称在印刷革命歌曲。老实说，我什么都没有想到过。相反，我本来以为这是为年轻人好，他们可以有份工作，不至于夜里在小巷里四处游荡。”

“你为何不去查看一下呢？”

“我为什么应该去查看？我是出租人而已。一个出租人不能去打探他的租户在干什么。难道我应该每天晚上去看他们的印刷成果吗？人家可以由此指责我犯下了失职行为吗？我如何可以预料到他们是在伪造有价证券，印刷讽刺革命的诗行呢？”

富吉埃笑得前仰后合，没有继续听下去，插话道：“那些人没有买面包的钱，却应该买革命歌曲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夏尔耸耸肩。“我只是跟您说我的租户向我许诺要做什么事。”

“后来你也没有生疑过？”

“如果他们脑子里有荒唐可笑的想法，那么他们脑子里就是有荒唐可笑的想法。我要知道他们真是在印刷什么东西，我当然不会把工具棚出租给他们，而且马上会到您那里告发他们，先生。”

富吉埃会心一笑。他很满意现在夏尔称呼他为先生了。他带着某种愉悦的感觉打量站在他对面并且需要仰仗于他的恩惠的巨人，当人人都在害怕他时，他现在却在这里，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那好吧，”富吉埃说，“我们冲进那间工具棚时，那些年轻的家伙几乎全都溜之大吉了。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有价证券。我们尚不清楚这些

伪钞究竟是来自英国还是从你的工具棚里被印刷出来的。年轻人拥有那么多的纸币，我们也认为不大可能。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结果当然也要稍稍取决于，你是否还想起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名字。嗯，千万别掉以轻心，否则你儿子亨利突然有这个讨厌的义务要处死他的父亲。那你记着这事，多打听消息，然后给我报上名字。”

夏尔点点头。

“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是暂时。赶紧忙你的新机器去。我们这里的判决一天天多起来了。”

夏尔又一次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去。当他正要去打开门时，富吉埃问道：“你认识亨茨吗？”

“阿尔萨斯刽子手吗？”

“是的，他在上周被处死了。即便是刽子手的职业也无法保护任何人。”

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下得楼来，到了下面的大院里，夏尔询问看守马匹的仆役，他的马在哪儿。他不了解亨茨的故事。富吉埃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真相。据说亨茨强奸了斩首女人的尸体。

一名仆役递给他缰绳。夏尔正要骑上马，一辆马车挡住了他的道。一名仆人打开门，路易大夫从车上下来。“哦，巴黎先生，”他说，“我们可以建造机器，但木匠吉东对每台机器几乎索价六千镑。这对检察院来说太贵了。吉东说是谁也不愿意建造这样的机器，所以价格才要得那么高。”

“托比亚斯·施密特建造这台机器只需三百镑，”夏尔说，“为这个亚麻布袋子，他再另加整整二十镑。”

“他今天就应该动手干了。”路易大夫说，然后拾阶而上，来到富吉埃的办公室。他不想被人看到和刽子手在一起待得太久。

夏尔又一头扎进自己的工作中。夜里睡不着觉时，他就把发生的大事写进日记。可他心里感到不安。他在考虑是否应该把日记一烧了之。记载的内容足可以用于刑事诉讼了。但他需要那些日记：正当巴黎的公民吓傻了，纷纷躲避起来的时候，夏尔却更加孜孜不倦地拿起手中的笔，偷偷地写下谁都不敢写下来的东西。他给他的笔记加上了标题《法国大革命回忆》。

有一天，丹曼莉在药房里等他。她有点茫然若失地闲站着，看着那里面装着被捣碎的花和根的碟子。一看到夏尔出现，她急忙张开双臂冲到他跟前，拥他入怀，亲吻他。过了片刻，她说：“我身上痛。”夏尔请她躺下来。伤口已经愈合。可他突然看到她腰上的紫色伤痕。他脱下她的裙子。她全身血肿，仿佛被人用打谷棒痛打了似的。

“这是谁干的好事？”夏尔问道，气得浑身颤抖。

“我摔了一跤。”丹曼莉撒谎道。

“我能看明白伤口，别对我撒谎。”

“热比云神甫。可这是我的错。我痛哭流涕，因为他告诉我，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现在我必须一直待在他那里，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到菜市场去。夜里我必须睡到他的床上去。可这不是我的暹罗国王的意愿。神甫强迫我做那些不纯洁的事情。”

“难道其他神甫谁都不愿意帮你吗？”

她摇摇头。“不，他们整天酗酒作乐，仿佛再也没有明天。他们在等待最后审判的日子。他们害怕热比云神甫，他的影响力太大，他在古

尔丹太太府邸和有权有势的人经常来往。”

“热比云神甫。”夏尔像是在喃喃自语。

丹曼莉点点头。“你有什么打算？”

夏尔当天就去了坐落在双门街的那家妓院。

“有什么特别需要吗，先生？”一名西班牙女子用结结巴巴的法语问道。

“热比云神甫？”夏尔轻声说。

“热比云太太吗？”她问，然后带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厅。这里的人都不穿黑色的浴衣，而是穿着参加社交晚会的雅致衣服。那名西班牙女子悄悄地指着一名女子，她正在和一名裸体的金发女郎聊天。

“这是一个女人。”夏尔说。

“他喜欢女服，”高萨说，冷不防站在夏尔旁边，“谁也不知道那位御用数学家在暹罗出了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儿不是靠观察星空和勾画新的航海图度过他的时间。他享受着保护，因为他为我们的革命者先生们提供暹罗姑娘。”夏尔想回避，可高萨跟在他后面。“先生，但愿您可不会对我那篇关于保皇派印刷厂的小文见怪。读者喜欢这样的故事。”高萨暗示那个西班牙女子可以离开了。“把您的客人让给我吧。”他对着烟斗吸了一口。“您瞧，那边，罗伯斯庇尔。他不能忍受和圣茹斯特喜欢同一个女人。如果这种竞争不马上停止，革命就要失败了。为了一个婊子。”

夏尔怀疑地打量高萨。他变了。他的脸上表现出讥讽和轻蔑。

“世上有一些东西，巴黎先生，它们对一个男人来说要比一个年轻

貌美的野鸡更为重要。比如他的陶制烟斗。”说完他从嘴里拿出烟斗，然后开始咳嗽，“一个婊子可以分享，一只陶制烟斗可不行。”

夏尔不再过于关注这位记者。他在观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笨拙的发情表演。

“您认识圣茹斯特吗？”

夏尔摇摇头。

“我在国民议会听过他一些煽动性演说。他来自偏僻的外省，有远大的抱负，可他的才华却很可怜，和他崇拜的罗伯斯庇尔一样是个饭桶。他不会白白送给别人任何东西。您仔细瞧瞧他。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吗？一个孩子，却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您过来。”高萨把夏尔带到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那里。

“您那些涂鸦怎么样了？”高萨问道，公然看着圣茹斯特的脸冷笑。“您倒是可以用诗歌的形式通过一个法令，可以迫使巴黎的出版社出版您的诗歌。”

圣茹斯特朝高萨轻蔑地瞥了一眼。“你要小心了，高萨公民。即便不是保皇派，你想享受随便开玩笑的自由还早着呢。”

“哦，我们的革命者现在已经和我们以前的国王一样，变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吗？”高萨伸进口袋，掏出一份文件放到圣茹斯特面前的桌子上。“是奥兰普·德古热写的。她以人权为依据，撰写了一份传单，标题叫《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现在已经散发到巴黎的大街小巷了。”

圣茹斯特看了几行，喃喃道：“‘女子生来平等，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想必她有点误会了。”

罗伯斯庇尔一把夺走他手里的传单撕成粉碎。

高萨哈哈大笑。“恐怕这还不够。”

“您别想着去印刷，否则我把您送到……”

“那么新闻自由在哪儿，罗伯斯庇尔公民？”

“为了煽动民众，人们也有可能滥用新闻自由，高萨公民。”罗伯斯庇尔目光严厉地盯着他。

“那么法国殖民地的那些黑人拥有哪些权利呢？人权也适用于他们吗？”

“谈话结束了，高萨。总有一天您会吓得张口结舌的。”

“那我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高萨咧嘴笑道。

“高萨，问题是：所有的人突然之间都想掌权，可谁也不想再做公民了。”圣茹斯特叹息道。

一条帷幕被推到一边，一位具有帝皇范儿的人物走进大厅。此人便是丹东。他，个子高，嗓门大，麻子脸很宽，嘴唇很厚。他朝女伴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向圣茹斯特走去。“一个胜利的革命者的薪水必须能过上一种奢侈的生活，你不觉得吗？”

圣茹斯特表示拒绝。罗伯斯庇尔飞快地抓住一个留着刘海的黑发姑娘，然后站起身。他拉住她的手，带她到了一个有雅座的地方。

“美女决定为权力献身，”高萨对圣茹斯特说，“不是为青春，也不是为金钱。”

圣茹斯特同样站起来，跟在罗伯斯庇尔后面。丹东扭转头，径自上酒吧去了。

“这个圣茹斯特。他是个自恋狂，本能地要向君主政体报仇雪恨，因为虽然自身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他依然被拒之于凡尔赛宫门外。这是我的想法，巴黎先生。”

“您了解那位御用数学家吗？”夏尔悄悄地问道。

“他们在暹罗把他变成了人妖。他对那里的人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显然很喜欢。然后他带着十二名交流生回到了巴黎，而其中一个暹罗小女孩他似乎特别中意，马上将她攫为己有。这跟我们的革命者所做的同出一辙。他们做出的决定只能适用于其他人。您能想象这一点吗？”

“如果您执行刑事判决的话，您可以想象到一切。我当年处决过达米安……”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记性就是我的资本，”高萨说，“什么都逃不过我的记性，必须小心这种人妖，他将是下一个在绞刑架上结束生命的人。”说完就到酒吧去了。

夏尔看到热比云神甫在和一名豆蔻少女调情。他感到满腔的怒火嗖的冒上来，于是别转头去。而更让他感到愤慨的是那种新的专制，它在巴黎四处蔓延。革命者们已经登上了国王的宝座。国外有人认为他们都是罗伯斯庇尔的军队。

“夏尔！”有人叫道。他转过身来。原来是热比云神甫和那名姑娘一起过来了。“太让人意外了，我本来以为您会更喜欢暹罗的公主们。您耐心等等。一船的货已经在路上了。”热比云哈哈大笑。他没有一丁点儿的拘束。他肯定在享受着革命者的保护，而一名刽子手太微不足道，

完全不必在他面前束手束脚。

“您是想要说什么？”夏尔不安地问。

“我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革命让教会变得穷困潦倒。我们应该靠什么负担修道院生活的费用呢？”

“依靠体面的工作！”夏尔尖刻地回答。

“何为体面的工作？您的工作算有体面吗？”

“您是故意把丹曼莉派到这里来的吗？”

热比云神甫突然大笑一声。“您相信我会做出这等事来吗？”他开心得格格笑起来，“我警告您。爱情不能持久，猎艳的激情将会觉醒，你将会渴望新的爱情的幻想。上帝就是如此创造了我们。顺便说一句：是按照他的原型。您可以想象一下，这家伙是如何到处拈花惹草了吧？”

夏尔不动声色。“我问过您一次，丹曼莉是否可以到我家里干活并且住在我家里。”

神甫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丹曼莉为我一个人服务。她是我的人。我喜欢她的厨艺。”

“我可以给您钱。”

神甫装作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回事。“终于有了一个明智的建议。教会需要很多钱才能喂肥那里的男人。我会好好考虑的。如果您答应我一件……”

“请讲？”夏尔真想痛打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您别从坏处想我。革命把上帝扫地出门了。我们现在可以尽情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老天上面已经没有上帝给我们记账了。”他将手臂搭在夏尔的肩上，低声道，“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了诅咒。夏尔，您是自由的。革命使您获得了自由。”他又一次纵声大笑，然后带着姑娘离开了。

---

[1] 格言“布道时公开喝水，之后悄悄地喝酒”，出自德国作家海涅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第10章

那台机器端坐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院子里。两根柱子向着天空耸立着，细长的阴影泼洒在参加这一轰动事件的一小群人身上。那天是1792年4月15日。在场的有路易和吉约坦两位大夫、检察官罗德雷和富吉埃、夏尔和助手以及他的儿子亨利。监狱工作人员并没有露面。稍后赶来的还有高萨，富吉埃朝他友好地点点头以示欢迎。可这起轰动事件暂时集中在一只脏兮兮的绵羊身上，它疯了似的在断头台周围奔跑。夏尔的助手们想要逮住它，却是枉然。有几名看守过来帮忙，总算得手了。他们将这只绵羊绑定在活动搁板上，再将搁板置于水平位置，然后推到断头铡下，断头铡在同一时刻呼啸着落下。随着完美的切割顺利完成，绵羊的脑袋和它的躯体分开。鲜血溅到了院子里。除了拉紧制动断头铡的金属阀门之外，夏尔没有其他事可做。面对这样的行刑速度，所有的人显然很吃惊。

“您有尸体吗？”路易问。

“有。”夏尔回答，给了助手们一个暗示。他们用一辆手推车将三具尸体推到院子里。那是三个有着坚实的脖颈子的男人。第一个是自杀者，第二个是醉鬼，第三个则是国王的一名步兵，在决斗中丧生。“他们是医院提供给我们使用的。”

前面两具被斩首时干脆利索，轮到第三具时，路易大夫希望助手们换下断头铡，再装上路易十六修改之前考虑采用的半月形刀刃。试验虽然失利，但路易大夫对此很满意，因为他可以很高兴地通知国王他是对的。

“我们现在如何命名这台机器？”高萨出乎意料地问道，“将来会有许多新机器，因此它需要自己的名字。路易塞特？”

“这不行，”路易气愤地说，“我是大夫。用吉约坦纳如何？”

“我同样是大夫。”吉约坦拒绝道。两个人把目光转向夏尔。

“桑松奈特？”高萨笑道。

“我只是机器的胳臂而已。”夏尔回答。

高萨摇摇头。“我喜欢路易塞特这个名字，听起来悦耳动听。”

“为何不呢？”富吉埃说，“毕竟有许多人起路易的名字。”他哈哈一笑，然后转向夏尔，“桑松公民，我有话要跟您说。不过先让佩尔蒂埃成为您的刀下鬼吧。这个幸运儿。他将作为采用路易塞特被处死的第一人而永载史册。”

夏尔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剪掉了尼古拉·雅克·佩尔蒂埃齐肩的头发，挪开了他的衬衫领子，好让他的脖颈清晰可见。菲尔曼和巴雷帮助死囚穿上血红色衬衫，随后将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他们陪着他来到马车里，马车将为他提供最后一段旅程。在波旁-维尔纳夫街发生的一次性质严重的抢劫中，佩尔蒂埃因偷了八百镑而被送上断头台。

数千名爱看热闹的人早已等候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门前。马车几近无法进入。终于，国民军总司令拉法耶特离开了监狱内院，从马车旁边挤了过去，在群众兴高采烈的掌声中担任向导。一路上人山人海，他们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抵达断头台。大街小巷被密密麻麻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有的人探身窗外，贵族们坐在自家的阳台上。一份传单犹如一场戏剧演出一样列出了整个行刑的过程。拱廊之间搭设了出售小香肠的售货棚。周围的饭馆在菜单的第一页印上了被处决者的名单。每一张桌子上摆放着托比亚斯·施密特的断头台微型模型，可以用它切下胡萝卜和芦笋。马车从围观者身边走过时，佩尔蒂埃遭到了冷嘲热讽。大家听到了最不可思议的新词。他马上就要“人头落地”了，“国家的剃刀”就要惩罚他了。有一个小丑名叫雅各，在巴黎城大名鼎鼎，他突然纵身一跃跳

到夏尔的一匹马上，扮鬼脸，取笑这个死囚犯。就在观众向他喝彩时，夏尔抽出鞭子，将小丑赶回人群中。难道死亡还不够惩罚吗？佩尔蒂埃被腐烂的蔬菜击中，想在座椅下寻求保护，可被夏尔阻止住了。富吉埃交给他的记录上就是这么要求他的。

拐进格莱夫广场，他们看到行刑台上那两根柱子矗立在天空中。在短暂的一瞬间，断头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亨利和助手们搭建了一座巨大的行刑台，并已在那里安装上了路易塞特。拉法耶特的骑兵们围着行刑台。佩尔蒂埃被抬至木台阶上。从木台阶上望向格莱夫广场时，他似乎很惊讶。乌压压的人群，都是过来看他死的。夏尔对着广场上空大声叫喊佩尔蒂埃的名字，逐一清点他的私人物品，而亨利和格罗、巴雷以及菲尔曼一起将被行刑者绑至垂直的活动搁板上，然后像秋千一样把它翻转成水平位置，再向前推至那两根竖直的柱子中间。随着断头铡呼啸着落下，只听到扑通一声，那颗已分离的头颅恍如一根被锯断的树枝掉入柳筐内。当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躯干里喷出来时，观众中传来一阵喝彩声。可绝大多数人感到很失望，尤其是喜欢饶舌的泼妇们，她们闲站在行刑架周围，目的就是想要用粗野的嘲讽去取笑这些濒死者。一切来得如此之快，大家根本没看明白整个过程。没有在沸水中长达几分钟之久的垂死挣扎，没有悬梁自尽时的窒息而亡，也没有四肢被烧后的嘶嘶作响声，什么也没有。亨利从柳条筐里取出那只沾满鲜血的头颅，展示给人群看。广场上传来稀稀拉拉的嘘声。“把我们的绞刑架还给我们！”有几个人嚷道。之后，他们掷地有声的叫嚷声越来越高亢。“把我们的绞刑架还给我们！”

鲜血一直从被斩首者的躯干上飞溅出来。夏尔站在行刑架的最高一级台阶上，仔细观察是否人群中有任何对断头台怀有敌意的骚动。

“这可能很残酷，但这是公平的，这种快速的处决和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思想相吻合。”说这话的是高萨，他神色凝重地寻找词句，“您感

觉到了什么，桑松公民？请告诉我们的读者。”高萨说完挤到夏尔跟前。

“我执行了一次判决，”夏尔回答，“我的双手没有沾染上鲜血。我开始喜欢这台机器了。”

“这台机器现在有了一个名字，”高萨说，“吉约坦纳。这个决定是国王作出的，旨在保护他的家庭医生。吉约坦博士提出抗议，可他太渺小了。他的后代恐怕要诅咒他，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此以后将永远和这台杀人机器联系在一起。命运的嘲弄总是一再让我感到快乐。这是我创作故事的原材料。”高萨匆匆举起手以示问候。“再见，巴黎先生。我得赶在编辑部截稿之前交出我的报道。”

夏尔目送高萨离去。高萨以一副煞有介事的神情吸着烟斗，穿过他暗地里瞧不上眼的人群，疲倦不堪地开辟出一条道来。然后夏尔就看到有一个矮个子女人从高萨身旁悄悄走过。原来是丹曼莉。她大概整段时间一直在观察他。丹曼莉站在通往断头台的台阶前。夏尔爬下台阶走到她跟前。她双手托住下巴，虔诚地低下头。

“夏尔，”她说，满脸钦佩地看着他，“我不知道你是行刑的人。我很遗憾，我没有对你表示出必要的尊重。”夏尔疑惑地打量她。“在暹罗，只有圣人才能处死人，”她补充道，“他们和被处决者达成一致，和神灵们联合起来。”

“你没有去过行刑现场吗？达米安受刑时？”

“没有，”丹曼莉说，“你一定是认错人了。”

现在，断头台周围显得很逼仄。越来越多的人挤到柳筐那里，好看一眼被砍下的头颅，尽管感到毛骨悚然，但还是饶有兴趣。有些人把他们的手绢浸入血中。助手们把尸体装进那只和棺材类似的柳筐里，将头

颅搁到大腿之间。

“我得去一下墓地。”夏尔对丹曼莉说。

“我可以明天上你家里去吗？”她请求地问道。

“你待在我家里。你可以住在我家里。我们有足够的地方。”他紧抓住她的手不放。这时，雨稀里哗啦地下了起来，人群开始散去。

夏尔让助手们留下来拆掉断头台。他请亨利坐在马车里的尸体旁边。丹曼莉则坐在夏尔身旁，夏尔握住缰绳。有一些拉法耶特的国民军士兵为他们开辟通往郊区墓地的道路。黄昏时分，他们抵达玛德莱娜公墓，找到了富吉埃指定的万人坑。“由于位置紧张，拥有单独墓地是不可能的。”他曾经这样说过，“接下来还有很多尸体过来。”

到了墓地围墙旁，亨利从车上跳下，打开铁门。他们一起来到南侧刚被挖出的一个大坑。他们扛着那具没有头颅的尸体扔进坑里，往尸体上倒上氨、碳酸和水组成的混合物，再往上面覆盖上适量的熟石灰。忽然，一名年轻女子出现在墓碑中间，嚷道：“巴黎先生！”夏尔以为她是来看热闹的，是想让她的手绢沾上血，或是想搞到截下的四肢。“您可以给我头颅吗？”

“不行，”夏尔说，“法律禁止我做生意。”

“我不付任何钱，所以不是做生意。这个头颅我只需半小时。”

“为了什么目的？”夏尔不耐烦地问。

“我和我的叔叔菲利普·科特斯在皇宫里经营一家蜡像陈列室。我想把这个头颅制作成模型，这是从断头台上落下的第一个头颅。”

“您问检察官富吉埃或者罗德雷，从我这里您是拿不到头颅的。”夏

尔说，抓住孤零零的头颅的头发扔进坑里。

“我要我的头颅。”她固执地说。

“当然，而且比您想要的还要多。”

“这还要持续多久？”玛丽-安娜怒气冲冲地问道，她连门都没敲，直接走进了药房。

“她现在待在这里。我们不是谈过这事吗？”夏尔说，“她给我做药房的帮手，也给我们做饭。”

“她究竟能做什么饭菜？”玛丽-安娜讽刺地问。“蝗虫、鸡身上的食管以及烫坏你舌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暹罗人也吃狗肉。”

玛丽-安娜满脸通红。“够了！我要上我妹妹家去。这里恐怕再也不需要我了。”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过道，穿过厨房，看到丹曼莉在生火。她本想说点什么，说点讨厌的话，可还是默默地走到院子里，给她的马上鞍子。

安托万·富吉埃双手背后交叉，向窗外张望。夏尔始终站在他的书桌前等着。富吉埃心情不错，甚至忘记采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称呼方式了。“对您成功的处决表示祝贺。您的机器确实发挥了作用，可您的朋友，那位德国的钢琴制造商却并没有获得这份订单。罗德雷想把机会优先提供给他的一个亲戚。他的东西虽然贵得多，但他们恰好是亲戚。您瞧，我当年在寄宿学校警告过您的事，在这里又一次得到验证。贵族血统打败知识，亲戚关系打败质量。您永远不会有机会，夏尔。你们生活在岩洞里，而你们也将永远不可能打通你们脑袋上方的岩层。可是，像我这样的人，生来自由，唯有苍天才能限制我们。”

“这就是全部吗？”夏尔毫无反应地问道。

富吉埃没有理会他的问题。他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无耻。“你现在想到一个名字了吗？”他挖苦地问。

夏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重新呼出一口气。

“嗯，我在等名字。你至少可以给我举出一个名字来。”富吉埃重新转向窗口，往下面的院子里看去。“顺便说一句：墓地的那个小个子女人到我这里诉苦。你们应该每次借给那个女士半小时人头。他们应该看到革命的牺牲者。这才会起到威慑作用。人头落地还会有很多。因为墓地的那些大坑应该被填满，而不是我们的监狱。桑松公民，我一直在等名字。只要一个人的名字！”

“热比云神甫。”夏尔听到自己在说。

“我没有完全明白过来，”富吉埃说，“热比……”

“热比云神甫，”夏尔重复了一遍，“一个耶稣会会士。他作为御用数学家被派往暹罗。”

“我记得高萨不久前提起过他。我们的数学家应该在那里观察星象，绘制新的航海图，可他却在观察那些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屁股。暹罗国王拉玛一世还要向我们宣战……”他呵呵一笑。“热比云始终享受着宫廷的保护，因为他，”富吉埃此刻吼起来，“是一个该死的保皇派。我讨厌他。我一直讨厌他。”

夏尔匆匆扬起眉毛，似乎是说：那好，这样不错。

“有那么困难吗，桑松公民？”夏尔正想走，富吉埃又说道：“你的朋友，那个管风琴制造商，可以制造断头台：八十三台，每台九百六十

镑。如果有一台出现问题，那么撤销其余订单。”

“可您说过……”

“你送给我一个人，那我也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因此你只有一次机会来明白这些游戏规则。而且谁知道呢，桑松公民，说不定我们又可以重拾旧情。”

托比亚斯·施密特醉得不省人事。他躺在制作工场里一张被丢弃的沙发上，喃喃着叫人听不懂的胡话。墙上挂着新的设计图。有一张图上是一台巨大的断头台，可以同时对二十四人斩首。夏尔走进车间，施密特一骨碌跳起来，可马上又被一阵恶心击倒，又被拌了一下脚，正在用力深呼吸。“我都快要成功了。”他气喘吁吁地说，跪在地上。“罗德雷不想给我订单，”他诉苦道，“说是我的价格太贵，质量又太次。这本来是我一辈子的订单，超过八十台断头台，每个省都有一台。”施密特急促地喘气，呼吸很困难。

“我能帮您忙吗，施密特先生？”夏尔向他伸出手。

施密特拒绝了，指了指那块沿墙摆放在地上的木板。木板上摆放着好几十个断头台小模型，不会比人的前臂更大。“玩具断头台，”施密特叹息道，“他的天才浪费在儿童玩具上，难道一个发明家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我发明了液压机、新型壁炉以及著名的钢琴，而这种钢琴可以将中音提琴、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效果完美地结合起来。我目前正在发明一种保存蔬菜和水果的方法，在自身试验时每天都要吃坏我的胃。而现在我制造了这个玩具，您告诉我，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这就好比您给了一个杰出的将军一匹儿童木马。”

夏尔把他扶起来。“罗德雷的表弟要价五千六百六十镑，可您只要三百四十……”

“还有亚麻布袋子，每只二十四镑。如果使用柳条筐，就更便宜了。”施密特似乎失去了平衡，又重新扶住，跌跌撞撞地穿过工场大厅。“我把这一切统统烧毁掉，”他嚷道，“这一切！”

“等到明天再说，”夏尔说，“您先把断头台造起来，单价九百六十镑。这是富吉埃的命令。罗德雷已经同意了。”

施密特奔向夏尔，热烈地拥抱他。“八十三台断头台，总共加起来，您等等，接近八万镑！桑松先生，我应该感谢您。”

“对我而言重要的始终是要找到时间，可以校正我的钢琴，而且要把加布里埃尔的腿夹板调整好。最近一段时间他老是跌倒。”夏尔说。

“我保证！”施密特说，一脸严肃地点点头。他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他把夏尔推到一张工作台旁，敞开着的罐头食品在上面堆得到处都是。“我现在尝试用铅密封这些罐头食品。铅应该是有毒的。古罗马人早就因为水管含铅而死于铅中毒。但我只使用少量铅。它几乎接触不到食物。如果这件事我做成了，所有的街道将以我的名字命名。”施密特重新躺倒在沙发上，闭着眼抓起地上打开的那瓶葡萄酒。他把瓶中酒喝尽，任凭酒瓶在高低不平的厚木板上滚动。

“行，不过您马上开始制作断头台吧。”夏尔催促道。

夏尔回到家，丹曼莉已经离开了。

1792年8月10日夜间，警钟在整个巴黎上空鸣响。估计午夜已过，夏尔心想哪里发生了大火，赶紧起床。他和亨利一起走到大街上。大家不约而同地从家里冲出来，到处挤满了人。绝大多数人荷枪实弹。人群向杜伊勒里宫方向进发。数周前，他们曾经做过同样的事，闯入这座关押国王及其家人的王宫，抓住路易十六，强迫他喝下一杯葡萄酒为他们的健康干杯。可这一次他们还要做出更大的举动。有谣言称，普鲁士和

奥地利军队已经越过边境进入法国，想要救出国王。邻近的君主国害怕革命的大火蔓延到他们的国土上。巴黎正在上演的是第二次革命。激进的无套裤汉们任命了自己的市政府，并因此成了和具有立法功能和民主体制的国民议会相抗衡的对立政府。这一万名正在行军中的无套裤汉，准备采取一切手段彻底摆脱他们的国王。当杜伊勒里宫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时，人群中响起了气壮山河的声音："处死国王！"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向大约一千名保卫国王的瑞士卫兵挺进。两千名以国民议会的名义监视国王的国民军，看到巨大的人群后立即逃之夭夭，混入怒气冲冲的无套裤汉的队伍里。很大一部分瑞士卫兵被愤怒的民众所杀害。他们或被枪杀，或者满大街地被人追杀，直至筋疲力尽地瘫倒在地，然后像母鸡一样被大砍刀斩首。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维护制度的力量。谁也无法控制这群人。巴黎的黑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从秘密的地下涌向外面的世界，结清应收账款，发泄自己的怒火，对垂死的卫兵实施阉割，随后将他们的生殖器扔到大街上。那些人不再拥有真正的政治目标。他们利用混乱的局面，利用大街上没有法制约束的机会，四处抢劫，屠杀可憎的富人。这是血腥的全民节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公开地杀死任何一个人，而不会受到任何惩处。由于发生了那些大事件，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他们的孩子被带到寺庙里，而国民议会还在采取极端的态度，以抚平无套裤汉的怒火。议员们感到震惊，可是无能为力。

8月，新设立了一个刑事法庭，不再有任何上诉的可能，哪怕对"宣誓"稍有一点儿嫌疑，都有可能立即遭致斩首的命运。人人自危，纷纷躲进自家屋子里不出来了。

"现在发生的一切已经不正常了。"夏尔对亨利说，他们干完活给绳子上油。这是他们喜欢做的规定动作，可以有助于他们忘记当天的处决，尽管有了断头台之后，他们根本不再需要绳子。许多鲜血从断头台的木板之间流到石子路上，散发出一种恶心的气味，只能招来狗们。人

们不是抗议大屠杀，而是抗议恶臭。夏尔和助手们因此在杜伊勒里宫大门前的卡鲁索广场上安装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号召对革命的敌人实施人民司法。他试图重新控制激起愤怒的群众，可是恰恰相反，武装人员和国民军冲进监狱，屠杀了一千多名犯下小罪行的囚犯。革命的崇高目的已经跌倒在荒诞不经的故事里。

尽管出现了大屠杀事件，夏尔的工作量依然与日俱增。每天早上，他都要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去造访富吉埃，以便拿到晚上要执行的判决。有时候，在诉讼、判决以及处决之间只有几小时的间隔时间。革命者维持这样一种立场：宁愿错杀十个无辜者，也不能放过一个罪犯。

“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了边境，”夏尔走进办公室时，首席公诉人富吉埃嚷道，“对现在无法证明自己爱国的人，我们将把他们移送给人民司法。在这一时刻，成千上万的愤怒公民冲进监狱，抢走了你的工作，把关押在里面的囚犯统统杀死。”

“人权的崇高目的究竟在哪儿？”夏尔冷嘲热讽地问道。

“小心！小心，桑松公民！我跟你说过，任何一次革命都是在鲜血中诞生。国民公会废黜了国王，将他送入寺庙。你认为有可能将来某一天你在断头台上斩决国王吗？”

“他还活着，”夏尔说，“没有判决。”

“国民公会已经没有权力了。现在掌权的是街道，是起义的人民公社。”富吉埃交给他一份被处决者的最新名单。夏尔匆匆浏览了一下：伪币制造者，一名新闻记者，一名鞋匠。一个名字倏地跃入他的眼帘：热比云神甫。此外，他还发现一个巴黎城里赫赫有名的工匠，此人拥有着最好的名声，却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而已。“还有什么问题吗，巴

黎先生？”

夏尔摇摇头。

富吉埃将椅子挪正，做了一个保持距离的姿势。“听说那个雅各小丑不时地跟在你们的车队后面，用他的疯癫取悦于人群。你应该用鞭子赶走他。”

“这是对的，”夏尔回答，“一次处决不应该变成一个全民节日。我习惯庄重地执行判决。”

“这是谁规定的？”富吉埃问道，轻蔑地看了看夏尔。“你是谁？你能代表革命政府吗？一次处决就是革命的全民节日。把那个家伙列入你的工资发放名单中。这是命令。我们必须始终让人民高高兴兴，谁知道，没准未来几个月里我们还得指望他们干这干那呢。而且要在黄昏来临后开始行刑。在断头台上点上火炬。我们要瞧瞧是否人民更喜欢这样。”

夏尔迟疑地点点头。

“你心里还有什么想法吧，我从你的脸上看出来。”

“我想现在就把我的职位移交给我的儿子亨利。”

“闭嘴！我不想听到这种话！现在提交你的申请，恐怕是最愚蠢的时刻。你将在断头台上处决国王，因为你是革命的刽子手。亨利只是一个伙计，可你是断头台的手臂。有些人拼着小命跑到行刑现场，就是想一睹你的风采。”

和妹妹吵架后，玛丽-安娜又一次不辞而别。她突然站在厨房里做豌豆汤。“好在我又回来了，”她说，“没有我，这个家真的根本不行。

你们做事全乱套了。另外，加布里埃尔也应该跟你们一起上行刑现场。他不能整天弹琴。”她把汤端上桌。

“加布里埃尔喜欢艺术。”夏尔说，有气无力地碰了下他的汤。

“玩艺术又赚不到钱，”玛丽-安娜激动起来，“刽子手的职业是我们国家最稳定的职业之一，因为刽子手总是需要的。”

“总有一天，”加布里埃尔说，“死刑将会被废止，我们不再需要刽子手了。”

“这个日子你是看不到了，”玛丽-安娜嚷道，“罗伯斯庇尔想取消死刑。他没有做到。那么谁还能做得到呢？”

“你还是别烦他，”亨利强硬地说，“他现在又不想做刽子手。”

“你别插手，”母亲训斥他，“你只是担心你父亲的接班人……”

“别再吵了，”夏尔说，张开手有力地敲了敲桌子，“亨利是我在巴黎的接班人，这个已经决定好了，而如果加布里埃尔愿意，我可以在另外一个城市给他安排一个职位，可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他至少应该爬上断头台一次，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不愿意做刽子手。”

“你为何又回来了呢？没人想你。”夏尔说。

“我始终还是母亲，”玛丽-安娜固执地说，“不管和你们合不合得来。”

“那好吧，”加布里埃尔说，将他的盘子推到一边，“别吵了，明天晚上我爬上断头台感受一下。”

外面，初雪已降。刺骨的寒风透过窗缝吹进屋子。德马雷在壁炉里点起了大火。夏尔则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坐到了琴旁。

暮色来临，天下起了小雪。熊熊火炬照亮了断头台，整个刑场沐浴在幽灵般飘忽不定的灯光里。夏尔不去看热比云神甫。直至到了断头台，他们的目光才相遇。夏尔帮他下车。在观众的掌声中，加布里埃尔第一个拾阶而上，爬上断头台。根据判决记录，首先是伪币制造者被逐一斩首。夏尔站在台阶下面，抬头望着两个儿子和他的助手们。当加布里埃尔指给人群看那个被处决者的人头时，夏尔带着一名新闻记者走上断头台，然后自己重新爬下台阶。此刻，热比云神甫的目光和夏尔再次相遇。那是伤心的目光，忧郁却并不恐惧。夏尔感到身体不舒服，感到自己卑劣。他感到羞愧的是，这个人不得不为他而死。可然后，他努力劝说自己，他没有别的选择，而且因为对待丹曼莉的事，神甫也是罪有应得。新闻记者的头颅掉入柳条筐里。现在，夏尔领着热比云神甫爬上断头台。他刚离开断头台，只听到巨大的断头铡呼啸着落下，耶稣会神甫的头颅瞬间滚入柳条筐里。加布里埃尔抓起它的头发，把头颅举高。人群鼓掌、狂叫、大笑，人命关天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在火炬忽明忽暗的灯光里，加布里埃尔慢慢走上断头台，从容不迫地作了一番步测，好像是在丈量断头台的距离似的。可转眼之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加布里埃尔不见了踪影。仿佛一阵风把他吹跑了一样。他根本就不在断头台上。夏尔朝上面望去，寻找他的儿子。围站在断头台那里的人，开始害怕地叫喊。加布里埃尔却已经躺在了地上，他们在他的周围站成一个半圆形。他在黑暗中从断头台上坠落下来。神甫的头发突然被撕断，加布里埃尔条件反射似的想接住那颗脑袋，却不幸滑倒在大雪覆盖的厚木板上。

夏尔从凑热闹的人群中拨开一条道，跪在加布里埃尔旁边。他把手伸进他的头下，立刻发觉他的脖颈子已断。“加布里埃尔，”夏尔低语道，然后双手抱住儿子，对着夜空大吼，“加布里埃尔！”热泪从他的脸

颊汩汩而下。“刽子手在哭。”有人说道，于是人们突然从四面八方听到这句话：“刽子手在哭。”稍后，亨利将手搭在夏尔的肩上。“我们走吧，爸爸。加布里埃尔应该回到家里去。”亨利把自己的兄弟抬到车里，独自穿越白雪笼罩却已被死者的鲜血染红的广场。夏尔傻坐在断头台最下面的台阶上，在那里待了很久。

夏尔动身回家时，广场上早已空荡荡的了无人烟。没有人等他。家里也是人去楼空。亨利和助手们显然已经将加布里埃尔的遗体安放到祈祷室里去了。夏尔踏进院子，想走进自己的空间，却看到在白雪皑皑的菜园边上有个人坐在长凳上。他向她走去，那是玛丽-安娜。他在她前面几步远外站住。他想轻轻地碰下她，可还是放弃了。她已经太过频繁地拒绝他。“我不需要你。”她喃喃道，匆匆抬头望了一眼。她的脸色沉重，她的眼睛哭肿了。

“你要冻感冒了，”夏尔说，“上屋子里去。今夜很冷。”

“那我正好感冒得了，”她回答，“你反正想着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夏尔本想否认，可还是沉默了，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她的错。

“我这辈子永远不该嫁给你。”玛丽-安娜说。她的脸上写着厌恶。“我母亲警告过我，可我不想听她的话。她说一重诅咒压在桑松家族好几代人身上。她的话应该是对的。”

“世上本无诅咒，玛丽-安娜，这只是人的一种尝试，赋予那些事物一个意义。我们自由了。我也自由了，玛丽-安娜。我将放弃我的职务，然后离开你。”

“你可以离开我，夏尔，但诅咒将会追随你。你想想吧。我明天到我妹妹家去了。”

“她会很高兴的，”他说，“而如果明天下班回家，我没看到你在家里那就太好不过了。”

他走进药房，坐在床边喝酒。他突然就累得不行了，感觉自己好像是一艘无法驾驶的船漂泊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上。他充满深情地想起了加布里埃尔，觉得他没有了痛苦乃是种安慰。不久，他对妻子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怒火，可他马上想到上帝已经惩罚过她了。是上帝夺走了他的儿子，以此交换热比云神甫的生命。他突然相信上帝在观察他。不是高萨，而是上帝注意上他了。他受到了惩罚。那重诅咒回来了。玛丽-安娜也许说得对。然后他感觉窗外有个人影。难道上帝想要拜访他吗？不，他不相信有这样的故事。那是玛丽-安娜。她重新从窗口离开了，走进屋子。夏尔不停地喝酒，后来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约莫中午时分，他还在睡觉。谁也没叫醒他。亨利已经承担起整个行刑的工作。夏尔听见马车离开院子的声音。他把身子侧向另一边，继续呼呼大睡。他只是想睡下去，不愿再醒来。后来他想到了丹曼莉，他的呼吸变得更均匀，他的睡眠变得更安详了。

重新醒来时，他感觉有一只温柔的小手在抚摸他的脸颊。这不可能是玛丽-安娜。她的双手因为整日在院子里劳作而变得粗糙干涩，闻起来始终有一股潮湿的狗皮味。而这只小手却有一股杏仁油的芳香。他把这只手紧紧地拉到身边，又重新睡着了。再次醒来时，他独自一个人，不知道梦见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德马雷给他端来了一盘汤。“夫人说您应该吃点东西。她刚才骑马走了。”夏尔把盘子放到桌上。

后来，亨利叫醒了他。“外面有一个骑兵。他要向你打听事情。”

“他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是他病了或者受伤了。”

“让他进来。”夏尔说着起床了。这种消遣对他很有好处。尽管发生了那么多讨厌的大事，可只要有人找上门来，他还是感到很高兴——作为大夫。骑兵穿着一件黑色风帽大衣，脚蹬一双高及膝盖的皮靴。他在门口对敲靴子，抖落上面的雪花之后，才踏进药房。

“您把大衣放到炉边长凳上，它就可以烘干了。”

“谢谢，先生。”骑兵说，脱下他的风帽大衣。他身上还穿着二件套的蓝色料子衣服，做工考究。他坐在夏尔对面的椅子上，从衣服的里袋掏出一只皮夹子。他松开钱包，好让夏尔看到里面藏有金币。“我有一些很有影响的朋友，”骑兵谨慎地说，“他们忠于我们的国王。他们并不是请求您做不可能的事。一小时前我们的国王被判处死刑。我们会在前往断头台的路上释放他。”

“您走吧，”夏尔说，拒绝地举起手来，“我不会为了世上的金钱支持阴谋活动。”

“我知道，”骑兵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敢来找您。我知道您是一个正派人。我们只是请您不用做任何可能阻碍我们成功释放国王的事情。您只需平静地坐在您的马车夫高座上，一动不动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成。您不会有事的。”

“我不想要这个钱，”夏尔说，“我愿意批判今天适用的那些专制的法律，但我必须遵守它们。我是一名司法官。”

骑兵站起来。“这钱我留下来。如果您不需要，您可以送给穷人。上帝保佑我们的国王。”

“上帝保佑我们的国王。”夏尔轻声道。想到国王即将被斩首在他的

断头台下，他的心都快要碎了。另一方面，夏尔想道，国王的命运沦落至此，是他罪有应得。他从来没有回报过臣民的爱。他什么都没干过，甚至对他饥寒交迫的人民完全不闻不问。“他不可能有别的结局，”夏尔喃喃道，“他咎由自取。”

第11章

1793年1月23日，夏尔在日记上写道："国王之死。"用语言领会这一大事件很困难，因为迄今为止国王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完全被视为是由上帝派来的。那天上午，教堂的钟声还没敲到八下，夏尔就已经和他的助手巴雷、菲尔曼、德马雷以及格罗一起坐在马车里出发了。他们愈是接近目的地，马路上的人流就愈多。到最后，密如蚂蚁的人群挤在一起，仿佛巨大的海怪将他们的马车团团围住。夏尔和助手们通过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数千名配备了枪支和长矛的卫兵，在新任国民军总司令桑泰尔的指挥下，在马路上坚守安全。人群中弥漫着一种阴森恐怖的静寂。没有喧哗，没有叫喊，只是一片静寂，就像所有的人在联合进行一次神圣的行动。约莫十点，他们终于抵达革命广场，行刑架和威严的断头台早已在广场上准备就绪。夏尔又一次被这个幽灵震撼住了。断头台兀立在自由的天空下，自有一种崇高庄严的气氛，似乎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宗教仪式的祭礼。

亨利已经站在行刑架的平台上。他用手势示意一名骑兵给他的父亲开出一条路来。夏尔感到自己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剧烈。他伸手去摸夹克衫下面，确认匕首、手枪、火药盒和子弹袋都还牢牢地绑在身上。他感到害怕。最近的恐吓信铺天盖地，他对有人将会释放国王不再抱有怀疑。他对着革命街的出口不停地张望，在人群中寸步难行，那辆将不幸的国王送到断头台去的马车还没有出现。可突然之间，他听到了马蹄声和叫喊声。一支骑兵队飞奔而来。骑兵的上身突出在人群中，紧接着，夏尔看到国王的马车驶过来了。他匆匆坐在断头台的木板上，做了一次深呼吸。他的眼前一黑。汗水从他全身的毛孔里渗出来。他要站起来都很勉强。他觉得脚下没有支撑，厚木板在活动，似乎要漂移。他想起了加布里埃尔，他想起了丹曼莉，可马上又不知道自己刚才在想些什么。唯有一种可怕的压抑感猛然攫住了他。

"到下面去，"亨利说，"在台阶脚下等着，然后给我一个信号。"夏尔点点头。广场上依然死一般的静寂。大家只能听到马蹄声。

国王的马车在断头台前停下。卫兵们各自散开，在马车周围形成一个四边形。之后，国王从车上下来。心平气和，若有所思，但没有任何慌里慌张的表现。他看起来要比夏尔记忆中更庄严、更崇高。那位爱尔兰神甫站在他边上，嘴里不停地祷告。德马雷知道采取主动出击，而夏尔和其他三位助手却呆若木鸡地盯着国王看。德马雷满怀敬畏和尊重地向这个濒死之人解释道，按照规定他有义务脱下他的衣服。他本想伸手拿住国王的上衣，可国王怒气冲冲地朝后退。“拿走我的上衣，但别碰我的身体！”那名男子说，而在不久前，作为路易十六国王，他还在整个欧洲受到尊重。“我们必须绑住你的双手，剪掉你的头发和领子。这是规定，卡佩公民。”他真的称呼他为卡佩公民。

国王忽然直愣愣地盯着夏尔看，夏尔浑身的干劲和力量逐渐消失。有一瞬间，他想跪下来，请求法兰西国王原谅。可他马上想起了自己职业的尊严。因为你，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夏尔想道，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又因为革命，我们的人找回了自己的尊严。真见鬼，你为何提早并且自愿地放弃你的王位呢？因为你想维持一切，所以你现在失去了一切。国王之死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代价。

夏尔迈出几步走到国王跟前。“绑住双手是有必要的。否则我们无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他低声道。国王不看一眼刽子手，只是点点头。可他神色不动。夏尔请神甫给他帮个忙。神甫立马明白怎么回事，在国王耳边轻轻说了两句。国王显然感到很屈辱，忙将双手放到背后。夏尔这下可以绑住法兰西国王曾经用来发号施令的双手了。在爬上断头台的台阶之前，路易·卡佩亲吻着爱尔兰神甫举到他嘴前的圣母像。一踏上断头台的平台，卡佩公民面对着已不再是他的臣民的民众，用坚定而清晰的声音高吼：“法国人啊，你们看到你们的国王愿意为你们而死。但愿我的鲜血能换来你们的幸福。我是无辜而死。”

桑泰尔骑着马开出一条道，好不容易到了断头台，暗示鼓手立即敲

击双面锤。国王的临别赠言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击鼓声中。夏尔转向爱尔兰神甫，可就在这一刹那，沉重的断头铡呼啸着落下，国王的人头顷刻间滚入柳条篮中。夏尔完全没有注意到，国王早已被捆绑在厚木板上。亨利从篮子里拿出人头，而就在这时，鲜血就像喷泉一样从国王矮胖的残缺躯体上喷出来。对这样一个有着粗大颈脖子的人，他们真的使用了一把带倾斜的刀刃。正当亨利将国王的人头展示给人群看的时候，有一些人拿着手绢冲到断头台上，好让自己的手绢沾满鲜血。有个别人在高呼“共和国万岁！”可广场上占据上风的却是狼狈的沉默。人们感到尴尬。现在，他们果真把自己的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夏尔又一次被眩晕击倒。尽管非常理智，可他还是感到这种行为犹如背叛，犹如一种深重的罪孽，犹如弑父，而他相信，国王的躯体将会在他的梦里追随他，从此以后他将在他的酒杯杯底看到国王的人头和他可疑的神情，那种神情是在表达他的困惑和讶异。可是他要成功地反击这颗人头，因为他活该尸首分离。他蔑视他的人民。“共和国万岁！”此刻越来越多的人在铿锵有力地高呼着。

助手们开始拆卸断头台，而夏尔和亨利在用他们的马车将国王的尸体运至玛德莱娜公墓。他们一路由宪兵护送。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收集纪念物的人强占国王的衣物。

玛丽·格劳舒兹早已等候在公墓。她毫无阻力地得到了国王的头颅，立即着手工作，夏尔和亨利则脱下国王身上的衣服。这具死尸上没有任何王者风范。苍白，肥胖，没有尊严，就连他的下体也并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珍藏的所有东西中没有一件可以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既没有他的金子，也没有他的猎狗，抑或凡尔赛宫里的镜子大厅。

疯狂的玛丽咬着牙、硬着头皮，飞快而又熟练地开始浇铸。你无法否认她的天才和激情。她三下五除二地完成工作，满面春风地告辞了。她的马车在等着她。这个惨遭屠杀的鲜血淋漓的尸首似乎一丁点儿都没

有折磨到她。她只为她的蜡像而活。

夏尔正要离开公墓，却见有一名矮个男子站在门口。他穿着一条深黄色裤子，吸着烟斗。是高萨。“我本想看看那个小女子如何获取死者面型。可显然我来得太晚了。有些可惜吧，不过人头落地还会更多。”高萨挡住了马的去路，“您过来，巴黎先生。我请您喝杯酒。我们必须谈谈。”

夏尔原本想去耶稣会修道院去，可他感觉到必须陪着高萨才行。或许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告诉他。或许他正陷入危险之中。

他们一起去了双门街上的那家妓院。基本上和每次行刑之后差不多，这里宾客盈门，大家谈论着今天的主角，每次都能得出结论，被处决者罪该万死，以此表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找小姐的生意反而不多。虽然享受着这样的氛围，领教了许多裸露的肌肤，但大家到这里来首先是为了表白自己公开的信仰。

主大厅中央端坐着当今法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他俩自信地伸展四肢躺在沙发椅宽大的软垫上。两人在谈论断头台和指挥权的事。夏尔觉得自己很卑鄙，被人利用了。

“听说您在记日记，”高萨轻声道，“能让我看下吗？”

夏尔恼怒地摇摇头。“我哪有时间记日记？为谁记？我不需要。”

“竟有这等事，印刷厂里的日记都卖光了，可谁也不记日记。那些人为何要买日记本呢？”高萨意味深长地冷笑道。

“可能会有许多原因吧。”夏尔说。

“我在印刷厂做过一些调查研究，获悉您是忠实的用户。”

“我用来做记录。我的职业需要我这么做。我要记下被处决者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他们被处死的原因，然后编制一份他们临终前随身衣物的清单目录。”

高萨点点头，耐人寻味地会心一笑。他不相信夏尔的话。“我们新闻记者的压力也很大，”他说，“对革命政府而言最好不过的是，我们要每天诽谤公民，然后人们就可以把他们送到断头台去。但是每一个公民都是潜在的读者！”他俯身向前，对夏尔低语道，“您瞧那儿，我们的新国王们。”他的整个脸上洋溢着嘲讽。

罗伯斯庇尔认出是高萨，对他喊道：“高萨，你就写下这样的话吧：共和国要解决的就是彻底消灭反对它的人。”

“那巴黎的居住条件马上就会改善了。”高萨说道，点了一杯香槟酒。

“我们不仅要惩罚我们国家的叛徒，而且也要惩罚那些漠不关心的人，惩罚每一个消极被动、不为革命出工出力的人。”圣茹斯特拿腔拿调地补充道。

罗伯斯庇尔乘势附和道：“北部有德国人在进军，南部有英国人在进军。凡尔赛已经请求英国军队支援了。我们必须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从此以后将它命名为‘无名之城’以示警告。唯有采用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才能从内部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我们才能腾出手来对付聚集在我们国境线上的外来敌人。”

“爱国主义者，”高萨带着有点玩世不恭的神情说，“我刚好听说里昂也已在英国的保护之下。现在，在总共八十三个省中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省反对自由。真没想到。”

“他们所有的人马上就会支持我们了，”罗伯斯庇尔说，“不管是出

于信念，还是出于恐惧，我都无所谓。谁现在还想扮演温和派的角色，他可以剪掉自己的头发准备上断头台吧。我们有可能错杀一千名无辜者，但为了革命总比漏杀一个温和派要好。”

“坟墓里人满为患总归要比监狱里人满为患好。”圣茹斯特干巴巴地说。

“我们认识吗？”罗伯斯庇尔对着夏尔问道。

“还没有。”夏尔答道，离开了房间。

夏尔和高萨离开妓院时，两人谁也没说话。他们默默地沿着马路走，在一个路口停下脚步。“今天不是喝香槟的日子。我得小心了，”高萨说，“我树敌太多。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被列在名单上，然后我就人头落地了。您可曾在断头台上斩首过一个朋友？”

夏尔摇摇头。

“您将会经历这样的事。”高萨说。

“您今天究竟为何要请我喝酒？”

高萨注视夏尔良久。“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了。今晚已经向我证明，相信一个人很危险。法国共济会跟您联系过了吗？”

“没有，”夏尔回答，“他们应该和我联系吗？”

高萨耸耸肩。“大家感到恐惧，先生。恐惧比任何法律更强大。”他吸了吸烟斗。

“您今晚想告诉我什么，高萨公民？”

“我？”高萨虚情假意地问。

“对！”夏尔嘟囔道，恳求地看着他。

高萨躲开他的目光，有点迷惘地摇摇头。“我得回家了，桑松公民，已经很晚了。”他稍显匆忙地拐入灯火阑珊的拉维瑞雷路。

夏尔跟在他后面走着。“您害怕什么？”

高萨没停下步伐。“我该害怕吗？”他加快了脚步。

“不知道。但我看出您害怕。我可以读懂人的心理，先生。一个刽子手可以感觉到他人的恐惧。”他将手搭在高萨的肩上。“您害怕什么？”他几乎以慈父般的声音在和他说话。

高萨烦躁地摇摇头，好像不想听到这个问题似的。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您了，”夏尔说，“您是被关起来了吗？”

“没有，没有，”高萨脱口而出，他惊恐地看了看四周，“我在伦敦，这段匆匆忙忙的时间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危险，不过我是在伦敦，先生。”

“为何您又回来了呢？这并不明智。”

“不，不，并非如您现在想象的那样。我的工作是在伦敦，作为新闻记者。您知道博伊德科尔银行吗？那是青年瓦尔特·博伊德引以为豪的银行。他和一个貌若天仙的克里奥耳女人结了婚。他们一起拜访了巴黎所有用金钱买来贵族头衔的人士，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新的存款。这引起了我们革命者的反感。他们没收了他的银行。”说到这里，高萨突然吓了一跳，试图在黑暗中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种奇怪的声响。一扇窗户被关上了。有人把垃圾扔到了小巷里。“这个年轻人可是有第六

感的，”他继续道，“他趁着这个本该遭到逮捕的黑夜逃到了伦敦。您可知道他带走什么了吗？”

“您会告诉我的。”夏尔喃喃道。他根本不想听到任何秘密，这只会使他陷入危险。有几条狗从他们身边奔跑过去，奔向散乱在巷子四处的垃圾堆中。

“黄金，”高萨轻声道，“巴黎贵族的黄金。他已经把保皇派的财富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我到伦敦去，是为了和他进行一次谈话。他给我看了一些东西，不，他给了我一些东西……”

“那这就让您感到恐惧了吗？”夏尔怀疑地问。

“是的，甚至是极大的恐惧。因为假若有人知道我知道什么的话，我就要站在您的断头台上了。”

“那我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夏尔说，然后站住。

高萨重新加快了脚步，拐入下一条小巷。巷子里几乎没有任何灯光。夏尔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

夏尔还不想回家。他前往耶稣会修道院。一名神甫为他开门。听到夏尔打听丹曼莉的情况，神甫遗憾地表示，大家全都聚集在祈祷室里，为热比云神甫做祷告。接着他又说道：“最好您别再过来了。到这里拜访很危险。”

“我必须见到丹曼莉。”夏尔直截了当地说。

“现在已为时太晚，”神甫说，“我们要把暹罗人送回他们的家乡。我们将无法继续热比云神甫的行动了。”

“可是她究竟是否还在巴黎？”

“您现在走吧。”神甫想关上门，可夏尔把他的脚挡在中间。

“务必转告她我找过她，只有您答应我，我才会走。”

“那好吧，”神甫最后说，“我会转告她。”

丹曼莉没有出现，接下来的几天很快就过去了。需要夏尔处决的人越来越多，他发现助手们也已变得麻木不仁。可是就连被判处死刑的人也变得麻木不仁起来。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在前往断头台的路上抗拒处决。他们已经在被告密的恐惧中生活了太久，现在一切终于结束了。死亡成为解脱。

悲哀就好比肌肉一样，夏尔想道。你可以悲哀，随你喜欢或者你不得不这么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肌肉将会松弛无力。加布里埃尔尽管不是从早到晚地占据他的脑海，可每天晚上他都会梦见他。他听见他在弹琴。夏尔在睡梦中哭泣，醒来时，眼里噙满梦里留下的泪水。

“加布里埃尔是一个好孩子，我不该带他过去。他擅长的是音乐。”夏尔和亨利坐在厨房里。他们在喝酒。

“你不用对某个人做的每一步负责，如果他给绊倒或是摔倒了，你是无能为力的。”亨利说。

“可你的兄弟是从断头台上摔下去的。是我派他上去的。他想帮我的忙，结果遭此不幸。是否我给他的爱太少，他不愿意帮我的忙？”

“富吉埃是有责任的，爸爸，他为何要在晚上在有火炬的灯光下行刑呢？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会亲自送他上断头台。”

数日后，夏尔决定重新探访耶稣会修道院，却看到丹曼莉在向他家方向去的马路上行走。他难以控制自己，开始奔跑。她扑到他的怀

里。“永远别再让我孤单一个人。”她低声说。

他紧紧地抱住她。“我刚好在去你们修道院的路上。”他说。

“我必须回暹罗去，”她忧心忡忡地说，“可我想留在你身边。”

“你当然可以待在我身边。”

他们相拥着离开了市中心，最后在一个低矮的围墙边坐了下来，那道围墙围绕着一座偌大的房产。马在附近的草地上吃草。

“我可以帮你。我们当时不只是学习法语，”丹曼莉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也学了好多关于人体、植物、其他国家以及数学方面的知识。热比云还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他是一个坏人，可他也教了我不少东西。”

他们一起回了家，在药房里聊了很久。

“我不会再让你孤零零一个人待着了，”夏尔说，“过来，我们吃点儿东西。现在很多东西要变。我可能在本月底把我的职位移交给儿子亨利，之后我就不会再有活儿要干了。我自由了。”

丹曼莉站起来，腼腆地亲吻夏尔的额头。“今天晚上我必须回去，明天我再过来。如果我不在教会规定的时间内回去，神甫会不高兴的。”

“答应我，你不会回暹罗去，我等你。”

“我们不用再等很久了。”丹曼莉说，抚摸着夏尔瘦削的脸。然后她解开他的衬衫纽扣，亲吻他。“当你回首时，痛苦才会出现；但当你向前看时，痛苦也会出现。”她轻声道，然后脱下她的衣裙。“可是现在，桑松师傅，我们感受不到痛苦。此刻，我们摆脱了痛苦。正因为如此，

此时此刻是人生中最好的。”

他们一直缠缠绵绵至下午很晚，直至饱尝了爱欲为止。然后他们长时间地躺在床上，享受着两人相聚的时刻。夜渐渐来临，他们开始喝茶。丹曼莉谈起了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的学说，谈起了佛陀。

“佛是你的上帝吗？”夏尔问。

“不，”丹曼莉回答，“佛不是上帝，他也不是传递上帝福音的人。佛是道。佛是一种哲学。你们不是也有哲学家吗？佛教众生战胜痛苦。它以一种认识为前提条件，一种觉醒，明白它说的四种真理。痛苦对人的一生产生影响。这种痛苦皆由贪婪引发。”

就在丹曼莉给这位刽子手讲解亚洲哲学的同时，罗伯斯庇尔已经发出招募令，号召所有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未婚男子从军，这在欧洲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创举，之前他们都是征用雇佣军。“现在我们要发动全面战争了，”他听到自己发出尖锐的声音，“既对外，又对内。”他梦见一个大法兰西，它的疆土一直延伸至其自然的边界：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和大海。它的宪法可以被任意践踏，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更多地剥夺人民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取代国王的是一个嗜杀成性的独裁者。罗伯斯庇尔梦想有一个干净纯洁的民族，一切卑劣的东西都将被彻底消灭。

1793年10月，新建立的革命法庭将二十一名吉伦特派成员送上了断头台。那是最早一批为革命理想英勇奋斗的仁人志士。可现在，他们却统统在断头台上被斩首。紧接着轮到的是埃贝尔派成员，再后来是丹东派成员走上刑场，直至最后，只有罗伯斯庇尔的政党还在掌权。仅仅是运送吉伦特派成员上刑场，夏尔和亨利就用了四辆马车。现在折磨他们的是，他们偏偏不得不处死人权之父们了。所有的人都曾誓死捍卫自由，誓死捍卫革命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令人震撼的是，他们爬上断头

台时是那么镇定自若。谁也没有乞求苟且偷生。他们只是太了解他们的罗伯斯庇尔们和圣茹斯特们了。皮埃尔·韦尼奥，虽然是一个几近默默无闻的吉伦特派成员，却足以重要到承受惨遭杀戮的命运，他对着夏尔嚷道："现在革命要吞噬它的孩子了。"

夏尔只是希望一点：所有这一切将很快有个了结。可是，桑松一家需要越来越多的马车。他们每天必须把最多五十名死刑犯送至断头台。亨利操作断头铡的机械装置越来越麻利，巴雷和菲尔曼松开被斩首者的绳索也越来越迅疾，然后把他们视同染上瘟疫的动物尸体那样倒入马车里。前面的人头尚没落地，格罗和德马雷已将接下来要斩首的人送至断头台。菲尔曼和巴雷马上对被斩首者采取行动，他的手臂被抓住，人被绑至木板上，那块木板立刻回复至水平位置，然后推到前面，而亨利几乎在同一时间让巨大的断头铡滚落下来。夏尔、亨利和他们的助手们仿佛轮子在一个驱动装置上转动，这个驱动装置由栎木横梁、断头铡以及人类手臂组成，这些海怪一再给机器带来新的动力。有一个人称这台机器为理性女神。如果这个人说得对，那么他们就是理性女神的仆人，并且向她奉献人祭。可夏尔并非是唯一讨厌人祭的人。他觉察到菲尔曼总是脸色苍白，巴雷真的每次都是跌跌撞撞地走到断头台，好像他的大腿不听使唤，而亨利细长的大腿则颤抖不已，仿佛死亡的微风在他的身体四周吹拂。

巴黎的民众开始抗议这淋漓的鲜血，它流入排水口，引来野狗出没。人们在考虑强制拴住狗，考虑轮换行刑设施。在玛德莱娜、埃拉溪以及皮克普公墓附近的居民因为渐渐腐烂的尸体发出的臭味而提出抗议。他们也担心地下水受到污染，生怕因此染上疾病。巴黎需要更多的墓地。在古老的玛德莱娜教区，由本笃会修女们种下的菜园被挖出，挖出的大坑有十英尺深，然后用手推车运来生石灰填上。在这里，有一段时间，被斩首的尸体，就像是从屠宰场里运来的垃圾一样，被草草掩埋在万人坑内。

大量的鲜血在流。每天最多有五十人在断头台上被斩首，那就是三百升鲜血。等到轰轰烈烈的场面过去，爱凑热闹的人就会徘徊在广场上，鲜血粘在他们的鞋子上。他们就这样将血迹从整个城市一直带到自己家的客厅里。而太阳一出来，一旦闻到热烘烘的血腥味，人就会感到恶心。柳条筐不再像从前那样经久耐用了。他们行刑所在的地面，因为血太多而被泡软了，干燥后就会裂开。七颗人头放在一只柳条筐里实在太多了。夏尔对额外增加的柳条筐要求提供更多的资金，同时要求增加一名助手，好让他在七次行刑之后清洗断头台。恐怕不能让即将处决的人看到那么多的鲜血，他们一定很虚弱和恐惧，而把他们绑到木板上则要艰难得多。可富吉埃认为把死囚绑到血污的木板上，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盯着柳条筐里血迹斑斑的头颅看，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

富吉埃不让夏尔走。他希望看到伟大的刽子手站在断头台上。夏尔的退职或许会给民众传递一个信号，恐怖统治业已失去支持。

像是在恍恍惚惚中，夏尔完成了很多处决。因为太全神贯注于例行程序，他都不去仔细想想前面都做了些什么。每当夜深，当他真的想要安定下来时，巨大的痛苦便会悄然找上门来。之后他喝酒，并试图用写作的方式整理思绪。可他的手为屠杀所累，它就像一块肉躺在他的书桌上。而他的日记本上那崭新的一页依然像他的床单一样白。他真想大吼一声。唯有丹曼莉才能使他摆脱精神错觉，可他们没有再相遇。耶稣会修道院的神甫们再也不给他开门。他们躲在修道院里不出来了，他们感到恐惧。

夏尔几乎没注意到，高萨不再给报纸写文章了。他以为他逃到国外去了。可夏尔再次与他相逢，却是在断头台的台阶上。这个矮个子男人上身穿着一件浅褐色大礼服，里面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凹纹马甲，下身穿着一条深黄色鹿皮裤子。虽然他的双手已被绑住，可他依然吸着烟斗。“这是我第一次没法写下来的处决。”高萨沉思地说道。夏尔困惑地

抓住他的右上臂，带他到断头台的折叠木板上。“稍等一下。”高萨说。夏尔给他行了方便。“您知道我的罪行吗？”他轻轻地说。夏尔没吭声。他一直抓住高萨的胳膊，努力使他平静。“我们的吉约坦博士写了一本小册子，”高萨继续道，“对新闻自由的一曲颂歌。然而，印刷机被迫叫停，书也遭禁了。我就写了这么一件事。假如我们不再允许倡导新闻自由，那这场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夏尔点点头。他不想阻止被判处死刑的人诉说在他们看来至关重要的事。因为夏尔知道，人在死亡的瞬间总会后悔。他会后悔自己做过的事，也会后悔自己没做的事。这是通往地狱的最初滋味。在这一时刻，濒死之人的思绪如一团乱麻，犹如开天辟地前万事万物正处在混沌时期，那时候，人尚未成为人。他们毫无防备地听任万事万物的摆布。他们无法控制自己。

高萨突然拥抱他的刽子手，情不自禁地尿了出来。“再见，巴黎先生。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朋友。”夏尔也默默地拥抱这个矮个子男人。高萨伸展手臂，他在寻找夏尔的耳朵。“如果到了墓地您给我脱衣服，”他低声道，“您看下我右边马甲口袋里的东西。那是我留给您的。”当他的头向前被搁到木板上，看到下面被斩下的头颅时，高萨失声痛哭。“痛苦只是很短暂，是吗？”他还问道。话音一落，他的头颅已经掉入柳条筐内。

接下来依次被送上断头台的有洗衣妇、雇工，甚至还有一名马夫，全都是贫民。他们从来不会对政治产生兴趣，唯一的罪行就是因为曾经在一名保皇派家里做过小工。或许这些显然很无辜的人惨遭处决，成了威慑的组成部分，成了恐怖统治的组成部分。最后被拉上断头台的是两名贵族，他们试图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国外。一切进行得非常之快。他的助手们动作娴熟。当最后一颗人头噼啪一声落入血淋淋的柳条筐内，巴雷和菲尔曼迅即将无首尸体抬入车里。亨利再将单独的头颅一一提上

来。被斩首的脑袋被安置在各自尸体的大腿中间。

夏尔和他的全体人马默不作声地前往墓地。今天不得不处决高萨，多少触动了夏尔的心弦。他想起他们初次见面是在处决达米安的行刑现场。当时，这个小记者让他心情烦躁，可到最后他还是喜欢上他了。而现在，他因为失去他而开始惦记他了。

到了墓地，他们脱下尸体身上的衣服，随后把尸体扔进万人坑。德马雷再给他们盖上石灰。和以往一样，他们将衣服堆成一堆扔进马车里。只有裤子早就在墓地里被挑拣出来，因为它们大多被粪便弄脏了。尸首分离之后，任何肌肉都会失去控制。唯有单个的神经还在疯狂地抽搐，伪装成还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之后就连这一点也很快结束。

他们把衣服带到家里的库房里。“你们去厨房吧，给自己做点吃的东西，”夏尔说，“这里等到明天再收拾好了。”听他这么说，亨利和助手们无不感到高兴。从某个方面看，他们已渐渐对手上沾满鲜血感到厌倦。

夏尔独自一人留在库房，拿起那件凹纹马甲。他果真在右边马甲口袋里找到了东西。那是一份文件，有好几页。他将文件塞进上衣口袋，回到了自己的药房。他又把那份文件掏出来仔细研究。最后他决定不再去看。如果就是这份文件夺走了高萨的生命，那么他不想去看它。他不想知道里面写着什么。他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他只是一名执行判决的刽子手而已。他想拥有自己的平静，找到自己的安宁。可这一切并非那么简单。死者在晚上找上门来了。他听见他们在说话，听到他们的遗言，他看到他们无助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在恳求他。可然后，他就听到断头铡呼啸着落下，他从噩梦中惊醒。

11月3日，勇敢的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死于断头台，时年四十五岁。“我们不能公开地说话，”她走上断头台时，用镇定自若的语调对

夏尔说，“我们只能公开地死去。可我们只希望拥有和男性同胞同样的权利。”

杜巴丽伯爵夫人也想和夏尔说点什么。12月8日，她不想那么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因受冰雪天气影响，巷子里和大桥上平滑如镜，处决时间不得不被推迟了多次。又逢冬季。这样的严寒季节唤醒了夏尔对加布里埃尔的思念。伯爵夫人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等待死亡。她和其他人迥异。她不沉默。她扯开喉咙咆哮，冲向每一个助手，当巴雷想要剪掉她的头发时，她提起膝盖对着这个可怜的家伙的下腹踢去，并企图抠掉他的眼睛。唯有夏尔走进监狱，她才安静下来。“夏尔，”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救救我，我在凡尔赛附近有一座小宫殿，还有路易十五的珠宝，我是他的情妇。”

“太太，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送您走上最后的旅程。”夏尔说，指了指他的双手。他的左手有一根绳子。

“太太？”她吼道，“夏尔，是我呀，玛丽-让娜·贝库。”

夏尔愣住了。

“夏尔！”她在恳求他。

“我现在想起来了，太太，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您当时跟我说，您马上会拥有杜巴丽的大名。”

伯爵夫人整个脸上闪耀着光芒，马上跪在他面前。“救救我，夏尔，我是无辜的。”她的青春已经不在。她款款而动的样子依然和从前一样，仿佛她还是一位美女，可青春早已从她的脸上消失。凡尔赛宫里油水充足的饭菜使她的脸变成了一个没有轮廓的生面团，唯有鼻子和嘴巴在那张生面团里显得更加幼稚可笑。当年丰腴的乳房越发庞大而粗壮，依然主导着她的整个形象。好像这个身体只是为了烘托出她的巨乳

才创造出来的。

菲尔曼带着一件红衬衫走进监狱。巴雷硬把伯爵夫人拉到椅子上，使她的胳膊交叉至椅背上。夏尔火速把她的手腕绑在一起。他们是一支出色的团队。此刻，菲尔曼站在他们面前，茫然无助地拿着他那件红衬衫。夏尔重新松开伯爵夫人，三个人试图给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套上那件红衬衫。最后，巴雷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她顷刻间安静下来，乖乖地穿上了那件红衬衫。

去断头台的路途漫无尽头。很可能只是夏尔和他的助手们才有这样的感觉。杜巴丽伯爵夫人一个劲儿地叫喊着、怒吼着，痛哭流涕。她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抓住马车的栏杆，叫嚷道："巴黎的民众们，救救我，救救我，我是无辜的！"她发疯般地摇动隔离栏，使劲叫喊着，连旁边的小马路上都能听得到。她的声音比马的笃笃声和轮子的嚓嚓声都要大。"救救我，可怜啊，慈悲啊，救救我！"夏尔任由她胡闹。现在阻止她已经毫无意义。他或许也想防止她冲到他跟前，在大庭广众之中咬他，抓破他的脸，就像她对巴雷所做的那样。这时，她扯开喉咙怒吼着，说话的声音变得很尖。她的喉咙嘶哑了。他们拐进革命广场时，她差点儿摔倒，可还是抓住了马车的横板条，双臂抱住整块木板，撕心裂肺地哭个不停，鼎沸的人声渐渐平息下来。有人如此为自己的生命号喊，却是少见。可人们不想听到这种声音。人们不想看到这种情形。很多人气咻咻地离开了行刑现场。

伯爵夫人不想离开马车。菲尔曼和巴雷把她的双手从栏杆上挣脱开，硬把她从车里拉下来。她使出浑身的解数，拼命挥舞双手，总能摆脱这一只或另一只胳臂，这使她的心中萌生出希望。就在她快要成功脱身的时候，菲尔曼将她推到地上。巴雷想揪住她的大腿，可她像马一样乱踢乱蹬，还多次打中了他的脸，害得他两颗牙齿被打掉了。这时，亨利和格罗急忙冲过去给那两个人帮忙，将伯爵夫人拖至断头台的台阶

上。夏尔平心静气地站在那里。“大人，巴黎先生，请再稍等片刻。”她恳求道。助手们马上朝夏尔看去。他坚定而平静地摇摇头，没有瞧她一眼。

有人此刻听到了来自群众中的抗议声。人们讨厌这种热闹场面。“可别打搅他们了。”有一些人在嚷道。这是新鲜事。这一点难以理解，但民众终于对所有这些处决感到非常厌烦了。巴黎人感受到了某种怜悯之类的东西。极少数人大概看过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可时代已经成熟。个体赢得了意义。民众对他人的命运不再漠然置之。夏尔心想，要是民众一开始做出这样的反应，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被处决了。假如一个人曾经容忍过和法律相符的恐怖行为，那么这个人是无辜的吗？

1794年4月5日，是丹东走上断头台的日子。“给民众看我的头颅吧。它是值得的。”他在爬上台阶前对夏尔说。可后来，他眼里饱含泪水，因为他想起了妻儿。夏尔并没有跟在他后面。他在下面站住，示意亨利解开横木。沉重的断头铡嗖的一声落下，而那颗头颅将要属于那个疯女人玛丽半小时。她不久就要和弗朗索瓦·杜莎结婚，从此以后她将永远只被称作杜莎夫人。

安托万·富吉埃交给夏尔处决的名单越来越长。尽管判决还没有宣布，但部分名字早已列入死亡名单之中。“里昂刽子手、五十八岁的让·里佩被处决，”富吉埃一边说，一边给夏尔最新的名单，“我希望你有足够的车辆和马匹。”夏尔立即明白了这一信息。里佩是保皇派成员。

“国王早就死了，”夏尔丝毫不为所动地说道，“我可以马上将我的职位移交给我的儿子了吗？”

“还不行，夏尔，”安托万悄声说，“还没有完。不过快了。”

好几个月没有听到丹曼莉的消息了，夏尔感到很绝望。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他急匆匆地奔向耶稣会修道院。他只想把丹曼莉带走。永远地带走。他也想过是否应该和她一起离开巴黎。亨利年纪够大了。当他终于到达修道院时，他惊恐地发现那里已经所剩无几。无套裤汉们一把火点着了修道院。夏尔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奔到已被烧得黑不溜秋的门口。他爬到坠落的梁上，那里还一直暗自发出熏人的烟味。“丹曼莉！”他喊道，急忙冲进院子里。那里连个影子都见不到。他此刻站在药草园里，往四周探看。“丹曼莉！”他不停地喊道。

“您还想干什么？”有人叫道。一名神甫从一根柱子后面走出来，“他们把丹曼莉抓走了。”

“为什么？”夏尔怒气冲冲地吼道。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您不应该再到这里来。您只是给我们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想再落入司法的视野，谁知道接下来他们又会想出什么事来。”

这个消息，犹如暗箭击中了夏尔的心脏。丹曼莉居然因为所谓的保皇派颠覆活动而锒铛入狱。

神甫走近夏尔，尖叫道：“您瞧瞧您都在这儿闯下什么祸了。”说完他揪住夏尔，可夏尔一把挣脱他的双手，急匆匆地向大街跑去。他要马上质问富吉埃。

富吉埃让他等着。这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夏尔多次吩咐过穿着蓝色制服站在门口的那名仆人，他要马上拜访富吉埃。两小时后，那扇门终于为他打开。

“究竟哪儿出事了，桑松公民？”富吉埃问道，眼睛却没有离开他的案卷，“我们不是才见过面吗？”

“耶稣会修道院里住着一位来自暹罗的女人。她被您的人抓走了。为什么？”

“你怎么会对此感兴趣，桑松公民？”富吉埃直起身子，疲惫地向后靠在沙发椅上。

“她是我的病人，”夏尔说，“我相信这里一定发生了误会。她从来不对政治感兴趣。”

“可现在政治对她感兴趣了。她到这里来是为了学习我们的语言，可她干了些什么？前不久她还在给热比云神甫熨烫衬衫。一个保皇派分子的衬衫。”富吉埃微笑着，用舌头反复地舔着门牙，仿佛要想方设法将饭菜残渣剔除干净。“热比云神甫，”他继续道，“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我们满意地获悉了桑松公民的合作。可是你不也知道，这还不足以清除体内一个有疾患的部位，你必须在这个病灶周围花大力气，并且要将附近的一切切除。你不是学过几个学期的医学吗，是不是？”富吉埃装腔作势地向后甩头。“我还有事情要做，桑松公民。”

“我想和她说话。”

“桑松公民，我们可以放弃任何一个人，也可以放弃你。你别吹大牛。而且要和那些参与保皇派颠覆活动的人保持距离。我们要把他们斩尽杀绝，所有的人。也包括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不管他们是熨烫衣服的，还是制作鞋子的。”

“我想找她谈话。”夏尔坚持道。

富吉埃拖延时间回答他的问题。他显然在享受看到夏尔受折磨这一幕。“那好，”他稍后说道，“你至少把热比云神甫交给了我们。就这样吧。”他按了下书桌上的闹钟。仆人走进房间。“请给桑松公民签发一份探监许可。是一名来自暹罗的女士。”

“哪个监狱？”仆人问。

“我得查看一下，可我没有时间。”富吉埃冷笑道。

夏尔很清楚他在撒谎。

夏尔首先探访修道院监狱，然后去了修女监狱，歌剧院院长和十三名演员正在那里等待死亡的来临。自由港监狱里只关押女性。她们嘲弄着注定的命运，抑扬顿挫地呼喊“国王万岁”，“给我一个男人吧”。这里也没有找到丹曼莉。人权路上有大力监和小力监两座监狱，直接受富吉埃领导。夏尔碰巧在监狱的院子里遇见富吉埃。富吉埃从他身边走过时顺便喃喃了一句：“你到钥匙路上的圣佩拉热监狱试试吧。”

圣佩拉热监狱可以容纳大约五十名囚犯，可被关押在此的囚犯多达三百五十人。他们在草褥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寻找和被拘捕的共和军将军比隆公爵亲近的机会。比隆公爵身上总是带着足够的钱，给监狱长提供好处费以获得庇护。每一项服务都有清清楚楚的明码标价：饮料、精美食品、书籍、探监，所有的一切都需付费才有可能。许多囚犯是妓女，他们给这位贵族保皇派成员提供了美妙的时光，还有一些女人，她们唯一的罪行就是因为她们曾经是某个被处决者的女友或情妇。比如有一个克里奥耳女人，她和英国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保持过一段恋爱关系，她不明白自己被逮捕的原因。她来到断头台上时，他正在伦敦庆祝成功逃离巴黎。有些人唯一的罪行只是因为自己是个有钱人。

夏尔被带至地下大厅，那里已被改造成关押众多犯人的集体牢房。大厅里潮湿，霉味十足，还有粪便的臭味。围墙由沉重的大方石构成。拱形的天花板上爬满了无数的蝙蝠，它们犹如黑色的小雨衣。几个女人立即走到栅栏那里，抓住铁栏杆。“操我呀，”一个女人对着他的脸喊道，“只要一怀孕，我就自由了。”

夏尔在一个栅栏前探看，女人们纷纷涌至栅栏后面。“我在找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来自暹罗。”

“国王万岁！”一些人叫喊道。

“有一个女人曾经在那里，”看守说，“可我无法告诉您是否她已经上断头台了。不过您，先生，您一定知道答案，那是您的断头台。”看守冷笑道，露出嘴里的最后几颗烂牙。他的脸形都走样了，仿佛铁夯压扁了他的鼻子。

“丹曼莉！”夏尔绝望地叫道，仔细倾听。

“我是丹曼莉。”一个妓女嚷道，摇动栏杆。

“别听这个荡妇的话，”另外一个妓女说，“我是丹曼莉。”

看守做了个结束的手势，然后指了指门口。“很遗憾，巴黎先生。”

“在您眼里她肯定与众不同，公民，她是黑皮肤。”夏尔在他面前站住。可看守重新摇摇头，又指了指门口。夏尔犹豫不决地走了几步。

“昆底。”他忽地听到有人叫道。

他急切地盯着栅栏看去，可在所有的女人中他哪儿都认不出丹曼莉。

紧接着，他又一次听到那个声音，这才看到那只瘦小的胳膊正透过栅栏向空中招手。那是丹曼莉。她跪在栅栏后面。“我会等你的。”她叫道。

夏尔也跪在栅栏前，握住她的双手。他把她的双手紧贴在他的脸上然后亲吻。“我要救你出去。”他说。

“不，”丹曼莉说，“这不可能。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在那儿，在另一个世界，我会等你。别害怕。”

她把头紧贴在栅栏上，嘴巴在栅栏之间，然后闭上眼睛。夏尔亲吻她，没有松开她的双手。

“我能在这里过夜吗？”夏尔问看守。看守摇摇头。

“您得问问价格是多少，而不是问可不可以。”一个洪亮的声音说。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为自己辟出一条路，径直走到栅栏口。“比隆公爵，共和军将军。”囚犯自豪地自我介绍道。他头发灰白，连鬓胡子很长，脸形有点凹陷，而且因为常年在野外，饱受日晒雨淋影响而又不注意保养皮肤，整张脸呈青皮色。他递给夏尔好几枚钱币。“这点钱该够了，巴黎先生。不，不必，不用谢，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也没有继承人，我该如何花掉我的钱呢？”

夏尔把钱交给看守，看守悄悄地塞进衣袋里，装出没有任何反应的模样。

“再给我来两瓶波尔多红葡萄酒，”将军大声对着看守嚷道，“给这位先生来一捆秸秆。不过是要干秸秆。”

清晨时分，丹曼莉和夏尔都睡着了。他们睡在栅栏的两侧。手挽着手。

夏尔真的希望能够挽回丹曼莉的性命。可是当他上午站在富吉埃的办公室，看到被处决名单时，他的呼吸中止了。他连问都不问一下，就坐在富吉埃对面的椅子上。

“我让你坐下来了吗？”

“您把这个女人放了。”

“我知道，桑松公民，这个来自暹罗的女人。你现在还是找到她了。”富吉埃在浏览卷宗，“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过您应该把她释放掉。请您帮我一个忙，下次有机会我会报答您。”

“桑松公民，”富吉埃开始道，“首先我们有了一个有效的法庭判决，谁也无法撤销这个判决。其次你恐怕无法给首席公诉人帮上忙，让他值得为此疏忽自己的责任。难道你想贿赂革命的首席公诉人吗？这个暹罗女人今天会人头落地，明天还会轮到其他人。而如果你要坚持的话，巴黎先生，那么我就叫人给你戴上镣铐，因为支持反革命。我们现在可以达成一致了吗？”

夏尔默不作声。他明白丹曼莉已经没有机会活过今天了。他俯身对着富吉埃的书桌。“我警告你，安托万，要是丹曼莉死了，你也会死的。”

“哦，”富吉埃讥讽地回答，“我还从未见过你这种样子，夏尔。你看起来真的怒气冲天了。当年在鲁昂时我就问过自己，究竟该如何惹你，你才会愤然反抗。想必你从前从不敢这么做。你瞧，革命让你解放了。你真该感谢革命！”

丹曼莉和三个妓女一起前往断头台。夏尔坐在她旁边。这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因为为了让被处决者平静，他一向就是这么做的。可这一次，在整个行驶过程中，他的手触摸着这个黑皮肤矮个子女人的小手。他的助手们低着头。夏尔也同样低着头。他爱这个女人胜过一切。她已经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一旦失去她，他一定会心碎的。

当马车拐入格莱夫广场时，人群中出现了鼓掌声和欢呼声。可倏忽

之间，所有的人全都沉默起来。丹曼莉站起来，夏尔也站起来。他站在她旁边，高出她两个头。她在他旁边就像个孩子。

“不要孩子！”后排有人突然叫道，“不要孩子！”其他人重复道，而就在蓦然之间，所有的叫喊汇合成同一种声音：“不要孩子，够了！停下！”附近人家都把玻璃窗关上了，仿佛想要回避瘟疫似的。夏尔真想永远走不完这个行程。他从内心深处希望他们漫无目的地乘坐这辆车行驶下去，手拉着手，直至世界的尽头。可他马上看到两根柱子呈垂直状耸立在空中。他在搜寻人群。有一瞬间，他相信会有转机，相信命运的安排，相信奇迹的诞生。女人们从车上下来，走到断头台前，夏尔一看到司法代表，知道谁也阻止不了这次处决了。

“要坚强。”丹曼莉迈开脚步走到最下面的台阶时说道。她站住不动，注视着他。“我们会再见的，昆底，佛祖保佑我们。”

上了台阶，夏尔想跟着丹曼莉，可她无比温柔地把他推到后面，难以察觉地摇摇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告别。我不害怕，夏尔。我们来世会有好报的。”亨利拦住父亲。他攥住他的胳臂，带他走下断头台。“回家吧，爸爸，今天不是你的日子。”

夏尔站住，双手支撑在一根柱子上。他听到那扇弧形窗砰地关上，断头铡呼啸着落下，脑袋滚落至柳条筐中。鲜血。到处都是鲜血。他呆若木鸡地站在断头台上，而他爱人的鲜血从没有固定好的厚木板之间飞溅到他的额头上，她的鲜血然后和之前被斩首的其他人的鲜血混为一体。一只狗冲了过来，开始舔舐鲜血。夏尔猛地踢了它一脚。狗狂吠了一会儿，蜷缩着身子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夏尔还从未感觉到自己离人类竟然如此遥远：被放逐，受蔑视，遭屈辱，身上沾满了罪犯的鲜血，而且毫无希望。他无法逃离地狱。他的鞋上沾满了丹曼莉的鲜血，而现在这血迹肯定会到处跟踪他。鲜血重新滴落到他的额头上。他觉得好像魔鬼亲自为他洗礼。夏尔本想用手擦掉血迹，可他只是把血迹

抹到了脸上。他感到呼吸艰难，不小心撞在柱子上，踉踉跄跄地爬下断头台，径自走进人群之中。可一看到满身鲜血的刽子手，他们又马上分散开了。当夏尔终于从广场上的人群中脱身，走近最前面的几栋房子时，他支撑着身子离开了第一栋房子的围墙。接着，他蹒跚着从一栋房子走到另一栋房子，稍微歇了会儿，有时就坐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然后重新吃力地站起来。他觉得好像自己缓缓地走在一条褐色的鲸鱼背上，鲸鱼并不想平静地保持某种姿势，而是晃晃悠悠地让波涛溅出浪花，直至浪花击中了夏尔的脸。天下起雨来。他的眼睛无法盯住任何一个点，只是漫无目的地变换着，向他显示重影，而重影又增强了他的眩晕度，可以持续不断地刺激他。那些房屋似乎对他充满敌意。它们开始隆起，仿佛全都怀上了孩子一样。为了避免摔倒，他加快步伐，可脚还是被绊了一下。

黎明时分，夏尔坐在塞纳河畔。血已变干。一只小舟将商品运往城里。塞纳河的对岸，巴黎已经苏醒。商贩们拉着手推车，或者驱赶取下笼头的耕马将满载的新鲜货物运到集市上去。夏尔拿起一块石头紧抓在手里。他有一种感觉，好像这块石头在他手里将会变得和海绵一样柔软。可石头并没有改变它的形状。夏尔的颌骨在抽搐，牙齿在格格作响。他感觉到那只铁夹犹如断头台的弧形窗砰地一声掐住了他的脖子。我吓住了，夏尔想道，作为断头台的胳臂，我将在这里受罚几百年，而唯有我的大脑还在工作，好让它折磨我。

“巴黎先生！”

“爸爸！”

夏尔吓了一跳，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现在他看到他们过来了。他们奔跑着穿过草地。他们向他奔来。他的助手格罗、巴雷、菲尔曼、德马雷以及两个儿子亨利和加布里埃尔。有点儿不对劲。加布里埃尔为何能奔跑呢？夏尔一骨碌跳起，急匆匆地沿着塞纳河畔朝正在熊熊燃烧的第

四十四号海关大门方向跑去。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看到了加布里埃尔，那么说他并没有出过致命的意外。那么说他只是梦见他死了。可是，真见鬼，他们怎么会向他奔来？而且为何他们是六个人？一个人过来说话就够了。可他们是六个人。因为他们想要抓住他。可是为什么呢？然后夏尔才明白过来。他们是要把他送到断头台去。可是那份书面判决在哪儿？“哪儿？”夏尔嚷道。

“这只是一场噩梦而已，爸爸。”亨利说。

夏尔掀开被子，昏昏沉沉地坐到床沿。“加布里埃尔死了。”他说，确切地说像是在探询，然后恳求地看着亨利。

“是的，”亨利说，“加布里埃尔从断头台上坠落，脖颈子断了。”

夏尔点点头。

“富吉埃在找你，”亨利说，“你得起床了。”

“又有任务了吗？”夏尔叹息道，“难道就没完没了了吗？每执行一次判决，他们就从我的大脑里切下一块。他们偷走了美好的回忆，留下的只是滚落的头颅，它们扑通一声蹦跳着穿过厚木板，默默地谴责我。我的手碰到了什么，就会变红，变成血红。我的双手怎么了？”

“你的双手没问题。你还是躺下吧，爸爸，我已经和我们的助手一起干完活了。”

夏尔倒在床上。亨利把他的被子拉高至下巴。

“你知道一个空荡荡的谷仓看起来是怎样的吗？”夏尔喃喃自语。

亨利点点头。

“如果他们掏空了你的一切，你就像谷仓一样空荡荡的了。挽具、马车、马，所有的一切都没了。他们只给你留下火钳，好让你继续受尽折磨。”

亨利窘迫地沉默着。

“我要骑马出去，”夏尔说，“去塞纳河畔，不，不，我去过那里了。”

“那是在你的梦里，爸爸。”

“你这就走吧，去断头台。她在等着我们。”

“爸爸，这只是一个有着锋利刀刃的行刑架而已。”

“不，不，”夏尔反驳道，“他们创造了我，他们只是为了断头台才创造了我。而断头台留下的淋漓鲜血使她复活了。你们等着吧，她马上就会站在我们的家门口。”

“丹曼莉，”夜深了，两人还在喝酒，夏尔对亨利说道，“我爱过她，之前还从未像爱她那样爱过任何一个人。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会有这样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要比风、水和步枪子弹更强大。”

亨利尴尬地挠着耳朵。

“她是无与伦比的，”夏尔低声道，“我把我的心献给了她。一个人只能奉献自己的心一次，一个人只能爱一次，然后爱就许了人。你后来再给出的，那是某一种东西，但不能再称之为爱。”

“那不必是爱，”亨利说，“一个人没有爱，照样可以活下去。”

“但如果你看到过天堂，那就不能了。”夏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护身

符放到桌上。“这是桑松家族一只开裂的钟，一只没有铃声的钟。这是我们的一位先祖留下来的一件礼物。它是在新大陆用银子铸造的。现在它归你了。我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亨利。死亡不会比我活在世上经历的痛苦更糟糕。我会毫无恐惧地死去。”

“可是爸爸，”亨利害怕地说，“现在还不是死的时候。”

“结束刽子手王朝吧，”夏尔说，“拯救我们的家族吧。你的后代可以从事任何一种职业，面包师、细木工、印刷工，任何一种都可以，但别做刽子手。”

“你感觉不舒服吗，爸爸？”

“生命渐渐离开我的身体，”夏尔轻声道，“它不想再继续了。总有结束的时候，亨利。”

夏尔累得睡着了。可没过几小时，妖魔鬼怪纷至沓来，纠缠他不放。他总是梦见到丹曼莉没有死，她还在某个地方活着。可她只活在他的梦里。“她死了。”梦里的那些人对他嚷道，可他并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硬将她的尸体藏匿起来，然后寻找某个人向他证明，她并没有死。可在他的梦里，谁也不愿意证明这一点。而当他醒来时，他知道丹曼莉已经死了。他走到外面的院子里，凝望着夜空。他发觉自己无比寂寞。

他在等待疲倦再次来临。有时他喝酒，之后再回到药房，重新躺在床上。他无法沉睡。他只是独自打打瞌睡。突然，他大吃一惊，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正是那声音把他从梦中叫醒。“昆底。”

夏尔躺着没起来。“是你吗，丹曼莉？”

“昆底。”

“是你在那里吗？”夏尔问。他一动不动。他感觉到有一丝细微的穿堂风，呼吸到了她皮肤的芳香。“你在我身边吗？”

“昆底。”她重复道，语气比之前更温柔。

夏尔发觉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真的是你吗？丹曼莉，我以为死人不会回来。但有些人会，是吗？”

丹曼莉不回答。

“这只是一个梦，是吗？”

丹曼莉沉默着。

夏尔看到透过门缝下面射入药房的光线。虽然天已黑，他还是看到了鲜血。血流得很快，犹如堤坝决口一样。此刻，门窗被挤坏了，成河的血流肆意涌入屋内。有时地下还有一颗人头。消瘦的头颅和头皮就像仿羊皮纸，眼睛就像烧焦的杏核。巨大的血流把他裹挟着拖走，拖到屋外。在大街的尽头，他看到断头台向自己飘浮而来。高耸的断头台在摇晃，可是它没有翻倒。它正向他漂来。断头台在路上。向他漂来。

“不，”夏尔嚷道，“我没有红衬衫，你们不能把我带走。这是规定。没有红衬衫谁也上不了断头台。”

一名戴着黑色三角帽的侏儒拉住夏尔的袖子。“巴黎先生！国民公会宣布决定，鞋匠只能为保护国家的人工作，谁若违反，谁将被收缴所有的鞋子。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人赤足跋涉在血海中。我们控制不住奔涌而出的鲜血。大地不喜欢吮吸那么多的鲜血。鲜血就像是山中湖泊里的水溢了出来。赤足者沾满了鲜血，穿鞋者沾满了鲜血，车轮上沾满了鲜血，马蹄上也沾满了鲜血。雨不下了。太阳照耀大地。空气里有股臭味。腐烂味。上帝不喜欢我们把那么多鞋匠送上断头台。明天我们

不再有鞋匠了。我告诉您，鞋匠将离我们而去。我们大家全都在血海中赤足乱跑。”

“别说了！”夏尔嚷道，开始踢那个侏儒。可他踢了个空。那里没有侏儒。

1794年6月17日，一幅漫画在巴黎流传开来。漫画的主角是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他本人躺在断头台上，亲自拔掉锁定断头铡的铁销。“为何刽子手要在断头台上斩决自己呢？”图片说明上写道，“因为他是巴黎最后一个公民。现在巴黎终于被清除干净了。”

6月，夏尔、亨利和他们的助手一共执行了六百八十八名死刑判决。颁布的一项新法律规定禁止被告在法庭前辩护。以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以及富吉埃为首的极端分子离人民越走越远，他们早已看不到自己的疯狂。所有的人都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伪币犯、士兵、军官、将军、神甫、纺织品贸易商、伤疾军人；对残疾人，要先打断他们的骨头，否则没法被送入断头铡下，而对那些虚弱的老人，因为他们无法独自行走，必须由人搀扶着爬上断头台。革命家们带来的不是平等和博爱，而是死亡和毁灭，墓地里早已尸横遍野。

现在，为了给公民自由，废除了君主制度的罗伯斯庇尔果真开始实施统治了。罗伯斯庇尔国王。在国外，人们谈到罗伯斯庇尔运动、罗伯斯庇尔军队、罗伯斯庇尔法律，也谈到他正在为谋求王位而奋斗。谣言四起，让他那些潜伏着的敌人乐不可支，因为让罗伯斯庇尔以暴君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也才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他推翻掉。当有人鼓起勇气将此消息公之于众时，罗伯斯庇尔逃之夭夭了。他熟悉这种恐怖结构。他被逼上了绝路，结果自杀未遂，颌骨被打落。这个只知幕后指使的案犯在实际操作领域笨拙得很，而且解剖学永远不是他的强项。因此，7月28日，当夏尔眼睁睁地看着亨利和助手们将屠杀者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时，他心想，这并没有让人感到惊

讶。从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开始执政到推翻他的统治这段时间，一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六人成为断头台的牺牲品。

“现在只是还缺一份判决。”亨利走下断头台台阶时夏尔说。

“算了，爸爸，我不想看到你穿着红衬衫站在那上面。恐怖统治已经土崩瓦解，马上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渴望最终结束的日子到来。”

“你已经结束了，爸爸。你已经将职位移交给了我。”

“还缺一份判决，”夏尔坚持道，“等到那个名字列入名单，我就不会再去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了。”

“你在浪费时间，爸爸。”亨利温顺地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知道，亨利，可也许这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次日，夏尔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去了。安托万·富吉埃办公室。

“你不敲门就进来了，桑松公民？”富吉埃重新俯身向前看他的卷宗，“你儿子已经拿走了那份名单。”

“我看过了，安托万，看过了你的名单。还缺一个名字。”

富吉埃匆匆抬起头来。“哦，你给我一个名字吗？”

“是的，”夏尔说，走到书桌后面，一把抓住安托万的肩膀，“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

“放开我，疼死我了。”

“我恰恰是为了让你疼才过来的，安托万。我被培养成一个让他人受苦受难的人。可我原本想治病救人。”

安托万挣脱开，想要站起来，可夏尔用力把他按回到椅子上，死死掐住他的脖子。“我也做过调查研究，”他低声道，“就像你当初在鲁昂，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你还记得吗？”

“我要叫卫兵了。”安托万嚷道，试图摆脱刽子手的手掌，可还是徒然。

“他们已经出去了，”夏尔说，“你不用叫他们了。”

“这是怎么回事，夏尔？放开我！”

“高萨从伦敦回到巴黎后，你把他送上了断头台。他从伦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东西。”

“哦是吗？”安托万一筹莫展地摆动他的两只胳臂。

“是的，安托万，是的。”

“夏尔，这还有完没完？你是怎么设想这件事的？你在这里永远不会活着出去。你放开我！”安托万忽然陷入恐慌之中，企图重新脱身。

夏尔把椅子翻过来，使劲朝他砸去。就像是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夏尔对他连续出击，仿佛想要替每一个惨遭处决的人报仇雪恨。宛如一匹马，在马厩里待了太久，而现在马蹄终于出击，夏尔连连击中安托万。即便安托万血流如注地躺在地上，疼得像一只蠕虫那样缩作一团，夏尔依然不依不饶地对他猛踢一通。直至安托万不再动弹，夏尔才在这位最高公诉人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的脚搁在安托万的脖子上。

“你们公布了一项禁止拥有黄金的法律，好让你们毫无价值的纸币

继续消灭整个国家。如果有谁不上缴他的黄金，再换取毫无价值的有价证券，那么他将被关进铁窗六年。可是在高萨从伦敦瓦尔特·博伊德那里获得的文件里，你和你的整个家族拥有的黄金高居榜首。你们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将价值数百万之巨的黄金藏匿国外。那么你应该按照你自己制定的法律被判刑然后被处死。”

“你这么做是不会成功的。”安托万轻声道。他想站起来，可夏尔把他往下压。安托万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头上的巨人看，“你疯了吗？你这样会死在断头台上！”

夏尔抓住安托万，把他提起来，又将他推到桌子边上，拳头往他的脸上砸去，然后拉住他的一条腿毫不留情地猛击。安托万流着血爬到桌子底下。夏尔重新把他拉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安托万风驰电掣般地抓住桌上的闹钟，对着房门扔过去。几乎与此同时，门被撞开了，四名卫兵进入办公室。

“把他抓起来！”安托万命令道。

卫兵把两人团团围住。

“你们应该把他抓起来，我说过。他应该今天上断头台。”

一个卫兵抓住安托万的手臂，另一个给他戴上手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安托万叫嚷道，试图挣脱开。

“我们只是执行命令，富吉埃公民。您被逮捕了，因为您非法拥有黄金，还把黄金带到了敌国。您破坏了革命，和敌人狼狈为奸。”

“那我们断头台上见了，安托万·昆廷·富吉埃·德·坦维尔。我很好奇，你的血会是怎样的颜色。”夏尔说。

“上帝讨厌你们所有的人！”安托万嚷道，卫兵们随即将他带离办公室。

亨利和助手们乘坐马车抵达行刑现场时，夏尔已经站在断头台的台阶旁。他们只有一名囚犯。他应该是恐怖统治行将结束时被送上断头台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个。整个广场上人山人海，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看客。

“富吉埃！”有人声嘶力竭地吼道。富吉埃转过身来。托比亚斯·施密特为自己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路来。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台阶，直挺挺地摔倒在富吉埃面前。他已经酩酊大醉。“你说说看是否喜欢断头台。或许你还可以提出合理化建议。销子、尖轨和导槽应该用铁制品，而不是用木头，是不是？”

富吉埃避开施密特，独自爬上断头台。菲尔曼和巴雷不让施密特跟在他后面。夏尔站在断头台后面，位居两根垂直的柱子之间。当人们将富吉埃固定在滑板上然后将滑板恢复成水平位置时，富吉埃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将永远定格在夏尔身上。

鲜血在厚木板上溢出来了。幸好没溅到夏尔身上。他知道自己该站在哪儿。

富吉埃之死促使夏尔重新拿出日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记录。之后他就永远沉默了。他太虚弱了，无法再拿起笔来。经他之手死的人太多了，被他送上断头台的人足有三千人。他在日记里的最后几句话如此写道：“没有诅咒。永远没有诅咒。唯有一种诅咒你可以相信。可我已经不再相信了：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

夏尔-亨利·桑松再也不去断头台了。他常常坐在河畔，目不转睛地盯着河水发呆。他在想某一个牺牲者是否有可能回来。一种心灵的相遇

或者某种可以对比的东西。既然有那么多的人被斩首，那么有唯一的一个人回来想必也是可能的。假如有个人向他靠近，他会陷入万般恐惧之中。那是真的吗？或者真有人可怕地回来了吗？只要看到悲伤的目光，他总是会想起许多死囚犯总是那么悲伤地注视他。我必须走了，而其他人可以留在这里，他们似乎如是说。这些人将随后跟上，夏尔心想。他一再被吓住。他将每一种声响都和那台奴役他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厚木板嘎嘎作响，折叠木板向前碰撞发出狠毒的尖锐刺耳声，弧形窗砰地关上，销子解开，断头铡呼啸着落下，而随着沉闷的撞击声响起，那颗头颅掉入柳条筐内。

厨房里也有许多听起来类似的声响。他们坐在桌旁吃饭时，他会突然吓得一跃而起，他的心在砰砰地乱跳，脸上毫无血色。他盯着玛丽-安娜看，仿佛从她的脸上能看出是否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幻觉。她嫣然一笑，走到他跟前。他不明白为何她现在在这里，而且在对他微笑。她温柔地从背后将她的双手搭在他的肩上。有时她甚至还和他说话。她说一切都挺好的。或者她问他是否还要喝汤。问到是否他还饿着时，他点点头。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脑袋，秃顶，瘦长，而只要不被声响吓住，他就会显得无比宁静和威严。他的变化没能逃过助手们的眼睛。可他们向巴黎先生表现出了过分的尊敬。亨利始终坐在他右首的桌旁，一直将手搭在父亲的手上，尽管他颤抖的手难以被察觉到。他几近体贴入微地握着父亲的手，用拇指在上面抚摸着。

夏尔骑着马路过已过世的岳父母的园丁之家，沿着无边无际的菜园，直至抵达森林。他选择了一条历经多年后形成的狭窄小径，飞身上马，穿越森林往上山路上爬去，直至看到山丘上草地青葱，这片草地和山崖形成了天然分界线。背阴的地方，草坪上总是湿漉漉的，他的马和马蹄不慎陷入其中。他下了马，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泥泞地。然后他看到了蘑菇。一个个蘑菇大约有一只手的高度。夏尔采摘蘑菇时，那断口部分马上变成了蓝色。他骑马回到林中，一直朝面向太阳的那一边走。

他接着骑马沿河而下。这儿的地是干燥的。他解下马鞍扔到一根树墩子上。他躺在地上，开始吃蘑菇。

起先他只是听到小鸟零星的啁啾声，之后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他歌唱。苍天开始呼吸，可他不怕被闷死，因为他感觉自己那么轻盈，好像在小鸟的绒毛上飘过一样。夏尔从父亲留给他的文学书籍中知道，这种蘑菇在许多许多年以前被用来占卜。因此人们将它称作神灵的肉体。他发觉上帝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他感觉到蚂蚁在他肩膀上蠕动，感觉到它们沿着脊柱渐渐地向下移动，直至爬遍全身。接着，寒冷开始了。他试图起身，可晃晃悠悠的像个醉鬼。就连他的马也在他面前退缩了。他周围的色彩和光线开始闪耀，而且他突然看到某些东西过来了，就像是在一只万花筒里。他重新躺下，感觉到一丝永恒。

“爸爸，”亨利说，“你怎么了？”

“我把上帝吃了，”夏尔低语道，“可上帝只是一只蘑菇，”他带着一丝遗憾补充道，“只是一只蘑菇。”

亨利离开了那只万花筒。他跪在父亲面前。

“河流是真正的人生导师，”夏尔忧伤地说，“一切都在流动。没有任何东西停止不动。你无法留住河流，亨利。水在你的手中化为乌有。人生就是如此。你在水里漂流，一滴水是没有意义的，可所有的水滴汇合在一起——所有的水滴汇合在一起就具有了意义，可一滴水不起任何作用。你试着注意到河里的一滴水了吗？到最后，任何一切都不再起到任何作用。不管你活得短暂还是长久，永恒只是相对于你在这尘世度过的岁月而言。而到头来，河流也没有了任何意义。”

“爸爸，”亨利说，“你为何要这么说？”

“死亡是一种解脱，是一切不幸的结束。我们的痛苦不会超越它。

它使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诞生之前所处的宁静之中。”

夏尔坐在自家院子里的药草中间。他下身穿了一条棕色灯笼裤，脚上穿了一双灰色袜子，脚蹬一双黑皮鞋，而在脚背那里用一根很大的带扣扣上了，他上身穿了一件棕色衬衫，头戴一顶黑色三角帽。他在想是否应该再一次骑马到山上去找寻蘑菇。可后来他忘记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无论如何再也回想不起刚才究竟在想些什么。或许想到了墓地里的那些头颅。他必须重新把他们挖出来吗？大概他至少还能为他们做这件事吧。或许他们都在等着他。

“死神会光临每个人，”夏尔轻声道，“有些人活得很长，还有些人年纪轻轻就死去。因此人类各种年龄的死亡都会存在，这就像发生在动物和万木身上一样，谁也不会活得真的很长久。”

一只手从后面搭在他的肩上。空气里有股湿漉漉的狗皮味道。在最初的犹豫之后，他碰了碰那只手，然后抓住它。是吃晚饭的时候了。

结束语

1847年3月18日，一个披着黑纱的老妪走进巴黎的圣洛朗教堂，站在教堂中殿的中央位置。黯淡的光线透过哥特式窗户射进来，女人看到某个人跪在最前面的长凳上。想必就是他了。有人告诉过她，她一定可以在这里找到他。她的脚步在石板地面上发出回响。她走到最前面的长凳，在那名男子旁边跪下，双手合十，开始祷告。

“您是亨利-克莱芒·桑松，伟大的夏尔-亨利·桑松的孙子吗？”她低语道。

那名男子一动不动。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整张脸因为嗜酒而浮肿着。他约莫五十岁光景。“您别靠我太近，”他喃喃道，“我不会给人带来好运。一重诅咒压在我的家族身上。您走吧，今天上帝没有时间关照您。”

“上帝永远有时间，”那个女人满怀信念地说，“或者，我们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可能吧，”亨利-克莱芒说，“可是今天我独自一个人需要他。”他凝视着圣坛上的马赛克图画。图画上显示的是耶稣复活。

“您相信复活吗？”她问。

“不，太太，我害怕复活。所有我的先人都害怕复活。因为他们害怕死者，害怕死者回来。起先你只是感觉到一丝细微的穿堂风，可突然之间，他们全都到齐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濒死之人最后的目光犹如烙印，很容易让人记住。我们给许多人的肩上打上了烙印。即便到了今天，我的鼻子里还能闻到炖过的人肉味。我每次都给伤口擦上猪油和火药。我不只是杀人，我也减轻他人的疼痛，我治病救人，和我的所有先人一样。”他低下头，试图祷告。稍后，他呵斥那名老妪道，“您就找不到其他地方祷告了吗？”

她沉默不语。

他试图看清她的脸，可是没成。他若有所思地抚摸自己的黑短髭，低声道："我祖父从来不想做刽子手。我也不想。我一直讨厌这个职业。"

"从来没有一个刽子手是违反自己意愿的，因为他们的薪酬太好了。"她轻蔑地回答道，"从来就没有什么诅咒。我到巴黎来，先生，是为了购买您祖父的日记。他不是在大革命时期写过日记吗？"

"是的，"他说，"我祖父是夏尔-亨利·桑松，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刽子手。他把一切都跟我说过。我父亲几乎对此不感兴趣。历史将他遗忘。可我的祖父，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日记在哪儿，先生？我想瞧一瞧。我想看看伟大的桑松究竟是怎么写我的。"

"写您？该怎样就怎样：我怀疑他的日记能否给您带来快乐。可是，如果您坚持要的话，太太，那么出点儿费用吧。我需要钱。您知道欧勒布乐兹吗？一名记者。他为他的印刷厂寻找回忆录。他寻找充满丑闻的日记。巴尔扎克想必帮他做过编辑加工。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太多了。杀了三千，一个人独自无法经受得起这个……"

"可难道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吗？"她打断他。

"是他干的，可是安宁，那种安宁他是再也找不到了。"亨利-克莱芒轻轻地一笑，审慎地瞥了女人一眼。"您了解桑松家族什么？"

"好多呢，"她含义模糊地喃喃道，"可现在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欧勒布乐兹看过那些日记了吗？"

他以怀疑的目光朝她看过去。他打了一个寒战。他突然有了一种预感。他祖父不是提到过有个疯女人玛丽吗？她曾经夜里在玛德莱娜公墓悄悄地等候他。要是这个女人在大革命中幸免于难，那么她现在……他在心算。五十多年悄然逝去。半个多世纪了。她该有八十多岁高龄了。

“我想要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女人不可动摇地说，然后摘下面纱。此刻他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脸了。瘦骨嶙峋的鼻子犹如岩石一样突出在那张衰败的脸上。皮肤白得像石灰，当年在玛德莱娜公墓就是这种石灰被倾倒在被斩首者血流如注的躯干上。她的眼神像木乃伊般呆滞，仿佛她刚刚从墓穴里爬出来。她的眼睛显得迟钝，好像她在喃喃自语着什么。而现在，她脸露愠色，看起来几乎是粉红色的，仿佛是一只蜡制的旧玩具娃娃，仿佛是来自恐怖陈列馆的一具蜡像。

“哦我的上帝，”亨利-克莱芒害怕地说道，双手抚摸着自己的头发，“难道您就是出现在玛德莱娜公墓的那个疯女人玛丽吗？您就是杜莎夫人！”他是个蹩脚的演员。多年的纵酒损害了他的健康。“我把一切都变卖掉了，夫人，”还没等到她回答，他继续道，“路易十六的鬈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鞋子，丹东油腻的衣服领子。只有罗伯斯庇尔的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保留下来。除了一条浸透了鲜血的手绢。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手绢。在执行处决之后，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奔到断头台，将他们的手绢浸入血泊中，说是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我现在只剩下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

杜莎夫人将没有牙齿的下颌骨推到前面，将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我想要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她重复道，“我要全部。”

“哦我的上帝。”他叹息道，绞尽脑汁地搜寻合适的词语。他甩动双手，想要站起来，可他只能跪着。他没有力气了。顺便提一下，他想祷告。他必须祷告。和他所有的先人一样，他们都作了很多祷告，为所有的心灵，正是那台机器将他们的心灵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我到这里来

是为了祷告。”他绝望地嚷道。他的话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回响。他重新凝视着圣坛上的马赛克图画，仿佛想要证实，上帝已经听到他说的话了，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祷告，而且他还一直在诵念第一遍玫瑰经文，这可不是他的责任。这又不是他的责任。

“先生，”杜莎夫人无动于衷地说，“您尽可以呼喊，尽可以怒吼。您的行为举止有失体面。您到这里来是为了祷告，而我特意从伦敦赶过来，就是为了购买那台机器。我用现金支付。一万法郎。”

“那台机器值两万法郎。”亨利-克莱芒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她没做出反应，只是目不转睛地凝望那座圣坛。

“那好吧，夫人，”他做出让步，“一万六千，这台该死的机器就归您了。”

“您拿到一半就该心满意足了。”她喃喃道。

他满怀轻蔑地打量她。老太太已经习惯做生意了，能否做好的生意，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的人需要钱。她可以给他难堪，可以压低价钱，他不会有任何反抗。他知道如何干干净净地把人头从躯干上分离出来，可对生意却是一窍不通。“好吧，同意，”他固执地回应道，“不过您只能拿到那台机器。没有日记。”

“您先给我说说桑松家族的历史，然后我再决定是否购买日记。我不会为愚蠢的废话付出一个子儿。”

“我是桑松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桑松王朝结束在我身上。我是最后一个可以向您介绍桑松家族历史的人。可我需要钱，我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说我老婆今天离我远去。这本不该发生在桑松家族的人身上。我不是真正的桑松，我是一个窝囊废。桑松家族的人都很强大，身材魁

梧，独具魅力，气宇轩昂，虎虎生威，信心百倍。他们独自对抗支离破碎的世界，任何风暴都无法强迫他们屈膝跪下，任何东西都无法压倒他们，可我是个软蛋，我是个胆小鬼，我没有任何雄心壮志，我整天狂喝滥饮，逛遍了巴黎最堕落的风月场所。凡是穿着裙子的任何东西，我都会亲吻。而且……不只是穿着裙子的任何东西。不，夫人，我无法拥有桑松家族的人拥有的东西，无法拥有使一个桑松成为一个桑松的东西。我仅仅是桑松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给桑松王朝丢脸的人。我在断头台的阴影里沉沦，而我祖父，伟大的桑松已经载入史册。”

“让我走吧，先生，”杜莎夫人冷淡地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您一洒慰藉的热泪。”

“您难道就没有怜悯之心吗，夫人？”

“怜悯之心？如果您有怜悯之心，您就领养一条狗吧。巴黎到处都有流浪狗。您的机器在哪儿？”

“这不是我的机器，”他拒绝道，“它从来就不是桑松家族的机器。我们仅仅是判决的执行者。这种该死的断头台，我们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那是路易和吉约坦两位医生的杰作。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医用仪器。可是真见鬼，您要派它做什么用场？”他一跃而起。

“我要把它带到伦敦去。”她平静地说，同样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可以听到她的关节发出喀嚓声。

“我要扶着您吗？”亨利-克莱芒忧心忡忡地问。

“您别碰我，我只想要您的机器。”

“那么您要拿它到伦敦去干什么？”

“我要把机器陈列在罗伯斯庇尔们、丹东们、马拉们以及他们所有人中间，因为我从您祖父那些血淋淋的柳条筐里找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头颅，把他们每个人制作成了蜡像。”她坐在祷告用的长凳上。“正如你们桑松家族将刽子手的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样，我也想完成自己毕生的事业，然后把它传给我的两个儿子。但首先我想要这台机器，这是我唯一还缺少的东西。还有这段历史。您祖父早就去世，先生，但唯有我的蜡像还能在一百年之后让人活生生地回想起法国大革命。我孤身一人塑造了这种回忆，我孤身一人确定了当人们谈起它的创造者杜莎夫人时他们会谈起什么。正因为如此，我想要听到这段历史，也许也要买下那些日记。杜莎夫人成了一家企业。我无法容忍我一生的事业遭到毁灭。您可以说下去，先生，您也要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我向您发誓，年轻人，如果您胆敢对我撒上哪怕一次谎，我就会在您家的工具棚里找到火钳，在您的肩上打上烙印。而且我不会给您涂抹上任何猪油。”

“那好，那好，”亨利-克莱芒回答，在她身旁坐下，“我要跟您说说这重诅咒，说说那些决定命运的大事件。”

“您别再说了，我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诅咒，从来就没有违背意愿的刽子手。您就开始吧，我的轮船今晚回英国。”

“这台机器值一万六千法郎吗？我可以相信您吗？”

她点点头。

“可是我也要警告您，夫人，那重诅咒将会追随您，让您的博物馆化为灰烬。您的那些像可都是蜡制的，是不是？”

“您就开始说吧！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还能让我感到害怕的了。我安然度过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有了两任丈夫。”

“夫人，我会让您痛哭流涕。”

“还没有人因为痛哭流涕而死去，开始吧！”

“我需要酒，夫人。否则无法进行下去。”

“我知道，有人警告过我。”她从大衣里掏出一瓶红酒，摆放在自己身边的长凳上。

亨利-克莱芒立马拿起酒，拔出瓶塞，一口气喝下去半瓶。然后他开始说道：“我祖父夏尔-亨利·桑松于1806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我奶奶在他去世后又活了十一年……”他又喝了一口。

“先生，”杜莎夫人不耐烦地说，“您真是一个可怜的酒鬼。您给我日记，我买下了。这种感伤的扯淡我无法再听下去了。”

“没有日记，”他回答，“但有记录，谁、何时以及为什么被处死。此外还有被斩首者的衣物清单。我对文字进行了补充，添加了当时的报纸报道、目击者的报道以及流亡法国人的札记……”

“我知道有原稿。您祖父记下了恐怖的一本账。”

“但为了使它变得更为清楚明了，我必须对它进行加工润色。我为此拿到了三万法郎。那名记者欧勒布乐兹给我帮了点忙，拿到了一万七千。印刷厂还请来了巴尔扎克，日记马上增加了五大册。应该用斧子杀死这个人，他才会停止写作。”他在衣服口袋里翻来找去，掏出一个护身符，“父亲送给我一个吉祥物：一只开裂的钟。可是它也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如果您再给我一瓶酒，我就把它送给您。”

“我对您的护身符和您的回忆录不感兴趣，先生。反正这一切完全是鬼话。您现在可以给我看断头台机器了。”

“它不在我这里。”他喃喃道，低下头。

“它在哪儿？”杜莎夫人不知所措了。

“我把它借人了。”

“借人了？”

“在当铺老板手里，就在拐角那边，我需要钱。这有那么难理解吗？您可以拥有断头台，但首先必须把它从当铺赎回。这个非常简单，我经常干这事。有时候出于不得已，巴黎看守所所长康莱也会从当铺赎回机器。他威胁过我，一旦再发生这种事，他要立刻解雇我。现在这事又一次发生了。我们要在他获悉此事之前赶紧了断才是。您去伦敦的船是几点的？”

后记

1847年3月18日，亨利-克莱芒·桑松被解职。他果然把断头台抵押出去了。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他沉迷于酒精和年轻的舞女之中，最后在1889年去世，终年八十九岁。

1925年，位于伦敦的杜莎夫人博物馆毁于一场大火，三年后重新开张，1940年遭遇德国轰炸后被夷为平地，可偏偏阿道夫·希特勒的半身塑像意外地安然无恙。

夏尔-亨利·桑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下了日记。他的创作风格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即便今天读到他的文字也仍然令我们不寒而栗。有证据表明，他的孙子亨利-克莱芒·桑松将那些笔记卖给了记者欧勒布乐兹，后者受年轻的印刷厂老板迪普雷委托寻找畅销书素材。迪普雷是一位先知式天才：他革新了印刷工艺和出版业，想用一本全法国的畅销书为他的印刷厂做广告。也有证据表明，青年巴尔扎克认识亨利-克莱芒·桑松本人，并和他有过交流，他曾经作为枪手创作过《桑松回忆录》的一部分，为此不惜从自己的《人间喜剧》原稿中，其中包括从《1793年的一次弥撒》和《政治和军队生活场景》中剽窃了部分内容。也许巴尔扎克用这个王朝的“诅咒”杜撰了漂亮的神话。他是小说家，因而相应地对那些史实进行了添油加醋式的修饰润笔，而且还要满足剧情的需要。

本书中，丹曼莉的人物是个例外，她的名字并没有流传下来，而所有其他有名有姓的人物均在历史上有过记载，部分引用了刊登在报纸上或者由时代目击者以书信和日记记录下来的原始资料。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事件。它受到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的鼓舞，成为西方民主的开路先锋。启蒙和人权是其最伟大的成果。然而，从同时代的角度看，它不只是给法国人带来了公民的自由权，而且也带来了暂时性（1793—1794）的恐怖统治和大屠杀。直至大革命的第三阶段和最后阶段（1795—1799），当国内外敌人不再倒转时代的车轮，平静才得以出现。

几乎从来没有另外一起大事件能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化进程，并且在其影响下给西方世界的人们送去了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

致谢

自2009年起，巴塞尔大学医院隔离病房和细胞代谢门诊部的所有员工竭尽全力医治我的白血病，我谨向他们表达我由衷的感谢。我也要感谢那位匿名的骨髓捐赠者。

我要感谢我的代理商塞巴斯蒂安·里切尔，他在艰难的条件下耐心而友好地陪伴我的小说问世。我也要感谢埃马努埃尔·哥契尔和亚历克斯·黑格里，自从我的第一任太太于2008年去世后，他们为我的家人付出了很多。我也要感谢我的儿子克洛维斯，他是我每日的编辑和最好的朋友，感谢他为完善本书所提出的戏剧性建议。我还想特别感谢蒂娜，她曾作为我的菲律宾女友从香港来到瑞士，如今成了我的妻子。凭借她对生活的乐趣和自始至终积极而幽默的人生态度，她陪伴我度过了异常艰难的时光。

我还要感谢雷诺斯出版社。海迪·佐默尔、克里斯托夫·布卢姆以及托姆·福勒，提出了条分缕析的审查意见，使拙著的品质得到了提升，也使小说充满了生命力。

克洛德·库埃尼

2012年12月于瑞士巴塞尔郊外阿尔施维尔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著
倪复生 译

大革命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它建立起的并非是一个新体制，而是一个新宗教。换而言之，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信仰是不可抵挡的。

——古斯塔夫·勒庞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高毅主编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法]古斯塔夫·勒庞　著
倪复生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法）勒庞著；倪复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ISBN 978-7-303-18039-4

Ⅰ.①法… Ⅱ.①勒… ②倪… Ⅲ.①法国大革命-政治心理学-研究 Ⅳ.①K565.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6806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FAGUO DAGEMING YU GEMING XINLIXU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60mm×230mm

印张：14

字数：206千字

版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何琳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让亲历者和史学家们迷惑的诸多历史事件，只有通过现代心理学方可得以解释。

1913年版前言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褒贬大革命，而在于设法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读大革命，这些方法已在我的另一本书《观点和信仰》（*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 ）中做了详解。

源于此，我即不必对先前的种种观点进行梳理。但谈谈这些观点还颇为有趣，这也是我用一章的篇幅来对其加以列举的原因，然而这只是某些史学家们对这一重大革命事件的观点。

（书中的）几个篇章仅仅就先前的观点做了阐述，并对将来的观点加以预判，而很少对当今的观点进行表述。只有某些期刊对当今人们的感受做了阐述。这类评判大有裨益。

一些文章也对此事件做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三个概念，它们代表着当今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第一个观点认为，大革命如同一种信仰，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第二个观点认为，大革命类似一种神秘现象，难以解释；第三个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在没有公布尚未解密的大量官方文献前是无法评判的。

对这三个观点加以简单的分析还是颇为有益的。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大革命对于大多数法国人而言是一件好事，它使得法国人摆脱了蒙昧，挣脱了贵族阶级的压迫。不止一位政治家这样认为，没有大革命，他便会沦为大领主家的仆人。

一位法国著名人物埃米尔·奥利维耶（Emille Ollivier）在其所做的一份重要的研究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绪，这份研究的目的便是要与我就本书中的观点展开商榷。

在谈及将大革命看作一个无意义事件的观点时，这位杰出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对此评论说："古斯塔夫·勒庞也接受这个论断。在其最近一本关于大革命心理学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窥见其概括能力和风格。"他说："付出满目疮痍的代价后的所获，其实在不久之后，也可以借由纯粹的文明发展而轻松得到。"

埃米尔·奥利维耶不赞同这个观点。大革命对他来说是必需的，他总结说："有人为自己无法再做拍打池水以防蛙鸣惊扰大领主休息的这类恶人而后悔；有人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田块被一群粗鲁的年轻人践踏而悲伤；有人为不再能因为有一个叫洛赞（Lauzun）的人觊觎他的妻子，或者因为对某位大人物

言语不敬，或者因为某个莫名其妙的缘由被关进巴士底狱坐牢而懊恼；有人为不再有部长、高官、总督的暴虐，为不再任人宰割，为不再被洗劫而只缴税款，为不再被所谓胜利者嘲讽、蹂躏而感到绝望。对我这一介平民，我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的艰辛劳作，让我摆脱了这些桎梏，若无他们，这些桎梏便要套在我的头上，尽管他们有错，但我仍祝福他们。”

上述文字把人们对大革命的信仰做了概述，而拿破仑的不凡业绩，更是让法国人对大革命念念不忘。对大革命的信仰源于这种广为流传的幻象，甚至连法国政治家也都认为：制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而制度却毫无例外地取决于科学和经济的进步。抹平差距成了动力之源，它如断头台般的高效，甚而没有大革命，假以时日，我们依然可以实现如今的平等和自由，此外，很多民族不经历革命，也实现了自由。

上面列举的第二个概念——大革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的事件——也让大革命变得扑朔迷离。

在一篇评判我的作品的文章中，巴黎一家久负盛名的报纸的政治主编德吕蒙（Drumont）作了如下表述：“这个撼动了旧世界的神奇事件，依旧是个谜……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无法让人明白这场危机中的不同寻常和神秘之处，它始终是一个离奇的历史事件。”

这套理论在政治人物中很有市场。从一位前部长爱德华·洛克鲁瓦（Edouard Lockroy）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套理论的影子。

“历史学家们弄不懂大革命……国民公会总是处在吵吵嚷嚷中，永远那样混乱不堪……罗伯斯庇尔的专制是一种懦弱……大革命的历史是一群人的历史，其中没有领导人，大家都在行动……谁是领导人？是一群人，是大众，没有领头人，是一群普通人引领另一群不知名的人。”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大革命似乎就是在某个神秘的偶然因素的支配下所发生的诸多混乱事件的一个集合。

上面所做的简单引述表明，有关大革命的研究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而变得晦涩起来，而囿于这些不确定性，也出于谨慎，博学家们仅刊发一些短文[1]。

如今存在着一种想要客观认识大革命的意识，其结果要么是盲目的推崇，要么便断言这个重大事件至少以目前的资料是难以解释的。

在我设法运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大革命时，阐释上的困境也曾让我惊诧不已。很快我便知道，历史学家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狐疑缘由其习惯于凭借理性阐释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驾驭的带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以及集体主义色彩的事件。

大革命历史的每一页都证实了上述判断。仅集体主义逻辑本身，而非理性主义逻辑，便可揭示为何国民公会的倡议总是和其每一个成员的意见相左。理性无法深入解释为何在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贵族阶级的代表会宣布放弃一些他们曾经孜孜以求的特权，倘若他们在适当的时间放弃这些特权，那么大革命的发生原本是可能避免的。在不了解人在不同环境下会有性格的转变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理解温和的、聪明的资产阶级在某些委员会上一边提出建立公制以及开办大学的建议，一边却投票赞同一些野蛮的做法如处死拉瓦锡（Lavoisier）[2]、处死诗人谢尼耶（Chénier）、拆毁圣德尼（Saint-Denis）恢宏的陵墓？在不知书本教的传播规律与现实传播规律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又如何理解革命运动蓬勃兴起？

我们过于理性而难以接受，历史是可以脱离理性而展开的，甚至常常是反理性的。由此，需要我们随机应变，彻底改变历史阐释的方法，如果我们想弄清楚一系列事件的话，而理性通常是无能为力的。

我认为，本书中所述的观点都将很快得到传播。诸多文章证明，这些观点已令很多观察家震惊。在此引述英文《泰晤士报》中的几个最重要的片段以飨读者。

“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得有多么周全。”

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

人们会对我的阐释加以评议。我认为自此以后，不考虑我的阐释而去书写一段大革命历史是很难做到的。

巴黎，1913年1月

---

[1] 这类工作都很有价值，尽管鲜有新意，但应当坚持下去，我相信当前的这些思想。我借用当今一位批评家的评述来做个结论：“参与冒险的政治家、乡村恐怖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据点，施行残暴的封建统治，他们玩弄犬儒主义，并以此来设法打消、诋毁整个国家对乌托邦和博爱的不懈追求。只有在将所有这些人以及不胜枚举的外省委员会（约两万个）的历史全部弄清

之后，才能还原大革命的本来面目。”

[2] 拉瓦锡（1743.8.26—1794.5.8），法国著名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燃烧的氧学说”的提出者，大革命中被杀。——译注

- 导论 历史的修正
- 第一部分 革命运动中的心理因素
  -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一、革命的分类
      - 二、科学革命
      - 三、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 第二章 宗教革命
      - 一、宗教革命研究对于解读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 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先行者
      - 三、宗教改革运动所提主张的理性意义
      - 四、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
      - 五、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势同水火
      -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 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势
      - 二、政府如何抵御革命
      - 三、政府发动的革命：以中国、土耳其等国为例
      - 四、在革命中，无法和政府一起被更迭的社会因素
    -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 一、民族意识的韧性和稳定性
      - 二、人民对革命的态度
      -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 四、人民群体及其构成因素
  - 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性格的变迁
      - 一、人格的变化
      -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体性格的构成因素
    -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 一、革命年代主流心理的分类
      - 二、神秘主义心理
      - 三、雅各宾心理
    -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一、革命心理

            - 二、犯罪心理
        - 第四章 革命群众的心理
            - 一、群众的一般特征
            - 二、稳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规约群众精神的摇摆
            - 三、革命运动领袖的角色
        - 第五章 革命议会心理学
            - 一、大型革命议会的心理学特征
            - 二、革命俱乐部心理学
            - 三、议会热情逐步高涨的阐释
- 第二部分 法国大革命
    - 第一篇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 一、大革命史学家
            - 二、大革命宿命论
            - 三、近来的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质疑
            - 四、不偏不倚的历史
        - 第二章 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
            - 一、旧体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 二、旧体制的弊端
            - 三、旧体制下的生活
            - 四、大革命期间对君主制的情感变化
        - 第三章 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
            - 一、革命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 三、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 一、对原始人、自然状态、大众心理的幻象
            - 二、幻想使人摆脱过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 三、对大革命原则的理论价值的盲从
    - 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 第一章 制宪议会心理
            - 一、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 二、旧体制的解体和全国三级会议

        - 三、制宪议会
    - 第二章 立法议会心理
        - 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
        - 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质
    -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
        -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点
    - 第四章 国民公会政府
        - 一、国民公会期间的巴黎公社及俱乐部的作用
        - 二、国民公会期间的法国政府：恐怖时代
        - 三、国民公会的结束：督政府时代的开始
    - 第五章 革命暴行
        -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 二、革命法庭
        - 三、恐怖时代的外省
    -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 一、革命议会和军队
        - 二、欧洲对大革命的镇压
        - 三、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及军事因素
    -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 一、大革命期间人的精神状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 四、富基耶—坦维尔、马拉、比约—瓦雷纳等人
        - 五、大革命后国民公会议员的命运
- 第三篇 传统惯例和革命原则之间的较量
    -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搏：督政府
        - 一、督政府心理
        -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再现
        - 三、波拿巴崛起
        - 四、大革命持续的缘由
    - 第二章 恢复秩序：共和执政府
        - 一、执政府如何巩固大革命成果
        - 二、执政府重塑法兰西
        - 三、决定执政府执政成功的心理因素

        - 第三章 传统惯例与革命原则百年冲突的后果
            - 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因素
            - 二、法国革命运动百年回顾
- 第三部分 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
    - 第一章 大革命以来民主信仰的变迁
        - 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缓慢传播
        -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同结局
        -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和人民大众的民主
        - 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民主平等化
    - 第二章 推进民主的结果
        - 一、缺乏理性价值观对社会演化的影响
        - 二、雅各宾思想和民主信仰心理
        - 三、普选及当选者
        - 四、改革需要
        - 五、民主国家的社会差异与各国民主思想
    - 第三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 一、劳资之争
        - 二、工人阶级的演变与工团运动
        - 三、为何当代一些民主国家逐渐演变成为官僚政府
- 结论

返回总目录

导论 历史的修正

当今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发明的时代，也是一个对知识要素进行修正的时代。首先应承认，没有任何一种现象其初始原因是现在可以探究的。科学对先前的结论加以核查，并察觉到了其中的不足。科学如今认识到其陈旧的规则正在被逐步淘汰，机制也失去了其功能，不久前还是世界基础的物质，如今成了各种转瞬即逝的力的受体。

尽管历史用推断的方法使其免受过于严厉的批评，但历史并不能逃避这种广泛的修正。没有哪个历史阶段，当人们在谈到它时，可以说它是千真万确的，以前言之凿凿的事都受到了质疑。

和对其他事件的研究一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作家们的分析，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可以说是结束了，大革命的面貌可以说是非常清楚了。除了做些细节上的修正，对大革命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

对大革命如何评判，反倒让那些最为坚决捍卫大革命的人开始犹豫起来。之前的坚信不疑变成了有待商榷。对大革命的立场和信念动摇了。有关大革命的最新描述反映出了这种迷茫。但描述过后，人们却越来越难以下结论。

不仅这个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被大加议论，人们甚至疑惑，取代旧体制的新律法是否可以凭借文明的进步自然形成而无须暴力。大革命的所获似乎与当时付出的代价不相称，也和大革命远期的历史成果不相称。

有几个原因促使对这段悲惨的历史进行修正：一是时间让情绪恢复了平静；二是众多的资料慢慢地公布于众；三是人们学会了独立分析这些资料。

但对我们的观点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现代心理学，因为它可以直入分析人心和行为的动机。

在可用于历史分析的心理学发现中，要重点提及的有：对先辈行为的深入了解，发动群众的规律，性格分裂的实证，精神的传染，信仰在无意中的形成，不同逻辑形式之间的差异。

实际上，在这本书中运用的心理学手段还不仅于此。历史学家通常还停留在分析研究资料的阶段。但仅心理学便足以激起我刚刚谈及的质疑。

******

改变革命民族命运（例如信仰的产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时候非常难以解释，以至于只能对其进行观察。

自我进行历史研究以来，让我无从下手的某些重要现象常常令我惊异不已，尤其在涉及信仰产生的时候。让我感受较深的是在阐释它们时总是缺少某个关键点。理性已竭尽全力了，不能再指望它会带来什么，人们应当寻求其他的手段来弄清楚它无法阐释的东西。

这些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不辞辛苦追寻业已消失的文明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也无法弄清楚这些问题。

经过苦思冥想，最终我意识到该问题是由一系列先前单独研究过的其他问题构成。这也是我二十年所做的事，其结果已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做过表述。

首先就是探索民族演化的心理学规律。在已经明确了历史的民族——也即缘由历史偶然因素形成的民族——最终获得像解剖学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学特征之后，我便尝试着解释那些民族是如何改变其制度、语言和艺术的。与此同时，我还要探究在突发的环境变量的影响下，为何个体的性格可以彻底垮塌。

在由民族构成的稳定的集体之外，还存在着临时的动态集体，我们可称之为大众。伴随着大众的集结，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随之发生，大众具有的特征，与组成大众的个体的特征绝对不同。这些特征是什么？它们是如何演变的？我在《大众心理学》[1]（*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中对这个新问题做了探究。

在这些研究之后，我便觉察到有一些因素被我疏漏了。

但这仍不是全部。在最重要的历史因素中，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信仰——这些信仰是怎么产生的，它们真的是理性和意志的产物？是长期教育出来的结果？还是无意识形成的？它与理性毫无瓜葛吗？我在另一本书《观点和信仰》中对这个难题进行了研究。

在心理学认为共同的且自愿的信仰仍然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在已证实信仰通常都是非理性的以及非自愿的情况下，我便可以对这个重要问题给出答案，为何信仰在没有任何理据的情况下，可以被各年龄阶层中最有思想的人轻易接受？

历史问题的解决耗时数年，至此已真相大白。我的结论是：相对于引领思潮的且被人们奉为思想指南的理性主义逻辑，还存在着多种迥异的逻辑形式如情感主义逻辑、集体主义逻辑以及神秘主义逻辑，通常是它们在支配着理性，并孕育出我们行为的动因。

这个结论一旦形成，我便豁然开朗，原来很多历史事件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人们在阐释这些历史事件时，借助的是一种与它们的发生几乎无关的逻辑。

******

在此用寥寥数语加以总结的这些探究都曾耗时数年。在感到穷尽这些研究无望时，我不止一次打起退堂鼓，转而做些实验，因为我坚信，

实验和真理是并行的，且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片段。

探索物质世界非常有趣，但解读人类更有意思，这是我为何有志于心理学的原因。

从我的研究中得出的某些原则也让我受益匪浅。我坚决将其运用于实例研究，由此，我便被引领着去涉猎革命心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心理。

在分析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从阅读中获得的曾坚信不疑的确切的观点，大部分都接二连三地被推翻了。

为了解释这段时期，就应像几位历史学家们所做的那样，不必将其看成是一个整体，因为大革命是由一些同时发生的且彼此各不相干的现象构成的。

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心理学规律的产物，它们的发生像齿轮箱一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事件的参与者像是一幕剧中的人物一样，事先都早有安排。每个人说着该说的话，做着该做的事。

这些大革命的参与者也许和一出戏中的人物不同，他们没有研究过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一些无形的力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早有安排，而且他们似乎也早已知晓。

确切原因是：他们接受这命中注定的安排，但却不解其中的逻辑，因而当事件发生时，他们的惊讶不亚于我们，尽管他们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他们从未想到过有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他们。他们无法抑制愤怒和懦弱。他们言必理性，声称受到理性的引领，但实际上却和理性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比约-瓦雷纳（Billaud-Varenne）写道：“我们所做的决定备受非

议，其实在决议前一两天前，我们也未曾想要做出这些决议，仅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这些革命事件并非是不可避免的。看过我们的书的读者知道，我们从伟大的奋斗者身上懂得了人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不过他们只能驾驭小部分事件，对于后果难料的事件，他们通常也是无能为力的。科学家们也知道，在微生物得势前可以杀死它，但当发展到生病之后，他也无能为力了。

******

在一个问题引发热议且人们还为之争论不休之际，我们可以确信，这时的问题还处在信仰的阶段，而非知识的阶段。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言明，信仰原本是无意识的，且与理性无关，它从来就不受理性思考的影响。

大革命作为信仰者的杰作，对其如何评价却非信仰者可为。对其赞誉者有之，诋毁者有之，大革命依旧是一种可全盘接受或拒绝的信念，任何理性逻辑都不曾有此境遇。

一场宗教或政治革命在爆发之初，可能有一些理性的因素作为支持，但随后的演变却只有依靠神秘主义或情感主义等为理性主义所不容的因素方可进行。

既然理性主义逻辑不是规定它的逻辑，那么以这种形式的逻辑来评判法国大革命事件的历史学家也就无法理解大革命。由于这是连事件的亲历者自己都难以洞悉的事件，因而当有人说我们的大革命是一个参与者和阐述者均不懂的现象时，说明他离真相不远了。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如今这样对现在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不加揣测。

******

大革命的力量不体现在那些陈旧的但仍要传播的原则上，也不体现在其试图建立的制度上。人们几乎不关注那些制度以及学说。法国大革命让法国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内战所带来的暴力、谋杀、废墟、恐怖，并在军事上成功地对抗了欧洲，最终捍卫了自己。大革命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它建立起的并非一个新体制，而是一个新宗教。换言之，历史告诉我们，强大的信仰是不可抵挡的。从前，一度无敌的罗马不得不臣服于信奉穆罕默德并受其指引的由牧羊人组成的游牧军队。欧洲的君主们也同样无法抵御在国民公会号召下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像所有使徒一样，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准备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样建立起来的宗教，有着和其先辈宗教一样的力量，只不过没有它们持久。若不留下一些深刻的烙印和持续的影响，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

我们不像大革命斗士们那样认为大革命是一种历史的中断。大家知道，为了表明自己的意图——建立一个与过去迥异的世界，他们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并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做彻底决裂。

但是过去永远不会消亡。它在我们身上而非在我们身外始终延续着。大革命革新者未觉察到他们自己便是过去的延续，他们巧立名目延续着君主制的传统，旧体制的集权和君主专制反而还得到了加强。托克维尔寥寥数语便证实了大革命仅是颠覆了行将崩溃的体制而已。

可以说，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摧毁什么东西，它反而加速了某些思想的产生，这些思想随后又继续得以发扬。大革命所宣扬的博爱和自由

从未受到很多的关注，但是平等却成了福音书，成为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现行整个民主思想演化的基石。可以说大革命既没有随着帝国的来临而结束，也没有随着其后一系列的复辟而结束。在岁月长河中，大革命在缓慢地发展着，继续或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

本书花了大量篇幅来对于法国大革命加以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讲述大革命的书籍就是传奇故事集，而非真相。它们打破了读者的幻想。

这些传奇要比历史更加生动。不必为此而忐忑不安。对某些哲人而言，了解真相是有趣的，但对于人民而言，幻想似乎更有意思。这些传奇是理想的集合体，这些传奇构成了强烈的行为动机。丰特内尔（Fontenelle）指出，如果没有这些虚幻理念的支撑，人民便将失去勇气。圣女贞德、国民公会的巨擘、帝国时代等，过去的这些辉煌都给失败后消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这些都是父辈们给我们编织的憧憬，憧憬的力量往往要比事实更为强大。梦想、理想或传奇，总之都是不真实的，但它们才是历史的塑造者。

---

[1] 也翻译为《乌合之众》。——译注

第一部分 革命运动中的心理因素

第一篇 革命的一般特征

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革命的分类

人们往往用革命一词来指称突发的政治变故，但这种表达方式应适用于一切突然的，或近似的变化，如信仰、理念以及学说上的这类变化。

而且我们已经研究过理性主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因素在信仰以及舆论的产生中的作用，这类因素决定了行为，因而不再赘述。

一次革命最终产生某种信仰，革命的目的通常是为了消除积弊、独裁以及不得人心的君主，等等，其爆发的动机往往是非常理性的。

一场革命的根源通常是理性的，但不要忘了，酝酿革命所需的理性，只有在转化为情感时才能够对大众起作用。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但为了煽动大众，仍需激起他们的欲念，此外，还得再添加上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才能达到目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哲学家们便用手中的理性逻辑，揭示了旧体制的各种弊端，唤起了变革的欲望。神秘主义逻辑从有着一定的规则且组织完整的某个社团的习俗中诱生出了信仰。情感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集体主义逻辑规定着团体以及国民公会，并促使其成员采取行动，而理性主义逻辑、情感主义逻辑、神秘主义逻辑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一场革命，无论其缘由是什么，只有在深入人心后才能产生结果。大众独特的心理导致事件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群众运动都具有某些鲜明的特点，描述其一便足以让人知道其他。大众是一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起点。大众是一个中性的事物，若没有一个领头者引领，它原本是无欲无求成不了气候的。大众在引领下很快便会从冲动走

向行动，但无外界激励，它永不会产生冲动。

突发的政治革命最让历史学家惊诧莫名，但它们通常都是最无关紧要的。重大的革命都是一些思想上的以及道德上的革命。更替一个政府并不能转换人民的思想，推翻一国的制度并不代表能更新它的灵魂。

真正的革命都是改变人民命运的革命，通常都是以一种缓慢的方式来实现的，历史学家难以界定其从何时开始。对他们而言，“演化”一词要比“革命”更为适用。

上面列举的种种因素大多对革命的爆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以之来对革命加以分类尚显不足。若仅以革命的诉求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将之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宗教革命。

二、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是最为重要的革命。尽管不引人注目，但科学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政治革命难以企及的。因而，我们将其放在首位，尽管在本书中无法对其加以深究。

自启蒙时代以来，伴随着天文学的重大发现以及实验手段的运用，由此我们知道，各种现象的出现原来不是上帝在恣意妄为，而是受到永恒规律的支配，随之我们的世界观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此类的革命，鉴于其缓慢的特点，“演化”一词倒是贴切。但对于其他的革命，尽管在同一个领域，但鉴于其迅捷，则还是称之为“革命”较好。如达尔文的理论，在几年间便颠覆了生物学界；巴斯德的发现在其有生之年便已改变了医学界。还有物质裂变理论，它证实了以前所谓永恒的原子，也难逃世界所有元素注定都要衰减、灭失这一规律。

这些科学革命发生在纯粹是知识性的思想领域。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信仰对其无任何作用。对它们，我们只能接受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其结果通过实验的检验，无须人们去品头论足。

三、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远较这些推动文明进步的科学革命逊色的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它们与科学革命没有什么瓜葛。科学革命仅仅是理性因素的产物，政治和宗教信仰几乎全都是以情感因素和神秘主义因素为支撑。理性在其中充其量只起到配角的作用。

我在我的《观点和信仰》一书中，一再强调信仰其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并指出政治或宗教信仰，它是一种信仰行为，这种行为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不管其表象如何，理性对这种行为是无可奈何的。我同时还指出，信仰时常会强烈到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它的程度。对信仰着迷的人因而会成为信徒，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以便捍卫其信仰。至于信仰的荒谬性业已变得无足轻重，对他而言，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耀眼的真理。而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让信仰获得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可以完全控制原本只有时间才能影响到的笃信者的思想。

仅从信仰被当作绝对真理这个事实便知，信仰必然会变得狭隘。与重大的宗教和政治革命相伴生的暴力、仇恨、迫害证实了这一点，宗教改革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尤其如此。

如果人们不知信仰其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起源，不知信仰必然的狭隘，不知信仰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不知神秘主义信仰激发起来的情感的力量，那么人们便难以理解我们历史的某些时期。

前述概念由于过于新颖而无法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仍执着于用理性来解释一系列与理性无关的现象。

有些现象如宗教改革运动，在五十年内便彻底改变了法国，但这根

本不是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不过人们总是认为这是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结果，连最新出版的书也是持这种看法。例如，在拉维斯（Lavisse）和朗博（Rambaud）二位先生合著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中，就可以看到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一段解释：

> 这是一场在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的运动，源自老百姓去阅读福音书并进行个人的自由思考，这是由一种极为虔诚的意识以及一种极为坚定的理性所推动的。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结论相反的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首先，这类运动绝非自发的；其次，理性在这其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确切地说，煽动人们暴动的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力量还体现在这一点：这类信仰源自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理性既无法创造出它们，也无法改变它们。

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同样的规律。它们的形成往往和非理性有关，而不是理性。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运动、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一些特点鲜明的思想形式。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基础，并遵循着与理性逻辑不相干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源自植根于灵魂中的信仰，但政治革命的形成也有诸多其他因素掺杂在其中。“不满”一词是对这些因素的一个概括。当这种不满蔓延开来时，一个政党便形成了，且常常变得强大到足以对抗政府的程度。

不满一般要经历长期的积累才可以产生效果，因此，一场革命并非总是表现为一个现象结束另一个现象随即开始，它是一种持续的现象，只是其演化速度较快。不过所有现代革命都是一些突发运动，导致政府瞬间垮台。例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中国的革命等均是如此。

与人们的看法相左的是，极为保守的人民热衷于最暴力的革命。源于保守，因而他们无从知晓，演化要缓慢，自己方能适应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当革命风起云涌之际，他们被迫迅疾投入其中。这种突进的演化构成了革命。

尽管采用渐进的方式，但也无法总是能够避免革命。只有英国人在1688年成功地通过一场革命结束了一场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追求至高无上权力的国王和寻求通过代理人施行自治的国民之间。

重大的革命一般是自上而下开始的，而非自下而上，而当人民获得解放，革命的权力便属于人民。

很明显，没有军队主力的参与，所有的革命过去不会发生，将来也绝不会发生。法国王权并非在路易十六被处决之日才消失的，而早在它的军队拒绝保卫它时便已消失。

军队的离心离德源于精神传染，最终表现为对既有秩序漠不关心。在几名军官联手推翻土耳其政府后，希腊军人便想着效仿他们来改变自己的政府，尽管这两个政府之间毫无类似性可言。

一场军事行动可以推翻政府，那些西班牙殖民地共和国毫无例外都是被军事推翻的；但革命要想产生成效，则需仰仗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不满和希望。

除非到处充斥着不满甚至愤怒，否则不满并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怂恿人们去抢劫、破坏和杀戮很容易，但要煽动整个民族，或至少这个民族中的一大部分人，领头人的示范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对不满者夸大其词，让不满者相信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饥馑的唯一原因；领导者还许诺说，所追求的新制度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幸福的时代。

通过启发和传染，这些思想得以萌发、传播，随后革命的时机便到来了。

基督教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酝酿并成熟的。若说后者酝酿的时间仅仅数年，而前者耗时多年，个中原因是法国大革命者很快便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基督教革命者则在很久之后才拥有自己的物质力量。最初，基督教革命仅有些信徒，他们是卑贱者、穷苦者、奴隶，在弥撒的蛊惑下，他们认为此生的不幸会为之换来极乐。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这种自下而上的传染，最终会侵染到上层社会，在最终获得某位皇帝的认可后，这种业已蔓延开来的新信仰便成为正式的宗教。但在此之前，这个传染过程却极为漫长。

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一个政党获胜后，会依据自身的利益来着力构建社会。革命发起者有军人、激进人士、保守人士之分，他们对社会构建的看法各不相同。新的法律和制度是依据获胜的政党以及辅助它的阶级如教士的利益来制定的。

如果胜利是通过暴力取得的，如法国大革命，胜利者便会将前政权的律法一股脑全部废除。前政权的拥护者也将遭到迫害、流放或处决。

除了保护自身的物质利益外，当获胜的政党在捍卫其信仰时，迫害会达到顶点。失败者别指望能得到一丝同情。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国民公会的死刑以及法国近来宗教集会禁令等莫不如此。

胜者获取的这种绝对权力让胜者走上了极端，如国民公会要求用纸币代替金币，商品要按照规定的价格出售等。限价措施很快在生活必需品上碰了壁，招致群情激奋，在大革命末期，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这一规定不了了之。几乎全由工人组建起来的澳大利亚社会党内阁近来的

遭遇也是如此，它颁布了一些荒唐的法律，赋予工会会员以相当大的特权，招致舆论的一致反对，三个月后，内阁解体。

刚刚提及的都是些不常见的例子。大部分的革命都以产生一位新君主上台掌权而告终。这位君主深知要想执政长久，首先就不能过于专宠一个阶级，而要致力于实现阶级和解。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在阶级间寻求一种平衡，以免受到一个阶级的挟持。允许一个阶级得势也即等于为自己找到一个主子。这是政治心理学中颠扑不破的规律之一。法国国王们都深谙此道，并先后对资产阶级和教士的壮大做了坚决的抵制。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下场将和中世纪德意志的皇帝们一样，被教皇逐出教会，受到凌辱，其下场一如在卡诺莎（Canossa）觐见教皇以求宽恕的亨利四世。

这个规律在历史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验证。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异常显赫，皇帝们完全仰仗士兵，军人对皇帝们的废立可以说是随心所欲。

对法国来说，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一位几乎至高无上的君主统治是一大幸事，其言必君权神授，因而声誉日隆。若无此权威，他将无法制约封建贵族、教士以及议会。如果在十六世纪末期，波兰也存在着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绝对的君主统治，那么波兰将不会走上这条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了的衰败之路。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政治革命也可以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但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些变革与导致它们的宗教革命相比是多么的脆弱。

第二章 宗教革命

一、宗教革命研究对于解读重大政治革命的重要性

本书辟出一部分篇幅用于专述法国大革命。充斥着暴力的大革命自然有其心理学的原因。

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让人吃惊，而且似乎无法解释。但如果意识到，大革命业已成为一种新宗教，它应当遵循一切信仰的传播规律，由此出发，大革命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其中的愤怒与杀戮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研究一场重大宗教革命的历史，如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显现其中的心理学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在这两起事件中，均难以窥见信仰其理性价值观在信仰的传播、在阻止迫害、在调和不同的信仰、在制止不同信仰间绝望的暴力冲突等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人们还可从中看出信仰被与信仰无关的利益方大加利用的情况。人们最终明白，不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便无法改变人的信念。

所观察到的现象清楚地表明：大革命的福音其传播方式与其他一切宗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是一样的，特别是加尔文福音。它无法以另外的方式进行传播。

不过，虽然一场宗教革命如宗教改革运动，和一场重大的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它们产生的缘由极为相似，但它们的后续影响却大为不同，由此，它们的存续时间也不相同。

在宗教革命中，信奉者无法借助实践来揭示他们被蒙骗了，因为只有上了天堂才能证实这一点。而在政治革命中，学说的错误可以很快被

实践所证实，并必定被人们所抛弃。

在督政府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使得法国陷入了毁灭、悲惨、绝望的地步，连最狂热的雅各宾主义分子自己都不得不放弃了他们的主张。仅有几个无法通过实践验证的理论原则如“平等可以为人们带来普遍的幸福”得以保留下来。

二、（**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及其先行者

宗教改革运动对很多人的道德理念和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运动的目的最初很单纯，就是为了反抗教士的舞弊行为，从实践的角度看，是为了回归福音的主张。

这场改革绝非像人们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追求自由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更宽容，那个时代的理论家认为，精英分子的宗教应当就是君主的宗教，在所有进行宗教改革的国家里，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并拥有与其一样的权势。

新信仰由于没有宣传和交流的手段，因而在法国的传播极为缓慢。在1520年左右，路德招募到了一些信徒，到1535年左右，信仰开始广为传播，当局这才意识到，必须用火刑来处死其信徒。

与广为人知的心理学规律相一致的是，上述死刑只会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官员，但主要还是一些稀里糊涂的手工艺者。这种信仰的转换主要归功于精神传染和暗示。

自新信仰开始传播以来，很多原本对它漠不关心的人现在都聚集在这个信仰的周围，但其中不乏以此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热情和贪婪的人。在好几个国家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都曾有过这个现象，尤以德国和英国为甚。

由于路德已经告诫过，教士不需要财富，因而德国的庄园主们极为

欣赏这种允许其占有教会财产的新宗教。亨利八世便是以类似的方法致富。

从这一教理中，饱受教皇欺凌的君主们看到了获取政权之外教权的机会，看到了自身摇身一变成为教皇的机会。宗教改革运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君主们的专制。

三、宗教改革运动所提主张的理性意义

宗教改革运动颠覆了欧洲，并在五十年内让法国几乎受到战争的毁灭。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从未有一个如此微不足道的原因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是证实信仰在一切理性之外传播的证据之一。神学的教理强烈刺激着人们的灵魂，尤以加尔文的教理为甚，从理性逻辑来看，却是不值得加以深究。

沉湎于救赎的路德尤为害怕魔鬼，连忏悔都难以使其平静，于是千方百计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取悦上帝，以免受炼狱之苦。

他从最初抨击教皇贩售“赎罪券”，到后来完全无视教会和教皇的权威，连宗教仪式、忏悔、圣人祭祀都一并加以谴责。

路德宣称，基督徒除了《圣经》以外，不该有其他的行为准则。此外，他还认为，没有上帝的圣宠，任何人都不应得到救赎。

最后这条教义，也即所谓灵魂归宿预定论，连路德本人对此都有些无所适从，不过加尔文对其做了精确定义。

加尔文规定，预定论是大部分新教教徒都应遵守的一种教理的基础。他说：“很久以来，上帝便预定了有些人要受到火刑，而另外一些人则将得到救赎。”为何如此不公？原因很简单，“这是上帝的意志”。

由此看来，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奥古斯丁的某些断言，全能的神应为取乐而制造出了生灵，但仅是为了让其永受炼狱之苦，而不顾及这些生灵品德和行为的好坏。一种如此不堪的胡诌居然能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并仍将继续让众多的灵魂为之折腰简直是一大奇观[1]。

加尔文的心理学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学如出一辙。和后者一样，加尔文对事实的真相了然于胸，因而对于不赞同其教义的人，加尔文便将之处死。他信誓旦旦地说，上帝意欲“在有人质疑其荣耀时，就让整个人类消失”。

加尔文与其信徒的例子表明，理性认为最荒谬的事情在受到信仰蒙蔽的人看来，都是极其正常的。从理性逻辑看来，既然无论做什么，大家都坚信自己是被救赎或是被诅咒，那么基于灵魂归宿预定论来建立道德也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做到了，他在一个完全非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他的信徒们自视为上帝的选民，由于自视甚高，他们充满自豪感，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堪称楷模。

四、宗教改革运动的扩展

新的信仰不是通过演说，也非经过推论，而是通过上述机制得到了传播，也即通过强词夺理、一而再再而三、精神传染和个人威望得以传播的。革命思想后来在法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在前文谈及迫害，迫害对于传播有利无害。每一宗迫害都会引发一些人改变信仰，这一点在基督教早期曾出现过。议会参议员阿内·迪堡（Anne Dubourg）被判火刑，他一边走向柴堆，还一边规劝群众改变信仰，一位目击者说：“他的坚定不屈要比加尔文的书更有说服力，很多年轻学生由此成了新教徒。”

为了不让这些受刑者对群众说话，便在行刑前割掉其舌头。更加恐

怖的是，将受害者系在一根铁链子上，将受害者扔到柴火中，再将其拉出来，反复多次。

然而没有什么能吓退新教徒，于是乎便在让其领略了火刑的厉害之后又赦免他们。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改变了其起初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一次性设立六个火刑场。而我们知道国民公会巴黎仅设立了一个断头台。可能是酷刑不太痛苦，基督教殉难者对此满不在乎。信仰者受到了其信仰的蒙昧。如今人们知道，某些形式的蒙昧可以让信仰者对酷刑变得完全麻木不仁。

新信仰在快速传播着。到了1560年，在法国出现了2000个经过改革的教会，很多原本无动于衷的大地主都皈依新教义。

五、不同信仰间的冲突：势同水火

我已重复过，不宽容总是与强烈的信仰相伴随。宗教及政治革命已经无数次验证了这个结论，我们还知道，相似的宗教其信徒间的不宽容要比疏远的信仰，如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护教者之间的不宽容为甚。如果认为是信仰导致法国长期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那么人们就会注意到，信仰间的差别其实都只是在细枝末节处。天主教和新教都极为崇拜同一个上帝，只是在崇拜的方式上有些差别。在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如果理性能够起到一丁点儿作用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上帝对于以哪种方式来膜拜他是不介意的。

理性无法触动信奉者的大脑，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继续他们的鏖战。君主们促使二者和解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édicis）目睹着改革派在酷刑胁迫下反而日益壮大并且吸引着数量众多的贵族和官员加入进来，仍幻想着让二者停止冲突，于是便在1561年在普瓦西召开主教和牧师会议，意图撮合这两种教义。这

样一番心思突显了梅迪奇王后对神秘主义逻辑是多么的无知，尽管她很精明。人们在历史中还找不到有关通过辩驳就改变信仰的例证。梅迪奇王后还不知道的是，宽容在必要时可以发生在个体之间，但宽容在集体间是不可能出现的。她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与会的神学家们引经据典，相互攻讦，但却无一人产生动摇。梅迪奇认为最成功的莫过于在1562年颁布的一项敕令，赋予新教教徒们集会并公开举行礼拜活动的权力。

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是值得推崇的，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这是不明智的，这种宽容除了激怒双方之外，不会有其他结果。在新教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南方地区，新教教徒迫害天主教教徒，并试图用暴力迫使他们皈依新教，如果不能如愿，便割断他们的喉管，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势力占优的地区，新教教徒所受到的迫害也是如此。

这样的敌视必然会导致内战。所谓宗教战争让法国长期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城市遭到蹂躏，居民遭到屠杀，冲突瞬间便呈现出了宗教或政治战争特有的野蛮特征，这一幕在随后的旺代战争中得到了再现。

老人、妇女、儿童，都遭到屠杀。一个叫德奥佩德（D’Oppede）的男爵堪称是“劳模”，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在十天的时间里，指使人极端残忍地杀害了3000人，摧毁了三个城市以及22个村庄；蒙吕克（Montluc）堪称卡里耶（Carrier）的前辈，让人将加尔文信徒活生生地投掷到井中，直至井被填满。新教教徒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对待坟墓和雕像的手段和后来国民公会对待圣德尼皇家陵墓（Saint-Denis）的手段完全一样。

法国在这些浩劫的影响下，在亨利三世统治的后期，逐步分崩离析，被肢解为众多的结成联盟的小城邦共和国，各自为政。皇家权力逐步丧失。布卢瓦邦向逃离首都的亨利三世坦诚了自己的想法[2]。1577年，旅行家李普马诺（Lippomano）穿越法国，历经奥尔良、布卢瓦、

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所到之处城市悉数被毁，教堂成为废墟，坟墓被捣毁。这几乎也是督政府末期法国的景象。

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中，留给人们最为灰暗的记忆是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Saint-Barthélemy）事件，虽然被屠杀人数不是最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屠杀的。

不需要特别深奥的心理学知识就能明白，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下令这么做。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皇室的罪行，而是群体性的犯罪。卡特琳·德·梅迪奇觉得自己和国王的性命受到了四五个在巴黎的新教首领所策划的阴谋的威胁，于是按照那个时代通行的做法，派人上门刺杀了他们。巴蒂福尔（Batiffol）对随后而来的大屠杀作了非常清楚的解释。

“一听到所发生的事情，整个巴黎立刻谣言四起，说要屠杀胡格诺教徒，于是天主教贵族、卫士、弓箭手，都立刻拿起武器冲上街头，进行杀戮，大屠杀就这样在‘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的叫嚣中开始了。”凡被认为是异端分子的都难逃厄运，或被打死，或被溺毙，或被绞死，仅在巴黎就有2000余人被杀死。

由于精神传染，外省的民众也群起效仿巴黎的做法，有六千到八千新教教徒被杀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狂热慢慢降温，所有的历史学家，包括天主教史学家，都对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表示，以现在的视角，着实难以理解当时的精神状态。

事实上，在当时，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但没有受到指责，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阵营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菲利普二世在得悉此消息后，高兴得语无伦次，法国国王所收到的祝贺之多，堪比其

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

尤其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更是难以掩饰喜悦之情。为纪念这一欢乐时刻[3]，他令人铸造一枚奖章，点燃两堆节日焰火，鸣响火炮，举办庆祝集会，并召集画家瓦萨利（Vasari）在梵蒂冈的墙壁上描绘杀戮的主要场景，随后还差遣一位使节前往法国面见国王，对其这一壮举大加褒奖。有了这些历史细节，人们方才懂得信仰者的灵魂到底是怎么回事。雅各宾分子在大恐怖时期[4]的精神状态和格列高利十三世的精神状态相类似。

面对这样的大屠杀，新教教徒们当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也取得了收获，到了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向他们做了让步，颁发《博利厄敕令》（*Edit de Beaulieu*），允许他们自由集会并掌控八个要塞，而且在议会中，天主教和胡格诺教各占一半的席位。

被迫所做的让步根本无法持久。吉斯公爵（duc de Guise）领头组建了天主教同盟，战斗继续进行。但是战争不能无休无止。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Edit de Nantes*）并宣布放弃新教信仰[5]，冲突因而告一段落，双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平安无事。

冲突得到缓和，但并没有结束。到了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教徒们又不安分起来，黎塞留被迫于1627年围攻拉罗歇尔（La Rochelle），造成15000余名新教教徒死亡。随即，政治抱负远大于宗教抱负的这位枢机主教对新教教徒又变得极为宽容。

但这种宽容无法长久。对立的信仰，一旦一方感觉有实力支配另一方，那么在对峙时便会不惜余力地毁灭对方。在路易十三时代，新教派从多数派变成了实力最弱的一方，于是便高挂免战牌，老老实实地过日子。此时的新教教徒人数大概在120万人左右，拥有600多个教堂，有700名左右的牧师负责管理。法国领土上出现的这些异教徒，让天主教

士难以容忍，人们用各种手段对其加以迫害，但是效果甚微，于是路易十四于1685年使用龙骑兵对新教教徒加以迫害，造成大量新教教徒死亡，依然无果而终。需要采取一些一劳永逸的手段。在教士以及博絮埃（Bossuet）的压力下，《南特敕令》被废除了，新教教徒被迫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种凄惨的移民持续很长时间，据称，这让法国人口减少40万，减少的这些人都是极为刚毅的人，因为他们毅然听从信仰的召唤，而不是利益。

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从宗教改革运动这一段灰暗的历史来看待宗教革命，就会认为宗教革命都是灾难。但宗教革命并非都是如此，其中也有极大促进文明进步的宗教革命。

宗教革命赋予一个民族一个道德体系，往往会极大促进其物质力量的发展。穆罕默德建立起的新信仰，将那些弱小的阿拉伯部落改造成为了令人生畏的民族。

新的宗教信仰不仅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得到统一，它还可以显著改变一个几乎不可改变的事情：一个民族的情感。这是任何哲学、任何法典都无法做到的。

人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生的宗教革命中最伟大的革命——推翻了异教，用一位来自加利利（Galilé）平原的神取而代之——观察到这一点。新理想要求人们放弃全部的尘世之乐，以寻求天堂中永恒的极乐。这样的一种理想很容易被奴隶、穷人、不幸的人所接受，因为他们此生已经没有了幸福可言，于是人们给他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以替代眼前毫无希望的生活。清戒的生活容易被穷人所接受，但富人也可以接受。这点展现了新信仰的力量。

两千多年来，基督教革命不仅改变了德行，它还给文明也带来了深

远的影响。一种信仰成功了，文明的所有因素自然就要立即适应这种信仰，文明很快也就被改变。作家、文人、艺术家、哲学家，只是用自己的作品来表现新信仰的思想而已。

一旦某种宗教或政治信仰取得成功，理性便对它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信仰总是念念不忘去阐释理性、证实理性并强加理性。在摩洛克神（Moloch）时期，可能会有诸多的布道者、神学家在论证以人祭祀的作用，这与人们赞誉宗教裁判所、美化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不要过于指望持有坚定信仰的人能够有多宽容。只有古代社会里那些多神论者才拥有宽容心。现代社会里讲究宽容的国家是认可多神论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在这些国家里有着不计其数的宗教派别。同一个名称的诸多教派，其信奉的神也是五花八门。

繁多的信仰，成就了宽容，成就了弱势的信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解的心理学问题：如何在坚持宽容的同时又能坚持信仰。

上述资料表明了宗教革命的巨大作用以及信仰的力量。尽管其理性价值不值得一提，但宗教革命塑造了历史，避免了没有信仰、没有力量的民众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信仰，以便规范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任何哲学都不能替代这些革命。

---

[1] 灵魂归宿预定论的教义仍然在新教的教义课本中出现并被传授给教徒。我从爱丁堡弄来的一本最新正版的教义课本中选取一段来对此做个说明：“按照上帝的圣谕，为呈现上帝的荣耀，有的人和天使被预定为永生状态，其余则被预定为永死状态。被上帝预定命运的天使和人，都是特定的且不可更改；其人数也是确切无误，不可增减。被上帝预定得活之人，都是在上帝创世之前，依据他一贯的目的、从不示人的意图和善良的愿望，挑选基督来承受永远的荣耀，这是上帝无限圣宠与爱的结果，而非出于对其信心、善行、毅力的预判，也非因上帝造人时有何先决条件或动因，一切都是让人赞美的圣宠使然。上帝选定了荣耀继承者，并根据自己永恒的无限的意图，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荣耀继承者，虽在伊甸园里堕落了，却被基督所救赎；圣灵在适当的季节

使之膜拜基督；由此被收为义子，消除罪孽，又承蒙其庇护，借着对基督的膜拜而得救。除了荣耀继承者外，无人可被基督感召、庇护、收养、消除罪孽和救赎。”

[2] 其想法大概和发生在1588年12月23日的刺杀事件有关，其时亨利三世利用在布卢瓦（Blois）召开三级会议的机会，派人暗杀了吉斯公爵及洛林红衣主教。——译注

[3] 应该有很多人获得了这枚奖章。因为国家图书馆奖章陈列室中收藏有三枚这样的奖章，金、银、铜各一枚。奖章的翻印件见博纳尼（Bonnani）所著的《教皇奖章》（*Numism Pontific* ）第1卷336页，其一面刻有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像，另一面刻有一个天使，手持双刃剑砍杀着胡格诺教教徒，并有题铭：Ugonotorium strages，也即“屠杀胡格诺派”。（西塞罗或蒂托-李维将“strages”一词解释为杀戮或屠杀；而维吉尔或塔西佗则将其释为灾祸、毁灭。）

[4] 又称雅各宾专政，法国大革命时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间由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统治法国时期的称呼。在这一段时间内，法国政府为了彻底得到政权，将嫌疑的反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严格限制物价。该时期有数千人被残忍杀害。雅各宾派（激进共和主义派）在1793年的起义中战胜温和共和主义派，夺取了政权。但是，雅各宾派执政也为法国历史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推广教育，提倡宗教自由，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等。1794年，热月政变爆发，罗伯斯庇尔被斩首，雅各宾专政结束。——译注

[5] 亨利四世生活的世纪是法国宗教战争流血纷争的时代。登上法国王位之前，亨利饱受圣路易后裔及新教教徒领袖两种身份的影响，为了合法继承法国王位，他宣布改信天主教，并颁布南特敕令，为延续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画上句点。这也是第一部承认新教教徒信仰自由的敕令。法国的经济在他统治时代发展起来，亨利四世为此深受人民爱戴。1610年，亨利四世于巴黎遇刺身亡。凶手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教徒。——译注

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

一、政府在革命中的弱势

不少现代国家，如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一个世纪以来都在不停地闹革命。这些革命都有迅捷和易举的特点，而受攻击的政府都是被推翻的命运。

迅捷意味着精神传染的快速，这得归功于现代化的传播手段。政府的弱势让人惊讶。这意味着政府理解力和预判力完全失效以及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信。

而轻而易举地让政府轰然倒塌并不新奇。这在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被推翻的不仅有作为宫廷谋反牺牲品的君主专制政府，还有借助新闻界和舆情监测机构而熟知情况的政府。

在这些瞬间倒塌的政府中，最令人称奇的是由查理十世的敕令[1]引发的倒台。众所周知，这个君王是在四天之内倒台的。他的内阁根本没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当国王外出狩猎时，他对于巴黎的平静局势是非常放心的。军队对其也是毫无敌意，一如路易十六时代，但是指挥混乱的军队却被若干叛匪一击即溃。

路易-菲利浦的垮台是更为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位君主并没有像查理十世那样遭人痛恨，垮台并非由于其执政的鲁莽，而是由于一件不起眼的极易被扑灭的骚乱所致。

历史学家不明白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且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居然可以被几个闹事者推翻，于是很自然地将路易-菲利浦的垮台归结为某些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垮台的真正原因就是负责保卫他的将军们的无能。

这是为人们所知的教训最为深刻的例子之一，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博纳尔（Bonnal）将军对这个事件研究得极为透彻，基于一位见证人——埃尔兴跟（Elchingen）将军——的记录。36000人的军队当时就在巴黎，但是无能且胆怯的将领却不让调用军队。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条接着一条，最终便是禁止向群众开枪，且允许群众和士兵混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骚乱最终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国王被迫退位。

博纳尔将军用大众心理学的研究来分析前述的例子后指出，导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是多么容易被制止。他还特别提到，如果将领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一小股军队便可以阻止叛乱分子进入议院。而由君主主义分子组成的议院肯定会拥戴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摄政。

类似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革命中。

这些事实表明了不起眼的小事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由此，人们应不必过于在意历史的一般规律。没有导致路易-菲利浦下台的骚乱，我们便可能不会有1848年的共和制，没有第二帝国，没有色当战役，没有侵略，也不会丧失阿尔萨斯。

在我刚刚说到的革命中，军队对政府没起到任何作用，不过也没有调转枪口对付政府。一般而言，都是军队进行革命的，如葡萄牙和土耳其。发生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不计其数的演变便是借助军队实现的。

借助军队进行的革命，新的执政者通常也在军队的操纵下倒台。我之前曾经谈及罗马帝国末期，那时，皇帝们都是被士兵所推翻。

同样的现象经常出现在现代社会。关于希腊革命的一段报道描述了政府被军队操控后的结果。

“一天，有80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他们指控的领导人职务的话，他们便要辞职。而另一天，一群租种属于储君的分成制租田

的农业工人群起要求瓜分其田地。海军抗议的是对索巴斯（Zorbas）上校的提拔。索巴斯上校在与上尉泰帕尔多斯（Typaldos）进行了一周的谋划后，与议院主席展开对等的谈判。与此同时，市政联盟对这些海军军官加以斥责。一名议员提议，应以敲诈罪名来处理这些军官及其家属。当指挥官米亚乌里斯（Miaoulis）朝造反者开枪时，原先受泰帕尔多斯指挥的海军士兵们，便开始履行职责了。这不再是伯利克里（Périclès）以及地米斯托克利（Thémistocle）时代的那个和谐的希腊，而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亚格拉蒙营地（Camp d’Agramant）。[2]”

没有军队的帮助，一场革命是无法成功的，或至少军队要保持中立，最常见的是军队没有参与，运动便开始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就是如此，紧接着是1970年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起因是在色当战役中，法国战败投降，令法国人蒙羞。

大部分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地区，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但这并非一成不变。如大家知道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尼塔尼、法国南方就曾群起造反来对抗巴黎。

二、政府如何抵御革命

在前文列举的多数革命中，政府的消亡是由于其懦弱，最后一触即溃。

俄国革命告诉我们，一个政府要坚决捍卫自己，才能最后赢得胜利。

对于一个政府而言，革命永远都不是最可怕的。由于在东方遭受到巨大失败以及旧制度长期暴虐的统治，所有的社会阶层，其中包括部分军队和海军，都揭竿而起。铁路、邮局、电报都纷纷罢工，导致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各主要地区间的交通、通信基本中断。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是农民阶级，他们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宣传。农民的命运非常凄惨。在沙俄农村村社组织米尔（Mir）体制下，他们只能耕作土地但无权获得土地。政府决定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方式来与这个人口众多的阶层实现和解。一些特殊的法律出台了，如强制地主出售给农民其拥有的部分土地，并专门成立一些银行，负责借贷给购买土地者必要的资金来支付土地款。而所借款项可以用其出售的作物款以按年缴付的方式来偿还。

在确信农民保持中立之后，政府开始与焚烧城市、向人群投掷炸弹、打仗残酷无情的狂热分子作战。所捕获之人一律处死。这种屠杀是自人类有史以来保护社会免遭反叛者摧毁的唯一办法。

获胜的政府还明白，必须要满足国家开明人士提出的合理的要求。于是政府建立起了议会，让其负责起草法律、监督开支。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所有原来的支持都接二连三地失去的情况下，一个政府是如何凭借着智慧和决心战胜最大的困难的。公正地说，政府不是被推翻的，而是政府选择了自杀。

三、政府发动的革命：以中国、土耳其等国为例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

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Pierre le 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

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形，革命是由政府发起的，但革命的对象是技术而非灵魂。

只有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极具天赋的独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务：改革要顾及全体人民。此处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专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过仔细观察，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败不过就是这些改革企图的代名词。无论这些革命是从社会高层还是从底层发起的，它们都不会改变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民族的灵魂。它们仅能触及已被岁月侵蚀的随时会崩塌的东西。

对一个政府而言绝难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此，实际上是中国做了最有趣的尝试。中国政府原本想强行推动改革，在中国进行改良，但改革却引发了不满，不满导致了革命，革命进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烟、禁赌、改建军队、兴办学校导致税赋增加，这一点和改革本身一起，成为舆论责难的目标。

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

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诩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一部分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共和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样的。

中国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失去了其日积月累搭建起来的骨架后所变成的样子。经过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中国必得要重新建立起

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暴虐必然要远胜被推翻的旧体制。科学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根能让一个无纪律的社会存在下去的魔棒。当然如果有这样一根可以代代相传的魔棒，也就无须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们宣泄着原始的本能，摧毁祖先苦心构筑起来的堤坝之后，也唯有通过一种暴政才能恢复这些堤坝。

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类似，可以作为佐证来证实上述断言。几年前，一些在欧洲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并满怀憧憬年轻人，在几名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残暴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苏丹[3]。在接受了我们强大的拉丁信仰——对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之后，他们想要在一个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种族众多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建立起代议制政府。

这种尝试前景很不乐观。改革的倡导者应当注意到，尽管他们十分宽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些与被推翻的体制相近似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他们无法废止不经法定审判程序的死刑，无法制止对基督教教徒大规模的屠杀，也无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责他们当然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无法改变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狂热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来治理他们信仰的圣地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难以撼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点像是立宪体制的君主专制形成了，它和旧体制没什么大的差别。类似的尝试形成了这样一个范例：在改造民众的灵魂前为其选择体制是徒劳的。

四、在革命中，无法和政府一起被更迭的社会因素

前面我们谈到了稳定的民族意识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个存续已久的现成的体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君主很容易被谋反者推翻，但是谋反者却无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拿破仑

下台后，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缘继承人，而是国王的继承人。后者身上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仑的儿子只是那些尚未固化在灵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位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的部长，无论他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都鲜有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位伟大的首相独自一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他的主子，仅仅对他动一动手指便就让其滚蛋了。面对受到舆论支持的一个定律，人是那么无足轻重。

由于种种原因，以政府为化身的某个定律会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并非社会一切的组织因素都会同时消亡。

如果只知道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不安，就会认为法国是处在一个极度的无政府状态下。但法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似乎和所有的纷争以及体制无关。

在历史所关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书本都不屑去谈论它们。它们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但它们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过，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名称频繁变化的法国政府，而对日常小事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它证实了法国政府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

一个民族真正的引领者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是国王和大臣，但从每日生活中的小事来看，则没他们什么事。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一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

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法国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并逐渐过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职员管理国家的阶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们就会越发感觉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进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非常难。

---

[1] 查理十世为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1824～1830年在位）。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四项高压敕令，如解散立法机构并改变选举制度等，敕令成了当年七月革命的导火线。从7月27日开始，以《自由报》为首的四十多家报纸发表了抗议书，公开号召人民放弃对政府的服从。次日，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巴黎人民同政府军展开激烈战斗。29日，起义者攻占了王宫，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国。——译注

[2] 法国谚语，意思是同一阵营里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争执。——译注

[3] 苏丹是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应该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推翻了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恢复了1876年宪法，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译注

第四章 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一、民族意识的韧性和稳定性

对历史中某个特定时刻的某一个民族的认识，既包括对其环境的认识，也包括对其过去的认识。理论上可以否定这个过去，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和如今很多的政治家所做的那样，但在行动上却是无法摧毁这个过去。

在数百年来逐渐积累构建而成的过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情感、传统、偏见，它们构成了民族的灵魂，民族灵魂产生了民族的力量。没有它，就没有进步可言。每一代新人都需要重新开始。

构成民族灵魂的一系列东西，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稳定性的情况下才是稳固的，但是这种稳定性不应当过分，否则就没有韧性可言了。

没有了稳定性，祖先的灵魂就没有了任何依托；而没有了韧性，灵魂也就无法适应由于文明的进步而导致的环境的变迁。

民族灵魂若有过度的韧性，便会导致人民进行无休止的革命。而过度的稳定性则会导致没落。因为长期的过于稳定，人类会变得无法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人类这样的生灵就会消失。

鲜有民族能够在这两个相反的特征——韧性和稳定性——之间达到一个恰好的平衡状态。古代的罗马人和现代的英国人可以说是在这个方面做得最好的两个民族。

灵魂过于稳定的民族，其革命往往是最暴力的。他们不懂得慢慢演化并适应环境变化的道理，当发现这种适应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因而不得不强行适应。

获得稳定性要经历漫长的时间。一个民族的历史往往就是一部讲述其长期努力获得灵魂稳定性的记述。如果这个民族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它便是一盘散沙，既没有凝聚力，也没有战斗力。在经历了罗马帝国后期的入侵之后，法国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塑造自己的民族灵魂。

最终法国拥有了自己的民族灵魂，但是在数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灵魂却变得过于僵化。如果民族灵魂再多一点韧性，那么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就会与其他地方一样，慢慢地发生改变，这样，我们也就可以避免依靠代价高昂的革命及其结果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

前述思考呈现了民族在动荡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解释了同样的革命为何在不同的民族中产生的结果迥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有些民族中受到追捧，在有些民族却备受冷遇。

当然，作为一个极为稳定的国家，英国也发生过两次革命，并让一位国王送了性命[1]，但是盛放其精神骨架的模具却是既稳固而又不乏弹性。由于稳定，过去的所获可以得到传承；而有弹性，则就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样的模具进行调整。英国从未想过在理性的招牌下用摧毁祖先遗产的方式来重建一个新社会，这只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那些人的所为。

A.索雷尔（A.Sorel）写道："法国人鄙视他们的政府、厌恶他们的教士、仇恨他们的贵族，奋起反抗他们的法律；而英国人却为他们的宗教、宪法、贵族政府和上议院感到自豪。这些东西一如气势磅礴、哨楼林立的巴士底狱，英国人在其庇护下，在英国骑兵的保卫下，傲视欧洲，指点欧洲。英国人承认，在他们自己的宫殿里，人们也为这些东西的控制权在争吵，但却不要外国人来染指。"

民族对自身命运的影响还清楚地体现在美洲那些西班牙共和国里所发生的无休止的革命上。这些国家的人口是由混血儿或者说是由遗传特

征各不相同的个体构成的，其祖先的特征业已荡然无存，因而这些人口没有民族灵魂，也就没有任何的稳定性。一个混血的民族始终是难以统治的。

如果人们想确切地知道种族表现出来的政治能力上的差异，便需要研究被两个不同的种族接连管理过的同一个国家。

历史中不乏这样的事件。古巴和菲律宾最近发生的事件则令人惊异。菲律宾则刚刚由西班牙人殖民转由美国人殖民。

人们知道，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古巴的贫穷和混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程度；而在这个岛国被美国接手后几年间又繁荣到了何种程度。

同样的经历在菲律宾重现，其时的菲律宾已经被西班牙君主统治了几个世纪。但该国最终仍是一个巨大的沼泽地，那儿各类传染病肆虐，既没有商业也没有工业，人民生活悲惨。在经过美国治理的几年后，这个地方完全变了样，疟疾、黄热病、鼠疫、霍乱消失了，沼泽干涸了，有了铁路、工厂、学校。十三年间，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

依然不懂得“民族”二字的深刻含义、不知道一个民族其祖先的灵魂的作用大到何种程度的历史学家们，可以看看这些例子。

二、人民对革命的态度

在一切革命中，人民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但绝非人民发动、人民指挥着革命。它的作用取决于领导人。

当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有些百姓便自发起义，正如人们最近在香槟地区看到的那样。一场地方性的运动就是一场骚乱。

当领导人极具影响力时，那么革命便容易发生了。巴西和葡萄牙就是最新的例子。但是新的思想要想深入人心，还需要漫长的时间。通

常，人们认同一场革命，但却不知为什么，当人民有幸明白了这个为什么之后，那场革命早已结束了。

人们之所以进行革命，是因为有人鼓动他们去革命，但对革命领袖的思想知之甚少，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揣摩革命，他们与革命发起人对革命的认识大相径庭。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789年的大革命，其真实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贵族的统治，也即用有能力的新精英分子替换业已变得无能的旧精英分子。

革命起初的这个阶段无关人民的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已经明示天下，但只体现在选举代表的权力上。

百姓目不识丁，他们不奢望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在社会阶梯上攀爬，也丝毫感受不到与贵族平起平坐的意义，他们本来也不想这样，人民的看法和利益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极为不同。

国民公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促使国民公会把人民牵扯进来。人民在其中越陷越深，资产阶级大革命很快演化成为一场人民革命。

一个没有力量的思想，只有依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才有所作为，为了打动人民，资产阶级理论思想变成了一种清晰的新信仰，它带有明显的功利因素。

这种转变是迅疾的，当人民听到眼前被视作政府的那些人对它保证说人民翻身做主人后，自视为受害者的人民大众便开始洗劫、纵火、屠杀，并自以为在替天行道。

革命定律的巨大力量在于释放出被传统、法律、环境长久压抑的原始野蛮的本能。

于是，所有的社会约束日渐坍塌。民众体味到了拥有无限权力以及追捕、洗劫前主人的快感。成了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民众，还会有什么不敢干的？

“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是信仰的真实体现，也是大革命之初的向往，但很快它就成了掩饰大众真实动机的冠冕堂皇的词，如贪婪、嫉妒以及仇视高高在上者等，这些动机是任何约束都无法抑制的。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法国就落入无序、暴力和无政府的状态之中。

自大革命从资产阶级蔓延到人民大众阶层之时起，大革命便不再是理性支配本能，而是相反，成了本能竭力去支配理性。

本能对理性的胜利有着合法的借口，但这是一种可怕的返祖现象。社会的一切努力——依靠传统、习俗以及法制对遗传下来的人的动物本能和原始兽性进行抑制——是实现社会延续不可或缺的。对这些本能的抑制是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对其本能的抑制越强，文明程度就越高，但却无法摧毁本能。诸多因素皆可轻易将其激活。因此，放纵民众的激情是很危险的。一如滔滔洪水，一旦越过河床，如不进行大肆蹂躏，它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里瓦罗尔（Rivarol）[2] 在大革命之初便说过：“这不是对群氓进行启蒙的世纪，这场撼动一个民族之根基的大革命是一场不幸。”

三、人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

大众心理学的规律表明，没有领导人，人民是无所作为的，人民是因听信怂恿而信心满满地大规模地投身革命的，但他们绝不会成为所参与的运动的领导者。

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会有领袖忙碌的身影。他们不创造革命赖

以为继的思想，只用这些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南。思想、领袖、军队和群众构成了一切革命的四要素，且各有各的作用。

群众在领导人的煽动下，成群结队地行动起来。他们就像是一发发本身没有力量但借助火药的力量洞穿钢板的炮弹。群众很少明白自己参与的革命是怎么回事。他们心甘情愿跟随领袖，甚至连自己到底图什么都懒得去想。只是因为查理十世颁布了几项敕令，他们便推翻了查理十世，但对查理十世所颁布的敕令的内容却是一无所知，若问他们后来为什么又要推翻路易-菲利普，他们肯定会一脸茫然。

包括米什莱（Michelet）、奥拉尔（M.Aulard）等诸多学者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认为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的发起者。

米什莱说："大革命的主力是人民。"

奥拉尔写道："关于法国大革命是由几个精英人物、几个英雄发起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从1789年到1799年这段时期的经历来看，没人能够独自左右事件的进程，无论是路易十六、米拉波（Mirabeau），还是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都无法做到。法国人民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英雄这点还用说吗？只要看看法国人民是组织有序还是群氓便知。"

柯钦（M.A.Cochin）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对人民的作用的看法更是偏激。

> 米什莱说的没错，这是个奇迹。对大革命了解得越多，就越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五年间，无领袖、无法律的人民，似群氓，然其指挥、管理及其一言一行，都带着干练、连贯，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整体。无政府状态也让溃败中的秩序派大开眼界……2500万人，在三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3]，形同一人。

如果人民步调一致的行为正如作者所设想那般是自发的话，那无疑是个奇迹。奥拉尔自己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谈及人民时，也

小心翼翼地说到，人们处在群体之中，群体可能受到一些人的领导。

“后来，是谁巩固了国民团结？谁拯救了遭受复辟反攻的以及被内战弄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是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是卡尔诺（Carnot）[4]？”诚然，这些人都发挥了作用；但是，法国的完整得以维护，法国的独立得以确保，都是仰仗以人民公社和协会组织起来的法国人团体。是市镇的及雅各宾派的组织击退了欧洲反法联盟。不过在每个团体中，若仔细观察，都可找到2～3个能力出众的人，他们无论是领导者或是被领导者，在工作中，都透着一种领导的气质，人们称之为领导人，在我们看来（如细读人民协会的会议记录便知），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其团体而非其自身。

奥拉尔的错误在于他认为一切团体都由“一场理性和博爱的运动”而生。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自发的成分。遍布法国的数千个小俱乐部，唯一接受的便是来自巴黎雅各宾总部的号召，并且心甘情愿任其差遣。这就是事实原貌，有人只是出于对雅各宾主义的迷信而不愿承认罢了[5]。

四、人民群体及其构成因素

为了解释某些理论概念，人民已被升华成为一个神秘的群体，它集一切权力及一切德行于一身，政治家们对其赞不绝口、恭维有加。但通过对人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对人民的这种概念还需要三思。

无论是当年还是如今的雅各宾分子，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体有一种至上的特性，拥有只有神灵才有的属性，它无须为自己的行为担当，也从不犯错。人们对其只有膜拜。人民可以烧杀抢劫，可以犯滔天罪行，它可以在今天把人捧上天，而明天又将其贬得一文不值，但这都没关系。政治家依旧不停地歌颂它的德行、它的大智慧，并把人民的每一个决定都奉为圭臬[6]。

这个神秘的偶像般的群体，一个世纪以来备受革命者推崇，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这个群体可以被分解为两个迥异的类别。第一类由农民、商贩以及各类工人组成，他们需要安宁和秩序来从事生产。这一类人占了人民的多数，但却是一类绝不想革命的多数。他们只想平静地过日子，因而被历史学家忽视。

第二类人是由一群在犯罪意识支配下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边缘人组成。他们因酗酒和贫困而堕落，成了小偷、乞丐、一文不名者和没本事的失业工人，他们组成了起义军中一个危险的群体。他们是国家一切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

因害怕惩罚，这类人中的大多数在平时都是老老实实的，不过，一旦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他们罪恶的本性便暴露无遗。

让每一次革命变得血腥无比的大屠杀就是由这群阴森恐怖的乌合之众所为。

这类群氓军人，在其头目的带领下，不断冲击主要的革命议会。这群捣乱的军人没有别的想法，只想着屠杀、抢劫、纵火。他们完全不把革命原则和理论当回事。

通过精神传染，并受到运动的吸引，一群游手好闲且无所事事的人又加入到这群来自人民最底层的群氓中。听到别人高呼口号，他们也跟着呼喊口号，看到别人起来革命，他们也跟着革命，但他们却连喊口号、闹革命的最基本的目的也一无所知。这是受氛围感染的随大流、凑热闹行为。

这群心存歹念且不安分的人，却是自古至今一切义军的核心分子，

是演说家们唯一看上眼的人，也是其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人民。实际上，这里的至高无上的人民正是由梯也尔[7]（Thiers）口中的群氓构成的。

梯也尔说：“自从塔西佗目睹了群氓们为皇帝们的暴行欢呼雀跃的情形之时起，群氓卑劣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这些野蛮人在社会底层繁衍生息，随时准备响应权势的召唤。他们以其累累罪行让社会蒙羞，让一切建树都背上骂名……”

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的社会底层人口，其恣意妄为的时间有在法国大革命中那样持久。

自野蛮的大众没了约束伊始，也即自1789年起，早在国民公会之前，大屠杀便已开始了。大屠杀手段的残忍令人发指。在“九月大屠杀”[8]事件中，人们用马刀一刀一刀地割着囚犯们的肉，这样做既延长了囚犯们的痛苦，又让目睹这惨绝人寰的情景的旁观者们感到莫大的快乐。

类似的情景在法国屡见不鲜，甚至在大革命之初也是如此。对外战争等任何借口都不足以来为此类暴行开脱。

从5月份到9月份，一系列的纵火、谋杀、抢劫等，让法国血流成河。鲁昂、里昂、斯特拉斯堡等都相继落入群氓之手，泰纳（Taine）记录下了发生在上述地方的120个事例。

特鲁瓦市市长的双眼被用剪刀挖出，并在被折磨几个小时后死去。龙骑兵上校贝尔曾斯（Belzunce）被活活剁碎。很多地方，都可见到受害者的心脏被剜出后挑在矛尖上招摇过市的情形。这就是束缚底层民众的体系被轻率解除后，群氓们在原始兽性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这些暴行得到姑息的原因，就是政治家们要迎合他们以便从中获益。可以设想一下，在那一刻，这数千人融合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残忍的、偏激的怪兽，其状恐怖，连世上最嗜血的暴君都难望其项背。

然而这群暴戾而残忍的人，一旦遭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又会变得极其乖巧。这群人的残暴是无边的，他们的奴性也是无边的。所有的专制者都对其大加利用。而恺撒一类的强人，如卡里古拉[9]（Caligula）、尼禄（Néron）、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或布朗热（Boulanger）等，则是这群人的偶像。

除了这群在革命期间发挥主力作用且具有破坏性的群众之外，剩下的便是之前提及的只想过安稳日子的真正的群众。他们有时也会从革命中受益，但绝不想革命。革命理论家们对其知之不多，也不看重他们，觉得他们从骨子里就是传统且保守的。但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中流砥柱，并且始终如一、尽其本分。由于胆小、恭顺，因而极易为领袖所左右，并在其影响下，一时间也可以做出疯狂之举，但在传统力量的约束下，他们很快又会回到正轨，这就是他们很快厌恶革命的原因。其固有的传统意识促使其在无政府主义成灾时站起来与之对抗，并找寻一位带领他们重建秩序的领袖。

这样的人民并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也没有复杂的思想，他们温顺且本分。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府其实十分简单，就是一种极类似独裁的政府。自希腊雅典共和国至今，在无政府状态结束之后总是一成不变地出现这种形式的政府，个中原因恰是如此。在第一次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波拿巴独裁政府受到了广泛欢迎；第二次大革命后也是如此，尽管一片反对声，但四轮全民表决，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0]（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及皇帝，借助公民表决，他的政变还合法化了，法兰西帝国由此得以顺利建立，一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前，他的统治都是合法的[11]。

无疑，人民在这些事件中受到了蒙蔽。但若没有这些导致混乱的革命伎俩，人民也不会去想办法来摆脱这些混乱。

要想弄清楚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本章所提及的事件是不应被忽视

的。人民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又极为不同于传闻中的那样，但传闻能给人以鼓舞。

---

[1] 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两次内战，1649年元月30日，查理一世被送往断头台处死。——译注

[2] 里瓦罗尔（1753—1801），法国政论家、新闻记者及讽刺诗人。——译注

[3] 每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译注

[4] 卡尔诺（1753—1823），法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堡垒防御工事专家，1792年选入国民公会，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次年参加救国委员会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成功地组织了许多战役。因不满罗伯斯庇尔的恐怖政策，转而支持热月政变。1795年任督政官，1800年被拿破仑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因主张维护共和制，反对拿破仑称帝，遂退出政界，悉心研究军事和数学。1814年被委任守卫安特卫普，百日王朝时期曾任内政大臣。——译注

[5] 奥拉尔在其与得比图尔（Debitour）合著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大书特书。其中就讲到了人民自发且坚定地参与革命的内容，如：6月20日白天，“国王革除了吉伦特派大臣的职务。愤怒的巴黎人民自发组织起来，冲进了杜伊勒里宫”。8月10日白天，“立法议会不敢罢黜国王，但巴黎人民，在各省联盟军的支持下，不畏流血，发起了这场必要的革命”。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争斗。“大敌当前，这场内讧让人恼火。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还是人民强令国民公会将吉伦特派驱出公会并下令逮捕，从而终结了这场内讧”。

[6] 连最激进的共和党人都觉得这种看法匪夷所思。法国著名政治家克列孟梭（Clémenceau）写道：“让社会主义分子愤懑的是，把一切的美德，如至上的理性，都赋予群众，但确切而言，群众的理性并非总是完美的。”如将克列孟梭的说法换成：群众理性不但不完美，甚而是几乎不存在的，这样应更确切一些。

[7]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七月革命后，先后担任内阁大臣、首相和外交大臣之职。1871—1873年，梯也尔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起义。——译注

[8] 1792年9月2日，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民众担心监狱中的保王党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报复，于是闯入监狱，擅自处死了一千多名犯人，史称九月大屠杀。——译注

[9] 罗马帝国朱利亚·克劳狄王朝第三任国王盖约·恺撒的别名，拉丁文

Caligula是其别名，有“小军靴”之意，公元37—41年在位，因其残酷且荒淫无道而闻名。——译注

[10]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即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 Bonaparte）。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1852—1870），为拿破仑一世之侄，拿破仑二世之堂兄，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与奥坦丝·德·博阿尔内王后之幼子。——译注

[11]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回到法国。9月当选制宪议会议员。12月10日凭借拿破仑一世的名望和农民选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849年远征罗马，协助教皇绞杀罗马共和国。1850年颁布法卢法，让教士重新控制学校；取消普选权。1851年12月2日他发动政变，解散立法议会，并通过公民投票使政变合法化，逮捕一切反对他的议员，稍后，又镇压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反抗。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中亲临前线，同年9月2日在色当战败投降，被俘入狱，时年62岁。《法兰克福条约》签订后被释放，随即流亡英国，仍坚持其复辟帝制活动。1873年1月9日病故于英国，享年65岁。——译注

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

第一章 革命中个体性格的变迁

一、人格的变化

我一直强调存在着一种性格理论，不借助这种理论，就绝不可能理解行为在某些时候的变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变迁。以下就是其中的主要观点。

如果环境不变的话，那么个体惯常的精神心理几乎也是一成不变的，但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每位个体的性格都有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一些特定的但非所有的环境的产物。每一个“我”都是由不计其数的“小我”（moi celluaire）组合而成的，它是祖先人格的沉淀物。在社会环境不变的时候，这些“小我”之间达成了相当稳固的平衡关系。一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如在动荡时期，这些平衡即被打破，组合体随之解体并重组为一种新的人格（personnalité），由此，同一个体便表现出与其之前截然不同的一些思想、情感、举止。在法国大恐怖期间，一些因文雅而著称的原本诚实的资产者和温和的官员却变得嗜血成性就是这个道理。

在环境的影响下，先前的人格可以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格。重大政治或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在这点上似乎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其实他们与我们无异。同样的事件会塑造出同样的人。

拿破仑对性格的变化感触最为深刻，他在圣赫勒拿岛（Sainte Hélène）说：

“因为我深知，偶然性在我们做政治决策中的作用，还因为我对在动荡年代带领群众的党派，一直毫无偏见且极为宽容……在革命中，人们只能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若断言人们别无选择，这也许不明智……当人们想公正无私时，却发现人性是最难把握的。人们彼此会主

动去了解与解释吗？这就是环境造就的善与恶。”

当正常的人格在某些事件的影响下分崩离析后，新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有若干种途径可以为之，其中最为有效的是借助一种强烈的信仰。信仰可以将所有的知性因素加以规整，就像磁铁把磁性金属粉末聚合为有规则的曲线一般。

在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运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这类的重大危机时期，所观察到的那些个性就是如此形成的。

在正常时期，环境几乎没有变化，人们只会观察到身边的个体都是清一色的一种人格。但在某些环境下，人们却会有好几种人格，且彼此之间会相互取代。

这些人格彼此间可以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这种现象在正常状态下尚不显山、不露水，但在某些病理情况下就会特别明显。一个人身上有数种人格的例子，在病态心理学中多有记载，莫顿·普林斯（Morton Prince）和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二人曾数次提及。

在整个人格变迁中，智力是不变的，只是情感在变，情感聚合形成性格。

二、革命年代主流集体性格的构成因素

在革命中，人们发现通常被压制的多种情感得到了发展，社会约束被摧毁后，便任由这些情感宣泄了。

这种由法制、道德、传统构建而成的社会约束，并不会被完全打破。其中若干个约束历经动乱而存续下来，并对遏制危险的情感迸发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强的约束来自于民族意识，它决定了同一个民族中大部分个体的

观察、感受、意愿等心理活动的方式，构成了代代传承的习俗，没有比习俗更为强大的民族纽带了。

民族意识的影响力限制了民族的改变，尽管有一些表浅的变化，但民族命运的走向依旧是可控的。

仅从历史叙述便可看出，法国民族心理在一个世纪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这种心理便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恺撒主义，接着便是复辟，随之又是革命，最后出现一位新恺撒。但实际上发生改变的只是事物的表层。

我们不必在一个民族发生改变的程度上做过多纠缠，马上要探讨的是一些情感因素。在革命期间，正是这些因素的演变导致了个体或集体人格也发生了变迁。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以及热情等因素。因为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因素在历史动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素材。

仇恨

当人们研究大革命期间人的心理时，最让人震惊的情感便是仇恨，人们因仇恨而革命，他们仇恨人、仇恨事、仇恨制度。他们不但仇恨敌人，连自己阵营中的成员也仇恨。最近有位作家便写道："如不加保留地听信他们彼此对对方的评价，那么他们都将会是叛徒、无能之辈、夸夸其谈者、卖身投靠者、杀人犯或暴徒。"人们知道，吉伦特派、丹东派、埃贝尔派[1]（Hébertiste），罗伯斯庇尔派等，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缠斗就是出于这种仇恨，一种置对手于死地也难以消解的仇恨。

产生这种仇恨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狂躁的宗派分子，自视为掌握绝对真理的使徒，他们像所有信徒一样，容不得其他的见解。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上的自信，使其总是强求别人归顺自己，一旦有机会进行屠

杀时，他们绝无罪恶感，也绝不退缩。

仇恨使得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们彼此心存芥蒂，若这些仇恨源自理性，那么它将不会长久，如仇恨源于神秘主义的或情感主义的因素，那么它就无法消弭。派系虽有不同，但仇恨却是同源，同样都用暴力来宣泄仇恨。一些文献表明，就血腥程度而言，吉伦特派的所作所为并不比山岳派好多少。依据时任巴黎市市长佩蒂翁（Pétion）的说法，第一个提出失败的党派应该灭亡的是吉伦特派，根据奥拉尔的描述，吉伦特派还试图让九月大屠杀合法化。大恐怖不应当被视作一个简单的自卫手段，而应当将其看成是获胜方的信徒用来对付其厌恶的敌人的惯常的摧毁手段。最为崇尚思想多元化的人却无法容忍异己的信仰。

在政治或宗教冲突中，失败者不可能得到宽恕。自苏拉[2]（Sylla）割断200名议员以及5000～6000名罗马人的喉咙时代起，直至1871年[3]的巴黎公社的胜利者在获胜后用步枪和机枪射杀约2万战败者，这条血腥的定律就从来没有失效过。过去是这样，将来仍会是这样。

另外，大革命的仇恨并不仅仅源于信仰上的分歧。其他的情感如嫉妒、野心、自尊心同样也可滋生仇恨，它们对不同派系间的仇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体间争夺支配权的斗争，将各个集团的领袖们一个个送上了断头台。

还需注意的是，分裂以及由分裂带来的仇恨似乎就是拉丁民族灵魂的构成要素。我们的高卢祖先就为此而丧失了独立性，连恺撒也为此而大为感喟：

“没有哪座城市不分为两派；没有哪个州、哪个村、哪个家庭不为自己的派系归属而苦恼，若某个城市在一年中没有起兵攻伐或御敌，那将是一件相当稀罕的事。”

人类只是刚刚步入知识时代，而之前则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摆布，因此，对仇恨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挥官兼军校教员科兰（Colin）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战争中的重要性：

> 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动性了；仇恨让普鲁士人战胜了拿破仑。那些最为经典的战役，那些最为关键的军事行动，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杰作的话，那么就必然是激情而非算计的结果。1870年的战争[4]，如没有德国人对我们的仇恨，战争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作者在此还应当添加上日本人对俄国人强烈的仇恨，俄国人对日本人曾经百般羞辱，这是日本人获胜的因素之一。俄国士兵几乎无视日本人的存在，对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恨，这也是俄国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期间谈论较多的无疑是博爱，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团结主义是进步政党挂在嘴边的口号，不过人们清楚，隐藏在这些字眼之后的仇恨有多深，它对现实社会的威胁有多大。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既展现了个体的巨大勇气，也呈现了集体的极度恐惧。

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议员总是大义凛然；但是在骚乱分子冲击议会进行威胁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懦弱，面对最为荒谬的要求也是唯唯诺诺，这点我们将在总结革命议会历史时再行赘述。

这个时期的恐惧形式多种多样。最普遍的恐惧形式便是温和。国民公会的成员、检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竞相抨击对手，以彰显自己的激进。恐惧是这个时期的犯罪动机之一。如果出现奇

迹，恐惧得以在革命议会中销声匿迹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野心、嫉妒、虚荣及其他

正常情况下，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力都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个士兵有可能成为将军，但必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革命时期就不必等待了。鉴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爬上社会顶层，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极度膨胀。最卑微的人都自认为可以胜任最高的职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虚荣心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野心、虚荣心等所有的激情都同时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际，对一夜间飞黄腾达的人的嫉妒却在日渐滋长。

在革命时期，嫉妒的作用一贯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贵族的嫉妒是诱发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对贵族的超越。尽管和贵族们的融合越来越深，但是和贵族们的距离感还是无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愤懑。这种精神状态让资产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平等”哲学教条的忠实拥护者。

嫉妒心和受伤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如卡里耶、马拉等几位国民公会议员，每当他们回忆起自己在大贵族门下谋生的情形，无不愤恨不已。但在贵族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实在不理解这种仇恨。

罗兰（Roland）夫人绝不会忘记，在旧社会的某天，自己和母亲在一位贵妇人家做客时被人领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学家里瓦罗尔在下面这段话中明确指出了受伤害的自尊心和嫉妒

心在诱发革命仇恨过程中的作用，泰纳（Taine）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 最让国民痛恨的既不是税赋，也不是密函，既不是当局的贪渎，也不是总管的欺凌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贵族们的歧视，国民对这种歧视深恶痛绝。得出这种结论在于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贵族的人们，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四处鼓动市民、农民们起来对抗贵族阶级。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证实了拿破仑的话：“虚荣心导致了大革命，自由只是大革命的借口。”

热情

大革命发起者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穆罕默德信仰的传播者。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民会议时打算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宗教。他们意欲摧毁一个旧社会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文明。诱人的幻想打动人心。新教义所宣称的平等和博爱将给所有人带来永恒的幸福。人们将告别黑暗的、野蛮的过去。新生的世界在纯理性光辉的照耀下熠熠夺目。最雄辩的说辞在各地回荡，迎接依稀可见的黎明的到来。

这份热情之所以很快就演变为暴力，是因为觉醒是迅速且可怕的。不难想象，当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后会激起怎样的怒火，而大革命的先行者们正是带着这份怒火奋起反抗的。他们起初想抛弃过去、忘记传统、重塑人类。然而过去却挥之不去，人们也拒绝自我改变。改革家们虽步履维艰，却不打算放弃。他们试图用独裁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却适得其反。人们立刻便怀念起被推翻的政权，最终导致复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最初的热情在国民议会中并未持续多久，但在军队中却一如既往，并成了军队主要的动力。事实上，早在法国成为共和国之前，大革命的军队便已信奉共和主义了，而在法国不再是共和国之后很久，军队依然信仰共和主义。

本章所分析的性格上的变化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两个：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期待，要有相一致的环境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固化成为几种均

质的心理状态。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四类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雅各宾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

[1] 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左翼。——译注

[2] 苏拉（约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独裁官。苏拉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统帅，公元前88年他当选执政官，并被元老院选为东征统帅。

[3] 此处在“巴黎公社”前添加“1871年”（原文没有）是为了和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相区别。——译注

[4] 1870～1871年普鲁士同法国之间的战争。因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和德意志统一问题，普法两国之间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发表了挑战性的“埃姆斯密电”，触怒了法国政府。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4日，巴黎爆发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但普军仍长驱直入，包围巴黎。1871年1月28日，巴黎失陷，两国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双方在凡尔赛签订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正式和约。这一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译注

第二章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一、革命年代主流心理的分类

分类在于把一种连续的事物割裂开来使之成为片段，若无分类，科学研究便无法进行，鉴于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分类是人为的。由于连续只有在中断的形式下才能加以端详，因而分类是必需的。

如要把在革命时期观察到的种种心理进行切分，则定要把彼此重叠、交织、交错在一起的一些因素区别开来。而为了得到明晰的认识，则必然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精确性。前一章节末尾所列举的且我们在此要描述的那几个基本类型涵盖了尚未被分析过的一些群体，人们有必要弄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我们已经分析过，人的行为是在一些各不相同的逻辑的支配下进行的，这些逻辑相互并列。通常，它们彼此间互不影响，但在各种事件的影响下，它们之间会产生冲突，彼此间的差异也会由此变得异常明显，并使得个体和社会产生诸多的混乱。

在我们马上要谈及的雅各宾心理中，神秘主义逻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该逻辑并非唯一发挥作用的逻辑。其他形式的逻辑如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会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发挥主要作用。

二、神秘主义心理

在此先不谈情感逻辑、集体逻辑以及理性逻辑，而只关注神秘主义因素在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支配作用。

神秘主义意识的特点表现在它赋予一些人或事物以一种神秘力量，并以偶像、图腾、文字和程式来使之具体化。

神秘主义意识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也是绝大多数政治信仰的基础。

但政治信仰一旦被剥离了其赖以为继的神秘主义因素便会崩塌。

神秘主义逻辑与受其左右的情感和激情相结合，给群众运动注入了情感和激情的力量。极少有人准备为理性而牺牲，但却有非常多的人心甘情愿为其膜拜的神秘主义理念而奉献生命。

法国大革命的信仰所激起的神秘主义的狂热堪比之前出现的由各种宗教所引发的狂热。但大革命信仰只是对数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心理加以引导、改变而已。

由此，国民公会成员所流露出来的狂热就很好理解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心理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新教教徒们的心理没什么两样。大恐怖时期的主角们，例如，库通（Couthon）、圣茹斯特（Saint-Just）以及罗伯斯庇尔等人，实际上就是大革命信仰的使徒。他们就像波利厄克特[1]（Polyeucte）一样，摧毁供奉着虚无的神的祭台，以便宣扬自己的信仰，他们渴望说服所有的人。他们的热情泛滥，坚信自己的神秘主义范式足以推翻一切君王，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国王们宣战。游移不定的信仰总是不敌强烈的信仰，因而他们在欧洲得以所向披靡。

大革命领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还一览无余地体现在其公共活动中。罗伯斯庇尔确信自己有来自上天的支持，他在一次讲话中确认，至高无上的神“自世界之初始便已敕谕施行共和制”。他以一种国教大祭司的身份，促使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宣称“法兰西民族承认至高无上的神的存在以及永恒的灵魂”。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节日里，他端坐在王座上，进行长时间的布道。

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俱乐部最终担负起了宗教评议会的所有职能。玛克西米利安[2]（Maximilien）在此间宣布了“伟大的神的旨意：眷顾受欺压的无辜者，惩罚霸道的作奸犯科者”。

所有批评雅各宾正统性的异端分子都被驱除出教会，也即被送交革命法庭处理，其下场也唯有被送往断头台。

神秘主义心理最典型的代表便是罗伯斯庇尔，但它并没有随着罗伯斯庇尔的死亡而消亡。一些具有这种心理的人物至今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驾驭他们灵魂的不再是古老的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条，他们如罗伯斯庇尔一样，一有机会便要将自己的政治信条强加给他人。各个时代的神秘主义分子，一旦他们执掌权柄，为了宣扬自己的信仰，都会采用同样的规劝办法，即时刻准备进行屠杀。

罗伯斯庇尔拥有众多追随者也就很自然了。类似他的人数以千计。人们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但他的思维观却没有被一道处死。这些思维观伴随着人类继续存在下去，直至其最后一名信奉者。

革命的神秘主义因素被众多历史学家所忽视。他们一直致力于借助理性逻辑来解释与理性逻辑无关的诸多现象。我已经在另一章中引用了拉维斯和朗博先生在其合著的史书[3]中的一段话，其中宗教改革运动被解释成为“普通百姓基于一种极为虔诚的知觉（conscience）和一种极为大胆的理性（raison）而进行个人独立思考（réflexion）的产物”。

若认为这些运动的发生是出于理性，那么就永远不会弄懂这些运动。改变世界的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它们有着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规律。信仰的形成与理性无关，反之，它们还与理性相悖。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巫术、雅各宾主义、社会主义、通灵论等信仰，它们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我还要再重复一次，它们都是在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们遵循的逻辑与理性逻辑不相干。这些信仰的意义在于其恰好证明了理性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信仰。

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篇专门谈论刚刚履职的一位部长的文章，该

文章淋漓尽致地呈现了我们当代的政治使徒们的神秘主义心理。

一问起这位A先生是属于哪类人，答案也许是他是没信仰的人。真滑稽！我们非常清楚他没有任何确定的信仰，他诅咒罗马天主教和日内瓦新教，他排斥一切传统的教义及一切已知的教会。他与信仰坚决地决裂，仅为腾出一块空地来构建自己的教会，但他的教会只会更专横，其宗教裁判所的残忍度不亚于人所皆知的托奎马达[4]（Torquemada）宗教裁判所。

他宣称“我不接受学校中立。我们要求世俗的教育要全方位进行，由此，我们反对教育自由化”。他之所以没有提及动用火刑，是因为道德的进步，使他不得不有所顾忌，纵然在某种程度上他对此不以为然。尽管他无法继续对人施虐，但他却可以使用世俗的力量来扼杀异己的学说。这就是宗教裁判所法官们的做法，是对思想的扼杀。这位自由的思想家的思维是如此自由，以至于在他看来，任何他所排斥的哲学不仅是荒谬怪诞的，而且还是罪恶的。他自诩掌握着绝对的真理。他坚信，任何与其相悖的人都是可憎的，都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他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仅是一种臆测，他自己的观点就是旨在消灭神权，但他却强调自己神圣的特权，这点尤为荒谬。或者可以说，他在声称要消除神权的同时，却又以另一种方式重建了神权。看到这个神权，人们不禁想起以前的神权来。这位A先生是理性女神的信徒。他把理性变成了一位嗜好祭品的压迫别人的摩洛克神。除了他自己和其同党之外，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的自由，这便是A先生的自由思想。这样的前景的确很吸引人。但为了它，数世纪以来，人们业已摧毁了太多的偶像。

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这些阴鸷的狂热分子不要变成我们的统治者。

鉴于理性帝国并非建立在神秘主义信仰之上，因此，有关革命或政治思想的理性价值是如何形成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对这些信

仰的影响感兴趣。那些有关人的平等设想，有关人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有关依法重塑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它们都已经被观察和实践所揭穿，这点也无须多言。不切实际的幻想应该是人类已知的最强大的行为动因。

三、雅各宾心理

尽管“雅各宾心理”一词并非属于分类法范畴，但我还是想用这个词，这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一类客观存在的心理类别的所有特征。

这种心理支配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但却不是他们所特有的，因为这种心理至今仍是我们政治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上文所探讨的神秘主义心理是雅各宾心理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并非全部。我们马上来探讨其中其他的相关因素。

雅各宾党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神秘主义意识。反而声称自己仅遵循纯理性的指导。在大革命期间，他们不停地提及理性，并把理性作为自己行动唯一的指南。

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认可了雅各宾党人的意识是出于理性主义这样一种观点，泰纳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导致他在探究雅各宾党人的大部分行为的源头之时过多地仰仗理性。不过他在对雅各宾党人的分析中也有很多的真知灼见，鉴于其中不少广为人知，在此仅仅引述最为重要的部分。

过分的自尊和教条主义推理，二者在人类身上都不少见。雅各宾精神的这两个根基在每一个国家都是深藏不露且绵延不绝的。二十年前，一个年轻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他的理性和自尊同时受到了挫折。无论他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从纯理性而言，首先这个社会都是一个不堪的事物，因为这不是一个明理达观的立法者依据一个简单的原则建立起的社会，这是数代人依据自身诸多莫衷一是的需要、前赴后继建设起来的社会。社会不是逻辑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面对这个古老巨大的建筑物，它的基石是随意选定的，它的建筑结构是松散的，它有很明显的修补痕迹……对此，刚到来的这个理性主义者

（un raisonneur débutant）只能无奈地耸耸肩。大部分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有着自己追求的年轻人，在走出校门之际，或多或少都受到雅各宾思想的影响……正如腐质土壤适宜长蘑菇一样，社会的腐质适合雅各宾党人的繁衍生息……看看雅各宾思想的真实的丰碑……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演说，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辩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人的高谈阔论、致辞和报告……从未有过如此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一味地唠唠叨叨、废话连篇、信口雌黄、华而不实，真理就这样湮灭在乏味单调的夸夸其谈中……雅各宾派无比推崇的就是自己理性主义脑海中的那些空想；在雅各宾党人看来，这些空想要比活生生的人更真实，雅各宾党人唯一考虑的便是这些空想为其带来的选票……雅各宾派真诚地希望能有大批的追随者前呼后拥伴其前行……雅各宾派会依据自己的意志塑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形而上学的意志，这些意志将会异口同声地支持它，它则要以自己的声音对外面胜利的欢呼声做出内在的回应，状如一场大合唱。

除了敬仰泰纳的描述外，我还认为，他没有准确把握雅各宾派其真正的哲学。

在大革命时代以及如今，真正的雅各宾党人的意识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对其应该加以解构，以便明确其中各因素的作用。

这个分析首先便为我们揭示出，雅各宾党人并非理性主义者，而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并非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用信仰来塑造理性，即便其言语中充斥着理性主义，但其思想和行为中还是罕见理性的踪迹。

一位被人指责言行不一的理性雅各宾分子（un Jacobin raisonnant），应该有时会倾听理性的声音。但对自大革命至今的观察表明，雅各宾党人从来就不曾受到某种理性思考（un raisonnement）的影响，无论该思考正确（justesse）与否，当然这也是雅各宾党人的力量所在。

为什么雅各宾派会这样？唯一的原因是其目光短浅，这使得它无法摆脱强烈冲动的影响，而任由冲动左右。

但仅有丰富的激情与微不足道的理性这两个因素尚不足以构成雅各宾心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激情支撑着信念，而非创造了信念。不过，真正的雅各宾党人都有坚定的信念。那么这些信念的支撑会是什么呢？至此，上文我们提及过的神秘主义因素便浮现出来。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神秘主义，它用新的神代替了古老的神，它凭借文字和惯用语的力量，使得新的神拥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为了侍奉这些挑剔的神，它不惜诉诸最为暴力的手段。如今的雅各宾分子投票通过的法律可兹证明。

雅各宾心理多见于性格偏执和狂热的人，他们的思想僵化、狭隘，听不进任何批评以及任何有悖于其信仰的意见。

神秘主义以及情感主义因素左右着雅各宾党人的灵魂，导致其行为做事过于简单化，他们只知道事物间肤浅的关系，他们把脑子里一闪而过的念头当成是事实。他们不懂事物之间的前因后果，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梦想。

大家知道，雅各宾分子犯错并非由于其理性逻辑过多，而是其理性逻辑太少，这也是他们变得如此危险的原因。在有识之士犹豫、却步的地方，那些几无理性的雅各宾分子却在冲动的裹挟下大大咧咧走上前去。

即便是一个伟大的理性雅各宾主义者，也绝不意味着他是受理性的支配，他其实是受神秘主义和激情的左右，但却自认为在理性的支配下行事。像所有囿于自身信仰不能自拔的坚定分子一样，雅各宾党人也无法摆脱自己的窠臼。

雅各宾分子是真正的好斗的神学家，其与前一章中描述过的加尔文的门徒惊人地相似。这些加尔文门徒在其信仰的蛊惑下，什么都不能使之屈服。所有与其信仰相悖的人都应当被处死。他们也像是一些强大的理性主义者一样，认为只有理性指引自己，却不知自己被秘密的力量所左右，而事实上，神秘主义和激情才是他们唯一的主宰。

真正理性的雅各宾党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的存在只会让理性感到绝望。相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狂热的雅各宾分子却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上述三种因素——几许理性、强烈的激情和浓厚的神秘主义——是构成雅各宾精神的三种真正的心理因素。

---

[1] 波利厄克特，高乃依的同名小说（1643）中的主人公。他总是烧毁自己崇拜过的东西。这些东西曾是他的上帝，他烧掉它们，不让它们绝对化。他受神旨的感召，反抗罗马统治者的迫害，为基督教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译注

[2] 也即罗伯斯庇尔，其全名为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译注

[3] 拉维斯和朗伯（Ernest Lavisse et Alfred Rambaud）合著的《5世纪至今通史》（第一卷）。——译注

[4] 托奎马达（1420—1498），西班牙多米尼克教派修道士，是西班牙第一任宗教裁判官。——译注

第三章 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一、革命心理

我们刚刚讨论了神秘主义的因素是雅各宾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它在另外一种心理模式也即革命心理中的模样。

每一个时期的社会总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焦虑、彷徨和不满的人，他们随时准备起来反抗既定的社会秩序。他们对造反有着赤裸裸的嗜好，即便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的欲望，他们依然还要造反。

这种特殊的心理通常是由于个体难以适应环境造成的，它也许源于极端的神秘主义。不过这种心理也可能是一种性情上的问题或是一些病理问题。

这种造反欲望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可以从单纯以话语来发泄对人和事的不满，一直到暴力摧毁。有时候，无处发泄的革命怒火只能朝自己发泄。俄国就充斥着这类疯子。如阉割派（skopzis）[1] 以及其他类似派系的门徒们，在纵火及向人群中乱扔炸弹依旧不能满足他们之后，他们开始自相残杀。

这类终身造反者一般都是一些受心理暗示影响的人，他们的神秘主义灵魂受到一些挥之不去的念头困扰。尽管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劲头十足，但实际上他们性格软弱，无法抵御冲动，因而被冲动所左右。激励他们的神秘主义意识是其暴力行为的根源，也是他们自视为伟大的改革者的缘由。

在正常情况下，社会的反叛者受到法律、环境的约束，简而言之，受到社会规定的约束，因而发挥不了影响。在混乱不堪的年代，这些约束被弱化，反叛者便得以兴风作浪、为所欲为，并成了各个运动的领导

者。革命的动机对他们而言是不重要的，红旗也好，白旗也罢，甚至道听途说的国家解放，为了这些，他们无所畏惧，宁可牺牲自己。

革命精神并不总是意味着走极端，这样很危险。革命精神若非源于神秘主义或冲动，而是源于理智，那它就是进步的源泉。独立的精神造就出理智的革命者，仰仗这种革命者，一种文明方可成功地摆脱那业已变得过于沉重的传统和习惯的桎梏。科学、艺术、工业等，无不借此实现了进步。伽利略、拉瓦锡、达尔文、巴斯德就是这样的革命者。

一个民族没必要拥有太多这样的革命者，但必定要有几个这样的人。否则人们至今还会居住在洞穴中。

发明创造道路上的这种革命胆识，需要一些非比寻常的能力与之相配。尤其需要一种精神的独立，以避免世俗观点的影响，还需要一种判断力，以把握掩藏在相似的外表之下的本质。这种类型的革命精神是创造性的，而之前提及的革命精神却是破坏性的。

革命心理其实反映的是个人生活中的某些心理状态，但若过度了，就成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病态心理。

二、犯罪心理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必然会受到一些社会残渣的拖累，这些人要么是智力有缺陷的，要么是难以适应社会的，抑或是有着各式污点的。流浪汉、乞丐、通缉犯、小偷、杀人犯、穷光蛋，这些得过且过的人构成了大城市的犯罪群体。在寻常时期，这些文明的弃儿多少受到警察和宪兵的管束。但到了革命时期，不再有任何的约束，他们便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各个时期的革命者从这些人中肯定能找到兵源。这些人嗜好抢劫和谋杀，而对他们所应捍卫的事业感到无所谓。一旦发觉在对立阵营中杀人越货的机会更多的话，他们便会立刻投靠对方。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罪犯，他们是社会的痼疾，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半犯罪群体。偶尔作奸犯科者，他们绝非造反者，对于既定秩序的畏惧使得他们不敢造次，一旦秩序弱化，他们便加入到革命帮派中去。

这两类罪犯——惯犯和偶尔的罪犯——构成了一支只会制造混乱的不安分的军队。但所有的革命者，所有的宗教或政治团体的创建者们，却时常要仰仗他们。

这部分有着犯罪心理的群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总是出现在此起彼伏的骚乱的第一线。部分历史学家说起人民的意志便满怀激动，伟大的人民带着武器，枪尖上挑着刚刚砍下的人头，侵入议会大厅，向国民公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如果人们分析这些所谓伟大人民的代表的组成成分，人们就会发现，除了一小撮头脑简单跟着领导人亦步亦趋的人之外，剩下的就是我在前文刚刚描述的那些匪徒。诸如，九月大屠杀以及法国路易十六王室兰伯娜（Lamballe）公主被杀这类不计其数的杀戮都是这些人的杰作。

从制宪议会到国民公会无不对其胆战心惊，他们蹂躏法国长达十年。如果老天开眼，将这支犯罪军队加以剪除，那么大革命的进程就会截然不同。大革命从头至尾都充满血腥。理性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他们对理性也是不屑一顾。

---

[1] 18世纪下半叶出现在俄罗斯的东正教的一个分支，英文名为skoptsy，中文名为“阉割派”，男教徒自行阉割，女教徒自切乳房。——译注

第四章 革命群众的心理

一、群众的一般特征

无论革命的起因是什么，革命只有在深入人心之后才能达到效果。革命是人民群众心理的一种反应。

尽管在另一本著作中我们已经研究过集体心理，在此我还要再次复述一下其中的主要规律。

作为群体的一分子的人，与孤零零的一个人大不相同。有意识的个性（individualité）湮没在无意识的集体的人格（personnalité）之中。

个体要获得集体的心理，并非一定要有实质性的接触。特定事件诱发出来的激情和封闭的共同情感足以使得个体产生集体心理。

瞬间形成的集体灵魂是一种特殊的情结。其主要特征便是：完全处在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支配之下，并服从于一种特殊的逻辑——集体逻辑。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群体特征如极端的轻信、敏感、轻率以及理智的缺乏等。断言、传染、重复、威望是唯一说服他们的方式。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作用。可以做到让群众接受一切，而在群众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由于群众的极度敏感，因此他们的情感，无论好坏，都是夸张的。在革命年代，这种夸张尤为明显。一点微不足道的刺激便可促使群众做出可怖的行动。在平时就泛滥的轻信，到革命时期就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最为离奇的故事他们都相信是真的。亚瑟·杨（Arthur Young）说他在大革命期间，在克勒蒙（Clermont）附近游山玩水时，他的导游被当地人截住，原因是当地百姓认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要来此处埋设炸

药，以便炸毁这座城市。最为可怕的是关于王室的流言蜚语，在其中，王室家族成员被描绘成为一群吸血鬼和食尸怪。

上述特征反映了群体中的人往往极度偏离文明，他们几乎成了野蛮人，身上具有野蛮人的所有特征，如突发的暴躁、热情和英雄主义等。从智力角度看，群体智力总不如一个孤立的人的智力高。而从道德和情感角度看，群体是高于个体的。群体既很容易犯罪，也很容易自我牺牲。

个体的特征湮灭在群体中，群体的行为对于构成群体的个体的影响是巨大的。吝啬的人会变得慷慨大方，怀疑主义者会变成坚定的信仰者，正直的人会变成罪犯，懦弱的人会成为英雄。这样的例子在大革命期间不胜枚举。

作为陪审团或议会的一员，集体做出裁决或者投票形成法律，这是个体状态下的个体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集体对个体影响最为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他们的情感和意志综合在一起。这种心理上的融合赋予集体巨大的力量。

心理上的这种联合源于群体中的情感、举止和行为的相互传染。个人的爱、恨、愤怒在群体中会立刻得到响应和叠加。

这种共同的意志和情感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通过传染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染首先需要一个触发点。领袖便是这个触发点。我们稍后便来谈谈领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没有领头人，群众便是一盘散沙，形成不了合力。

了解支配群体心理的规律是阐述法国大革命事件、理解革命议会行为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特殊转变所必不可少的。在集体无意识的力量的推动下，人们经常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赞同他们原本不赞同的事情。

即便集体心理规律往往被高明的政治人物所洞悉，但要注意的是，大部分政府对此从过去至今仍是不明就里。正是由于对此不知，因而很多政府便会轻易地倒台。某些政权特别是路易-菲利普政权，就因为这而被一场小小的骚乱所轻松推翻，由此可知，忽视集体心理的后果是多么严重。1848年，原本足以保护国王的军队，由于其统帅的无知，任由军队和百姓混杂在一起，军队在百姓的暗示和传染之下变得茫然不知所措，竟而连自己的职责都无法履行。军队的统帅不太清楚的是，群众实际上对威望是极其敏感的，因此，需要对其展示自己的威严，以便迅速遏制其敌对的行为。另外，聚集的人群应当立即加以驱散。如今，所有这些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是无法理解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群众心理学更是不为人所知。

二、稳定的民族精神如何规约群众精神的摇摆

一个民族在关键时刻可以被视作一个群体。民族拥有群体的部分特征，但是民族的这些特征其变迁却受到了民族精神（l’âme de la race）的制约。民族精神拥有短暂的群体精神所不具有的稳定性。

一个民族的精神是长期积淀形成的祖传的精神，它支配着群体的精神。

民族是由利益、性情各不相同的集团构成的，这点与群体不同。反之，分属不同社会集团的个体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有确切意识的群体中，如一次集会。

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一样都是易变的，但是别忘了，在表面的易变、热情、暴力、破坏之下，民族精神仍捍卫着其极为顽强的、保守的本能。大革命及其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向我们昭示了保守精神最终还是支配破坏精神的。一个体制被打破，但很快便又被修复。

改变民族精神，即一个种族的精神，不如改变群体精神那般的容

易。动用的手段都是间接而缓慢的（报纸、会议、讲演、书籍等）。说服的方法不过就是上文业已提及的断言、重复、威望、传染等。

精神传染可以瞬间影响整个民族，但最常见的是一个团体缓慢传染到另一个。宗教改革运动就是这样传遍法国的。

一个民族远非一个群体那样爱激动。但某些事件，如民族的屈辱，外敌入侵等，可以迅速激发起一个民族的情绪。这样的现象在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好几次，尤其是在布鲁斯维克（Brunswick）公爵公布其傲慢无礼的宣言时出现的那一次。后者由于对于法兰西民族意识认识上的不足而发出了自己的威胁。这样做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路易十六的事业，更是伤害到了自己，他的干涉反而促使法国人奋起反抗。

民族情感的这种突然迸发在任何民族都存在。拿破仑在入侵西班牙和俄国时，就不曾明白这种巨大的力量。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瓦解群体一时的躁动，但却无法撼动民族永恒的精神。诚然俄国的农民是一群狭隘、粗俗且冷漠的人，然而一听到法国入侵的消息，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人们可以从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的一封信中看出端倪。

从拿破仑穿越边境线那一刻起，这个消息便如电光石火一般传遍整个俄国，其传遍范围之广，让生活在帝国每一个角落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愤怒的呼喊，这个声音是如此的可怕，我认为整个世界都为之动容。随着拿破仑的军队向前推进，这种愤怒便越发强烈。几乎一无所有的老人们说‘我们要想方设法活下去，什么都要比屈辱的和平好’。那些妇女们，她们对这种和平的恐惧要超过对其在部队作战的亲人们的安危的牵挂。媾和虽然可以避免俄国的灭亡，但这种和平是不会轻易到来的。沙皇没有媾和的念头，即使他想这样做，他也不能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大无畏的立场。

皇后向其母亲提及了突显俄罗斯人抵抗精神的两个片段：

法国人在莫斯科抓了几个倒霉的农民，打算让他们在自己的部队里服役，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他们在其手上烙上印记，就像为种马场的马匹烙上战马印记一般。其中一个农民便问这个烙印是什么含义，人们答复说这意味着你成了一名法国战士。这位农民叫道：“什么？我是法兰西帝国的战士？”他当场拿起

斧头将自己的手砍了下来，扔到旁观者的脚下，并叫道：“拿走你们的印记吧！”

同样还是在莫斯科，法国人抓住了二十位农民，打算杀一儆百来震慑袭扰法国补给运输队并袭击法国正规军先遣队的村民。他们让这些农民靠墙站成一排，用俄语向他们宣读了判决。人们等待他们求饶，然后这些人不但不求饶，还一边在胸口画十字一边彼此道别。法国人于是射杀了一名农民，接着便等待其他被吓坏的农民求饶并承诺痛改前非。法国人射杀了第二个，第三个，一直到二十人全被杀死，都没有一个人乞求敌人的宽恕。在俄罗斯，拿破仑没有一次机会如愿说出“宽恕”这个字眼。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任何民族及任何年代的大众意识中，都充斥着神秘主义这一特征。

民族总是相信一些至上的东西，如神灵、政府或大人物，认为他们有权利随心所欲改变事物。这种神秘主义使人产生膜拜的需求。由此民族需要一个膜拜的对象，其或是一个人或是某种教义。这也是人们在无政府主义的威胁下，总是期盼着出现一位像弥赛亚一般的救世主的原因。

民族也会像民众一样，从膜拜走向仇恨，只不过更加缓慢而已。名噪一时的英雄，却可能最终遭人诅咒。在所有国家中，都可以看到对于政治人物舆论上的反复。克伦威尔（Cromwell）便是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1]

三、革命运动领袖的角色

各种民众（无论其是均质还是异质的）、议会、民族、俱乐部等，我们在此再重复一遍，若没有一位领袖来指挥他们，都将只是一些无法步调一致的聚合体。

我曾用一些生理学的实验证实了无意识的集体精神和领导者的精神是紧密相关的。后者给前者提供了单一的意志，并强迫他们绝对服从。

领导者通过暗示发挥其对群众的影响，群众受到的正是这种方式的煽动，领导者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获得了成功。很多的实验表明，集体极易受这种暗示的影响。[2]

在领导人的暗示影响下，大众或是安静的，或是愤怒的，或是罪恶的，或是勇敢的。这类暗示有时可能会表现出理性的一面，但这种理性也仅仅是表面上的。现实中，群众是无法做到完全理性的。唯一可以影响他们的那些理念，其实就是以想象方式唤起的情感。

大革命历史的每一页都表明，群众是多么容易被领袖们煽动起来，无论领导者们的论调是多么的不着边际，是多么的相互矛盾。群众对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以及恐怖主义者的胜利或随后而来的垮台莫不欢欣鼓舞。我们可以断言，群众对所有这些事件是一无所知的。

如今，我们也只能隐约知道那些领导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他们一般处在幕后指挥。为了确切了解领导者的作用，则要在当代这类事件中对其加以研究。大家知道，煽动群众是多么轻而易举。在这里我们不考虑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的大罢工，因为只需把上述职员的不满情绪加以发挥即可，还因为其他群众对这类罢工并无兴趣。举个类似的例子，几位社会党领袖在西班牙的弗雷（Ferrer）被处死的第二天，便在巴黎人民中挑起了一场群众暴动。然而法国人从来就没曾听说过此人，即便在西班牙，此人被处死也几乎无人关注。但在巴黎，寥寥几位社会党人便足以煽动一支群众武装去冲击西班牙大使馆，而且目的是要烧毁它。因此当局不得不派遣部分卫戍部队去保护该使馆。这些攻击者在被强力驱离后，只是洗劫了一些商店，设置了一些路障。

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中，领袖们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们的影响力。当这些领导者意识到纵火焚烧外国大使馆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之后，便要求在第二天举行和平示威。这些刚在前一日受命进行暴力活动的群众，次日便又忠实地执行新命令进行和平示威了。这是呈现领导者的作用和群

众的服从的最好的例证。

历史学家如米什莱（Michelet）和奥拉尔（M.Aulard）不知革命群众的心理，认为革命群众无须领袖便可自行其是。

---

[1] 克伦威尔推翻了一个王朝并拒绝登上王位，但死后仍被按照国王的待遇加以安葬。两年后，他的尸体被从墓中挖出，头颅被砍下，悬挂在议会大门之上。不久，人们为其建立一座雕像。这位前无政府主义者但后来又成为独裁君主的人如今被人供奉，敬若神明。

[2] 在验证这一事实的众多实验中，最著名的便是Glosson老师对其授课的学生所做的一次实验，结果刊登在1899年10月29日的《科学期刊》（*Revue Scientifique* ）上。他说："我准备了一个酒瓶，其中装满了蒸馏水，用棉花精心将其包裹好后，装到了盒子中。在其他几轮实验后，我告诉大家说我想知道要嗅到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要求嗅到气味的同学立刻举起手……我开箱取出那酒瓶，把其中的水倒在棉花上，在倒水时我的头离得远远的。接着我取出一块秒表，等待测试的结果。我对在场的人解释说我坚信课堂上绝对没有人曾经闻到过我倒出来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十五秒后，坐在前面的大多数人都已经举起了手，在四十秒内，'气味'便以规则性的平行波飘散到课堂的后排。约四分之三的学生声明嗅到了'气味'。绝大多数人可能是受到了暗示的影响，到一分钟时，我被迫停止了实验，因为前面的几位学生觉得受不了气味的影响想要离开大厅……"

第五章 革命议会心理学

一、大型革命议会的心理学特征

一个大的革命议会其本身也是一个群体，不过，由于组成该群体的各派系彼此的感受不同，因此，这样的群体往往很难有所作为。

由于议会中存在着有不同利益诉求的派系，且它们各有各的领袖，因此，这样的议会必然会被人们视作一个异质交叠的群体。均质的群众心理规律只能出现在单个的派系中。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派系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

议会中的每一个派系代表的都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个人一旦加入其中，便会失去自我，即便违背自己的信念和意志，也要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路易十六被审判的前夜，维尼奥（Vergniaud）对处死路易十六的投票动议提出了强烈抗议，然而翌日自己也投了赞成票。

群体的作用主要在于让犹豫不决的人下决心。个体软弱的信念在成为集体的信念之后便得到了强化。

强势的或拥有声望的领袖可以通过对议会中的所有其他群体施加影响，有时也可以使得议会成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就是在极少数上述领袖的影响下，投票通过了那些完全违背自己意志的动议。

面对一些能量很大的派系，集体总是会做出让步。革命议会的历史表明，尽管革命议会可以冒犯国王，但面对那些操纵骚乱的领袖们，革命议会还是得唯唯诺诺。在一个霸道的首领指挥下闯入议会的一群狂热分子，便足以胁迫议员们当场投票通过那些最为荒唐、最为不堪的动议。

一个议会若具有了群众特征，便会像群众一样在情感上走向极端，既极为暴戾，也极为懦弱，一般表现为对弱者颐指气使，对强者卑躬屈膝。当年轻的路易十四气势汹汹地来到议会发表简短讲话时，议会是诚惶诚恐的。随着路易十六大权日渐旁落，制宪议会对其态度则越发嚣张。到了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国民公会议员已让人闻之色变。

这个特征成了议会的一条普遍规律。一个君王若在其权势渐衰时召集议会，则是犯下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学上的错误。全国三级会议[1]的召开让路易十六送了性命。当亨利三世被迫离开巴黎之后，便决定在布卢瓦召集全国三级会议，而这个愚蠢的念头差点让其丢掉王位。一旦三级会议的代表们感觉到国王的颓势，他们便会立即当家做主，调整税赋，遣散官员，并声称他们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

在大革命时期的所有议会中，都可以见到这种行进式的情感上的大起大落。制宪议会起初是非常尊重王室的权威及其特权，随着制宪议会的权势逐渐膨胀并最终自诩代表着最高权力，路易十六在其眼中也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官员。起初国民公会很低调，到大恐怖时期便开始蠢蠢欲动，此时它还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事，随后便大肆弄权，直至颁布法律剥夺被告人的一切辩护权利，并同意仅凭推断就可给嫌疑人定罪。此后国民公会变得越发嗜血，最终自取灭亡。吉伦特派、埃贝尔派、丹东派、罗伯斯庇尔分子们，就这样前赴后继走上了断头台。

议会在情感上的激进解释了它们为何驾驭不了自身的命运且最终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一心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并捍卫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徒、保王党与制宪议会，却反而迅速地将法国推向了血腥的共和、推向了宗教迫害。

我们已经说过，政治议会是由异质的群体组成的，不过也有一些议会是由均质的群体构成的，如在大革命期间发挥重大作用的某些俱乐部，它们的心理值得重点研究。

二、革命俱乐部心理学

一些拥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利益的小规模的团体，它们通过排除异己，实现了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从而与一些大的议会有所不同，如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公社、宗教团体、同业公会、俱乐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社团，如今的共济会、工会等都属于此类。

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就有必要研究一下异质的议会与均质的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因为一直到督政府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公会时期，大革命都是受此类俱乐部所左右。

在这些俱乐部中，由于没有派系之分，因而其意志得到了统一，但其依然服从于群众心理学的规律，它们依然受到领袖的掌控，这点在罗伯斯庇尔领导下的雅各宾俱乐部尤为明显。

一个均质的群体如俱乐部的领导者要想发挥作用，其难度要比一个异质的群体的领导者大很多。因为后者只需少许办法便可轻易实现。

而在一个均质的群体如俱乐部中，由于大家的情感和利益是同一的，因此，领导要精通如何妥善应对，当然，领导者反被领导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均质的群体的巨大力量之一源于其是匿名[2]的。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几条匿名的命令便让巴黎的最为著名的建筑物付之一炬，如巴黎市政厅，杜伊勒里宫、审计法院、荣誉勋章纪念馆等。来自一个匿名的委员会的一条简短的命令如“烧毁财政部、烧毁杜伊勒里宫等”立刻便可以得到执行。罗浮宫以及其中的藏品得以幸免纯粹出于偶然。如今我们得悉，工会的匿名的领导发出的最荒谬的命令都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在大革命期间，巴黎的俱乐部和参与起义的巴黎公社[3]也是一言九鼎，只要其一声令下，马上会有一队武装群众前来接管议会。

我们将在一个章节中总结一下国民公会的历史，届时将会看到，公会屡遭侵犯，公会在一小撮骚乱分子强硬的命令前卑躬屈膝，然而长期以来，坊间传说公会却是非常的强大。督政府痛定思痛后，取缔了俱乐部，并采用大规模镇压方式终结了武装群众对公会的侵犯。

国民公会很快便明白，均质的群体对于异质的公会的优势所在，这也是它将自己分为若干个委员会的原因，每个委员会由数量有限的个人组成，如救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如此便在大的议会中形成了一系列小的独立议会，它们的权力只受到俱乐部权力的制约。

前述的思考表明，群体对构成它的成员们的意志有着影响。如果该群体是均质的，那么这种影响力是巨大的，如果该群体是异质的，那么这种影响力会较弱，但也可以变得巨大，一是因为一个议会中的强势群体可以支配依附它的弱势群体；二是因为某些情感常常会传染到一个议会中的所有成员。

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关群体影响力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大革命时期。1789年8月4日夜里，贵族们投票表决通过某个议员提出的关于废除封建特权的动议。我们知道，大革命的部分起因就是由于贵族和教士拒绝放弃自己的特权。起初他们为何拒绝放弃？原因仅仅是群体的行为不同于孤立的个人。就个人而言，没有哪个贵族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引述了几个特例来说明议会对其成员的影响。

他说："在大革命时期，有一类人极为常见，他们在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与其实际的模样相去甚远。例如，人们认为蒙日（Monge）是一个可怕的人，当决定开战时，他登上雅各宾党人的讲台，宣称要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最先在前线负伤的士兵……他还说要杀死所有的贵族，等等。然而蒙日却是世上最温和、最懦弱的人，要他来杀一只鸡，或仅仅在他面前杀一只鸡，他都受不了。"

三、议会热情逐步高涨的阐释

如要对集体情感加以精确的定量分析，那么可以用一条曲线来对其进行阐述。起初，这条曲线缓慢上升，接着便急速上升，随后又垂直下降。还可以用方程式来表达这个曲线，在该方程式中，刺激为常量，集体情感为变量。

在一个常量的作用下，某些情感的突然变化让人很难解释。或许，人们可以说，如果将心理学规律看作力学规律，若其中某个恒量持续发挥作用，也应该可以迅速增强情感的强度。例如，一个力以一定的量和方向，如重力，持续作用于一个物体，将会使其做加速运动。在重力的影响下，一个自由落体在第一秒的速度是10米/秒，第二秒则是20米/秒，第三秒则是80米/秒，如此等等。如果让这个落体从足够高的高度落下来，它最终的速度可以使之轻易击穿一块钢板。

即便以此来解释情感在恒力作用下的加速度，也无法解释这种加速度为何最终又戛然而止。只有心理学才能解释、才能让人明白这种戛然而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快乐或痛苦不能过头，过分的情感刺激会造成麻木不仁。我们的肌体只能承受一定量的快乐、痛苦或强度，而且不能长期承受。一如握着握力器的手，手很快便会筋疲力尽，最终手会突然松开。

对议会中某些群体的情感突然消失的研究还应当顾及这个事实：除了利用其声望和势力取得主导地位的党派外，还有一些党派，他们的情感在前者的声望和势力的裹挟下，无法获得充分的表露，一旦环境许可，优势的党派遭到削弱，受压抑的党派便会趁势而起。山岳派在雾月革命后的下场便是教训。

把物理现象所遵循的规律与支配着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的演化规律作比较，很明显是非常牵强的。只待我们对大脑功能的机制做进一步了解之后，这样做才更为合适一些。

[1] 三级会议，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是不定期的。它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百年战争时期，为了抵抗外敌，三级会议有权监督政府。16—17世纪初，专制王权加强，三级会议的权力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会议中断了175年。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了最后一次三级会议，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大革命后，三级会议随旧制度一道被废除。——译注

[2] 所谓“匿名”，也即集体负责，也即没有哪位个人对做出的决定负责。如随后的“匿名的委员会的一条命令”就是指委员会集体做出的一项决定，集体要为此承担后果。——译注

[3] 一般而言，法国大革命开始于1789年，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在这5年期间，巴黎人民分别于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1793年5月31至6月2日发动过三次起义，最后一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此处的巴黎公社与1871年反抗资产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并非一回事。也有人翻译为“巴黎民众社团”。在本书中，若无年份，“1871年”的巴黎公社，均是指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译注

第二部分 法国大革命

第一篇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一、大革命史学家

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尽管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人们依旧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评判它。对于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魔鬼的杰作”，“黑暗的魂灵从未如此地明目张胆过”。而对当代雅各宾党人而言，正因为大革命，人类方得以重生。

在法国旅居的外国人认为在交谈中应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写道：“这类随处可见的回忆或传统，是如此的鲜活，没有人能够对其无动于衷。它们既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也可引起人们的仇恨。人们一直带着一种热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识来看待它们。你越是了解法国，便会越发地明白，时至今日，在法国人眼里，没有任何一项关于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为了能够公正地阐述过去的事件，那么这类事件既不应当再产生后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为我已经指出了这些信仰都有与生俱来的狭隘性。

人们不必惊异于历史学家表述的有关大革命的观点如此迥异。长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大家都认为自己说得在理，而证明自己漏洞频出的观点的依据却又是那么的空洞。相关的文献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观点迥异，大家都有意或无意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作为自己先后抛出的论述的佐证。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们如梯也尔、基内（Quinet）、米什莱（Michelet），尽管他们才华横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他们的学说并不深奥。历史宿命论是其中的基调。梯也尔认为大革命是数个世纪

以来绝对君主制的产物，大恐怖则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后果。基内将1793年的残暴之举归结为长期专制的结果，并认为国民公会的暴政是毫无意义的，且妨碍了大革命事业。米什莱只把大革命当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业，并率先对其加以颂扬，其他的历史学家则加以效仿。

泰纳（Taine）打破了笼罩在这些历史上的光环，尽管他对其非常着迷。他在其著述中对革命时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将无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泰纳对事实、人物的呈现令人赞叹，但他却声称以理性逻辑来对事件进行判断，但理性是无法陈述、阐释这类事件的。他在把心理学用于描述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将其用于解释方面却是苍白无力的。罗伯斯庇尔有恃无恐地残害国民公会长达数月，泰纳认为他如此藐视国民公会，是因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有人说泰纳眼明但心不亮，这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优秀，且尚无人能够企及。该作品巨大的影响力，从其在雅各宾教条的忠实信徒中激起的愤怒可见一斑，巴黎大学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奥拉尔，就是这些信徒中的一位。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檄文声讨泰纳，字里行间饱含激情。两年的时间花在对具体事例的细枝末节的辩解上，换来的只是越描越黑。

再来说说奥拉尔的作品，柯钦指出，奥拉尔在其引述中的对错几乎各占一半，而泰纳则鲜有错误。这位历史学家告诫人们尤其要当心奥拉尔的材料。

“这些材料，如会议记录、报纸、宣传册、革命党人，都是一些爱国主义的真材实料，由爱国分子们编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众。奥拉尔应是从这些材料中搜罗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辩护词；他手上拿着现成的大

革命的历史，用一套现成的解释，用为共和体制辩护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人民’的行动，从九月大屠杀，直至牧月法令。”

无论对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纳学派和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难以弥合。奥拉尔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无上的，而泰纳派则认为，一旦挣脱了社会的束缚，听任本能的驱使，人民就会堕落，变得原始和野蛮。奥拉尔的观点和大众心理学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现代雅各宾分子们看来，他的观点依然神圣如同宗教教义。雅各宾分子们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为笔来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学家的观点当成是真知灼见。

二、大革命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毁者承认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埃米尔·奥利维尔（Emile 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个章节对此有过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大革命。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谴责幸存的人。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事件的起因和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事件是环境和事物发展的产物。

泰纳本人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在三级会议召开时，各种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势不可当，甚至苗头已现。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担负起未来和历史的责任；在一代人还未崭露头角之前，其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当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纳一样，也是这种宿命论的拥护者，主张要宽容对待革命暴力。

M.索雷尔（M.Sorel）对博絮埃（Bossuet）有关古代革命的结论“单从特殊的起因来看，一切都让人惊讶，其实一切原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深以为然，因此便片面地认为：“法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是对

老欧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老欧洲的重生，但这却是欧洲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归宿，此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让人极为诧异的结果，它仅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并可以从旧体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释。”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基佐（Guizot）。不久前他还在竭力辩称，法国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它是极为自然的产物。当然，他将之与英国的革命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他说：“英国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根本没有中断欧洲其自然的进程，这些革命没有诉求、没有主张、没有做任何革命爆发前人们所说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数次尝试过的事情。……即便从两场革命的基本主张及其落实情况来看，都没发现有什么针对政府、个人或财产、自由或公民权的新举措，没看到其中有什么至少和平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有这些断言均触及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所产生的某个现象，均是先前诸多现象的结果。但此类的笼统说辞没太大的意义。

没必要什么事都要用历史宿命论来解释，尽管很多历史学家都接受历史宿命论。我曾就这类宿命论的意义做过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这类宿命论。历史充满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满了本不该发生却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本人列举了可能影响其后来霸业的六种情形。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奥克松（Auxonne）洗浴时，由于恰巧遇到一个沙滩，才得以幸免于难。如果说那时波拿巴死了，人们也许认为会有另外一个将军取而代之，成为独裁者。但没了带领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的天才，法兰西帝国及其结局又会是什么样？

应当承认，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种必然，但上述坚持宿命论的作家们并没有阐释过这点：大革命是理论家们的永恒的斗争。这些理论家们

满怀全新的理想，罔顾他们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律。由于对这些规律的无知，使得他们在追根溯源无果并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羞成怒之后，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布法令，强行推广纸币以代替黄金，纵然手段使尽，也不能阻止该纸币的虚拟币值狂贬，直至如同废纸。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以抑制形势的恶化，然而形势却愈发恶化。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所有的无套裤汉[1]都应当为原本应由富人们供养的公共财政开支埋单”，尽管有搜查令和断头台，但是国库依旧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后，大革命者们最终发现，一个社会没有制约就无法存续，但当他们想创造出一些新的制约时，他们才明白，最强有力的制约，即便有断头台的辅助，也无法取代由过去的岁月缓慢建立起来的深入人心的秩序。但他们从不想去理解一个社会的演化，去判断人们的心思，去预见施政的后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是雅各宾主义戕害的产物，而非环境使然，且本不该如此。若路易十六从善如流，或者制宪议会在群众骚乱中不那么胆怯，大革命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只有在为造反有理辩解时，革命宿命论才能派上用处。

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都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从前，人类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学让人类摆脱了这个命运。我之前讲过，睿智的人类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这些支配。

三、近来的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质疑

在本章中要阐述其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挞，无不言之凿凿。囿于自身的信仰，他们做不到就事论事。保王党的作家极端仇视大革命，而自由主义作家则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兴起一股把大革命当成是一种科学现象来研究的热潮，我们知

道，掺杂在科学现象中的作者的意见和信仰是极少的，读者是难以觉察的。

当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怀疑阶段。一些之前还曾言之凿凿的自由作家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近来，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些判断，现撷取部分。

阿诺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处之后，开始反思大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接着说道"历史对此一直犹豫再三，难以决断"。

马德林（Madelin）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有关大革命的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犹豫。

> 给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个全面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一直觉得忐忑不安，没有底气。如今要下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都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原因、事件、结果都充满了争议。

有关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观念发生了切实的转变，这点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卫者的最新的著述中处处可见。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曾声称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仅仅是自卫之举。而如今他们仅仅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辩护。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奥拉尔（Aulard）和德比多尔（Debidour）所著的教科书《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证实这个新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其中有关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 血流遍地，到处都是于国于民都毫无意义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这场风暴中，人们丧失理智，到处危险重重，爱国者们在暴怒中横冲直撞。

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我们看到刚刚提及的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尽管他是强硬的雅各宾主义者，但对被冠以"国民公会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现得极为严厉。

外国人对我们的大革命的评价一般而言相当严厉。一想到我们动荡

的20年对欧洲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其中，德国人表现得最为严厉。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话对此作了总结：

> 本着爱国和勇敢的精神，我们来谈谈法国大革命；因为爱国主义首先要求对自己的祖国说出真相，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看，德国人认为法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嘴边挂着自由、博爱等伟大的字眼，但却在15年中饱受欺压、蹂躏、谋杀、抢劫和敲诈；而如今，这个民族依旧打着同样的旗号，组建起了专制的、压迫人的、让人厌烦的、危机四伏的民主政体，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体。德国人就这样看待法国。依据德国人的报纸、书籍，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德国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的价值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来的作家们会将大革命当作一件充满激情的、富有意义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把80岁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儿送上断头台或溺毙的嗜血的政府，让法国成为废墟，但在军事上却成功地击退了欧洲；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的王后死于断头台。几年后，她的亲戚，另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嫁给了成了皇帝的陆军中尉，取代她成为王后，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心理学家要选择一段鲜有人研究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最终他们也许会发现，只有放弃虚构的理论，只有放弃实证经验，来研究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心理学才能得到发展[2]。

四、不偏不倚的历史

公正性历来被当成是一名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品质。自塔西佗开始，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实际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犹如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带着自己的秉性、个性和民族灵魂来看待事物。有些艺术家，置身于同样的风景前，但是其阐释的方法却必不相同。有一些人会侧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

细节。每一份临摹都是个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来对其加以阐释。

作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历史学家要比画家更加客观公正。

历史学家可能局限于复述文献，这是现实的倾向。但是仅关于不久以前的文献，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一一浏览。因此，必须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无意识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观点最为吻合的素材，只是偶尔才有意识而为之。

除非满足于简单罗列某个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则无法写出一本真正客观的历史书。任何作者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对此也不必感到遗憾。在要求客观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著述变得越发平庸、沉闷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据此了解一个时代也成了奢望。

历史学家是否可以公正为借口，来回避对人的评价，即回避用敬仰的或严厉的措辞来谈论他们？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每个答案从各自所处的立场而言都是极为正确的，这个立场或是心理学家的立场，或是伦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应当专注于社会利益，并以此来评判人。社会要生存发展的现实，必要有一定数目的规则，要有一套善恶的严格标准，要有明确的善恶评价作为保障。由此，社会要构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个时代的人大体上不超出这些模型的左右，游离模型过远便会有害于社会。

伦理学家便是依据社会所必需的这样的模型以及衍生出来的规则来判断过去的人。伦理学家通过毁誉来建立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楷模

的道德模型。像高乃依一类的诗人们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难以效仿，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此，一个民族还需要英雄作为榜样以提振灵魂。

这便是伦理学家的立场。心理学家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一个社会无权宽容，因为它的第一责任便是生存，心理学家应当客观冷静，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考虑功利，其唯一的任务便是解释事物。

他的处境和观察家在观察任意一个现象时的处境一样。看到卡里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处，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显很难做到冷静。但为了理解这类行为，必须得淡定，一如博物学家坦然观察在慢慢享用苍蝇的蜘蛛。理性一旦被煽动起来，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么也就解释不了了。

大家知道，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可以要求二者以阐释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力量。

---

[1] 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当时法国贵族男子盛行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平民则穿长裤，无套裤，故有无套裤汉之称。——译注

[2] 这个建议绝非套话。如今的心理学家极少研究自己身边的世界，甚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我在《哲学评论》刊出的一则针对我出版的书的批评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散漫的心态。其中，作者批评我“研究社会和报纸胜过研究书本”。
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批评。报纸的社会栏目和现实世界的视角要比充斥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类期刊中的形而上学的不尽合理的论调要有意义得多。
哲学家们开始觉得这类无聊之语很幼稚。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写所有这些论述只不过是要表达“粗略观察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几个争论”时，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数卷这类的陈词滥调。作为最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大家，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承认“一门学科中的每一句陈述的不足，都会招致形而上学的批评”。二十年来，我一直试图将心理学纳入对现实的研究中，但学院派形而上学的思潮仍难以转向，尽管其影响尽失。

第二章 旧体制的心理学基础

一、旧体制的根基和君主制

很多历史学家坚信，大革命针对的是君主制的独裁，但事实上，在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法国国王就已不拥有绝对的王权了。

只有在很久之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君主才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之前的所有君主，包括最为显赫的君主们如弗朗索瓦一世，都不得不与庄园主、教士、国会议员们做持续不断的斗争，而且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获胜。弗朗索瓦一世并不拥有足够的权威去对抗索邦神学院和议会来保护其最亲密的亲信。他的朋友兼参事贝尔干（Berquin）得罪了索邦神学院，遭到了后者的拘捕。弗朗索瓦一世命令释放他，然而却遭到了拒绝，在没有其他办法保护他之后，他不得不派警卫人员将其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弄出来，并将其安置在卢浮宫，置于自己的身边。索邦神学院并不服输，终于在国王不在的时候，再一次逮捕了他，并将其交由议会审判，上午10点判刑，中午便被火刑处死。

法国国王们的权势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巅峰，随后便迅速地衰落。因此说路易十六专制的确非常牵强。

所谓当家人实际上是宫廷、大臣、教士和贵族们的傀儡。他所做的事不过是别人强迫他做的，极少是其本人愿意做的。他的自由并不比其他法国人多。

君主制的巨大权势源于神圣的血统以及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传统。这些传统形成了一个国家真正的骨架。

旧体制崩溃的真正原因就是作为其根基的传统的式微。当传统在被一再质疑以至于乏人拥护后，旧体制便像一栋根基被掏空的建筑物一样轰然倒塌。

二、旧体制的弊端

一个建立已久的体制最终都会得到其统治下的人民的接受。当体制的弊端成了习惯，人们也就难以觉察了，只有在认真思考时，弊端才会暴露出来。人们会思索为什么能够容忍这些弊端。真正不幸的人是觉得自己不幸的人。

在大革命时代，在作家们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意识，我们稍后探讨这些作家们的行为。旧体制的不足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不足数量庞大，仅列举其中几条加以说明。

通过对独立省份接连进行征服后形成的法国，尽管中央集权有相当的权威，但国内还是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法律、习惯法和风俗，且税赋各不相同，关税壁垒使得彼此间隔离开来。法国的统一相当程度上是人为的。它是各类地区的一种聚合体，法国在历任国王的努力下，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完全统一。大革命最富有成效的成就便是这种统一。

不但存在着空间上的割裂，还存在着社会的割裂。社会被划分为贵族阶级、教士阶级、第三等级[1]，各阶层间的等级森严，难以轻易逾越。

划分阶级是旧体制的权力之一，因此，旧体制要竭力维护这种阶级划分。阶级划分成了产生仇恨的主要原因。作为获胜方的资产阶级，它的暴力行为其实就是对自己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蔑视和压迫的一种报复。自尊受到伤害是最难忘的伤害。第三等级遭受的伤害最为深重。在1614年的一次全国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被迫摘下礼帽，屈膝行礼。当第三等级的一位代表说三个阶级亲如兄弟时，贵族阶级的发言人回应道："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根本没有兄弟情义，贵族们可不希望和鞋匠、皮匠们的后人称兄道弟。"

虽然启蒙运动有了长足发展，贵族和教士却依然坚持要求享有特权和待遇，但由于这些阶级已不再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

教士和贵族阶级受到王权的猜忌，并被能力和教育水平越来越好的资产阶级所逐渐取代，他们由此远离了公共职位，只剩下一个名头。泰纳对这种情况作了清晰的阐述：

> 自从贵族失去了特权以后，第三阶级借助教育和才华全面接管了权力，二者之间没有了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不但失去了意义而且还是有害的。既然贵族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无能是子虚乌有，那么习惯法构建起来的不平等不再被认可便是理所当然的，第三等级也必然会对特权表示不满。

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等级，使得人们对贵族和教士阶级主动放弃特权不抱什么希望。最终在外力的逼迫下，他们在一个难忘的夜晚[2] 放弃了特权。但太迟了，此时的大革命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的发展也能逐步建立大革命所要建立的东西：公民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废除与生俱来的特权等。虽然拉丁民族思想普遍保守，但这些东西最终也会水到渠成，就像在其他民族里一样。我们由此将会少受二十年的祸害，而为了避免这些灾祸，还需要一个与我们心理构成不同的心理构成，尤其需要一些与该时代政治家不同的政治家。

资产阶级对源于传统形成的凌驾其上的阶级怀有很深的敌意，这种敌意是造成大革命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资产阶级在大革命胜利后洗劫失败者财富的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宛如征服者，一如诺曼人纪尧姆家族（Guillaume le Normand）在征服英国之后把土地分发给士兵一般。

虽然资产阶级厌恶贵族阶级，但它对君主制却没有丝毫的愤恨，在资产阶级看来，君主制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国王的愚钝和对外国的依赖

却使其慢慢得丧失了民心。

第一届议会从未想过要建立共和制。实际上，议会具有极端的保王主义性质，它只想用君主立宪制来代替绝对君主制。当议会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之后，便开始对国王的抵制不满。然而却不敢推翻他。

三、旧体制下的生活

对旧体制下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的真实处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为大革命辩护的作家们像捍卫宗教教义的神学家们一般，把旧体制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描述得极为不堪，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不幸的人为何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被饿死。前巴黎大学教授朗博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其中有一篇名为“路易十四时期农民的悲惨生活”的文章还附有一幅版画，画中最显著的位置上，有一个人和狗在争抢已经完全没有肉的骨头。在那个人的旁边，还有一个人捂着肚子蜷缩着身体，在远处有一名妇女卧在地上，咀嚼着草。这幅画的背景是一些匍匐于地的人，或者说是尸体，或者是饿殍。朗博还举了旧体制统治的一个例证：“花上800里弗[3]在警察局谋得一份差事，便可以获得40万里弗的回报。”但在倒卖这类肥差的掮客眼中，谋得这些数目的好处算得上是极为清廉的了。他还向我们证实“只要花420里弗便可将人送进监狱，在路易十五时期，被监禁或放逐的人达15万之多”。

大部分有关大革命的书籍都缺少客观性和批判精神，这也是这个时期至今不被人所知的原因。

当然，原因并非缺乏资料，而是资料的矛盾丛生。只要将英国旅行家杨所看到并描绘的富足、热情的农民形象与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所做的著名描述进行对比便可知晓。

农民们真的不堪税赋，要将自己收入的五分之四上缴而不是当今的五分之一？对此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似乎可以证实旧体制下的农村居民不可能过得如此悲惨，因为我们业已证实，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被农民买下的。

人们对当时非常暴虐和复杂的财政制度了解也很多，如预算经常处于赤字状态，残暴的包税人在各种税赋上层层加码。到了大革命时期，这种财政形势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上也提到了这点。我们注意到，会议记录所列举不是以前的情形，它反映的是由1788年的歉收和1789年严寒的冬季所引发的危机的真实情况。如果再提前10年，这些记录里会记载些什么呢？

尽管形势严峻，但这些记录中也不会载有任何革命的想法。最激进的想法也不过是要求“加税要由三级会议批准，且所有人都应纳税”。不否认有时还会提出“国王的权力应该受到一部规定国王权力和国民权力的宪法的制约”。如果这些愿望得以实现，那么用以取代绝对君主制的君主立宪制很容易便会被建立起来，大革命由此也就很可能不会发生了。

不幸的是，由于贵族和教士阶级太过于强势，而路易十六又过于软弱，导致这种方案夭折了。

资产阶级的要求也给这种方案带来极大的麻烦。声称要取代贵族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真正推手。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这场运动很快便超出了其预期、要求和希望。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求平等，但人民也转而向它要求平等。大革命由此最终以成立民众政府而结束，但这是大革命从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的结局。

四、大革命期间对君主制的情感变化

虽然情感因素演化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大革命期间，不但民

众对君主制的情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连革命议会也是如此。从第一届革命议会的立法者们满怀敬意地簇拥在路易十六的身旁到其被砍头，中间只隔了短短数年时间。

这些转变只是表面上的而非深层次的。事实上，也只是把对同一个秩序的情感进行了简单的位置调换，也即这个时期的人们把口中念叨的对国王的爱，转移到了继承其权力的新政府的身上。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

在旧体制下，所谓天授神权的君主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权力，各地的民众都对其表示了认同。

一旦受到膜拜的人的权力一再被证实是虚幻的，那么民众对君主绝对权力的迷信便会立刻崩塌，其威望便会立刻消失。一旦失去威望，民众便不会原谅那曾让人着迷而如今崩塌的偶像，并寻找他们不可或缺的新偶像。

自大革命伊始，大量为人津津乐道的事件终让最狂热的信徒们明白，君主不再拥有权势，众多其他势力不仅可以挑战君主，还可以凌驾其上。

目睹了王室在议会上的颓败及其在面对武装进攻时却无力保护巴黎市中心最坚固的城堡巴士底狱，老百姓们会做何感想？

王室的弱不禁风昭然若揭，议会的权势如日中天。在百姓看来，弱不禁风便是威严扫地，于是百姓们转而投向了强者。

议员们的情感也在变化当中，但演化极为缓慢。这也是为何当巴士底狱被攻陷后，在国王逃走并与外国势力串通的情况下，议员们对君主制的信仰依旧的原因。

对王室的忠诚非常强大，以至于巴黎的骚乱和事变虽让路易十六掉了脑袋，但还不足以彻底摧毁这种忠诚。在外省，人们对古老君主制长达数世纪的虔诚[4]依旧。

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在法国大部分地方依然存在着对王室的忠诚，这也是保王事件以及起义在几个省份频发的原因。频繁的事端让国民公会疲于弹压。但在巴黎已不见对王室的忠诚，因为在巴黎，王室的颓废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外省人看来，王权依然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依然具有威信。

对王室的感情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断头台也无法遏制这种情感。保王运动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一直持续不断，在督政府时期甚至愈演愈烈，49个省派保王党代表去巴黎请愿，由此引发了果月政变[5]。

对君主制的这些情感，大革命难以压制，这促成了波拿巴的成功掌权。波拿巴占据了王位后，几乎又重新恢复了旧体制。

---

[1] 在法国旧体制中，第三等级是指当时法国社会中除了教士阶级、贵族阶级之外的其他公民组成的阶级。第三等级没有前两个等级所拥有的封建特权，并且担负纳税和其他封建义务。——译注

[2] 史称八月法令，法令宣布“将封建制度全部予以废除”。1789年8月4日晚，贵族代表和教士代表在国民议会上纷纷宣布放弃封建义务。一夜之间，议会通过30个法令，宣布废除全部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包括教会什一税、贵族狩猎特权、养鸽特权、领主裁判权等。——译注

[3] 里弗（Livre），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译注

[4] 为了表达人民对国王的这种深厚爱戴，米什莱讲述了发生在路易十五时期的一件事。“当人们在巴黎得知路易十五离开王宫视察军营并在梅斯（Metz）患病的消息时已是夜晚。但人们还是不顾休息，漫无目的地四处奔走打探；教堂在深夜也敞开大门……人们聚集在十字路口，陌生人之间彼此靠近，相互询问。有好几个教堂的牧师泣不成声，中断了唱诗，改为国王的健康祈祷。百姓们也悲戚哭喊……当信使带来国王康复的消息时，大家上前拥抱，几乎使之窒息；人们亲吻他的马儿，似乎在欢迎凯旋的英雄……大街小巷响彻‘国王康复

了’的欢呼声。”

[5] 法国督政府中的共和派督政官为镇压保王党复辟活动而组织的政变，发生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故名“果月政变”。——译注

第三章 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传统、情感、道德观构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为并维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的外在生活，各个时代皆是如此。

一旦这套框架的抗应力下降，之前没有可能产生的思想观点便可能萌发、滋长。如在两个世纪前曾遭到猛烈鞭挞的某些理论，到了大革命期间却大行其道，其中缘由便是如此。

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缓慢的心理演变的结果。若要对一场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极为缓慢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看不到这种演化的。人们只有把同一个社会阶级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变化曲线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对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为了弄清楚饱学之士对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室的看法，人们可以将博絮埃和杜尔哥（Turgot）的政治理论加以比较。

博絮埃在解释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时说，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国王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对人负责，它只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评判。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样强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动摇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尔哥一类谋求改革的大臣们，他们的著述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们几乎绝口不提圣灵或国王，而人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的描绘。

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从税赋、贫穷、饥荒到不幸的战争这样一个演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君主权威的尊崇产生了动摇，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时机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个的精神框架开始分崩离析并迅速解体。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新思想，在大革命时期能够迅速传播开来的原因。

实际上，这些极具诱惑力的思想早已出现过多次并影响了英国政治多年。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们便已开始捍卫自由、诅咒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发动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尽管其本人及其父辈早已从教科书中知道了这些事物，但他们却不为所动，因为时机不成熟。为何在一个把等级制度当成一种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时代，人民反而会受到这些思想的触动？

哲学家们在大革命爆发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什么新东西，但却发展了批判精神，而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教条无法对抗这种批判精神。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影响下，业已不受待见的事物变得越发不堪，当传统和声望尽失时，整个社会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种逐步解体最终传导至民众，但解体进程并非由民众开启。民众只是效仿，绝非首创。

哲学家们无法对人民施加影响，但对于民族中的开明阶级的影响却不同凡响。游手好闲的贵族阶级，长久以来不予委任职位，因此，对社会心怀不满并跟着哲学家们一起鼓噪。缺乏远见卓识的贵族阶级率先与自己唯一赖以为继的传统相决裂。满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

则不断地以批判来挖自己特权的墙脚。最热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运的宠儿群体之中，如今也是一样。贵族阶级鼓励人们去论述社会契约、人权、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批判特权阶级的武断、尸位素餐以及各种弊端的演出击节叫好。

一旦人们失去了对规范其行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会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满。所有的阶层都感到之前的行为理据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长达数世纪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们和贵族的苛责的精神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与其他的重大影响叠加后可以产生共振效应。我们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时提过，如今业已分道扬镳的教权和世俗政府，在旧制度下却是紧密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君主制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知识的持续进步让人从信奉神学走向崇尚科学，从神启的真理走向观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尽管一直模糊难辨，但这表明，规范人们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的价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在“人们普遍不满”的这片废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会大厦的魔术棒？

人们一致相信，理性具有传统和神灵所失去的那种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计其数，由此认定以理性来建设社会，以理性完全改造社会，难道不合理吗？为何要怀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传统越来越被人鄙夷，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终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催生出了大革命，还完全驾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与过去相决裂，为了按照逻辑指定的蓝图来建立社会，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学家们的唯理论逐步传播到了民众并被总结成为一句话：从前应当遵从的东西如今不再被遵从，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对从前的主子唯命是从。

对上流阶级所不再遵从的事物，群众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从。当遵从的障碍消除后，革命便水到渠成。

这种新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普遍的不顺从。据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1] 讲述，当她在隆尚（Longchamps）游历时，老百姓一边踏上马车的踏板一边对她说，“明年，您便会待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不只是民众表现出这种不顺从和不满。在大革命前夜，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泰纳说：“底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诸侯对大领主、农民对城里人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精神状态从贵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众，同样也波及了军队。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内克尔（Necker）[2] 说“我们对军队没信心”。因为军官们也被人道主义化、被哲学化了。从社会底层招募来的士兵虽然没有被哲学化，但都变得不听话了。在他们简单的大脑中，平等观仅仅意味着可以对上级和一切命令说不。1790年，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加以威胁，甚至有几次，如在南锡，军官们还被关押起来。

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蔓延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军队，这成了旧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罗尔写道“受到第三等级[3]（Le Tiers）思想的影响，军队发生了背叛，正是这种背叛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但不能因为他们抨击不

公和舞弊，就认为他们就是民众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在研究了古希腊时期民主的作用后，普遍对民主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与民主伴随而来的破坏、暴力，他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决于民众的意见，民众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几个演说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是伏尔泰真正的前辈，他对雅典民众政府的所作所为做了如下描述：

> 我们看到的这段历史，其间充斥着群体性的骚乱；雅典城被各个派系所瓜分；暴动让该城市不得安宁；在残暴的煽动者的蛊惑下，最有才华的人遭到迫害、放逐，甚至被处死；人们确信，这个以特别自由而著称的民族，本质上却是一小撮蛊惑者的玩偶，这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根据自己的兴致一会儿让它向东，一会儿让它向西，犹如海浪随风变向。在马其顿这样的君主制国家里，您是找不到雅典历史中那么多的暴政的例子的。

孟德斯鸠也对民主没有太多的好感。在描述了三种政府形式——共和制、君主制、专制——之后，他还特别指出民众政府容易出现的问题：

> 人们因法律而自由，但人们还想自由地反抗法律；准则成了严厉，规则成了束缚。私人的财产成了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又成了私人的祖业。共和国是一种招牌；它的力量为几个人所用，所有人都可以借它为所欲为。……于是出现了许多的小暴君，每个小暴君身上都拥有单一的暴君身上一切的暴虐。仅剩下的一点自由的东西也很快让人难以容忍；单一的暴君出现了，民众失去了一切，甚至连腐化堕落的资格也没有了。民主要设法避免极端的平等意识，因为它将导致民主走向一个人的专制，就像一个人的专制终将走向征服一样。

孟德斯鸠的理想是英国式的立宪政府，它可以防止君主制堕落为专制。只是在大革命期间，这位哲人的影响力极为有限。

至于百科全书派，人们认为其在大革命爆发中所起的作用很大，其中除了自由君主制分子霍尔巴赫（Holbach）[4]、伏尔泰和狄德罗之外，大多不太关心政治。他们捍卫个人的自由，抨击极端狭隘的教会的

侵犯以及哲学家的敌人。他们既非社会主义也非民主分子。大革命和他们的理念毫无关联。伏尔泰本人表示自己对于民主不大赞同，他说：

> 民主仅适合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且还要位置好。尽管很小，但是它也会犯很多错，因为它也是由人构成的。混乱将在那里成为常态，就像挤满了修士的女修道院；不过，因为喝下了这免费的海水[5]，该国将不会发生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会有爱尔兰大屠杀，不会有西西里岛晚祈祷事件[6]，不会有宗教裁判所，不会有苦役犯，除非这个共和国是由地狱某个角落的恶魔组成的。

所有这些所谓大革命的煽动者的观点却绝少是颠覆性的，几乎看不到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卢梭是他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几个民主哲学家之一，这也是他的《社会契约论》在大恐怖时期被奉为圣经的原因。他似乎在为无意识的神秘主义、情感主义的冲动所引发的行为开脱，并为其提供理性主义的理由，然而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未曾鼓吹过神秘主义、情感主义。

实事求是地说，卢梭的民主直觉相当可疑。他本人认为，他的社会重组计划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只适用于很小的城邦。因此，当波兰人向其讨教民主宪法方案时，他向其建议选择一个世袭的国王。

在卢梭的理论中，关于完美的原始社会状态的理论大受褒赞。当时的作家们和他一样，大家都确信原始人是完美无缺的，只是社会让他们堕落了。用好的法律来对堕落的人加以矫正，人们便可以重获原始时代的那种幸福。由于不懂心理学，卢梭便认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受到同样的制度以及同样的法律的制约。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看法。爱尔维修（Helvétius）写道：“一个民族的善与恶向来都是立法的必然结果……各个民族的善或多或少都是行政治理智慧的结晶，这点难道有问题吗？”

没有比这更为荒谬的了。

三、大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

很难确切描述大革命期间某位资产者的社会观和哲学观。不过，著名的《人权宣言》对这些观点做了概括，大致将其分为博爱、平等、民众政府等几种形式，我们将从《人权宣言》中引述一些片段。

18世纪的哲学家似乎都没有得到大革命时期人们的高度认可。而且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话语中。新立法者们依旧沉浸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回忆中，重温着柏拉图和普鲁塔克（Plutarque）[7]的著述。他们想重现斯巴达时代的政体、习俗、法律以及朴素的生活。

莱克古斯（Lycurgue）[8]、梭伦（Solon）[9]、米太亚德（Miltiade）[10]、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Manlius Torquatus）[11]、布鲁图斯（Brutus）[12]、穆西乌斯·塞沃拉（Mucius Scoevola）[13]以及神话人物的米诺斯（Minos）[14]都成了戏剧舞台和讲坛上的常客，为民众所津津乐道。革命群众始终笼罩在古代英雄的光环之下，只不过后来人们将其换成了18世纪的哲学家的光环。

人们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一般被描述为一群在思维缜密的哲学家们指导下的、坚忍不拔的革新者，但实际上，他们却从不主张进行革新，而是执着于尘封已久的、充满不确定性且他们一无所知的过去。

理性的人是不会在如此遥远的过去中寻觅自己的榜样的，而只想着采用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大加赞扬的英国式的宪政体制，且各个民族都应加以模仿，以免除暴力危机。

他们的抱负仅限于完善现存的君主制，而非推翻它。但在革命时代，人们所设想的道路往往与实际的道路截然不同。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根本没人想到温和的、有文化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一场革命会迅速转变成为一场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专政之一。

[1] 勒布伦夫人，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御用肖像画家。——译注

[2] 内克尔，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瑞士银行家，主张缩减开支，1781年被免职。——译注

[3] 第三等级，通常是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由纳税义务的人构成的等级。与那些不纳税、享有封建特权的人构成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相对立。具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等，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以上。他们均属被统治阶级，虽负担着国家的各种赋税和封建义务，但却没有任何权利。——译注

[4] 霍尔巴赫（1723—1789），法国哲学家，无神论者。生于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商人家庭。1735年时移居法国。1744年就读于荷兰莱顿大学。1749年回到法国，后继承伯父的男爵爵位。与狄德罗等人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是“百科全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著有《自然的体系》《健全的思想》《揭穿了的基督教》《神圣的瘟疫》《自然政治》等。其中，《自然的体系》一书有“无神论的圣经”之称。——译注

[5] 原文如此，在此应该指采用了“民主”。——译注

[6] 指反对安茹王朝的西西里国王卡洛斯一世对当地统治的一场起事。1282年3月30日是复活节，一大群西西里人聚集在巴勒莫附近的一所教堂外面等待晚祷钟响起。一伙法国官员也加入了人群，不顾人们对他们冷眼相向。几个法国人开始和西西里女子套近乎，后来一个法国军士带着一个已婚的女子离开人群，女子的丈夫当即就把法国军士刺死了。法国人立马要为他们的同伴复仇，却当场遭到群众攻击和杀害。当全城的晚祷钟声响起，报信者们在巴勒莫四处奔走，号召人们暴动。西西里人屠杀了法国人以及同法国男子结婚的女子，侵袭了房屋、客栈和僧尼修院。——译注

[7] 普鲁塔克（约公元46年—120年），生活于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常称为《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蒙田对他推崇备至，莎士比亚不少剧作都取材于他的记载。——译注

[8] 莱克古斯，古斯巴达的立法者，主张严刑酷法。——译注

[9] 梭伦，古雅典政治家和立法家。——译注

[10] 米太亚德，约公元前554年—前489年，古希腊的雅典统帅。——译注

[11] 曼利乌斯·托尔卡图斯，古罗马执政官。——译注

[12] 布鲁图斯，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注

[13] 穆西乌斯·塞沃拉，古罗马时期的一位左撇子英雄。——译注

[14] 米诺斯，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国王，主神宙斯和欧罗巴之子。——译注

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象

一、对原始人、自然状态、大众心理的幻象

我们已经提及并再次重申，一个学说中的谬误并不妨碍它的传播，唯一要关注的是它对人的影响。

在心理学家看来，批判错误却无人喝彩，是件极为有趣的事。哲学家要想弄清楚人们为何如此沉迷，不妨着重研究一下人们在生活中的幻象。

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大革命时期才会出现如此多的意义深远的幻象。

最为明显的一个幻象便是关于我们先祖和原始社会的本质。在人类学还没能揭示我们远祖的生存状况之前，人们只根据《圣经》的记叙而认为，人类是完全出自造物主之手。后来被文明所玷污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应该皈依的模型。重返自然状态很快成了众口一词的要求。

卢梭说："我在我的著述中所论述的道德的基本原则便是：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他热爱公正和秩序。"

现代科学通过我们祖先生活的遗迹判断其生存状况，很早便证实这个学说是错误的。现代科学认为原始人是粗野残忍的，他们和现代野蛮人一样，不知善良、道德、怜悯为何物，他们只受冲动的支配，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便离开洞穴冲向猎物，在仇恨的刺激下，他们会扑向敌人。理性尚未诞生，不可能对他们的本能有任何的作用。

与所有的革命信仰相反，文明的目标不在于回归原始状态，而是要脱离原始状态。雅各宾党人恰是要以摧毁一切社会约束——没有这些约束，任何文明都无从谈起——从而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状态，将一个开化

的社会变成了野蛮的游牧部落。

理论学家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与一位罗马将军对占卜者的力量的认识差不多。作为行动的动机，它们的影响都相当大。国民公会总是从中汲取动力。

有关原始先祖的错误认识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现代发现之前，人们对他们真正的生存状况的了解是少之又少。但大革命理论学家完全无视其周围人的心理则是难以理解的。

18世纪的作家和哲学家完全不具备细微观察的能力，这点似乎能说得过去。他们生活在同龄人之间，但却既不观察他们、也不理解他们。他们从不怀疑大众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人民总是和他们空想出来的虚幻模型相一致。由于对心理学以及对历史教训的无知，他们认为人民的本质是善良的、有情义的、懂得感恩的并时刻准备倾听理性的声音。

国民公会的议员们的话语表明他们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当农民开始焚烧城堡时，他们居然觉得不可思议，并苦口婆心地劝导农民停止纵火，以免"惹恼了他们的好国王"，并恳请他们要以"德行来感动国王"。

二、幻想使人摆脱过去，迷信律法的改造力

人类很容易摆脱过去，一个社会可凭借制度来加以全方位的重塑，这点成了革命制度的基础原则之一。

在理性的启蒙下，立法者认为，除了可作为模式的原始社会之外，过去代表的是迷信和谬误的一种遗赠，立法者决定要与之彻底决裂。为了更好地体现这种意图，他们建立起一个新的纪元法，并更改历法，更改月和季度的称谓。

考虑到人与人都是相似的，他们认为可以为人类立法。孔多塞（Condorcet）[1] 说，"一部好的律法应当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好的，正

如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正确的一个几何命题”，他认为自己阐述的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

大革命的理论学家从未觉察到隐藏在显性的事物背后那些不可见的动因，这些动因决定着事物的走向。生物学的进步表明，他们的错误是何等严重，生物对其过去是何等依赖。

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一直在与过去的影响做斗争，而根本不明白过去的影响为何物。他们想要斩草除根，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大革命末期，立法者对制度和法律的绝对力量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在初期则是信心满满。格雷古瓦（Grégoire）在制宪议会的发言席上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宗教，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在场的人居然也毫不惊讶。人们知道，他们想稍后去做这个事情，人们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企图遭到了何等惨烈的失败。

雅各宾派拥有一切成功的要素。得益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暴政，他们扫清了一切障碍。他们所钟情的法律都得以被接受。在十年的暴力、摧毁、焚烧、屠杀、动荡中，他们的颓势越发明显，最终沦落到四面楚歌的地步。独裁者在整个法兰西的要求下，不得不恢复先前遭到废除的绝大部分事物。

雅各宾派想要在纯理性的借口下重塑社会的企图是一场最发人深省的实验。人类或许将不会再以如此大的规模来重蹈覆辙了。

尽管教训异常深刻，但它并不足以警醒世人，如今我们依旧看到，社会主义分子还在凭借他们的空想来主张彻底重塑整个社会。

三、对大革命原则的理论价值的盲从

大革命用以构建新权力的基本原则被写入先后于1789年、1793年以及1795年公布的《人权宣言》之中。这些《宣言》都宣称“主权原则属

于国家”。

这三部《宣言》在几个方面并不一致，尤其在平等问题上。1789年的《宣言》的第一条只是简单地说“人生而自由，始终自由，且权利平等”。1793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更进一步明确了“所有人生而平等”。1795年的《宣言》在第三条中说得较有分寸：“平等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在谈及权利之后，第三部《宣言》还认为有必要就“义务”做出说明。第三部《宣言》中的道德就是指《福音书》中的道德。其中的第二条认为“人和公民的一切义务源于铭刻在每个人心中的两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些《宣言》的核心部分便是平等和人民主权，它们也是唯一保留下来的部分。

共和国的格言“自由、平等、博爱”尽管理性不足，但作用相当巨大。

这句神奇的格言被镌刻在我们的墙壁上，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它拥有实实在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仿佛是被巫师施加了魔力的咒语。

在承诺燃起的新希冀的推动下，这句咒语的扩张力十分惊人。成千上万的人为它付出了生命。如今，每当一个地方爆发革命，总会听到这同样的话语。

选择这样的范式非常幸运，它属于笼统含糊的、让人浮想联翩的范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恨、自己的希望来自由阐释它。真实的意义并不重要，从信仰而言，人们赋予它的意义才是其力量所在。

在革命格言的三原则中，平等最富有意义。在本书的另一个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平等是唯一存续并被保留下来的，其影响至今不绝。

人们不能肯定是不是法国大革命把平等思想带给这个世界的。无须追溯至古希腊共和国时期，人们便可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早已以最直白的方式在传授平等理论了。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上帝只根据人的德行来对人进行评判。

仅仅把平等宣称为一个原则是不足以让人遵守的。基督教会很快便抛弃了理论上的平等，大革命人士也只是演讲者才提及平等。

平等一词的意义随着使用它的人的不同而不同。其中隐含的情感经常与其真实的意义截然相反，不但体现着“不让任何人高于自己”的蛮横要求，还伴有“自己要高人一等”的强烈愿望。

在大革命雅各宾党人中，在如今的雅各宾党人中，平等一词释放出来的仅仅是对于一切优越因嫉妒而萌生的愤恨。为了消除优越，他们声称要统一习俗、礼仪、习惯、地位。一切专制，除了他们自己施行的专制外，都是可憎的。

无法回避天生的不平等，这让他们感到反感，于是他们便矢口否认不平等。第二部《人权宣言》，也就是上文提及的1793年的那部，便公然谎称“所有人生而平等”。

隐藏在大革命人士对平等的渴望之下的只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需求。拿破仑被迫为他们恢复了贵族头衔和勋章。泰纳指出，在最为可怖的革命中，他找到了最为驯服的统治工具，泰纳说：“在自由和平等的布道下，顷刻间，他便把他们的专制本能欲望、发号施令的欲望、强过别人的欲望尽收眼底。此外，绝大多数的下属也都对金钱和享乐充满渴望。救国委员会的代表和帝国的部长、行政长官、专区区长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他们只是穿着两套服装的同一人，只不过前者着短上衣，后者穿绣花外套。”

平等教义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资产阶级要求人民主权的申明。这个申明一直是纯理论上的空谈，至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都是如此。

平等原则是大革命的遗赠。在共和格言中分列在“平等”左右的“自由”和“博爱”两个词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大革命以及帝国期间，除了装扮语句之外，它们几乎毫无用处。

此后它们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博爱根本没有被用于实践，人们也几乎不在意自由。实际上，工人们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给了工会。

总而言之，尽管共和格言极少用于实践，但它的影响特别巨大。除了这三个著名的词语之外，法国大革命在人民的心目中业已荡然无存，这三个词成了人民的福音书，成了横扫整个欧洲的利器。

---

[1] 孔多塞（1743－1794）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亲身参加了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并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1793年7月，执政的雅各宾派以“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为罪名追捕孔多塞，后者于9个月后，即1794年3月服毒身亡。——译注

第二篇 大革命期间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的影响

第一章 制宪议会心理

一、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心理因素

在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逻辑支配下的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已经说过，很多历史学家由于没能对上述因素各自的影响加以区分，导致他们对这个时期的解释差强人意。

理性主义因素常被人用来解释大革命，实际上它对于事件的影响力最弱。它对法国大革命仅起到了铺垫作用，而且仅是在大革命的开始阶段，因为此时的大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的作用体现在很多的措施中，如税收改革计划、取消寄生的贵族特权等。

一旦大革命深入民众阶层，理性主义的力量迅即消失，并让位给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因素。而神秘主义因素则是革命信仰的基础，它能让军队热血沸腾，能让全世界都接受新信仰。

我们马上来看看这些因素在一系列事件中、在个体的心理中的影响。有着最重要影响力的也许是神秘主义因素。只有把大革命看成是一种宗教信仰形式，我们才能明白大革命，这点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所谈及的有关一切信仰的结论都同样适用于法国大革命。例如，在之前有关宗教改革运动的章节里，就可以看到它在很多方面都和大革命很相似。

哲学家们在花了很长时间来描述理性主义因素在信仰中的微弱价值之后，如今又开始深入阐释信仰的作用。他们不得不承认，唯有信仰才具有改造一个文明中各个要素的足够力量。

信仰独立于理性之外，它拥有指引思想和情感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力量。纯理性从未有过如此的力量，它也无法激发人们的热情。

大革命很快便披上了一件宗教外衣，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革命会具有如此大的扩张力并获得如此的声誉。

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应该把这场伟大的运动看作一种新宗教的奠基仪式。我认为，洞察力强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揣测到这点的人。

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但它采用的方式和外在的形式却与一场宗教革命无异。从几个特征和规律来看，大革命都与宗教革命相似，大革命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还像它一样，以预言和布道来贯彻。一场政治革命激发起了人们对新信仰的热忱，人们热切地劝说外国也开展他们在自己国家中如火如荼进行的革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景象！"

大革命的宗教特征已经得到认可，人们的狂怒和破坏行为也就很容易解释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和信仰与生俱来的东西。大革命煽动起来的不宽容和暴力，其实就是获胜的神灵要求其信徒们做的事情。大革命让欧洲20年不得安宁，它摧毁了法国，杀死了数百万人并导致法国遭受数次入侵，但不经历如此的浩劫，一个民族就无法改变其信仰。

神秘主义因素历来是信仰的根基，但某些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因素很快也会介入其中。信仰成了情感主义范畴内的感情、激情和兴趣的集合体。理性将这个集合体加以发展，以便设法为它鞭长莫及的事件提供合理的依据。

在大革命时期，每个人都会依据自己的期望，为自己的新信仰找到一件理性的外衣。人们看到大革命只是将祸害他们的等级制和宗教的、政治的专制统统加以废除了。像歌德（Goethe）这样的作家和康德（Kant）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这是理性的胜利。一些外国人如洪堡特（Humboldt）甚至还来到法国"呼吸自由的空气并观看专制主义的葬礼"。

但知识分子的这些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事件的演变很快便暴露了其梦幻表象的实质。

二、旧体制的解体和全国三级会议

大革命在付诸行动前便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酝酿着了。在上述因素的铺垫下，法国大革命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爆发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和指责与日俱增，胃口也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呼唤着改革。

路易十六非常明白改革的益处，但是他太软弱了，根本没办法在贵族和教士阶层中进行改革。他甚至连他的改革大臣马勒舍布（Malesherbes）和杜尔哥都保不住。接连的饥荒和税赋的加重让各个阶层的贫困渐长，君主及其身边人的巨额俸金与普遍的穷苦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为了消除财政危机，贵族们被召集起来开会，但他们拒绝接受平等纳税，仅同意了某些无关痛痒的改革，而最高法院又不同意签署这些改革，于是最高法院被解散。各省的高等法院效仿最高法院，由此也全被解散。被解散的这些人掌握着舆论主动权，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召开全国三级会议，而这样的会议已经有近两个世纪没有召开过了。

全国三级会议最终还是召开了。500万法国人中有10万教士，15万的贵族，他们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三级会议共有代表1200名，其中第三等级的578名代表主要由官员、律师、医生组成。教士阶层有300名代表，其中的200人是平民出身的代表，这些平民代表和第三等级的代表站在一起反对贵族和教士阶级。

从第一次会议开始，社会地位不平等、心理状态不同的代表之间的心理冲突就表现了出来。特权阶级的华丽服饰与第三等级寒酸的衣着之间产生了让人屈辱的对比。

在第一次会议上，贵族和教士代表根据他们的阶级特权，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免冠礼，第三等级的代表欲效仿之，结果遭到特权阶级的抗议。第二天又爆发了一些涉及自尊的新冲突。第三等级的代表邀请单独坐在特设议事厅中的贵族和教士阶级的代表一起审议权力事宜，但遭到贵族代表的拒绝。磋商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第三等级的代表自恃代表了全国95%的人口，便根据西哀士（Sieyès）教士的建议，宣布自己组建国民议会。法国大革命序幕由此拉开。

三、制宪议会

一个政治议会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其对手的强弱。制宪议会对自己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只受到寥寥几个演说家的强力掣肘而感到惊讶，制宪议会的言与行从一开始便以统治者自居。特别是它将征税权强行拿在自己手上的行为，更是对王权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路易十六的反抗十分微弱。他只是关闭了制宪会议的议事厅，于是代表们便去了网球场大厅并在那里进行宣誓，宣称若不形成一部王国的宪法就绝不解散。

大部分的教士阶级代表站在了他们一边。国王宣布议会的决议无效，并命令代表们解散。大司仪德勒-布雷泽（Dreux-Brézé）侯爵规劝他们执行国王的命令，议会议长宣布国民议会不接受命令，米拉波（Mirabeau）则向国王的特使称会议是在人民的要求下召开的，议会不会屈服，除非使用武力。国王再次做出让步。

6月9日，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制宪议会这个名称。数世纪以来，国王第一次被迫承认一个新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而从前这种由民选代表组成的权力机构是不被承认的。君主制走到了尽头。

路易十六感到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在凡尔赛布置了由外籍雇佣军组成的军团。议会则要求撤走这些军队，路易十六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将内

克尔解职，而让以专横而著称的布洛格利（Broglie）元帅去接替他。

但是议会的捍卫者也不是省油的灯。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与一批人四处对群众发表演讲，号召他们起来捍卫自由。他们敲响警钟，组织起12000人的民兵，并从荣军院夺来步枪和大炮，7月14日，他们指挥武装人员向巴士底狱进发。这座堡垒几乎没有设防，几个小时后便被攻陷。人们从中找到7位囚犯，其中1人是疯子，4人是造假犯。

巴士底狱关押过很多的专制受害者，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绝对君主制的象征，但是摧毁它的民众并没有受过巴士底狱的伤害。那里几乎只关押过贵族。

攻占这座堡垒所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如朗博证实“攻占巴士底狱不但在法国历史上，甚而在全欧洲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它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大言不惭。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却是独一无二的，它第一次证实了一个从前令人生畏的威权是多么不堪一击。

威权原则一旦在人民的心中受到损坏，它很快便会分崩离析。对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主要堡垒免遭群众攻占的国王，人们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向他提呢？被人视作无所不能的国王就这样掉下了神坛。

攻占巴士底狱还引发了一起精神传染事件，这样的精神传染事件在大革命历史中比比皆是。外国雇佣军团尽管对巴士底狱事件不大感兴趣，但受其影响，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哗变的迹象。路易十六迫不得已将这些雇佣军团解散。他重新启用了内克尔，并亲自来到了巴黎市政厅，当面承认了既定的事实，接着便从国民自卫队司令拉法叶特

（Lafayette）手中接过蓝、白、红三色帽徽。代表着巴黎市的蓝、红和代表着国王的白连成一体。

这场攻占巴士底狱的骚乱即便称不上是“历史上的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它也标志着民众政府的开始。武装起来的人民自此以后便介入革命议会的讨论当中，并对议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人民的介入符合人民主权教义，这受到了大革命历史学家们由衷的赞誉。一份关于大众心理学的浅显易懂的研究向历史学家们指出，他们称为人民的这个神秘的整体，其实就是几个领袖在做主。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冲击杜伊勒里宫，强闯国民公会等，不过就是几个领袖——通常是通过俱乐部——联系上大批民众并发动他们去攻占、去冲击而已。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同样的一群人，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或攻击或保卫势不两立的政党，这群人从没有自己的思考，唯领袖马首是瞻。

榜样是最高效的一种心理暗示方式，攻占巴士底狱后，必然会有一大批的堡垒遭到摧毁。很多的城堡被视作小巴士底狱，为了效仿摧毁它的巴黎人民，农民们也开始焚毁各地的城堡。由于这些领主的住宅是用封建杂税盖起来的，所以农民们焚毁城堡的情绪更加激昂。活脱脱的一种扎克雷（Jacquerie）起义[1]。

制宪议会像随后所有其他革命议会一样，对国王傲慢自大，对民众唯唯诺诺。

为了终结混乱的局面，8月4日夜，根据一位贵族代表诺阿耶（Noaille）子爵的提议，制宪议会通过了废除封建领主权利法案。尽管这个措施一举废除了贵族们的特权，但该法案还是在热泪盈眶、相互拥抱中得以表决通过。这样的热情迸发可用情感传染来加以圆满解释，因为我们知道，情感在民众中尤其是在因恐惧而不能自拔的议会中是可以传染的。

要是贵族们早几年放弃他们的特权，或许就可以避免发生大革命，他们放弃得太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只会促使人们提出更多的要求。在政治上，应当要有远见，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路易十六在犹豫了两个月之后，批准了制宪议会8月4日夜里通过的决议案，并躲到了凡尔赛。领袖们向那儿派遣了一支七八千人的群众队伍，其中有男有女，因为领袖们向他们承诺说王室住所内有大量的面包供应。宫殿的围栏被推倒，一些侍卫被杀，国王及其家人在一干民众的叫嚣中被带回了巴黎，民众的长矛上还挂着被杀的士兵的头颅。这次恐怖的旅途长达6个小时。这些事件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民众的权力日渐强大，而国王，一如议会，则慢慢落入民众的掌控之中，也即落入俱乐部及其领袖们的掌控之中。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民众的权力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大革命也几乎成了其唯一的事业。议会宣称人民是唯一的主人，但议会还是被大大出乎理论预见的骚乱所困扰。于是议会便设想制定一部宪法来恢复秩序、确保人民的永久幸福。

人们知道，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议会的一个主要任务便是制定、否定、再制定宪法。理论家们赋予宪法以改造社会的权力，如今也一样。议会不能辱没自己的使命。于是它在大革命期间颁布了《人权宣言》，并将革命原则落实到其中。

宪法、申明、宣言以及演讲对群众运动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议会内部的分歧日渐扩大。在俱乐部的支持下，激进党派日渐崛起，议会处境越发艰难。一些有影响力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稍后还有马拉、埃贝尔等人，在演讲中、在报纸上极力煽动平民，由此，人们很快便走入了极端。

在一片混乱中，国家财政没有得到改善。议会终于意识到，靠博爱的说辞是改变不了他们悲惨的现状的，面对即将到来的破产，议会于

1789年11月2日下令没收教会的财产。教会的收入，包括从教徒抽取来的什一税等，约为2亿里弗，其总价值估计为30亿里弗，它们为几百名高级教士、宫廷教士所有，约占法国财富的四分之一。这些财产从此后属于国家，并作为发行“指券”[2]的担保物，第一次发行了4亿里弗的指券。公众开始还接受指券，但到了国民公会和督政府时期，由于指券发行量过大，达到450亿里弗，面值100里弗的指券最后贬值到几个苏[3]。

在身边幕僚的怂恿下，懦弱的路易十六试图以拒绝批准制宪议会的法令来进行反抗，结果当然是徒劳的。

在领袖们日复一日心理暗示的影响下，在精神传染的作用下，革命运动四处蔓延开来，并脱离了议会的掌控，甚至和议会产生了冲突。

在城市，在乡村，在当地国民自卫队的保护下，各地都成立了市镇革命政权。临近的市镇政权开始相互协作，以便在需要时彼此保护，就这样，它们很快便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联盟。联盟之一于1790年7月14日向巴黎派出了14000名自卫队队员，并聚集在战神广场（Champ-de-Mars），万般无奈的国王在此宣誓要坚持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

这种宣誓没有实质意义，君主世袭制原则和议会宣称的原则之间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这点日渐明显。

回天乏力的路易十六只想着逃跑。在瓦雷讷（Varennes）被捕后，路易十六被像罪犯一样带回巴黎并关押在杜伊勒里宫。议会尽管一直是保王党性质的，但还是终止了他的权力，并决定独自担负起政府的职责。

从未有君主经历过像路易十六出逃时那么糟糕的处境。即便像黎塞留那样的天才也难以从中脱身。唯一可以仰仗的自保手段便是军队，但军队自一开始便离他而去。

在制宪议会统治期间，绝大多数的法国人以及议会无疑还是保王派的，若国王接受了自由君主制，或许他还会继续掌权。但路易十六似乎并没有尽力去和议会处理好关系。

肯定是没有尽力。而且连“尽力”二字对他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他同意修改祖上传下来的君主制，那他实在无颜以对列祖列宗。退一步而言，即便他要这么做，来自家族、教士、贵族、宫廷的反对声也会将他淹没。君主制所依赖的古老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他们的势力几乎和国王一样强大，国王每次屈服于议会命令，都是在武力胁迫下的不得已的屈服，而且仅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无计可施深陷绝望中的路易十六决定向外国求援。

他竟异想天开地指望着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对手奥地利出手相助，而王后比之更甚。即便奥地利勉强同意前来搭救国王，那它也只想从中获得丰厚回报罢了。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Mercy）告知路易十六，奥地利要他用阿尔萨斯、阿尔卑斯以及纳瓦拉作为回报。

俱乐部领袖们察觉到议会过于袒护路易十六，于是号召民众反对议会。联名请愿书要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权力组织来审判路易十六。

无论怎样，议会依旧忠于王室。在发现大革命的煽动性越来越过分时，议会决定对平民的袭扰展开反击。在拉法叶特的命令下，国民自卫队的一个营开赴战神广场，以驱散聚集在那里的群众。有五十多名示威者被杀。

议会的微弱抵抗并没有持续多久。非常害怕民众的议会，对国王慢慢强硬起来，国王的特权一天天被剥夺。国王几乎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公务员，只按照别人的意志行事。

议会自认为可以行使从国王那里剥夺来的权力，但这副担子又远远

超出了它的能力。一个过于分散的权力一般都是无力的。米拉波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600人共同行使主权更可怕的事了。"

议会把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并像路易十六一样行使着这些权力，为此它还曾洋洋自得。但很快，它便寸步难行了。

随着议会的权势逐步弱化，无政府开始滋长。民众领袖们不断地煽动民众闹事。暴乱成了唯一管用的权力。

每天，议会都要受到喧闹而蛮横的代表团的冲击，这些人以恐吓和警告为手段来达到目的。

议会出于害怕而一直对所有的群众运动唯唯诺诺，但这些运动根本不是自发的。它们仅仅是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宣示其新权力的方式，这个新权力与议会的权力并驾齐驱。

在这些俱乐部中，最为强大的是雅各宾俱乐部，它在外省已经快速建立起了500多个听命于它的分支。在整个大革命期间，它的势力一直无人企及。在成了议会的主人后，它也就成了法国的主人，它只有一个对手，那就是起义的公社，不过公社的权力只限于巴黎。

国民议会的软弱和失误让它变得不得人心。议会也意识到这一点，且自己的势力一天不如一天，于是决定加紧制定宪法，以便自行解散了事。它的最后一个举动非常愚蠢，即下令任何制宪议会成员都不得参选立法议会。立法议会的成员由此也就没有前辈们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1791年9月3日，宪法大功告成，9月13日，国王同意了该宪法，议会也恢复了国王的权力。

这部宪法要求组建一个代议制政府，规定要将立法权交给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行政权交与国王，并承认国王拥有对议会法令的否决权。

宪法还对省份进行了重新划分，以取代旧时的外省。老的税种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依旧在施行的直接税和间接税。

刚刚改变领土划分并推翻所有旧时的社会组织架构的议会，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去改造法国的宗教组织。它声称要让人民来选举教士阶级的成员，这样就使之摆脱他们的最高领袖教皇的影响。

这部教士公民组织法是诸多一直持续到执政府时期的宗教斗争和迫害的根源。有三分之二的教士拒绝宣誓效忠该法。

在制宪议会当政的三年里，大革命的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成果或许就是特权阶级的财富开始向第三阶级转移。这在激励人们保护利益的同时，也为新体制博得了诸多热情的拥护者。一场革命立足于满足人们的欲望，并由此而获得巨大的力量。

排挤了贵族的第三等级和购买了国家财产的农民们非常清楚，旧制度的复辟将让他们失去这些利益。竭力保卫大革命也就等于保卫自己刚到手的财富。

这也就是在大革命部分时期内，将近一半的省份起义反抗压迫它们的专制但都失败了的原因。共和党人战胜了一切对手。他们非常强大，他们不仅要捍卫一种新理想，还要捍卫物质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贯穿了整个大革命时期，并对帝国的建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

[1] 扎克雷起义，是发生在1358年法国的一次反封建农民起义，是中古时代西欧各国较大的农民起义之一。扎克雷，源自Jacgues Bonhomme，意即“乡下佬”，是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得名。——译注

[2] 1789—1797年期间在法国流通的一种由国家财产担保的证券，后作通货使用。——译注

[3] 苏，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20里弗或1795年后流通的1/20法郎，等于5生丁。——译注

第二章 立法议会心理

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

在探究立法议会的精神特征之前，先简要总结一下那些发生在立法议会为期一年的短暂执政期间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些事件自然也对立法议会的心理表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立法议会不再像之前的制宪议会那样一心想推翻君主制，而是拥护君主政体。国王尽管看起来有点不可靠，但立法议会仍想保留国王。

路易十六如坐针毡，他不停地要求外国势力加以干涉。这位胆怯的君主，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身边仅有自己的瑞士侍卫，他在几股相互对立的势力之间犹豫不决。他向一些报纸提供补贴以便影响舆论。然而这些办报的不明就里的蹩脚记者们完全不懂如何影响公众情绪。他们只会用绞刑来恫吓大革命的拥护者，并扬言会有一支军队前来解救国王。

国王别无依靠只能指望外国王室，贵族们则逃亡国外。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威胁要入侵法国。王室则为入侵创造有利条件。

在各国反法联盟结成之时，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抗击入侵。此时，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成了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号召群众武装起来，六十万志愿者随即获得了武器。王室认可了一个由吉伦特派控制的内阁。在这个内阁的操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向议会提议攻打奥地利。这项决议随即就被表决通过。

对此项决议，国王是言不由衷的。王后向奥地利泄露了法国的战争计划以及内阁会议的机密决议。

战争一开始法方便损失惨重。数个纵队受到突袭，溃不成军。巴黎

市郊的人们在各俱乐部的鼓动下，确切地说，在确信国王与外国王室相互勾结之后，便发动了起义。六月二十日，起义的领导人雅各宾党人——主要是丹东——派起义者给立法议会送来废黜国王的请愿书。随后，这些人进入杜伊勒里宫，痛骂国王。

命运驱使着路易十六走向了不幸。雅各宾党人对王室的威胁激怒了众多省份的民众。人们获悉有一支普鲁士军队已到达洛林地区的边境地带。

国王和王后一直对得到外国支援抱有幻想。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1] 对奥地利人和法国人的心理更是都寄予了完全不切实际的厚望，看到法国被这些狂热分子所威慑，她认为自己也能以威胁的方式来震慑巴黎人民，让他们臣服于王权的威严。在王后的授意下，费森（Fersen）谋划并公布了布伦瑞克公爵（Brunswick）的宣言[2]，宣言以“若王室受到波及，就把巴黎掀翻”一类的话来威胁巴黎人民。

然而事与愿违，该宣言激起了人民对国王的愤怒，国王被认为是入侵者的同谋，因此，他更加不得民心。从这天起，国王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在丹东的安排下，各分区代表在市政厅成立了一个起义公社，逮捕了效忠国王的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让其敲钟召集全体自卫队成员，并派遣这些队员在八月十号和平民一起冲向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六召集起来的军队四下逃窜，保护他的只剩下一些瑞士侍卫和贵族，但全部被杀死。孤立无助的国王向立法议会寻求庇护。人们要求废黜国王，立法议会宣布终止国王的职权，并让未来的议会——国民公会——来决定他的命运。

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质

以心理学而言，由一批新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具有一种特殊的价

值。很少有议会能把政治团体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立法议会由750位议员组成，议员们分为纯粹保王党、立宪保王党、共和派、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其中律师和文人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少数的立宪派教士、高级官员、天主教教士以及个别学者。

立法议会成员们的哲学观似乎都很幼稚。他们大多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主张回归人类的自然状态。他们和其先辈们一样，深受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开口便是加图（Caton）[3]、布鲁图、格拉古（Gracchus）[4]、普鲁塔克、马克·奥勒留（Mac-Aurèle）[5]、柏拉图等人，并对其加以效仿。甚至当演说家想要辱骂路易十六时，都会直呼其为“卡里古拉”。

他们是革命的，因为他们期望颠覆传统，但他们又是极端反动的，因为他们要求回到遥远的过去。理论对他们的行为影响甚微，理性二字虽然不断出现在他们的演讲中，却从未被付诸实践。他们一直受情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所支配，这些因素的力量我们曾一再提及。

立法议会的心理特征与制宪议会的心理特征相同，只是更为明显一些。这些特征被归纳为四个词：敏感、多变、胆怯、脆弱。

多变和敏感体现在他们不断改变的行为中，他们今天可以相互大声辱骂并拳脚相加，第二天却又可以“满含热泪、相互拥抱”。有人发言要求惩罚请愿废黜国王的人，他们便为之热烈鼓掌；同一天有代表团要求废黜国王，他们又出席议会。

在威胁面前，立法议会的胆怯与脆弱一览无遗。尽管立法议会有保王党的倾向，但立法议会还是应巴黎公社的要求，投票同意终止国王的权力并将国王一家拘禁在寺院。

由于立法议会的软弱，它与制宪议会一样，没有行使任何一项权力

的能力，只能听任巴黎公社以及由埃贝尔、塔里安（Tallien）、罗西涅尔（Rossignol）、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领导的俱乐部的摆布。

发动起义的巴黎公社控制着国家主要权力并统治着巴黎，似乎冥冥之中有人要求其这么做，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

巴黎公社要求将路易十六监禁在寺院的塔楼之中，而立法议会则希望将国王软禁在卢森堡宫。巴黎公社把大批嫌疑犯塞进监狱，并随后将他们杀害。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个150人的匪帮，每天佣金24里弗，他们在巴黎公社的指使下，在短短四天内杀害了约1200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九月大屠杀”。巴黎市市长佩蒂翁还热情接待并款待了这个杀人团伙。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发出了零星的抗议，而雅各宾派则选择保持沉默。

一开始，受到威胁的立法议会假装不知道这次大屠杀，但几位有影响力的议员，尤其是库通（Couthon）和比约-瓦雷纳（Billaud-Varenne）对这次大屠杀表示了支持。尽管议会最终决定加以谴责，但却没敢设法制止屠杀的继续。

深知自己无能为力的立法议会在15天后自行解散并让位给国民公会。

立法议会的结局明显是灾难性的，这不是指其初衷而是指其行为的结局。保王党抛弃了君主专制，人道主义者纵容了九月大屠杀，和平主义者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一切表明，一个软弱的政府带给国家的只有毁灭。

前述两个革命议会的历史再次证明，事件之间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个事件就是整个传动链中的一环，一个事件的发生有时可以引发意料

不到的后果。决定权在我们手上，但结局我们却无法把握。

制宪议会最初的举措是理性的、自主的，但随之而来的后果，却让所有的期望、理性以及预言都化为泡影。

路易十六之死、旺代战争、大恐怖、持续的杀戮、无政府状态以及在一名军人的铁腕统治下传统与秩序最终得以恢复，上述事件，在1789年，有谁能想到或能预见到？

在革命议会初期的行为引发的众多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最震撼人心的可能是民众政府的诞生和发展。

从攻占巴士底狱、强闯凡尔赛宫、九月大屠杀、攻击杜伊勒里宫、杀害瑞士守卫、废黜和囚禁国王等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很容易得出民众及其领导者的心理学规律。

现在我们看到，民众的力量是越来越强大，其他力量都甘拜下风并被取代。

---

[1]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帝国公主，生于维也纳，1770年嫁给路易十六成为法国王后。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彻底推翻了君主制。随后，她和国王一起被囚禁在当普尔堡。次年10月，被交付给革命法庭审判，判处死刑，送上断头台，享年38岁。——译注

[2] 布伦瑞克宣言，也称布伦斯威克宣言，是一份由普奥反法联军总司令卡尔·威廉·斐迪南（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Charles William Ferdinand）在1792年7月25日致法国革命战争时期巴黎人民的一份公告。该布告威胁如果任何法国王室的成员受到任何伤害，法国平民将因此受到严厉的报复。这项布告的目的是为了恐吓巴黎人民，却反倒加剧了人民的革命热情。——译注

[3] 古罗马时期有两位加图，一位是老加图（公元前234年－前149年）或监察官加图，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演说家，前195年的执政官，罗马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小加图（公元前95年－前46年），他的曾祖父为老加图。小加图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斯多葛学派的追随者。他与恺撒长期不和，他不受贿、诚实、厌恶当时普遍的

政治腐败。——译注

[4] 一般称为格拉古兄弟，是指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68年－前133年）和盖约·格拉古（公元前154年－前121年）两兄弟，他们是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平民派领袖。他们分别当选公元前133年及公元前123年、公元前122年的保民官，并各自在任期内领导了一场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保守势力，而先后在保民官任上被杀。——译注

[5] 马克·奥勒留（公元121—180年）著名的“帝王哲学家”，古罗马帝国皇帝，在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修辞、哲学、法律、绘画方面受过很好的教育，晚期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沉思录》一书。——译注

第三章 国民公会心理

一、国民公会的传奇

国民公会不但为心理学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而且它还表明，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们，甚至其追随者们，都无法对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及周围的人做出准确的评价。

大革命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人们对这个时代方才形成一些稍微精确的评判，尽管依然疑惑重重。

廓清大革命之所以难以实现，不仅是因为从档案中发掘出了新资料，还因为重重迷雾笼罩下的有关血腥年代的传说正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深深吸引着我们父辈的昔日英雄们被冠以一个光荣的称谓：国民公会巨擘。他们的传奇最为人津津乐道。

国民公会一手镇压国内的叛乱，一手外御欧洲武装干涉，这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这场伟大战争中的英雄们仿佛个个都是泰坦族巨人，而非法国人。

只要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依旧是混沌未解，那么巨擘的称谓也就无可厚非。同时发生的事件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把共和国军队的功劳与国民公会的功劳混淆在一起。军队的荣耀让后者相形见绌，博取荣耀成了大恐怖时期大屠杀、残酷的内战以及让法国遭受劫难的缘由。

在现代犀利的、批判的目光的注视下，这个异质的谜团慢慢地被解开了。共和国的军队依然保持着它的荣耀。但是应当承认，那些全身心投入到内讧中的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对军队的成功毫无建树。在国民议会的某个委员会之中，最多只有两到三个议员关心军队，军队之所以取

得胜利，除了人多势众以及年轻将领们的聪明才智外，还因为有一种新的信仰激发起了军队的热情。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专门讲述革命军队，还将指出革命军队战胜欧洲武装干涉的缘由。在自由和平等理念熏陶下的军队，将这些理念当成了新的福音书。他们带着这些理念开赴前线并长期坚持在前线。他们保留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精神与起初受到军队忽视而后受到鄙视的政府精神有着天壤之别。

国民公会议员对军队的胜利感到茫然，他们只满足于根据领袖的指令盲目地立法，因为领袖声言要通过断头台让法国得以绝处逢生。

正是由于骁勇善战的军队，才使得国民公会的历史声誉如日中天，如宗教般神圣，让几代人为之膜拜，至今不绝。

但只要仔细琢磨一下国民公会“巨擘们”的心理，他们的神圣形象便会瞬间崩塌。他们都是些极端平庸的人，连为其辩护的热心人如奥拉尔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奥拉尔先生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样说道：

> 人们曾说过，1789年至1799年的这一代人，完成了如此伟大的或恐怖的创举，不愧是伟大的一代，简而言之，他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人。但这是历史回顾的一种错觉。构成这一代人的公民，他们要么是市民，要么是雅各宾党人，要么便是民族主义分子。大革命便是由他们发起的，但无论从开明程度还是从智力水平来看，他们似乎并不比路易十五或路易·菲利普执政时期的法国人更高一筹。之所以他们能够名垂青史，这是因为他们身处在巴黎这个大舞台，或因为他们是革命议会中最杰出的演说家，难道他们有过人的禀赋？米拉波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天才，但是诸如罗伯斯庇尔、丹东、维尼奥等人，他们真的比现今的演说家们更有智慧吗？在1793年，也就是在这个所谓巨擘辈出的时代，罗兰夫人（Roland）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法兰西就像是一个人才枯竭的国度；令人吃惊的是，纵观大革命，人们几乎只见一群侏儒，不见伟人。

在对国会议员逐个分析并从整体上加以审视后，人们可以说，从智慧、品行和勇气来看，这些国会议员都称不上是杰出的。从未见过有哪个群体是如此怯懦。他们只在演说中才慷慨激昂，只在针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危险时才勇气十足。这个只会在言语上咄咄逼人的国民公会，一旦面对国王，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温顺的政治集团。他们在巴黎公社、在俱乐部的命令前卑躬屈膝，在每天冲击议会的民众代表前瑟瑟发抖，在骚乱者的指示前唯唯诺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最杰出的议员。国民公会给世人留下一个令人失望的形象：遵从民众的指令，表决通过荒唐透顶的法律，一旦议会大厅中的骚乱平息，便又将通过的法令加以废止。

很少有哪个议会表现得如此脆弱。人们若要想看看一个政府会颓废到何种程度，只要翻开国民公会的历史便可知晓。

二、雅各宾宗教胜利的影响

在造成国民公会特殊面貌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革命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成了强制性的规定。从中，革命教义也逐步成形并得以最终确立。

这种教义是个大杂烩，其中掺杂有自然、人权、自由、平等，社会契约、对暴君的仇恨以及人民主权，但对它的信徒们而言，这些东西俨然就是不容亵渎的福音书中的一个个章节。

这类新的真理不乏拥护者，他们对这些真理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和各年代的信教者一样，也试图借助武力来向世人推销他们的真理。对于持不同意见者，只须将其消灭即可。

我们在谈论宗教改革时曾提到，对异教徒的仇恨是那些伟大信仰的一个不可磨灭的特征，这个特征为雅各宾宗教的不宽容性提供了绝好的注解。

这段与宗教改革相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相似的信仰，它们之间的斗争仍是十分激烈的。因此，在国民公会中，雅各宾派暴打与其信仰稍有不同的共和党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使徒们非常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信仰。为了教化外省人，他们不但向外省派出了满腔热情的门徒，还让其随身携带着断头铡，他们就像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们一样，对于异教徒的错误绝不姑息，因为罗伯斯庇尔坚信“共和国的建立靠的就是摧毁一切对立面”。国家不愿意被重塑并不要紧，人们可以强行重塑它。卡里耶保证说：“如果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来重塑法国，那还不如将其埋葬。”

源自新教义的雅各宾派的政治很简单，即主张平均的社会主义，施行专政统治，容不得任何反对的声音。

对于人类的本质和经济的需求，治理法国的理论家们却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他们只要有断头台和演讲就够了。不过他们的演讲却很幼稚。

泰纳说：“演讲中没有事实，只有抽象的概念，只有关于自然、理性、人民、专制君主、自由等一连串的看法，这些看法如同吹足气的气球，在空中做无谓的碰撞。当然，如果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而可怕的后果，这些也不过是一种逻辑的游戏、学校的习题、学术的炫耀以及一堆空洞的学说。”

雅各宾派的理论实际上只剩下绝对专制。很显然，在雅各宾党人看来，地位和财富均等的公民们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主权国家。

他们赋予自己的权力要比之前的君主大得多。他们限定商品的价格，并且冒称拥有剥夺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

他们对革命信仰的重塑功能深信不疑，因此在向国王宣战之后，他

们又开始向神明宣战。他们推行新的历法，将圣人的名字从中除去，他们树立起一个新的圣灵：理性。有关理性的庆典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庆典仪式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无异，理性被供奉在“献给圣母玛利亚”的祭坛上。这种仪式一直持续到罗伯斯庇尔以一种个人宗教取而代之为止，罗伯斯庇尔自认为该教的大主教。

雅各宾党人在成为法国唯一的主人之后，便可以与其信徒们肆意洗劫了，尽管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是少数派。

我们难以确定他们的具体人数，但知道他们其实人数不多。泰纳估计在七十万的巴黎居民当中，只有五千雅各宾党人，而在三万贝桑松居民当中，约有三千雅各宾党人。而整个法国则有三十万雅各宾党人。

对此，泰纳解释说：“一小群封建强盗盘踞在被征服了的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有限，却有实力支配着法国。这首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赋予他们以惊人的力量；其次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政府，且几个世纪以来，法国人已经养成了服从命令的习惯；最后是因为人们认为若推翻他们，将会导致旧制度的复辟，这让许多拥有国家财产的人感到害怕。只有当其专制变得可怖时，才会有众多省份揭竿而起。

上述雅各宾党人的权力动因中的第一个动因十分重要，在强势信仰与弱势信仰的争斗中，成功永远属于前者。强势信仰会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并一举盖过了薄弱的意志。雅各宾派之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是因为他们的累累暴行迫使成千上万的薄弱意志团结在一起，并从整体上实现了反超并战胜了强烈意志。

被雅各宾派残酷迫害的吉伦特派，诚然也有着坚定的信仰。但在吉伦特派发起的斗争中，他们反受他们所受教育的拖累，他们对某些传统、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给他们的对手造成任何麻烦。

埃米尔·奥利维耶写道："吉伦特派的大部分人情感细腻而宽厚；而雅各宾派则是下流、粗俗而残忍。维尼奥的声名与'神明的'马拉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口才征服了国会的吉伦特派，很快便又败在了思考少、行动多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下层群众热情的山岳派狂热分子的手下。国民公会给人的印象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点

每一个议会除了具备一般议会都有的普遍特征外，还会因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特殊的面貌。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所具备的特点，大多可以在国民公会中看到。

国民公会由大约750名议员组成，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曾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履过职。雅各宾派通过威胁选民的方式赢得了选举，而大部分选民（800万中有700万）都选择了弃权。

由于职业的缘故，国民公会汇集了大量的法律人才，如律师、公证人、庶务人员、退休的官员，还有一些文人。

国民公会的精神并不是统一的，这意味着一个由诸多不同特质的个人组成的议会很容易分裂成为不同的小团体。国会很快就分成了三个群体：吉伦特派、山岳派和平原派，而君主立宪派已基本消失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是两个极端派别，每个派都有100多个成员，并先后成为领袖派。山岳派中不乏一些最激进的成员，如库通、埃罗·德·塞舌尔（Hérault de Séchelles）、丹东、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1]、马拉、科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比约-瓦雷纳、巴拉斯（Barras）、圣茹斯特、富歇（Fouché）、塔里安（Tallien）、卡里耶、罗伯斯庇尔等人，吉伦特派则包括布里索

（Brissot）、佩蒂昂（Pétion）、孔多塞、维尼奥（Vergniaud）等人。

而国民公会中剩下的500多人，也就是最大的一部分，组成了所谓平原派。

平原派人数众多，但他们随大流、没主见、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他们凭性子办事，并且容易被转瞬即逝的激情所感染。他们听命于前两个派别中较有力的一方。在对吉伦特派唯命是从之后，又开始对获胜的山岳派俯首帖耳。这就是我们之前表述过的“弱者总是会服从强者的意志”这一法则的必然结果。

在国民公会整个的存续期间，这些伟大的操纵者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影响力。国民公会一直被一群思想狭隘的暴力的少数派所把持着，因为强烈的信念给这些少数派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一个残忍蛮横的少数党往往能带领胆小的且犹豫不决的多数党，这也是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注定会走向极端的原因。国民公会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在另一个章节里探究过的加速度规律。

因此，国民公会的成员们必然会从中庸一步步地走向暴力，并最终发展成为相互残杀。在最先控制国民公会的180位吉伦特派人士中，有140位被杀或者是逃亡，最终，最狂热的恐怖分子罗伯斯庇尔仅一人便控制住了那些温顺而胆小的议员。

在平原派的500名代表当中，虽然大部分人缺乏主见，惯于见风使舵，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识之士。承担国民公会实用工作的技术委员会便从中招募到不少人才。

平原派的代表对政治相当漠然，他们也要求别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的全部心思放在委员会上，几乎不去议会，这也是国民公会的会议通常只有近三分之一的议员们出席的原因。

不幸的是，长此以往，这些聪明、诚实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个性，他们在恐惧的支配下，不得不投票支持暴戾的主子们提出的最糟糕的动议。

平原派投票赞同别人要求他们赞同的一切：设立革命法庭、实行大恐怖等。也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山岳派才得以打败吉伦特派，罗伯斯庇尔才得以清洗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弱者跟随强者，平原派也一样。平原派的那些温和的慈善家们，虽是议会的多数派，但由于他们的懦弱，导致国民公会做出大量恐怖的暴行。

在国民公会中有一个突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是极度的恐惧。正是因为恐惧，他们才自相残杀，以求得一线希望来保全自己。

这样的恐惧其实很容易理解，这群可怜的人坐在议员席上，在一片嘲笑和喊叫声中议事。由于随时都会有带着长矛的粗鄙之徒闯进议会，所以大部分的议会成员都不敢再参加会议。即便偶尔来参会，也是一言不发，并根据人数只有他们三分之一的山岳派的要求去投票。

支配着平原派的这种恐惧，虽然不太明显，但却十分地深。他们清除异己，不仅是因为狭隘和狂热，还因为坚信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就连革命法庭的法官们也在瑟瑟发抖，他们想要无罪释放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的遗孀以及其他一些人，但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在罗伯斯庇尔成为唯一的主宰后，弥漫在议会中的恐惧感有增无减。有人说罗伯斯庇尔的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其同僚因恐惧而消瘦下去，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在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因畏惧而苍白或因绝望而自暴自弃”。

所有的人都害怕罗伯斯庇尔，而罗伯斯庇尔也害怕所有的人。因为害怕别人谋反，他砍掉了别人的脑袋，而同样也因为恐惧，别人默许了

他这样的行为。

国民公会议员们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段可怕而黑暗的时期做了详细回顾。泰勒说，巴雷尔（Barrère）在沉寂了二十年之后，对救国委员会[2]的真正目的及其内在的出发点做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这便是自我保护，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便是要生存，因为我们人人自危。人们把他人送上断头台上，只是为了自己不被他人送上断头台。”

若要探讨领袖的作用以及恐惧对议会的作用，那么，国民公会的历史无疑是最具震撼力的例子之一。

---

[1] 卡米尔·德穆兰（1760年－1794）是一位法国记者、政治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译注

[2] 救国委员会，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最高领导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译注

第四章 国民公会政府

一、国民公会期间的巴黎公社及俱乐部的作用

在国民公会整个存续期间，国民公会一直由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领袖们领导。

我们已经指出它们对之前的议会的影响力。在国民公会期间，它们的影响力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国民公会的历史其实就是支配它的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历史。它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公会还控制着法国。众多外省的小俱乐部，在首都俱乐部的领导下监督行政官员、检举可疑分子并执行一切革命命令。

一旦俱乐部和巴黎公社决定采取某些措施，它们便要求议会立即付诸表决通过。如果议会抵制，它们便向议会派遣它们的代表团，也即派出它们从社会最底层挑选出来的武装团伙。这些团伙传达的命令总是能得到遵从。巴黎公社如此强势，以至于它可以要求国民公会立即赶走它不喜欢的代表。

国民公会的成员一般都受过教育，而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店主、小工、工人，他们没有个人的观点，他们只听从他们的领袖如丹东、卡米尔·德穆兰、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指挥。

在俱乐部和巴黎公社起义者这两股势力中，巴黎公社在巴黎尤为活跃，因为它组建了一支革命军。下设的48个国民自卫队委员会全部由巴黎公社指挥，巴黎公社指挥它们去杀人、屠杀，特别是洗劫。

国民公会在巴黎的行动比较过火。例如，它委派一个叫作夏朗冬（Chalandon）的鞋匠负责对巴黎的某个区域进行监控，即他有权将所有他怀疑的人送交革命法庭，也即意味着可以将人送上断头台。某些路段的人口因为他而锐减。

国民公会起初还与巴黎公社做了点抗争，但这种抵抗并未持续多久。冲突的高潮出现在国民公会打算逮捕巴黎公社的首脑人物埃贝尔时。巴黎公社于是派出武装团伙前往国民公会进行威胁，要求其驱逐提出此项动议的吉伦特派代表。遭到拒绝后，巴黎公社于1793年6月2日根据昂里约（Henriot）的命令派兵包围了国民公会。受到恫吓的议会于是开除了27名议员。可笑的是，巴黎公社旋即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对公会的顺从表示祝贺。

在吉伦特派倒台之后，国民公会完全倒向了巴黎公社，对其唯命是从，巴黎公社也变得无所不能。巴黎公社甚至还要求议会在同意设立法庭和断头台之后，再下令招募一支革命军队，以负责在全法国范围内逮捕、处决嫌疑犯。

到了国民公会末期，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国民公会才得以从巴黎公社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国民公会取缔了巴黎公社以及俱乐部，并处决了其中的一些首要分子。

尽管采取了惩戒措施，但其领导者仍然继续召集下层民众，并且煽动他们去攻击国民公会。在芽月和牧月[1]，国民公会受到了围攻，这些武装代表团甚至还要求投票重建巴黎公社并召开新一届的议会，并最终如愿以偿。在起义者撤离后，国民公会则赶紧废除了这些措施。羞愤交加的国民公会召集军队解除了市郊的武装，逮捕了将近一万人。起义军中的26个头目被处死，参与起义的6个议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但是，国民公会的反抗意志依旧是昙花一现，它在脱离了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操控之后，又对救国委员会唯命是从，后者的指令不经讨论即可由国民公会投票通过。

威廉斯（H.Williams）写道：“国民公会完全可以把任何一位欧洲君主或国王五花大绑地押送至自己面前，但它自己却被一小撮唯利是图者

囚禁在自己的议事厅中。”

二、国民公会期间的法国政府：恐怖时代

1792年9月，国民公会一召开便立即颁布法令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尽管此时大部分议员仍犹豫不决，因为外省还都是保王党分子的天下。

国民公会深信这样做可以让法兰西走向文明。国民公会创立了新的纪元和历法，新纪元的元年标志着理性统治世界的开始。应巴黎公社的要求，新纪元的元年在对路易十六的审判中拉开帷幕，不过大部分国民公会议员并不情愿这样做。

实际上，一开始控制国民公会的是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公会主席和秘书都是从最知名的吉伦特派人物中选出来的。而后来成为国民公会绝对主宰的罗伯斯庇尔此时还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在主席选举中只获得了6票，而佩蒂昂却获得了235票。

山岳派起初的势力极小，他们只是后来才掌权的，而此时，温和派在国民公会中已没有了任何席位。

尽管山岳派只是少数党，但他们仍找到了办法迫使议会对路易十六提起审判。这次审判既是山岳派对吉伦特派的一大胜利，也是对所有国王的一次判决，更意味着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

为了促成这次审判，山岳派采用的手段可谓老道异常，如鼓动外省向国民公会递交审判路易十六的请愿书，让起义的巴黎公社向议会派出代表团以提请审判路易十六等。

和其他胆小怕事、言不由衷的革命议会一样，国民公会并不敢反抗，它同意了这场审判。

私下里本不希望处死国王的吉伦特派，一旦开会表决，却由于恐惧而投了赞成票，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路易十六的堂兄奥尔良公爵也投了赞成票。1793年1月21号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如果路易十六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将会看到，抛弃了他的懦弱的吉伦特派成员，大多步其后尘一个接一个走上了不归路。

仅从纯功利的角度来看，处死国王是大革命的一个败笔，它引爆了内战并促使欧洲对法兰西进行武装干涉，而国王之死在国民公会内部也引起了内讧，并以山岳派胜利、吉伦特派遭清洗而告终。

山岳派主张采取的措施变得越发专制，导致包括西部和南部在内的60个省份发生暴乱。如果不是保王党人参与其中而让人害怕旧制复辟的话，这场由被放逐的国民公会议员领头的起义说不定就会成功。实际也是如此，如在土伦，起义者便已经在高呼路易十六的名字了。

在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场猛烈的国内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十分残酷。老人、妇女、儿童都未能幸免。村庄和粮食被付之一炬，据估计，仅在旺代地区被杀的人数就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

国内战争未了，国际战争又来。为了解决这内忧外患的局面，雅各宾派打算制定一部新宪法。在法国，所有的革命议会都有这么一个传统信仰：规范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这种言辞上的信念从未因实践的失败而发生过动摇。

对大革命大加赞赏的朗博先生写道：“一种强有力的信仰支撑着国民公会不辞辛苦地进行立法，因为它坚信，只要将大革命的原则变成法律，它的敌人就会迷茫甚而会归顺自己，而正义的到来会促使起义者缴械投降。”

国民公会在执政期间拟定了两部宪法，一部是1793年宪法或称元年

宪法，一部是1795年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第一部宪法并未付诸实施，因为一个绝对的独裁统治很快便取而代之，而第二部则是由督政府制定的。

国民公会中有大量的法学家和商界人士，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政府职能不是一个人员冗杂的议会能够行使的，于是他们将国民公会分成一些小的独立委员会，如商业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农业委员会、艺术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向议会所递交的法案，议会常常看也不看就投票通过了。

多亏了他们，国民公会的工作才不至于完全是破坏性的。他们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法案：创办重点大学，确立统一度量公制等。正如我们说的那样，大部分的议会议员躲进各个委员会，为的是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从而保住脑袋。

与政治无关的商业委员会，隶属救国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793年4月，有九名成员。救国委员会起初由丹东领导，同年七月改由罗伯斯庇尔领导，随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把持了所有权力，包括对部长和将军发号施令的权力。卡尔诺掌握了军权，康蓬（Cambon）把持了财权，圣茹斯特和科洛·德布瓦负责日常政务。

技术委员会投票通过的法律通常都是有相当的水准，这为国民公会持久的事业奠定了根基，而在闯入议会的代表团的威胁下投票通过的法案则常常是荒唐可笑的。

这些可笑的法案基本与公众利益或国民公会自身利益无关，如1793年9月投票通过的最高限价法令就是这样一个最没意义的法案。该法令要求固定日用品的物价，而这样做除了造成持续的物资短缺以外，并没有其他。诸如此类的还有对圣德尼皇家墓地的破坏，对王后的审判，有组织地纵火焚烧旺代地区，建立革命法庭，等等。

大恐怖是国民公会政府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大恐怖开始于1793年9月，在法国肆虐了10个月，直到罗伯斯庇尔死为止，尽管有些雅各宾党人如丹东、卡米尔·德穆兰、埃罗·德·塞舌尔等人曾提议施行宽大政策，但这项提议的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些提议者被送上了断头台。最终是公众的厌倦终结了这项可耻的制度。

持续不断的党派斗争以及越来越极端的做法，让国民公会中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都相继陨落了，国民公会最终完全落入罗伯斯庇尔之手。

在国民公会糟蹋、蹂躏法兰西之时，法国军队却取得了卓越的战功，它们攻占了莱茵河左岸、比利时和荷兰，《巴塞尔条约》承认了这些占领。

我们已经说过，必须把国民公会的成就与革命军队的成就完全区分开来，我们稍后还要谈到这点。那个时代的人非常清楚这二者间的差别，但如今的人却忽略了。

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统治了三年后终被解散，此时的公会早已声名狼藉。被大众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国民公会，不但没有为法兰西带来和平，反而将其置于无政府的深渊中。瑞典驻法使馆商务专员德林克曼（Drinckmann）男爵在1799年7月的一封信里对国民公会做了精辟的总结：

> 恕我直言，我不希望再有哪个民族像法国那样，在开辟了崭新的自由之路后，却被一群低能而残忍的恶霸所统治。

三、国民公会的结束：督政府时代的开始

国民公会一直对规则的力量深信不疑，在其行将就木之际，它制定了一部宪法，这就是共和国三年宪法，以取代从未付诸实施的1793年宪法。新宪法规定，立法权交由一个250人组成的元老院和一个500人组成的500人院共同行使，行政权交由五名执政官组成的督政府行使，这五

人由500人院提名，元老院任命，且每年选举更换其中一名。

新宪法还特别规定，新一届议会中三分之二的议员应当从前国民公会议员中选举产生。然而这项谨慎的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只有十个省份对雅各宾派是忠诚的。

为了避免保王党当选，国民公会决定流亡者永远不得入境。

这部宪法的公布并没有在公众中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弹压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更是无济于事。最重要的一场起义发生在1795年10月5日，起义军领导向国民公会派出了一支正规军，这直接威胁到了国民公会。面对这样的挑衅，国民公会最终决定进行防卫，它召集了军队，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巴拉斯。

刚刚崭露头角的波拿巴负责这场镇压。在波拿巴的指挥下，镇压进行得迅速有力。在圣洛克（Saint-Roch）教堂旁边，在一通猛烈的扫射之后，起义者四下逃窜，现场留下了几百具尸体。此番坚决的军事行动，让国民公会很不习惯，不仅因为行动进行得干净利落，还因为就在此次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起义者业已派代表前往议会，而国民公会也像往常一样，对其俯首帖耳。

镇压这场暴动成了国民公会的谢幕之举。1795年10月26日，它宣告了自己使命的终结，并让位于督政府。

我们已经强调了国民公会政府带来的某些心理学上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并不能长久支配人的灵魂。

从来没有哪个政府使用如此可怖的手段，尽管有血流不断的断头台，有派往外省的特派员和刽子手，有严刑峻法，但国民公会仍不得不无休止地与骚动、起义、阴谋做斗争。尽管成千上万的头颅落地，但各城市、各省份以及巴黎市郊的暴动仍是此起彼伏。

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国民公会一直在与某些无形的力量做斗争，这种力量驻扎在人们的灵魂中，它不为物质所动。国民公会根本不懂这些无形的动因的力量，还徒劳地与其对抗。最终还是以无形的力量获胜而告终。

---

[1] 指法国共和三年的芽月起义（1795年4月1日）和牧月起义（1795年5月20日）。——译注

第五章 革命暴行

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原因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里指出，革命理论俨然成了一种新的信仰。

本着人道主义与感性主义，革命理论对自由和博爱推崇备至。但人们注意到，革命理论与其他宗教一样，也存在着教义与行动截然相反的矛盾，在实践中，自由得不到任何宽恕，博爱变成了屠杀。

原则与行为的反差源于一切信仰的不宽容性。一种宗教或许以人道主义以及自制精神为追求，但其信徒们却总想以武力将其强加于他人，暴力由此变得不可避免。

大革命中的暴行是传播新教义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宗教裁判所、宗教战争、圣巴托罗谬之夜大屠杀、《南特敕令》的废除、龙骑兵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对冉森教徒的虐待等事件，与大恐怖时代如出一辙，它们有着同样的心理根源。

路易十四其实并不是一个暴君，但在自己信仰的蛊惑下，决定驱除法国几十万新教教徒，其中部分被射杀，大批新教徒被送去做苦役。

信徒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异教徒。路易十四时期的新教徒和冉森教徒并非什么危险分子。不宽容性主要出自于一种精神上的强烈愤慨，即一个掌握不容置疑的真理的人对一个否认该真理的人也即信仰邪恶的人的愤懑。当一个人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消除错误时，又怎能容忍错误的存在呢？

各个时代的信徒们都是这样的想法，路易十四和大恐怖时代的人们也是如此，他们坚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确切无疑的真理，并且认为这种真理的普及会让人类得以重生，因此，他们对待对手又怎能比教会及国

王对待异教徒更为宽容呢？

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的信徒都深信恐怖手段是必须且有效的，宗教法则自有史以来一直都是以恐怖为基础。为了让他人遵守规则，便以布满刑具的永恒的炼狱来恐吓、威胁他人。

雅各宾派信徒们的行事方式与其前辈们如出一辙。相似的事件一再上演，类似的行为也会一再发生。一种新的信仰，比如，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如在未来取得了胜利，它也会采取与宗教裁判所和大恐怖时代同样的传播手段。

若仅把雅各宾派的大恐怖理解成为一次宗教运动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我们注意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总有大量与该宗教无关的个人利益依附在一个获得胜利的宗教信仰的周围。操纵大恐怖的只有几个狂热的信徒，但在其周围，除了几个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热情的皈依者之外，大多数人只是为了自己从中获利。一旦有谁获胜，他们便一窝蜂地追随获胜者，目的是参与分享掠来的成果。

A.索雷尔（Albert Sorel）写道："大革命时期的暴徒们认为只有采用恐怖手段方可保持他们的权力，且别无他法。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保，而事后却说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国家。恐怖在成为一项统治制度之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而将恐怖制度化就是为了将恐怖合法化。"

埃米尔·奥利维耶在关于大革命的书中对大恐怖做了如下的定义："大恐怖其实就是一场'扎克雷'农民起义，一场合法的掠夺，是任何匪帮都自叹弗如的史上最大的盗窃。"对此定义，我们完全表示认同。

二、革命法庭

革命法庭是恐怖行动的主要执行机构。不仅在巴黎，在整个法国到

处遍布着革命法庭，然而仅在一年之后，革命法庭就将它的创立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

泰纳写道："一共有178个革命法庭，其中40个是巡回法庭，可以随时随地宣判死刑，且当场执行。1793年4月16日至共和国二年热月9日期间，巴黎的革命法庭一共处决了2625个人。而外省的法官们和巴黎的法官们一样忙碌，仅在奥朗日（Orange）这座小城，就有331人被处死。在阿拉斯市（Arras），有299个男子和93个妇女被处死……在里昂，革命委员会批准了1684宗死刑判决……据估计，共约17000人被处死，其中1200人为妇女以及一些80岁以上的老人。"

虽然经巴黎革命法庭处决的确切人数为2625个，但不要忘了，还有不计其数的嫌疑犯在9月份就被草率屠杀了。

巴黎革命法庭只是救国委员会一个工具。事实上，革命法庭正如富基耶-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1] 在诉讼中评判的那样"只是执行命令而已"。一开始，革命法庭还会走一些正常的程序如审问、辩护、传证，但最后这些程序都被取消了。只凭道德证据也即纯粹的猜疑就足以给嫌犯定罪。审判长通常只要问被告一个笼统的问题即可。为了提高效率，坦维尔甚至还提议把铡刀搬到法庭中来。

因党派仇恨而被捕的被告人被革命法庭不分青红皂白地送上了断头台。革命法庭很快也落入罗伯斯庇尔的手中，成了他血腥专制的统治工具。当革命法庭的建立者之一丹东成为革命法庭的牺牲品走上断头台时，他才开始向上帝和人们祈求，请其原谅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东西。

在革命法庭面前，任何人都得不到宽恕，智慧如拉瓦锡，温和如德穆兰，高尚如马勒舍布，也都在劫难逃。本雅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惋惜道："如此多的天才，却成了一群最卑鄙、最愚蠢的人的牺牲品。"

雅各宾派建立和控制革命法庭的宗教心理是革命法庭累累罪行的根源。革命法庭在精神和目的上都不比宗教裁判所逊色。借革命法庭大肆杀戮的人如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等，都自认为是救世主，因为他们在清除那些妨碍世界重获新生的、对信仰不忠的敌人。

恐怖时代的处决对象并不仅仅是贵族阶级和神职人员，还有将近4000名农民和3000工人被处决。

如今目睹一场死刑的执行，我们都心有戚戚焉，而同时处死如此多的人，对情感的震动可想而知。不过，那时的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母亲带着孩子去看行刑，就像带着孩子看木偶戏一样。

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杀头场景让人对死亡变得麻木不仁，在断头台上，人人都镇定自若，吉伦特党人在登断头台时还高唱着马赛曲。

对于法律和习惯的屈从让人的情感迅即变得迟钝，保王党人每天都在发动起义，断头台已经不再让人害怕。一切照常进行，仿佛大恐怖已吓不倒任何人。大恐怖只有准备实施而未实施时，它才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手段，真正的恐怖在于震慑而非实施。

三、恐怖时代的外省

革命法庭在外省实施的极刑只是大恐怖时期大屠杀中的一部分。革命军队是由流浪汉和土匪组成的。他们在整个法国掠夺和屠杀，泰纳对他们的行为作了记述。

“在贝督因（Bédouin），一个有着2000人口的城市，一些陌生人砍倒了自由之树，433所房屋被毁坏或烧毁。16个人被砍头，47个被射杀。其他居民被全部驱逐，为了活命，他们山里流浪，靠在地上挖洞来遮风挡雨。”

被送上革命法庭的可怜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公正审判的假象

很快被揭穿。在南特，卡里耶根据他的臆想便淹死、枪毙、射杀了将近50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

在热月政变之后，这些屠杀的细节刊载于《箴言报》（Moniteur）上，我摘录部分如下：

> 托马斯（Thomas）说："在诺瓦木提埃（Noirmoutier）被攻占之后，我看见很多男人、女人、老人被活活烧死……妇女、十四五岁的女孩子遭强奸后被杀，幼小的孩子被刺刀挑起后扔到地上，而孩子的母亲就在一旁。"（1794年12月21日《箴言报》报道）

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位叫作朱利安（Julien）先生的证词，讲述卡里耶是如何逼迫受害者们挖坑将自己活埋的。在1794年10月15日的《箴言报》上有梅兰·德·蒂翁维尔（Merlin de Thionville）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命运号"船长接到命令，要求其将41个受害者带至海中淹死。"在这些受害者中有一个78岁的失明老人，12个女人，12个女孩，15个儿童，其中有10个人在6到10岁之间，5个还在吃奶。"

在对卡里耶的宣判中（1794年12月30日《箴言报》报道），他被指控"曾下令淹死和射杀妇女和儿童，并且要求阿克苏（Haxo）将军杀光旺代所有的居民，烧毁他们的住处"。

像所有的刽子手一样，卡里耶从虐待受害者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说："在外省追杀牧师时，每每看到他们临死前的扭曲面容，我就会乐开了花，我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审判卡里耶是为了给热月政变者们一个交代。发生在南特的大屠杀一幕在其他城市中一再上演，富歇在里昂处死了2000人，而土伦也有大量的人被杀，该市人口在几个月内便从29000锐减至7000。

应该要为卡里耶、弗雷隆（Fréron）、富歇等所有这些可怖的家伙说句公道话：他们是在救国委员会不断的怂恿下这么做的。卡里耶在对

他的审判中道破了天机：

> 我承认，每天要射杀150个到200个嫌犯，但这是委员会的命令。我曾告知国民公会击毙了上百个恶棍，国民公会对此表示赞许并要求将此事写入公报。如今严词责罚我的议员们，他们当时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在鼓掌叫好。他们为何让我继续执行任务呢？在他们眼中，当时我是祖国的救星，但如今却成了一个嗜血之人。（1794年12月24日《箴言报》报道）

不幸的是，就在他向人们道出实情时，卡里耶并不知道国民公会被掌控在七八个人手中，而处在惊惧中的国民公会对这几个人更是言听计从。面对卡里耶的辩白，人们无言以对。他肯定是要被杀头的，但是整个国民公会也应当陪着他一起杀头，因为它同意了卡里耶的暴行。

卡里耶的辩白在救国委员会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执行任务的代表们的确是在不断的怂恿下行事的。卡里耶一事表明，大恐怖时期的暴行是一种机制的综合产物，而绝非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仅是个人自发的行为。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并不满足于对人的毁灭，人们还要摧毁物质。真正的信徒历来都是无视传统的人，一旦大权力在握，便会全力以赴去消灭自己信仰的敌人，摧毁让人忆起旧信仰的画像、庙宇、象征物。

我们知道狄奥多西（Théodose）皇帝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毁了矗立在尼罗河畔6000年的大部分寺庙。因此，当我们看到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气撒在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上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些都是可恶的过去的遗腹子。

雕像、手稿、彩绘玻璃窗以及金银器都被砸得稀巴烂。在富歇这位未来拿破仑时代的奥特郎托（Otrante）公爵、路易十八时代的阁员，作为国民公会的特派员被派往涅夫勒（Nievre）之后，便下令拆毁城堡的塔楼以及教堂的钟楼，因为他们“有损平等”。

在大革命对文物的破坏行动中，连坟墓也不能幸免。在巴雷尔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报告之后，气势恢宏的圣德尼皇家墓室，其中包括亨利二世令人叹为观止的陵墓，随即便被日耳曼·皮隆（Germain Pilon）完全捣毁，棺椁被掏空，蒂雷纳（Turenne）[2]的尸体被送到博物馆展览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牙齿被看守拔出来卖掉。亨利四世的髭须被拔光。

目睹这些有识之士竟然也赞同毁坏法国的文化遗产，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但也不能苛求他们，我们应当记住，强烈的信仰是这万恶之源，连国民公会也由于不堪忍受日日不断的袭扰而不得屈服于大众的意志。

有关破坏的凄惨记述，不仅表现了盲信的力量，同时也表现了摆脱了社会束缚的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国家在他们手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

[1] 富基耶—坦维尔（1746—1795），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译注

[2] 蒂雷纳（1611—1675），又译为杜伦尼，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著名元帅。——译注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一、革命议会和军队

如果不做全面的了解，那么革命议会尤其是国民议会只会给人留下软弱、暴力、内讧不断这么一个极为灰暗的印象。

但是，即使在它们的敌人看来，这个血腥的时期也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军事上的成功为其带来的。事实上，在国民公会解散时，法国已将比利时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将疆域扩展至莱茵河左岸。

如把国民公会看作一个集体，那么将法国军队的胜利归功于这个集体是公允的。如把这个集体加以分解并逐一研究其中的组成要素，那么各要素的独立性就显而易见了。人们注意到，在军事行动中，实际上国民公会的作用不大。前线的军队和巴黎的革命议会，二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极少，且思维差距甚大。

我们看到的国民公会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它在公众的推动下，朝令夕改，是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典型。它什么也领导不了，反倒总是被人使唤，它怎么能够指挥军队呢？

由于深陷内部争端之中，无暇他顾，于是议会将所有的军事问题都交给了一个由卡尔诺一手掌控的特殊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真正的任务是负责供应食物和弹药。卡尔诺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指挥752000人的法国军队驻守有战略意义的要点，还在于他安排将军发动进攻并严肃军纪。

国民公会参与国防的唯一举动便是颁布征兵令。当然，大敌当前，任何一个政府都得这么做。除此之外，有一段时间议会还向军队派遣代表，以负责处决某些将军，但是议会很快便放弃了这种做法。

事实上，议会参与国防的力度一直都非常小。幸亏军队人数多、热情高以及年轻将领灵活的战术，军队才得以成功地独自应对一切事情。军队在没有国民公会参与且完全独立于国民公会之外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二、欧洲对大革命的镇压

在列举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因素之前，先来简短回顾一下欧洲镇压法国大革命战争的来龙去脉。

在大革命之初，国外的君主们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来看待处在焦头烂额中的法国君主制，因为法国一直被他们视为强大的对手。普鲁士国王认为受到严重削弱的法国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建议奥地利国王帮助路易十六，条件是以佛兰德（Flandre）和阿尔萨斯作为补偿。1792年2月，这两位君主签订了一项反法联盟条约。在吉伦特派的影响下，法国先发制人对奥地利宣战。

法国军队开局不利，多次战败。反法盟军一直推进到香槟省，此地距巴黎不过200公里之遥。在迪穆里埃（Dumouriez）将军的带领下，法军取得了瓦尔米（Valmy）战役的胜利，并迫使盟军撤退。

虽然在这场战役中只有300名法国士兵和200名普鲁士士兵阵亡，但这场战役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年轻的革命军队成功地迫使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后撤，这为革命军队挣得了勇猛的好名声，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们四处出击。参加瓦尔米战役的法国士兵们将奥地利人赶出比利时，在那里，法国士兵们还被当成解放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国民公会统治期间，战争的规模巨大。1793年年初，议会宣布将比利时并入法国，结果爆发了一场与英国长达20年的战争。

1793年4月，英国、普鲁士、奥地利的代表们齐聚安特卫普，并就

肢解法国达成协议。普鲁士人想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奥地利人要占领佛兰德和阿图瓦，英国人想吞并敦刻尔克。奥地利大使建议用“消灭整个法国领导层”的恐怖手段来粉碎大革命。面对这类的申明，法国要么战而胜之，要么坐以待毙。

为了对抗1793～1797年期间的第一次反法联盟，法国不得不四面作战，战线从比利牛斯山脉一直延伸到北部地区。

开始，法国失去了一些占领地，遭受了几次失利。西班牙人占领了佩皮尼昂（Perpignan）和巴约讷（Bayonne），英国人占领了土伦（Toulon），奥地利人占领了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到了1793年年底，国民公会宣布在所有18～40岁的法国男性中大规模征兵，大约有750000名男性被组成九个纵队派往边境战场，前皇家军队也被合并到志愿军以及新征军队中。

儒尔当（Jourdan）击退了盟军，取得了瓦蒂尼（Wattignies）胜利，莫伯日（Meubeuge）要塞得以解围。奥什（Hoche）夺回了洛林。法国采取了攻势，收复了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左岸的失地。儒尔当在弗勒留斯大败奥地利人并将其赶回了莱茵河，同时还占领了德国的科隆和科布伦茨（Coblentz）。

法军还占领了荷兰。反法联盟的君主们不得不求和并承认法国的占领。

法军的胜利与敌人没有全力以赴有关。因为在1793～1795年期间，盟军正忙于瓜分波兰。每个国家都一心想着如何多瓜分一些。这也是普鲁士国王在瓦尔米战役失利后选择撤退的动机。

反法盟军的犹豫和互相猜疑对法军而言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1793年夏，如果奥地利人直扑巴黎，那法国就会像蒂耶博（Thiébault）

将军所说的“百分之一万的失败”。正是奥地利人为法国赢得了培养士兵、军官和将军的时间，奥地利人救了法国。

在《巴塞尔条约》签订之后，在欧洲大陆上除了奥地利人以外，法国已不再有劲敌。督政府对奥地利和控制着米兰的意大利发起了进攻。波拿巴负责这场战役。从1796年4月到1797年4月，在经过一年的对抗之后，波拿巴迫使法国最后的敌人主动求和。

三、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心理及军事因素

在决定革命军队成败的因素中，一定少不了那些有着忘我牺牲精神的士兵们，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时常赤脚，但他们依旧热情非凡、坚韧不拔，因为他们在革命原则的熏陶下，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播新信仰、创造新世界的使命。

大革命时期军队的历史让人想到阿拉伯游牧民族的历史。在穆罕默德的理想的感召下，这些游牧部落化身成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并迅速占领了古罗马帝国的部分地区。如今，一种类似的信仰赋予共和国的士兵们一种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在国民公会难以为继并让位给督政府时，共和国的军队已经解放了全国，同时还将入侵战争回敬给了敌人。在这一时期，只有这些士兵才是法国真正的共和主义者。

信仰会传染。大革命俨然是一个新纪元，好几个饱受君主专制压迫的民族在遭到入侵时，把侵略者当成了解放者。萨瓦省的居民跑着迎接法国士兵的到来。在美因茨（Mayence），法国士兵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人们种下自由之树，还仿照巴黎的国民公会建立起了自己的公会。

大革命的军队若遭遇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桎梏下逆来顺受且没有任何个人理想要捍卫的民族，那么获胜会相当容易。但若法国军队与那些拥有与他们同样强大的理想的民族发生冲突，那么胜利就会非常困难。

自由和平等的新理想能够吸引没有明确信念而又饱受主人专制迫害的民族，但对拥有根深蒂固强大理想的民族毫无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缘由，对宗教和君主制有着深厚感情的布列塔尼人和旺代人才得以在数年内成功地抵抗了共和国军队。

1793年3月，旺代和布列塔尼地区起义已经蔓延至其他十个省。旺代人在普瓦图（Poitou），朱安党人在布列塔尼（Bretagne），共召集了八万人参战。

与毫无理性可言的各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一样，各种对立的理想之间的冲突也是残酷无情的。宗教战争是无情而野蛮的，发生在旺代的战争自一开始便显示出了这个特征。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795年年末奥什平定了旺代才结束。但这种平定是靠歼灭几乎一切反抗者才得到的。

莫利纳里（Molinari）写道："两年内战之后，旺代只剩下可怕的断壁残垣，死亡约九十万人，其中男、女、老、少皆有，而侥幸逃过屠杀的一小部分人只能勉强度日。田地荒芜，围墙倒塌，房屋尽焚。"

让大革命士兵无往不胜的不单有他们的信仰，还有他们热情高涨、才华卓越、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这是他们的另一个优势所在。

革命军队原先的将领以贵族为主，现大多流亡，因此，必须组建一支新的军官队伍。由此，一批军事天才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得到了越级提拔。譬如奥什，1789年还是下士，在25岁时就成了师长、司令。极为年轻的将领们给军队带来了一种反抗精神，这是一种让敌人很难适应的精神。这些仅凭军功得到升迁的将领们，他们不为任何习俗、惯例所约束，很快便成功制定出了应对新形势的战术策略。

没有经验的大革命士兵无法用复杂的战术与老练的正规军作战，要知道，这些正规军都深谙七年战争[1]以来普遍使用的战术。

只能靠人海战术来实施攻击。由于将领们手下人多势众，这种有效的但野蛮的手段造成的减员也很快能够得到补充。

蜂拥而上拼刺刀的战法，很快就让习惯采用更加珍视士兵生命战术的军队迷失了方向。那个时代的枪支射击速度缓慢，这为法军采用这种相对简单的战术带来了便利。法国虽然胜利了，但自己损失惨重。有人做了统计，1792～1800年，法国军队在战场上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力（200万人中有70万人丧生）。

在本书中，我们不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事件，还要进一步从这些事实得出一些结论。

对在巴黎的革命群众和对军队的研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过这点很容解释。

我们已经证实，民众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他们只受自己变幻不定的冲动的支配，同时我们也知道，民众很信奉英雄主义，利他主义在民众中也很有市场。我们随便就可以找到成千上万个可以随时为某种信仰献身的人。

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而不同的心理特征必然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甚至完全相反的行为。国民公会及其军队的历史为我们证明了这点。由类似的人构成的法国民众在巴黎和在边境的表现，其中的差异之大，让人怀疑这还是不是同一个民族。

在巴黎，民众是混乱的、暴力的、残忍的。他们的反复无常让政府束手无策。

而在军队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同样一群不安分的民众，在本分的农民和工人的影响下，在军纪的约束下，在情感的感染下，变得甘愿穷苦、英勇无惧，他们组成了一支了不起的军队，战胜了欧洲最可怕的军

队。

这些事实证明了纪律的力量，当然也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这种力量。纪律可以改造人，没有了纪律的约束，民众和军队就会变成野蛮的乌合之众。

这个真理被人们一天天地淡忘了。由于不懂得集体逻辑的基本规律，因此，面对大众变幻不定的冲动，人们只能一再退让，而非设法驾驭。

有必要向大众指明前行的道路，而非由大众自己来开辟道路。

---

[1] 是指1756～1763年发生在以英国与法国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这次战争对于18世纪后半期国际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

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一、大革命期间人的精神状态：懦弱和暴力并存

判断源于智慧，行为源于性格，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得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

在重大的动荡时期，如在革命时期，性格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在几个章节中已经描述过动荡时期的各种主流的精神状态，在此不一一重复。它们一起构成了精神状态的基础类型，当然每个人的精神状态还会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们已经注意到神秘主义因素在雅各宾精神状态中、在其拥护者可怕的狂热中的分量。

我们知道议会的成员并非都是狂热分子。狂热分子只是少数，即便在最血腥的大革命议会中，绝大多数人仍是胆小的、温和的中立派，他们在热月政变前，是因为害怕而附和暴力分子，在热月政变后，他们便和温和派站到了一起。

革命时期与在其他时期一样，中立性格者总是占绝大多数，即使面对最无理的要求，他们也一概听之任之。事实上，他们和暴力分子一样危险，因为后者的强大正是基于前者的软弱之上。

在所有的革命中，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总会看到一小部分思想狭隘但意志坚定的人对大多数有才华但没性格的人颐指气使的情形。

除了狂热的使徒和懦弱者之外，在革命中，还有一些只想利用革命进行渔利的人。在大革命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浑水摸鱼，大捞一笔，如巴拉斯、塔里安、富歇、巴雷尔等人。

他们唯一的政治理念就是附和强者，欺压弱者。

大革命初期，这类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很多，用如今的话说就是“野心家”很多。对此，1792年德穆兰写道：“大革命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本着利己主义和自爱参加革命的，所有这些利己主义和自爱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普遍利益。”

在关于政治动荡时期各种心理形式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对观察到的现象做了总结，把这些总结与本节前述的内容相结合，或许我们会对大革命中人的特点形成一个笼统的看法。现在我们要将先前已阐述的原则付诸实践，以分析革命年代那些声名最显赫的人物。

二、革命代表的心理

在巴黎，国民公会成员的行为总是受同僚以及社会行为的指引、制约或激励。

为了更公正地评价他们，我们要观察的对象必须是处在无拘无束、没有顾虑也即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被国民公会派遣到各省份执行公务的代表们就是这种情形。

这些代表们的权力是极大的。任何审查都约束不了他们。所有的公务员和行政官员都要服从于他们。

一位执行任务的代表说，凡是他觉得好的，就可以征用、查封或是没收，凡是他认为合适，就可以对其征税，将其监禁、流放或是斩首，在他的领域内，他就是“帕夏”[1]。

这些代表每个人都自视为帕夏，“坐着六匹马拉的四轮豪华马车，身边簇拥着守卫，坐在能摆三十副餐具的豪华饭桌旁，边用餐边听音乐，身边还有一群喜剧演员、交际花和侍卫陪同”。在里昂，“科洛·德布瓦的派头不亚于旧时的土耳其皇帝。若非再三请求，我们都无权一睹

尊荣；在他的会客厅前还有一排厅堂，任何人都必须与他保持15步的距离”。

人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虚荣心膨胀的独裁者在侍卫的簇拥下在城市里耀武扬威的样子，他的一个手势就足以让你人头落地。

接不到案件的小律师，没病人求诊的医生，还了俗的神甫，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些以前平淡无奇的人，突然间飞黄腾达，堪比历史上强大的封建君主。断头台、溺死、扫射，一切随心情而定，一切是那么冷酷无情，他们深谙这种由位卑言轻通达显赫权贵之法。

连古罗马皇帝尼禄（Néron）、希利伽巴拉斯（Héliogabale）都远不及国民公会代表们残暴。前者还有成文法和习惯法约束，后者则不受任何牵制。

泰纳写道：“富歇站在窗前，用望远镜观看对210名里昂人的屠杀。每有枪决，科洛、拉波尔（Laport）和富歇便大摆筵席，射击声传来，他们便挥舞帽子、起身欢呼。”

在这些执行公务且有杀戮心理的代表中，就有前任神甫勒蓬（Lebon）。勒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阿拉斯市和康布雷市（Cambrai）深受其害。他和卡里耶的例子，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没有传统和法律制约的人会变成什么样。这位冷酷的议员不仅生性残忍，而且还是个虐待狂；断头台就搭在他家的窗户下，以便他、他的妻子以及助理可以即时享受杀戮的乐趣。在断头台下，他还设置了供无套裤汉们来饮酒的酒吧。为了让他们高兴，这位刽子手还在大街上将那些被斩首的裸尸摆成各种有趣的姿势。

看了1795年在亚眠印制的审判勒蓬的两本卷宗，仿佛像是噩梦一般。在二十场庭审期间，阿拉斯和康布雷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们都会来到亚眠古老的司法总管辖区法院大厅作证，此处，就是这位前国民公会议员接受审判的地方。这些失去亲人的魂灵的话让人难以置信：空无一人的大街；在荒唐的审判后被处

死的九旬老人和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人们在讥讽、凌辱中死去，死亡成了娱乐、消遣；人们在音乐声中执行死刑；一大群孩子被招募充当断头台的守卫；荒淫、玩世不恭、纸醉金迷。萨德的一部小说成了这些人的真实写照；面对这场暴行的直言控诉，整个国家，在经受长期恐吓之后，似乎终于吐尽恐惧，并为自己的懦弱行径进行补救，于是拿这个倒霉蛋开刀，而这个受审判的人只是一个遭人痛恨的失败的体制的替罪羊。

这位前任神甫唯一可以为自己辩护的就是奉命而为。指控他的那些事实其实早已众所周知，但国民公会对此却置若罔闻。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这些执行公务的代表们有着强烈的虚荣心，他们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连最有权势的独裁者都自叹弗如，但这些仍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残暴。

这种残暴有着多种缘由。作为一种严格的信仰的传播者，这些国民公会的代表就像圣职部的审查官一样，对受害者毫无怜悯之心。此外，他们不受一切习俗和法律的约束，由此，人性中残留的原始兽性被他们发挥得无以复加。

文明可以抑制这些本能，但本能永远不会消亡，猎人的杀戮欲望便是永久的证据。居尼塞·卡尔诺（Cunisset-Carnot）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向我们展示了在纯娱乐的猎杀过程中，猎人在遗传习性的支配下再现出来的野蛮。

可以说，为杀戮而杀戮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狩猎热情的本质。我们必须承认，现如今，文明国家的扩张根本不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我们祖先从事猎杀是迫不得已，猎杀是为了生存下去，要么杀死猎物，要么自己被饿死，但如今的杀戮则是毫无必要。杀戮在继续，而我们却无可奈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挣脱这条长久以来奴役我们的铁链。我们不能阻止自己去享受那种极度的欢乐，看着动物在流血，我们兴奋异常，当我们沉湎于杀戮时，我们变得毫无恻隐之心。那些最温驯的、最漂亮的野兽，欢唱的鸣禽，如春天般妩媚，掉进了我们的陷阱或是在我们的丝网内窒息，我们兴致勃勃地看着它们受到威胁，在流血，在极度痛苦中挣扎，竟没有一丝怜悯，而它们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造成的。它们试图靠着已经断了的爪子逃脱或者拼命扑打着已经抬不起来的翅膀垂死挣扎……这一切是祖传习性从中作祟的结果，即便人中豪杰也无力抗拒这种

习性。

在平常年代，这种嗜血的祖传旧习被严厉的法律所遏制，因而它只能在动物身上得到宣泄。一旦法典不再起作用时，它便立刻扑向了人类。这是众多恐怖分子在屠杀中感到极度兴奋的原因。卡里耶所说的看到受害者遭受酷刑时的表情就觉得快活的话可谓经典。残暴的本能在文明人身上，只是被抑制，但绝没有消亡。

三、丹东与罗伯斯庇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对于前者，我不打算多说，他的心理相当简单，且人所共知。他是俱乐部的演说家，冲动而又暴力，一副时刻准备煽动民众的样子。他只是在演讲中显得残酷，却还经常为由此造成的影响而感到遗憾。从一开始，他就在议会中居于首位，且光芒四射，而他未来的对手罗伯斯庇尔此时还默默无闻，在议会中垫底。

丹东曾一度成为大革命的中心人物，但他在行动中却不顽强，也不坚定。此外，他生活窘迫，而罗伯斯庇尔则无衣食之忧。后者持续的狂热战胜了前者间歇性的努力。然而，这样一位强大的平民演说家却被比他逊色的、恶毒的且平庸的对手送上了断头台，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罗伯斯庇尔是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同时也是最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对象不仅有大革命的敌人，还有不是现政权敌人的同事，一个人能有如此巨大的势力着实令人费解。

泰纳说罗伯斯庇尔是一个迷失在空想中自命不凡的人，但这种解释还不够确切；米什莱说罗伯斯庇尔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原则，但这种说法还不够肯定；与他同时代的威廉斯说：“他实现统治的秘密之一就

是把受到栽赃陷害的人当作实现其个人野心的垫脚石。”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

他成功的原因不可能在于雄辩。眼力不济的他读起冰冷的、含糊的、抽象的演讲稿时倍感吃力，更何况议会还有着无数像丹东和吉伦特派这样的天才演说家，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死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上。

事实上，对于这位独裁者为何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并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罗伯斯庇尔对国民议会本没有任何影响，他是一步步慢慢成为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的主人的。比约-瓦雷纳这样说道：“到了救国委员会之时，他已经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了。”

米什莱说：“他的故事让人不可思议，与之相比波拿巴都稍逊一筹。我们没看到计谋、同党以及精心准备。我们看到的只是文人堆里的一位小律师，一个诚实、严肃，但相貌平凡、资质平庸的人。一个早晨，一场不知名的龙卷风袭来，将他吹起，顷刻间，他一跃高过了帝王，成了被供奉的对象，多么让人震惊的传奇，连《天方夜谭》里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他成了主心骨，每个人都离不开他。此时的他业已声名显赫，但我们对他迅速崛起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我更愿意相信在他身上有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个人魅力。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我们开始留心他成功中的女性因素。在他发表演讲的日子里，“走道里挤满了女人……观众台上有七八百人，她们使劲地为他鼓掌……在他对雅各宾派发表讲话时，常引来同情的啜泣声、尖叫声，还有足以震塌大厅的跺脚声……”夏拉布夫人（Chalabre），一位拥有四万法郎租金的年轻寡妇，还向他寄去了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并称非他不嫁。

罗伯斯庇尔的性格与他大受欢迎并无什么关系。忧郁的气质，智力平平，罔顾现实，沉湎于幻想，奸诈而又虚伪，他最鲜明的特征便是极

度的傲慢，这种傲慢一直膨胀至其最后的时光。他俨然就是一个新教义的大祭司，自诩为上帝在人世间的使者，负责建立一个道德王国。人们写道：“他是弥赛亚，永恒的上帝允诺他来改造一切。”

满怀文学抱负的他对自己演说词的润色是不厌其烦。演说家或文人因遭其深深的嫉妒而死亡，如卡米尔·德穆兰。

德穆兰写道：“文人学者尤其受这位暴君的痛恨。罗伯斯庇尔不仅嫉妒同事，这位迫害者还带着愤恨来对待他们；对他们的仇恨，不是缘于他们对专制的反抗，而是缘于他们拥有让其相形见绌的才干。”

这位独裁者对同僚的蔑视是巨大的、不加掩饰的。他在梳洗时接见巴拉斯，刮完胡子后，朝他的这位同事身边吐痰，仿佛人家不存在一样，对巴拉斯提出的问题，他也不屑回答。对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他同样报以充满仇恨的轻蔑。只有群众才能得到他的好感。他说：“当至高无上的人民行使权力时，我们需要服从。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道德和真理，没有任何的不妥、错误和罪恶。”

罗伯斯庇尔患有被迫害妄想症。他杀害了这么多人，不仅仅是因为他肩负着捍卫共和的使命，还因为他认为自己处在敌人和谋反者的包围之中。索雷尔写道：“他的同事在他面前越是软弱，他就越发害怕他们。”

他在五个月内的绝对专政将领导专权发挥到了极致，令人惊讶不已。一个拥有军队的暴君想杀谁就杀谁，这点很容易理解。但仅以一己之力便成功地将大批同僚一个个送上绝路，这点很难解释清楚。

罗伯斯庇尔的权势无所不能，他可以将德穆兰、埃贝尔、丹东以及其他许多显赫至极的议员送交革命法庭审判，并最终送上断头台。曾经辉煌一时的吉伦特派也倒在他的脚下。

他还攻击令人生畏的巴黎公社，将他们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并且用一个听从他的命令的新公社取而代之。

为了尽快肃清那些让他不悦的人，他让人投票通过了牧月法。有了这个法律，他便有权处死仅仅受到怀疑的人，于是在49天内，他便在巴黎杀害了1373人。他的同事们饱受这场疯狂恐怖的煎熬，甚至都不敢在家睡觉。参加会议的议员代表不足百人。戴维（David）说："我认为我们山岳派能剩下二十人就不错了。"

对自己的实力和国民公会成员的软弱太过于自信，这点最终要了罗伯斯庇尔的命。由于罗伯斯庇尔让人通过了一部法律，只要他领导下的委员会发出命令，便可将议员送上革命法庭，也即送上断头台，而无须议会批准，这让许多山岳派人士和平原派的一些成员坐不住了，他们便开始密谋推翻他。塔里安深知下一个被处死的将会是自己，于是也就无所顾忌地公开控诉罗伯斯庇尔的残暴罪行。罗伯斯庇尔则发表了一个经过反复斟酌的演讲来为自己辩护，但在白费口舌后，他方明白，以逻辑推断来处死这些人是可以的，但议会却不是以逻辑推断来行事的。这些谋反者的呐喊盖过了他的声音。在精神感染的作用下，现场众多成员都发出了"打倒暴君！"的喊声，这足以让罗伯斯庇尔下台了。于是议会当机立断，马上宣布对他的指控。

巴黎公社曾想解救他，但国民公会却宣称他"不受法律保护"。在这神奇的一招的打击下，他彻底垮台了。

威廉斯写道："在这个时期，宣布谁'不受法律保护'，在法国人看来，无异于说谁得了瘟疫，于是这个人的民事权被剥夺，这个人呼吸过的空气似乎也能传染，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把大炮瞄准国民公会的炮手们也一样，没有接到任何的命令，仅听到公社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便就立刻调转了炮口。"

罗伯斯庇尔以及他的同党圣茹斯特、革命法庭庭长、巴黎公社主席等共计21个人在热月十号被送上了断头台。在处决他们的第二天，又有70个雅各宾党人被处死，第三天，处决了十三个。持续十个月的大恐怖终于结束了。

在热月政变中，雅各宾大厦的坍塌是大革命期间最令人好奇的心理事件之一。事实上，在推翻罗伯斯庇尔的山岳派中，根本没人会料到罗伯斯庇尔的垮台竟然标志着大恐怖时代的结束。

塔里安、巴拉斯、富歇等人推翻了罗伯斯庇尔就像推翻埃贝尔、丹东、吉伦特派等人一样。但人群的欢呼声让他们意识到，罗伯斯庇尔的死被看作恐怖时代的终结，于是他们急忙声称这本来就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平原派是议会中的多数派，一直任由罗伯斯庇尔残杀，现在平原派满怀仇恨猛烈攻击这个自己长期以来昧着良心为之赞美的体制，他们没法不去附和平原派。一度害怕而如今不再害怕的人其实更可怕。平原派为了一雪自己曾被山岳派胁迫的耻辱，随后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罗伯斯庇尔的同事们在国民公会中对他的顺从绝非出于本意，而是独裁者让他们感到难以抑制的恐惧，在这种因害怕而温良恭让、溜须拍马的背后，隐藏的是强烈的仇恨。

在罗伯斯庇尔死后，1794年8月11日、15日和29日的《箴言报》刊登了几位议员撰写的报道，看了这些报道，尤其是看了关于“罗伯斯庇尔、库通和圣茹斯特三巨头的阴谋”之后，人们才明白仇恨是如此之深。连奴隶都绝不会如此谩骂他没落的主人。

“一段时间以来，这些怪物连马略（Marius）[2] 和苏拉最可怕的流放手段都重新用上了。”在报道中，罗伯斯庇尔被描述成一个可怕的无赖；人们信誓旦旦地说：“他就像卡里古拉一样，总想着让法国人民对

他的马顶礼膜拜。他不放过一丝的怀疑，他在严刑拷打中寻找安全感。”

这些报道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权力根本没有依靠一支强大的军队，这点与他们所影射的苏拉和马略不一样，他靠的仅仅是国民公会成员的纵容。没有他们的极度软弱，这位独裁者的权势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对罗伯斯庇尔的信条加以总结，我们可以说：他以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以及一成不变的僵化成了雅各宾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许除了圣茹斯特外，无人能及。如今他依旧不乏仰慕者，如阿梅尔（Hamel）坚称他是“热月政变的殉难者”。人们还曾讨论过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我非常赞同保留一些形迹作为警醒，以便让人们知道：在一个知道如何操控议会的领袖前，一个原本有所作为的议会是何等温顺，群众又是何等盲目。他的雕像会让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国民公会还对这位独裁者——国民公会的最大威胁——推行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敬仰和激情溢于言表。

四、富基耶—坦维尔、马拉、比约—瓦雷纳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残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个章节中加以介绍。他们的残暴因掺杂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从而变本加厉。

富基耶-坦维尔，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最阴险的人物之一。这个昔日因温和而著称的法官，而后则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人们对他的回忆只有不尽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经常拿他作为例子来说明在革命时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转变。

在君主制没落的时候，他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他十分期待社会动荡，因为从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没有任何的失去。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之一。

国民公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他，让他决定将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其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人。他处决了所有的可疑分子，并毫不顾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护者。德穆兰、丹东或其他什么人，一旦失势，他便对其提起公诉。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维尔卑劣的灵魂。在正常年代，在职业规则的约束下，他注定是一个温和的、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检察官吉尔贝-利埃东（Gilbert-Liendon）的命运。迪雷尔（Durel）这样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事一样感到惊骇，然而他却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结束了他的生涯。"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最大的善行之一无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险分子，只有社会约束才可以控制住这些人。

富基耶-坦维尔至死都不理解人们对他的判决，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判决是没有道理的。他难道不是在卖力地执行领袖们的命令吗？不能把他与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们等同看待，因为人们无法监视那些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审查了他所有的行动，并且到最后一天还在表扬这些行动。如果他对犯人的草率判决和残暴没有得到领导们的支持，那么他的权力早就不保了。国民公会对富基耶-坦维尔的判决，也即等于对自己可怕的体制的判决。国民公会明白这点，国民公会将许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维尔，他只是忠诚的死刑执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维尔之外，我们再来说说迪马（Dumas）。迪马是革命法庭的庭长，由于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异常残忍。不准备两把上好子弹

的手枪，他都不敢出门，他在自己家中设置障碍，只通过窗口和拜访者交谈。他怀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他甚至将他的妻子也送进了监狱，在热月政变突然发生之际，他正打算将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这些人中，比约-瓦雷纳是最野蛮的人之一。我们可以把他看作野兽般残忍的一个完美典型。

在愤怒从生、英雄气短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静，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杀人者表示祝贺，并允诺付给他们薪酬；之后，他回到家中，仿佛刚散完步一样。他就是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公会主席，救国委员会委员。他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将王后送上了断头台，将他以前的主人丹东，这个曾说'比约舌下有把刀'的人也送上了断头台。他批准了里昂的炮击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团伙事件；他组织了残忍的'奥朗日'（Orange）委员会；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怂恿富基耶-坦维尔去放心大胆地干；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他的签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他说着夸张的句子，"抖动着他的狮鬃"，当他逐渐靠近时，其他人便惊恐、犹豫、后退，他没有任何怜悯，没有感情，也没有热情；为了让他那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与他周围的热情相协调，他现在戴着黄色的假发，不过显得不伦不类，这头假发，除了戴在比约-瓦雷纳阴森的头上，戴在其他人头上都会让人发笑。当轮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倒霉时，他抛弃了他们，站到了对手那边，并将他们推上了断头台……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野心，他对金钱、权力都没有欲望。

我不认为上述引文中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在前面谈过，在某些凶手身上普遍存在着杀戮欲，用杀戮欲来解释比约-瓦雷纳的行为再合适不过。这一帮为了杀戮而杀戮的匪徒，就像猎人打猎一样，仅为了从破坏中找乐子。在平常年代，有杀戮欲的人，由于忌惮警察和断头台，而不得不克制这类欲望。在可以肆意妄为的时期，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去杀戮。比约-瓦雷纳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拉的心理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他不仅有杀戮欲，在其心理之中还叠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伤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固执己见、为荣誉痴狂的半疯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过远大的科学抱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胡思乱想。虽梦想着地位和荣誉，但他只在一个大领主家里谋得一份卑下的差事。心中充满着对那个否定他价值的旧社会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伙人的领导。在公开颂扬九月屠杀以后，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以之抨击所有的人，并整天鼓吹死刑。

因为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所以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极为鄙视他。即便他逃过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过断头台上的铡刀。

五、大革命后国民公会议员的命运

除了这些心理很有特点的国民公会议员之外，还有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兰·德·蒂翁维尔等人。他们都是毫无信仰、毫无原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致富。

他们善于在民众贫困的基础上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在正常年代，我们会把他们当作纯粹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所有的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只有极少数雅各宾党人依然狂热，大部分人在成为拿破仑忠实的奉承者并名利双收之后，都抛弃了他们的信仰。曾称呼狱中的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国时期，曾要求他的亲信在公共场合称他为亲王殿下，在私下里为王太子殿下，这表明许多雅各宾党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于某种嫉妒的情感。

马德林写道："大部分的雅各宾党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齐尔（Bazire）、梅兰、巴拉斯、布尔索（Boursault）、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土地。现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富有……"仅在热月党的总部——共和三年委员会里，就有1个未来的王子，13个未来的伯爵，5个未来的男爵，7个未来的帝国上议员，6个未

来的国家参议员，除此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未来的勒尼奥（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后将拥有爵位、纹章、翎饰、四轮华丽马车、年俸禄、长子世袭财产、公馆和城堡的民主派。富歇在去世时有一千五百万里弗的资产。

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曾遭极力诋毁的旧制度特权看来有必要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摧毁法国、烧毁整个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颠覆欧洲，要开辟战场杀害几十万人。

在结束这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节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说过的东西，这关系到对这个时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评价。

对待某些个人，伦理学家必须要态度严厉，因为他是根据一个社会赖以为继的各种典范来评判这些人的，这些典范必须得到遵守。而心理学家就不需要这样严格。心理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而且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理解。批评不是他的事情。

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极其脆弱的机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木偶极少能够与推动它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遗传、环境、形势都是蛮横的主人。如果我们处在上述我们尝试解释其行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没有人能说出我们的行为肯定会是什么样。

---

[1] 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地位最高的官衔。——译注

[2] 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译注

第三篇 传统惯例和革命原则之间的较量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的最后一搏：督政府

一、督政府心理

不同的革命议会中的部分成员都是同一群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议会的心理是极其相似的。

在正常时代里，情况也许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环境造就了一成不变的议会的特征。但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大革命时期，这些特征也需要改变以适应形势的变化。督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督政府这种政府形式由不同的议会组成：两个由不同派别的议员组成的人数众多的议会以及一个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人数极为有限的议会。

两个大的议会因其极度软弱从而使人想起国民公会。虽然它们不再对民众暴乱逆来顺受，因为督政官们已对这类暴乱加以强力约束，但它们依然得无条件地服从督政官的独裁命令。

最初被选举出的议员们大体上属于温和派。所有人都被雅各宾派专制折磨得筋疲力尽。新议会渴望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法兰西，并且建立一个自由无暴力的政府体制。

事物的发展通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种必然性，大革命已证实了这一规律。尽管议员们的初衷是美好的，但可以说，由于这种必然性，他们还得像他们的前任一样，做出事与愿违的事情。他们希望给人以温和的印象，但结果却是暴力的，他们渴望消除雅各宾派的影响，但结果自己却反受其害，他们期盼着修复废墟，但结果废墟却更多，他们憧憬着宗教和平，但结果却变本加厉地迫害和屠杀教士，比大恐怖时期尤甚。

由五个督政官组成的小议会的心理和议员组成的大议会的心理大不相同。督政官们每日要务缠身，忙得焦头烂额，然而那两个大议会却历来罔顾现实，只会憧憬。

督政官们的主导思想很简单。他们对原则毫无兴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借助于最不合法和最暴力的手段，当他们的利益受损时，他们连废除众多省份的选举制度也在所不惜。

当感到治理法国力不从心时，督政官们便放任法国，任其自生自灭。他们以独裁手段达到统治法国的目的，却从不管理法国。而法国彼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管理。

在历史上，国民公会政府以强硬而著称，督政府则是以软弱而闻名。但恰恰相反，督政府才是一个强硬的政府。

心理学可以解释督政府和先前的议会政府之间的这种区别。一个六七百人的会议可以在情感传染的影响下表现出不一般的狂热，如8月4日的夜晚贵族们投票废除封建特权，甚至还可以激发出强烈的意志如挑战欧洲所有的君王。但这种冲动转瞬即逝，因而不堪大用。一个五人的委员会，很容易被一个人的意志所支配，因而也很容易刚愎自用，也即一意孤行。

督政府在管理上一贯显得无能，但它从不缺乏强烈的意愿。它可以为所欲为，不尊重法制，不尊重公民，更不关心公共福祉，它在法国施行的专制统治，让法国大革命开始以来甚至大恐怖时期的每一届政府都自叹弗如。

督政府和国民公会一样，以最残暴的方式统治法国，结局也和国民公会一样，它永远无法成为国家的主人。

上述事实再一次证明了物质约束无法左右道德力量。我们只得不厌其烦地再说一遍：真正引领人类的是祖先们建立起来的道德框架。

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有法可依的、遵循传统的社会里，很难描述一个没有了道德框架的民族的状态。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人们只看到社会中不如意的一面，而对其他视而不见。殊不知，一个社会只有立下一定的规矩，只有用法律、习俗和惯例来对与生俱来的野蛮的本能加以约束，方可称之为社会。

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反面教材，它清楚地表明，一个没有了传统架构的民族，一个仅以人为拼凑出来的过于空洞的理性为指南的民族，会混乱到何种程度。

二、督政府的专制统治：大恐怖再现

为了转移注意力、使军队忙起来并掠夺邻国以获取资源，督政官们决定重起征服之战，这个方法在国民公会期间曾百试不爽。

在他们的统治期间，战争一直持续着，尤其在意大利，军队取得了丰硕的战果。

一些被侵略的国家的人们还天真地认为，这些侵略是为他们好。但没多久他们就发现，与军事行动一同到来的是沉重的捐税、教堂遭劫、国库遭殃等。

这种征服政策最终导致了一个新的反法联盟，并持续到1801年。

对国家漠不关心又无能治理国家的督政官们，为了保住权力，时刻忙于打击谋反势力。

这项任务足以让督政官们焦头烂额，因为各政党都拒绝解除武装。无政府主义演变至此，以至所有人都期盼着能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来恢复

秩序。每个人包括督政官自己都觉得，共和体制已难以为继。

有些人梦想着恢复君主制，有些人则想建立恐怖政体，还有些人期待着某位将军能力挽狂澜。只有那些攫取国家财富的人害怕政体的变更。

督政府的不得人心与日俱增，1797年5月，议会的三分之一议员被改选，大部分被选举出的议员反对现有政体。

督政官们当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而不安。他们取消了49个省的选举结果，154名新议员被剥夺资格逐出议会，53名被判处流放，其中就有几位大革命期间大名鼎鼎的人物：波塔利斯（Portalis）、卡尔诺、特隆松·杜·库德雷（Tronson du Coudray）。

为了恐吓选民，军事委员会随意地处决了160人，并将330人流放至法属圭亚那，其中一半人很快死去。回到法国的侨民、教士们遭到大规模驱离。这就是所谓“果月政变”。

这场政变主要打击的是温和派，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另一场打压活动很快便接踵而来。督政官们发现在新一轮选举后，雅各宾派议员人数太多，便中止了其中六十多人的资格。

上述事件暴露了督政官们的专制本性，而其具体的手段则更突显了这种本性。督政官们和大恐怖时期最残暴的国民公会议员们一样嗜血成性。断头台无法一直用下去，于是乎便用流放来取而代之，而在恶劣的条件下，受害人生存的机会微乎其微，如流放到罗什福尔（Rochefort）的受害者们被关在铁笼子里，堆放在船上，暴露在各种恶劣天气中。

泰纳说：“那些不幸的人被关在‘戴卡德号’（Décade）和‘巴尤那兹号’（Bayonnaise）的甲板舱里，他们因氧气不足和酷热而呼吸困难，他们被虐待、被洗劫，最终因饥饿和窒息而死，到了圭亚那，航程才告结

束。‘戴卡德号’运送的193人，在22个月后只剩下39人；‘巴尤那兹号’运送的120人最后只剩下1人。”

看到天主教遍地兴起，便认为教士们要谋反，于是仅一年内，督政官们便把1448名神职人员加以流放或者送到劳役所，这还不包括许多被草率处死的教士。大恐怖实质上已卷土重来了。

督政府独裁专制的统治遍及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尤其是财政部门。如因为需要六亿里弗，督政府便让逆来顺受的议员们投票通过了一项增税法案，但只征收到1200万里弗。不久，心有不甘的督政府又下令筹措一亿里弗的强制借款。但结果导致作坊关门、商业停滞、佣工失业，这项以毁灭为代价的措施仅筹得四千万里弗。

为了确保对各省份的控制，督政府让人投票通过了一项所谓人质法，根据该法令，每个公社都要列出一份人质名单，列出要为闹事承担责任的责任人。

这样一种体制自然会导致天怨人怒。1799年年底，14个省发生了暴动，还有46个省准备揭竿而起。如果督政府还持续执政，那么这个社会就将彻底解体。

这种社会解体已经在大踏步进行中。财政机构和行政机关已完全瘫痪。国库中的指券贬值到仅为票面价值的1%，几乎成了废纸。以利息为收入的人和公务员没有了经济来源。

在旅游者的印象中，法国是一个被战争蹂躏、被其人民抛弃的国度。倒塌的桥梁、堤坝和建筑物致使交通瘫痪。废弃已久的道路上盗匪横行。若没有从帮派的头目那里购买的安全通行证，在某些省份便寸步难行。工商业也被摧毁，如在里昂，15000间作坊里有13000间关门歇业。里尔、勒阿弗尔、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等城市就像是死城。苦难和

饥荒随处可见。

相比上述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混乱也毫不逊色。奢靡、享乐、华服、盛宴、豪宅为一个由公债投机商、军火供应商、靠掠夺致富的奸诈金融家组成的新阶层所专享。它们让巴黎呈现出一片奢华祥和的虚假繁荣景象，并迷惑了众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在这惊人的奢华背后是普遍的贫穷。

督政府的编年史，让人们明白史书中的历史情节是多么不靠谱。这个时代曾经是戏剧创作的题材，它的风尚依旧被人所模仿，它给人们留下了这么一种回忆：这是历经大恐怖惨剧后百废俱兴的一段快乐时光。但事实上，督政府的体制并不比大恐怖时期的体制优越，二者同样血腥。这种体制最终导致天怨人怒，督政官们感到自己的统治来日不多，便开始物色有能力取代他们并保护他们的独裁者。

三、波拿巴崛起

我们刚才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让所有人都翘首企盼一位强势人物出面来恢复秩序。1795年，一些议员还曾一度幻想过恢复君主制。在路易十八愚蠢地宣布他要完全恢复旧体制、要将财产归还给以前的主人并且惩罚参与大革命的人之后，人们便立刻抛弃了他。离奇的基贝隆（Quiberon）战役[1]使得这位潜在的君主失去了其全部的拥护者。保王党分子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狭隘，证明了对他们采取的大部分的严厉措施都是合理的。

君主制看来是不可能了，于是一位将军来收拾残局。唯有一个叫波拿巴的将军堪当此任。意大利的战役让其崭露头角。在跨越阿尔卑斯山之后，他又接连取得胜利，攻入米兰和威尼斯，在战争中，他几乎所向披靡。在奥地利皇帝决定求和之时，他指挥的军队离维也纳仅有25古法里。

尽管波拿巴已经声名显赫，但这位年轻的将军还是觉得不满足。为了进一步提升他的声望，他说服了督政府入侵埃及，以便削弱英国的力量。1798年五月，波拿巴在土伦启程出征。

最有远见卓识和势力的将军们一直在催促这位出生在意大利的将军采取行动，做共和国的首脑；但波拿巴拒绝了，因为他还没有强大到能够独自应付局面的程度。对于统治的艺术和共和国的需求，他与革命党人以及议会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不能一意孤行，他担心他的声誉受到影响。他决定出征埃及，一旦形势需要或有利，他便再度问鼎。

波拿巴并没有在埃及逗留很长时间，因为他的朋友召唤他回去。他在弗雷瑞斯（Fréjus）登陆并归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到处张灯结彩。波拿巴、西哀士（Sieyès）[2]、两位督政官以及一些主要的部长们共同谋划了一起政变，法国为配合这次政变也提前做好了准备。密谋在三个月内完成。政变定在雾月18日，进行得异常顺利。

摆脱了长期以来一直压迫和剥削法国的邪恶帮派，所有的党派都感到无比快乐。

法国人民无疑要面临一个专制体制，但是它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年的专制体制那样难以忍受。

雾月政变的历史很好地证实了我们之前一再说过的话：即便是世人皆知且见证者无数的事件，要想准确判断它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在三十多年前人们对雾月政变是怎么一种看法。人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野心家在军队的支持下犯下的罪行。事实上，军队在雾月政变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驱逐少数几个顽固议员的小股卫队并非军人，而是议会自己的宪兵。发动雾月政变实际上是政府自己，整个法国都是这次政变的同谋。

四、大革命持续的缘由

若只为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竞争公职、人民主权、控制支出等几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大革命只需几个月的时间。到1789年年中，这些目标都已经实现了。随后的那些年里并未增加什么新原则，但大革命实际上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官方历史学家承认的大革命持续时间来看，大革命一直持续到波拿巴崛起，前后大约为期十年。为什么在新原则得到确立之后这种混乱而又暴力的局面依旧？我们不该在对外战争中找原因，因为那场战争因反法同盟的破裂和我们的胜利而早该结束了；更不该在法国民众对革命政府的同情中寻找原因，因为没有哪个政体会像革命议会那样令人憎恶和鄙视。由于革命议会的反复无常，大部分的法国人都流露出对革命议会的厌恶。

最后一点，法国对革命体制的反感。这点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至最近，历史学家方才使其大白天下。刚刚出版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本书的作者马德林，将这些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做了如下精辟的概括：

> 一个人数不多的政党自1793年起便掌控着法兰西、掌控着大革命、掌控着共和国。现在，四分之三的法国民众希望停止大革命，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大革命摆脱可恶的盘剥者们的掌控，然而这些人却想方设法控制住这个不幸的国家……如他们施行大恐怖来保住权力，他们随时打击任何企图反对大恐怖的人，即便他们是大革命最优秀的奴仆。

直到督政府统治末期，政府都一直被雅各宾派掌控着，他们只想用权力来保存他们通过屠杀和掠夺积累起来的财富，他们还准备将法国出卖给任何可以保护他们这种财富的人。他们之所以和拿破仑就雾月政变进行协商，仅仅是因为路易十八无法实现他们的愿望。

但如此专制、如此令人唾弃的政府会存续那么多年，这又如何解释呢？

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革命宗教还心存念想，也不仅是因为它采用了迫害和暴力的手段，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之前所讲的缘由：若维持这个政府，便会有一大群人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

这一点才是根本。如大革命仅停留在理论信念的层面，那么它很可能无法持续下去。然而刚建立起来的信仰很快便脱离了纯理论的范畴。

大革命不仅局限于剥夺君主、贵族和教士的政府权力。大革命在把特权阶层的职务和财富往资产阶级和众多农民手里转移的同时，也把资产阶级和农民改造成为新政体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以极低廉的价格获取了从贵族和教士那里剥夺来的土地和城堡的财富拥有者们，最担心的便是君主制卷土重来，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必须交还他们所得到的一切。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方使得一个在平时绝不受支持的政府能够一直支撑下去，直到一个承诺保护大革命的道德成果特别是物质成果的新统治者出面收拾残局。波拿巴满足了这些期待，自然受到了热烈欢迎。一些有争议的物质成果和理论原则依然不保险，波拿巴便用制度和法典将其固化下来。波拿巴终结大革命的说法是错误的。波拿巴并没有破坏大革命，而是巩固了大革命。

---

[1] 基贝隆战役是热月党打击王党复辟活动，维护革命成果的重要战役。热月党在镇压芽月起义和牧月起义后，国民公会的政策明显右倾，为王党势力的抬头提供了机会。逃亡贵族的家属及其党羽公开要求发还已被没收的财产，亡命国外的贵族也加紧活动。在意大利的王弟普罗旺斯伯爵利用朱安党人发动叛乱，并向英国求援。1795年6月27日，一批逃亡贵族率领约4500人乘英国军舰登陆，占领奥雷城。奥什将军率共和军迎战，登陆军退到基贝隆半岛。7月21日法军发动总攻，将王党判军彻底击败。——译注

[2] 西哀士，神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议会代表，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派中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元老院元老。——译注

第二章 恢复秩序：共和执政府

一、执政府如何巩固大革命成果

执政府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学材料。这段历史表明，一个强有力的个体要比一个集体更为高效。波拿巴很快便终结了困扰共和国长达十年的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之恢复了秩序。尽管镇压手段空前残酷，但四届革命议会中没有一个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波拿巴独自一人便实现了这个目标。

波拿巴以个人的威望迅速平息了巴黎所有的叛乱，打消了复辟的企图，并让法国因强烈仇恨而支离破碎的道德恢复完整。

波拿巴以完美有序的个人独裁取代了无序的集体独裁。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因为他的专制远没有之前长达十年的专制那么沉重。此外，鉴于他的专制受到极大的欢迎，因此有理由认为，对其感到不快的人应该寥寥无几。

之前的历史学家认为波拿巴颠覆了共和政体，如今的人是不会附和这种说辞了。他利用制度和法典将大革命成果中可行的部分如法律平等、废除特权等加以固化，从而保留了共和政体中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若没有他，这一切便无从谈起。此外，执政府也一直自称是共和政府。

如果没有执政府，取代督政府的极可能是复辟君主制，大革命的大部分成果将会得而复失。实际上，假设历史上没有波拿巴，我想没人会认为督政府在一片萎靡中还能够支撑下去。督政府必定要被那些整天算计的保王党人的阴谋所颠覆，路易十八极有可能就此登上王位，而不必等到16年后。但在这16年期间，波拿巴把大革命原则落实到习俗和法律中，由此这些原则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从而使得复辟君主不敢造次，也

不敢将财产归还给流亡贵族。

若路易十八当时直接取代督政府，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路易十八恢复的是旧的专制制度，而为了废除这种制度，必然就要爆发新的革命。查理十世就是因为有了回归过去的天真想法而被赶下台的。

对波拿巴的专制感到愤怒是很幼稚的。旧体制让法国人民承受了各种暴政，共和体制的暴政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制成了常态。但只要不出现混乱，也就不会有人反抗。

大众在制造了无政府状态之后，又去寻找一个能令其摆脱无政府状态的领导者，这是大众心理的一条永恒的定律。波拿巴就是这种领导者。

二、执政府重塑法兰西

掌权之后，波拿巴便接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重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法国。雾月政变第二天，波拿巴几乎独自一人草拟了宪法，目的是让自己获得重建国家和整治乱党所需的绝对权力。一个月过后，宪法完成。

这部宪法就是所谓“八年宪法”，一直沿用至波拿巴的统治结束，其间只做了细微的改动。行政权归属于三位执政官，其中两位仅有建议权。第一执政官即波拿巴本人成了唯一的主人。他拥有任命部长、国务委员、大使、行政官员和政府公职人员的权力，拥有宣战或停战的权力。他还拥有立法权，因为只有他可以创立法律，随后这些法律会被提交给行政法院、法案评议委员会和立法院三个议会。第四个议会即元老院则退居幕后，充当起了宪法守卫者的角色。

无论波拿巴是否独裁，即便是独裁，但他在决定一件事之前，无论大小，都会与议会商议。在他的统治下，立法院并没有发挥出多大的影

响力，但在没有和行政法院讨论的情况下，他不会签署任何一项决议。由最有学问的人组成的行政法院草拟法律，然后将其呈交给立法院，后者可以自主评判法律，因为投票表决都是秘密进行的。在波拿巴的统治下，行政法院几乎成了最高法院，甚至可以裁决大臣们的行为[1]。

这位新君主对行政法院非常信赖，因为它由各自领域内杰出的法学家组成。他过于看重心理分析，以至于极度怀疑由平民组成的平庸无能的大型议会。在他看来，在整个大革命时期，这些议会就是祸害。

波拿巴想要为民执政，却从不让民众参与，没有为其在政府中安排任何职位，只为民众保留了投票支持或反对修宪的权力后便一了百了。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才诉诸全民公投。立法院的议员也是由议员们推荐而非由人民选举产生。

第一执政官创立新宪法，旨在巩固他自己的权力，而没有奢望以此来服务于国家重建。他在草拟宪法的同时，还着手进行一项宏大的工程，这就是行政、司法和财政的重组。各种权力都集中到了巴黎。每个省都由省长管理并由一个省议会协助；每个区则由一名区长管理并由一个区议会协助；每个市镇则由一名市长管理并由一个市镇议会协助。所有官员均由部长们任命，而不像在共和国时期那样由选举产生。

这套制度赋予国家以绝对权力和高度的中央集权，它被所有的政体所采用并且沿用至今。中央集权尽管有其明显的缺陷，但它却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国家避免地方专制的唯一手段，因而一直得以保留。

这种组织架构是建立在对法国人的心理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立刻就让久违了的安宁和秩序得到了恢复。

为了稳定人心，被流放的人被赦免，教会又回到了教徒的手上。

在重建社会的同时，波拿巴还在编纂一本法典。法典的大部分内容

源于旧体制的习惯法。有人曾说过，这部法典是“新法与旧法之间的一种妥协”。

面对第一执政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完成的浩大工程，人们明白，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必须要有一部宪法赋予自己以绝对权力。若把重塑法国的一切措施都交由律师议会来决议，那么他永远也无法把法兰西从混乱中解救出来。

“八年宪法”显然将共和政体变成为了君主政体，其专制不亚于路易十四的天授神权。作为唯一顺应时代要求的宪法，它彰显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

三、决定执政府执政成功的心理因素

经济的、历史的和地理的等一切外部力量都会对人产生影响，并最终都转化为心理力量。为了更好地统治，需要对这些心理力量加以了解。革命议会完全忽略了这些心理力量。波拿巴却懂得运用它们。

各类议会，尤其是国民公会，都是由对立的党派组成。拿破仑明白，为了驾驭这些党派，他不能加入其中任何一个派别。波拿巴深知，一个国家的财富就是散布在各派别中的精英分子，他要设法任用这些精英。如部长、省长、行政长官等政府官员，都是仅凭各自的才能，不拘一格地从自由党、保王党和雅各宾派等派别中挑选出来的。

波拿巴不排斥与旧体制的人合作，不过与此同时，他要真诚地告知他要保留大革命的基本原则，许多保王党人由此也被新政体招至麾下。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执政府最卓越的功劳之一就是恢复了宗教和平。造成法国分裂的主要分歧是宗教分歧，而非政治分歧。武装冲突几乎完全结束，但人心不稳，因而在旺代省的部分地区依旧出现有计划的破坏。唯有一人即基督教的首脑才有能力安抚人心。波拿巴立刻与之进

行了商谈。二者所达成的“政教协议”（Concordat）可谓名副其实的心理学的杰作，因为波拿巴明白，无法以暴力来对付道德力量，迫害道德力量也是极端危险的。在安抚教士的同时，他也把教士阶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主教由国家任命并支付报酬，波拿巴依旧是国家的主人。

波拿巴的宗教妥协意义重大，但如今的雅各宾派依然不得要领。他们被狭隘的狂热蒙蔽了双眼，雅各宾派不明白，如将教会从政府中分离出去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国中国，这个国中国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由外人领导的且必定敌视法国的对手。放任敌人为所欲为是相当危险的。无论是波拿巴，还是之前的天主教领袖，都绝不同意让教士阶层像今天一样不受国家的领导。

第一执政官波拿巴面临的难题要远多于他称帝后所面临的难题。只是他对人心的深刻认识帮他克服了这些困难。当然这位未来的主宰还远未成功。一些省份依旧处于暴乱之中。盗匪依旧四处横行，法国南部地区惨遭党派斗争的蹂躏。波拿巴执政官必须得驾驭好塔列朗（Talleyrand）、富歇和一些自认为能与之平起平坐的将军们。甚而连他的兄弟们也在觊觎他的权力。波拿巴在做了皇帝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堪称是其对手，但作为执政官，每一个党派都是他的劲敌，他必须设法在其中维持某种平衡。这项任务应该十分艰巨，因为一个世纪以来，鲜有政府能够实现这种平衡。

要想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须十分巧妙地综合运用计谋、威望和交际手段。但波拿巴仍觉得没有把握，于是他为自己确立了一条规则，套用他自己的话，这就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愿来统治他们”。不过在成为皇帝后，他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统治了。

极其盲目的历史学家们与才华横溢但心理学欠佳的伟大诗人们群情汹涌反对雾月政变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没有超人的想象便很难读懂“法兰西在穑月[2]的阳光下是美丽的”，没有鲜活的幻想便无法像维克

多·雨果那样来判读这段时期。我们清楚，积极参与“雾月之罪”的同谋不仅有政府自己，还有摆脱了无政府状态的整个法国。

人们在问，为何这些聪明人会把如此清晰的一段历史评价得如此不堪。答案或许是他们基于自己的信仰来看待这些事。我们知道，在执迷于信仰的人眼里，真相会变得面目全非，最明显的事实会变得晦暗不清，事件的历史也会变成梦呓般的历史。

我们对执政府时期的轮廓做了粗略的勾勒，心理学家只有在没有任何党派倾向、没有党派狂热的情况下才能了解这个时期，且不应想着要去批判这一段情非得已的过去。波拿巴让法国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英雄史诗被两次入侵战争画上了句号，他的英名在其殁后庇护其子嗣登上了王位，而他的子嗣发动的第三次入侵战争至今依旧贻害无穷。

所有重大事件其起因间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一个民族的演变，一个理想的变更，其代价便是这类重大事件。人类绝不能在一夜之间与祖先决裂，也不要彻底打乱人类历史的进程。

---

[1] 波拿巴虽然经常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行政法院，但并非次次都能如愿。据《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记载，有一次他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之后说了如下的话：“先生们，这次的声明你们都赞成，只有我一人反对，我应该让步；但我声明，从我内心而言，我只是在形式上让步，你们可以迫使我沉默，但却无法使我信服。”
另一次，皇帝在发言时三次被打断，于是他走向了打断他发言的人，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道：“先生，我还没有讲完，请您让我把话讲完。毕竟，在场的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
……“与一般的看法相反，这位皇帝并不专权，他对行政法院的态度特别的随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把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再次提交讨论或加以废除，因为行政法院中的某位成员给他提出了新的理由，或者是皇帝依靠自己的观点说服某个成员，继而说服了其他人。”

[2] 法兰西共和历的10月份，也称获月，相当于公历6月19～20日至7月19～20日。——译注

第三章 传统惯例与革命原则百年冲突的后果

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因素

研究一下革命思想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我们便会发现，五十多年来，革命思想在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是如此之慢。

在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民众和资产阶级都排斥革命思想，革命思想的传播仅局限在少数的信徒之间。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应对失策，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足够挑起数次革命。现在就先来研究一下促使革命爆发的心理因素，稍后再对这些革命进行总结。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法国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动荡的历史便足以证明：人类是受自己心理因素的驱使，而非受外部强加的社会体制所支配。

法国接连不断的革命是法兰西民族中两拨心理状态迥异的人群之间争斗的产物。一部分人长期受祖辈的影响，信奉宗教和君主制；另一部分人虽然也经受了同样的影响，但他们却把这些影响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从大革命一开始，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地表露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残酷的镇压，但起义和谋反一直持续到督政府统治末期。这表明，过去的传统对人类灵魂的影响是多么深。在某个时期竟有六十个省同时发动反抗新政体的起义，经过大范围一再屠杀后才得以消停。

在旧政体和新思想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是波拿巴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由此，他需要找到一些对造成法兰西分裂的两种心理都适用的制度。为此，他采用了折中调和的办法，他将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字，最后我们看到，他成功了。

在法国的历史中，他的统治时期是一段罕见的法国精神完全统一的时期。

但这种统一并不长久。在他下台的第二天，以前的党派全都东山再起并一直活跃至今。一些党派顺应传统的影响，另一些则竭力排斥传统的影响。

长时间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在信徒和对宗教冷漠的人之间，因为冷漠者总是宽容的，冲突不会持久，事实上，只有相互对立的信徒间才会有长时间的冲突。世俗教会很快便有了一副宗教的外衣，它所宣称的理性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主义，尤其在如今，直截了当地说，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最狭隘的教权主义。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同的宗教信仰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掌权后的教权主义者对自由思考者，不可能像后者如今对待他们那样的宽容大度。

在这些由于不同信仰导致的分歧上，又叠加了源自不同信仰的政治概念上的分歧。

许多单纯的人一直认为，真正的法国历史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如今坚持这种肤浅想法的人几乎没有了。就连最刻板的革命者们也摒弃了这种想法[1]，他们甚至还认识到，过去并非一个迷信盛行的野蛮黑暗的时代。

在法国，政治信仰大多源于宗教，宗教使得这类政治信仰的信徒们心中充满难以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让外国人惊讶不已。

巴里特-温德尔（Barret-Wendell）先生在其有关法国的书中写道："保王党人、革命者和波拿巴主义者不仅誓不两立，而且身为性格冲动的法国人，他们还对彼此的认知能力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厌恶。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不由自主地断定：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谬误的帮

凶。这是再清楚不过、再确定不过的事实。每个党派都会严肃地告诉您，对立方的捍卫者都是极其愚蠢的人或刻意的撒谎者。而当您遇到这些捍卫者们时，他们也会对您说同样的话来评价他们的对手，您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他们既不愚蠢也没刻意撒谎……”

各党派信徒彼此间的这种憎恨，使得法国政府和内阁的更替成了家常便饭。少数党从不会拒绝结成联盟来反对执政党。我们知道大批社会主义革命者入选现今的议会，靠的就是比大革命时代聪明不了多少的君主专制主义者们的帮助。

宗教与政治上的冲突并非法国不和的唯一原因。挑起这些冲突的人都有一种特定的心理，即之前描述过的“革命心理”。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总想着要推翻既定的秩序，而无论这种秩序是什么，即便这种秩序符合他们的愿望。

在法国，党派间的不包容以及对权力的渴望，被自大革命时起就广泛传播的信念——依靠法律来重塑社会——放大了。一个现代国家，无论谁当首脑，在民众和领导人眼中，它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它是神的意志的化身，它是以往历代君主的继承人。对政府力量的这种信心不仅感染了人民，也感染了所有的立法者[2]。

尽管疲于立法，但政治家们仍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本身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力。伟大革命幻想的继承者们没有看到，人是由过去所创造的，我们无法重置过去的根基。

原则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造成了法国的分裂，未来仍将会长时间继续下去，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冲突会导致什么样的新动荡。如果本纪元前的雅典人能预测到他们的社会冲突将导致希腊被奴役，他们一定会停止纷争，可他们又怎么会预见到这个结局呢？吉罗（Guiraud）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代人都极少能明白其使命。每代

人所为之奋斗的未来常与他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二、法国革命运动百年回顾

在解释了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运动的心理原因之后，现在可以对接连不断的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胜了波拿巴之后，反法联盟的君主们把法国恢复到了原来的疆界，把唯一的王位人选路易十八扶上了王位。

根据一个特别的宪章，新国王接受代议制并成为立宪制君王。他认可所有的大革命成果如民事法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对变卖的国家财产不予追究，且只有支付了一定税款的纳税人才有选举的资格等。

这部自由宪法遭到极端保王党分子的攻击。前政权流亡分子想重新拥有国家财产，并恢复他们曾有的特权。

出于担心这种局面会引发新一轮的革命，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众议院，并推选温和派的议员，这样路易十八就能在不触动大革命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继续统治，因为他深知，要把法国人带回到旧政体中，这无异于逼其造反。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图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十分狭隘的查理十世无法理解身边的新世界，并自诩自1789年以来他的理念不曾有丝毫的改变，他准备了一系列反动的法律议案：给予流亡分子十亿里弗赔款、强化亵渎法、恢复嫡长子权、教士权等。

由于大部分议员日复一日地反对他的计划，于是在1830年，他颁布了解散众议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论自由，并准备复辟旧制。

这一君主专制的举措立即引发了反应，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开始了联盟。为发动巴黎人民起义，共和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自由保王党人联合到了一起。法令颁布四天后，起义者们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国。

运动的领导者如梯也尔、卡西米尔-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叶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为法兰西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统王朝的贵族们的敌视，这位新国王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在一项选举法将选举人数缩减至不足二十万人后，这一阶级在政府中独大。

不过国王的处境并不轻松。他要对付拥护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孙子的正统主义者，对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仑为首的波拿巴主义者，还要对付共和主义者。

在1830～1840年期间，与大革命俱乐部类似的秘密社团挑起了无数次的骚乱，不过都很快被镇压下去。

但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并未停止他们的密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利女爵（De Berry）试图在旺代地区起义，结果失败。至于教士阶级，他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发动了一场起义，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被毁掉的。

共和主义者构成的威胁不大，因为在与他们的斗争中，众议院站在国王一边。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强权，他声称统治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理性和大炮。”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对理性有所幻想。

这个“强势政府”实质上一点也不强势，共和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蠢蠢欲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

Blanc）声称政府有义务给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拉科代尔（Lacordaire）和蒙塔朗贝（Montalebert）所领导的天主教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政府，这和如今比利时的情形一样。

1848年，一场拥护选举改革的运动引发了一场暴动，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难以解释。人们对他几乎无可加以指责。诚然，他不信任普选，但法国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选。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样独裁，因此，无法像后者那样随意废止妨碍他的选举。

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建立普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选出国民议会的九百名议员。

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密谋与暴动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心理学现象再度呈现出来。一些俱乐部形成了，俱乐部的领导人鼓动民众冲击议会，动机是五花八门，一般毫无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兰起义等。

为了安抚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会主义者，议会组建了国有工厂，工人们在此可以从事各种劳动。有人算过，为了这十万名工人，国家每周的花费超过一百万里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劳而获的要求，这让议会不得不关闭了工厂。

这一举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动的导火索。五万名工人参与造反。议会受到了惊吓，将所有行政权交与卡芬雅克（Cavaignac）将军。在持续四天的镇压闹事分子的冲突中，三名将军和巴黎大主教丧生。根据议

会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受此打击，革命社会主义一蹶不振长达五十年。

这些事件使得国家公债价格从116里弗跌至50里弗，商业停滞。受到社会主义者威胁的农民以及税收被议会提高一半的资产阶级，转而反对共和国，当路易-拿破仑承诺重建秩序时，受到了热烈的相应。根据新宪法，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需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路易-拿破仑获得五百五十万张选票当选。

不久，因为和议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仑决定发动政变，议会被解散，三万人被逮捕，一万人被流放，一部分议员被驱逐。

这场政变尽管草率，然而却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在提交全民表决中，这场政变获得了八百万张选票中的七百五十万张。

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被大多数人拥立为皇帝。法国民众对蛊惑人心的政客和社会主义者的憎恶促成了帝国的复辟。

在帝国成立初期，拿破仑三世延续了专制体制，在后期则采用了自由政体。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当战败投降后，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便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毁，约两万名起义者被处死。

1870年战争之后，经历如此多劫难且不知道谁能靠得住的选举者们，把众多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选进了制宪议会。由于无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任命梯也尔先生为共和国总统，随后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接替他出任总统。1876年，新一轮的选举将一大批共和主义者送进了议院，且以后的选举都是如此。

自此之后，先后出现的议会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导致政府频繁更替。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间的平衡，我们才享受到了长达四十年的相对的安宁。共和国的四位总统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区那样的暴动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人民运动差点推翻了共和国，不过共和国打退了来自所有党派的进攻，最终还是安然无恙。

共和国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很多。首先，参与角斗的派系没有谁强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其次，国家的元首仅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拥有实权，我们不能把所遭的罪归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证能有所改变。最后，权力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人的手中，责任由此也被稀释，很难界定谁该承担责任。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却无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以来起义和革命在法国引发的巨大变化，那就是：用强大的难以摧毁的集体专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个人专制。在渴望平等并习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的人民看来，个人专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而集体专制则较为容易接受，尽管通常它更加强硬。

国家主义专制的扩大是我们各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先后出现的所有政体的共同特点。这种专制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理想，法国持续的动荡只使得这种专制形式得到强化。国家主义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体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选票支持的体制。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国，都是空洞的标签，是无为的影子政体。

[1] 要评价近来的思想演化，可以参考饶勒斯（Jaurès）先生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演讲的片段："如今的辉煌是过去努力的结果，法兰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时代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是通过经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2] 在我发表了一篇有关立法妄想的文章后，我收到了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参议员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来信，信中内容摘录部分如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二十年的经历让我明白，您所言不虚；我曾多次听到同事对我说'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政府的错'等一类的话。但在我们的血液中，君主专制意识已经流淌了长达十四个世纪。您又能怎么样？"

第三部分 革命原则在当代的演变

第一章 大革命以来民主信仰的变迁

一、大革命后民主思想缓慢传播

深入人心的民主思想可以影响好几代人。在法国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也符合这条规律。

法国大革命行使政府职能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其革命原则的影响却很深远。它如宗教信仰一般，影响着几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走向。尽管偶有间断，但法国大革命依旧在挫折中延续。波拿巴不仅要颠覆世界、改变欧洲版图，他还要再现亚历山大的辉煌。他将法国大革命确立的新人民权利固化为制度和法典，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军事上的建树很快便灰飞烟灭了，但他所传播的革命原则却流传了下来。

继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接踵而来的复辟让人们几乎忘记了革命原则。在五十年期间，革命原则的传播相当缓慢，或许可以说，革命原则已经被人废弃。只有少部分的理论家还依据这些原则行事。作为纯粹的雅各宾思想的传承人，他们也认为可以通过法律来重塑社会，而且还坚信第一帝国只是革命事业的中断，他们希望重续革命。

他们期盼着能够重启革命，竭力以写作来传播革命原则。他们忠实地追随着革命者，却从不考虑他们的改革计划是否符合人性。他们为理想的人类建立了一个空想社会，他们坚信，只要他们的梦想实现了，人类就可以获得新生。

各个时代的理论家们虽没本事去建设一个社会，但却能够摧毁一个社会。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曾断言："即便君主制像花岗石一样坚固，空想家们也可以将其击得粉碎。"

在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皮埃尔·勒鲁

（Pierre Leroux）、路易·布朗（Louis Blanc）、基内（Quinet）等一类杰出的空想家群体中，只有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明白思想和道德的转变必须要先于政治的变革。这个时期的空想家所进行的改革计划不仅没有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反而延缓了民主进程。有些空想家还声称，为了实现共产社会主义，要重新进行大革命，结果不但资产阶级，甚至连工人阶级都受到了惊吓。我们注意到，这种惊吓是导致帝国复辟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写手们费尽心思得出的空想理论不值得讨论，但为了探究一下在如今被人不屑一顾的宗教观、道德观的作用，对这些空想理论做个大致了解还是必要的。改革家们坚信，新社会与旧社会一样，若没有宗教与道德信仰，便会一事无成，因而他们总是热衷于建设宗教与道德信仰。

但根据什么来建设呢？毫无疑问，当然是理性。既然利用理性可以造出复杂的机器，为何不能用理性造出表面上看起来更为简单的宗教与道德呢？没人去质疑宗教与道德信仰是否是以理性为逻辑基础。奥古斯特·孔德本人没看到其中有多少理性。我们知道孔德创办了所谓实证教[1]，而且还有6名信徒。他们设想以一位新教皇来代替天主教教皇、来领导教士。

我在此重申，理论家们的一切政治、宗教及道德的观念，在漫长的时间里，只会让民众疏远民主原则。如果民主原则最终得到大范围的传播，这也不是理论家的功劳，而是新出现的生活环境使然。得益于科学发明，工业得以发展，大量工厂得以建立。政府、人民的考量逐步放在经济发展上，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尤其是工会运动——当代的民主形式——的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大革命三个基本原则的不同结局

可以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概括为一句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如前所述，“平等”原则的影响巨大，“自由”与“博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虽然词语浅显易懂，但对其理解总是因时、因人而异。对于同一词汇，不同精神状态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历史冲突频发的主要成因。

对于国民公会而言，“自由”是指可以随心所欲地实行专制统治。对于一位年轻的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意味着可以打破一切束缚他的东西，如打破传统、法律、特权等。对于现代政治雅各宾主义者而言，“自由”则意味着可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

政治演说家们在演说中还会时常谈及自由，但已不再提及博爱。他们教导的是阶级斗争，而非和睦相亲。这加深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所属政党间的仇恨，加剧了彼此间的分裂。

自由原则变得愈发模糊，博爱原则业已荡然无存，唯有平等原则欣欣向荣。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政治动荡之后，法国不但依然坚持平等原则，并且还大大发展了平等原则，使之成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法律、道德、习俗的基石，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它是名副其实的大革命遗产。最近发生的民主革命，即社会主义，它不仅主张法律上的平等，还主张地位与财富的平等。生物学、经济学历来强调优胜劣汰，但人类却与此相反，对平等的强烈渴求让平等原则大行其道。情感与理性的缠斗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此阶段，理性难敌情感。

三、知识分子的民主和人民大众的民主

一切颠覆世界的思想都逃不脱两个规律：一是这类思想的演化缓慢；二是这类思想会因受众精神状态上的差异，而变得意义完全不同。

一种信条犹如一种生物。它只活在变化中。书本必然无法及时应对

这些变化，沉积在书中的只有过去的事物，书本只能描述死了的过去，而从不反映活的现实世界。涉及信条的文字叙述通常呈现的都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在另一本书中曾阐述过制度、语言、艺术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演变过程，且还一并指出这些变化的规律与书本中所讲的是多么的不同。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在研究民主思想时很少关注成文的信条，而只研究信条背后的心理要素以及接受这些信条的各类人的反应。

同一个原理，在具有不同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其意义千差万别，它似乎是一种随处可贴的标签。

这类原则不仅可以用来解释宗教信仰，还可以用来解释政治信仰。比如，当涉及“民主”时，应该研究一下“民主”一词在不同民族中的具体含义以及在同一个民族中，知识分子的民主与大众的民主是否存在着巨大差异。

现在我们来谈谈大众的民主。很显然，书本与报纸中的民主思想都是文人们的纯理论，普通民众对此不了解，而且普通民众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理论上，工人阶级可以通过竞赛与考试来突破横亘在不同阶级之间的藩篱，但这样的机会却微乎其微。

知识分子民主的唯一目的就是建立选拔制度以选拔领导阶级。且不说这种选拔是否是真实的，但它贯彻的却是波拿巴的格言“政府的实质就是以民主形式实行精英统治”。

不幸的是，知识分子的民主其结果只是由极度专制、狭隘的寡头政治取代了国王的天授神权，然而推动“自由”的目的不在于以一种专制来代替另一种专制。

与前者一样，大众的民主绝不是为了推出领导者。大众的民主竭力

主张“平等”、要求改善工人命运，因此它不能接受“博爱”，它不在意“自由”。大众的民主只认可专制的政府，人们不但可以从大革命以来出现的所有专制政府都大受欢迎这个现象中看到这一点，更能从领导工会的专制方式中觉察到这一点。

知识分子民主与大众民主的巨大差异，工人阶级比知识分子看得更清楚。二者在精神上没有任何的共性，二者说着不同的语言。工会今天还特别申明不可能与任何资产阶级政客结盟。这番话说得斩钉截铁。

实际情况历来如此，这或许就是自柏拉图至今的大思想家们绝口不替大众民主辩护的原因。

这一现象使埃米尔·法居特（Emile Faguet）感到震惊，他说：“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在我写《十九世纪的伦理学家与政治》（*Politiques et Moralistes du 19 Siècle* ）一书时，我希望找一位民主主义者，向其请教他的民主信念，但结果一个都没找到，这让我非常失望。”

这位优秀的作家肯定可以从职业政治家中找到很多民主主义者，但职业政治家是思想家的却是凤毛麟角。

四、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民主平等化

如何调和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与民主平等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难题之一。我们很清楚民主的诉求。让我们看看自然界对此有何反应。

从古希腊英雄时代直至当代，那些撼动世界的民主思想一直绕不过“与生俱来的不平等”这道坎。少有观察者对爱尔维修（Helvétius）提出的“教育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表示赞同。

事实上，自然界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平等。天赋、美貌、健康、活力、智慧总是因人而异，但拥有这些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优势。

任何理论都改变不了这些差异，除非遗传法则能够均分人的能力，否则民主信念只能停留在文字中。

连自然界都拒绝平等，难道社会就可以人为地建立起平等来？

部分理论家一直认为教育可以实现全民平等，但多年的经验表明，这只是天方夜谭。

不过，风头正劲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清除全部的精英从而实现暂时的平等，这点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一个民族压制自己的精英，而其周围的国家却在依靠精英发展，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显而易见。

自然不仅不懂平等，而且还始终强化等级差异，也即扩大不平等，来实现发展。只有不平等才使得地质时期的低级细胞进化为高等生物，而高等生物的创造力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

在社会中同样也有这种现象。不过从百姓阶层中选拔人才的民主形式最终还是会出现一个知识精英阶层，但这却违背了理论家们欲将上层和下层人民一视同仁的初衷。

在不受平等原则规约的自然规则之外，又出现了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条件。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

人们惊奇地发现，尽管法律和制度要求人与人的平等，但文明的发展却倾向于加深不平等。农民与封建男爵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工人与工程师的知识差距却在日益加大。能力逐渐成为发展的要素，由此，各个阶层的精英们的地位不断提高，而平庸者只能原地踏步或地位下降。面对这种必然性，法律又能怎么样？

能力不济者即便声称人多势众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研究所侧重的高人一等的大脑，他们很快便会陷入贫苦与混乱之中。

精英们在现代文明中的关键作用无须多言。文明国家和野蛮民族都存在着一群平庸者，文明国家的真正优势仅仅在于拥有精英。美国充分理解了这一点，因而它禁止中国工人进入其领土。中国工人与美国工人的能力相当，对薪资要求低，势必会成为美国本土工人的劲敌。

尽管世人皆知这个道理，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依旧日渐激烈。没有哪个时代对精英的需求有这么大，但他们的境遇也从未有如此的艰难。

---

[1] 实证教也称人道教，是孔德晚年创立的，他试图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但这仅是乌托邦的设想。——译注

第二章 推进民主的结果

一、缺乏理性价值观对社会演化的影响

大家知道自然法则与民主愿望并不一致，但人类头脑中早已固化的法理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人类只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会考虑它的实际价值。

研究这种信仰的哲学家理应讨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并特别关注它对人的影响。

在对历史上的主要信仰进行阐释时，做这种区分尤为重要。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朱庇特（Jupiter）[1]、摩洛神（Moloch）[2]、毗湿奴（Vichnou）[3]等一系列的神灵只是一些朴素的幻象，然而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也可以运用这种区分对那些在中世纪流行的且有成千上万人顶礼膜拜的信仰加以阐释。这些信仰影响深远，好像现实中真的存在过，尽管它们也是幻象。

若有谁对此心存疑虑，那么只要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统治与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便可释怀。前者具体而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幻。后者尽管基于想象之上，却也同样强大。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多亏了教会，那些半开化的民族才接受了各种社会规范，若没有这些规范，文明也将无从谈起。

教会的强势表明，某些幻象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甚至强大到可以催生出——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做到——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格格不入的一些情感，比如，迷恋修道士生活、渴望殉道、参加十字军东征以及宗教战争等。

把上述思考运用于隶属民主思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人们便可得知，即使这些思想无任何坚实的基础也无妨，只要它们能震撼灵魂就足够了。即便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听之任之。

新信念的倡导者们没有必要为信仰去寻找理性基础，那等于自寻烦恼。他们只要做一些断言，让人们有所期待，便足以说服很多人。但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固有的宗教意识，经年累月中，只有崇拜的对象在改变。从哲学角度来简单审视一下民主演化的种种结果，可以发现民主进程在不断地加快。可以说，中世纪的教会对人们的精神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从民主理念的结果来看，它们的影响力同样也不容小觑。

二、雅各宾思想和民主信仰心理

当代人不仅继承了革命原则，还继承了使革命原则获胜的特殊心理。

在研究雅各宾思想时曾描述过这种心理，我们发现，这种心理把幻想当作真理加以强行推行。最终，雅各宾思想在法国和拉丁区变得十分普遍，征服了包括最保守的党派在内的所有政党。资产阶级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民众则更胜一筹。

雅各宾思想的蔓延使得人们倾向于借助暴力来施行一切政治观念、制度和法律。因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和平而有序的工会运动，一到法国就变得咄咄逼人、难以驾驭，变成骚乱、怠工与纵火。

雅各宾思想深深腐蚀了普通民众的头脑，懦弱的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在最近一次铁路职工代表大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怠工，大会的一名书记还以“请允许我向所有怠工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这种普遍心理导致社会越来越混乱。我之前指出，法国之所以没有陷入不断的革命中，是因为瓜分法国的各路政党其彼此间势均力敌，它们之间互相仇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足以制服对手。

雅各宾式的偏执四处蔓延，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助暴力，用最彻底的方式来对付它们的敌人，也即对付那些稍有不从的政党，直至剥夺其财产。如今我们的统治者就像古代的征服者一样，不会给战败者留下任何念想。

偏执不是大众阶级的专利，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米什莱（Michelet）很早就发现，有修养的人有时比普通民众更加暴力。他们或许不会去打碎路灯，但却随时准备让人的脑袋落地。大革命中最令人发指的暴力便是由有修养的资产阶级、教授、律师等人所为，然而人们却指望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教授们让社会风气变得温和。

浏览大学教授们编辑的高水平的刊物便可明白，如今的传统教育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做得并不比大革命时代好多少。

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一样充满暴力，这些命运的宠儿为何会心生仇恨，这实在令人费解。

这些人若宣称自己深受利他主义影响，则很难令人信服。人们更愿意相信，撇开狭隘的宗教思想不谈，吸引当权者注意或者制造轰动效应才是他们在其作品中宣扬暴力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在以前的一部著述中，我曾引述过法兰西学院一名教授的著作中的章节，作者在书中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并号召人们去抢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由此我得出结论，从这些信口雌黄的作家当中，很容易找到一场新的革命所需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卡里耶等人。

雅各宾主义信仰，犹如古代的神，对那些混沌未开的人有着特别的

吸引力。被这种信仰所蒙蔽的人均以理性为指南，而支配他们的唯有激情与幻想。

因此，民主思想的演变不仅引发了上文提及的政治运动，还对现代人的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的宗教教义早就变得空洞无物，但民主理论不但不空洞，而且还遍地开花结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普遍存在的对优势群体的仇视心理。

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在所有阶级中都充斥着一种仇视心理，仇视社会地位、财产、智慧不同一般的人。

于是造成嫉妒、诽谤、好斗、嘲笑、迫害横行，龌龊不断，人们不相信正直、无私、智慧。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开口便是诋毁、贬损，连过世的先贤都不放过。曾被一个国家视为最宝贵遗产的伟人，也从来没遭受过这么多著述的诋毁。

嫉妒与仇视似乎是民主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此类情感的影响从未像如今这么大，它使每一位见证者都感到震惊。

布尔多（Bourdeau）描述道："有一种卑劣的蛊惑人心的天性，它毫无道德追求，它只想让人类社会不断堕落，由于这种天性，一切优势，甚至文化优势，都被视作对社会的冒犯，正是出于这种卑劣的平等情感，雅各宾派的刽子手才砍下拉瓦锡和谢尼耶的头颅。"

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好比一种不断加速的机械运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变得日趋严重，这点体现在后果日益严重的事件之中：铁路工人罢工、邮政工人罢工、装甲舰爆炸，等等。谈及一分钟内造成五千多万里弗损失、两百多人当场死亡的"自由号"装甲舰的爆炸，前任海军部部长德·拉内桑（de Lanessan）做了如下表述：

> 侵蚀我们海军的恶，就是吞噬我们军队、行政、公用事业、议会体制、政府体制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恶，这种恶，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即精神与事物的无序，以至于一切都不按理性要求进行，人们的行为举止也不再遵循职业要求与道德要求。

对在“耶拿号”（Iéna）事件后发生的“自由号”悲剧，巴黎市议会主席菲利克斯·鲁塞尔（Felix Roussel）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 在我们的海军中出现这种恶的原因不足为奇，这种恶很普遍，它由三个名词组成：不负责任、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这些引述在证实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同时，还表明了共和政体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们已经察觉到社会的混乱状态[4]。对此，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又深知自己无力去改变。这说明，心理的影响力大于我们的意志力，社会混乱的状态是心理影响的结果。

三、普选及当选者

普选可能是民主信条中最基本的且特别具有诱惑力的一个。它向大众传达了平等的概念，至少，在短时间内，在投票箱面前，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学者还是文盲，大家都是平等的。在投票处，一名部长会与其佣人中最卑微的一个并肩而立，在这短暂的一刻，两者的权力完全相同。

包括大革命时期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惧怕普选。对于普选，事实上从一开始便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普选意味着民众有权选择有管理能力的人。让品行一般、知识浅薄、思想狭隘的仅有人数上的优势的民众来评判候选人孰优孰劣，这似乎令人十分难以接受。

用帕斯卡（Pascal）的话来说“多数原则比较直观，让人信服，因而是最好的途径，但却是最愚蠢的主意……”从理性角度分析，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当今时代，普选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制度所代替，因而必须接受它、适应它。

反对普选是毫无意义的，应记住王后玛丽·卡罗琳娜（Marie Caroline）[5] 告诫与之作战的波拿巴的话：“在开明时代，连一个鞋匠都与政府据理力争、指手画脚，没有比统治这些人更恐怖的事情了！”

其实，反对意见并不如表面那般强烈。大众心理的规律表明，那种认为有限选举给出的人选就要比普选出的人选优秀的说法是极不靠谱的。

大众心理的规律还表明，所谓普选其实是一种纯粹的空想。除了一些特定情况外，群众只会听从领导者的意见。因此，事实上普选是最有限的选举。

这正是危险所在。普选的危险表现为：参与普选的一些小的地方委员会，它们类似大革命时期的俱乐部，它们的创立者，成了普选的操纵者，谋取委任的人选由他们指派。

谋取委任的人一旦被任命，便会行使地方绝对权力，前提是满足其所属委员会的利益。出于这种要求，国家利益几乎被完全抛在一边。

很自然，委员会要的是温顺听话的傀儡，而不会选择天资聪颖的人，更不会选择品德十分高尚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性格平和、社会地位低下、始终温顺的人。

于是乎，这些小团体赞助参选者，参选者则对其卑躬屈膝，唯命是从，若无赞助，参选者将什么都不是。参选者的政治抱负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听话才能干得久。

只有个别因名声、地位或财产而享有崇高威望的名流，才能不受把

持着地方小委员会的少数胆大妄为者的专权的影响，成为普选中的赢家。

所有民主国家和法国一样，都仅在表面上实行普选。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民众不感兴趣的也从不要求的法律，如收购西部铁路的议案、关于宗教组织的法律等，都获得了通过。这类荒谬的现象不过是狂热的地方小委员会提出要求且它们所挑选出来的代表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观察所选出的代表们的所作所为，便可明白这类委员会的影响。温和的代表们被迫支持破坏军工厂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便与反军国主义者结盟，也就是说他们附和各种最恶劣的要求，只是为了确保自己连任。就这样，民主国家中最为卑劣的人的意志通过当选代表得到了确立，可以说，道德、习俗也会变得卑劣不堪。如尼采（Nietzsche）所说，政治家是政治的主人。

有政治（place publique）的地方，就会有伟大的喜剧演员的喧闹声，就会有毒蝇的嗡嗡声……喜剧演员只想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只想获得人们的信任。明天，他有一个新的信仰，后天，他有一个更新的信仰……一切伟大都与政治无关，与荣誉无关。

四、改革需要

借助法令突然推行改革，是雅各宾精神中最具危害性的思想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的遗产之一，是造成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之一。

弊端重重，但又难以厘清其中真实起因，这是人们一直渴望进行改革的心理诱因之一。为了解释改革的必要性，于是便编造出一些过于简单的牵强的理由，整治弊端的手段自然也就简单粗暴。

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不亚于一场小型的革命。尽管改革不断，或者说正是由于改革，我们成了欧洲进步最小

的民族之一。

通过不同民族的社会主要因素如经济、工业的对比，我们可以判断出我们的发展十分滞后。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民族，发展十分迅速，而我们却步履蹒跚。

我们的行政、工业、商业组织太过老化，无法满足新的需求。我们的工业死气沉沉，海上贸易困难重重。尽管享有大量财政补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殖民地，我们依然无法与外国竞争。前任商业部部长克吕皮（Cruppi）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强调了这种令人悲伤的颓败。接着他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认为可以借助新规则轻易扭转这些劣势。

所有的政治家都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发展十分缓慢的原因。每一个政党都坚信，可以通过改革解决所有问题。正是这种信仰使党派纷争不断，使法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分裂的也是最混乱的国家之一。

决定民族兴衰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个人及其方式，这点无人能懂。卓有成效的改革，不在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在于日积月累的改进。像地质演变一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时间不断地为它添砖加瓦。德国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证明了这条规律的正确性。

尽管有些重大事件不乏运气的成分，但量变引起质变这点依然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有时可能不到一天就结束，但若想成功，则必需精心准备良久。我们在1870年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6]，而后俄国也尝到了这个滋味。在那场关系日本命运的对马岛（Tsushima）的战役中，东乡平八郎（Togo）上将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全歼了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胜利正是由无数个长期准备的细节换来的。导致俄国失败的因素很多：和我们一样冗杂、不负责任的官僚机

构，昂贵却质量低劣的设备，上上下下的腐败以及对国家利益的漠不关心等。决定民族繁荣的质变依赖于量变的积累，不幸的是，小事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对政治家的选举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政治家们总是无视这些小事、任其积累，最终酿成大祸，使得国家走向衰落。

五、民主国家的社会差异与各国民主思想

在将人分成不同等级并根据出生来区别对待的时代，社会差异被视作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结果而受到普遍的认同。

旧的等级制度被摧毁后，等级差异便显得不伦不类，让人难以容忍。

平等仅存在于理论中，人们注意到，在民主国家里，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在迅速增加，制造不平等的人为自己确立了明显的主宰地位。此时的人们对头衔和勋章的渴望可谓史无前例。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如美国，头衔和勋章没有任何吸引力，只有财富才能体现差异。年轻的百万女富豪能看得上古老的欧洲贵族头衔的极为罕见。即便如此，也是出于本能，是想利用这唯一的方式为过于年轻的种族增添些历史厚重感，以稳固其道德体系。

总体而言，美国式的贵族不是建立在头衔和勋章的基础上，它只与金钱有关，所有人都有希望在某一天成为贵族，因而很少有人嫉妒贵族。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关于美国民主的一书[7]中指出人民普遍希望平等，但他却忽视了他所期待的且仅以金钱为基础的平等仍会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除此之外，美国一无所有，或许有一天欧洲也会如此。

其实，法国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只是文字上的民主。因此，如前所述，有必要探究一下在冠以“民主”的国家中民主的不同含义。

估计只有英国和美国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尽管民主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原则无异，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存在宗教迫害。只要有能力，无论年纪大小，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宏图大展，个人发展没有任何的障碍。

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们相信，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工人们都知道自己能够成为工头，能够成为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工程师的禀赋与常人无异，它和其他职业一样，都需要从底层做起，而在法国则不同，工程师从一开始便高高在上。正因如此，在法国愈演愈烈的阶级仇视，在英国与美国却并不明显。

在法国，民主只存在于演讲中。针对青年的考试与竞赛制度，使得某些职业拒人千里之外，由此造就了一批批阶级敌人。

拉丁民族的民主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中央集权专制代替了君主专制，但其行为同样残酷，财富世袭制取代了出生世袭制，但特权现象并未减少。

此外，君主制与民主制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所产生的结果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精神状态的差异。一切有关政体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政体本身没有任何优劣之分，决定其优劣的历来是其所管辖的人民。

一个民族只有明白国家地位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努力的总和而不是政府，才能实现快速发展。

[1] Jupiter，也即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第三任神王；克洛诺斯和瑞亚之子，掌管天界。——译注

[2] 古代迦南市民们聚集时敬拜的一尊青铜神像，圣经称之为“摩洛神”。摩洛神又称巴力，是个长着牛头的风暴之王，摩洛神能带来毁灭性的洪水或干旱，人们要以活的婴儿做祭品来祭拜它。——译注

[3] 也译为维湿奴、维修奴，也称诃利（Hari）、幻惑天王、那罗延，佛教称为遍入天，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梵天主管“创造”、大自在天湿婆主掌“毁灭”，而毗湿奴天即是“维护”之神。印度人大多信仰湿婆，另不少人信奉毗湿奴，故印度神话故事因作者派系不同，常有扬此贬彼之情况。依照印度教的说法，毗湿奴拥有十种化身，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佛也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宣导独特的言论，以迷惑罗刹等恶鬼神，维护世界的秩序。——译注

[4] 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存在着这种无序状态。人们可以从多赛（Dausset）先生提交给巴黎市议会的一份报告中找到很多有趣的例子。“应以高效服务为要务的公共路政部门却成了墨守成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代名词，人财物都不缺，却把人财物耗费在无用的琐事上，没有秩序、没有创新、没有章法，总而言之一个词：无组织。”随后在谈及这类部门的那些随心所欲、意气用事的负责人时，他又说道：“这些领导彼此之间完全不了解，他们只规划自己的项目，而不管不问其他部门的项目，没有人把他们召集起来做些协调工作。这也是为何一条路今天被挖开，明天被修补，过几天又被挖开的原因，因为水、电、气、排水等部门之间彼此嫉妒，从不想着去协调一致。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浪费惊人，如果私营企业这么干的话很快便会破产。”

[5] 玛丽·卡罗琳娜（1752—1814），罗马帝国皇帝弗朗索瓦一世与奥地利国母、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玛丽娅·特蕾莎之女，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胞姐。1768年与西班牙波旁王朝查理三世之子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结婚成为那不勒斯王后，在那不勒斯推行“开明专制”。波拿巴军队在占领、统治那不勒斯时期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不久后便退出那不勒斯，玛丽王后有感而发说了上述话语。——译注

[6] 是指1870年普鲁士大败法国的色当战役。——译注

[7]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这里指的是他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译注

第三章 民主信仰的新形式

一、劳资之争

在我们的立法机构恣意进行改革、立法之际，世界继续着其缓慢的自然演化。一些新的利益格局出现了，不同民族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工人阶级焦躁不安。方方面面都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而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们却对此束手无策。

在这些新问题中，由劳资双方对峙引发的冲突最为棘手。即使在英国等传统国家，这种冲突也十分激烈。工人不再履行曾被视作劳资契约关系的集体合同，工人们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便会罢工，另外失业率、贫困率之高也令人担忧。

在美国，没完没了的罢工运动阻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催生出了解决方案。十年来，工业巨头组织起了强大的雇主联合会，要求工人们按照仲裁程序来解决问题。

法国因自身人口增长停滞，因而不得不接受大量外国劳工，这些人的到来使得法国的工人问题复杂化[1]。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土地快要承受不了众多的居民时，这些居民必然会侵入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人口增长停滞的国家很难应对这样的入侵。

同一个国家中的劳资之间的冲突还会因外部的竞争而加剧，如亚洲人要求低，因而工业品价格低廉，而欧洲人要求高。二十五年前，我就已经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汉密尔顿（Hamilton）将军[2]，派驻日军的前军事专员，在战争结束前就预言日本会取得胜利。在一本著作中，朗格卢瓦将军（Langlois）这样转述道：

> 我认为工人应该做出选择。鉴于当今的世界格局，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孩子们的军事理念，使之自觉肩负起军国主义的考验与重担，甚而要为生存而开展

一场残酷的斗争，以对抗势不可挡的竞争对手。要想阻止亚洲移民，避免因竞争导致工资降低，并拒绝移民进入我们的生活，办法只有一个：刀剑。如果美国和欧洲忘记自己的特权是靠武力赢来的，亚洲很快便会采取报复行为。

不过讨论这些问题为时尚早，眼下的问题已经让人焦头烂额，其他问题只能暂时搁置一边。

二、工人阶级的演变与工团运动

当前最主要的民主问题，可能是由近期的工人阶级演变造成的，而这种演变又是工团运动造成的。

这种把有着共同利益的人聚集在一起构成工团的运动也称工团主义（syndicalisme）[3]，工团主义发展迅速、声势浩大，遍及各个国家，堪称世界性的运动。一些工团组织的预算与小国不相上下。在德国有的组织经费高达81000000法郎。

工团运动的发展表明它和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工团行动的目标、手段、趋势都与社会主义毫无瓜葛。我在《政治心理学》一书中已做过详尽阐述，在此只需简单回顾一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社会主义政府将所有企业收归国有、统一领导，将收入平均分配给国民。与之相反，工团反对国家介入，它将社会切分为行业集团，并进行自我管理。

深受工团蔑视与打击的社会主义者想方设法去淡化冲突。但随着冲突愈演愈烈，二者间的冲突最终无法掩藏。社会主义者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很快便会消失。

工团主义的快速发展是以社会主义的没落为代价。尽管这类经过革

新的合作运动由来已久，但它身上却体现了现代工业专业化分工的某些要求。实际上，我们在各行各业中都看到了这一点。

工团运动在法国的发展不及其他国家。前文提到过，工团运动在法国采取了革命的形式，并暂时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把工团当成一个普通的组织，他们仅是利用这个新的学说来设法摧毁当前的社会。无论是社会主义者、工团运动者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指导思想完全不同，但他们最终的目的却是一样：暴力推翻统治阶级，夺取他们的财产。

工团主义学说和法国大革命原则毫无关系。在某些观点上，它们甚至截然相反。实际上，工团运动就是某些形式的集体组织的复活，这些集体组织与法国大革命所禁止的协会相差无几。工团还组建起了被法国大革命所禁止的某种联盟，并最终彻底否定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制。

工团运动无视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原则，要求其成员严格遵守纪律、不得随心所欲。

目前工团的力量有限，尚不足以相互迫害，彼此间还有情感交流，可以勉强称之为博爱。一旦工团变得足够强大，彼此利益上的冲突必然会引发斗争，古代意大利共和国时期如佛罗伦萨、锡耶纳等地的工团运动便是如此。之前的博爱很快便会消失，平等也被占优势的工团专制主义取代。

这样的前景并不遥远。新的力量成长迅速，无能为力的政府为保全自己有求必应。但这种退却的做法令人不齿，最多暂时有点效果，但却贻害无穷。

最近，英国的矿工协会便是以中止工业生产相要挟，为其会员们争

取最低薪资且不受最低工时的限制，对此，英国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拙劣的做法。

尽管这种要求是无法接受的，但政府还是同意向议会提出议案。对此，巴尔夫（Balfour）先生在下议院作了令人深思的沉重的讲话：

> 在漫长、动荡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从未遭遇如此巨大而严峻的挑战。陌生而阴森的一幕已经上演，一个小小的组织居然威胁要全面使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王国中的商业、制造业瘫痪。由此可见，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矿工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我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封建大地主能这样嚣张吗？有哪个依法行事的美国托拉斯会如此藐视共同利益？我们的法律、社会组织以及各行各业彼此融为一体，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这却让我们的社会遭遇到空前的危机，比在艰难岁月中的祖先所经历的危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因素第一次显示其威力，稍不留神，整个社会都将会被其吞噬……而政府对矿工的要求做出退让的表态，就等于明确承认反抗社会的那些人取得了胜利。

三、为何当代一些民主国家逐渐演变成为官僚政府

由民主思想催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斗争，使得一些政府的发展过程难以预料，使得政府的权力名存实亡。这种演变是自发形成的，它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之路，我们将简要指出这种演变带来的影响。

在民主国家，普选的代表组成了政府。他们投票通过法律，从其内部遴选或罢免部长，以临时行使行政权。只要有一票反对，部长就会被撤职，因此部长们的更换十分频繁。继任者与前任分属不同的党派，因此进行管理的原则也各不相同。

乍一看，似乎一个受制于不同政见左右为难的政府不会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然而，尽管社会形势变化无常，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依然运行得有条不紊。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答案很简单。行使行政权的部长们，实则权力有限，他们只能发表一些无人在意的演说，制定一些应景的措施。

没有实力、也干不长的部长们只拥有短暂的表面上的权力，发号施令的是政治家，他们是其傀儡，真正起作用的是一股幕后力量，它一门心思强化自己的行政权力。它的力量是基于传统、等级制及惯性之上的，部长们很快便知自己无力与之抗衡[4]。政府的责权过度分散，没有任何一位部长能够一言九鼎，稍欠周全，就会遭到由一系列规章、惯例、判决组成的巨大网络的抵制，由于自己对该网络一无所知，而根本不敢再对其冒犯不恭。

民主政府的权威只会不断下降。这是一个永恒的历史法则，我曾经谈过这个法则：无论哪个阶级，不管是贵族、教士，还是军人、百姓，只要成为统治者，都会以最快的速度征服其他阶级。如罗马军队最终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国王不敌教士阶层，法国大革命时期，全国三级会议代替君主制成为最高统治机构。公务员阶层再一次证明了这个法则的准确性。一旦他们足够强大，便会开始咄咄逼人且以罢工相威胁，如继邮政工人罢工后，国有铁路职工也举行了罢工。大政府中出现了由行政权力构建而成的小政府，如果任由发展，小政府将成为唯一的实际掌权者。待发展到社会主义制度，其他制度将不复存在。因此，所有的革命都只会造成国王的君权旁落，使其落入不负责任的、隐匿的、专制的政府雇员之手。

******

让我们的命运前景难料的所有这些冲突，它们终将何去何从，不得而知。不必悲观也无须心存侥幸，只需坚信最终一切都会达到平衡。无论个人的意志如何，世界都会继续其前进的步伐，而我们迟早也会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关键不要有太多摩擦，也不能相信空想家的幻想，他们无法重建社会，但却数次颠覆了社会。

在历史上曾一度辉煌过的雅典、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都成了这些可怕的理论家们的牺牲品，最后都无一例外地步入无政府主义、专制

和没落。

现代众多的喀提林（Catilina）[5] 无视这样的教训，他们野心勃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却不知道最终自己也会反遭吞噬。空想家们点燃了人们心中不切实际的希望，刺激起了人们的欲望，同时也摧毁了历经多个世纪缓慢构建而成的用以约束人们的堤坝。

盲目的民众对抗精英的斗争自古有之，绵延不绝。民众夺得主权，若无制约，则意味着一个或多个文明的结束。精英专司创造，民众专司摧毁。一旦精英的权力衰弱，民众就会开始冒险运动……

伟大的文明不懂得如何统治自己的国民，必然会走向毁灭。无政府主义、专制、外敌入侵以及最后的主权丧失，所有这些民主专制的后果不唯独出现在希腊。个人专政总是从集体专政中衍生出来。罗马帝国以个人专政而告终[6]，而蛮人[7] 国家则是以集体专政而告终[8]。

---

[1]

大国人口

	1789 年	1908 年
俄国	28 000 000	129 000 000
德国	28 000 000	57 000 000
奥地利	18 000 000	44 000 000
英国	12 000 000	40 000 000
法国	26 000 000	39 000 000

[2] 汉密尔顿上将（1853－1947），他是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第一个抵达日本的西方人，当时率领印度军团加入日本参加了日俄战争。——译注

[3] 工团主义即英语中的工联主义（unionism）。该学说一直都不是十分明晰，它强调的是行动而不是理论。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它提倡战斗

精神（包括怠工、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译注

[4] 身为内阁部长之一的克吕皮（Cruppi）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中指出了部长们的无奈，就连最能干的部长也会很快被其同僚架空，只得立刻缴械认输。

[5] 喀提林（约前108年—前62年）是罗马的阴谋叛变者。公元前64年，他聚集一批穷人和不满分子组建了一个革命党，口号是取消债务，均分财产，后来兵败被杀。本文借指革命者。——译注

[6] 罗马帝国（前27年～476年），是古罗马文明的一个阶段。罗马曾经有数百年的共和制历史，但自从斯巴达克起义以后，罗马进入了军人执掌政权的时代，并通过两次“三巨头执政”后，屋大维被封为“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从此罗马进入了“罗马帝国”时代。——译注

[7] “蛮族”实际上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对邻族（日耳曼人）以及亚洲一些民族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译注

[8] 举“神圣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所谓蛮人国家的例子以解释勒庞书中所提及的“集体专政”。“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962～1806年在西欧和中欧的一个封建帝国。早期是由拥有实际权力的皇帝统治的国家，中世纪时演变成承认皇帝为最高权威的公国、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的政治联合体。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完全是中世纪式的，皇帝没有实权，实际权利掌握在300多个大小领主手中，（对此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哲学家伏尔泰曾有如下评价：“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所以它的统治是集体专政的。各地领主完全自治，拥有自己的军队、朝廷，甚至有收税的权力。——译注

结论

本书着重研究了影响历史的重大革命，尤其是影响欧洲二十年且至今影响不绝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心理学资料宝库。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无法像大革命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我们提供如此多的经验教训。

在法国大革命的每一页，我们都能发现，有数不清的出现在我们书本中的原则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有短暂的大众心理和持久的民族心理，有信仰的作用，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有不同逻辑形式之间的冲突。

大众心理学所认可的一切规律在革命议会中都得到了演绎。革命议会因议员们的冲动和害怕，从而被一小撮领袖们所把持，且常违背议会成员们个人的愿望，反其道而行之。

如保王党人的制宪议会摧毁了古老的君主制，人道主义的立法议会促成了九月大屠杀，崇尚和平的立法议会让法国陷入了可怕的战争之中。

国民公会期间发生的各种背离现象，让大部分国民公会的议员们开始排斥暴力。情感丰富并宣扬平等、博爱、自由的哲学家们最终倒向了最可怖的专制。

再来看看督政府时期的那些悖论。起初，议会的主张还算是温和，并在督政府时期血腥的政变中存活了下来。它想恢复宗教和平，但最终却把数千牧师送进了苦役犯监狱。它想修葺遍布法国的废墟，却只能徒增废墟。

革命时期人们的个人愿望和议会的行为之间总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这是因为有一些他们无法驾驭的无形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他们自认为是依据纯理性行事，但实际上他们受到其无法理解的神秘主义、情感主义和集体主义所左右，我们也是如今才知道这点。

******

时代在发展，民智在开启，人类的前景美好，然而，作为灵魂其真正的基石以及其行为的动机却没有随之改变。总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片刻的不安宁。必须得承认，人类的本性终究是无法改变的。

大革命的推手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破天荒地试图以理性为依据来改造人和社会。

从未有过以此为目标的事业。而意图完成此项事业的理论家们就得采用超越任何暴君的手段。

然而，纵然大权在握且军队骁勇，纵然有严刑峻法且政变不断，但大革命最终换来的仍不过是废墟千里和独裁政权。

经验对开启民智而言不可或缺，因此这样的尝试也未尝不可。没有大革命，便很难知道纯理性是无法改变人性的，由此便知，无论立法者有多大的绝对权势，一个社会仍是无法按照立法者的心思来加以重塑的。

******

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发起的大革命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变成了一场本能与理性之间的战争，一场反抗一切束缚的叛乱。但正是由于这些束缚，人类才从野蛮走向文明。改革者们依据人民主权原则，试图将他们的信条强加于人。人民在领袖的带领下不停地对议会的决议指手画脚，且坏事做绝。

大革命期间的大众历史发人深省。它表明，那些标榜一切美德属于人民的政治家是错误的。

大革命事件告诉我们，一个不受社会文明基石束缚——的民族，一个任由本能的冲动肆虐的民族，很快便会堕落到先前的野蛮愚昧状态。每一场获胜的大众革命都是一次向野蛮的短暂回归。1871年的巴黎公社如果持续下去，大恐怖的场面恐将再一次上演。由于无力屠杀那么多人，只得将首都巴黎的主要建筑付之一炬以泄愤。

大革命呈现出来的还有从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如大众的本能、雅各宾主义信仰、传统行为、奔放的激情和欲念等，所有这些心理因素在十年的激烈冲突中得到了宣泄，它们让法国血流成河，使之成为一片废墟。

粗略看来，这就是大革命的全部，且这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需要对其加以剖析，以明白那些一直左右着大革命人物心理的动机。在平时状态下，有多种逻辑在支配着我们，如理性主义、情感主义、神秘主义、集体主义等，它们之间大体维持着平衡关系。在动乱年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冲突，人也就变得不是他自己了。

******

我们在这本书中绝没有忽视大革命所取得的涉及人民权利的成果的重要性。但是很多的历史学家和我们一样不得不承认，付出断壁残垣代价的收获原本可以在以后仅依靠文明的进步而毫不费力地获得。为了稍早实现，我们付出了多少的物质损失和道德沦丧的代价啊！人类历史上的这些惨痛场景极难被人忘却，它们一直让人耿耿于怀。

如今的年轻人似乎青睐行动而非思考。他们厌恶哲学家们沉闷冗长的长篇大论，他们没有兴趣去关心那些对事物本质还一无所知的空洞的

思辨。

行动肯定是受到鼓励的，所有的重大进步都是源于行动，但行动只有在适当的指引下才是有益的。大革命期间的人都是敢做敢当的人，但被他们奉为圭臬的虚幻却将他们引向灾难。

若罔顾现实去展开行动，执意强行改变事物的进程，那么行动将是有害的。不应当拿社会当实验室的机器做实验。我们的遭遇表明，为社会错误买单的代价极其高昂。

尽管大革命的教训显而易见，但依旧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对革命念念不忘。社会主义便是这种希望在现实中的凝练，是向低级的演化形式的一种倒退，因为它使我们最重要的行为动机瘫痪了。它用集体的责任和能动性来代替个人的责任和能动性，由此，在人类价值观的梯度上，个人变得可有可无。

如今的环境不适合进行这类实验。在空想家们追求自己的梦想并激发起民众的热情和欲望的同时，各民族也在积极武装备战。每个民族都意识到，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弱小的民族将无容身之地。

在欧洲的腹地，一个可怕的军事强国正在崛起，它渴望支配世界，以为它的商品寻找市场，为它日益增长且其即将不堪重负的人口寻找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内斗、党派纷争、卑劣的宗教迫害并施行阻碍工业发展的法律，破坏我们的凝聚力，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快便会失去，并让位与那些众志成城、懂得顺应天时而非逆潮流而动的民族。如今切不能重蹈覆辙，历史的细微处遍布不可预见的因素，但是历史的主线却是一贯的，决定事件起落的依然是永恒的法则。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英] 乔治·鲁德 著
何新 译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序
第一篇 引论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第四章 1789年7月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第九章 热月
　　第十章 芽月—牧月
　　第十一章 葡月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第十五章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
附录
名词解释[1]
参考资料
返回总目录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乔治·鲁德　著
何　新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Acknowledgement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5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鲁德著；何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ISBN 978-7-303-19900-6

Ⅰ.①法… Ⅱ.①鲁… ②何… Ⅲ.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1883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mm×980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王艳平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序

本书是过去九年中常去访问巴黎和巴黎各档案馆及图书馆的收获。因此，我谨向国家档案馆，警察总局档案馆，塞纳、塞纳-瓦兹和塞纳-马恩三个省的档案馆，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市历史图书馆的档案专家及工作人员表示最热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始终如一的合作、善意的关切以及和蔼的态度和良好的意愿。

我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兼合作者利夏·科伯和亚尔培·索布尔，他们经常给我提供意见和材料，并慷慨地允许我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事实上，我们近年的合作是如此密切，因而在本书中很难确切地辨别哪些是他们的特殊贡献，哪些是我自己的研究心得。所以，实际上，本书是一部集体创作，而不纯粹是一部个人著作。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对本书的贡献也不小，他的治学榜样，精辟的见解和亲切的鼓励使我和无数其他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一样，受惠匪浅。

我也要感谢多年来一直帮助和指导我的阿尔弗列德·科本教授，以及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并费神和我一起校阅清样的阿隆·戴维斯先生。最后，我应该特别感激我的妻子，她的耐心、谅解和亲切的照顾使我感到写作本书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

乔治·鲁德

1958年6月15日

第一篇 引论

动。

第一章 导言

历史学家一直甚为忽视的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群众的性质问题。当然，人们很久之前就承认这次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的，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乱，城市和农村的法国普通群众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都贡献了力量。巴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巴黎革命史上，人们已经公正地承认了那些伟大的“骚动日”的，也就是1789年至1795年间不断爆发的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的特殊重要意义，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各政党和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把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卷入了革命活动。

这些都是早已得到普遍承认的常识。但是，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监狱，10月进军凡尔赛把国王和王后挟回首都，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以及在热月9日冷眼旁观罗伯斯庇尔失败的那些群众，究竟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领导或影响他们的是谁？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哪些动机？他们的参加有什么特殊意义？带来了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说研究这次革命的史学大师没有解答这些问题，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由于缺乏更为精密的研究，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政治态度或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来解答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几类：一类是柏克和泰讷这样的作家，他们对革命和革命所维护的一切显然采取一种明显的敌视态度；一类是共和派历史学家，如密什勒和奥拉尔，他们认为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人民伟大的再生风暴；此外还有卡莱尔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虽然大体上同情“无套裤党下层社会”，赞佩他们的“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人似乎要造成的“疯狂世界”或“无政府状态”怀有极端的恐惧。

在柏克看来，革命群众起的完全是破坏作用，并且认为他们是由社会上最可恶的不良分子组成的：1789年10月侵入凡尔赛宫的群众是“一群满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残酷的歹徒和凶手”；王室家族是被“那些地狱冤鬼化身的、卑贱丑恶到难以形容的妇女”一路挟持着返回巴黎的。国民议会迁移到首都以后，被迫在“一群凶恶的暴徒和无耻的女人的喧嚷中”考虑问题[1]。然而，柏克的诋毁还远远抵不上泰讷，这位1848年时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被1871年的经历吓坏了的先生，他那一套咒骂的词汇以后一直为研究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引用。1789年初夏的外省起事群众，被他说成是“逃税者、私盐贩、偷猎分子、流浪汉、乞丐、多年积犯”。巴黎革命党人和攻陷巴士底监狱的群众都是最下层的社会渣滓：

社会渣滓浮上了表面……首都似乎落入了贱民和匪徒的手中……这些流浪汉、乞丐，许多人都“几乎赤身露体”，大部分像野人一样地武装

起来，面目狰狞，他们是“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人”。

10月间向凡尔赛进军的女商贩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笔下是：

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这些乌合之众包括她们碰到的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妇女。此外，还有流浪汉，在街头闲荡的二流子、土匪、盗贼，这些人都是汇聚在巴黎的社会渣滓，他们每逢动荡就浮上了表面……这就是前前后后卷入群众浪潮中的垃圾。

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赶出图伊勒里宫的起事者变成了：

几乎都是一些最下贱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贱行业的顽民，杀人不眨眼的好勇斗狠者和妓院小厮……来自各处的无法无天的冒险者，马赛人和外邦人，被驱逐出境的萨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2]

直到今天，还有人像泰讷那样把上述的以及类似事件的参加者一般称为：“暴民”“最下贱的人”“土匪”和“强盗”。[3]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称呼革命群众。每逢革命群众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资产阶级的愿望时，他们便被认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的体现者。在密什勒看来，巴士底监狱不是必须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垒，而是罪恶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体现着美德的人民所战胜；“巴士底并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它那罪恶的心灵受到谴责，它自己已经感到完全绝望。”谁攻陷它的呢？“人民，全体人民”。同样，在10月5日，当革命领袖们正在为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时，他说：“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补救办法：去把国王找回来。”妇女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决不仅是偶然参加而已：“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

疑就是妇女们。”[4] 路易·勃朗对群众的评价虽然没有密什勒那样热情洋溢，但也相差无几[5]；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激进派教授奥拉尔，尽管措辞十分谨严和引证十分丰富，但也具有同样的传统：“整个巴黎都站起来了，武装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监狱。”[6]

虽然这两个敌对的学派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和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卡莱尔惊人的想象力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发生的影响也许更大。他用多种多样的辞藻来描绘为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构成革命每一个决定性阶段的积极因素的社会力量：“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席卷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鸟”，等等。从这一切描写看来，卡莱尔郑重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企图对法国大革命作更精确的分析就不足为奇了：“千万不要试图估计和衡量这一无法衡量的事件，为它作什么说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逻辑公式。”[7]

尽管这些说法差别很大，所发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却都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不论革命群众被泰讷和柏克说成是“暴民”或“卑贱的乌合之众”，或被卡莱尔说成是“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或被密什勒和奥拉尔说成是“人民”或“整个巴黎”，这些作者全都按照个人的好恶或偏见，把革命群众看成是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和善或恶的化身。我们对此也许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些作者多数所属的19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政治方面或思想意识方面：19世纪20年代的君主立宪派如米涅和梯也尔是如此，那些受到1848年二月革命鼓舞的人如密什勒和路易·勃朗等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者如泰讷还是如此，甚至如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激进派奥拉尔也未能例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尽管他们对于革命传统的态度和大革命的领袖或牺牲者的爱憎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却全都惯于“从上层”[8] ——也就是从公安委员会办公室、国民议会或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或者革命报纸专栏文章的角度来观察历次事件及其参加者。这就使他们看不见有血有肉

的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的面貌随着革命领袖、他们的批判者或拥护者的兴趣、见解或理想而改变，因为群众的呼声是很少反映在政治家的演说或者小册子作家及新闻记者的文章中的。

然而，近50年来，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可能用比较公正，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接触这一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档案材料；虽然有时是这种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来说，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莫提梅-泰诺曾经利用过的重要史料后来已经被毁。促使历史学家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并由于这种探索的结果，而促使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宁说是20世纪新的社会标准和新的问题。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构成无套裤党人的群众成分——农民、工匠、帮工和一般劳工——已经作为具有自己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各个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再不能被看成仅仅是首都知名的记者、律师、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说与命令的响应或反映。对于大革命的这种新认识——由下而上所看到的——首先表现在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本书尽管题目就带有倾向性，却得到当时担任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奥拉尔的极大赞扬[9]。此后五十年中，亚尔培·马迪厄关于1792年至1794年间巴黎社会运动的著作[10]，拉布鲁萨教授关于18世纪物价和工资的著作[11]，特别是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关于农民、革命群众心理和1789年革命动乱的著作[12]，都大大扩充了这方面的研究领域。

如果没有这些著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动力，我也许不会想到写这本书。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因为有适当的文献资料可供利用。显而易见，参加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像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他们很少以书信、小册子、演说词或会议记录等形式留下关于他们的活动和愿望的永久记载。还有，巴黎的情况是，1871年的大火焚毁了大批市政和财政档案，因此我们丧失了一个宝

贵的资料来源。如果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就可以提供有关工匠和小店主的收入、税额及流动资本的可靠材料，而巴黎无套裤党人中最富有斗争性的分子正是来自这两种人。不过，我们还保存着一项重要的，对本书的写作也许是更为可贵的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和巴黎警察总局的警政档案，这就是本书所依据的主要文献。18世纪法国的警察制度远比当时的英国发达，因此留下了丰富得多的档案。此外，警察的反复审讯的方法及其传统的审讯笔录，为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案犯职业、住址、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和以前犯罪记录的详细材料。50年前，亚历山大·图埃特伊和马瑟勒·罗夫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些案卷作为社会历史资料来源的巨大价值[13]。然而，不知为什么，马迪厄和他的学生却忽视了这部分资料[14]，直到近年来史学家才重新注意到这些档案。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1787年至1790年间巴黎市警察局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5]和1790年至1795年间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6]，并部分引用了1793年至1795年间治安委员会的同类报告[17]。这些文件帮助我们对发生在巴黎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若干次群众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的史学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使我们能够对于参加这些运动的形形色色社会分子作更加全面和更加清晰的描绘。当然，它们只涉及一小部分参加者——被逮捕、被杀害、受伤或者被人向警察告发的人——但是，从这方面得到的一些代表人物，却常常足以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推出一般的结论。不过，关于这段时期主要革命运动——1789年7月、1792年8月、1793年5—6月和共和国三年牧月暴动以及四年（1795年）葡月暴动——的参加者，我们就必须另外参考其他资料来源：巴士底监狱攻克者名单[18]、1792年8月申请领取恤金[19]和1793年6月申请领取从军时间损失补偿金的申请者名单[20]，及专为审判牧月和葡月起事者而成立的军事法庭的记录[21]。

当我们从这些记录中或多或少地看清楚革命群众的构成时，我们反而更难断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和导使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参加这些运动的

动机（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警察局记录和那些回忆录作者、记者、国民议会代表以及政府报告人通常带有倾向性的记载相比，仍是一种丰富得多的资料来源。除去上述警察档案以外，另一种宝贵的资料来源是由希米特、卡隆和奥拉尔分别编纂的，从1792年至1795年巴黎公社、中央警察局和内政部警探的报告或舆论调查[22]。这些报告是关于小有产者以及工资劳动者特别对于那几年各种事件反应的一座资料宝库。关于早期，还没有和它们完全相等的资料，虽然关于革命爆发前夕和爆发时的资料，哈代的日记手稿比它们更有价值[23]。

此外，警察的调查报告对于在本书中起有重要作用的物价和工资变动情况来说，是一个有用的资料来源。不过，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12}和F^{13}类中发现的各种统计表和一些不常有的材料[24]。

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加以整理和在研究共和国二年情况时充分利用过的1789年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和1790年至1795年的巴黎各区文件[25]没有被充分地利用，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知道，绝大部分暴动者和起事者来自其中的无套裤党人，在起草《陈情表》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巴黎尤其少。此外，在1792年8月以前，他们在各区的群众大会和各委员会中也很少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而只是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这一个短时期内起过主要作用；但这段时期，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除1793年9月是特殊的例外，在巴黎，是一段唯一没有发生群众政治骚乱的革命时期。

本书主要研究的虽然是1789年至1795年的革命运动，但我也试图对1787年和1788年的群众运动作一番描述，它们虽然发生在1789年暴动以前，却是革命从之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骚乱的一种突出的表现。早期的史学家虽然赞赏这些年中的贵族反叛对革命本身起了开锣戏的作用（即使

不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群众运动——正如他们在革命末期，往往忽视共和国四年葡月（1795年10月）的群众运动一样，这些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起事，可是却引起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重大响应。因此，本书也许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色，即力图描绘出1787年至1795年整个时期的巴黎革命群众（在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明他们怎样行动，由什么人构成，怎样被吸引到革命活动中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了多少愿望。为此，本书准备首先叙述巴黎革命和紧临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主要由普通男女构成的群众在街头和市场上参加活动。除去1790年（这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平静时期）而外，这些骚动几乎是革命爆发前两年左右和爆发后最初六年间首都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现象。叙述了这些事件之后，本书将从参加各种运动的群众的成分、举动、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上，得出一般的结论。

但是，必须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巴黎革命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

[1] 埃·柏克：《法国革命感言》（E.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51年伦敦版，第66—69页。

[2] 希·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La Révolution* ），1876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8、53、54、130、272页。

[3] 例如，勒·马德林（L.Madelin）提到1789年7月巴黎起事者时任意使用“匪徒”和“强盗”等字眼〔参看他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 ）（1914年巴黎版）第60、66、68页〕；又如，在普·加佐特的《法国大革命》〔（P.Gaxott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8年巴黎版〕中，也随处都有这种字眼。

[4] 让·密什勒：《法国大革命》（J.Michel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8年至1900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248、377—379页。原版于1847年至1853年期间出版。

[5]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L.Blan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8年至1870年巴黎版，12卷本，第2卷，第352—353页；第3卷，第184页。初版于1847年至1862年间出版。

[6] 阿·奥拉尔：《1789年至1804年法国大革命政治史》（A.Aular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5年巴黎版，第37页。

[7] 托·卡莱尔：《法国大革命》（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 ），1869年伦敦版，3卷本，第1卷，第226、258、264—266、303等页。值得注意的是，1837年的本书初版有一个副标题是："无套裤主义史"（*A History of Sansculottism* ）。

[8] 乔治·勒菲富尔（Georges Lefebvre）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短语，最近还在为瓦·马尔科夫和亚·索布尔合著的《巴黎无套裤党人》〔W.Markov and A.Soboul，*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1957年柏林版）〕所写的序言（第8页）中用过。

[9]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年至1904年巴黎版，4卷本；1922年至1924年修订版，8卷本。

[10]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A.Mathiez，*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1927年巴黎版。

[11] 塞-埃·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Siècle* ），1933年巴黎版，2卷本；《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 ），1944年巴黎版。

[12]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诺尔省农民》（G.Lefebvre，*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4年巴黎—里尔版；《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载《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11期（1934年），第1—26页；《1789年的大恐怖》（*La Grande peur de* 1789），1932年巴黎版。

[13] 例如，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A.Tuetey，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s sources manuscrites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0年至1914年巴黎版，11卷本，第1卷导言；再参看马·罗夫：《1789年巴黎最初几次骚动中的人物》（M.Rouff，"Le Personnel des premières émeutes de '89 à Paris"），载《法国大革命》，第57期

（1909年），第213—231页。

[14] 因此，连《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这样的社会史巨著也几乎是完全以国民大会、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发言记录为根据的。

[15] 国家档案馆文件（Archives Nationales），Y类：巴黎市警察局案卷（archives du Châtelet de Paris）；Z类：一般和特殊司法案卷。

[1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Aa类：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类（一般警务）。

[18] 这些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国家档案馆文件T类514（Ⅰ）奥斯林文件（Osselin papers）中的巴士底监狱攻克者的662人名单。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7—3274；F^7 4426。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556—558。

[22]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内政部密探报告》（P.Caron，*Paris pendant la Terreur .Rapports des agents secret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1910年至1949年巴黎版，4卷本；阿·奥拉尔：《督政府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A.Aulard，*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et sous le Directoire*），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

[23]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S.Hardy，*Mes loisirs，ou journal d 'événements tels qu'ils parviennent* à *ma connoissance*），1764年至1789年巴黎版，8卷手稿本。国立图书馆，法文图书部，6680—6687号。

[24] 读者如果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来源，请参看附录的书目。

[25]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

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

第二章 大革命前夕的巴黎

在革命前夕，从表面上看，巴黎正在经历着一场根本的变化。这种情况在它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中世纪城市的周围一度是菲力普-奥古斯都在13世纪建筑的坚固城墙，后来查理五世向外扩大了这个城市，他在14世纪建立起巴士底城堡保护城东的通路。路易十三时代，沿着现在的内城各大街修建了一道新的围墙或者说一圈关卡，划定了城市的正式入口[1]。18世纪，建筑的飞跃步伐和商业及社会生活的加速发展使人们感到有进一步改建的必要：旧桥边的房屋被拆除或任其自行倒塌，在新的路易十六大桥——现在的协和桥——上开始了建筑工

程；从城市中心清除了中世纪的公墓，新的街灯开始代替了街角上阴森森的老式灯笼，街上逐渐有了模仿伦敦的人行道[2]。最主要的是，城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1785年，新的围墙竣工，这是一圈围绕着首都的设有54个关卡的城墙，高10英尺，全长18英里。它不但把市区向外扩大到东边包括圣安东郊区，北边包括圣马丁和圣丹尼郊区；而且第一次把西边的巴塞和夏约两个村庄和南边的圣维克多、圣马瑟勒、圣雅各和圣日尔曼等旧郊区都划入首都范围[3]。但是，建筑新城的意图不仅是想划定新的京城外围，它的主要目的是要加强市内关税制度和通过杜绝走私来大量增加王室收入。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1789年，巴黎关税收入不下于2800万里弗到3000万里弗，而全国关税收入不过为7000万里弗[4]。这当然不会使当时推行这项计划的大臣卡龙和负责制订与实施这项计划的总包税人受人欢迎。聪明人写道："包围着巴黎的城墙使巴黎怨声载道。"[5]这种敌对情绪很快就在巴黎"城外"神父的《陈情表》中和某几个选区的第三等级身上表现出来[6]。这种情绪也表现在巴黎"贱民"更为激烈的行动中，这些关卡甚至在人所痛恨的巴士底监狱陷落以前就已被愤怒的人民毁掉[7]。

尽管那一时期试做过许多统计调查，巴黎新市区究竟包括多少人口仍是难以计算的：最可靠的估计是在52.4万人到66万人之间[8]。正如内克尔见到的一样，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不仅要测定比较固定的人口[9]（按照出生和死亡、户口、面包证或警察局报告等各种资料计算），而且要测定较难以掌握的旅馆和公寓中的流动人口，这种流动人口一年四季变化很大，很少能够得到有关他们的官方统计资料[10]。我们记住这一点，便可以认为内克尔非正式估计的64万和66万[11]之间的人口数目可能比1788年至1789年人口普查得出的52.4万人的较低数字更接近于真实（若干作者曾经认为这个较低数字是一个合理的估计）[12]。

在以上两种调查中，特权阶级或比较有钱的阶级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里·卡昂曾经试图计算出18世纪中叶居住在巴黎的各种社会集

团或阶层的人口，他得出的结论是：教士约1万人，贵族约5000人，金融、商业、制造业和专门职业的资产阶级有4万人左右[13]；其余的人——绝大多数人口——是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帮工、一般劳工、流浪汉和城市贫民，这些人组成了后来一般所称的无套裤党[14]。

当时巴黎的外貌正在改变，上流社会的中心区正在向西迁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进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迎合他们的社会虚荣心。教士们由于有140座修道院仍然分散在旧城和郊区[15]，并且在这些修道院里拥有大宗财产，所以对大规模扩建计划不感兴趣：有人甚至说，路易十五企图把老城区完全拆毁、重新改建，只是由于受到教会的阻碍才没有实行[16]。贵族、银行家和富商没有这种顾虑，很早就在罗亚尔宫、莱茵宫和圣端诺累郊区这些比较现代化的西区竞相建筑崭新的市内住宅。以上这些地区是随着路易十四时代宫廷迁移到凡尔赛开始繁荣起来的[17]。河右岸马莱旧贵族区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时代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中心，这时已经日趋萧条；18世纪80年代，塞巴斯梯恩·麦塞把这块市区描绘成“满目凄凉的地区”[18]，在这里，布尔哥尼府的塔楼和塞恩、克吕尼等邸宅都已改为商用，它们都目睹过往日的繁华，而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片荒凉[19]。

同时，麦塞写道，在最后这25年里，修造了一万座房屋，三分之一的巴黎都经过重建[20]。建筑工人的队伍是从中部各省招募来的，建设速度往往是惊人的：75天建成了歌剧院，6个星期建成了巴加岱尔宫[21]。特别是在北区和西区，开辟了全新的街道。研究过1789年巴黎的史学家莫南使我们对于旧制度最后15年间这种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有一些了解。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当时这里是新式住宅区的最西端边缘），国王的弟弟亚多瓦伯爵修建了贝里街和盎哥莱姆街，不久之后，柯列塞街和米莱大街（今天的马提农大街）也陆续建成。在邻接的圣端诺累郊区，准备修建达斯脱街——虽然到1789年还没有完成；在那些林荫道以北和以东，银行家拉保德获得修建普罗凡斯街、亚多瓦街（今天的拉菲

特街）、泰布街和荷赛依街的许可证。由此再向东，是马特尔、里塞尔、圣尼古拉、蒙德隆、布福、朗克里等大街。在罗亚尔宫附近，夏巴奈侯爵和路瓦侯爵用他们的名字为其市内住宅附近修建的街道命名。肖梭尔公爵出售了他在林荫道上的一部分地产，这就为兴建意大利喜剧院和开辟新圣马克、托朗特、唐波阿斯和台拉斯等大街准备了条件。革命爆发前两年，在鲍依诺斯府旧址上建起了布累杜伊、鲍依诺斯和克罗斯涅等大街[22]。王族中最有钱和最孚众望的亲王奥尔良公爵修建的罗亚尔宫的花园和连环拱廊，更是辉煌壮丽，很快就成了一个游乐的中心和记者、小册子作家以及好谈政治者的聚会场所；同时，在河左岸，不久以前用300万里弗购买了孔德府旧址，并于1789年在那里建成了法兰西剧院（后来的奥地昂剧院）[23]。不过，饶勒斯指出，在所有这些狂热地大兴土木的人士中，首都不动产最大的所有者仍是有钱的资产阶级。他写道："除去几百家豪门望族而外，连贵族本身也沦为资产阶级的房客。"他下结论说："在接近1789年时，巴黎的资产阶级是市内财产和生产与消费的最高主宰者。"[24]

尽管有这些变化，但是，中世纪旧巴黎的风貌仍然基本保存着，并且继续保持了75年。巴黎圣母院和圣教堂的宏伟建筑仍然俯瞰着老城区的入口；无数的修道院、寺院以及拘留所仍在和那座过去封建时代的遗迹——峙立着8个堡楼、狱墙达80英尺高的巴士底城堡竞相媲美。特别是，巴黎仍然保存着古老的住宅、庭院和狭巷、作坊、客店，十分之九的巴黎人就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在老城和中央市场各区，在巡礼大道以东的郊区都是这种情况（巡礼大道由圣马丁和圣雅各大街以及它们的延伸部分组成，从北边的圣马丁关卡到南边的圣雅各关卡，把全城划分为两部分）。

这时还没有明显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只有到第二帝国时代，它们才完全出现[25]。当时至多不过有一些街上有客店和公寓，如市政厅邻近的毛特奈里街或者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加朗德大街、公园大街等。在这

些地方居住着河岸工人、搬运工人、石匠和其他季节性工人，他们花1～4苏[26]拥挤在公寓里过上一夜[27]。不过，一般讲来，小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帮工都是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巴黎革命期间，我们将会看到作坊老板和帮工从拉坡街或圣安东郊区街上同一所房子里走出来，参加攻打巴士底监狱[28]。在这一郊区，甚至有钱的制造场主如累维伊扬（他在蒙特娄街拥有一座雇用350名工人的“制造厂”）和著名的啤酒酿造商安东-约瑟夫·桑代尔都住得离他们的工人很近。在这些地区中，作为一个集团而出现的并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劳工等组成的全体“贱民”。从这些人的住所、语言、服装、生活方式和他们每星期外出到库提厄、鲍雪隆或新法兰西这些酒馆和小酒店中消遣一番的特征上，大致可以辨识出他们这个社会集团[29]。

然而，某些地区已经具有了由本区居民的行业形成的显著特征。这里面当然有莫培广场和中央市场的著名的卖鱼妇或女商贩，有钟表码头、金匠码头和市内多飞内广场，或罗亚尔宫拱廊上的金匠和宝石匠。新发展的夏约郊区因皮耶兄弟巴黎水利公司而闻名，这家公司拥有蒸汽动力设备，是法国第一家按照詹姆斯·瓦特的设计制造蒸汽引擎的公司[30]。由伦巴底、圣丹尼和格拉维叶等大街组成的市场以北的市区是主要商业中心，在那里住有很大一部分这个城市的家庭工人，例如“两万”名丝织工人，他们曾在1791年11月向立法议会请愿，抗议采用机器设备[31]。新纺织厂（其中有一些雇用400、500乃至800名工人）大多数设在圣马丁和圣丹尼大街两侧的北郊[32]。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和季节性建筑工人使市政厅和格累夫广场周围的街道带有一种熙熙攘攘的显著特色。一贯是群众骚动中心的圣安东郊区[33]有几家啤酒厂和一家雇用500名工人的玻璃厂，但主要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小手工业——特别是制造家具和室内装饰品的小作坊的中心[34]。

圣马瑟勒郊区及其邻近的圣雅各和圣维克多郊区的人口成分更加复杂，而且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更加不安静。长期以来，那里最出名的工业

就是制革，这种行业在100年前被柯尔培从老城码头赶到了圣日纳维叶山的山坡上；不过，它们在革命爆发前几年似乎已经衰落，因为根据1791年一项调查报告的记载，当时只有十来个老板，雇用的助手还不足200人[35]。其他行业包括染坊、呢绒制造业和洗衣房，此外还有路易十四在1662年兴办的著名的戈布兰挂毯工场[36]。许多染工和呢绒制造者都是弗兰德斯或荷兰血统，他们在沿着这个郊区的主要通衢莫弗塔大街散布着的许多家啤酒馆里开怀畅饮（莫弗塔大街从枫丹白露关卡蜿蜒曲折地一直通到圣日纳维叶山的外崖地方）。麦塞写道："这些人可以连宵酗酒，达一周以上"，他认为这些人是危险分子，说他们"比其余各区的人更邪恶、更容易被激怒、更喜欢争吵和更容易走向暴动"[37]。

这些郊区包括一部分市内最穷的各区，常常领取最多的在旧制度和革命时期随时发放的贫民救济金。例如，当1790年2月巴黎公社议决向贫民发放64 000里弗救济金时，位于圣马瑟勒和圣雅各郊区中间的圣埃纳山区分到7000里弗；圣雅各郊区的维尔格累斯和上坡口的圣雅各地区领到5300里弗；圣安东郊区的孤儿区和圣马格里特区分别领到5100里弗和4800里弗：这些是数目最多的拨款[38]。1791年，所有这些领救济金的人当中几乎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圣马瑟勒郊区的四个区内[39]。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所以甚至于最近的史学家都把这些不久就在革命中显示特殊作用的郊区说成是工人阶级郊区[40]。可是，这个名词是易于使人产生误解的，这有好几个理由。第一，正如布莱希先生指出的，靠工资生活的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市场区和首都北郊——不是集中在圣马瑟勒郊区，更不是在圣安东郊区或者小手工业者占大多数的任何其他地区。1791年初，巴黎市政当局为了查明首都48区每一个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人数，曾作过调查，调查的结果说明了上述情况[41]。这些调查报告（尽管不十分详尽）表明：当时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总数（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将近30万人。把各区人数和1792年人口调查表明的人数[42]联系起来看，我们发现：靠工资生活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在北部和

中北部7区[43]的居民人口中占三分之二，在中央市场4个区[44]占居民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而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只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45]。

但是，即使在这些工资劳动者构成当地人口大多数的时候，他们也不具有一个社会阶级的显著特征。在18世纪的法国，工人这个名词可以指普通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也可以随意用来指那些独立的工匠、小作坊老板——甚至偶尔也可以指有钱的制造场主；它最常使用的意思和工匠一词同义[46]。这种用法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那时，靠工资过活的人还不具有一个生产者的明确地位，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往往还存在着许多中间阶层。典型的生产单位仍然是小作坊，这些作坊一般只用数目很少的帮工或学徒。即使在巴黎，虽然工人和雇主比起来人数较多而行会制度所规定的限制也比其他地方松弛[47]，但是，帮工仍然经常和老板一桌吃饭，同屋住宿[48]。挣工资的帮工和独立工匠，乃至与作坊老板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在1724年举行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的2000名巴黎织袜工，一方面依靠工资为生，另一方面仍然从雇主那里租用织袜机，在自己家中工作[49]；我们还可以看到：1789年8月，有很大一群巴黎理发匠帮工坚持他们有自行开张营业的权利，不管他们的雇主是否愿意[50]。

1791年调查报告中记载，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建筑业[51]；他们大部分是季节性工人或刚从克鲁斯和里摩日来的移民（所以他们的绰号叫“里摩日人”），住在莫弗塔大街或市中心那些家具很少的房间里[52]。在他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帮工兼雇主，或“老板工人”，他们一方面依靠建筑承包商付给的工资生活，另一方面又按日或按季计酬雇用自己的伙伴或小伙计[53]。广大的搬运工人、运输工人和河岸工人常常是从皮卡尔迪、萨瓦或欧维尼迁来不久的移民，住在各市场周围或码头附近，他们的地位更难确定；不过，在一般体力劳动者和高度组织化的由巴黎市场的挑夫或更加贵族化的各类没有技术的小工

组成的团体之间，一定隔着无数的等级和差别[54]。住在济贫院和贫民医院中的14 000人成分更为复杂[55]，不久以后，又有成千上万没有工作的农民、小商贩和农村工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些人在革命前夕涌进首都，被赶进圣母山和其他地方的救济工场[56]。事实上，我们只有在可能占全部劳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57]的北郊新纺织工场工人中，才能开始看到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也将看到，和小工匠和帮工不同，他们在革命当中只是起一种比较次要的作用。

不过，尽管巴黎的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缺乏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团结，但是，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提出他们特殊的经济要求——常常是通过暴力手段。随着古老的中世纪行会存在目的和组织的崩溃，帮工发现自己已经降到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的地位，成为老板的希望非常渺茫[58]。老板和帮工这种物质利益的逐渐分歧反映在那一世纪日趋剧烈的罢工和社会运动上，而随着工资追不上逐渐上涨的物价，这种罢工和社会运动就变得更为剧烈[59]。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1724年，织袜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举行了一次罢工，这次罢工是因为他们的领袖被捕而引起的[60]。1737年，织布帮工起来反对管理和限制升为老板的新规定[61]。1749年，巴黎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禁止制帽帮工干涉雇主雇用工人的自由[62]；1765年，一个类似的判决，禁止这些工人佩带刀剑和行猎匕首[63]。1776年，书籍装订工人爆发了一次争取14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64]。1785年，建筑业工人罢工反对降低工资，结果赢得辉煌胜利：在几百名建筑工人和警察局长伦诺发生争论，其他工人游行示威要见布洛依宫里的国王以后，最高法院宣布了有利于他们的决定[65]。第二年书商兼日记体作家塞·哈代报道了一次包括木匠、马掌铁匠、锁匠、面包师和石匠等在内的规模更大的罢工运动[66]；同年，搬运和运输工人举行罢工，反对宫廷宠臣发起的垄断竞争，他们去凡尔赛向国王请愿，引起群众广泛的同情[67]。1789年6月，就在巴黎革命爆发前夕，制帽工人又举行了一次罢工——各个对立的帮工协会都参加了这次罢工[68]。

如马瑟勒，罗夫所见到的，这些运动可能有助于1789年革命气氛的形成[69]，但是它们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一般还居于次要地位，工资劳动者最关心的往往是食物价格——特别是面包价格，而不是他的工资数目。这一部分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和全国性的工会运动，尤其是因为面包在工资劳动者的支出中，像在一切小有产者的支出中一样，占很大一部分。1789年，巴黎一个体力劳动者的每日工资大约是20～30苏，石匠帮工可能挣40苏，而一个木匠或锁匠可以挣50苏[70]。按照拉布鲁萨教授的说法，一个18世纪的法国工人平常要在面包上用去其收入的50%左右，在蔬菜、油脂和酒上用去16%，衣服15%，燃料5%，照明1%[71]。所以，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少的劳动者主要关心的是面包价格，在巴黎，一块4磅重的面包在“正常”时期售价为8苏或9苏。如果它的价格飞涨到12苏或15苏（或至20苏），显而易见，大部分工资劳动者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而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所以，如果他们常常想到的是更便宜和更充足的面包——而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劳动条件，那就不足为奇；除去极少数例外，在革命期间也同样是这种情形[72]。因此，当时传统的和典型的群众抗议形式仍然是食物暴动而非罢工；在这种暴动中，不仅有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而且有小店主、工匠和作坊老板参加，来共同反对农场主、磨粉商、面包商、囤积者、粮商和市政当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被证明是把组成大革命时期无套裤党的各社会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根最坚固的链条。

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一样，在整个18世纪中一直受着这种骚动的威胁。为了平息这种骚动，当局曾拟定一套复杂的制度以保证郊区的磨粉商按时得到充足的小麦供应，巴黎的面包商按时得到充足的面粉供应——这种办法常常使粮食供应区本身受到损害，或者使粮食运往首都所经过的河流和道路附近的村庄受到尽人皆知的损害[73]。但是，这种保证在最大的限度上也不足以抵抗歉收、旱灾、冰雹、霜灾和交通不便的打击，或者粮食垄断者与投机者的侵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这套制度

终于崩溃，抢购使面包价格猛涨并引起巴黎“贱民”的愤怒暴动。在1709年的大饥荒中，这种崩溃几乎是全面的，而且时间很长，以致有好几百人因饥饿而死[74]。1725年8月，据达冉松侯爵记载，面包价格高过1709年，为了平息民愤（“当时巴黎已发生严重骚乱”），将当时的负责大臣敦布里弗尔免职[75]。1740年9月，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20苏，相当于一个非熟练工人的一天工资；人们向国王大呼：“发发慈悲吧！面包！面包！”红衣主教弗劳里遭到一群愤怒妇女的攻击；比塞特勒监狱的50名犯人因抗议减少囚粮而群起暴动之后被枪杀[76]。1752年12月，由于巴黎大主教拒绝给一个有扬森派嫌疑的垂死修女施行圣礼，引起人们愤怒的游行示威，面包暴动也就同时与这场示威结合起来[77]；6个月后，面包价格仍然高得惊人，有人散发煽动性传单，传单上写着：“法院万岁！打倒国王和主教”[78]，还是那个国王——路易十五——人们认为是他制定了狠毒的“饥荒协定”[79]。

范围更广而且也是使当局更加吃惊的，是1775年春天在巴黎和邻近各省爆发的粮食暴动。1774年8月，杜尔果被任命为财务总监。他刚一上任时，在一般人眼中还没有什么丧失民心的特殊记录，事实上，他的前任和他的死对头、修道院院长塔莱在他被任命以后不久，就受到了被圣安东郊区的人们焚烧肖像的侮辱[80]。然而，使杜尔果在宫廷中的敌人高兴的是，他由于操之过急地把重农主义学说应用于粮食贸易，不久就失去了人民给予他的宠爱：他于9月13日下令恢复粮食和面粉贸易的自由。这道命令再加上歉收，便造成了第二年春夏两季谷物、面粉和面包的缺乏和价格飞涨。3月初，巴黎4磅重面包价格涨到11苏半，到4月末便涨到13苏半。粮食暴动已经在波尔多、第戎、都尔、麦茨、里姆和蒙托榜等地爆发——紧接着发生了一连串历史上称为“面粉战”的特别骚动。骚动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另一个市场，采取了由群众控制小麦、面粉和面包价格的形式——面包价格一般被规定为2苏一磅，面粉20苏一蒲式耳，小麦12法郎一塞第（等于200千克）。4月27日，骚动从首都以北20英里的瓦兹河畔的博蒙开始，29日扩展到潘托塞，5月1日蔓延到圣月

尔曼，2日蔓延到凡尔赛，3日蔓延到巴黎城。巴黎中央面粉和面包市场遭到劫掠，市中心和郊区面包商不是被抢就是被迫廉价出售面包，直到军队开出来才恢复了秩序。骚动接着沿塞纳河和马恩河流域向东和向南发展，在布里埃的市场和乡村中继续了好几天，9日发展到加提讷河畔的博蒙（巴黎以南50英里），10日在米隆附近逐渐平息[81]。

这些暴动使人们看到了某些革命事件的惊人预演——特别是对于主要商品的群众限价或群众平价，这在1789年至1793年成了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是，这些骚动还远不是为了反对现存的制度，而是对于一种新式主张提出严重抗议——这种主张就是放任食物价格上涨到它们的自然或市场水平，而不从社会正义的考虑出发来加以控制。运动并没有产生具体的结果，这也许不足为奇。这基本上是一次工资劳动者、工匠和乡村与城市贫民的运动——无论是资产阶级或大多数农民都没有参加。然而，它使政府和“上层”阶级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12年后，曾经目睹巴黎市场和面包店受到袭击的哈代，谈到当时有再度出现1775年5月场面的危险[82]。

至少在巴黎，这次运动是旧制度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骚动。以后的12年是粮食价格和社会秩序都比较稳定的时期[83]。哈代所记载的大部分是反对新建关卡的抗议，有些是市场上的关于肉类和木柴价格的不满，还有一些是表现反教会情绪的突出事件[84]。尽管中央市场和郊区居民的平静仅仅是表面的，但他们并不比同时代南瓦克、威斯敏斯特和中塞克斯大主教教区的英国人更倾向于暴动和骚乱——这些英国居民曾经因反对瓦尔波尔制定的消费税和烧酒法案发生暴动，并在60年代和70年代高呼过“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口号。无论如何，巴黎同伦敦、威斯敏斯特市以及中塞克斯相比，有一套更为有效和权力集中的警察系统，具有一支力量大得多的武装供其调遣。伦敦那些地方的治安推事和警察的权力有限，镇压机器分散而指挥不灵，因此，几乎常常无法阻止暴动和骚乱。

另一方面，巴黎的警察总局局长的管辖范围包括首都的全部地区，48名警务委员则分别掌管全城各区警务，他们拥有对付犯罪和民众骚乱的雄厚实力。这些武装包括150名法警，接近于1000人的三连巴黎近卫军，以及300到400名警察。总括起来，他们可以直接指挥1500人左右，此外还有5000到6000名法兰西警卫军、瑞士警卫军和枪兵的预备部队——大部分都驻扎在首都——可以在紧急时调动[85]。虽然这些联合起来的武装力量远不如后来革命当局能够调动的武装力量强大，但只要他们仍然效忠于政府和地方官吏，他们就是一支比伦敦治安推事所能随便调遣的队伍实力雄厚得多的武装部队。

所以，当1780年6月戈登暴动爆发，伦敦大部分地区有好几天一直被“反罗马教皇”的暴动者控制时，法国观察家就有资格扬扬得意了。例如塞巴斯梯恩·麦塞在巴士底陷落的9年以前评论伦敦骚乱时写道：乔治·戈登勋爵在伦敦造成的恐怖和惊慌，在巴黎这样一个警政完善的城市是难以想象的[86]。我们在事后都聪明起来，当然可以嘲笑塞巴斯梯恩·麦塞的天真，然而他在写作当时，似乎也有其自满的合理根据。

但是，在这种表面平静的背后，各种力量正在成熟中，不久就要粉碎这种幻觉，并把巴黎人卷进远比前一世纪所经历到的任何事件都更大的灾难中。当时就连最聪明和最有远见的观察家都没有看出这种情况。尽管这些事变的结果竟然没有破坏巴黎的外观[87]，然而却使巴黎公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

---

[1]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A.Demangeon，*Parts .La Ville et sa banlieue*），1933年巴黎版，第16页。

[2] 阿·巴波：《1789年的巴黎》（A.Babeau，*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23页；赫·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H.Monin，*L’Etat de Paris en* 1789），1889年巴黎版，第10—13页。

[3] 阿·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4] 莫·马里昂：《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制度辞典》（M.Marion，*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ⅩⅦ *e et* ⅩⅧ *e siècles*），1923年巴黎版，第402—404页。〔里弗（livre）为法国旧币名。——译者注〕

[5]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8页。

[6] 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C.-L.Chassin，*Les Élections et les cahiers de Paris en* 1789），1888年至1889年巴黎版，4卷本，第2卷，第410、421、425、432、442、443、444、448、455、465、519页；第4卷，第406、451页。

[7] 参阅本书第55—56页。

[8] 1788年至1789年的人口调查是按户计算的，调查出的居民总数为524 186人〔《法国统计资料》（*Statistique de la France*）第3卷：《土地、人口》（1837年巴黎版），第277页〕。按照内克尔1784年的私人计算，总数为64万到66万人〔日·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J.Necker，*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de la France*），178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277页〕。1792年人口调查的结果是635 504人〔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N.Kareiev，*La Densit* é *de la population des différent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1912年巴黎版， 第14—15页〕。1795年进行了两次人口调查，一次是部分地依据面包证登记资料，另一次是依据消费者的数目，得出的数目分别为626 582人和636 772人〔普·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P.Meuriot，*Un Recensement de l'An* Ⅱ），1918年巴黎版，第33—34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关于这些估计数字可靠性的讨论，请参看乔·鲁德：《1789年至1791年的巴黎工资劳动人口和起义运动》〔（G.Rudé，*The Parisian Wage-Earning Population and the Insurrectionary Movements of* 1789-91），以下简称为《巴黎工资劳动者》（未发表的哲学博士论文两卷集，1950年伦敦大学印），第1卷第34—43页〕。关于1790年至1800年巴黎48区的人口估计数字，参看后文附录二。

[9] 这里使用的“固定人口”一词当然只是就相对意义而言。整个18世纪，迁出和迁入巴黎的人口一直继续不断（虽然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迁入巴黎的）。警察局和其他公共机关的档案记录表明，革命时期的巴黎居民中，外省籍贯的人占很大比例。

[10] 非定居人口的数目——那些住在出租旅馆和各种类型公寓中的人口数目——在1795年两次人口调查的第一次中有记载，但是48区中只有25区有这种资料（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2页）。

[11] 内克尔：《法国的财政管理》，第1卷，第277页。

[12] 例如，可参看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F.Braesch，*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1911年巴黎版，第14页；亚·朗德里：《旧日巴黎的人口统计》（A.Landry，“La Démographie de l’ancien Paris”），载《巴黎统计学会会刊》（*Journal de la sociét é de statistique de Paris* ），第76期（1935年），第34—45页。但是，摩里奥倾向于那个较高的数字（《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4—35页）。

[13] 里·卡昂：《18世纪中叶巴黎人口》（L.Cahen，“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milieu du 18 siècle”），载《巴黎评论》，1919年，第146—170页。

[14] 1792年6月以后，这个名词同样带上了一种政治意义，一般指极端共和主义者——甚至也应用到本人很有钱的共和主义者身上。但是我在本书中，仍然只是在社会意义上使用它。

[15] 按照埃德梅·维尼克（Edmé Verniquet）的1789年巴黎地图（巴黎市政会议于1889年出版），当时有68座男修道院和修会，73座女修道院和修会。

[16]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9页。但是也有例外，譬如，圣安东广场王家修道院女修道院长和会众就在巴士底以东他们的地产上新建了一条街、一个市场和一座喷泉（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6页）。

[17] 德马让：《巴黎，城区及近郊》，第16页。

[18] 耳·塞·麦塞：《巴黎年表》（L.S.Mercier，*Tableau de Paris* ），1783年阿姆斯特丹版，12卷本，第1卷，第258—261页。

[19]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8页。

[20] 麦塞：《巴黎年表》，第8卷，第190页。

[21]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7页。

[22]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5—16页。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38页。

[23] 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24页。

[24]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2年至1924年巴黎版，8卷本，第1卷，第149—150页。

[25] 耳·谢瓦利埃：《19世纪巴黎人口的构成》（L.Cheva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ⅩⅨ *e siècle* ），1950年巴黎版，第122页以下。

[26] 苏（sou）为法国旧铜币。——译者注

[27] 这些钱数出现在1789年至1792年间的各种警察报告上。再参看巴波：《1789年的巴黎》，第158页。

[28] 参阅本书第63—65页。

[29] 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A.Soboul，“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载于1956年7月《史鉴》（*Miroir de l’histoire* ），第91—99页。

[30] 到1791年，该厂已制造出40台蒸汽机，并且开始出口。参看亚·马迪厄：《18世纪下半期的法国经济》（A.Mathiez，*La France économique dans la secondemoiti é du 18 e siècle* ），1927—1928年巴黎文学院现代史补充研究征文，1928年巴黎版，第84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430；转引自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24页。

[32]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r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

[33] 克·勒弗夫：《巴黎旧宅第，巴黎各宅第和各街道史》（C.Lefeuve，*Les Ancicnnes maisons de Paris .L’histoire de Paris ， rue par rue ， maison par maison* ），1875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3页和第147页。

[34]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6—8页。

[35]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6]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巴黎公社》，第10页。

[37] 麦塞：《巴黎年表》，第1卷，第257—258页。

[38] 亚·图埃特伊：《革命时期巴黎的公共救济》（A.Tuetey，*L’Assistance publiqu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5年至189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133—135页。

[39] 在118 784人中占27 158人〔夏布罗尔·德·渥尔维克：《巴黎市区统计研究》（Chabrol de Volvic，*Recherches statistiques de la viiie de Paris* ），1821年至1829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43页〕。据说在1794年，68 000名领救济金的人中，住在圣安东郊区一地的就有15 000人（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6页）。

[40] 例如，参看汤普逊：《法国革命》（J.M 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7年牛津版，第49—66页。

[41] 弗·布莱希：《1791年左右巴黎工业人口的统计》（F.Braesch，“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ts 1791”），载《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63期（1912年），第289—321页。布莱希先生的发现根据的是48区中的41区应巴黎市政当局的请求在1790年后半年所作的调查报告，那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需要分配给雇主的低额指券（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的数目。这些调查报告收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30} 109—124、129、131—134、136—160各辑中。关于布莱希估计的讨论，请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 ），第1卷，第46—51页。

[42] 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第14—15页。

[43] 这些区是博堡、格拉维叶、崩索、莫孔赛耳、新崩纳、普瓦松尼、圣丹尼郊区。

[44] 这些区是：罗浮、奥拉托利、老实人市场（后来的市场区）、伦巴底。

[45] 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2—53、277—280等页（附录A）。

[46] 《法兰西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1772年版）给工人一词下的定义是：“用手工从事操作和制造某种东西的人”。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对这个名词的解释是“一般说来为从事某种行业的工匠。”按照一个工资劳动者的现代含义给这一名词下定义的最早的《学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是1935年的版本。关于在研究社会史时对这一名词难下定义问题的讨论，可参看阿尔弗列德·科本的《社会史中的名词》（Alfred Cobban，“The Vocabulary of Social History”），载《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第71期（1956年），第14页。

[47]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A.Franklin，*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comment on devenait patron* ），1889年巴黎版，第281—284页。

[48] 除去警察记录的证据以外，我们还可以在1789年7月《安丁大道加比桑区技工、工匠和工人的提案》中找到这种说法，提案中说："我们居住在老板家里，我们的父辈住在公寓里。"（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42号，对开本第13—15页）。

[49] 弗·芬克-布伦泰诺：《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F.Funck-Brentano，"La Question ouvrière sous l'Ancien Régime"），载《旧事评论》（*Revue rétrospective*），第17期（1892年），第1—24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51] 关于当时巴黎这一行业和其他各行工人的情况，参看《巴黎工资劳动者》，第2卷，第277—280页（附录A）。

[52] 格·莫科：《19世纪初期法国工人们的迁移》（G.Mauco，*Les Migrations ouvrières en France au début du* ⅩⅨ^{e} *siècle*），1932年巴黎版，第29—31页。

[53] 日·日·列特莱：《17和18世纪巴黎泥水匠雇主联合会》（J.-J.Letrait，"La Communauté des maitres maçons de Paris au ⅩⅦ^{e} et a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和外国法律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cais et étranger*），1945年，第256—257页；1948年，第113—117页。

[54] 关于后者可参看马·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M.Rouff，"Une Grève de gagne-deniers en 1786 à Paris"），载《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第105期（1910年），第332—348页。布莱希所分析的1791年调查报告中，没有这种工人。

[55] 这是1791年的数字〔克·布洛和亚·图埃特伊合著：《1790年至1791年的国民议会乞丐委员会的笔录和报告》（C.Bloch and A.Tuetey，*Procès-vetbaux et rapports du comit é de mendicit é de la Constltuante*，1790—1791），1911年巴黎版，第482页〕。

[56] 拉斐德估计攻陷巴士底以后一周内巴黎的"外乡人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三万以上"；不过，这个数字也许由于党派目的而被夸大了〔《拉斐德将军的回忆录、通信和手稿》（*Mémoires，correspondance et manuscrits du Général Lafayette*），1837年巴黎版，6卷本，第1卷，第272—273页〕。

[57] 《巴黎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58页和注83。

[58] 阿·富兰克林：《旧时代的私人生活：如何成为雇主》，第90—95、173—217页。

[59] 拉布鲁萨教授指出：食物和其他群众消费必需品的价格在1726年至1741年和1771年至1789年这两段时期之间上涨了62%，名义工资同时期只增加了22%〔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e siècle* ），第2卷，第597—608页〕。

[60] 弗·芬克-布伦泰诺：《旧制度下的工人问题》。

[61]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3页。

[62]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A.Franklin，*Dictionnaire des arts*， *métiers et professions exercés dans Paris depuis le* ⅩⅢ *e siècle* ），1906年巴黎版，第372页。

[63] 阿·富兰克林：《13世纪以来巴黎各手工艺行业辞典》，第573页。

[64]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3卷，第281页。

[65]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149—150页。

[66]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6卷，第315页。

[67]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34页。

[6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6（1789年6月12日）。

[69] 罗夫：《1786年巴黎小工的一次罢工》，第347页。

[70]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Prices，Wages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经济史评论》（*Econ .Hist .Rev* .），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页。但是，由于在旧制度下有许多天节日，所以工人的平均“有效”工资远比这些数目为少：这些节日每年达到111天左右（同上）。并可参看附录七。

[71] 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第2卷，第597—608页；勒菲富尔：《物价变动和法国革命的起因》（G.Lefebvre，“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289—329页。

[72] 这种趋势明显地反映在流传下来的几份外省工资劳动者的《陈情表》上。在巴黎没有这种证据，因为有特殊的规定，把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排除在巴黎人预备会议之外（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1卷，第

373—376页）。

[73] 里·卡昂：《18世纪末叶巴黎的面包问题》（L.Cahen，“La Question du pain à Paris à la fin du ⅩⅧ^e siècle”），载《法国革命纪事》（*Cahiers d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第1号（1934年），第51—76页。关于巴黎运粮道路和1752年至1789年期间水陆路巴黎运粮队经常遇到袭击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和第三年勒芒地区和下塞纳流域的饥荒》（R.C.Cobb，“Les Disettes de l’an Ⅱ et de l’an Ⅲ dans le district de Mantes et la vallée de la Basse-Seine”），载《巴黎和伊耳德法兰西历史考古学会联合会报告》（*Mémoires de la féderation des societés histor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Paris et de l’Ile-de-France*），第3卷（1954年），第227—233页。

[74] 阿·德·包瓦斯勒：《1709年的严寒和饥荒》（A.de Boislisle，“Le Grand Hiver et la disette de 1709”），载《历史问题评论》（*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s*），第73期（1903年6月），第442—509页；第74期（1903年12月），第486—542页。

[75] 达冉松：《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Journal et mémoires du Marquls d’Argenson*），1859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54页。按照另一个回忆录作家，律师巴比尔的说法，4磅面包每个几乎涨到28苏到32苏这种骇人听闻的价格（巴比尔：《路易十五时代的历史记事与逸事》〔（E.J.P.Barbier，*Journal historique et anecdotique du règne de Louis* ⅩⅤ），1847年巴黎版，4卷本，第1卷，第224—225页〕。

[76]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3卷，第169—173页。

[77]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353、357页。

[78]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8卷，第35页。

[79] 勒·此奥莱：《饥荒协定及其对粮食的影响》（L.Biollay，*Le Pacte de famine et les opérations sur les grains*），1885年巴黎版。

[80] 参看米特拉：《路易十五去世后……的政治与文艺秘密通信集》（Métra，*Correspondance secréte*，*politique et litteraire ... depuis la movt de Louis* ⅩⅤ），1887年至1890年伦敦版，18卷本，第1卷，第87页。塔莱和杜尔果不同，他是一个极端赞成国家干涉粮食贸易的代表人物，在他任职期间，粮食贸易的管理大部分掌握在一群有钱的“垄断者”手中，因此，他的名字在群众中已经和臭名昭著的“饥荒协定”联系在一起。1768年11月，当塔莱在任的时候，巴黎的4磅重面包的价格业已上涨到16苏，并且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S.Laeroix，*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续集，8卷本，1900年至1914年巴黎版，第6卷，第398页〕。

[81]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G.Rudé，“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1956年4月至6月，第239—279页。

[8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123页。

[83] 这一时期，4磅重面包的价格保持着显著的稳定，一般售价在8～9苏之间；只有在1784年短时期内曾经上涨到10苏半或11苏（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散见于第3—7卷各处）。

[8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5卷，第322—323、394—395、410页；第6卷，第18、35、330、332、435、479页。

[85] 赫·德·蒙特巴：《路易十六时代的巴黎警察》（H.de Montbas，*La Police parisienne sous Louis* ⅩⅥ），1949年巴黎版，第78—84、93—101页。并可参看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79、543页。

[86] 麦塞：《巴黎年表》，第6卷，第22—25页。

[87]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11—12页。当然，唯一突出的例外是巴士底监狱，它在1789年至1791年被有计划地夷平了。

第二篇 行动中的革命群众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研究法国革命的传统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单一的长时期的事件，开始于1789年5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三级会议，或者开始于7月巴士底监狱的陷落。不过，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倾向于修正这种观点，既把革命看成是一连串界限分明而又互相关联的事件，又把革命爆发的日期推前两年——推到1787年5月，当时，贵人会议的解散引起了“贵族反叛”或“贵族革命”[1]。把大革命看成是通过具有革命爆炸性的连锁反应而逐渐展开的许多小规模革命运动的论点，毋庸在这里详加解释；但是，关于革命爆发的日期问题，我们要谈一谈。有人认为，“贵族反

叛”应该看成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因为强迫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是贵族和法院——长袍贵族，如果没有三级会议，就不会有1789年的革命；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公开向君主专制挑战，才把主要参加革命的各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2]。夏多布里昂写道："贵族使革命开始，人民把革命完成。"[3]就一切大革命都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分裂和危机而言，这一论断确实包含一条重要的普遍真理。研究17世纪的学者将会在英国历史中找到有趣的类似情况。然而，这种论点不能令人完全信服：掀起"贵族反叛"的特权阶级和君主专制之间的分裂虽然是深刻的，但并不是根本的；当包括资产阶级和城乡广大群众的第三等级的力量参加进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范围更广泛的要求时（像他们在1789年春天开始做的那样），这些分裂便很快地得到了消弭。根据这种观点看来，只有在农民、城市工匠与资产阶级新闻记者、律师及三级会议代表的分散行动汇合成为1789年7月的共同斗争时，革命爆发的真正时间才算到来[4]。

所以，本书中把"贵族反叛"看成是这场革命戏的前奏曲或正戏前的开锣戏，而不是它的第一幕。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它对于本书主题的深远意义和特殊重要性：它不仅为第三等级的胜利直接铺平道路，而且由于把城市群众吸引到行动中来，使社会平静时期告一段落（就巴黎而言，自12年前的"面粉战"以来，一直或多或少地维持着这种社会平静）。这段新的社会紧张斗争时期既包括革命的六年，也包括革命以前的两年。所以，我们对于巴黎革命群众做比较广泛的研究，必须从这时开始。

自法国在1778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国家的财政一直陷于绝境。1787年2月，几乎空空如也的国库和不断增加的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彻底的补救办法：为了能立即找到某种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专门召开了贵人会议。财务总监卡龙提出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措施，包括扩大印花税和普遍征收新土地税在内。正如杜尔果和内克尔在以前召集

的贵人会议一样，实际上，政府希望应邀参加会议的特权阶级能够做一种亡羊补牢的贡献以挽救国家免于破产。然而贵族有他们自己的不满和要求，他们拒绝合作。于是，卡龙在4月8日被免职，由塞恩和图卢兹大主教洛默尼·德·布里盎继任，他很快就被提升为红衣主教。布里盎的建议和卡龙的建议同样地不能被接受，同样地遭到了反对，这一回是贵人会议在5月25日被解散，接着便发生了“贵族反叛”。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打头炮的是宪法上对其权限规定得非常含混的巴黎法院。巴黎法院一方面接受了布里盎提出的放宽对粮食销售与出口限制的计划，并在抗议之下同意了印花税；另一方面断然拒绝给征收土地税的法令注册，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来讨论这一问题。当8月在国王亲临法院的情况下照样颁布了这些法令以后，各省法院群起支持巴黎法院，结果布里盎被迫屈服：9月21日，撤销了土地税和印花税的法令，被流放的巴黎法院法官几天后又重新复职[5]。

法院重返首都这件事引起了群众在多飞内广场、哈莱街和其他通往法院的街道上举行热烈庆祝的场面。 8月开始出现反保王派的小册子[6]，当局已经做好应变的准备。裁判所周围驻扎了500名巴黎近卫军，还有一团法兰西警卫军作为支持。哈代本人是法院的拥护者，他告诉我们：“一群狂热的青年”聚集在新桥和它的通路上，放焰火鸣鞭炮，向军队扔石子，他们当中有裁判所的职员、多飞内广场奢侈品行业的学徒和帮工。9月28日，骚动达到最高潮，有几名兵士被激怒而开了枪，那是法兰西警卫军的一名军曹下了一道野蛮而有意思的命令：“给我开枪打这群流氓的屁股！”不过并没有伤亡，只有一个过路的律师被流弹打穿了大衣。军队逮捕了5个年轻人，并在群众纷纷嘲骂和继续投掷石子的情况下，把他们押到伦巴底大街警务委员弗朗的办公处去进行审讯[7]。从弗朗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被捕者（其中有4人送进了阜尔斯监狱）中有两人是小手工业学徒，两人是金匠帮工，还有一个是裁缝师傅；两人住在裁判所的紧邻，另外两人住在河对岸的大学区[8]。

骚乱持续了一星期，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在裁判所前广场上点燃焰火，散发反对保王派的小册子，焚烧卡龙和国王子女的女教师波列略伯爵夫人的肖像[9]。最后，法院于4月3日发布告示，严禁一切在裁判所附近举行集会和放焰火的活动[10]，嗣后运动便平息了——不过，哈代还记下了之后的一次小骚动和直到11月12日还动员600名军队的事情[11]。虽然时间拖得这样长，但这仍是一次局部事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参加的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也许是因为面包价格一直稳定，所以郊区和市场并没有卷入。

但是，在以后几个月内，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主要是因为实行杜尔果的自由贸易政策引起了粮食价格的飞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布里盎采取了借债的权宜办法，巴黎法院表示愿意接受这种办法，但必须召开三级会议。谈判在11月又告决裂，深得人心的奥尔良公爵和两名法官被流放；当公爵在4月重返首都时，人们又放了另一场焰火来欢迎他[12]。1788年5月，法院颁布公诉状，指责包括密札制在内的专制政府的整个制度，因而更受到人民的欢迎。政府的回答是又一次派军队包围了裁判所，强迫法官把他们的首领交给王家法官审判，并且颁布了掌玺大臣拉玛扬拟定的六道敕令，这些法令限制法院的管辖范围，削减法官人数，并赋予王家法庭和官吏以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一次只是因为有军队在场，才阻止了愤怒的群众没有把王家法庭焚毁[13]。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新的暴动时期——最初主要是在外省。6月，在格累诺布和勒恩有群众骚动；7月，在多飞内，贵族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反对国王。7月初，在巴黎老城内出现了以群众暴动威胁国王的愤怒的传单："发抖吧，暴君，你的统治要结束了！"哈代担心一场严重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来临[14]。政府预见到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于8月初开始选拔新的团队进驻首都附近的村庄——这一次，政府害怕的不是裁判所的职员和学徒，而是市场和郊区的"贱民"[15]。

这种恐惧证明是有根据的。政府被迫在风暴面前低头，答应一定在

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8月24日，内克尔接替了布里盎的职务，不久又召回了法院。人们为了祝贺这双重胜利，两天后在多飞内广场及其附近又一次举行庆祝：在警卫军眼前放起了大量鞭炮，点起焰火，群众强迫坐车通过新桥的人向亨利四世骑马像鞠躬致敬，并高呼“打倒拉玛扬！”但是，一种新的因素扩大了这些骚乱，使它们远远地超出了上一年的范围。8月17日，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长期保持在9苏以后，涨到9苏半，20日涨到10苏，9月2日涨到10苏半，9月7日涨到11苏[16]。在第一次涨价以后，哈代注意到圣安东郊区已经有轻微的骚乱[17]； 8月28日，市场和郊区的“工人”和“贱民”参加了两天前裁判所职员在多飞内广场发起的骚动，使骚动的整个性质发生了变化[18]。第二天，骚动更为猛烈，并扩大到其他各区：新桥上和河两岸的军队哨所遭到袭击并被焚毁。在此期间，1775年5月的平乱“英雄”贝朗元帅，受命指挥首都全部驻军，并下令近卫军要以武力对付武力。当晚，在格累夫广场举行示威的600多人遭到巴黎近卫军射击，有七八人被击毙[19]，其余的人被驱散。巴黎有半个月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在9月14日，不得人心的拉玛扬被免职这件事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骚乱，断断续续地拖延到月底。群众得以在多少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在新桥上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在格累夫广场焚烧拉玛扬的肖像以表达他们的满意心情；但是，群众企图袭击圣马丁街那边的巴黎近卫军司令杜布瓦爵士的市内住宅时，却引起了一场可怕的屠杀，当时军队向被围在狭窄的梅莱街上的群众开枪射击——据哈代说，有50人死亡，25人被捕，不过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夸大[20]。一星期后，法院回首都一事引起进一步的骚乱。这一次，在大学区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那里，有200名青年拿着火炬和月桂花束高呼“亨利四世万岁！法院万岁！打倒四条腿的坏蛋[21]”，这时法兰西警卫军在哈普街向他们发动袭击，造成若干伤亡[22]。9月30日，杜布瓦爵士在接受一万里弗奖金和彼龙涅武官勋位后提出辞呈，骚乱也就告一结束[23]。

后来，最高法院和巴黎警察局编制了由于这些暴动而负伤、被捕或被判刑者的名单，这些名单使我们了解到那些参加暴动的是什么人和他们来自哪些地区。约有50个人注明了职业，其中24名是帮工、学徒、体力劳动者和其他工资劳动者；10名是手工业作坊老板；16人是小商贩和小店主。他们大多数来自骚乱的主要中心——老城区、圣日尔曼郊区和首都中央及北城各区。奇怪的是，尽管哈代坚持说圣安东郊区的"贱民"曾经在8月末参加了暴动，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从这个区来的[24]。总的说来，这些记录表明：巴黎的无套裤党人已经作为决定性力量参加了反对政府的斗争，但是还没有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来参加；真正的革命危机还没有到来。

1788年至1789年的冬天，这种情况有了发展，并且使各阶级做了一次彻底的重新配备。当时发生普遍歉收现象，7月，在巴黎地区，一场意外的雹灾打坏了谷物。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因此使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并进一步使成千上万的乡村居民涌进了首都；12月，据哈代记载有8万人失业。巴黎市场上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11月8日上涨到12苏，28日涨到13苏，12月11日涨到14苏，最后，在2月1日涨到了14苏半；直到巴士底监狱陷落前，面包一直保持这个价格[25]。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登上了革命舞台。冲突的原因深深植根于旧制度中。一方面，近百年来，殖民地贸易、土地价值和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和制造业的扩展到处受到特权组织、封建地主和政府的限制，限制资本家的根本自由：雇用劳动力的自由，生产的自由和购买与销售的自由。不过，虽然是由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对立，才使得接着发生的冲突终于变得十分尖锐和得到那样的结局，但是，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冲突，在开始时仍是从三级会议的代表和表决问题上引起的。巴黎最高法院在9月已经开始失去其作为人民自由代言人的声誉，因为它要求三级会议应该按照1614年的方式组成，也就是说每一个等级应该选出同样多的代表，并且以等级为单位进行表决。12

月，王族发表宣言，更加直接地表示他们要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然而，内克尔说服了国务会议准许第三等级选出名额多一倍的代表；可是，关于“以人为单位”（如资产阶级所要求）或者“以等级为单位”（如贵族和僧侣所坚持）来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终于在勒恩地方导致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流血冲突。到1月，各种力量的重新配备已经日趋明显，马勒·杜班注意到，这时已经不再是国王和特权阶级之间的立宪冲突问题，而是“一场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战争”[26]。2月，修道院院长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出版以后，把冲突推到更高潮；在这本小册子中，资产阶级第一次要求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不顾及其他等级的愿望或特权。

就是在这种危机加深和政局动荡的情形下，圣安东郊区在4月末发生了累维伊扬骚动；这些骚动被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次群众大暴动[27]，虽然把它们叫作旧制度下的最后一次暴动也未尝不可。累维伊扬是一个获得成功的糊墙纸制造场主，他的总厂坐落在圣安东郊区大街附近的蒙特娄街上，约雇用有350名工人。他曾经因为对工业有贡献而获得过王家勋章。他很有钱，他的图书馆里有5万卷藏书，据说，单是他的家具就值5万里弗，而他的酒窖甚至在暴动中被抢劫后，还有两千瓶酒完整无损。他有一个好雇主的名誉：他声称自己的工人中没有一个人的日工资少于25苏，而一个工人领取20苏以下的工资在当时仍然是平常的事；在1788年至1789年那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当工业由于缺乏燃料几乎完全停顿的时候，他曾经付给200名暂时被解雇的工人以每日15苏的失业工资[28]。那么，何以这样一位完全的公民、善良的雇主和当地选举人会议中受尊敬的代表会变成圣安东区的帮工和工人暴力破坏的对象呢？让我们简略地研究一番以下的事实。

4月23日，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选举人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在演说中抱怨生产成本过高和高额工资给工业增加了负担；他是否曾主张削减工资这一点不能肯定，但是他似乎很惋惜工人每天领15苏

就行了的日子已成过去。同一天，在孤儿区（也在圣安东郊区）的会议上，科特街的一个香粉制造场主亨利奥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论说这些话的动机如何，它们都立刻引起了这一区工资劳动者自发的不满，这种情况从巴黎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第二天早晨向路易十六呈递的报告上可以明显地看出：

〔他报告说〕昨晚十时左右，圣安东郊区某处发生某些轻微骚动；骚动只是某些工人对两个制造场主表示不满，这两个人曾在圣马格里特会议上对工资定额发表了轻率的评论。[29]

在暂时平静之后，于27日又吹起了风暴，这一天是星期一，是工人的休息日。据梯鲁·德·克罗纳报告，下午3时，有五六百名工人聚集在巴士底狱附近；他们把累维伊扬的肖像吊起来以后，又举着这两个制造场主的假人像在首都各处游行[30]。当天下午，哈代（他的书铺“金柱书店”设在圣雅各大街，这个位置最便于看到这些游行队伍）在日记中记的是，“叛乱”已经蔓延到巴黎圣母院区；后来，他在圣日纳维叶山大街上，遇到了几百名工人，手持棍棒，以鼓手为前导；他们在圣马瑟勒郊区补充了生力军以后，便回到市政厅前的格累夫广场，人数达到3000人[31]。以后有三个第三等级选举人描写他们那天傍晚和示威者相遇的情况，示威者当时正再度出发前往圣马瑟勒郊区；他们三个人把示威者劝散了[32]。但是，不久以后，群众又在蒙特娄大街累维伊扬工场附近聚集起来，当他们发现累维伊扬的住宅已经有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兵士守卫时，便前往附近科特街上的亨利奥住宅，捣毁了他的家具和私人物品。后来，军队驱散了他们——并没有人死亡（据梯鲁·德·克罗纳说）。除去驻扎在累维伊扬住宅附近的卫队以外，另有100人一队的两个分队被调来守卫圣安东郊区各处，并且从疯人院地方调来100名骑兵作为应付紧急情况的预备队。当局派出了这些兵力以后，认为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33]。

但是，第二天早晨，又发生了骚动并蔓延到更广大的地区，使户主们感到非常惊慌。当更多的军队被调来时，一群群工人在各区用说服或威胁的方法召集到了新的支持者。当天的码头上没有人做工，工场工人和作坊帮工刚一过午就来到了街上，许多人加入骚动者的队伍。警察局发出明确指示，要强迫雷依里大街的王家玻璃制造厂（离累维伊扬的工场只有200码远）的500名工人继续工作；但是，巡行各处的人群破门而入，劝说或强迫工人们参加他们的队伍。在大教堂区，有人企图把工人从他们的住所中拉出来[34]。根据哈代所记，到5点时，群众在新桥、商业桥（邻接警察局）、圣安东门和林荫道附近聚集在一起[35]。

傍晚6点到8点之间，骚动达到了高潮。群众冲进了累维伊扬的住宅，50名王家轻骑兵团的卫兵被赶开了，比前一天晚上规模更大的破坏重演了一次。法兰西警卫军司令沙特勒公爵下令开枪，于是在窗户边和屋顶下挤满几千人的狭窄街道上展开了大屠杀。尽管如此，群众毫不退缩，高呼“自由……我们决不让步！”以进行反击[36]。有的人高呼：“第三等级万岁！”甚至高呼：“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37]斗争一直坚持到8时；10时，梯鲁·德·克罗纳向国王报告：“局势正在恢复平静，在圣安东郊区，还没有走散的只有不多几伙人了。”[38]哈代担心第二天还会重演这类事件，据他记载，暴动者在解散以前曾经宣布，“为了让面包减价，明天还要举行大暴动！”[39]

剩下的就是法律审判了。4月29日，地毯工人吉尔伯和搬运工人布拉在格累夫广场被绞死。三星期以后，书记员马利在圣安东门被绞死；还有一名妇女叫玛丽-贞尼·特鲁摩也被判绞刑，由于被发现有孕才得到缓刑，最后被赦免了。另外5个人在累维伊扬的酒窖中喝醉了，犯了以暴力和辱骂抵抗军队的罪行，被系上足枷在圣安东门马利的绞架旁边示众，以后被烫上烙印，送到船上终身服苦役。其他26名被捕的人最后被释放了。大部分都是在三个月以后由于公众的压力而获释的[40]。

累维伊扬暴动中死伤的人数一直没有确定。为了避免进一步激怒舆论，当局谨慎地少报了牺牲者的数字，这样一来，便引起了种种胡乱的传说和揣测。里姆地区贵族代表西勒里侯爵在向他的选民报告发生的事件时，估计被杀死的人有“几百人”[41]。哈代估计的人数更多，有900人以上[42]。另一个作者谈到单单在蒙特娄街一座房子的花园里就有七八十具尸体[43]。与此相对照， 各警务委员的报告说死亡者只有25人，受伤者只有22人[44]。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完全的，虽然我们无法对它们加以纠正。

然而，尽管有这些缺陷，这类报告仍然有助于我们确定暴动者的身份和与骚乱最有直接关系的地区。历史学家在后一点上的意见还没有能趋于一致。饶勒斯认为大部分暴动者是从圣安东郊区那边来的[45]；而一位较近代的作家让·科洛则认为，暴动者所受的主要煽动来自另一个一贯喜欢闹事的圣马瑟勒郊区[46]。科洛的看法从古林的口供上得到了支持，这个被告在受审讯时告诉警察说：“乘机暴动的是圣马瑟勒郊区的人，这是我听我哥哥和别人说的。”[47]但是，其他证据否定了这种说法——不仅梯鲁·德·克罗纳的报告始终说暴动者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48]，而且警务委员关于死伤及被捕者的报告也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些报告或许是比较确实的。事实上，在报告中提到住址的63个人中，只有5个人住在圣马瑟勒郊区[49]。这看来符合事实——当然，如果另有证据证明，在躲避子弹和逃脱侦缉方面，圣马瑟勒区的人比一般人有更大的本领或更好的运气，那又当别论！

饶勒斯的论断比较近于事实：在上述的63人中，我们知道只有32人住在圣安东郊区——显然只能勉强算是多数，可是如果把住在邻接和紧密毗连的圣保罗区和圣日瓦区的人加上去，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在有案可查的那些人中占绝对多数。所以，大体上，这些暴动可以说主要是一次圣安东区事件，重要的煽动和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圣安东区各地。不过，由于累维伊扬发表的评论不只对于圣安东郊区有重要意义，因此，骚乱

事实上也就不难从邻近教区得到支援——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件，它的反响并不像以前8月和9月事件那样普遍。

累维伊扬暴动在大革命史上之所以是突出的，在于这些暴动代表工资劳动者的起义。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一切暴动中，只有这些暴动是工资劳动者显然起了主要作用，并且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工资劳动者提出了号召（虽然提得还不够明确）。巴黎革命将看到各行业不止一次地同心协力为工资而进行斗争——如1791年和1794年——但是它们从来没有能采取过起义的形式。在上一章提到“工人”这一名词的意义以后，我们当然要慎重，不能认为哈代和梯鲁·德·克罗纳所用的“工人”一词就一定意味着所说的那些人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50]，但是，在这次事件中，这一名词的意义却基本上证明与现代的意义相吻合。我们已经看到，示威者向码头、工场和公寓旅店中的工人发出了直接的特殊的号召；而对警察局报告的研究表明，在注明职业的75人（被捕者、受伤者或死者）中，不下于58个人是工资劳动者——圣安东区小手工业帮工、圣保罗和圣日瓦区河岸工人、一般工人以及少数制造厂工人。其余的包括一个雕刻师、一个酒商、一个家具铺老板，还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这也许有些不协调）[51]。他们当中有一个妇女——据说是首领之一——名字叫玛丽-贞尼·特鲁摩，她被认为曾经高呼：“啊，第三等级万岁！”“打倒累维伊扬！”以此煽动暴动者焚烧和抢劫。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乎使她送掉性命[52]。

是什么东西驱使这些帮工、体力劳动者和小工匠愤怒地参加这些暴乱和采取这样奋不顾身的勇敢行动的呢？骚乱的直接原因当然很清楚：它直接产生自累维伊扬和亨利奥关于工资过高的“轻率”言论。这两个人是否如人们所普遍相信的那样，真正主张减低工资；或者他们是否如替他们辩护的人所说的那样，只是叹息今不如昔[53]；或者是否如他们自己所坚持的，他们从来没有说过传说的那些话[54]，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圣安东郊区的工资劳动者认为他们说了些什么，这些话

对工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有些比较老实的被告在审讯时承认，驱使他们参加暴动的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工资似乎受到了威胁。例如，马具匠勒·勃朗承认他曾经冲进累维伊扬的住宅，把家具从窗子里扔出去，他解释自己参加示威的理由如下：

尽管他是因为爱看热闹，被人群拥到那里去的，但他和这一区的其他工人一样，对累维伊扬先生感到气愤，因为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的第三等级会议中曾说：工人每天有15苏就可以过活。他还说：他厂子里的工人每天挣20苏，衣袋中装着怀表，工人们不久就会比他还要有钱。

勒·勃朗又说（也许是含有深意地），告诉他这些话的就是他自己的雇主，罗克特街上一个有名的瓷器制造厂主奥列弗[55]。

当这些暴动发生在一个政局极端不稳定时期，当局必然会认为这不仅是关于工资问题的自发的骚乱。既然所有被捕的工人看来都不像是领袖，那么是谁通过收买或其他手段把他们煽动起来的呢？哈代提到暴动者的时候，把他们说成是“受到匪徒煽动的……工人”[56]；一本题为《略论4月28日事件》的小册子的作者，指出这是一个贵族或教会的阴谋，在这个阴谋中：

大多数各行业的工人都不是主动参加的，有的受钱引诱，有的迫于暴力，才加入了暴徒的行列。[57]

所有调查委员的报告都表明他们怀有暴动是由外人策动的先入之见；他们没能够从任何被捕者那里得到关于这方面的满意证据，于是在5月3日逮捕了修道院院长罗伊，在此以前，一般人都认为他是政府的密探和累维伊扬的私敌。但是，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使人失望的证人，所以几天以后他就被释放了[58]。在警察局方面，认为有教会阴谋家从中策划的这种意见似乎很有力量，因为当被告之一、造纸工人西里叶供称，在暴动发生几天以后，有人在圣端诺累街上给了他钱时，警察局就问

他“给他钱的是修道院院长还是别人”[59]。不过，就像1775年的暴动一样，认为有教会阴谋看来并没有真凭实据。

另一种认为有人阴谋指使的理论——说暴动者经过收买，看来也没有什么根据。据极端保王派刊物《国王之友》的编辑蒙勺瓦报道，每一个送进市立大医院的受伤者身上，都发现有12法郎，大多数都是用纸包着，好像刚发放的一样[60]。看来这是一种捏造，因为警察有一切理由愿意证实他们对于教会、奥尔良分子或其他阴谋的怀疑，但是却没有从任何受过人身检查的被捕者身上发现可疑的物品。在18具送往蒙特罗公墓和经过警务委员奥丹检查过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一文钱——只有几个廉价的烟荷包、钥匙、本行工具；有一个人身上有一件也许是偷来的小小的银器[61]。唯一承认领取金钱报酬而且在他的口袋中找出一大笔钱的人，是造纸工人西里叶，而他却是在暴动结束一星期以后才开始与本案发生关系[62]。

泰讷指责暴动者是“匪徒”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深究，除非他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在这些被捕者中， 只有三个人有过任何一类的前科，而且，其中两个人只不过是在阜尔斯监狱中被拘留过短时期，只有一个人有过某种犯罪记录——这就是码头工人达代涅，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一个“V”字烙印[63]。事实上，这些犯人大多数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工人，他们大都有职业[64]，参加暴乱以后并没有得到金钱的好处或进行过抢劫。

但是，在这些骚乱的背后的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在背后隐藏着比表面的直接原因更为深刻的经济因素。两个本地制造场主对于工资随便发几句议论这件事本身，很难引起这样一场猛烈的大火。还有一件突出的事实，就是累维伊扬本厂的350名工人中，没有一个人属于死伤或被捕者之列，也没有任何报告提到人们在4月28日曾经打算把这些工人拉出来参加其他工人的队伍。所以如果想把累维伊扬暴动解

释成工人为反对一个不得人心的雇主而举行的罢工或简单的工资抗议，那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是一次反对当时面包缺乏和价格高涨的极为猛烈的——虽然一部分是不自觉的——抗议。我们看到，4磅重面包从2月以后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惊人高价。这次抗议的矛头固然是指向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两人是坏雇主，也不是因为工人受到教会或贵族代理人的煽动。如这两个制造场主自己所怀疑，他们的私敌在挑起众怒上可能起有某些作用，但是这种挑拨之所以得逞，完全是因为累维伊扬发表了关于工资的议论，以致触犯众怒，使公众认为他和他的同事同那些令人憎恨的垄断者或粮食囤积人有关系，而后一种人正是大家最痛恨的对象。小册子《上国王书》的作者似乎已经了解到这种动机，他写道："陛下，最近这些骚动完全应该归罪于面包的高价。"[65] 我们也看到哈代在日记上记着，暴动者在捣毁累维伊扬的住宅以后，宣布他们的意图是要求面包减价[66]；除去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私人财产外，在暴动中唯一被侵入的场所是食品店，这也是暴动的一个显著特点[67]，事实上，所有证据都指明饥饿是这些骚乱背后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并不完全排斥有其他外因加入，起煽风点火作用的可能性。是否有累维伊扬和亨利奥的政敌或商业竞争者蓄意煽起群众的愤怒来反对他们呢？前者似乎不大可能，我们看到暴动者在开始进行破坏时，曾高呼新的流行口号"第三等级万岁"。由于累维伊扬本人就是当地第三等级中的知名人士，这种情况看来也许更难令人理解。但是，对于参加累维伊扬暴动的人，正如对于后来在7月破坏巴黎关卡的人一样，"第三等级"这个名词在应用上有一种更为狭窄的社会含义：在他们嘴里，这句话似乎是一句号召穷人反对富人的口号，而不是如修道院院长西哀士所了解的那样，全体国民反对一小撮特权人物的口号。在这种意义上，"第三等级万岁"这句口号当然可以用来反对像累维伊扬这样有钱的制造场主。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瓷器制造场主奥列弗的态度，据说他曾经把累维伊扬在圣马格里特区会议上的一时失言用最可怕和最有挑拨性的词句向他自己的工人报告[68]。是否在当地有某些雇主和累维伊扬有私仇，故意煽动自己的工人和这一区的贫民来反对一个生意兴隆的商业竞争者呢？

这是一种有趣而又可能的事，然而它不能提供根本解释：无论是商业竞争者或教会冒险家，无论是奥尔良分子或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他们在累维伊扬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也只占很少一部分。骚乱的主要原因，正如旧制度时期（以及革命时期）发生暴动时常有的情形一样，主要在于面包缺少和价格昂贵，买面包的费用几乎已经达到工资劳动者支出的四分之三[69]。另一个使暴动具有特点的原因是两个制造场主不谨慎的言论，他们把面包问题和工资问题联系起来的说法激起了工资劳动者的极大愤怒。

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自然是当时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为掌握三级会议而向特权等级发出挑战，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口号已经开始在“贱民”中生根，并且被他们用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这种空气将被以后几个月的事件推向一个更高的高潮。

---

[1] 参看亚·马迪厄：《法国革命史》（A.Mathiez，*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2年至1927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2章（中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Quatre-vingt-neuf*），1939年巴黎版，第11页以下。

[2] 亚·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卷，第1、2章。

[3] 转引自勒菲富尔：《1789年》，第7页。

[4] 关于更详细的论述，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的爆发》（G，Rudé，“The Outbreak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今昔》（*Past and Present*）， 1955年11月，第28—42页。

[5] 关于“贵族反叛”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第1卷，

第1、2章；勒菲富尔：《1789年》，第24—42页；阿·葛德文：《法国革命》（A.Goodwin，*The French Révolution*），1953年伦敦版，第27—42页。

[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178页。

[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250—251页。按照哈代的说法，开枪的士兵后来被囚禁起来。

[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4。此外，9月2日，有一个家庭佣仆被带到警务委员里日那里，罪名是煽动群众反抗巴黎近卫军（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81页）。

[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4，第252—255页。

[10] 大英博物馆文件（Brit.Mus）：27 D 13（43）。

[1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287页。

[1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11页。

[13]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70页。10天以后，在伦巴底大街又发生了另一次小骚动（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81页）。

[1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0—11页。

[1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5、72—73页。

[1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68页。

[1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页。

[1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7卷，第61—62页。用哈代的话说："由于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群众增加了那个地方的闹事人数，骚乱越来越厉害了。"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XI^b 8989；1788年9月24日巴黎法院文件选录；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2—487页。

[2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80页。但是，根据警察局文件，并没有人死亡，只有14人在圣马丁街和圣日尔曼郊区（那里发生另一场冲突）受伤，有18人（其中8人受伤）被捕（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6页）。

[21] 对骑兵的一种通常的蔑称。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206；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00页。

[23]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9页。

[24] 国立图书馆，朱里·德·弗劳里丛书（Collection Joly de Fleury），第1113册，国家档案馆文件：Y 9491，9989，11206，11517，15309A，18751，18795；XIb 8989（转引自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489页）。

[2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154—155、168、408、426页。

[26] 转引自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Lefebvr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54年巴黎版，第113页。

[27] 勒菲富尔：《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69页。

[28] 乔·鲁德：《巴黎工资劳动者》，第2卷，第36页。

[29]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58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53页。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7—298页。

[32] 《第三等级三名选举人的爱国行为》（*Acte patriotique de trois electeurs du Tiers État*），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20。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160/146号，对开本第49、54页。

[34] 参看达代涅（搬运工人）、纪勒（大理石匠）、海利叶（马掌铁匠）、古林（造纸工人）、夏罗（铜匠帮工）的审讯笔录。（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13582、12218、11033）；并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51页。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36] 让·科洛：《累维伊扬事件》（J.Collot，“L’affaire Réveillon”），载《历史问题评论》，第121期（1934年至1935年），第35—55、239—254页。

[37]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7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C 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52页。

[3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29—133页，Y 18795，对开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页；BB16 70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3、329—331页。

[41]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6页。

[4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13页。

[43] 《上国王书》（*Lettre au Roi*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6，第15页。

[4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3582、15101；克-勒·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72页以下。

[45]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142页。

[46] 科洛：《累维伊扬事件》，第42—49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

[48] 1789年5月8日，他在写给警务委员约朗的一封信中说："你要叫他们知道，这些暴乱大部分来自圣安东郊区……"等（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981）。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491、10530，对开本第131—133页；13582、15019、18795，对开本第444—445、447—450、457、462页；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72页以下。

[50] 参阅本书第21页。

[51] 参阅44页脚注②。此外，据哈代记载，5月2日在普列特利·圣塞佛林大街（在大学区）上逮捕了与这次事件有关的两名搬运工人（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7页）。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加到被警察逮捕并出现在警察报告中的35名男女中，我们便发现在37个被捕者中，工资劳动者就有32人——这甚至要比上述数字还更有意义，因为这些人和偶中士兵流弹的牺牲者比起来，大概都与这次事件更有直接关系。

[5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981、13454。

[53] 国家档案馆文件：KK 641，对开本第16页。

[54] 《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Expos 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Réveillon* ）和《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Expos é justificatif pour le sieur Henriot*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Bib.Nat.）：Lb 39 1618—1619。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雕刻师达尔戴维兹和装修木匠维庇也说了类似的话（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奥列弗后来以其制作的巴士底监狱瓷器模型而出名〔参看《巴士底监狱与陶器模型》（“La Bastille et les faienciers”），载《法国革命》，第1期（1881年），第116—118页〕。

[5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57]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8。

[5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08—309页；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104页；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44—45页。我们在警察局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关于罗依的案卷。

[5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60]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45页。

[6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019。

[6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6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

[64] 35名被捕者中只有5名是失业者，25名受伤者中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历史学家可能被暴动有意在“工人”休息日——星期一举行这件事迷惑了。

[65]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156。

[6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

[6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6005。

[6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

[69]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47—249页。再参阅附录七。

第四章 **1789**年**7**月

一个在1788年至1789年冬天访问法国的人没有预见到正在酝酿中的巨大事变，或者甚至没有看到老百姓对当时各种问题的态度有任何特殊变化，也许是可以原谅的。当然，特权等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对国王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但是，这是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路易十五时代就曾这样做过，虽然不如现在这样有成效。再有，经济危机确已日益严重，低级消费者对于小麦、面粉和面包的价格上涨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满；但是，这难道不能像1740年、1768年和1775年那样地结束吗？虽然1789年1月的严寒使已经让人感到恐慌的工人失业现象更加严

重（一般认为这种失业现象是由韦尔然同英国签订的“自由”通商条约造成的[1]），但是，这场严寒并没有使当时的局面发生根本的变化。一般流行在学术界的关于“革命”问题的谈论已经继续了许多年。诚然，政府最近已经答应在5月召开三级会议——这自然是最近以来没有先例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三等级会顺从地接受发动召开会议的贵族和僧侣为其规定的卑下地位吗？事实上，完全改变法国时局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不是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是这一决定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是会议的发起人所预料不到的。

第三等级一经决定接受贵族和僧侣的挑战，像阿瑟·杨格这种有见识的旅行家或者像马勒·杜班这样机敏的本国观察家，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区别——第三等级接受挑战的方式是，不仅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有加倍的代表人数（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让步），而且要求以每个代表为单位来进行表决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代表作为一个单一的审议团体的一部分来表决；这样，在这个团体中，第三等级如果能把即使是很少一部分贵族和僧侣争取过来，就能够获得胜利。正是为了促进这种要求的实现并且从资产阶级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支持，修道院长西哀士才写出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才有关于“第三等级”“国民”和“人权”等的言论。这些思想一旦像1789年春天那样在一般人民中传开，已经为经济困难和一贯的不满所孕育成熟的群众不安就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的目标。的确，单是想到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和《陈情表》中所提到的人民疾苦可以诉之于会议这件事，就引起了历史学家所说的“巨大希望”。

一件惊人的大事（勒菲富尔写道）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无限美好而又模模糊糊的希望——一个全民新生的希望，一个大家都将享有更多幸福的新时代的希望[2]。

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当然是阿瑟·杨格所提到的那件事，他有

一次在香槟省遇到一个老农妇，她告诉他说：

据说，有些大人物在动手替穷人做些事情，但是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也不知道他们将怎么做，不过，愿上帝让我们生活得好点吧，因为人头税和租税已经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啦[3]。

当时的另一面情况是：人们坚信特权等级将想尽一切办法粉碎这些希望——因此，就同时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贵族阴谋”的观念。哈代说明了这个观念和“饥荒协定”的旧观念是怎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告诉我们，当面包在2月涨价到14苏半时，人们开始说：

亲王们公开垄断了所有的粮食，以便能够更容易达到推翻内克尔的目的，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把内克尔赶下台[4]。

同年夏天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加深了这种恐惧，刺激了已经在首都发展起来的暴动情绪[5]。三级会议由于第三等级（它很快就把自己组织成为国民议会）和大多数贵族及主教们提出了互相敌对的要求而陷入僵局。为了加速解决问题和恐吓巴黎，外国军队正在巴黎外围集中：6月3日，哈代已经看到了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的到达，他们被召进首都的借口是防止圣安东郊区重新爆发骚乱[6]。宫廷派围绕着玛丽·安东涅特和国王的兄弟亚多瓦伯爵结成一党，他们的意图越来越明显：6月22日夜间，国王被说服把内克尔免职，并且陈兵耀武恫吓国民议会。这场阴谋失败了：数以千计的人涌进王宫的庭院要求保留内克尔的职务；孔提亲王指挥下的士兵拒绝服从开枪的命令；被米拉波一席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鼓舞起来的代表们拒绝解散。国王被迫屈服。

到这时为止，在巴黎发展起来的革命情绪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领导。专门职业者和商人阶级一直准备静观事态发展，并且目睹郊区和市场区的愤怒情绪而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从凡尔赛传来最新的消息，他们开始对各种事情发出指示，如果没有这些指示，七月革命就很难发

生。从这时起，奥尔良公爵（他在凡尔赛已经站到第三等级一边）周围的小册子作家和记者开始在罗亚尔宫建立起一个常设的本部；每天晚上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这里，听取哈代称之为“极端革命派”的各种口号和指示——可能还领有经费[7]。与此同时，407名巴黎第三等级选举人（他们原来的任务是选派巴黎第三等级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代表）开始按时在首都的中心——市政厅集会。这两个团体在七月事件中起了各不相同然而却是互相补充的作用。不过，在早期，给予群众运动以积极指示的只有罗亚尔宫。当市政厅满足于起草各种建立资产阶级武装或民兵的纸上计划时，罗亚尔宫就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通过公开鼓动和慷慨地花钱来争取法兰西警卫军，使他们不再为宫廷效忠。 6月30日，从罗亚尔宫派出的群众强迫当局把11名警卫军从亚培监狱释放了出来，他们是因为于6月22日夜间在凡尔赛拒绝向人民开枪而下狱的[8]。有人在巴黎卫戍部队中散发支持第三等级立场的小册子：7月8日，一个报贩由于向驻扎在马尔斯教场上的军官和士兵兜售这种资料而被捕[9]。7月10日，从伤兵医院军营中冲出来的80名炮兵在罗亚尔宫和香榭丽舍区受到公开的招待。

宫廷派对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反应是企图冒险做最后一试： 7月11日，内克尔被放逐，代替他的是布累杜伊男爵。这证明是燃起巴黎叛乱的火花。消息在12日中午传到首都，下午，巴黎人群集在罗亚尔宫，在那里，演说家们（其中有年轻的卡米累·德姆连）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一支支游行者队伍迅速组成；人们扛着当时的英雄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的半身塑像在大街上游行；剧场被迫停演来表示悲愤；在路易十五广场上，示威者和奉命驱散图伊勒里宫花园中人群的朗贝斯克亲王指挥的骑兵发生了冲突。巴黎卫戍司令贝桑伐尔带兵撤退到马尔斯教场，首都落入了人民的手中。

当警钟敲响以后（不久，就成为巴黎人所常听到的熟悉声音），一队队的起事者加入两天前就已经开始烧毁关卡的那些人中；这些关卡一

贯敲诈勒索，深为小店主、酒商和低级消费者所痛恨，并且早已是时常发生骚乱和试图走私的场所[10]。从9个月后对这些袭击者提出的控诉看来（在审判过程中，听取了80多个证人的证词），我们知道在四天的暴动中，54座关卡中有不下40座被烧毁[11]。破坏是有计划的：文件、登记册和关税收据被焚毁，铁栅栏被推倒，办公室和家具被烧掉，收税官员（如果他们没有逃掉的话）被赶跑。事出意外，许多人连他们的个人财物都没有来得及拿走，因而受到巨大损失。特隆关卡的一名官员后来声称，他的财产损失价值25 213里弗，其中包括8100里弗现款；另一个人的损失达到27 470里弗10苏[12]。可是，抢劫并不在暴动组织者的计划之列，在圣马丁关卡上，一个抢劫的人受到一个一同暴动的人谴责："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放火，因为上面有命令，但是我们不要抢，命令上禁止我们这样做。"从这种和甚至更为明显的证据看来，罗亚尔宫方面显然与焚烧关卡事件有关：两座据说是属于奥尔良公爵的关卡被纵火者特意保存了下来，这件事无疑是能说明问题的。看来，"极端革命派"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使消费物资自由进入首都（虽然这是必然的结果），而在于消灭总包税人的垄断并控制武器和人的出入。但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常常独立行动）对于一种使酒类、木材、鸡蛋和牲畜的成本大为增加的制度有他们自己的账要清算。这些人是小商贩、酒商、桶匠、建筑工人、码头工人等体力劳动者和公共工程计划雇用的工人。文件告诉我们，他们在这场事变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无疑也影响了它的结果。

当天晚上，武装的平民、法兰西警卫军和当地的穷人，攻进了城北边缘上的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搜寻武器，释放囚犯，并且把52车粮食和面粉搬到中央粮食市场[13]。搜寻粮食是进攻这个修道院的主要目的。一个失业的马车夫带着从修道院找到的700枚金币逃到布艮第的夏劳勒，后来人们在那里找到了他，这个人曾谈到他如何"被那些像样的人带到修道院去……为了把那里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去。"[14]另一个马车夫在受警察讯问时，也谈到两次运过粮食，每次都得到40苏的报酬[15]。

虽然这方面的行动是受罗亚尔宫的指挥，但修道院也同样遭到了当地失业者和“贱民”——文献上谈到的是搬运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很少有作坊帮工——的彻底洗劫，金钱、食物、银器和埋藏的珍宝被抢掠一空。一切想得到的真正值钱或者被认为是值钱的东西都被偷走：一个屠夫的儿子（后来因为偷窃被判罪）承认他拿走了一个干枯的公羊头；另一个狂热分子甚至捎走了一具骷髅，经过五段楼梯拉到自己的房间里！这种行为给警察和新组成的民兵一个现成的借口，使他们逮捕了许多嫌疑犯，主要是失业工人和流浪汉，其中许多人后来都以参加这次事件的罪名受到控告[16]。

但是7月12日夜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武器：各修道院都受到了搜查，首都各区的枪炮匠、造甲匠和马具匠的作坊都遭到了抢劫。一些要求赔偿的声明一直保存到现在。例如，圣列厄教区格勒讷塔大街的枪炮作坊老板马瑟勒·亚洛报告说，他的作坊在清晨2时遭到了一群人的抢劫，带头的是让·罗培大街上的造甲匠帮工；他们拿走了价值24 000里弗的毛瑟枪、手枪和刀剑。圣米契尔桥的马具匠报告说，他有价值390里弗的皮带和吊带被抢走。巴杜贝克街（圣让安格累夫教区）的枪炮和刀剑作坊老板布鲁恩呈递了一份要求赔偿4348里弗的申请书，说他的铺子被抢劫不下30次，一共被抢去150把剑40打刀片，58把猎用匕首，10对手枪和8支毛瑟枪。圣塞佛林教区的另一个刀匠诉苦说，他的铺子在7月12日和13日遭到了好几次抢劫，有大量刀、剑和没有安刀柄的刀片被许多人拿走，这些人不肯付钱，理由是“将用这些东西来保卫首都”，他的损失达6684里弗。巴黎枪炮匠最后向国民议会呈递的报告说明全部损失达151 118里弗。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得到赔偿：他们是革命中倒了小霉的牺牲者[17]。

七月革命第一夜事变的目击者让-尼古拉·丕平的叙述也值得我们注意。这个油烛制造工人是被法院传审的圣拉扎尔事件的证人，他后来谈到他如何被卷入向前推进着的市民和法兰西警卫军的人群中，他们潮水

般地通宵在街上通过，高呼刚刚学来的爱国口号，敲起警钟，搜寻粮食和武器。从他的叙述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当时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是罗亚尔宫，愤怒、惶惑而又扬扬得意的市民向那里而不是向市政厅寻求领导和指示[18]。

然而，在13日早晨，选举人采取了控制局势的坚决措施。他们组成一个常设委员会，作为临时市政府，并且决定不让全体人民都不分青红皂白地武装起来。他们为关卡被焚和圣拉扎尔修道院被抢劫事件而感到惊恐。对他们说来，一帮帮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在这些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对于公民的安全和财产的威胁，并不亚于在凡尔赛酝酿阴谋的特权阶级[19]。因此，他们迅速地通过了建立一支正规民军或者是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的计划，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保卫首都不受外来的军事威胁，也防止首都陷于内部"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毋庸多说，国王在第二天被说服表示同意，完全是因为后一种理由[20]。户主被召集到60个选区里开会：每一区要出200人（后来增到800人）。巴那夫写道：这一天登记并武装了13 000名公民[21]。两天以后，他高兴地宣称：

"巴黎的大部分军队都是善良的资产阶级，这就使城市的公众治安有了保障，而且也是反对暴政的强大力量。"[22]

事实上，因为各区各自规定本区的入伍条件，所以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有财产和居住资格——甚至要有雇主证明品行端正的证书——的限制，这就实际上把一大部分工资劳动者排斥在外；失业者和流浪汉当然更不包括在内了[23]。所有流浪汉、漂泊者和其他"非正规军"都要立即解除武装。据一位英国观察家里格比博士记载，这一天晚上，这项措施已经大体上完成，"那时（他写道），正规武装公民几乎已经完全占领了各街道。"[24]

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说明选举人建立权威的迅速程度。

但是，只要叛乱还在继续，解除武装的手续是否像里格比博士所说的已经完成，却大可怀疑。甚至在解除武装完成以后，新市政当局还认为不能不号召巴黎工人和工匠交出武器以领取每人9里弗的报酬[25]；在7月22日到8月3日期间，单是圣洛赫区就用这种办法收买了250支毛瑟枪和12支手枪[26]。此外，群众还在继续包围市政厅，要求领取武器和弹药。巴黎市长和临时市政机关领袖雅各·德·弗勒塞尔一心想限制武器弹药的分配，因此作了含糊其词的许诺，打发许多人到军火库和卡尔特修道院去白跑一趟；这种“背叛”使他在第二天送掉了性命。与此同时，选举人委派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修道院长勒菲富尔，守卫他们收集起来藏在市政厅地下室中的大量军火。这位修道院长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但是他迫于包围着市政厅喧闹的半武装群众的声势，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把他保管的火药迅速地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交出。他仔细记下了一笔账，我们看到他在7月13日发放了8桶火药，14日发放了46桶——其中有3桶“用以攻打巴士底”，15日又发放了42桶。在这项记录的结尾有几行致歉的附言：

“由于这一次发放得过于仓促，所以没有能填写领据。上述的96桶共重96 000斤。”[27]

对于武器和弹药的搜索一直在继续着：14日早晨，河对岸的伤兵院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抢劫。按照目睹这种事情的撒克逊大使萨尔摩的说法，有七八千市民参加了抢劫[28]；哈代写道，在混乱中，许多人都被挤伤了[29]。院长松布罗叶侯爵部下的士兵不再支持他，于是他被迫打开大门。他后来报告说：有3万支以上的毛瑟枪被抢走了，其中至少有12 000支落入了“危险分子的手中”[30]。同时，人们开始高呼：“到巴士底去！”

保王派历史学家嘲笑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冲向巴士底监狱去释放犯人的情况，因为当时堡内只囚禁有7个犯人，他们不是疯子就是品行恶劣

的坏人[31]。这种批评并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攻打巴士底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释放囚犯，而是为了寻找弹药，因为人们知道不久以前曾经从军火库送去一批军火。无疑地，这里面也有其他动机，人们相信这座堡垒里有很多兵士；堡上的大炮当天早晨曾经对准圣安东街，它们可能对密集的房屋造成很大损害。在夜间，谣传有3万名保王党军队开进了圣安东郊区，并已开始屠杀那里的市民。此外，虽然巴士底监狱已经不再是主要囚禁政治犯的地方，但是作为君主专制的象征，它遭到人们普遍的痛恨：巴黎各区的《陈情表》就证明了这一事实[32]。不过，看来当时并没有真打算用暴力把它攻陷[33]，在巴黎选举人常设委员会方面更没有这种企图——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在手忙脚乱、拿不定主意地从市政厅来指挥一切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和司令官德洛纳谈判，要求他把保存的军火交出来，并且把大炮从城堡上撤掉。这项计划的失败和巴士底只是在遭到正面进攻的威胁之后才陷落，完全是由他们所不能控制的环境造成的。

许多围攻巴士底事件的目击者，或者看来像是目击者所写的记载都保存了下来，这里边所记的许多事实常常是真假参半，而最可信的资料或许就是选举人本身留下的文件[34]。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看到派去和德洛纳谈判的第一批代表在上午10时到达巴士底。他们受到了亲切的欢迎，并且被邀请进午餐，所以有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等在外面的密集的群众担心代表们中了诡计，于是高呼要塞投降，否则就进行攻打。为了消除怀疑，邻近的文化区又派出第二批代表催促司令官投降。这批代表的领导人图里奥·德·拉·罗塞勒给常设委员会带回了这样的话：司令官拒绝投降，但已经撤除了大炮，并且答应除非有人进攻决不开火。直到这时，从圣安东大街涌来的群众才进入了通向巴士底主要吊桥和大门的两个院子的外院。和通常一样，外面的院子并没有人守卫，有一道墙和一座吊桥把它和里面的办公院隔开。不知为什么德洛纳只把这座吊桥吊了起来而没有派人把守。图里奥走了半小时以后，有两个人从邻近的一座建筑物上翻上了那道墙，放下吊桥，德洛纳以为马上就要受到正面进

攻，便下令开火。在接着发生的混战中，包围者牺牲了98人，有73人负伤[35]；防守者只有一人中弹。在混战过程中，派往巴士底的另外两批代表遭到射击，没能够进入要塞。

这时，可尊敬的选举人没有办法了。他们的和平谈判政策已经证明完全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各队武装市民愤怒地坚持，他们肯定会放弃自己的努力。这些武装的市民拥挤在市政厅的办公室里、外面的格累夫广场上以及所有通往巴士底的路上，号召为流下的血和可疑的背叛复仇。这时候，排列在市政厅外面的两分队法兰西警卫军响应前士官皮埃尔·奥古斯丁·胡林的号召，带着当天早上从伤兵院运来的5门大炮，跟着他开往巴士底。他们和要塞前的几百名武装平民联合在一起，冒着炮火冲进了内院，对准正门架起了大炮。这一招起了决定性作用。司令官提出愿意投降，但是守军必须被赦免；可是愤怒的群众根本不肯讲什么条件，继续进行围攻。这时，德洛纳似乎着了慌，威胁着要炸毁要塞，但是守卫的士兵劝阻了他，结果，他在绝望中下令放下大吊桥。巴士底就这样陷落了。

愤怒和胜利的群众冲进巴士底要塞敞开的大门以后，并没有更彻底和无区别地进行报复，这也许是令人惊奇的。他们已经神经紧张地度过了好几天，一直担心着突如其来的袭击和灾难；他们认为某些领袖把他们出卖了；他们有150名以上的伙伴已经牺牲或负伤。在110名守军中，只有六七人被杀死。德洛纳尽管已经领到去市政厅的安全通行证，却在路上被打死了。他的头被人用屠刀割了下来。杀死他的人狄诺，是康帕龙街上的一个厨师，尽管他声明德洛纳先踢了他，后来却夸耀自己的勇敢，说他这样做是一桩爱国的行为，应该获得一枚勋章[36]。德·弗勒塞尔由于不愿意分发武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他随着谴责他的人走出市政厅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7]。

这些群众复仇的行动——一星期以后又杀死了富龙和贝梯埃——当

然要被有些人挑出来，用它们来诋毁巴士底的进攻者，把他们说成是流浪汉、刑事犯或者是花钱在圣安东区小酒馆中雇来的一群乌合之众。这是一种难以消灭的传说；然而，不仅仅没有支持这种传说的证据，而且所有现存的资料都是对这种传说的直接驳斥；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只满足于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圣安东郊区工人”“人民”或者“整个巴黎”。事实上，我们很少有这样做的理由，因为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不过才几百人，而且，至少在他们这种情形下，保存下来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比较能看清楚他们的面貌。

后来被人们称为“巴士底攻克者”的那些人，数目大约在800人到900人之间。他们就是经过仔细查证以后，才被正式承认为曾经直接参与进攻要塞的那些人。他们的名字被仔细编载在册子上，并且分成三份名单保存到今天。每份名单都在1790年各个不同时间经过制宪议会的承认[38]。这些名单中有一份——由“攻克者”的秘书斯塔尼拉-马伊雅制订和保存的那一份——包括662名活下来的人，其中将近600名是平民[39]。虽然它并不完全[40]，却是仅有的一份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名单，因为，我们只有在这份名单上才能找到有关的那些人的住址和职业，乃至于所属的军事单位的记载。当然，只有根据这种证据，才能认清巴士底攻克者的社会地位或职业身份，而不必靠着猜测或者不确切的推论。

这里面很少有富人，正如饶勒斯所说：

人们并没有把那些放利为生者，那些资本家列入战斗者名单，尽管所进行的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他们。[41]

名单中有3个制造场主、4个商人、酿酒商桑代尔、3名海军军官、4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也许还有一小撮有钱的店主，其余的人，除去61名兵士和15名国民自卫军骠骑兵——没有列出他们的非军事职业——而外，几乎全是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当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约30种小工业的小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42]；其余的是

从事制造、分配、建筑、专门职业和一般行业的人[43]。工资劳动者不是经常都能被明确地指出来，但是他们似乎（如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预料到的）只占绝对的少数：从事各种小手工艺的也许有60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许有85人或90人[44]。他们当中有一名妇女——她叫玛丽·夏潘提叶，是何塞恩的妻子，一个圣马瑟勒郊区圣希波里特教区的洗衣妇。

这些就是没有被打死的人；关于所说的在围攻中牺牲了的98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的更少。饶勒斯引用了记者路斯塔洛的话，他写道："有三十多个人在这场不幸中丢下了他的妻子儿女，现在这些家属急待救济。"[45]此外还有证据表明：牺牲者中包括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据哈代报道，7月18日人们曾在圣塞佛林教堂为胡西特大街上的刀匠帮工，31岁的查理·杜松举行葬礼[46]。此外，桑代尔的一个酿酒工人让·马利·塞尔瓦思·戈戎在7月14日下午带着武器到巴士底去，这个17岁的青年也牺牲了[47]。还有5个平民的尸体被运到警察局进行检验：他们包括圣安东郊区的一个制鞋匠帮工和马保广场附近诺耶大街的一个街灯点火夫；其余的都没有人来认尸，也没有验明他们是谁[48]。

至少在没有死的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圣安东郊区的市民。诚然，在635名已经查明籍贯的人中间，有400人是外省籍贯[49]；但是，他们大都已经变成了这一区的定居居民：在602名知道地址的人中间，不下425人住在该郊区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教区[50]。剩下的有60人来自圣日瓦、圣保罗和其他与巴士底毗邻的西部各区，有30人来自中央各市场[51]，约12人来自圣马瑟勒郊区。从离巴士底一二英里路以上的地方来的人寥寥可数：其中有一个来自圣端诺累郊区的锁匠和一个来自马尔斯教场附近格罗卡尤的洋铁匠。所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来自圣安东郊区还是其他什么地方，都绝不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而是有一定住所和职业的人。或许更加令人惊奇的是，绝大部分巴士底攻克者都是作为新组成的资产阶级武装或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地方单位的入伍者[52]带着武器

到巴士底去的。当然，这不仅进一步反驳了所谓攻克者都是流浪汉或社会渣滓的无稽之谈——这种分子当然已被严格剔出民兵队伍，而且也说明了这次围攻可能远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发的事件。

不过，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同意密什勒的说法，这就是：攻打巴士底并不只是和这件事最有直接关系的圣安东区几百个市民的事情，它是全巴黎人民的事情。在暴动达到最高潮时，也许有25万巴黎人（有些人认为还要多）武装了起来[53]。但是，即使采信这种广泛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圣安东郊区和其他地区的广大巴黎小手工艺者、商贩和工资劳动者所起的作用。由于好几个月来生活费用上涨和随着危机的加深而日益相信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希望正在遭受着贵族的阴谋破坏，这些人的革命情绪已经酝酿成熟。

虽然巴士底的陷落没有多大军事意义，可是却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国民议会被保全，并且得到了国王的承认，宫廷派开始瓦解，亚瓦多伯爵自愿流亡。在首都，政权转移到选举人委员会手中，委员们建立了市参议会，任命贝野为市长，拉斐德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7月17日国王亲来巴黎，在市政厅受到胜利者的接待，为了表示默认这次事变的后果，他戴上了革命的红白蓝三色帽徽。虽然在哈代看来，14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54]，但这一周是群众狂欢和彼此亲切地互相拥抱的一周。然而，这段时期并没能持久。革命虽已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可是还远没有完成，庆祝和欢乐不久就为一系列新的严重而悲惨的事件所代替。

---

[1] 查·希米特：《1788年的法国工业危机》（C.Schmidt，“La Crise industrielle de 1788 en France”），载《历史评论》，第97期（1908年），第78—94页。不同的看法，可参看里·卡昂：《1786年至1787年英法条约的新解释》（L.Cahen，“Une Nouvelle interprétation du traite franco-anglais de 1786-7”），载《历史评论》，第185期（1939年），第257—285页。

[2]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12页。

[3] 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Arthur Young，*Travels in France and Italy* ）（人人丛书，1915年伦敦版），第159页。

[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50页。

[5] 关于1789年6—7月间的事件，曾经参考过下列权威著作：皮·卡隆：《1789年6—7月的反革命阴谋》（P.Caron，"Une Tentative de contre-révolution en juin-juillet 1789"），载《现代史评论》（*Revue d'histoire moderne* ），第8卷（1906年至1907年），第5—34、649—678页；让·弗莱马蒙：《1789年7月14日记事》（J.Flammermont，*La Journée du* 14 *juillet* 1789），1892年巴黎版；普·沙韦：《1789年巴黎的暴动和巴士底监狱的攻占》（P.Chauvet，1789.*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946年巴黎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第107—138页；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J.M.Thompson，*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43年牛津版，第45—59页。文献史料另行列明。

[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42页。

[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62页。

[8] 《圣日尔曼亚培监狱事件概述》（*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 é à *l'Abbaye St .Germain* ），1789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383页。

[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818。

[10] 5月1日，10名走私者在圣丹尼关卡上被捕，5月6日又有两人因为引起骚动和侮辱收税官被捕（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第446—447页；18763）。

[11] 国家档案馆文件：Z^{la} 886。（可特别参看标明为《1790年3月29日及以后数日的关于烧毁关卡事件报告》）。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Y11987，15403。

[13] 《1789年7月20日圣拉扎尔警区财务官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4] 索恩-卢瓦尔档案馆文件（Arch.Saône-et-Loilre）：B.705。

[15]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6] 大约50个这种人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档案馆文件中，Y 10634，对开本第149页；10649，对开本第17—21页；18795，对开本第462页；115181；12708；12218；14240；15101；15683。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218，12698；C134，第8卷，第12宗；D Ⅵ 6，第39号，第19宗。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19] 由于从阜尔斯和比塞特勒监狱释放了囚犯，这些人很快就扩大了队伍；不过，其中有些囚犯并不乐意享受这种自由，第二天又向警察局投案（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454）。

[20] 《贝野回忆录》（*Mémoires de Bailly* ）（1821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67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97—199页（1789年7月15日的信）。在7月14日，据哈代记录，已经有3万人编入队伍（《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6页）；据巴那夫估计，到7月15日，入伍者已达48 000人（同上），7月18日达9万人（国家档案馆文件：W 13，对开本第105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97—198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C 134，第1卷。

[24] 《1789年里格比博士自法国等地来信》（*Dr .Rigby’s Letters from France etc .in* 1789），伊斯特莱克夫人（Lady Eastlake）编（1906年伦敦版），第55页。

[25] 《1789年7月14日于市政厅召开的巴黎选举人大会会议记录》（*Procés-verbal des séances et délibérations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électeurs de Patis* ）（1790年巴黎版，3卷本），第2卷，第156—158页。大英博物馆文件：F602—604。这些记录大部分都转载在罗·乔·威克翰·莱格的《法国革命……文献选辑》（L.G.Wickham Legg，*Select Documents ...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 ）（1905年牛津版）中，第1卷，第49—95页。

[26]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0号，对开本第55页。

[27]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8号，对开本第47页。

[28] 亚·马迪厄：《伟大的国民议会时代（1789年至1791年）》

（A.Mathiez，*Les Grandes iournées de la Constituante* 1789—1791），1913年巴黎版，第22—23页。

[2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0页。

[30] 《选举人大会记录》（*Procés-verbal de l'assemblée des électeurs* ），第1卷，第371页。

[31] 亚·贝吉：《1789年至1792年巴士底监犯登记簿》（A.Bégis， *Le Registre d 'écrou de la Bastille de* 1789 à 1792）（1880年巴黎版）。

[32] 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散见第2卷各处。

[33] 参考哈代所说的“郊区的工人企图在形式上包围这座要塞”（《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34] 重要各段见于威克翰·莱格所编的文献中，第1卷，第49—95页。

[35] 这些是杜索几个月后在他第一次向制宪议会提出的正式报告中所列的假定数字〔《巴黎人的暴动和巴士底狱的陷落》（*De l'insurrection parisienne et de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1790年巴黎版，第161—162页。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972〕。哈代列出的数字较低，只有20～60人牺牲，17人负伤，他根据的是最初的传说（《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3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823。根据狄诺自己说，他在7月13日加入地方民兵，参加了对伤兵院的进攻。

[37] 关于这些不同的牺牲者的记录，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Y11285、14604、10634，对开本第149—151页。

[38] 《攻克巴士底的公民名单》（871名），国家档案馆陈列品，第1166号；《巴士底攻克者名单》（954名，其中许多姓名有重复），收于F.布农：《巴士底》（F.Bournon，*La Bastille* ），1893年巴黎版，第219—223页；《巴士底攻克者名单》（662名），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40] 显然被漏掉的人当中有：砍掉德洛纳头颅的狄诺，修道院长伏契，美洲人富尼叶，建筑师帕罗伊以及马伊雅本人。

[41]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页。

[42] 这些人包括49名装修木匠、48名桌椅匠、41名锁匠、28名皮匠、20名

雕刻匠和塑型工人、11名金属浮雕匠、10名旋工，10名理发匠和假发制造者、7名陶工、9名纪念碑石匠、9名钉匠、9名小工艺品商、8名印刷工人、7名黄铜匠、9名裁缝、9名翻砂工人、5名宝石匠、5名金匠、5名炉匠和3名室内装饰工人。关于类似的分类，可参看考·博尔：《1789年的共济会叛乱》（G.Bprd，“La Conspiration maconnique de 1789”），载《通讯杂志》（*Le Correspondant*），1905年5月，第521—544页。博尔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一定利用了马伊雅的名单，但是他没有说明参考资料的来源。

[43] 这些人包括11名酒商，3名咖啡店老板，2名客栈老板，21名商店老板，9名帽商，3名制造场主，4名商人，6名园丁，3名木匠和7名石匠。

[44] 人数最多的几个职业种类是：桌椅匠（8～10），装修木匠（8），锁匠（7～9），皮匠（5），印刷和造纸工人（4），织袜工（4），纱布工（22），搬运工（17），河岸工人和船夫（8），船坞工人（5），马车夫（4），石匠（5），石工（4），丝带工（3）。

[45]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03页。

[4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8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

[4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150页；12698；10598。

[49] 让·杜里埃：《巴士底攻克者》（J.Durieux，*Les 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1911年巴黎版，第261页以下。

[50]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巴士底附近各条街道——圣安东郊区大街和附近的各街道（245人），拉坡大街（53人），疯人院大街（44人），贝塞大街（12人），蒙特娄大街（7人）。

[51] 所以，美洲人富尼叶所说的从圣尤斯塔区的800名附和者队伍中带领了400人前来参加围攻这件事，我们不应该完全信以为真〔《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Mémoires secrets ... de C .Fournier*，*Américain*），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52] 在马伊雅的名单上，有七分之六的平民注明了国民自卫军的连和营的番号。我假定其余七分之一（他们中间包括一个14岁和一个16岁的男孩子以及一个妇女）的人不属于民兵之列。

[53] 资产阶级武装的最初鼓吹者尼古拉·德·邦涅维尔后来写道：在7月14日，巴黎有30万人武装起来（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

卷，第31页）；巴那夫写道：在7月18日，有18万人拿起了武器（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105页）。

[5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0页。

第五章 向凡尔赛进军

10月5日进军凡尔赛的结果使国王回到首都，从而完成了巴黎的七月革命。只要宫廷和国王还留在凡尔赛，少数活跃的代表还能够和宫廷勾结起来破坏国民议会的制宪计划，那么，实际政权就仍然是由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少数开明贵族的支持）和旧制度的拥护者分别掌握着。国王拒绝同意人权宣言和国民议会的最终会导致废除封建地主制度的8月4日有名的决议，关于“否决权”的长期斗争以及经常有人阴谋把国王拐到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所有这些都表明七月革命的成果是如何靠不住。

十月暴动就为的是巩固这些成果。把国王置于国民议会、巴黎市政府和各区大多数人的严密监视之下，并在国民议会内部摧毁保守的“英国派”的势力，这就使君主立宪派确立了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在巴黎从贝野长期担任市长和拉斐德长期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上得到了反映。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 由于把国民议会本身置于巴黎“贱民”——其中比较活跃的分子已经开始拥上讲坛，而且经常影响议会中的辩论——同样严密的监视之下，这就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种发展既不是10月的胜利者所能预见的，其结果也不是他们所欢迎的；不过，这当然还是未来的事。

然而，君主立宪派（他们显然是暴动的直接受惠者）并不急于夸耀他们的成功，或者向全世界表明他们怎样取得了这些成功。当警察局关于10月6日事件的调查报告在1790年3月发表的时候[1]，它得到了国民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它不仅没有暴露事件的真相，而且起了一种真正的烟幕作用，转移了人们对10月“骚动”事件真正主使人的注意。这份调查把国王被人们粗暴地和匆忙地挟持到巴黎，说成是解释得很含混的奥尔良派阴谋或者是丧失名誉的米拉波险恶的计划所造成的结果。这种说法很能迎合宫廷、警察局、巴黎市政当局和议会中统治党的心意；如果把事变的真相暴露，说它是控制国民议会和巴黎市政厅的可尊敬的资产阶级和开明的贵族对于一个长期酝酿着的计划的执行，那就太没有政治头脑了。毫无疑问，米拉波、奥尔良甚至拉斐德在事件中起的真正作用是蒙着一层神秘的幕布的——警察局的调查有效地加厚了这层幕布。本章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清有关的各党派各有什么罪行或责任；亚尔培·马迪厄在已有的条件下，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我们在这里只要这样说就够了：如果那些最直接受惠于这些事件的人一点也没有对十月暴动进行有效控制，就像他们对巴黎七月革命进行过控制一样，那就实在太奇怪了。在一定范围内，他们在10月会和在7月一样毫不犹豫地利用“贱民”的愤怒和革命动力来达到他们确定的政治目的。国民议会中间派的一位深受尊敬的成员杜索院士在8月26日就已经和总

包税人奥日阿说过，一定得把国王弄回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难道他没有这样说过吗？[3] 巴那夫在事变发生后曾写信向他的多飞内区选民解释暴动的必要性——尽管事变的某些现象无疑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且赞扬巴黎城又一次挽救了“公众自由”，难道他没有这样写过吗？[4]

关于十月事件的主要政治后果和责任，就简要叙述这些；但是，巴黎的“贱民”已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从犯，他们并不愿意在10月仅仅为君主立宪派的利益进行暴动，正如他们在7月不愿意仅仅为了罗亚尔宫或者巴黎选举人而举行起事一样。他们虽然可能和所有的“爱国者”一样，对于凡尔赛策划的新“阴谋”抱有一般的恐慌，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别迫切的要求。巴那夫经常表现出比他的大多数同事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现实，当他写信给他的选民时，他唤起他们注意这种利益的分歧，他指出：在十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人民”虽然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携手合作，但前者完全是受着想要击败贵族阴谋的驱使，而后者在具有这种愿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面包的缺乏[5]。这种双重利益决非十月事件所特有；但是认清了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一事件至少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们知道，这一事件在某些方面是比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更为神秘莫测的。如果我们先试着追究一下这些不同趋向的根源，研究它们的发展，看看它们怎样汇合成为10月5日的共同行动，我们也许对于这一事件就能了解得更清楚。

和七月事变一样，首先被卷进积极抗议中的仍是“贱民”，而不是资产阶级；而他们的运动也没有随着当前政治目标的实现而停止。在他们看来，七月革命以后的平静不过是短时期的。从政治运动的角度看来，7月和10月的事件虽然有共同的联系，但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件；可是从群众社会运动的角度看来，也许更正确的说法是：这几乎是一个继续不断的骚动，从4月和5月就开始发生，7月达到高潮，10月又达到另一次高潮，一直到11月初才最后平息下来。在这一运动中，面包问题

是首要的，凌驾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把最大多数人吸引到共同抗议中来。不过，这里面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它们虽然只影响少数人，却增加了普遍的不安，因而对于愤怒程度和10月5日示威者的人数也一定起了推动作用。

首先，当时有一批从事于公共工程计划，或者仅仅是集聚在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他们的人数在急剧增加，到8月份，救济工场中的失业者已经有22 000人，其中单是圣母山就有18 000人[6]。在七月革命中，他们在关卡上甚至在巴士底都起过一定作用[7]，但是，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说来，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同盟者。当局对于他们的厌恶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当一批新征召到圣母山的工人于8月9日聚集在蒙苏的奥尔良公爵府邸外面等待一个办事员分配工作或发工资时，15个人被以非法集会的罪名被捕[8]。不久以后，就出现了一本作者叫博勒帕勒爵士的小册子，说圣母山的工人正在修筑为架设指向全城的大炮而准备的炮台[9]。虽然从小圣安东区来的考察代表团在一份作证报告中否认了这些臆测[10]，当时却引起了关闭这座工场的要求。市政当局在8月12日同意这样做，并且在15日委派拉斐德向圣母山的工人们说明这项决定。拉斐德没有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或许是因为国民议会刚刚决定减低他们的工资[11]。接着便发生骚乱。同月末有两个圣母山的挖掘工人由于威胁说要杀死他们的工场经理而被捕下狱；有10名在巴士底做工的工人（其中包括3名妇女）由于闹事被桑代尔逮捕[12]。圣母山的失业工人被及时遣散了，大多数在巴士底义勇队（这是一支武装部队，不要和巴士底攻克者混淆）的协助下被送回各省原籍[13]；但是，其他救济工场并未关闭，并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逐渐为向凡尔赛进军以前的政治鼓动所渗透。

与此同时，有一些行业决定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考验新市政当局是否忠实可靠。这些人当中包括面包师、假发匠、裁缝、鞋匠、药剂师和家庭仆役。一般讲来，他们发现新市政当局对他们

所提出来的要求并不比以前的当局更有同情心：他们提出的准许集会的要求被断然拒绝了，而且有时是靠着国民自卫军的帮助这样做的[14]；根据哈代的记载，只有裁缝的增加工资要求胜利了——他们的工资每天增加10苏[15]。

如我们所能设想的那样，假发匠和家庭仆役由于奢侈品行业的衰落和大规模的移民，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有4000名假发匠在香榭丽舍区开会要改组他们的劳工介绍所；在和国民自卫军发生了冲突以后，他们的代表团受到了市政厅的接见，被安排了和作坊老板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最后起草了新的规章[16]。仆役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他们要求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利，出席区议会和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权利（作为奴仆，原来不被准许参加），并且要求不许萨瓦人从事他们的职业。经过说服，他们安静地散去，第二天并没有实行他们原来威胁着要在香榭丽舍区或者大教堂广场举行的4万人以上的示威[17]。但是，情绪很激昂：几天以后，一个失业的厨师——欧埃尼·葛维，因为煽动家庭仆役和一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而在罗亚尔宫被捕；他最后被判处打上烙印做九年划船苦工，后来改判在监狱中服两年徒刑[18]。

10月5日发生在凡尔赛的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当妇女们在国民议会正在开会时冲进会场时）对于教士代表表示了轻蔑和敌视，人们向教士们高喊“打倒瓜皮小帽！”和“教士该死！”的口号[19]。虽然这种敌视情绪是不久以前教士们拒绝放弃什一税所引起的，但当然也有其更深的根源。哈代于7月12日在罗亚尔宫听到了“打倒教士阶级！”的口号[20]；同月初，在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看到了人们对于教会不尊敬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认为，这时，这种不尊敬在市场中已经是普遍的了[21]。一个月后，哈代注意到，在圣母升天节，一支宗教仪仗队伍在巴黎圣母院附近遭到了“打倒教士阶级！”和“把他们吊上灯柱”这类口号的威胁[22]。9月末，在波雪里的圣雅各教堂和圣尼古拉广场教堂（两个教堂都位于中央市场区）发生的事

件表明，在一般“贱民”中反教士情绪正在增长。当圣雅各教堂的神父因为没有得到23里弗的全部报酬而拒绝埋葬一个木匠帮工时，群众愤怒地冲进了教堂，神父被迫屈服，最后，在集合起来的群众的喝彩声中，为死者举行了庄严的亡人弥撒。附近圣尼古拉广场教堂的唱经班指导宣布他自己由于参加这个葬礼已被免职，这时群众的情绪很快又转为愤怒。大批群众冲进这个教堂，威胁着要吊死神父；后来，靠了国民自卫军的力量，在逮捕了一个暴动者和答应使唱经班指导复职以后，群众才散去[23]。对教会僧侣的这种极端敌视——首先起因于缴纳什一税或者埋葬费等经济问题——对将来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哈代对于各区市场妇女、洗衣妇、商贩和工人几乎每天举行的宗教游行的纪律和盛大规模表示惊恐，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8月和9月，经常有这样的游行，蜿蜒通过圣雅各大街，去到新建造的圣日讷维叶教堂举行谢恩祈祷的仪式。虽然这些游行具有半宗教的目的，但这些市场和郊区“贱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已经对向凡尔赛进军作了预先的尝试。哈代在写到圣安东郊区于9月中旬举行的有1200人参加的游行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潜伏的可能，他写道：

许多人都发现，从游行的布置、参加者成分和盛大规模看来，这里面蕴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凡是有见识的人都看到了公众这些动作十分荒谬，它们的进行既不可能被打断，而它们的动机不幸也不是完全出于虔诚[24]。

4磅重面包的价格在7月22日曾经从14苏半回降到13苏半[25]。接着来的平静时期并没有持续多久。8月初，由面包涨价或缺少而引起的群众运动时断时续地发生，一直继续到11月。运动所采取的形式是，用暴力行动对付面包商和被认为是囤积居奇者，举行抗议集会或派代表去见市政当局。8月2日，巴黎北边圣丹尼区区长助理夏特耳被一群愤怒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杀死：据他们说，他曾经人为地造成粮食的缺乏，并且用轻蔑侮辱的口吻拒绝降低面包售价——他说“不应该让

这些贱民吃上2苏一磅的面包”。夏特耳似乎被赶到了教区教堂的尖塔上，在那里被人刺死，他的头被一个普罗凡斯联队的士兵割了下来。这次凶杀的结果，有21个人（包括4名妇女）被捕，他们当中有2名工匠师傅、4名商贩、9名工资劳动者。另外还有18个人逃走了，受到缺席控告，其中有12名是工资劳动者。1790年4月，查出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一名印刷工人和一名裁缝帮工——有罪，他们的假人像被吊上绞架[26]。

8月8日，在市政厅外举行大示威以后，4磅重面包价格又降低到12苏[27]。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收获。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这样的减价意味着一个建筑工人在2月和7月之间必须花费80%的实际工资去购买面包，现在只用收入的67%就可以买到同样多的面包；再如一个锁匠或木匠帮工（他们挣的工资比一个累维伊扬工场工人多一倍）以往要花48%的收入购买面包，现在只要用40%[28]。因此，在8月的第二或第三周，哈代能够报道说面包危机已告平息：供应比以往充足，面粉的质量有了改进，武装卫兵也从面包房撤走[29]。但是，在8月21日，再度发生十分严重的危机：当时收成很好，但是由于长期干旱，磨坊主不能够磨他们的谷物。面包价格仍然保持稳定，但是引起的供应奇缺局面造成了饥饿，使人们排在市场和店铺门前的队伍越来越长。8月24日，高松纳里大街上一个假发匠师傅由于以可怕的“吊上灯柱”的话威胁一个面包商而被控告；25日，巴塞杜兰帕大街上一个铜匠因为辱骂市政厅故意造成面粉缺乏而被捕；两天以后，一个家庭仆役在排队购买面包时被捕，受到制造骚乱的控告[30]。以后又是短时期的平静；但是在9月1日，卫兵又在面包房门口出现，在那个月内一直守卫了16天。同时，哈代气愤地抱怨说，他的口粮被降低到只能购买“半个味道很坏的4磅重面包”[31]。9月3日，在弗隆纳里大街上，一个盖屋顶的帮工被捕，因为他公开攻击拉斐德参与制造面粉缺乏和抬高面粉价格的阴谋——他说：“他是一个叛徒；他给自己准备下了绳子，应该把他绞死。”[32]“饥饿协定”又回来复仇了。

当工人们因排队购买面包而损失了他们的日工资的一部分时，他们的精神失去了常态。

〔哈代写道〕为了获得面包，人们竟把家里的女人赶开，他们甚至虐待妇女，以使自己首先吃上面包。[33]

9月13日，在凡尔赛发生了一次面包暴动，愤怒的群众企图把一个面包商吊死，因为他以18苏的价钱把好面包卖给有钱的顾客而以较低的价钱把坏面包卖给其余的人。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当地的民兵恰好赶来割断了面包商的绞索。“为安定人心”，国王都出面了。有几个人受伤，有21人被捕，其中有3个人在10天后被绞死[34]。

这时候，妇女们开始加入运动。面包危机特别关系她们的切身利益，从这时起，在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便是妇女，而不是男人。9月16日，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在夏约截住装载粮食的五辆大车，把它们带到巴黎市政厅。17日中午，愤怒的妇女包围市政厅控诉面包商的行为；贝野和市政会议接见了她们。据哈代记载：“妇女们大吵大嚷说：男人们什么都不管，现在妇女们要来管这些事了。”第二天，市政厅又被包围，当局作出了保证。同一天晚上，哈代看见妇女们在特罗瓦·马利广场截住一辆粮食车。把它押到当地区政府里[35]。这一运动一直继续到10月5日的政治示威前后[36]。

同时，和6月一样，为了应对在凡尔赛发生的宫廷与国民议会之间争执不下的局面，巴黎已经开始发展起一个政治运动。带头的仍是奥尔良公爵周围的记者和律师，他们的总部就设在罗亚尔宫。按照马迪厄的说法，在巴黎的“爱国派”中间起领导作用的是杜波尔、德姆连、丹敦和《巴黎革命》的主编路斯塔洛；马拉和他的《人民之友》，和往常一样，仍然是单独行动。正是这批人通过他们的报纸、俱乐部和自己的选区，提出并扩大宣传这样的口号：应该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廷的阴谋，并把他带回巴黎来[37]。

国王应该回到首都，住到“美好的巴黎市”他的臣民中间来，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表》和7月份的一本小册子里已经看到这种意见。当路易十六在7月16日来到革命的首都时，许多向他高声欢呼的人大概都有这种想法。现在，为了应对新的特殊的政治局势，这种想法又得到了复活，而且比以往更为坚持。当前的问题是“否决权”问题——也就是根据凡尔赛正在讨论中的宪法，国王是否应该拥有修改、保留或根本否决国民议会的立法提案的权力。大体说来，右派或者温和派希望授予国王以绝对否决权，而以巴那夫为首的“爱国派”则主张国民议会有最高的立法权；不过，和他们的罗亚尔宫的盟友不一样，他们准备靠赞成妥协的中间派的帮助来进行谈判。8月末，当这种谈判正在进行时，据说杜索院士曾宣布，为了打开僵局，必须使国王回到巴黎来，必要时可以使用暴力。三天以后，当谈判破裂时，杜波尔在罗亚尔宫发动了一个反对否决权的公开运动，而德姆连虽然没有得到巴那夫的同意，却提出了国王必须回到首都的口号。

罗亚尔宫的极端“爱国派”就这样（也许有国民议会的某种秘密支持）企图加紧进攻，其结果是：企图在8月的最后一天第一次发动向凡尔赛进军，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一个真相不明的事件，可是从警察局的警察报告看来，在这次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圣杜律治侯爵、坦托男爵、修道院长柏纳、某一个叫圣日尼的人以及伏依咖啡馆的主顾们等。在警察眼中，这座咖啡馆是“破坏公共安宁的骚乱分子的集会之所”，在别人眼中，这是“商人和资本家的社交中心”。[38] 看来，也曾有一个代表团企图说服巴黎公社发布一项要求国王回到罗浮宫的声明[39]；并曾有人在罗亚尔宫和伏依咖啡馆发表演说，号召大家敲响警钟，各区进入警戒状态，并把市民武装起来。自然，这些手段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非常明显的：据说修道院长柏纳曾在伏依咖啡馆说过下面一段话：

必须到凡尔赛去寻找国王和王储，把他们送回巴黎的图伊勒里宫，置于巴黎人和全国的保护之下。

虽然他事后否认这样说过，但他承认自己打算号召市民在各区开会，“反对国王的否决权”[40]。

由于国民议会中的“爱国派”还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谋求解决的希望，所以这次进军计划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个计划还没有在巴黎“贱民”中得到能够使之实现的那种程度的支持。9月份，局势突变。正如我们看到的，由面包危机引起的愤怒首先指向面包商和市政当局；有时也表现在对市政厅或国民自卫军或作为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斐德个人所发起的猛烈攻击上：8月和9月初，由于这种罪行而被捕的有许多工匠、职员、仆役和其他工资劳动者[41]。一方面，记者们——马拉以及和罗亚尔宫有关系的记者——并不反对让他们所不信任的拉斐德成为群众辱骂的对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民议会的还是巴黎各区的“爱国派”，都希望把群众的愤怒引导到更符合他们的直接政治目的的道路上去。不久就看到了它的结果。9月初，马路埃的记载是，“有人看到在国民议会外面，有许多轿夫对否决权问题表现得很激动”[42]。17日，特鲁塞瓦大街上一个领年金的军人在格累夫广场上被捕，因为他说了这样的话：

国王在凡尔赛有一座行宫，在巴黎有一座罗浮宫；我们一定得去找国王，把他带回巴黎来，我本人也愿意去寻找国王[43]。

失业者也激动起来了。贝野在9月22日写给在凡尔赛的国王的一位大臣拉·都尔·杜宾的信中说：

现在我获悉，军校区救济工场所有那些不幸的工人都想要到凡尔赛去，并且为了这一件事，当局已派出军队。[44]

最后一点特别重要：虽然巴那夫和他的同事们预备在否决权“悬而未决”的基础上和宫廷达成妥协，可是为国民议会中“温和派”所支持的宫廷却决定再显示一下威力以打破僵局。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骚动，调

来了弗兰德斯旅团。结果迫使“爱国派”采取了极端的手段，把首都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最后使“爱国派”决定采取行动的，是保王派在10月2日禁卫军于凡尔赛举行的宴会上表现出来的傲慢，据说人们在宴会上把国民自卫军帽徽抛在地下践踏，王后和她的子女受到了几乎是想象不到的狂热的欢迎。第二天，这件事传遍了巴黎，“爱国派”报纸号召人们复仇。丹敦在哥德利埃俱乐部通过一项催促拉斐德带着最后通牒到凡尔赛去的决议，德姆连再次号召巴黎人把国王弄回首都。10月4日，星期日，一群群“中等人家的”妇女出现在罗亚尔宫，一个“衣着打扮说明她的身份在中等阶层以上”的30来岁的妇女在集会上发表了演说；人们纷纷谈论第二天要到凡尔赛去[45]。十月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研究10月5日和6日事件资料的主要来源是警察局所作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询问过388名证人之后于1790年3月发表的。这样一种报告看来不仅可以为研究事件本身，而且可以为研究参加者的成分和目的提供宝贵的资料。泰讷在描写把王室逼回巴黎的男女群众时，的确充分利用了这份资料[46]。不过，如前所述，这是一份非常片面的报告；事实上，在公布以后，它便受到巴黎多数各区的攻击，用首先提出抗议的哥德利埃区人的话来说：“在证人的名单上，除了贵族的姓名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47]这固然是一种夸大，然而警察局的调查报告也显然具有明显的预定目的，因此，在利用它的时候必须提高警惕，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补充其他资料——少数残存的警察报告（在行动过程中只有二人被捕）和其他证人的叙述。

在10月5日早晨，暴动在中央市场和圣安东郊区同时开始。在这两个地区起领导作用的都是妇女；从许多人的各种叙述中看来，参加以后各项活动的有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市场卖鱼妇和女摊贩，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衣着漂亮的资产阶级和“戴帽子的女人”[48]。根据一个警察局证人的证词，运动是由一个小姑娘发动的，她从圣尤斯塔区出发，敲着一面鼓，攻击面包缺乏；这样，就吸引了一大群妇女，人很快多起

来[49]。当地国民自卫军队长和该区主要的煽动者美洲人富尼叶在7时听到警钟声后，急忙赶到市政厅[50]。与此同时，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圣马格里特教堂司钟人鸣起警钟，号召市民武装起来；据他说，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和一个妇女，“他也不像是一个普通人。”[51]在7点和8点之间，这一区的一个律师看到有四五十名妇女在圣安东门高呼要求面包[52]。几乎是在同时，斯塔尼拉·马伊雅率领了一小队巴士底义勇队来平定附近拆除巴士底堡工人的骚乱。工人们无疑还记得，正是这一支军队几星期以前在圣母山曾经强迫解散过他们的同伴，所以表现得非常凶恶；但是马伊雅（据他自己这样说）却能够未经流血就把他们说服解散了[53]。

在开始这些行动之后，妇女们就聚集到了市政厅[54]。她们的首要目的是面包，其次或许是为她们的男人寻找武器和弹药。一个在8时半路过旧市场的绸布商看到成群的妇女在大街上截住行人，强迫这些人和她们一起到“人们应该从那里领面包的市政厅去”。卫兵们被解除了武装，妇女们把他们的武器交给了那些跟在后面并催促她们前进的男人。另一个见证人，一个市政厅的出纳员，描述了在9点半钟左右，大群杂有男人的妇女如何冲上台阶，闯进市政厅所有的办公室。一个证人说，她们拿着棍棒和梭镖，另一个证人坚持说她们带的是斧头、铁橇、大头棒和毛瑟枪。一个出纳员壮着胆子向侵入者提出抗议，但是群众告诉他说，“他们才是上述市政厅的男女主人”。示威者在搜寻弹药和武器的时候，撕毁了文件和账簿，账匣里一叠100张1000里弗的钞票从橱柜中不翼而飞了。但是，群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抢劫：据市司库员后来告诉警察说，350万里弗的现金和票据丝毫没有缺少；丢掉的钞票在几星期以后又完整地被人送了回来。示威者到尖塔上敲响警钟以后，于11时左右退回外面的格累夫广场[55]。

正在这时，马伊雅和他的义勇队赶到了现场，根据他的说法，妇女们正在威胁着贝野和拉斐德的生命。不知道马伊雅是想设法转移这场灾

难呢，还是完全为了服务于“爱国派”的政治目的，他居然答应率领妇女们游行12英里，到凡尔赛吁请国王和国民议会为巴黎供应面包[56]。当她们在刚一过午出发时，她们移去了警察局的大炮，并且（哈代写道）强迫她们遇见的各式各样的妇女——“甚至戴帽子的妇女”——参加他们的队伍，一起到凡尔赛去[57]。

游行者这样扩大了队伍以后，过河到老城区，经过奥弗勒码头到新桥，再过河到罗浮区，经过图伊勒里宫花园，这一支六七千人的队伍在路易十五广场停了下来。马伊雅告诉我们，妇女们在香榭丽舍区的大教场同意不带武器继续前进。按照传统的记述，游行者这时继续沿着河右岸到夏约街、塞弗里街、维罗弗累，最后到达凡尔赛[58]。然而，从其他资料看来，主要的游行队伍虽然随着马伊雅穿过夏约街，另一支队伍却可能在大教场分道扬镳，走的是穿过沃吉拉的南边的路线。这件事至少可以从一个面粉厂工人向凡尔赛警察局所交代的话中看出来，这个工人叫柏纳-萨拉培，在军校区工作，是由于在凡尔赛禁卫军驻所抢劫刀剑和其他武器而被捕的两个工资劳动者之一。从他的话里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在沃吉拉吃午饭，被一队三四千人的妇女硬拉着去参加了游行[59]。

游行者在下午到达凡尔赛以后，直接进入国民议会会场，拥进议席和惊愕的代表们站在一起，裙子上挂着剑和猎刀[60]，等待马伊雅呈递她们的请愿书。马伊雅在他的演说里毫无顾忌地引用了当时新流行的小册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面包》中的话，按照这本小册子的看法，造成面包缺乏的与其说是面包商，不如说是政府当局[61]。他在演说结束时提出两点要求——为首都供应面包和惩处侮辱国民自卫军帽徽的禁卫军，许多代表作了保证性的答复。人们曾经对教士愤怒地呼喊：“打倒教士！”但当罗伯斯庇尔发言时，群众都肃然无声，也有人喊“我们可爱的母亲米拉波！”[62]妇女们选出六名代表等着谒见国王——帕罗伊侯爵认为她们当中有两个人“样子很不错”[63]——于是比较有秩序地散会

了。

这时，在巴黎，由警钟召集起来的国民自卫军拥到格累夫广场。他们纷纷喊叫“到凡尔赛去！”拉斐德的用意在这一事件中是暧昧不明的。看来，他踌躇了好长时间才置身于一场显然是武装叛乱的队伍的前列；他采取了拖延的手段，按照富尼叶的说法，他曾发表冗长的演说，但是最后在群众呼声的催逼之下，不得不下令向凡尔赛进军[64]。当晚10点钟和午夜之间进入凡尔赛的军队包括三连掷弹兵，一连枪兵，三门大炮，两万名巴黎各区的国民自卫军，还有700到800名武装着毛瑟枪、棍棒和长矛的杂色队伍。

第二天清晨，巴黎人和守卫王宫的禁卫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一部分示威者想办法冲进了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寝宫的接待室。在发生这一事变过程中，一名禁卫军从窗户里开枪打死了下面庭院里的一个17岁的志愿军，他叫热罗梅·累里提埃，是圣安东郊区的家具匠帮工[65]。被激怒的群众杀死了两名禁卫军，并且砍下了他们的头颅[66]。巴黎国民自卫军恢复了秩序，同时大批群众拥在王宫外面等待着事情的解决。对于国民自卫军——至少是对于损失一天工作而伴随着拉斐德到凡尔赛来的小商贩、小作坊主和帮工——来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不管他们的总司令愿意与否，国王必须回到巴黎去[67]。从“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女人”伊丽莎白·吉拉的证词看来，的确存在着这种想法，她后来向警察局说：

在凡尔赛，所有民众，尤其是许多锁匠帮工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损失了工作日，并且说，如果国王不回巴黎，如果不把禁卫军消灭，就用长矛挑起拉斐德的脑袋[68]。

要说动妇女也许更费事一些。不管怎样，富尼叶认为有必要对一群卖鱼妇鼓动一番，他用他自己认为最容易被她们听懂的话说：“动手吧……你们看不见拉斐德和国王要把你们收入后宫么……必须把这个王

廷小店整个搬到巴黎去。”[69] 不管情况怎样，当国王、王后和拉斐德在王宫阳台上露面的时候，人们大声呼喊“国王到巴黎去！”几小时以后，巴黎国民自卫军和游行妇女簇拥着国王一家，浩浩荡荡回到了首都。

根据关于妇女们向凡尔赛进军的传统记载，妇女们在游行时高唱“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指国王、王后和王储——译注）人们认为，国王御驾亲临他的子民中，就会保证面包的充分供应。这种希望并没有立即实现，面包危机仍然继续了一个月。在王室回首都后的第二天，一群妇女拥进了谷物市场，把面粉样品送给国王过目以后，将150桶发霉的面粉倒在河里[70]。10月21日，在市政厅地区的一次面包暴动中，面包商弗朗索瓦被吊死在格累夫广场众所周知的灯柱上。为了这件凶杀案，市场搬运夫弗·布兰被判处死刑，镀金匠日·阿德韦讷被判处9年徒刑[71]。第二天，在离中央市场不远的泰彼耳奥德街上，妇女们由于坚持要进一所房屋搜查暗藏的粮食和面粉引起了一场骚动[72]。11月2日，贝野不得不命令军队保护圣日尔曼市场的一家面包商[73]；第二天，一个妇女由于在哥德利埃街一家面包铺外面引起骚动而被捕[74]。最后，10天以后，磨粉工人尼古拉·比隆被捕，他的罪名是在10月和11月两次引起骚动并威胁要吊死军校区的面包商[75]。

但是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在逐出“温和派”和在首都确立了它的地位以后，没有必要再来利用“贱民”暴动的力量；这些暴动已经使他们达到了目的。因此，在10月21日，为了镇压社会骚乱和马拉的《人民之友》所进行的煽动，采取了新的措施，其中包括处“叛乱者”以死刑、报刊检查和戒严令。这些限制自由的法令的第一个牺牲者叫米契尔·阿德里安，他是一个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在当天由于企图在圣安东郊区鼓动起一场“叛乱”而被绞死。[76]

不过，公社和议会同时也采取了有力措施来解决粮食危机。虽然面包价格在以后好些个月里始终保持12苏，但烘面包商都能够得到面粉的

正常供应。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社会秩序相当平静的时期，在此期间，国民议会比较不受打扰地继续它为全国制定宪法的工作。1790年7月14日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的第一届结盟节，是全国团结与和平进步的伟大象征。大多数人一定以为革命几乎已经大功告成了。

---

[1] 《关于10月6日事件巴黎警察局……的刑事侦查记录》（*Procédure criminelle au Ch âtelet ... de Paris sur la journée du* 6 *octobre* ），1790年巴黎版，国立图书馆文件：Lc 29 980。

[2] 亚·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Etude critique sur les j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载《历史评论》，第67期（1898年），第241—281页；第68期（1899年），第258—294页；第69期（1899年），第41—66页。我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大量利用了这一研究。

[3] 转引自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7期，第249页。

[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3，对开本第317—318页。不过，他把事变说成是“一个可怕的运动”，他认为，如果没有拉斐德和国民议会起作用，可能发生不幸的结局（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

[5]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0—201页。原文如下：“在我们商量的时候，巴黎市民早已怒不可遏；在各区中，资产阶级和民众都集合了起来，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反对政府和贵族最近的行动才激愤起来，而民众的激愤原因则是关心面包问题，因为面包已经开始缺乏了。”（重点是作者加的）

[6]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57页。

[7] 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名单》中包括4名来自救济工场的参加者——两名挖掘工人，一名工头和一名领班（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 [1] ）。

[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

[9] 博勒帕勒爵士：《给小马杜林区各位先生的报告》（*Chevalier de Beaurepaire* ，*Rapport* à *MM du district des Petits Mathurins*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285。

[10]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4号，对开本第156页。

[11] 《贝野回忆录》，第2卷，第265页。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2、18766、18795，对开本第463、466—467页。

[13]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56页。

[1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4、438—439、455页；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1集，第1卷，第123—124、381、416、547页；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G.M.Jaffé，*Le Mouvement ouvrier*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7年巴黎版，第65—73页。

[1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8—439页。

[1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39页。

[1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55页；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据说他曾说过："所有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和穿军服的人都是些纨绔子弟，咱们一万个当仆人的都有资格加入那些穿着白边蓝制服的纨绔子弟队伍：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纨绔子弟，一个也不例外，我们只能看到一群轻佻无用的年轻人在罗亚尔宫里胡闹。巴黎有六万名家庭佣仆可以和各种工人联合起来，要这么一干，大家就会看到所有这些穿漂亮制服的纨绔子弟都会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虽然葛维说原话不是这样，但是他承认说过类似的话。

[19]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载《历史评论》，第68期，第261页。

[2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85页。

[2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

[22]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50；10649，对开本第42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3—494、497页。

[24]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31、437—438、441、443、445—446、453、455—456、462、467—470、473、475页。

[2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01页。

[2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2079、10479、10649，对开本第27页；10530，对开本第181—183页；18795，对开本第463、470—471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17页。

[2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6页。

[28]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48页。

[2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29—44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5—467页；18766。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58页。

[3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3]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60页。

[3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Arch.Seine-et-Oise）：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15个被告中（都是男人）包括两个车匠和一个垫子工人（被绞死），两个建筑工人，四个搬运工人，两个茶房，一个兵士，两个体力劳动者和一个马鞍匠。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78—480页。

[36] 参看哈代1789年10月3—7日和12日的记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499—505、512页）。日记结束于10月14日。

[3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66—268页；第68期，第269—273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39] 《老箴言报》（*L'Ancien Moniteur* ）（重印），第51期，第417页；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7期，第251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63—464、467—469页；10530，对开本第149—151页；18766；18767。

[42] 《马路埃回忆录》（*Mémoires de Malouet* ）（1868年巴黎版），第2

卷，第367页。

[4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7。

[44] 国家档案馆文件：C 31，第262号，对开本第3页。

[45] 《刑事侦查记录……》，第62号证人；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8期，第292—294页。

[46]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0—136页。

[47] 《哥德利埃区会议议事录》（1790年巴黎版）。大英博物馆文件：R.655（6）。

[48] 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35、62、91、92、119、126号证人；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502、506页；帕罗伊侯爵（Marquis de Paroy）于1789年10月写给他妻子的信〔《革命评论》（*Revue de la Révolution*），第1卷（1883年），第1—7页〕。

[49] 《刑事侦查记录……》，第43号证人。

[50]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51]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92号证人。

[52]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第12号证人。

[53]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斯塔尼拉·马伊雅）。

[54] 然而，哈代把它仅仅说成是“市场区和其他各区的妇女集众到市政厅去的一次暴动”（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1页）。

[55] 关于上边的叙述，可参阅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319中的12个人的证词；再参阅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卷，第950号。

[56] 关于这时和以后的许多情况，可参看《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马伊雅）。

[57]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2页。

[58] 根据马伊雅在警察局的证词所作的这一叙述，和巴蒂福耳（M.L.Batiffol）的说法相同，见《1789年10月5日和6日的凡尔赛暴动》（*Les*

Fournées des 5 *et* 6 *octobre* 1789 à *Versailles* ），1891年巴黎版，第15—17页。

[59] 《1789年10月6日对于贵族出身的萨拉培的审讯记录》。赛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载《巴黎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tis* ）〕。虽然没有提到沃吉拉，却也认为妇女分成了两队，各走一条路线，“一队穿过圣克卢，另一队取道塞韦。”（第13期，1789年10月3—10日，第15页）

[6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61]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2344；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2—43页。

[62] 《刑事侦查记录……》，第81号证人；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31页。

[63] 《革命评论》，第1卷，第1—7页。

[6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并可参看巴那夫（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对开本第201页）。

[65]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判记录。

[66] 累里提埃以及两名禁卫军的安葬记载于《凡尔赛圣母院王家教堂死者安葬登记册》第82卷中（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E集）。三个人当中，只有累里提埃一人完全按军礼安葬。

[67] 马迪厄：《关于10月5日和6日事变的批判研究》，第69期，第45—46页。在这方面，如果能知道当时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社会成分和职业，将有很大的意义；但不幸的是，只有极少的名单保存下来可供参考。圣安东郊区和中央市场各区的队伍（他们可能是10月5日国民自卫军武装起义的主要煽动者）看来只包括少数帮工、码头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大多数是店主、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例如，我们知道家具帮工累里提埃是圣马格里特区的一名义勇军；埃德梅·法基是一个金匠帮工，他是附近圣日瓦区的一名义勇军，也是因为抢劫禁卫军驻所而被捕的。此外，1789年8月中央市场圣奥波顿营的花名册上包括一群小作坊主和商贩，26名商人雇用的职员，4名“店员”和4名“雇员”，2名市场搬运夫，1名珠宝匠帮工，1名枪炮匠帮工和1名镀金匠帮工（大英博物馆，F830〔6〕）。与之对照的是，1789年11月小圣托玛营（布塞附近）征募的150名掷弹兵中，25名是资产阶级（一般指有独立财产的人），29名公务员，6名律师，7名商人，2名银行家和3名股票经纪人，只有16人是商贩——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工资劳动者（国家档案馆文件：W 357，第750号，第一部分，第100件）。

[68] 《刑事侦查记录……》，第90号证人。

[69]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70]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5页。

[71]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95，对开本第476—477页；10530，对开本第157—159页；18768。

[7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

[7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8，第375号，对开本第2页。

[7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172。

[75]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530，对开本第157页；18768。

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

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上发生的剧烈骚动代表着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和雅各宾派，自由资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争夺政权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巴黎，这直接导致作为市政领袖的贝野和拉斐德的失尽人心；但是，在国民议会中“立宪派”的失败却由于战争爆发而推迟，直到1792年8月王室倾覆时才完全垮台。从巴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马尔斯教场事件一方面代表第三等级内部的第一次流血冲突——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另一方面也代表几个月来社会不安和革命骚动的高潮，其结果是组织在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中的民主派成为无

套裤党的不容争辩的领袖。在这一运动过程中，首都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更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是争夺政权的主要领袖们所不能忽视的因素，而他们的利益至少也是革命民主派所要勉强维护的[1]。在这一意义上，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本身应当被看作一个进程的顶点，并且像十月暴动一样，应当结合着它以前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来加以考察。

那一段偶有小骚动的社会平静时期一直维持到1791年春天。1790年6月的面包价格已经降低到11苏；不久以后，管制便解除了，面包价格自1788年初以来第一次降到8苏的正常水平[2]。截至1791年8月——马尔斯教场骚动以后的一个月，面包价格始终没有显著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面包的价格或供应在刺激革命活动上至少并不占主要地位。

治安第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发生在2月28日，当时，曾有人企图拆毁万森堡（它正在改建成为一个首都临时的装满犯人的监狱）的一部分。“爱国派”想到这座建筑物过去曾经囚禁过被“密札”拘留的人，开始对这种改建提出抗议，1月28日，雅各宾俱乐部有人谈到由“一个郊区”[3]进行有计划的攻击。一个月以后，运动成熟了，1000名以上的圣安东郊区的工人（其中有拆毁巴士底堡的工人[4]）推举桑代尔为国民自卫军孤儿院区步兵营的指挥官，正如拉斐德在1789年10月所处的地位一样，他们簇拥着他，强迫他带领他们到万森堡动手拆毁望楼。然而不久，拉斐德带着1200人赶到了，他把桑代尔公开斥责了一顿，在圣安东区人们的嘲笑声中带着64个犯人回到巴黎[5]。犯人被囚禁在贡西尔日里监狱，三个星期后在引起民主派轩然大波的情况下被释放；在民主派的活动中，桑代尔的辩护律师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领袖人物皮瑞特·韦里勒起了重要作用[6]。

民主派在1791年春夏两季就不断地努力向首都小商人、工匠、在业和失业工人进行宣传并争取把他们拉过来，这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

已。在7月17日的大会上，这种激动达到了顶点，当时人们完全为了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呼吁书上签字这一政治目的而从城市各区聚集到了一起[7]。

整个这一时期，在巴黎的无数被捕者中间，失业者所占数目之庞大令人惊异，其中有些人来自市政厅兴办的救济工场，他们是由于公开表示他们仇视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而被捕下狱的。这说明在工资劳动者中间已经有某种政治觉悟，也说明在许多行业中间失业者的人数正在增长。我们看到在这些失业者中有以前的油漆匠、雕刻匠、裁缝、理发师、家庭仆役、珠宝匠、装修木匠和编篮工人[8]。同时，进入救济工场的人数在不断增多：贝野在1月的统计数字是24 000名，到6月就增为31 000名[9]。除了要用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外，他们对于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反革命阴谋的现成工具（甚至像马拉等极端民主主义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10]）；他们在关卡上时常和税务人员发生冲突（当局仍然希望保持这种关卡）[11]；像巴士底工人向万森堡进军的这一类事件也会引起公众的不安。简单地说，当局并不需要很多说服就作出了解散他们的决定：5月8日，贝野宣布关闭巴士底工场的决定，这里的工场从1789年7月以来，经常有800名工人工作；6月中旬，制宪议会颁布普遍关闭救济工场的命令，同时作了开办其他新工场以吸收失业者的某些空洞的诺言[12]。

工人们眼看就要丢掉仅足糊口的每天20苏的生活费，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巴士底的工人们虽然被军队驱散了，但是在以后几个星期里积极活动，争取圣安东郊区帮工对他们的支援[13]。其他工场的关闭引起更大的骚动，在这些骚动中，雅各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的民主派起了一定的作用。三份不同的请愿书递到议会，要求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第一份是由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技工联合会协助起草的，于6月28日递到议会，措辞极为缓和：它认为从公共治安着想而关闭工场是合理的，但是同时请求稍予延期[14]。第二份是由卡米累·德姆连代表

巴士底的工人在7月3日呈递的，他声称这个请愿书已经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同意：请愿书要求公民有生存权，并且提议由出售教堂土地获得的收益中拨出一部分来维持救济工场[15]。第三份请愿书是紧随着第二份递上去的，带有几乎是强烈的威胁口气，请愿书说不论用这种方式还是用那种方式，工人们一定得有面包："使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口气的，绝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是需要——一种最迫切的需要。"[16]

议会对这些请愿书置之不理；但是，这时候失业工人已经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加压力的形式。6月24日在万多姆广场举行的示威发出了成立共和国的号召[17]。在这以后的一星期中，又有两次示威游行，这时有风声说，22 000名失业者计划于7月3日在圣端诺累大街集会[18]。两天之后，据一家敌视革命的小报《杂谈》报道，有400名失业工人到市政厅示威，万多姆广场发生骚乱，两名工人在路易十五广场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19]。结果政治气氛日益紧张，有地位的公民开始公开地说，应当使用武力给失业者以教训。

（《杂谈》在7月6日报道）各阶层市民对工人们开始忍耐不下去了。国民自卫军、商人、制造厂主、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都发生怒吼，反对这些受捣乱分子收买的人……人们大声疾呼，必须用大炮来清除这一帮家伙[20]。

自然，这样一种态度很能够说明，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和商人，在不到两星期以后驱散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者时，为什么是那样地凶狠。

与失业者的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各行业的帮工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这里边也牵涉到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帮工的工资据我们所知道的，从七月革命以来没有显著增加过。运动于4月开始，当时木匠们议定每天最少要领到50苏工资；少数的活跃包工头感到烦恼，而大多数包工头则似乎很愿意接受帮工的条件。但是，帮工们请来作仲裁的市政厅

却判定他们的组织是非法的，并且拒绝最低工资的提议，认为它违反自由的原则；后来，市政厅的公报甚至威胁说，要以扰乱治安罪对帮工的领袖们起诉，不过这种威胁并没有见诸实行[21]。

其他行业的工人很快地就学会了木匠的榜样——其中有制帽工人和印刷工人。马掌铁匠师傅在6月初递交议会的一份请愿书中，警告说巴黎存在着一个80 000工人的“大联合”，包括锁匠、装修木匠、皮匠以及他们本行的工人[22]。他们的数字可能夸大了——马掌铁匠师傅们自然倾向于把他们的情况说得过分一些——但是这个运动有许多理由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1794年对罗伯斯庇尔的垮台起了某些作用的那一次运动以前，这是首都一次最广泛的工资运动。第二，正是马掌铁匠师傅和木匠的这些请愿导致了议会通过著名的“霞白立条例”规定“工人的联合组织”或者说工会是非法的——应该注意的是，甚至“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在雅各宾最民主的时期，也没有认为这个条例应该取消，事实上，在以后将近一百年，这个条例一直是有效的法律[23]。第三（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论点尤为重要），木匠帮工得到了革命民主派相当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们看到木匠们不仅在哥德利埃俱乐部使用的大厅里开会，并且事实证明，指导他们运动的“木工工人联谊会”就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5月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不仅如此，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弗朗索瓦·罗培和他的妻子路易丝所主编的《内外新闻》，虽然在原则上反对帮工强行规定最低工资，但对他们的运动却给以某些支持[24]。马拉也在他的报纸上辟出工人通讯栏，在1791年6月12日工资运动达到高潮时期，一封意在代表修建圣日讷维叶教堂的560名建筑工人观点的措辞激烈的信出现在《人民之友》上。这篇文章严厉地斥责包工头是“无知的压迫者，贪得无厌”，是“吸血鬼”，以及“无所事事、吞噬劳动人民用血汗所取得的果实， 而且永远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情的坏蛋”。[25]

然而，哥德利埃俱乐部所做的决不限于参加工资劳动者已经从事的

经济斗争。通过与罗培的中央委员会有联系的各联谊会，俱乐部开始十分细致地用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想教育巴黎的“贱民”——这是一个对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

（马迪厄写道）“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正是各联谊会。这些联谊会是无套裤党的摇篮和掩蔽所。”[26]

这些新的社团尽管处在资产阶级坚强领导之下，却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消极公民[27]敞开了大门。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每月只收会费2苏；在这年夏天被国民自卫军逮捕的人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小工艺品制造工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家庭佣仆都是俱乐部会议的参加者[28]。在这一时期“平民俱乐部”和其他联谊会都被描写成是由“穷挑水夫”“工匠”“鲁钝的工人”组成的[29]。受民主派和他们的报纸公开鼓动影响的人，其数目当然要比这里所举的多得多，他们的鼓动涉及每一个想象得到的政治问题——包括这样一些迫切的时事问题，例如“消极”公民没有选举权的问题；事实上等于把体力劳动者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的问题；或者请愿权利受到各种限制的问题等[30]。

从警察局档案中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鼓动对许多普通巴黎人的心情和思想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7月17日，格雷讷累街64号一个23岁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因为辱骂当天下午曾参加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一个国民自卫军军人的妻子而被捕。格雷讷累喷泉区警务委员曾经对她进行审讯，审讯记录的大意如下。

问：她去马尔斯教场了吗？

答：去了，她和里昂太太及她的女儿一起去的。

问：她为什么上那儿去？

答：为了“像每一个善良爱国者那样”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

问：那份请愿书上说的是什么？

答：她明白请愿书的目的就是“要另行组织政权机关”。

问：她时常参加公众集会吗？

答：她有时到罗亚尔宫和图伊勒里宫去。

问：她是属于任何一个俱乐部的吗？

答：她有时到哥德利埃俱乐部去，不过她实际上并不是会员。

问，她在马尔斯教场曾经和什么特殊的人混在一起吗？

答，她曾经登上“祖国之坛”，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问：她扔过石头没有，或者看到有人扔石头没有？

答：没有。

问：谁邀她去在请愿书上签名的？

答：没有人邀过她，可是她听到许多人说，在马尔斯教场上有一个请愿书要人签名。

问：她的名字上过报这件事是真的吗？

答；是真的，她的名字上过《巴黎革命》，因为她曾经对路斯塔洛的死亡表示过哀悼。

间：她读哪些报纸？

答：她读马拉、奥杜安和卡米累·德姆连办的报纸，还经常看《人

民喉舌》[31]。

以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告一结束的这场政治运动，直接起因于6月20日的国王企图逃往帝国边境。从这时起，民主派和激进的记者们的鼓动便具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唤起民众对将来的国王和行政权问题发表意见。在瓦雷讷逃亡事件之前，在鼓吹共和思想方面几乎得不到响应的那些记者和其他人，现在第一次能够拥有一些信徒了：他们的影响可以从失业者及其他工人在6月末和7月初举行的会议中高喊共和口号上看出来，也可以从各联谊会的决议和请愿书上看出来[32]。但是，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大，就连会员中包括许多著名共和派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在发表到当时为止还很难希望得到“贱民”支持的那些言论时也是审慎的。毫无疑问，在国王出走又丢脸地从瓦雷讷回来以后的一星期中，由于发表煽动性看法而在各区被捕的15个或20个人，更不会发表多少这类的意见[33]。

但是，俱乐部对于新的发展的反应肯定并不迟缓；6月21日，它请求议会在和各省商量之前暂时不要作出有关国王未来命运的决定，俱乐部呈递了17份类似这样的请愿书，这是其中的第一份并且张贴在巴黎各处[34]。三天以后，发生了所谓“3万人大请愿”，据罗兰夫人说，圣安东郊区全力支持了这次请愿[35]。7月中，骚动在继续；但是斐扬派占多数的制宪议会15日宣布对路易十六不加追究，并且主张重新信赖他作为行政首脑。

这项决定导致民主派阵营的分裂。哥德利埃俱乐部于7月16日起草请愿书，号召人们举行抗议示威，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赞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雅各宾派又撤销了他们的支持[36]。哥德利埃派现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游行和独自继续干下去的两种办法之中选择其一，他们决定采取后者。结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罗培起草了一份措辞更激烈的请愿书。请愿书没有指明要求成立

共和国，然而他请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制宪机构作为代替，并着手于组织一个新的行政机构”[37]。签名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了[38]，各联谊会和俱乐部被邀请于上午10时或11时在圣安东门集合他们的全体会员[39]，从那里出发到马尔斯教场去举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请愿者到达之前，在马尔斯教场发生了一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怪事，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形下，给当局提供了—个干涉的借口。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人潜伏在“祖国之坛”下面——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观赏女士们的大腿——被起疑心的旁观者拽了出来，并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吊死在附近一个窗户上。下午，5万名公民按照计划集合起来举行和平示威[40]，其中有6000多人在军队赶来之前，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41]。与此同时，因为市政厅官员警告贝野要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戒备，于是他就实行了一个看来早已拟订好了的计划[42]。戒严令发布了，执行武力镇压的红旗展开了，在拉斐德的指挥下，10 000名国民自卫军冲向示威群众[43]。关于以后的情况，记述各有不同；但是人们似乎向自卫军（包括拉斐德本人）扔了石头，大约有50人死亡，十余人受伤[44]。一个裁缝在两天后因为抗议国民自卫军的行为在亨利四世区被捕，用他的话来说，“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45]。很多人被捕：在马尔斯教场被捕的只有十余人；在各区被捕的却可能有200多人，其中有少数哥德利埃俱乐部会员和其他被认为是暴动领袖的人，绝大多数是敢于批评市政当局和自卫军行为的普通请愿者[46]。有许多被捕者在一个月之内获得释放，其余的在9月13日大赦令颁布后被释放[47]。这就是马尔斯教场的示威和“大屠杀”。

要把这些和平请愿者叫作“革命群众”，也许我们会感到犹豫。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名词是适合的；探讨一下他们是如何组成的，来自首都的哪些地区，这对于本书的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尽管比十月暴动的证据充分，却仍然寥寥无几。在军队到

来之前征集的6000个签名中，据组织者声称，有2000以上是属于国民自卫军、市政厅职员和选举人的[48]。另一方面，布舍和卢曾经见过被1871年大火焚毁以前的完整的请愿书，他们坚持说“广大的签名群众几乎都是不识字的人”，并且举出请愿书上画的许多十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49]。还有，《杂谈》曾带着惯常的恶意描写示威者说：“在这些人中，我想，没有一个人识字。”[50]

即使我们认为《杂谈》怀有极端党派成见的说法中有夸大成分，而且根据文化程度来从事社会分析并不可靠，我们也应该接受布舍和卢的推论，即示威者大部分是由巴黎比较贫穷的各区居民组成的。巴黎档案馆中仅存的不多几件与示威参加者直接有关的文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市政厅官员费越在马尔斯教场附近的格罗卡尤军医院检验了在教场上被杀死的尸体，他提出的报告书表明：在验明的九具尸体中，有三个是作坊帮工，一个是女人，穿着用“杂色布块拼凑起来的裙子”，其余的是一个马鞍师傅，一个酒商的儿子，还有两个衣履比较整齐的资产阶级中人[51]。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只提到一具尸身，7月17日运到罗亚尔宫警察所那儿的一个伤兵医院区的皮匠。[52]不幸的是，阜尔斯监狱登记簿上的12个于马尔斯教场被捕的人中间，只列出了一个人的职业：他是一个名叫帕罗舍的修道院长[53]。示威后在各区被捕的人中，只有5个人承认那天下午在马尔斯教场，他们是：一个厨师，一个裁缝，一个桌椅匠帮工，一个咖啡馆侍者和一个擦皮鞋的失业者[54]。在这些人当中，擦皮鞋的说，抵抗军队的“全是理发匠和其他工人”；据裁缝说（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杂谈》的报道进一步提供了工资劳动者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证明。它说，码头工人们曾经到帮工的作坊和住所去发动他们参加示威[55]；当皮瑞特·韦里勒以煽动工人到马尔斯教场集合这种罪名被控诉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因为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到那里去。”[56]

除此之外，我们还具有虽然大部分是间接的然而数量却多得多的证据——与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后数月内因政治犯罪而在各区被捕的250人左右有关的警务委员的报告和阜尔斯监狱的登记[57]。我们承认：这些资料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参加哥德利埃请愿书签字或愿意签字的确切证明。但是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研究哪些阶级的人和首都的哪些地方被吸引到这场以7月17日的请愿和示威为其高潮的政治运动中来说，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撮人是因为发表了可以勉强解释成为反革命的言论而被捕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案子里，那些被捕者的罪状都是辱骂或批评了政府、国民自卫军或者拉斐德本人。从他们辱骂时所说的话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民主派和群众团体在这一时期中对巴黎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发生的影响。因此，在1791年4月14日到7月15日之间被捕的、有详细职业可查的52个人中，有34人是就业或失业的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人主要是小店主、作坊师傅或独立的工匠。在7月16日到11月15日期间被捕的另外186人中（大多数人是因为批评国民自卫军或市政当局对马尔斯教场请愿者使用暴力而被捕的），有102人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雇主、工匠和其他小有产者。这些证据虽然是间接的，却似乎可以支持我们从研究直接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文献中得到的看法，即：7月17日马尔斯教场的请愿者和示威者是典型的“贱民”——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构成郊区和市中心人口密集地区居民的主要部分。

事实上首都的哪些地区与这次运动有关系呢？就马尔斯教场的集会来说，组织者的意图无疑是想使它成为一个全巴黎的事件。虽然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就设在左岸的多飞内大街，各俱乐部和联谊会的集合地点却是圣安东门，而第一次发出示威号召的7月16日的请愿则是在圣端诺累街、圣马丁门和圣安东郊区街等相距甚远的地区发动的[58]。至于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由于和马尔斯教场参加示威人数直接有关

的官方文件比较少，所以现在很难断定。但是，就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圣安东郊区对于这次示威的反应是微弱的。拉斐德曾在巴士底广场布满了军队，这很能说明为什么美洲人富尼叶发现那天清晨到那里聚合的人非常少； 市场协会派出去的委员普里梅里不仅发现到集合地点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当他在这一区努力唤起人们兴趣的时候，遇到的反应也是不大的[59]。从圣安东门到马尔斯教场的直线距离为3英里半，这可能也有些关系；此外，雅各宾派的撤销支援也可能影响了很多人——例如，在富尼叶看来，桑代尔的行为就有些躲躲闪闪[60]。但是，我们研究一下作为间接证据的警察报告就可以看出，圣安东郊区和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关系。在4月到9月间被捕的，而且住址业已查明的约240人中，只有10人住在圣安东郊区，其中仅有3人是在桑代尔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

应当承认这些记录是有很多缺陷的，因此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巴黎48区有关的警察报告，现今只有25区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收禁过将近130名囚犯的阜尔斯监狱的警察登记中所包含的资料加进去，我们就可以弥补一部分这种不平衡；除此之外，有许多情形是，被捕人的就捕地区并不是他居住的地区。根据这些综合的资料我们发现，无论是被杀死在马尔斯教场的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整个时期中被捕的240名巴黎市民，来自于不下47个区——只有圣路易岛区不在其内。这件事本身就显著地证明了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已经广泛地散布在首都的“贱民”中间；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支持者是从城市各地区汇集到马尔斯教场上来的。

然而证据并没有表明这种支持分配得很平均，我们已经看到圣安东郊区的反应就是冷淡的。最集中的支持力量似乎是来自距离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不远的左岸几个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地带，仅仅三个区（四国区、朱利昂温泉区和圣日讷维叶区）的被捕者就达38名。还有50名被捕者来自中央和中央偏北的五个区——阿尔西区、崩索区、格拉

维叶区、罗浮区和奥拉托利区。以上两地似乎是支持者的重要力量所在地。市政厅区罗浮区之间居民密集的市中心各区，对于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请愿运动照例给以积极的赞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马瑟勒郊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仅在几个月之前，市政当局还特别单独称赞这一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的行动自革命爆发以来一直是和平的和守秩序的[61]。这个好名声以后再也得不到了：从现在起，圣马瑟勒郊区在这一时期的每一次政治骚动中都始终站在最前列。

我们已经看到，面包的供应和价格问题对于支持马尔斯教场请愿或民主派的其他政治活动并没有起多少鼓动作用。这一问题只是在这次政治运动被镇压下去，运动的领袖们被捕或者逃往国外以后才重新出现。8月中旬，由于歉收和面包商缺乏面粉，4磅重面包再一次开始涨价，到9月，似乎已经涨到12苏或者甚至还要多[62]。《革命日报》9月7日报道，贝野在粮食市场曾经受到含有敌意的接待：受到要被“吊到街灯柱子上去”的威胁而被迫退出了市场[63]。第二天一个纽扣工人皮恩奇在邻接中央市场的迈尔区被捕，并被解往阜尔斯监狱，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买到2苏一磅的法国面包，不然就拼命。”[64]

但是，政治运动到这时候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当局所担心的穷人们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屠杀进行惊人的报复是不会实现的[65]。假使面包危机在5月或6月发生，情况就可能不同了，而马尔斯教场事件的发生也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事实是这样，所以警察密探拉保德能够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巴黎一直过着十分平静的日子。”[66]

---

[1] 用饶勒斯的话来说：“一部分资产阶级力求在人民中间寻求支持，以反对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可怕威胁。贤产阶级的这种分裂增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这时，无产阶级虽然软弱，但却已经表现出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人。”（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67页）我认为：这段话里的“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指的是“无套裤党”或“贱民”，而不是“工资劳动者”。

[2] 《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关于面包价格与销售的决议》（1791年8月

17日）。大英博物馆文件：F59* （18）。

[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130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4]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6号，对开本第159—162页（拉斐德的侍从武官德木特关于当天事件的叙述）。据一个目击者说，其中也有来自圣马瑟勒和圣马丁郊区的人〔《狂暴的日子：1791年2月28日革命骚动》，农学家阿列克赛·乌佐（Alexis Houzeau）的手稿，现在保存于芳特纳苏布瓦的M.埃斯塔培先生（M.Estabert）手中，承他借阅这份资料，谨此致谢〕。

[5] 关于官方记载，可参看：《1791年3月4日万森市镇当局公布的1791年2月28日万森事件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1页；关于桑代尔的辩护状，可参看：《桑代尔先生……关于万森事件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202页）。

[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51—156页（韦里勒文件）。

[7] 关于这一过程的最详细的记载，参看亚·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Le Club des Cordeliers pendant la crise de Varennes et le massacre du Champ de Mars* ），1910年巴黎版。

[8] 在1791年4月14日到11月15日期间巴黎各区被捕的238人中，知道职业的人里面，有45人是失业者，或者是由于失业已经沦为报贩，其中10人曾从事公共工程。他们当中，有8个家庭仆役或马车夫，2个油漆匠，2个装修木匠，2个裁缝，还有几个人过去在奢侈品行业〔参看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不同匣装）和Ab集324，第7—60页〕。

[9]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3号，对开印刷本第22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0] 《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 ），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

[11]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35、239、246—248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12] 巴黎市历史图书馆手抄本，10441；国家档案馆文件：C 71，第695号。

[13] 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54—259页。

[14] 国立档案馆文件：C 71，第700号。

[15] 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5卷，第261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第1册，对开本第14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7] 《杂谈》（*Le Babillard* ），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9] 《杂谈》，第23期，1791年7月5日，第7页。

[20]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21] 《巴黎革命》，第96期，1791年5月7—14日；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3卷，第700页以下；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二篇。

[22] 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124页。

[23] 一直到1884年议会通过另一个法案。

[24] 《内外新闻》（*Mercure national et étranger* ），第25期，1791年5月11日。

[25] 《人民之友》，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2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66页。

[27] 凡未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租税的人，就是消极公民，按照178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这种人没有选举权。以后这项规定被采入1791年的宪法中，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解散前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取消这项规定。

[2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206，对开本第217—21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另一个仆人说，他曾经在4个月内对雅各宾俱乐部捐助24苏基金（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5—366页）。

[29]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并可参看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I.Bourdin，*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31年巴黎版，第15—44

页。

[30]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下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31—32页。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32] 《杂谈》，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378页；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3页。

[3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84、134、157、167、172、182、206、215。

[34] 弗·布莱希：《马尔斯教场的请愿》（F.Braesch，“Les Pétitions du Champ de Mars”），载《历史评论》，第143期（1923年），第17—18页。

[35]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52页。

[36]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18—120页。

[37] 《巴黎革命》，第106期，1791年7月16—23日，第60—61页。

[38] 阿·埃·普里梅里，一个杂货制造工人兼自由市场协会会员，当天因为征集签名，在圣安东郊区街上被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39]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157页。

[40]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弗·罗培对于事件的叙述）。

[41]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Buchez er 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33年至1838年巴黎版，40卷本，第11卷，第113页。

[42] 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8—139页。

[43]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4] 当时对死者数字的估计相差极为悬殊，据官方报道数字仅有13人，而

据最荒唐的谣传则达3000人之多（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0页）。《巴黎革命》〔罗培（Robert）的记载〕刊载的数字是50人（同前引处）。根据官方记录，有11或12人（包括一名国民自卫军）被送到附近的格罗卡龙军医院治伤〔《7月17和18日的调查记录》，第12页（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C 75，第737号〕。

[4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15，对开本第463页。

[4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Ab（详情参阅本书第103页注①）；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132页。

[47] 《革命日报》（*Le journal de la Révolution*），第402期，1791年9月18日。

[48] 《巴黎革命》，第106期，第53页以下。

[49]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11卷，第113页。

[50]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第4页。

[5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第235号。

[5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768页。

[5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60页。

[5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33、38页；Aa 148，对开本第30页；215，对开本第463页；182，对开本第31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T 214（3）。

[55] 《杂谈》，第36期，1791年7月19日。

[56]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3，对开本第104页。

[5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6、72、74、76、84、85、134、137、148、153、155、157、166、167、172、173、182、198、205、215、216、219、220、224、239；Ab 324，第7—60页。此外，还有几个案子见于国家档案馆文件：W294，第235号（贝野文件）；T 214^3（检察官柏纳的文件），和 $DXXIX^b$，第34与36号（调查委员会）。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3—36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2号，第7—10页。

[59] 《巴黎革命》，第106期；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142页。

[60] 《拉斐德对法国犯下的罪行》（*Crimes de La Fayette en France* ）（印刷本，1791年）。国家档案馆文件：F^7 6504。

[61] “市政当局借此机会对圣马瑟勒郊区一带地方自革命以来一贯遵守秩序和保持安静的情况表示赞扬”（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1791年3月4日，印刷本）；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对开本第149—150页。

[62] 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6卷，第455—463页。

[63] 《革命日报》，第391期，1791年9月7日。

[6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7，对开本第73页。

[65]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7号，对开本第9—10页。

[66]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8号，对开本第10页。

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

国王逃往瓦雷讷所引起的直接后果，虽然由于议会的宽容原谅和把全国团结在1791年宪法周围的企图而被掩盖过去，但却有其深远的影响。8月，维也纳和柏林的宫廷在法国流亡者的怂恿下，发表了旨在纠合欧洲列强反对法国革命的庇尔尼茨联合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不包括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却使国内外的反革命势力有了一个纲领，从而促成了他们的联合；另一方面，也给议会中聚集在布里索和吉伦德省代表周围的新左派提供了必要的借口，以号召全国发动向欧洲各君主进攻的十字军。他们的鼓动，加上内部经济困难的影响，得到了巴黎各区义勇兵

的热烈响应；当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时，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主政治派（罗伯斯庇尔最初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和巴黎“贱民”们的支持。军事上的失利，通货膨胀的影响以及人们日益相信宫廷方面在“奥地利党”的指引下，正在利用战争诱入敌人，用武力来摧毁革命，这一切都进一步刺激了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结合，所以在1792年的春季和夏季，群众运动几乎一直处于不断的兴奋状态中，最后带来了王政在8月里的倾覆和巴黎各监狱在9月里所进行的大屠杀[1]。

像1789年一样，最初把“贱民”吸引到活动中来的仍是经济危机；但是，这一次引起物价上涨和惹起群众骚动的，不是小麦或面粉的缺乏而是通货膨胀。当时的战争加剧了这个过程；不过，早在战争爆发以前，指券[2]的价值已经开始下落，而法国里弗的外汇率在国外也开始猛跌。1791年6月，法国里弗在伦敦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70%，1792年3月已经下降到50%；在巴黎，1791年11月，指券的售价为票面价值的82%，到1792年1月跌到63%，6月跌到57%[3]。但是，首都重新爆发骚动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食糖和某些其他殖民地产品的缺乏，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场主和土著居民之间发生了内战。在1月，食糖价格几天之内就从每磅22～25苏涨到3里弗或3里弗半[4]；于是在圣安东、圣马瑟勒和丹尼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和博堡中心区发生了骚动。骚动者相信——他们确实有几分理由——食糖缺乏的真正原因是商人囤积，殖民地的动乱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原因，他们闯入一些大批发商和推销商的店铺与货栈里，要求按以前每磅20、22、24或26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同时，在某些地区，把要求的范围扩大到包括面包、肉类、酒以及别的商品在内[5]。这是1775年骚动以来，首都第一次大规模“群众平价”运动。

巴黎各区1月份和2月份的警察报告说明了这些事件的某些真相。我们知道，1月20日在博堡区大约有12名妇女——“是女商贩的样子，穿戴还整齐”——闯进圣默里教堂街的一个批发商孔马尔·塞尼奥尔的铺子

里，拿出一张上面记着某些批发商和推销商姓名的名单来，名单上就是被认为要特别为食糖和咖啡的涨价负责的人。她们声言，唯一的挽救办法就是抢劫和烧毁这些人的铺子。但是当孔马尔太太机智地拿出钱来行贿时，她们却把这些钱看作对于为“公众利益”服务受到的时间损失的赔偿而欣然予以接受，并安静地走开了[6]。三天以后，群众聚集到离圣安东郊区街不远的圣马格里特街的一个杂货商贝野的铺子里，强迫他按25苏一磅的价格卖给他们食糖；他们向蒙特娄区的警务委员杜蒙解释说，

糖的突然涨价使他们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来降低价格并惩罚垄断商。

与此同时，这一区的五六个杂货商都曾经同样被迫减价出售食糖，直到警察和国民自卫军来到现场，驱散了各铺子里的群众，并逮捕了一些人[7]。

另一次骚动浪潮爆发在2月14日早晨，圣安东郊区的警察和宪兵最初就陷于寡不敌众的状态——“全郊区都发生了骚乱”——仅圣安东郊区大街就有20家以上的杂货铺有被袭击的危险，其中有若干家在秩序恢复以前被迫以每磅20苏的价格出售食糖。夜间，向里昂运输货物的车辆在经过这一区的时候被群众截住，市政当局只有请求国民自卫军勉为其难地来保护商人的财产[8]。

同时，一种更具有爆炸性的形势已经在圣马瑟勒郊区发展起来了。戈布兰区的两个染坊主，奥日和蒙讷里，预料到食糖售价一定会日趋上涨，从上一年的11月以来就一直大量囤积——据说他们囤积的食糖有8万磅——堆放在圣希波里特街的一座货栈里。1月，有一次抗议示威很容易地被驱散了；但是当2月14日，谣传这批存货将分散放在全巴黎各处时，事情就变得严重了。那天一清早，群众就聚集起来，截住了在武装护送下离开货栈的第一批装载着食糖的货车，然后就在街上以每磅25苏或30苏的价格出售[9]。第二天，接着发生了多次企图闯入货栈的行

动，货栈由一支当地国民自卫军不怎么心甘情愿地守卫着。包括洗衣妇在内的妇女们敲响了圣马瑟勒教堂的警钟。结果反而促使市政当局采取了行动。新当选为巴黎市长的佩迪昂带着大批武装部队到场，肃清了街道并逮捕了若干人。关于这些被捕者和骚动时期其他被捕者的详细状况，都可以在警察档案中查到：1月里送到贡西尔日里监狱的14个人，大部分是市中心各区的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在2月，有5个人——其中3个或4个是妇女——因为参加了圣马瑟勒郊区事件被送进了贡西尔日里监狱[10]。这些犯人很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同情，2月26日呈给立法议会的一份要求释放他们的请愿书有150个当地公民签名，其中有两个人是教士[11]。

在接着发生的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属于这两个郊区的公民。这次示威于当年的6月20日发生在图伊勒里宫。表面看来，这纯粹是一个政治事件——它的目的是迫使国王答应巴黎各区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要求——不过，情况很可能是：对于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所感到的愤懑使示威群众的人数大为增加，他们借此机会，在王宫中威胁地列队走过路易十六的眼前。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还有其他更实际的不满和不安的原因：军事上的连续失利；国王拒绝批准对不肯宣誓的教士进行放逐的法律；以及现在“爱国派”（吉伦德党）部长们又于6月13日被免职（国王当初曾经被迫十分不情愿地把他们包括在杜木里厄的战时内阁中）。上述最后一项行为给6月20日的示威提供了借口。16日，佩迪昂接到一份申请书，签名的是戈布兰区的少数公民，但是用意在于代表圣马瑟勒和圣安东两个郊区的集体愿望，要求在20日，即1789年的网球场宣誓纪念日，允许这两个郊区的公民武装列队游行以种植一棵自由之树，并向议会和国王呈递请愿书[12]。接到佩迪昂转来的这封请愿书的巴黎市政当局和巴黎省政府都不愿意支持武装的示威游行；但这里已有先例：不到三星期前，圣马瑟勒区的两千居民，就曾携带着矛、干草叉和枪炮等各种武器在议会前游行[13]。佩迪昂本人是一个吉伦德党分子，他想两面讨好：表面上，他劝告组织者放弃武装示威

游行的想法，同时却关心怎样才不至于在这两个区里失去人望。所以，他提出了一项折中的建议，允许两个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在连队指挥官的率领下武装游行——不过不能在国王面前这样做；对于他们携带武器的权利应当让步，因为指挥官们曾经表示过这样的顾虑，那就是如果不带武器游行，他们很可能落入圈套[14]。正如所料，巴黎省政府断然驳斥了这个建议；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至少是戈布兰区对此满不在意。早晨5点钟，武装起来的号召响遍了圣马瑟勒郊区。沿着医院大道，从莫弗塔街的转角处起，成群的形形色色的公民聚集在一起，其中有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也有其他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按照佩迪昂自己的叙述，这些人里有"伤病兵、国民自卫军、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儿童等"[15]。

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是在这一天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戈布兰营的指挥官，他受他那一区的指示，要和桑代尔指挥的圣安东郊区的队伍会师。因此他带领自己的队伍越过图内累桥和玛丽桥，穿过圣路易岛和桑代尔在圣安东大街汇合到一起。这支联合的队伍在桑代尔的指挥下从这里前进，顺利无阻地通过韦勒里街、伦巴底街、圣端诺累街到达万多姆广场，起事者在此停下来等待议会表示意见。他们被邀请递入他们的请愿书，并在代表们面前武装列队走过[16]。

这天下午和傍晚发生在图伊勒里宫的更为热闹的场面，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17]。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王宫的一座侧门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上锁，于是以圣安东郊区的公民为前导的示威群众就从这个缺口涌进了王宫内部[18]。这样，一直到晚上8时或10时，男女群众的示威队伍一刻不停地从国王面前走过。戴着自由帽的国王这时不得不倾听群众永无休止地反复呼喊的各种口号："取消否决权！""召回爱国的部长！"里边大概还掺杂着更粗野、更有挑战性的词句，如"昏庸的路易"，"暴君颤抖吧！我们就是无套裤党"，等等[19]。佩迪昂胸前佩满市政机关的勋章赶到了，并且作了讲演；最后示威群众虽然没有得到什么

革除时弊的诺言，却和平地散去了。

我们对于6月20日的起事者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缺乏警察局报告和国民自卫军的花名册，要想获得一些关于他们的印象，我们不得不依靠最一般性的叙述。巴黎省政府两星期后停止了佩迪昂的职务，并且，无疑是为了说明它这样做是正当的，所以把那些没有组织在国民自卫军里的人说成是这样：

绝大多数是些面生的流浪汉，业已在各方面公开背叛的人……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其中还有惯匪和杀人犯……混杂着妇女和儿童。[20]

但是这段描写，除去十分明显地带着别有用心的目的以外，并没有比我们以前所看到的佩迪昂自己关于这些人的叙述——“拿短枪的人、没有武装起来的人、妇女和儿童”——使我们对其有更多的了解[21]。然而，根据其他记载看来，在示威游行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似乎是小店主、作坊老板、郊区的手工业者，他们得到了帮工和劳动妇女的大力支持。例如，在圣安东郊区，店铺和作坊继续停业几乎有一星期[22]；在圣马瑟勒郊区，根据亚历山大的详细叙述，我们明显看出，主要的推动力来自组织在国民自卫军中的积极公民，那时候大多数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是不能加入国民自卫军的。同时，亚历山大记载了一件小事，这件小事既显示了这个郊区的劳动妇女对于事件的积极关心，同时也为以前的2月杂货骚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联系：当局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和示威游行有牵连而下令拘捕他，但是持拘票的公差几乎受到私刑，而亚历山大由于一些妇女的援救竟得免于被捕。这些妇女正是他在几个月以前为了保护奥日和蒙讷里的财产而曾经和她们作过对的[23]。

在回顾时，把8月10日事件（在这一天，图伊勒里宫被武装攻占，国王被停止行使权力）说成是6月里王政威风扫地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当然非常简单省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很正确，因

为反王室的骚动在郊区继续发生，并且在7月这一个月里，不仅在本地得势而且扩展到其他各区域：到7月末，巴黎已经有47个区宣布赞成国王退位。除此而外，虽然路易十六表现了个人的勇敢，但王位的尊严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将在进攻图伊勒里宫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地结盟军也已经应召到达首都；此外，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小群坚决的共和主义者早就决定要在6月20日小试锋芒之后，于有利时机到来时，给王政以决定性的最后打击。从美洲人富尼叶的回忆录来看，这些都是很清楚的。富尼叶受命和7月29日到达的马赛结盟军领袖在疯人院协商的时候，告诉他们说：

6月20日发动了大规模的初步进攻之后，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这个计划的实质就是逮捕那名为国王的独夫和王室，并把阴谋造成法国人民全部损失和奴役法国人民的那些罪恶分子和匪徒逐出王宫。[24]

但是，这样描绘出来的图景并不完整。一则，虽然各区反对王政的骚动是一个经常的因素，但是，骚动领导人的目的和组成却不是这样。威胁国王离职是吉伦德党发动的；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山岳党（非吉伦德党的雅各宾派开始被这样称呼）的最高领袖在6月20日的事件中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在7月14日结盟节那天，佩迪昂仍然被看作当时的英雄；只有在7月中旬以后，当吉伦德党慑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社会影响而退缩为王政的保卫者时，山岳党才把运动的领导权抓过来；但是，即使到7月末，罗伯斯庇尔还强调说，王政的将来，和整个宪法的将来一样，要取决于群众选举出来的国民大会而不是取决于武装暴动[25]。再则，王室手里仍然有很多张重要的王牌：各省责难6月20日对国王个人进行侮辱的决议大批涌来；在巴黎，作为抗议的请愿书很快就收集到了两万个“积极”公民的签名；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几个师的指挥官（包括圣马瑟勒郊区的指挥官）公然表示他们是国王的人；当拉斐德在6月28日提议采取积极措施来驱除民主派时，竟受到立法议会的欢迎，他打

算动员一大部分巴黎国民自卫军对雅各宾派发动一次武装政变，而这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王后以她那特有的愚蠢拒绝了他的帮助[26]。但是，甚至在拉斐德失败和回到部队上以后，主动权还仍然常常在保王派手里。佩迪昂在7月初被停职（虽然，必须承认，他一星期后又复了职）；西部各区的青年人志愿担任图伊勒里宫的保卫工作，以表示他们支持王室的某种决心；几营“保王派”的国民自卫军甚至觉着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袭击图伊勒里公园的和平群众[27]；在此同时，盛传即将对“爱国派”进行讨伐，而揭露保王派“密谋叛国”的告发书像潮水一般涌入巴黎公社和警察局[28]。

“爱国派”，甚至或多或少置身于事外的中立派，都把这些事情看得很严重，亚历山大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录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亚历山大本人虽然是一个保王派，是6月20日事件的一个冷淡的——即使不是冷淡，也是非心甘情愿的——参加者，但由于害怕他认为即将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所以变成了8月10日起事的积极支持者[29]。8月1日的布伦斯威克宣言自然更使人们感觉到这种恐惧是真正有根据的，这项宣言威胁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说，如果他们敢于拿起武器抵抗军队，就要被就地正法。所以，从这个意义说来，八月革命绝对不是一个前前后后都想好并按照计划来执行的一套行动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防止真正的和想象的危险的自卫行动[30]。

然而，到7月的最后一周，一个或多或少决定了的行动计划已经形成；8月10日的爆发是一系列不成熟的发难的高潮。7月26日夜间，巡行圣安东郊区的蒙特娄区的结盟军发出了武装起来的号召；工人们在圣马格里特教堂敲起警钟；桑代尔从床上被拖起来；各作坊在第二天一直停工[31]。30日，议会通过允许“消极”公民参加国民自卫军的法令，这就给运动和它的成功增加了动力。7月30日[32]，8月1日和5日[33]有更多的不成熟的发难或关于这些发难的谣言。8月6日，巴黎人和结盟军在马尔斯教场举行盛大集会要求路易十六退位[34]。圣安东郊区从7月中旬以来

一直就是各区运动的领导者，这时它警告议会到9日必须废黜国王或停止其职权，否则各区将采取武装行动。

当天夜间，警钟响起来了。48区的“通信”委员会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的公社，把佩迪昂软禁在他的屋子里，同时，国民自卫军武装队伍开向图伊勒里宫。

虽然最后结局是不容怀疑的，但守卫者仍有可能进行更坚定的抵抗。守卫王宫的是900名瑞士兵，200名到300名圣路易骑士和2000名国民自卫军——他们后来全部投向进攻的队伍。围攻者集结的力量要大得多：到9点，在开始进攻前，他们可能已经有了20 000人，其中包括400名马赛人和来自布列斯特、卢昂以及其他城市的较小的队伍[35]。在枪响之前，侍奉国王的巴黎省检察官洛德莱劝国王偕全家到附近正在开会的议会去避难，这样也许可能避免流血，并由议员们找出一个解决方法而不必经过武装叛变的强迫命令。守卫者被国王丢弃之后，只有瑞士兵和一小撮金融界的掷弹兵准备抵抗。马赛人上前和防卫者表示亲近，但却遭到瑞士兵的开枪扫射。正如在巴士底一样，谴责背信弃义的喊声响起来了。猛烈的进攻开始了。在王宫被摧毁之前，国王传令停火；但是这并没有挽救瑞士兵被成批地屠杀，他们一共被杀死了600人，其中有60名被武装押往市政厅，经过设在那里的革命公社下令或默许而被杀死。进攻者这方面大约有90名结盟军和差不多300名巴黎各区的人战死或负伤[36]；后一部分人中间有3名妇女，其中一个叫路易丝-瑞讷·奥都，来自图书馆区，是10月5日事件中的老战士[37]。

在描写参加进攻图伊勒里宫的结盟军和巴黎各区居民时，敌视革命的见证人和历史学家特别滥用了许多可怕的形容词。他们被图尔泽耳夫人称为“武装匪徒”，被比戈德·圣克罗瓦写成为“造反的匪党”，在泰讷的笔下成了“差不多全是最下流的人，操贱业的平民”，在珀耳提尔的笔下是“一群被抛弃的柏伯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蒙特

人”[38]。就这些描写意在说明所描写的这些人的职业、社会出身，或者甚至国籍而言，我们可以参考巴黎各区送来的死伤者名单和以后被国民大会认为有资格由本人或其家属领取恤金的名单，来对证这些描写是否可靠[39]。

结盟军的死伤者在有记录可查的全部伤亡数字中大概不足四分之一[40]，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对他们进行详细的社会分析。我们只要指出下面的情况就够了：在这些名单上所见到的那些人的姓名都是典型的法国发音，而标明他们是意大利人或其他外国人，无疑是意在制造偏见。在300多名巴黎市民中[41]，有120人注明了职业[42]；这就是我们估量当时参加者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必须依据的蓝本。在这120人中间，有95人来自首都50种小商业和小手工业，不是店主、小商贩和制造商、作坊老板、工匠，就是帮工[43]。他们中间只有2名资产阶级和3名可以叫作专门职业者的人：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绘图师。其余的是小职员（2）、音乐师（2）、家庭仆役（9）、码头工人、体力劳动者和马车夫（7）、玻璃工人（2）。考虑到几天以前“消极”公民还一直被排除于国民自卫军之外，他们当中工资劳动者之多是惊人的：一共有33个帮工和18个其他工人。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远不足全部人数的一半[44]。那么总体来说，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党，夹杂着少数比较富裕的公民；但是他们绝不是“最下流的人”，如抱有成见的泰讷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

从下面的意义说来，他们也是典型的：他们几乎来自首都各区，因为除去四个区以外，首都各区在名单上全见到了——例外的四个区是西边的鲁列区、马莱旧贵族区中心的罗亚尔广场区、两个岛区，后者也就是亨利四世区（现已改名为新桥区）和圣路易岛区（友爱区）。这一次，圣安东郊区又以它的传统地位出现：仅盲人收容院区就有不下于8名死亡者和50名负伤者；其次是蒙特娄区（死伤共18名），菲尼斯太勒区（19）和天文台区（18）——最后两个区属于圣马瑟勒郊区。两个郊

区合计约占死伤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这些枯燥的统计数字的后面，隐藏着许多个人英勇牺牲的故事，隐藏着许多在焦急的期待、恐怖和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日子。已故的日·姆·汤普逊就曾记述过卡米累·德姆连的妻子露西，当人们在8月9日夜间进攻图伊勒里宫的时候，在哥德利埃区的一个公寓里，焦急而忧虑地等待着战斗的结果[45]。但是德姆连是一个社会上有名的新闻记者，他个人固然可能遭到生命危险[46]，他的家庭却不至陷于经济困难的境地。如我们所看到的占进攻者大多数的小商贩、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来说，如果他们受伤或者残废归来，就是那一夜的进攻得到了胜利的结局，也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困难和痛苦；如果他们战死，在当局可能决定给寡妇孤儿一笔恤金之前，也要等候一段漫长的岁月。例如，圣安东郊区大街254号的一个50岁的网纱工皮埃尔·杜蒙，被他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列入了1792年10月残废者的名单，两年后因伤致死，他的妻子并没有领到恤金。安东·洛布瓦，39岁，格雷讷累喷泉区博讷街的一个镶玻璃师傅，遗留下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其中只两个有领恤金的资格。路易·勒·罗伊，21岁，伤兵院区小圣让街金匠帮工，抛下了靠他养活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幼儿。皮埃尔·欧迈特，49岁，大教堂郊区街21号的一个家具匠帮工，在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列格罗去攻打图伊勒里宫：他虽然是一个工资劳动者，却做了一年八个月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他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孤儿。

许多情形表明，那时的当局和今天的一样，花起公家的钱来很吝啬，对于申请补偿的人往往百般刁难：阿尔西区古特勒里街22号的运水工人路易·沙韦，因为未能按法定手续拿出证明诊治性质的医师证明，他的申请就没有被批准；玻宾库尔区的菲利普·布韦同样被拒绝发给补偿金，因为他一年后所患的疝气病看来不是由于参加8月10日事件所引起的。其他人比较幸运一些，但是补偿金的数目比起本人的牺牲来常常是微小的。比如，蒙特娄区的让·道本通，虽然在图伊勒里宫负了伤，

伤还没有痊愈就被征入伍，派往前线去了；他养了143天的伤，以后被奖给前线薪俸50里弗和214里弗的恤金。另一个久经锻炼的战士，似乎叫亨利·布太，是戈布兰街87号的珠宝匠，41岁，他的左手曾经在巴士底负伤，事后得到了6个月养伤的假期；他这次在图伊勒里宫又负了伤，养了两个半月的伤，得到了112里弗10苏的补偿金。另一个“巴士底攻克者”（在这些名单中，一共有4个这样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盲人收容院区德利格勒街的码头工人，名字叫埃·伯诺瓦，在图伊勒里宫牺牲了，他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战斗员——1761年至1779年间在正式军队中服役，担任中士，后来退休到圣安东郊区做染工，参加过1789年攻打巴士底的战斗[47]。

在攻下图伊勒里宫之后，紧接着就是到前线去的招募；很多攻打图伊勒里宫的战士都是喘息未定，就重新上了火线——这一次是和普鲁士人作战。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另一个到前线去的是路易·沙万，他是圣安东郊区特拉韦尔西勒区的一个锁匠师傅，也是属于盲人收容院区的，最初，人们传说他已经战死在图伊勒里宫。他的内兄也负了重伤，而在他走后不久，他的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得了病。他的妻子在这些遭遇之后，心情的苦痛可想而知，她写了一封词意悲切而文理欠通的信给公共救济委员会，请求给她本人和她的家庭以帮助，她写道：

我的丈夫不得不随着市民们出发去替祖国报仇雪耻，我回忆起这些日子十分伤心，因为总起来说，我的哥哥（他是孤儿区的，名字叫达莫瓦）也受了伤，几乎死去，他告诉我，我丈夫已经阵亡。[48]

这一类事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忧虑和痛苦，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说明，为什么巴黎许多公民甚至从图伊勒里宫发动政变的危险中解脱以后，还继续处于狂热的激动状态中。国王已经被停止行使职权，瑞士兵（国王的最忠实的保卫者）已经被屠杀或囚禁；许多公开的宫廷支持者

已经被一网打尽，并且他们家里私藏的武器或信件也被进行了搜索。但是外国敌人离大门不过才几百英里远；监狱里满是（人们想的比实际上还要满）反动的僧侣、革命的政敌，还有一群伪造货币犯，人们认为正是他们伪造的指券引起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这些监犯被认为都是布伦斯威克公爵的党羽，他们正在一心等候着义勇队开赴前线，以便从监狱里冲出，屠杀留在后方的老弱妇孺。这种心理在巴黎各区的战斗员——毫无疑问，他们就是属于攻打图伊勒里宫的同一类人——中间渐渐滋长起来，终于导致9月初对监犯的可怕屠杀。这决不是一刹那的感情冲动所造成的，或暂时的恐惧所引起的突然爆发。早在8月11日，即图伊勒里宫陷落的第二天，珀隆和维讷这两个警官就已经写信给新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桑代尔，警告他说：

“先生，据报告有人计划要到巴黎各监狱中抢走所有囚犯，给他们一种迅速的裁决。”[49]

六天以后，佩迪昂写信给桑代尔说：

有人告诉我……今天夜晚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一定会敲起警钟集合市民，把他们带到监狱去杀害所有被监禁的人犯[50]。

但是，这一运动并不限于郊区：同一天，市中心的格拉维叶区和崩索区传出了类似的威胁[51]；9月2日，凡尔登被普鲁士人攻陷的那天，普瓦松尼区议会决定向其他47个区发出决议的抄件，声明：

为了避免危险，为了提高市民们向国境线出发的爱国热情，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想，唯有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52]。

当天下午，有一部分犯人被武装押赴圣日尔曼·代·普雷教堂附近的亚培监狱，刚一到就被正在那儿等候的群众抓住当场处决了。屠杀扩展到沃吉拉街的加尔美教堂；夜间又扩展到贡西尔日里监狱、沙特勒监狱

和阜尔斯监狱；在阜尔斯监狱，屠杀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6日或7日。3日，又在圣维克多街的圣斐曼神学院和贝尔纳丹修道院执行死刑，在这里，一般的罪犯正等待着被送往土伦、布列斯特和罗舍福等地去做划船苦工。这天下午和第二天，收容贫民、流浪汉和疯子的比塞特勒监狱医院的犯人们遭到屠杀；作为女贼和娼妓拘留所的萨柏特里埃监狱也有少数死者。只有两个监狱没有被触动——科勒夫街的圣佩拉纪债务人监狱和圣丹尼郊区的圣拉扎尔监狱（现在是妇女监狱）。屠杀到6日或7日停止。以上谈到的9座监狱的犯人共2800名，到这时为止，被屠杀的约为1100名至1400名（其中只有37名是妇女）。略多于这个数目——也就是1500或1600名——的犯人被仓促成立的法庭宽恕了，这些法庭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培监狱中由马伊雅主持裁判的那一个。使人惊异的是，这些监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僧侣、贵族或“政治犯”，而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菜园窃贼、娼妓、伪造犯和流浪汉等[53]。

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几天内，有些当权的人准备称赞这些屠杀，说这是必要的群众审判行为，甚至认为这是其他人可以效仿的榜样。9月3日以巴黎公社名义发给各省的一个通告（常常是由马拉执笔）是很有名的，其中说，“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当然渴望采取此种必要的手段”。还有圣马瑟勒郊区的菲尼斯太勒区议会，它在9月6日向所有48区发出下列号召的时候，也不过是表明了当时巴黎流行的看法而已。[54]

兹特郑重声明，人民已经复了仇，对于那些可能逃脱公正报复的阴谋家一定要给以法律制裁。[55]

但是危急的时刻一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任何党派会认为这场屠杀是应该的，或者是有功的；而对于挑起或组织这场屠杀——或者甚至对于仅仅是没能制止这场屠杀——的攻击却成了各党派彼此斗争的公认的武器，山岳党用它来败坏吉伦德党的信誉，而吉伦德党则用它来给山岳

党脸上抹黑；同时，保王党和“温和派”则无区别地用它来对吉伦德党和山岳党进行同样的攻击。在热月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斗争变得更为尖锐，最常见的给雅各宾派加上的形容词，除了“恐怖主义分子”或“嗜血鬼”之外，就是“九月事件制造者”。要想证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屠杀者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人数很多吗？他们是少数心狠手辣的狂热分子吗？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能够代表整个巴黎吗？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回答。皮埃尔·卡隆在详细研究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考察了每一件他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确定许多意在列出“九月事件制造者”全部和详细名单的文件的正确性；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文件，即使是诚心诚意提供的，也是真伪难辨。除掉目击者关于到场的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其他个人的记载以外——这些记载中很多是相当真实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共和国第四年（1796年），对于被认为曾经参与1792年屠杀的39个人的司法审讯记录。虽然由于证据不足，除去三人以外，全被宣告无罪——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一些例证，这样一来它的比例就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张名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在当时的人看来，那些屠杀者可能是从哪些人和哪些阶级里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包括小作坊主和工匠、店主以及少数退伍军人和宪兵；在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几乎每人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卡隆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说：法布尔·德格兰丁的说法比大多数说法更近于事实，他于1792年11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冲进亚培、奥尔良和凡尔赛各监狱的人就是8月10日的那批人”[56]。

这一插曲本身尽管很令人不快，但是这场屠杀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义勇军于9月20日在瓦尔美击败布伦斯威克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边境线的几个星期以前，这场屠杀已经把内部敌人消灭殆尽。这样，这年秋天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就是建立在最初看来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革命已经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

---

[1] 关于本章的政治背景和事情的主要经过，可参看乔治·勒菲富尔：《法

国大革命》，第217—256页。

[2] 指券原来是作为教堂土地拍卖资金而发行的有息公债，后来渐渐成为革命时期公认的纸币，并且用于所有的金融交易。

[3]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5页；拉·格·霍特莱：《法国指券的崩溃》（R.G.Hawtrey，“The Collapse of the French Assignats”），载《经济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第28卷（1918年），第111期，第300—314页。

[4]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1页。

[5] 关于骚动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6—49页。关于2月中旬圣马瑟勒郊区的骚动，参看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J.Godechot，“Fragments des mémoires de Charles-Alexis Alexandre sur les journées réivolutionnaires de 1791 et 1792”），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6期，1952年4月至6月，第148—161页。

[6]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72，对开本第54页。

[7]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8]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39页。

[9] 参阅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48—161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拘捕材料），对开本第103—137，200—204页。

[11] 国家档案馆文件：D Ⅲ 256（4）。

[1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佩迪昂文件）。

[1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64页。

[14] “他们对于不携带武装游行表示反对和疑虑”（国家档案馆文件：BB 30 17；与1792年6月20日事件有关的资料）。亚历山大对于这项建议是有功劳的（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1—172页）。

[15] 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67号，对开本第46—53页。

[1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3—175页。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18] 图伊勒里区的警察记录，在1792年6月20日那一天的记事里记载着，“业已证实王储寝宫有好几扇门被砸坏了，公主的寝宫也有一扇门被砸坏了，而且还砸开了公主屋子里的两个箱子。”（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2，对开本第31页）

[1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6页。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1] 其他记载还提到“一个带着军刀的市场搬运夫”（国家档案馆文件：BB^{30} 17）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6页）；但是，这里提到的人太少，当然不足以作为依据。比较有启发性的是某些图伊勒里宫的侍从的叙述，他们声称曾经从示威者当中认出了“奥尔良先生的留有小胡子的那些人”（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3]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9页。

[24] 《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25]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6页。

[26]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77—187页。

[2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0页。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387，第2号卷宗。

[29] 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87—221页。参看以下一段：“宫廷派在准备作一次更激烈的斗争

的同时，一直在进行卑劣的操纵、迫害和诽谤造谣……而反对派则取守势，但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即要对宫廷做有力的抵抗”（《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骚动的回忆片断》，第187—188页）。

[30]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47页。

[3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63页。

[32] 根据富尼叶的说法，这一天的计划由于没有得到桑代尔和佩迪昂的支持而失败了。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8月3日，圣安东郊区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但是它似乎和8月起事没有任何关联（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19，对开本第30页）。

[34]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0728a（印刷本）。

[35] 关于这些数字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和观察家提供的数字，可参看普·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P.Sagnac，*La Chute de la royaut é*），1902年巴黎版，第277页以下。

[36] 关于围攻者的死伤数字，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1—21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300页以下。

[37]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4—5页。

[38] 转引自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4—136、181、190、300—302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4；F^{7} 4426。

[40] 图埃特伊记载的376名进攻者伤亡名单中，结盟军有89名（《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1页）。

[41] 图埃特伊的287名巴黎市民的数目看来是估计少了。

[42] 图埃特伊的名单上只注明了84人的职业（《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4—25页）。

[43] 他们中间有12名制鞋匠，8名家具匠，6名网纱工，4名假发匠，4名制帽工，3名木匠，3名锁匠，3名油漆匠。

[44] 图埃特伊令人吃惊地把大多数人说成是属于"工人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3页）。

[45] 日·姆·汤普逊：《法国革命的领导者》（J.M.Thompson，*Leaders of the French Révolution*），1948年牛津版，第118—121页。

[46] 马迪厄怀疑这一点，他写道："即使卡米累·德姆连去时拿着枪，他也不是为自己用。"（《八月十日》，1931年巴黎版，第119页）

[47]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9—3270、3272。

[48]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74，第1592号，对开本第111页。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22：《关于8月10日事件的文献资料》，对开本第29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74^{70}，对开本第603页。这两项文件都没有被卡隆引用。

[51]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5卷，第3874号。

[52]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03页。然而，屠杀在这项决议发生影响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皮·卡隆：《九月大屠杀》（P.Caron，*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第338—339页〕。

[53] 卡隆：《九月大屠杀》（1935年巴黎版），第3—7、76—102页。

[54] 关于同时代人对于一直延续到9月底的屠杀的评论，可参看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21—165页。

[5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42页。

[56]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03—120页。

第八章 山岳党的胜利

路易十六的被推翻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共和国宣告成立，而且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宣布赋予一切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权利："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区别——1789年至1791年的立宪派所十分喜欢的东西——被取消了，每个成年男子从此有权在所有地方的、省的和全国的选举中投票[1]。这样，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的平等观念就具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尽管有这一切成就，可是，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一段历史仍是一个充满内部深刻矛盾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和谐融洽的时期。代替旧的矛盾的是新产生的矛盾，而这与对外战争问题完全无关，因为新选出来的

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不同程度上都给战争以热烈的支持。吉伦德党在这次选举中一跃而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并且有地方上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巴黎，由于他们在八月革命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因而失去了武装民众的支持。与吉伦德党对峙着的是山岳党，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敦和马拉现在都被选进了国民大会。他们深得巴黎各区和俱乐部的拥护，因为他们在八月事件中起的作用使他们在各区和俱乐部中间享有极高的声誉。斗争逐渐在秋天展开，随着这年冬天和第二年春天许多新的叛变行为与战争的失利而日益激烈，到了初夏便爆发为公开的暴力行为。这场斗争一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才获得解决，这时，吉伦德党的领袖们被加入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无套裤党人强行赶出国民大会。然而，只有到9月群众进一步暴动之后，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得到巩固，专政的工具即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才宣告成立。

但是，成为革命第二阶段中最显著特征的山岳党和巴黎无套裤党的联盟，并不是没有经过困难和紧张时期就实现了的。除了政治权利以外，无套裤党人并没有从八月革命中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新的巴黎公社曾经领导由他们积极参加的暴动，但它既不是由他们缔造的，也不合乎他们的理想：虽然同1789年和1791年的公社比起来，坐在里面的律师和商人少了一些，但是，小店主、作坊师傅和帮工只占公社成员的三分之一；而律师和记者虽然是少数，却占据着领导地位[2]。不过，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发生变化。当时存在着更为直接的迫切问题，如工作和粮食价格问题等。11月，圣安东郊区的玻宾库尔区议长曾向国民大会呼吁，要求给“工人公民这一人数众多的阶级”准备面包和工作[3]。曾引起1792年9月骚动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在夏季和秋季有所缓和[4]，但是1793年最初几个月又猛涨起来：比起上一年春季，这一次来势要凶猛得多，波及的消费品范围也更为广泛。到2月，精制砂糖（1790年售价为24苏）卖到47～60苏，粗糖（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40苏，牛油蜡烛（1790年售价为15苏）卖到18苏半～20苏，咖啡（1790年售价为34苏）卖到40苏，肥皂（1790年售价为12苏）卖到23～28苏。结果引起了

比上一年食糖暴动更广泛更持久的群众骚乱。巴黎各区全部或者几乎全部卷进了这次骚乱，它大概比革命中的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清楚地标志着“贱民”和有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这些有产阶级中包括曾经在雅各宾俱乐部作过演讲或者鼓过掌，或在国民大会中同山岳党同坐过最高一排椅子的极端民主派在内[5]。

星期日，也就是2月23日这一天，有两个妇女代表团到国民大会请愿，其中一个是洗衣妇组成的，她们抱怨肥皂涨价[6]；第二天便发生了局部骚动，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真正的爆发开始于25日早晨，骚动的形式是群众冲进杂货铺和蜡烛商店，强迫店主按照骚动者的规定降低价格。上午10点钟，从市中心的商业区——由伦巴底、格拉维叶和马尔舍等区[7]组成——开始，运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到全城各处[8]。从保存下来的警察报告中，我们可以找出它从这一区发展到那一区的路线。先从向东发展说起：刚过10点不久，运动就发展到公社大楼（市政厅），中午发展到结盟广场（罗亚尔广场）区，2点发展到兵工场区，3点发展到人权区，3点至4点之间到盲人收容院区，4点到蒙特娄区和武装人（马莱）区。同时，向北发展的情况是：运动在两点半发展到祖国之友区，5点到崩迪和白山区。向西的发展是：两点半到达法兰西警卫军区，4点到博物院（罗浮）区，7点到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区，8点到图伊勒里区，10点到共和（鲁列）区。运动可能从图伊勒里区越过国民大桥（以前的路易十六大桥）扩展到河左岸；不论怎样，格雷讷累喷泉区那天晚上8点到9点之间是有骚动的。第二天，在若干区里发生了一些较小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心区的女商贩和圣马瑟勒郊区比厄富尔街的洗衣妇起了更显著的作用。但是25日离开巴黎到凡尔赛去的桑代尔早就动员了国民自卫军，很快便驱散了群众，恢复了法律和秩序。

这次运动的目标不仅指向食糖，而且同样指向全部其他杂货和殖民地产品。这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有一个普遍现象是：城市这一区和那一区所规定的价格标准是显然一致的——所有这些都暗示这是一次有计划

的一致行动。下面是骚动者最普遍需要的货物和他们订出的价格范围：食糖，18～25苏；粗糖，10～12苏；牛油蜡烛，12苏；肥皂，10～12苏；咖啡，20苏。如果严格按照这些价格出售的话，我们将看到店铺老板所得到的货价大约相当于市价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但是，实际上，很少是这种情形。骚动者中间无疑掺杂有趁此大好机会进行抢劫的人——特别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国民自卫军出动（有些自卫军甚至还参加骚动）。此外，在随之产生的混乱中，就是世界上心地最纯正的人也往往易于顺手牵羊，拿些货物，而不会交出钱来领一张付款收据。不过我们看到，圣马丁街一个杂货商交给警察下面这样一张收款和损失清单：

计开，	糖，	420 磅，原价每磅 54 苏	1134 里弗
	粗糖，	70 磅，原价每磅 40 苏	140 里弗
	牛油蜡烛，	229 磅，原价每磅 20 苏	229 里弗
	“蓝白牌”肥皂，	248 磅，原价每磅 28 苏	347 里弗 8 苏
			共 1850 里弗 8 苏
			实收货款 754 里弗 5 苏①

①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Λa 48，对开本第 563 页。

这张账单表明货物出售后实收的货款差不多只有市价的五分之二。另一个杂货商，罗亚尔广场区的皮埃尔·麦尔维埃能够证明他在价值1547里弗[9]的货物出手后收回521里弗15苏。但是这些店主是特别幸运的，其他店主有的只收到他们商品市价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例如，阿尔西区的卡安从价值26 267里弗的货品上只收到2829里弗，法兰西警卫军区的孔马尔，被拿走的货物市价是27 043里弗，他费尽气力只收到了1158里弗4苏的“包在茶巾里的指券”[10]。

骚动还有其他一些显著的特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它们的主要牺

牲者是大商人和批发商，一般认为这些人应该对囤积和促成物价上涨负责。这也许能说明为什么运动开始于格拉维叶和伦巴底区，因为这两区是这类商人的麇集地。但是当骚动向四周扩展以后，似乎就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了，小蜡烛商和杂货商的店铺也被殃及。例如，在盲人收容院区，警务委员开了一张25家杂货商的名单，其中有13家都受到了某种损失——有几家只损失了几里弗[11]。这里有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参加这些主要是对于高物价的自发的抗议的，不仅仅是很穷苦的人。根据目击者所引证的，有许多例子证明，的确有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参加骚动：我们听到的有屠户的学徒、建筑工人、运水工人、码头工人、女商贩、厨师和家庭仆役，他们在全市各地区起了极其显著的作用；而在由于骚动而被捕的49个人中间，有28个人是各种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和工匠[12]。可是，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其他店主——有时候甚至还有资产阶级——也十分踊跃地利用杂货商不幸受窘的机会，派他们的厨师、仆人、学徒或帮工混在侵入杂货铺的群众中间，以非常有利的价格购买食糖、肥皂、蜡烛和咖啡等[13]。

我们很难判断这次骚动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预定的行动计划的结果。市议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大会中的各党派在承认物价上涨造成生活困难的同时，全都对骚动作最露骨的斥责，企图用“幕后有人指使”、反革命阴谋或者是政敌的诡计一类的说法来解释这次事件。例如这时还没有参加山岳党的巴累别有用心地说，“这是暗藏的贵族背信弃义的煽动”。为了加强他的论点，他坚持说糖和咖啡这类“奢侈”品不至于激起群众的愤怒；但是当他说出下面一段话的时候，便透露了他的成见，他说：

我们不要忘记了一切社会原则；因为在一切不再尊重私有财产的地方，我们是不会再看到社会秩序的[14]。

马拉的报纸曾经主张把一部分杂货商吊死在他们的大门口，也许是

为了分散大家对于马拉的注意，山岳党和公社选中了格拉维叶区的“红色教士”雅各·卢，认为他是暴动的主要煽动者——如我们所见到的，格拉维叶区是这次骚动的起点。马迪厄也趋向于同意这种看法[15]。雅各·卢在此之前固然要求过对一切消费品实行最高限价，但是他的影响能够扩展出他本区以外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而且，无论怎样说，也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证明他在这次事件中起过任何直接作用。

这次骚动并没有产生直接后果：2月27日警局督察处的报告力言食糖、咖啡、油脂、皮革、肥皂和板油售价仍然保持以前那种“过高”的水平[16]；但是公社却在3月4日趁机规定4磅重面包价格为12苏，并且用补助面包烘制商的办法维持住了这个价格水平，虽然其他消费品价格和工资都在增高[17]。然而，正如警察局以后几星期的报告所表明的， 当局继续提心吊胆地等候着不久的将来再爆发一次群众平价运动[18]。

但是，不久，又慢慢发生了其他问题，引起了骚乱。4月中旬面包一度缺乏，于是风传妇女要列队到市政厅和国民大会去抗议；圣端诺累街一家面包店被愤怒的妇女冲入，店里的东西大部分被抢走了。4月和5月，谣传女商贩和其他人等正在准备一场新的监狱大屠杀；从这时候起，竭力鼓吹迅速作革命裁判的马拉成了“贱民”心目中的英雄。5月2日，一万名非武装的圣安东郊区公民代表在国民大会前游行，要求为零星消费者的利益而控制物价；从凡尔赛来的妇女在国民大会吵闹，并且拒绝离开会场[19]。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大会才非常勉强地投票通过了第一道限制全国面包和面粉最高售价的法令[20]。

和过去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时，争夺权势的党派开始利用运动谋求私利并把它引向符合自己政治主张的道路。吉伦德党和山岳党的斗争已经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从吉伦德党企图把丹敦牵连进杜木里厄的叛国阴谋案中和接着逮捕马拉以及革命法庭对他的传讯看来，很明显，如果山岳党不及时下手的话，他们自己就会成为反对派的牺牲品。

然而，首先发难的并不是山岳党，也不是雅各宾俱乐部，而是以让·华尔勒和雅各·卢为首的极端革命忿激派这一个集团。忿激派企图推动巴黎公社和各区掀起一次不成熟的暴动。在离图伊勒里宫数步之遥的斐扬派平台上，华尔勒的讲演吸引了大批支持者；但是华尔勒的暴动委员会策划于3月10日发动一场群众性暴动的企图却流产了。它的目的是要清算吉伦德党领袖罗兰和布里索并处囤积者和投机者以死刑，但是雅各宾俱乐部、公社和圣安东郊区的坚决反对注定了它的失败[21]。不过忿激派仍然有它的信徒，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还有人谈到，有必要举行一次群众性暴动以清洗整个国民大会和控制所有必需品的价格[22]。

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领袖们倒是不慌不忙的。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增长了智慧；他们虽然和自己的敌手吉伦德党不同，愿意而且也能够利用群众运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们决不想让运动的领导权转入旁人手中，不论是转入忿激派或者是转入艾贝尔手中，艾贝尔是《杜歇老爹报》的主编，他的影响正在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巴黎公社中日益增长。此外，他们还担心太早的起义会带来对于国民大会的过于严酷的清洗，经过这样清洗后的国民大会将无力抗拒无套裤党的各种经济要求；他们还担心暴动会带来一场新的监狱屠杀，因而使巴黎在各省的联合反对面前孤立起来[23]。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到4月初，他们准备提出自己的纲领，争取各区议会的支持（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其中大多数的支持）并从两种“极端派”手上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夺过来。于是罗伯斯庇尔的弟弟奥古斯丁于4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公开号召各区去国民大会请愿，并“迫使我们逮捕那些不忠实的议员”[24]。反应很迅速：三天以后，崩孔赛耳区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民大会审判吉伦德党最著名的领袖微尼奥、加德、蒲佐等人；10日，它的邻区粮食市场区，更进一步地提出了22名议员的名字[25]，打算从议会中赶走这些人，这样做一方面能满足群众清洗这个不受信任的国民大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证山岳党在议会内部获得起作用的多数。这现在已经成了口号，围绕着这一口号形成了5月到6月的暴动。到4月中旬，48区中已经有35

个区分别表示了它们对于这种主张的支持；巴黎公社同意群众的要求，5月19日邀请各区选派委员商讨实施办法。正是从这样形成的大会中，最后出现了组织和指导5月31日到6月2日的巴黎革命的中央革命委员会[26]。

我们要想知道各区议会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经过是很容易的，但是，关于巴黎“贱民”对于这些发展有什么反应，组织者采取了什么步骤吸引他们给予起事以积极的支持，我们知道的就很少。不过，他们正在得到这种支持，似乎是没有疑问的。我们知道，食物涨价已经使“贱民”感到惊慌，他们已经提出了不仅要控制面包和面粉，而且要控制所有重要消费品的价格与供应的要求，忿激派有时就是他们这方面的代言人。山岳党对于这样的方案虽然并不热心，但主要的反对正如一切聚集到议会中上层旁听席那些人自己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来自吉伦德党和它的国民大会中的支持者。物价在继续上涨，4月和5月的警察报告反映了群众的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雅各宾派所倡议的清洗国民大会可能促使对于囤积者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从而保证物资供应[27]。同时，也有迹象表明：雅各宾派及其支持者正在利用俱乐部和群众团体来取得男女“贱民”的支持。例如，一个警察局密探在5月13日向内务部长报告说：

妇女们坚持要求22个议会议员退职，并且希望男子给她们以支持[28]。

5月29日我们听到伟人祠区的一个前雅各宾派书籍装订工人说：

最无耻的是，有人竟要使圣日讷维叶教堂区那些在区议会会场外和会后聚合到一起组织成为俱乐部的全体工人们来代替资产阶级。[29]

在紧急关头到来时，我们将看到，革命组织者有一种更切实有效的办法，来保证自己的武装支持者不致因为担心工作时间受到损失而脱离

队伍；但这只是最后一分钟才采取的措施，对于在事变发生以前取得支持上并没有起作用。

同时，暴动或多或少是按着计划发展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在5月29日一直开会；第二天晚上，公社正式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位过去的海关职员安利奥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此外又决定在各区成立一支由无套裤党组成的两万名革命民兵，在服役期间，每人每天发给饷银40苏[30]。31日清晨3点，警钟敲响了，关卡被封锁了——这是重大事件发生时必然会有的前奏曲。但是，这天是一个工作日（星期五），到这时为止，响应的工匠和工人并不多，所以国民大会感觉他们所受的外力压迫比较小，能够争取时间，并把这一不可避免的请愿转交给新成立的公安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然而中央革命委员会决定加速步伐：6月2日，星期日，它派遣国民自卫军的忠实部队，加上无套裤党分遣队的支持，包围了图伊勒里宫。议员们企图勇敢地冲出宫去，但在他们发现每一个出口都被堵死之后，只好垂头丧气地屈服于暴动者的各种要求之下。29名议员和多数党的两名部长被软禁在住宅里[31]。食物价格问题暂时还没有谈到，但是山岳党已经达到它当前的目的了。

吉伦德党议员被驱除，和巴士底被占领及图伊勒里宫被围攻一样，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军队进行的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不能希望从警察的报告中看到暴动者的面貌[32]；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胜利者和死伤者的名单作为线索。不过，关于各区为了这次事件而特别征召和武装起来的那些队伍的人数和组成的情况，我们从各区和巴黎省公安委员会[33]的通信中得到了一些印象；这些信件是关于因参加民兵以致失掉工作的那些人请求发给补偿费问题的讨论。例如，我们知道31个区送上来的要求发给补偿费的数字为114 291里弗[34]，还有两个区另行申请[35]，在这些区里边，以下各区所召集起来的无套裤党的队伍人数最多：

蒙特娄区	2946人	圣母山区	1438人
盲人收容院区	2039人	崩孔赛耳区	1400人
红十字会区	1458人	伤兵院区	1358人
格拉维叶区	1457人	玻宾库尔区	970人

在总数22 000多名的申请人中，圣安东郊区差不多就占6000名，实际上居于首位，而圣马瑟勒郊区——天文台区的申请者为907名，菲尼斯太勒区为660名——似乎起的作用比较小。但是在这方面无须深究，因为这些统计数字缺陷很大[36]。诚然，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出各区募集的无套裤党人的数目；但我们无法知道他们在全部武装人员中占多大的比例。

我们固然有理由肯定以上列举的数字指的都是无套裤党人——虽然不一定就能肯定他们分别属于哪些分遣队，但我们不能分清哪些是作坊老板，哪些是帮工或工资劳动者，也不能分清哪些是城市贫民，哪些是店主和独立的工匠。不错，在少数情况下，我们看到了这种区别：在新桥区13个申请者名单中，在工匠和店主中间发现了一个烟草工和一个店员；我们看到，在伤兵院区第五连中，有一个农场主（作为一个巴黎人这是很少见的职业！）为他自己和他的两名助手安排了一个轮流服军役的日程表[37]。此外，在团结区所召集的武装力量中，至少也有相当数目的帮工，因为5月31日黎明它曾经决定所有作坊一律停工，并命令“全体工人”分别向他们所属各连报到；不过，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小雇主和普通工人[38]。

然而，亨利·卡尔弗认为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各区武装公民中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39]。他的论点是根据下列假设：要求工作损失赔偿的申请者一定是手头无钱的人，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中央革命委员会

在国民大会中提出这项计划的用意，无疑是每日40苏只发给那些如果不发，参加革命就会给他们带来困难的人[40]；并且，公社在要求各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提出名单的时候，强调只限于确实需要补助的那些人[41]。有些区严格遵守了这项指示[42]，但有些区——由于种种原因——竟没有这样做；我们发现这些区统计的名单中不仅有“贫穷的义勇军”“不太宽裕的公民”或者“每天做工的公民”，而且还有店主和雇主——包括伤兵院区的农场主葛勒，甚至不加区分地开出整连的名单[43]。

在这同时，食品和物价问题仍然存在。5月到6月的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物价的上升与指券价值的盘旋下降和从前一样在继续。6月，指券降低到票面价值的36%，8月又跌到22%[44]。从革命初期以来，熟练帮工的工资可能增加了一倍，可是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却超过了这个数目——在6月和9月之间，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下面的比较数字可以说明：

物品名称	1790 年 6 月	1793 年 6 月	1793 年 9 月
酒（每升）	10 苏	16 苏	20 苏
肉（每磅）	12 苏	19 苏	20 苏
黄油（每磅）	14 苏	$26\frac{1}{2}$苏	35 苏
鸡蛋（25 个）	21 苏	$27\frac{1}{2}$苏	50 苏
食糖（每磅）	24 苏	100 苏	110 苏
咖啡（每磅）	34 苏	80 苏	90～100 苏
牛油蜡烛（每磅）	15 苏	40 苏	44 苏
肥皂（每磅）	12 苏	23～28 苏	70 苏②

② 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的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载《经济史评论》，第 6 卷，第 3 期，1954 年，第 254—257 页。关于面包，自然是供应不足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这张价目表所不能显示出来的是引起群众突然爆发出愤怒的物价陡涨。六月革命刚过一星期，就有对杂货商和肉商再发动一次总攻击的风声。几天以后，面包房门前又排上队；甚至警察局密探也说有必要对富有的店主和批发商的贪得无厌加以制裁：“广大群众才是唯一应该从革命当中获得利益的阶级。”[45]6月25日和28日之间发生了肥皂骚动：这类事件之一是，在25日，圣拉扎尔街的群众截住了一辆载有10箱肥皂的大车，按20苏一磅的价格在街上出售肥皂，警察只有站在一旁看着，无力进行干涉[46]。同一天，雅各·卢代表哥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大会呈递一份请愿书，攻击山岳党不能让穷人吃饱饭，因此在国民大会中被哄下台来。虽然面包缺乏情况在7月间稍稍稳定了一些，但8月和9月又继续发生：这几个月里，在因破坏公共秩序而被捕的各类人中，我们发现有若干由于辱骂国民自卫军或在面包房闹事而被拘押的工资劳动者和小店主[47]。

9月4日和5日的“暴动”接续发生，巴黎公社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将其置于卵翼之下[48]。早晨5点，“暴动”开始于市政厅北边的大教堂区和圣阿瓦区，工人们是从工场和建筑工地被招呼出来的。同时，另一起示威游行似乎发生在陆军部附近的林荫大道，艾贝尔的一个助理——万森的办公处就设在那里。示威者一面高呼着要面包，一面向格累夫广场前进[49]。公社的领导人艾贝尔和硕默特最初想用一套动听的言辞把他们骗走；但在艾贝尔的提议下，大家同意他们可以在第二天上午11点重新集合，到国民大会去，要求对囤积者和政治嫌疑犯采取严厉措施；雅各宾派也答应参加。当天下午，公社命令所有作坊于第二天停工，以便老板们和帮工们都能参加游行示威。但是，假设我们因此就和丹尼尔·古林一样认为9月4日的“暴动”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事情[50]，那我们应当注意到，公社在同一次会议里还下令集合一部分军队来驱散为面包和增加工资而游行示威的建筑工人[51]。

虽然4日最初骚动的主要动因是物价和物资供应问题，可是在5日示

威游行时发表的许多演讲中，它们似乎又一次被轻易地忘掉了。不过却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 各区一星期内只能开会两次，贫穷的无套裤党人每次到会可以领40苏的补助金；要拘捕嫌疑犯；要把拖延已久的“革命军”建立起来，这支军队作为恐怖时期的有力工具，要保证巴黎附近乡村对这个城市充分供应食粮和肉类。但是，当前的问题仍然存在，危机一直没有平静下来[52]。国民大会在试行了并且讨论了各种其他办法之后，终于在群众压力下屈服，于9月29日通过了有名的普遍实行最高限价的法律，限制大批生活必需品以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服役的价格[53]。

因此而产生的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就目前说，店主、师傅和帮工们都热烈欢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最高限价。一个内政部的密探这样写道：“人民都欢迎国民大会关于重要生活必需品限价的法令。”[54]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似乎很顺利，至少在巴黎，这种联盟是共和国第二年建立革命政府的基础。

---

[1] 然而，直到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前，住在由别人供应家具的房屋以及公寓中的工人和其他人似乎还不能参加选举（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3页）。妇女和家庭仆役当然仍然没有选举权。

[2] 弗·布莱希：《1792年8月10日的公社》（*La Commune du* 10 *août* 1792），第267页；汤普逊：《法国革命》，第297—298页。

[3] 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8卷，第395期。

[4] 斯·埃·哈里斯：《指券》（S.E.Harris，*The Assignats* ），1930年哈佛大学版，第102页。

[5] 关于详细记载（主要是根据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参看乔治·鲁德：《1793年2月25、26日的骚动》（“Les Émeutes des 25.26 février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33—57页。

[6]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45—146页。

[7] 不幸的是，这三个区属于在整个骚动时期没有保存下任何审讯记录的30个区之列。但是，从警察局和监狱登记处以及警局督察处的一般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14个区的一些情况。

[8] 参看1793年2月27日巴黎公社给国民大会的报告："骚乱突然猛烈地爆发了；从发生骚乱的中心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蔓延到本市各边缘地区。财产遭到了侵犯。"（国家档案馆文件：C 247，第360号，对开本第36页）。

[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5，对开本第265页。

[1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59，对开本第92—94页；153，对开本第78—81页。

[1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0，对开本第240—241页。

[12] 有证据表明被捕的人数实际上要多得多；但是有关文献（和市政厅以前保管的大量其他资料一样）一定是在1871年大火中焚毁了。

[13] 我们在1775年的粮食骚动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许多小农利用"群众平价"的机会，以只有市价五分之二左右的低价从较富裕的"农户"手中购买便宜麦子。

[14] 《高等法院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 ）（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第59卷，第272—274页。

[15]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39—161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

[17] 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Terreur* ），第1卷，第9页，注1。从此以后，面包价格一直到1795年冬天都不再成为问题（参看后文第十章）。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关于1793年3月1、4、7、18日的报告）。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4月4日，4月5—8日，4月15—16日，5月2—3日，5月14日的报告）。

[20] 《高等法院档案》，第64卷，第56—57页。

[2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3月11—16日和4月16日的报告）。

[23]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33页。

[24]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25卷，第294页。

[25] 《箴言报》（*Moniteur* ）（重印），第16期，第100页。

[26] 关于详尽的叙述（但稍有偏颇）可参看普·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P.Sainte-Claire Deville，*La Commune de l'an* Ⅱ），1946年巴黎版，第42—76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4月到5月的报告）F^{7} 3688^{3}，第2号卷。

[29]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第1卷，第330页。

[3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31] 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341—342页；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77—97页。

[32] 然而警察们当时正在注意带刀或带手枪的妇女，人们怀疑她们当时正埋伏着以伺机袭击毫不疑心的右派议员。人们猜想她们这样做是出于克累勒·拉刚布的“妇女革命会”的鼓励。从两名劳动妇女——一名是5月31日在雅各宾俱乐部附近被捕的，另一名于6月2日在图伊勒里宫外被捕——的审讯上，我们知道这样一些情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90，对开本第562—563页；138，对开本第476页）。

[33] 这是起义以后已经清洗了华尔勒和他的党羽的前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新名称。

[34]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

[35] 崩孔赛耳区的一份个别的通知声称，6月2日该区曾有1400名男子武装起来（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1号卷）；新崩纳区为了供应“武装弟兄”，在6月1日曾从11家面包房征集了490个4磅重面包，6月2日从4家面包房征集了213个（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7，对开本第45页）；该区坚持曾经送上清单，但委员会可能把它弄丢了（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7号卷）。蒙

特娄区关于供应食品给本区“贫穷的义勇队”有更详细的清单：我们发现，他们在6月2 日征集了56个4磅重面包、44.5磅腊肠、30磅乳饼等，共值542里弗8苏（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73，对开本第92—93页）。

[36] 例如，除去没有呈送统计数的15区而外，伟人祠区只送上33个连中20个连的统计，博物院区承认只报告了一部分统计数字（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

[37] 这位农场主安排他自己出勤一次，他的两个工人出勤共4次（同上）。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7，对开本第22页。

[39] 亭·卡尔弗：《各区参加1793年5月31日—6月1日—6月2日运动的情况》（H.Calvet，“La Participation des sections au mouvement du 31 mai-1er -2 juin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5卷（1928年），第366—369页。

[40] “凡是无法牺牲工作日来为共和国服务的工人，每人每天发给40苏津贴”等规定（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16号卷）。

[41] “把所有入伍而需要帮助的人造出名册”（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17，对开本第14页）。

[42] 参考粮食市场区、蒙特娄区和人权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第5号和7号卷；F^{*} 2497，对开本第29页）。

[43] 参考伟人祠区、新桥区和博物院区的统计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20，对开本第52、54页；BB^{3} 80，第7号卷）。后一区的说法是，“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得到津贴，但却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得到一份。”

[44] 哈里斯：《指券》，第166—176页。

[45] 国家档案馆文件：AFⅣ1470（6月7—10日、14日、16—17日、25日、27—29日的报告）。

[4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26，对开本第329—330页。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226—227页。

[4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7（阜尔斯监狱登记簿），第367—375页。

[48]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22页以下。埃·索

罗：《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中的工人》，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卷（1937年），第436—447页。

[49] 这天，在面包房门口曾逮捕了若干人（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39，对开本第134页；139，对开本第96页；208，对开本第143页）。

[50]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D.Guérin，*La Lutte de classes sous la le République* ），1946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130页。

[51]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577—578页。

[52] 参看国民自卫军和警局密探9月份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F^7 3688^3 ，第1号卷；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56—210页。

[53] 《箴言报》（重印），第17卷，第775—776页。

[5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10页。

第九章 热月

1793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参加了公安委员会，这正好是他败亡的前一年。后来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圣鞠斯特和库通当时已经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9月4日到5日的“暴动”之后，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哥德利埃俱乐部两个领袖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1]。这些人形成了共和国第二年革命政府的核心。这个政府在革命最紧要关头这一年，治理着整个国家，抑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供应军队以粮食和装备，挽救了法兰西免于战败和受侵略。即使是最仇视他们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这些功绩。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政府的一般历史，甚至也不是它在共和国第二年热月（7月27日到28日）解体的一般原因——而是侧重于这个政府如何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和无套裤党人如何在它的领导人失败前夕离弃了他们[2]。在此以前，本书一直在探索造成一种革命形势的人和物的因素的发展情况，介绍行动中的革命群众并分析其构成，而现在这样来研究问题自然是和以前采取的研究方法恰好相反，这一点笔者是认识到了的。另外，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是最有关系的人物离弃革命的原因，而不是他们参加革命的原因。我们知道，如果把一小撮身处高位出谋划策的人物除外，那么，与其说罗伯斯庇尔的败亡是由于他的反对者的革命行动，毋宁说是由于他以前同盟者的离弃，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现在这种研究方法也许是正确的。

这样看来，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雅各宾派和无套裤党的联盟怎样逐渐遭到破坏，并反映在热月9日到10日的戏剧性事件中。

首先，政府的力量和行动最初在巴黎“贱民”及其在各俱乐部和各区委员会里的斗士中间获得了信任与支持，这些都是没有疑问的。上文已经提到，仅仅发布最高限价法令就在他们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鼓舞反应。9月29日的法案和11月1日的补充修正法案规定产品的出场价格比1790年6月只能增加三分之一，外加按每3英里计算的运输费，批发商的利润为5%，零售商的利润为10%。这一法案包括39种一般消费物品，但是，木柴、鱼、烟草、盐、牛奶和家禽不在其内。在工资方面，它规定比1790年6月的工资增加50%[3]。1793年6月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1790年以来，以全国而论，主要商品价格上涨一倍乃至两倍；而在同一时期的工资，虽然各地区和各工种有显著的差别，平均大约增加100%到150%[4]。以6月这次调查为基础，现在命令各区按照9月29日法案的规定制订一份物价和工资的最高限度表——当然，这就意味着此项工作一旦完成，现有物价和工资水平将大大降低。

很明显的是，在一个依靠千万小生产者的产品的国家发布这样的法案，并且交给基本上相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和官员们去执行，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是，不论作为一项社会立法它有什么缺点，也不论它带来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的后果，最高全面限价法令的发布无疑是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的，因为它既遏制了通货膨胀，也加强了政府与无套裤党人的联系。就法案本身而论，它对囤积和投机并不见得能起多大限制作用；但是在提出它的同时，采取了一些加强政府职能、保护币制和用恐怖手段强制推行这项法令等的其他措施，这样，它就帮助——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稳定了物价并保证了军粮和民食的充分供应。法案通过后，头三个月内指券价格的突然回升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从1793年8月是票面价格的22%，到11月上升到33%，12月上升到48%[5]。在这些日子中，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是建立在两种希望上：政府的政策会保证公民得到廉价和足够的食物供应，并能够对共和国的敌人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我们在9月30日的一份警察密探报告中读到这样一段：

在当地公社大楼里看到许多工人在吃饭的时候对商品的减价、征兵时青年的热情应召，尤其对于即将到来的共和国的胜利感到十分高兴。[6]

甚至于在12月底——这时肉类、杂货以及蔬菜早就供应不足，由于面包暂时缺乏已经发出食粮配给票——我们还听到市场上的妇女对罗伯斯庇尔、山岳党（圣山岳党）和共和国立法者的热烈称颂。“这些市场女商贩是活泼愉快的，她们在歌颂着国民大会。”[7] 这样的忠心本来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因为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本身第一次成为巴黎行政的中坚：他们的战士控制着多数的区议会和委员会——特别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的大会和执行机关。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发现，共和国第二年，在巴黎担任各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职的454人中，有9.9%为工资劳动者，63.8%为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的工匠，只有

26.3%为租金收入者、制造商、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8]。同样，圣克累勒·德维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职的132名公社委员中，他们的职业是：小制造商、工匠和小商贩82名，体力劳动者2名，中产阶级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时，还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职业者[9]。自然，这并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务员职务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在热月以后是怎样恢复社会平衡的。

同时，政府无力把现在这种形式的最高限价法令付诸实施也越来越明显。甚至在革命委员会和“检查囤积委员”十分警觉并受到舆论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破坏最高限价法。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种植者、生产者和维持首都供应的中间商处在比较容易逃避监察的有利地位，他们发现限价法规定的价格太低，于是就把物资扣留起来，等待良好时机，到“黑市”上出售，或者与零售店或商人进行非法交易。结果是，巴黎杂货商和肉商在进货时已经付出高于限价的价钱，他们必须把这笔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从12月到4月，当肉类实行定量供应时，肉商的售价经常高出合法价格的25%到50%[10]，猪肉商为了逃避限价，专卖熟肉（只有生肉的价格受管制）。成群的商人和投机倒把者潜入僻静的街道和市场，以高于规定的价格出售食糖、黄油和切块的瘦肉[11]。在12月和1月，据内政部的密探报告，巴黎市场上的黄油每磅售价为36～44苏（限价：22苏），鸡蛋每25个为80～100苏（比较一下：1790年6月为21苏，1793年6月为27苏半，9月为50苏）[12]。无套裤党人虽然对于这种使他们受损失的逃避限价深为不满，却认为作恶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和店主，他们坚持要求当局继续有效地利用镇压机构来消弭这种弊端。事实上，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由政府加深恐怖来彻底实施现行的法令，或者设法放松限制和增加利润率以取得农民和生产者更为热心的合作。政府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巴累说，“对于商业应该调剂而不是扼杀”[13]。但是，这便意味着在另一方面要失掉朋友和同盟者。从1793年春天就控制着公社、

鼓吹对住宅实行搜查和进行更严厉的革命裁判的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于3月22日被处死了；此后不久，“革命军”以及地方群众团体和委员会由于搜索囤积者而被解散。自上年12月末起，流通券投机分子就从隐藏的地方开始露头[14]；指券再次回跌：到7月，已经下降为票面价格的36%[15]。最后，3月底，公布了修正的最高限价，规定的价格和利润率都提高了，正如一个警察局密探所说，这似乎“有利于商人而不是有利于人民”[16]。

但是，在此以前，无套裤党已经开始用更直接的形式来表示抗议，并且有时候还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2月20日，在莫培广场群众拥挤的市场上，一个妇女嚷道：“要不是我在克制自己的话，我非打倒新政权不可。”听到的人并没有起来反对。第二天，也是在这个市场里，愤怒的妇女们从一个商人手中夺去黄油，聚集在市场上的其他妇女截住了5辆装着黄油和鸡蛋的大车，强迫赶车人以黄油每磅22苏和鸡蛋每25个24苏的价格出售[17]。艾贝尔及其追随者的审讯和执行死刑，在无套裤党人中引起的并不是愤怒，而是迷惑和冷淡：“杜歇老爹”虽然没有马拉那样受人爱戴，却是群众所熟悉的发泄情感和偏见的喉舌，他的被除掉打断了巴黎公社和群众的联系。人们听到妇女在库提厄酒店问道：“既然我们最信任的人都出卖我们，我们怎么办呢？”一个警局观察员写道：“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在艾贝尔被处决一周后，“在咖啡馆中……过去说话很多的人，现在竟一声也不响了。”[18]

市场上的骚动还在继续着。3月17日，天文台区的妇女们因为不满意一家杂货铺中鸡蛋和黄油的配售而吵闹。19日，市政厅附近一个失业工人被捕，因为他威胁一个杂货商人，并且喊道：“我们有美好的自由，它是专门供有钱的人享受的，并且专和穷人作对。”又过了几天，一个洗衣妇因为在圣保罗街一家肉铺中制造骚乱而被捕，她说她好几天买不到鸡蛋和黄油了。28日，伤兵院区附近“军火工场”的一名军火工人向他的同伴诉苦说，工资固然有了提高，可是生活比以前更苦了：“人

们拿这点工资什么也买不到。”两星期后，阿尔西区的两个军火工人被捕：其中一名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让工人和别人一样地活着”，因而被送进了监狱[19]。一个月之后，圣马瑟勒郊区洗衣妇写给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安利奥将军的威胁信，更能说明人们正在变化的心情。这些洗衣妇以前是雅各宾派的坚强同盟者，现在，在这封信里，她们却对他破口大骂，老实不客气地骂他是“一个胆小鬼”，“一个罗伯斯庇尔的浑蛋跟班”[20]。

在工场作坊中，局势的发展更为严重。在大革命的历史上，这确是不多见的一段时期。这时，工资劳动者对于食品价格的关心远不如对工资额的关心，而更常采取的和更有意义的社会抗议形式是罢工和派遣代表进行工资谈判而不是食物暴动[21]。虽然如此，这并不像丹尼尔·古林一定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标志着劳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2]。这毋宁说是一系列不会再发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高全面限价法规定现行工资水平要和物价同样降低；各地区要自动拟定新的工资标准——只有政府新建立的军火制造工场和有政府的派驻代表（这种代表具有高出于地方当局的无限权力）的地区除外。结果，造成了一套支离破碎、标准相差悬殊的工资制度，最高工资限额的有效或无效随着当局的社会成分，当地无套裤党对于现行工资额的任何降低有无抵抗和政府或政府代表的干涉情况而有所不同。在巴黎，问题仅仅集中在两方面：军火制造工场的工资决定于公安委员会，私营工业的工资决定于公社。政府由于不受雇主和工人互相对抗的压力的阻挠，所以能立即对军火制造工人实行最高工资限额：10月和12月，一些新工场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定为每日5里弗，非熟练工人为3里弗，这就是通常的标准。同时，颁布了一套纪律严明的工场法，所以在12月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三家工场的“闹事者”受到了惩罚[23]。但主要的麻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在后面。

“艾贝尔派”仍然控制着公社，并且，只要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他们

看来就无意按照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制订出一套最高工资标准[24]。这是一个劳动力缺乏和工资上涨的时期；两个政府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在1月里所作的报告中声称工资自179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四倍，这个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大：

一个工人或一个搬运夫，过去每天挣4里弗或5里弗，现在每天能赚到20到24里弗，有时还要多一些[25]。

我们发现烘面包的工人拒绝接受每周15里弗的工资（包括食宿），而在不久以前，他们的工资还只有8里弗；巴黎省直到3月还为建筑工人规定了多于1790年一倍以上的工资标准；即使在军火工场，虽然政府有降低工资的意图，我们仍然能听到工人工资已经涨到1790年的二三倍或四倍[26]。

但是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在3月被消灭了；他们一被肃清，当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来实行对工资加以限制的1793年9月的最高限价法。同时，他们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制止工资的继续增长。4月，烟草工人代表到市政厅请愿，改组后的罗伯斯庇尔派巴黎公社国家代表柏依安援引禁止工人集会的霞白立条例，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了5个人。而别的罢工和工资要求接踵而来，其中包括泥水匠、面包工人、宰猪工人和码头工人等。除了逮捕更多人以外，公社还威胁着要起诉下列人等：

要向那些藐视法律、放弃工作的人提出起诉，因为这些工作是国家存在所必需的，所以他们应该愈加热爱这些工作[27]。

以后一个月是平静的——可能是由于这种威胁生了效，也可能是由于有人企图暗杀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布瓦而使人们暂时不再注意这个问题。但是，6月中运动又开始了，直到热月以后也没有平息。这次是从12月以来一直保持相当安静的军火工人发起的。被认为领导暴乱的人

在许多工场被捕，其中包括为提高工资而在原地闹事的人及离开原来的工场到工资较高和限制条件较少地方去的人[28]。运动似乎扩展到了政府其他雇用部门，因为我们发现巴累以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对被他称为“在生产指券、武器、火药及硝石的工场中有犯罪行为的反革命分子”[29]进行起诉。别的行业的人也参加了进去，在6月和7月，我们看到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和从事于各种官方包工工程的工人都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7月7日，连委员会自身所属的印刷工人也罢了工，结果有3名工人被捕。

当这种骚动还在继续时，巴黎公社于7月23日最后决定公布在首都实行的工资定额。这份贻害无穷的文件无视近日工资或食物价格的增长，死守着原来最高限价法的条文，使大多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大降低，有时要减少现在所挣工资的一半或者更多[30]。

在政治危机如此深刻的时期，这种挑拨性的措施不能保证社会的安宁，也不能把工人们紧密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公社犯了这个轻率的错误之后，似乎了解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预防进一步的骚动。25日，安利奥接到了这样的警告：若干军火工人“无疑已受到人民之敌的诱惑而误入歧途”，离开了他们的工场；热月9日早晨（7月27日），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显然还并不知道在政府委员会里和国民大会的休息室里，新的戏剧已经揭幕，他下令武装部队第二天要阻止住工人们，因为第二天是个休假日[31]。

与此同时，政治危机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刻。自从共和国在弗勒律斯获得胜利（6月26日）之后，国民大会中沉默地坐在“平原”的席位上的占大多数的议员，对于政府表现出不愿再继续给予支持，在他们看来，这个政府的口号仍然是恐怖和束紧腰带，而在两个主要委员会——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内部和彼此之间，政策和人事的冲突也已经公开化[32]。热月9日刚过中午，议员们拒绝听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

上的发言，他和他的主要同伴一起被下令逮捕。消息传遍了首都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个长时间的复杂的争取巴黎各区和无套裤党人忠诚支持的斗争，特别是争取控制巴黎武装部队的斗争。这个部队的大部分在名义上仍然处于公社和总司令安利奥的指挥之下[33]。

公社的形势开始时虽然很有利，但如众所周知，结果却失败了。实际上还是同一支武装部队，率领它的还是同一个司令官，它在1793年6月曾强迫国民大会服从它的意旨；而这一次，在少数部队经过短时间的犹豫之后，它却放弃了公社和雅各宾派的领袖而和他们的敌人联合在一起。虽然我们承认安利奥的手段是拙劣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不愿或者没有能领导群众举行起义来反对国民大会中敌对的多数派，而且，在一系列的错综复杂事件中也有种种幸与不幸，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仍然是：他们失去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支持。

各区的武装人员对于正在作生死斗争的两派向他们提出的重大问题，有一切机会来做出决定。整个下午和晚间，两派向这些武装人员发出互相冲突的命令、威胁和声明，要求他们效忠：到底他们应该站在“被压迫的爱国派”一边呢，还是应该反对和放弃这些爱国派，让他们被人们判定命运，最后被合法组成的国民大会宣布他们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呢？公社方面最初是占上风的：留在首都的30个炮兵连（他们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中的17个连服从了开到格累夫广场列队示威的命令；其中有来自圣安东郊区的2个连，来自市场区的2个连，来自左岸的红帽区和卢森堡区的2个连。此外，还有十几个区派来了火枪营和梭镖营，里边有圣马瑟勒郊区的伟人祠区派来的1200人的有力部队。某一个时候，市政厅外面有3000多武装人员列队待命。但是他们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当各区委员会和议会正在进行辩论时，整个这一部分部队主要是闲在那里没有人管，因此便渐渐散去了。热月10日凌晨一时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的最后一批武装支持者，来自菲尼斯太勒区的200人，也不声不响地开回圣马瑟勒郊区去了。[34]

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从各区的民政当局得到响应。传统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西部各区——图伊勒里区、香榭丽舍区、共和（鲁列）区、罗浮区、革命区（新桥区），甚至于皮克区（罗伯斯庇尔自己那一区）——很快宣布它们站在国民大会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一开始就支持国民大会的各区中也同样包括像盲人收容院、团结和公社大楼这样激进的各区。圣克累勒·德维厄曾对当天各区议会和委员会的行动和倾向作过详细的研究，他发现只有不足五分之一（连半心半意的也在内）的首都民政当局表示愿意（但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社的一边；这里边包括12个革命委员会，其中菲尼斯太勒区的革命委员会表现了最热烈的响应。最后——也是最确凿的证明——有39个区通宵开会进行辩论和接受报告。其中35个区断然宣布拥护国民大会； 另外两个区——无套裤区（安利奥的区）和菲尼斯太勒区——最初是犹豫，后来也合在了一起；只有两个区——圣马瑟勒郊区的天文台区和沙利尔（克吕尼）区——明确表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派，不过，在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因此在天明之前，也就向多数投降了[35]。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大部分是在事后写成的——这时候热月的胜利者已经坐稳了雕鞍。因此，赞成公社的少数人的意见就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在这些报告当中还可以找到个别并不那么容易动摇的忠诚的无套裤党人的意见。例如，我们看到，四国区有一个公民，在充满敌意的阻挠声中坚持安利奥的一封信应该当众宣读，不应该被当作“叛变的公社”送来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旁人挑战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坚强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朗布里纳，住在墓园街，格腊索的伙计（帮工）。”[36]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查理·约利，他是再团结区（博堡区）的一个糊墙纸工人和班长，当他听到一个卖报妇女叫嚷着安利奥被捕的新闻时，把她手上的报纸撕碎了；他作为公社的共谋犯而被捕，直到12月才被释出狱[37]。但是这不过是些个别的例子；形势一经开始变化，罗伯斯庇尔那一天的声援者就仅仅成了微弱无力的少数人，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反雅各宾的反动的汹涌浪潮中。

尤为明显的是工资劳动者所抱的特别敌对的态度，他们已经为罗伯斯庇尔派公社最近宣布的最高工资限额所激怒。工人们大概还不知道刚刚公开爆发的政治斗争，所以那天下午4点聚集在格累夫广场举行抗议大会：这一举动一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附近5个区的民政委员会的议事录上都记载了这件事。这种举动也一定使看到的人有些莫名其妙，因为示威者聚拢到广场去的时候，差不多正是首批武装队伍响应公社号召开始在广场上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报告对于这次工人集会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很正确地说它是“对最高工资限额的反抗”，有的说工人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甚至有人说罗伯斯庇尔已经被示威者杀死[38]。公社虽然正在操心别的事情，但对于工人们的这次抗议很重视，并且没有企图用武力来驱散他们而给自己招致更多的不满。当晚8时，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在告公民书中，公开地把事情推到罗伯斯庇尔的主要敌人之一巴累的身上，说他应当负削减工资的责任：

“这个反复无常依次参加各派的巴累，规定工人每日的工资，意欲使工人饥饿而死。”[39]

但这种做法已经为时过晚，对于事变的进程不能有任何影响。工人们对于这种辩解不是仍抱敌意，就是无动于衷。那天傍晚，据目睹者报告，安利奥将军为被捕的议员们寻求同盟者，向二三十名铺路工人讲话，要求他们放下工作，因为他们的“保护人”和“父亲”正处在危险中。“工人们听了一会”，报告结尾说，“喊了几声共和国万岁，又做起他们的工作来了。”[40]另外有些人表示出了更明显的敌意。两天以后，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经被处决，并轮到公社委员们被解赴刑场时，据说工人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样喊道：“打倒最高工资定额！”[41]从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构成巴黎无套裤党最大一部分的工资劳动者似乎相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除掉，将意味着可恨的最高工资限额的结束，而且为提高工资扫清了道路[4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其后果却既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预

料的。

---

[1] “大”公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巴累、卡诺、罗培·林德、让彭·圣丹得累、科多尔的普里欧和马恩的普里欧。

[2] 关于整个问题的最近、最详细和最有根据的研究，请参阅亚·索布尔的著作：《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43]。

[3] 黑·埃·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H.E.Bourne，“Maximum Prices in France，1793—1794”），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23期（1917年），第107—113页；并参看同一作者：《法国革命时期的食物管制和限价》（“Food Control and Price-fixing in Révolutionary France”），载《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27期（1919年），第73—94、188—209页。

[4] 《1793年6月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12} 1547^{c}，第2号卷。报告只包括48个省的统计材料，涉及38种消费品的价格和约15种行业的工资，日工的工资也在其内（巴黎除外）。

[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6]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241页。关于同样的说法可参看第168、197页。

[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4页。

[8] 亚·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探讨》（Une Discussion，“historique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载《思想》（*La Pensée*），第65期（1956年），第28—29页。

[9]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361—379页。由48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市政委员会）中，有25名小制造商和商贩、4名薪金工作者、4名商人和商业经营者，还有12名属于自由职业者。

[10]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178、229，251、299、330页；第3卷，第30页；第4卷，第11页。

[11] 鲍恩：《1793年至1794年的法国最高限价》，第206—207页（根据警局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的报告）。

[12]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1卷，第344页；第2卷，第20、26—

27、102、185、251、310页。

[13] 《箴言报》（重印），第19期，第631页。

[14]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61、194、281页。

[15] 哈里斯：《指券》，第176—18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F^{1c} 111塞纳13（1794年3月29日的报告）。

[17] 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4卷，第237、263—264页。

[18]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157、173、193页。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98，对开本第260页；139，对开本第410页；70，对开本第418、439—441页。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60页。更多的例证可在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中找到：Aa 94（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139（忠诚区=市政厅区），201（伟人祠区），240（大教堂区）。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7页。

[21] 参阅上文第24—27页。

[22] 德·古林：《共和国第一年的阶级斗争》，第2卷，第155页。

[23] 参阅阿·奥拉尔：《公安委员会文献》（A.Aulard，*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 é de Salut public* ），1889年至1923年巴黎版，26卷本，第6卷，第486页；第9卷，第322、400、515、696、751页。克·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C.Richara，*Le Comit é de Salut public et les fabrications de guerre sous la Terreur* ），1922年巴黎版，第699—709页。

[24] 参看乔·鲁德和亚·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rnidor”），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第1—22页。

[25] 这份报告接着说：“他们（指日工）做一点轻活就要索取100苏，而一年以前，这点活计最多只值10苏”（转引自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86—587页）。再参看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第2卷，第7页。

[26] 莫·马里昂：《革命时期的最高限价法和对工资的限制》（M.Marion，“Les Lois de maximum et la taxation des salaires sous la

Révolution"）， 载《国际社会学评论》（*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ociologie*），第25期，1917年，第487页。马里昂夸大了雅各宾派不愿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程度。

[27]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0—12页；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91页。

[28] 利夏：《公安委员会和恐怖时期的军火制造》，第709—727页。

[29] 《箴言报》（重印），第20期，第699页。

[30] 例如，原来挣8里弗的木匠要降低为3里弗15苏，军火工场里高工资的铁匠或装配工人的工资将要从16里弗10苏降低为5里弗5苏（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16—17页）。

[31]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8册，对开本第38页；AF^{11} 48，第374册，对开本第10页。

[32] 参看阿·奥尔丹：《公安委员会的警务处》（A.Ording，*Le Bureau de police du Comit é de Salut public*），1930年奥斯陆版；亚·马迪厄：《关于罗伯斯庇尔》（*Autour de Robespierre*）（1926年巴黎版），第149页以下；关于巴黎各区及无套裤党人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可参看亚·索布尔：《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入》，第917页以下。

[33] 关于热月9日到10日事件的确实记载，可参看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189—314页。

[34]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01—214页。

[35] 圣克累勒·德维厄：《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第273—278页。

[3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242页。

[37]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3，对开本第293页。还有关于皮埃尔·罗斯的一段混乱的记载。他是武装人区（马莱）的军火工人，他因为向街坊们报告了那天晚上他在格累夫广场上听到的一个消息而被关闭起来。那个消息说，凡是公开宣布罗伯斯庇尔等人已经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将为公社所逮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56，对开本第2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AF^{11} 47，第365册，对开本第8、28页；第366册，对开本第1、6、34、50页。奇怪的是，圣克累勒·德维厄竟没有提到这件事。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432，第1册，对开本第40页。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第9册，对开本第4页。

[41]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thermidorienne*），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第1卷，第11页。

[42] 后来，据伦巴底区一个毛刷制造者报告，他的工人欢迎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处死，并且说："最高工资限额这一下子完蛋了！"并且很快提出了增加工资33%的要求〔罗·科伯：《伦巴底区毛刷工人的一次"大联合"》（R.Cobb."Une 'Coalition' des garcons brossiers de la section des Lombards"），《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67—70页〕。

[43]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

第十章 芽月—牧月

共和国第三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到4日（1795年4月1日和5月20日到23日）的群众暴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人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把他们的意志加在统治者身上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努力。牧月失败之后，直到19世纪初期革命卷土重来以前，他们就再也没有起任何实际作用。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标志着山岳党和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想在国民大会和巴黎各区中恢复他们的政治优势的最后挣扎；这一次，虽然他们对于群众运动（这次运动首先起因于对于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提出抗议）给了一些政治指导，但是他们懦怯和没有自信的干预注定了

这次运动的失败。要了解这次运动的规模和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794年秋天热月党人的政策和这种政策在无套裤党人中间引起的不满[1]。

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很快拆散了雅各宾派所建立的政府机构，并恢复了比较自由的经济制度以符合国民大会中新多数派的愿望和利益。8月24日公布法令，成立了16个委员会，执行以前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工作，治安委员会虽然继续存在，它的权力和独立性却大为削弱：尤其重要的是武装部队（包括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由这些委员会管辖，而被置于特别成立的对国民大会负责的军事委员会之下。地方政府也同样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旧的各区监察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曾经是雅各宾专政的主要支柱，这时都被整个废除或者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在各省，只有区级的这种组织还存在。在巴黎，公社被取消，48个区的革命委员会合并成为12个行政区委员会，凡是雅各宾派的斗士都被排除，在其中占优势的社会成分不再是小店主和工匠，而是商人、公务员或从事专门职业的人[2]。各区的民政委员会同样也被清洗，并归国民大会直接控制，由国民大会立法委员会遴选的人员组成。在这一过程中又经历了一次社会变化，在新出现的各委员会中，共和国第二年的无套裤党人和雅各宾派让位于1793年6月以前曾经控制各区的真正有产者和“温和派”[3]。在区议会里，由于取消40苏的津贴，无套裤党人的势力被进一步地彻底削弱，此外，议会只能每10天开会一次[4]。

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与此相适应的。虽然战争在继续进行，物资缺乏，政府对于支持它的人——城乡大生产者、商人和造船业者，那些“从战争中大捞一把的铁青面孔的人”——负有解除它的前任所实行的经济控制的义务。第一步是在10月修改了最高限价法，准许物价比1790年6月上升三分之二；12月23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最高限价：4磅重的配给面包仍然保持12苏的售价——但却准许在自由市场上出售另外的面包；每5天半磅肉的基本配给仍然保持着，但新价格是每磅21苏；其他物品的价目可以自由上涨到自然水平。于是，这样引起的通货膨胀反

映在指券价值的逐步下跌上：从7月的36%，下降为10月的28%、11月的24%、12月的20%、2月的17%，1795年5月跌到只有票面价值的7.5% [5] 。

虽然巴黎和各省的大城市——那里已经完全取消了物价管制，公民们忍受着半饥饿的痛苦 [6] ——比起来，是一个特别受优待的地区，但由于实行新政策，首都的平民遭受了长时期的极大困难。这里现在紧挨着仍受管制的限制市场，发展起来一个自由市场，这个市场上不仅出售不实行配给的货物——鸡蛋、黄油、食糖、木柴、油脂和蔬菜等，而且同样出售肉类和面包。随着全面限价法的废除和穷人预定购买的每一项物品的日益缺乏，巴黎“贱民”不仅必须以高得惊人的市价购买面包和肉类以外的物品，而且由于政府说的话不兑现，不能按规定价格充分供应面包和肉类 [7] ，而不得不拿出他们收入的更大部分去自由市场上购买这两种东西。这样，自1791年秋季以来，面包价格就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它的重要性可以从下列事实判明： 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从1795年3月28日的25苏上涨到4月11日的65苏，4月21日涨到6里弗，5月11日再涨到9里弗，一星期后——牧月1日事件爆发的前两天——涨到16里弗 [8] 。同时，自由市场上的肉价从12月的36苏涨到4月1日的7里弗10苏 [9] 。以1790年6月为基数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795年1月的500上升为4月的900 [10] 。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资情况，我们知道的比较少。最初，热月党人想通过废除巴黎公社倒台前夕颁布的工资等级表把工资劳动者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他们确曾于8月9日公布了修正的最高工资限额，规定比那不幸的7月23日的最高工资限额增加约二分之一 [11] 。但是这种增加很快就被政府故意实行助长通货膨胀和恢复自由竞争市场的政策所抵消。从可以得到的有限证明资料上看来，巴黎工人1795年4月的实际工资远比1793年至1794年的工资要低，大概曾经降低到1789年最初几个月的悲惨水平 [12] 。

但是早在这时以前，甚至于在12月废除最高限价法以前，巴黎一般民众已经开始对政府政策流露出敌意，虽然起初只是表现为冷淡和愤懑。内政部的一名密探于11月末对当时人们的情绪作过如下描写：

人们不断听到诉苦和埋怨：配给面包的迟迟得不到，面粉的缺乏，市场和广场上面包、木柴、酒类、煤、蔬菜和马铃薯的价格的昂贵。这些物品的价格每天惊人地高涨，这一切把人们投入一种可想而知的悲惨和绝望的境地。[13]

第一次和当局发生公开冲突的是军火工人，这些工人自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一直是比较安静的。11月17日到18日，两个工场的代表团请求国民大会考虑他们提高工资的要求，过了几天，接着来的是伟人祠区工场的350名工人，他们强迫他们的经理领着他们游行到图伊勒里宫。其他工场纷纷效尤。国民大会对于这种似乎是普遍工资运动的复活感到震惊，于是命令所属两个主要委员会提出适当对策。最后的决定是：从1月20日起，政府的军火工场全部停办。工人们面临着隆冬失业的前景，产生了强烈反应，在举行一系列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有许多骚乱领袖被捕）之后，终于说服当局允许展延几个星期，1795年2月8日工场停办[14]。但是12月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工资运动的事。一旦人们感觉到了通货膨胀的全部影响，工资劳动者就和其余的无套裤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抗议各种消费品价格的狂涨。粮食暴动再一次替代罢工被提到了日程上。

事实上，12月末的废除最高限价法已经给群众运动点了一把火，这一运动除去短时间的平静外，一直持续到初夏。12月27日的一份警察报告发出了社会日益不安的警告：“贫困阶级使和平的市民对于物价过分高涨的后果感到不安。”从最高限价法废除以来，到1月初许多物价已经增长一倍。工人们聚集在图伊勒里宫，威胁要用暴力对付商人和店主：“至于商人，他们都是些应该宰掉的肥猪。”有人喊出保王派的宣

传："共和国，去他妈的吧！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有钱的人才什么都不缺少。"谣传圣安东郊区准备要再一次进军国民大会，这次是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甚至有人提出应当用武力解散国民大会[15]。

但是，使这一运动始终存在下去的原因不只是生活费用的高涨，这里面也夹杂着政治斗争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迫害1793年至1794年"爱国派"，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40苏的津贴，捣毁马拉半身像，鼓励投机者、发战争财者和中等阶级青年（也就是"纨绔子弟"，他们的飞扬跋扈特别引起了无套裤党人的愤怒和仇视）；另一方面是由勒布瓦主编的《人民之友》和一些俱乐部与社团继续进行雅各宾派的宣传。这些俱乐部和社团设法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格拉维叶区残存下来——其中最出名的是天文台区的共和道德社和韦尔布瓦街俱乐部，后者被说成是大部分由"受教养不多，很容易走上歧途的工人"组成的。这种宣传有时也反映在警察报告中，例如，11月末，当新崩纳区的人列队到国民大会去祝贺议员们决定封闭雅各宾俱乐部时，所遇到的奚落和讥笑的喊嚷是："看哪，这些就是到国民大会去的新崩纳区的小花花公子。"再一个例子是：一个军火工人因为于2月9日在图伊勒里宫制造骚乱被捕，他在批评国民大会不该停办工场时，攻击议员在人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中饱私囊，并且不该毁坏马拉的纪念像；而各区到国民大会来表示赞成这些措施的请愿者则被骂作："阴谋者、大腹贾、乱党、一群穷光蛋、穿女人衣服的人。"这种阶级仇恨的气氛——使我们想起了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大屠杀前夕笼罩着首都的同样气氛——由于国民大会的反动措施而进一步加深。其余的俱乐部都遭到封闭，有些地方领袖——其中有巴贝夫——被逮捕。更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向治安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更好地利用弗累隆领导的反雅各宾青年组织"青年团"来和"反政府派"的活动相抗衡的建议。

它（委员会）既然没有任何镇压的手段，没有任何完全可靠的武装力量，使用这一种对抗力量就更有必要了[16]。

正如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项建议并没有落空。

在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达到高潮的起义运动，就是以此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引起运动爆发的新因素是配给面包的日益缺乏，这种情况在1月里已经开始被感觉到，3月末达到了近于饥荒的程度。关于起义爆发前两周情况的警察报告，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幅愤怒和失望情绪日益高涨的图画，这些情况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3月16日 格拉维叶区妇女集会。

3月17日 圣雅各区和圣马瑟勒区的代表团向国民大会请愿："我们缺少面包，我们正在后悔我们为革命所作出的一切牺牲。"

3月18日 一名在蒙塔纳（罗亚尔宫）区被捕的饭店侍者诉苦说，"看到法国人每天面包配给量减少到只有一磅，吃只有猪才应该吃的马铃薯，这是多么可怕"。

3月21日 国民大会接见了圣安东郊区的代表团；工人们和"纨绔子弟"在圣丹尼门动起武来。

3月22日 格拉维叶区和武装人区（马莱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两名绅士在平等宫（罗亚尔宫）受到工人的侮辱；一名制纸工人在新桥被捕，因为他喊嚷"有钱的人都是坏蛋"。

3月23日 有一些"青年人"冒险到圣安东郊区和工人们握手言欢，兵工场妇女们威胁着要把这些"青年人"扔下河去。

3月24日 蒙特娄区有4个人因为想"鼓动这一郊区闹事"被捕；没有面包分配给人权区、不可分割区、市场区和伦巴底区。

3月25日 一个圣马丁街的珠宝匠被捕，因为他威胁国民大会并且诉

苦说：“靠半磅面包过活真不容易。”

3月26日 圣马丁街的妇女们斥责男人们是“胆小鬼”，因为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面粉工场的女工们试图组织起来到国民大会去示威。

3月27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广泛发生面包骚动，男女工人们到国民大会去示威，对只有半磅面包的配给表示不满，有几个人被逮捕；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举行非法区议会。

3月28日 格拉维叶区和大教堂区继续发生骚动；国民自卫军把到国民大会去示威的人驱散，并在歌剧院附近逮捕8人。

3月29日 一个母亲因为怕挨饿而把他的三个孩子杀死了两个。

3月30日 人权区和北郊区有面包骚动。

3月31日 人权区非法区议会向国民大会呈递了一份请愿书： 工人为要求更多的面包罢工； 4个区向国民大会请愿：盲人收容院区的代表团提醒国会议员们说，必要时的暴动是神圣的义务，并且要求对被囚禁的“爱国派”公平处理，要求采取减轻饥饿的措施，并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17]。

第二天（芽月12日）提出来的要求比这些更为广泛。一清早就组织起集会和游行示威。有些区的面包配给完全停顿；其他各区，每人只分到4两或8两。人权区的妇女在面包房里动起武来。圣母山街建筑工人开会，抗议3月31日的法令——这项法令规定，凡是住在有家具设备的住房里的人不得按限价购买面包[18]；附近工场的工人们应邀一起参加对国民大会表示抗议的示威游行。圣马瑟勒郊区和圣雅各郊区联合到图伊勒里宫去示威；传说格拉维叶区和其他13个区相约采取同样的行动。当国民大会主席波亚西·唐格拉斯正在演说时，起事各区的男女群众冲进会场，高喊“面包、面包”；有些人的帽子上戴着起事者的标语，“面包

和1793年的宪法”。但是示威者缺乏领袖，也没有确定的行动计划：老城区的发言人要求实行1793年的宪法，而其他两个区的发言人却因为作了温和的讲演而受到国民大会多数的称赞。当热月党领导者之一默兰·德·迪昂维尔在西郊各区效忠的国民自卫军和“青年们”（为了对付这种形势，他们事先就已经聚集在罗浮区）的簇拥中出现时，侵入者没有作任何抵抗就解散了。山岳党的议员们在这些活动中不仅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他们之中的两个议员还首先提议闹事的人们要赶快把事情交代清楚，有秩序地退出议会大厅[19]。

这一天和第二天，首都各地区还发生了不少小骚动。有些区——玻宾库尔区、老城区和伟人祠区——连续举行会议；格拉维叶区的炮手队（“绝大部分由工人组成”）说要向香榭丽舍区进军，将“爱国派”从狱中释放。但是国民大会采取了恢复秩序和防止重新发生暴动的严厉的措施。巴黎宣布戒严，它的武装部队被置于正规陆军军官庇什格律将军的最高统率之下；社会契约区、格拉维叶区、阿尔西区和圣母山区的地方领袖们被捕；12名议员（包括勒奥纳尔·布尔敦、亚马尔、坎蓬——全是热月中罗伯斯庇尔的反对者）也被捕；热月政变的3名领袖——巴累、俾约·瓦楞和科洛·德布瓦，这时被斥为恐怖主义者并被判处流放[20]。

当局在应对食品危机方面并没有尽心尽力。4月2日，国民大会发布法令，规定面包配给不足的地方，应以大米和饼干补充，分配的时候“工人、工匠和穷人”有优先权。但是，这自然解决不了更大的供应问题，配给面包依然继续缺乏。我们看到，4月和5月的配给仍然是每人2两、4两或6两，外加少量大米。此外，据报道乞丐越来越多，街上有人饿得奄奄一息，时常有人自杀[21]。保王派宣传又复活了：“我们（有些人这样说）大家再稍许忍耐一下，15天之内我们就会有一个国王；那时我们就有面包吃了。”但是，一般人都抱着绝望和听天由命的心情，虽然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战斗精神。

可是，无论政府怎样炫耀武力，企图威慑“贱民”，在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又爆发了群众运动。4月4日，在市场上又听到了熟悉的诉苦声音；9日，一个瓷器画工在圣丹尼门被捕，因为他在一大群人面前激烈攻击国民大会，抱怨面包供应不足和质量太差。第二天，有人大呼：“打倒军队！我们不要士兵，因为没有面包了。”听到这种喊声，大约有500名妇女在自由帽区（红十字区）聚集起来。4月17日，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的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20日，新桥区一个家庭仆役被捕，他的罪名是说这样的话：“8个月以前我们有面包吃，现在我们没有面包了，我们简直和奴隶一样。”第二天，兵工场区有两个工匠因为发表煽动性言论被捕，其中的一个为他的行为辩解说，他认为这是为了面包的缘故。

警察局在下一个月里发表的舆论公报里几乎天天报道类似的事件[22]。此外，我们有时还发现一种较有组织的运动再度开始形成的迹象。例如，4月29日蒙特娄区宣布它已召开旨在讨论食物供应问题的长期会议，并号召其他各区召开同样的会议；植物园区企图也这样做，由于为首的一些人被捕，在刚一酝酿时就被镇压下去了。5月12日，建筑工人威胁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就要举行罢工；一个警探忧虑地说，不可能把咒骂政府的人全数逮捕，“因为那就要拘捕半数以上的巴黎居民”。第二天，若干中心区——博物院区、伦巴底区、市场区——的示威者依次到每一家面包房，劝说妇女们拒绝接受她们的面包配给。16日，当配给减少到每人2两时，警探说由恐怖分子煽动的群众暴动眼看就要爆发；18日，谣传说，如果不增加配给面包，圣安东郊区就要在牧月1日（5月20日）再度起事，并邀请巴黎其余各区采取同样行动。第二天，一般人都谈到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伤兵院区的工人（据警察报告）准备和圣安东郊区工人联合起来。人权区和盲人收容院区举行非法议会，在那里，人们认为“必须举行一次群众性武装游行，向国民大会要求面包或者死亡”。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一份匿名的宣言散发到市中心和郊区各处，宣言的标题是“人民为得到面包和恢复他们的权利

而起义”[23]。这就是号召人们武装起来进行一次最突出的和最顽强的群众革命反抗。

牧月1日清晨，圣安东郊区和植物园区的警钟敲响了。像1789年10月一样，这一次又是妇女带头，并让她们的男人们随着她们一起行动。在北郊区（圣丹尼郊区），她们在早晨7点把男人从工场中叫出来。在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和人权区都有食物骚动和妇女们在面包房里集合。在图伊勒里区，成群结伙的妇女强迫面包房前排队的家庭主妇们和她们一起到国民大会去。在河左岸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植物园区和菲尼斯太勒区（那天早晨，这些地方每人只配给2两面包），妇女们闯入民政委员会的会场，要求委员们领着她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忠诚区（市政厅区），妇女们抓住一面鼓敲起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让我们向国民大会进军！”在附近的兵工场区，一个声名狼藉的商人评论道：“制定法律不是女人家的事。”在圣安东郊区，妇女们强迫商店关了门并在下午1点半开始向图伊勒里宫进发， 男人们带着武器结队跟在后面，“其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帽子上缀着这类字样：面包或死亡”。据一个目睹者说，她们在行进时，强迫商店里、私人住宅里和乘车的妇女们加入她们的行列。2点她们到达了图伊勒里宫前的卡罗瑟勒广场。她们的帽子上和罩衫上缀着起义的两个口号“面包和1793年的宪法”。她们这样装备着闯进了议会大厅，但是很快被驱逐出来。1小时之后，她们带着成群的国民自卫军武装部队重新返回。

同时，圣安东郊区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男人们很快武装起来，准备跟随妇女们到图伊勒里宫去。在圣马瑟勒郊区和中央各区开始了类似的行动。有些地方，少数起义者强行打开武器库，把武器分配给同伴，强迫他们的指挥者带领他们到国民大会去。在其他地区，“维持秩序派”占了上风，但也进军国民大会，以响应那天晌午政府发出的普遍拿起武器的号召。所以，那天下午3点半，跟随在示威妇女们后边于卡罗瑟勒广场上集合的是一支起义者和自谓国民大会保卫者的杂乱队伍

[24]。

很快便发生了图伊勒里宫第二次被侵入的事件。议员费罗反对人们进入会场，当时就被打倒，他的头被割下来挂在枪尖上示众。这一次，妇女们得到了起义各区武装公民的充分支持，虽然只有很少几个营全部闯进会场，可是示威者的众多人数和鲜明耀眼的武器，足以把多数议员压服得安静下来，并鼓励山岳党的少数残余议员提出他们的主要要求——释放雅各宾派犯人，采取步骤实行1793年的宪法，进行新的管制以保证食品的充分供应。这些要求很快就被表决通过了，并且成立了一个负责执行的特别委员会。可是起义者和芽月时一样，缺乏领导和任何明确的纲领或行动计划。他们在达到了直接目的之后，用好几个钟头来发表空论和进行讲演。这就使热月党领袖们有时间号召效忠的各区前来支持——为首的是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博物院区（罗浮区）和累珀累提尔区——起义者终于被从图伊勒里宫赶了出来[25]。

武装起义第二天还在继续。从凌晨两点起，盲人收容院区就响起了武装起来的号召。10点以前，忠诚区（市政厅区）和人权区敲起了警钟。这两个区和阿尔西、格拉维叶以及玻宾库尔区，都组织了非法议会。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迅速地拿起了武器，向国民大会进军，领头的是一个西印度人，叫吉洛梅·德洛默，他是一个车匠兼玻宾库尔区的炮手长。他们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的支持下，于下午3点半出现在卡罗瑟勒广场，装好枪炮，瞄准了国民大会。指挥政府军队的杜布瓦将军手下有4万人，起义军可能有2万人。这是自革命以来在巴黎列阵备战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武装对垒。但是并没有放枪；当国民大会方面的炮手和宪兵们投向起义者时，起义军没有抓住有利时机有所作为。薄暮，双方开始谈判；请愿者在议会厅中受到接待，重述了他们的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会主席对他们表示欢迎。起义者陶醉于空虚的幻想，希望政府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分别退回各区[26]。

但是国民大会却决心要结束这种事情。牧月3日早晨，政府除“青年团”和西部各区的队伍之外还召集了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把圣安东郊区包围在政府势力之内。“青年团”向这个郊区发动了一次过早的突击，结果被迫退回，圣安东郊区的工人们从警察手里抢救下来一个杀害费罗的正被解往刑场的人。但是，政府在这一天夜里平定了其他大部分起义区的抵抗，4日，要求圣安东郊区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和所掌握的全部武器：如果拒绝，政府将宣布该区处于叛变状态，并将号召所有各区联合起来用武力对它进行征服，或者以饥饿围困使它投降。同时，默努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也准备向起义者进攻。

起义者大势已去；但其他各区也有试图对他们加以援救的。在普瓦松尼区，有一个补鞋匠埃田纳·舍夫松，他是一个“革命军”老战士，因为企图组织奥特维尔街和财政部街的建筑工人去援救圣安东郊区而在之后被捕；在阿尔西区，人们听到妇女在街上喊：“必须援救我们圣安东郊区的弟兄们，打倒那些代表，对商人和花花公子们不要讲任何客气。”在菲尼斯太勒区，甚至在斗争失败以后，仍然有人喊“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在圣马瑟勒郊区和市中心，也有其他各区答应声援。我们在当天下午5点半警察局发出的关于当时形势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起事者的）大炮在以前的圣安东门对准全城架了起来，郊区大街充满了武装着长矛和不多几支老式毛瑟枪的市民队伍；在夏隆讷、尼古拉、蒙特娄和特拉韦尔西勒等街上没有武装哨兵，但是老百姓似乎决心不让他们自己被解除武装。妇女们聚集在每一条街上，发出很大喧嚷。面包是他们起事的物质原因；但是，1793年的宪法是起事的灵魂；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似乎伟人祠区、无套裤党区（植物园区）、菲尼斯太勒区、老城区、格拉维叶区还有朱利昂温泉区的大部分，都声明支持他们[27]。

但是，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援助；圣安东郊区在几小时后，未放一枪就投降了。运动完全被镇压了下去。两天后，一个警探记录说：

“据今天的报告，巴黎情况昨天是最平静的一天……男人们都面面相觑，妇女们也沉默无言。”

这一次是彻底的和无情的镇压。它不仅打击了起义的首领，或者是被认为的首领，而且也打击了将来可能成为同样起义首领的人：为了一劳永逸地除掉无套裤党，使它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政府认为有必要打击国民大会中各区议会和国民自卫军中的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有12名议员被逮捕，其中有6名曾经在牧月1日支持示威者的要求。 5月23日（牧月4日），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对于所有因携带武器或佩戴起义标志而被捕的人进行简单审讯和执行死刑。委员会工作了10个星期，审讯了132人；其中有19人（包括6名山岳党议员 [28] ）被判处死刑。各区被邀于5月24日举行特别会议，痛斥所有“恐怖”嫌疑者和雅各宾派同情者，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结果是大批人被剥夺人权，在这里面，清算旧账和考验政治上是否纯正起了同样的作用。据《法兰西报》统计，截至28日，已经有一万名受到这种惩处的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的最后总数一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因为，在好几个区里，所有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所有“革命军”的士兵，不论他们在芽月和牧月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都一律被捕或被解除武装。这样树立起来的先例在督政府和执政府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地为人们所仿效 [29] 。

当局对于已经发生的危机拿不出其他解决办法，所以他们自然愿意把芽月和牧月的暴动说成是反对政府的雅各宾派、以前的恐怖分子和被解散的群众团体与俱乐部成员阴谋叛变所造成的结果。一份牧月1日的警察报告非常简单明确地表明了官方的观点：

我们认为食品的缺乏只是一个被骚动者用来迷惑轻信者的借口，这个借口只是太巧妙了。长期以来发生群众运动的真正原因 是以前那

一派政治领袖们的煽动，他们不仅唆使人民起来要求面包，而且要求恢复公社和1793年的宪法，要求从狱中释放所有山岳党议员和前革命委员会的委员[30]。

在上述运动中，政治动机和雅各宾派的煽动当然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看到，在芽月12日以前的几个月中，少数几个残存的群众社团对运动给了某种政治指导，否则它一定会成为盲目的对于物价上涨和食物缺乏的愤怒的发泄；这些从芽月起义者喊出来的政治口号——释放爱国者和恢复1793年宪法——上看得很清楚。在牧月里，我们也看到在郊区和市中心有些区采取了组织非法议会并宣布长期开会的纯政治性的行动。更为有意义的是起义者提出了“面包”和“1793年宪法”这两个口号。警察局把第二个口号看作“运动的灵魂”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运动就会缺乏团结力量，甚至在开始时缺乏一种自觉的政治方向。但是，如果说在这两次事件中国民大会里的少数山岳党议员起了很大作用，这便是错误的：在芽月，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只是急于劝告示威者尽快退出议会大厅；在牧月，他们不过是跟在起义各区的后边和响应妇女与武装的无套裤党人向他们提出来的要求而已。

归根结底，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而不是政治煽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运动的所有阶段，从1794年12月最初开始时起，经常不断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物资缺乏和食品价格上涨问题——特别是配给面包的缺乏和自由市场上面包的突然增多。这主要是政府既定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种政策就是在战争和物资缺乏时期匆忙地把整个经济从管制中解放出来；不过自然因素，如1795年冬天从来没有过的严寒，也使情况更为恶化。起义者心里所想的主要是面包和黄油问题，从妇女们在芽月和牧月里所起的突出作用（仅次于她们在1789年10月所起的作用）上可以得到确切的说明。

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多数骚动者都是平民聚居的各大郊

区、市场附近各区和市中心各区的男女群众。在因为直接参加牧月1日与2日事件而被捕的几百人中[31]，有168人的职业在我们所参考的文件中有记载。这里面约有45～50人似乎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店主、作坊老板、工匠和小职员。他们来自不下于40个区——其中最主要的是玻宾库尔区（13人被捕）、兵工场区（12人）、盲人收容院区（10人）和阿尔西区（10人）[32]。

但是，比较少数的被捕者的档案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各区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的情况极为有限。从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一幅更为完整的图画。从这些事件看来，主要参加在芽月12日达到高潮那一运动的各区是盲人收容院区和玻宾库尔区（圣安东郊区），天文台区和伟人祠区（圣马瑟勒郊区），老城区、人权区、祖国之友区和格拉维叶区（中心区）以及大教堂区和圣母山区（北区）。在牧月，有更多的区参加——有的整个参加，有的仅仅一部分。领导这个运动的仍是圣安东郊区的3个区和圣马瑟勒郊区的5个区中的4个（只有天文台区除外）。他们受到市中心各区——阿尔西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区）、老城区、伦巴底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粮食市场区——的密切支持；也得到了（虽然不是全心全意的）北部的普瓦松尼区和北郊区以及南部的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和伤兵院区的支持；甚至还有来自西部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的妇女队伍的支持。但是，一般说来，西部各区形成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的坚强保卫者。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葡月（1795年10月），它们在某种程度起了与此相反的作用。

那么，既然有这些可靠的支柱，为什么巴黎无套裤党人还会在1795年5月失败呢？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是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行动计划；一部分是由于山岳党议员的软弱；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没有抓住有利时机；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相应地有比较高明的手腕和丰富的经验，并且能从——即使没有正

规军的积极干涉——“青年团”、商人、公务员和西部各区的有钱阶级取得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牧月，无套裤党人没有能像他们在1789年至1793年各次伟大起事中所做的一样，至少与资产阶级的激进一派取得和保持真正的联合。当在这一点上犹疑不定和失败时，他们的运动就会像1775年一样，尽管范围广泛和富有战斗精神，也终将成为没有希望取得政治成果的于事无补的暴动[33]。

---

[1] 关于这些事件的一般叙述，可参看亚·马迪厄：《热月的反动》（*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1929年巴黎版，第186—209、236—258页；乔治·勒菲富尔：《热月党人》（*Les Thermidoriens*），1937年巴黎版，第111—139页。关于更详细的研究参看埃·塔尔累：《芽月和牧月》（E.Tarlé，*Jerminal i prerial*），1951年莫斯科版，1953年柏林德文版；克·德·汤纳逊：《无套裤党人的失败：共和国第三年巴黎的群众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反动》（K.D.Tönnesson，*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mouvement populaire et réaction bourgeoise* à *Paris en l'an* III）（1959年，奥斯陆大学博士论文）。本章特别依据的是罗·科伯和乔治·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R.Cobb and G.Rudé，“Le Dernier mouvement popula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Paris：les journées de germinal et de praral an III”），载《历史评论》，1955年10月至12月，第250—281页。后者广泛地引用了这一时期最丰富的资料——警察局档案，包括奥拉尔主编的“社会舆论”公报（《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1—756页）、治安委员会的文件〔国家档案馆文件：F^7（字母顺序）（警察总局）〕和巴黎各区警务委员会的审讯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

[2] 布路瓦苏：《巴黎行政区监察委员会》（M.Bouloiseau.*Les Comités de surveillance des' arrondissements parisiens*），1930年巴黎版，第88页。

[3] 大英博物馆文件：F^* 61，第11，20，21，27号（印刷名单）。

[4]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4—110页。

[5] 哈里斯：《指券》，第186页。

[6] 哈里斯：《指券》，第99页。

[7] 肉类配给常常完全不兑现（哈里斯：《指券》，第107页）；面包配给，在1795年3月规定为每人一磅到一磅半（《箴言报》，第23期，第700页），3月到5月中降为每人8两、6两、4两，甚至于2两（奥拉尔：《热月反动

时期的巴黎》，第1卷各处）。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10、654、675、715、729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41、629页。

[10] 哈里斯：《指券》，第107—108页。

[11] 鲁德和索布尔：《巴黎的最高工资和热月9日》，第20—23页。

[12] 关于以上两段，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物价、工资和群众运动》，第6卷，第3期，第261—264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4} （作者自法文译成英文）。

[14] 关于上述经过，主要参看：《国民大会的会议记录》（*Procés-verbaux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第47卷，第132页；第49卷，第244—263页；第50卷，第89—90、115页；第51卷，第155—157页；第54卷，第266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43、357—358、367、369—370、377、380页。

[16]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7—259页。

[17] 参阅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59—262页。

[18] 警察局认为这项法令是芽月12日工人们不满的主要原因（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27、630页）。

[19]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6页。

[20]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01—208页。

[2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660、714—715、719、721、724、728页。

[22] 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367—370页。

[23] 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梗概（其中出现了牧月1日到4日暴动者的所有口号

和政治要求），可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3—244页。

[24] 马迪厄的叙述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并没有把这件事弄清楚（《热月的反动》，第244—245页）。至少有两个起义的营——格拉维叶区和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卢森堡区）——根本没有在图伊勒里宫出现（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

[25]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45—253页。

[26] 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4—255页；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23—124页。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43，第3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8] 他们是罗姆、杜格诺瓦、戈戎、步尔波特、杜罗瓦、苏布朗尼。关于前三个人戏剧性的自杀，参看马迪厄：《热月的反动》，第256—257页。

[29] 关于这一时期有计划地镇压雅各宾和无套裤党干部的情况，可参看罗·克·科伯：《1795年至1801年对无套裤党人进行镇压的记录》（“Note sur la ré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à 1801”），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4期，1954年1月至3月，第23—49页。

[3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3页（重点是作者加的）。添加的一项要求——恢复共和国第二年的公社，无疑是警察局的故意罗织：在芽月或牧月的起义者所提出的口号和政治纲领中，找不到这种要求的一丝痕迹。

[31] 不要把这些人和牧月5日以后数目大得多的各区被捕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相混（参阅本书第156页）。

[32] 格拉维叶区有7人被捕，崩迪区7人、伦巴底区6人、粮食市场区6人。更使人惊奇的是——图伊勒里区和博物院区各有6人。

[33] 关于无套裤党人在牧月以后最终失败的原因的看法，可参考科伯和鲁德：《巴黎革命的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80—281页。

第十一章 葡月

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历史虽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终，但并不代表它们是革命群众以武装叛变或街头示威向政府当局挑战的最后一次。构成最后一个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所以，即使闹事者的出身与目的以及导致这次暴动的各项事件的类型和前几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书对此也不能略去不谈。这次暴动并非企图推动革命朝着更彻底的方向前进或者建立或加强共和国，它的最后目的是摧毁共和国和为王政复辟开辟道路。暴动的倡导者不是民主派、雅各宾派或无套裤党人，而是盘踞在首都西部各区的最顽固的金融集团

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最热心地站在热月党人一边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义中曾经是国民大会的主要捍卫者。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套裤党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们虽然在牧月被镇压了下去，但仍然是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他们虽然面对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给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们自己不能开展一个独立运动，但他们宁可联合起来支持（诚然有些消极）政府当局来反对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国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点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关系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这些事件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议会即使没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会集团或舆论团体的积极支持，也仍然可以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全国。在热月，国民大会能够依靠巴黎多数区——包括那些无套裤党仍然有巩固阵地的各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谢的中立来推翻罗伯斯庇尔。在牧月，为了战胜无套裤党人和活跃的雅各宾派残余，国民大会能够号召“可尊敬的”西部各区的武装公民予以援助。在葡月，国民大会已经消灭了雅各宾派干部，镇压住了无套裤党人，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们赶出了各区议会和委员会，因此，当它处在正好是西部各区要发生暴乱的境地时，除了依靠军队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此例一开，再也不容易消除；从1795年10月起，军事政变已经作为政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而隐约地在地平线上出现。

引起葡月暴动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三分之二”法令），该项法令提请为新选举而召集的预选议会同意上届国民议会的议员中有三分之二仍然连任议会代表。这样明目张胆地企图延长一个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这个团体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机会把巴黎多数各区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大会，并为接着发生的武装叛乱取得有力的支持。大体说来，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但是，完全用

这些政治术语来介绍这幅图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开始叙述9月中旬——当时正在开始形成对于“三分之二”法令的反对——的各种政治事件以前，我们准备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有关各方面的影响[3]。

尽管零星消费者的惨况在春季和夏季已经十分明显，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它们的经济政策，战争的扩大和自然因素的继续不利，不断使经济政策的恶果趋于严重。指券在实际作废以前，在10月更进一步下跌到票面价格的5%[4]。规定按每磅3苏的价格配给面包（名义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旧公然不兑现：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们看到每人只分到2、4、6、7或8两；而且人们常对面包商超过规定价格售货表示不满[5]。8月里，情况有些好转：一般都达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里，又常听到人们抱怨面粉质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给量又减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同时，在“自由”市场中，面包仍然卖15～20里弗一磅[7]。肉类按照21苏的规定价格往往买不到，在“自由”市场中，肉价从6、7月的每磅8里弗涨到9月底的15里弗[8]。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上涨：黄油从7月的16～18里弗一磅涨到9月的30里弗；食糖从1月的11里弗涨到9月的62里弗；鸡蛋从7月的每打9里弗涨到9月的12里弗；马铃薯从5月的34里弗一蒲式耳涨到10月的56里弗；牛油蜡烛从1月的5里弗涨到6月的30里弗和8月的50里弗；煤从6月的75里弗一伏阿涨到10月的175里弗；木柴从5月的160里弗涨到9月底的500里弗[9]。

生活费用这样继续上升对工资劳动者和其他收入微薄或固定的人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工人们为了要求更多的面包而在8月罢工，他们聚集在圣马丁门，提出这样一个应当问的问题：“我们用每天挣的12法郎怎么能买15里弗一磅的面包呢？”[10]一切小有产者在这种情形下的惨况，在7月16日一个密探的报告中得到了确切概括的说明：

“工人的工资按他每天必需的生活费来说是太低了；不幸的租金收入者为了生活不得不卖掉他的最后一件家具，使贪得无厌的投机者发一笔横财；产业主别无生路，只能连收入带本金一起吃光；完全靠薪金生活的公务员也在忍受着穷困的煎熬。”[11]

事实上很多观察家都认为，租金收入者和小业主所遭受到的这种痛苦，比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还要大一些[12]。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像累珀累提尔、布特·代·莫兰（罗亚尔宫）和万多姆广场这些西部各区——这些区里很多人都是这种社会成分——早在“三分之二”法令引起政治危机以前，就对国民大会表示极端仇视[13]。但是从这些地区当然不会产生出有效的行动来结束它们所抱怨的经济情况，因为所说的这些区同样也是投机者和股票经营者的主要巢穴，他们利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大发其财，而政府的政策是有利于他们的活动的[14]。

在无套裤党这方面，他们以其独特的形式做出了反应。像在牧月以前的几个月一样，有些人流于悲观失望而只关心目前的面包和生活问题。

“（一个观察家在7月写道）公众似乎只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生活需要……政治问题已经从咖啡馆里绝迹了。”

“政府并不怎么重要”（一个公民说），“只要我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

在8月，据另一个观察家报告：“公众……既不注意法律，也不注意宪法；他们只注意自己所要求的面包。”[15]不过，另外有些人反应很强烈：在6月和7月，我们听到群众在罗亚尔宫为工人们抢夺在自由市场上出售面包的商人的存货而欢呼助威；而且人们认为，只要面包继续缺乏，圣日瓦教堂就应当停止在圣餐仪式上送面包的习惯[16]。有些人开

始惋惜旧制度，痛斥共和国，把希望放在王政的复辟上。7月，有人听到圣安东郊区的公民说，他们才不在乎敌人是不是进入巴黎呢，“因为我们反正不能拦住物价上涨，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都是一样。”还有一个观察家写道，“下层”群众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赞成有一个国王，但是，只要君主制能给他们面包，他们似乎也并不反对。据说，某些公共场所在8月里流传着这样的口头禅：“国王或者面包”；一个密探写道，“和旧制度比起来……共和国并没有增加声誉”[17]。不过，至少在无套裤党人中间，这种心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在葡月事件之前已经不存在了。

雅各宾派煽动的复活而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持久的。8月，有人要求重新控制物价和必需品供应：“（一个观察家写道）公众似乎期望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有一个合理的限价。”[18]同一月稍后一点，有人报告说很多人惋惜罗伯斯庇尔的时代：“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人们的日子要好过得多，那时候人们并不觉得这样的穷困。”9月8日，一个士兵在罗亚尔宫说，“如果不实行恐怖”，事情会继续坏下去。两星期后，有人听到一个妇女在圣马丁门说，她很惋惜断头台时期，她希望那个断头台永久存在。到月底，由于有些区释放了前恐怖党人，以及保王派在其他一些区里大肆煽动，人们又在图伊勒里宫花园和圣丹尼门、圣马丁门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区公开地宣扬雅各宾派的主张了[19]。

同时，虽然牧月暴动失败了，但仍有人谈到将有一个新的无套裤党人起义。

〔一个观察家在6月底写道〕在排队或集会中，人们谈论着，大家认为工人是安静的，因为他们的武装已被解除，不过，他们懂得使用和大革命开始时同样的方法来取得面包。

一星期之后，监察官布伊龙把正在发生的群众议论和牧月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作了一个比较。8月20日，人们看到，“聚集在马丁门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第二天，一般的骚动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们相信他

们准备在最近就举行起义”[20]。但是，这时政府和各区之间已开始发生政治冲突，我们要看一看这对于无套裤党人的骚动将有什么影响。

在6月里已经召集了预选议会（在巴黎，相当于各区的区议会）。召集这个议会的目的是通过新起草的宪法并推举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推举定于秋季召开的新的革命议会的议员。这时保王派的煽动日益猖獗，并且正在巴黎、各省城镇和乡村赢得一些徒众[21]；毫无疑问，为了保卫共和政体不至于被保王派的反动搞垮，同样也是为了延续它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解散的国民大会的多数派于8月22日和30日公布了有名的“三分之二”的法令。法令要求预选议会同意500名新议会的议员一半由国民大会的现有议员中选出，只有其余的250名议员由选举人自由选举。国民大会预料到将有不利的反应，因此，在同一天开始调动正规军进入首都；并且为了缓和舆论的不满，通过9月2日的法令，允许以前的恐怖党人参加预选议会[22]。

收到这些提议的巴黎各区从热月以后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接连不断的清洗已经把所有的雅各宾派不仅从西部各区而且同样从郊区与市中心区的委员会和每星期开会的区议会里驱逐出去。当各区召开普选议会投票表决宪法的时候，大约有12个区——包括阿尔西区、人权区、格拉维叶区、植物园区、伦巴底区和朱利昂温泉区等这样一些最近起义的区在内——特别把所有前雅各宾派排除于审议之外[23]；在6月，植物园区曾经宣布逮捕不下于38名所谓“9月2日和3日的屠杀者”[24]。不受欢迎的社会成分受到同样认真的清洗：从牧月以来，国民自卫军中的工人和工匠不是被批准免予服务，就是被特别排除于军职之外；9月，据一个观察家记载，“出席各区议会的工人寥寥可数”[25]。事实上，区议会已经日渐贴近热月以来为统治集团所喜爱的“有产者共和国”，9月24日的《法兰西报》确切地说明了它们的社会哲学：

在所有文明社会中，只有有产者是组成社会的成员。其余的都是无

产者，他们属于广大的市民阶级，正在等待时机，以便取得一笔财产[26]。

这类公民在接受共和国第三年的宪法草案前是不会有长时间的犹豫的。这部宪法和1793年的宪法最显著的差别是：它重新采用了间接选举制度，并且甚至在预选阶段就只限于纳税人才有选举权，而在选举国民大会代表阶段则只限于殷实的有产者才有选举权。事实上，到9月6日，所有各区都以大多数通过接受了这部宪法[27]。至于对待“三分之二”的法令就与此完全不同了。在激烈辩论和对国民大会及其各委员会进行了猛烈的反攻之后，国民议会最后宣布投票结果，人们发现巴黎不下于47个区否决了这项法令——唯一的例外是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以433票对139票通过了这项法令[28]。

不仅是8月22日和30日法令本身引起了各区的政治反抗，选派军队进入首都以及允许前恐怖党人（仅仅在几个月以前各区当局才费尽心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和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参加议会和他们的政敌一起投票的决定，也引起了进一步的敌意。正是这些为首都主要保守集团所深恶痛绝的因素的结合，给了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以可乘之机，他们想以巴黎普选议会作基础建立一个反对中心，并把许多人罗致在内。如果保王派公开宣布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些人一定会表示拒绝。

保王派骚乱的主要核心在累珀累提尔区，这是一个“富户住宅区”和金融及股票投机的中心。在革命早期的一些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区的领导人和军事单位倾向于保王派和温和派。这一区的掷弹兵曾经在1792年8月反对马赛人和保卫王室；在热月事件中，这一区曾热心支持国民大会反对罗伯斯庇尔；在1795年2月曾首先捣毁马拉半身像[29]，并且曾经带头以武力反对芽月和牧月的起义者。一开始，他们在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找到了同盟者[30]，不久又在其他各区找到了一些。9月初，累珀累提尔区在各区中率先反抗；但是它最初想在由48个

区组成的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暴动中心的企图却遭到了失败[31]。在随后一周中，叛乱各区中发生了剧烈骚动，这期间有人向团结区议会报告说，5000名恐怖党人已经到达首都，并且已经在圣安东郊区散发了100万里弗[32]——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保王派的宣传资料；9月16日，累珀累提尔区努力争取到30个区的对于巴黎公民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支持（“明确表示和全体一致地”）[33]。同时，布特·代·莫兰区单独给国民大会一份建议书，重新提出从1793年吉伦德党和山岳党之争以来再没有听到过的要求，认为巴黎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和地理形势，“应该有主动选举立法和执行机构的权限。”[34]

9月23日（葡月1日），国民议会宣布预选议会投票结果：全国各地都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宪法，8月22日和30日的法令也同样被通过，但是反对者也不在少数[35]。预选议会受命于10月2日以前结束工作；复选议会须于12日召集，并将于11月6日召开新的立法议会。这些决定揭开了一幕新的冲突。有几个巴黎预选议会声明：这些选举结果是假造的，并且准备对解散的命令置之不理[36]。同时，在一些区里和保王派站在一起的“青年团”[37]开始侵犯公民并在罗亚尔宫与军队发生冲突。有一次，他们竟高呼：“打倒三分之二法令！”“国王万岁！”“打倒国民大会！”“打倒步兵队！”[38]另一方面，雅各宾派或国民大会的支持者也公开地谴责各区的“保王派暴徒首领”。9月25日夜间，在球场区和累珀累提尔区有三个这样的批评者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并且被带到布特·代·莫兰区的警务委员那里，因为他们曾经说预选议会是由“强盗”组成的，并且曾公然表示支持国民大会：

等到明天敲起战鼓和发出征兵令的时候，如果对他们非法发出征兵令，他们就将束手无策；到那时候，他们就要到国民大会来啦[39]。

各区的骚乱在继续着。骚动者企图使盲人收容院区和其他区议会联合在一起，好几个代表团到这个区来，劝他们取消对“三分之二”法令的

支持；但盲人收容院区在几经踌躇之后仍然拒绝了。玻宾库尔区虽然反对这项法令，但9月28日却拒绝了累珀累提尔区的邀请，没有指派委员（1793年8月10日和5月31日的影子！）“参加起草声明”[40]。然而，第二天，累珀累提尔区却交给了国民议会一项声明，这个声明虽然并没有得到它意欲代表的巴黎多数各区的直接支持，但却有23个区的签名，其中包括没有签署9月16日致全国预选议会书的布特·代·莫兰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友爱区和球场区[41]；这是对国民大会权力的直接挑战，因为两天以前，它曾禁止各区议会审议有关选举以外的问题[42]。政府为阻止巴黎各区和首都附近各行政区采取联合行动所采取的措施[43]招来了更加严重的威胁：10月2日，累珀累提尔区和法国剧院区邀请首都其他预选会的选举人第二天在武装保护下到法国剧院区的大会堂（现在的奥地昂剧院附近）开会。20个区接受了邀请，但是只有15个区出席。那天晚上，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法国剧院区和市中心的4个区宣布它们对国民大会处于“反抗状态”[44]。不久以后，暴动就发生了。

然而，除去各区很少数的“体面绅士”或有产者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步骤是有意识的进攻行为， 更没有认识到这是有意识地企图削弱和推翻共和国，而只认为这是反对国民议会的一种自卫措施，因为它的法令破坏了主权在民的神圣原则，并且正在企图用武力和成批地释放可怕的恐怖党人或嗜血鬼来强制推行这项法令。在他们看来“有产者的共和国”正在遭到破坏和威胁，这种破坏和威胁并不是来自叛变各区而是来自国民大会本身。政府为自卫而采取的每项措施和无套裤党人的日益不听支配，帮助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状态，这在许多方面使人回想起巴黎资产阶级在1789年夏季从防御到进攻的态度。政府面对着各区的威胁，不仅召集了更多的武装部队，并且还特别招募和武装了1500名义勇队，其中包括许多在牧月后被解除武装的人[45]。同时，由于物价的进一步上升，在市场和郊区再次发生威胁巨商和囤积者的事件，人们都在担心会像1793年2月那样发生到处抢掠或进攻食品商店的事[46]。

但是无套裤党人和工人们非但没有为了向国民大会算账而和各区的叛变者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共同保卫共和国反而更靠近了国民议会，并斥责各区分裂者为保王派和大腹贾。下列9月和10月初的警察报告的摘录说明了这一点：

9月10日，“工人们在各区集合起来，声明拥护国民大会，并且把对于一切反对果月5日及13日（8月22日及30日）法令的人的逮捕归罪于保王派和各区首领。”

10月1日，“反对各区、反对商人和囤积者的运动……极为活跃。”

10月2日，“由一部分手工业者组成的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的群众全部倾向于国民大会，如果不是由于商品、木材和煤炭的昂贵使他们感到苦恼，他们的意见会表达得更为明确。”

10月4日，“工人们在许多市区中集合起来，尽管他们对物价昂贵表示不满，但他们仍然说，虽然保王派领导各区，他们却支持国民大会。”[47]

在香榭丽舍区，当地消防工人比此更进一步：他们把会场锁起来不让区里的分裂派开会，并且警告选举人说，如果选举人参加反叛者，“他们就要给以教训”[48]。

同一天（葡月12日），各区大都为保护似乎受到来自这方面或那方面威胁的财产而武装起来。在一些区里，公民们带着武器去参加预选会，并且公开向国民大会挑战；在其他区里，他们做了准备但没有任何进攻意图，或者由于意见分歧大而不能采取任何行动[49]；还有一些区的情况是：他们在本区选举人的逼迫下，不得不勉强武装起来，或者是相信了匪徒和囚犯逃脱的谣言而武装起来。在市场区，谣传恐怖党人要解除巴黎的武装，砍掉居民的脑袋。在球场区，武装公民在“打倒恐怖

党人”的口号声中列队行进。当比塞特勒监狱中的在押犯逃出的谣言散播开的时候，群众纷纷在卢森堡区和团结区的交界处德布西十字路集合起来。在法国剧院区，武装的区分裂派看守着监狱；在团结区，公民受命在亚培广场举行武装游行，“因为政府委员会今天武装了所有的嗜血鬼、恐怖党人和恶徒” [50] 。只有在累珀累提尔区，公开宣布了保王派的目的：在小圣托玛街（现在的布塞）的区司令部外边，号召过往行人拿起武器，“和国民大会及恐怖党人作战，除非有一个国王，我们才能有好日子过” [51] 。

当晚，政府命令指挥巴黎军队的默努将军的队伍进攻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并逮捕其领袖。默努将军实际是一个保王派，所以和叛乱分子进行谈判，并允许他们各回各家。同一天晚上，布特·代·莫兰区、球场区和图伊勒里区在“打倒恐怖党！”“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中集合起来支持累珀累提尔区；继之而起的是布鲁特斯区、祖国之友区和法国剧院区。这时，一个公然在君主派指导之下的参谋本部出现了，保王派记者里塞尔·瑟里西担任主席，法国剧院区的唐尼康将军担任总司令 [52] 。控制商业桥要冲的阿尔西区在第二天早晨9点钟宣布它站在骚乱者一边 [53] ，于是河两岸两个叛变的主要中心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到这时各区叛乱者大约已有25 000人武装起来，但是大多数都是处于防御状态，等候并不存在的嗜血鬼进行攻击；其中只有7000至8000人——大半来自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附近各区——参加了不久以后对图伊勒里宫的武装进攻 [54] 。

与此同时，政府已经组织了防御工作。默努被逮捕。巴拉受命代之为巴黎军队总指挥，正规军数目为5000名，此外还有几百名义勇军，包括盲人收容院区派来的250人在内 [55] 。这时在公众中还默默无闻的波拿巴将军被指定率领炮兵队；他派谬拉带领300人到撒布龙运来40尊大炮，把图伊勒里宫变成了一座要塞，并把每一条通路都把守起来 [56] 。当叛乱者离开防守坚固的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大本营由北向

南推进时，遇到了摧毁一切的炮火——波拿巴有名的“镇压民众运动的密集射击”。连接圣端诺累街和图伊勒里宫的国民大会大街（现在的多飞街）上发生了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57]。6点钟，叛乱者被击退，但仍然占据着圣洛赫教堂、共和国剧院（法国喜剧院）和罗亚尔宫；后两个地方在天黑后不久就陷落了。在人权区，阜尔斯监狱发生骚动，在押犯人害怕——也不无理由——9月“大屠杀”的重演[58]。

在这场事变中，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事件是10月6日（葡月14日）早晨进行的圣洛赫之战[59]。夜间，在累珀累提尔区、法国剧院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准备战斗的号召又响起来；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是反应是不太热烈的。圣洛赫很快地被瓦肖将军攻克；不久以后，巴拉便占领了累珀累提尔区的司令部。第二天，委员会下令将叛变的累珀累提尔区的巴黎国民自卫军掷弹兵及射击手和所有公民一律解除武装，现在这个区几乎遭到了普遍的谴责，认为它是“保王派、股票投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巢穴”[60]。所有区级预选议会都再次被命令停止工作，并分别成立三个军事法庭审讯那些未及逃脱的“这次叛变的主要制造者和煽动者”——这些法庭在法国剧院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开庭。10月9日（葡月17日），警察局又用熟悉的和安心的口吻报告说：“巴黎呈现出一片特别安静的景象”，然而他们也觉得不能不加上一句：“不过，仍然有些人为物价高涨而不满并口出怨言。”[61]

政府镇压了叛乱以后，渴望它和曾经反对过它的各区之间不至于产生太深的裂痕。因此，决定把叛变的群众看成是被引入歧途的无罪羔羊，而仅仅对少数“煽动者”——新闻记者、有名的保王派和各区议会的议长、秘书等采取镇压的措施。即使这些人，大多数也让他们逃跑了，因为关卡并没有封锁：仅仅在剧院区，警察准备于两星期内逮捕或传讯的15个人中，就有12个人逃脱[62]。在委员会逮捕的或者想要逮捕的约200人中[63]，只有30名在设于叛变中心区的三个军事法庭上受到审讯（本人或到案或缺席）。在这些人中，有2名执行了死刑（还有5名被缺

席判处死刑），8名宣告无罪，其余被判罚款或监禁。一年之后，那些受到缺席裁判的人的判决作为大赦的一部分被撤销了[64]。总而言之，葡月的叛变者比牧月起义者受到了远为宽大的对待——这一事实没有逃开公众的注意和批评[65]。

但是，这两次事变除去目的完全不同而外，其参加者当然也有很大差别。当局意在于葡月的死伤者中找出多数的国外流亡者和死硬的保王派。“（巴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受伤者当中主要是国外流亡者，系绿领结或黑领结的人，很少有商店主……”[66]10月12日的报纸报道中谈到许多尸体穿着粗劣的外衣，里面却包着精致的饰以百合花国徽的内衣[67]。但是，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力求把骚乱者说成是一小撮保王派的意图过于明显了，因此使群众很难相信这种报道。这种分子可能存在于参加叛乱的“青年团”中间；但是，他们和骚动者队伍中喝醉了酒的工人（警察局侦察员的一份报告曾经谈到，葡月12日累珀累提尔区召集的武装公民中有喝醉了酒的工人[68]）一样，都不能代表全体骚乱者。更有代表性的积极分子至少是叛变被镇压后政府逮捕的或想要逮捕的那几百人。各区那些住宅和文件被警察搜查的人主要是（就能够鉴别其身份者而言）记者、印刷商、公务员、议员和股票投机者，他们里面还有一个是酒商。受军事法庭审讯的那些人，除了他们在原来各区的公职以外，都是职业军人、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此外还有一个前王室官员、一个杂货批发商和一个商店助手（他们里面唯一的无套裤党人）[69]。毫无疑问，在累珀累提尔区、布特·代·莫兰区、布鲁特斯区、法国剧院区、阿尔西区、卢森堡区和其他积极参加葡月13日叛变的各区的武装公民的队伍中还有其他社会成分；但是，除去为此目的而特别招募的人以外[70]，他们一定主要是由首都的纳税人、店主和有产者构成的，唯有他们逃脱了自热月以来进行的社会清洗。这些公民曾经称赞过对巴士底的围攻，曾经支持或是不反对推翻王室；但是在巴黎革命的年代里，他们自己在革命群众中成为主要分子或者在巷战中一马当先，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可是，虽然无套裤党在这些事件中起的作用很小，他们像热月以来常有的情形一样，仍然是主要的牺牲者。不错，国民大会为迎合群众心理起见，曾于10月6日发布法令，规定所有负担得起的人要放弃自己的面包配给而到自由市场上去买[71]；但这项措施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物价依然高昂，物资继续缺乏，随着冬日的逼近，这种情况更趋严重。11月，面包在自由市场上的价格涨到24里弗1磅，煤300里弗1伏阿[72]。20日，在崩孔赛耳区，群众强迫一名商人按10里弗1磅出售他的面包[73]。但是，面对着看来没有什么解决希望的日益严重的困难，一般人都抱着悲观绝望的心情。

“（当时的一个观察家写道）匮乏已经到达极点。巴黎街头呈现出一片妇女和儿童因缺乏营养而奄奄待毙的凄惨景象，医院和救济院不久将容纳不下大批的病人和不幸者。穷困和饥饿几乎使他们完全无话可说；有时偶然说出话来，也是对政府的喃喃诅咒。”[74]

这幅图画使人们想起警察局刚好在一年以前描绘出来的景象。和那时一样，在以后几个月里，生活更为困苦：12月，1磅面包涨到45和50里弗，1796年5月涨到80里弗； 肉价到1月涨到75里弗，3月涨到97里弗[75]。但是，这时，雅各宾派的余众哑然无声，无套裤党的武装战士灰心丧气、东零西散，或被监禁或被解除了武装，再也看不到1795年春天的战斗精神了。巴黎市民也适当地受到了葡月以后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分子的威胁和控制： 国民大会召入首都的军队，在督政府时期一直驻扎在巴黎[76]，为波拿巴的军事独裁铺平了道路。“革命群众”——不论是由无套裤党还是由意见不同的资产阶级组成的——的时代在以后许多年内不复存在。

---

[1] 诚然，热月事件在某种程度已经不属于这种类型，但是那种区别还不像葡月事件这样明显。

[2] 关于这次暴动及其政治背景的最详尽的叙述，可参看黑·济维：《共和

国第四年葡月13日》（H.Zivy，*Le Treize vendémiaire*，*an* Ⅳ），1898年巴黎版。虽然作者充分利用了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的往来信件、区议会的议事录、希米特编纂的警察报告（《法国革命年表》）和葡月15日成立的审讯被捕暴徒领袖的军事法庭的记录，但因他的著作问世太早而未能利用奥拉尔编纂的更完全的警察报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

[3] 为此而引用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75页；第2卷，第1—319页（1795年5月29日到10月14日）。

[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26页。

[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0、767页；第2卷，第8、34、48、108、120、138、145页。

[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02、151、181、186—189、199、208、210、213、277页。

[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6页；第2卷，第36、139页。

[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34、113页。

[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368、376、750页；第2卷，第3、8、36、61、113、191、271、291、327页。一伏阿相当于56立方英尺。

[1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2页。

[1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86、50页。

[1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7页；第2卷，第48—49页。

[13] 累珀累提尔区、万多姆广场区、布特·代·莫兰区在5月到7月中都感到食物缺乏并发出了怨言，甚至于谈到“最近再来一次暴动把那些代表和商人都赶进坟墓”。关于这方面的例证，可参看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55、767页；第2卷，第48、60、65、108页。

[14] 参看10月5日（葡月13日）的一份报告：“所有投机商人都是从这两个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布特·代·莫兰区。——作者注）的中心来的，他们在平等宫做最卑鄙的交易，既危害国家利益也危害私人利益。”（《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0页）

[15]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53、65、177页。

[1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2、43—44、67页。

[1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70、77—78、161页。

[1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08页（并可参看143页）。

[1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82、233、254、276页。

[2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7、65、182、184页。

[21] 勒菲富尔：《热月党人》，第173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4、77—78、161、182—183页。

[2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187、218页。

[23] 其余各区是万多姆广场区、崩孔赛耳区、西区（红帽区）、累珀累提尔区、布鲁特斯区和布特·代·莫兰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3页）。

[2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9页。

[2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8页；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27页。

[2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67—268页。

[27]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4—25页。

[2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04—265页（各处）。

[29]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467页。关于1789年至1794年整个时期累珀累提尔区始终存在着反革命阴谋的情况和它的社会基础，可参看阿·德·勒斯塔皮：《关于海军上将的阴谋》（A.de Lestapis，“Autour de l’attentat d’Admiral”），载《法国革命史年鉴》，1957年，第6—18、106—120页。

[30] 回想起来，崩孔赛耳区的一个无套裤党人敏锐的政治眼光是值得注意的，这个人在牧月4日鼓动人们武装支援圣安东郊区时就曾说过，“我们要打倒……布特·代·莫兰区，累珀累提尔区的贵族和花花公子以及其他该死的坏蛋”（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662，第2号卷）。预选议会讨论新宪法后，投赞成君主制的少数票在下列各区的记录是：团结区（6）、布特·代·莫兰区（6）、老

城区（5）（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5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页）。

[3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29页。

[3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卷，第236页。

[33]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1 459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1—32页。这些区是：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崩孔赛耳区、崩迪区、新崩纳区、布鲁特斯区、香榭丽舍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粮食市场区、武装人区、不可分割区、植物园区、累珀累提尔区、卢森堡区、市场区、白山区、天文台区、西区（红帽区）、万多姆广场区、普瓦松尼区、新桥区、再团结区、大教堂区、法国剧院区、图伊勒里区和团结区等。

[3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46页。

[35] 表决结果是：赞成宪法的有914 853票，反对的有41 892票；赞成“三分之二”法令的有167 758票，反对的有95 373票（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5页）。

[36] 这些议会包括祖国之友区、兵工场区、老城区、人权区、格雷讷累喷泉区、白山区、新桥区、再团结区、法国剧院区、忠诚区（市政厅区）和球场区等——后两个区没有在9月16日的致全国预选议会书上签字（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页）。

[37] 他们参加了布鲁特斯区，累珀累提尔区和卢森堡区的议会（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3页）。

[38]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36—37页；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布特·代·莫兰区），第480—481、483—488、489—490、502—505页。关于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对于个人进行的袭击，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62、463—464、465—466、467—468、508页。

[3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72—478页。关于类似的话，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98，对开本第499—500页和Aa 189（博物院区），对开本第208、211页。

[4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327—328、240—241页。

[41]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3页。

[4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79页。

[43] 从德勒到巴黎的两个代表被捕；在诺农库尔，地方民兵队和正规军曾发生冲突（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44页）。

[44] 这四个区是布鲁特斯区、普瓦松尼区、大教堂区和社会契约区——后者不是9月16日声明的签字者。

[45]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52页。

[46]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83、290页。

[4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32、283、290、297页（重点是作者加的）。

[4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95页。

[49] 例如，伦巴匠区民政委员会拒绝了区议会发出战斗号召的请求；然而第二天早晨，不经该委员会的同意，号召的钟声却响了起来（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66，对开本第176页）。

[5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3—299页。关于葡月12日和13日在阿尔西区、格拉维叶区、西区和大教堂区的对于“匪徒”“恐怖党”和“恶徒们”的同样恐惧，可参看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

[5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52]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6—69页。

[53]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7—558，第2号卷。

[54]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84—85页。

[55] 在此以前“效忠”于国民大会的其他各区——蒙特娄区、玻宾库尔区、格拉维叶区、法兰西警卫军区和伟人祠区——拒绝响应召唤。格拉维叶区实际上已经表决和累珀累提尔区联合在一起（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69页）。

[56] 和传说相反，事实上，在这次事件中，波拿巴起初只是巴拉手下服役的六七名将军之一。只是在战事结束后，在巴拉的请求下，波拿巴才被正式承认作为他的副指挥（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73—78页）。

[57] 双方各伤亡二三百人（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5页）。关于图伊勒里区由于战争而受到的财产损失的情况，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对开本第378、417—418页。“国民大会大街一个要求赔偿

损失者有些激动地说，他家里的玻璃窗大部分都被砸碎了，给他所造成的损失就是对他的财产的一种侵犯，而法律却是保证他的财产的安全的”（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

[58]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36，对开本第224—225页。

[59] 具体事例可参看巴尔扎克：《恺撒·比罗托》（Balzac，*César Birotteau*）（第1版，1837年）。

[60]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6页。

[6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13页。

[6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43，对开本第23—60页。

[63] 我曾在16个区里发现66起这种案件，但是警察局记录很不完整：例如，关于这一时期累珀累提尔区的情况就没有记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1、74，75、77、134、158、168、175、177、202、211、214、219、242、243、252）。

[64]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99—101页。

[65] “有些人评论说：比起葡月13日暴动者的罪过，牧月暴动者的罪过要小得多，因为后者只是要求面包，而前者则企图攻击和消灭国家代议机构；可是……牧月暴动者却受到比葡月13日的暴动者远为严厉而轻率的裁决。”〔1795年10月13日警察局侦察员的报告，见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9页〕

[66] 济维：《共和国第四年葡月13日》，第85页，

[67]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18页。

[68]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297页。

[69] 参阅本书第176页注②和注③。

[70] 军事法庭的记录里报告了少数这样的例子，但我们不能估计出它们的重要性（国家档案馆文件：W 556—558）。

[71]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308页。

[72]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375、434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74，对开本第608页。

[7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2卷，第434页（11月26日的报告）。

[75] 埃·勒伐塞：《1789年至1870年法国工人阶级史》（E.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 de* 1789 à 1870），1902年巴黎版，2卷本，第1卷，第236—244页。

[76] 关于驻军对巴黎市民构成威胁的早期的事例（偷窃东西、损坏财物、伤害生命），可参看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52（图伊勒里区），对开本第356—368、373—375、378、417—419页。

第三篇 革命群众剖析

第十二章 革命群众的构成

虽然以前各章所描述的各种革命骚乱和暴动，在范围、组织和目的上各不相同，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在它们当中是否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首先，在这些运动参加者的社会成分上，就显然有着某种类型的一致性，因为除了葡月武装叛变者是唯一的例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巴黎无套裤党人——首都的作坊老板、工匠、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因此，关于社会出身，我们在示威和起事的广大群众与指导这些活动或从这些活动中取得政治资本的政治领袖——1789年5月到7月的巴黎选举人、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或者国民议会的

代表、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之间，就看到了一种明显的区别。这些政治领袖，除极少数例外，都是来自商业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的贵族[1]。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一种领导人和参加者在出身上的不一致，怎样反映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目的的不一致上。

可是，虽然参加这些事变的革命群众绝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组成，但他们绝不是来自同样的社会集团。如果把他们说成是巴黎下层社会性质相同的、无名的“乌合之众”，只要政治领袖一发命令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或者由于饥饿或暂时不满的刺激就会自发地产生反应，事实上，那将是一种明显的过分简单化。然而在回忆录作者和历史学家的笔下，他们却经常被描绘成为这种形象。

要纠正这种错误的描绘，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隐伏于这些革命暴动后面的根本动机；可是，在这样做以前，我们先必须再看一看参加这些暴动的都是哪些人。如我们所看到的，1787年秋和1788年骚动的爆发是对于巴黎法院在贵族反叛时期和国王及其大臣进行斗争当中所做的鼓动的反应。最初推动这些骚动的是律师的书记和法院的传达员；可是，当骚动继续下去的时候，老城区的学徒工和帮工便参加了法院书记员的斗争，而在1788年，许多市场区、圣马瑟勒和圣日尔曼郊区的“贱民”也参加了进来。事实上，那些被捕者主要是由小店主、工匠和帮工组成的，其中有半数是各种行业的工资劳动者[2]。作坊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在1789年4月的累维伊扬暴动中起的作用尤为显著。当时，愤怒的群众曾经在圣安东郊区捣毁了两家制造商的房屋。我们看到，这一次，构成骚动者中间最积极成分的巡回队曾经特别努力在工资劳动者的工作地点——码头、作坊和工场——和住所召集他们参加骚动；而骚动的结果是：在大约70名死伤和被捕的人当中，有50名以上的各种工资劳动者。这个比例数固然高得非凡，然而，考虑到在物质极度缺乏和面包价格高涨时期，累维伊扬竟然或隐含或有意地对工人的生活水平提出威胁，因而引起了郊区及其附近地区帮工和体力劳动者的特别仇视，这也许就不足为奇了

[3]。

我们可以非常符合事实地说，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是由全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进行的：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些武装起来的人可能达到25万之多。但是，那个伟大起义的几个主要事件当中最积极的分子，在数目上就少得多了，并且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那些人。直接进攻巴士底监狱的人，大多数是新成立的国民自卫军的成员，在数目上只不过有几百人。这些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是生意兴隆的商人或其他资产阶级，绝大多数是来自范围广泛的各行各业的工匠、店主和帮工，虽然他们主要来自圣安东郊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建筑业、家具业和奢侈品业[4]。在巴士底，乡村失业工人（他们大量流入首都是预报革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一种明显表现）起的作用很小或者没有起作用；一般工资劳动者，甚至作坊的帮工，似乎也显然是少数。 7月11日到14日焚毁税卡和13日洗劫圣拉扎尔男修道院的群众，在构成上就与此完全不同了。在关卡事件中，同在巴士底一样，突出的骚动者中间有少数资产阶级——甚至有贵族。有人在通向圣马瑟勒郊区的两个关卡上看到贵族冒险家圣费利的谬斯基讷。在北面两个关卡的纵火犯中，“有两个衣冠楚楚的人”。龙场地方骚动者的领袖“带着贵族风度”，在巴塞，有“穿着白礼服的人”。检察长后来发出逮捕状要逮捕的80人里面，有一个人被描写成身穿“蓝衣服，带着一根金柄手杖”，另一个“骑着白马”。但是这些都只是例外，目睹者最常描述的骚动者是服装简陋的男女老百姓——当地的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他们里面还有不少的酒商和所谓职业走私者，但是也有从事劳动的家庭主妇、挑水夫、建筑工人、桶匠和来自附近救济工场的失业者[5]。在圣拉扎尔修道院的抢掠和破坏，似乎也主要是由小商贩、在业和失业的体力劳动者及当地穷人做出来的，而不是由工匠和帮工干的。当然，这一事件和其他两个事件不同，它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事件，参加的人几乎全是城北圣丹尼郊区大街和圣拉扎尔郊区大街交界地方附近一带的住户[6]。

至于把路易十六逼回首都的10月5日向凡尔赛的进军，我们没有参与者的名单可以参考，警察关于被捕者和死者的报告涉及的人数也太少，因此不能从中得出任何一般的结论。但是从哈代的日记和其他各种报告者或目击者的证明中我们看到，是市场妇女发动了9月和10月的整个面包运动，而在向凡尔赛进军的第一支大队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市场妇女；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妇女的游行队伍中，除去有特许证的小摊贩、卖鱼妇和市场劳动妇女以外，还包括有服装整齐的资产阶级（哈代把她们叫作“戴帽子的女人”）和其他各社会阶层的妇女[7]。在报道那些拥挤在凡尔赛国民议会议席中的妇女所呈现的奇观时，哈代说：

许多妇女的打扮使这种景象显得格外奇特，她们穿着相当漂亮的女服，可是短裙上却佩带着猎刀或短剑[8]。

关于那两万名国民自卫军（他们那天早晨在格累夫广场上列队，当天下午强迫显然很勉强的拉斐德带领他们跟在游行妇女后边到凡尔赛去），我们知道的就更少了——不过，从见证人在巴黎警察局提出来的证据以及从在凡尔赛逮捕的少数人的装束来看，他们仍然是由圣安东郊区及其邻近各地区的作坊老板、工匠和帮工组成的[9]。但是，这一次按地区来说，光荣无疑地要归于中央市场的女摊贩和卖鱼妇女。妇女在这次事件中，比在任何其他类似的革命事件中都更起主导作用，并且始终是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1790年的长期平静之后，我们看到：由民主派和哥德利埃俱乐部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又于1791年春季爆发。这一次，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几乎席卷了巴黎的每个区，并且采取了明显的政治形式。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教场环绕祖国之坛举行的大会是这次运动的高潮，当时有5万人集会，准备在哥德利埃俱乐部起草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路易十六退位。在颁布戒严令和国民自卫军开枪之前已经签了名的6000人中，很大一部分人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请愿书上签名的地方散布着许

多圈起来的十字 [10] 。从警察报告的间接证明中我们知道：在夏秋几个月里，因政治嫌疑而被捕或者在示威时当场死伤的大约250人中，一半以上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主要是独立经营的工匠、店主和小商贩，也杂有少数租金收入者、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小职员，每20个人中约有妇女一人 [11] 。

1792年8月进攻图伊勒里宫与两年前进攻巴士底的情况相类似，主要是一个军事行动，执行这一行动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队伍，并得到了一些从外省来的队伍的支持。由于工资劳动者在几天以前实际上还不能参加巴黎民兵队，而妇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编入，所以我们不能期待8月10日的起事者和卷入1791年政治运动的起事者一样，能够大体上代表巴黎的整个无套裤党。但是，从本人或家属申请恤金的那些名单中我们看到，仍是郊区和市场区的无套裤党人起了主要作用：在名单中标明职业的123人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店主、帮工和“一般”工人，工资劳动者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二 [12] 。

就我们从不完全的记录所知道的，参加1792年和1793年最初几个月粮食暴动的群众，其性质有些不同。我们可能还记得，这些暴动是在物价陡涨时期反对食品商人特别是杂货商人的一种多少带有自发性质的骚乱。所以，在闹事的时候有许多妇女参加就不足为奇了：杂货商的证词说妇女成群结队地侵入他们的店铺，并且特别提到圣马瑟勒郊区的洗衣妇和市场妇女。一个名叫阿尼埃斯·贝尔娜的妇女因为参与1793年的骚动被判处两年徒刑 [13] ；不过，妇女实际被捕的人数——约为被捕者的八分之一——并不能充分反映她们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另一个特点是被卷入的厨师和家庭仆役的数目较大；在被捕的工资劳动者中（在有记录可查的那些人中占五分之三），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仆役、码头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人或一般工人，而不是传统手工业的帮工 [14] 。

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795年5月），在群众反对罗伯斯庇尔的热月

继任者的伟大起义中，重新出现了大批的妇女和工匠。在这方面，这次骚动和1789年10月那一次有显著的相似之点，那时，巴黎人向凡尔赛进军，具有抗议面包缺乏和把国王带回首都的双重目的。在这两次事件中，市场和郊区妇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紧接着妇女为面包而暴动之后，就是编入国民自卫军队伍的商贩和工匠们的起义。在牧月事件里，这个特点反映在因参加这次骚动而被捕的市民名单上：和人数虽少却有相当影响的妇女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各行各业的帮工[15]。

从这一简单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骚动者和起事者在成分上的共同之点，也能看到某些显著的差别。共同之点自然是除去一次以外，在所有这些骚动中，都是无套裤党占重要地位。不过其他社会成分也起了某一些作用：在共和国第四年的葡月事件中尤其是如此；这里边也有少数资产阶级、租金收入者、商人、公务员和专门职业者参加了破坏关卡（可能是罗亚尔宫奥尔良派直接派遣的人）、攻陷巴士底、马尔斯教场事件、进攻图伊勒里宫和牧月的暴乱[16]。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进军凡尔赛、1792年到1798年的粮食暴动和牧月事件中，妇女的作用特别明显。这当然完全不足为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粮食价格和面包、牛油等问题完全是主要的；我们看到，在最后发展成为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运动中，妇女起的作用就不太显著；至于主要是军事行动的进攻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中逐出吉伦德党议员们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当然就更小了。再有，虽然工资劳动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起了实际的作用，但他们只在唯一的一次重要暴动中起了显然是主要的作用，这似乎就是圣安东郊区的累维伊扬事件。这个原因并不难发现，因为这次事件虽然不能说它是罢工或工资运动（累维伊扬自己的工人似乎并没有参加），但它是唯一带有一点工人和雇主之间直接冲突痕迹的行动。还有一点无疑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手工业者——无论是老板、独立工匠或帮工——在某些暴动中比在其他暴动中显得更突出。当一个小手工业区大部分被卷入暴动——像老城

区被卷入1787年和1788年的暴动及圣安东郊区被卷入其他许多暴动——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但这似乎也是比较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如马尔斯教场事件和武装进攻巴士底、图伊勒里宫等——的一个特点，这时主要推动力无疑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带着自己的伙计、帮工和学徒一起参加。与此有关，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业如装修、建筑、五金和制衣各业的成员，特别具有持久的战斗精神。在所有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制锁匠、细木工、家具制作工、鞋匠和裁缝；其他常常表现较突出的是石匠、理发师和雕刻匠；在从事于相对非专门技术行业的人当中，有酒商、运水夫、搬运工人、厨师和家庭仆役。工场（纺织、玻璃、烟草、花毯和瓷器）雇用的工人们，除网纱工以外，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太显著[17]。

对于这些记录的研究证实了一种传统的看法，即最经常和最热心参加革命暴动和起义的巴黎地区是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圣安东郊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区的工匠和帮工曾发动并控制累维伊扬暴动、巴士底的攻占和王室的推翻，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和牧月的群众起义中也起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从警察报告中看到，只有在1787到1788年的事变和马尔斯教场事件中，圣安东郊区才没有起很大作用或根本没有起作用。圣马瑟勒郊区固然在1788年9月到10月的骚动中有一些实际的贡献，并且也派出了一些义勇队参加围攻巴士底，然而它只是在1791年春季和夏季才开始起有真正的突出作用。此后，它在1792年8月和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及牧月暴动中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圣安东郊区[18]。当然，在葡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虽然有产者和“温和派”当时甚至已经掌握了有名的各区，但是，带头和掌握主动的不是这两个区，而是传统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累珀累提尔区（图书馆区）和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另外，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却表现了自己的特色，单独派遣了一支武装义勇队去对抗反革命的叛徒。

但是，即使能够证明，除去最后一次以外，在所有革命暴动中占压

倒多数的参加者都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可是，究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他们来自于其中的社会集团呢？泰讷和他的追随者虽然不否认在革命群众中有商贩、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然而却坚持革命群众中的主要成分是“流浪汉”“罪犯”和“无家可归的人” [19] 。考虑到流浪汉、小偷和失业者在各个革命阶段对大小有产者造成的恐惧，那么进行这种攻击也许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当时怀有敌意的记者、回忆录作家和警政当局也曾不止一次地肯定这样说。但是，至少是把这种攻击施之于首都，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在有详细情况可查的累维伊扬事件的68名被捕者、受伤者和死者中间，只有3名没有固定住所——一名补鞋匠、一名车夫和一名挖掘工 [20] 。烧毁关卡后预定逮捕的将近80人和4个因为打碎圣丹尼关卡窗户而被逮捕的人全都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 [21] 。在1789年7月抢劫圣拉扎尔修道院时被捕的约60个人，只有9人是没有固定住所的失业工人，他们是在7月革命期间对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公寓寄宿者进行大举搜查时被捕的，可能根本和抢劫修道院这件事没有直接关系 [22] 。巴士底攻克者662人以及1792年8月由本人或家属申请补助金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所和一定的职业 [23] 。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几个星期中，一名乞丐因辱骂国王和王后被捕，另一个乞丐因为赞扬他们从巴黎出亡而被捕；还有两名是因为闹事和侮辱国民自卫军被捕；其他三个人被描写成为“没有职业的人”；这一时期其余250名被捕者看来全有固定住所 [24] 。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被捕者中，记录上也没有提到流浪汉和乞丐；也许更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与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有牵连的那些人中，也没有提到这类人。毫无疑问，这些分子在这些场合下是混在骚动者和起义者中间的，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在1789年7月革命时期引起了巴黎选举人的忧虑 [25] ；但是在这些运动中，看来他们起的完全是次要的作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失业工人或寄居在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间或公寓中的工人和工匠（往往被人轻视的“无固定住所的人”），不是构成革命群众的有力因素。在革命初期那几年特别是这种情形，那时，除乡村失

业者大批涌入城市外，在很多的巴黎手工业部门中都有大批的失业者；不过在1791年秋天以后，这个因素已日趋下降。我们在累维伊扬暴动中发现，大约50名被捕或受伤的工人中，有8名是失业者，而在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被捕者中，这个比率还要高一些[26]。1789年7月，也有间接的证据表明，在参加攻击巴士底的那些人中间有失业的工匠、帮工和体力劳动者（只有极少数来自救济工场）。例如，我们知道在巴士底陷落以后，曾募集了相当数量的款子来救济这个郊区的困难，而在后来请求国民议会给以失业救济的900名石匠当中，有几个人声称他们参加了进攻巴士底[27]。我们也曾看到来自邻近救济工场的失业工人在破坏关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抢劫过程中起过一定的作用[28]。无固定住所的人在首都的工资劳动者、小工匠和小商贩中占有相当比重，而绝不仅限于失业者或临时工，虽然当时一般都传说客店或者备有家具出租的房屋是专为外地人、外国人、凶犯、窃盗和无家可归的人预备的。实际上这些客店或出租房屋的主人或租屋人必须依法每天统计所有的寄居者，并向警察局报告[29]。从无固定住所者的数量看来[30]，他们在各次骚动的参加者中间占相当比重是不足为奇的——在累维伊扬事件的被捕者中大约占四分之一，在巴士底攻克者中占十分之一，在马尔斯教场运动最积极的活动者中占五分之一，在杂货暴动的被捕者和下狱者当中占六分之一[31]。但是这当然和泰讷所说的无家可归的人不是一回事，并且不能进一步说明这里边有多少流浪汉。

还有一种争论是：在革命暴动中，罪犯和匪徒起了显著的作用。如果我们细加研究，这种争论也是不易站得住脚的。警察局审讯押犯的时候，习惯于询问他们以前是否判过徒刑，而且在他们犯过比较严重罪行的情况下，很容易验明他们是否被打上了臭名昭著的盗窃犯V字或船役囚徒G字的烙印。审讯累维伊扬案犯人的8个警务委员只能发现三个以前有过前科的人——2名曾因轻微犯罪而在阜尔斯监狱中被短期拘留过，另一个码头工人达代涅烙有V字[32]。但这是一个例外。在因抢劫圣拉扎尔修道院而被捕的人当中，只有一名服过徒刑——屠夫的学徒卡

特勒沃，他以前曾被判在阜尔斯监狱监禁17天[33]。1789年8月，圣丹尼发生了一次食物暴动，杀死了区长助理夏特耳，在与该案有关的21名被捕者中，没有一个看来有过犯罪记录；在9月凡尔赛的类似暴动中被捕的15个人中，只有3个人以前服过刑——一个因为在1788年偷过四块木头，两个因为轻微地违犯过军纪[34]。在马尔斯教场事件前后几个月内，巴黎各区因政治犯罪而被捕的150人中，只有4人有过前科，而他们的犯罪情节也很轻[35]。共和国第四年，因被认为参与九月屠杀而受审的39人中，没有一个人以前在法庭上出现过[36]。不幸的是，我们得不到关于其他重大革命暴动的这类材料；但是，就目前的情形来说，以上这些证据是有巨大力量的，应当说是无可辩驳。整体看来，参加到革命群众中的那些人，事实上并不比其他巴黎普通公民更倾向于犯罪，或者更倾向于暴动或扰乱秩序。

当然，有人可以争辩说，这样的人并不能完全代表巴黎“贱民”，因为就他们参加革命事件的情况看来，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少数斗士。但是，这一点却不能过分强调。诚然，对于一小批“领导人”或者（如卡隆所称呼的）“活动家”（这些人甚至在看来好像是最自发的运动中都可能起过一些作用）说来，认为他们与众不同可能是正确的；关于这些人，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谈到。而且，这种说法无疑也可以用到这样一些无套裤党人身上，他们在共和国第二年曾在各区起过积极作用，或者担任过地方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乃至于公社的委员（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很少是工资劳动者）：他们自然就是“无套裤党”这个名词在其社会政治意义上所最常指的那些人。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公认的巴士底攻克者、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或在牧月武装向国民大会进军的那些人，乃至在1791年春天和夏天用直率的政治语言斥责制宪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几百人（我们已经看到过厨娘康斯坦·埃符娜的例子），看作是少数斗士。但是我们却很难同样有把握地把这个名称用到捣毁累维伊扬住宅的体力劳动者和帮工身上，很难用来指那些在1792年至1793年闯入杂货商店强行规定他们自己的群众性物价管制形式的男女，很难用

在那些赞扬九月屠杀的许多人身上（甚至用在屠杀者本人的身上），或者用在10月向凡尔赛进军、在牧月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而示威游行的那些妇女身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作出这种区别呢？这自然涉及比本章所讨论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在我们研究了把群众吸引到一起并使他们发挥出革命精神的各种动机和其他形式的推动力量以后，我们也许就能够更有把握地来回答这一问题。

---

[1] 米拉波和拉斐德自然是贵族——正像不太著名的人物如圣费利的谬斯基讷与圣杜律治侯爵等也是贵族一样。罗伯斯庇尔和丹敦以前是律师、德姆连、布里索和艾贝尔是记者，马拉由医生转为记者。西哀士和雅各·卢是教士，桑代尔和勒冉德尔是生意兴隆的商人，马伊雅是法庭职员，美洲人富尼叶是一个小康的资产阶级的儿子。甚至于共和国第二年巴黎国民自卫军所谓无套裤党总司令安利奥，也是以前的海关职员，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家庭佣仆。在次要的但尚为人们所知的革命领袖中，也许唯一的真正无套裤党（就这一被滥用了的名词的真正社会意义而言）是罗西诺耳将军，他以前是一个金匠帮工。

[2] 参看附录三。

[3] 参阅本书第40页以下。

[4] 参阅附录三和附录四。

[5] 国家档案馆文件：E^{1a} 886。

[6] 国家档案馆文件：E^{2} 4691。

[7] 参阅本书第77—80页。

[8]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506页。

[9] 参阅本书第81—83页。

[10] 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第11卷，第113页。

[11] 参阅附录四、附录五和本书第95—98页。关于1789年至1791年起事者和骚动者社会成分的详尽研究，可参看我所写的《1789年至1791年巴黎起事者的社会成分》（“La Composition sociale des insurrections parisiennes de 1789 à 1791”），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7期，1952年，第256—288页。

[12] 参阅附录四和本书第109—113页。

[13] 赛纳瓦兹省档案馆文件：B集，凡尔赛刑事法庭，1793年5月。

[14] 参阅附录四和乔·鲁德：《1793年2月25日和26日的骚动》（“Les Émeutes des25，26 février 1793”），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30期，1953年，第46—51页。

[15] 参阅附录四和附录五。

[16] 参阅附录四。

[17] 参阅附录四。我们自然也注意到了从事军火工场工作的工人在1794年和1795年最初几个月里所表现的特殊战斗精神（参阅上文第138—142、149—151页），但是这些人一般都是从小作坊来的从前的制锁匠、细木工和五金工，关于他们我们已经提到了。

[18] 参阅附录三。根据研究过的记载来看，其他比较一贯“革命”的是市政厅附近的各区（如阿尔西区和兵工场区）和某些中心区（如罗浮区、奥拉托利区、莫孔赛耳区、老实人市场区、格拉维叶区和伦巴底区）——北部的大教堂区、崩迪区和圣母山郊区以及西南部的伤兵院区，有时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精神。当然，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只是那些全区积极参加或区内有大批个人积极参加街头示威和暴动的各区。所以，我们这里没有谈到那些提出纯属初步革命倡议的各区（例如1793年4月的粮食市场区和崩孔赛耳区）。事实上，在区委员会办公室或区议会里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常常采取向其他团体发出请愿书或决议书等形式——和住在同一个区里的示威者与起事者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精神并不完全相符合（除去短时期内圣安东郊区的情形可能是例外）。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二者的社会成分——除去1793年至1794年的短时期以外——有显著的差别。

[19]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8、41、53—54、81、130、135页；普·加佐特：《法国革命》，第122、133—134、146页。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Y18795，对开本第444—461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Y 10649，对开本第18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Y 10649，对开本第20—21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F^{15} 3269—3274；F^{7} 4426。

[24]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67，对开本第51页；157，对开本第134

页；Ab 324，第28—29、32、36、37页。

[25] 《巴黎选举人大会……会议记录》，第2卷，第156页以下。

[26] 参阅附录五。

[27] 国家档案馆文件：C 134，第6号卷，对开本第14—15页；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集，第5卷，第260页。

[28] 参阅本书第182—184页。

[29] 莫南：《1789年的巴黎状况》，第21页，注5；第419页，注4。

[30] 在1795年的人口调查——这一时期唯一的一次把无固定住所的人计算在内的调查中，无固定住所者在25个区中的数目是9792人〔普·摩里奥：《共和国第二年的人口调查》，第32页〕；但这时是人口大量外移时期，使住在客店和公寓的人大为减少〔让·德·拉·蒙内雷：《革命时期巴黎公寓业的危机》（J.de la Monneraye，*La Crlise du logement*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928年巴黎版，第12—13页〕。

[31] 参阅附录五。随便从马伊雅的巴士底攻克者的名单中举一个例子：日·阿·拉木勒，锡匠，寄住在拉坡街公寓经理人布瓦尚那里；马克-安东·圣保罗，独立的渔夫，住在圣马瑟勒郊区的公寓；让·加布里勒，印刷工人，寄居在莫培广场附近普拉特勒街的一个酒商那里；冈比和塞曼，河畔工人，寄居在圣保罗教区菲基埃街沙龙客栈（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 ）。

[3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101，13454。

[33]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34]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497；塞纳瓦兹省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审讯记录，1789年，对开本第7—21页。

[35]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37，对开本第177—178页；173，对开本第24、25—26页；215，对开本第451—452页。再参看附录五。

[36] 皮·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11页。

第十三章 革命群众的动机

泰讷和他那一派史学家坚持说，收买、贿赂和企图抢劫是煽起革命活动的主要原因。在谈过以上各种情况之后，我们也许就不会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莫提梅-泰诺说："在大部分群众运动中，金钱比热情起的作用更大"[1]。按照泰讷的说法，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市场妇女，是为这一目的而被雇用来的[2]；较为晚近的作家加埃，甚至于更具体地断言，工匠和帮工都是被收买来参加进攻巴士底的："有人在工场里（他写道）以每人一个金路易的代价进行收买。"[3]1792年8月猛攻图伊勒里宫的队伍，被莫提梅-泰诺说成是"那些无耻的人，借忠诚爱国之

名肆无忌惮地从事杀戮和抢劫”[4]。

自然，在大革命当时就不乏似乎足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说法。无论是反对革命的保王派还是革命当局，他们在认为这样做对于自己有利的时候，都会特别随便地进行这种攻击。例如，《国王之友》的主编蒙勺瓦，声称他掌握有可以证明有人向累维伊扬暴动者散发金钱的直接证据：

我问过许多这种穷人（他写道）……我毫不怀疑，他们每人都得到了12里弗的收买费。[5]

为平定骚乱而征集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贝桑伐尔根据警探的一致证明声称，“人们看到有人煽动暴乱，甚至于散发金钱”[6]。暴动的两个主要牺牲者，亨利奥和累维伊扬都作过同样的攻击[7]。

此外，1789年7月，一个圣拉扎尔事件的见证人声称，他曾看见有人出示装满银币的口袋；同时，在关卡上，一个见证人报告说，他曾听到一个骚动者夸耀自己接受了米拉波的钱，据说还有一个网纱工，“为了参加这些骚乱”，他每天接受9里弗钱[8]。哈代在他那本日记上记载说，那些面包骚动者的首领曾经企图于9月在凡尔赛吊死一个面包商，后来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衣袋里都有33里弗[9]。为调查10月5日和6日的事件而设立的警方调查团，曾要求许多见证人提出关于弗兰德斯旅团士兵、巴黎市场妇女和其他职业比较可疑的人曾受过厚贿收买的证明——推测收买者是调查团准备予以中伤的奥尔良派。泰讷及其追随者曾经随便引用这些资料来充实自己的论点。[10]

在马尔斯教场冲突事件前的社会紧张时期，批评当局的人动不动就被看成是被新政权的敌人以金钱收买的密探分子。小报《杂谈》把救济工场新近解散的工人说成是“被叛徒收买的人”[11]。在这以前，巴黎市长贝野就曾把1790年5月圣安东郊区的骚动（当时有3名窃盗被激动的群

众处死）归之于同样的原因："政府知道有人分发金钱来达到制造危险暴乱的目的。" [12] 做这种群众受贿攻击的，不仅是仇视革命的人，还有如贝野这样的君主立宪派。在1793年2月的雅各宾派议员和巴黎市政当局看来，如果说杂货暴动者的动机纯粹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咖啡、食糖或肥皂，那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警察局密探提出的报告中，有许多地方提到带着成捆的指券或者大把分发金银的男女 [13] 。在牧月里，警察局也根据其密探的证明声称："据说有人在圣安东郊区分发指券来鼓动暴乱。" [14]

至于对待在这类骚动中被捕、受伤或被杀死的人，当局自然有一种现成的方法，那就是不仅宣布他们的怀疑，而且还要证实他们这种怀疑的正确。在他们接触到这一问题时，当时法国的警察局和市政委员会或政府委员会同英国的或其他地方的同等机关并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在面对着"下等人民"对于现存秩序挑战时，总是臆断群众被人收买，而对于群众起义的补救办法是搜捕假定的阴谋叛乱者而不是解除社会的不平。所以，在累维伊扬骚动之后，警务委员在审讯被捕者和受伤者时，问他们是不是知道有人用钱鼓动暴乱 [15] 。当官方对油脂运输工人让-尼古拉·丕平进行审讯，审问他和圣拉扎尔抢劫事件以及7月12日到14日在罗亚尔宫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般事件有什么关系时，就曾问他"是否接受过某些人的钱" [16] 。拆除巴士底堡的工人，后来以在圣安东郊区犯下"倡乱罪"被绞死的米契尔·阿德里安，在被审讯时，人们曾问他"在7月12日前后是否收到过不同的人给他的钱，让他在巴黎发动暴乱" [17] 。弗朗索瓦·比隆，由于1789年秋季在军校区威胁着要吊死一个面包商人而被控告，审讯人问他，"是否受过某些居心叵测的人的煽动……那些人想用钱来对他进行诱惑" [18] 。我们可以一直这样叙述下去——1791年夏季和秋季被捕的人，受过与杂货暴动有关的审讯的那些人，以及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被军事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传讯的那些人都受过这种讯问 [19] 。通常的回答是完全否认，但是有时候这种回答却更有意思。例如，我们发现，在1791年，一个万多姆广场区的家庭仆役用意料不到的

反驳回答了这个老问题，他说他不仅没有因为参加政治事件而接受过金钱，而且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他为此而花去了24苏——显然指的是他作为一个雅各宾俱乐部会员所缴纳的会费[20]。在牧月，一个盲人收容院区的炮手，当问到他是否知道有人在郊区散发金钱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虽然他又加上了一句，说，“他听到有人说过，要发钱和两磅面包来鼓动暴乱”[21]。但是没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人直接承认，或有一个犯人或其他见证人曾经于进行这种交易时被捕。

况且，警察局还有更为有效的搜查犯人的方法。而且如果在犯人身上搜查出可疑的物品或者一定数量的金钱，他们有一切理由予以公布。可是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有记录可查的案件里，这种搜查的结果都是一无所获。不错，在累维伊扬暴动后，一个被捕的造纸工人被发现身上带有4里弗，并且承认这笔钱是他在罗亚尔宫碰见的两个人给他的——但是这是发生在骚动已经平息足有一个星期之后的事[22]。贝桑伐尔和蒙勺瓦提出的，并且为作家们在《历史问题评论》中所重复过的群众被人收买的说法，看来所根据的只是这样一种极不可靠的基础。此外，1789年7月14日在圣丹尼关卡被捕的4名青年工人中，有一名被发现衣袋里装有157里弗12苏银币；但十分明显的是，这笔钱如果不是偷自关卡，便是（如犯人所坚持的那样）在圣拉扎尔寺院的暴动中拾到的[23]。甚至通常是一个可靠见证人的哈代，似乎也完全受到了报告的迷惑，竟认为1789年9月的凡尔赛面包暴动者的钱袋里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钱，可是关于这次事件的警察报告对此却只字未提[24]。至于在警方调查十月事件的过程中对于群众被收买所进行的大量攻击，由于缺少旁证，大部分都不能相信，因为他们的说法很含糊，并且多数见证人都是可疑的[25]。

虽然广泛收买的证明可以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但我们却不能过于不假思索地否认一切，认为抢劫完全不是使人参加革命活动的一个刺激因素。不过，即使是这样，它也被过分夸大了，并且在革命的任何阶段都很少有滥肆抢劫的现象。在累维伊扬暴动期间，我们看到有些食品商店

被抢——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这些骚动的根本原因[26]。在关卡上也发生过抢劫税关职员财物和积蓄的事件，虽然所占的比例并不大[27]。在袭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事件中，抢劫的情形较严重；但是即使在这里，主要的活动也是用大车把粮食运往中央谷物市场，而抢劫不过是附带的[28]。1793年杂货暴动中，也有抢劫的情形，虽然比较轻微[29]。在革命的其他骚动里，根本没有多少抢劫的情形。不过，我们看到，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把1792年8月人们进攻图伊勒里宫的动机说成是抢劫。在王宫陷落以后，确实有过一定的抢劫；实际上我们看到那年8月10日到9月2日有134人因为抢劫或被怀疑抢劫各种各样的物品而被拘留于阜尔斯监狱[30]；在各区也有几个人因为同样罪名被捕[31]——虽然他们之中看来没有一个武装进攻者。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普通公民（其中包括工资劳动者）曾特地绕道把在图伊勒里宫发现的珍贵物品交到自己的区里保存[32]；而且，即使是最敌视革命的见证人也不得不承认，武装队伍不但没有宽恕或者参加抢劫，而且立即处决了他们那些非武装的支持者中间企图从事抢劫的软弱弟兄[33]。在九月屠杀中，许多企图抢劫的人也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4]

那么，如此众多的巴黎无套裤党人参加这些事变，到底是受了什么动机的驱使呢？他们和鼓励他们、发动他们的人在革命目的上有何种程度的不同呢？首先，显而易见的是，革命群众不但远不是消极的工具，而是受到了在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争夺政权的各政治党派的口号和思想的感染。例如，在贵族反叛时期，我们看到从事骚动的职员和帮工群众怎样在新桥焚烧不得人心的掌玺大臣拉玛扬的肖像和高呼法官们的口号“打倒拉玛扬！”“亨利四世万岁！”[35]以后，在累维伊扬暴动时期，当人心已经归向于即将到凡尔赛开会的第三等级时，示威者（虽然很多人相信这是由于保王派密探们的煽动）高呼当时的革命口号：“国王万岁！ 内克尔万岁！第三等级万岁！”[36]在7月里焚烧关卡和洗劫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时，群众也喊出了同样的政治团结的口号“第三等级！”——虽然有时候它的意义似乎已经变成号召穷人起来对富人进行反抗[37]。

在“贱民”的头脑中也逐渐有了“自由”“人权”等新思想，我们看到，在8月，一个由于发表蔑视拉斐德的言论而在凡尔赛被捕的制炮匠帮工，就曾以“人权”为理由要求当局对他进行公正的审理[38]。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当国民会议中君主立宪派和宫廷派在国王否决权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的时候，巴黎“贱民”公开地拥护前者反对后者，并且我们还看到军校区的失业工人以及格累夫广场和罗亚尔宫的工资劳动者和士兵，在事件正式爆发前几天，就表示他们准备随时去把王室弄回巴黎[39]。这一个时期的另一个特点，自然是示威者和骚动者采取了反教士的口号；在凡尔赛，示威者对待教士议员们很少有礼貌，并且向他们高呼“打倒瓜皮小帽！”[40]。

在1790年的社会平静时期，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响应国民大会的号召到马尔斯教场集合，庆祝革命爆发的第一周年。但是，没过几个月，民主派和共和派的社会政治观点就开始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身上得到了反应。这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很清楚地表现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示威上，哥德利埃俱乐部号召这次示威完全具有一种政治目的——签署请愿书，质问国王在出亡瓦雷讷以后是否还有权继续在位。在国民自卫军到达之前，有6000人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或画了十字，其中可能有许多人并没有清楚地了解请愿书的内容；但是，至少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在审讯时十分清楚地表明，她相信请愿的目的是“为了改组政权机构”。在由于和示威有关而被关入阜尔斯监狱的将近130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对国民议会、市政当局或武装民兵表示政治上的反对而被捕的[41]。

在1792年8月武装推翻王室和1793年5月到6月驱逐吉伦德党这些事件上，我们不能提出同样的文件证据；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这些起义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它们的贯彻执行不是依靠非武装的（或大部分非武装的）革命群众，而是依靠集中组织起来的武装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前一事变中，还有来自马赛、布列斯特和其他

城市的武装部队的支援）展开战斗。同样，这些行动也标志着把巴黎无套裤党人完全卷进去的多月政治酝酿的最后成熟。一个重要的新因素是，布里索派发起的反对欧洲各王室的革命战争运动，这一运动正如战争本身在开始阶段一样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关于这一点，1791年秋季志愿去守卫边疆的工人、工匠和帮工的长长的名单就是证明[42]。另一点证明是大批作坊和工场工人们的捐款，他们把这项“爱国捐款”送到国民议会，以供应1792年部队的粮秣和装备[43]。此外，我们还看到了攻陷图伊勒里宫以前的一场开幕战——6月20日群众闯进了王宫，由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成千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公民向国王呈递请愿书并高呼流行的“爱国派”口号；就在8月10日革命爆发的前四天，大批公民也曾聚集在马尔斯教场要求国王退位[44]。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爆发前，也有同样的政治酝酿。那年3月警察密探的报告就已指明，人们在俱乐部和市场上公开讨论有必要举行一次新的起义来清洗国民大会。在4月，如我们所看到的，雅各宾派决定给这一运动规定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目标，在他们的领导下，在实际行动爆发以前就有无数的代表团和请愿书要求驱逐吉伦德党的议员[45]。最后，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的暴动中，闯入国民大会的群众要求给山岳党的政治纲领以支持和释放被捕的雅各宾派；用针缀在他们的便帽和罩衫上，与“面包”字样并排在一起的，是“1793年宪法”这一政治口号[46]。

所以不容怀疑，这些革命群众对于国民议会中的政治集团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目标、思想和口号给予了热烈的支持并且也有所领会，他们接受这些政治团体的领导，并且为它们的利益而示威、请愿或者拿起武器。这些本来是自由、民主和共和派的资产阶级的目标、思想和口号（以革命向左发展所达到的阶段为依据），但巴黎“贱民”（起义者和示威者大部分来自他们中间）中的积极分子接受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摧毁旧制度和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中，看来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符合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看作工资劳动者、小店主和作坊老板本身的特定要求[47]。所以，我们虽然和泰讷以及他那一派的见解

相反，承认领导者的政治思想对刺激群众革命活动起有作用，但是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部分的解释来接受。它对于如累维伊扬暴动、导致向凡尔赛进军或推翻吉伦德党的社会不安、1792年和1798年袭击杂货商店等这种非政治性的运动，以至芽月和牧月骚动的基本性质并不能作出解释——而这些运动却是革命的真正一部分，而且被卷入的人民大体上是来自猛攻巴士底、推翻王室和签署马尔斯教场请愿书的同一个社会集团。尤其是，它不能解释几乎始终存在于“贱民”中间的造成社会不安的一般要求，而这种要求正是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代的特征，如果没有这种要求，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在本身是巨大的政治骚动中动员群众队伍。要想得到一个更为满意的解释，我们必须于领导者时常变换的政治口号之外找出更固定的因素，必须详细研究参加者本身的社会要求，并证明乔治·勒菲富尔论点的正确性：“群众的参加意味着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动机。”[48]

这种研究表明，在革命时期，正像在整个18世纪一样，我们最常看到的群众骚乱的动机，就是“贱民”迫切需要廉价而又充分供应的面包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对此有保证的必要的管理措施。这一点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他们的这种迫切要求因为和一切资产阶级集团所主张的自由贸易和财产观念相矛盾，往往在他们和甚至最进步的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盟上造成紧张关系。如果市场和郊区的普通老百姓只满足于戴上三色帽徽和红帽子，空喊几句激进的爱国口号，而不十分关心于满足他们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解除他们自己的特殊疾苦（例如，如果累维伊扬的骚动者，在高呼无可指摘的“第三等级万岁”口号的同时，没有坚持捣毁像亨利奥和累维伊扬这样真正第三等级的忠实同志的财产；或者，如果市场妇女仅仅满足于向凡尔赛进军把王室逼回巴黎——如君主立宪派所需要的——而不那样猛烈地骚动和呼喊着要求更多的面包和更好的面粉），那对于罗亚尔宫的记者们、革命议会和雅各宾俱乐部的议员与演说家们说来，当然是很令人愉快的。1792年和1793年的杂货暴动也许最能说明这种利益的分歧。第一，雅各宾派郑重提议，

只要零星消费者自动地不去购买像咖啡、食糖等这种“奢侈品”——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商品”，危机就可以得到解决。第二，在当局拒绝采取措施，骚动者强制执行他们自己特殊形式的物价管制的时候，马拉和罗伯斯庇尔都斥责他们受了皮特和反革命分子的欺骗。“7月14日的人们并不是为糖块而斗争。”[49]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矛盾，很少有革命领袖——雅各宾派也不过是在1794年的短时期内——准备解决这种矛盾。但是，至少巴那夫对于这一问题及其在革命上的重要性有些认识，当他在向自己的选民谈到1789年10月事件时，他把资产阶级的纯政治目的和人民所主要关心的经济 要求划分得很清楚——“这里边掺杂着面包开始缺少的问题”[50] 。

拉布鲁萨教授研究了革命爆发前若干年的物价波动和预算情况，他的研究重新强调了物资缺乏和物价高昂（特别是面包）是18世纪法国社会动乱主要原因的这一课题。他指出，在这些年中，特别是小麦长期缺乏和价格高涨给城市居民中较贫穷的人群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这种情况在1787—1789年期间达到了高峰[51] 。当我们了解到，比如说，一个巴黎建筑工人为了维持他的正常消费而不得不用在面包上的钱在他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788年8月的约50%上升到1789年2月和7月之间的80%以上，我们就能更好地领会为什么巴黎工资劳动者对于旧制度如此仇视和他们为什么愿意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消灭这个旧制度[52] 。

所以，从当时的文献中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面包的价格和供应问题经常是1788年起义运动和革命最初几年期间的群众骚动的根源，这并不奇怪。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8月审判厅书记在多飞内广场和新桥上发起庆祝召回最高法院的运动，与面包价格的突然猛涨正好是在同时——几天以后，郊区和市场的“贱民”参加了骚动，并使骚动的性质有了变化。再有，半个月的暂时平静之后，骚动又以再生的力量重新爆发，其原因可以归之于拉玛扬被免职所引起的狂热，也可以同样归之于9月初面包价格的进一步上涨[53] 。在11月和12月，面包继续涨价，到4月累维

伊扬暴动事件发生的时候，4磅重的面包在整整三个月内一直保持着14苏半的奇高价格。事实上，如我们所看到的，面包的昂贵和欠缺正是骚动的主要根源，虽然它并不是骚动的直接原因[54]。姑且不谈其他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警察局长梯鲁·德·克罗纳在骚动中间呈给国王的报告也着重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骚动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反对累维伊扬，但实际上却为的是要求减低面包价格。"[55]在这种临时性的爆发之后，面包原因几乎在长期的群众运动中一直是主要的刺激力量，这一运动发生于5月末，到7月12日至14日达到了高潮，到10月5日至6日达到了另一高潮，直到11月初也没有看到它的平息，这时，使君主立宪派得以牢固掌握政权的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早已完成。

在以攻占巴士底为高潮的七月革命之前的那几个星期里，哈代在他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群众心理，以及当局不断担心会爆发一次比4月底圣安东郊区规模更大和更猛烈的骚乱。在5月、6月和7月初，他曾经9次记载在市场布置特别岗哨以平息面包骚动的情况。6月13日，他记述了警察局为怕发生社会骚乱曾经批驳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价格从14苏半提高到15苏的请求。在这次政治革命的前几天，一群人公开焚毁了《人民的希望》这本小册子，因为它提议要有两种价格的面包——每磅3苏的和5苏的。哈代写道："下层阶级的人民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56]在七月革命期间，同样的问题经常出现。7月13日早晨，人们有组织地进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到中央市场，并且还可以听到在各屋子里抢劫的当地人高呼"让我们找面包"；同时，对于那些接受罗亚尔宫政治领袖的命令去烧毁关卡的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来说，问题更是十分简单——保证有廉价的食物和饮料：如一个在捣毁夏约关卡办公室家具的制锁匠所说的，"我们有3苏钱就可以买酒喝了。"[57]

自然，我们已经充分证明，在政治上达到了把王室拥回巴黎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骚动，显然与巴黎饥饿群众的面包供应问题有更大

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7月22日杀死了富龙和他的女婿贝梯埃之后的平静只是短时期的。8月初，在丰收以后，面包价格曾降到12苏；但是，一部分由于干旱，预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实现，结果是一直持续到11月的面包缺货使群众运动始终在兴奋状态中。接着就是市场妇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厅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向凡尔赛的伟大进军。这次骚动值得注意的特点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去找那个面包房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以及妇女和她们的代言人马伊雅坚持要求国民议会使巴黎人民有东西吃[58]。

另一方面，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虽然在巴黎多数各区里受到“贱民”的广泛支持，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伟大骚动中的一次纯粹政治性的事件。1789年11月初，由于国民议会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应了廉价而充足的面包，并稳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这时已告结束。由于指券贬值和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特殊问题还没有到来，所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骚动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与群众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没有关系的运动。诚然，在示威前曾发生过一次相当大的工资运动，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帮工；示威以前也发生过因救济工场停办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失业工人的连月骚乱。但是这些运动虽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它的所属团体的支持，却不能说它们和马尔斯教场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在巴黎各区被捕的许多工资劳动者、店主和作坊老板的审问也并没有反映出这些工人的要求[59]。在这一方面，马尔斯教场事件似乎并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一般形式的社会骚乱。在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60]。他们的要求和抗议所采取的毋宁说是一种政治形式——证明是，在这一运动中被捕的人曾经给国民自卫军以种种侮辱并对国民议会和市政机关有许多抱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马尔斯教场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众运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随着革命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决定要在人民中间获得可靠

的支持，他们正在开始起一种更为独立的作用：他们不仅提出资产阶级比较激进部分的特殊纲领，而且正在开始（虽然不是十分坚定地）以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到1792年春天，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群众运动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指券的贬值已经开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价上有了反映；但是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灾难的却是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的注意力几乎一直集中在物价问题、食品缺乏及必须迫使当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从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整个时期都受这种迫切要求的支配。但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在艾贝尔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帮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特殊需要的社会要求方案，最后迫使雅各宾派掌握的国民大会以最高限价的形式在短时期内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的愤怒矛头，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样，首先指向了杂货商，表现在革命群众试图强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们当中较殷实的商户）按革命前的价格出售货物上。第一个这样的运动——1792年1月到2月的运动——只发生在少数的中央北部各区和圣安东与圣马瑟勒郊区，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和不久以后发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骚动是没有多大关系的[61]。1793年2月的骚动规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62]。这一次，在动员了国民自卫军、逮捕了数十名骚动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缓和措施以后，运动并没有停止。一般说来，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价法以后，经过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热月的垮台时期，到共和国第三年牧月的无套裤党人的最后一次起事，甚至在起事以后，运动一直没有平息。这一运动一发生就立即与雅各宾俱乐部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后一活动导致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伦德党，这时，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看来，吉伦德党和可恨的垄断者或食物囤积者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国民自卫军每天的报告，但是它们足以清楚地证明，在这几个月为了纠正和清洗国民大

会而发生的骚动背后，存在着群众对于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深切的关心[63]。

吉伦德党的被逐虽然使政权转到了山岳党手中，但并没有能立即消除这种不安。6月里警察密探呈交的报告几乎和4月或5月的完全相同。面包房缺少面包又开始引起3月里的忧虑，到8月末，排队购买面包和面包骚动又成了巴黎生活中常见的特点。这就是由艾贝尔和硕默特掌握的巴黎公社所领导的1793年9月4日至5日的暴动的直接背景。如我们所看到的，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国民大会最后决定颁布最高限价法，并开始着手组织拖延已久的“革命军”，作为恐怖时期的一种工具，其用意在于保证巴黎从四郊获得粮食和肉类的充分供应。[64]在这种不间断的群众压力之下，国民大会和公安委员会靠管制政策设法制止了通货膨胀，使指券的价值在几个月内未再下跌。但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农民的敌对，造成了食物供应的不足，这些农民常常把他们的农产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或者是因为害怕征收而根本不从事生产。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委员会企图满足大生产者和大商人的欲望， 自然会给政府与巴黎无套裤党人的联盟带来十分紧张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由此产生的不满再加上工资劳动者对于政府决心实行最高工资限额的特别怨恨，使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伴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在热月9日决定命运的那一夜他们本来是可以指望得到这种支持的[65]。

当然，有许多巴黎人后来都为罗伯斯庇尔的灭亡感到惋惜。但是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这种反应，而在当时，他们对于雅各宾派领袖的被捕、地方委员会的清洗、政治团体的封闭，乃至他们自己创立的最高限价法的废除等，都或多或少是无动于衷的；不过，当主要由于政府的政策而造成疯狂的通货膨胀和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时，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众运动就形成了。这一运动在1795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得到了动力，最后在芽月和牧月爆发成为严重的骚动。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与残存的群众团体和雅各宾派残余分子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合在一起并从

其中吸取了力量，但是它的始终不变和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仍然是对面包的迫切需要[66]。

但是我们必须避免某些历史学家曾经对之屈服的诱惑，惯于把革命时期的群众起义说成几乎完全是受暂时的经济原因的支配——好像每一个运动实质上都是“饥饿暴动”一样。这当然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不仅看到，随着革命的进展，无套裤党已经完全接受了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想和响应了行动号召；而且还特别看到，马尔斯教场示威和导向这个示威的整个准备活动，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更不必说无套裤党人对于像攻打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里逐出吉伦德党等这些纯属军事政治的行动所给予的积极支持了。至少在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情形下，饥饿的威胁或物价的高涨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对于共和国第四年葡月事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政治干涉——和几个月以前，他们积极参加芽月和牧月事件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这两次事件中群众对于面包缺乏和通货膨胀都是同样地十分关切[67]。根本区别当然在于政治情况有了变化和葡月叛变者抱有与牧月起义者完全不同的目的[68]。所以尽管通货膨胀继续，半饥饿状态仍然存在，积极的无套裤党人却不准备把他们对于热月国民大会的敌视扩大到使共和国的公开敌人感到愉快的程度。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据此驳斥一种论调，这种论调说，“贱民”由于政治上不成熟，所以会不顾自己的利益或意图而准备盲从任何煽动者；另一方面，它表明如果要满意地解释群众为什么参加或不参加这些运动，必须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都适当地考虑在内，如果只集中考虑一方面而不考虑另一方面，结果只能产生一幅被歪曲了的画面。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可避免的结论仍然是：这一时期推动革命群众的主要的和最常看到的动机，是对廉价而充分供应的食品的关心。这一点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充分解释群众革命的根源，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持续不断地发生社会骚动——这是首都这些年中一个非常

显著的特点，一切重大政治事件本身都是从这种骚动发展来的。它还更可以说明“贱民”为什么有时候会爆发出独立的行动，超过或者违反他们的资产阶级同盟者的利益，并且被这些同盟者指责为“反革命”——例如累维伊扬骚动者爆发出来的盲目愤怒，或者是巴黎市民在1792年和1793年杂货暴动中强制执行一种群众限价的比较有建设性的努力等。但是，如果没有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领袖的政治思想的推动，这些运动就会由于无目的而成为不可思议的，并且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无套裤党果真像某些作家所说的那样，没能够吸收这些思想，那么，他们对于革命进程和结果，就不会起正如他们事实上所起的那么大的影响。

---

[1]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M.Mortimier-Ternaux *Histoire de la Terreur* ），1862年至1881年巴黎版，8卷本，第8卷，第455页。

[2] 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1卷，第129页。

[3] 阿·加埃：《1789年的骚动者》（A.de Gallier，“Les Émeutiers de 1789”），载《历史问题评论》，第34期（1883年），第122页。

[4] 莫提梅-泰诺：《恐怖时期史》，第2卷，第105页。

[5] 蒙勺瓦：《回忆录》（Montjoie，*Mémoires* ），第1卷，第91—93页；转引自沙森：《1789年巴黎的选举和陈情表》，第3卷，第58页。

[6] 贝维厄和巴里埃勒：《贝桑伐尔男爵回忆录》（Berville and Barriére，*Mémoire du Baron Besenval* ），见《法国革命回忆录选辑》（*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21年巴黎版，两卷本，第2卷，第346页。

[7] 《亨利奥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9）；《累维伊扬先生的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8）。

[8]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Z^{1a} 886。

[9]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88页。

[10] 巴黎警察局的刑事审讯记录（特别参看第20、29、45、71、87、89、91、144、161、164、373、387各号证人的证词）。

[11]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26日。

[12] 《箴言报》（重印），第4期，第465页。

[13] 国家档案馆文件：AF^IV 1470（1793年2月26到28日的报告）。再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153页以下。

[14] 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42页。

[15] 参看1789年5月1日警务委员博瓦累在市立大医院对23名受伤者的审讯（国家档案馆文件：Y11033）。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1789年7月29日）。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8（1789年10月21日）。

[1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9（1789年11月16日）。

[19]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集；国家档案馆文件：W546，F^7 （字母排列顺序）。

[20]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206，对开本第366—367页。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35，第4号卷（重点是作者加的）。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4119（1789年5月5日至6日）。再参看警务委员奥丹对于运到蒙特罗公墓待认领的18具尸体的检验（国家档案馆文件：Y 15019）和上文的第44—45页。

[23]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634，对开本第149页；15683。

[24]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B集。宫廷检察官，1789年审讯记录，对开本第7—21页。

[25] 参阅本书第76—80页。

[26] 参阅本书第49页。

[27] 参阅本书第54页。

[28] 参阅本书第55页。

[29] 参阅本书第121—122页。

[30]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6140。

[31]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14—544页；153，对开本第48页；157，对开本第200页；173，对开本第43—44页；262，对开本第40—41页。

[3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8，对开本第546—571页；219，对开本第32页；262，对开本第42—44页。再参看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297—298页。

[33] 塞涅克：《1792年王室的倾覆》，第136、195页。塞涅克引证了保王派图尔泽耳夫人的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帮强人相互禁止在图伊勒里宫抢劫，如果发现某一个人想把宫中的某些物品据为己有，就毫不姑息地把他处死。"

[34]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111页。洛德莱向拿破仑说，"屠杀者并不抢劫"。

[35]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9—68页。关于本章以后所谈的大部分资料，可参看乔·鲁德：《法国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动机》（"The Motives of Popular Insurrection in Paris during the French Révolution"），载《历史研究所学报》（*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第26期（1953年），第53—74页。

[3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29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KK641，对开本第17页。

[37] 阿瑟·杨格也趋向于把"第三等级"和"穷人"等同起来（关于例证，可参看《法国和意大利游记》，人人丛书版，第172—173页）。再参看本书第49页。

[38]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8766。审讯他的警务委员的反驳也很有趣，这位委员说："他不断谈到自由、人权等字眼，这就足以说明他在精神上已准备参加暴动。"

[39] 参阅本书第75—77页。

[40] 参阅本书第70—73页。至于革命中的反僧侣运动和以后的"反基督教"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贱民"自己的深刻感情和经验，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非群众的来源，如专门职业阶级或开明贵族等，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有利于后一种说法的证明似乎相当有力量。

[41] 参阅本书第90—93、96—97页。

[42] 沙森和昂讷：《革命时期的国民义勇军》（Chassin and Hennet，*Les Volontaires nationaux pendant la Révolution* ），1899年至1904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6—136页。

[43] 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4卷，第258—392、1403、1422、1747—1749号。的确，1792年3月，大约有250名店主、工匠和帮工（帮工只占少数）签署了一份《巴黎市工人的声明》，公开地反对革命和反对鼓动战争（国家档案馆文件：C284，第115号，对开本第249bis，250—251页〔手抄本〕；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1162〔印刷本，有重要改动〕）。不容置疑，1792年秋季以后，战争日益变得不受欢迎了，虽然从文献上很难充分说明这一点。

[44] 参阅本书第105—106页、109—111页。

[45] 参阅本书第124—126页。

[46] 参阅本书第153—156页。

[47] 这并不等于说无套裤党人——特别是店主、作坊老板以及他们当中的其他小有产者——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在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期间，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些分子在巴黎各区非常活跃的时候，有许多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要求的请愿和决议〔参看马尔科夫和索布尔：《巴黎无套裤党人》（Markov and Soboul，*Die Sanskulotten von Paris* ），散见于第2—5章〕。然而，除去1793年9月4日到5日的运动以外，这些在鼓动参加革命运动上并没能起任何作用。

[48]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La révolution de* 1789），第141—142页。

[49] 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46—49、151—157页。

[50] 国家档案馆文件：W12，第200—201号。

[51] 塞-埃·拉布鲁萨：《法国的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 ’économie française* ），第42—50页。

[52] 参阅附录七，第一表。

[53] 参阅本书第36—38页；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

卷，第72页。

[54] 参阅本书第47—49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C221，第160/146号，对开本第48页。

[56]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10、312、320、332、341、344、348、351、378、384页。

[57]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Z^{1a} 886。

[58]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五章。

[59] 参看本书第二篇第六章。尽管工资劳动者的这些独立的运动——特别是1791年和1794年的运动——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但它们在鼓动参加这一时期的骚动上似乎并没有起任何显著的作用（当然，除非我们把热月9日工人在市政厅前的示威也包括在内）。最常推动工资劳动者的经济动机，自然是他们和全体“贱民”所共有的那一种——对于价廉而充足的面包的需要。

[60] 然而，当一个妇女在以侮辱拉斐德和国民自卫军罪被控时，她尖刻地回答说，如果控告人和挣面包吃的人有同样的痛苦遭遇，她就不会这样袒护他们了（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53，对开本第7页）；还有一个厨娘，当她被问到如何解释对国民自卫军的仇视时，她说，由于面包商缺少找零的钱，因此感到买面包时很困难（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85，对开本第117页）。

[61] 参阅本书第101—103、105—107页。

[62] 参阅本书第119—124页。

[63]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3688^{2}；AF^{IV} 1470；F^{1c} 111赛纳27。

[64] 参阅本书第131—132页。

[65]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九章。

[66]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章。

[67] 参阅本书第二篇第十一章。

[68] 诚然，这里面也牵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牧月彻底失败之后来从事一致行动有纯技术性的困难；但是这丝毫也无损于这一论点。

第十四章 革命活动的产生

但是，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其中有一些我们可以试着作出一种回答。革命思想和革命口号是怎样传播给群众的？标志着革命群众特点的那种紧张、猛烈、大胆和英雄主义的特殊气氛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巴黎的各次革命暴动是怎样酝酿和组织的？在领袖和时常组织起来响应他们的战斗号召的群众之间有什么联系？群众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发的？

当然，群众意见——作为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那些个人的意见——

显然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自身的直接经验形成的。有些历史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关于他们对经济危机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已经说明很多了，因而没有必要再多做论述。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贱民”从其他社会集团那里取得的和吸收了的那些思想和口号，这些思想和口号，如我们看到的，不但使他们有了一套新的政治语汇，而且也使他们在各次革命大骚动中作为革命记者和政治家的同盟者参加了战斗。这些思想是怎样传播给他们的呢？至少在乡村里，几乎全都是文盲，这种传播一定主要是口头的[1]；即使在省城和市镇（阿瑟·杨格发现那些地方也是报纸奇缺[2]），1789年第三等级代表的报告也都是在大广场上或市政厅外面向他们的选民高声宣读的[3]。我们也可以假定，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1793年陆军部免费发给各军事单位[4]）也是用来在营房里达到同样目的的工具；我们听说1791年的宪法在制宪议会通过以前，也是通过在工人和其他人的集会上朗读来加以讨论的[5]。

但是，如果认为至少巴黎无套裤党人没有直接读过政治思想家和记者的著作，那就不免是一种错误。在首都，识字者看来要比外省多得多，同时代的观察家和警察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在1789年这样写道：

近来，首都的工人们变得难以驾驭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书中读到了一条他们认为非常有力量的真理：工人是最宝贵的人[6]。

他这样说无疑是有些夸大，但是警察局和各区的关于这一时期骚动被捕者的警察报告表明，绝大多数小作坊老板、商贩和一大部分成年男子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帮工——至少能签署自己的名字[7]。虽然我们也许可以认为，直接阅读卢梭或任何其他哲学原著的无套裤党人并不多[8]，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些小册子的作者和政治作家是直接向他们（包括他们当中的妇女在内）喊话的。许多小册子不仅意在反映郊区和市场的看法，而且是用通俗的语言写成的，这就足以说明这个问

题。艾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是一个明显的恰当例子。有趣的是我们看到1789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卖鱼妇和市场挑夫的第一次对话》的小册子，里面用一个市场妇女的口吻说："太太，我盼望我们能读书识字。[9]"1791年，民主派特别努力于打动挣工资的居民：马拉的《人民之友》刊登了补鞋匠帮工和建筑工人的来信[10]；路易·罗培于1791年6月在联谊会叙述"国民中最没有知识的阶级"入会情况时写道："报纸已经不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它们唤起了这个阶级教育自己的愿望。"[11]同年警察局所作关于马尔斯教场事件的报告中，也有证据表明，至少有一大部分活跃的帮工和其他工人阅读革命报刊。例如，厨娘康斯坦·埃符娜告诉格雷讷累喷泉区的警务委员，说她阅读普律多姆、马拉、奥杜安、卡米累·德姆连作品，还常看《人民喉舌》[12]；一名烟草工人被捕时，发现带有《人民之友》；一名流动商贩讲述他的观点来自马拉和普律多姆；一名鞋匠帮工力言他的意见是由于阅读民主报刊而形成的[13]。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因政治犯罪而在巴黎各区被捕的250人中，有12人是报贩，他们的罪名是向这类主顾分发小册子和报纸[14]。如果积极的工资劳动者的情形是如此，我们就只能认为民主派的报刊在小作坊老板和商贩中销路一定更为广泛，这些人的文化通常高于他们的帮工，而且常常左右他们的观点。

所以，情况似乎很可能是：期刊和小册子在形成群众对当时主要政治问题的意见上起了主要作用，并且至少也有时候在为首都的巨大革命事件直接准备这样的舆论上起有重要作用。我们已经见到民主报刊和哥德利埃俱乐部在1791年的骚动中所起的作用。马拉在1793年2月25日的《政论家》上猛烈地煽动群众反对商人和杂货店主，无疑助长了随之而来的杂货骚动的紧张气氛。此外，根据警察局告密者的说法，在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日起义前夕，有人把500多份《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分发给适当选定的首都各区[15]。不过，大体上说来，这些事件的大部分参加者可能是用其他方式吸引来的。

由于无套裤党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尤其是加入了各俱乐部和各社团以及各区委员会，他们就更有系统地接受了先进政治集团的思想教育。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无套裤党人怎样最初被排斥于这些团体的权威地位之外，后来却逐渐“攻占”了这些团体，甚至于——虽然是短时期的——把这些团体变为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而不是表达建立这些团体的政治领导人观点的工具。当1789年7月国民自卫军组成的时候，巴那夫高兴地说，它至少大部分是由“善良的资产阶级”组成的 [16] 。不久以后，“消极”公民无形地被排除于它的队伍之外 [17] ；但是，这种界限在1792年夏季被取消了；从1793年5月安利奥被任命为总司令起，它便成了主要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部队，并且在许多个月中一直是听命于雅各宾派公社的工具。毫无疑问，未来的牧月武装起义的军事干部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成长起来的。

俱乐部和各群众社团在以雅各宾派的主张对巴黎“贱民”进行政治教育上一定也起了更为显著的作用。我们已经谈过，在1791年马尔斯教场示威和请愿之前的那几个月中，某些俱乐部和社团，也就是所谓联谊社团，在厨师、运水工人和其他非技术工人的意见形成上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段时期“母”社哥德利埃俱乐部由于把会费降低到每月2苏，已经向“消极”公民敞开了大门 [18] 。在这一时期，像雅各宾联谊俱乐部、市场区俱乐部、暴君主敌协会等社团，主要都是由这些分子组成的，它们的每次集会能够吸引300人至800人不等 [19] 。到1792年初，到处都在成立这类社团，同年5月，戈布兰区挂毯工场曾抱怨工人们“长期守在俱乐部” [20] 。一年之后，伟人祠区的一个书籍装订商在抗议雇来建筑圣日讷维叶教堂的工人行为越轨时说，“他们组织了俱乐部，并且在区议会之外或开会以后另外开会” [21] 。

各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由无套裤党人组成的。在其代表的就职会议上，它们曾请求公社和国民大会给它们的成员以补偿，“因为他们全都是以劳动为生的工人” [22] 。甚至于在现代化居民区西部边界上

的香榭丽舍区，在1793年6月也有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杂有几个资产阶级分子”的委员会[23]。从以前引用过的数字上，我们看到共和国第二年绝大多数委员是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工匠，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委员是租金收入者、工场主、公务员、承包商和专门职业者[24]。虽然关于巴黎人民团体的组成，我们知道的要少得多，但看来大体上与此相似[25]。这一时期的巴黎公社的组成也是一样[26]。政府对损失工作时间的人发给40苏的补助金保证了为数可观的无套裤党人经常出席各区大会[27]。情况既然如此，这些团体时常成为无套裤党人本身观点——诚然，一部分是从革命领袖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国民大会多数派观点的传播中心这件事就不足为奇了。这当然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1794年春季这些社团大部分都被封闭和各区的独立性受到限制[28]——热月以后“温和”的国民大会用大批“清洗”和改组公社、民政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以及停发40苏补助费等方法更快地完成了这一过程[29]。如我们所看到的，到1795年9月，已经没有任何直接表达无套裤党人意见的社团、俱乐部、委员会和区议会了；当召开预选会讨论共和国第三年宪法草案时，只有很少几个工人参加会议[30]。从此以后，他们又只能在街头、作坊和市场上进行鼓动和发泄他们的不满了。

尽管如此，公共集会场所、作坊、酒店、市场和食品商店等处的谈论在传播思想和形成意见上一定仍起有相当的——也许是很大的——作用。警察报告和其他关于这一时期骚动的同时代评论都充分证明了这种看法。在贵族反叛时期，新桥和多飞内广场是议论政治和革命骚动的主要中心：这当然是由于它们紧邻法院，是法官和他们最有力的支持者、律师的书记和庭丁们的活动场所。1789年6月，一度在东部郊区的骚动中心，转移到罗亚尔宫，奥尔良公爵和追随他的那一群演说家、小册子作者和记者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总部。6月30日夜间，群众就是从这里出发去释放亚培监狱里的11名法兰西自卫军士兵，他们被关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曾经拒绝向一星期前因反对宫廷企图解除内克尔职务而在凡尔赛示威的巴黎市民开枪[31]。也是在罗亚尔宫，卡米累·德姆连等人于7月

12日发出武装起来的号召，点燃了巴黎革命的烈火；人们也是从这里出发去破坏关卡，在寺院和枪炮作坊里搜索武器，并从圣拉扎尔男修道院把粮食运到中央市场[32]。在为10月的进军凡尔赛作舆论准备上，罗亚尔宫也起了作用；就是在罗亚尔宫花园里和咖啡馆里，圣杜律治侯爵和他的同伴企图以煽动巴黎市民在8月底进军来加速解决问题；这里的演说家在10月4日的重新煽动上却获得了更大的成就[33]。在以后几年，罗亚尔宫（不久更名为平等厅）的拱廊和花园成了臭名远扬的娼妓、投机者和赌徒的出没场所，而不再是政治记者和演说家的活动地点；但在热月之后，它又重新成为骚动中心：在1795年春季，它成为“纨绔子弟”和无套裤党人的舌战之地，在葡月以前的日子里，这里曾发生过保王派青年和共和派军队之间的更为猛烈的冲突。在其他场合，罗亚尔宫可能不如格累夫广场有名，因为这个广场和人烟稠密的各区很近，并且就在市政府的门前（我们已经看到它在7月13日、1789年10月5日和热月9日的重要性）[34]；此外，罗亚尔宫也可能不如马尔斯教场有名，因为这个教场已经成了有组织的盛大庆祝或示威的集合地点，或者不如斐扬派平坛有名，因为它就在国民大会的入口处。其他当地的集合中心是圣安东郊区大街和莫弗塔街。

小作坊在为舆论作准备上所起的作用在文献上能够找到的证明比较少，老板和帮工们就在这些小作坊里一起劳动，并且也常常一起吃饭和睡觉，在这里，老板们对于时局问题的看法常常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警察报告里也能偶尔看到这种关系。例如我们看到瓷器制造商奥列弗，或有意或无意地、不厌其详地转述了累维伊扬据说在圣马格里特地方议会发表的关于工人工资的演说，借以煽动他的工人反对累维伊扬。更典型的例子是师傅同帮工一起肩荷着武器去参加革命武装暴动：我们看到酿酒者桑代尔如何带着自己的一名帮工到巴士底去（在圣安东郊区，当时类似这样的例子一定很多）；此外，我们看到皮埃尔·欧迈特，一个细木工帮工，在1792年8月10日伴同他的雇主到图伊勒里宫去；伤兵院区农场主葛勒在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中曾安排他的两个农

场助手轮流服役。在其他场合，我们也听到作坊老板受到敌对的见证人的控诉，说他们煽动自己的工人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和牧月起义这一类运动。[35]

酒店也可能是沟通革命思想的同样有力量的地方。不仅酒商看来是最坚持革命的一个集团——注意他们在攻打巴士底的人中所占的数目，在烧毁关卡当中，他们的数目还要大[36]——而且他们的酒店也是郊区和市场“贱民”的公共消遣之所，特别是在星期日和星期一，这些人成群地越过关卡聚集在众所熟知的库提厄、鲍雪隆和新法兰西酒店里。这些酒店成了谈论国事和交换新闻与谣言的方便中心，就因为这个以及其他原因，巴黎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在周末发生或得到推动也许就不是偶然的了[37]。考斯道夫·博尔的那篇文章是言过其实的，但是他断定许多攻打巴士底的人都来自圣安东区的酒店的说法却不无正确之处[38]。例如，贩运大理石的约瑟夫·夏诺在累维伊扬骚动中被一块落下来的瓦片砸伤了，他承认是在一个酒店里坐着喝酒的时候被一群巡回的骚动者拉出来的；那一次的其他被捕者也有类似的说法[39]。一个蜡烛商的油脂搬运工让-尼古拉·丕平，在详细叙述他在7月革命中的经验时说，“在新法兰西酒馆卖金太阳酒的老夏维那里”酒足饭饱以后，于12日夜间加入了圣马丁关卡附近的骚动者[40]。

食品商店和市场更是显而易见的骚动中心。在物资缺乏和价格高昂的日子里，人们在杂货店、肉铺和面包房排队之际很容易发脾气。根据哈代的证明，我们已经看到，在巴黎革命爆发前的若干星期中，政府为预防骚动曾调派军队进入市场并在面包店门前设置岗哨；并且也看到，在随之而来的夏天和秋天里，当这种措施不再成为可能时，面包商怎样不止一次地成为群众暴动的牺牲者。虽然在1789年以后不再采取“灯柱上吊人”的办法，但如已经充分证明的，面包房和杂货店，仍然是一般骚动的中心和常常达到起义程度的群众示威的出发地点。

聚集在市场、面包房和酒店的工匠、工资劳动者和家庭妇女怎样从这种规模较小的团体开始发展成为带来一切恐怖表现、英雄主义和破坏性暴行的伟大革命群众的呢？历史家们似乎不大愿意探讨这类问题，认为它们特别属于社会学家或群众心理学家的研究范围[41]。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眼光或可靠的文献，专家们也同样容易误入歧途，正如写了不少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的考斯道夫·勒朋一样。按照勒朋的说法，革命群众往往是由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和具有破坏天性的人构成的，他们都是或多或少消极地响应“领导者”的号召[42]——这表明作者不仅是拾泰讷的牙慧，而且表明作者想把他的革命群众的一般化概念同样应用于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乔治·勒菲富尔与此相反，曾经论证革命群众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它虽然符合于某些一般的发展规律，可是它是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并且是特殊的社会压力和思想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情况正是如此[43]。

在这一方面，当然有必要把群众为了直接响应领导人的号召而集合起来的示威运动和其余的骚动分开——如1791年7月17日马尔斯教场事件，1792年8月武装进攻图伊勒里宫和1793年6月2日驱逐吉伦德党议员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等都是这一类的示威运动。在这些情况下，无论一般的或特殊的参加者都是心悦诚服地为同一目标而战斗，群众的共同心理和组织这个示威运动的个人或集团的心理完全一致，没有从这一种心理到另一种心理的突然变化[44]——自然，除非某些意想不到的新因素参加进来破坏了平衡[45]。1792年6月20日一类的示威似乎属于另一种类型：这一次，公民们在他们公认的领袖率领之下的和平游行，由于冲入图伊勒里宫（可能纯粹出于自发），竟一变而成为对于国王本人权威的猛烈而自发的挑战。

事实上，标志着革命群众的最典型的形式的正是这种变化或转化的因素——在革命开始阶段，国民自卫军组织还没有建立，各区还没有设立一种可以更有计划地来组织对当局挑战的机构，这种形式是最为常见

的[46]。例如我们看到，1788年法院书记和老城区帮工的并没有多大害处的庆祝，由于郊区和市场区的小作坊老板、帮工的参加，就转化为达到起义程度的暴动了；这种转化并不是领导人伺隙煽动的结果（如泰讷和勒朋所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由于面包价格的暴涨对零星消费者发生了影响造成的。构成累维伊扬骚动事件的原因，在累维伊扬和亨利奥于4月23日作了激怒群众的演说后已经存在，因此在骚动的过程中就没有这种突然转化。然而，这次骚动却从酒店、作坊里的群众发牢骚和通过邻近各区的结队游行发展成为28日夜间在圣安东郊区的疯狂的破坏和对于枪弹的英勇抵抗。这里，暴动速度和性质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因素的干预，不如说是由于参加示威者人数的增多和当时存在的因三级会议即将到来而产生的紧张激动的气氛。

1789年夏季和秋季的两次规模巨大的巴黎起义，足可以作为这种转化的典型例子。第一次起义是星期日，在罗亚尔宫里散步的心境和平的群众，听到了内克尔解职的消息和奥尔良公爵周围演说家发出的准备战斗的号召，像触电一样突然变成了一种革命的力量。从这以后产生了即使最机敏和最坚决的宫廷反对派也无法计划或预见其一切的一系列事件：举着内克尔和奥尔良公爵肖像在大街上游行；对关卡和圣拉扎尔修道院的袭击；在枪炮作坊、寺院和兵工场里搜索武器；在正在组成新市府的市政厅外面示威；为了寻找武器以武装新成立的资产阶级民兵而展开对于伤兵院的进攻；最后（一部分是有计划的，但主要是整个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是对巴士底的正面进攻和杀害德洛纳与弗勒塞尔[47]。在10月，我们看到了同样类型的发生和发展，虽然起义的最后阶段比较明确地带有政治方向。自然，对于10月5日清晨要求供应较廉价和较充分面包的绝大多数家庭主妇及市场妇女来说，正如对于偶然在场的观察家一样，暴动的开始放枪一定看来不过是9月里整个一系列同样示威的继续。甚至于群众闯入市政厅也不过是前几周同样形式的抗议在一个更大的和更猛烈的规模上的重演。但是妇女们的转趋凡尔赛（一部分是由于“爱国派”几周来的鼓动，一部分是由于马伊雅和他的巴士底义勇队

的参加）却赋予了她们的示威一种全新的政治内容。从这时起，虽然示威所抱的仍然主要是经济目的，但它已经与“爱国派”所发动的并受到巴黎国民自卫军游行队伍支持的政治起义合二为一了[48]。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群众的性质和行动的转化可能是由于插进了各种极为不同的因素造成的。领导者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他们并不起泰讷和考斯道夫·勒朋为他们规定的那种突出的作用；关于他们以后还要谈到。但是有一个因素我们必须在这里予以注意，虽然它并不是法国革命事件所特有的，事实上它可能是在一切时间和一切地点造成某种群众心理状态的永久性的要素之一。这就是由谣言造成的恐怖和疑惧——在交通困难、消息迟缓和不容易得到的情况下，特别易于发展。不论它在其他情况下的直接起因是什么，这里，这种恐惧产生于对极其重要的三件东西——财产、生命和生活资料的真正的或者想象的威胁。我们看到这种恐惧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发生在革命年代里——既发生在城市也发生在乡村——并且随着1792年4月里战争的爆发而更为常见。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人们对于“饥荒协定”怀着恐惧，根据这个协定人们认为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在有意识地制造一种面包缺乏以饿死广大人民。在1775年的粮食暴动时期，一种类似的想法为人们所相信——虽然这次说的是杜尔而不是国王——因而大概帮助了暴动的扩展和延续。在革命时期，新的当局，有时候是磨坊主和面包商，往往被加上类似的罪名，因为我们在累维伊扬暴动以后几个星期里的圣安东郊区的不安中，在反对垄断者的不断呼声中，在对磨坊主和面包商以及圣丹尼区的区长助理夏特耳的暴力攻击中，都看到了这种想法。这种想法几乎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10月5日到6日的骚乱中暂时被“爱国派”转移了方向。在1792年和1793年的袭击杂货店事件中，在牧月和葡月前夕，这种想法都曾经再次出现。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曾利用它对艾贝尔和他的同伙提出控诉，于是他们在1794年春天连同其他罪状被冠以阴谋制造动乱以断绝首都供应的罪名。[49]

另一个时常想到的问题是担心财产遭受攻击，这种恐惧对于资产阶级、富农和农业经营者特别有影响，但是它也与无套裤党人中间的小有产者有重要关系。我们看到，这种恐惧在人们不断谈到“土地法”的可怕中得到了清晰的说明，并且被用来有效地动摇了雅各宾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派威胁着要实现一部分财产分配的决心。但是，它的最突出的表现是1789年夏季袭击了大部分巴黎郊区，并且影响了巴黎本身的恐惧——历史家称为“大恐怖”的那一个插曲。它的起源一方面是产生自1787年至1789年经济危机中农村人口的失业和流离失所，一方面是人们普遍相信特权阶级准备粉碎召开三级会议所唤起的希望和幻想。因此，乡村的流浪汉——漂泊者或匪徒——被认为是执行“贵族阴谋”的爪牙，他们随时都会进攻农村小有产者，因而引起了普遍的恐惧。在村庄里，农民武装起来应付后来证明并不存在的危险，他们的这种防御性组织不久就变成了焚烧城堡和消灭庄园契据的进攻性集团[50]。巴黎也受到了它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农村失业者出现在市内，他们当中许多人被赶入圣母山上的救济工场，其他的人在街头游荡，这就引起了同样的恐怖。这自然就是巴黎资产阶级义勇队建立的一部分背景，这个义勇队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对付可怕的流浪者对财产的进攻，另一方面是为了防备凡尔赛宫廷派在首都发动军事政变，哈代在叙述巴士底陷落后第二天的事情时，就曾反映了这种恐怖[51]。1791年春季，再度发生这种恐怖，特别是在国王出走瓦雷讷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对于巴黎市政当局和制宪议会的多数人来说，不久以后终于要从救济工场中解散的失业者是科布兰兹流亡者手下实际的或潜伏的特务——《杂谈》称之为“被乱党雇用的那些人”[52]。有些民主派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如激进派的记者路斯塔洛把“无产阶级”和“所有容易被人收买的公民”两种人等同起来；即使对穷人十分同情的马拉也担心救济工场的工人可能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现成工具[53]。1791年7月示威运动的前夕，谣传有人阴谋劫走王室并在主要来自于失业者的4万人协助之下在首都纵火[54]，并且人们普遍相信，穷人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大屠杀”而对有产阶级采取大规模的复仇行动[55]。

这种恐惧可能在革命民主派和西部各区的保守分子中引起战斗的反应。关于前一种倾向我们看到的例证是，谣传即将发生监狱暴动——各种监狱阴谋——所引起的许多恐惧和1794年春季比较不著名的那一次军事阴谋事件 [56] 。关于第二种倾向，我们看到的典型例证是，葡月前夕笼罩于巴黎各区的恐惧。当时，店主、公务员、有产者为了反对可怕的恐怖分子或嗜血鬼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而迅速拿起武器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正在释放惯匪和监狱中的囚徒来对他们进行袭击。当然，在这种情形下，保王派为了于己有利，会把这种恐惧转变成反对国民大会的武装叛变 [57] 。

第三种恐惧是从对生命的威胁中产生的，这种恐惧自然和前一项恐惧有密切关系，并且，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有时候同时出现。在围攻巴士底时我们看到了这种恐惧。当时，德洛纳向集合群众开枪的愚蠢行动引起了“有阴谋”的呼喊和对要塞司令与若干守军的屠杀 [58] 。在1792年8月进攻图伊勒里宫时发生了几乎相同的情况。不过，这些恐惧只是暂时的，虽然影响了围攻者和支持他们的人的行动，但并没有怎样改变事变的进程。规模更大和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路易十六被赶出图伊勒里宫以后发生的恐惧。当时，在义勇军开赴前线的同时，谣传说监狱里的犯人正在等待机会越狱出来屠杀妇孺和老人，因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气氛，导致了9月的大屠杀。

这种自卫行动是无套裤党人、小有产者甚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在法国革命前夕和革命进程中发展起来的许多情况的典型反应。只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从柏克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把革命说成是持续不断的革新，或者说成是“政治救世主义”的信徒对于哲学家们孕育已久的方案的有计划的揭露 [59] 。这种设想除了有其他错误之外，再一次把无套裤党降低到消极工具的地位——自然，除非能够证明无套裤党人也渗透有这种“全面革新”的愿望。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无套裤党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或者按照新的标

准来改造社会，而是为了收回传统的权利，维持他们认为由于部长、资本家、投机者、农业“改良家”或市政当局的革新而受到了威胁的标准。这种对于事情的守势反应是导向革命或标志革命发展的每一次巨大暴动的特点。1788年8月到10月参与骚动的书记和帮工为了反对国王的大臣们的革新，曾高呼亨利四世万岁并声言最高法院是“古代自由”的保卫者。累维伊扬暴动是圣安东郊区工资劳动者的一种自卫行动，它的产生据说是因为反对本区两个雇主对于工资和生活标准发出威胁。1789年7月的巴黎革命开始时是对于一名深得人心的大臣被免职的抗议，以后发展成为反对显然产生在凡尔赛宫的“贵族阴谋”的群众自卫行动。在以后几个星期中，成群结伙的农民攻击贵族城堡和焚毁财务契据，是对于领主们的革新的有力回击——这些领主对于封建契据实行分类和扩大领主的权利对农民的传统产权构成了一种侵犯。十月暴动所采取的形式是要求恢复较为廉价而供应充足的面包和反对宫廷正在准备的军事措施的自卫行动；而强迫国王回到首都则是在王室和巴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复活了一种古老的传统。甚至王室的被推翻也同样既是一贯的共和派所拟定的那些计划的必然结果，又是在对抗反革命阴谋的一种自卫运动中的一个最后行动。我们已经看到，在葡月以前武装起来的多数各区不但不认为他们自己是反对依法组织起来的政府当局的叛徒，而且相信他们是为保卫自己而对一个暴虐的国民大会进攻作战。屡次爆发的群众物价管制或群众平价运动，难道不正是零星消费者主张他们有受保护的传统权利来反对资本家的“自由市场”和新奇的供求原则的革新运动吗？然而，在当时的革命危机的状况下，每一次这样的运动，除去葡月以外，都是推动革命前进的，都有助于把封建主义更深地埋进坟墓和使比较自觉的激进集团的目标得到实现。

这些暴动者和示威者的行动往往在表面上采取传统的形式，而且我们能在许多革命骚动中看到过去事件的映射，这也许并没有什么奇怪的。破坏城堡或屠杀引起群众不满的人，如德洛纳、弗勒塞尔、富龙和贝梯埃等，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革新：起事者是在走15世纪和17世纪的农

民暴动与其他时期较近的群众爆发愤怒的老路。1789年和1793年的群众平价运动有1752年[60]和1775年的先例。卡隆告诉我们，1792年9月的监狱大屠杀标志着人民主张一种古老的权利，即“保留的裁判权”——统治者不必通过正常司法程序来处理案件的特权。这种权利在传统上是授给国王的，但是从8月10日以后就落到自主的人民手中了[61]。请求国王作为人民的保护者出面仲裁的凡尔赛进军，也有1775年骚动[62]和较晚的1786年的巴黎运输工人的罢工[63]作为先例。甚至于进军者所高唱的“我们去找那个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和那个小老板”所表现的情绪和1674年波尔多农民的“国王万岁，取消盐税”的口号，以及1775年5月一名巴黎锁匠师傅喊出的“国王万岁，面包减价”[64]的口号所表现的情绪都是相似的。1789年7月叛乱农民的领袖把他们焚烧和破坏贵族财产的行为说成是国王授予的权限（“受命于国王”），也同样表明人民把国王当作保护者的观念；与此相呼应的是，在1775年粮食骚动期间，人们也相信国王曾亲自干预，把谷物、面粉和面包价格降低到一个公平合理的水平[65]。除去1793年6月2日和8月10日的武装起义以外，我们也许只能在1791年7月和1792年6月的请愿以及1794年军火工人的骚动中看到在未来的工业城市社会出现的新的行动方式。

我们固然不应该低估下列两种情况，即一方面革命领导人虽然寝馈于新的哲学思想，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要以前事为师；另一方面，他们不但没有采取一种首尾一贯的全面革新纲领，而且还时常急不暇择地从这一种政治手段改取另一种政治手段——战争的紧急情况、社会的需要调和和缺少传统的政治经验，这一切，在整个过程中都起有作用。但是他们的利益或环境却在引导他们企图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如我们已看到的，不止一次地导致他们和无套裤党人发生冲突，或者使他们企图采取迂回的路线与无套裤党人和解，或者是把无套裤党人的力量引导到“安全”的政治道路上去。如我们看到的，这些企图在从攻克巴士底起到斥逐吉伦德党为止的各次巨大政治骚动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在无套裤党要走他们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如在累维伊扬暴动和

1793年2月的粮食暴动中，这些企图就失败了；不过，这些失败还不是不可挽救的灾难。最严重的失败是雅各宾派在1794年夏天没能再得到无套裤党人的效忠，那时，革命政府和无套裤党之间的裂痕已经无可弥补，因而加速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在热月的灭亡[66]。这只能再一次说明：革命群众的组成分子虽然吸收了雅各宾派和进步的民主派的政治思想，但仍有他们自己的社会要求，为了坚持提出这些要求，他们甚至会违反革命领导人本身的劝告，有时甚至会违反他们的利益。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研究，这就是：不论无套裤党人是直接卷入或者被号召参加革命时期的巨大政治示威和暴动，或者是在自发地行动，所通过的人事媒介到底是什么呢？自然，十分明显的是，每一次巨大的政治骚动，虽然很难预测其准确的结果，但都经过相当的准备工作，并且常常是在当局充分了解之下进行的，这里面包括各区的决议案和代表团、演讲、报纸文章，甚至于建立各区的通信或联络委员会以在指定的日子里协商和指挥一切行动——如1793年5月、6月、8月10日以及葡月时的情况。这当然已经足以说明无套裤党人是怎样被吸收进来和怎样取得他们的同情的，特别是在地方社团、议会和委员会为他们中间最积极的分子所塞满或支配的年代里。此外，当正在发生的活动是由军事单位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进行的时候，领导者和参加者之间的沟通途径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不过，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仍有一个因素是我们所没有注意的，而各种文献也常常很少谈到这个因素：群众是怎样并且在什么阶段参加革命的，口号和行动计划是怎样传达的？我们偶然也能看到这种正在进行的传达方式——例如，在焚毁关卡事件中，我们从许多见证人的证明那里知道，地方领袖是在罗亚尔宫的直接命令之下行动的[67]。再如在10月5日，我们发现斯塔尼拉·马伊雅和妇女的代言人商议着怎样指挥行动；美洲人富尼叶怎样匆忙赶回他的圣尤斯塔区鼓动对游行者给以支持，并在凡尔赛煽动卖鱼妇要求国王回到巴黎[68]。但是，这种偶然看到的材料非常稀少，而暴动的真正关键之所在是我们一般所发现不了的；不过，根据以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假定，在这些

和相似的事件中，最高领导人和广大参加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像马伊雅和富尼叶这些次要的领袖以及其他人如圣杜律治、圣费利、太鲁瓦思·德梅库尔和克累勒·拉刚布等来保持着的。

但是，来自其他社会集团的这些中间人本身并不是无套裤党人。因此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无套裤党究竟有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来和资产阶级各集团及各党派的代理人合作或接受他们的命令呢？而在他们自己行动起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领袖来鼓动和领导他们呢？他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的自发性特别强呢？毋庸置疑，在这些场合下当然有人表现得比他们的伙伴更热情、更积极、更勇敢，或者采取了更惊人的暴力行为，因而引起了警察、国民自卫军或旁观者的注意。例如，在累维伊扬暴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个名叫玛丽-贞尼·特鲁摩的女人，她是伯尔的妻子，一个市场妇女，曾因高呼“干哪，第三等级万岁”和“去找累维伊扬”等口号来煽动骚动者抢掠和放火而被判处死刑（虽然之后被赦免了）[69]。据目击者说，在焚烧关卡的那些无套裤党人中间，带头的是一个酒商助手巴塔厄和一个码头工人杜蒙（化名卡德）[70]。在妇女进军凡尔赛时，据马伊雅说，她们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个不识字的护士，一个搬运夫的妻子拉瓦朗讷太太，虽然她声称自己是被迫参加的[71]。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那些人里面，我们曾提到惹人注目的厨娘康斯坦·埃符娜——虽然她在政治意见方面的成熟要比她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更引人注意[72]。在1793年2月的杂货暴动期间，根据警察记录，有几个人在鼓动群众不满和规定食粮、蜡烛及咖啡应有的售价上起了突出的作用。兵工场区警务委员的一份详细的报告中说，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漂亮女人……身高约五尺一寸，30来岁……穿着一件时髦的深蓝色布便服，披着一块黑色丝绸披肩，并且有一块带钢链的金怀表……这个妇女尽可能地扩大暴动范围……也正是她规定了肥皂价格为每磅12里弗，糖18里弗[73]。

牧月事件以后，有些人被向治安委员会和特别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告发为骚乱的带头者；这些人有的是过去“革命军”的成员，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曾经因为具有人所共知的共和国第二年的军事履历而被选出来领导本区起义的国民自卫军部队[74]。在这一例子中，我们所谈的是有经验的雅各宾派干部，他们是在革命的年代中成为领袖的；但这只是后来的现象，在1791年夏季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有这种情况[75]。在以前所引证的例子中，那些被认为起主要作用的可能都是以前完全没有战斗经历的人，他们之所以知名也许是由于他们在那一特殊事件中特别活跃或勇敢；我们甚至可以完全接受这样一种人们常听到的说法，就是这类领袖的产生是出于有意，也同样可以说是出于偶然，他们有的是受邻居或游行的队伍所劝说或裹胁。事实上，不管玛丽-贞尼·特鲁摩或拉瓦朗讷太太怎样表现了暂时的斗争精神，她们也不会和1775年布里埃-孔特-罗培地方粮食暴动中作为暴动领袖出现的乡村妇女有什么不同的经历。当警察要这个乡村妇女解释她的不法行为时，她朴实地回答说，

她是被拉来的……她的脑袋长得和别的女人的脑袋一样，她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干的是什么……[76]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公认的那种意义上的领袖，战士或积极分子与普通参加者之间的分别也消失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革命后期就不是这种情形，那时，俱乐部和社团有充足的时间从无套裤党的群众中间挑出人来把他们训练和装备成战士与领导者。但是，至少在最初几年里，在我们对小册子、杂志，及公共集会场所、食品商店和市场中的口头宣传等在产生革命行动上所起的作用作过说明以后，这里仍然存在我们不能予以精确分析的自发性这一因素。

---

[1] 关于这一时期农民文盲，可参看埃·商皮昂：《从1789年的记事看当时的法国》（E.Champion，*La France d’après les cahiers de* 1789），1921年巴黎版，第209—210页；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D.Mornet，*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33年巴黎版，第420—425

页。

[2] 阿瑟·杨格：《法国和意大利游记》，第174、178—179、182、185—186页。

[3]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83—84页。

[4] 陆军部每日订阅的份数从1793年9月18日起，由8000份增为12 000份（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0卷，第2221号）。

[5] 《内外新闻》，第8期，1791年4月23日。

[6] 雷斯提夫·德·拉·布累托内：《我的随笔录》（Restif de la Bretonne，*Mes inscriptions .Journal intime* ），第130页；转引自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426页。

[7] 参阅附录五。识字的程度当然随着工资劳动者的工种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一种和那一种无套裤党人之间差别更大。正如我们可以想到的那样，作坊老板的识字程度比帮工高，帮工比“普通”工人或工场工人高，男子比妇女尤其高得多；在男工中，最低的是革命最初几个月中挤满了救济工场的失业工人和农民。

[8]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看德·莫内：《法国革命的精神来源》，第281、449页。

[9] 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7577，第16页。

[10] 《人民之友》第468期，1791年5月24日，第7页；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11] 《内外新闻》，第24期，1791年5月10日，第376页。

[12] 参阅本书第91—93页。

[1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b 324，第44页；Aa76，对开本第40页；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6，第376号，对开本第37页。

[14] 参阅附录四。

[15] 阿·奥拉尔：《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第1卷，第735页。

[16] 国家档案馆文件：W 12，第197—198号。

[17] 莫·图诺：《法国革命时期巴黎历史书目》（M.Tourneux，*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92年至1913年巴黎版，5卷本，第2卷，第6702号。

[18] 参阅本书第89—91页。

[19] 伊·布丹：《革命时期巴黎的民众团体》，第131—139页。布丹小姐的叙述只包括1790年至1792年这一时期。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O^1 2053。

[21] 1793年5月29日杜达尔给加拉的报告（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1卷，第330页）。

[22] 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0。

[23] 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第2卷，第52页。

[24] 参阅本书第135—138页。

[25] 巴黎社团的这类名单，现存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我所见到的最完整的是法国剧院区“人民共和统一协会”的名单，在1794年1月，它的280名会员中包括大约260多个行业的工匠和店主（15名细木工，24名裁缝和39名鞋匠）、28名小职员、16名各种工资劳动者以及若干商人、承包商和股票投机者等〔大英博物馆文件：F·827（5）〕。我所知道的外省各社团会员的一点情况得自从事于法国外省档案广泛研究的科伯·利夏先生。

[26] 参阅本书第135—137页。

[27] 埃·梅伊埃，《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各区》（E.Mellié，*L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98年巴黎版，第145页。

[28] 仅在1794年5月到6月间，巴黎就有39个这样的社团被封闭〔亚·索布尔：《罗伯斯庇尔和1793年至1794年的群众运动》（“Robespierre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of 1793—4”），载1954年5月号《今昔》，第69页〕。

[29] 参阅本书第147页。

[30] 参阅本书第167—169页。

[31] 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73页；《关于圣日耳曼修道院事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882；马·罗夫：《1789年6月30日和8月30日暴动中的巴黎工人》，载《法国革命》，第63期，1912年7月至12

月，第430—454页。

[32] 参阅本书第53—56页。

[33] 参阅本书第75—78页。

[34] 警察局在1793年至1794年往往到格累夫广场探听无套裤党人的意见；然而，以后在1795年，人们常做这种活动的中心似已向北移到圣马丁门和圣丹尼门（参看卡隆和奥拉尔搜集的这一时期的警察报告，散见各处）。

[35] 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153，对开本第6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 4707，第2号卷；F^7 4735，第2号卷。

[36] 参阅本书附录四。

[37] 累维伊扬骚动和1793年的杂货骚动发生在星期一；1789年的巴黎革命开始于一个星期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示威在一个星期日举行；1793年6月2日（反吉伦德党革命中有决定性的一天）也是一个星期日；另一方面，1792年8月10日则是星期五。

[38] 考斯道夫·博尔：《1789年的共济会叛乱》（G.Bord，“Ld Conspiration maçonnique de 1789”），载《通信杂志》，1906年5月10日和25日，第521—544、757—767页。

[39]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033，15101。

[40] 国家档案馆文件：Z^2 4691。

[41] 参阅卡隆：《九月大屠杀》，第6页。

[42] 考斯道夫·勒朋：《法国革命和革命心理》（G.Lebon，*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psychologie des révolution* ），1912年巴黎版，第55—61、89—93页。同一作者：《群众心理》（*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年巴黎版。

[43]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 ），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1卷（1934年7月），第1—26页；由《法国革命研究》重登（1954年巴黎版），第271—287页。虽然勒菲富尔的研究主要是关于1789年的，他的结论却一般可以应用于1787年至1795年的整个时期。本章的讨论内容主要是我从他那里得来的启发。

[44]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2页。

[45] 例如，马尔斯教场示威初期，两个不知名的人被发现藏匿在祖国之坛下面，再如1792年8月10日瑞士近卫军士兵的“背信”，他们出乎意料地向马赛人开了枪。这两件事情都引起了惊恐和挑起了杀戮。

[46] 勒菲富尔：《革命群众》，第279页。

[47] 参阅本书第52—62页。

[48] 参阅本书第77页以下。

[49] 国家档案馆文件：W76，78；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第11卷，第1—171号。

[50]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

[51] “当时有一种可怕的阴谋，有3万人准备在匪徒支持之下于14日夜间进入首都”（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395页）。并可参看博勒帕勒爵士在1789年8月发表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声言圣母山区失业者正在构筑工事以便对准巴黎架设大炮（《给小马杜林区诸位先生的报告》，国立图书馆文件：Lb 40 285）。

[52] 《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53]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3卷，第388页；《人民之友》，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当然，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最初几年，反革命分子曾企图在郊区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在救济工场的失业者中间煽起不满——对革命和新政权不满；虽然当局和民主派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但是，反革命分子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参看埃·塔尔累：《制宪议会时期的工人阶级和反革命派》（E.Tarlé，“La Classe ouvriére et le parti contre-révolutionnaire sous la Constituante”），载《法国革命》，第57期（1909年），第304—326、385—404页；和拙著《巴黎工资劳动者》（*Parisian Wage-Earners*），第1卷，第260—269页〕。

[54]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8号，对开本第26页。

[55] 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 33，第347号，对开本第9—10页。

[56] 罗·克·科伯：《共和国第二年风月的军事阴谋》（R.C.Cobb，“Le Complot militaire de ventôse an Ⅱ”），载《巴黎与法兰西岛》（*Paris et Île-de-France*），第7期（1956年），第221—250页。

[57] 参阅本书第173—178页。有产者的恐惧转而在监狱犯人中引起了恐

惧，他们害怕1792年9月事件的重演。

[58] 参阅本书第59—61页。

[59] 例如，可参看日·耳·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J.L.Talm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2年伦敦版）。这本书把革命说成是卢梭、马布雷、摩雷利等人的思想和他们的信徒（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及其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这些人“受到了一种全面革新的革命力量，和一种有意识地按照一种合理的终极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的思想的推动”。

[60] 《达冉松侯爵的日记与回忆录》，第7卷，第229页。

[61] 卡隆：《九月大屠杀》，第435—445页。

[62]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La Taxation populaire de mai 1775 à Paris et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43期，1956年，第148页。

[63] 参阅本书第24—25页。

[64] 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77页。

[65] 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111—117、141页；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第147—160页。

[66] 参阅本书第134页以下。

[67] 例如，杜昂耳——以前的一个制锁匠和几个关卡纵火案中的首领——向一个见证人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并且还要完成别的任务”；在圣马丁关卡，一个骚动者用这样的话斥责另一个人：“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放火，因为有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不能抢劫，因为命令禁止我们这样做”；在布朗希关卡，一个男子要大家安静下来听“罗亚尔宫来的命令”（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

[68]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号证人；《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

[69] 国家档案馆文件：Z13981，13454。

[70]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 886。

[71] 《警察局刑事审讯记录……》，第81—82号证人。

[72]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148，对开本第30页。

[73]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 69，对开本第296页。在一般认为骚动从那里开始发生的伦巴底大街上，警察选出粮食市场区卖鱼妇阿尼埃斯·贝尔娜作为特别注意和惩罚的对象；她之后被判处两年徒刑（参阅本书第185—186页）。

[74] 罗·科伯和乔·鲁德：《巴黎革命最后一次群众运动：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事件》，第279页，注2。

[75] 我们在1791年7月的马尔斯教场运动中发现了最早的这类情况：在各区因抗议国民自卫军暴行而被捕的人当中，有3个人是巴士底攻克者（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85，对开本第85—86页；167，对开本第460页；206，对开本第370—372页）。

[76] 国家档案馆文件：Y 11141（对于厄尔省日雇工汤通太太的审讯）。

第十五章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中心问题——参加巴黎伟大革命事变的群众的性质这一问题上来。从我们的分析看来，这些群众是作为革命进程中的积极动因出现的，是由具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利益和愿望的社会成分构成的。然而，他们在这些方面既不是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有矛盾也不是和它们全然无关。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革命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实际上之所以能够爆发——正是因为组成革命群众主体的无套裤党人能够领会并接受开明贵族和资产阶级所宣传的新政治思想。不过，即使革命群众的头脑中充满了这些思想并为它们所鼓舞，我们也不能因此

就认为他们只是中产阶级领袖和利益集团的被动工具，更不能把他们贬为没有任何社会特征的愚昧的“暴民”，或者，把他们说成不过是城市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或社会渣滓。那样的人固然也起了作用，但那完全是次要的，和泰讷或其他作家恶意描绘的到处横行的“暴民”形象没有丝毫相同之处。

密什勒以“人民”称呼他们当然是更接近于事实的，例如，我们看到巴那夫就曾对既非贵族又非资产阶级的革命事变参加者应用过这一名词。然而，这个名词的意义太含混了，因为整个说来，构成暴动者和骚动者主体的固然是“贱民”或“无套裤党”，但他们的组成分子——妇女、工资劳动者、工匠、帮工、小商贩或作坊师傅——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次或那一次中却迥然不同。当然，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一点，这就是：革命群众绝不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概念，正相反，它是由具有各种社会要求的普通男女组成的，这些人对于各式各样的刺激发生反应，在这些刺激中，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以及要求消除眼前和特定的不满的冲动都起了作用。

这种结论是否只是在法国革命这一比较狭窄的范围内有效，还是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应用于其他“革命群众”呢（许多历史学家或者是为了方便，或者是缺乏同情，往往把革命群众描绘成为“暴民”或社会渣滓[1]）？当然，如果我们从本书所研究的事例中作出过分自由和自信的推论，那就要流于狂妄和贻误读者；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例，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在英国和法国爆发的这些和其他的群众运动，仍然有某些共同特征。至少在这一范围内，我们或许可以把我们的结论应用于比较广泛的领域。

我们已经看到革命时期的某些“经济”运动和法国旧制度晚期的经济运动——特别是1775年的运动有相似之处。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断上涨的面粉和面包价格引起了同样的自发反应；在市场和面包铺发生了同

样的骚动；群众强制限价，其规定价格由群众从一个市场传到另一个市场；群众同样几乎是毫无疑问地相信王权的有效和仁慈；谣言对群众活动起了相同的刺激作用；城乡“贱民”的各集团也积极参与了运动，而在他们中间，犯罪分子和地痞流氓并没有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晚至1848年的法国农村暴动，这些特征中有若干（虽然绝非全部）又重新出现[2]。在19世纪初叶的城市革命中，1789年的特征仍然在相当大程度上被保留着，虽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的逐渐变革，也出现了不少新的特征。在1848年，巴黎的外貌及其人口的地理分布大部分仍然和60年前一样[3]；小作坊仍然占主要地位，它们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有势力[4]；而“贱民”的主要集中地仍然是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以及市场以北各区[5]。就我们从有限资料中所知道的而言，1830年7月“光荣三日”的参加者的成分和巴士底攻克者的成分相去不远[6]。和1792年8月10日的先辈一样，1830年的工人离开作坊拿起了武器，他们不但没有鼓励抢劫，而且把抢劫者就地枪决[7]。1848年，作坊老板和帮工仍在一起游行，并且共同把守街垒和在二月暴动中占领了下议院[8]，德·托凯维尔对于2月24日和5月15日群众拥入议会会场的描写，读起来活像是共和国第三年芽月和牧月国民大会中群众大示威的情况[9]；甚至在以后的六月革命中，虽然工人和资产阶级已经到了针锋相对地发生武装冲突的地步，我们看到，暴动者大部分仍属于曾经攻占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的那些人所熟悉的行业：在这次事件中被捕和受控告的11 693中，有554名石匠、510名装修木匠、416名鞋匠、321名家具匠、285名锁匠、286名裁缝、283名油漆匠和191名酒商[10]。但是差别也是同样惊人（如果不是更为惊人）的。即使在2月，工资劳动者在起事者中所占的比例也要比1789年大得多——德·托凯维尔确曾认为革命的胜利者（至少到5月为止）是工人阶级，而其唯一的牺牲者是资产阶级[11]。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却是，在当时的暴动和骚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工资劳动者和独立工匠这时已经在他们自己的政治俱乐部中组织起来，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和领袖的领导下前进，他们这时非但不再响应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口

号，而且已经深受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2]。路易·菲利普时代的工业革命带动了铁路和工业开始机械化。我们在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当中发现，除传统手工业和小作坊的装修木匠、家具匠、锁匠等之外，还有大约80名铁路工人和257名机器匠的名字[13]。正如1848年6月标志着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一样，同时它也标志着无套裤党最后的衰微和工资劳动者的兴起，从此，工资劳动者就成了暴动中的新突击队和革命群众中的主要成分。

我们发现在英国发生的过程也与此相类似，虽然它开始的时期较早。在英国，18世纪的典型农村暴动和法国比起来，甚至更多的是起因于谷物、面粉或面包价格的高涨，其表现形式是各式各样的直接行动——从对于磨坊主、农场主或地方长官的人身攻击，破坏篱笆、关卡栅栏、房屋或磨坊，劫夺储存的粮食和阻截食物运输车辆，到农业工人、矿工和乡村工匠在当地市镇上的巨大示威。这些活动当然会使我们想到同时期法国农民和乡村商贩所进行的类似活动；但是最为酷似的要算是普遍采用“群众平价”或群众限价的办法，英国乡村发生的这种事例似乎比法国还要多：仅在1766年一年间，据韦尔谟思博士记载，在全国市镇和乡村中发生的这类事例就不下22起[14]，地方档案所揭露的无疑更要多得多。到19世纪，这种事件在都市社会中早就中止，唯有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乡村地区，这种类型的暴动——以及它对于群众或“自然”制裁的强调——还在一直继续着。时间可能最晚而规模肯定最大的这方面的事例，是1839年和1842年两次在威尔士西部爆发的“里贝卡暴动”——表面上是反对通行税征收卡，实际上却反映了威尔士农民对于什一税、“外国”地主、作威作福的地方长官、教会捐税、高额地租以及新济贫法的积愤[15]。这两次暴动虽然时间晚，但仍然与18世纪末某些法国的城乡暴动和骚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暴动者的宣传和装束都采用了传统的形式[16]，不时出现当地的领袖或“里贝卡”[17]；在破坏通行税征收卡和济贫院时明确提出“自然制裁”的口号；农夫和农业工人采取联合行动；暴动好像燎原的烈火般从一个地区自发地蔓延到另一个地区[18]

。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在起作用；“里贝卡”夜间闹剧的停止和群众集会以及向国会请愿的代之而起，肯定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政府的镇压奏效，而是由于在雇工坚持要实现自己的特殊要求时，农场主改变了他们的心意[19]。

英国城市暴动性质的改变，也是由于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18世纪，尽管涉及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始终保存着一种令人联想到法国暴动的类型。除了最大的都市以外，在市镇和一切其他城市中流行的形式始终是食物暴动。在伦敦，它很少采取这种形式，虽然食物价格的高昂可能是引起骚动的原因之一[20]。由于历史学家经常重复托利党或威尔克斯派“暴民”的时髦名词，所以这些骚动的真正性质往往被模糊了，同时也模糊了这一事实：参加运动的群众具有自己的社会特征，推动他们的是各种特定不满和与抢劫或获得钱财无关的一些动机。1736年7月的伦敦东区暴动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帮工和工人，因为爱尔兰工人愿意领取较低工资，他们愤而以暴力反对当地爱尔兰人[21]。但是，其他因素，如那一年的烧酒法案和对于瓦尔波尔的使人们受到威胁的消费税的记恨等，也都起了作用。在1768年至1769年的“威尔克斯与自由”暴动和12年后的戈登暴动中，参加者大部分是帮工、学徒、仆役、体力劳动者、小工匠和小商贩。虽然骚动的直接原因在两种场合下截然不同，但这两种运动都是社会抗议运动，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隐藏在背面的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冲突，虽然还不是劳资冲突。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当时英国和法国典型的城市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由地方领袖领导的工资劳动者、工匠和小商贩等“贱民”，通过捣毁橱窗、焚毁他们当时的敌人的肖像或“拆毁”他们的住宅、酒馆或磨坊等形式，施行了一种粗暴的和方便的自然制裁[22]。在戈登暴动中，这种活动的规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单是事后要求赔偿的私人建筑和个人财产损失的数额就达到7万英镑以上。这一特殊情况主要并不是由社会敌对情绪加深造成的，而是因为对于想象中的罗马天主教徒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加所带来的后果抱有恐惧： 当时甚至谣传最高法院院长曼斯菲尔德

勋爵在一夜之间“使国王成了一个天主教徒”！所有这一切的一个有趣的附带结果是：伦敦城的商人和房主面临着双重威胁——政府的军事措施威胁他们的自由，“下层人民”的破坏狂威胁他们的财产——因而提出了巴黎的商人和房主于9年以后提出来的组织资产阶级民兵来保卫自己利益的要求[23]。

在新的工业时代到来以后，这种形式的群众示威没有长期维持下去。随着这一世纪末的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工场制度的兴起，工会变成了更常见的和更稳定的组织，工资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直接冲突成了工业和城市社会更为平常的现象。从18世纪80年代起，罢工开始代替食物暴动和其他的自然制裁运动，成为典型的社会抗议形式。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工资劳动者正在开始代替“城市贫民”“下层人民”或“贱民”（较早时期适用的名词）这样的社会集团，成为城市社会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在英国，这一过程没有带来1848年在法国看到的那种暴力事件或迅速成熟的政治思想；但是一般的过程开始得比较早，到宪章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时，这一过程业已完成。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期，西欧正在发展起一种具有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表现方式的新型的“革命群众”（就这一名词最广泛的含义而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它也迅速地在其他地区出现。这种新型群众或许要比法国革命时期的旧型群众较易于辨认，因此，研究工会或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在利用现有的研究材料来对他们加以说明上并没有落后。可是，旧的坏习惯是不容易消除的，一般的历史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喜欢用方便和现成的词汇来掩盖自己的意图，这些词汇尽管因为袭用已久而变得神圣化了，但仍然是不恰当的和容易引起误解的。毫无疑问，在代表外界利益从事活动的受雇党徒这一意义上，“暴民”一词在写作社会史时是可以使用的，可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应该特别谨慎，而且只能在当时的特殊情况要求使用这一名词时使用。就本书中所能得出的任何一般有效的结论而言，这种情况恐

怕是很少的，而泰讷笔下的“暴民”应该被看作他信手拈来的名词，或者显然是他怀有偏见的证明，而不是一种符合事实的历史现象。

---

[1] 当然，史学家也时常在群众身上贴上密什勒那种更同情的（如果不说是更有辨识力的话）“人民”或“爱国派”的标签。英国史学家对于19世纪欧洲和南美的民族运动所作的描述往往如此，在这类运动中，群众所推动的事业，显然是那些作家所同情的。有时候，由于时论或官方政策的改变，评价某一个运动的态度甚至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变”，昨日的“匪帮”会变成今天的“爱国派”或“自由战士”。

[2] 参看高赛兹：《骚动纪实》（R.Gossez，“Carte des troubles”），载于埃·拉布鲁萨编：《19世纪中期（1846年至1851年）法国经济萧条与危机一览》〔E.Labrousse（ed.），*Aspects de la crise et de la dépression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au milieu du* ⅩⅨ *siecle* （1846—1851）〕，1956年巴黎版；乔治·勒菲富尔：《1789年的大恐怖》，第61—65页。

[3] 参看克·塞格诺博：《1848年的革命》（C.Seignobos，*La Révolution de* 1848），1921年巴黎版，第344—345页。

[4] 耳·谢瓦利埃：《19世纪巴黎人口的组成》（L.Chavelier，*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 *e* *siécle* ），1950年巴黎版，第77页。

[5] 格·伏蒂厄：《1831年工人的贫困》（G.Vauthier，“La Misère des ouvriers en 1831”），载《1848年的革命》（*La Révolution de* 1848），第22卷（1925年），第607一617页。

[6] 参看由于参加巴黎1830年7月27—29日事变而被杀害和受到表彰的人的一份极不完全的名单（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369—370、420）。

[7] 《关于1830年7月暴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Une Lettre inédite sur les journées de juillet 1830”），载《1848年的革命》，第7卷（1910年），第272—275页。在1848年，德·托凯维尔（de Tocqueville）也注意到（他还说这并不奇怪）并没有发生抢劫事件〔《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The Recollections of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48年伦敦版，第80页〕。

[8] 阿·克雷梅：《1848年2月23日加普善路的激战》（A.Crémieux，“La Fusillade du boulevard des Capucines du 23 février 1848”），载《1848年的革命》，第8卷（1911年），第99—124页；弗·杜塔克：《1848年2月暴动记事》（F.Dutacq，*Un Récit des journées de février* 1848），载《1848后的革命》，第9卷（1912年），第266—270页。

[9] 《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第51—59、135—145页。

[10] 《按姓名首母排列的1848年6月被控告人总名单》。国家档案馆文件：F^{7} 2585—2586。

[11] 《阿列克赛·德·托凯维尔回忆录》，第78页以下。

[12] 塞格诺博：《1848年的革命》，第24—25、57—58，67—70、89—106、138—139页；苏扎纳·华兹曼：《1848年拉贝尔的俱乐部》（Suzanne Wassermann，“Le Club de Raspail en 1848”），载《1848年的革命》，第5卷（1908—1909年），第589—605、655—674、748—762页；高赛兹：《第二共和国时期的巴黎工人组织》（R.Gossez，“L’organisation ouvrière à Paris sous la Seconde République”），载《1848年，当代革命评论》，第41卷（1949年），第31—45页。

[13] F^{7*} 2585—2586。并可参考格·杜沃，《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工人生活》（G.Duveau，*La Vie ouvrière en France sous le Second Empire* ），1946年巴黎版，第42—43页。

[14] 罗·华·韦尔谟思：《18世纪的美以美教派和普通人民》（R.W.Wearmouth，*Methodism and the Common Peopl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45年伦敦版，第19—50、51—76、77—91页。

[15]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David Williams，*The Rebecca Riots* ）（1955年威尔士大学出版社）。

[16] “里贝卡”的信提醒威尔士人要记住自己受着“亨吉斯特”的英格兰“后裔”的奴役（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192页。可参照英国固有的认为英国人为“诺曼枷锁”所奴役的传说）；暴动者一般都涂黑自己的面孔，或者化妆成为妇女（最后一点是人们经常攻击1789年10月5日向凡尔赛进军的巴黎市民的借口）。

[17] 这些人大都是佃农，虽然偶尔也听说有“绅士”、酒馆老板乃至工人（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190、195、198、221、250页）。

[18]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212页。在1830年至1831年英国农业工人的暴动（英国农村中最后发生的这一类运动）中也可以看到某些这样的特征。

[19] 大卫·威廉斯：《里贝卡暴动》，第243、262页。

[20] 1736年的反爱尔兰和烧酒暴动中以及1768年3月到5月的“威尔克斯与自

由”暴动，可能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虽然1768年至1769年的威尔克斯运动或1780年的戈登暴动也许不是这个缘故。关于与这些运动有关的这些和其他问题，可参看乔·鲁德：《“本国烧酒”与1736年的伦敦暴动》（G.Rudé，“‘Mother Gin’ and the London Riots of 1736”），载《公会杂谈》（*The Guildhall Miscellany* ）1959年第10期；及其《1768—1769年的“威尔克斯与自由”运动》（“Wilkes and Liberty，1768—69”），《公会杂谈》，1957年第8期；《戈登暴动：暴动者及其牺牲者的研究》（“The Gordon Riots：a Study of the Rioters and their Victims”），载《皇家历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第5集，第6卷，1956年，第93—114页。

[21] 不论其起因是什么，这些暴动和50年后的巴黎累维伊扬暴动一样，与19世纪的工资运动很少有共同之处。

[22] 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1790年至1792年的“教会与国王”暴动中也看到了这些特征；但是在这些暴动中，还掺杂有其他需要单独研究的因素。

[23] 乔·鲁德：《第一次“戈登暴动”》（“I ‘tumulti di Gordon’”）（1780年），载《工人运动》（*Movimento Operaio* ）（米兰），1955年版，第852页。这一要求受到冷遇和不得不放弃并不足为奇。

附录

附录一 **1790—1795**年的巴黎各区

（前面是1790—1791年使用的名称，括号内是后来使用的名称）

1.图伊勒里区

2.香榭丽舍区

3.鲁列（共和）区

4.罗亚尔宫（布特·代·莫兰、蒙塔纳）区

5.万多姆广场（皮克）区

6.图书馆（1792年、累珀累提尔）区

7.船夫谷仓（米拉波、白山）区

8.罗浮（博物院）区

9.奥拉托利（法兰西自卫军）区

10.粮食市场区

11.邮局（社会契约）区

12.路易十四广场（球场、吉洛梅太尔）区

13.蒙莫朗西喷泉（莫里哀喷泉、布鲁特斯）区

14.新崩纳区

15.崩索（祖国之友）区

16.莫孔赛耳（崩孔赛耳）区

17.老实人市场（市场、商场）区

18.伦巴底区

19.阿尔西区

20.圣母山（蒙马拉）郊区

21.普瓦松尼区

22.崩迪区

23.大教堂区

24.玻宾库尔区

25.蒙特娄区

26.盲人收容院区

27.格拉维叶区

28.圣丹尼（诺尔）郊区

29.博堡（再团结）区

30.红公主（马莱、武装人）区

31.西西里王（人权）区

32.市政厅（公社大楼、忠诚）区

33.罗亚尔广场（结盟、不可分割）区

34.兵工场区

35.圣路易岛（友爱）区

36.圣母院（老城、理性）区

37.亨利四世（新桥、革命家）区

38.伤兵院区

39.格雷讷累喷泉区

40.四国（团结）区

41.法国剧院（马赛、马拉）区

42.红十字会（红帽、自由帽）区（西区）

43.卢森堡（穆提乌斯·斯卡沃拉）区

44.朱利昂温泉（博勒帕勒、沙利尔、再造、温泉）区

45.圣日讷维叶（法国伟人祠）区

46.天文台区

47.植物园（无套裤党）区

48.戈布兰（拉佐夫斯基、菲尼斯太勒）区

附录二 1791—1795年巴黎各区的人口

区　名[1]	1791年的工资劳动者[2]		1791年的“积极”公民[3]	人口		1800年的人口密度：每4000平方米内的居民[6]
	就业工人	雇主人数		1792[4]	1795[5]	
1. 图伊勒里	646	40	1 654	12 600	15 148	74
2. 香榭丽舍	…	…	873	8 000	8 000	11
3. 鲁列	1 497	106	1 289	12 850	11 377	23
4. 罗亚尔宫	1 334	92	2 395	20 400	16 719	251
5. 万多姆广场	…	…	1 030	14 000	13 428	75
6. 图书馆	782	46	1 517	12 987	9 930	147
7. 船夫谷仓	1 197	55	856	11 570	10 920	39
8. 罗浮	1 094	61	2 023	11 800	22 691	259
9. 奥拉托利	1 677	77	1 902	6 612	12 567	444
10. 粮食市场	621	37	1 870	7 011	11 640	294
11. 邮局	…	…	1 809	9 869	12 567	330
10. 路易十四广场	969	71	1 394	13 000	9 500	266
13. 蒙莫朗西喷泉	298	29	1 087	12 472	9 424	224
14. 新崩纳	2 389	128	1 607	9 950	14 860	360
15. 崩索	5 288	242	1 607	13 645	16 648	360
16. 莫孔赛耳	1 866	115	1 708	11 000	13 878	388
17. 老实人市场	1 705	61	1 072	14 722	13 146	555
18. 伦巴底	1 421	110	2 504	12 550	14 811	438
19. 阿尔西	…	…	1 753	12 000	11 600	580
20. 圣母山郊区	1 242	78	687	13 800	10 104	51
21. 普瓦松尼	1 517	97	834	12 000	8 435	43
22. 崩迪	…	…	1 439	13 315	12 404	32
23. 大教堂	1 273	99	1 662	25 000	11 988	48
24. 玻宾库尔	1 358	84	1 268	13 747	10 933	17
25. 蒙特娄	1 330	84	1 478	15 000	13 479	45
26. 盲人收容院	1 831	141	1 958	12 550	18 283	27
27. 格拉维叶	4 699	339	3 305	11 000	24 774	364
28. 圣丹尼郊区	3 217	101	1 330	13 840	11 630	62
29. 博堡	2 932	165	2 285	11 015	16 320	315
30. 红公主	1 015	102	1 784	8 974	10 481	132
31. 西西里王	1 025	67	1 811	10 500	12 321	239

续表

区 名	1791年的工资劳动者		1791年的“积极”公民	人口		1800年的人口密度：每4000平方米内的居民
	就业工人	雇主人数		1792	1795	
32. 市政厅	…	…	1 729	11 230	12 231	304
33. 罗亚尔广场	1 172	75	1 883	14 500	11 836	123
34. 兵工场	890	58	1 407	21 000	10 264	82
35. 圣路易岛	305	28	1 032	5 257	4 862	204
36. 圣母院	…	…	1 657	11 780	11 402	310
37. 亨利四世	459	54	883	3 581	5 126	297
38. 伤兵院	767	30	1 100	11 000	10 401	17
39. 格雷讷累	985	71	2 100	10 878	12 554	86
40. 四国	2 310	164	3 900	21 516	21 601	204
41. 法国剧院	2 207	105	2 600	16 600	14 400	275
42. 红十字会	1 669	118	1 551	17 600	16 744	67
43. 卢森堡	1 061	84	2 100	17 000	17 633	52
44. 朱利昂温泉	1 139	72	2 000	14 490	12 394	325
45. 圣日讷维叶	2 136	129	2 762	22 645	24 977	320
46. 天文台	1 133	55	1 700	19 907	13 193	32
47. 植物园	1 695	66	2 178	16 000	15 185	60
48. 戈布兰	613	38	1 200	12 741	11 775	35
共计	62 743	3 776	82 270	635 504	636 772	…
	(41区)					

①1790年至1791年使用的区名(关于以后的变动可参看附录一)。

②引自弗·布莱希：《关于1791年巴黎工业人口统计》(F. Braesch, “Un Essai de statistique de la population ouvrière de Paris vers 1791”)，载《法国革命》，第63期(1912年7—12月)，第289—321页。关于马·布莱希(M. Braesch)数字中差额的讨论，可参看拙著《巴黎的工资劳动者》，第1卷，第46—51页。

③引自埃·沙拉瓦：《巴黎选举人会议》(E. Charavay, *Assemblée electorale de Paris*)，1890年至1895年巴黎版，3卷本，第2卷，第5—7页。

④引自纳·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N. Kareiev, *La Densité de la population des différentes sections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第14—15页。

⑤国家档案馆文件：$F^{7}3688^{4}$，第1号卷(1795年1月)。

⑥加雷埃夫：《革命时期巴黎各区人口密度》，第14—15页。

附录三 巴黎各区与1787—1795年的起事者

（在各次骚动中被捕、伤亡或参加者的数目）

区　名*	(1) 1787年到1788年	(2) 1789 累维伊扬暴动（4月）	(3) 1789 攻打巴士底（7月）	(4) 马尔斯教场（1791年7月）	(5) 1792年8月10日	(6) 杂货暴动1792 1793	(7) 1793年5 6月	(8) 第三年牧月	(9) 第四年葡月
1. 图伊勒里	…	…	2	3	6	2	68	6	1
2. 香榭丽舍	…	…	…	1	5	…	…	…	…
3. 鲁列	…	1	2	3	…	1	660	5	…
4. 罗亚尔宫	1	…	1	6	6	3	229	2	1
5. 万多姆广场	1	1	1	4	4	1	331	1	2
6. 图书馆	…	…	2	1	2	…	59	1	4
7. 船夫谷仓	…	…	2	3	1	1	527	4	…
8. 罗浮	1	1	1	8	1	2	270	6	…
9. 奥拉托利	7	1	2	7	3	4	46	4	…
10. 粮食市场	…	…	6	5	3	1	315	6	…
11. 邮局	1	…	4	4	7	1	191	1	…
12. 路易十四	…	…	…	7	1	1	…	1	…
13. 蒙莫朗西喷泉	…	…	…	4	1	…	…	3	…
14. 新崩纳	…	…	…	6	7	…	…	4	…
15. 崩索	…	…	3	9	11	1	…	…	…
16. 莫孔赛耳	4	1	4	8	5	3	1 400	3	…
17. 老实人市场	6	…	6	3	1	2	…	4	…
18. 伦巴底	4	…	5	4	12	…	…	6	…
19. 阿尔西	1	1	3	17	9	…	…	10	2
20. 圣母山郊区	…	…	…	7	16	…	1 438	…	…
21. 普瓦松尼	…	1	1	1	4	…	194	5	2
22. 崩迪	…	1	4	3	5	2	813	7	…
23. 大教堂	…	…	9	4	2	…	662	5	3
24. 玻宾库尔	…	6	87	4	6	…	970	13	…
25. 蒙特娄	…	13	139	3	18	1	2 946	6	…
26. 盲人收容院	…	13	193	3	58	…	2 039	10	…
27. 格拉维叶	4	…	3	9	15	6	1 457	7	1
28. 圣丹尼郊区	…	…	1	2	6	…	…	2	…
29. 博堡	2	…	5	9	3	…	678	1	1
30. 红公主	…	1	2	5	3	…	…	…	…
31. 西西里王	1	…	3	3	6	1	…	2	…
32. 市政厅	…	6	18	5	2	…	700?	1	…

续表

区　名*	(1) 1787 年到 1788 年	(2) 1789 累维伊扬暴动（4 月）	(3) 1789 攻打巴士底（7 月）	(4) 马尔斯教场（1791 年 7 月）	(5) 1792 年 8 月 10 日	(6) 杂货暴动 1792 1793	(7) 1793 年 5 6 月	(8) 第三年牧月	(9) 第四年葡月
33. 罗亚尔广场	…	…	17	2	…	…	…	5	6
34. 兵工场	…	3	23	2	2	1	618	12	2
35. 圣路易岛	…	1	…	…	…	…	…	1	1
36. 圣母院	2	1	1	7	3	…	…	…	…
37. 亨利四世	3	…	2	4	…	…	13	2	…
38. 伤兵院	1	…	5	3	5	…	1 358	…	…
39. 格雷讷累喷泉	1	…	2	5	3	1	190?	1	…
40. 四国	2	…	6	12	4	2	225?	…	…
41. 法国剧院	1	…	6	3	12		…	…	1
42. 红十字会	…	…	2	4	5	…	1 458	1	1
43. 卢森堡	2	…	7	3	7	…	432	3	…
44. 朱利昂温泉	4	3	3	11	6	1	…	4	1
45. 圣日讷维叶	6	1	10	15	7	…	400?	1	…
46. 天文台	2	…	3	4	18	…	907	3	…
47. 植物园	…	1	3	1	1	…	…	3	…
48. 戈布兰	…	3	3	3	19	5	660	5	…
巴黎境外	1	3	…	…	…	1	…	…	…
共计	58	63	602	240	316	45	22 860	168	29

* 1790 年至 1791 年使用的区名（关于以后的变动，可参看附录一）。

资料来源：

(1)国家档案馆文件：Y 13014，9491，9989，11206，11517，15309A，18751，18795；X^{1b}8989。

(2)国家档案馆文件：Y 10491，10530，11033，13582，15019，15101，18795。

(3)国家档案馆文件：T 514[1]：巴士底攻克者名单。

(4)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25 辑），Ab324；国家档案馆文件：W 294，T214。

(5)国家档案馆文件：F^{15}3269—3274；F^{7}4426。

(6)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9，11（拘捕类）；Ab325，327。《法国革命史年鉴》，第 130 期，第 33 页。

(7)国家档案馆文件：BB^{3}80，第 7 号卷，11 辑。32，39，40，45 等区的数字系根据不完全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8)国家档案馆文件：W554—555，F^{7}（各类）；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各类）。

(9)国家档案馆文件：W556—558。

附录四 巴黎各行业与1787—1795年的起事者

（括号内数字表示可能是工资劳动者的人数）

行业	(1) 1787—1788	(2) 累维伊扬暴动	(3)* 焚毁关卡	(4)* 圣拉扎尔事件	(5) 攻打巴士底	(6) 马尔斯教场	(7) 1792年8月	(8) 杂货暴动 1792—1793	(9) 第三年牧月	(10) 第四年葡月
1. 饮食业										
面包师	…	3(2)	…	1(1)	5	1(1)	1	…	2(1)	…
酿酒师	…	…	…	…	2(1)	…	…	…	…	…
屠户	…	…	…	1(1)	5(3)	…	2(1)	2	…	…
咖啡馆与饭店经营者	1	1(1)	…	…	4	3(1)	1	1(1)	…	…
巧克力经营者	…	…	…	…	…	1	…	…	…	…
厨师	…	…	…	…	2(2)	7(7)	…	3(3)	…	…
水果经营者	1	…	…	…	…	4	2	…	2	…
杂货商	…	…	1(1)	…	…	2(2)	1	…	…	1
客栈主	…	…	…	…	2	1		…	…	…
点心制造人	1(1)	…	…	…	4	1(1)	…	1(1)	…	…
烟草经营者	…	…	…	…	…	1(1)	…	…	…	…
酒商	1	1	17(3)	…	11	2(1)	1(1)	…	4	…
2. 建筑、修路										
木匠	…	…	…	…	3	4(3)	3(1)	…	…	…
装玻璃工	…	…	…	…	…	…	2(1)	…	…	…
锁匠	3(3)	3(3)	3	…	41(8)	2(2)	3	1(1)	12(6)	…
纪念碑石匠	1(1)	1(1)	…	…	9(1)	1(1)	…	…	1	…
挖掘工人	…	2(2)	1(1)	3(3)	2(2)	6(6)	…	…	…	…
漆匠	2(1)	1(1)	…	…	4	1	3	…	3(2)	…
铺路工人	…	1(1)	…	…	…	…	…	…	…	…
泥水匠	…	…	1(1)	…	…	…	…	…	…	…
采石夫	1(1)	1(1)	…	2(2)	…	…	…	…	…	…
锯匠	…	…	…	…	4(1)	…	…	…	…	…
雕刻匠	…	2(1)	…	…	20(1)	1(1)	…	…	1	…
破石匠	…	…	…	…	4(4)	4(2)	1	…	2(2)	…
石匠	1(1)	2(2)	2	1(1)	7(5)	6(6)	2(1)	1(1)	4(1)	…
测量员	…	…	…	…	…	1	…	…	1	…
瓦匠	…	…	…	…	…	…	1(1)	…	…	…
3. 服装业										
制带工	…	…	…	…	…	…	1	…	…	…

续表

行　业	(1) 1787 1788	(2) 累维伊扬暴动	(3)* 焚毁关卡	(4)* 圣拉扎尔事件	(5) 攻打巴士底	(6) 马尔斯教场	(7) 1792年8月	(8) 杂货暴动 1792 1793	(9) 第三年牧月	(10) 第四年葡月
制靴鞋工	…	3(3)	2	3(2)	28(5)	17(13)	12(2)	2(2)	10	…
裁缝	…	…	1(1)	…	…	1	…	…	…	…
染工、洗衣工	1(1)	…	…	…	3	2(1)	…	…	…	…
花匠、园丁	1	…	2(1)	…	6(3)	2(3)	1	1(1)	1(1)	…
毛皮商	1	…	…	…	2(1)	…	…	…	…	…
理发匠	2(1)	2(1)	…	1(1)	10	6(3)	4(3)	…	5	…
帽商	1(1)	…	…	…	9(4)	3(1)	4(2)	…	…	…
丝织工	…	…	…	1(1)	3(3)	…	…	…	…	…
织袜工	…	…	…	…	4(4)	2(1)	1(1)	…	…	…
男装裁缝	2(1)	…	…	…	7(1)	11(7)	1	3(1)	…	…
4. 家具业										
编篮工	…	…	…	…	2	…	…	…	5	…
糊盒工	…	…	…	…	1	…	2	…	…	…
家具匠	…	2(2)	…	…	48(9)	…	…	…	…	…
蜡烛商	…	…	…	…	…	2(2)	1(1)	…	3(1)	…
小工艺品制造者	2(1)	…	…	…	9(1)	3(3)	1	1(1)	…	…
细木工	…	5(5)	1(1)	3(3)	49(8)	12(7)	8(4)	2(2)	3(1)	…
室内装饰商	…	1	…	…	4(1)	3	2(2)	1	8(2)	…
5. 运输业										
船夫	…	…	…	…	3(3)	…	…	…	…	…
铁匠	…	…	…	…	…	…	1	…	…	…
车夫	…	2(2)	2(1)	2(2)	5(5)	1(1)	1(1)	…	1(1)	…
马车工人	…	1(1)	…	3(3)	2(1)	6(5)	1(1)	3(2)	…	…
马掌铁匠	…	1	1	…	4(1)	2(2)			…	…
马具、马鞍匠	1(1)	1(1)	1	…	5	1	1(1)	1	…	…
搬运工人	2(2)	2(2)	3(3)	5(5)	16(16)	6(6)	2(2)	3(3)	4(4)	…
河畔工人	…	4(4)	2(2)	…	5(5)	…	…	1(1)	2(2)	…
造船工人	…	…	…	…	5(5)	…	…	…	…	…
车匠	…	…	2(1)	1(1)	…	3(2)	1(1)	…	3(1)	…
6. 金属业										
黄铜匠	…	2(2)	…	…	7(1)	…	…	…	1(1)	…
纽扣工人	…	…	…	1(1)	3	1	…	…	1	…
刀匠	…	…	…	…	…	1	2	…	4(1)	…
利器匠	…	…	…	…	2	…	…	1(1)	…	…

续表

行　业	(1) 1787 1788	(2) 累维伊扬暴动	(3)* 焚毁关卡	(4)* 圣拉扎尔事件	(5) 攻打巴士底	(6) 马尔斯教场	(7) 1792年8月	(8) 杂货暴动 1792 1793	(9) 第三年牧月	(10) 第四年葡月
雕刻匠、镀金匠	2(1)	…	…	…	13	6(1)	2	1(1)	2	…
翻砂工人	…	1(1)	…	…	9(2)	2	2	…	1(1)	…
金匠	3(2)	…	…	…	6(1)	5(3)	2(1)	…	…	…
工具制造匠	…	…	…	…	…	…	…	2(1)	…	…
珠宝匠	…	…	…	…	5	3	1	…	…	…
机械匠	…	…	…	…	…	…	…	…	1(1)	…
钉匠	…	…	…	…	9(1)	…	…	…	…	…
锡蜡匠	…	…	…	…	2	1(1)	…	…	…	…
火炉匠	…	…	…	…	5(3)	…	…	…	…	…
白铁匠	…	…	…	…	5(2)	…	1	…	1	…
钟表匠	…	…	…	…	3	1	1	…	1	…
7. 木材业										
桶匠	…	1	1	…	3(1)	1(1)	…	…	…	…
旋工	1	1(1)	…	…	10	1	…	1(1)	…	…
8. 纺织业										
棉纺	…	1(1)	…	…	…	…	…	1(1)	1(1)	…
罗纱	…	1(1)	…	…	22(22)	…	6(6)	…	…	…
丝织	…	…	…	…	1(1)	…	…	…	…	…
织工	…	…	…	…	1	1(1)	1(1)	…	…	…
9. 皮革业										
鞣皮匠	…	…	…	…	…	…	…	…	3(1)	…
制皮革衣装者	1(1)	…	…	…	2	…	…	…	…	…
10. 印刷造纸业										
装订工人	…	…	…	…	…	…	1	…	…	…
书商	1	…	…	…	…	…	…	…	…	…
造纸工人	1(1)	5(1)	…	…	1	…	…	…	…	…
印刷工人	1(1)	…	…	…	8(4)	3(1)	2(1)	1	1(1)	…
11. 玻璃、陶器										
瓦器业	…	…	…	…	1	2(2)	…	…	3(2)	…
陶工	…	…	…	…	7	1	…	…	…	…
王家玻璃工场	…	2(2)	…	…	1(1)	…	2(2)	…	…	…
12. 杂类										
演员、艺术家、音乐家等	…	…	…	…	…	6	2	1	…	…

续表

行业	(1) 1787—1788	(2) 累维伊扬暴动	(3)* 焚毁关卡	(4)* 圣拉扎尔事件	(5) 攻打巴士底	(6) 马尔斯教场	(7) 1792年8月	(8) 杂货暴动 1792—1793	(9) 第三年牧月	(10) 第四年葡月
乞丐	…	…	…	…	…	3(3)	…	…	…	…
资产阶级	…	1	6	…	…	7	2	2	1	…
商人	…	…	…	…	4	2	…	…	…	1
烧炭工人	…	…	…	…	3	…	…	…	…	…
公务员	…	…	…	…	…	4	…	…	4	7
店员	1(1)	…	…	…	5	7(2)	2	…	…	…
家庭佣仆、清洁工人	1(1)	…	…	…	…	11(11)	9(9)	9(9)	2(2)	…
议会代表	…	…	…	…	…	…	…	…	11	…
渔民	…	…	…	…	2(1)	…	…	…	…	…
家庭主妇	…	…	…	3(3)	…	…	…	…	…	…
记者、出版商	…	…	…	…	…	6	…	…	…	…
各种体力劳动者	2(2)	1(1)	6(6)	2(2)	2(2)	4(4)	2(2)	…	4(4)	…
洗衣工人	…	…	1	…	3(1)	…	2	1	4(4)	…
报贩、摊贩	…	…	…	…	…	13(12)	…	…	…	…
农民	…	1	4(2)	1(1)	…	…	…	…	1	…
教士	…	1	…	…	…	1	…	…	1	1
专门职业(建筑、法律、医药)	…	…	…	…	…	5	3	…	1	3
店主，伙计	10	2	1(1)	…	22(1)	…	…	…	5	1(1)
“走私者”	…	…	15	…	…	…	…	…	…	…
教师	…	…	…	…	1	4	…	…	2	…
零售商(杂项)	2	5(2)	1(1)	3	56(1)	8	8(2)	6(1)	7(2)	…
军队、警察、国民自卫军										
一、军官与军士	…	…	…	…	…	6	…	…	4	8
二、其他	1	1	…	…	77	…	…	5	41	…
共计	55 (28)	68 (52)	77 (26)	37 (33)	662 (149)	248 (128)	123 (51)	58 (35)	186 (46)	22 (1)

资料来源：

(3)* 国家档案馆文件：Z^{1a}886；Y 10649。

(4)* 国家档案馆文件：Z^{2}4691；Y 14240，10649；索恩-卢瓦尔档案馆文件(Arch Saône et Loire)：B705。(1)—(2)(5)—(10)的来源同附录三。

附录五 1775—1795年的巴黎起事者和暴动者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籍贯、有无前科等）

骚动与暴动	(1) 被捕人数	(2) 工资劳动者	 失业者	(3) 妇女	(4) 平均年龄	(5) 识字者(%)	(6) 有前科者(%)	(7) 外省籍贯(%)	(8) 居住在公寓中者(%)
1. 1775年谷物暴动	139	102	18	14	30	33	15	80	37*
2. 1787—1788年暴动	55	28	?	1	23	60	?	31	10
3. 累维伊扬暴动	68	52	8	1	29	62	13	66	25
4. 焚毁关卡事件	77	26	?	9	?	?	?	?	?
5. 圣拉扎尔事件	37	33	…	13	…	…	…	…	…
6. 攻打巴士底	662	149	…	1	34	…	…	63	10
7. 马尔斯教场	248	128	44	13	31	80	2～3	72	20
8. 1792年8月10日	123	51	…	3	38	…	…	…	…
9. 1792—1793年的杂货暴动	58	35	…	7	30	…	…	…	17
10. 第三年牧月	186	46	…	20	36	85	…	72	…
11. 第四年葡月	30	1	…	0	44	100	…	…	…

资料来源：

关于1775年谷物暴动，可参看乔·鲁德：《1775年5月巴黎及其附近地区的群众平价运动》，载《法国革命史年鉴》，1956年，第239页。

〔其他资料来源同于附录三至附录四〕

* 就居住在巴黎者而言为46%。

附录六 革命日历[1]

葡月 9 10月	雾月 10 11月	霜月 11 12月	雪月 12 1月	雨月 1 2月	风月 2 3月	芽月 3 4月	花月 4一 5月	牧月 5 6月	穑月 6 7月	热月 7 8月	果月 8 9月	无套裤党日 9月
1 22	1 22	1 21	1 21	1 20	1 19	1 21	1 20	1 20	1 19	1 19	1 18	1 17
2 23	2 23	2 22	2 22	2 21	2 20	2 22	2 21	2 21	2 20	2 20	2 19	2 18
3 24	3 24	3 23	3 23	3 22	3 21	3 23	3 22	3 22	3 21	3 21	3 20	3 19
4 25	4 25	4 24	4 24	4 23	4 22	4 24	4 23	4 23	4 22	4 22	4 21	4 20
5 26	5 26	5 25	5 25	5 24	5 23	5 25	5 24	5 24	5 23	5 23	5 22	5 21
6 27	6 27	6 26	6 26	6 25	6 24	6 26	6 25	6 25	6 24	6 24	6 23	
7 28	7 28	7 27	7 27	7 26	7 25	7 27	7 26	7 26	7 25	7 25	7 24	
8 29	8 29	8 28	8 28	8 27	8 26	8 28	8 27	8 27	8 26	8 26	8 25	
9 30	9 30	9 29	9 29	9 28	9 27	9 29	9 28	9 28	9 27	9 27	9 26	
10 1	10 31	10 30	10 30	10 29	10 28	10 30	10 29	10 29	10 28	10 28	10 27	
11 2	11 1	11 1	11 31	11 30	11 1	11 31	11 30	11 30	11 29	11 29	11 28	
12 3	12 2	12 2	12 1	12 31	12 2	12 1	12 1	12 31	12 30	12 30	12 29	
13 4	13 3	13 3	13 2	13 1	13 3	13 2	13 2	13 1	13 1	13 31	13 30	
14 5	14 4	14 4	14 3	14 2	14 4	14 3	14 3	14 2	14 2	14 1	14 31	
15 6	15 5	15 5	15 4	15 3	15 5	15 4	15 4	15 3	15 3	15 2	15 1	
16 7	16 6	16 6	16 5	16 4	16 6	16 5	16 5	16 4	16 4	16 3	16 2	
17 8	17 7	17 7	17 6	17 5	17 7	17 6	17 6	17 5	17 5	17 4	17 3	
18 9	18 8	18 8	18 7	18 6	18 8	18 7	18 7	18 6	18 6	18 5	18 4	
19 10	19 9	19 9	19 8	19 7	19 9	19 8	19 8	19 7	19 7	19 6	19 5	
20 11	20 10	20 10	20 9	20 8	20 10	20 9	20 9	20 8	20 8	20 7	20 6	
21 12	21 11	21 11	21 10	21 9	21 11	21 10	21 10	21 9	21 9	21 8	21 7	
22 13	22 12	22 12	22 11	22 10	22 12	22 11	22 11	22 10	22 10	22 9	22 8	
23 14	23 13	23 13	23 12	23 11	23 13	23 12	23 12	23 11	23 11	23 10	23 9	
24 15	24 14	24 14	24 13	24 12	24 14	24 13	24 13	24 12	24 12	24 11	24 10	
25 16	25 15	25 15	25 14	25 13	25 15	25 14	25 14	25 13	25 13	25 12	25 11	
26 17	26 16	26 16	26 15	26 14	26 16	26 15	26 15	26 14	26 14	26 13	26 12	
27 18	27 17	27 17	27 16	27 15	27 17	27 16	27 16	27 15	27 15	27 14	27 13	
28 19	28 18	28 18	28 17	28 16	28 18	28 17	28 17	28 16	28 16	28 15	28 14	
29 20	29 19	29 19	29 18	29 17	29 19	29 18	29 18	29 17	29 17	29 16	29 15	
30 21	30 20	30 20	30 19	30 18	30 20	30 19	30 19	30 18	30 18	30 17	30 16	

附录七 **1789—1793**年的巴黎物价和工资

（转载自《经济史评论》，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48—255页）

表（一） 1783年巴黎工人消耗在面包上的收入百分比

职业	日工资[①]	实际日收入[②]	消耗在面包上的收入百分比(%)			
			售价为9苏	售价为14 $\frac{1}{2}$ 苏	售价为13 $\frac{1}{2}$ 苏	售价为12苏
累维伊扬工场中工人	25苏[③]	15苏	60	97	90	80
建筑工人	30苏	18苏	50	80	75	67
石匠帮工	40苏	24苏	37	60	56	50
锁匠、木匠等帮工	50苏	30苏	30	48	45	40
雕刻匠、金匠	100苏	60苏	15	24	22 $\frac{1}{2}$	20

①此处工资数除另有说明外，均引自比奥莱：《1790年的物价》(L. Biollay, *Les prix en 1790*)，1886年巴黎版，第14—79页。由于缺乏其他材料，这些数字几乎全是1790年的。然而，根据现有的1789年的材料看来，这两年之间的差异很小。不过，裁缝帮工显然是例外，他们在1789年8月通过一致的行动，使自己的工资提高10苏(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第8卷，第438—439页)。

②在计算“实际”收入时，旧制度下无数不付工资的节日都已经扣除。这里假定每年有111天这样的节日(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26—27页)。此外，还应该扣除生病的日子。

③《累维伊扬先生辩护状》，国立图书馆文件：Lb 39 1618。

表（二） 1789年6月和1791年6月巴黎工人的假定预算

建筑工人的预算（工资：30苏；“实际”收入：18苏）				木匠、锁匠等帮工的预算（工资：50苏；“实际”收入：30苏）			
1789年6月		1791年6月		1789年6月		1791年6月	
4磅面包	$14\frac{1}{2}$苏	4磅面包	8苏	4磅面包	$14\frac{1}{2}$苏	4磅面包	8苏
房租	3苏	房租	3苏	房租	3苏	房租	3苏
		$\frac{1}{2}$升酒	4苏	$\frac{1}{2}$升酒	5苏	1升酒	8苏
		$1\frac{1}{4}$磅肉	$2\frac{1}{2}$苏	$\frac{1}{2}$磅肉	5苏	$\frac{1}{2}$磅肉	5苏
用于油、蔬菜、衣服等项的余款	$\frac{1}{2}$苏	余款	$\frac{1}{2}$苏	余款	$2\frac{1}{2}$苏	余款	6苏
共计	18苏		18苏		30苏		30苏

表（三） 1790年6月和1793年6月巴黎工人的假定预算

一个木匠帮工的预算				一个锁匠帮工的预算			
1790 年 6 月（工资：50 苏；“实际”收入：30 苏[1]）		1793 年 6 月（工资：80 苏；“实际”收入：57 苏）		1790 年 6 月（工资：50 苏；“实际”收入：30 苏）		1793 年 6 月（工资：110 苏；“实际”收入：78 苏）	
4 磅面包	11 苏	4 磅面包	12 苏	4 磅面包	11 苏	4 磅面包	12 苏
房租[2]	3 苏	房租	6 苏	房租	3 苏	房租	6 苏
1 升酒	10 苏	$1\frac{1}{2}$升酒	24 苏	1 升酒	10 苏	$1\frac{1}{2}$升酒	24 苏
$\frac{1}{2}$磅肉	5 苏	$\frac{1}{2}$磅肉	9 苏	$\frac{1}{2}$磅肉	5 苏	$\frac{1}{2}$磅肉	18 苏
用于蔬菜、油、衣服等的余款	1 苏	余款	6 苏	余款	1 苏	余款	18 苏
共计	30 苏		57 苏		30 苏		78 苏

①此处的“实际”收入按照每周工作五天的假定计算。许多旧时的节日这时已经废除，但大大增加了每年工作日数的革命历这时尚未采用。

②由于缺乏关于房租的精确资料，我假定 1793 年的房租较 1790 年上涨一倍，这和其他物价的上涨情况大致是成比例的。

关于1793年至1795年工资和物价的预算及统计表，可参看《经济史评论》，1954年第6卷第3期，第257—264页。鉴于它们不够详细并且需要作更多的文字说明，所以这里没有选录。

---

[1] 革命（或共和）日历自1793年9月22日（共和国第二年葡月一日）正式使用，至1805年底（共和国第十四年雪月十一日）始被废除。在闰年（1796、1800、1804），风月十一日相当于2月29日，革命日历多出的一天则在以上日历的五天“无套裤党日”中再加一天（称为第六日或“补余日”）。

名词解释 [1]

囤积者（**Accapareur**）

囤积居奇者（大都指实际和被认为的粮食囤积者）。

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aire**）

1793年秋天在各中心地区成立的民兵，一般认为由可靠的无套裤党人组成。成立革命军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迫农业生产者以其产品供应巴黎和其他城市。1794年春“艾贝尔派”倾覆后，革命军旋即因丧失信誉而被解散。

指券（**Assignat**）

革命政府发行的，1791年夏季以后通用的纸币。

祖国之坛（**Autel de la Patrie**）

建立在马尔斯教场中央、献给祖国的市民祭坛。

关卡（**Barrièrs**）

革命爆发前不久由总包税人围绕巴黎城设立的税卡。

资产阶级（**Bourgeoisie**）

这里作为一般名词使用，多少和“都市中等阶级”——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商人、大制造商和各种专门职业者——同义。

嗜血鬼（**Buveur de sang**）

共和国第二年热月后泛指雅各宾派和专指罗伯斯庇尔派的诬蔑性名称。这类诬蔑性名称还有“恐怖分子”或“九月凶手”等。

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

由特别召开的城乡居民和三个等级的代表大会起草的陈述各种不满的文件，是为1789年的三级会议准备的。

马尔斯教场（**Champ de Mars**）

位于河东岸（今埃菲尔铁塔所在地），原为本城主要的军事检阅场。革命时期是市民用以庆祝节日和举行盛会（例如7月14日的结盟节和主宰节）的中心，也是群众起草请愿书的中心（例如1791年7月16—17日和1792年8月6日）。

民政委员会（**Comité civil**）

区级的政治或行政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原为监察委员会，热月后改为行政区委员会。属于区的地方性委员会，负责警务和内部安全。

检查囤积委员（**Commissaires aux accaparement**）

各区任命的官员，负责保证在本地贯彻最高限价法，并调查关于囤积食物和饮料的控告。

治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

政府的两个主要委员会之一，共和国第二年成为雅各宾专政掌握政权的机关，特别负责警务和内部安全。

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共和国第二年两个主要政府委员会中更为重要的一个，既管内政又负责外交，它在警务和司法方面的权力和治安委员会重叠。

公社（**Commune**）

这一个充满传统和革命含义的名称，指攻克巴士底后出现的巴黎本地政府。热月事变后不久消失，在1848和1871年又重新（短期地）出现。

贵族阴谋（**Complot aristocratique**）

宫廷派在1789年夏季，企图陈兵威吓巴黎，解散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当时群众就称这种企图为“贵族阴谋”。后来，对于其他真实的或被怀疑的反革命阴谋，也应用了这一名称。

君主立宪派（**Constitutional Monarchists**）

“英国派”（他们赞成国王有绝对否决权和议会中有第二院）在十月“骚动”中被击败和崩溃后，国民（和制宪）议会中出现了新的多数，这里的“君主立宪派”一词即随便应用在他们身上的名称。他们在议会中的领袖是巴那夫、杜波尔和拉默兄弟，在巴黎政权机关中是贝野和拉斐德。

哥德利埃俱乐郡（**Cordeliers Club**）

革命时期巴黎两大俱乐部中更加“平民化”的俱乐部，设在左岸的法国剧院区，收取的会费比雅各宾俱乐部还要低，一般采取的都是比较进步的政策（例如在1791年7月和1794年春）。该俱乐部最有名的领袖是丹敦、马拉、艾贝尔和隆撒。

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y**）

在本书中使用时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指在任何革命阶段中反对革命的人。

宫廷派（**Court Party**）

本书中使用的这一名词，具体说来，专指1789年夏季以亚多瓦伯爵为首的集团，就比较广泛的意义而言，指1792年8月以前各时期受国王和王后信任的人以及在报刊上和议会中支持王室的人。

旬（**Décade**）

按革命日历，每月为三十日，每十日为一旬。

（旧）区（**Districts**）

1789年4月，巴黎划为60个区以进行选举。然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它们实际上掌握了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力，谓之旧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情况，到1790年5—6月才被48个新区所代替。

忿激派（**Enragés**）

由雅各·卢、特奥菲累·勒克雷克和让·华尔勒领导的极端革命集团，他们虽然遭到哥德利埃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同声谴责，在1793年春季、夏季和秋季对于无套裤党却有相当影响。

郊区（**Faubourgs**）

郊区（字面是“郊外”的意思）原来位于旧城城垣之外，到1785年已经被圈到市区以内。本书使用的这一名词既指以前的一般“郊外”，也专指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区——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史学家有时用这一名词表示“工人住宅区”，这是不正确的。

结盟军（**Fédérés**）

从外省到巴黎来参加1792年7月14日结盟节的武装部队，在本书中，特别指参加进攻图伊勒里宫的马赛、布列斯特等地的结盟军。

斐扬派（**Feuillants**）

在1791年6月国王出亡瓦雷讷事件发生后，当时掀起了废黜国王或停止国王职权的运动。一部分保王派代表及新闻记者因抗议这个运动而与雅各宾派决裂，另外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他们便被称为斐扬派。

国民自卫军（或资产阶级民兵）（**Garde Nationale**，〔**milice bourgeoise**〕）

最初由巴黎各区在1789年7月成立的公民武装或民兵。

法兰西自卫军（**Gardes Francaises**）

革命前夕驻防巴黎的保王军主力。他们虽然在1789年4月累维伊扬暴动中效忠于政府，但在6月已经开始被革命者争取过来，在7月暴动中一般都站在人民一边。

无家可归的人（**Gens sans aveu**）

即没有固定住所的人或流浪汉。

吉伦德党（**Girondins**）

本来指立法议会中的一群左翼代表，他们在1791年秋冬两季支持布里索的“革命战争”政策，其中许多人（如布里索）都来自吉伦德郡。后来，使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凡是反对雅各宾派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纲领方面多少相同的人都被称为吉伦德党。

青年团（**Jeunesse dorée**）

罗伯斯庇尔被推翻后，由记者弗累隆组织的反雅各宾派青年团体，他们在共和国第四年葡月支持了保王派的反对国民大会的暴动（见“纨绔子弟”条）。

骚动日（或革命日）（**Journée**〔**Journée révolutionnaire**〕）

群众（一般均由无套裤党构成）参加的革命斗争日。

沼泽派（或平原派）（**Marais** 〔**Plaine**〕）

指共和国第二年国民大会中的中间集团，由于他们在热月9日不支持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才被他的敌人孤立和逮捕起来。

最高限价法（**Maximum**）

最高限价法有二，一是1793年5月颁布的，只限制谷物价格；一是1793年9月颁布的，范围比以前扩大，几乎对一切主要必需品都实行了限价，连劳动力也不例外（最高工资法）。

首领（**Meneur**）

即领导人（经常带贬义）。

贱民（**Menu Peuple**）

普通人民：工资劳动者和小有产者（见“无套裤党”条）。

山岳党（**Mountain**）

以罗伯斯庇尔和丹敦为首的雅各宾派议会代表的名称，因为他们在1792年9月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坐在会场高处座席上，故有此名。在吉伦

德党被驱逐后，由他们组成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

纨绔子弟（**Muscadins**）

无套裤党对于热月政变后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公民和中等阶级青年的蔑称，表示这种人衣衫华丽，行为放荡。

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

旧制度下有钱的地方长官，他们通过购买或继承职位，取得了贵族地位。

无固定住所的人（**Non-domiciliés**）

居住在旅馆、公寓或租借家具的房间（出租公寓）中的人，在1793年6月以前，这种人一般都不计入当时的人口调查中，也没有参政权。

工人（**Ouvriers**）

在18世纪，这一名词指用双手劳动的一切城市居民，而不论他们是小制造者、独立工匠，还是工资劳动者。

饥荒协定（**Pacte de famine**）

群众认为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两朝各届政府施行的政策就是饥荒协定，也就是有意囤积，使市场缺粮，以便抬高价格，造成饥荒。

卖鱼妇（**Poissarde**）

按字面解，就是卖鱼的妇女，一般扩大指市场妇女。

巴黎市长（**Prévôt des marchands**）

革命前巴黎城敕立的政府高级长官，最后一任雅各·德·弗勒塞尔，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陷落后，被愤怒的群众杀死。

审讯笔录（**Procès-verbal**）

警务委员审讯犯人的正式记录，切勿与“警察局报告”相混，后者可能是关于“形势”或舆论情况的报告或记录。

贵族反叛（**Révolte nobiliaire**）

1787—1788年巴黎贵族和法院对国王的反叛，它是1789年大革命的“开锣戏”。

无套裤党（**Sans-culottes**）

本书完全按照其社会意义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名词来使用，它包括城乡小有产者和工资劳动者；就巴黎无套裤党而言，包括小店主、小商贩、工匠、帮工、体力劳动者、流浪汉和城市贫民。当代人往往只把这一名词用于政治上比较积极的阶级，或者扩大到不论来自哪个社会阶级的“群众”领袖身上。史学家时常在这一政治意义上使用这一名词。

（新）区（**Sections**）

按照1790年5—6月的市政法，原来分为60个区的巴黎改划成48个区，以便进行选举并为一般政治目的服务。

联谊社团（**Sociétés fraternelles**）

1790年和1791年成立的早期各激进派俱乐部和社团的名称，它们是哥德利埃俱乐部的附属机构或支部。

群众团体（**Sociétés populaires**）

泛指1791年夏季以后的地方俱乐部和社团。许多这类社团都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支部，但是，由于它们倾向于（至少在巴黎是这样）宣传进步观点和独立的政策，深为共和国第二年的革命政府所厌恶。许多这样的社团（尤其是1793年9月9日以后成立的纯粹是各区的团体）在艾贝尔倾覆后都被封闭，热月后被封闭的更多，只有少数几个残存到1795年年初。

群众平价（**Taxation populaire**）

暴动群众强迫面包商、杂货商等按较低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谓之“群众平价”（本书中举的例子是：1775年5月，1792年1—2月，1793年2月）。

恐怖（**Terror**）

本书使用的这一名词主要并非指一种方法，而是指一段时期——从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雅各宾政府通过军事、司法和经济等各种强迫性措施实行专政。

热月（**Thermidor**）

革命日历中包括部分7月和8月的一个月（参看附录六），在本书中更常用来指罗伯斯庇尔及其最亲密同事被推翻的共和国第二年热月的两天（9日和10日）。

第三等级（**Third Estate** 〔**Tiers État**〕）

按字面是指奉召参加三级会议的三个等级的非“特权”代表，但在本书中使用的意义较为广泛，指除贵族、上层僧侣或有特权的地方长官以外的一切社会阶级——也就是“贱民”和“资产阶级”。

巴士底攻克者（**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

可以证明自己曾积极参与攻陷巴士底的800～900人的荣誉称号。

---

[1] 这里的注释仅限于一个目的，即对书中某些可能引起混淆或误解的名词作一些很粗浅的说明或解释。读者如欲了解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定义，可参看马里昂：《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制度辞典》以及布尔森与夏拉梅合著：《法国大革命辞典》（Bourssin and Challamel： *Dic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参考资料

关于写作本书时利用的资料，其全部名称已见于直接列出或指出转引来源的脚注中。此处如再重复所有参考过的第二手著作的名称，既无此必要，也使读者和作者厌烦，所以不再赘述。

以下所列仅限于原始资料的简介，手稿本和印刷本兼而有之；但是，关于后一种，开列的只是那些不容易以回忆录、通信或出版的资料集（如奥拉尔、克·布洛克、卡隆、沙拉瓦、沙森、拉克罗瓦、莫南、图诺和图埃特伊等人所编的）形式得到的文献。

手稿本来源

国家档案馆文件：

AA集（立法与司法部分），第46—47号。

AF集（行政部分。国务大臣），Ⅱ，第47—48，50—57号；Ⅱ* .294，298；Ⅳ.1470。

BB集（司法）：BB[3] 73，76，80，222；BB[16] 702；BB[30] 17，79，87。

C集（国民议会发言记录）：第27，31，35，71，75，134，167，184，203，221，238，246—247，251号。

D集（议会各委员会），第Ⅲ，Ⅳ，Ⅵ，ⅩⅩⅨ[b]，ⅩLⅢ号。

F[1c] 集（公共舆论。选举），塞纳13，27。

F[7] 集（警察总局），第2476，2491，2513，2523，3299，3688，3281，4387，4411—4776（使用了65卷），6504号。

F[7*] 集（登记簿），第2497，2505，2507，2517，2520，2585—

2586号。

F^{12} 集（工商业），第1430，1544，1546—1547号。

F^{13} 集（民用建筑），第1137—1138号。

F^{15} 集（济贫院和赈济），第3267—3274，3564号。

H 集（一般事项，市政局），第1453，2121号。

KK集（历史纪念碑。登记簿），第641，647号。

O^{1} 集（王室），第500，1036，2053，2057号。

T集（产业部分。查封），第214，514号。

W集（司法部分。革命法庭），第12—13，24，76，78，81，170，174，294，319，343，357，444，546—548，556—558号。

Y集（巴黎警察局档案），刑事科：第9828—10598号（使用了25卷左右）；登记簿：10626，10634，10648—10650；警务委员档案：10790—16022号（使用了有关1775年、1787年至1790年部分的150卷左右）；法兰西岛省长官：第18748—18770，18794—18796号等。

Z集（特殊与普通司法），第I^{a} /640，886号；2/4691。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

Aa集 （巴黎部分。警务委员审讯记录，1790年——共和国第九年），第9—266号（使用了有关1790年——共和国第四年部分的80卷左右）。

Ab集（案犯入监登记簿），第132（贡西尔日里监狱），319（圣

佩拉若监狱），324—327（阜尔斯监狱），356（其他）号。

塞纳档案馆文件：

V.D.* 集（1790年——第四年部分），第645，650，826，1012，1635，1656，1661—1662，1681号。

塞纳马恩档案馆文件：

B集 （司法），第2247，2387，2695，3698号。

塞纳瓦兹档案馆文件：

B集 凡尔赛：宫廷检察官。1775年诉讼记录，1789年审判厅诉讼记录，1789年诉讼记录，1793年5月刑事法庭记录。圣日尔曼-安拉夷：宫廷检察官记录。1775年审判厅文件。

国立图书馆文件：

法文珍藏资料，第6680—6687号：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1764年至1789年，8卷本）；第11697号（贝野—拉斐德通信集，1789年至1791年）。

新得法文资料，第2654，2666，2669，2670，2673，2678，2716，2811，3241号。

同时代印刷本资料采源

写作本书时参考了法国国立图书馆Lb集第39—41号所包括的各种小册子、请愿书、公民名单、各区报告等，同时参考了大英博物馆F，F.R.和R（克罗克藏书）等集中的同类印刷物。

我也利用了某些革命报刊，特别是《人民之友》《杂谈》《革命日报》《内外新闻》《法国和布拉本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 ）以及《巴黎革命》等。

我也参考了下列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人对于各种事变的记述（不过，从这些材料中得到的收获却较少）：布舍和卢：《法国大革命的高等法院史》（*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33年至1838年巴黎版，40卷本；马维达尔和洛伦（编）：《高等法院档案》第1集，1789年至1799年，1868年至1914年巴黎版，80卷本；《重印老箴言报》，1858年至1863年巴黎版，31卷本；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以及国民大会的发言记录。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法国大革命史

[法] 阿尔贝·索布尔 著
马胜利 高毅 王庭荣 译
张芝联 校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史

（法）阿尔贝·索布尔　著
马胜利　高　毅　王庭荣　译
张芝联　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大革命史/（法）索布尔著；马胜利，高毅，王庭荣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2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ISBN 978-7-303-18834-5

Ⅰ.①法… Ⅱ.①索…②马…③高…④王… Ⅲ.①法国大革命（1789～1794）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2819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60 mm×230 mm

印张：35.5

字数：534千字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80.0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刘东明 赵翠琴 李京原

美术编辑：焦丽　　装帧设计：焦丽

责任校对：李菡　　责任印制：陈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译者序

在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日子里，翻译出版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家阿尔贝·马利乌斯·索布尔（1914—1982）这部名著，对我们具有特殊意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占压倒优势。这同自饶勒斯以来的法国史学传统有密切关系，更应直接归功于索布尔撰写的普及法国革命历史知识的著作。

本书的前身《法国大革命简史》最早出版于1962年（后几经修订改用今名），被译成多种文字，风行全球。自从索布尔的业师乔治·勒费弗尔1951年再版《法国革命》一书以来，索布尔这部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释法国革命进程的最系统全面的著作。反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把它称为无产阶级的《圣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索布尔在本书中首先探索法国革命的深刻原因，在100多页的引言中揭示旧制度的各种危机。他把法国大革命划分为3个阶段：从巴士底狱的攻陷到巴黎市府的建立（1789—1792），这一部分叙述资产阶级革命与群众运动的发展；从巴黎人民8月10日起义到芽月、牧月起义（1792—1795），这部分分析群众运动如何促进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热月反动与群众运动的结束；从督政府的成立到波拿巴雾月政变（1795—1799），这一部分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秩序的巩固是革命的必然结局。

索布尔始终抓住各时期社会矛盾发展这一主线，突出各种阶级力量的斗争和消长，揭示革命从上升到下降路线的变化规律。他坚持3个基本观点：第一，革命的性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和前途是建立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他的论敌攻击他最厉害的论点）；第

二，从“下面”看历史——是群众运动不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但超过一定限度，群众就被资产阶级所抛弃；第三，“断裂”与“连续”的统一——革命破坏了旧制度，但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的建立也需要一个稳定时期，使新统治阶级力量得以巩固起来，这不仅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目的不相违背，而且是息息相联的。

索布尔用具体、丰富的史料和史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文笔朴实有力，条理清晰，富于现实感。这样的著作无论如何不能被扣上“教条主义”、“斯大林主义”、“僵化”的帽子，像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的那样。索布尔本人自然并不在乎这些无的放矢的证词，他经常感到有必要修改书中某些部分，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书在他全部著作中的地位以及索布尔关于修订此书的最后遗言，他的学生、法国历史家克劳德·马佐里克在他的前言中已作了详细介绍，在此不必赘述。

我只想就索布尔与中国的关系、他对法国大革命研究的重大贡献，以及我与他个人接触的点滴感受作些补充说明。

索布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十分同情社会主义新中国，一直希望来我国访问。我们及时地向他发出邀请。1981年3月1日他给我写信说：“这次旅行将是我的生涯的完满结束。”8月，我们有幸在北京热烈欢迎他，并请他在政协礼堂向200多位历史工作者作题为《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的学术报告。这篇热情洋溢、旗帜鲜明的精彩报告博得了听众长时间的掌声。9月，他应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学一个月，各地教师慕名前往听讲。他讲授了9个专题[1]，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课余还进行了个别辅导。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负责精神给听讲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国派往巴黎进修法国史的教师，都得到了索布尔的诚挚关怀和细心指导。

索布尔来华的时机很好，1981年我国历史学界正在冲破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力图开创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的新风尚。索布尔在华

东师大讲学的开幕式上，结合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况，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他特别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必须把广博考证与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时刻也不忘记对人民事业的关心和忠诚。索布尔的讲演具体地体现了他的观点和方法，给听众以多方面的启发。

第一，在论述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时，他十分注意研究历史运动的共性和特性，不仅分析过渡的普遍趋势，而且分析过渡的各民族特点。在索布尔看来，重要的不是去抽象出“模式”来，而是去揭示过渡的不同道路，从而更丰富而具体地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二，在谈到共和二年的革命政权时，索布尔深入探讨了在任何近代革命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把两种力量结合起来——既要保证坚强的统一的领导，又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如果研究过去革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话，这就是认真总结和吸取索布尔指出的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

第三，索布尔的讲演的特色之一是论争性很强，他保持了法国大革命史学中的这个“顽强的传统”。索布尔认为，历史家的责任是要促进这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而不是“冻结”这种讨论。他很同意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上，在索布尔1981年访华以前，他的名字对我国史学界并不陌生：他的早期通俗性著作《法国革命，1789—1799年》（1948年初版，1951年增订版）在我国早有译本[2]。索布尔与马尔科夫合编的巴黎无套裤汉史料一出版就有书评介绍[3]。他的论文《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的译文刊载在我国历史杂志上[4]。对索布尔的经历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争论以及索布尔的观点，也有比较详细的评介[5]。

阿尔贝·马利乌斯·索布尔1914年4月2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奥兰

（瓦赫兰），是国家扶养的战争孤儿。1936年获得巴黎大学历史学与地理学文学士。1938年取得中学历史教师资格。1939—1940年应征入伍。从1940年法国溃败到1942年，索布尔在蒙贝利埃中学教书。是年7月因参加抵抗运动被捕撤职，此后至法国解放一直从事地下活动。1944—1960年，索布尔长期在中学任教，1951年后兼任巴黎大学文学院预科讲师。1958年答辩通过国家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9日》[6]，索布尔以优异成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1960—1966年任克莱蒙-费朗大学副教授、教授。从1967年到他逝世，荣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主持法国革命史研究所。

索布尔的学术成就是与他的师承关系分不开的。他曾多次提到法国革命史研究中注重社会经济问题与人民运动的优良传统，即从饶勒斯（Jaurès）、马迪厄（Mathiez）到勒费弗尔（Lefebvre）的法国大革命进步史学。这几位历史学家都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索布尔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以研究圣茹斯特开始他的史学生涯。战后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国民军队（1789—1794年）》（1945），此书说明旧制度下的法国军队如何演变为取得辉煌胜利的人民军队。从1950年起，他参与编辑的《罗伯斯庇尔演讲集》（5卷）陆续出版。从这些研究和著作中，特别是他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都可以看出饶勒斯和马迪厄的影响。

但是索布尔最尊重和钦佩的是他的授业老师乔治·勒费弗尔。勒费弗尔和马迪厄都生于1874年。1932年马迪厄死于讲坛上，勒费弗尔继任马迪厄创办的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主席、《法国革命史年鉴》的主编；1937年他又荣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创立法国革命史研究所。在他任教巴黎大学的20多年间，正是索布尔学术生涯成长和发展时期。在他的直接指导下，索布尔花了近10年时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巨著。这部关于法国革命时期城市人民运动的专著可以同勒费弗尔关于

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专著相媲美。勒费弗尔的博士论文《法国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一个省的范围。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统计与分析，得出典型的事例与确切的结论，证明法国革命对农民来说确实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废除了封建权利与什一税和贵族的免税特权，实现了地产的转移。勒费弗尔从中看出了农民运动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索布尔把勒费弗尔研究农民运动的方法用来研究城市人民运动，揭示了无套裤汉的独特性与其历史作用。在索布尔之前，有的历史学家如莫迪梅-代尔诺（Mortimer-Ternaux）竭力诋毁无套裤汉运动；有的尽管同情人民但实际并不了解他们，如米什莱（Michelet）。而托派历史学家盖兰（Guérin）则把无套裤汉视为现代无产阶级，并用“不断革命论”来解释当时的人民运动[7]。

索布尔为了进行无套裤汉的研究，首先整理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48个区（Sections）的文件，各区大会的档案，各委员会的议事录、信件以及各人民团体的残存文献，并编出目录[8]。他非常细致地分析这些文件，作出相应的统计。他的论文第1和第3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了无套裤汉的活动，而在最充实和最有创造性的论文第2部分，他具体描述了无套裤汉的社会成分、职业、组织、要求、斗争目标和策略等等。他的研究表明，法国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既不是1848年革命时的无产阶级，更不是1917年的觉悟工人，也不构成现代意义的政党。他们主要由小手工业者、小店主、小商人组成，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据索布尔对各区委员会领导人物的统计，约3／4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约5%是有产者，约1／10是工资劳动者。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下的贵族特权阶级，又反对从革命中获利的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他们支持革命后建立的社会结构，但希望从雅各宾政权那里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解决他们的日益困难的生活需要。他们是“平均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索布尔进一步分析了无套裤汉运动与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为了取得革命应该提供的生活

权利——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机会等等，无套裤汉希望建立一个由人民直接控制的民主制度。索布尔认为，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并非作为整体敌视无套裤汉，而是根据历史提出的具体任务把精力用于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以战胜内外敌人。当无套裤汉运动的经济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构成对革命政府的威胁时，罗伯斯庇尔等领导人才加以镇压。对此索布尔表示“惋惜”。他不仅肯定无套裤汉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而且承认无套裤汉运动的传统长期存在于后代的意识中。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对索布尔的某些结论（例如认为救国委员会以所谓1794年3月起义为借口来镇压无套裤汉运动，从而使罗伯斯庇尔在热月政变时失去了支持）表示怀疑，但这丝毫无损于索布尔对无套裤汉及其运动的全貌的丰富而生动的描绘。在研究革命时期城市人民运动方面，索布尔确实开辟了一个新天地[9]。

索布尔关于无套裤汉的巨著确立了他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的卓越地位。1959年8月他的老师勒费弗尔去世。11月，经过选举，索布尔参加了罗伯斯庇尔研究会的主席团并担任该会秘书长，《法国革命史年鉴》的编辑责任实际上也落到他身上。勒费弗尔遗言委托索布尔负责整理他的著作。索布尔费了很多精力整理、订正、出版和再版勒费弗尔的手稿、讲义、专著，计有《奥尔良研究》（2卷，1962—1963年），《法国大革命研究》（1963年），《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瑟堡》（1965年），《法国大革命》（1968年），《拿破仑》（1969年），《近代史学的诞生》（1971年），《督政府时期的法国》（1977年），《论历史学》（1978年）。

索布尔对勒费弗尔的学术遗产，有继承，也有发展和修正。例如，索布尔根据自己20多年对农民问题的探索结果，提出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方法和观点[10]。在研究方法上，索布尔认为在旧制度下有3方面的问

题必须研究清楚，否则不足以说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核心作用：封建榨取，地产分配，农村公社的存在。但勒费弗尔对第一方面问题（即封建权利及其废除）和第三方面的问题（即农村公社及其在革命时期的逐步瓦解）都轻轻带过，未予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索布尔不同意勒费弗尔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要求的性质和作用的估计。大家知道，勒费弗尔一贯强调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的独立性，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在1789—1792年之间强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但是勒费弗尔认为农民在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资本主义，大多数农民（从小地产主到农业工人）都要求保持一块小地产、瓜分公地，保存传统的农村公社，换言之，即保存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方式。他们向后看，要求恢复或维持过去的一套。这些要求显然阻碍了农业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改造，妨碍了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因而勒费弗尔断定，农民平均主义在经济上是后退的。

这种把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归诸小农经济普遍存在的观点，在历史界是很流行的。索布尔企图推翻这一观点，他认为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不但不应该从小农生产大量存在中去找寻，而且应该归诸这种小农生产还不够普遍。索布尔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证明，法国革命并未彻底消灭大地产，这些大地产虽然已经不属封建性质，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归贵族所有，征收地租；租佃制、分成制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甚至保存什一税、半什一税，直到20世纪初，这些才是真正落后、倒退的生产方式，才是妨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阻力[11]。他指出："19世纪法国农业发展的消极方面，与其说是由于小农强加给革命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如勒费弗尔所断定的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不如说是由于小农未能从革命中夺得的东西：破坏大地产与消灭地租。……因此，法国日后资本主义的落后乃由于农民革命的不完全性，由于广大农民未能把他们的'革命道路'贯彻到底。"[12]

索布尔这里所谈的"革命道路"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20

章所分析的由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的两条途径之一[13]。索布尔在研究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时，不仅注意到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的特殊结构，从而说明农民运动以及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而且联系到法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问题。他的视野比勒费弗尔更广，能够把法国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方式放在世界范围内加以观察，作比较研究，并参照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展开争论[14]。他把英国、法国过渡的道路与意大利、德国、波兰、日本过渡的道路进行对比，以区别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与自上而下的妥协道路；同时又在采取同一条道路的国家之间（如英国与法国）进行对比，以揭示过渡的各种途径的一致性与分歧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坚持研究阶级与阶级斗争，研究群众运动，研究社会经济结构，研究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规律”，但他并不忽视人物、事件和思想的作用。他先后组织了几次大型讨论会：1960年巴贝夫讨论会[15]，1965年吉贝尔·昂姆讨论会[16]，1965年罗伯斯庇尔讨论会，1967年圣茹斯特讨论会[17]，1969年纪念拿破仑诞辰200周年讨论会。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索布尔对巴贝夫与巴贝夫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在1960年举行的巴贝夫讨论会上，索布尔提出论文：《巴黎各区人员与巴贝夫派人员》[18]，研究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的社会构成。他根据可以查考到的各类名单，核对平等派密谋的拥护者与曾参加共和二年巴黎各区活动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用以说明无套裤汉与巴贝夫运动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与差异。在这次讨论会上，索布尔被推选与苏联历史学家达林（Daline）和意大利历史学家萨义达（Saitta）共同主持出版《巴贝夫文集》。1966年，他们编出了《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19]。《巴贝夫文集》法文版第1卷，出版于1977年，索布尔为此写了题为《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密谋》的导言。他根据新出的文献指出，巴贝夫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乔治·勒费弗尔所说的分配的和消费的共

产主义，而且是生产的共产主义。索布尔也不同意马迪厄所说的，巴贝夫运动只是在1794年和1795年被排挤出政权的雅各宾主义者为重新掌权而策划的，他详细地论证了这是巴贝夫及其战友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的革命行动。

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索布尔还坚持同来自“左”右的各种歪曲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观点展开论战。除了上述出现于40年代的以盖兰为代表的拔高无套裤汉、诋毁罗伯斯庇尔的“左”的倾向外，50年代又出现了以美国帕尔默（Palmer）为代表的抹杀、贬低法国大革命的“大西洋革命论”，以英国考本（Cobban）为代表的反对以社会原因解释法国大革命的“革命神话论”。到60年代中，法国孚雷（Furet）和李舍（Richet）又提出了“优秀人物论”、“三种革命论”和“革命侧滑论”；美国爱森斯坦（Eisenstein）和泰勒（Taylor）则企图从根本上否定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从而否定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索布尔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修正企图”加以分析批判[20]。

与此同时，索布尔加强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正面阐述及普及工作。1962年出版了他的《法国革命史简编》。这部著作不是1951年的《法国革命1789—1799年》的增订版，而是包含10多年独创性研究的新概括。此书主线明确而又不把历史简单化，在突出主要矛盾的同时还细致地分析了各种次要矛盾。继此之后，他又为法国《知识丛书》撰写了《法国大革命》、《督政府与执政府》、《第一帝国》[21]。此外，他还写了《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为了追根溯源，索布尔晚年把研究范围上推到革命前的旧制度，出版了《革命前夕的法国》、《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旧制度的危机》、《启蒙世纪》。他还参与了布罗代尔（Braudel）与拉布鲁斯（Labrousse）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第3卷，负责撰写1789—1815年部分[22]。

面对着年鉴派与结构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攻，索布尔是

如何应战的呢？这里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为社会史家，索布尔并不拒绝应用其他社会科学如人口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学等提供的工具，包括计算机。他对年鉴派初期的贡献也是肯定的，并适当运用“结构”、“局势”、“长时段”、“心态”等概念。但对于年鉴学派贬低个人与事件的作用以及过分重视经济史、忽视社会史的倾向，他是持否定态度的。索布尔认为，对于社会史来说，计量法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但计量不能离开人，离开社会的人，离开阶级的人。如果只看到物价的升降而不问这些变化使谁贫穷，使谁发财，为何贫穷，为何发财；如果只计算地产的分配，而不问这些地产的性质（封建还是资本主义）以及剥削关系和程度，这对一个历史家，特别是社会史家来说是不能想象的。

索布尔也并不排斥对各种“结构”——经济、社会、思想结构进行分析。他承认在历史的一般运动中，结构既是历史的支柱，又是历史的障碍。然而，他说：“历史家的职务主要在于揭示结构的运动、它们的变化原因和过程，确定事件和这种运动相联系的方式。结构主义的分析倾向于解剖结构，而历史的分析虽然也有同样的要求，但它要进一步了解结构的运行。对历史分析来说，重要的是变化。它超越‘共时性’，包含运动，即‘历时性’，还要说明其运转方式。”[23] 总之，索布尔认为历史家关心的是结构的演进、衰退和死亡，旧结构如何为新结构所代替；而这种演进、衰退、死亡的动力乃存在于结构内部而不在外部，是结构本身包含的各种矛盾推动着它的变化过程。他说：“结构主义用固定不变的范畴来思考；历史学则排斥这些范畴，因为它的雄图和目的是理解人类社会的运动。如果依照结构主义的分析，历史学所提供的真实仅仅是一些断断续续的固定不变的图像，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24] 这是对当代颇为流行的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有力批判。

索布尔逝世后，陆续出版了他生前已完稿的《文化与法国革命》第2卷（1982）：《法国革命》；第3卷：《拿破仑时期的法国》

（1983）。这部1 600多页的巨著包含他对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叶法国历史研究的结晶。这是一部法国从封建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的真正社会史，它具体描述各阶级状况的演变和斗争，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逐步形成。图文并茂，年表及参考书目齐备，科学与文化大事罗列无遗。

另一部著作《革命者画像》（1986）是索布尔在1958—1982年间所写的短文、序言和讲演，内容集中在对革命人物的素描和评论，包括德穆兰、圣茹斯特、昂姆、库通、罗伯斯庇尔、埃贝尔、格雷古瓦尔修道院长克卢茨、塔里安夫人。索布尔从未写过一本革命者的传记，他曾对我说："写传记比写一部历史更难，有一个出版社曾约我写一部丹东传，我犹豫不决，最后终于谢绝了。"从这些人物画像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索布尔评论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他从不苛求于古人，包括对塔里安夫人那样的多变人物；也不美化革命者，例如他指出圣茹斯特的严重缺点：不了解经济问题，缺乏历史观点。他认为"历史家不是检察官，史学的责任不是审判，而是使人理解。"[25]

我第一次结识马利乌斯（最亲密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是在1979年5月。此后3年，我每年都有机会和他晤叙：1980年在布加勒斯特，1981年在北京、上海，1982年又在巴黎，每次都受到了极大教益。有一件事使我铭记终身：1979年5月中我抵达巴黎那天（距前一次访问法国已隔了23年），索布尔刚从亚眠讲学回来，马上到巴黎大学附近我的住处来看我，一见如故。他的坦率的谈吐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立即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彼此虽系初交，却毫无隔阂。那天傍晚，他在带我去进餐的路上，顺便参观了他引以自豪的亨利四世中学。在这所著名学校，索布尔曾任教多年，一边教书，一边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他的老师乔·勒费弗尔也在该校教过书）。他那热爱教学的精神，忘我地指导青年从事历史研究的责任感，特别是他对历史科学在培养公民品德方面的作用的信念，一直维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今年杜桑节（类似清明节），11月2日，我到拉舍兹神父公墓马利乌斯坟上凭吊致敬，他逝世已整整5年了。墓碑上只刻着几个朴素的字：“阿尔贝·索布尔 法国革命史家”。我惊奇地发现，葬在索布尔左右两旁的是两个浙江人。一位陪我同去但从未见过索布尔的文学家对我说：“你说对了，索布尔确实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还应加上一句：中国人民也是索布尔的好朋友。”

张芝联

1987年12月

---

[1] 阿·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论选》，王养冲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2] 端木正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书后附有索布尔1954年发表的论文《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译文。这部著作为我国大学历史系参考书，流传颇广。据索布尔自己回顾，撰写此书时虽然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阐述，但还没有摆脱学院派的影响，特别是马迪厄的影响，因此存在一些缺点。

[3] 张芝联，《巴黎的长裤汉。1793—1794年人民运动史资料》（书评），《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

[4] 严武译，何兆武校，《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

[5] 张芝联，《漫谈当代法国史学与史学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6] 该书第1版出版于1958年，共1168页，第2版出版于1962年。意、德、英、苏诸国均出版此书节译本。论文导师乔治·勒费弗尔亲自为该书写评介，见《法国革命史年鉴》，1959年第156期。

[7] D·盖兰，《第一共和国时期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与“赤膊汉”（1793—1797年）》，2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6年初版，1968年新版。

[8] 《巴黎各区文件简目。1790年—共和4年》，法国革命经济社会史委员会出版，1950年。

[9] 英国历史家鲁德（Rudé）和科布（Cobb）、挪威历史家特纳森

（Tonnesson），都在索布尔的论文发表后写出有关法国革命时期人民运动的专著。

[10] 索布尔关于农民问题的著作汇集在他的《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论文集）中，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76年。在索布尔的指导下，出版了一本由他的学生撰写的《法国革命的农民史论文集》，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年。索布尔为此书写了一篇长序。

[11] 参看索布尔在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0年8月布加勒斯特）上提出的论文：《拿破仑欧洲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与土地状况——以法国为例》，见大会报告III，页379—407。

[12] 索布尔，《法国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论文集），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76年，页440。

[1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373—374。

[14] 参看索布尔，《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法国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译文见《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

[15] 参看《巴贝夫与巴贝夫主义诸问题》，1960年第1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讨论会文件，巴黎：社会出版社，1963年。

[16] 昂姆是立法议会与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历发明人之一，因赞助共和三年牧月起义被判死刑而自杀。参看《吉贝尔·昂姆（1750—1795）及其时代》，1965年克莱尔蒙文学院吉贝尔·昂姆讨论会文件，法国大学出版社，1966年。

[17] 参看《罗伯斯庇尔》，1965年第1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罗伯斯庇尔讨论会文件，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出版，1967年；《圣茹斯特讨论会文件》，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出版，1968年。

[18] 发表于《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62期，1960年10—12月号。收入索布尔，《理解法国革命》，巴黎：马斯贝罗出版社，1981年，页147—167。

[19] 参看《巴贝夫手稿与已出版著作总目录》（与达林、萨义达合作），法国革命经济社会史委员会出版，1966年。

[20] 索布尔，《传统的大革命史编纂学与修正的企图》，见《法国大革命史论选》，页168—191。

[21] 关于索布尔对督政府和拿破仑研究的贡献，参看端木正，《近年来国外拿破仑史学的一些动态》，《历史研究》，1978年第6期。

[22] 这一卷出版于1976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23] 索布尔，《文化与法国革命》第1卷：《旧制度的危机》，巴黎：阿尔多出版社，1970年，页34。

[24] 同上书，页36。

[25] 《革命者画像》，巴黎：社会出版社，1986年，页131。

- 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 第一章 社会危机
  - 第二章 制度危机
  -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 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 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 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
  -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
  -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 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 革命遗产
- 附录 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 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 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
  - 阿尔贝·索布尔著作目录

- 法汉人名对照表
- 法汉地名对照表

返回总目录

前言

《法国大革命简史》再版随笔

1982年9月13日，阿尔贝·索布尔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对于法国的历史科学，对于他在各国的朋友和学生们是一巨大损失。他的研究活动停止、著书立说中断所造成的空缺是难以弥补的。索布尔为了以广博的历史研究成果迎接17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配合1989年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庆祝活动，正在从事着一整套历史考证、研究和出版方面的工作。正是由于感到纪念1789年的活动的临近，他于1982年5月欣然接受了社会出版社的建议：以新版面、新题目再版他的《法国大革命简史》，并同意对内容进行充实、修改。这部名著于1962年出版后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为了迎接伟大的200周年纪念日，有什么做法能比再版这部以明晰、贯通理性才智和科学求实著称的著作更为恰当呢？为完满实现这一计划，索布尔与他的得意门生——鲁昂大学的居伊·勒马尔尚和我本人曾多次会商，其中以7月27日在尼姆的那次长时间工作会晤最为重要。

除了在各章里作的一些修改和增补外，阿尔贝·索布尔在原书基础上还作了3个方面的改动。首先是重新撰写了引论：《旧制度的危机》。在这方面，他十分注重近年来关于18世纪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研究的新成果，并乐于把这些研究的具体结论吸收进他的论述之中，因为所有这些结论与他的基本推理并不相违。其次是他打算重写第二部分的第三章：《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他计划在其中吸收他自1977年起在巴黎大学讲课的内容：关于社会下层所要求的革命暴力与法国大革命战时政治所必须实行的国家恐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最后，他认为应该在书的结尾部分增加一篇史学史方面的文章，以阐明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和关键地位：两个世纪以来，在我国出现的各种思想冲突中，法国大革命都是不可回避的参考基础。

在很长时间里，索布尔曾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样板”。近10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开始一致认为：大革命远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他力图表明这一过程何等深入地根植于法兰西民族所特有的现实矛盾的土壤中。在1789年，这个民族虽尚未完全形成，但正以其特有的和强有力的方式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而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独具特色。

阿尔贝·索布尔本应在1982年10月以前向社会出版社提交第二部分第三章的新稿。我和居伊·勒马尔尚整理的关于如何重写引论和结论部分的讨论记录也应由他修改后定稿。1982年7月28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对我们建议修改的内容表示赞同，并写道：“亲爱的克洛德，感谢你承担起所有这些事情。”他休假回来后，我于9月11日从电话中得知他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但他仍重申，同意我们7月份以来提出的各项建议，并请求再宽限他几天以便完成剩下的文字。然而两天之后，他却猝然去世了。

出于对阿尔贝·索布尔的怀念和对其30年来教诲的忠诚，我发动社会出版社投入了《法国大革命简史》的修订出版工作。这也是索布尔在他生前那个最后的夏日里托付给我的心愿。在不改动引论部分原文的情况下，我们把由勒马尔尚执笔、索布尔生前同意增补和修改内容放在〔〕形括号中，[1] 放入他指明的段落里。考虑到他对其他章节表示的明确意见，但又不便对他未及修订的内容妄加改动，我们在本书正文后增加了索布尔的两篇最新研究论文。这既是本书的附加部分又与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索布尔原想在再版此书时将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吸收进来。第一篇《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做的一次讲演，载于该所《历史手册》1981年第5期。另一篇《什么是大革命？》曾刊登在1981年《思想》杂志（第217—218期）。倘若索布尔有时间最后完成此书，这部《法国大革命史》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结构。但是，新版肯定表达出了索布尔生前最重要的观

点，反映了他最新思路的方向。

为了使这个具有参考工具书性质的版本臻于完善，我们在前言之后附加了索布尔著作的目录[2]。这是由他特别信任的学生，巴黎第一大学的弗朗索瓦兹·布律内尔专为本书编订的。这里，我们采用了严格的、索布尔式的分类方法。我们不追求一篇不漏地和盘托出，因为这需要在无数国内外报刊的目录中寻觅几年才能做到。然而，这一目录已相当完备，堪称当今独一无二的。它包括了索布尔生前以其多产的手笔和科学探索精神为我们创造的一切成果。此外，永不满足的激情还激励他不断挥毫改动、完善其旧作，他认为这些著作应获得新生。

《简史》在索布尔著作中的地位

眼前这本法国大革命史教程在索布尔的全部著作中占据中心地位。出版此书的计划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社会出版社在1950年曾向索布尔建议再版他于1939年由国际社会出版社出版的《1789年，自由的共和元年》以及他在1948年发表的一部简短教材。索布尔在1950年6月6日的一封信中对此表示同意，并补充道："当然，我要做一些修改。尤其是，我认为引论过于机械、简单化，以重写为好。至于其他，只需作某些细节上的改动。20年后，当我在这方面达到更高水平时，我将用我现在开始构想的、同以前全然不同的方式把它们全部重写。"索布尔的这个新的"全部"就是《法国大革命简史》。这部书的写作是从1960年，即他通过国家博士论文答辩3年之后开始的。我有幸在1961年秋拜读了由他亲笔抄写的该书定稿。可以说，《简史》是一部已在形成的伟大著作的第一次总结。索布尔在其科研生涯的前半期致力于探讨1789年革命本身的价值，以及巴黎公社之前19世纪历次革命所赋予它的全新意义。他注重新型民主价值的出现，同时对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演变进行对照研究。从旧制度向新型法国急骤过渡时，法国社会的深刻运动也引起他的注意。作为乔治·勒费弗尔的后继者和学术知己，索布尔对他所热爱的这段历

史中阶级斗争的特殊运动进行了研究。他不为那种把阶级斗争排除于历史之外的理论所左右，同时也坚决抵制任何不求甚解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这部伟大论著于1958年出版，1962年再版（被译成英、意、德、俄等文）。它使阿尔贝·索布尔在本世纪从饶勒斯、马迪厄到勒费弗尔等名家为代表的大革命传统史学中成为最杰出的专家之一。实际上，他是真正的历史回顾社会学的奠基者。他丝毫不局限于那种承认罗伯斯庇尔主义的巨大贡献而无视革命过程中的矛盾的片面观点。恰恰相反，他阐明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总体过程中的社会性质和矛盾作用。正像他所说的，他通过研究无套裤汉、共和二年的士兵和农民，产生了“从下层人民看”大革命的兴趣。

后来，阿尔贝·索布尔致力于理论研究。他通过严格的比较研究，对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道路进行了剖析，为此他走遍了世界各地。通过1962年出版、1972年再版的《法国大革命简史》这部杰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第一项综合成果。直到1982年，他一直在继续这种努力。20年来，这部著作已成为经典，从未被世界各国的出版物所超越。在我看来，达到这一成就的原因很明显：索布尔在倡导细致地、积极地思考10年大革命的同时便解答了一切真正的革命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如此巨大的运动如何能够发生？革命者怎样、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如何进行了自身的改造？另外，此书内容严谨，结构均衡，使大革命的发展线索更显明晰。史实叙述环环相扣，史料可靠，对史料解释基于广博的考证知识。全书文笔流畅，语言简洁，无丝毫造作，所用语汇规范，任何用心的读者均可从中受益，并会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和过程进行深入思考。

作者首先系统地研究了旧制度危机在结构与经济情势方面的基础。然后以大部分篇幅对推动大革命发展的社会、政治矛盾的性质展开了分析，其中包括从雅各宾时期的民主激进主义到为巩固法国政治制度而试行的各种形式，从封建主义的残存到现代社会基本制度的建立。

《简史》这部综合性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阿尔贝·索布尔史学研究第一时期的完满结束，成果累累。然而，《简史》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它进而提出了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后来不断扩展，以至成为索布尔最新思路的核心，即关于向新社会过渡的道路问题。因此，他在1980年9月26日的《大革命》周刊上谈到乔治·马歇《当今的希望》一书时写道："同在政治方面一样，在历史方面也不存在任何模式，而只有各种道路。法国通往未来的道路是通过顽强斗争开拓出来的。"对索布尔的史学思想中这个新观念的分析超出了本前言的范围，因此，我们仅就《简史》在他的研究和思考中所占的地位加以说明。

索布尔的生平和学术生涯

阿尔贝·索布尔是一位杰出学者。他的著作在法国以至全世界把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了解引向更深的程度。他喜欢用"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一语来评价这场革命。索布尔于1914年4月27日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地区的阿米-姆萨一个移民小农家庭。其父辈原籍是法国的阿尔代什省。他自幼因战乱失去父母，成为由国家抚养的孤儿。后来，他和姐姐被在尼姆的姑母玛丽·索布尔所抚养。这位教育家曾任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现在位于尼姆市大革命广场的一所学校便是该校旧址。在这种非宗教和典型的共和思想环境中，索布尔受到了以民主精神和为民献身为最高美德的思想教育。这种教育贯穿着卢梭主义，同时倡导敬重书籍，尤其受珍视的是米什莱、马迪厄的那些造就人们灵魂的历史书籍。

结束了尼姆中学和路易大王中学的寄宿学习后，索布尔在1938年获得正式中学历史教师资格。他最初与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马克·布洛克的交往令人失望。后来他得到了一年的科研资助金，使他得以初探法国大革命史。1939年，他作为普通一兵应征入伍，在一支马拉火炮部队服役。1940年，他随同一个有6匹马的炮组从法国北部撤到西南部，蒙受了不战而退的耻辱。此事在他心灵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复员后，索布

尔在蒙彼利埃的霞飞中学任教。1932年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42年7月14日，他在一次爱国游行中被捕，并立即被“维希伪政权”（索布尔语）解职。此后两年中，他一边以临时职业为生，一边从事地下活动。解放后，国民教育部将他重新编入巴黎教师队伍。他先后在马塞兰·贝特洛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任教。在1946年至1948年的两年停薪休假之后，他重新受聘于亨利四世中学。1950年10月至1953年10月，他在国家科研中心任职。此后在让松·德·萨伊中学教书，接着重返亨利四世中学。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60年，其间于1958年11月29日通过了国家博士论文答辩。1960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克莱蒙-费朗文学院副教授。1962年9月1日，他晋升为该校正式教授。1967年，他接替马塞尔·雷纳尔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史讲座教授。奥拉尔、萨尼亚克、马迪厄和勒费弗尔都曾在这座享有盛名的学府任教。直到他去世，阿尔贝·索布尔一直献身于教师、历史学家和研究导师的工作，从未中断。他希望从1982年学年起继续任教两年，使他的几个临近结业的学生得以完成论文答辩。这一要求是合理的：维希政府把他解雇使他有权在任职末期追回叛国政府剥夺他的两年任教期。但是死亡竟使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作为驰名世界的学者，索布尔曾到世界各地任教或讲学：拉丁美洲和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苏联和德国，他走遍了整个欧洲、非洲和中东。

索布尔生前是布达佩斯科学院和柏林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莫斯科大学和澳大利亚及美洲一些大学的名誉博士。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阿尔贝·索布尔的名字为法国历史编纂科学增添了光彩。

以上便是索布尔其人及其作品的扼要介绍。社会出版社怀着双重感情按我们的建议，以新书名再版这部法国大革命史巨著：一方面是将此

书作为新的宝贵文献收入“土壤”丛书；另一方面是向已离去的阿尔贝·索布尔表示敬仰和感激之情。

克洛德·马佐里克

历史学家、社会出版社社长

---

[1] 为全书体例一致，我们将〔 〕一概省略了。——译者

[2] 中译本将此份目录作为本书的附录。——译者

序言

法国大革命与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一样，是使资产阶级成为世界主宰的这一长期社会、经济演变过程完成的标志。

这个当今人所共知的真理是由资产阶级最觉悟的理论家从19世纪开始宣告的。为了从历史角度论证《宪章》，基佐曾指出，法国社会和英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人民和贵族之间存在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它的思想逐渐明确，并建立了一个新社会的框架。1789年革命便是对这种新社会的确认。其后的托克维尔及泰纳也赞同这种观点。托克维尔曾以“一种宗教的恐怖”谈道：“这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多少个世纪以来突破重重阻碍向前发展。今天，人们仍然看到它在自己造成的废墟中前进。”泰纳勾画出资产阶级在社会地位方面缓慢地上升，这最终使它对不平等状况不能忍受。但是，尽管这些历史学家确信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首先归功于流动财富、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他们却从未注重具体研究大革命的经济根源和从事这场革命的社会各阶层。

尤其应当指出，尽管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具有远见卓识，他们都未能阐明一个根本问题：大革命归根结蒂应该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之间的矛盾来加以解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力量所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是在“封建社会”自身的内部产生和发展的。在18世纪末，所有制关系、农业和制造业的组织形式已不再适应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并成为生产的阻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写道：这种桎梏“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1]

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一书中，饶勒斯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也在该

书《总引论》中承认，他对历史的解释中“既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又有米什莱的神秘主义观点”。）再现了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雄辩地展示了一幅广阔宏伟的时代画面，它至今仍不失为一座不朽的丰碑。他写道：“我们懂得，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方式是历史的基础。”饶勒斯之所以能把大革命史研究推向前进，是与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高涨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如果说他本人并未明确指出，阿尔贝·马迪厄却感觉到了。马迪厄在1922年《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再版前言中写道：饶勒斯把他在政治斗争中的“敏锐感与嗅觉”同样运用于历史资料的研究中。“由于他投身于各种集会和党派的激烈的政治生活中，他比那些教授和埋头于工作室的人更能体会出革命者的激情及他们明确或隐晦的思想。”饶勒斯的著作或许有简单化的毛病。在该书中，大革命的发展是单一性的：其原因在于业已成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和知识方面的力量，其结果则是这种力量以法律的形式被确认下来。

萨尼亚克和马迪厄又有发展，他们阐明了18世纪中在1787—1788年达到高潮的贵族的反动。马迪厄以含糊的用语称之为“贵族的反叛”，即贵族疯狂反对任何改革尝试，少数特权人物不仅把持所有国家官职，而且顽固拒绝与上层资产阶级共享优势。这就说明法国大革命何以具有剧烈的性质，资产阶级的上台为什么不是一种渐变而是一种实质性的突变。

然而，大革命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业绩。在饶勒斯之后，马迪厄也强调了第三等级的迅速分化和资产阶级各派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很快出现的敌对，指明了大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和各阶段的发展进程。乔治·勒费弗尔把目光从历史学家们一贯注重的巴黎和大城市转向对农民的研究（因为18世纪末的法国毕竟是以农为主的国度）。在此之前，农民的行动一直被看作是对市民运动的反应，主要是配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和王权。关于大革命的同质形态和发展主流的观点便这样延续了下来。乔治·勒费弗尔以精确的社会分析揭示出：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内，发

展着一股农民运动的潮流。它在其起因、进程、危机和倾向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有必要明确指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即摧毁封建的生产关系。大革命在农村打碎了旧的所有制关系，加速了传统农业组织的瓦解。

乔治·勒费弗尔的著作具有示范与榜样的价值。没有他开拓的这一研究领域便没有大革命的社会史研究。而这种社会史研究是加深对大革命了解的唯一途径。要想说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作用表现，搞清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和最终对大革命做出确切总结，我们别无他径，只有从细致地分析各社会阶层及其团体的地产、流动财富和经济实力入手。

有一个事实发人深省：在资产阶级无可争议地统治了150多年之后，仍然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问世。在对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的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侧重精神形态而不是经济实力的论文和对某个地区或城市、某个家族或阶层的专题研究成果。这些专题研究注重史料分析并提出了研究方向，因而具有较高价值。尽管如此，大革命史研究在这方面的落后状况必须受到正视。毫无疑问，对社会（指上流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描写不乏其作。但这些通信集或回忆录中的描述仅限于对习俗或思想的勾画，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却是生产关系、收入和人数方面的状况。我们除了没有一部资产阶级的历史以外，也没有一部关于大革命期间的贵族的历史著作。城市人民阶层的历史则初具规模。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在经济和税收文件所提供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着手对各局部地区进行专题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各阶级和社会阶层进行综合的研究工作。而这种研究工作才是揭示阶级对立和把握阶级斗争辩证运动复杂性的唯一途径。例如，对糖岛（指安的列斯群岛——译者）的开发和与之相关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尽管已有许多描写，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深入研究波尔多资产阶级的著作。缺乏对吉伦特派所代表的这个社会团体的财富和实力的估量

和对其构成范围的明确勾画，对吉伦特派的任何评价便无从谈起。

这类例子俯拾即是。我们会看到，由于对当时社会力量缺乏确切的了解，大片的研究领域仍有待开发，大革命的许多曲折仍不为人所知。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256。——译者

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在1789年，法国正处在被后人称为“旧制度”的框架之中。

这个社会在本质上仍是贵族性的，它基于门第特权和土地财富。但是，经济演变使流动财富逐步增加，资产阶级的实力不断加强，从而侵蚀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同时，实证知识的发展和启蒙哲学的勃兴正动摇着现存秩序的思想根基。18世纪末的法国固然仍是个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国度，但是大规模size 规模贸易trade 贸易的高潮和大工业的出现（尽管是局部和初发的）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自由的要求必然激起那些依赖于传统经济秩序的社会阶层的强烈反抗。然而在资产阶级看来，这种发展和要求却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也制定出一套符合其社会和政治利益的理论。尽管贵族阶级在社会正式等级中仍居首位，但它在经济实力和社会作用方面却相对没落。

人民各阶层，尤其是农民承受着旧制度和封建残余的全部重压。这些阶层尚不知什么是它们的权利和它们强大到何种程度。在它们眼中，有强大经济支柱和精神威望的资产阶级才是当然的领导者。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创立了一整套与其历史、作用和利益相适合的哲学。这种哲学旨在抨击和摧毁旧制度，它的视野极为广阔并牢固地依据理性，因而具有一种普遍价值。它把所有法国人和整个人类作为传播对象。

启蒙哲学以社会幸福的理想取代了传统的生活与社会的观念。这种理想基于对人类精神和科学知识发展的无限性的信念之上。人重新获得了尊严。经济、政治及一切领域的完全自由应该激发人的活动。哲学家使人把了解自然以便驾驭自然和增加财富总量作为奋斗目标。这样，人类社会将得以充分发展。

在这种新的理想面前，旧制度被迫退居守势。当然，王朝仍旧保持着神授权利的色彩，法国国王仍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享有绝对权力。然而，这种绝对君主制已不得人心。路易十六最后还是把他的绝

对权力分放给贵族。所谓“贵族革命”（只不过是“贵族阶级的反动”，更恰当地说是一种不惜使用暴力和叛乱risings in叛乱手段的“贵族的反动”）自1787年起成为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行政人员往往很出色，但在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这些贵族堡垒的顽固抵制下，马肖、莫普Maupeou， René Nicolas de（1714-92） 莫普和杜尔哥Turgot， Anne Robert Jacques， Baron de L'Aulne（1727-81） 杜尔哥进行结构改革的企图全部归于失败。因此，行政组织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行政组织毫无改善，旧制度仍然是未竟之业。

君主政体的各种制度大致最终形成formation of 形成于路易十四时期。路易十六用与其祖辈同样的政府和御前会议进行统治。路易十四把君主制度的权威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却没能使之成为一个合理与协调的整体。民族统一的进程在18世纪有较大发展，这种发展得益于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学教育对古典文化的传播和沙龙、思想团体及阅读reading 阅读活动对哲学思想的推广。然而，这种民族统一尚未臻于完善。不少城市和省份仍然保留着各自的特殊权利。北部地区保持着旧有习俗；南部地区遵从着罗马法Roman law 罗马法。度量衡单位千差万别，国内路卡关税重重，民族统一受到阻碍。有的法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内竟被当作异族对待。行政组织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行政组织的特点是杂乱无章，司法、财政、军事、宗教各部门的区划相互重叠，各行其是，钩心斗角。

当旧制度的结构在社会和国家中处于勉强维持之际，一场“名副其实的情势革命”（埃内斯特·拉布鲁斯语）加剧了社会紧张状态：人口增长与物价上涨二者双管齐下，使危机更为严重。

在18世纪，尤其是1740年以后，法国的人口开始增长。和前一时期的停滞状态相比，这种增长显得很突出。实际上，这种增长可谓一般。据估计，如果按1789年时的疆域，法兰西王国的人口在1700年前后为2

080万，1790年为2 760万。内克Necker 内克在《法国的财政管理》（1784年）一书中提到的2 470万的数字似有些偏低。如果按2 700至2 800万计算，人口增长应是32%左右。这种增长因地区而异，在埃诺Hainault埃诺和阿尔萨斯Alsace 阿尔萨斯较快，在诺曼底Normandy 诺曼底则较慢。英国在同期的居民总数不超过900万，其人口在一个世纪内增长了80%。西班牙当时的人口为1 050万。法国的出生率比较高，达到38‰。然而，减少生育的倾向也有所表现，尤其在贵族家庭以及巴黎市和巴黎盆地Paris basin 巴黎盆地的平原地区。死亡率每年的起伏变化很大，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下降。尽管从1750年以后开展了医疗卫生宣传运动，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仍高达35‰左右。[1] 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夕，法国人的平均寿命增长到29岁左右。这一人口增长始于18世纪20年代，其主要原因是17世纪由营养不良、饥荒famine 饥荒和流行病（如1709年的“严冬”）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已不复存在。从1741—1742年以后，这种“饥荒famine 饥荒”型危机已趋于绝迹。出生率虽保持原水平，死亡率却下降了。于是人口开始大量增加，在下层人民各阶层和城市中尤甚。人口增长在城市比在农村更为突出。1789年，法国已有1万居民以上的城市60余个。如果按2 000人以上的居民点为城市的标准计算，城市人口的比例最少为16%，最多可达20%。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促使物价上涨。

在18世纪的法国，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主要表现为1733—1817年期间的长期上升。按照西米昂的术语，这是“A阶段”，在此之前的“B阶段”是从17世纪至1730年的萧条时期。这个长期的上升运动开始于1733年左右（锂的价值在1726年被稳定下来，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一直没有发生过任何货币波动）。1758年前这种运动的发展尚且缓慢，但在1758—1770年间（路易十五的“黄金时代”）则急剧进行。此后，上升运动曾趋于稳定，到大革命前per-Revolution 革命前夕又重新出现高峰。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对24种食品和商品的价格prices价格进行了计算：把1726—1741年间作为基础，其指数定为100。1771—1789年这一长时期

的平均上涨率为45%，而其中1785—1789年间的上涨率达到65%。价格prices价格的上涨因商品而异：食品价格prices价格上涨高于制成品，粮食比肉meat 肉类上涨多。这些特征表明农业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粮食在人民开销中的比重极大。粮食产量增长有限，而人口迅速增加，外国谷物grain 谷物又不得介入竞争。1785—1789年间，小麦价格prices价格增长了66%，黑麦价格prices价格增长了71%，肉meat 肉类价格prices价格增长了67%。木柴价格prices价格的增长创最高纪录：91%。葡萄酒的情况较特殊，只有14%。许多葡萄农不生产粮食，面包靠购买，葡萄酒酿造业利润下降的后果便更显严重。纺织品（毛织物为29%）和铁（30%）的价格prices价格上涨率处于平均水平以下。

周期性的波动（1726—1741年、1742—1757年、1758—1770年和1771—1789年各为一个周期）与季节性的波动在此期间相互交错，加剧了物价上涨。在周期的最高点1789年，小麦上涨达127%，黑麦达136%。关于粮食，好年景时季节性价格prices价格波动不很明显；坏年景时，波动便会加剧。从秋季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价格prices价格可以增加50%至100%，甚至更多。1789年，季节性波动的最高点在7月头15天：小麦价格prices价格上涨150%，黑麦上涨65%。经济情势主要通过生活费用表现出来，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

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于周期性波动、季节性波动以至危机，其原因应该从总的生产条件和交通状况中去寻找。各个地区全靠自给自足，生活费用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收成多少。产量不高，缺乏储藏技术而使粮食不能保存到来年。工业的结构主要是手工业型的，它很少出口exports 出口，只服从于国内消费，并受农业波动的直接影响。长期的价格prices价格上涨产生于四组相互作用现象的综合效应。首先是贸易trade 贸易关系的密切和生产商品化的加强，其次是金属货币流通的扩大和汇票、记名本票等形式的短期信贷的发展。金属货币流通的扩大是由于巴西的金矿和墨西哥的银矿得到开发。它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

要，并促进了这种发展。人口增长同样起了作用，它扩大了需求和劳动潜力，刺激了商业和生产。最后，在这种物质环境下勃兴的经济投机精神助长了长期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通货膨胀。

以上便是旧制度的危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种种表现。对此问题的研究即是勾画出大革命发生的深刻根源与偶然起因，并且预先指明大革命在法国近现代史中的特殊意义所在。

---

[1] 原书为35%，似有误。——译者

第一章 社会危机

在旧的贵族政治的制度下，传统法把人分为3种地位或等级：僧侣、贵族为两个特权等级，全国绝大多数人为第三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构成法律差别的正式结构。它在理论上基于不同的社会作用，而实际上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贵族的理论活动为此辩护；教会为确立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实际上也接受这种不平等。

等级制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进行祈祷的人，从事战争的人和以劳作供养他人者之间的差别已经出现。僧侣等级最古老，教规法则最初就为它确定了特殊地位。后来，在世俗人中逐渐形成了贵族这个社会成分。那些既不是僧侣又非贵族的人们便构成了第三等级的前身——“劳动者”阶层。然而第三等级的形成是缓慢的。最早出现的只是市民阶级，即执有特许证的城市中的自由人。农村中的平民自1484年首次参加第三等级代表选举后也进入这个等级中。等级制逐渐巩固下来，并被王朝所接受。于是等级差别便成为约定俗成的王国基本法律。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中把等级看成是法定的，并将其定义为“国中之国”。

等级并不相当于社会阶级的构成。每一等级中还可分为若干个或多或少相互对立的部分。尤其是，建立在封建制和蔑视体力活动与生产事务之上的旧社会结构与现实已不相协调。

旧制度下法国的社会结构仍然保留着10至11世纪法国刚开始形成时的原始特征。当时，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是在土地上耕作的农奴的主人。后来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打乱了这种原始秩序。国王从领主手中夺回了属于王室的权利，但保留了他们的社会、经济特权：他们在社会等级中仍占据头等地位。11世纪以后的贸易复兴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出一种新形式的财富——流动财富，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

18世纪末，资产阶级领导着商品生产，它向王国的行政部门输送中

下层官吏，为国家的正常运转提供大部分必要资金。贵族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作用在减弱，但它仍掌握着社会和国家的领导权。社会的法律结构已不再适应社会和经济的现实了。

Ⅰ.封建贵族的没落

贵族阶级是旧制度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它包括贵族等级和全体高级僧侣。

1789年时，如果说贵族仍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它却早已失去在中世纪享有的那种掌握公共权力的特性。卡佩王朝经过长期努力重新掌握了王室权：征收捐税、招募士兵、铸造货币、司法审判。继投石党之乱以后，君主制的国家加强了权力，挫败和制服了贵族等级，使之俯首帖耳。1789年以前，贵族在社会中居首位，它在僧侣之后组成国家的第二等级。

不能把贵族阶级和享有特权者完全等同起来：庶民百姓出身的神甫和修士并不属于特权者范围。贵族阶级主要是由贵族组成的。作为特权等级的僧侣被社会屏障一分为二。按照西埃耶斯的说法，它主要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种职业。实际上，高级僧侣属于贵族阶级，如主教、修道院长和大部分议事司铎；下层僧侣，如正、副本堂神甫大都是庶民百姓，其社会地位属于第三等级。

1.贵族：没落与反动

贵族的人数估计有35万左右，占全国人口的1.3%。有人提出贵族人数为12万，其资料依据不太可靠。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地区性的差异。根据一些人头税名册和1789年参加选举的贵族选举人数目测算，贵族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从不足1%至大于2%不等：在埃费勒为2%强，在阿尔比为1.5%弱，在格勒诺布尔为1%弱，在马赛为1%弱。

贵族在王朝中属第二等级，但实为社会的统治阶级。“贵族”一词在

18世纪末掩盖了其内部各集团间的争斗所造成的离析。所有贵族都享有荣誉、经济和财政方面的特权：佩剑、教堂专座、被处死时受斩刑而非绞刑，尤其是不承担人口税、养路徭役、留宿军队等义务。他们还享有狩猎权，并独揽军队、教会、司法及行政部门的高官要爵。此外，那些拥有领地的贵族（有的贵族不拥有领地，也有的平民能拥有贵族领地：贵族与封建制之间的关联已消失了）可以从农民身上征收封建捐税。贵族的地产规模因地区而异，在诺尔（22%）、庇卡底、阿尔图瓦（32%）、西部地区（莫日为60%）和勃艮第（35%）等地其比重极大，在中部、南部（蒙彼利埃教区为15%）和东南部则稍次。从整体看，贵族掌握着王国近1/5的土地。

贵族只是在享有特权方面是一致的，其内部可分为不同类型，它们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

宫廷贵族包括4 000名左右出没于王宫的贵族。他们在凡尔赛生活，簇拥在国王周围。宫廷贵族大搞排场，他们靠从国王的挥霍中得到薪俸、军饷和王室官职收益维持自己。此外，被国王任命教职的俗间教士或世俗人员可以拥有产业益用权，即从收入中无偿提取1/3。宫廷贵族还从他们的大片领地上抽取大量财富收入。尽管如此，上层贵族仍不能完全摆脱棘手的财政处境。他们的收入主要用于维持其身份和地位。他们身边众多的家仆、华丽的服饰、赌博、招待宾客、举办庆典、组织演出以及狩猎等活动都要花费更多的金钱。上层贵族开始负债累累，与平民中富有的女继承人联姻也不能使他们摆脱困境。上流社会的生活使贵族中一部分人逐步与受哲学思想影响的金融界上层人物接近，正如在德比内夫人的沙龙里那样。这部分上层贵族改变了习俗并信奉自由思想，从而开始脱离原等级。这种现象恰恰发生在社会等级差别最为严格的时期。这些自由派贵族在保持其社会特权的同时转向上层资产阶级，并与它分享某些经济利益。

乡居贵族的命运要逊色得多。小贵族地主与他们的农民一起生活，时常过着与农民几乎是同样艰难的日子。贵族不准从事体力性职业，甚至耕种自己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量也会丧失贵族身份。因此，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只能是向农民收取封建租税。这些租税的数额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确定下来，因此当以货币形式收取时其收益简直微不足道。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一直持续下降，而生活费用却不断在提高。这些收益甚微、面积狭小的领地上的主人固然处境不佳，但是，由于一些省份在遗产处置上盛行优待长子的不平均分配，这些贵族家庭中的幼子便更成为牺牲品。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乡居贵族靠经营地产和把实物或货币租税转化为流动财富抵御住了18世纪的物价上涨，有的甚至还利用提高地租，出售租地多余农产品，增加市场税和另一些随通货膨胀而增值的领主税等办法发家致富。小贵族地主无论穷富，都时常受到大领主的歧视。反之，他们也憎恨那些以各种渠道从王室财库中获取收入的宫廷贵族和靠生产活动聚积起财富的城市资产阶级。

穿袍贵族是随着王朝行政、司法机关的发展而形成的。这种担任公职的贵族是16世纪从上层资产阶级中开始产生的。17世纪时，它仍然处于资产阶级和佩剑贵族的中介位置。到18世纪，穿袍贵族趋于与佩剑贵族合为一体。处于穿袍贵族之首的是高等法院的名门望族。它们力图控制国王的政府，参加国家的行政管理。它们花钱购买的职位是终身性的，可以传给后代。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代表了一种强大势力，常与王权发生冲突。他们对其等级特权非常注重，敌视可能触及到它的任何改革。因此这些人受到了哲学家们的猛烈抨击。

封建贵族在18世纪末显示出没落的倾向。不断增多的交际生活、奢侈品及偶尔的文化活动，这些都使贵族对金钱的需求相应扩大。尽管收入有所增长，但仍常常入不敷出。因此，越是临近破产，贵族便越是强烈地要求恢复其传统的封建权利。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贵族的反动”十分猖獗。在政治上，贵族阶级要垄断国家、教会和军队的所有要

职。国王在1781年的一项敕令中规定：能证实自己为3代贵族出身者方可成为军官。在经济上，贵族阶级加强了领主制。通过执行一系列关于“财产分类”的敕令，领主把原乡村公社财产的1/3据为己有。他们还通过修编土地税簿和列有其各项权利的登记册，把古老过时的权利又恢复起来，要求不折不扣地享有之。另外，贵族也开始对资产阶级的企业发生兴趣，并把它的资金投放到新型工业，尤其是冶金企业中。一部分贵族开始在他们的土地上使用新型农业技术。在这场对金钱的追逐中，上层贵族中的一部分与资产阶级接近，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有共同的政治愿望。但是，为数众多的乡居贵族和宫廷贵族只想以不断加强和明确其特权来获得拯救。他们敌视新思想，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只是为了重新获得政治优势和使特权得到确认。

实际上，贵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真正意识到其整体利益的社会阶级。王朝不仅遭到高等法院贵族的反对和自由派大领主的批评，也受到乡居小贵族地主的抨击。后者被排斥于政治或行政职务之外，他们幻想恢复那个连自己也描绘不清楚的旧王朝制度。持完全反动立场的乡居贵族与专制主义截然对立。受启蒙思想熏陶的宫廷贵族从制度的弊端中得到好处，同时又要求改革这种制度。他们看不到废除弊端将会给自己以致命打击。旧制度的统治阶级不再团结一致地捍卫这个维护其主导地位的制度了。在它的对面是整个第三等级：被封建制度激怒的农民和被财政与荣誉特权惹恼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特权的共同仇恨使第三等级团结一致。

2.分裂的僧侣等级

僧侣等级有12万人左右，它自命为“王国的第一实体”。作为国家的第一等级，它拥有重要的政治、司法和财政特权，其经济实力建立在什一税和它的地产之上。

僧侣的地产在城市和乡村中均有。它在城市中拥有大量房产，收缴

的房租金额在一个世纪中增加了1倍。修会僧侣在城镇的财产似多于乡村。在雷恩、鲁昂这些城市，修道院拥有许多房和地产。教会在乡村的财产数量更大，从全国范围很难估计。伏尔泰估计僧侣的土地收入为9 000万锂。内克的估计是1.3亿锂。这个数目无疑与实际情况更接近。然而可以肯定，当时人们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僧侣的地产收入。教会的地产往往分割成小块，由分散的农庄组成。由于管理不善和鞭长莫及，收成往往不佳。如果通过对局部地区的研究更准确地估算教会的地产，我们会看到地产的数量因地区而异，趋势是越往西南越少（西部的莫日为5%，南部的蒙彼利埃教区为6%）。教会地产的比重最高可达20%（诺尔、阿尔图瓦、布里），最低则不足1%，平均为10%左右。鉴于这一等级人数极少，这一比重则相当可观。

779年和794年的敕令强迫地产主把一部分农产品或牲畜交给收税人，这就是所谓什一税。这是一种普遍的税收，无论是贵族的产业、教士个人的地产还是平民的土地均在征收之列。什一税的数额还因地区和收成状况而变化。“大什一税”的征收针对4种主要谷物（小麦、黑麦、大麦和燕麦）；“小什一税”针对其他作物。什一税的税率一般低于1/10，全国范围谷物的平均税率在1/13左右。僧侣从什一税中获得的总收入很难估计，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在1亿到1.2亿锂之间。另外，它还可获得大约同等数额的土地收入。

僧侣通过征收什一税和拥有地产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收成，并将其转手倒卖。这使它从物价和地租上涨中得到好处。什一税的价值在18世纪里几乎增加了1倍多。什一税常常不是按最初的规定只归于僧侣，一些世俗者也以“采邑什一税”之名征收此税。这使什一税成为农民更加难以忍受的负担。

唯有僧侣构成一个真正的等级，它拥有自己的一套行政机构（僧侣总代理人和教区公会）和自己的法庭（宗教裁判所）。每5年召开1次僧

侣大会，负责研究宗教事务和有关本等级利益的问题。大会还要通过一项自愿捐赠决议以减轻国家负担。这种“无偿馈赠”和“教士所得税”合在一起，成为僧侣缴纳的全部税款，大约每年350万锂。这个数字与这个等级的收入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僧侣还担负着户籍管理（洗礼、婚礼和葬礼的登记）、社会救济和教育事业。世俗社会对教会权力的依赖性仍然很强。

修会僧侣（包括2万至2.5万名男修士和4万名左右修女）在17世纪曾兴盛一时，但到18世纪末却出现道德严重败坏和混乱不堪的局面。1766年建立的“修会僧侣特别法庭”曾试图改革，但收效甚微。1789年时，在625个享有产业用益权的男修道院中，有115个属于恪守教规的修道院。女修道院有253个享有这种名誉。实际上，这些几乎都是由国王所命名的。修会僧侣威信扫地的原因之一是：修会僧侣掌握大量地产，其收益落入人员稀少的修道院甚至被长离职守却享有用益权的修道院院长攫取。高级教士本身也对修会僧侣予以严厉批评。图尔大主教1778年讲道：“方济会派（属圣弗朗索瓦·达西兹门派）在外省变得卑鄙堕落，主教对教士们荒淫无耻和混乱不堪的作为深感不满。”

教规的松弛有禁无止。不少修道士接受了新思想，阅读哲学家的著作。他们中间后来出现了一部分立宪派僧侣，甚至一些革命人员。妇女教会团体的堕落不太明显，尤其是那些从事教育和救济的团体。它们中有些恰恰是最贫困的，但也有享有巨额收入的古老修道院。许多修道院的职位是由国王任命的。国王常不把修道院的收入留给修道士，而将其以用益权名义赐给俗间教士，甚至非宗教人员。这些人虽然不任神职，却抽取收入的1/3。

俗间僧侣也面临一场真正的危机。宗教的感召不再如以前那样以信仰为唯一基础，它早已被哲学宣传所动摇了。

实际上，如果说僧侣作为一个等级在精神方面是个整体，它却并不

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整体。在它中间也和在旧制度社会中一样，存在着贵族与平民、上层僧侣与下层僧侣以及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主教、修道院长、议事司铎等上层僧侣的产生越来越仅限于贵族。他们力图保护其特权利益。下层僧侣往往被排斥在外。1789年时的139个主教中没有一个是非贵族出身的。整个等级收入的一大部分都归高级教士所有。教会头面人物的奢侈豪华可以和最大的世俗领主相媲美。他们大都居于宫廷，几乎不过问主管教区的事务。由王侯担任的斯特拉斯堡主教所得收入竟可达40万锂。

下层僧侣（5万正、副本堂神甫）的物质状况不尽相同。总的说来，他们与上层僧侣之间自15世纪起产生的社会差距在18世纪时日趋明显。这是因为高级教士和修道院长们攫取了什一税和教会土地的大部分，他们在18世纪的经济情势中格外受益。而从17世纪末起，正、副本堂神甫只能从平民百姓中产生了。征税人把教区的什一税全部收走，而一些神甫只能得到少量薪俸（自1786年后，正神甫为750锂，副神甫为300锂）。然而，所有正神甫都把做礼拜的收入（教徒的酬金）和教堂宅地的租金纳入私囊。他们往往还有一笔私产，用以购置入修会所必需的神职证书或充抵进神学院学习的花费。大多数正神甫的生活比较富裕，而副神甫却没有固定收入，常常处于困境之中。由于这两种人都在人民中间行使神职，他们常与之有同样的物质方面的烦恼，并与之心息相通。多菲内下层僧侣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这个省比其他地方都更早发生了“神甫暴动”，它使得僧侣等级在三级会议召开不久便陷于分裂。这种请愿精神形成的原因之一是数量众多的“纳薪俸者”被排斥在上层僧侣之外，再就是他们得到了高等法官们的支持。正、副本堂神甫在物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这促使他们提出了世俗方面的要求，不久这种要求便转向神学领域了。从1776年起，亨利·雷蒙这位后来成为立宪派的格勒诺布尔主教便开始出版他的一本书。该书受到里歇[1]主义的启发，并根据教会最初的历史、宗教评议会的传统和圣父的理论来确立神甫们的

权利。1789年，多菲内神甫们的陈情书尽管保持了对主教们的谦卑语气，但还是把上述思想发展到了极端，把下层僧侣的命运与第三等级联系在一起。

尽管下层僧侣持这种态度，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忘记，在旧制度的社会中教会是把自己的命运与贵族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自身处境的恶化，贵族阶级在18世纪中更加自我封闭起来。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它使自己形成若干个等级集团：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上层教会。这些集团垄断了一切军事、司法和教会官职，平民百姓被排除在外。此时的贵族阶级已完全成为寄生虫，它早已不再如最初那样以其对国家和教会的服务获得荣誉和特权，享有合法补偿。贵族阶级以它的无用、奢求和拒不考虑整体利益自绝于民族了。

Ⅱ.第三等级的崛起及其困难

从15世纪末起，前两个等级之外的社会阶层便被称为“第三等级”了。第三等级代表了民族的大多数：旧制度末期为2 600万人。僧侣和贵族等级的形成比它早得多。但是由于第三等级的成员在民族与国家中所发挥的作用，它的社会重要性增长迅速。在17世纪初卢瓦佐就看到：第三等级“目前已拥有比以往大得多的权力和威望。因为自从贵族变得不学无术和游手好闲后，司法和财政官吏几乎都由它担任了。”

西埃耶斯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1789年）中，明确指出了第三等级在旧制度末期的重要性。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切。”在第一章里，他提出第三等级是“一个完整的民族”：

“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需的一切？它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人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

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

西埃耶斯最后写道：

“第三等级包含了一切属于民族的东西；任何第三等级之外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为民族的一部分。”

第三等级中包括了乡村和城市各人民阶层。此外，还有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的中、小资产阶级。在这些不同社会级别之间不可能划出明显的界线。自由职业者，如非贵族的法官、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也属于这个中等阶层。上层资产阶级包括金融界和大规模贸易方面的代表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船主、金融家、包税人和银行家。他们在财富方面超过了贵族，但他们梦寐以求的是谋取官职和贵族称号，以便跻身于贵族行列。尽管存在社会差别，第三等级的一致之处在于反对特权等级和要求公民平等。这个要求一旦达到，第三等级中不同社会级别之间的团结一致便会消失，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便由此发展起来。第三等级由一切平民组成，它是一个等级但不是一个阶级。第三等级是个实体，只有把它的各个社会成分分解开来我们才能对它有准确的认识。

1.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多样化

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中占优势的阶级：它领导了大革命并从中得到好处。它凭借财富和文化占据了社会头等位置，然而这种地位与特权等级的正式地位相抵触。根据社会地位和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可以把资产阶级划分为不同类型：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以本金利润或地产收入为生的食利者；以法律界人士、官吏等组成的自由职业型资产阶级是一个多样化与复杂的资产阶级类型；手工业者和店主是与传统的生产和交换体系紧密联系的中、小资产阶级；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直接以利润为生，该类型十分活跃，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推动力量。在整个第三等级中，资产阶级自然只占少数，即便把全部手工业者计入资产阶级也是如

此。18世纪末的法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在工业生产方面也只是个手工业国家。信贷事业极不普遍，流通货币十分有限。这些特点对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构成产生了影响。

食利的资产阶级从工商业资产阶级中派生出来，靠本金利润为生，在经济上是股消极的力量。在整个18世纪中，资产阶级大发其财，食利者的数量与日俱增。例如，格勒诺布尔的食利者（及其遗孀）在1773年占资产阶级总数的21.9%，法律界人士占13.8%，商人占17.6%。到1789年，商人的比例降为11%，食利者的比例上升为28%。在图卢兹的食利者占资产阶级总数的10%左右。在阿尔比，其比例降为2%—3%。估计食利型资产阶级在整个阶级中共占10%左右。但是，食利者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勒阿弗尔，“食利者本小利微，是受人鄙视的资产阶级”。在雷恩，社会最上层和最低层都有食利者。食利意味着某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多种水平，这与财富的极端多样性是一致的。同时，利息的来源各不相同，它可以来自商业企业的股份或市政府（债务机构）的公债，也可以来自城镇房租或者农村地租。资产阶级（这里指整个资产阶级而不只是食利的资产阶级）的地产在各地区所占的比重为12%至45%不等：诺尔为16%，阿尔图瓦为9%，勃艮第为20%，莫日为15%以上，蒙彼利埃教区为20%。资产阶级的地产在城市周围比较集中，因为许多在商业中发财的资产阶级总把购置住所附近的地产看成最佳投资。

资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是个极为多样化的组合，第三等级的主要代言人都从他们中产生。同样，他们的升迁也往往是一种商业活动，其最初的资本也从利润中获得。那些不授予贵族的官职便在他们中间分配：司法或财政官职既有威望又属国家公职，这些官职被官员买下以后就成了私产。严格意义上的自由职业应首推人员众多的司法职业，其中包括旧制度时各种各样裁判管辖区内的检察官、执达员、公证人、律师等。其他自由职业并不都这样体面、荣耀。医生人数较少，除了少数名

医（如特龙香、吉约坦）外，其他人并不太受人敬重。在小城镇里，人们比较熟悉药剂师或外科医生，而后者在不久前还是由剃须匠兼任的。教师的地位更不被人重视。当然，若干在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或法学院、医学院任教的著名教授不在其列。他们人数不多，因为教育被教会垄断在手里。多数世俗的教育者是小学教师或家庭教师。最后还有文人和“传播新闻者”（记者）。这些人在巴黎比较多（如布里索）。格勒诺布尔是一所高等法院的所在地，因而是个法学家、律师、检察官云集的地方。他们在资产阶级中占13.8%。图卢兹也是高等法院和省行政机关所在地。在那里，由非贵族担任的司法、财政官吏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占资产阶级的10%—20%。在波城的9 000居民中有200人从事司法和自由职业。从全国范围看，自由职业者大约占整个资产阶级总数的10%—20%。同样，这部分人的生活条件不尽相同，其酬金或薪水差别很大。一些人与贵族阶级相差无几，另一些人则处于中等水平。这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大体十分简单，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并忠实信仰哲学思想。他们，尤其是法律界人士在1789年发挥了首要作用，涌现出一大批革命人物。

由手工业者和店主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和地位比它高的工商业资产阶级都靠利润为生。这个层次的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其人数大约占资产阶级的2/3。在这个层次中，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劳动和资本的作用为标准：劳动的作用越少，资本的作用越大则社会地位越高。对手工业者和店主来说，社会地位越低，资本的比重就越小，收入来源中个人劳动的作用则越大。这样，他们的下层已和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阶层很难区分了。这个社会阶层与传统的经济形式、小商业和手工业紧密相连。资本不集中，劳动力分散在小作坊是这种经济的特征。手工业生产的技术落后，工具陈旧，但仍在工业生产中占很重要的位置。生产和交换领域的技术改造引起了传统经济形式的危机。与行会制度相对立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的观念。18世纪末，大多数手工业者都怨声载道。由于越来越受到从事制成品远销和原料供应批发交易的控制，一部分手工业

者的条件日益恶化，逐渐沦为雇佣劳动者。另一些人则害怕出现竞争者导致自己破产。手工业者一般都敌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他们不像工商业资产阶级那样赞成经济自由，而是统制经济的拥护者。为了判断他们的精神状态，我们还应对其收入变化的情况加以考虑：收入因劳动和资本所占的比重而异。对以经商为主、手工业为辅的人来说，收入的增加与物价上涨是一致的。18世纪，不少小酒店主的子弟成了法院书记人员（检察官的办事员、记录秘书等），从而上升为自由职业者。以手工业为主、经商为辅的人只为主顾而生产。他们也从物价上涨中得到好处，他们的产品增加了。至于那些主要依靠工资（标准工价）为生的附属手工业中的劳动者，物价与工资之间日渐扩大的差距使他们深受其害。尽管名义工资上升了，购买力却下降了。这些附属手工业者的收入普遍有所下降。这种现象在旧制度末期的城市人民阶层中是共同的。手工业各团体在危机的作用下被发动起来，它们为城市无套裤汉组织提供了骨干。但是，不同的利益使之不能提出一项协调的社会纲领。大革命历史中的，尤其是共和二年间的某些曲折便是由此产生的。

工商业大资产阶级直接以利润为生，在资产阶级中是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从广义上讲，这是个“企业家”阶级，用亚当·斯密的话说便是“企业主”阶级。根据他们的不同活动，可以把他们分为不同种类，而这些种类之间的差异还受到地理因素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金融资产阶级的地位最为重要，其中包括每6年承包1次间接税征收权的包税人、银行家、军火商和财政官吏。他们组成了一帮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贵族，并时常通过参与公事或联姻关系和世袭贵族建立密切往来。不少人在任职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贵族封号。这些人的社会作用广泛，经常资助文学艺术事业，保护哲学家。他们通过征收间接税，向国家贷款以及组织合股公司等方式积累了巨额财富。苛刻的税收使他们不得人心，因而其中不少人在1793年被送上了断头台。

商业资产阶级在海港地区颇为得势。波尔多、南特、拉罗舍尔等地就是在对海外岛屿，尤其是安的列斯群岛和圣多明各的贸易中繁荣起来的。从海外输入的有糖、咖啡、染料和棉花。“乌木材”的贩运向这些地方提供了黑奴，并成为巨额收入的来源。1768年波尔多的贸易能力据说相当于法国向美洲诸岛贩入黑奴年总量的1/4。这个港口在1771年进口了价值1.12亿锂的咖啡、2 100万锂的染料、1 900万锂的白糖和900万锂的粗糖。马赛专门从事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贸易。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最突出。1716—1789年，贸易规模扩大了4倍。于是，在港口和商业城市里聚积了大量财富，各种经济活动应运而生，如大宗商品交易、海运事业，银行业等。在这些地方产生了主张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政党领袖，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后来便是吉伦特派。资产阶级用积累的财富或购置土地（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或向新兴工业投资。贸易高潮成为工业发展的先导。

制造业的资产阶级刚刚从商业中分离出来。在很长时间里，工业（当时人称制造业或加工业）只不过是城市商业的附属。18世纪十分发达的农村工业便具有这种形式：几千个农民为城里的批发商工作。资本主义大生产仅在那些设备昂贵的新型工业中开始出现。工业的集中化始见雏形。在冶金工业部门中，一些大企业已在洛林、克勒佐（1787年）等地形成。“克勒佐”联合股份公司拥有完善的机器设备：“火焰机”、铁路马车、4座高炉、2个锻造车间。它的炮筒车间在全欧洲同类企业中是最大的。钢铁大王迪特里希是法国当时最大工业集团的首脑。他在涅代布隆的工厂共有800多工人。在罗托、雅热塔尔和雷斯肖方都有他的企业。特权等级还掌握着冶金工业的很大一部分。绅士并不因成了冶金厂主而丧失贵族身份，例如在夏尔维尔、翁布尔和阿扬日的旺代尔家族。煤炭工业也在更新。联合股份公司的组成使开采更为合理，也使大量工人集中到一起。1757年建立的安赞煤矿公司雇佣了4 000名工人。在旧制度末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些特征已经有所显露。

根据皮埃尔·莱昂在《十八世纪的工业》中的研究，1730—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因地区和生产部门而异。

增长速度缓慢的是基础工业和传统纺织业：毛织品、亚麻或大麻布。在18世纪中，这些部门的生产在全国范围的增长较少：61%。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差别，从1703年到1789年，朗格多克的生产增加了143%，蒙托邦和波尔多两个财政区在同期内增加了109%。从1692年到1789年，香槟地区的生产增长为127%，贝里地区为81%，奥尔良地区为45%，而诺曼底在同期内的增长只有12%。奥弗涅、普瓦图则是生产停滞的地区。某些省份甚至出现增长负值，如利穆赞（-18%）、普罗旺斯（-36%）。

增长速度迅速的是“新型”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冶金工业、新型纺织业。技术不断进步和大量投资使这些部门充满活力。在煤炭工业方面，皮埃尔·莱昂在考虑到统计数字的近似性后，估计生产增长为700%至800%。根据掌握的连续级数计算，安赞的生产1744—1789年增长了681%。冶金工业在大革命前的增长并不显著，后来开始加快，1815年后又趋缓慢。例如生铁产量1738—1789年增长72%；而1738—1811年则增长了1100%。对新型工业中的棉纺和印染产品尚缺乏总统计数字。但是鲁昂地区的棉织品在1732—1766年间增加了107%，牟罗兹的印花棉布销售额在1758—1786年间增长了738%。古老的丝织业在普遍繁荣中得益匪浅，表现出新型工业的发展势头。在里昂，1720—1788年的织机数量增加了185%，在多菲内，1730—1767年的捻丝产量增加了400%（重量）。

尽管法国工业的扩张力量非常显著，但工业增长对国家经济总增长的影响力却显得相对弱小。农业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地租上涨和农业收入增加后大量资金转向工业企业。工业的增长对贸易结构必然产生影响。1716—1787年，制成品的出口增长了221%（法国出口总

额增长了298%）。不把殖民地贸易计算在内，在此期间工业原料在进口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从12%增至42%。

这种经济活动现象使资产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存在，并使他们懂得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不可避免地处于敌对地位。西埃耶斯在他的小册子里以第三等级从事的专门劳动和担任的公职对它作出了定义：第三等级是整个民族，贵族不能成为民族的一部分，它处于社会组织之外。因为，它脱离总的运动，处于僵化静止状态。“它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吞噬着劳动果实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以其毫无作为而自绝于整个民族。”

巴纳夫表现得更为敏锐。的确，他是在多菲内的工业活动环境中长大的。如果手工工场视察员罗兰在1785年所做的描写是可信的，这种工业活动使当时的多菲内以企业多种多样、工场密集林立、产品数量丰富位居王国各省之首。巴纳夫在制宪议会解散之后写了《法国大革命引论》。在提出了所有制作用于社会制度的原则后，他接着指出，土地贵族阶级创立的制度抗拒和延误着工业纪元的来临：

“当工艺和贸易得以深入到人民之中，并且为劳动阶级创造出新的致富手段时，一场政治法律范围的革命便开始酝酿了，新的财富分配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如同占有土地使贵族阶级提高了地位一样，工业财产正在使人民的权力增加。”

对巴纳夫笔下的“人民”，我们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它把自己与民族同化了。工业财产，或者整个流动财产的拥有者阶级获得了政治领导地位。巴纳夫明确指出了土地财产权与流动财产权之间的对立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对抗。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于社会演变和它所代表的经济实力有敏锐意识。它怀着对自身利益的坚定信念把大革命引向结束。

2.城市人民阶层：每天的面包

城市各人民阶层承受着旧制度的重压，它们由于仇恨贵族阶级和旧制度而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合紧密。然而它们内部分为不同类型，在大革命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所有人民阶层都始终如一地反对贵族阶级，那么它们对革命运动中先后掌权的各资产阶级派别的态度却存在差别。

以双手劳动，从事生产的群众被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些有产者称作“人民”。这个字眼多少有些轻蔑的意思。实际上，从中等资产阶级到当时的无产阶级之间有很大差异，甚至存在对抗。人们常以国民公会议员勒巴妻子的说法为例，她是“细木工匠”（应理解为“细木器工场主”）迪普莱的女儿，同时也是罗伯斯庇尔的房东。据她说，她的父亲很注重其资产阶级的尊严，从来不许他的“仆人”，即他的工人和他同桌就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之间的距离，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严格意义上的人民阶层之间的距离。

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界限如何划分？这是个很难回答，甚至根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在贵族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第三等级”这个笼统用语所包括的各个社会范畴之间还没有明确分野。资本主义的演变将使它们之间的对立更加具体化。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手工业生产和店铺式交换制度是与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无明显分界的现象互相适应的。

“附属手工业者”处于人民阶层与小资产阶级之间，例如“里昂丝织工”那样的手工业者，他们由商人资本家发给加工报酬，提供原料并出售制成品。这种手工业者在家里劳动，不受商人监督，工具通常属于自己。有时他们还雇佣若干帮工，俨然是个小老板。然而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只不过是受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的雇佣劳动力。这种社会结构以及手工业者对商人所定“工价”的附属性曾导致18世纪的里昂多次发生骚乱，尤其是1744年丝织工人的暴动，它使总督不得不遣兵入城。

另外，我们还应该把行会工人（手工业生产）与人数少得多的手工工场工人和新兴大工业工人区别开来。

行会中的帮工和学徒在经济上和思想上紧密附属于师傅。在手工业中，家庭作坊构成独立的生产单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某种社会关系。不仅学徒，就连帮工（通常为一两名）也生活在师傅家里，“与他同吃、同住”。这几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大革命前夕，这种习惯在不少行业中仍然盛行。随着这种习惯趋于消失，师傅与帮工的分离开始出现，传统劳动关系也逐渐解体。这种现象由于帮工数量不断增长而加剧。

手工工场工人比较容易爬上工人的各种级别，对他们没有任何正规的学徒要求。但是，他们被置于比作坊规章更为严格的纪律之下，很难脱离雇主。为此，他们必须得到“解雇书”。1781年，对所有雇佣劳动者都实行了必须持有“劳动手册”的规定。这部分城市雇佣劳动者是19世纪无产阶级的前身。然而我们对它的数量不宜过分夸大。

为主顾出力的雇佣劳动者可能是城市各人民阶层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他们有短工、园林工、搬运夫、运水或运柴工和代人跑腿做零活的“散工”。此外，还有在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中的仆役（仆人、厨师、马车夫）。在巴黎的某些区，如圣日耳曼郊区，他们的人数相当众多。每逢收成不佳，还有些农民进城招揽活计。在巴黎，从秋季到春季，许多从利穆赞来的人在建筑行业做工。此外还有灾荒年月聚集到城市中的流浪者。他们是由于物价上涨而失业的农村手工业者和短工，来到城里寻求工作或救济。这些人是参加暴动的潜在力量。

18世纪，城市各人民阶层的生活条件开始恶化。在物价上涨的同时，城市人口增加，这使工资与生活费用的关系失去平衡。在18世纪后半期出现了雇佣劳动者贫困化的趋向。在手工业方面，帮工的生活条件和师傅没有根本区别，只是偏低些而已。工作日一般是从清晨到夜晚。

在凡尔赛的许多作坊，劳动时间在气候宜人的季节是从早上4点到晚上8点。巴黎的大多数行业每天工作16个小时，装订工和印刷工的工作日不超过14小时，因而被人看成幸运者。当然，那时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紧张，其节奏比较慢，宗教节假日也较为繁多。

人民生活条件的根本问题是工资和购买力问题。物价不均衡上涨对人民各阶层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它们开支的构成。粮食价格比其他物品上涨都多。由于人口增长在下层社会尤其显著和人民群众的食品构成中面包比重极大，所以人民所受的打击也最大。为确定人民生活费用的指数，有必要把不同开支的比重先大致确定下来。拉布鲁斯认为：在18世纪，面包开支占人民收入的一半（这是最低限度），蔬菜、油脂和葡萄酒占16%，服装占15%，取暖占5%，照明占1%。拉布鲁斯以上述各类商品长期价格指数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是：与1726—1741年这个基数时期相比，1771—1789年生活费用增长了45%；1785—1789年则增长了62%。另外，季节的变化加剧了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前夕，在物价普遍上涨之后，人民的开支中面包已占58%，在1789年，面包的开支比重又上升到88%，用于其他的开支只剩下12%。物价上涨对富裕的社会阶层显得宽容；对穷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

由于行业和城市的不同，工资也自然不同。城市的技术工可以挣得40个苏[2]。但是一般工人，尤其是在纺织业，工资不超过20—25个苏。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沃邦所估计的平均工资为15个苏。在18世纪中期以前，工资一直保持稳定。1777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当时的平均工资额为17个苏。可以认为，1789年时的平均工资额为20个苏左右。一磅面包的价格在好年景时是2个苏。因此，旧制度末期一般工人的购买力应相当于10磅面包。问题在于：人民生活用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后果究竟是随着工资额的运动有所缓和呢，还是更加严重了。拉布鲁斯对此做出了统计系列，他以1726—1741年为基数，表明1771—1789年的工资额增长了17%，但是，在近一半的地区（根据局部的统计系列），工资额增长

不到11%。若以1785—1789年与基数相比，增长率为22%，在3个财政区则超过了26%。工资的增长因职业不同而异：建筑业为18%（1771—1789年）和24%（1785—1789年），农业短工分别为12%和16%，纺织业处于中间水平。从长时段看，工资增长与物价上涨（48%和65%）相比要少得多。工资随物价上升，但不能与之持平。工资额周期性和季节性的变化更加大了工资与物价的差距，甚至引起反向发展。的确，在18世纪，商品昂贵引起了失业，收成减少压缩了农民的需求，农业危机引起了工业危机。面包价格上涨使人民群众开支中面包的比重更为加大，其他开支的比重相应缩小。

把“名义工资”的上升与生活费用的上涨进行比较，人们就可以看到“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拉布鲁斯估计，1785—1789年与1726—1741年相比，下降至少有1/4，如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因素，下降可达一半以上。这个时期的生活条件决定了收入减少主要是在食品上产生影响。18世纪的物价上涨时期增加了人民阶层的困苦。经济波动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后果：饥饿把无套裤汉动员了起来。

当时的观察家和理论家对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有所察觉。杜尔哥第一个提出工资“铁的规律”（他著的《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思考》出版于1766年）：按照事物的常理，工人的工资不能超过维持其生存和再生产的最低限度。

上面列举的数字是全国的平均水平。一些地方研究的新成果可以启发我们在一些方面看到更细微的差别。在当时已开始成为工业大城市的里昂（1785年时居民达15万人），黑麦价格的上涨在18世纪里超过了建筑工人同期工资的上升。妇女劳动的增加略微改善了工人的收入状况，但是，他们的生活始终很艰难。随着1760年以后出现的经济不稳定，丝织者的工作越来越无保障。在中等城市冈城（1789年的人口为3.2

万），人数最多的非技术行业的工资额在18世纪中期曾超过小麦价格的增长，在1767—1780年间却明显地落后了，在1780—1789年间，工资的增长与食品价格的上涨又趋持平。实际上，就业问题和长期低水平的工资相比显得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由此可以看到1789年、1792—1793年和1795年的高昂物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饥饿把无套裤汉动员了起来。

尽管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社会冲突，然而他们都为反对贵族阶级而动员起来。手工业者、店主、帮工，他们对旧制度心怀不满，对贵族充满仇恨。许多城市劳动者出身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这种根本的对立更加尖锐。他们痛恨贵族享有特权，占有地产和征收捐税。对于国家，人民各阶层主要要求减轻税收负担，尤其是废除各种间接税和入市税。市政府利用这些税收抽走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而这些都有利于富人。对于行会，手工业主与帮工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在政治上，他们都隐约地倾向于民主。

但是，人民的主要要求仍然是面包。在1788—1789年间，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最敏感的莫过于导致其处境日益艰难的严重经济危机。在多数城市中，1789年发生的骚动都是由贫困所引起的，这些骚动的第一个效果是使面包价格下降了。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危机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它往往由于连年收成不佳或明显歉收所造成。粮食价格因此猛涨，许多农民小生产者或非生产性农民不得不购进谷物，其购买力因此而下降。这样，农业危机也波及到工业生产中。1788年的农业危机是整个世纪中最严重的一次。冬天，粮荒出现，失业造成乞丐大增，这些饥饿的失业者构成革命群众的一部分。

然而，某些社会阶层却从谷物价格上涨中获得了好处，如收实物地租的地主、什一税征收者、领主、商人。这些人恰恰都属于贵族阶级、僧侣或资产阶级，即属于主导阶级。社会对立和人民同政府当局的矛盾

更为加剧，关于“饥饿协约”的传闻便应运而生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负责城市粮食供应的市政当局和政府。内克本人也被谴责偏袒面粉厂主。

“激情”与反抗在这种苦难和群体心态中酝酿生成。1789年4月28日，在巴黎第一次爆发了反对壁纸工场主雷维庸和硝石场主昂里奥的骚乱。他们被指控在一次选举大会上对人民的苦难发表了轻率的言论。雷维庸可能讲过：每天15个苏可以使一个工人生活得蛮好。4月27日出现了游行示威。28日，两个人的住所被洗劫一空。警察总监调来了军队，闹事者则进行反抗，结果有若干人死亡。经济和社会原因在这第一个革命日中已经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一场政治骚乱，人民群众对于政治事件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动机使他们投入运动。但是，这些人民骚动反过来产生了政治后果，即便只是触动了一下政权。

人民认为，解决粮荒和生活用品昂贵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求助于物价管制。为了严格实行这一点，即使采取征用和限价等手段也应在所不辞。人民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对立的：资产阶级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要求自由。归根结蒂，这些要求说明了人民在1789年7月突然闯入政治舞台的原因和第三等级内部的矛盾将引起一些波折，尤其是共和二年的民主尝试。

3.农民：统一的实体，潜在的对立

旧制度末期的法国主要是个农业国，农业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革命过程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便在于此。

首先是农民在法国人口中的重要性。在2 700多万人口中，城市人口占16%至20%，农村人口大约有2 300万，占绝大部分。1846年进行的城乡人口比例状况普查表明，此时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75%。

其次是农民在大革命史中的重要性。如果农民群众保持被动消极状态，革命便不可能成功，资产阶级也不会取胜。促使农民介入大革命进

程的主要原因是领主权和封建残余问题。农民的介入导致封建制度的彻底废除，尽管这种废除是逐步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恐惧导致了8月4日之夜。购得了国有产业的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义无反顾地成为新秩序的拥护者。

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因而他们不同于欧洲中部和东部服徭役的农奴，也区别于英国的雇农。后者虽有人身自由，但只能靠工资为生。自16世纪起，“圈地”运动开始使英国农民的财产被剥夺一空，使雇农的人数越来越多。还应该了解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占多大比重。就整个法国来说，我们只能提出近似值。经营的问题也应该考虑到：地产与土地经营是两个各不相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对农民来说，经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地产分配造成的不利因素。

在不同地区，农民地产在全部土地中的比重为22%至70%不等。在北部、西北部和西部的小麦高产区和畜牧区，它的比重较低：在诺尔为30%，在莫日为18%，在蒙彼利埃教区的平原地区为22%。相反，在原来多灌木或树林的地区和山区，农民地产的比重比较高。这些地区的开垦大多是个人自发所为。在那些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进行土地整治（如排干沼泽）的地区，或者在城市近郊那些特权者和资产阶级地产集中的地区，农民地产则极少。尽管农民产业总的比重显得比较大（35%左右），但是鉴于农村人口众多，摊到每个农民身上的份额便微乎其微了。许多农民甚至没有一点土地。旧制度下的法国农民中不少人拥有一小块地，但无地农民的数量更多，他们构成农村的无产阶级。

农民生活条件差别很大，造成这种差别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人的法律地位；另一个是地产的分配和土地的经营。

从第一个方面看，农民分为农奴和自由农。尽管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已成为自由人，但农奴的数量仍然很多，在弗朗什-孔泰和尼韦尔内地区有100万左右。在农奴的身上压着领主的“永久管业权”，除非向领

主缴纳大笔税金，否则农奴的子女连父辈的流动财产也无权继承。1779年内克在王家领地废除了永久管业权，在全国废除了“追及权”，即领主对于逃亡农奴所拥有的权利。

在自由农中，“散工”、“零工”和农业短工构成了日益增多的农村无产阶级。18世纪末，由于领主的反动，封建和王室捐税的加重以及人口的增长，下层农民的无产者化加速了。在第戎农村和布列塔尼，散工数量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1倍，而小自耕农却相应减少了。尽管名义工资有所增长，而物价更大幅度的上涨却使农村无产者的处境愈加恶化。

许多小农的状况与农村无产者相似。他们只有一小块不足以为生的土地。这块土地或属于自己或是租佃来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在雇佣劳动或农村工业中谋取收入以补其不足部分。拥有地产的教士、贵族或资产阶级很少自己经营，他们把土地以永佃制，更多是以产品分成制的方式出租。由于地块往往是分散的，出租按地块单独进行。这使得短工有可能得到一小块土地，使小自耕农有可能扩大经营范围。在这些拥有小块地的农民中，分成制佃农无疑是数量最多的：法国2/3或3/4的地区实行分成制地租。当然，应该把这一比重看成是最高限度。这种制度在卢瓦尔河以南，尤其是在中部（索洛涅、贝里、利穆赞、奥弗涅）、西部（布列塔尼的一半租地使用这种制度）和西南部地区占主导地位，在卢瓦尔河以北则较罕见，主要集中在洛林地区。分成制是最贫困地区的一种租佃方式，这些地区的农民既无牲畜又无资金。

在大面积耕作区，如巴黎盆地盛产粮食的平原，大佃农常常吞并所有出租土地，使短工和小农一无所有。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加速了农民的无产者化，因而招致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和愤怒。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成分单纯的社会集团。它集中在大面积耕作区，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粮食产区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倡导者。大佃农租用大片地产，租期一般为9年，这需要有一笔经营资本。这种

永佃制远不如分成制普遍，主要流行于农民地产较少的粮食高产区和盛产小麦的冲积平原，如庇卡底、东诺曼底、布里、博斯等地区。

“大自耕农”指那些生活宽裕、甚至富有的有地农民和租用大片地产、主要以货币支付地租的佃农。他们在广大农民中只是一小部分，但其社会影响却是很大的。他们是农民整体中的显贵、“村里的公鸡”或一种“农村资产阶级”。这些人的经济作用很有限。他们也把一部分产品投入市场，但这些产品在整个农产品中只占很小部分。好年景时自耕农就把多余粮食推销出售。在许多地区，自耕农主要出售葡萄酒。葡萄酒的价格在1777—1778年以前始终保持大幅度上升的趋势（70%左右）。于是，拥有土地的富裕农民在路易十六统治以前一直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好处。

在农村中，农民可分为大佃农、大自耕农、永佃农、分成制佃农、小自耕农以及大量短工，他们包括了从拥有房屋、庭院和租入小块土地者到一无所有的人。由此可见，农村的社会差别和对立与城市不相上下。

传统的耕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贫农的无地之苦。尽管各地区的程度不同，农村公社制仍然十分盛行。农村公社具有自己的政治和行政组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它还经常行使其经济职能，在贫农占优势的地方，它趋向于保持集体权利。在北部和东部，乡村的田地被划分成狭长和相互开放的地块，并实行三圃轮作制（冬麦和春季谷物），其中总有一块田休耕以便恢复地力。在南方则实行两圃制。休闲的1/2或1/3可耕地以及收割后的田地被看成是“公共的”，经过一次收割的草场也是如此（二茬草权）。在这些公共地块上可以行使“共同放牧权”；每个农民都可在此放牧牲畜。这样，田地和牧场就成为开放性的。“公社产业”（牧场、森林）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使用权”为农民提供了其他生活来源。除此以外，村民还享有“拾穗权”、“拾草权”。富农对这些限制

其耕作自由和财产权利的集体权利持敌视态度。而贫农却相反，他们非常重视这些权利，多亏这些权利他们才得以生存。贫农致力于限制个人财产权以保卫集体权利，因而他们反对以“圈地法令”为主要特征的“农业个人主义”的发展，以及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从整体看，18世纪末农民的经营仍然是前资本主义性质的。小农的所有制观念与贵族、资产阶级地主和大耕作区的佃农有天壤之别。资产阶级的所有权概念，即所有者对其财产享有绝对权利与小农的集体所有权观念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

农村经济越是落后，农民的负担便越沉重。他们在反对君主制度和贵族阶级把这些负担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斗争中实现了农民的团结。

首先是王室负担：军役税的缴纳几乎全落在农民身上，同时他们还须缴纳人头税和念一税。筑路徭役、运送辎重、组织民团等义务也全由农民承担。最后还有非常沉重的间接税，其中以盐税为最。与17世纪和1715年以前相比，王室负担在18世纪大部分时期里有所减轻。但随着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这些负担又重新开始加重，如在瓦隆人的弗朗德勒地区，仅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直接税就增加了28%。

其次是教会负担：什一税是向僧侣缴纳的，其税率并不统一，但大都低于1/10。其中“大什一税”的征收对象是4种主要作物：小麦、黑麦、燕麦、大麦，“小什一税”以其他作物为征收对象。牲畜也是征税的对象。缴纳给主教、教堂、修道院甚至领主的什一税很少被用于维持宗教活动和救济教区穷人。这使农民对什一税不能容忍。

最后是领主负担，这是最为沉重、最不得民心的。封建制度的触角伸向所有平民的土地，封建权利便由此产生。领主在领地上享有高级和低级司法权，这是他们社会优势地位的象征。“低级司法权”是强迫缴纳捐税的经济武器，是领主剥削不可缺少的工具。领主权本身包括狩猎、捕鱼、养鸽的独占权和桥路税、市场税的征收权，以及使用个人徭役和

作为经济垄断的专利权（磨房、压榨器和烤炉的使用税）。“物权”是指对土地而不是对人的权利。领主手中掌握着土地的“支配产权”（直属权），土地（采地）由农民耕种（他们只有“使用产权”）。农民要缴纳年赋（以货币为主的地租和年贡以及作为实物地租的一部分收成）。农民由于出售土地或继承地产引起使用权变更时还要缴纳“额外酬金”（地产转移与出售税）。这种制度的严格程度是不一致的。在布列塔尼最厉，在洛林也很严格，在其他地方则较松弛。估价这种制度的后果，不仅应注意到这些负担本身，还应该看到它所引起的欺凌压迫和种种弊端。

“领主的反动”在18世纪非常突出。它使得封建制度越加令人难以忍受。领主的司法机关对有争议的农民实行压服。领主们攻击集体权利和公社产业使用权，要求对公社产业实行财产支配权。而“选用权法令”往往使他们得到1/3的公社产业。领主的反动在某些地区特别猖獗。例如在曼恩，18世纪中，一些领主庄园合并起来，使封建地产更加集中。长子继承权成为根深蒂固的习俗，使采地得以保持。公社财产被领主吞并殆尽。在弗朗什-孔泰仍然严格保留着对农奴的追及权和永久管业权。而这些权利在其他地方都已废弃了。1779年国王发布的废除令在这里则直到1788年，经过一场38小时的辩论后才被“强行”在高等法院登记注册。

领主的反动还由于整个18世纪的物价上涨而加剧。物价上涨使领主和收税人的实物地租与实物什一税的价值增加。农民身上承受着捐税加重、物价上涨和人口增长等多方面的压力，他们手中的货币日渐减少。这也是造成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每逢危机来临，什一税和领主捐税的压力便空前加重，例如在1788—1789年发生的那种情况。中等农民在正常情况下能勉强在自己的土地上谋得生存。在危机时期，缴完什一税和领主捐税他们便落得两手空空，不得不以高价买粮，1788—1789年就是这样。这就是农民对领主权势怀有深仇大恨的原因所在。

农业形势与这种社会状况互相联系。传统的耕作制度显然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农业经营获利甚微，耕作方式原始落后，产量很低。实行两圃或三圃制致使土地每两三年就要休耕停产1年。这使农民缺乏土地的问题更为严重。大革命前夕到法国来旅行的英国农业专家阿瑟·扬证明了农村这种落后性和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18世纪中，在重农学派的宣传下，一种主张对农业实行资本主义改造的思潮应运而生。“农业狂热”一时间风行开来，几个大领主在这方面还作出了榜样。实际上，特权者所追求的只是增加收入，他们对农业问题的解决并不关心。他们从经济学家的理论中找到了论据，以便在谋求公共利益的招牌下掩盖领主反动的行径。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经济的社会结构直接造成的。任何技术进步、对传统农业的任何根本改造都会导致封建残余被摧毁。如果依照英国的先例，集体权利也将会消灭，因而贫农的命运会更为恶化。重农学者和农业专家们对英国的榜样印象很深。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小农都是在这种矛盾环境中挣扎。

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农民的要求自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它反映在两个方面：封建捐税问题和土地问题。

对于封建捐税，农民是一致的。他们的陈情书表现了他们在领主和特权者面前的团结。除了间接税外，封建捐税和什一税引起了众人的抱怨。这些捐税是沉重和令人恼火的，农民对它们的来源不得而知，认为它们的征收是不公正的。诺尔省一个教区的陈情书中写道：封建捐税“是在一种应该受到指责的、神秘的阴影中产生的”，如果其中一部分属于合法的所有权就应该加以证明。即便如此，这些权利也应允许赎买。关于验证封建权利合法来源的要求在实质上是革命性的。各教区陈情书在提出这项要求时（还有许多陈情书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它们不是由农民起草的），大都是态度明确的。农民们要求以货币而不再以实物缴纳什一税和地租。他们认为，随着货币购买力的下降，这些捐税

最终也会名存实亡。他们还要求把什一税用于其最初的目的，特权者也要纳税。资产阶级人士在这些要求中的许多方面与农民意见一致。第三等级的团结也因此得到加强。

在土地问题上，农民却不像在其他问题上那样团结一致。众多农民缺少土地，不少人认识到他们应该成为土地的主人。然而，陈情书中极少有敢于要求僧侣出让财产的。它们一般只限于提出用僧侣财产的收入还清国家债务，弥补财政亏空。在大多数人看来，私有财产，甚至一个等级的财产是不能触犯的。农民认为，能够租用土地已经足够了。陈情书在土地经营问题上的态度则大胆得多，其中许多提出了分割大农庄的要求。所以，从1789年封建权利被废除后，农民便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分裂。大地产经营者的利益与小农和无产者的利益互不相容。前者力图创立技术先进的农业，为市场而生产，后者则满足于生活在几乎完全封闭的经济中。在对待旧制度的改革尝试（圈地、谷物贸易自由）以及农村公社和经营方式问题上，农民也陷于分裂。从1789年起，有地农民开始意识到无地农民对其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诺尔地区的某些陈情书早已要求建立按纳税额决定选举权的制度，以便把非纳税者和接受救济者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它们认为这是“防止省议会过分嘈杂纷乱的唯一手段”。固然必须首先废除封建制度，但有地农民此时已经开始为保持其社会权威而忧虑了。

法国农民之间后来发生的对立是从旧制度末期开始萌生的。他们只是在反对特权者，仇恨贵族方面保持一致。大革命废除了封建捐税、什一税和特权以后，有地农民便转而主张恢复秩序。至于土地，大革命通过出售国有产业使小土地所有者大为增加，同时也保持了大地产和大型经营方式及其一切社会后果。旧制度末期的农民结构本身已预示出大革命在土地成果方面的温和性质，用乔治·勒费弗尔的话说，这“像是资产阶级与乡村民主之间的一种妥协”。

4.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危机

从1720年起出现的经济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出放慢的迹象。一些省份大型贸易和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减慢，一般毛织品、棉麻织品、小型冶金等大众产品工业的增长达到了极限。流行病的蔓延与经济发展放慢的现象竞相出现。封建主义的社会组织基础本身显然与此有关。的确，以往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现在因国内市场不足而受到阻碍：农民群众太穷困了。这种状况本身与各地区之间由物质（尽管修筑了道路，交通工具仍然不足）和人为（商品流通税的负担）造成的严重隔绝也有直接关系。同时，对农民劳动的横征暴敛也是原因之一：领主的反动加重了领主捐税，地租的份额与数额随着不断增加的租地要求猛涨，此外还有其他各种税收。然而，同以往一样，这些征缴的绝大部分并未用于农业投资，而是在奢侈性（豪华用品）或非生产性（官僚机构、军队、宫廷）的开支中被挥霍浪费掉了。这样，农民中潜在的积蓄大部分被吸干，剩下的少部分也被用于土地投资了。农业的进步得不到任何资助，农业技术停滞不前。

此外，人口增长对于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框架也产生影响。瘟疫消失、赋税放松和国内相对和平使人口一度大量增长。这促使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旧结构变得脆弱了。1760年以后，流浪现象有新的发展。在里昂地区，游民中短工和小农的比例很大。这种现象的增加与农民中社会差别的扩大紧密相关，同时也和土地遗产集中与分割的双重变动分不开。人口增长加剧了这一变动，并且引起地租上涨。由于工业增长缓慢，它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并非是因为缺乏销售市场，而是因为缺乏资本——可使用的资本。然而，资产阶级大搞国家财政交易（这种交易因王家金库亏空而膨胀），并且模仿贵族阶级购置地产。这些活动占用了它相当一部分资金积累。

因此，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生存无任何保障。由于缺少收入转让制度，救济事业仍很不发达；1786年贸易条约引起英国制成品大量流入；1788年的坏收成和1788—1789年的严寒冬天。所有这些在当

时并不是特别的灾难，也许比1709—1710年的程度要轻，但是，此时正值经济结构的危机，新思想正在四处传播，国家镇压工具也陷于危机。这些情况是路易十四王朝时期，即便是末期也未曾有过的。再者，17世纪以后人们的心态已发生了变化。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尤其在大城市和贸易活跃的农村地区，1720—1770年间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初等教育的发展使他们开始不大遵从教会的道德箴言（1760年后避孕开始出现，虔诚读物减少），并不安于逆来顺受了。在许多农村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农民与领主间的敌对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往往是无足轻重的）。农民与僧侣之间的敌对甚至也出现了，只是较少些。三级会议的咨询活动开始后，人们感到幸福有可能得到，前途充满希望，同时也越发不能忍受经济情势方面的危机了。

III.资产阶级的哲学

社会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意识形态同时也在变化。大革命的思想源流应该从17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中去寻找。笛卡儿曾指出用科学驾驭自然的可能性。作为他的继承者，18世纪的哲学家公开地阐明了一个新秩序的原则。哲学运动与17世纪教会、国家的专横和禁欲思想背道而驰。它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界，唤醒并激发了批判精神，同时提供了新的观念。无论在科学、信仰和道德方面还是在政治与社会组织等各个领域，启蒙思想都以理性原则取代了官方与传统的原则。

德·朗贝尔夫人（1647—1733年）说过："研究哲学就是使理性恢复其全部尊严和权利，就是把一切事物与它们本身的原则联系起来，并摆脱舆论与权威的桎梏。"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对"兼收并蓄"条目作了这样的解释："兼收并蓄者作为哲学家，他打碎偏见、传统、古法、普遍认可和权威，即一切束缚群众精神的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探索最明确的普遍原则。他对任何事物的承认都必须经过感觉和理性的证实。"

伏尔泰在1765年写道："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开垦荒地，促进耕犁和居民数量增加，他们使穷人有事做，能致富，他们鼓励婚姻，安抚孤儿，对必要的捐税毫无怨言，并力图使耕作者有条件愉快地缴纳，他们对人无所求，而是鞠躬尽瘁，为其谋福。"

1748年后，该世纪中最伟大的著作相继问世：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到卢梭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此期间出版的还有比丰的《自然史》（第1卷出版于1749年）、孔迪雅克的《感觉论》（1754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摩莱里修士的《自然法典》（1755年）、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1756年）和爱尔维修的《论精神》（1758年）。在1751年这一年中，出版了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第1卷、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重农学派的刊物——《经济杂志》第1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以及经济学家，他们都以不同的特色为哲学兴盛作出了贡献。

18世纪上半叶有两大思潮在发展：一股是具有封建色彩的，以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为代表。各高等法院和特权者们从该书中汲取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论据。另一股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敌视僧侣甚至宗教本身，但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这两股思潮在18世纪后半期固然还存在，但是更为民主和平等的观念开始出现了。哲学家们此时从涉及政府的政治问题转向涉及财产制度的社会问题了。尽管重农学派在一种保守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经济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推动了时代思想向这个新方向发展。伏尔泰自1750年至他去世前是哲学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如果说他所主张的是在绝对君主制范围内实行改革，把政府交给富有的资产阶级，那么平民出身的卢梭则表达了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的政治理想。

重农学派认为，国家的组成是为了保障财产权，法律是自然的真理，它独立于君主并凌驾于君主之上。"立法权只能是宣布法律而不是

创造法律的权力。”（杜邦·德·内穆尔语）“法律对财产的任何侵犯无异于社会本身的颠倒。”重农学派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的力量仅限于保卫财产，国家只应该行使镇压的职能。这样，重农学派的运动便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地产主的阶级政策。

伏尔泰同样主张政治权利归富人所有，但不是只归地产主所有。在他看来，土地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但是，“在社会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人，他们是否应该享有发言权？”（尊敬的波利卡普神甫信札）伏尔泰在《哲学辞典》（1764年）的“平等”条目中写道：“如果不永远保持成千上万有用的、同时又一无所有的人，人类便不可能生存下去。”他在这个条目中还写道：“平等是最自然，又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伏尔泰企图把大人物压低，但丝毫不想把人民提高。

作为平民灵魂的卢梭却反其道而行之。在第一篇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是否败坏或增进道德》（1750年）中，他批判当时的文明，为贫苦人申诉：“在城市里养活100个可怜虫的奢侈品使得10万个穷人为之丧生。”在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中，他对财产制度予以抨击。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中，卢梭发展了人民主权的理论。在这方面，孟德斯鸠主张权力归贵族；伏尔泰主张权力属于上层资产阶级；卢梭则主张解放卑贱者，把权力赋予整个人民。卢梭为国家规定的职能是惩治对个人财产的滥用，以继承法和累进税保持社会的平衡。这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论点在18世纪是独步一时的。它使卢梭与伏尔泰及百科全书派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对立。

开始，这些不同思潮几乎是完全自由地发展的。蓬帕杜尔夫人从1745年起成为宠妃，并得到财界的支持。她由于保护哲学家而遭到由主教团和高等法院支持的王后、王太子亲信集团的对抗。他们把哲学家视为敌人。1745—1757年，马肖·达尔努维尔试图通过开征念一税来废除财政特权，建立纳税平等。他依靠了哲学家的支持，因为这也是他们的

要求之一。这样便结成了开明大臣和哲学家的联盟。同时，对特权和宗教本身的攻击也展开了。1750—1763年，政府没有出面干预。马尔泽尔布主持着图书编审机关。作为哲学家他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书刊检查部门有何用处。正是由于他，《百科全书》的头几卷才没有夭折。

在中立态度的鼓舞下，哲学运动逐步扩展开来。尽管后来当局改变了态度，但它已经是所向披靡了。1770年后，哲学宣传已大获全胜。此时，最伟大的作家已开始沉默并纷纷逝去（卢梭和伏尔泰于1778年去世）。二流的一些作家却开始把新思想在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至整个法国普遍传播开来。思想史上的重要成果《百科全书》于1772年完成。它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温和的，但它强调对科学无限进步的信仰，为理性树立了宏伟的丰碑。马布利、雷纳尔、孔多塞继承了前辈的业绩。哲学成果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虽有所减少，但不同体系的综合却开始形成，革命理论便应运而生。雷纳尔修士所著的《欧洲人在两印度定居和贸易活动的哲学与政治史》在1770—1780年间再版不下20次。狄德罗参加了该书很大一部分的编写。雷纳尔在书中把哲学宣传的所有论题都再次提出来：对专制主义的仇恨与对教会的不信任，主张教会应受世俗国家严格控制，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赞扬。

书籍和小册子把这些思想传播到各个社会阶层。1775年马尔泽尔布在当选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中宣称："在每个公民都能用印刷品向全民族发表意见的时代，那些对别人具有教育才能和激励天赋的人们，即那些文人，他们处于分散的人民中间便犹如罗马和雅典的演说家们处于集合起来的人民中间一样。"

18世纪的书籍出版量有很大增加。1731年前后，全国每年出版400—500部著作，1789年前后达到1 000—1 200部。旧制度末期的报刊也增加了。在法国北部里尔的第一份报纸于1749年创刊，瓦朗西安、阿腊斯和亚眠的第一份报纸出版于1788年。

口头宣传扩大了印刷品的影响范围。沙龙、咖啡馆数量大增，各种社团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农业学会、慈善协会、各省学院、阅览室等。讨论哲学和社会问题的学术团体成倍增加。1780年以后，在40多个城市建立了上述各类团体，其中有波尔多这样的大都市，也有像巴耶这样的小镇。从1770年起僧侣会议便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或乡镇能够“免于这种亵渎宗教的言行的传染”。

共济会助长了哲学思想的传播。自1715年从英国传入后，共济会便无保留地支持哲学宣传。在身份平等、宗教宽容等许多问题上它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这种作用不宜过分夸大。作为贵族阶级和富有资产阶级相互融合的场所，共济会不过是众多传播哲学思想的团体之一。同时，中等教育的发展，中学和寄宿学校的大量增加，使有条件对新思想感兴趣的公众广为扩大了。在鲁昂（1789年有7万人口）有两所男校和两所女校，较小的勒阿弗尔（2万人）也有了一所学校。

传统的权威并非无动于衷。僧侣会议从1770年就开始担心：随着信仰的丧失，“对君主本人的爱戴和忠诚感情也会永远消失”。对教会的攻击动摇了君权神授的基石，正如对特权的批评动摇了旧制度的社会基础一样。1775—1789年，巴黎高等法院查禁了65部著作。对于邦塞1776年出版的《论封建捐税之弊端》，高等法院宣称：“作家们开始研究如何反对一切，摧毁一切，推翻一切了。假使这名作者写作的系统思想不幸惑及民众，王法将被彻底动摇，臣属将起而反叛主人，人民就会反抗君王。”

在哲学宣传的主要论题中，理性至上最为突出：18世纪时，理性主义的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它已所向披靡。其次是对进步的信仰，理性把它的光明传播得离人们越来越近了。

“终于，一切阴暗都消逝了，大地光芒普照，各类伟人辈出的壮景出现了！人类理性是何等尽善尽美啊！”（杜尔哥《人类精神进步的哲

学画面》1750年）

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对自由的要求，从个人自由到经济自由。18世纪所有伟大著作都把自由作为主题。哲学家们行动的主要表现（尤其是伏尔泰）是为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而斗争。在平等问题上存在的争议比较大，大多数哲学家只要求在法律面前的身份平等。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认为，不平等是永恒的和命中注定的。狄德罗把特权区分为基于实际服务的正当特权和非正当特权。然而，卢梭把平等的观念输入当时的思想中，他要求一切公民的政治平等。他赋予国家的作用是保持某种社会平衡。

这些构成哲学思想共同基础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各阶层呢？反对贵族阶级是所有人联合的基点。18世纪，贵族越来越企图保住特权和贵族地位。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雄心与日俱增。然而此时一切晋升的道路都对它关闭了，使它不能担任重要的行政职务。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比贵族成员更适合担当这些职务，因而它的荣誉感和自尊心时常遭到伤害。在布耶侯爵这位绅士的《回忆录》中或在罗兰夫人身上，资产阶级的这些不满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罗兰夫人明确认为自己的才能和资产阶级尊严远非贵族妇女所及。

资产阶级面前主要有两个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就是分享政权的问题。18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从1770年起，舆论越来越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资产阶级宣传的内容显然是哲学运动的论题：批评神授君权，仇恨专制政府，抨击贵族，反对特权，要求身份平等与纳税平等和任人唯贤的人事制度。

资产阶级对经济问题同样感兴趣。上层资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对国家进行改造。什一税、农奴制、封建捐税和不公平的税

收制度妨碍农业的发展，影响着一切经济活动。只有废除长子继承权和永久管业权财产才能得以流通。工商业资产阶级还想得到劳动自由和企业自由。多种类型的司法习俗、国内的种种关卡、度量衡的多样化，这些都影响了贸易活动的发展，阻碍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在管理其企业时所奉行的原则，即秩序、精简、统一，也应该被用于国家治理。最后，资本主义的企业精神还有赖于科学领域的研究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科研工作与哲学思辨一样，都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审查。

驱使资产阶级行动的不只是自身利益。当然，贵族的排他性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和智力方面上升与身份下降的矛盾加强了它的阶级觉悟。然而，意识到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资产阶级从哲学家们那里汲取了某种世界观和大公无私的文化。它不仅仅认为改变旧制度符合自身的利益，还相信这样做是符合正义的。资产阶级确信自己的利益与理性是一致的。

当然，我们对这种断言要具体分析。资产阶级包括各种阶层，它并不是一个清一色的整体。许多资产者从未受到哲学宣传的触及，有的则出自于宗教虔诚和传统主义，反对进行变革（在恐怖时期的死难者中第三等级的成员占大多数）。我们不应该忘记，宗教书籍虽然在18世纪出版物中的比例大为减少，但仍然为数可观。多数报刊在概述新书内容时都表现得谨小慎微。学术团体同样是非常温和的，因为贵族往往在其中有很大势力。哲学传播中遇到的这些限制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抵制哲学宣传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固然希望变化和改革，但它并无丝毫革命之意。整个第三等级都敬仰国王，这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感情。正如马尔蒙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证明的：国王代表了民族观念，任何人也不打算推翻王政。资产阶级，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更多地是想与贵族融为一体，而不是摧毁它。资产阶级对于拉法夷特的迷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总之，资产阶级远不主张民主，它主要是想保留社会差别，使自己区别于下层阶级。库尔诺在《回忆录》中讲道：“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身份的从属关系更引起注意的了。代理人或公证

人的妻子被称为‘太太’，而参事的妻子则毫无争议地被称作‘夫人’”。

贵族鄙视平民，资产阶级鄙视人民阶层。资产阶级号召人民各阶层反对贵族。但当它看到人民在共和二年觊觎政权时便既愤怒又恐惧。这便是这种阶级成见的最好说明。

贵族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危机

18世纪，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质。的确，贵族已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在不断进步的生产力和知识的推动下，社会劳动变得多样化了，促使富裕和有知识的资产阶级壮大起来。与此同时，第二等级为保住自己的旧有优势，拒绝相应地满足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成为贵族的要求。总的看来，18世纪加封的贵族比以前减少了，因为从路易十四以后取消了拥有采邑便自封是贵族的做法。这种做法虽不合法但在此之前一直较普遍。1728年后，有爵位的官职不再开设，贵族证书的颁发也不轻易进行了，只是在1770年前后出现过一阵高潮。

贵族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支配权远不如17世纪了。新设的经济或军事职务及主要的机构开始有一部分摆脱了它的控制。因为掌握这些职位必须有技术能力，这使官员的招募超出了贵族范围。对此，贵族的反动也无济于事。王家要塞建筑师团体已稍向平民开放，这是因为梅齐埃尔工程学校的招生范围较广，专业培养所需的数学水平很高，因而录取不能在社会方面过分限制。中央行政部门办公处的成倍增加引起“办事员”数量的上升，这些人多数是非贵族。

在文化方面，那些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尽管受到贵族和国家的控制，尽管它们大多数并无颠覆思想，但还是对旧制度的社会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们促进了思想世俗化和“功利”情趣等资产阶级准则的传播。这些准则与陈旧的宗教感情和古老贵族的荣誉感是背道而驰的。一直是贵族阶级社会主要思想支柱的教会在18世纪末越来越不能满足新的

社会要求。私人寄宿学校和市政教育设施增加后，教育便不再是教士们的一统天下了。救济事业同样也开始世俗化。监察官或地方当局建立了乞丐收容所和慈善堂。方兴未艾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最终对贵族政权是个打击。对普罗旺斯省遗嘱的研究表明：外省的大批贵族对于传统宗教的笃信程度比人们以前所想象的要高。这一点很说明问题。此外，同样意味深长的是，1789年以后的反革命流亡成了宗教思想意识的强烈复发中心。

---

[1] 10世纪法国编年史作家，修道士。著有882—995年间的《历史》。——译者

[2] 法国辅币名，相当于1锂的1/20。——译者

第二章 制度危机

君主制度自中世纪以后不断完善。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它的形式，至少是政治形式最终确定了下来。这位国王改善了政府体系，把政府的权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他却没有把它治理成一个合理与协调的整体。可以说，路易十四死后，“专制主义无所不在，而专制者却四处皆无了”。实际上，王朝一直在进行创设而从不废弃。于是，社会与政治状况之间的分离、民众思想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分离日渐加深。混乱与庞杂一直是行政组织的特征。按照米拉波的说法，法兰西只不过是个“由一些相互不和的人群组成的非法定集合体”。

Ⅰ.君权神授的王朝

1.专制主义：奢望与局限

专制的、管理性的君主制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成形，到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鼎盛，并持续于整个18世纪。前个时期表现出来的分立势力已大为削弱，但大部还保留着。三级会议在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后就被废弃不用了。城市自18世纪起处于监护之下。省三级会议、高等法院、僧侣会议依然存在，并继续行使职能，但它们都在王权的控制下。与此同时，随着参政院和地方行政监察官的设置，王朝的行政组织正规和完善起来。这种君主制被理论家赋予一种神授权利的性质，而且这种性质越来越突出。在亨利四世时期，卢瓦佐还只是把国王看作人民的官吏兼上帝的代理人。到了路易十三时期，勒布雷说得更为明确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权仅仅来源于上帝，他们不必屈从人间的任何权势，他们享有完全、绝对的主权，在王国是至高无上的。”

博絮埃的《圣经本文里的政治》一书表明他是君权神授的天主教王朝的权威理论家。这部著作是为王子而写的，到1709年才出版。

作为上帝的代表，国王在所有的诏书中都要宣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安排，法兰西和纳瓦尔的王”。加冕礼使国王具有神授的性质，通常

在兰斯大教堂内举行。国王在重臣簇拥下首先向教会和臣民宣誓，然后接受加冕，即以圣油瓶的油敷身。此时总主教口中念念有词：“接受祝福并成为这个王国的君主吧！上帝把它交给你统治。”戴上王位徽章后，国王与人民见面。加冕礼第二天的活动是触摸瘰疬：国王抚摸每一个患者，口中不断重复：“国王触摸你，上帝治愈你。”王朝通过这种仪式表明自己的神圣，加冕礼使国王博得一种宗教性的尊崇。

国王的绝对权力来源于它的神授性质。路易十四在回忆录中写道：“把君主赋予人类者愿他们像自己的代理人那样受到尊敬。”

臣民若想控制源于上帝的权力便是大逆不道。君主政体的神授性质在一切领域都保障着绝对权威。国王是专制者，但并不是独裁者。他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行使权力。正如1572年，巴黎高等法院院长德·图对查理九世所说，他必须尊重天意，“按上帝的意志”作君主。国王行使权威要向上帝负责，他还必须遵守王国的“根本法律”（王位转归制度、领地的法律地位）。这些法律是把王冠和君权赋予国王及其家族的交换条件。国王要在加冕宣誓中保证维护臣民与教会的结合，以公正、慈悲的裁决进行统治。因此，国王并不等于独裁者。但是，国王作为共同利益的代表，超越王国中各个等级和团体之上。他拥有无限制的行动手段，不受任何力量控制。这样，专制主义便成为王朝的特征。

国王的权力是个整体，不能分享也不能交换。当然，国王得到参政院、最高法庭、省三级会议这些机构和组织的辅佐。但这些只是咨询性机关，对君权不能加以限制。居约在《论官职》（1786年）中写道：“我们有一位国王，这就是说我们处在一个人的意志的支配下。这种意志固然不应是专断的，但它却应该是最高的。他的权力不应是独裁的，然而也不能分享。延缓国王的行动以便使他明智，这当然是有益的，但永远不允许中断他的行动以阻隔或诋毁他。”

国王是专制的君主，他拥有一切权力，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国王是一切司法的本源。在加冕礼中，他保证要给臣民公平正义。大法官米歇尔·德·洛皮塔尔（1507—1573年）在奥尔良的三级会议上说：“国王被选择出来首先是为了行使司法权。法国国玺上国王的形象并不是戎装跨马，而是端坐王位主持司法。”作为司法的主管人，国王有权受理或重新审理任何案件，干预一切诉讼，这就是所谓“保留司法权”。国王往往把司法权交给他的法庭来行使，这就是所谓“委托司法权”（只是委托而不是让与）。

国王是一切立法的本源。他是活的法律，即“法律国王”。国王不受其前辈法律的约束，尽管他一般避免与之实行太突然的决裂。1770年12月，路易十五在高等法院声明：“我们只依靠上帝来执掌王权。制定法律的权利只属于我们自己，我们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们的臣民要受这些法律的指导和统治。”国王通过诏书和敕令进行立法，这些是普遍性和永久性的决定。训令、敕书、手谕或御旨涉及个别措施。但是，国王不得违背天意和自然道德，还须遵守王国的根本法律。

国王是一切行政权力的本源。他拥有负责王国事务的政府。杜尔哥在献给路易十六的《关于市政的论文》中写道：“陛下不得不亲自或通过受权人对一切事务作出决定。人们无论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还是为了尊重他人的权利，有时甚至是为了运用自己的权利，都要首先得到陛下的专门旨意。”国王对职务和官爵的人选作出安排。出自对管理和政府部门的需要，他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托付给官员行使。这些官员仅仅是被授权者，他们处于国王的最高控制之下。为满足其国家所需，国王个人有权征收捐税和御用金。这种习惯在16世纪开始形成，只有僧侣等级和自治税区对此略有限制。国王不仅可以决定征收捐税，他也是财政开支的唯一决策者，财源的“分配”由他做主。

最后，国王还是战争与和平的本源。他最古老的责任之一就是实行保卫，保护王国抗击外敌。在18世纪变成了“保卫国家”。国王决定对外

政策，他还是军队的统帅。

1766年3月3日，路易十五在高等法院宣称：“我本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立法权都属于我自己，我不依赖别人也不与他人分享。我是整个国家秩序的中心。民族的权利与利益和我本人的权利与利益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

然而在事实上，这些奢望远未能实现，尤其是在立法方面。从14世纪起，尽管一些法律家承认国王享有无限制的立法权，而实际上直到18世纪，这种权力仍受到一些残存的限制。

14世纪以后，在财政陷于危机时，国王被迫设立了三级会议。专制君主制并未将它废除，只是自1614年以后不再召集它了。三级会议纯属咨询性机构，国王要求它投票通过税收，实际上国王不经过它也可以征收这些捐税。国王还要求三级会议提供建议，而是否采纳则由国王自便。召集三级会议成了王权在危机时期最不得已的权宜措施。1789年三级会议的召开真可谓一项古老制度的死而复生。

对王权威胁最大的莫过于高等法院和其他最高法庭的政治权利。高等法院，主要是巴黎高等法院，是所谓王国基本法的捍卫者。它们以使用“注册权”发挥政治作用：按国王意志发出的法律只有经高等法院“注册”之后方能生效。这时，国王的法律要经过“审查”、讨论。高等法院如果拒绝注册，就根据“谏诤权”解释其拒绝的理由。对此，高等法院声称这是一项历史权利，而王室则强调：这只不过是王权作出的一种默许的、非正式的让步而已。实际上，这些权利是在王权的容忍下经过长期习俗和逐步蚕食的作用形成的。然而这毕竟对王权构成了某种限制。对于遭到拒绝的法律，国王可以通过隆重会议或“御临法院”等方式强行注册。注册权和谏诤权在18世纪是高等法院对抗君主专制制度的有效武器。这些权利实际上只是用于保护高等法院贵族的特权，对付改革企图，尤其是对付财政方面的改革。然而，在高等法院似乎取得优势的时

候，它的政治生涯却结束了。因为在反对专制王朝君权神授原则的进程中逐步兴起的并不是一个特权团体的权利，而是国民主权的原则。

2.政府机器

在17—18世纪，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已大体完成。地方自治大为削弱以至完全丧失。凡事都要由凡尔赛或中央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决定。

按照专制君主制的最终形式，政府处于国王权力的控制下，由一个包括1名大法官、4名国务大臣和1名财政总监的内阁组成。内阁中不设首脑，它只是个高级官员会议，其成员都各行其是。各大臣之下设若干署，由“署长”主持。政府领导的一致性由国王和参政院保障。每个星期，轮流有1名大臣同国王一起办公，汇报本职工作。然后由国王作出决定，再由大臣将这些决定交各署执行。遇有重大事务要提到参政院讨论，这是政府名副其实的调节器。

阁员和国务大臣各负责一行政部门。大法官身为全体法官之首，是国王立法的创议者。他保管国玺，终身任职。当国王不再宠幸他时，就新设一“掌玺大臣”取代之。“国务大臣”一职初创于16世纪亨利二世时期。它曾是专制王权的有效工具。最初，国务大臣的职权范围变化不定，后来才逐步确定下来。其中，陆军大臣除掌管军务外还负责管理边境各省；海军大臣兼管殖民地事务；宫廷大臣拥有多种职权：僧侣、新教事务、巴黎市等；此外还有负责外交事务的大臣。国内行政事务也由4位国务大臣分管。国王每年划分1次国务大臣的“管辖区”，把几个省合在一起，分别交给他们负责。国务大臣是国王与他们所管辖的省、市、团体、等级之间的中介。另外，根据这种制度，国务大臣还是国王的私人秘书，他们4人中总有1人在国王身边。每个大臣在3个月中专门负责发布由国王批阅的赏赐、功德和特惠文书。国务大臣是“穿袍贵族”，一般从参政院参士中选拔上来。从1750年以后，佩剑贵族不再蔑视这一职务。最后还有“财政总监”，他的权限很广，实为总理大臣，负责国内行

政、农业、工业、商业、桥梁道路……

参政院作为政府的真正调节器，使它保持领导的一致。参政院是在旧宫廷不断分解和某些行政部门趋于专业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参政院的管理制度是路易十四的一项创举。他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经常性地召集政府的各种委员会使得这种制度统一起来，与大政方针相协调。他死后，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缺乏他这种素质。这种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国王个人的行动，一旦他失去不懈精神和权威，这种制度便动摇了。参政院由不同的会议组成。“高级会议”或称“国务会议”负责制定重大决策，即“战争、和平、与列强谈判等问题”。在这种会议上，国王专门召集五六名重要人物议事，他们被称为“国务委员”。任何部门一级的大臣都不是其中的正式成员，外交大臣在其中只担任报告人。国务委员离职后，即不再参加高级会议后仍然保留职称。这个会议一般每周举行3次。“国情会议”是负责国内行政统一的机构。“财政会议”管理国家的财政和收入，并负责分派各税区的军役税。“枢密会议”或“争议处理会议”由大法官主持，它是旧制度时的大理院，同时也是审理行政诉讼的法庭。这个庞大体系和它所属的各个部门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缺陷，它非但不能使君主制强化，而且常常导致它的行动陷于瘫痪。

Ⅱ.中央集权与自治

和中央行政一样，君主制度在各省和地方的统一事业也没有完成。到处都存在着混乱不堪的局面。王国历史上形成的行政区划与当时的需要已不相适应。国界本身也不明确：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边界走向如何，无人确切知晓。纳瓦尔始终是一个单独的王国。国王在布列塔尼是个公爵，在普罗旺斯则是个伯爵。旧的区划从未被废除，新的区划又复加其上。宗教区划（教区）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古老的司法区划（北部称“巴伊管区”，南部称“塞内夏尔管区”）起源于13世纪。军事区划（军区）初创于16世纪。财政区划或“税区”从17世纪开始出现，它同时也是监察官的行政范围。在这样一个极不协调的整体中，王国的行

政制度自身往往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依照传统，法国分为若干“省”或“地区”。这是些较为广阔的区域，曾长期处于某个封建王朝的政治统一体中，各自延用某种司法制度。习俗、历史传统、甚至语言方面的差异使这些古老的省区划分持续下来。18世纪末，“布列塔尼族”、“普罗旺斯族”依然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有自己的法律、习俗和方言。诺曼底、朗格多克、多菲内、布列塔尼……是最大的几个省，其他的省较小，如奥尼。然而，省并不是一种行政区划：国王的行政部门对省根本不予理睬。即使国王对各省的地方主义有所重视，也只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对国家构成的考虑。旧法国的行政结构建立在“军区”，尤其是“监察区”的基础上。

1.专制主义的代理人

在封建君主制下，国王的代表和代理人曾经是称作“巴伊”（Bailli）和“塞内夏尔”（Sénéchal）的地方长官。那时主要的行政区划则是巴伊管区和塞内夏尔管区。16世纪时，卖官鬻爵的实行使这些职权成为可供捐购的官职了。此后，巴伊只拥有军权（召集全部人马）和召集辖区内3个等级代表的特权。

16世纪，在温和君主制下，“军区长官”是国王的代表，军区是主要的区划。到17、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时，各税区的监察官则成为地方行政的领导。18世纪末，以上3种类型的区划同时存在。监察官的权威最大，然而他也不得不顾忌地区内其他重要权力：军区长官、最高法庭（包括高等法院、最高财政法庭、最高税务法庭），甚至还有省三级会议。

军区长官共有39名。根据1776年的敕令，他们都是从高级贵族中产生的。在18世纪，他们只享有名义上的权威，其官职纯属一种荣誉。这些人平时居住在凡尔赛，根据1750年的敕令，他们如无国王的特许均不得返回其管辖区，平时由军区的副长官代理其职。

“司法、警务和财政监察官”是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制最积极的官员。他们与国务大臣、财政总监和国情会议保持经常的联系，使地方行政从属于中央政府。监察官起源于16世纪到外省“骑马巡视的审查官”。这种制度在17世纪后半期才普遍建立起来。监察官的管辖范围以“税区”为最高区划，然而这两者之间不完全吻合：1789年有32个监察区，而税区则有33个，图卢兹和蒙彼利埃两个税区被合并成朗格多克监察区。“监察助理”在监察官的领导下主持下属各财政区。他们完全隶属于监察官本人，他可以任意撤换监察助理或改变他们的“管区”。

金融家约翰·劳对达尔让松侯爵说过：“您要知道，法兰西王国是由30个监察官统治的。你们既没有高等法院，也没有等级会议和政府。各个省区的福祸与贫富完全取决于这30个巡视外省的官吏。”

这种论断无疑有些言过其实。在18世纪里，监察官不能不使自己适应政治形势和地方的环境，此外，他们的行动自由也越来越受到中央政权的控制。

监察官是国王的直接代理人。他们是从枢密会议的审查官中，也就是从上层资产阶级里选拔出来的，因而遭到贵族的白眼。监察官的职权是多方面的。作为司法监察官，他们能够出席并主持一切法庭和审判庭（除高等法院外）。他们有权监督一切法官，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和叛乱罪有终审权。作为警务监察官，他们主持一般的行政管理，控制各个市政当局，监督商业、农业和工业。此外，他们还负责王家徭役，主持召集民兵。监察官的这些权力在自治税区多少受到些限制。作为财政监察官，他们有权摊派税收和处理税务诉讼案件。对于17、18世纪开征的捐税（人头税、念一税），他们有专属（征收）权，对于旧税（军役税）他们也享有控制权。尽管监察官在行政管理方面做了不少实际的好事，他们的大权在握还是激起了反对势力的群起而攻：陈情书都要求废除监察官制度。

2.地方自治的残余

由于专制王权代理人的出现，旧的地方权力机构逐渐被削弱了。

由省内各等级组成的省三级会议是个正规机构，它定期召开，有一定政治和行政权限，其中最主要的是表决税收。从16世纪起，王权极力想摧毁各省三级会议，变“自治税区”为“派管税区”。到18世纪时，只有那些边远的和较晚并入的省份仍然保留着省三级会议，如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勃艮第、多菲内等。实际上，省三级会议是一种寡头机构，其中的第三等级代表只有城市资产阶级，会议的审议表决也是以等级为单位，而不是按人头计算的。

同样，市政自由也由于专制君主制的发展而大为减少。市政官员不再由选举产生，城市被置于监察官的监护之下。至少在1787年以前，农村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市政机构。每个村的农村公社大会在领主权威的控制下负责管理公社的财产。

自路易十四以后，王权大大压缩了各地方的自治权，但并未完全取消它。大革命则反其道而行之，建立了地方分权的制度。

III.国王的司法

王权乃是一切司法的本源，因此国王有权干预任何诉讼。国王从未把司法权让与他人，因此他有权在他乐意的时候抛开自己的日常司法代表，亲自主持司法：或者在自己的参政院内移审，或者派特别专员审理。作为国家的大审判官，国王还可以通过“赦书”（取消、宽恕或减轻刑罚）和“密札”（专横地拘禁于国家监狱）介入司法。但是，国王在平时大都把自己的司法权委托给法庭行使。

为树立权威，国王司法不能不向领主司法作斗争。“王家案件”的理论（涉及王室权利的诉讼只能由国王司法审理）和“羁押期”的理论（起诉人在国王司法与领主司法之间可优先选择国王司法）使领主司法的地

位逐步下降。到18世纪末，它仅仅成了领主维护经济统治的手段了。

对平民民事案件进行初审的“普雷沃”（Prévôt）法庭在18世纪已大部消失。13世纪建立的巴伊和塞内夏尔法庭对争讼价值在40锂以下的案件有终审权。16世纪由亨利二世建立的初等法院对争讼价值在250锂以内的案件有终审权，这种法院在18世纪已全面衰落了。

各高等法院组成若干最高法庭，以国王的名义行使最高上诉机关的职能。高等法院原来是王宫中专门机构的一部分。到17、18世纪，它们便依据其注册权和谏诤权声称享有无限制和普遍的权能。1789年时，巴黎高等法院包括：起诉的“大法庭”、3个“调查庭”、为特权等级所设的“诉状审理庭”和审理刑事诉讼的“轮审庭”。王国的扩张和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从15世纪起建立了12个省高等法院（图卢兹、格勒诺布尔、波尔多、第戎、鲁昂、埃克斯、雷恩、波城、麦茨、贝藏松、杜埃、南锡），其组织形式与巴黎高等法院相同，另外还在4个地方建立了最高咨议会（鲁西荣、阿尔萨斯、阿尔图瓦、科西嘉）。

卖官鬻职和职位世袭在法官的任用方面仍占主流。这种制度从“出让”有俸圣职的现象演变而来。法官的职位也被拿来与教会的有俸职位相比，并可以向别人出让。王权在14世纪授予高等法院对空缺职位的提名权，15世纪又授予它选择权。后来，每遇法院推事辞职，高等法院总习惯于指定由辞职者本人选择的“出让”对象，如遇死亡，便由高等法院选择其继承人代之。弗朗索瓦一世把这一做法改造成合法制度。为了满足御库的需要，他根据财政情况，决定授予或出卖空缺和新设的王家官职。1522年，他还为此建立了一个专门管理部门——“额外收入署”。这种措施开始适用于财政官职，后来扩展到司法官职。出让官职的做法早已存在，它很可能断绝卖官鬻职的财源。于是查理九世规定：只有向御库缴纳一笔税金后出让官职才为合法。从此，卖官鬻职的制度便臻于完善，法官的职位可以由在职的官吏或王权出售给他人。

最初，当一名官员死后，国王仍然自由地掌握其职位。但随着官职的买卖，它便渐渐成为世袭职位了。世袭的做法最初是由一些个别的措施发展起来的：国王授予某个官吏或个人指定职位继承人的权利，这种做法在整个16世纪都很流行。有时，国王会将他授予的职位继承指定权统统收回。这样，御库又可收纳新的官职出让税。在一个名为夏尔·波莱的王室秘书的建议下，世袭制在1604年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措施确立下来，这种制度因此得名“波莱特”。参政院的一项法令规定，法官如每年缴纳相当于官职售价1/60的税金，他就可以享有如下两种优惠：他如果生前出让职务，税金可减半；如果在任内去世，他的官职出让权可由其继承人行使。这样，国王便失去了任选法官的权利。另外，对法官应具备的年龄和能力标准有了明确的规定：25岁以上，具备法学学士或博士学位。然而实际上，年龄限制经允许后可以不计，考试也并不很正规。

法官职位捐纳制导致了法官的终身制。国王不能将法官撤职，因为这官职是他捐来的，除非国王把税金还给本人。终身制成了卖官鬻职的法律结果。在旧制度时，所有捐纳的官职都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另外，卖官鬻职还导致了“讼费”制度的出现。根据旧的司法习惯，诉讼人求助法官时要向他缴纳少量礼品，即“讼费”（最初是糖果、果酱、东方食品）。从16世纪起，礼品演变成必交税，可用金钱缴纳。随着卖官鬻职的流行，讼费也增加了：法官的所得与官职税金不相符时，他们就逐渐趋向尽量多地搜刮讼费。这样，无偿的司法便不复存在了。

卖官鬻职造成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法官们（“高等法院的先生们”）是穿袍贵族，他们的职位使其享有可转让的贵族地位。他们的选拔不受国王控制，由自行遴选解决。这样，司法机关成了完全独立的部门。在18世纪，它已能与王权作对了。18世纪末，高等法院的排他性更为强烈，司法机构自我封闭起来：雷恩、埃克斯、格勒诺布尔的高等法院不接纳平民为法官候选人。1789年的陈情书一致要求废除官职的捐纳和世袭制度。

18世纪末，王家司法机构形成了一整套错综复杂的制度。法庭大量增加引起权限方面的争执，上诉大量增加使诉讼永无休止。司法费用十分昂贵，它包括付给律师和检察官的酬金和付给法官的讼费。卖官鬻职是国家制度的最大弊端。但是，如果不首先打击那些死抱住特权不放，靠职务和官位发家致富的社会阶级，怎么能触动这种制度呢？这实际是对私有制提出指责。

Ⅳ.王国的税收制度

随着国王权力逐步确立，领主的征税权被剥夺了。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国王任意向臣民征税的做法已固定下来。税收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它对于臣民和各省来说都是不平等的：没有一项捐税的征收对象是全体臣民，也没有任何捐税在整个王国是普遍的。

中央财政的管理由在王家财政会议协助下的总监主持。巴黎财政法庭由以前的王宫财政处演变而来。它与外省的11个财政法庭监管着王家财政。有关税务的争讼则由13个最高税务法庭审理。每个税区都设有一个由法国国库总管组成的财政局，负责征收军役税。人头税和念一税则由监察官负责征收。在旧制度末期，王国的税收制度极为庞杂。对在温和君主制时期开始设立的军役税，一部分人不在征缴之列或可以享受豁免权。除这项税收外还有一些专制君主制时期开征的捐税，这些捐税从理论上讲稍合理些。实际上，王家捐税的征收是因省而异的，对于臣民也不一视同仁。税收制度的弊端是导致王朝倾覆的主要原因之一。

1.直接税：不可能的平等

“军役税”只向平民征收。在北部地区称为“对人的军役税”，是针对全部收入的税收；在南部地区称为“对物的军役税”，是针对不动产收入的土地税。军役税不按比率征收而是实行摊派。国王在确定税额时，并不根据收入的百分比落实到每个纳税人，而是把一个总数额落实到各个团体或教区，再由这些团体或教区在居民中分摊。政府每年都制定“军

役税表”，即向全国征收的总额。然后，财政会议将其摊派给各个财政区和派管税区。在每个派管税区，由派管人公署确定各教区的税额。最后，在各教区由纳税人中选出的分税员把军役税落实到每个纳税人头上。负责征收税款的，在教区是征集员，在派管税区是一名专派国库官，在税区则是总收纳官。军役税的这种征收方式致使弊端层出不穷。从1707年起，沃邦在他的《王家什一税》中便对这种弊端有所揭露。

在1701年最终确立的“人头税”原本是向一切法国人征收的。纳税人被分为22级，每级纳税总额相等。第一级中为首的是王太子，缴纳税额定为2 000锂，最后一级中的士兵和短工只缴纳1锂。僧侣在1710年一次付出2 400万锂，赎清了纳税义务。贵族也得以免缴。到头来，人头税只是向平民征收，它成了军役税的附加部分。

“念一税”在经过各种尝试之后于1749年正式建立。它课及来自不动产、商业、地租甚至封建捐税的收入，工业却得以幸免。僧侣以定期通过“自由赠礼”的方式赎清了纳税义务，贵族则往往得到豁免权。自治税区实行预缴的方法。因此，念一税实际构成了军役税的第二个附加部分。

这样，在理论上的平等原则在实践中走了样，有利于僧侣和贵族的特权重新出现。这使缴纳军役税的人所承受的负担相应地加重。当这种负担已不能再增加时，王权便试图再一次建立税收平等。这是缓和财政危机的唯一药方。1787年，卡洛纳建议以“领土特别税”代替念一税，对一切人征收。高等法院的抵制和特权阶级的反抗引起了危机，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发生。

“筑路徭役”由于18世纪道路网络的扩展而加重。沿路的产业主必须按其劳力、车马多少，分担清除碴土，运送沙石的工作。王室徭役在1726年至1736年间逐步建立起来。1738年的一项命令最终使它成为普遍实行的制度：徭役与军役税合并在一起。这样规定徭役导致流弊百出并

激起强烈反对。杜尔哥在1776年曾试图让所有产业主都负担徭役，并把徭役与念一税合并在一起，使徭役成为念一税的附加部分，可以用货币充抵。然而改革失败了，杜尔哥下台后敕令也被废除。1787年，实际的徭役被取消后，在军役税的基础上增加了1/6的追加税。这样，道路修筑、保养的费用负担又都落到了平民身上。

2.间接税和包税总会

15世纪最终确立的“附加税”是针对某些消费品的，如葡萄酒，尤其是烧酒。僧侣和贵族可以免缴。负责征收该税的是巴黎和鲁昂的税务法庭。王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捐税，只是名目不同而已。

“盐税”是14世纪以来对食盐的课税，各地区征收方式极不一致。“赎清地区”，如吉埃纳，指那些在并入法国时已要求不设盐税的地区。“免征地区”，如布列塔尼，则完全不受征缴。在“低额盐税区”，盐的消费不受限制。在“高额盐税区”，每个家庭必须购买“规定的食用盐”。只有慈善机关和公务人员才享有“免税买盐权”。实际上，盐税负担主要落在穷人身上。盐税引起走私活动异常活跃，盐税局的职员和税吏对此大加追捕。盐税遭到人们的一致痛恨。

“贩运税”或关卡税在国内仍然存在。它反映了王国形成的历史过程。全国各省被分为3类：“五大包税区”是由科尔贝尔统一起来的，包括以法兰西岛为中心的一片地区，在这里，只对外国或王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征税；“被视为异邦”的各省（法国南部、布列塔尼），其四周都设置征税关卡；3个“实为异邦”的省（三主教区、洛林、阿尔萨斯），它们可以与外界自由通商。这种互不协调的组织极大地影响着贸易的发展。

直接税的征收由王室行政部门负责，间接税的征收则主要实行“包税”制。此法也适用于领地和领地税。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人们用“贩运”一词指关卡税便很能反映这种组织：国王把征税的权利交给“贩运

人”承包。这种制度被用于盐税和附加税。在很长时期里，国王与包税人的交易只限于个别人、局部地区和某项税收。在派管税区，派管人对税收实行招标承包。“地方包税所”便是这样产生的。17世纪初形成了在国王的参政院实行招标的惯例。同时，实行这种制度的区域也扩大了，“五大包税区”便是为征收贩运税而设立的。集中化可使总开支减少，这对王室有利。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这种集中化倾向继续发展。到1726年开始实行由“包税总会”把全国所有捐税一次招标承包。

包税总会的租约一定6年，以一名得标人的名义签订。签约人只是挂名而已，租约由“总包税人”，即大金融家们担保（最初为20名，后为40名，最后扩大到60名）。包税总会创立了自己的一套管理机构，以便保证收回间接税和承包税额。但是，包税总会处于监察官的监督和税务法庭的控制之下。这类法庭拥有对附加税、盐税和贩运税争诉的终审权。然而新间接税争诉的终审权则在监察官手中，除非出现向国王的参政院上诉。这种制度使总包税人牟取暴利，对国家则是个繁重的负担。路易十六政府把一向被承包的一些捐税收归官办。但是，由于没有坚实的财政和足够的信贷，它仍然脱离不开总包税人的扶助。由于包税总会主要负责征收盐税，它成了人民仇恨的众矢之的。革命动乱常常从焚毁包税总会的办事机构开始。

财政困境是大革命诸直接原因中最主要的。导致这种困境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弊端百出，征收方法混乱和纳税不平等。当然，除此之外还应加上宫廷的挥霍和战争，尤其是美国的独立战争。国债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以灾难性的速度猛增。3亿多锂花费在满足国王的需求上，占了御库岁入的一半以上。在一个繁荣的国度里，国家却处于破产的边缘。特权阶级自私自利，拒绝纳税平等，这迫使王权作出让步：1788年8月8日，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决定召开三级会议。

18世纪末，旧制度古老的行政机器已显得破旧不堪了。君主政体在

理论上强大无比而在实际上却软弱无能，这种矛盾显而易见。由于庞杂，行政结构不能协调一致，陈旧的机构还保留着，新的机构又复加其上。尽管专制主义形成后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国家的统一远未实现。税收制度的弊端尤其使王权实力大为削弱。捐税分派不均，征收不当，以致不见收益。税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使他们更加怨声载道。在这种条件下，国王的专制主义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官僚制度的惰性、政府人员的懒散、行政管理的庞杂以至混乱，使王朝在旧制度的社会秩序发生动摇和失去其维护者的一贯支持时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1789年前的几年是社会和制度陷于危机的时期。由于王朝在财政方面的软弱并无力进行自身改革，产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每当一名立志改革的大臣试图对国家进行现代化改造，贵族阶级便群起保护自己的特权。贵族阶级的反叛在大革命之前发生，并在1789年前动摇了君主制度。

Ⅰ.君主制度最后的危机

1781年5月，内克辞去了财政总监的职务，从此，危机便日趋严重。国王路易十六是个身体肥胖、心地善良厚道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平庸无奇、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的人。他对政务表示厌倦，他在狩猎场上和锁匠作坊里要比在参政院会议上更显快活。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原是奥地利的玛丽-泰雷兹之女，她漂亮、浅薄、轻浮，她那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使王室更加不得人心。

1.财政的软弱

在内克的后任若利·德·弗勒里和勒费弗尔·多梅松时期，王国仅靠东拼西凑勉强度日。1783年11月，卡洛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后，继续奉行内克在北美战争时开始采用的政策：鉴于不可能以增加税收的办法弥补财政亏空，便实行大举借债的做法。

财政亏空是王朝的慢性病，也是导致大革命的主要直接原因。北美战争大大加深了这一危机：王朝的财政平衡遭到破坏，并从此一蹶不振。我们对赤字的规模很难确切估计，旧制度下的王朝从无正规的预算制度，收入由各个银库分存，财务制度极不健全。有一份资料可以使人了解大革命前夕的财政形势，这就是《1788年御库账目报告》。这份报告是王朝“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财政预算”。其实，这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预算。御库并不对王国的所有财政收支进行记账登记。根据1788年这份账目报告，支出达到6.29亿锂以上，而收入仅为5.03亿锂，亏空达1.26亿锂，即支出的20%。这份报告预计借债1.36亿锂。在整个预算

中，民用支出为1.45亿锂，占总数的23%。但是，公共教育和救济方面的支出只有1 200万锂，还不足2%；而宫廷和特权阶级却得到了3 600万锂，也就是将近6%，况且，1787年的王室预算还作了大量压缩。军用开支（战争、海军、外交）达到1.65亿锂以上，占预算的26%。其中4 600万锂是1.2万名军官的薪俸，仅这些军官的花费就超过了用于所有士兵的开支。在预算中，借债的比重比其他项目都大，达到3.18亿锂，即占支出的50%以上。在1789年的财政预算中，预先收入达到3.25亿锂：抵充收入的借款占总收入的62%。

王朝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当时的人们强调宫廷和大臣们的挥霍浪费。大贵族花费了国家大笔资财。1780年，国王赏赐给普罗旺斯伯爵近1 400万锂，赏赐给阿尔图瓦伯爵的则更多。大革命爆发时，阿尔图瓦伯爵不得不承认自己有1 600万锂的债务要立即偿还。波利尼亚克家族从御库中得到的年金和赏金最初为每年50万锂，后来达到70万锂。国王购置朗布依埃城堡耗资达1 000万锂，王后购置圣克鲁城堡耗资600万锂。路易十六为了优待贵族还对他们的领地进行交换或重金收买。他曾从孔代亲王那里购买了克莱蒙图瓦领地，花费了60万锂债券、700万锂现金。然而直到1788年时，孔代亲王却照旧从克莱蒙图瓦领地上得到收入。

债务使王家的财政无法负担。据估计，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使法国共耗资20亿锂：内克是以借债来支付这项开支的。战争结束后，加洛纳3年里在原有旧债上又增加了6.53亿锂。到1789年时，债务已达50亿锂左右，而流通的货币估计有25亿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15年里，债务增加了3倍。

增加税收已不能弥补财政亏空。对于人民群众来说，税收的负担已无法承受。因为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中，物价比1726—1741年间增长了65%，而工资只增长了22%。劳动阶级的购买力相应地下降了。在不到

10年中，税收已经增加了1.4亿锂。任何新的加税办法都不可能实行了，唯一的挽救措施就是实行一切人平等纳税。首先是各省的平等纳税，因为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这样的自治税区比派管税区的税收负担要轻。臣民的平等纳税更为重要，因为僧侣和贵族仍然享有纳税豁免权。土地财产的收入已经增加了98%，而物价的同期增长率只有65%，以实物征收的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也水涨船高地增加了。这样，豁免纳税的特权便更显触目了。特权阶级作为可以征税的对象尚未受到触动，只有它作出牺牲才能充实国库。但是，这还须得到高等法院的认可，而高等法院却不准备牺牲其私利。哪一位大臣敢于强制推行这种改革呢？

2.政治上的无能

最后，借债的来源也枯竭了。被逼到破产边缘的卡洛纳及其后任布里埃纳试图实行所有人平等纳税以解决财政危机。但是他们的企图被特权阶级的利己主义所挫败。

1786年8月20日，卡洛纳在呈送给国王的《改善财政计划》中提出了改革方案。这是一份涉及税收、经济和行政3个方面的全面计划。

税收改革旨在消除亏空和还清债务。为弥补亏空，卡洛纳设想在整个王国推广烟草专营，实行印花税和注册税，对殖民地的商品征收消费税。而主要的计划还在于废除地产的念一税，以“领土特别税”取而代之。这是一种比率税，即与收入成正比，不能豁免，一视同仁。这种税的征收对象是土地而不是个人，所有地产都被征收此税。无论是教会的、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地产，也不管地产是闲置多余的还是生产收益的均不能免缴。地产被分为4等，税率按等级而定。最好的土地征税率为1/20（5%），最劣的土地征税率为1/40（2.5%）。对于流动财富，卡洛纳保留了念一税：“工业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商人和工业家；“职业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捐纳的官职；“权益念一税”的征收对象是其他流动收入。为了还清债务，卡洛纳建议把王室领地出让25年。税收计划的最

后一项是减轻军役税和盐税。豁免权固然还保留着，但统一化的倾向已显示出来。卡洛纳甚至还表示了完全统一盐税的愿望。

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的目的在于刺激生产，其内容包括：实现谷物贸易自由；“壁垒后移”，即取消国内关卡，把关税界限推至政治国界，从而统一国内市场；取消某些束缚生产者的捐税（铁器标记税、经纪税、停泊税等）。在这方面，卡洛纳的改革计划实际反映了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观点。

卡洛纳计划的最后一个方面是把国王的臣民与王国的行政管理结合起来。内克曾在贝里和上吉埃纳创立过“省参议会”。但它是按等级组成的。卡洛纳则以地产为基础提出了一套基于财产的选举制度。按照他的计划，要建立“市镇参议会”，由收入在600锂以上的产业主选举产生。市镇参议会的代表组成“县参议会”，再由县参议会选派一至若干名代表组成“省参议会”。这些参议会纯属咨询性机构，决定权始终在监察官手中。

这套计划主张建立一项经常性按比率的税收制度，从而有助于加强王权。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反映了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作为行政机构的合作者，第三等级从废除税收特权中可以得到满足。然而，尽管卡洛纳给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以沉重打击，他并不想完全消灭之，因为他认为这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在他的计划中，贵族阶级仍旧享有豁免个人捐税和义务的权利，如军役税、徭役、留住军队等。贵族保留了自己的荣誉特权。

为批准这项改革召开了一次“显贵会议”，因为卡洛纳不能指望高等法院为改革法案注册。显贵们于1787年集会，共144人，包括高级教士、大领主、高等法院法官、监察官、国务委员以及省和市镇的三级会议成员。卡洛纳主动挑选了这些人，以期他们能唯命是从。而实际上，王朝想求得贵族阶级的赞同而不是迫其服从自己的意志，这本身就已经

是投降了。作为特权者，显贵们死保他们的权利。他们要求查阅御库账目，抗议滥用年金，并在通过补助金的问题上讨价还价，以便使王朝在政治上让步。舆论也不支持卡洛纳，资产阶级持保留态度，人民则无动于衷。路易十六在其左右的压力下，最后还是抛弃了他的大臣；1787年4月4日，卡洛纳被解职。

在卡洛纳的反对者中为首的是图卢兹的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埃纳。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坚持下，国王召他为大臣。他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征收新税、节约部分开支，尤其是借债6 700万锂）才免遭破产。然而财政问题依旧存在。

由于形势所迫，布里埃纳不得不重新采取他前任的方案。谷物贸易自由建立起来了，徭役被改成一种货币捐税。省参议会也建立起来，其中第三等级的代表与另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相等（这样做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与特权等级的联合）。最后，贵族和僧侣也须缴纳土地税中的领土特别税。显贵们宣称他们无权同意这项税收。布里埃纳既然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就将显贵们解散了（1787年5月25日）。

第一次尝试便这样以王权的明显失败告终。卡洛纳也曾打算先争取显贵们，以求靠他们压服其他贵族阶层。然而，无论是卡洛纳还是布里埃纳都未能取得显贵们的赞同。改革的紧迫性与日俱增，布里埃纳又不得不与高等法院抗争了。

高等法院的反抗与显贵们的反抗相继而来。巴黎高等法院在最高税务法庭和最高财政法庭的追随下发出谏诤，指责对请愿书、报刊和张贴物征收印花税的敕令，决不同意有关领土特别税的敕令。它同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认为只有三级会议有权同意征收新税。1787年8月6日，巴黎高等法院在御临法院的压力下被迫注册了这些敕令，而第二天它又将注册宣布为非法，并予以撤销。这次反叛遭到了流放特鲁瓦的惩罚。但是，动乱已经扩展到省级法院和整个司法界贵族。于是，布里埃纳赶快

妥协投降：撤回税收敕令。重新归位的巴黎高等法院于1787年9月4日注册了恢复念一税的法令，征收领土特别税再也不可能了。这次失败比第一次更惨。由于代表整个特权阶级的高等法院进行抵制，税收改革全然不能进行。

为了勉强维持下去，布里埃纳再次求助于举债。但是，没有巴黎高等法院的同意他便不能借债。而巴黎高等法院只有得到召开三级会议的允诺才肯同意注册。在没有把握取得多数的情况下，布里埃纳还是强行通过了敕令。他把一次“御前会议”突然转变为“御临法院”，以便终止任何讨论（1787年9月19日）。奥尔良公爵抗议道：“陛下，这是不合法的。”路易十六反驳说：“这是合法的，因为我要这样做。”这种回答并不是镇定、庄严地作出的，故称不上是路易十四式的回答。争吵无休无止，辩论越演越烈。1788年1月4日，巴黎高等法院通过一项反对密札的公诉状，并要求得到作为天赋权利的个人自由。最后，1788年5月3日，巴黎高等法院公布了一个王国基本法宣言，它自称是这些基本法的保卫者。这意味着对专制权力的否定。巴黎高等法院尤其宣称，通过税收的权利属于三级会议，即属于国民。它再次谴责武断逮捕和密札，最后还规定必须保持“各省的习俗”和法官职位的终身制。这个宣言的特点是兼有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贵族阶级的要求。它不主张权利平等与废除特权，其原因自不必说，因此。它不具有任何革命的性质。

拉穆瓦尼翁的司法改革旨在粉碎巴黎高等法院的反抗，但是，他的各项法令均被撤销。国王的政府不肯罢休，最后它决心一意孤行，便下令逮捕巴黎高等法院反对派中的两名煽动者：迪瓦尔·代普勒梅尼和古瓦拉尔·蒙萨贝。经过了1788年5月5日至6日之夜的激烈争论之后逮捕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巴黎高等法院宣布，在它那里避难的两名参事“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尤其是在1788年5月8日，国王强行注册了由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起草的6项敕令，其目的在于粉碎法官们的反抗和进行司法改革。一项刑事法规废除了“预先拷问”，即在执行前对犯人施用酷

刑（预审时的严刑逼供已于1780年废除）。很大一部分下级或特设法庭被取消，初审法院改为初级法院，高等法院的权限缩小，作为上诉法庭的45个“大裁判所”的权力相应加强。但是，出于财政原因，拉穆瓦尼翁不敢取消卖官鬻职和讼费。为了注册国王的法律，建立起一个主要由巴黎高等法院的大法庭和公爵、重臣们组成的全能法庭，它取代了高等法院的地位。这样，司法贵族便失去了对国王的立法和财政部门的控制权。

这些改革是深入的，但已为时太晚。贵族阶级成功地把一切不满都引向政府，把冲突的范围扩展到全国。

Ⅱ.高等法院反对专制主义（**1788**年）

1.高等法院的骚动与维齐耶堡会议

拉穆瓦尼翁的改革剥夺了高等法院贵族的政治特权。对这一改革的真正反抗并非来自巴黎，而是来自外省。尤其在一些省份中，除了高等法院以外，贵族阶级在省三级会议的机构中也拥有行动手段。司法改革的实行正值根据1787年6月敕令建立的省参议会激起动乱的时刻。为了满足贵族阶级，布里埃纳曾赋予省参议会广泛的权力，并相应削弱了监察官的职权。但是，他同意给第三等级双重代表权和按人头而不按等级表决，这使得特权等级大为不满。多菲内、弗朗什-孔泰和普罗旺斯地区要求重新恢复旧的省三级会议。引起骚动的两个缘由结合到了一起。高等法院贵族把上层贵族中的自由派和大资产阶级拉到自己一边。阻止设立新法庭，举行司法界罢工，制造混乱，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这些就是他们的口号。各高等法院和各省三级会议联合起它们在法律界众多的支持者一起进行反抗，游行示威此起彼落。佩剑贵族先参加进来，接着教会贵族也参加了进来。僧侣大会在1788年6月对全能法庭的建立表示抗议。

骚动进而发展成为叛乱。在第戎（1788年6月11日）和图卢兹，大

裁判所成立时引起了闹事。在波城，受到省三级会议中的贵族煽动的山民包围了监察官的官邸，强迫他恢复高等法院（1788年6月19日）。在雷恩，保卫高等法院的布列塔尼贵族与王家军队发生了冲突（1788年5—6月）。

然而，构成大革命真正序幕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发生在多菲内。在那里，省参议会的建立引起了极大不安，而司法改革又使这种不安发展到了极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是：这个省份的工业活动和工业产量均名列王国的前茅，反对力量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当政府要格勒诺布尔的高等法院注册5月8日的敕令时，引起了它的抗议。于是政府强令其休庭。5月20日，格勒诺布尔高等法院再次集合起来。省行政官随即向它发出了放逐令。1788年6月7日被定为放逐的日子，这一天发生了人民起义。那些司法助理人员看到，高等法院垮台必然会殃及自身，因而他们满怀愤恨，这次事件好像就是他们挑起的。人民群众占领了各个城关，爬上屋顶，向街上的巡逻队投掷瓦片。行政官、老公爵克莱蒙-托内尔把军队调回营地以期平息众怒。但这也枉然，傍晚前，动乱已波及全城，促使法官们在法院内重新就职。虽然这个“抛瓦日”的直接后果并不严重（法官们最终服从了国王的命令，在1788年6月12—13日夜离开了格勒诺布尔），但它在多菲内标志着真正革命性动乱的开始。

1788年6月14日，在格勒诺布尔市府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者有该城的9名教士（议事司铎或本堂神甫）、33名绅士和59名第三等级成员（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律师等），其中包括穆尼埃和巴纳夫：资产阶级是运动的首领。会议通过了一项由穆尼埃起草的决议，要求召回诸法官，完全恢复他们的职权。此外还要求“召开省特别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参加人数应与僧侣和贵族代表之和相等；代表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最后，决议还提出召开全王国的三级会议“以便根治国家的弊病”。

按其发起者的意愿，格勒诺布尔会议只是多菲内各市镇总会议的预备会。各市镇总会议最后定于7月21日召开。为保证会议的成功，全省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当局的软弱无能助长了这种宣传。多菲内有一位经济巨头，因其家产万贯而被人称作“外国富豪”，他就是佩里埃。佩里埃为建立棉制品厂，前不久在格勒诺布尔城关一带购置了维齐耶城堡。此时，他将城堡借出，1788年7月21日在这里召开了“维齐耶堡会议”。这次会议是1789年三级会议在一个省范围内的预演。由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的会议中有50名教士、165名贵族和276名第三等级代表。按照穆尼埃的说法，这是一个显贵的会议，“最下层人民”被排除在外。各市镇选派的只是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多菲内的1 212个教区中只有194个教区有代表。一份在很大程度上由穆尼埃授意的决定成为大会的决议。会议要求恢复高等法院，但剥夺其政治特权。会议还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它指出：“只有三级会议才具有必要的力量与大臣们的专横作斗争，并制止财政上的挥霍无度。”

会议认为，多菲内的三级会议应该建立起来。在新的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应与特权阶级相等。另外，会议还超越了省的地方主义，接受了民族精神：“多菲内的三个等级将永远不把自己的事业同其他省份的事业割裂开来，在维护它们局部权利的同时将不抛弃民族的权利。”

会议还率先放弃了多菲内省批准税收的特权：“省的三个等级不再批准征税……除非它们的代表在王国的三级会议中对此通过了审议。”

在布列塔尼和贝亚恩的骚动仅限于本省范围。维齐耶堡会议却大为不同，它宣称：为了建立新秩序必须实现民族统一。这样，由于第三等级的努力，维齐耶堡会议的决议具有了一种革命性质，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从基础上被动摇了。

第三等级与贵族阶级的联合和维齐耶堡决议中第三等级观点的优势

虽然轰动一时，但并没有在其他省份产生反响。维齐耶堡宣言只受到钦佩，并没有被效法。1788年春，导致王权失败的主要因素是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之间的联合。为了反抗王权和维护其特权，贵族阶级曾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激烈手段。佩剑贵族和穿袍贵族抱成一团，拒绝服从国王。它们求助于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便进行了自己的革命尝试。尽管贵族阶级要求立宪制度和保障基本自由，主张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和把地方行政权还给遴选的省三级会议，但它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在各个机构中的政治和社会优势。贵族的陈情书一致要求保留封建权利，尤其是荣誉权利。特权等级确实投入了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并把第三等级也拉了进来，但是它的最终目的却是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和保持自己的社会特权。

2.王权的屈服

面对第三等级与特权阶级的联盟，布里埃纳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他掌握不住权力了。由他自己创立并根据他的意思组成的各省参议会对他并不唯命是从，而是拒绝增加捐税。军队是由敌视改革的贵族统率的，因而也不可靠。尤其是御库一空如洗，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又借债无门，布里埃纳只有向贵族阶级的反抗让步。1788年7月5日，他答应召集三级会议。8月8日，他暂闭了全能法庭，把三级会议的开幕定于1789年5月1日。布里埃纳在用尽了弥补亏空的应急措施之后，不得不动用残废军人基金和对医院的捐款。然而御库空虚仍一如既往，他便辞职下台了（1788年8月24日）。

国王重新召回内克，由他完成了君主制的让步：曾激起反抗的拉穆瓦尼翁司法改革被废止；高等法院得到恢复；三级会议也将按布里埃纳确定的日期召开。巴黎高等法院迫不及待地表示出它要扩展战果的方向：根据高等法院1788年9月21日的一项判决，三级会议将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开，即三个等级分别有一票表决权。这样，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相比就会占优势。

1788年9月底，贵族阶级胜利了。但是，如果说贵族阶级的反叛挫败了君主制，它对君主制的动摇也足以为革命开辟道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培育了这场革命的参加者——第三等级。当第三等级开始讲话时，真正的革命就开始了。

1789年的大革命打乱了传统结构。在开始论述这场革命之前，我们有必要透过那些涉及社会结构和情势的纷乱事实以及种种社会、政治现象，对旧制度危机的本质做个概括。

18世纪确实是一个繁荣的世纪，但它的经济高峰处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北美战争之前的经济高涨固然无可争议，但从1778年起便开始出现了衰落，即“路易十六时期的衰落”。另外，对这种经济高涨的影响也不宜估价过高。它更有利于特权等级和资产阶级，各人民阶层受益很有限，各人民阶层受经济衰落之苦却是首当其冲的。1778年以后开始了经济收缩时期，尔后便是经济衰退，最终发展到周期性危机，由此造成了种种苦难。当然，饶勒斯不否认饥荒对大革命的发动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他并不认为这种作用是根本的。他指出，1788年的歉收和1788—1789年的危机使人民备受饥苦，把人民发动起来帮助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实际上，法国已病入膏肓，所有经济部门都受到侵袭。在空前的经济高涨过后，资产阶级因收入和利润减少而受到损害。恰恰在这种时候，苦难把人民群众发动了起来。经济衰退和1788年开始的周期性危机无疑是造成1789年事件最首要的原因。了解这一点意味着对大革命直接起因的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

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经济的决定作用之外，社会的根本对立也在起作用。巴纳夫指出了旧制度的结构，体制与社会、经济运动这两方面的矛盾。我们应该从这种矛盾中找出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原因。在大革命前夕，社会框架仍然属于贵族阶级性质，地产制度也属于封建结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使农民难以忍受。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赖

以形成的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在发展。旧制度的社会、政治组织维护着土地贵族的特权，束缚着资产阶级的成长。

按照饶勒斯的说法，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资产阶级和民主性质的”革命，而不像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那样是一场“狭隘的资产阶级和保守性质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特权充满仇恨，被饥饿逼得起来造反，并极力从封建压迫下挣脱出来。大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摧毁封建制度，使农民和土地得到解放。大革命的这种特征不仅可以从旧制度末期的经济总危机中得到说明，旧社会的结构矛盾更能深刻地揭示这一点。法国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然而它是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支持下进行的。

在旧制度末期，“民族”观念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的上升而日渐明显，但仍然受到经济、社会和国家方面封建残余的阻碍和贵族阶级的抵制。民族统一尚未完成。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遭到种种束缚，如国内关卡、通行税、度量衡标准不一、庞杂的税收制度以及一直保留的封建捐税和教会什一税。社会统一也不存在，社会差别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不仅有贵族和僧侣的特权，还有众多的“团体”和共同体的特权。它们把民族分割开来，拥有各自的“豁免权”、“自由权”，总之是它们的特权。不平等是司空见惯的。“行会”心态使分裂更为加剧。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巴黎的景象》（1781年）一书中用一章描写了“团体的利己主义”：

“团体变得顽固、执拗了。它们声称自己在政治机器的各种关系中要保持孤立和隔绝状态。如今，任何团体都只对那些触及本成员的不公正现象反应敏感，而对非本团体的公民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

国家的结构也同社会结构一样，与民族统一背道而驰。卡佩家族把法国的各省联合到自己的领地周围，从而组成了国家。它的历史使命是赋予国家行政的统一，这也是唤醒民族觉悟和行使王权的有利因素。实

际上，民族与国家处于分离状态，有君主本人的话为证："我们正处在请民族来救助国家的时刻……"这是路易十六1789年10月4日说的话。在18世纪里，国家的组织丝毫没有改善，路易十六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前辈路易十四的机构进行统治和管理。改革结构的尝试在贵族阶级的抵制下归于失败。高等法院、省三级会议和僧侣会议都是贵族阶级势力盘踞的所在。各省、市名为国王的臣属，但始终保有豁免权和特权，这是抵制王权专制主义的堤坝，也是地方主义的顽固堡垒。

专制君主制未能完成民族统一，这与贵族性质的社会结构长期存在是分不开的。这种社会结构与民族统一互不相容。完成王朝的民族统一大业意味着对社会结构，进而对特权提出了异议。这是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路易十六从不能下狠心抛弃"他的忠诚贵族"。贵族阶级的封建和军事心态不仅保留下来，甚至有所加强，这使得大部分贵族处于民族之外，只依附于国王本人。贵族阶级不能顺应潮流，它死抱住偏见不放，自我孤立乃至僵化在唯我独尊之中。与此同时，新的秩序已经在过时的制度框架内开始萌发了。

托克维尔写道："这个贵族等级脱离了中等阶级（指资产阶级），将其从自己内部排斥出去。它也脱离了人民，使之与自己离心离德。贵族等级在民族中已完全陷于孤立，它表面上统领大队人马，而实际上只是个无兵少卒的军官团体。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些，他们就会懂得为什么贵族等级在站立了一千年之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打翻在地了。"

3.君主国家的危机

1760—1788年间君主国家一次次改革尝试都归于失败，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路易十五的麻木不仁及其后任的软弱无能。实际上，这些事件反映了中央国家的发展逻辑与君主制的贵族阶级性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君主及其大部分亲信都受到17世纪的传统和凡尔赛国王崇拜环境的影响和熏陶，他们满脑子专制主义思想，这便使上述矛盾变得更加尖

锐。

一方面，为了使法国现代化，使国家更强盛，王家政府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支持资产阶级的上升。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日益强大，它开始要求在国家领导中有一席之地，要求放松个人专制制度。一些权宜措施便应运而生。实际上，杜尔哥根本不打算把他的行政改革付诸实施。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于1787年7月首次提出，但政府却拐弯抹角地拖延，回避它的召开。其实，为了粉碎贵族阶级对改革的反抗和抵制，国王本应采取强硬措施。虽然资产阶级可能会对此感到不便，但它终归会赞同政府计划。莫普的行动[1]在1772年受到狄德罗的责难，于是在哲学的名义下形成了一个由贵族和第三等级组成的、反对政府专横的联盟，这是个表面化和临时性的联盟。

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贵族的反对，政府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迫使贵族阶级接受改革并与资产阶级达成妥协。然而政府不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首先，国家领导人员几乎全部是贵族出身，古老贵族出身的人甚至越来越多。在18世纪里，进入政府的人都出身名门望族。1773年，在参政院40名成员中有30名贵族，其余的也因官职而受封为贵族，其中还有12人的贵族称号延续了3代以上。其次，专制王朝的基础是建立在贵族阶级和特权上的。因此，国王即便享有神授君权，他的光彩也只有在名门望族组成的华丽宫廷之中才能焕发出来。国王处于万尊之首，他是法国第一绅士和最高封建主，这样，他的权势才更显强大。世袭制约社会等级制度建立在封建所有制基础上，保障着社会秩序。它使国王的意志得以执行，行政管理得以运转，并且使贵族阶级统治下的臣民百姓俯首帖耳。为此，国家机器被赋予保障社会“现状”的职能，主要成为镇压的工具。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贵族阶级的压力使国王在许多情况下与改革计划背道而驰，支持贵族的反动。从1751年起，在军队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旨在把军官职位

留给贵族，甚至是家世悠久的贵族。这种政策自然激起资产阶级的怨恨与不满。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有一部宪法，以便使它能经常性地控制政府。同样，由于国王的改革尝试使他背离了大多数贵族，这些贵族也设想有一部宪法，以使之免受这种灾难性的动荡不安。当然，这两种宪法要求的内容大相径庭。当政府一时间既失去了贵族阶级的辅佐也丢掉了资产阶级的支持时，它便只得作出让步，并且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召集三级会议了。

---

[1] 莫普，路易十五政府的大法官，主张加强专制王权，对高等法院的反抗实行高压。1770年12月，他以御临法院的方式强行注册国王敕令。1771年1月19日夜，他利用密札逮捕和流放了巴黎高等法院中所有敢于反抗国王的法官。这一做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应。——译者

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濒临财政破产和为贵族阶级的对抗所困扰的法国君主制度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召集三级会议上。但是，王权的专制主义原则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抨击：贵族阶级主张恢复它所信奉的王国古老政体，以便参加政府；新思想的拥护者则主张国民有权干预国家行政。对此，王权没有任何具体的行动纲领。它只是随波逐流而不能控制局势。它步步退让，终于被卷进了革命。

1789年的大革命是由第三等级中少数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各个危机时刻，是城乡广大人民支持了革命并推动它向前发展。这些人民群众有时被人称为“第四等级”。借助于同人民的联盟，资产阶级迫使王权批准了一部宪法，从而把主要权力掌握在手。资产阶级把自己与民族等同起来，主张使国王服从法律的统治。“民族、国王、法律”这种理想的平衡仿佛一度实现了。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上，整个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名副其实的君主主义激情中。人们发出庄严的誓言，这誓言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把法国人同他们的国王团结在一起，以便保卫自由、宪法和法律”。但是，在1790年时，民族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拥有政治权利、经济实力和知识优势。

在法律庇护下的民族与国王的团结并不牢固。贵族阶级和王朝都在伺机反扑。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既害怕贵族阶级的复辟又担心人民的奋起，它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1791年6月21日国王的出逃和马尔斯校场的枪杀导致资产阶级分裂为两派。斐扬派出于对民主的憎恨，加强了宪法的资产阶级性质，保留了君主制度，并以此作为抵制人民愿望的壁垒；吉伦特派出于对贵族阶级和专制主义的仇恨抨击王权。战争一发动，它便毫不迟疑地求助于人民，在它看来，战争会使一切困难迎刃而

解。

人民很快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控制，要求为自身利益行动。1792年8月10日革命结束了由立宪派建立的制度。实际上，新生的民族与国王之间的结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国王是旧制度和封建贵族阶级的天然保护者。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 年）

财政危机和贵族反叛迫使王朝召开三级会议。但是，第三等级是否甘愿屈从大多数贵族所作的提议呢？三级会议依旧是封建机构呢，还是经过其努力创造出一个适应经济、社会现实的新秩序呢？……第三等级公开要求权利平等，并着手对旧制度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王权试图用曾经对付贵族的手段粉碎第三等级的反抗，此时贵族已成为王权的盟友了。但是事与愿违：经济危机将人民推向起义，公众的力量突破了国王的控制。继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之后，出现了人民的和暴力的革命。旧制度土崩瓦解了。

Ⅰ.合法的革命（1788年底—1789年6月）

1788年8月26日，路易十六任命内克为财政总监和国务委员。内克并无明确纲领，与其说他在控制局面不如说他是随波逐流。他对政治、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缺乏足够估计，没有充分注意到经济危机足以使资产阶级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农业生产上，不少地区受到了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的侵害。那时的葡萄种植地区远比今天广阔。对许多农民来说，葡萄酒是唯一可出售的产品。葡萄种植区的农民人数众多而集中，面包靠购买，因而有城镇居民的性质。1778—1787年间的生意萧条与价格下跌使众多葡萄农陷于苦难。1789—1791年的葡萄歉收又导致价格回涨。然而生产不足使葡萄农并不能重整家业。此外，1788—1789年谷物价格上涨时，葡萄产区居民，尤其是佃户和短工，因丧失任何积蓄而陷于绝境。葡萄种植与酿造业危机只是总的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1786年法国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导致工业活动减慢。在这个时期，英国工业正在进行设备改造和增加生产能力，而法国工业则刚在恢复元气，甚至在国内市场上都遭到英国的竞争。贸易的危机使局势更为严重化。

1.三级会议的召集（1788年底—1789年5月）

国王从8月8日起允诺在第二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这在第三等级中激起很高热情。在此之前，第三等级始终追随着反叛专制主义的贵族

阶级。但是，自从1788年9月21日巴黎高等法院作出判决，规定三级会议将“正规地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开和组成”后，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的联盟便开始破裂。资产阶级转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希望他能求助于臣民，倾听其呼声。马莱·迪庞在1789年1月写道：

“公众争论的情况大为改变。国王、专制主义与宪法在争论中只占极次要地位，第三等级与另外两个等级之间的战争开始了。”

爱国党领导了反对特权阶级的斗争。它是由法律家、作家、工商业家、银行家这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特权阶级中一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也站到他们一边，其中有大领主（拉罗施富科-利昂库尔公爵、拉法夷特侯爵）或高等法官（阿德里安·迪波尔、埃罗·德·塞谢尔、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公民地位平等、法律和纳税的平等、基本的自由、代议制政府，这些就是他们的主要要求。宣传活动也组织和开展起来，或者是通过个人的联系，或者是通过某些团体，例如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黑人之友”社。咖啡馆成了鼓动的中心，其中有著名的普罗科普咖啡馆。三十人委员会大概是领导爱国党宣传鼓动的核心机关，它授意撰写小册子，还传播一些陈情书的范本。

“第三等级的加倍”是爱国党宣传的基本点：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应该与贵族和僧侣代表的总和一样多，这其中包含着按人头而不按等级表决的意思。内克并无既定政策，他一心只求争取时间和调解各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于1788年11月召集了第二次显贵会议，指望说服他们同意第三等级的双倍代表数。不难预料，显贵们仍然主张按照旧的方式。12月12日，王族亲贵们向国王上呈了请愿书，它堪称贵族阶级的宣言。请愿书对第三等级的主张和进攻予以反击：“有人已经提出取消封建权利……难道陛下能忍心牺牲和屈辱他那正直、悠久和体面的贵族吗？”

然而，特权阶级的反抗却促进了爱国运动的新高涨。巴黎高等法院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它在1788年12月5日的判决中接受了第三等级代表

的加倍。但是巴黎高等法院却不对按人头表决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这个问题才是头等重要的。

内克在1788年12月27日提交给国王的参政院的报告中采取了上述立场。他认为有3个问题值得注意：代表与居民的比例问题、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问题和各个等级代表的遴选问题。在1614年，每个行政区都选出了数量相等的代表，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按比例的公平规则。这样，老方法便不再可取。内克表示赞成比例制。至于加倍问题，再按1614年的方式去做是行不通了，因为从那以后，第三等级的作用大为加强了。他谈道：

“在此期间，万物巨变，流动财富和政府的借债把第三等级与公共财产结合起来。知识和启蒙思想成了人们共有的遗产……许多公共事务中，只有第三等级是行家里手，其中包括：国内国外的商业交易、手工工场的管理、鼓励加工业的最佳手段、国家信贷、货币的生利与流通以及征收捐税、滥用特权和其他许多非它莫属的领域。”

内克最后指出，一旦第三等级的意愿一致起来，并与普遍的公平原则相符合时，它将被称为民族的意愿。因此，第三等级的代表数量应该同其他两个等级代表之和相等。第三个问题是每个等级是否只能在自己内部挑选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内克则主张完全的自由。

作出的决定刊登在《1788年12月27日在凡尔赛举行的国王的参政院会议结果》中。召集三级会议的御旨和选举规则在1个月后，即1789年1月24日公布了。但是，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进行表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选举活动在充满激情和效忠国王的气氛中，同时也是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展开了。失业问题严重。1788年的收成很差，粮荒威胁迫近。1789年初的几个月中“人民的不安”加剧，粮荒引起的骚乱在许多省份发

生。城市人民要求对粮食实行限价。他们有时举行暴动，1789年4月28日巴黎雷维庸彩色壁纸工场工人的暴动就是一例。社会骚动与政治骚动重合在一起，它常常能说明政治骚动的原因。

在教堂里宣布的选举规则声称："陛下嘱望，无论是在王国的边陲还是在最为闭塞的地区，每个人都能确信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转达给他。"

这种嘱望被人当作了把柄。第三等级借此鼓动舆论，政治性论著大量涌现，出版自由在默许下建立起来。小册子、檄文、论著以及法律界人士、教士，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的著作成倍增加。无论在外省还是巴黎，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都受到剖析、批评和重新设计。在阿腊斯，罗伯斯庇尔发表了《对阿腊斯全民的呼吁》；在鲁昂，图雷发表了《告善良的诺曼底人书》；在埃克斯，米拉波发表了《对普罗旺斯全民的呼吁》。

在巴黎，早以其《论特权等级》而驰名的西埃耶斯在1789年1月发表了他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这本书获得了巨大成功："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在此之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求什么？有所作为。"

著名的作家、政论家以及无名的作者纷纷发表评论、公开信、感想录、建议书或规划。塔尔热写了《致三级会议的信》。卡米耶·德穆兰在激烈的檄文《自由法兰西》中，主张建立一个既没有卖官鬻爵，也没有世袭贵族和税收特权的法国："好吧！对，这件好事就要全部实现了，人间的任何势力也不能阻止它。这是哲学、自由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结果啊！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这些宣传作品都出自资产阶级人物之手，反映了有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之所以要打倒特权是由于特权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劳动阶级、

农民、小手工业者的命运并不被他们放在心上。然而，有一些人却关注人民的苦难，例如迪富尔尼的《第四等级的陈情书》所表现的观点。这在当时虽然非常罕见，但却已经预示着：自由派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处于反革命和对外战争的威胁而势将垮台之际，无套裤汉群众将登上政治舞台。

政府制定了一套自由主义的“选举规则”。选区按巴伊管区和塞内夏尔管区划分。特权等级的成员到首府集合，组成僧侣选举大会和贵族选举大会。僧侣选举大会中包括主教、修道院长和参加教士会议的所有教士。他们都属于履行教规的或在俗的教会团体和会门。这些教会团体或会门享有年金，所有教士几乎都拥有薪俸或封地。贵族选举大会则包括一切拥有封地的贵族。参加僧侣选举大会的还有所有教区神甫，这保障了下层僧侣的大多数。第三等级的选举规则较为复杂。组成第三等级的所有居民，包括法国人和加入法国籍者，凡年满25岁以上，有固定住所和在纳税簿上有名者都有选举权。在城市，选举人先按行会集合，不属任何行会的人则按居住区集合。每百名选民中指定1至2名代表，这些代表再组成全城第三等级选举大会，负责选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最后再由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选出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在农村，居民们按教区组成大会，按每200家出两名代表的比例指定出行政管区的第三等级选举大会代表。所有选举大会都起草陈情书。

1789年1月24日的选举规则有利于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代表都是经间接选举产生的：在农村是两级选举；在城市是三级选举。尤其是，选举大会的表决使用点名的方式，在大会讨论起草陈情书之后进行。这样，资产阶级中最有影响、最善于辞令的人（通常是法律界人士）便有把握控制辩论，左右农民和手工业者。第三等级的代表全由资产阶级组成，任何一个农民，任何一个城市人民阶层的直接代表也未能出席三级会议。

选举活动进行得十分缓慢，选举大会的集合是平静的。然而僧侣选举大会却因神甫们的强烈情绪而出现了某些混乱：人多势众的神甫极力主张只选举爱国者为代表。贵族选举大会中存在着对立的两派：乡居贵族和部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领主。第三等级的选举大会充满着庄严、有时甚至是隆重的气氛，尤其是农民的选举大会，它往往是在教堂里举行的。

每个选举大会都起草一份“陈情书”。僧侣等级和贵族等级在各选区各自只有一个选举大会，所以各起草一份陈情书，由本等级代表转递到凡尔赛。第三等级各行政管区的选举大会起草的陈情书是各教区和城市陈情书的融合（城市的陈情书则是各行会和住区陈情书的汇总）。陈情书远非都具有独到见解，许多起草人都是受了本地区流传的小册子的影响。各选区流传着陈情书的范本。在卢瓦尔河地区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到拉克洛《引论》的影响。《引论》是受爱国党的领袖之一奥尔良公爵的要求而写的。有时，同一个显贵、神甫或书记官为几个相邻的教区起草陈情书。某些名人的作用也很显著：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为孚日山区的维施雷起草的陈情书对另外18个起草人都有启发。

保留下来的陈情书有近6万份，这为我们提供了反映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广阔画面。直接来源于人民，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陈情书最富有自发性和独创性，尽管它们往往是根据某种范例写成的或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个人抱怨。总陈情书，即行政管区的陈情书非常值得关注。在总共起草的615份中现存的还有523份。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并没有反映整个等级的看法（教区陈情书中那些资产阶级不感兴趣的条文常常被删掉了），它只代表资产阶级的观点。贵族和僧侣的陈情书的重要特点是：除了少数几份由神甫或教会团体起草外，这些等级没有下层的陈情书。

3个等级的陈情书都一致反对专制主义。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以限制王权；建立一个全国代表机构以表决捐税，制

定法律；把地方行政下放给遴选的省三级会议。三个等级还一致要求重整税收制度，改造司法和刑事立法；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僧侣的陈情书对特权问题保持缄默，对于信仰自由即便不反对也只字未提。贵族的陈情书一般都顽固地维护按等级表决的方式，认为这是保障特权的最好办法。纳税平等虽被接受，但多数陈情书反对权利平等和向所有法国人开放一切职务。第三等级全体要求实现完全的公民平等，废除什一税，取消封建权利。对于这一点，许多陈情书只满足于要求赎买封建权利。

不仅3个等级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冲突，各等级内部也同样有冲突发生。神甫们对主教和教会等级群起而攻，抨击宗教圣职之繁多，强调自己薪俸之微薄。乡居贵族反对宫廷贵族，谴责他们把持国家高位，妄自尊大。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可以反映出不同阶层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细微差别。对于取消公共牧场和分割共有地的各项敕令，反对态度并非一致。在行会问题上，师傅的意见占了上风：在31个城市的行会所起草的943份陈情书中（185份是自由职业者的，138份是工匠和商人的，618份是行业团体的），只有41份赞成取消行会制度。反对取消行会制度的势力在大城市中表现尤为强烈。因为在大城市中，竞争日渐明显，而行会师傅不愿参加竞争。然而，很大一部分陈情书表达了商人和工业家的意愿，包括他们对法英贸易协定恶果的抗议和各生产部门对需求的陈述。

如同在陈情书中的要求一样，选举结果也表明爱国党善于在社会各阶层中争取力量。

僧侣中共选出代表291名，其中200名以上是主张改革的神甫。在这些自由派教士中，南锡行政管区的代表格雷古瓦修士后来最为著名。还有一些高级教长也怀着改革之心来到凡尔赛，如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波尔多的大主教尚皮翁·德·西塞和奥顿的大主教塔莱朗-佩里戈尔。

旧制度的保卫者们则在才华出众的宣传家莫里修士和等级特权精明的卫道士孟德斯基乌修士门下集合起来。

在270名贵族代表中，顽固坚持特权的“特权派”占了上风。其中最反动的并不是出身最高贵的：高等法院参士代普勒梅尼是穿袍贵族的代言人；卡扎莱斯是个龙骑兵军官，出身南方小贵族。贵族代表中还有接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领主。作为哲学家的保护人或信徒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志愿参加者，他们准备与第三等级携手合作。在这90名代表中首屈一指的是拉法夷特侯爵，他在里奥姆好不容易才当选。其次还有诺阿耶子爵、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拉罗什富科公爵和埃吉荣公爵。

第三等级的代表有578名之多，其中近一半是法律界人士，他们在选举中曾大显身手。律师有200名左右，穆尼埃和巴纳夫在格勒诺布尔当选，佩蒂翁在夏特勒当选，勒夏普利埃在雷恩当选，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当选。商人、银行家也不少，有近百名。50多个富有地产主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当选。第三等级代表中还有些是科学家（天文学家巴伊）、作家（沃尔内）、经济学家（杜邦·德·内穆尔）和新教牧师（在尼姆当选的拉博·圣艾蒂安）。最后，第三等级还选举了几个背叛特权等级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如埃克斯和马赛的米拉波、巴黎的西埃耶斯修士。

特权等级来到凡尔赛时已经陷于严重分裂。僧侣与贵族的敌对、乡居贵族与自由派大领主的矛盾使得头两个等级的561名代表不可能团结一致地保卫特权。在他们的对面，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成为整个第三等级的先驱。资产阶级的代表有文化，能力强，为人正派，对本阶级及其利益深信不移。在他们眼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一回事。合法的革命主要是他们的集体成就。

2.合法的冲突（**1789**年**5—6**月）

选举已清楚地表明了全国的意志。但是，王权若要满足第三等级的

意愿就不能不自动让位，并自己拆毁旧制度的社会结构。作为贵族阶级的天然支柱，王权决然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5月2日，三级会议的代表觐见国王。从这时起，宫廷就表现出它执意要保留等级之间的传统差别。对于僧侣代表，国王在议政室单独进行了接见。对于贵族代表是按照惯有仪式公开进行接见的。然而，国王对第三等级代表的接见则安排在寝宫里进行，让他们灰溜溜地列队而过。按照礼仪，第三等级的代表都身着式样单调无华的黑色礼服、丝绸外套和细麻布领带；然而贵族的黑色装束则是佩有金色饰物的短上衣和丝绸外套，还有带花边的领带和亨利四世式的翘羽帽。

开幕式在1789年5月5日举行。路易十六用戚戚哀哀的声调告诫代表们要谨防任何图新精神。敌视新生事物的掌玺大臣巴朗坦接着作了一篇空洞的演说。最后，内克终于在一派肃静中起身发言。然而，他历时3小时的报告只限于财政问题，没有任何政治纲领，也丝毫没涉及按等级还是按人头表决的问题。第三等级的改革愿望深受挫伤，最后闷闷离去。在三级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当晚，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王权已经同意了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它不想再进一步妥协了。然而王权也不敢采取公开支持特权等级的立场。假如当时王权能够满足第三等级的亦即民族的要求，它便会作为民族的王权而获得新生，并且延续下去。但是，王权犹豫不决，错过了这个有利时机。面对王朝的踌躇不前，第三等级开始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了。如果仍保持按等级进行评议和表决，代表的加倍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按等级进行表决无异于第三等级的毁灭，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相反，假如采取共同评议和表决的原则，第三等级坚信下层僧侣和自由派贵族会加入自己一方，使自己拥有绝对多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在1个多月里，它成了三级会议辩论的主题和全国注意力的中心。

从5月5日晚起，同一省的第三等级代表便开始接触。集合于勒夏普利埃和朗热内周围的布列塔尼代表表现得尤为活跃。一种共同的意志应运而生。第三等级的代表在1789年5月6日的讨论中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称号，拒绝按等级组成单独一院。第三等级的头一个政治行动便具有革命的性质：众议院不再承认传统的等级划分。但是，贵族等级以141票对47票否决了按人头表决的方式，并开始了代表资格的审查工作。僧侣等级也仅以133票对114票的多数拒绝作任何让步。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此突出以至有关各方不可能达成相互妥协。或者是贵族（在前两个等级中主要是贵族在起作用）让步，这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时代的开始；或者是第三等级认输，这意味着旧制度将继续下去，三级会议召开所激发的希望归于破灭。众议院代表心里对此很清楚，他们同米拉波一样认为，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就可以使敌人望而生畏”，舆论是支持他们的。僧侣等级在以格雷古瓦修士为首的一部分下层僧侣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动摇。

1789年6月10日，在西埃耶斯的要求下，众议院决定进行最后的交涉。它提出，请代表们来三级会议大厅共同审查代表资格。到那一天，要对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进行总点名。“无论特权等级的代表出席与否”，资格审查工作都要进行。这一敦促于6月12日传达到僧侣等级，它答应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审议第三等级的要求。至于贵族等级，它只满足于宣布将在本等级会议上讨论此事。当天晚上，第三等级着手进行所有应召出席的行政管区代表的总点名，以便共同审查代表资格。特权等级的壁垒开始瓦解了：6月13日，普瓦提埃行政管区的3名神甫在点他们名时答了到。14日又有6名僧侣，其中包括格雷古瓦修士对点名答到。16日答到的又有16人。第三等级感到胜利在望，它决心勇往直前。

6月15日，西埃耶斯请求代表们“立即着手组成议会”。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它能够着手进行国家期待于它的事业。西埃耶

斯建议放弃三级会议的名称，因为它已有名无实，而改用“经法兰西民族承认和审查的代表大会”的名称。穆尼埃较尊重法规，他建议的名称是：“由国民大多数代表所组成的、在少数人缺席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合法大会”。米拉波主张用一个直截了当的提法：“法国人民代表”。最后，西埃耶斯选择了贝里代表勒格朗的提议：“国民议会”。1789年6月17日，众议院以490票对90票的多数通过了西埃耶斯的提案，发布了“关于建立国民议会的声明”。紧接着，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关于保障税收和公债利息管理的法令。这样，第三等级代表便以国民议会自居，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立宪派资产阶级曾申明征税应得到国民的同意，这是含蓄地用纳税人罢缴威胁政府。而后，它又对国家的债权人进行安抚。这些做法意味深长。第三等级的态度削弱了僧侣的反抗，使它首先让步。6月19日，僧侣以149票对137票通过决议：在全体大会上对自己的代表资格进行最后审查。同一天，贵族向国王呈递一份抗议：“假如我们保卫的权利纯粹属于我们自己，假如这些权利只关系到贵族，我们便不会以这样大的热忱去争取之，不会以这样的坚韧性去维护之。陛下，我们所保卫的不只是我们的利益，这也是您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这归根结蒂也是法国人民的利益。”

在贵族反抗的鼓舞下和亲王们的影响下，路易十六决心负隅顽抗。6月19日，参政院决定取消第三等级的决议。为此，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国王将要在会议上宣布他的旨意。在此之前，为了防止僧侣等级按照它的决议与众议院合席，国王借口进行必要的修缮下令关闭了三级会议大厅。

6月20日清晨，第三等级的代表发现默尼大厅四门紧闭，他们便在吉约坦代表的指引下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大厅。大会由巴伊主持。穆尼埃宣布：“国民代表们的权利与尊严遭受了侵犯，他们百倍警惕一切险恶阴谋和唆使国王采取有害措施的企图。因此，他们应该以一项庄严的誓约把自己同公众命运和祖国利益结合起来。”

在一派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所有代表（除一人外）都参加了“网球场宣誓”，坚定地表明了众议院的改革意志：众议院决心“在制定宪法并使其建立在牢固基础上之前决不解散，并根据情况在任何地方集会”。

原定于6月22日举行的御临会议被推迟到第二天，为的是拆除会场上的公众席，防止发生示威。这一间隙被众议院所利用。22日，僧侣等级执行了19日的决议，与在圣路易教堂议事的第三等级汇合一处。多菲内的两名贵族代表也加入进来，受到最热烈的鼓掌欢迎。贵族等级是否也将让步呢？

1789年6月23日的御临会议是国王和贵族的一次失败。路易十六旨令3个等级分院议事，并撤销了第三等级的决议。他同意税收平等，但特意保留了“什一税、封建领主的地租和权利”。国王最后威胁道：“如果你们在这项如此美好的事业中背弃我，我将单独为我的人民谋求福利。我现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并于明晨在为各等级准备的大厅继续讨论。”

第三等级原地不动。贵族等级和一部分僧侣离席而去。第三等级对司仪官重申国王命令不予理会，它再一次阐明以前的决议，并宣布其成员不可侵犯。第三等级比在6月20日走得更远，它公开反叛王权。国王一度打算动用武力，他命令御林军驱散代表。归附于第三等级的贵族代表表示反对，拉法夷特等人扶剑在手。路易十六终于不再坚持。第三等级控制住了局势。

从此以后，第三等级节节取胜。6月24日，大多数僧侣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合为一体。第二天，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47名贵族代表也效法此举。国王决定对他未能阻止的做法加以认可。6月27日，他写信给那些少数僧侣和大多数贵族，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

1789年6月23日这一天标志着大革命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路易十

六本人在御临会议的声明中已经接受了由三级会议表决税收，还批准了保障个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承认立宪政府的原则。命令三个等级合庭议事，国王便走上了新的让步道路。从此以后，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代表的控制之下。但是，国民议会的目的是在合法地摧毁旧制度之后重新进行建设。7月7日，国民议会创立了一个制宪委员会，7月9日，它又自行命名为国民制宪议会。合法的革命在未求助暴力的情况下大功告成。但是，当国王和贵族似乎接受了既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决定诉诸武力，以迫使第三等级屈服。

Ⅱ.人民的革命（**1789**年**7**月）

1789年7月初，合法的革命已告完成。由于第三等级和下层僧侣代表与贵族自由派之间的联盟，民族主权在法律上取代了王权专制主义。人民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反革命的威胁之下，人民的介入使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王权和贵族等级看来，动用军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路易十六在他命令特权等级加入国民议会的前一天就决定把2万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宫廷的目的在于解散国民议会。

从5月份以来，人民群众一直十分警觉。全国都关注着凡尔赛的动态。代表们定期向选民们汇报政治情况。这期间仍然是资产阶级起着主导作用。在巴黎，进行过代表提名的407名选举人于6月25日集会，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市政府。在鲁昂和里昂，陷于瘫痪的旧市政府中加入了选举人和显贵。地方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当宫廷明显要动武时，至少有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设法组织抵抗。出于这个政治目的，他们发动了巴黎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整个革命时期，这些小资产阶级都是起义的骨干力量。帮工和工人跟随他们行动。三级会议的召开在这些群众中激发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希望。然而贵族阶级却处处阻止这种革新。贵族起初反对第三等级代表的加倍，后来又反对按人头进行表决。这些都加深了一种看法，即贵族将会顽固地保护它的特权。于是，产生了存在某种“贵族阶级的阴谋”的想法。非常自然，人民主张在贵族尚未

发动进攻时，先发制人地投入反对民族之敌的斗争。

经济危机促进了群众的发动。1788年的收成特别坏。从8月份起，面包价格开始上涨。内克下令从外国购进粮食。在葡萄产区，由于1778年以来的滞销危机，种植者对面包涨价更为敏感。酒价则下跌到最低水平。收成不佳和产品滞销产生了同一后果：群众的购买力下降。农业危机接着又波及到工业生产，而工业生产在此之前已经遭受着1786年贸易协定的不良影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同时，失业现象大为加剧。在生产停滞或萎缩的情况下，工人们争取不到增加工资。1789年，巴黎一个工人每天挣30至40个苏。7月份每磅面包卖4个苏，在外省可卖到8个苏。人民把饥荒归咎于征收什一税者、收取实物地租的领主以及搞粮食投机的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征调和限价措施。饥荒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骚乱自1789年春天已发生过多起，到7月份则成倍增加。此时正值收获前夕，危机已经发展到顶点。

在人民心目中，贵族的阴谋和经济危机是紧密相联的。他们谴责贵族囤积粮食以向第三等级发难。于是群情慷慨激昂起来。人民不再怀疑，国王准备以暴力驱散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国民议会。爱国者揭露政府企图挑动巴黎人闹事以便使集结在首都四周的军队，尤其是外籍兵团进兵。马拉在1789年7月1日发出了一篇题为《告人民书或大臣们已暴露无遗》的檄文：

“啊，我的同胞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注视着大臣们的行动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解散我们的国民议会，他们唯一的手段是发动内战。大臣们在挑动骚乱！……他们在你们周围安置了由士兵和刺刀组成的可怕机器！……”

1.巴黎的暴动：**7**月**14**日和攻克巴士底狱

国民议会对形势的严重性不可能视而不见。7月8日，根据米拉波的报告，它决定向国王呈交一份请愿书，要求调离军队：“为什么一个受2

500万法国人爱戴的君主会不惜耗费巨资，调几千个外国兵来维护王座呢？”7月11日，国王通过掌玺大臣回答说，军队只是用来镇压，更确切地说是预防新的骚乱的。路易十六在当天便把内克解职，召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布勒特伊男爵为大臣，同时任布罗格利元帅主持军政，这使形势急转直下。巴黎人民的干预挽救了束手无策的国民议会。

7月12日下午，内克被解职的消息传到巴黎，像灾难一样降临在人们头上。人民预感到，这只是朝反革命道路上所走的第一步。对食利者和金融家来说，内克的去职无异于新的财政破产已经临头。经纪人马上汇集到一起，并决定关闭交易所以示抗议。在一天里，贴现银行的股票下跌了100锂：从4 265锂下降到4 165锂。游艺场所全部关闭了，还出现了一些自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在鲁瓦亚尔宫，卡米耶·德穆兰对人群发表了鼓动演说。一队示威者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与朗贝克亲王统领的王家德意志禁军发生了冲突。消息传来，警钟长鸣，军火商店被一抢而空，人民开始武装起来了。

7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它对内克和被解职的大臣们怀有“敬意和挽惜之情”，并宣布现任大臣们应对当前的局面负责。然而，国民制宪议会在武力的威胁面前仍处于束手待毙的境地。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形成。7月10日，第三等级的选举人再一次在巴黎市政厅集会，表示了“尽早使巴黎城建立起一支资产阶级自卫军”的意愿。在12日晚一次新的会议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并于13日清晨发布。该决议的第3条提出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第5条提出了一项设想：“各区制定一份包括200名知名的和能够使用武器的公民名单。这些人将组成一支‘巴黎民兵’部队，保护公共安全。”这实际是一支“资产阶级”民兵，用来保卫一切有产者，使之不仅能抵御王权及其军队的逞凶，而且能防止那些被视为危险因素的社会阶层的威胁。7月14日上午，巴黎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宣称：“资产阶级民兵的建立和昨天

采取的措施使全城一夜平静无事。资产阶级民兵曾连续解除了一些自行武装者的武器，并使他们遵纪守法。”

7月13日白天，动乱再度兴起。人们成群结队在巴黎四处穿行，寻找武器，并威胁要搜查贵族们的府第。他们还开沟挖壕，修筑街垒。蹄铁铺的工人们从清晨就开始锻造枪矛。然而人们所需要的是火器。人群曾向巴黎行政官索取，但一无所获。下午，受命撤出巴黎的法兰西保安军拒绝服从命令，并转到市府帐下听候调遣。

7月14日，人们要求全面武装。为了得到武器，人群涌向残废军人院，在那里夺取了3.2万支枪，而后又直奔巴士底狱。巴士底狱的围墙高30米，护城河宽25米。尽管守卫它的只有30名瑞士雇佣兵和他们带领的80名老弱残兵，人民的进攻却对它奈何不得。市郊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得到了法兰西保安军和相当数量资产阶级民兵的增援。资产阶级民兵拉来了5门大炮，其中3门对准城堡的大门轰击。这一决定性的行动迫使要塞司令洛内投降，他下令放下吊桥，人民一拥而入。

在凡尔赛的国民制宪议会一直焦虑不安地关注着巴黎的事态。14日这一天，有两个代表团被派去要求国王作出些让步。不久便传来了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路易十六将何去何从呢？压服巴黎必须要经过艰苦的巷战。包括利昂库尔公爵在内的一些自由派大领主劝说国王：为了王权本身的利益把军队调开。路易十六决定等待时机，遂于7月15日亲赴国民制宪议会宣布撤离军队。

巴黎的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的胜利夺取了首都的行政权力。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改名为巴黎“市府”，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巴伊当选为市长。拉法夷特被任命为资产阶级民兵即不久后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国王不仅于7月16日同意重新召回内克，而且还在17日来到了巴黎，从而实现了进一步的退却。国王以亲赴巴黎的举动对7月14日起义的结果加以认可。在市政厅，他受到巴伊的欢迎。巴伊向他呈交了象

征“君主与人民之间庄严、永恒联盟”的三色帽徽。路易十六神情激动，费劲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人民可以永远信赖我对他们的爱戴。”

贵族深感君主的大势已去，其首领宁可流亡国外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阿尔图瓦伯爵于7月17日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孔代亲王以及全家不久也步他后尘；波利尼亚克公爵夫妇去了瑞士；布罗格利元帅投奔了卢森堡。流亡运动开始了。

1789年7月的这几天过后，王权被大大削弱了，而巴黎的资产阶级却强盛起来。它成功地在首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迫使国王承认它的至高无上。7月14日固然是资产阶级真正的胜利，但它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天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兴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标志着以巴士底狱为代表的旧制度彻底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7月14日这一天为所有被压迫人民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2.城市的暴动（**1789**年**7**月）

借助代表们的书信联系，外省也同首都一样以焦虑的心情关注着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斗争的进展。内克被解职在外省激起了与巴黎同样的波动。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自近而远，从16日至19日传遍全国，激发起高昂的热情，并使自7月初以来在某些城市出现的运动加速发展起来。

“市政革命”实际持续了一个月。7月初，在鲁昂出现了由粮食短缺引起的骚动，继而发生市政革命。到8月，奥施和布尔日也实现了市政革命。在第戎，市政革命的爆发是由内克被解职的消息引起的。蒙托邦的市政革命则是由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激发起来的。

市政革命的彻底程度因地区而异，它们的特点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的革命很彻底：有的旧市政府被暴力推翻（如在斯特拉斯堡）；有的城市虽然保留了旧市政府的职能，但把它置于一个委员会中，使它处于少数地位（如在第戎和帕米埃）；还有的城市把市政府的权能压缩

为“一般警察”，由一个委员会负责革命事务（如在波尔多）或对行政进行经常性干预（如在昂热和雷恩）。另一些城市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旧政权与革命政权同时并存。例如在诺曼底的某些城市，瞻前顾后的态度很突出。有时，这种二元现象反映了不同因素之间的对立，任何一方也不能完全战胜对方。这种对立在麦茨和南锡表现为社会对抗，在蒙托邦和尼姆则表现为社会对抗加新旧教徒之间的宗教敌对，在利莫日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对立。还有一些城市的市政革命之所以不彻底是由于只取得了一时胜利，例如在里昂和特鲁瓦。那里的爱国者在7月份获胜后又被旧制度的反攻所打败。最后，还有部分城市始终没发生过市政革命。这或是由于旧市政府得到了爱国者的信任（如在图卢兹），或是由于旧市政府拥有军队和法院的支持（如在埃克斯）。市政革命的不同表现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有关系。在弗朗德勒地区，运动的规模很小。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具有政治性；人民提出的要求具有社会性。这两种要求提出的时间不相吻合。总的看来，市政革命在北部和南部表现得不很显著。这些地区的城市往往以资产阶级为主导，或是设置执政官之地。另外，城市公社传统比较牢固。在塔布和图卢兹，旧市政人员基本能够代表市民的各个阶层，因而爱国者们无需排除他们。在波尔多和蒙托邦却相反。在那里，君主制早已把公社自治消灭殆尽。因此，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市政官员被一扫而光。

随着市政革命而产生的国民自卫军同样具有多样性。最常见的是：新的市政委员会仿效巴黎的做法，急忙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便维持秩序。有的城市（如昂热），国民自卫军是由旧市政府创建的，而后由这个更具有爱国倾向的自卫军施加压力，促成市政委员会的建立。在图卢兹，没有经过市政革命就组成了一支国民自卫军。在阿尔比，自卫军则只是旧制度下早已存在的民兵的变种而已。

无论这场市政革命的形式如何，其后果在各地都是同样的：王权消逝，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监察官都弃职而去，捐税的征收暂告

停止。当时有一个人写道："国王没有了，高等法院没有了，军队、警察都没有了。"各新市府接管了政权。长期饱受专制主义刁难的地方自治得到了自由发展，城市生活重新活跃起来。整个法国都市营化了。

市政革命在许多地区的社会表现值得重视，它是由贫困和生活必需品昂贵所引起的。城市人民期待废除间接税和对粮食贸易实行严格管理。在雷恩，新市府上任后马上担负起寻找小麦储备的职责。在冈城，为了平息众怒，市政官员下令降低面包价格。然而他们也组织起资产阶级自卫军以防不测。在蓬图瓦兹，一场因粮食引起的起义被从巴黎撤回的一团军队所制止。在普瓦西，一个被怀疑搞囤积居奇的人成为人民骚动的众矢之的，多亏一个国民议会代表出面才使他得以活命。在圣日耳曼昂莱有一个面粉场主被人杀死。另外，弗朗德勒地区的关卡办公处被洗劫一空。7月26日，凡尔登的起义人民焚烧了入市税征收处的围栏，并使一些被怀疑储藏粮食的房舍受到威胁。军区长官恳请资产阶级组成城镇民兵以恢复秩序，然而他也不能不作出让步，降低面包价格。在流亡路上的布罗格利元帅恰巧落入这场急风暴雨的包围。多亏卫戍部队的帮助，他才从人民的狂怒中逃脱出来。

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确实加重了外省的紧张气氛。任何风吹草动都显得可疑。运输受到监视，马拉客车遭到盘查，外出或流亡半路的大人物被扣留起来。在边界一带流传着外国入侵的消息：皮埃蒙特人准备进犯多菲内！英国人就要占据布雷斯特了！全国上下都在焦虑地等待。不久，大恐惧发生了。

3.农村的暴动：大恐惧（**1789**年**7**月底）

在选举过程中，农民曾经历过一个慷慨激昂的时期。当各等级间的冲突进行时，他们多少有些焦急地等待着人们对自己所倾诉的苦衷作出答复。资产阶级已经通过一场骚乱夺取了政权。农村的人民难道还要再等待下去吗？他们的要求还没有一条得到满足，封建制度依旧存在着。

同在城市中一样，“贵族的阴谋”这种提法也在农村传播开来。

经济危机使不满情绪更加强烈。饥荒令人不堪忍受，许多农民的收成不足糊口。工业危机波及到那些乡村工业普遍的地区，失业大大增加。失业与饥荒使乞丐和流浪者数量猛增。春天，这些人成群结帮地出现。“对强盗的恐惧”加剧了对贵族阴谋的担心。经济危机使受苦人的数量增多，使农村更加不安全。同时，它也激发起农民的愤怒，促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领主。

土地暴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整个春天，在普罗旺斯、康布莱齐、庇卡底、甚至巴黎和凡尔赛近郊等地区都发生过骚动。7月14日的事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诺曼底的博卡日、在诺尔省的斯卡普河附近至桑布尔以南，以及在弗朗什-孔泰和马孔总共发生了4起暴动。这些土地暴动首先是针对贵族阶级的，农民们要求废除封建捐税。为达此目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城堡连同贵族的档案文书一起焚毁。

1789年7月底，“大恐惧”使这种反抗运动形成不可抗拒的浪潮。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并且，它越是沿村广泛流传越是不断产生新的反响。土地暴动、经济危机、贵族的阴谋、对强盗的惧怕，所有这些现象的后果汇集到一起，造成一种恐慌的气氛。流言蜚语在惊恐万状的人们中不胫而走：匪帮在渐渐逼近，他们割走未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为了应付这些想象中的灾祸，农民们用长柄镰刀、木叉、猎枪等武装起来。报警的钟声使险情越来越近，恐慌的波及面则越来越广。

国民制宪议会、巴黎和报界对此感到震惊。米拉波在第21期《普罗旺斯邮报》上撰文，怀疑传播这些假警报是自由的敌人所为，并建议人们保持镇定与谨慎：

“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没有什

么比这更使观察家感到震惊。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最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于是，这些传言便编造出行凶事件，以阴暗的恐怖刺激人们的想象。我们宛如一群孺子，越是可怕的故事越是认真去听……”

最初的恐慌发生在6个地区：农民暴动之后的弗朗什-孔泰、香槟、博韦齐、曼恩、南特地区和吕费克地区。从7月20日到8月6日，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很快发展到法国大部分地区，只有布列塔尼、洛林与阿尔萨斯以及埃诺未遭波及。

大恐惧助长了农民暴动。这些恐怖的夸张性实际上很快就暴露无遗了。然而农民仍然保持着武装。他们不再去追寻想象中的强盗，而是涌向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让他们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以及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化的契据，并把这些文件在村子的广场上付之一炬。有的领主拒绝交出文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绞死。比较常见的做法是让当地的公证人出面，以证明封建权利是按照规定手续自动放弃的。长期剥削造成的苦难、贫困和生活费用昂贵，饥饿引起的不安，一阵阵夸大其辞的传言，对“盗匪”的恐惧以及对摆脱封建压迫的向往，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大恐惧的气氛。大恐惧之后的农村改变了面貌。土地暴动和农民起义把封建制度打翻在地。农民委员会、乡村民兵纷纷建立起来。如同巴黎的资产阶级武装起来夺取市行政权一样，农民们也把武装和地方政权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敌对很快就出现了。和贵族一样，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他们感到，恐慌之后出现的农民起义对其既得利益构成了威胁。在当局陷于瘫痪，权威废除殆尽的情况下，他们便起来自己保卫自己。各新市政府的常设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担负起在农村保卫贵族和资产阶级地产主权利的职责。对农民的镇压往往是血腥残酷的。在马孔，

农民团伙与资产阶级民兵之间发生了战斗。在社会革命的威胁面前，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些有产阶级的联盟开始形成，其矛头针对那些为争取土地自由而斗争的农民。阶级斗争的这种表现在多菲内尤为明显。那里的资产阶级支持贵族，而人民的同情心却向着起义农民。但是，对农民的镇压并没能改变大恐惧的主要结果。经过1789年7月的农民起义，封建制度再也没能保存下来。

国民制宪议会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但它既无能为力又心慌意乱。它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资产阶级产业主。他们将承认农村新局面的合法化呢，还是拒绝任何让步，不惜在资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呢？

III.人民革命的后果（1789年8—10月）

1. 8月4日之夜和人权宣言

对于农村发生的暴动，国民制宪议会一度想要组织镇压。8月3日，它讨论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法令草案。法令草案指出："国民制宪议会了解到有人拒不缴纳地租、什一税、年贡、领主捐和其他捐税。有人手持武器，施行暴力，构成犯罪。他们闯入城堡，夺取契约文书，并在庭院中焚烧……故此，国民制宪议会宣布：在国民制宪议会对各项捐税正式作出决定之前，无论以何理由停缴租税和其他贡赋均属非法。"

但是，国民制宪议会认识到镇压政策的危险性。把统率镇压力量的权力交给王家政府，这对国民制宪议会没有任何益处。政府很可能利用这种力量从事反对国民代表的勾当。尽管立宪派资产阶级对组织镇压犹豫不决，但它又不可能看着贵族被剥夺而不担心自己的财产。于是，它同意作出某些妥协。它承认封建权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所有权，往往是强取豪夺来的，因此对土地捐税的契约文书进行审查是合法的。然而巧妙之处在于：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一名自由派贵族——全国最大的地产主

之一埃吉荣公爵负责。他的干预使特权等级陷于一片恐慌，同时也刺激了自由派贵族的好胜心。这样，革命的资产阶级领袖便迫使国民制宪议会从个人既得利益中解脱出来。

经过这样的准备，8月4日夜晚的会议一开始，诺阿耶子爵便首先发言。作为没有财产的幼子，他建议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埃吉荣公爵对他表示热烈支持。这些建议由于大都是让贵族作出象征性而不是实际的牺牲，所以在一派激情中被通过了。此头一开，所有等级特权、省和城市的特权都相继被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作为牺牲了。狩猎权、养兔权、养鸽权、领主司法权、卖官鬻爵制统统被宣布废除。在一个贵族的建议下，僧侣等级放弃了什一税。第二天凌晨2点钟左右，在这场辉煌宏大的、与过去决裂的仪式结束时，大会宣布路易十六为“法兰西自由的重建者”。专制王权未能实现的国家行政与政治统一现已大功告成。旧制度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实际上，8月4日作出的牺牲主要是迫于形势压力所作的让步，并非自愿地满足农民要求。首先要在外省恢复秩序，平息动乱。米拉波在《普罗旺斯邮报》第26期（8月10日）上写道：“国民议会8月4日以后的一切工作都旨在恢复王国内的法律权威，向人民担保幸福，使其立即享受到自由带来的最初好处，以便缓和他们的不安情绪。”

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经通过，只差形成文件。当需要把这些决议具体化时，国民制宪议会则力图在实践中削弱那些在人民暴动推动下所采取的措施的影响。曾一时沉浸在激情之中的反对派们也开始恢复了镇静，尤其是僧侣，它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国民制宪议会完全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在最终的法令里却塞进了一些特殊的限制。强加于人身的权利被废除了，但依附于土地的权利被宣布可以赎买。这意味着承认征收封建捐税是以领主和租地农民之间以前所订契约为依据

的。农民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他们不久便察觉到这些特殊的限制。在完全赎清土地之前，他们仍须缴纳地租。

国民制宪议会在规定赎买方式时条件限制更苛刻。它不要求领主出示其土地权利的任何证明，也不要求他们出示其祖辈与农民订立的任何契约凭据。这样，农民或是由于过于贫穷而不能赎买封建权利和解放其土地，或是由于限制条件太苛刻，即便他们较富裕也不能赎买。于是，封建制度虽然在理论上被废除了，但其主要部分依然保留着。农民群众大失所望，不止一个地方组织起了反抗活动。农民达成某种默契，拒绝缴纳捐税，骚动再一次出现。国民制宪议会的目的并不因此而动摇，它坚持把自己的阶级立法贯彻到底。只是待到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的表决之后，农民们才得以看到8月4日之夜和废除封建制法令的真正结果。

尽管如此，8月4日之夜的结果（由8月5—11日的一系列法令所确认）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民制宪议会摧毁了旧制度，等级差别、特权、地方主义被一扫而光。从此以后，所有法国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可以从事任何职业，缴纳同样的捐税。国土实现了统一，旧法国重叠的框架被拆毁，地方习惯法和省、市特权也不复存在了。国民制宪议会完成了破旧工作，下一步的问题是立新了。

从8月初起，国民制宪议会将此作为主要任务。在7月9日的会议上，穆尼埃以制宪委员会的名义说明了新宪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并声明有必要在新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一部好的宪法应该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并保护人权，应该承认自然正义所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应该重申形成各种社会基础的一切原则。宪法的每一条款都应成为一项原则的结论……这项宣言应该简短、易懂、明确。"

8月1日，国民制宪议会重新举行讨论。由于对起草权利宣言的必要性问题意见不一，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开展了辩论。几个发言人怀疑搞这样一个宣言是否合适。一些温和派，如马卢埃被动乱吓怕了，他认为制

定宣言毫无用处，甚至是危险的。其他人，如格雷古瓦修士希望在权利宣言之外再补充一个义务宣言。8月4日早上，国民制宪议会做出决议：将在宪法前面加上一项权利宣言。宣言的讨论进展缓慢。草案中有关思想自由和尊重公众宗教信仰的条款经过了长时间反复辩论。僧侣代表坚持要求国民制宪议会确认一种国教。米拉波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主张信仰和宗教自由。1789年8月26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宣言对特权社会和君主制的弊端进行了不明言的宣判。故此，它成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同时，它也吸收了哲学家们的理论，表达出资产阶级的理想，奠定了—个新的社会秩序的基础。这种新秩序似乎不仅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可行的。

2. 9月的危机：**“**显贵革命**”**的失败

在几个星期里，国民制宪议会承认了人民暴动的结果，它以8月4日之夜的那些决定摧毁了旧制度，以人权宣言开始重建大业。然而，1789年9月的危机却表明：法国的新生并非轻而易举。

财政困难依旧未解决。在凯旋气氛中重任大臣的内克也一筹莫展。捐税征收不上来，一项数额为3 000万锂的公债被抛出后，20天中只有200万被认购。内克彻底失去了民心。

政治困难也加重了。国王对国民制宪议会实行消极抵抗，他虽然在起义面前投降了，但他并不打算批准各项法令；“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8月5—11日的法令、人权宣言都没有得到批准：制度的改造仍然悬而未决。除了一场新的人民运动，什么也不能迫使国王批准法令和人权宣言。

制宪过程中的困难使国王在反抗中受到鼓舞。人权宣言通过后马上开始讨论宪法，人权宣言成为宪法的序言。在讨论中分裂加深了，变得

无法弥补。人民起义及其结果使一部分爱国党人深感不安，他们打算从此制止革命发展，加强国王和贵族的权力。制宪委员会的报告人穆尼埃和拉利-托朗达尔建议仿照英国，创立一个由国王任命并可以世袭的上院，它将成为特权阶级的堡垒。他们主张国王拥有绝对“否决权”，能取消立法部门的决议。主张建立上院和国王绝对否决权的代表被称作“王政派”或“崇英派”，他们的愿望同“显贵的革命”趋于一致。

一些爱国派代表强烈反对这种建议。西埃耶斯表示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否决权”：

“一个人的意志不应压倒普遍的意志。如果国王能够阻止法律形成，他个人的意志就会压倒普遍的意志。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立法权应该独立于行政权。绝对的或搁置的否决权不过是反对普遍意志的密札而已。”

在巴黎，舆论警觉起来了。常去鲁瓦亚尔宫的人们曾试图向凡尔赛进发，以左右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他们表决了一项提案：“否决权不应属于一个人，而应属于2 500万人。”8月31日，他们派出一个代表团来到市政厅，受命要求召开由各县参加的大会，“以便作出如下决议：在各县以至各省的代表发表意见之前，国民制宪议会应中止关于否决权的讨论。”

以巴纳夫、迪波尔、亚历山大和夏尔·德·拉梅特为首的大多数爱国党人反对设立上院。9月10日，建立两院制的提案以849票对89票遭到否决，右翼投了弃权票。爱国党在国王的否决权问题上稍微灵活些。巴纳夫建议授予国王搁置的否决权，以两届立法议会为有效期。9月11日，搁置的否决权以575票对325票被通过。爱国党领袖们做出这种让步是打算使路易十六批准8月的各项法令。然而国王坚持己见，这使爱国党人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

实际上，经济困难促进了巴黎人民的再次动员。流亡者们携走了一切能带的金钱，因而流亡运动使大量货币流出法国。不仅如此，流亡运动还影响了巴黎的奢侈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失业增加而面包仍然昂贵：每磅3个苏以上。收割的谷物还没有打完。到9月份，面包商门前出现了长龙，工人们开始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或得到工作。鞋铺伙计们也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集合，他们确定工资额，推举一个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的利益，并筹集份子钱接济失业的同行。国民制宪议会在解决粮食流通的问题上软弱无能，巴黎市政厅对首都的生计和供应漫不经心。这些都促进了形势的恶化。马拉在《人民之友报》第2期上指出了市府给养委员会的责任：

“今天（9月16日，星期三），饥荒引起的恐怖再次出现。人民缺少面包，面包商的店铺处于人们的包围之中。在获得了最好的收成之后，甚至在富足的环境中，我们却处于饿死的边缘。不用怀疑，我们已被那些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的叛徒团团包围了。我们之所以遭此灾难不正是由于民众公敌的疯狂、垄断者的贪婪、行政官吏的无能与不忠吗？”

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使政治动乱不断扩大。在巴黎，60个区议会管理着各区，并形成各区的人民俱乐部。鲁瓦亚尔宫成了政治活动分子的总部。爱国者的报刊也发展起来。从7月份以来，定期印行的有戈尔萨的《从巴黎到凡尔赛邮报》、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9月，马拉创立了《人民之友报》。爱国者的政论家们以出版小册子和檄文向人民揭露贵族阶级扼杀自由的计划，说明必须把高级教士和贵族从议会中清除出去。因为他们原是旧制度下各自等级的代表，已没有资格代表国民了。卡米耶·德穆兰发表了《路灯对巴黎人的讲话》。他把沙滩广场上的路灯拟人化，赋予语言的天禀。7月里，在这个路灯的铁支架上曾从速执行了几次死刑。匿名的檄文与日俱增，表达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其中有一篇很有意味，题为《1789年9月的为什么》。

9月底，革命再一次处于危急之中。国王始终拒绝批准八月法令。他开始了进攻的准备，重新把军队集结于凡尔赛。巴黎人民的干预第二次挽救了国民制宪议会和新生的自由。实际上，从9月起，当感到革命与旧制度之间一场激烈冲突已势不可免时，议会左翼代表、巴黎记者、区活动分子等爱国者便准备粉碎国王和王政派的顽固反抗了。他们筹划再发动一次起义，让巴黎人民重新表达自己的意志。马拉在10月2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吁请巴黎人赶在冬天给他们增加痛苦之前采取行动。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在第3期上发表的文章更为激烈：

"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 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蹂躏。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

在爱国者们的思想中酝酿出一个设想：如果国王来到他善良的巴黎人民中间，周围陪伴着国民的代表，他就会排除贵族阶级的影响，革命的命运将会得到保障。当人民处于警觉状态时，一个小事端也足以引起骚动。

3. 1789年10月的日子

关于10月的日子，其深刻原因在于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后果的相互交织。但引起它爆发的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事端：御林军的宴会。1789年10月1日，御林军军官在凡尔赛宫举行宴会，欢迎弗朗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呵，理查，呵，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你"的乐曲。宾客们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白色帽徽和象征王后的黑色帽徽。

两天以后，消息传到巴黎，人民被激怒了。10月4日星期天，街上聚集了不少人群。在无比激昂的气氛中，鲁瓦亚尔宫表决了一项接一项

的提案。爱国派记者们对贵族的这种新阴谋予以严厉谴责。在《国民之鞭》上刊有这样的段落：“从星期一以来，善良的巴黎人想尽办法也搞不到面包了。只有‘路灯先生’才能给他们弄到面包。然而他们却对这位善良的爱国者不屑一顾。”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

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然后，她们在门房文书马亚尔的带领下，决定去凡尔赛。其队伍共有六七千人。马亚尔是“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这支志愿军是由7月14日的战士们按军队编制组成的。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各区都集合起来。国民自卫军涌向沙滩广场，高喊着：“到凡尔赛去！”拉法夷特被迫担任了总指挥。在5个小时里，有近2万男子也走上了去凡尔赛的路。此时，巴黎的妇女已到达凡尔赛，并派一个代表团去国民制宪议会，然后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都允诺给她们小麦和面包。国民自卫军10点钟后赶到了凡尔赛。国王为了使反对者平息下来，便正式通知国民制宪议会他同意批准各项法令。于是，人民运动保证了爱国党的成功。

10月6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凡尔赛宫，一直深入到王后住所的候见厅。人群和御林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斗殴。国民自卫军不慌不忙地前来制止，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同意和拉法夷特一起在廊台上露面。人群起初犹豫不决，后来便向他们欢呼起来，但同时也喊道：“到巴黎去！”路易十六让步了。国民制宪议会在被征求意见时声称，它与国王本人是不可两分的。1点钟，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国民自卫军在前头开路，妇女们护送着装载麦子、面粉的车辆，排成庞大的行列紧跟其后。然后是部队，再往后则是国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马车，拉法夷特策马于车门左右。在国王后边是100名左右议会代表所乘的车辆，其后又是由人群和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行列。晚上10点钟，国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路易十六到达巴黎后，国民制宪议会也毫不拖延地随他迁来。12日，它暂时进入总主教府办公。专为它保留的马内日大厅

正在整修。

1789年10月的人民行动日使各党派的处境发生了变化。王政派作为从8月份以来的反对党成了最大的失败者。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并撤出了战斗。穆尼埃、马卢埃等人加入了第二批流亡者的潮流。他们是“显贵革命”的拥护者，当他们认为革命威胁到有产阶级的利益时就企图制止革命运动。直到执政府的稳定时期，他们才得以看到自己理想中的制度建立起来。

对于许多爱国者来说，正如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1期中所表示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全体公民与他们的国王同心同德地完成国家复兴大业了。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没有陷入过分的乐观之中，例如马拉。他在《人民之友报》第7期中写道：

“对于善良的巴黎人来说，终于掌握了他们的国王，这是值得庆祝的：国王在场可以使局面迅速改变，可怜的人民将不会死于饥饿。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宪法完全确立下来前使国王全家生活在我们之中，那么这种幸福将只能是一场黄粱美梦。《人民之友报》与它亲爱的同胞共享欢乐，但是它决不自我陶醉。”

1789年7月到10月的事件以及国民制宪议会在重建国家中所遵循的精神实际上都证明爱国者们的警惕是有根据的。

人民的起义保障了资产阶级的胜利。7月和10月的事件导致了反革命阴谋的破产。国民制宪议会只是在巴黎人民的帮助下才战胜了君主制度。但它担心被人民所支配，便开始对民主和专制抱同样的提防态度。大多数资产阶级想保住优势地位，避免贵族阶级的反攻倒算，他们便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削弱君主制度。同时，他们害怕人民各阶层投入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管理。所以，他们对人权宣言庄严肯定的原则应导致何种结果避而不谈。在君主制遭到削弱，人民受到监护的条件下，国民制宪

议会在1789年底开始着手对法国的制度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更新。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在整个1790年间，国民制宪议会重建法国的工作是在日益增长的危难中进行的。贵族阶级不放下武器，人民群众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跃跃欲试。为抵御来自两方面的危险，立宪派资产阶级在君主立宪制的招牌下树立起自己的最高权力，并想把一部分贵族阶级拉到这种制度中来。这样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妥协的制度。然而还得说服国王，并取信于贵族。这种妥协政策的代表人物是拉法夷特。此人高傲自负，头脑简单，他企图使水火相容。

Ⅰ.议会、国王和国民

政治妥协依照1688年英国革命的模式把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统治建筑在被奴役的人民各阶层头上。金钱显贵和法国资产阶级的领导派别接受了这种妥协，然而贵族阶级对此并不答应。为了粉碎它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人民群众。只有那些少数集合在拉法夷特名下的人才认为：他们能够以这种妥协保住自己的政权，因为英国的榜样证实了这一点。

1.拉法夷特的调解政策

18世纪的法国贵族阶级与上个世纪的英国贵族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在英国，不存在纳税特权，贵族也要纳税。贵族的军事特征已大为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贵族经营工商业也不失身份。航海和殖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合。贵族阶级也参加到新生产力的跃进之中。尤其是封建的结构早已摧毁，财产和生产已不受束缚。英国的特殊条件和更先进的发展程度使1688年的妥协得以实现。在法国，贵族保留着主要的封建特征。它献身武职，除极少数情况外不得从事有利可图的工商业，否则就会丧失贵族资格。传统结构使它的生存与优势地位得到保障，它对这种传统结构的依附便更为紧密。法国的贵族顽固地坚持其经济、社会特权，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和与资产阶级原则格格不入的封建心态，这导致它僵化在一概排斥的态度之中。

在1789年春天实现妥协是可能的吗？果真如此也必须是王朝毅然采取主动。但是，王朝的态度却每每表现出它只是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路易十六在7月初决心召集军队，这表明他要把刚刚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置于死地。后来，人民的力量挽救了革命。7月14日之后妥协还有可能实现吗？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中的一些人认为有可能，如拉法夷特和穆尼埃。穆尼埃相信，如同1788年在多菲内维齐耶堡发生的“显贵革命”一样，在1789年实现3个等级共同赞成的一场有限革命是可能的。他后来写道，他的设想是：“提倡循规蹈矩，反对贸然创新，对现存政府的形式只限于提出必要的改动以使之保障自由。”

大多数贵族和享有特权的高级僧侣对此断然拒绝。他们既不接受3个等级自愿集合，也不接受人权宣言和8月4日之夜的决议。这就是说，即使是部分地摧毁封建制也不接受。穆尼埃在妥协政策破产后便加入到贵族阶级和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他于10月10日离开了凡尔赛，1790年5月22日，他开始流亡国外。

也许是出于政治上的糊涂，也许是出于野心，拉法夷特在台上的时间更长些。他身为大领主、“两个世界的英雄”，足以使大资产阶级为之倾倒。他的政策旨在使土地贵族和工商业资产阶级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框架内达成和解。他在一年中操纵了政治生活。革命的资产阶级把他奉为真正的崇拜对象，以有这样一位领袖感到自豪。拉法夷特保证使它免受两方面的威胁：右边是贵族的蠢蠢欲动，左边是人民的奋起。年轻而享有盛名的拉法夷特侯爵自信在法国大革命中注定能发挥像他的朋友华盛顿在美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作为贵族自由派首领发挥了重要作用。巴黎的7月革命以后，他成为国民自卫军司令，手中掌握着兵权。路易十六对他是既迎合又厌恶。但是，为了实现国王、贵族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和解，为了使国民制宪议会同意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权，还有待于说服国王，并在议会中组成一个稳定多数。

米拉波曾一度成为实现这一政策不可缺少的人物。在内克威信扫地之后，应该由爱国党的主要领袖们组成内阁。米拉波为了钻进内阁不停地使用种种伎俩。但是，议会尽管对他的演说才能心悦诚服，却又不能不对他的私生活和唯利是图表示反感。为使他不能得逞，国民制宪议会于1789年11月7日作出决定：议会代表不得“在本届议会期间取得任何大臣职位”。于是米拉波卖身投靠了宫廷。路易十六安排他与拉法夷特达成协议。1790年5月，他们两人都极力要扩大国王的权限，使之享有宣战与媾和的权利。但是，米拉波在爱国者的心目中早已是臭名昭著了。

马拉在1790年8月10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至于里凯蒂老大（米拉波），他缺少一颗真诚的心，因而不能成为杰出的爱国者。他丝毫没有灵魂，这实在可悲！......里凯蒂朝秦暮楚的政策谁人不晓？他迫不及待地钻入三级会议的行为曾使我吃惊。我当时想：当他沦落到卖身求荣的地步后，将会把自己的嗓音卖给开价最高的买主。他最初曾反对君主，现在却卖身投靠了他。从否决权法令到宣战权法令，几乎所有这些有害法令的出现都是由于他贪财受贿所致。对一个不顾原则，道德败坏，少廉寡耻之徒难道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吗？他现在已经成为腐化堕落者和官迷们的灵魂、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首脑了。”

然而，米拉波却讨厌“假恺撒”[1]，他们之间的协和显然是办不到的。拉法夷特的政策不可能成功，这不仅是由于个人间的敌对，也是因为这种政策本身的矛盾。贵族阶级顽固地坚持抵抗。此外，生活必需品危机引起了骚乱。尤其是，在许多地区农民们不堪忍受1790年3月15日强迫赎买封建权利的法令，他们纷纷发动起义。所有这些都使贵族阶级受到越来越大的威胁，从而也加剧了它的抵抗。只要封建制的最后残余未被无可挽回地摧毁，在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寻求政治妥协就只能是空想。只要贵族阶级把保持自己利益的希望还寄托在复辟君主专制或建立孟德斯鸠、费内隆所幻想的特权制度上，它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和损害其利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最激烈的反抗。资产阶级为了

战胜这种反抗，不得不与城市人民群众和农民结成联盟。后来，为了结束这一联盟，资产阶级接受了拿破仑专政。当贵族阶级看到封建制一去不能复返，任何复辟企图永远不可能得逞时，它最终接受了妥协。在七月王朝时，这种妥协使它和大资产阶级联合掌权。

但是在1790年，贵族阶级远未放弃它的本来目标，何况流亡者们的阴谋活动、外国宫廷的密谋策划和反革命运动的兴起更激发了它的信心。在这种条件下，拉法夷特在1790年设想的妥协与和解政策只能归于失败。

2.政治生活的组织

国民制宪议会此时正在组织和完善起来。它的工作方法也逐渐确定下来。它所在的杜伊勒利宫马内日大厅并不舒适。讨论在每天上午和晚上6点钟以后进行。主持会议的主席由选举产生，任职15天。请愿者可以列队进入议会大厅，公众可以出席旁听，这保障了议会和人民的接触。国民制宪议会的工作由31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准备，各委员会有一名报告人向议会介绍拟定的决议。

议会中的不同集团也同时形成，尽管还不能辨别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开始只有两大集团：旧制度的拥护者贵族派和新秩序的保卫者爱国派。后来，一些差别更细微的派别也开始出现了。

“黑帮”或“贵族派”坐在议会右边。他们中的演说家，以杰出著称的是卡扎莱斯，以猛烈著称的是莫里修士，以诡诈著称的是孟德斯基乌修士。他们为保卫特权阶级而酣战不休。许多报刊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支持。这些报刊全是由王室经费资助的，其中有鲁瓦尤修士的《国王之友》、里瓦罗尔的《使徒行传》。里瓦罗尔在该报中用谐音丑化“爱国主义”为“痞子主义”。他们的俱乐部是法兰西沙龙。

“王政派”的首领是穆尼埃、马卢埃和克莱蒙-托内尔伯爵。穆尼埃

在10月事件后离开了国民制宪议会，11月15日辞去代表职务。王政派成为君权的捍卫者，他们与右翼接近以便阻止革命进展。他们云集的俱乐部名为“君主宪政之友”。

“立宪派”是由大多数原爱国党人组成的。他们忠于1789年宣布的原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主张以一种温和君主制的方式确立自己的政权。这是拉法夷特的党。该派中汇集了资产阶级和僧侣的代表：尚皮翁·德·西塞大主教、布瓦日兰大主教、西埃耶斯修士以及法律界人士卡米、塔尔热、图雷等。这些法律界人士在建立新制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巨头”坐在左边，是由巴纳夫、迪波尔和亚历山大·德·拉梅特组成的，具有自由派倾向。1790年底前后，当拉法夷特的影响下跌后，他们开始倾向王权，并成为其顾问。国王出逃后，三巨头担心民主的发展和人民的骚动，遂拾起拉法夷特的和解政策并声称要制止革命的发展。

民主派坐在最左边，其中有比佐、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他们保卫人民的利益，还要求实行普选制。

爱国派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组织。从1789年5月起，他们就习惯于集合在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布列塔尼代表的俱乐部就是这样形成的。10月事件发生后，这个俱乐部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内，改名为“宪法之友社”。它不仅向议会代表开放，也向富裕的资产阶级开放。雅各宾俱乐部与设在外省主要城市的俱乐部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使它得以把革命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全部战斗力量汇集和带动起来。

1791年2月14日，卡米耶·德穆兰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中写道：“爱国主义，即博爱仁慈，它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将要征服天下。在这种宗教的传播中，雅各宾俱乐部，或称雅各宾教堂被赋予首席地位，如同罗马教廷在传播基督教中的地位一样。在各地建立的爱国派俱乐

部、大会或教堂一经出现便要求与它联系，向它写信表示同心同德……雅各宾社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研究委员会。同国民制宪议会的委员会相比，它对善良公民的威胁小得多。因为在这里，揭发和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这对于坏人来说却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和下属团体的通信联系网能使它把83个省的任何角落掌握在手中。它如同一位大检察官，不仅使贵族们望而生畏，而且能铲除时弊，救助一切公民。俱乐部俨然行使着国民制宪议会属下公共事务部的职能。来自各地的受压迫者的诉状在提交到庄严的国民制宪议会之前都先呈送到这里。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大厅里不断有代表团前来。它们或是来表示庆贺，或是来要求加入，或是来提起警觉，或是来纠正某个错误。”

1791年，在国王出逃和马尔斯校场事件发生后，雅各宾派主要在罗伯斯庇尔的影响下加强了民主化倾向。斐扬派俱乐部便从雅各宾派中分离出来。斐扬派在拉法夷特及其密友的领导下以高额会费排斥了中等资产阶级，他们集合了温和的大资产阶级和归顺的贵族，对国王和宪法同样持维护的立场。

科尔得利派俱乐部，或称“人民之友社”于1790年4月建立。这是一个民主派俱乐部，丹东和马拉在其中享有盛誉。在巴黎各区，许多友好团体组成后使人民各阶层积极投入政治生活。其中最先出现的是“两性爱国者联谊社”，成立于1790年2月，其创建人是当萨尔教师。

拉法夷特的政策受到许多大报刊的维护，例如当时消息最灵通的、由庞库克主持的《导报》、《巴黎报》、《爱国者之友》等。左翼的不少报刊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影响，其中有：戈尔萨的《邮报》、卡拉的《爱国年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普律多姆的《巴黎的革命》（卢斯塔洛在该报颇为著名），最后还有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马拉则在《人民之友报》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捍卫着人民群众的权利。

Ⅱ.重大的政治问题

从1789年底起，财政问题和宗教问题成了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两个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各党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制宪议会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为大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

1.财政问题

自三级会议召开以来，财政境况日趋恶化。城市和农村的骚动给国库收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业已武装起来的农民拒不缴纳捐税，在四分五裂，权威扫地的情况下，迫使他们纳税谈何容易。国民制宪议会首先利用了这种形势，它把王朝的财政困难看作是向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们施加压力的绝好条件。而且，内克也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弥补国库空虚。国民制宪议会在“了解到国家的急需之后”，于8月9日决定发放公债3 000万锂，利息为4.5%。8月27日，它又决定发放新债8 000万锂，利息为5%。但是，这两次公债都没有认购完。国王把自己的餐具也送到铸币厂充银。9月20日，国务会议允许各铸币厂主管接纳个人送来的餐具。立宪派开始对教会的财富下手了：9月29日的法令规定“对得体礼拜”并非必需的银器进行处置。尤其是，1789年10月10日奥顿的主教塔莱朗建议将僧侣的财产完全置于国家的掌握之下：

“僧侣并不是同其他产业主一样的产业主。国家对一切团体拥有十分广泛的权利，对僧侣可以行使物权。它可以打碎这个等级中对社会无用的团体。这些团体的财产将必然为全国所合理分享。无论合法拥有的财产具有何等神圣的性质，法律却只能保持立法者所同意的东西。我们知道，在这些财产中只有神职享俸者的生计所必需的那部分才是属于他们的，其他部分则是属于寺院和穷苦人的财产。如果这种生计由国家负担，享俸者的财产就无所谓受到侵犯。因此，国家首先可以剥夺那些应取缔的宗教团体的财产，并对其成员的生活予以保障；其次，国家可以收缴空额的薪俸；第三，国家可以按一定比例削减现职人员的收入，并承担这些财产最初的债务……”

一场激烈的辩论随即展开，辩论的一方是莫里和卡扎莱斯，另一方是西埃耶斯和米拉波。前两人强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人权宣言所肯定的那样。后两人则反驳说，这一宣言在第17条中指出："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人们的财产可以受到剥夺，何况僧侣等级并不是财产的主人，而只是财产的管理人。这些财产的收入应该用于慈善机构和公共利益，例如医院、学校、宗教仪式。既然从现在起国家负担这些事业，那么这些财产归国家所属便是理所应当的。辩论结束后，1789年11月2日的法令以568票对346票的多数被通过。国民议会决定：所有教会财产都归国家支配；由国家负责提供适当的宗教费用，维持教士生活和救济穷人；一名本堂神甫每年至少应得到薪俸1 200锂。

这项大规模财政计划的实施方式尚有待解决。12月19日通过了建立"特别金库"的法令，该金库主要以拍卖教会财产的所得为财源。这些财产将被用作发行货币——"指券"的抵押。指券乃名副其实的国库券，其利息为5%，偿还它并不以货币而是以不动产。随着教会财产的出售，指券将不断被收回，然后将其销毁，这样便逐步还清国家债务。除了国王打算保留下来供其享受的森林和行宫外，王室领地也将被拍卖。将被拍卖的还包括相当数量的教会领地，其总价值足以达到4亿锂。

这些措施的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指券迅速地转变为纸币，它的贬值给大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困难。另一方面，1790年3月开始的国有财产出售导致了财产的大量转移，这使其受益者——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无可挽回地站到了新秩序一边。

2.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从1789年底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也十分尖锐：对教会财产的没收必然要导致法国教会的重新组织，宗教问题和财政问题是紧密相联的。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在这方面的行动丝毫不是出于敌视天主教，他

们始终申明对传统宗教怀有深切敬意。但是，作为国民的代表，他们自信有资格解决教会的组织与惩戒问题，正如以前王权所做的那样。在18世纪，任何人，即使是最大胆的理论家也未能设想一种制度会建立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对教会组织的改革主要是各种制度全面改造的必然后果，尤其是教会财产被国家支配后的必然结果。

国民制宪议会首先解决的是寺院教派问题。这些教派在1790年2月13日被宣布废除：修士可出门还俗，也可到某些指定的宗教机构中组织起来。1790年4月20日，教会被剥夺了管理其财产的权利，接着便开始讨论宗教问题委员会的草案。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一方面承认教会的“弊端由来已久”，另一方面又提醒国民制宪议会注意教会在惩戒和教务裁判权方面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草案侵犯了天主教会的组织法。国民制宪议会对这些意见置之不理，并于1790年7月12日通过了“教士法”。

III.调解政策的顶点和破产

反革命利用出售国有财产和教士法所引起的困难煽动骚乱。贵族们对指券百般贬低，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发售工作。流亡者开始施展阴谋，在南方准备发动大规模暴动。1790年4月13日，国民制宪议会拒绝承认天主教为国教，这为反革命提供了重要借口。1790年5月10日在蒙托邦，6月13日在尼姆都爆发了保王派天主教徒和爱国派新教徒之间的冲突。8月，在韦瓦雷南部（阿尔代什省）的雅莱营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武装团伙，直到1791年2月它才被强行解散。

1. 1790年7月14日全国联盟节

联盟是爱国派的反击手段，也是全国投入革命事业的表现。乡村和城市的居民们首先结成地方联盟，表示友好并许诺互相支援。1789年11月29日，多菲内和韦瓦雷的国民自卫军在瓦朗斯结成联盟；1790年2月，布列塔尼-安茹联盟在蓬蒂维建立；5月30日在里昂，6月在斯特拉斯堡、里尔也都建立了联盟。

1790年7月14日的全国联盟节最终确认了法国的统一，使这股全国团结一致的浪潮发展到顶点。在马尔斯校场，塔莱朗当着30万观众在祖国祭坛上作了庄严的弥撒。拉法夷特以各省所有联盟成员的名义宣誓。这誓言“把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把法国人与他们的国王团结在一起，以便保卫自由、宪法和法律”。而后，国王也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兴奋的人民以热烈的欢呼庆贺举国协和的重现。拉法夷特在这一天俨然是一位凯旋的将军。

然而，联盟运动并不能掩盖深刻的社会现实。联盟表明了爱国者们团结的意识，反映出国民对新秩序的赞同。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在谈封阿尔萨斯异族王公事件[2]时提出了一套新的国际法准则，主张以国民的自愿组合取代王朝国家。尽管人民群众在1790年7月14日表现出了极大热情，然而拉法夷特在联盟节上的突出地位却说明这个节日的政治和社会含意。拉法夷特是资产阶级的偶像，他声称要使贵族阶级归顺革命，他是妥协的代表人物。由他所统率的国民自卫军是资产阶级的武装，消极公民被排斥在外。1791年4月27日，罗伯斯庇尔起来抨击资产阶级的武装特权。他指出：“武装自卫是每个人的、不带任何差别的权利。武装起来保卫祖国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穷人们难道因为贫困就成了外国人或奴隶吗？”在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上，人民无疑是兴高采烈的，但它更主要的是观众而不是演员。在联盟的行动中，自卫军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它与作为“王家”武装力量的军队相对立。新秩序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位，打破了按纳税额决定选举资格的制度后，人民强行加入了自卫军，这才使它真正具有了“国民”的性质。

2.军队的分裂和南锡事件（**1790**年**8**月）

南锡事件很快消除了拉法夷特的崇高威望，导致他的调解和妥协政策归于失败。贵族阶级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拒不承认新秩序，并与之分庭抗礼。在国内，贵族阶级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内战危险日益加重；在

国外，流亡者们武装起来，期待着在都灵的阿尔图瓦伯爵求得外国宫廷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爱国者们也严阵以待。1790年的收成非常好，有利于缓和总形势，但还不足以完全排除市场骚动和对粮食自由流通的侵犯。尤其是农民的暴动仍在继续。从1790年1月起，在凯尔西和佩里戈尔爆发了农民起义；5月在波旁内也爆发了农民的暴动。这威胁了土地贵族的直接利益。1790年7月，一些传言说驻扎在比利时的奥地利军队即将入侵。这在蒂埃拉施、香槟和洛林引起了民心“不安”。人民群众到处都在准备对策。

社会冲突也波及到被流亡运动搅乱的军队。没有流亡的军官越来越受到国民制宪议会诸项改革的触及，他们采取了敌视态度，反对爱国派士兵。这些士兵通过与各俱乐部经常接触培养了公民爱国心。国民制宪议会没有能力对军队问题提出全国性的解决办法，它预感到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将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如何才能使王家军队摆脱贵族军官的影响，同时又不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化军队呢？实现全民化就意味着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被束缚在自身的矛盾和社会偏见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只能采取些不彻底的措施，例如增加军饷，改革管理和军纪。

然而，全国性的解决办法在1789年12月12日已经被杜布瓦-克朗塞提出了。当时他遭到右翼的一片嘲骂，左翼则持不自在的缄默态度。杜布瓦-克朗塞指出，“应该实行真正的全民征兵，其对象包括从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到最后一名积极公民以及所有消极公民”，也就是国王之外的全体国民。从1789年底起，杜布瓦-克朗塞就建议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一支全民军队。在辩论中，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声称：生活在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比生活在实行这种法律的国家要强上千百倍。1789年杜布瓦-克朗塞所建议的全民兵役制的不少特征在1793年的混编部队中得到了体现。国民制宪议会对遵循这样一条道路缺乏准备，然而，它并非没有受到提醒。早在1791年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就揭露出

存在的危险："在所有贵族陷于崩溃之际，唯一还在进行抵抗的这种放肆的、具有威胁性的势力是什么呢？你们消灭了贵族等级，它却仍然活在军队领导层中。"

身为贵族和职业军官的拉法夷特再不能犹豫不决了。在驻兵的城市和军港层出不穷地发生兵变的情况下，他站到了反对士兵的军官一边。1790年8月，在南锡的驻防军由于军官拒不允许士兵监督部队财务而发生暴动。于是，国民制宪会议在16日颁布法令："部队以武力触犯由国民制宪议会通过并由国王批准的法令属重大'亵渎国家罪'。"

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对暴动予以残酷弹压，处决了20来名肇事者，把夏托维厄兵团的40几名瑞士雇佣兵判处摇船苦役。拉法夷特对其表兄布耶表示支持，这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也立即因此而威信扫地。1790年10月12日，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写道："难道人们还能怀疑吗？这位大将军、两个世界的英雄、永生的自由复兴者实际上是反革命分子的首领、一切叛国阴谋的灵魂。"

与此同时，一部分僧侣起来攻击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路易十六也准备向外国求助。于是，拉法夷特主张的在国王周围实现妥协与和解的政策破产了。大革命再一次加快了进程。

---

[1] 米拉波对拉法夷特的贬称。——译者

[2] 指在阿尔萨斯地区拥有领地的外国王公或领主为反对法国革命废除封建制所制造的动乱。——译者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国民制宪议会在1790年的重重困难中仍然坚持进行重建法国的工作。作为启蒙运动的追随者，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首先赋予他们所依据的原则某种普遍价值，然后便试图对社会和制度进行合理化改造。但是，由于身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并受到反革命活动和人民力量奋起这两方面的夹击，他们毫无顾忌地把事业纳入到本阶级利益的范围内，甚至把那些庄严宣告的原则也抛到一边。在与动荡现实的搏斗中，他们善于要手腕，避免不切实际的空想而顺应各种局面。这种矛盾说明了国民制宪议会的政治业绩为什么会黯然失色，并从1792年起开始毁灭，也说明了那些庄严宣告的原则为什么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Ⅰ. **1789**年的原则

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把那些庄严宣告的“原则”作为事业的基础。这些原则经常被人们引证。在引证时，一些人充满着激情；另一些人带着讥讽；大多数人则是怀着深切的敬重。这些原则力图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便是这些原则的明确表达。根据宣言的前言，对于人权和公民权的“无知、忘却和鄙视”是构成“公众苦难和政府腐化的唯一原因”。从此以后，“建立在简明和无可争议的原则基础上的公民要求”只会变得有益于“维护宪法和一切人的幸福”。这种认为理性万能的乐观信念非常符合启蒙时期的精神。

1.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宣言构成新秩序的“基本教义”。当然，制宪议会代表的思想并没有全部包括在里边：经济自由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而资产阶级对这个问题最为关注。在重申天赋权利学说的前言和无主次之分的17条正文中，宣言明确提出了主要的人权和国民权利。宣言注重其条款的普遍性，显然超越了17世纪宣告的英国自由所具有的经验主义特征。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宣言，它确实提出了天赋权利的普遍意义，但同时又规定了某些限制，这使它的影响受到很大局限。

人权属于人是先于任何社会和任何国家的。这些权利是“自然的”和“永不失效”的。保存这些权利是所有政治结合的目的（第2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宣言第1条）。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2条）。规定这项反抗压迫的权利是为了将以前的暴动合法化，而不是为了批准以后的起义。

自由被确定为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它只以保证他人的自由为限度（第4条）。自由首先是人身自由即个人自由，这使人们不受专断的指控和扣押（第7条），并以推定无罪作为保障（第9条）。人是其自身的主人，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同时规定，意见的发表不得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第10条）。在法律所确定的情况下滥用此项自由应承担责任（第11条）。人的自由也表现在获得和占有方面：财产权是天然的和永不失效的权利。根据第17条，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第17条）：这是对赎买领主捐税不明言的肯定。

宣言把平等与自由紧密地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平等以反对贵族阶级；农民强烈地要求平等以反对领主。但是，这里涉及的只是身份的平等。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一切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无论出身如何都能平等地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第6条）。社会差别只是建立在公共利用（第1条）、德行和才能的基础上（第6条）。必不可少的赋税应该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地分摊（第13条）。

国民的权利在一些条款中也得到确认。国家不再构成一个自在的目的，它的目的只在于保证公民享受其权利。如果它违背了这一点，公民就要反抗压迫（第2条）。国民、即公民的整体是至高无上的（第3

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体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第6条）。有许多项原则都以保障国民主权为目标。首先是分权，没有分权就不会有宪法（第16条）。其次是公民对国家财政和行政管理亲自或由其代表行使的控制权（第14、15条）。

宣言是哲学家的门徒们的杰作，是向所有人民发出的。然而，它也不免带有资产阶级的烙印。作为自由派和产业主的这些制宪代表在宣言中塞满了“限制”、“预防措施”和“条件”，这使宣言的影响受到很大局限。米拉波在他的《普罗旺斯邮报》第31期上对此作了这样的记述：

“一个光秃秃的人权宣言，适用于各种时代、各国人民和地球上一切道德与地理范围，这的确是个伟大和绝妙的创见。然而，在如此慷慨地为别国考虑法典之前，似乎应该先奠定我们自己的法典基础，至少应达成一致见解……从国民制宪议会对人权的每一步解释中我们都会看到，认为公民不得滥用权利的思想很突出。制宪议会常常由于谨慎而对此加以夸大。由此便产生出种种限制、周密的预防办法和每一条款前精心设置的条件。这些限制、预防办法和条件几乎到处都使义务取代了权利，使羁绊取代了自由，在不止一个方面侵越了使它深感不便的立法细则。这些限制把人当作与其社会身份相联的人，而不是生而自由的人。”

富于功利主义精神的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借助于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式完成了一部应时的作品。他们在使过去反抗王权的斗争合法化的同时，还要提防人民破坏他们建立的秩序。由此便造成了人权宣言的矛盾百出：第1条宣布人人平等，但它又把平等从属于“社会利益”。纳税平等和法律平等只在第6条中受到形式上的承认，因财富而产生的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在第2条中，财产权被宣布为自然的和永不失效的权利。国民制宪议会对一无所有的广大群众却漠不关心。宗教自由在第10条中受到了特别的限制。异端的宗教信仰只是在“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

公共秩序”时才受到容忍。天主教仍为国教，是唯一由国家所维持的宗教。新教徒和犹太教徒只能满足于私下的祭仪。第11条指出，任何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法律可以制止“滥用这种自由”。爱国派记者对这种侵害出版自由的规定表示了强烈抗议。

卢斯塔洛在《巴黎的革命》第8期上写道：

“我们曾经迅速地从受奴役转为获得自由。我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从自由走向受奴役。企图奴役我们的人首先考虑的将是限制出版自由，甚至把它扼杀。不幸的是，这项奸生原则恰恰产生在国民制宪议会。‘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而遭受干涉’。这个条件如同一只箍套，可以任意放松或收紧。公众舆论对此不接受也是枉然。这个条件照样可被阴谋家利用来向上爬，并维持自己的地位。一旦有人向其同胞们揭露这帮人的面目、作为和企图，他便会被扣上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

2.原则遭到违反

在对法国的现实进行必要的改造时，国民制宪议会的法学家和逻辑学家们丝毫不受总原则和普遍理性的约束。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不能不为迎合一些人而限制另一些人，并且不在乎自己的成果中存在种种矛盾。他们坚信：为本阶级谋利就是捍卫了革命。

公民权并没有马上给予所有法国人。新教徒只是在1789年12月24日才被授予公民权；南方犹太教徒在1790年1月28日得到公民权；东部地区的犹太教徒在1791年12月27日得到公民权。1791年9月28日，在法国废除了奴隶制，但殖民地的奴隶制却仍然保留着。因为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会损害大种植园主的利益。这些人在国民制宪议会的主要代表是拉梅特家族。甚至有色人种中自由人的政治权利也遭到争议。最后，国民制宪议会于1791年9月24日决定：剥夺一切有色人种的公民权。对于劳

动者，国民制宪议会禁止结社和罢工。在巴黎的工场中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后，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了勒夏普利埃法。该法规定了劳动的自由，禁止工人结社保卫他们的利益。

政治权利只归少数人享有。人权宣言宣布一切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却通过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把选举权只给予有产者。公民被划分为三种类型。

“消极公民”没有财产权因而也没有了选举权。发明这个专用术语的西埃耶斯认为：消极公民有权“保护自己的人身、财物和自由”，但无权“积极参与组成公众权力”。大约300万法国人便这样被剥夺了投票权。

按西埃耶斯的说法，“积极公民”是“巨大社会企业的真正股东”。他们所缴纳的直接税至少要相当于3天的工作价值，即1.5—3锂。这部分人的数量为400多万，他们组成“初级议会”以推选出市政府和选举人。

“选举人”与积极公民的比例为1∶100，全国共有5万左右。他们的纳税额相当于当地10天工作日的价值，即5—10锂。选举人在省会组成“选举大会”，选出全国议会代表、法官和省级行政人员。

最后，组成“立法议会”的代表必须拥有一些地产，并缴纳一个“银马克”（约52锂）的税金。这种分为两级的、以纳税额决定选举资格的选举制度使得金钱贵族取代了门第贵族，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宪法起草委员会报告人强调指出：建立这样一种以纳税为标准的选举制度必然会在“消极公民”中引起竞争，使他们一心争取发财致富，以便成为“积极公民”，然后再成为“选举人”（这已经是基佐提出的“发财吧”的论调了）。这时候，国民制宪议会中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尤其是格雷古瓦修土和罗伯斯庇尔对此表示了抗议，然而并无效果。

1789年10月22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制宪议会上宣称：“一切公民，无论是谁，都有权担任各级代表，没有比这更符合你们的人权宣言了。在人权宣言面前，任何特权、差别和例外都应该消除。宪法规定主权在民，在人民的每个成员。因此每个人均有权协助制定那些约束自己的法律，也有权参加管理公共事务亦即自己的事务。不如此，人人权利平等，每人都是公民的原则便没有真正实现。”

民主派的报刊更加激烈。卢斯塔洛在《巴黎的革命》第17期中强烈抨击新生的金钱贵族，指责其法律如此荒谬，以至连让-雅克·卢梭也会被排除在国民代表之外。马拉在1789年11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中指出，选举制度会给人民各阶层带来有害后果。他号召人民进行反抗：“这样，与直接税额成正比的代表制把帝国交到了富人手里。而一向被控制、压迫和奴役的穷人，他们的命运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得到改善。这里，钱财对法律的影响无疑得到了触目的证实。但是，只有当人民甘愿服从时法律才能具有权威。如果说人民已经砸碎了贵族的枷锁，那么它也必将砸碎阔佬们的枷锁。”

卡米耶·德穆兰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他在《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第3期上写道：“在首都，反对银马克规定的呼声是一致的。不久在外省也会出现一致的呼声。这项规定使法国建立起特权政府，这是那些恶劣公民在国民制宪议会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若想让人们体会这一法律的荒谬程度，只需指出：让-雅克·卢梭、高乃依、马布里这样的人如果在世也没有被选举资格……你们时常重复的“积极公民”一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积极公民应是攻陷巴士底狱的人，是开拓土地的人。而僧侣和宫廷中的游手好闲之辈，尽管他们有大片领地，他们却只像福音书中写的那棵树一样，是一些不结果实的植物，只配被付之一炬。”

Ⅱ.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

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最重视的东西是自由，各种形式的自由。

在人权宣言中，平等与自由被结合在一起。这主要是在原则上肯定降低贵族阶级地位和废除特权，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意愿。况且，这里只涉及到身份平等。自由首先被理解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然而要在基于纳税额的限制之下。在摆脱了桎梏的经济活动中也实现了自由。个人的自由同时表现在自由地创造、生产、寻求利润和任意使用利润等方面。1791年的自由派宪法建立在“自由放任”的理论之上。

1.政治自由：**1791**年宪法

新政治制度的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胜利的资产阶级建立稳固的统治，既能抵御贵族阶级和君主制的反攻，又能防止人民的任何解放企图。

政治改革从1789年7月起着手进行。为了准备新宪法，在7月7日建立起了一个30人的委员会。8月26日，人权宣言被投票通过，10月通过了宪法的部分条款，12月通过了选举制度。1790年夏季，进行某些改动已显得很有必要。1791年8月，对宪法定稿的讨论开始进行，并于9月3日最后通过了宪法，即1791年宪法。这是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它在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建立了国民主权。这是一部资产阶级的宪法，它保障了有产阶级的统治。

行政权只能具有一种君主政体的形式。当时任何人对一个大国的设计也莫过如此。1789年9月22日，国民制宪议会在休会了一个月后重新进行辩论，并通过决定：“法国的政体为君主制。”但是，在确定国王的权力时，国民制宪议会尽量对王权加以限制，同时也避免使国王在人民要求面前处于完全无能的境地。9月22日通过的条款虽然确立了君主政体性质，但是同时也强调：“在法国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权威。国王只通过法律进行统治，他只能根据法律要求人们服从。”

国王的意志不再具有法律的效力。第二天，9月23日，国民制宪议会再一次讨论，以便进一步使王权从属于国民，即从属于资产阶级。一

切权力主要来自国民并只能来自国民，立法权属于国民制宪议会。但是，君主权也应强大到足以使资产阶级预防人民反抗的程度。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国民制宪议会的大多数便宣布赞成“搁置否决权”（1789年9月11日）。这使国王能够粉碎任何民主立法企图。由于这种否决权只限于搁置，当国王打算退回到专制主义，或打算照米拉波所建议的、依靠人民摆脱资产阶级议会的监护时，主宰形势的归根结底还是国民制宪议会。另外，1789年9月10日，国民制宪议会否决了建立上院的提案，因为它打算排斥依附于君主制的贵族。国王解散议会的权利遭到否决，这使国王在控制立法机构的资产阶级面前软弱无力，况且立法议会被宣布为常设机构。

在10月事件之后，国民制宪议会继续拆除着传统的君主制度。10月8日，一项法令把“法兰西和纳瓦尔的王”这一称号改为“法兰西人的国王”。10月10日，不敢绝对否定君权神授的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从此把国王称作“路易，承上帝和国家宪法之命，法兰西人的国王”。国王从属于法律，法律由立法机构颁发，立法机构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种关系在1789年11月9日通过的关于法律的提出、批准及颁布方式的条款中更加明显：立法议会应将其法令提交给国王，可以随制定随提交，也可以在例会结束时一并提交。国王对每一项法令的同意以这样的套语表示：“国王同意并使其执行”，搁置否决的套语是：“国王将审查”。颁布法律的套语明显表现出立法权大于行政权：“国民制宪议会作出决定，我们的要求和命令如下……”

国王在中央政府中没有实权，在地方行政中也是如此。1789年12月22日关于更新省级组织的法令在新的行政区划里取消了行政权力的所有代理人员。在省的行政管理和国家行政权力之间不再有中介人。省的行政官员一上任，监察官和其助理人员便要停止任职。

“法兰西人的国王”是世袭的，但他从属于宪法并向其宣誓效忠。现

在他只不过是一个领取2 500万锂王室费的公务员了。他保留着任命大臣的权利，但只能在议会代表以外任命。没有大臣的签字国王任何事也不能做。这项规定剥夺了他的擅自决定权，使他依附于自己的参政院。而参政院本身又依附于议会，因为，国王是不承担责任的，他任命高级官员、大使和将军，指导外交。但是，未经议会同意，他不得宣战或缔约。中央行政归6个部负责（内务、司法、陆军、海军、对外关系、国家税务）。原先的参政院各会议已不复存在。议会有权控告大臣，大臣在解职时要向议会汇报工作。与分权学说相矛盾的是，国王以搁置否决权的方式保留了一部分立法权。然而，这一权利既不适用于宪法也不适用于财政法规。

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的议会——“国民立法议会”。它任期两年，分两级由基于纳税额确定选举资格的选举方式产生，共有745名代表。国民立法议会是常设的、不可侵犯也不可解散，其权势在王权之上。它拥有立法倡议权；有权监督大臣的政务；可将大臣以“侵犯国家安全和宪法”的罪名提交全国高等法院审判。立法议会以它的外交委员会控制对外政策；它投票决定军队定额。立法议会在财政方面是最高主宰，国王不能支配经费，甚至也不能提出预算建议。无需国王召集，立法议会有全权集会。会议在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一开幕，会议地点和会期由立法议会自行决定。它独立于国王，国王不得解散之。立法议会甚至可以通过声明直接向人民征询，以此抵消国王的否决权。

在君主制的外表下，实际的权力被掌握在有纳税能力的资产阶级和金钱贵族手中。同时，他们也支配着经济生活。

2.经济自由：**“**自由放任**”**

在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中没有一处谈到经济。这无疑是由于在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看来，经济自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也很可能是由于人民各阶层仍然深深地依恋着旧的市场管理和规定价格制度。这种

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有所保障。旧制度的经济结构所具有的矛盾二重性使新型的工业企业与传统的店铺、手工业对立起来。资本家阶级要求经济自由，人民各阶层则表现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心理状态。1788年的严重歉收加重了经济危机，使10年以来的“衰落”达到最低点。这种经济危机成为分化第三等级的因素，不利于民族统一意识的形成。布里埃纳在1787年决定的粮食贸易与出口自由一度曾被内克取消。这种自由对生产发展有所促进，但从中受益的似乎主要是有产者和资产阶级，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人民曾经谴责领主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指责他们囤积居奇，后来又把困苦归咎于粮食商、面粉厂主以及面包商。第三等级的团结面临着威胁。在整个大革命中，生计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要自由经济还是要管制经济？谋利自由为上还是生存权利为上？），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看法都受到它的影响。在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要求有生存权，对这一权利的承认和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中平等的一部分。埃贝尔在人民运动发展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的时候在《迪歇纳老爹》上写道：“祖国？见鬼！商人们根本没有祖国。”但是，经济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财产自由是继8月4日之夜废除了封建制之后出现的。土地和人身一样摆脱了任何束缚。1789年8月5—11日的法令使8月4日之夜的原则性决定得以定型。这些法令取消了什一税，废除了土地贵族制、封地的等级制及立法特权，尤其是长子继承权。但是，封建权利被区分为“涉及实物或人身的永久管业权及对人身的奴役权”和“其他所有”封建权。前者被无偿废除，后者则被宣布可以赎买。梅兰（杜埃人）在1790年3月15日通过的赎买封建权利执行法中再一次作了这样的区分。

“支配性封建制”的权利指那些被推定为从国家力量中窃取的、由国家让与的、或者以暴力获得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予以无偿废除，其中包括：荣誉权、司法权、永久管业权、 奴役权、手续金、个人贡赋予徭役、专利权、通行税、入市税和狩猎、捕鱼、饲养鸽兔等权利。被

废除的还有实行了30年的、有利于领主的公社产业选用权。

“契约性封建制”的权利指那些被认为源于领主与佃农之间所订契约的权利。这些权利作为地产最初租让的抵偿，宣布可以赎买，其中包括：年贡、地租、实物分成和定期租金、地产转移和出售的临时收益权。1790年5月3日，货币地租的赎买价被定为年额的20倍；实物地租的赎买价被定为年额的25倍；地产转手的临时收益权的赎买价则按其数额大小而定。赎买严格按个人办理。农民还应还清30年以来的欠款。领主如能证明其地产为连续30年所有的产业，便不必出示该地产的文书。小农因赎金太重而不能获得解放的情况很快就显露出来。况且，事先没有任何信贷制度为赎买提供便利条件。唯有富裕农民和不从事经营的地产主使自己的土地摆脱了束缚。但是，不从事经营的地产主必然地试图把赎买负担转嫁到永佃农和分成制佃农身上。1791年3月11日的法令使取消什一税的结果有利于地产主。永佃农应以货币，分成制佃农应以其一部分所得来偿还什一税的数额。于是，如此设计的废除封建制有利于资产阶级和有地农民，而不能满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的不满转变为骚乱，甚至形成农民起义。封建制的彻底废除是在吉伦特派垮台后由国民公会完成的。

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一种新型的财产权观念应运而生，并很快被写进了人的天然和永不失效的权利之中。这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财产权。如同罗马法所规定，财产权就是对财产拥有自由的、个人的、完全的权利，允许耗费和任意使用。它以不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和公共利益为限。这种资产阶级的观念不仅与封建的财产权观念相违，并且与公社集体产业所有权观念和个人财产共有观念背道而驰。封建财产受封建权利的束缚，有利于领主；农村公社中的个人财产则受到公社支配。国民制宪议会赞成按有利于有地农民的方式分配公社财产。但它不能不谨慎从事，因为旧的一套东西还保持着。

财产权所完全承认的耕种自由最终确立下来。这种自由以“土地个人主义”的胜利为标志。它是长期的社会、司法演变的结果，它也导致古老的公社土地制度开始解体。地产主在摆脱了强制轮作的土地上可以自由耕种，任意围栏，取消休闲地。专题委员会的报告人欧尔多·德·拉梅维尔要求实现“农村的自由”，取消同“天然的、合法的财产权”相违背的共同放牧权。然而，国民制宪议会拒绝采用这种彻底措施。人造牧场当然不实行共同放牧权。1791年9月27日最终通过的农村法规并没有彻底落实业已通过的原则。圈地固然得到允许，根据证书或习惯形成的共同放牧权和通行权则被保留下来。无地或少地的小农仍将长期地保卫他们的集体权利，甚至拿破仑也不敢强行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于是，在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旧的农业经济和传统的农村公社与新的个人权利和新型农业一直并存着。

耕种的自由使农业领域的生产自由得以实现。行会和垄断被取消使生产自由得以普及。由于行会制度牵扯面广，涉及利益错综复杂，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不敢轻举妄动。从理论上废除行会特权在8月4日之夜就作出了决议：“省、公国、城市、团体和社团的一切专有特权被永远废除，并融汇到所有法国人的共同权利之中。”行会似乎应从此一蹶不振。卡米耶·德穆兰便是这样想的：“这个夜晚取消了师傅制度和独占性特权……谁能开店铺就可以开。裁缝师傅、鞋匠师傅、假发师傅将会愁眉苦脸。学徒伙计则会兴高采烈。光明将照亮屋顶的阁楼陋室。”

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在1789年8月11日最后颁布的法令中，被取消的只有“省、公国、地区、乡、市和居民社团的专有特权。”行会被保留了下来，对它的废除在一年半之后才得以实现。在讨论营业税问题时，国家税务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前贵族达拉尔德把所有问题都联系到一起。他指出，行会和垄断一样，也是造成生活费用昂贵的因素。这是一种应该废除的独占特权。1791年3月2日的法律，即“达拉尔德法”取消了行会的管事会和师傅制度，也取消了享有特权的手工工场。从此，资本

主义的生产力得到解放，人人可以自由地成为雇主了。生产自由的加强还在于撤销了作为大型批发机关的商会、取消了工业条例、“合格标志”、产品检查以及对手工工场的监察。建立在供求关系基础上的竞争法则成了调节生产、价格和工资的唯一机制。

在这种制度下，劳动的自由与企业的自由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市场应该和生产市场一样都是自由的，帮工的联合同师傅的行会同样不能被容忍。经济自由主义所承认的只是个人。1791年春天出现了工人的结社组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木器业帮工的组织。他们曾试图通过巴黎市府把“工价”强加于雇主。这引起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的警惕。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就是在这种工人斗争的背景下通过的。此法禁止同一行业的公民，包括工人或师傅任命会长、秘书或理事；禁止“对他们所谓的共同利益作出决议或进行讨论”。总之是禁止联合和罢工。这与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背道而驰。劳动的自由压倒了结社的自由。帮工协会以及工人互助团体都被视为非法。1791年7月20日，这些规定也开始推广到农村：禁止任何地产主、佃农、农场帮工和农业工人进行任何旨在左右价格和工资的一致行动。这无异于把工人和帮工们置于雇主的摆布之下，尽管在理论上他们是平等的。对工人罢工权利的禁止一直持续到1864年，对工人组织工会权利的禁止一直持续到1884年。这些禁令是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关键部件之一。主张平等社会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抽象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由主义只对强者有利。

最后是贸易自由。从1789年8月29日起，布里埃纳曾实行的粮食买卖自由又重新出现，然而粮食出口则无自由可言。9月18日，粮食价格放开。商品在国内的自由流通具有经济和财政两方面的意义。废除盐税（1790年3月21日）、贩运税和国内关卡（1790年10月31日）以及入市税、 附加税（1791年3月2日）后，商品流通自由逐渐确立起来。这样，早已被重农学派和哲学家们所谴责的消费税几乎全部消失了。然

而，人民购买力的增长很快又被物价的上涨所抵消，甚至超过。国内关卡、盐税和附加税的检查机构被撤销了。通行税被宣布可以赎买。“壁垒后移”终于把阿尔萨林、洛林这两个“实为异邦”的省份划进国内。这些变化使关税界线和政治边界吻合起来，国内市场实现了统一。金融和银行活动的自由完善了贸易自由。股票市场也和商品市场一样自由开放，这使金融资本主义得以高速发展。

对外贸易的开放表现在废除贸易公司特权上。1785年重建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好望角以外的一切贸易。商港和大宗出口贸易界的代表们曾对此予以抨击。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国民制宪议会在1790年4月3日宣布废除贸易公司的垄断权，“好望角以外的印度贸易对一切法国人开放。”塞内加尔的贸易于1791年1月18日宣布开放。1791年7月22日，马赛在地中海东岸和柏柏尔地区范围内的贸易特权被撤销了。而且，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贸易自由主义在外国竞争的危险面前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这再一次表明了1789年代表人物们的现实主义。民族产品受到关税的保护，这种保护是有限的。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3月2日制定的税则中只赞同禁止少数商品（如纺织品）的进口和几种原料（尤其是粮食）的出口。此外，国民制宪议会对于殖民地贸易仍然保：持“独此一家”的重商主义制度。殖民地只能与宗主国进行贸易（1791年3月18日的税则）。这表明维护殖民利益的压力集团相当强大。在此之前，它已使奴隶制保留下来，并拒绝给有色自由人政治权利。

传统的经济秩序被打乱了。固然，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就已成为生产和交换的主宰，“自由放任”的政策使他们的贸易和工业活动摆脱了特权和垄断的羁绊。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封建所有制的框架中出现和开始发展的，现在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解放了经济，从而加速了演变的进程。

III.制度的合理化改造

国民制宪议会努力用一种协调和合理的组织代替旧制度下杂乱无章的制度。这种组织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分级的区划之上，每个区划单位构成各种行政管理的唯一基础。普遍实施由纳税限制的国民主权原则，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最广泛的地方分权化便这样实现了。它符合全国的深切期望，然而，地方自治在不同程度上只对资产阶级有利。

1.行政权的分散

1789年12月22日关于初级议会和政务会议的法律决定采用新的领土划分。重叠纷乱的旧区划由一种统一的制度所取代：省下设若干县；县下设若干乡；乡下设若干市镇。1789年11月3日，图雷曾提出一项几何式划分的方案：把法国分为若干个面积为320平方里[1]的省；每个省由9个公社组成；各公社的面积为36平方里……米拉波反对这种划分，他要求充分尊重传统与历史：

“我主张划分要实事求是，考虑到地区和环境的固有特点，而不赞成数学式的，近似于唯心的划分。这样的划分是难以实施的。我认为，划分的目的不只是建立按比例的代表制，而是把对人与对物的管理结合起来，使公民能最大限度地参与管理。最后，我要求实行一种不显得过分标新立异的划分。恕我直言，这种划分应该容忍既成现实甚至错误，能够同样满足各省的愿望，并建立在已经成形的关系之上。”

1790年1月15日的法令把省的数量定为83个，以米拉波宣布的原则为划分的根据。省的划分远非是抽象的分割，而是服从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绝对必要。但是，旧省区的传统生活框架还是被打破了，全国都配有明确的行政单位。

1789年12月14日的法律对市镇行政的组织作出了规定：由每个市镇的积极公民选举出市镇总议会，任期两年。该议会由地方显贵和市政府组成。市政府中设市政官员、市长和市镇检察官，在较大的城市中还设有副检察官，其责任是保卫市镇共同体的利益。市镇拥有广泛权力：规

定税收的基数和进行征收，维持秩序，动用国民自卫军和宣布军法管制，还拥有普通治安司法权，市镇机关由直接选举产生，比两级选举产生的省行政机关要民主些。市镇生活紧张激烈是大革命时期法国的特点之一。

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规定了省的行政组织。由省选举大会选出36名省议会议员，任期为2年，组成省的评议机构。省议会任命8名议员组成常设机关——政务厅，作为省议会的执行代理。各省政务厅设立1名总检察官，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他与各部大臣直接联络，代表总体利益；实际上是行政部门的秘书。省政务厅控制本省全部行政管理，承袭了监察官过去的权力。中央当局在各省没有任何直接代表，各省俨然成为大资产阶级手中的小共和国。县的组织形式与省完全吻合（县议会由12名代表组成，县政务厅由4名成员组成，设有县检察官）。县级行政专门负责出售国有财产和分配各市镇的税额。乡一级不设置任何专门行政组织。

这样一来，一种由纳税的选举人所实行的地方分权便取代了君主制的中央集权。中央权力对资产阶级掌握的地方当局丝毫不能操纵。国王虽然有权将地方官员停职，但议会却可以恢复他们的职务。国王也罢，议会也罢，都无法强迫公民缴纳税款或服从法律。当政治危机加剧时，行政权的分散为民族统一带来了险恶的后果。全国各地的权力都已属于遴选的机构。倘若这些机构落到新秩序的敌人手里，革命便会遭到损害。两年之后，为了保卫革命，中央集权又得以恢复。

2.司法改革

司法部门的改革所依据的精神同行政改革一样。旧制度时繁多的专门法庭被废除殆尽，代之以一套新的各级法院系统。这些法院以国民主权为本，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新的司法组织重视保护个人自由，由此形成一整套有利于被告人的保障：被捕后24小时内出庭；审判公开；必

须有律师协助。执行国民主权的原则导致了法官由选举产生和建立陪审团制度。卖官鬻职的现象不复存在，法官从获得法科学位的人中选出，他们以国民的名义行使权力。在诉讼中，由公民们对案件事实作出评判，然后由法官负责在法律方面进行判决。但只有在涉及刑事案件时才组成陪审团。

在1790年8月16日的法令中，国民制宪议会在民事方面设立了乡“调解法官”，这个词是从英文中借来的。调解法官由初级议会从积极公民中选出，任职两年。他对争讼在50锂以下的案件有终审权，对争讼在100锂以下的案件有初审权。调解法官还有无偿的司法职务（家庭纠纷法庭庭长等等）。法律仍然很注重强制裁判，尤其是对于所有家庭纠纷。组织这种调解法庭时常遇到困难（由于没有报酬，陪审员很不热衷），但是它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并成为国民制宪议会最牢固的创造之一。“县法庭”在调解法庭之上，它由经县选举大会选出的5名法官和国王任命的检察院官员组成，任期6年。县法庭审理对调解法官判决的上诉。它对争讼在100锂以下的案件有终审权，对于超过这个数额的争讼，不服它的判决可以上诉。专门的上诉法庭并不存在：县级法庭之间可互为上诉机关。

在刑事方面，1791年1月20日、7月19日和9月16日的各项法令建立起一种3级司法制度。在各市镇，由市镇官员组成的普通治安法庭审理本市镇范围内的犯法事件。在各乡，由调解法官和两名调解员组成轻罪法庭，审理不法行为。在省一级的首府设立“刑事法庭”，由省选举大会选出的1名庭长、3名法官组成。此外还有1名公诉人负责起诉和1名国王的特派员监督依法判刑。1个起诉陪审团（按事先制定的名单抽签，选出8名陪审员）决定是否有理由起诉。1个审判陪审团（按不同于前一个陪审团的抽签名单选出12名陪审员）判定被告事实是否成立。陪审员多为富豪，至少也得是积极公民。该法庭的审判为终审判决。1791年9月25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了1部刑法典，其中取消了一切“想象罪”（异

端邪说、亵渎君主等），将罪行定为3种（普通违警罪、轻微犯罪、应处人身和名誉刑罚的罪行）。预定的刑罪应是“绝对和明显必要的”，它只针对个人，并且一视同仁。

司法组织的最高一级是两个全国性法庭。根据1790年11月27日法律建立的“大理院”由每省选举1名法官组成，有权撤销其他法庭的判决。但是，它仅受理违反程序和法律的行为。被撤销的判决被转送给另一个同级法庭。“全国高等法院”建于1791年5月10日。它有权审理大臣和高级官员的罪行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这一套司法组织协调、合理，不受国王所左右。尽管司法始终是以国王的名义行使的，实际上它已成为国民的事务。司法权也和政治权、行政权一样都掌握在纳税的资产阶级手中了。

3.国家与教会

在旧制度时，国家与教会的关系盘根错节。因此，对国家和行政的改革必然导致对教会的改革。这项改革激起了一场宗教冲突，给反革命以可乘之机。国民制宪议会的大多数代表是虔诚的信徒，他们不希望发生冲突。天主教保留了举行公开仪式的特权，是唯一得到国家维持的宗教。但是，深受法国教会自主论影响的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自认为有能力改革教会。

僧侣的财源和产业是最先被触及的。什一税在8月4日之夜已被废除。1789年11月2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家将教会财产置于自己掌握之下，并负责以体面的方式提供神职人员生计、祭仪的费用和对穷人的救济。本堂神甫每年可领取1 200锂，在旧制度下他们只能得到750锂的“微薄薪俸”。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成了最初的国有财产。取消了教会的产业必然会导致对僧侣传统组织的否定。

1790年2月13日，修会僧侣被取消了。这种僧侣趋于衰落，舆论对

它没有好感，而它的财产又相当可观。由于献身誓愿遭到禁止，它的招募来源陷于枯竭。

1790年7月12日通过、8月24日颁布的“教士法”改组了俗间僧侣。行政区划成为新教会组织的框架。每个省设一主教府，主教和神甫也和其他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主教由省选举大会选出；神甫由县选举大会选出。新当选者由其教会上级授职。主教由大主教而不再由教皇授职。教士会议被视为特权团体因而遭到取缔。代替它的是主教区会议，负责教区管理。这样，法国的教会便成了一种国家教会。根据1790年2月23日的法令：神甫要在主日讲道时宣读和讲解议会的各项法令。

法国教会与教廷的联系松弛了。教皇的敕书须受到政府的检查，首岁教礼[2]也被取消了。尽管教皇在法国教会中始终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的一切裁判管辖权均被剥夺。按照埃克斯大主教布瓦日兰的说法，国民制宪议会把“为教士法洗礼”的工作留给了教皇。实际上，在需要使教士法得到教规认可时，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是由教皇还是由一个全国主教会议来批准呢？出于对主教们反革命活动的担心，国民制宪议会放弃了召开主教会议的设想。这样，它就得任凭教皇的摆布了。1790年8月1日，法国驻罗马的使节贝尼斯红衣主教接到命令：促使庇护六世批准教士法。贝尼斯红衣主教反对教士法。他的行为已不止是模棱两可，他和贵族派主教通信，把他们充满激情的书信转呈给教皇。最后，他对教皇抵制教士法的行动表示称赞，并为自己使命的失败感到庆幸。

教皇早已把人权宣言斥责为大逆不道，他的抱怨、不满不打一处来：首岁教礼被取消了；阿维尼翁放弃了教皇辖地的主权，要求并入法国。庇护六世对自己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威都十分重视。他首先想知道法国政府在世俗事务，尤其是在阿维尼翁问题上的意图是什么，然后再决定自己在宗教事务方面应采取的根本行动。他不打算很快决定立场，

以免为宗教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世俗利益。国民制宪议会采取了一种节制态度。1790年8月24日，它拒绝对阿维尼翁问题表态，把该城居民的请愿书转呈给国王。尽管如此，教皇仍然采取了拖延的做法，并进行了一场讨价还价。但教皇的算盘打错了。这不仅使他的利益受到损害，还使宗教信仰出现混乱，导致法国发生教会分裂和内战。

在此期间，由埃克斯的大主教布瓦日兰领导的主教团曾多次发表意见，迫切要求国王和教皇批准教士法正式实行。出现决裂并不是主教们所期待的。1790年10月30日，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中的主教发表了《教士法原则的论述》。他们并没有谴责教士法，而是要求该法在付诸实行前首先得到教皇的批准。教士法使法国教会得以独立。按照当时的教会法规，这不一定导致教会分裂。在1790年时，教皇永无谬误之说尚未被奉为教理。法国的主教们打算从教皇那里得到符合教规的承认，否则他们便感到没有把握进行关于教区划分和主教区会议的改革。教皇的抵制是由于多种动机所驱使，其中最重要的不一定是宗教方面的。天主教列强，尤其是西班牙鼓励教皇的反对立场。直到最后一刻，布瓦日兰仍希望教皇不把法国投入分裂之中，认为他有责任使教士法具有教会法规的形式。

国民制宪议会等得不耐烦了，便于1790年11月27日要求所有教士宣誓效忠王国宪法。由于教士法也包括在宪法之中，这也是要求对教士法宣誓效忠。只有7名主教进行了宣誓。神甫们分为势均力敌的两部分。就地区而言，两派分布并不平均："宣誓派"或称"宪政派"在东南地区占大多数；"反抗派"在西部占大多数。

教皇对教士法的谴责使分裂的状态无可挽回。在1791年3月11日和4月13日的敕书中，教皇激烈抨击了大革命的原则和教士法。于是教会彻底地分裂。从此以后，全国也分为两大阵营。反抗派教士的敌对助长了反革命骚乱，宗教冲突使政治冲突倍加激烈。

制宪议会代表们为什么没有采取别的做法呢？实际上，无论在道德还是物质方面，政教分离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教士法的失败才会导致这一结果。当时，任何人也不主张实行政教分离，甚至连想也未曾想过。哲学家们主张把教会同国家联系起来，使教会的神职人员服务于社会进步。国民制宪议会的代表们即使不是笃行信徒，也是天主教的恭敬拥护者；而人民则对天主教深信不移，绝不会接受与教会决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会妨碍其灵魂得救。政教分离会被理解为向宗教宣战，反革命分子会借此作为可怕的武器。实行政教分离在物质方面同样不可能。僧侣的财产已被没收，教士的生活需要国家维持，还要建立宗教预算。正是这些财政困难导致对法国教会的改组。为了节约开支，近一半旧的主教区被取消，大多数修道院被关闭。因此，宗教改革是与行政部门的改造和财政问题紧密相关的。

4.税收改革

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在进行制度改造中依据的总原则同样适用于税收改革，这种改革也是陈情书所表达的主要愿望之一。纳税被作为一种“贡献”，且实行人人平等。在全国推行统一的合理化税额分配，与收入成正比，落实到个人，每年缴纳1次。国民制宪议会制定的这样一种税收制度减轻了纳税群众的负担，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间接税被取消了，只保留了建立土地税和流动财产税所必要的注册费，以及印花税和海关税。

新税收制度包括3项主要直接税。1790年11月23日建立的“土地税”是对地产收入课征的捐税。根据重农学派的原则，这是一项主要税收。但是，为了确定对地产的课税基数，必须制定出全国土地的测定及估价登记册，这样才能切实调整税收，即在省、市镇和纳税人之间实行公平摊派。国民制宪议会则只能满足于根据原税收额定出每省应缴纳的数额。市镇的税收底册是根据纳税人的申报制定的。1791年1月13日创建的“流动财产税”，是对租金或房租的实际收入所课的税收。法律规定

对负担重的家庭减免税收，对独身者则增加税收。1791年3月2日建立的“营业税”，是针对商业和工业收入的税收。所有这些税收的分派均由市镇负责，因而引起了不少挫折。各市镇常常没有办法，甚至没有愿望做好这项徒劳无益的工作。把旧的念一税作为基础，略加修改后制定出税收分派方案，这种应急的方法激起了强烈不满。尤其是流动财产税使农村居民负担不起，而城市资产阶级却受到照顾。为了平息对税收的责难和加速税收的分派，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6月任命了一些特派员负责协助市镇。

新的征收制度使这些麻烦更为突出。市政府被授命征收捐税：法律并没有设立专门的财政管理机构。在县里，由经选举产生的1名收纳员收集所有税金；在省里，由1名总主计员按国家财务署的命令支付开支；最上面的国家财务署于1791年3月建立，由国王任命的6名专员组成，负责批准各部门的开支。

这是一种简单、统一化的财政组织，在整个19世纪中，其主要轮廓一直保留着。但它在当时却加剧了财政的危机。新制度的推行需要一定时间，然而旧的捐税在1791年1月1日被废除后，地产税才刚刚建立，流动财产税和营业税还尚未出世。1789年10月6日创建的爱国捐占纳税者收入的1/4。但它也不能在短期内收回钱款。内克发出的国债（1789年8月9日为3 000万锂，利率为4.5%；8月27日为8 000万锂，利率为5%）宣告失败。同时，偿还僧侣债款、官职购买金、官职保证金，紧接而来的教士膳宿费和宗教礼仪费等开销使国家的负担更为加重。国库空虚，国家只得靠贴现银行的借款混日子。

财政危机迫使国民制宪议会采取了两项导致社会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措施：出售僧侣的财产和发行一种纸币——指券。

Ⅳ.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平衡：指券与国有财产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对国民制宪议会中资产阶级事业产生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为何不得不超越这种已经满足了自己利益的、合理而协调的政治结构。它迫使自己作出更果断的决定，从而加剧了社会动荡。当然，它既不希望也未料到会出现这种后果。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动荡毕竟为新制度提供了一个坚固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

1.指券与通货膨胀

货币改革及其广泛的社会后果是由财政危机所引起的。1789年11月2日，国民制宪议会决定把僧侣的财产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然而这还不够，还必须使这些不动产“发挥效用”。1789年12月19日，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以4亿锂的价格拍卖教会财产，同时发行同等数额的“指券”。指券是一种按照国有财产确定价值的票据。起初，指券只是含利息5%的债券，可以用教会财产进行偿付，它代表着国家的信誉。指券最初只有1 000锂一张的大票面。随着教会财产的出售，指券应该被陆续收回，作废和被销毁，这样便偿清了国家债务。

要使这种做法取得成功必须速战速决。但是，指券的推销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形势动荡不安；僧侣仍控制着其财产管理权；改革教会的法令尚未通过。这种情况促使国民制宪议会采取了断然措施：1790年4月20日，剥夺了僧侣对其财产的管理权。一个月后，它又创立了宗教祭仪的预算。5月14日，它确定了出售国有财产的具体方式。但是，国库依然空空如也，赤字在不断上升。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国民制宪议会逐渐不由自主地把作为国库券的指券转变为一种纸币了：它不再含利息，并且具有不受限制的偿还能力。1790年8月27日，指券开始成为银行票据，发行量达到了12亿锂。中等票面（50锂）开始出现后，又印行了5锂的低面值指券（1791年5月6日）。于是，最初被用来偿还国债的措施背离了原来的目的，成了弥补预算赤字的手段。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方面的后果表现在货币性指券的膨胀异常迅速，发行量成倍增加。国民制宪议会在1790年5月17日允许货币买卖即是促使指券贬值，金属货币都隐而不现了。两种价格随即出现：一种以硬币支付；另一种以纸币支付。低面值指券的印行使贬值更为加剧。在1790年中，指券的兑换率一再下跌，失去的价值从5%上升到25%。1791年5月，在伦敦市场上100锂指券只能值73锂了。

在社会方面货币性指券也造成了多种后果。人民各阶层成为通货膨胀的牺牲品，其生活条件不断恶化。领取纸币工资的帮工和工人的购买力日益下降。生活费用日渐昂贵，食品价格上涨引起了和饥荒同样的后果。社会骚乱再度出现。生活费用昂贵使城市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资产阶级，并促使大资产阶级倒台。对于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来说，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果也不轻。一些官员的职位被取消了；旧制度时把积蓄换成公债或抵押货款的食利者也因贬值而减少了收入。通货膨胀使已经到手的财富蒙受损失。然而，通货膨胀也使得投机商有利可图。尤其是货币性指券，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得到僧侣的财产。作为国库券的指券，则只能将僧侣财产交给国家的债权人，如国家供应商、金融家和被取消职位的官员。于是，指券不再是一种财政方面的权宜措施，而成为强有力的政治、社会手段了。

2.国有财产的出售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巩固

通过出售国有财产和发行指券的制度，大革命逐步向重新分配地产的方向迈进，使这场革命的社会性质更为突出。实际上，国有财产出售的方式不符合小农们的愿望。大多数农民完全没有土地或没有足以独立生活的土地。土地问题本可以通过把国有财产分割为小份和简化出售手续，以便增加有地农民数量的方法得到解决。这样，以废除封建权利为开始的土地改革便会全面展开。然而财政需要占了上风，这种需要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同赎买封建权利一样，国有财产的出售也不是为了满足农民群众，它使有产者的优势地位得到加强。

1790年5月14日的法律规定，僧侣的地产将在各县政务厅所在地公开拍卖，实行按不同经营的地块整份出售。所有这些条件都不利于贫困农民。另外，地租也仍旧保留了下来。但是，为了把一部分农民拉到资产阶级新秩序一边，国民制宪议会准许在12年内付清购地款额，年息为5%；如果地产分小块招标比整份出售的价格高，便允许分割拍卖。在某些地区，农民们合伙购买本村出售的土地；另一些地方的农民则用暴力驱走竞买者。农民的地产有所增加：在康布雷齐，在1791—1793年间，农民比资产阶级购买的土地多10倍。在庇卡底、拉翁或桑斯附近地区也是如此。尽管这样，从出售僧侣财产中获利最多的还是有地的自耕农，大佃农，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短工和小农中很少人能得到一小块土地。虽然教会大领地的解体造成了土地经营的分散，使不少农民以分成制佃农或永佃农的身份从土地中受益，但土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久，指券的贬值使从事土地投机的冒险家和唯利是图的工商业者“黑帮”发了大财。

国民制宪议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它涉及政治、行政、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法国和法兰西民族获得了新生，新社会的基础被奠定下来。作为受到理性和启蒙思想熏陶的一代人，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建立了一套合理、清晰和统一的社会结构。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把庄严宣告的自由、平等原则加以歪曲，为本阶级所用。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激起了人民各阶层和民主派的不满，同时也引起失去优势地位的贵族和旧特权阶级的仇恨。国民制宪议会尚未解散，工作尚未完成时，各种困难已经成咄咄逼人之势了。国民制宪议会把新的国家建立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隘基础之上，这必然使它的事业矛盾重重。它一方面被迫与不甘妥协的贵族阶级斗争，同时又对迫不及待的人民加以排斥。这便使资产阶级的国家陷于动荡不安，接着又陷入战争之中。

新的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的统一，但这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联系。彻底摧毁了四分五裂的封建状态，实现了国内的流通自由后，国内市场统一

起来。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互相之间的联合也巩固起来。“壁垒后移”和为使民族生产不受外国竞争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使法兰西民族与外国的区别明显起来。然而，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项统一大业的同时却以经济解放促使了第三等级的分裂。在行会和制造条例被废除后，行会师傅丧失了垄断权，这使他们万分恼怒。粮食贸易的自由引起了城市和农村人民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农民中对耕种自由的敌对程度不次于对粮食贸易自由的敌对，因为它使贫苦农民借以为生的集体权利不复存在。依恋市场管理和传统经济的群众大失所望，这几乎使他们背离这个按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而设计的祖国。

人民群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的组织之外。这种组织建立在纳税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通过宣布理论上的平等、取消旧制度下分化社会的各种“团体”和肯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主义观念，奠定了一个民族的基石。这个民族将包括所有的人。但是，他们把财产权列入了天然的和永不失效的权利之中，这便在他们的成就中产生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保留奴隶制和把选举组织法建立在纳税的基础上，这两项措施把这一矛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政治权利的多少取决于财富的多寡。300万消极公民遭到排斥。难道整个民族只是由构成初级议会的400多万积极公民组成的吗？难道民族只集中体现在选举大会本身的5万名选举人身上吗？

“民族、国王、法律”这一著名口号在民族主权原则的幌子下成为国民制宪议会成就的象征。但它掩盖不了问题的实质。民族被缩小到有产业的资产阶级这个狭隘范围内，仅仅由纳税者组成的民族是抵御不住反革命和战争打击的。

---

[1] lieue，法国古里，约合4公里。——译者

[2] 教士获得圣职后献给教皇的一年俸禄。——译者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 年）

从1791年开始，国民制宪议会的制度结构在矛盾发展的压力下出现了裂痕。贵族阶级仍在负隅顽抗，拒绝任何妥协。这使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再次提出的和解方案不可能实现。向外国求助的行为已众所周知，对外国入侵的恐惧使人民心目中产生了贵族在搞阴谋的看法。这样，民族问题逐渐上升到首位，它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紧张气氛，并打破了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权赖以建立的脆弱平衡。

Ⅰ.反革命的猖獗与人民的奋起

从1790年夏天起，由拉法夷特推行的政策已经破产。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和解已无实现的可能。宗教分裂和反抗派教士的骚乱助长了贵族阶级的反抗。指券贬值和经济危机促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1.反革命：贵族、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

流亡者、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力量加在一起，汇成了一股反革命敌对力量。

流亡者在国境地带制造的骚乱逐渐明显起来。他们主要集中在莱茵地区（科布伦茨、美因兹、沃尔姆）、意大利（都灵）和英国。流亡者们从事阴谋活动的目的在于挑动外国对大革命进行干涉。1791年5月，阿尔图瓦伯爵与莱奥波德二世皇帝在芒图进行了一次会面。然而，皇帝对问题持回避态度。

贵族阶级的动乱已在全国范围展开，涉及的领域不仅限于宪法方面。贵族、“黑帮”们想方设法使指券丧失信用，极力干扰国有财产的出售。武装阴谋活动大量增加。1791年2月，“短刀骑士”们曾试图在杜伊勒利宫劫持国王。1790年8月，在韦瓦雷南部有两万名保王派国民自卫军组成了雅莱营，一直到1791年2月才被武力取缔。1791年6月，莱扎迪埃尔男爵在旺代策动了一次叛乱。总之，贵族到处都在蠢蠢欲动。

反抗派教士的动乱为反革命的敌对活动增添了动力。他们与贵族同舟共济，成为反革命的积极分子。他们照旧主持祭礼，管理圣事。国家出现了分裂，许多老百姓不愿意抛弃“好教士”，是由于担心灵魂不能获救。这样，反抗派便把一部分群众拉进了反革命的敌对派阵营。由于混乱局面扩大，国民制宪议会在1791年5月7日允许反抗派教士搞宗教活动，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活动对待。宪政派教士对此大为恼怒，他们担心不能抵制反抗派教士的竞争。宗教战争爆发了。

2.人民的奋起：社会危机和政治要求

革命方面的反对派也在发展，这使得国民制宪议会的中庸政策难以推行。

反教会的骚乱是对反抗派教士动乱的报复。宗教斗争不仅使贵族党派的力量成倍增加，也促进了一个反教会党派的形成。雅各宾派为了支持宪政派教士，对罗马天主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谴责宗教迷信和狂热崇拜。

开展这种宣传的《乡村报》写道：“有人责备我们对天主教不太宽容，责备我们对永恒的信仰之树没有始终关照。但是，当他们仔细观察一下这棵不容侵犯的树时便会发现：所有枝杈上都交错横生着狂热崇拜。因此，断其一枝必然会触动其他枝干。”

反教会作家的勇气更大，他们提出取消宗教预算，主张建立一种爱国的与公民的信仰，盛大的全国联盟节便是这种信仰的前兆。

民主派的骚乱也是对反抗派教士的动乱的报复。国王和拒绝宣誓的教士们互相勾结起来，这反而促进了民主派的壮大。从1789年起，罗伯斯庇尔便提出了普选制的主张。人民俱乐部的大量涌现使民主派势力有所发展。在巴黎，教师当萨尔在1790年2月2日创立了第一个“两性爱国者联谊社”。这些接纳消极公民的人民团体，在1791年5月组成了一个中

央委员会。在1790年4月建立的科尔得利俱乐部是名副其实的战斗组织。它监视贵族，监督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募捐、请愿、示威等活动，必要时还举行暴动。因此，这个俱乐部是运动的主导。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博纳维尔在《铁嘴报》上都鼓励这一运动的发展。一些民主派甚至自称拥护共和，他们集合在罗贝尔的《国民信使报》周围。

社会骚乱自1791年春天起再度出现。在尼韦尔内、波旁内、凯尔西和佩里戈尔都发生了农民的骚乱。巴黎的工人也跃跃欲试。失业有增无已，奢侈品工业濒临破产，生活费用上涨。一些职业团体，如排字工、马蹄铁匠、木工等联合起来要求规定最低工资额。联谊团体和民主报刊对工人的事业予以支持，谴责企业主和批发商利用经济自由大搞“新的封建制”。社会骚乱助长了民主派的活动。

3.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与社会的巩固

面对上述两种威胁，国民制宪议会制定了强硬的政策。资产阶级对人民运动发展的恐惧丝毫不亚于对贵族反革命阴谋的害怕。拉法夷特的威望以及他对国王的影响现已消失殆尽。米拉波一时间成为头面人物。

米拉波曾被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排除在内阁之外。他被宫廷所收买，转而报效国王。他向国王呈递第一份奏章是在1790年5月10日。米拉波主张国王拥有实权，他极力促使议会赋予君主宣战权和媾和权。他向路易十六提供了一项庞大的宣传和贿赂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党派，让国王离开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向国民求助。在整套计划中，宫廷只采纳了贿赂一项。王室费总管塔隆通过积极行贿，使王室的同谋者和代理人为数大增。路易十六对米拉波同对拉法夷特一样不信任。米拉波于1791年4月2日猝死。他的政策由于中断而免于失败，他的死亡使革命舞台上失去了一个主要演员。

巴纳夫、迪波尔、拉梅特三巨头马上取代了米拉波的位置。民主派的壮大和人民的骚乱比贵族的阴谋更使他们警觉。他们也主张现在停止

革命。三巨头靠宫廷给的钱发行了一份新报——《文史学家》。他们开始与拉法夷特接近，逐步向右转。他们控制着国民制宪议会，也迫使它作同样的转变。消极公民被排斥在国民自卫军之外；集体名义的请愿遭到禁止；禁止结社和罢工的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通过。左翼当时的表现便是在这样一种反动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罗伯斯庇尔当时闭口不言，然而他曾经在所有场合英明、果断地保卫了人民的权利。1791年4月27日和28日，在关于国民自卫军组织的辩论中他发言："是谁进行了我们这场光荣的革命？难道是阔佬们，是有权势的人吗？唯有人民有愿望并有能力进行这场革命。同样，唯有人民现在能支持革命。"

勒夏普利埃法的社会后果连马拉也未完全估计到，他把它看成一项限制集会和请愿的反动政治法律。他在1791年6月18日的《人民之友报》上写道："他们剥夺了无数劳工和工人阶层在一起名正言顺地商议自己事务的权利……他们一心只图把公民们互相孤立起来，防止他们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与贵族阶级实行妥协的政策又冒头了。由于害怕民主，三巨头和拉法夷特主张修改宪法，提高选举的纳税标准和加强王权。但是，这种政策必须得到"黑帮"和贵族们的支持以及国王的同意才能成功。贵族负隅顽抗使之不能实现。国王的出逃充分显示出这种政策的虚浮。

Ⅱ.大革命与欧洲

在1791年当中，国内的动乱加上在国外的困难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处境越加艰难。新生的法国与旧制度的欧洲针锋相对，正如封建贵族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君主专制与自由政府之间的对立一样。各国之间的敌对有时会转移它们对法国事务的注意力。流亡者和路易十六求助外国恢复其专制权力和社会优势地位，这便使冲突不可避免。

1.革命的传播与贵族的反动

各国的君主从一开始便对革命思想的宣传和扩张力深感不安。大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和1789年原则本身就具有足以发动各国人民和动摇各君主专制权力的影响力。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极大好奇心。外国人纷纷涌向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向自由朝拜者”。他们中有美因兹的乔治·福斯泰尔、英国诗人沃兹沃恩、俄国作家卡拉姆津等等。他们参与政治斗争，出入俱乐部，成为大革命思想的积极宣传者。他们中最狂热的应属来自萨瓦、布拉邦特、瑞士、莱茵地区的政治难民。从1790年起，瑞士难民，尤其是日内瓦人和纳夏泰尔人便组成了“海尔维第[1]俱乐部”。

在法国之外，启蒙思想在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传播发展，使德意志和英国对大革命的影响尤为敏感。

在德意志，教授和作家们兴高采烈，例如在美因兹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的福斯特，汉堡的诗人克洛普施托克、普鲁士的哲学家康德和菲希特。在杜炳根，大学生们种植了一棵自由树。这一运动还超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扩展到资产阶级和农民中间。在莱茵河地区的伯爵领地，农民们拒不缴纳领主捐税；在萨克森的梅桑爆发了农民骚乱；汉堡的资产阶级在1790年7月14日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一天，参加者们身佩三色绶带，女孩合唱团讴歌自由的诞生，克洛普施托克还朗诵了他的颂歌《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啊，高卢的自由，

我纵有千万张歌喉，

也难以将你赞颂：

我的声音是那样的微弱，

啊，神奇的自由，

她无所不能……

在英国，辉格党的首领之一福克斯、奴隶制的反对者威尔伯福斯、哲学家边沁和化学家普里斯特莱都公开声明自己赞同大革命。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大革命初期曾持赞许态度。但是，随着革命事态的急剧演变，它的态度逐渐冷淡下来。只有激进派和异端分子坚持同情大革命，要求在本国实行改革。179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个“宪法社”；在1791年，“伦敦推动宪法情报社”重新建立。诗人们长期忠实于自己最初的激情，他们是布莱克、彭斯、沃兹沃恩和柯勒律治。1789年，柯勒律治在《法兰西》赞歌中表达了他如醉如痴的喜悦：

当法兰西怒火满腔，举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着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顿足盟誓：不获自由绝不罢休……

然而，欧洲的反动势力不久便锋芒毕露。封建制度被废除后，贵族阶级成为反革命。教会财产被没收后，僧侣也成为反革命。层出不穷的动乱使资产阶级深感不安。流亡者千方百计地挑动拥护旧制度的阶级反对革命的法国。阿尔图瓦伯爵从1789年后定居都灵，1790年，在特雷弗选侯的领地上组成了第一批武装。既疲于奔命又高傲自负的流亡者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祖国的利益之上。他们吹嘘只要几支部队便可征服被一小撮煽动者控制的巴黎。自1790年初，在德意志已经有人撰文抨击法国的民主运动，如在耶拿的《文学报》上。在英国，土地贵族和英国教会挑起了反革命活动；在1790年选举中，托利党的多数地位更为加强，议会改革推迟进行。1790年11月，伯克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这成了反革命的福音书。该书谴责法国大革命使贵族阶级破产，并摧毁了等级差别这个神圣的制度。1791年，因支持北美起义军而闻名于世的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人权论》中驳斥了伯克的观点，此书在人民中产

生了巨大反响。伯克提出了组织反革命十字军的主张。几乎与此同时，教皇庇护六世在1791年春也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予以严厉谴责。3月，西班牙政府沿比利牛斯山脉用军队设置了一条防线，制止“法国瘟疫”的蔓延。路易十六对跃跃欲试的欧洲反革命势力寄托了全部希望。

2.路易十六、国民制宪议会和欧洲

路易十六的政策与欧洲贵族阶级的愿望不谋而合。他秘密地向各国君主请求干涉。流亡者们也朝此方向努力。阿尔图瓦伯爵要求马德里组织武装干涉，支持在法国南方酝酿的叛乱。从1790年11月起成为流亡大臣的卡洛纳[2]指望从普鲁士那里得到帮助。孔代亲王在科布伦茨召集的军队准备为外国军队开道。旧制度看来又可以恢复了。路易十六只是在表面上接受大革命。1789年11月，他写信给西班牙的查理四世，对自己被迫作出让步表示了不满。1790年底，他决定出逃，并命令镇压南锡兵变的刽子手、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为出逃进行准备。他的目的是请求欧洲列强命令国民制宪议会修改法令，并在边界炫耀武力，施加压力。

各国君主对大革命的敌视是普遍的。然而他们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对组织反革命十字军表现得十分热衷：“摧毁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这会留下万古英名。”瑞典的居斯塔夫三世则准备统率联盟军队，他于1791年春天驻扎在埃克斯-拉-夏佩尔。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都同意动兵。德意志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以及英国政府则表现得较为谨慎。各国君主之间的钩心斗角和领土野心使他们四分五裂。如果没有担任联盟首脑的德意志皇帝，他们必然会一事无成。然而，莱奥波德二世并不完全敌视宪法改革，他对法国国王的权威被削弱并不恼怒。再说，他属下的各邦国以及它们的东部边界已经足够他操心了。

国民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以解决各国君主与大革命之间的冲突为重点，这些冲突涉及法律方面和领土方面。

阿尔萨斯发生的“异族王公”事件是由于废除封建权利所引起的。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意志诸侯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他们向日耳曼帝国议会表示对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决议的抗议。

阿维尼翁事件致使教皇与法国作对。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起义，并废除了旧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举行投票，决定并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犹豫不决遂使此事耽搁下来。当8月24日开始讨论阿维尼翁的问题时，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力图避免使教皇对法国革命产生新的不满，结果特隆谢的决议案得以通过：由于国王在外交方面有创议权，阿维尼翁人的请愿呈送国王定夺。因为制宪议会不打算因一个不合时宜的表决而损害正在进行的、关于批准教士法的谈判。

与此同时，在1789年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国际公法逐步确立起来。1790年5月22日，国民制宪议会庄严地宣布废弃征服权：国家的组成只能基于人们意志的自由表达。1790年11月，国民制宪议会向德意志诸侯宣布：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出于征服权，而是出于其居民的意愿，他们参加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便是证明。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以自愿组合的国家否定王朝国家，并从中总结出新国际公法的准则。他指出：“去年，在这个议会中，由一切新旧法国人订立的社会公约是你们和阿尔萨斯兄弟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合法依据。”他在这里指的是，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自命为国民议会的决议和同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接着他又提出，这里仅涉及到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即“阿尔萨斯人民能成为法国人是否依据了外交文件？……对于阿尔萨斯人民和法国人民来说，专制时期那些旨在把前者结合于后者的协定有什么意义呢？阿尔萨斯人民与法国人民结为一体，这是出于他们的愿望。因此，使这种结合合法化的仅仅是他们的意愿而不是明斯特条约”。

阿尔萨斯的这种意愿在1790年7月14日参加联盟节时已经表达出来了。

1791年5月，鉴于教皇对教士法已持谴责态度，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以便征求居民的意见。两地与法国合并的法案于1791年9月14日通过。在各国君主看来，新的国际公法等于宣布赋予革命国家一种权利：只要哪一国人民有这种愿望它就可以将其归并。这样一来，旧制度的外交便全被打乱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担心一旦发生战争会使宫廷从中渔利。它给了德意志诸侯一笔补偿费，而路易十六则立即鼓动诸侯拒不接受。国民制宪议会尽量拖延对阿维尼翁的归并。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被纠缠在波兰事务中不得自拔，这种和平政策才得以顺利推行。莱奥波德二世认识到，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鼓励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是为了使波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他们，而他自己将会在西方抽不出身，因此他宁愿置身事外。

但是，国王的出逃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和平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莱奥波德二世也因此被迫对法国事务进行干涉。

III.瓦雷恩：国王对革命的否定（1791年6月）

国王的出逃是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国内方面，它表明了王权与革命的国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外交方面，它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1.国王的出逃（1791年6月21日）

国王的出逃是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尔·德·费尔桑伯爵长期筹划的。他借口护送贵重财物经驿站来到布耶的军中，在通向圣默努的一路上布置了驿马和骑哨。这样，路易十六可以取道马恩河上的夏隆和阿尔戈尼直达蒙梅迪。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后，路易十六改扮

成侍从，与全家离开杜伊勒利宫。此时，拉法夷特正在视察城堡的哨位，并认为万无一失。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宫留着一个不上岗的门，这使费尔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寝宫。

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上路了。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5个小时。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队久等不见国王踪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当国王赶到瓦雷恩时并没有找到预定的接应驿马，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在圣默努时，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闪闪，他被驿站长的儿子德鲁埃认了出来。德鲁埃赶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轿式马车，并让人截断了埃尔河上的桥梁。当国王准备重新启程时，发现桥被阻断。此时警钟鸣响，农民们蜂拥而来，赶来的轻骑兵队也与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国王一家重新启程返回巴黎。在他们两旁是由各村赶来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人墙。当布耶闻讯奔来时，国王已经上路2个小时了。6月25日夜国王进入巴黎时，周围死一般沉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这俨然是“君主制的送殡行列”。

路易十六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法国人民宣言将他的企图暴露无遗。他要先投到布耶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路易十六的全盘秘密政策都是为了挑起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自己从中得益。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丰布吕纳修士为密使去见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竭尽全力使法国与阿尔萨斯诸王公之间的冲突恶化。路易十六并非如人们常说的，是个简单、软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他很有点小聪明，他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2.瓦雷恩事件在国内的后果：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后果：国王出逃激起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掌权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并

保持君主制。

瓦雷恩事件发生后，民主运动发展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成员从6月21日起就要求国民制宪议会建立共和制，或者至少在决定国王的命运前征询各初级议会的意见。他们宣布：“我们终于摆脱了国王，获得了自由。”国王的出逃成了促使人民群众加强民族觉悟的决定性因素。它向人民群众揭示了君主制与外国的勾结，它激起的强烈情绪一直扩展到最偏远的农村。人们担心外国入侵，便在要塞和边境自发地进入防御状态。国民制宪议会从国民自卫军中调了10万名志愿兵。这种社会和民族的反应所产生的效果与1789年的情形相似。在瓦雷恩，原本为保护国王出逃的轻骑兵队全都转向了人民一方，并高喊着：“民族万岁！”防御的反应突然呈现出来。1791年6月22日夜晚在圣默努附近，当地的领主当皮埃尔伯爵在前来欢送路易十六时被农民们杀死。在1791年的恐惧中，民族激情与社会仇恨激发了同样强大的力量。国王的出逃仿佛表明外国入侵已迫在眉睫，人民群众如同军队一样组织动员起来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却保持着冷静：它担心农民起义，同时也畏惧城市人民运动（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被通过）。国民制宪议会中止了国王的职能及其否决权，它把法国组成了事实上的共和国。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在阻止民主发展方面也毫无顾忌。它编造了“国王被绑架”的虚构情节。6月21日晚，巴纳夫对雅各宾派大声疾呼：“宪法就是我们的指南，国民制宪议会就是我们汇集的中心。”尽管罗伯斯庇尔表示抗议，路易十六仍得以免受起诉。只有布耶等制造“绑架”的人被指控。布耶在1791年6月26日给国民制宪议会的信中包揽了一切责任，但他早已逃之夭夭。7月15日和16日，国民制宪议会对布耶和另外几个无足轻重的从犯发出了起诉令。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

尽管国王的叛卖和贵族的危险不容否认，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始终认为国家应该是有产者的国家。对于它来说，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既定意图。巴黎人民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和其他友好团体的鼓动下频频举行请愿和示威活动。1791年7月17日，科尔得利俱乐部成员在马尔斯校场集合，在祖国祭坛上对一项要求共和的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国民制宪议会以扰乱秩序为借口命巴黎市长驱散集会。戒严法一宣布，由清一色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闯入马尔斯校场，并且不经事先警告就朝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致使50人倒地身亡。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镇压。许多人遭到逮捕；不少民主派报刊被迫停止发行；科尔得利俱乐部被关闭。一时间民主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便是所谓“三色”恐怖。

马尔斯校场枪杀案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爱国党分裂成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雅各宾派中的保守部分于1791年7月16日后就已分离出去，在斐扬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新俱乐部。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由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民主派更加突出了。集合在斐扬俱乐部里的、以拉法夷特派和拉梅特派联合而成的立宪派却准备与国王和“黑帮”和解，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事业，并坚持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于是，妥协政策再一次出笼。然而贵族阶级却仍旧顽固不化。

宪法的修改并未达到控制局面的“三巨头”所期望的程度。但是宪法中对选举权规定的财产标准更加提高了。选举人无论是产业主还是承租人，根据不同情况，其财产应分别相当于150、200和400个工作日的价值。1791年7月28日的法令经过9月19日法令的重申和修正后，使国民自卫军的组织最终定了型：只有积极公民才有权参加国民自卫军。在武装

的资产阶级面前，人民只能赤手空拳。经过这样修改后，国王于1791年9月13日接受了宪法。14日，他再一次向国民宣誓效忠。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又一次相信，大革命结束了。

3.瓦雷恩事件在国外的后果：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外同样引起了重大的后果。国王的出逃和被捕在欧洲君主中激起了巨大震动。普鲁士国王惊呼："多么可怕的榜样啊！"然而这一次也同以往一样，一切都取决于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在芒图向各国宫廷建议：协同起来，拯救法国的王室和君主制。但是，君主们各自的打算和利益远超过君主团结的感情，这使反对法国的欧洲协调不可能实现。斐扬派的政策使莱奥波德对路易十六的命运感到放心。为了掩饰他的退缩，皇帝只满足于在1791年7月28日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签署了一份皮尔尼茨宣言。该宣言只是以欧洲干涉的可能性对革命进行了恫吓。这两位君主宣称"互相配合，以必要的力量随时准备行动"。但条件是其他列强决意与之同心协力："只有这时和在此种情况下"，干涉才可进行。实际上，法国舆论只照字面理解了皮尔尼茨宣言，这也正是宣言作者所希望的。这种外国干预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大革命感到面临着威胁，民族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激昂高涨。

1791年9月30日，国民制宪议会在一片"国王万岁！""民族万岁！"的欢呼声中自行解散了。它的领袖们认为已经在王权和纳税的资产阶级之间订立了协议：既反对贵族阶级的反革命，也反对人民的运动。但是，国王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1791年宪法。国民与资产阶级并不像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融为一体。当瓦雷恩事件的危机发生时，国民制宪议会下令从国民自卫军中征集10万人。它既不信任王家的前线部队又拒绝依靠人民。它所信赖的是国民，即宪法中所规定的有纳税能力的国民。事态的发展使他们的打算陷于落空。皮尔尼茨宣言发出后，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在危险面前，资产阶级尽管迟疑不决，但又不得不求助于人民。然而，人民在摧毁了出身的特权之后不愿再长期容忍金钱特权的压迫。他们要求在国民中有一席之地。从此以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新的形式提上日程。

---

[1] 海尔维第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瑞士。——译者

[2] 卡洛纳在1787年4月被解职后，为逃避高等法院追究而出走英国。1789年11月，他到都灵投奔阿尔图瓦伯爵，后被其任命为财政大臣。——译者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在1791年宪法基础上确立的自由君主制的尝试连一年也未能维持。在国王领导的贵族反革命和人民运动这两面夹击下，掌权的资产阶级为了消除国内的困难不惜使国外的困难变得更严重。它与国王同谋，把法国和大革命投入战争之中。然而战争却使其发动者的打算全部落空了。战争使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导致了王位的倾覆，并且在几个月之后又导致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倒台。

轻率地挑起与贵族阶级的欧洲的冲突后，革命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向人民求助，进而向人民做出让步。于是国民的社会内涵被扩大了。实际上，这一现象是从战争具有民族和革命两种性质之日开始形成的。这场战争既是第三等级反对贵族阶级的战争，又是全民族反对旧制度的欧洲联盟的战争。法国的贵族阶级在国内大搞反民族的战争，欧洲的贵族阶级对法国大兵压境。在这种威胁下，基于纳税额的选举制度这一脆弱框架在人民的奋起中土崩瓦解了。

Ⅰ.走向战争（1791年10月—1792年4月）

1.斐扬派和吉伦特派

在1791年以前，资产阶级是团结有力的。瓦雷恩事件发生后，它发生了分裂，皮尔尼茨宣言使这种分裂更为加剧。无论在议会里还是在全国，资产阶级在它的敌人面前已经不再构成一个统一阵线了。

在新的立法议会中，代表的主体仍然来自资产阶级，产业主和律师在其中占优势。初级议会6月指定的选举人在1791年8月29日—9月5日任命了议会议员。这发生在马尔斯校场事件之后和皮尔尼茨宣言激起的不安之中。立法议会745名议员在1791年10月1日第一次集合。他们都是些新人（在罗伯斯庇尔的要求下，国民制宪议会代表在1791年5月16日通过法令，宣布他们自己不得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大多数是年轻人（议员中多数为30岁以下），尚无名气。他们中许多人是在市镇和省的议会中崭露头角和开始政治生涯的。

议会右翼由264名斐扬派议员组成。他们既反对旧制度也反对民主，主张有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正如1791年宪法所规定的那样。但是，斐扬派中有两种倾向，或者说是两股帮派。拉梅特派对巴纳夫、迪波尔和拉梅特“三巨头”言听计从。虽然这3人不再为议员，但大部分新大臣都由他们选择，例如外交大臣莱萨尔。拉法夷特派则一切按拉法夷特的授意行动。拉法夷特极重虚荣，对三巨头取代了自己在宫廷受宠信的地位怀恨在心。

左翼大体是由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136名议员组成的。它主要由两名巴黎的议员为首领：一个是记者布里索，他所属的派别被称为布里索派；另一个是哲学家孔多塞，他是伏尔泰著作的出版人。左翼受到一些在吉伦特省当选的出色演说家的巨大影响，他们是：韦尼奥、让索内、格朗热纳夫、加代等等。“吉伦特派”的名称便由此产生。50年后，拉马丁使这一名称家喻户晓[1]。布里索派多为新闻家、律师、教授，他们组成了第二代革命者。这些人中大部分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与波尔多、南特、马赛等海港的船主、银行家、批发商等工商业大资产阶级联系紧密，并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出身和所受哲学教育而言，布里索派倾向于政治民主；就其社会关系和气质而言，他们则倾向于尊重财富并为之效力。

议会的极左翼是几个主张实行普选制的民主派，如罗贝尔·兰代、库通、卡诺。3个亲密无间的议员——巴齐尔、夏博、梅兰（蒂翁维尔人）组成了“科尔得利三人帮”。他们在议会中影响不大，但在各个俱乐部和人民团体中却相当起作用。

中间派处于斐扬派和布里索派之间，由345名议员组成。这是一个不稳固的群体，他们被称为“独立派”或者“立宪派”。这些人真诚拥护革命，但是缺乏明确观点，也没有杰出人物。

在巴黎，俱乐部和沙龙既能够反映议会的观点也能够促使政治斗争

激化。

沙龙中云集了各派的首领，并为他们提供了协调意见的方便。斯塔尔夫人是内克之女，纳博纳伯爵的情妇。她的沙龙成了拉法夷特派的活动中心。韦尼奥则把他的朋友们汇集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多登夫人豪华的餐桌旁或沙龙里。这位多登夫人是一位包税商的遗孀。布里索派在罗兰夫人的沙龙中集合。她是一位富于正义感和感情丰富的妇女，是吉伦特派的灵魂。通过其好友和其丈夫的斡旋，罗兰夫人发挥了巨大影响。她的丈夫正直而平庸，曾任工场视察员。

俱乐部的作用越来越增强，它们把各种倾向的活动分子都组织起来。出入斐扬俱乐部的只有那些属于温和资产阶级的立宪派。雅各宾俱乐部会费较低，具有民主性质。小资产阶级、小商贩、手工业者经常不断地出席它的会议，成为它的支持力量。他们最欢迎的演说家是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这二人的观点不久便对立起来。雅各宾俱乐部通过其分会把影响扩展到全国，把所有革命保卫者和国有财产购买者组织在一起。科尔得利俱乐部是由更下层的人民分子组成的。

最后还有巴黎的48个区，它们使积极公民能了解政治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些事件。这些区定期召开全体大会。从1792年7月起，当消极公民大量进入后，大会便成为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场所，对民主与平等思想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2.国王与议会的第一次冲突（**1791**年底）

国民制宪议会有许多难题未能解决。它把这些难题留给了立法议会。这导致了国王与立法议会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以宪法方式所能消除的。这些难题涉及各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困难。1791年秋天，城市和农村中的动乱再度兴起。在城市，动乱首先是由于指券贬值和生活必需品涨价引起

的。由于圣多明各黑人不堪忍受奴隶制而举行起义，殖民地出产的食品，如咖啡、糖、朗姆酒的价格上涨尤为显著。1792年1月底，巴黎的一些食品杂货店周围发生了混乱，人群强迫商店降低商品价格。巴黎各区也开始检举囤积居奇者。在农村，小麦价格上涨和在赎买前依旧保持的封建租税激起了骚乱。从1791年11月起，几乎到处都发生抢劫运粮车和市场的事件。博斯地区的各个市政府迫于人民骚乱的压力，对粮食和必需的生活品实行规定价格。1792年3月3日，埃唐普的市长西莫诺——一个富有的皮革商，因拒绝实行规定价格而被杀死。斐扬派把他奉为殉道者。1792年3月，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流亡者的城堡连遭抢劫和焚毁。农民群众要求彻底取消封建制度。在这种社会威胁下，立法议会举棋不定并出现了分裂。

其次是宗教方面的困难。反抗派教士继续进行煽动，致使一部分信奉天主教的群众投向反革命一边。1791年8月，反抗派教士在旺代挑起了动乱。1792年2月26日，他们把洛泽尔的农民煽动起来反对芒德的爱国者。反抗派教士与贵族之间的勾结处处可见。1791年10月16日，贵族们在阿维尼翁策动了一次叛乱，并且杀害了激进派的首领——市镇文书莱斯居耶。爱国派则以拉格拉西埃尔的屠杀进行报复。

最后还有来自国外的困难。普罗旺斯伯爵加入流亡运动后，流亡者的挑衅活动大为增加：他们发布宣言叫嚷入侵法国，并猖狂地对立法议会进行猛烈抨击。孔代亲王命令军队集结在特雷弗选侯领土上的科布伦茨。对大革命的威胁逐步具体化了。

立法议会的政策在社会方面是犹豫不定的，但在反对革命的敌人方面却坚决得多。

在社会方面，资产阶级以武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后便不再像1789年时那样团结一致了。富有的资产阶级慑于社会骚动，越来越与贵族阶级同流，它打算与王权取得和解。但是，中等资产阶级在瓦雷恩事件后失去

了对国王的任何信任。它首先想到的是其自身利益，并且懂得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保卫这些利益。中等资产阶级的领袖们竭力防止资产阶级与人民各阶层之间出现裂痕。1792年2月6日，佩蒂翁在给比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和人民团结一致才完成了这场革命，只有他们的团结才能保住这场革命。"多姆山省的议员，后来成为罗伯斯庇尔至友的库通在同一时期也宣称：应该制定公正的法律以使人民同革命结合在一起。还应该"坚信人民的精神力量比军队的力量更为强大"。1792年2月29日，他提出建议：除了领主有原始文件证明的权利外，其他一切封建权利都予以无偿废除。斐扬派反对表决这项措施。战争使资产阶级的困难加重，从而使农民的彻底解放有可能实现。

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在拉法夷特派的支持下把议会鼓动起来对抗革命的敌人。拉法夷特派对战争的前景毫不担心。立法议会通过了4项针对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1791年10月31日的法令限普罗旺斯伯爵在两个月内返回法国，否则将剥夺他的王位继承权。11月9日的法令对流亡者们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否则他们将被作为阴谋嫌疑犯，他们的财产收入也将被收为国家所有。11月29日的一项法令要求反抗派教士进行一次新的公民宣誓，并授权地方行政部门在发生骚乱时将他们逐出住地。11月29日的另一项法令请国王"要求收留法国逃亡者的特雷弗和美因兹的选侯以及帝国其他诸王公不要再在边境聚集和招募军队"。

吉伦特派借助这些主动措施一步步激发起民族感情，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国王失去回旋的余地，迫使他明确表示对革命是赞成还是反对。

此时，宫廷也开始采取破釜沉舟的政策。11月，在巴伊辞职后举行的巴黎新市长选举中，宫廷使拉法夷特的竞选归于失败，结果雅各宾派的佩蒂翁于1791年11月16日当选。国王和王后暗自庆幸这一结果。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1月25日写道："我们甚至可以从过了头的坏事中更早地得到好处。对此，一般人是料不到的。"这是推行"物极必反"的政

策。11月的几项法令以及布里索派的好战主动性使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不胜欢喜。国王对制裁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者的措施行使了否决权，但他却批准了涉及他兄弟的法案和请求他向德意志诸侯发出最后通牒的法案。这样一来，议会便中了国王的圈套：诸侯受到攻击，他们就会投入战争。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以绝妙的两面三刀之术挑拨敌对双方，进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向外国求援成了挽救君主制的唯一办法。

3.战争与和平（**1791**年冬**—1792**年）

大革命和旧制度之间在利益和思想方面的冲突造成了困难的外交局面。布里索派和宫廷出于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对这种冲突不但不加缓和，反而逐步将其引向战争。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极少数人反对战争，但未能如愿。

主战派是由布里索派和宫廷联合组成的，这乍看起来不能不令人奇怪。

宫廷主张战争是因为它把获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外国干涉上，它一贯使用着两面三刀的手法。1791年12月14日，国王通知特雷弗的选侯，如果他在1792年1月15日之前仍不解散流亡者，路易十六只能将他视为“法国的敌人”。宫廷在请求外国干涉落空后便企图借制造事端达到目的。路易十六在威胁特雷弗选侯的当天便通知帝国皇帝：他希望自己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路易十六在给“他的代理人布勒特伊”的信中写道：“这将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政治战争。那时一切事物都将大为改善，法国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使它连半个战役也支持不了。”

在12月14日这同一天，玛丽·安托瓦内特在给她的朋友费尔桑的信中写道：“这帮蠢材，他们没有看到这是为我们火中取栗！”宫廷心怀鬼胎，它指望战局对法国不利，战争的失败使专制政权得以恢复。为此，它急于把法国推入战争。

布里索派主张战争是从国内和国外政策考虑的。在政治方面，布里索派想用战争迫使叛国分子和路易十六暴露出真实面目。1792年1月14日，加代在立法议会讲坛上大声疾呼：“我们要事先给叛国分子指明去处，这个去处就是断头台。”布里索派认为战争是符合国民利益的。1791年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遭受了10个世纪奴役后终于获得自由的人民是需要战争的，必须以战争来巩固自由。”

12月29日，布里索还在立法议会中讲道：“法国在欧洲面前展示其自由民族特征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它要保卫和坚持自由。”他在这次演说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目前，战争对国民是一种善行，唯一令人可怕的灾难是没有战争……只有国民的利益才是促进战争的力量。”

但是，他这里的国民指的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1792年1月5日伊斯纳尔在立法议会的演说是最明确的回答。仅仅“坚持自由”是不够的，还应该“完成革命”。伊斯纳尔赋予即将发生的战争一种社会内容：“这将是权贵与平等之间的一场斗争。”权贵指的是贵族阶级；而平等则只是“宪法所规定的平等”，是由基于纳税额的选举组织方式所确定的。按照伊斯纳尔的说法，“社会中最危险的阶级是由那些在革命中败落的许多人组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那些众多的大产业主、巨商和一群富有和骄横的人。这些人对平等不能容忍，他们对贵族等级无限惋惜，梦寐以求……总之，这些人痛恨创立平等的新宪法。”

这里所指的当然是1791年的宪法，所谈到的平等“只是权利方面的平等”，正如韦尼奥后来所强调的。吉伦特派所希望的战争只符合资产阶级国家的利益。

经济方面的忧虑也同样严重。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其政客希望彻底消灭反革命。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恢复指券的信誉，这是企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工商界一向能在军需供应中获取巨额利润，因此

战争并不令他们讨厌。这场战争将主要是针对奥地利的大陆战争，而不是针对英国的海上战争。因为海战会损害法国与海外诸岛的贸易和港口的繁荣。吉伦特派于1792年4月发动了大陆战争，直到第二年2月他们才向英国宣战。

在外交方面，布里索派实际上把主要攻击目标集中在旧制度的象征——奥地利身上。他们在各国政治难民的支持下准备发动一场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战争。布里索在1791年12月31日宣布："进行一场新的十字军征伐的时刻来到了。这场十字军征伐是为了实现天下自由。"伊斯纳尔在此之前曾向欧洲发出过警告，并提出发动"各国人民投入反对君主的战争"。战争成了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有一名议员在1792年1月写道："战争！战争！从帝国各地传到我耳朵里的都是这个呼声！"

主和派使战争的发生推迟了一些时间。三巨头和他们一派的大臣反对宫廷和议会的好战政策。1792年1月，巴纳夫和迪波尔向莱奥波德二世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劝告他遣散流亡者。

在战争政策的反对者中，数罗伯斯庇尔头脑最清醒，态度最坚决。罗伯斯庇尔最初只得到丹东和几份民主派报刊的支持，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抵制不可抗拒的潮流。这股潮流把全体革命者随着布里索派卷入了战争。在3个月中，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以惊人的远见展开了一场反对布里索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使革命派从此陷于分裂。他深知宫廷主张战争并非出自善意。1792年1月2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讲中指出，战争使流亡者、宫廷和拉法夷特之流感到庆幸。祸害的根源不仅仅在科布伦茨。"祸害的根源难道不在巴黎吗？在科布伦茨与离我们不远的另一个地方之间难道没有任何联系吗？"毫无疑问，完成革命和巩固国家都是必须做的事。但是，罗伯斯庇尔把轻重缓急的次序重新作了安排："你们应该首先把目光转向你们在国内的立场，在向外输出自由之前应该先把国内秩序整顿好。"

罗伯斯庇尔还指出，在进行战争和打击外部的贵族之前，应该首先消灭内部的贵族，制服宫廷，清洗军队。战局有可能变坏，因为贵族军官的流亡瓦解了军队，部队缺少武器、装备，要塞没有粮食弹药。“一旦将战争加在人民头上”就不能不对人民有所补偿：必须武装消极公民，振奋民众精神。而且，即便取得了胜利，自由也可能会葬送在某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手中……然而，罗伯斯庇尔对战争所持的清醒分析和勇敢的反对态度还不足以阻挡这股潮流。

4.宣战（**1792**年**4**月**20**日）

战争曾一度因罗伯斯庇尔的反对态度而推迟到来，但在1792年初的几个月中又加快了步伐。1791年12月9日，拉法夷特派在布里索派的支持下成功地把纳博纳伯爵安插为军政大臣，使他成为内阁中主战政策的工具。1792年1月25日，在特雷弗选侯被吓得让了步，解散了流亡者的聚合之后，立法议会就请求国王向皇帝询明“他是否放弃了旨在反对民族主权、独立与安全的任何条约和公约”。这意味着要求他正式收回皮尔尼茨宣言。外交事务大臣德莱萨尔力图制止好战政策，结果，纳博纳被免了职。

布里索派内阁的组成是对免除纳博纳职务的反击。吉伦特派火冒三丈；韦尼奥也谴责国王身边“居心叵测的顾问们”。布里索向主和的大臣提出了严厉的控诉状。1792年3月10日，德莱萨尔在大理院受到指控。其他大臣惊恐万状，辞官而去。路易十六在迪穆里埃的建议下召布里索的朋友和吉伦特派组阁：克拉维埃尔任国家税务大臣；罗兰为内政大臣；塞尔旺在5月9日出任陆军大臣；迪穆里埃任外交事务大臣。迪穆里埃曾作过密探，是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他怀着野心投身革命，与拉法夷特有同样的企图：进行一场速决战，然后班师回朝以便恢复君主政权。为了堵雅各宾派的嘴，迪穆里埃给了他们几个职位：勒布伦-通迪和丹东的朋友诺埃尔进入外交事务部；帕施进入内政部。吉伦特派的报刊立刻停止了对宫廷的攻击。罗伯斯庇尔抓住这一把柄，严厉揭露“阴

谋家们”的狼狈为奸。于是，在他的支持者和吉伦特派之间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决裂。

从此，宣战已势在必行。3月1日，莱奥波德猝死，他的继承者弗朗索瓦二世反对任何让步，决心一决雌雄。他对3月25日给他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1792年4月20日，国王亲临立法议会，建议向“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国王”宣战，这即是说只向奥地利而不向帝国宣战。只有十几个议员对宣战投了反对票。

战争并没有使其发动者如愿以偿：宫廷和吉伦特派的各自打算都落空了。战争却促进了民族感情的激昂高涨，并给吉伦特派增添了持久的威望。这种威望在相继而来的灾难中也难以磨灭。吉伦特派最终垮台的原因并不在于它企图进行一场导致国民自我发现的战争，而在于它不会驾驭这场战争。

米什莱写道：“他们是共和国的创建者。他们主张进行92年的十字军征伐和实现全球的和平。因此，他们受到全世界的感激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需要洗净93年的污迹，经过赎罪后永垂青史。”

Ⅱ.王座的倾覆（1792年4—8月）

这场震撼欧洲的，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到1815年的战争，使法国的革命运动重新活跃起来。王权则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

1.军事的失利（1792年春）

按照布里索派和宫廷的打算，这场战争应该是速战速决的。

然而，从战争一开始，军队和军官的不足就导致了接连失利。法国军队陷于完全瓦解的困境。在1.2万名军官中至少有一半已流亡国外。兵力减员严重，前线部队和1791年征募的志愿兵共有15万人左右。政治和社会冲突也波及到军队。爱国派的部队与贵族的指挥官相互对立，军

纪因此受到影响。高级统帅平庸无能：曾在北美战争中战功卓著的罗尚博元帅现已衰老，对其部队缺乏信心；老于世故的德意志人吕克奈尔元帅指挥无方；拉法夷特只不过是个政客式将军。

初战很快便告失败。迪穆里埃曾命令集结在边境的3个军发起进攻，奥地利军队只有3.5万人与之对垒。发动一次突然攻击本可以使法国人占领整个比利时。但是，4月29日，当奥地利军队刚一露面，对自己部队缺乏信心的狄龙和比隆将军便下令后撤，士兵们感到被人出卖而溃不成军，狄龙则被人杀死。于是，边境失去了防御。拉法夷特在阿登山脉始终按兵不动。将军们把失败归咎于部队目无军纪和对此容忍的内阁。1792年5月18日，汇集在瓦朗西埃纳的将领们不顾内阁的命令，自行宣布进攻已不可能，并且建议国王立即媾和。高级统帅持此种态度的真正原因并不在军事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一贯富有远见的罗伯斯庇尔早在5月1日就在雅各宾俱乐部中指出了这种危险："不，我丝毫不信任将领们。除了个别几个可敬者外，我认为他们几乎都对旧秩序和宫廷的恩宠怀有惋惜之情。我诉诸人民，只有人民。"

拉法夷特此时彻底向拉梅特派靠拢，以便对付民主派。他声称随时准备率部开向巴黎，驱散雅各宾派。

2.国王和议会的第二次冲突（**1792**年**6**月）

军事失利、将领的态度以及他们与宫廷的勾结使民族情绪高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的高涨与革命冲动密不可分，其矛头指向嘲弄民族的贵族。

4月26日，鲁热·德·利尔在斯特拉斯堡推出了他的《莱茵军战歌》。众所周知，这首歌充满了民族和革命的激情。无论在歌曲的作者还是歌唱者的心目中，革命和民族是融为一体的。阴谋使法国回到"古代奴隶制"的"无耻专制者"和暴君受到了鞭挞。贵族阶级、流亡者"这帮奴才、叛贼、大逆不道之徒和布耶的同谋者"也统统未能幸免。歌曲赞颂对祖

国神圣的爱，发出了保卫祖国的召唤（“你们可曾听到：在田野里，凶残的士兵在咆哮……”）。这祖国是1789年后在反对贵族阶级和封建制的斗争中诞生的祖国。

不久便成为《马赛曲》的这首歌和它的历史背景是难以分开的，这就是1792年春天的危机。民族的冲动与革命的奋起紧密相关，一场阶级冲突成为爱国主义的基础，并且大大激发了这种爱国主义。贵族们推出国王来反对他们所鄙视的国民。国内的贵族对外国入侵者望眼欲穿；流亡者为虎作伥，帮助敌方作战。对于1792年的爱国者们来说，此时正是保卫和发展1789年成果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始终被贵族的阴谋所烦扰。民族危机给他们以新的推动，使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消极公民们在吉伦特派的建议下拿起梭镖，戴上红帽，组织起越来越多的友好团体。资产阶级国家基于纳税额的制度框架是否将被他们打破？……

在罗兰1792年6月10日给路易十六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写有这样的话：“祖国绝不是在想象中被美化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存在物，人们曾为之作出牺牲。人们通过对它的关切表达对它与日俱增的热爱。人们为它的诞生付出了巨大努力，使它在动荡不安之中崛起。人们珍惜它是由于它来之不易，它使人充满希望。”

对于消极公民来说，只有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祖国的观念。

但是，激发起革命情绪的民族危机加剧了原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对立。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胜过了1789年，吉伦特派很快便迟疑不前了。为了武装志愿兵，富人们被课以捐税。农民暴动一直在凯尔西酝酿，并且扩展到了下朗格多克。通货膨胀的冲击此起彼伏，生活必需品短缺造成的骚乱重新出现。1792年3月3日埃唐普市长西莫诺被杀一事，反映出在人民的要求和资产阶级的商业、财产观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巴黎，雅克·鲁在5月就提出以死刑惩治囤积居奇者。在里昂，市

政官员朗日在6月9日提出了“保持面包充裕与价格公平的简便易行办法”：限定价格和制定管理条例。资产阶级开始被一个幽灵所纠缠，这就是“土地法”。当莫尚的神甫皮埃尔·多利维尔为埃唐普的暴动者进行辩护的时候，吉伦特派却不顾夏博的反对，在1792年5月12日作出决议：为西莫诺举行丧礼，将他的市长肩带高悬在先贤祠的圆顶上。这样，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分野开始出现，它们不久便分道扬镳了。吉伦特派的“全国性衰退”是史书上的婉转提法，这种现象的深刻原因此时已显示出来：吉伦特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强烈主张经济自由。它以战争政策激起了人民浪潮，但又对这种浪潮深感恐惧。它的民族感情从来没能强烈到超越其阶级团结的程度。

在人民的推动下，议会的政策坚定起来。布里索派意识到宫廷在支持将领们的反叛。布里索和韦尼奥在1792年5月23日猛烈地抨击“对奥委员会”，揭露它在王后主持下为敌人和反革命的胜利卖力。在他们的影响下，议会再次采取了威吓政策。新法令一个接一个地被通过：凡由本省20名以上公民告发的反抗派教士一律被驱逐（5月27日）；主要由贵族组成的御林军被取缔（5月29日）；在巴黎设置营地，供即将参加联盟节的2万名国民自卫军使用（6月8日），这支力量不仅要保卫巴黎，并且将在必要时抵制叛逆将领们的任何企图。

将领们和大臣们之间的不和为国王的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路易十六拒不批准关于驱逐反抗派教士和召集国民自卫军的法令。6月10日，罗兰郑重警告他，让他收回否决权，并向他指出：他的态度很可能使法国人相信国王串通流亡者和敌人，从而引起可怕的突发事件。路易十六坚持己见，6月13日，他解除了布里索派的大臣罗兰、塞尔旺和克拉维埃尔等人的职务。吉伦特派让议会作出决议，对被解职的大臣表示全国的惋惜之情。迪穆里埃生怕受到指控，他在6月15日提出辞职，随即前往北路军。斐扬派重掌政权后，拉法夷特认为时机已到，便在1792年6月18日宣称“法国宪法受到了内部叛逆和外部敌人的共同威胁”，并敦促

议会粉碎民主运动。

1792年6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为了向国王施加压力。国王拒绝批准法令，将吉伦特派大臣解职并组织斐扬派内阁，所有这些都表明宫廷和将领们力图推行拉梅特派和拉法夷特派的纲领，即消灭雅各宾派；修改宪法；加强王权；与敌方谈判结束战争。面对这种威胁，吉伦特派积极组织了一次人民活动日，以纪念网球场誓约和瓦雷恩事件。在桑泰尔的带领下，郊区人民向议会进发，而后又来到王宫。他们对按兵不动、拒绝批准法令和将大臣解职表示抗议。国王从窗口勉强探出身体，他头戴一顶红帽子并为国民的健康举杯。但是，他仍然拒绝批准法令和召回吉伦特派大臣。

以和平方式施加压力的尝试失败了。对立派的势力甚至有所加强，王权主义一度从中得益。巴黎市长佩蒂翁被停职。6月28日，拉法夷特丢下军队，重新出现在议会。他勒令议会取缔雅各宾俱乐部，惩办6月20日示威的肇事者。

3.外来危险和吉伦特派的无能（**1792**年**7**月）

吉伦特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自身矛盾之中，它没有能力解决国内外的困难，因此被首都的革命分子所超越。它赞成向人民求助，但仅仅以人民遵循它所规定的目标为限度。

1792年7月11日“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反映了外来危险的严重程度和吉伦特派不知如何应付。7月初，布伦斯维克公爵统领的普鲁士军队开到前线，孔代所率的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也相继赶来。战斗即将在法国本土展开。在危险迫在眉睫之际，雅各宾派捐弃前嫌，一心投入拯救祖国和革命的斗争。6月28日，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上发出了团结一致的号召。7月2日，议会绕过国王的否决权，命令国民自卫军前来参加7月14的联盟节。7月3日，韦尼奥慷慨陈词地揭露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的背叛行为。他指出：“自由是在国王的授命下遭到

攻击的。”7月10日，布里索重提此话，并且明确指出了政治问题：“暴君们是对着革命、人权宣言和国民主权宣战的。”在布里索的提议下，议会在1792年7月11日发出了祖国在危急中的公告：“大批军队正向我们的边境迫近；所有仇视自由的人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的宪法。公民们，祖国在危急中！”

所有行政部门都改为常设办公；所有国民自卫军都应征入伍；一些志愿军新营被征集组成。在短短几天内，有1.5万巴黎人参军。公告使切身利益受到威胁的人民加强了团结，它号召人民在参加保卫祖国的同时参加政治生活。

然而，吉伦特派的伎俩遏止了爱国主义的浪潮。在议会的威胁下，斐扬派大臣于7月10日辞职下台。这一事件在爱国派中再一次引起分裂。吉伦特派企图重掌政权，它开始暗中和宫廷谈判。7月20日，韦尼奥、让索内和加代通过画家博兹给国王通信。加代在杜伊勒利宫与国王一家进行了一次会晤。路易十六不肯退让，他一拖再拖，以便把吉伦特派置于死地。吉伦特派不久前已在议会中改弦易辙，它责备人民的骚动并对捣乱分子进行恐吓。7月26日，布里索扬言反对废黜国王，不赞成普选权。他说：“如果有人试图立即在宪法的废墟上建立起共和制，法律的利刃就会刺向他们，如同刺向那些积极主张两院制的人和科布伦茨的反革命分子一样。”

8月4日，韦尼奥迫使巴黎莫孔塞伊区撤销了它曾宣布的不再承认路易十六为法国国王的决议。

人民与吉伦特派之间的彻底决裂恰恰发生在吉伦特派的政策临近完满结局的时刻。吉伦特派在起义面前退缩不前。它担心控制不住革命群众，然而这些群众正是在它的促进下才发动起来的。它所害怕的是财产权受到侵害，至少是财富的优势遭到破坏。吉伦特派在谴责了路易十六之后又与他谈判，它刚向前迈步就要往后退。这样它便落得自寻死路，

并且把1791年建立的制度也引向绝境。这种制度将国民禁锢在基于纳税额的限制中。

4. 1792年8月10日起义

除了巴黎以外，全国上下也都起来反对犯有通敌罪的王朝。8月10日起义不仅是巴黎人民的功绩，而且也是以自卫军联盟战士所代表的法国人民的功绩。可以说，“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是全国性的事件。

爱国主义运动一经发动便势不可挡。已经组成中央委员会的巴黎各区成为永久性机构，消极公民也渗透进来，他们还参加了国民自卫军，7月30日的一项法令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做法。同一天，法兰西歌剧院区在全体大会上实行了普选制。在48个区中，最后有47个区表示赞成废黜国王。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早在7月11日他就曾向联盟战士讲话：“公民们，你们来到此地难道只是为了参加一个空洞的仪式，重演一次7月14日的联盟节吗？”

在他的启发下，越来越富有威胁性的请愿书不断出现，由联盟战士送交到议会。请愿书在7月17日和23日曾两次提出废黜国王。当罗伯斯庇尔看到吉伦特派与宫廷重新谈判时便对它再次抨击。7月29日，他揭露“宫廷和立法议会中的阴谋家搞相互串通的把戏”，要求立即解散议会，代之以一个国民公会，由它修改宪法。7月25日，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到达巴黎；30日，马赛的联盟军也到了，他们在市郊圣安托万行进时唱着那首不久便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歌。在罗伯斯庇尔的促进下，联盟军战士组成了一个秘密指挥部。

在科布伦茨起草的布伦斯维克宣言于8月1日传到巴黎后激怒了所有爱国者。自7月的最后几天起，首都的气氛激昂而紧张，人们在街头巷尾宣传祖国在危急中，公共场所的征兵工作在庄严隆重的礼仪中进行。为了恐吓革命者，玛丽-安托瓦内特请求敌国君主发布一篇具有威胁性的宣言。这篇宣言由一名流亡者起草并由布伦斯维克公爵签署。宣言向

敢于对侵略者实行“自卫抵抗”的国民自卫军和动摇分子以死亡相威胁，它警告巴黎人民：如果国王一家受到“丝毫侵害”，便要“血洗巴黎城并将它夷为平地。这将是足以为训和永世难忘的报应”。布伦斯维克宣言产生的后果与宫廷所预期的截然相反，它更加激怒了人民。

7月底未能爆发的起义一直推迟到巴黎各区把要求废黜国王的请愿书提交到立法议会之后。处于市郊圣安托万的盲人院区为议会规定的最后行动期限是8月9日。这一天，立法议会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就散会了。当夜，警钟长鸣，市郊圣安托万邀请巴黎各区派专员进入市政厅，先与合法的市府同时执政，然后取而代之。这便是“起义的市府”。巴黎市郊人民纷纷起来，与联盟战士一道向杜伊勒利宫进军。杜伊勒利宫的自卫军纷纷倒戈，转向起义。8点钟，马赛人的队伍首先到达，他们未遇阻拦，直入王宫内院。此刻，御前卫士们向他们开火，并将他们击退。郊区人民赶到后，联盟战士在他们的支援下再次进攻，并且发动了冲锋。10点钟左右，受困的卫兵们在国王的命令下停了火。起义刚开始时，由于罗德里（吉伦特派，塞纳省事务总管）再三请求，国王及其全家便离开了王宫，到不远的议会所在地——马内日大厅避难。在战斗胜负未见分晓之前，议会还将路易十六作为国王对待；当起义获得胜利后，议会便宣布停止国王的职权（不是废黜），并且通过决议：召开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这正是罗伯斯庇尔以前所建议的做法。

王座倾覆了。与之一起倒台的还有斐扬派，即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他们曾经促进了革命的发动，后来，他们又先后在拉法夷特和三巨头的带领下企图领导革命，使之更加温和。至于吉伦特派，它曾因与宫廷往来而落得名誉不佳，并且极力阻止起义发生。起义的胜利不属于它，因而它不会在胜利之后强大起来。与此相反，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的消极公民，则在罗伯斯庇尔和后来的山岳派的带领下令人瞩目地走上了政治舞台。

1792年8月10日起义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起义。南方和布列塔尼各省的联盟军在起义的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起义胜利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分割国民的壁垒也崩溃了。

1792年7月30日，巴黎的法兰西歌剧院区曾宣称："公民中任何个别阶级都不能窃夺拯救祖国的专有权利。"它号召那些"被特权者称为消极公民"的人到国民自卫军中服务，在各区全民大会上议事。总之，它号召他们共同"行使属于各区的那一部分主权"。7月30日，立法议会接受了既成事实，颁布法令允许消极公民加入国民自卫军。

磨坊岗区也发出声明："在祖国处于危急中时，国家主人应该忠于职守，即统率军队，主持国务。他应该无所不在。"

"第二次革命"通过实行普选制和武装消极公民，把平民纳入到国民之中，它标志着政治民主的诞生。与此同时，新的国家现实中的社会特征更为突出了。原来主张与贵族实行妥协的那些人在屡屡碰壁之后便销声匿迹了：迪特里希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挑起反叛，后来便逃之夭夭；1792年8月19日，被部队摈弃的拉法夷特投奔了奥地利人。此外，无套裤汉走上政治舞台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对新的国家现实产生了敌意。8月10日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而反抗这一共和国的势力也已经蠢蠢欲动了。

---

[1] 拉马丁在1847年发表了《吉伦特党人史》，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译者

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四等级的时代到来了吗？在革命的法国和欧洲贵族政治的斗争中，一部分资产阶级认识到，没有人民他们就无法取得胜利。由此，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但为自己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套裤汉对大资产阶级利益构成极大威胁。大资产阶级通过布里索之口谴责“无政府主义的七头蛇”。为了保卫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权，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毫不犹豫地同反革命和旧制度的拥护者结成了联盟。佩蒂翁在1793年4月底惊呼：“我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由此向有产者吹响了集合号。6月2日，在巴黎无套裤汉的打击下，吉伦特派崩溃了。

人民运动高涨起来。人民创造了所有伟大的革命日，并奋勇保卫国防。由于人民付出了牺牲，因此它从此开始要求保证自己的生存。

1793年6月25日，“忿激派”[1]的雅克·鲁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喊道：“在人类的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用垄断对其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

为了让无套裤汉活下去，以保证共和国的安全，山岳派创立了一种经济组织。征购，税收和国有化损害了有产者的权利。这是由于情势的逼迫而实行的一种真正的阶级政策。它符合无套裤汉的需要，反映了他们的深切希望。

雅克·鲁向山岳派提出：“你们作决定吧，无套裤汉将用他们的枪矛去执行你们的决议。”

然而，忿激派被镇压了。到1794年春，埃贝尔派和科尔得利派也被

镇压了。这些懂得如何表达人民群众模糊愿望的人被镇压后，无套裤汉和激进民主派中等资产阶级之间的友好联盟日益困难起来。而这种联盟正是共和二年共和国的基本特征。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他们认为“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竭力想用社会革新来使人民和革命生死与共，结果只是徒劳。他们既受到困惑的群众的冷遇，又受到资产阶级公开的敌视，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在危急的关头，民众的骨干分子对罗伯斯庇尔派在市府发出的起义号召无动于衷。圣茹斯特稍早些时候就说过，“大革命冻结了”。人民对革命的敌人强制实行自由专制主义，从而战胜了贵族反革命和欧洲联盟。但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胜利的果实，这使“显贵”们松了一口气。

热月党[2]资产阶级用了几个月才消灭共和二年的共和国，摧毁革命政府及统制经济，并在经济自由和自由利润的基础上建立富人和有产者的特权。罗伯斯庇尔派的垮台使巴黎无套裤汉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仍然进行了顽强的后卫战，在一连数月里步步为营地保卫着自己的生存权和在国家中的地位。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的那些悲剧性的日子标志着无套裤汉的失败和被逐出政治舞台，标志着从1792年8月10日王朝颠覆后开始的民主革命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共和三年牧月比热月9日更能代表大革命的结束：动力由此彻底枯竭了。

---

[1] Enragés，又译“疯人派”，系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派别，代表下层人民，特别是城市贫苦劳动者的利益。——译者

[2] “热月党”，以及本书其他地方出现的“王党”、“朱安党”等等，均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只是历史上的习惯称呼。我们沿用之，以求行文方便。——译者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立法议会立即承认了人民的胜利，通过了关于中止王权和召开由普选产生、负责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国民公会等决议。8月10日起义的市府将路易十六及其全家囚禁在唐普尔狱，严加看守。议会任命了一个临时行政会议，其中除了原有的吉伦特派大臣（即内政大臣罗兰，公共税务大臣克拉维埃尔和陆军大臣塞尔旺）之外，加入了掌管海军部的蒙日、掌管对外关系部的勒布伦和掌管司法部的丹东。

Ⅰ.第一次恐怖

1. 8月10日的市府和立法议会

在立法议会最后的6个星期（从1792年8月10日到9月20日）里充满了市府和议会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大革命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在以议会为代表的合法权力对面，崛起了一个革命的政权——8月10日的起义市府。8月30日，新闻记者、《法兰西爱国者报》（布里索主持）的编辑日雷-迪普雷致函议会，抱怨说市府传讯了他，并指控市府篡权，搞独裁。吉伦特派由此向市府发动进攻。针对让索内、加代、格朗热纳夫的攻击，市府于1792年8月31日通过发言人塔利安答辩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人民批准的……你们若要打击我们，就请同时也打击人民吧！正是人民制造了7月14日的大革命，在8月10日又巩固了这场革命，并将继续维护这场革命。”

两个政权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国民公会召开，而且随后又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这两大对抗派别之间继续进行。8月10日的胜利者们决心贯彻自己的意愿。立法议会不得不承认了这个起义的市府。市府通过选举，使自己在议会中的议员增加到288名。这些议员都来自中小资产阶级。但是，议会仍然处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法制的吉伦特派控制之下，它对于市府带头采取并由山岳派所继承的各种革命措施深恶痛绝。

丹东在行政会议里充当了两个政权之间的纽带。对于市府来说，他

的革命经历是一个保证；对于议会来说，他在许多情况下所持的暧昧态度也是一个保证。他于1759年出生于奥布河畔的阿尔西（巴伊管区）的一个检察官家庭，曾在前国王的参政院任律师。从1789年起，他就以一个民主派的面目出现，在法兰西剧院区和科尔得利俱乐部从事革命活动，并由此得以在1791年当选为省政府的官员，后来又当选为巴黎市府的代理检察长。他被宫廷收买过，这毫无疑问，但他似乎并没有对宫廷作出过重大让步。尽管他的作用在8月10日还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在此之后却的确成了一位首要的人物。他能言善辩，富于人们所喜爱的激情又毫不矫揉造作，充满现实精神。他足智多谋且措施果决，极为宽宏且热衷于享乐。他随时都可能勃然大怒但又从不会憎恨别人。他一度由于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对人民的信赖而成为革命法国的化身。他支配了行政会议。

政权就这样被市府、议会和行政会议这3个互相侵越的权威分享了。这3个相互竞争的权威，依据事态的演变，轮流地执行着各种由形势和国内外双重危险所要求的革命措施。这种混乱的专政不具备任何确定的形式，既不体现为一个制度或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作它的代表。

首先应当争取使各省和军队拥护新的局面。在8月10日当天，议会就委派了12名议员，3人一组，分别进驻4个军。他们“有权暂时停止将军和一切其他军官及文武官员的职务”。行政会议还向各省派出了由丹东在巴黎起义者中选出的特派员。市府也派出了另一些特派员，这些特派员采取了革命的行动，如逮捕嫌疑犯、建立监视委员会、清查各权力机关等。各省都必须按首都的榜样行事。

市府还要求建立一个由巴黎各区选出的法官组成的特别刑事法庭，用它来审判各种反革命罪行。议会尽管对此心存反感，还是在8月17日作出了让步。早在8月11日，市府就被委以这样的使命：调查有害于国

家安全的罪行，在必要时暂时拘捕嫌疑犯。议会还强令一切官员（包括教士）宣誓维护自由和平等。8月26日，议会宣布：一切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被流放到圭亚那。8月28日，议会又被迫授权市府进行抄家，以搜寻有嫌疑的公民藏匿的武器。渐渐地，一个非常的统治建立起来了。

2. 9月屠杀

9月屠杀是第一次恐怖的顶点。外部的危险远没有消除。8丹26日，隆维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山河步步沦丧，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爱国热情。同时，又传来了旺代即将发生叛乱的情报。到处都是敌人了！

市府在城郊发动人民修筑起防御工事，锻造了3万支枪矛，招募了新兵，并解除嫌疑分子的武装以装备志愿兵，从而大力推动了国防工作。在此同时，吉伦特派的首领们却对军事局势悲观失望，企图和政府一起撤离巴黎。罗兰主张撤到卢瓦尔河以南。丹东严加拒绝：“罗兰，不要谈论逃跑了，当心被人民听见！”随之，议会批准的抄家行动于8月30日开始了，一直进行了两天，其间有3 000名嫌疑犯被捕入狱。不过，有不少人不久就被释放了，因为在9月2日，9个拘留所里一共只有2 800名囚犯，而且其中只有近1 000人是在8月10日以后抓进来的。

9月2日上午，凡尔登被包围的消息传到了巴黎。凡尔登是巴黎和前线之间的最后一个堡垒。市府当即向巴黎人民宣告：“拿起武器，公民们，敌人已来到我们的家门前！”按市府的命令，人们燃放警炮，擂起战鼓，敲响警钟，关闭各处的栅栏，号召健壮的男子去马尔斯校场组成义勇军营队。市府的官员们都回到各区去进行鼓动工作。“他们将慷慨激昂地把祖国面临的危急局势、在周围威胁着我们的各种叛卖活动以及蒙受侵略的法国领土等等情况，告诉同胞们……”

市府再次表现出模范的爱国热情。在警炮和警钟所造成的异常激奋的气氛中，人们对叛卖的担忧愈加强烈了。志愿兵正准备编队出发时传

闻四起，说是在他们走后，被捕的嫌疑犯将发动暴乱来接应敌人。马拉曾经告诫过志愿兵们：在尚未审判人民的敌人之前，不要离开首都。

9月2日下午，一些被送往亚培伊狱的反抗派教士被押解者——马赛和布列塔尼的联盟军处死了。在卡尔默狱，也有一伙人（其中有店员、工匠、联盟军和国民自卫军）冲了进来，把囚禁在这里的许多反抗派教士屠杀了。随后就轮到了亚培伊狱的犯人。市府的监视委员会也介入进来，建立了一些民众法庭。按照公众的观念，执行审判是主权的一种表现，人民在必要时可以收回它。在9月2—3日夜间，市府的一位特派员宣布说："人民在复仇中恢复正义。"在后来的数天里，在其他监狱，如福尔斯狱、孔西埃热里狱、夏特莱狱、萨尔佩特利埃尔狱和比塞特尔狱（9月6日）仍持续进行着这类屠杀。总共有1 100多名犯人被处死，其中3/4是普通法的犯人。

当局对此采取纵容态度。议会完全无能为力。吉伦特派吓得胆战心惊。司法部长丹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保护监狱。据罗兰夫人说，他当时曾宣称："我管不了这许多犯人了，让他们好自为之吧！"在一份发到各省的通告中，市府的监视委员会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并号召全国都采取"这种对于救国极为必要的措施"。"在人民准备向敌人进军的时候，用恐怖震慑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叛徒集团"，这种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9月屠杀，《一位人民妇女的回忆录》曾写道："尽管被屠杀的恐怖景象吓得发抖，但人们还是把它看成一项正义的行动。"的确，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评价9月的屠杀事件。不断深化的革命危机使民族危机明确和突出了。9月屠杀和第一次恐怖有其民族的一面，也有其社会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外敌入侵（普鲁士军队已于8月19日侵入法国）是激起人们过激情绪的一个有力的因素。1792年8月末到9月初这个时期无疑是大革命最危险的时期，也是民众国家最强烈

地感受到外部危险的时期。但是民族的恐慌还联系着社会的恐慌：人们为大革命的成败提心吊胆，对反革命活动万分担忧。贵族阴谋在烦扰着爱国者的心。1792年9月12日，在阿尔戈纳地区的拉克鲁瓦奥布瓦、警卫队作战失利之后，龙骑兵马尔康在他的《记事手册》中写道："必须阻止敌人进入首都，不然他们会在那里屠杀我们的立法者，恢复路易·卡佩[1]的暴虐统治，并重新给我们戴上镣铐。"随着对入侵者的恐惧和仇恨的滋长，对内部敌人、贵族及其拥护者的恐惧和仇恨也滋长起来。这是一种社会的仇恨，而不仅仅是无套裤汉的仇恨。泰纳（他的善意是不容置疑的）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那种"可怕的愤怒情绪"。这种愤怒情绪，正是由旧制度和封建主义复辟的前景在农民群众中激发出来的：

"问题不再是在秩序和混乱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新制度和旧制度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人们在外国人的背后看到了麇集在边境上的逃亡者。动荡是可怕的，尤其是当它发生在那几乎承受着旧大厦全部重量的地基深处，在那千百万靠双手劳作艰难谋生的、……被课税、被掠夺、被辱骂的、数世纪以来一直世世代代遭受苦难、压迫和轻视的人民大众之中。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深知以往的状况和当时的状况之间的差别。他们只需回想一下，就能立刻感到王室捐税、教会捐税和领主捐税的沉重压力。伴随着一支支揭露暴君阴谋和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的民族歌曲，一种可怕的愤怒情绪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汹涌激荡。"

大革命的其他任何时刻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地表现出民族问题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阿泽马在1793年6月16日的报告中写道："阻止了敌人的进犯后，我们也就阻止了民众复仇的蔓延，那些复仇行动很快就相继停止了。"瓦尔米战役标志着第一次恐怖的结束。然而，那一天在"民族万岁"的口号下集合起来的不再是联邦派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而是一支"裁缝和补鞋匠"的军队了。9月屠杀正是这些人干的。

第一次恐怖和9月的那些日子的后果，进一步加强了8月10日和推翻

王权的影响。

在宗教方面，从8月10日起，议会就决定贯彻所有遭到国王否决的决议，其中包括1792年5月27日关于拘禁和流放反抗派教士的法令。8月16日，市府禁止天主教的一切外部的仪仗和典礼。8月18日，议会下令解散一切尚存的教会组织，并重申1792年4月6日的禁令，不准神职人员在不执行圣职的时候穿教士服装。8月26日，议会限令反抗派教士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将处以流放。这些对付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使许多市镇失去了神甫，从而导致自1792年9月20日起由各市政府负责户籍制度的世俗化。这一重大改革，作为政教分离的第一步，并不是世俗事务中立化思想的产物，而是迫于形势需要，出于一种战斗精神而实行的。它不仅打击了反抗派教士，同时也打击了宪政派教士，因为人们很快就夺去了他们教堂里的钟和银器。后来连教堂工场的财产也被拍卖了。1792年9月20日又制定了准许离婚法。共和派和宪政派教士之间的决裂已为期不远了。

在社会方面，原先需要加以赎买的各种封建租税在8月25日被无偿废除了，除非领主能够出示证书证明是合法的征收。8丹14日，经决定，正在按7月27日法令被拍卖的逃亡者的地产被分成小块出售，同时批准了公有土地的分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一些地方当局对最必需的粮食实行限价。9月9日及16日，议会最终同意授权各县政府清查谷物，并进行征购以供应市场，但仍不愿实行限价。国民制宪议会在社会方面的业绩也受到人民胜利的很大冲击。由市府所支持和人民所要求的物价管理逐步实现。对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仍然怀有深刻的敌意。于是，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明朗化了。

在政治方面，重建君主制看来愈来愈不可能。9月4日，议员们表示希望国民公会废除君主制。巴黎的选举大会则指令它的议员必须履行这项职责。国民公会的选举活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各选举大会从

9月2日起陆续召开。尽管也给了消极公民选举权，仍有许多人弃权，不过不能说所有弃权的人都是怀有敌意的。居心不良弃权的只是贵族和斐扬派。这样，国民公会的议员实际上是由为数不多的决心捍卫大革命成果的人选任的。

Ⅱ.侵略被制止：瓦尔米之役（1792年9月20日）

第一次恐怖不仅是一次人民的暴烈行动和一种对付内部敌人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是对付外部危险的应急措施。它促成了胜利的到来。在市府和议会的影响下，国防工作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1792年7月12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招募5万人补充前线的军队和42个志愿军新营（共3.36万人）。在巴黎，7月22日宣布了“祖国在危急中”，一周内就有1.5万名巴黎志愿者报名入伍。一些省份的爱国热情也引人注目。在东部各省，7月末以来共征用了4万名国民自卫军。9月7日，为鼓动人们报名参军，多姆山省议会派出特派员去各乡向集合的国民自卫军作宣传，让他们认识到，“在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之后，如果我们再次被套上奴隶的枷锁”，那该是多么“痛苦的前景”。特派员们还让大家不要忘记“这场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如废除什一税和各种封建捐税等等”。要强调说明这场革命战争的社会意义，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了。与1791年的情况不同，1792年参加志愿军的资产阶级人数很少，参军的基本上都是手艺人、工匠和已经满师但尚未离开师傅的学徒。

同时，共和二年所实行的保证自我武装和军队装备的经济制度已初具轮廓了。巴黎市府征调了武器、供享乐的马匹、教堂的钟和银器，并建立了一些被服工场。9月4日，行政会议还下令对谷物和饲料实行有利于军队的征调和限价。这种征调制度吓坏了信奉经济自由的资产阶级：国防问题的社会影响已经显示出来，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分界线也日益明确了。

普鲁士军队在逐渐逼近。9月2日，由于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暗中破

坏，当地爱国的指挥官，曼恩-卢瓦尔省志愿军营的博勒佩尔中校被王党分子谋杀，凡尔登投降了。9月8日，敌军抵达阿尔戈纳，但到处都碰到了迪穆里埃指挥的法国军队。9月12日，一支奥地利军队终于夺取了通往拉克鲁瓦奥布瓦的隘道。迪穆里埃南撤到圣默努附近，通往巴黎的大道已经敞开。但9月19日，指挥麦茨方面军的凯莱曼同迪穆里埃会师，法军由此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5万人对3.4万人）。

瓦尔米之役与其说是一场战役，还不如说是一场单纯的炮战。布伦斯维克企图使用一条妙计来包围法军，但性急的普王却命令他立即进攻。1792年9月20日，在一阵猛烈的炮击之后，近中午时分，普军像演习似的在凯莱曼占领的瓦尔米高地前摆开了阵式。普王满以为法军会仓皇溃逃，然而无套裤汉们不仅岿然不动，反而加强了火力。凯莱曼用剑挑起自己的帽子，一边挥舞，一边高呼“民族万岁！”这一革命口号，从一个营传到另一个营，很快响彻了全军。在欧洲最著名的正规军的炮火下，竟没有一个人退缩。普鲁士步兵止步不前了，布伦斯维克不敢下令进攻。炮击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到傍晚6时，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军队都只好在各自的阵地上过夜。

普鲁士军队并未被打垮。瓦尔米战役并非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但却是一次精神上的胜利。无套裤汉的军队在欧洲第一流的军队面前挺住了。大革命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崭新的、民族的和人民的军队顶住了按消极的戒律训练出来的职业军队。联军由此发现革命的法国并不是可以轻易战胜的。歌德当时在场，人们根据厄凯曼的转述，在瓦尔米战役纪念碑上镌刻下他的那句名言：“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经过和迪穆里埃的谈判和一段时间的休战，普军退却了，其状狼狈不堪。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行军甚苦，拖得普军筋疲力竭，又因染上流行性痢疾而大量死亡，沿途还遭到自发起来打击侵略者和逃亡者

的洛林和香槟农民的骚扰。而迪穆里埃的部队却慢吞吞地尾随着普军，无意利用敌军的困境去消灭之。敌军这种痛苦的撤退对于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胜利。10月8日及22日，凡尔登和隆维相继获得解放。

1792年9月20日，即瓦尔米战役的当天，国民公会取代了立法议会。

---

[1] 波旁王朝是瓦卢瓦王朝（1328—1589年）的支系，而瓦卢瓦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年）的旁系。在大革命中，人们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说明路易十六已被视为法兰西整个封建统治时代的代表。——译者

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9月—1793年6月）

国民公会肩负着为法兰西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使命。它在1792年9月20日下午，也就是瓦尔米战役结束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组织好领导机构之后，它于9月21日在马内日大厅里取代了立法议会。它接过来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反法联军被击退了，但没被制服；反革命势力受挫了，但没有被打垮。

自8月10日以来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保卫祖国和革命的政策方面被人民所超越。但它通过吉伦特派又在新议会里取得优势。它能胜任这一重任吗？……战争的失败对吉伦特派来说是致命的。共和国军队获得成功时，吉伦特派才能保持政权，一旦军队败北，他们就完蛋了。然而，作为主战派，当他们感到人民的观点和自己疏远了的时候，就试图通过使冲突普遍化再一次把它吸引过来。吉伦特派想用这种政治手腕或革命理想主义使法国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样，他们促使贵族欧洲的一切利益都为反对这个革命的民族而联合起来。可是他们不懂如何把战争引向胜利。1793年3月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急局势注定了吉伦特派垮台的命运。

Ⅰ.各党派的斗争和对国王的审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国民公会，作为普选产生的新的制宪议会，是国家的唯一代表，独揽了一切权力。而巴黎市府作为一个起义的市政府，只能在全国的代表面前让步。它认识到这一点，便采取温和的姿态，直至取消了它的监视委员会。因此，党争能否停止，取决于在国民公会中占大多数的吉伦特派的态度。山岳派由于自知力量不足，曾在开始的几天里加强了和解的努力。9月22日，马拉在他的报纸上宣布要采取一项“新的步骤”。丹东试图同布里索达成一项协议。

各党派之间的休战实际上为时很短。但在一些重要决议上，各党派毕竟表现了一致的休战姿态。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中，一致通过既反对独裁制又反对土地法的决议，这使有产者和民主派都安下心来。决议

指出：

“未经人民接受的宪法不得生效，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将受到国家保护。”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一致赞成废除王权。建议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的附议。格雷古瓦说：“国王之有害于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于身体。宫廷是罪恶的渊薮、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国国王的历史亦即各国国民的蒙难史。”当天晚上，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罗兰在一份给各行政机关的通令中写道：“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宣布共和，那就请同时宣布博爱吧，因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约-瓦雷恩又促使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历法。

9月25日，多姆山省议员库通提出一著名的原则：“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这项提案经长时间的辩论后得到了国民公会的一致采纳。这一原则否决了吉伦特派搞的联邦主义计划。1792年12月16日，为了完善这一法令，国民公会又规定：任何人，如若企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统一或把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割给外国”，将被处以死刑。

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休战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面对着势力尚不强大的山岳派，吉伦特派在中间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便有恃无恐，重启战端。参加8月10日起义的手工业者们和那些未能制止他们革命行动的人之间的斗争，将一直持续到1793年6月2日，即吉伦特派被清洗出国民公会并被打倒为止。两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1792年9月25日起，吉伦特派通过塔尔纳省议员拉苏尔斯之口（“巴黎的影响应该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然后又通过罗讷河口省议员勒贝基之口（“意欲建立独裁统治的党就是罗伯斯庇尔的党”）发起了攻势。吉伦特派极力

打击他们最惧怕的山岳派领袖，即所谓“三头”——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丹东曾责备马拉（“我们不应因为某些过激的个人而谴责一个省的所有议员”），并呼吁团结（“奥地利人看到这一神圣的和谐时定会吓得发抖”），但均属徒劳。满腔仇恨的吉伦特派仍一意孤行。

1792年9月25日这天，吉伦特派老调重弹，大骂马拉想搞独裁。“人民之友”承担了这一“罪责”，并予以反击：

“我作为一个政论家，建议把军人保民官、独裁者或三头政治作为消灭叛徒和阻谋家的唯一手段，这在法国是第一个，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马拉还提到他“为拯救祖国而蹲黑牢、遭磨难的三年”。他说：“我熬夜、苦干、受苦、受难、冒险，到头来竟落得如此下场！好吧，我就待在你们中间，来抵抗你们的狂暴攻击！”

辩论急转直下，吉伦特派不得不接受库通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提案。

对于已经和他们达成和解的丹东，吉伦特派更是背信弃义。1792年10月9日，他的司法部长职务为吉伦特派分子加拉所取代。10日，像所有离职的部长一样，丹东必须交出自己的账目。由于把钱作了特殊开支，丹东无法说明拨给他部的20万锂秘密经费的使用情况。10月18日，勒贝基又为此事发难，丹东越解释越糊涂，最后承认道：“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我们没有合法的收据。”11月7日，再次发生辩论，吉伦特派对丹东穷追不舍。终于，国民公会拒绝发给有贪污嫌疑的丹东清账证明书。从此，吉伦特派处处拿账目问题来攻击丹东。丹东由此变得暴烈起来，政治声望大为下降。事实证明他的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

1792年10月25日，卢瓦雷省议员卢韦以极端粗暴的态度控告罗伯斯

庇尔野心勃勃，想搞独裁。他说：

“罗伯斯庇尔……我控告你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偶像；我控告你用阴谋和恐怖的各种手段残暴地压迫巴黎省的选举大会；最后，我控告你明目张胆地篡夺最高权力……”

而罗伯斯庇尔在9月25日就说过：

“我不自认是被告，我自认是一个爱国主义事业的捍卫者……我决不是什么野心家，我一直在同野心家们作斗争。”

11月5日，在答复卢韦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牢牢抓住辩论的实质问题，为8月10日的事件和革命行动作了辩护：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非法的，恰如大革命、如推翻王朝和摧毁巴士底狱是非法的一样，恰如自由本身是非法的一样，我们不能搞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

这对吉伦特派来说是又一次失败。经过辩论，罗伯斯庇尔的影响扩大了，俨然成为山岳派的领袖。

这些攻击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促使山岳派下定了同吉伦特派斗争的决心。吉伦特派的攻击还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促成了一个“第三派”的形成。这个“第三派”，被卡米耶·德穆兰在《爱国者论坛报》上称为“冷漠派”——“一伙真正的投机分子，他们处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就像处于上升和衰落之间的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一样。”那些来自各省的独立派议员，尽管对巴黎市府和山岳派充满偏见，也因吉伦特派持续不断的指控和对过去事件的指责而忐忑不安。曾长期追随吉伦特派的阿纳夏尔西·克罗茨断然同他们决裂了。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其名虽为《既非马拉也非罗兰》，内容却是专门反对他过去的那些朋友的。“第三派”是在1792年11月初最后形成的，吉伦特派再

也不能独立操纵国民公会了。11月16日，他们连议长的职位都丢了。这一天，一位独立派议员、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被选为议长。

国民公会是由少数决心拯救革命和祖国的人选任的，所以其中找不到任何拥护旧制度或立宪君主制的保王派。那些创造了各革命日并主张采取各种便利民生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无套裤汉也没能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但他们在巴黎各区取得了优势地位，并由此在1793年带动了国民公会本身。国民公会里并无有组织的政党，只有一些界限模糊不清的派别。这些派别追随着两个领导集团——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引起它们之间根本对抗的是不同的阶级利益。

右边的吉伦特派崇尚法制，仇恨由山岳派和各区活动分子组成的巴黎市府所倡导的革命措施。它代表有财产、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要保卫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反对无套裤汉的各种限制要求。在政治方面，吉伦特派敌视一切救国所必需的特别措施。它发动了战争，却拒绝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打赢战争。为反对权力集中和严格的行政管理，吉伦特派求助于温和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各地方当局。在经济方面，同商业资产阶级血肉相连、对人民群众疑虑重重的吉伦特派狂热地要求经济自由、自由开业和自由利润。他们仇视无套裤汉所拥护的管制经济、限价、征用、指券强制流通等措施。吉伦特派满脑子社会等级观念，力图维护和加强社会差别，把财产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他们只为有产的资产阶级利益着想，因而对人民总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蔑的神态，认为人民毫无管理的能力。他们维护本阶级的独占统治。

左边的山岳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各阶层，即手工业者、店员、消费者。这些人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生活费用昂贵、失业和低薪）而备受熬煎。本身来自资产阶级的山岳党人，认识到法国的危急局势，要求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而这些特殊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取得人民支持时才是有效的。因此，他们便和推翻了王权并通过起义登上政治舞台的

无套裤汉结成联盟。由于比较接近人民、比较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较少受制于理论，懂得把公众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为了大革命的唯一中坚——人民的利益，他们决定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山岳派的领袖大都是巴黎的议会代表。他们深知首都人民在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和在8月10日的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并反对吉伦特派因害怕革命群众而企图把巴黎的影响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拉苏尔斯在1792年9月25扫就是这样要求的）。

1792年10月，布里索在《就巴黎的雅各宾社团问题告全法兰西共和派书》中，把雅各宾派和山岳派写成"一伙操纵巴黎社会，并败坏其声誉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捣乱分子想把财产、便利条件、食品价格以及对社会的各种服务统统拉平。"

1792年9月30日，罗伯斯庇尔在《致选举人的信》第1期中曾提出：

"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僧侣也已消失，平等的统治开始了！"

他抨击了那些假爱国者，说他们"只顾为他们自己而建立共和国，只想为富人和政府官员们的利益进行统治。"

他把"力图在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的"真正爱国者同他们进行了对照。

山岳派的领袖们，尤其是雅各宾派，力求使民族的现实状况具有能够团结人民群众的积极内容。在这方面，圣茹斯特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在1791年出版的《论大革命和法国宪法的精神》一书中，尚未摆脱孟德斯鸠影响的圣茹斯特曾写道：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便没有祖国。因此，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除非他们轻视和仇恨其他民族）没有祖国。”

在他1792年11月29日所做的关于生计问题的演讲中，圣茹斯特超越了“祖国和自由一致性”这一18世纪的平庸论点，把祖国和幸福等同起来了（这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独创性）：“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但是，当他强调“使人民从动荡不定和败坏人的悲惨状况中解脱出来”有助于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走得更远了。他在谴责“滥发符号券（即指券）”时，对国民公会议员们说：只要制止通货膨胀的破坏，保证人民的衣食，并由此把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们就可以在顷刻间给〔法国人民〕一个祖国”。罗伯斯庇尔的话说得更简洁。1792年12月2日，他在关于厄尔-卢瓦尔省小麦骚动的讲演中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奠定了一个把人民群众包括在国家之中的理论基础：

“理论家们把生活最迫切需要的食品只看成一种普通的商品，他们不在粮食贸易和靛蓝贸易之间作任何区分。他们谈得较多的是粮食的贸易，而不是人民的生计……他们对于批发商或有产者的利润考虑得很多，而对于人们的生活则不放在心上……最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最首要的社会法律就是保障一切社会成员生存手段的法律，其他的一切都应置于该法律之下。”

但是，正当山岳派由于战争需要和民族意识而向无套裤汉靠拢的时候，陷于空前矛盾窘境的吉伦特派却由于阶级本性而同无套裤汉疏远了。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担心求助于人民（非此不足以打败贵族和反法联盟）会损害有产者的统治地位。它拒绝作任何让步。1792年12月8日，继巴巴卢谴责有人“想制定有害于财产权的法律”之后，罗兰确立了谷物的贸易自由。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又通过否定民众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吉伦特派政策的阶级基础：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

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他是在维护财产权和财富的至上地位。吉伦特派在怀念基于纳税额的国家组织方式吗？……这里至少说明了他们对人民的蔑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竞争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无疑，大部分山岳派都和吉伦特派一样，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和革命，他们不得不采纳一种有利于群众的政策——该政策对某些人来说是原则，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权宜之计。山岳派接受并加以合法化的恐怖，按马克思的说法，“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1]。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将由此而获救。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应确定山岳派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山岳派资产阶级往往是上层资产阶级，国民公会的财政家康邦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些人是一些见势在必行便欣然为之的政客吗？确切些说，他们是一些坚定的资产者，拒绝任何妥协。他们认定法兰西民族和本阶级除了胜利别无出路，感到有必要采取这种策略。另外，他们受益于大革命，尤其是国有财产的出售，深知贵族的反攻倒算会使他们丧失一切。但其中的某些分子很快就对那些强制的和恐怖的做法感到厌倦——丹东和宽容派就是这样的人物。加之，这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政策是由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这个联盟是革命政府的柱石，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激进中等资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力量。它在无套裤汉群众的有生力量和那部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这一立场本身是不无矛盾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导致了罗伯斯庇尔政策的最后失败。这一立场是由激进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罗伯斯庇尔的房东迪普莱（细木工，优秀的雅各宾派）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尽管他身处劳动界，然而他至少拥有1—1.2万锂的房租岁入。迪普莱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相当优裕的木器业主。他身上体现了雅各宾派的双重特点。

最后该说到国民公会的中间派。这个派别是一群游移不定的分子所

组成的，也叫平原派或沼泽派。他们真诚信奉共和制，决心保卫革命。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自由的拥护者，从内心深处惧怕人民各阶层。但作为真诚的共和派，他们认识到：只要革命尚处于危险之中，就决不能和发动过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的人民决裂。他们最终接受了人民所要求的各种措施，但认为这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一旦革命胜利它们就应被取消。起初他们倾向于吉伦特派，但吉伦特派的仇视态度以及在消除危机方面的无能使他们改变初衷。其中有些人，如巴雷尔、康邦、卡诺、兰代等，归附了山岳派，同意该派的救国政策。但大部分人在1792年11月形成了“第三派”。这一派最后还是接受了山岳派的领导，因为这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领导。

2.对路易十六的审判（**1792**年**11**月**—1793**年**1**月）

国民公会的分裂因路易十六的审判而加剧。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斗争也愈发不可调和。

对国王的起诉拖延了很久。吉伦特派想延迟这场审判，因此毫不着急。丹东曾说过：“国王一旦受审就必死无疑”。国民公会实际上已不得不宣布国王有罪，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否定了8月10日起义。1792年10月16日，审判程序问题提交到法制委员会，随后该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11月7日，梅尔提出一个很有分量的报告，论证了路易十六可以由国民公会来审判。围绕该报告展开了辩论。吉伦特派的头头们都避免卷入辩论，而圣茹斯特在11月13日的讲演中把这场辩论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要求审判路易的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处罚国王的问题上谨小慎微的人永远建立不了共和国……就我而言，我看不到任何中间道路：这个人要么继续当国王，要么死亡。……他不可能不搞阴谋地进行统治，他的疯狂已极为显然。所有的国王都是叛乱者和篡权者。”

路易十六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是一个敌人，一个外国人。国民

公会与其说应当审判他，不如说应当打倒他。

“他是在巴士底狱、南锡、马尔斯校场、图尔内和杜伊勒利宫杀人的凶手。除了他，还有对你们干过更多坏事的敌人和外国人吗？”

1792年11月20日，“铁柜”（按路易十六的命令秘密地置放在宫殿墙壁中的一只橱柜）及其内藏文件的发现，证实了国王和敌人进行的各种交易。由此，审判再也不能拖延了。12月3日，罗伯斯庇尔重新提起圣茹斯特的论点：

“国王并不是什么被告，你们也不是什么法官。你们不是要去判决一个人是否有罪，而是要采取一项救国措施，是要履行一项保卫国家的天职。”

处死国王必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提议用某种方式来审判路易十六，这是向君主和立宪专制制度的倒退，是一种反革命观点。因为这样就使大革命本身成了问题。”

尽管吉伦特派玩弄种种花招，国民公会还是于1792年12月6日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路易·卡佩罪行公诉状》的委员会。

1792年12月11日，对国王的审判开始了。首先宣读兰代起草的起诉书。兰代的起诉书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揭露了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各关键时刻的伪善表现。12月26日，国王的辩护律师德·塞兹宣读了一篇措辞优雅，态度认真的辩护词，重申了1791年宪法所宣布的国王不可侵犯的原则。未能阻止这场审判的吉伦特派试图用一种新的牵制战术来搭救国王：他们要求征求人民的意见。韦尼奥强调说，不可侵犯的权利是1791年宪法给予国王的，只有人民能够从路易十六那里收回这种不可侵犯权。他忘记了这一宪法为纳税人服务的性质。1792年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提出了反驳。他指出了诉诸人民意愿和召集各基层议会的做法将给

国家带来的危险，说这样会“徒然地引起共和国的动荡”。1793年1月初，罗伯斯庇尔在《致委托人的信》中重申了他“关于人民主权和关于路易·卡佩审判的上诉制度”的论点：

“人民已经两次表明了对路易的态度：第一次是在他们拿起武器把他赶下王位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他们把拯救祖国和为全世界作出榜样的神圣职责——旗帜鲜明地给国王定罪，赋予你们的时候……当在酝酿中的政府遇到危机，当敌人联合起来向我们逼进的时候，有人要把国家置于危险之中，难道说这不是要通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使我们回到王政时代吗？”

审判国王的问题于1793年1月14日交付议决。这一天，国民公会确定了3个议员必须回答的问题，

“路易·卡佩是否犯有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是否应当就对他的判决征求国民的意见？应对路易处以何刑？”

除了几票弃权外，议会一致投票宣布国王有罪。征求人民意见的提议以426票对278票的多数被否决。吉伦特派失败了。通过一场没完没了的唱名投票（该投票从1月16日晚开始，整整进行了24个小时），终于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宣判了国王死刑。26名议员投票主张死刑缓期执行。1月18日，议员们又就缓刑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主张缓刑的意见以380票对310票的多数被否定。针对吉伦特派的态度，巴雷尔强调指出：缓刑将会使国内的各种纠纷延续下去，从而使大革命在外敌面前处于虚弱无力的状态。

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处死。这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震惊了欧洲。死刑是1月21日11时在革命广场上执行的。行刑时广场上军队阵势威严，百姓人山人海。在此前一天，一个叫巴里的前国王侍卫刺死了一个人民代表——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这种无力的绝望举动只

能使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策立场，并为大革命提供了第一个“自由殉道者”。

国王的处死打击了王权传统的和近乎宗教性的威望。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处死了，神授的君权不复存在了。国民公会已切断了自己的后路。欧洲对这些弑君者们发动了无情的战争。在革命的法国和旧制度的欧洲之间，在曾千方百计搭救国王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实际上，路易十六的处死也使吉伦特派实行的拖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在审判工作进行的时候，他们趁机提出一些对外政策方面的借口。布里索曾经宣称：“在我们的辩论中，我们对欧洲注意得很不够。”1792年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对此驳斥道：“胜利将决定你们是人类的叛乱者还是救星。”吉伦特派热衷于拯救国王，希望限制同欧洲的冲突。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同贵族妥协。就这些曾在11月份鼓吹战争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很不合逻辑的。通过处死国王，山岳派使法兰西民族除了去争取胜利之外，再无其他生路可寻了。

加来海峡省议员勒巴1793年1月20日写道：

“我们就这样勇敢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已破釜沉舟。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向前进。现在我们尤其可以说：要么自由地生活，要么就死亡。”

Ⅱ.战争和第一次反法联盟（1792年9月—1793年3月）

在瓦尔米战役后的几周里，共和国军胜利地挺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流域。接着，那些被占领国的命运问题被提上日程：应该解放它们呢，还是应当征服它们？其实战争的逻辑和政治的需要早就把解放变成征服了。

1.从宣传到兼并（**1792**年**9**月**—1793**年**1**月）

对莱茵河左岸、萨瓦和尼斯的征服使国民公会碰到了一些解决起来颇费踌躇的问题。

1792年9月29日，昂塞尔姆指挥的瓦尔军进入尼斯。孟德斯基乌同时解放了萨瓦，受到当地人民兴高采烈的欢迎。9月25日，他致信国民公会说："城乡的百姓们蜂拥而至，人人都佩戴着三色帽徽。"

在莱茵河流域，居斯蒂纳9月25日征服了斯皮尔，10月5日征服了沃姆斯，21日征服了美因兹，两天后又征服了法兰克福。

比利时也在这时被征服了。瓦尔米战役之后，奥地利军队不得不于10月5日撤去了对里尔的包围。27日，迪穆里埃进入比利时，从瓦朗西埃纳向蒙斯挺进。他的军队全是由正规部队组成的，是法国最好的军队。1792年11月6日，他在蒙斯的正面、热马普村附近发动了进攻，并攻占了这个村庄。奥地利军队败退了。11月14日，奥军撤离布鲁塞尔，30日又撤离了安特卫普。一个月间，奥军从比利时一直被赶到拉罗埃尔。热马普战役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尔米只是一场简单的战斗，而热马普却是共和国军队发动并打赢的第一场大战役。

对君主制欧洲的宣传战是在11月宣告开始的。事实上，尼斯人、萨瓦人和莱茵河地区的居民都要求并入法国。可是，国民公会犹豫不决。1792年9月28日，公会收到了孟德斯基乌将军的一封信，得知萨瓦人要求组成法国的第84个省。卡米耶·德穆兰叫嚷："把萨瓦置于共和国的奴役之下，当心我们沦为国王的同类！"德拉克鲁瓦插话道："那谁来偿付战争费用呢？"吉伦特派本身也意见纷纭。就昂塞尔姆将军将把尼斯伯爵领地收归市有一事，拉苏尔斯10月24日的报告指责："发号施令就是征服！"有一个由众多外国难民组成的势力很大的派别在促进这一征服行动。这一派别是科尔得利俱乐部中最积极的分子，其中有莱茵人、比利时人、列日人、荷兰人、海尔维第俱乐部的瑞士人和日内瓦人，以

及“阿洛布罗日人”俱乐部和军团的萨瓦人。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集团，其中有阿纳夏尔西·克罗茨，他是普鲁士臣民、国民公会的瓦兹省议员，被称为“人类代言人”，还有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尔、荷兰银行家德·科克和被认为是奥地利首相考尼茨的私生子的比利时银行家普罗利。

1792年11月19日，国民公会热烈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议：

“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布，它将向一切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并责成政府命令所有将军援助这些民族和保护那些为自由事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

议会希望建立一些独立的姊妹共和国。11月21日，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布里索曾考虑建立一条“共和国圈”。26日，他给塞尔旺部长写信谈道：“只要还有一个波旁家族的成员留在王位上，我们的自由就难以稳固，同波旁家族就决无休战！”他还进一步说道：“只有当欧洲，而且是整个欧洲都燃遍烈火，我们才能得到安宁！”格雷古瓦宣称要建立一个既无堡垒又无国界的欧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要充当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保护人。

很自然，兼并战是宣传战的结果。国民公会号召各民族起来造反，它就得出面保护这些民族。既要保护，除了兼并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呢？这方面交织着多种考虑。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宣传战唤起了民族野心，法国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地区扎下营盘，夺取自然边界似乎成了他们的注定目标。照布里索的说法，“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11月26日，他又指出：

“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

宣传和兼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越发明确地考虑到：战争耗资巨大，怎样养活占领区的军队？驻在尼斯的昂塞尔姆、驻在萨瓦的孟德斯基乌和驻在比利时的迪穆里埃都尽可能少向当地居民索取财物。而驻在莱茵地区的居斯蒂纳却就地征集部队给养。直到1792年12月10日，国民公会未就此作出最后决定。12月10日这一天，埃罗省议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康邦十分激动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越是深入到敌人的国土，战争就越是费资浩大。我们的哲学原则和宽宏大量使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人们总说我们给邻国带去了自由，我们还带去了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食粮哪！他们还不接受我们的指券呢！”

宣传政策所碰到的困难和战争的需要加速了事态的转变。萨瓦废除了旧制度并要求并入法国，但比利时和莱茵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则并不显得那么热情。最后，还是财政上的考虑占了上风。

根据康邦的要求所通过的1792年12月15日法令，在被征服的国家建立了革命政府。教会和新制度的敌人的财产被查封，并做了指券的抵押品。什一税和所有封建捐税均被废除，旧捐税被向富人征收的革命税所取代。人们必须向自由宣誓，然后才有选举新政府的权利。“向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康邦在报告中说：“在我们进入的国家里，所有享有特权的人，所有暴君，都应被视为敌人！”

这样，被征服的各民族不得不接受法国的革命专制。12月15日法令需要用武力加以贯彻。除了少数坚定的革命派，人们很快对这种政策产生了反感。在比利时，国民公会因为粗暴地没收了教会的财产而遭到部分居民的反对。

兼并成了在被占领地区防止发生反革命的唯一可行政策。早在1792年11月27日，国民公会就根据格雷古瓦的报告，以只有一票反对的绝对

多数通过了兼并萨瓦的决议。报告人列举了人民主权（10月22日，阿洛布罗日人的国民议会在尚贝里集会，在宣布废除旧制度之后，还表示了加入法国的意愿）、地理、萨瓦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等方面的理由。尼斯也按1793年1月31日的决议被兼并了。就在这一天，丹东提出了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然边界的政策：

“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

在比利时，加入法国的问题是在1793年3月间通过逐城、逐省投票决定的。在莱茵地区，3月17日，并入法国的问题也获得了在美因兹召开的议会的赞成，并立即得到了国民公会的批准。最后，3月23日，前巴塞尔主教辖区也被并入法国，变成了蒙泰利布尔省。

在这个时期，反法联盟成立了，战争在蔓延，厄运的征兆已经出现。随着事态的发展，吉伦特派及其政策的命运便同共和国军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

2.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建立（**1793**年**2—3**月）

革命宣传和法兰西征服威胁到各君主国的利益，它们随即作出反应：组织一个总联盟反对这个革命的民族。

和英国的决裂是反法联盟形成的第一步。在法国征服了比利时之后，皮特领导的英国政府开始放弃中立政策。1792年11月16日，法国行政会议宣布埃斯考河诸河口可以自由航行，全然不顾封闭这些河口的明斯特条约。这进一步加深了英国主战派的不满。国民公会关于允诺向各起义民族提供救援的决议激怒了英国的领导人。皮特采取了更多的反法措施。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一传来，英国宫廷如丧考妣，当即举行哀悼。1793年1月24日，法国大使肖夫兰接到了离开英国的命令。2月1

日，根据布里索的报告，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和荷兰宣战。这一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以皮特为代言人的伦敦旧城不能容忍安特卫普落入法国之手。另一方面，国民公会把同荷兰开战看作是攫取阿姆斯特丹银行以改善财政状况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到旧制度末期，法英两国在商业、航海和殖民地等方面的竞争已经激化。许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人物一直在担心英国对法国的竞争。在海外商品运输方面，法国也一直有赖于英国商船，国民公会贸易委员会1793年7月2日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法英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不再是君主之间的战争，它在许多方面都已成为夺取政治、经济优势的民族间的战争了。

这场大战很快就爆发了。国王的处死对于英国只是借口，而对于有着君主主义狂热的西班牙则成为战争的更充分的理由。1月21日之后，戈杜瓦首相拒绝接见法国代办布古安。布古安于2月22日离开了马德里。3月7日，国民公会在一致欢呼声中通过了对西班牙宣战的决议。巴雷尔宣称："法国多了一个新敌，不过是自由多了一份胜利！"随后，法国又同意大利各国君主决裂。1月13日，在由僧侣煽起的一场骚乱中，法国外交官巴斯维尔被杀害。这引起法国同教皇的决裂，接着就是同那不勒斯、托斯卡纳和威尼斯的决裂。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外，法国同整个欧洲都处于战争状态。布里索宣称："现在要和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交手作战的敌人是欧洲的所有暴君！"

尽管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但这些国家并未连成一气。英国于1793年9月通过一系列条约把所有参战国联系起来，由此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灵魂的第一次反法联盟。

大革命只能自己保卫自己。然而吉伦特派并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反法联盟军队的连连获胜决定了该派别的厄运。

III.大革命的危机（**1793**年**3**月）

革命的法国刚刚向君主制欧洲宣战就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外敌的联盟和军事的失败；贵族反革命和内战；经济危机和人民运动，统统汇合到一起，使危机恶化到了极点，同时也使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1.生活费用的上涨和人民运动的高涨

使共和国在1793年春几乎陷于崩溃的总危机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一危机自国民公会召开以来就存在。热衷于保卫有产者阶级特权的吉伦特派所推行那套纯粹消极的政策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吉伦特派一直想通过剥削被征服国家来解除经济危机。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财政危机由于新指券的不断发行而日渐严重，引起生活费用的迅速上涨。圣茹斯特在1792年11月29日的讲演中曾提议停止发行指券，整顿财政。他认为这是解决生活费用上涨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经济的毛病就在于符号券（指券）发行得过多。因此，应当尽力不再增加指券，以防止其继续贬值。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尽可能少地发行货币。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减轻国库的负担。或是通过把土地抵押给我们的债权人，或是通过拨出一些按年偿付的债款来还清债务，但不再增发符号券。"

圣茹斯特的意见未被采纳。财政委员会领导人康邦继续奉行通货膨胀政策。到1792年10月初，流通中指券的总量已达20亿锂。10月17日，康邦又将一批新指券投入流通，从而使指券总量上升到24亿锂。指券在继续贬值，国王的处死和全面的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1793年1月初，指券还相当于面值60%—65%的价值，到2月份就只能相当于面值的50%了。

生计危机由此严重化了，日平均工资在农村是20个苏，在巴黎是40个苏，而面包价格在某些地方竟涨到8苏1斤[2]。其他食物，尤其是殖民地的产品，都有类似的涨价。面包不仅昂贵，而且很难买到。1792年的

收成是不错的，但小麦一直没怎么上市。圣茹斯特在11月29日的讲演中分析了这种人为粮荒的原因："不愿用纸币充塞钱袋的农民，很不情愿出售他们的粮食。其他任何商业都必须出卖商品才能获取利润以维持生活。农民则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买。他们的需要并不在于商业。这个阶级习惯于年复一年，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积攒一部分土地收入。而今天，他们宁愿保存粮食而不去积攒纸币。"各大城市都出现粮荒，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们根本不急于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换回贬值的纸币。

本来，在夏季里建立的那套助长了第一次恐怖的管理制度，是可以通过强制清查粮食和批准征调来打消粮食生产者的坏心思的。然而，身为内政部长，并对经济事务负有责任的罗兰，却固守严格的自由主义正统信条，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贯彻这种合乎时宜的立法。恰恰相反，1792年11月8日，国民公会废除了9月制定的管理制度，重新宣布谷物和面粉贸易"最完全的自由"。当然，它仍禁止粮食出口。国民公会规定：反对食物流通者和聚众闹事者将被处以极刑。实际上，谷物一不上市流通，各地谷物价格就发生了差异：1792年10月，1瑟蒂埃[3]谷物在奥布省价值25锂，在上马恩省价值34锂，在卢瓦尔-歇尔省价值47锂。但在巴黎1法斤面包不过卖3苏，因为巴黎市府用财政补贴的办法限定了面包的价格。罗兰曾喋喋不休地谴责这种浪费行为。吉伦特派鼓吹自由竞争可以拯救一切，他们对各阶层群众的疾苦仍然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社会危机也在加深。从1792年秋天起，各地城乡都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在里昂，丝织工人由于丝绸生意萧条而纷纷失业。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加强了治安部队并开始抓人。在奥尔良，店铺遭到了抢劫。10月间，凡尔赛、朗布耶、埃唐普等地又发生了骚乱。11月间，小麦骚动遍及整个博斯地区和边境各省。一帮一帮的物价核定员出现在各地市场。11月28日，旺多姆有3 000名核定员。29日，有6 000名武装核定员出现在厄尔-卢瓦尔省的库维尔大商场。他们的帽子上都插着橡树枝，集合时喊着"国民万岁！小麦就要降价了"的口号。吉伦特派坚持自己的阶级

政策，强行在博斯地区恢复了秩序。

在巴黎，市府和各区在1792年11月29日提出的限价要求毫无结果。这一要求是一些平民领袖和各区活动分子提出来的。12且10日，格拉维利埃区的修道院长雅克·鲁就“路易末世的审判、就投机商、囤积者和叛徒”等问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在人权区，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名叫瓦尔莱的邮局职员从1792年8月6日就开始主张指券的强制流通和制定对付投机倒把的措施。他经常登上一个带轮子的讲坛，到各种公共场所进行宣传。里昂的夏利耶和勒克莱尔、奥尔良的塔布罗都宣传同样的口号：实行食物限价和谷物征购；管理面包业；救济穷人和志愿兵家属等。这些被称为“忿激派”的活动分子的宣传鼓动，在巴黎各区蓬勃开展。经济危机的加剧促进了他们的活动。1793年2月12日，一支代表巴黎48个区的代表团来到国民公会提出：

“仅宣布我们是法兰西共和派是不够的，还应该为民造福，应该有面包。因为没有面包就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共和国。”

请愿者们谴责“谷物贸易的绝对自由”，要求实行限价。连马拉都斥骂这场请愿是卑鄙的阴谋。2月25日，在殖民地粮食贸易中心——伦巴第人居住区发生了骚乱。后来这种骚乱蔓延开来，并持续多日。参加骚乱的人首先是妇女，其次才是男人。他们强迫商人按他们规定的价格把糖、肥皂和蜡烛卖给他们。

雅克·鲁这样说过：“这些食品杂货商不过是把他们长期以来让人们多付给他们的钱还给了人们而已。”

但罗伯斯庇尔像马拉一样，把这种骚乱斥为“一种旨在挑动爱国者斗爱国者的阴谋”。他提出，人民不应该“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而起来闹事，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人民应该奋起，但奋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垮那些匪徒，而不是为了找糖吃。”

忿激派要求实行限价的行动尽管失败了，但他们毕竟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山岳派的反应跟吉伦特派是一样的。但是不久，山岳派迫于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同吉伦特派作斗争，为了拯救祖国，便对人民的要求作了让步。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告诉巴雷尔：

“如果你们想让穷人来帮助你们完成这场大革命，你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证穷人能够活下去。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应按救国这一伟大法则办事。”

生活费用的上涨加速了吉伦特派的衰落。

2.迪穆里埃的失败和叛变

正当政治危机恶化、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更加激烈地重新开战的时候，前线告急了。

在1793年初，共和国军队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由于迪穆里埃所庇护的那些军需供应商的盗窃活动，部队吃不好、穿不好，致使许多志愿兵只打了一仗就利用法律承认的权利回家了。1792年12月法军有40万人，到1793年2月就只剩22.8万人了。法军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有着不同编制和章程的正规部队和志愿兵部队并存。志愿兵穿蓝服（人称“矢车菊”），军官由选举产生，军饷较高，军纪也不太严，且只有参加一次战役的义务。正规军士兵则穿白服（人称“白呆子”），负有长期的义务，军纪严格，军官由上级任命。由于正规军蔑视和妒嫉志愿军，两种部队之间常常发生争吵斗殴。

1793年2月21日《军队混编法》颁布后，结束了这种两种部队并存的状况，把军队按一种全国性体制统一了起来。改革计划是迪布瓦-克朗塞在2月7日向国民公会作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据此，两营志愿兵将和一营正规军合并为半个旅。这样，志愿兵可以把他们的救国热忱和公民责任感传给正规军；正规军则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技术和纪律教给志愿

兵。士兵们还可以自选军官，只有1/3的官职凭资历取得。2月12日，圣茹斯特对迪布瓦-克朗塞的方案表示热烈支持：

“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了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得胜利。”

他还进一步说道：

“共和国的统一要求军队的统一，祖国只有一颗心脏。”

《军队混编法》尽管受到吉伦特派的反对，但仍被通过了。然而，由于军事的需要，该法令一直拖到1793年与1794年之交的冬季才得到落实。但从1793年夏以来，服装、军饷及各种规章制度都统一起来了，正规军和志愿兵同化了。

1793年2月24日通过的30万人征召令，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国民公会曾向志愿兵发出呼吁：“士兵公民们，法律允许你们退役，但祖国的呼声却不让你们这样做。”试图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把他们挽留在部队里。但毫无效果。1793年1月25日，迪布瓦-克朗塞以总防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一份长篇报告。经讨论后，议会于2月21日作出一项原则性决定（这项决定后来由2月24日的法令完善化和具体化）：由国民公会下令在各省征召30万大军。原则上志愿兵的应募契约均维持不变。如志愿兵人数不足，“公民得不停地予以补足，为此他们将投票表决，以采取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第11条）

1791年和1792年的征召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1793年的征召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责任部分地应归于国民公会不愿确定军队补充人员的选派方式。国民公会让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从而使征兵工作被卷进个人之间的争斗。为了避免抽签或投票表决的麻烦，埃罗省于1793年4月19日决定实行直接的和个人的征召，即由国民公会特派员任命的委员会按

地方政府的建议，选派“那些被认为是最爱国的，而且在勇气、性格和体力方面都最适宜于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的公民”入伍。同时，又向富人强行发行500万锂的公债，以支付军饷，补偿装备费用和救济“贫困阶级”。这种征兵方式的长处在于，它把征召工作交给地方革命政府去办，因而被普遍采用了。然而1792年2月24日颁布的征召令只招募到预计人数的一半。只有靠全国总动员和普遍征调才能解决兵力问题。可是，人们还得再吃些败仗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1793年的军事行动以进攻荷兰失利开始。尽管法军已明显处于劣势，迪穆里埃拟定的进攻计划仍被采纳。1793年2月16日，他率2万军队离开安特卫普进入荷兰，并于2月25日占领布雷达。但3月1日，奥地利最高统帅科布尔的军队向分散驻扎在拉罗埃尔的比利时法军猛扑过来。这真是一场灾难：在极度混乱中，法军3月2日撤离埃克斯-拉-夏佩尔，后来又撤离列日。这些败绩在巴黎激起巨大的爱国热潮，推动人们采取第一批救国措施。3月9日，两家吉伦特派报纸——《巴黎纪事报》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印刷所被人们捣毁。第二天，有人试图发动一场人民起义，但由于缺乏巴黎市府和雅各宾派的支持而告失败。不过，在3月10日这天，建立了审判敌特的革命法庭。丹东宣告：“我眼中只有敌人，让我们打击敌人吧！”

接着，比利时失陷了。迪穆里埃不得不向南方撤退。但他还不甘心，他认为保卫比利时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向鹿特丹进军。他把战败的部下——米朗达和瓦朗斯的部队重新汇集起来。1793年3月16日他在蒂尔勒蒙一度重新得手，但3月18日就在尼尔温登被击溃，21日又再次败于卢万。此后，迪穆里埃就和把自己打败的科布尔勾结了起来，意欲解散国民公会，按照1791年宪法重建君主制，把路易十七扶上王位。迪穆里埃答应退出比利时。4月1日，国民公会派了4名特派员和陆军部长伯尔农维尔到他军中，准备撤他的职。他却命人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最后，迪穆里埃还试图带领部队进攻巴黎，但士兵们拒绝跟他

走。1793年4月5日，迪穆里埃带着几个党羽（其中有夏特尔公爵，即菲利普-平等之子、未来的路易-菲利普），冒着达武指挥的荣纳省志愿兵第三营的枪弹，仓皇逃入奥军阵营。

比利时的陷落导致了莱茵河左岸的陷落。1793年3月25日，一听到法军在尼尔温登失利的消息，布伦斯维克就跨过莱茵河，把居斯蒂纳的部队向南方压去。沃姆斯和斯皮尔被敌人夺去了。当普军进攻美因兹的时候，居斯蒂纳却在向朗多撤退。

正当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旺代叛乱的时候，反法联盟又在法国领土上燃起了战火。在安特卫普会议上纠集起来的联盟军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的战争目的是实行反革命和获得领土赔偿。失败使政治斗争激化了。吉伦特派指控丹东是迪穆里埃的同谋。丹东曾在3月初被派往比利时，是最初几次失败的见证人。但他却长期维护迪穆里埃，到3月10日还在国民公会上极力替他担保。3月26日，迪穆里埃在叛变的前夕，还在图尔内和3个很可能有问题的雅各宾分子——迪比松、佩莱拉和普罗利会晤过一次。而这3个人都同丹东有密切的来往。然而丹东毫不畏惧。1793年4月1日，在山岳派热烈的掌声中，丹东反控吉伦特派曾与迪穆里埃合谋。迪穆里埃的叛变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倒台。

3.旺代叛乱

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了许多骚乱。1793年3月9日，国民公会不得不派出82名议员去各省监督征兵工作。西部各省发生的动乱最为严重。在伊尔—维兰省，人们大批大批地在“国王路易十七、贵族和教士万岁”的口号下聚集了起来。在莫尔比昂省，拉罗舍贝尔纳和罗什福尔这两个县的首府落到了叛乱者手里。瓦纳也遭到了围攻。3月23日，赴雷恩执行任务的国民公会议员们（其中有比约-瓦雷恩）致信国民公会说：“白旗还在污染着自由的土地，人们还在佩戴白色帽徽……阴谋主要是教士和逃亡贵族搞起来的。”布列塔尼叛乱刚刚发生就被扑灭了。

在旺代省、曼恩-卢瓦尔省、安茹地区和普瓦图地区的边缘地带，在受过教士和贵族长期影响的莫热地区，30万大军的征召如果不是叛乱起因的话，至少也为叛乱提供了契机。1793年3月2日，即肖莱地区赶集日那天，由于农民示威反对征召，商业活动被推迟到第二天才得以进行。3月3日，一伙年轻人又在那里挑起一场殴斗。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类似肖莱地区发生的事件。3月10日（星期天）是既定的抽签日。这一天，圣弗罗兰勒维埃伊敲响了警钟，农民们拿起长柄叉、长柄镰或连枷，驱散了国民自卫军。旺代叛乱由此开始了。

旺代叛乱是大革命所遇到的反抗和农民群众不满情绪最危险的表现。农民群众一直在痛苦甚至灾难中挣扎，因而很容易接受反动派的挑唆，起来反对城市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常常是这些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中的包税人、谷物批发商和国有财产的获得者。一个叫做米洛坦派的传教士团体（其中心在博卡日地区中部的圣洛朗絮塞夫尔）自17世纪末就在西部各省布道，因而这个地区的宗教情绪十分强烈，并随着宗教危机的发生而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势。为数甚众的反抗派教士利用农民的宗教感情煽动他们反对大革命。自从战争蔓延开来之后，保王派也抬头了。但旺代的农民并没有支持1791年8月的贵族叛乱，也没有在1792年起来帮助那些“仁慈的”教士们免遭流放。

30万大军的征召令很难为农民所接受，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们想起旧制度农村中最令人厌恶的自卫队和通过抽签向正规军输送补充兵员的义务。该法律的实施带有很大随意性：它让被征者自己决定谁应参军，结果就让地方情绪支配了征召工作。1793年3月10日之后，从大西洋之滨到布勒西尔和肖莱的广大地区内发生的农民暴动，都以“和平！和平！不要抽签！”为口号。这些暴动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事先串联的。农民尽管受到反抗派教士的挑拨，但他们毕竟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都拒绝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去打仗。贵族分子们开始很惊讶，但又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场暴乱。

叛乱一开始，好几个县的首府，首先是肖莱，就落到了叛乱者的手里。在雷茨地区的旧首府马舍库尔，共和派资产者惨遭毒打和屠杀。旺代的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战争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这个地区的状况及博卡日的地形结构为叛乱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条条被树篱夹起来的坑坑洼洼的小路阻挡了视线，很容易设伏。人们居住分散，分成制租田零散，大路和聚居点罕见，而且军队也很少。国民公会开始时只派国民自卫军来平叛。叛乱首领最初都是民众中产生的，如莫热地区的马车夫卡特利诺、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布列塔尼马莱的前盐税收税员苏许、假发师加斯东等。到4月初出现了一些贵族首领，有马莱的夏雷特、莫热地区的邦尚和代尔贝、博卡日地区的萨皮诺、普瓦图地区的拉罗舍雅克兰。他们都是一些旧军官。一位反抗派教士——贝尔尼修士充任“王家天主教军”的顾问。但农民极不愿意远离家乡而任田园荒芜。因而，叛乱首领们无法组织大规模作战，只好搞一些简单的突袭。往往是一旦发现共和国士兵农民们就起来战斗，仗一打完就分散回家。

不过旺代人打了不少胜仗。他们一开始就控制了布勒西尔、肖莱和帕尔特内。1793年5月5日夺取图阿尔，6月9日又夺取索米尔。但在6月29日，他们对南特的进攻被挫败。海岸线也由于各港口资产阶级成功的抵抗而保住。3月23日和29日，萨布勒多洛纳港口的居民打退了两次进攻。旺代叛乱未能同英国取得联系。3月19日，国民公会一致通过决议：判处一切手执武器的叛乱者死刑并没收其财产。但行政会议到5月份才决定从前线抽调一些正规军来平叛，并建立了由康克洛指挥的布雷斯特海岸军和比隆指挥的拉罗舍尔海岸军。共和国将军们打了不少败仗：韦斯特曼在7月5日、桑泰尔在7月13日都吃了败仗。直到1793年10月，旺代叛乱还未被平息。

这些失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内战激怒了共和派，并把他们推向山岳派阵营。而山岳派作为唯一的拥护救国政策的派别，俨然成为保卫

革命的政党。但是，为了战胜反革命，打败联盟军，山岳派需要人民的支持。于是，它不得不同意对人民群众作出一些让步：3月10日建立了革命法庭，20日成立了一些监视委员会，4月11日通过了指券的强制流通法，5月4日规定了谷物的最高限价。所有这些特别措施，每一项都要同吉伦特派经过一番斗争才得以通过。旺代叛乱把大革命所面临的危机推到了顶点，同时也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垮台。

洛特省议员让邦·圣安德烈1793年3月26日致信巴雷尔说：

“国家正濒于毁灭。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要拯救这个国家，只有采取那些最有速效、最激烈的办法……经验现已证实，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国民公会：你是革命的议会……我们与大革命生死与共……我们必须把国家的航船开到目的港，否则我们就将与它同归于尽。”

Ⅳ.吉伦特派的终结（1793年5—6月）

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危险，人民运动强制推行了第一批救国措施。当吉伦特派明确地表现出对于排除这些危险无能为力的时候，决心拯救大革命的山岳派逐步采纳了民众活动分子们提出的纲领。于是，自1793年春天起，不顾吉伦特派的反对，人们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政府，“自由专制主义”初露端倪。

1.第一批救国措施

形势的曲折发展使群众运动及各种革命措施的发展带有某种节律。

革命法庭在1793年3月10日创设起来。当时，法军在比利时的失败，如同前一年8月间普鲁士军队进逼一样，在巴黎激起了爱国热情的高涨，同时也产生了人心惶惶的景象。许多区要求设立审判国内敌特的特别法庭。被9月屠杀的记忆搅得心神不宁的丹东也于3月9日提出了这一建议：

“我们应当从前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立法议会没有办的事，我们来办！让我们变得可怕起来，以便人民不再显得可怕。”

3月10日，尽管被吉伦特派斥责为独裁，国民公会还是通过决议：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其判决一经作出便不准上诉也不可撤销。“该法庭将受理一切反革命罪行，一切损害共和国自由、平等、统一和不可分割原则及国家的内外安全的罪行，以及一切阴谋重建王权的罪行。”国民公会保留了任命法官、陪审员的权力，特别是保留了起诉权。

各革命监视委员会在1793年3月21日（即在尼尔温登失败之后）成立。国民公会由此推广了一项在巴黎各区发展起来的制度。在各市镇或大城市的各个区，这种委员会握有监视外国人的权力。它们的权限很快就扩大到发放公民证、检查军事证件及逮捕不佩戴三色帽徽的人等事务。不久，这些委员会又担负起开列嫌疑犯名单和签发嫌疑犯拘捕证等工作。这些革命委员会均由忠诚可靠的爱国者（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无套裤汉）所组成，成为一种反对吉伦特派、温和派和贵族分子的战斗组织，也是救国统治体制的主要部门之一。

惩治逃亡贵族的法律在1793年3月28日完成编订，且在编订过程中更加严厉化了。凡在1789年7月1日以后离开法国领土又没有在1792年5月9日以前返回的法国人，凡不能证明自己在1792年5月9日以后一直不间断地居住在国内的法国人，都将被视为逃亡贵族。逃亡贵族被永远驱逐出法国领土，并被判定为“民事上的死亡”，他们的财产被共和国没收，违反该流放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1793年4月5—6日创建了救国委员会，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总防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国民公会中遴选出的9名委员组成，每月改选一次，实行秘密会商，负责督促临时行政会议的行政活动。在紧急情况下，它还有权采取全面防御措施。它的决议行政会议必须立即加以贯彻，“不得拖延”。吉伦特派再次叫嚷反对独裁。马拉反驳

道：

“我们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为了粉碎国王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实行自由的专制主义！”

丹东进入了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巴雷尔、康邦这些转向山岳党的人。

1793年4月9日，国民公会委派一些人民代表进驻各军。早在3月9日，国民公会就派了82名议员去各省开展30万大军的征召工作。4月9日的决议又向共和国的11个军各派了3名人民代表。这些代表被赋予无限权力，最严格地监督“行政会议官员、军队的所有供应商和承包商的活动和所有将军、军官和士兵的行为”。

国民公会并不满意这种组织结构。4月30日，它废除了这些规定，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文本。在加强驻军队特派员权力的同时，它责成他们必须和部队步调一致。特派员们还由此取得了逮捕将军的权力。他们每天都必须向救国委员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每周向国民公会提交一份报告。议会由此保持了对全军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在4、5月间加剧了。在此期间，随同那些政治措施，还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措施。1793年4月11日，通过了关于指券强制流通的法令，禁止实行两种物价和硬币交易，抵制指券者将受到惩处。关于限价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巴黎省的许多权力机构在4月18日、市郊圣安托万各居民区在4月30日都提出了限价要求。1793年5月4日，国民公会作出让步，规定了各省谷物和面粉的最高价格。一些县还清查和征调谷物、面粉以供应市场，禁止其他粮食贸易。最后，1793年5月20日，国民公会还决定向富人强制发行10亿锂公债。为了争取人民，国民公会采取了一些带阶级色彩的应时措施。1793年5月8日，罗伯斯庇尔号召雅各宾派以“无套裤汉的广大群众”反对“穿

金套裤者”：

“你们必须拯救自由。宣布各种自由权利吧，拿出你们的毅力来吧！你们拥有纯洁而强有力的无套裤汉广大群众。他们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那么让富人付给他们报酬吧！”

2.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决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山岳派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吉伦特派在议会中的地位仍然很稳固，但他们已不能控制政府了：罗兰于1793年1月22日辞去内政部长职务，让位于谨慎的加拉；司法部长戈耶不愿受牵连，也辞职而去；陆军部长伯尔农维尔在4月4日被道地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上校所取代；4月10日，丹东的朋友达尔巴拉德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取代了蒙日。外交部长勒布伦和公共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是仅存的两个吉伦特派部长。在国民公会里，平原派投票赞成山岳派提议的所有救国措施，但他们仍怀疑巴黎市府，不愿支持山岳派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企图居于超党派的地位。

1793年4月3日，罗伯斯庇尔发起了进攻：

“我认为，应当采取的首要救国措施，是对那些被控犯有与迪穆里埃同谋罪的人，首先是布里索，进行起诉。”

4月10日，他再次揭露了吉伦特派首领们的反革命政策及他们对迪穆里埃令人发指的讨好行为。韦尼奥作了答辩，话语中直言不讳地把他的派别说成温和派：

“对，我们就是温和派……自从王权废除以来，我听到许多人谈论革命。我曾暗自思量：可能的革命只有两种，一种是财产的革命或者说实行土地法；另一种便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专制主义的革命。我下定决心，要打倒这两种革命……有人企图用恐怖来结束革命，我倒想用爱来

结束革命……我们的温和主义曾使共和国摆脱了可怕的灾祸和内战……”

1793年4月5日，雅各宾俱乐部在马拉主持下向下属各分部发出通令，责成它们一致提出要求，把“上诉派”（即那些曾投票主张征求民意以图搭救国王的国民公会议员）召回并撤销他们职务。4月13日，国民公会就加代的提议，经过激烈辩论后以226票赞成、93票反对和47票弃权通过决议，对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身份签署5日通令的马拉提出控告。马拉被传到革命法庭后，表现出“自由的使徒和殉道者”的姿态，结果于4月24日在一派胜利的气氛中获得释放。从4月15日起，巴黎48区中有35个区陆续向国民公会提出请愿，要求惩治22名最著名的吉伦特派议员。

吉伦特派把辩论引向社会领域，以极大的努力重新争取对舆论的影响力。1793年4月末，佩蒂翁发表了《致巴黎人的公开信》，鼓动一切有产者投入战斗：

“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而你们对这一危险却不闻不问。有人在挑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战争，你们却袖手旁观不加防止……巴黎人，摆脱这种麻木状态，把那些毒虫赶回巢穴吧！”

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1793年4月24日向国民公会宣读了一份把财产权置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权利宣言草案；

“你们已为保障行使财产权的最大自由制定了许多条款，可你们对如何确定这种财产权的合法性却只字不提，好像你们的权利宣言不是为人类，而是为富人、为囤积者、为投机商和暴君们制定的。”

罗伯斯庇尔建议把财产权的定义确定为：“每个公民都拥有的享受和支配法律为他保证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财产权在1789年人权宣言

中被规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此刻它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不能掩饰罗伯斯庇尔这种态度的策略性质：为了战胜吉伦特派，必须给无套裤汉一种社会民主的希望，好让他们关心这种胜利。

这时，吉伦特派正在各省插手一种往往由王党分子操纵的“区民运动”，使贵族、反革命派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旺代叛乱的迫近，在波尔多，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各区在1793年5月9日只提出一份反对山岳派“无政府主义者”的威胁性的请愿书。南特的情况亦是如此。在马赛，控制了各区并同贵族结盟的吉伦特派，4月29日驱逐了国民公会特派员，成立了负责缉捕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的各区总委员会。在里昂，反革命势力更是肆无忌惮：温和派和保王派分子占领了大多数区，在5月29日推翻了山岳派市政府。市长夏利耶遭到监禁，后于1793年7月17日被杀害，成为第三个“自由殉道者”。各省吉伦特派的反抗都在阻碍特派员的行动，地方分立主义起而反抗中央政权，表现出联邦主义倾向。由于吉伦特派积极共谋，阶级利益取得了高于国防需要的地位。仍然持君主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和旧制度拥护者们使革命的国防事务陷于瘫痪。

为了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吉伦特派向山岳派的堡垒——巴黎市府发动了进攻。5月17日，卡米耶·德穆兰在雅各宾俱乐部宣读了他写的《布里索派的历史或大革命秘史之片断》一文。第二天，加代在国民公会上进行了抗辩，并谴责巴黎市府是“既贪钱又贪权的无政府主义权力机构”，要求立即取消这个机构。很快，成立了一个仅由吉伦特派组成的12人调查委员会。5月24日，该委员会下令逮捕埃贝尔，因为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239期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迪歇纳老爹报》向各省无套裤汉作重大揭发：布里索派、吉伦特派、罗兰派、比佐派、佩蒂翁派以及卡佩和迪穆里埃的可恶同党们策划了种种阴谋，妄图扼杀英勇的山岳派、雅各宾派、巴黎市府，以期消灭自由并重建王权。”瓦尔莱、多布桑（斯德区区长）等其他一些平民活动分子也被捕了。这些镇压措施导致总危机最后爆发。

5月25日，巴黎市府要求释放它的代理检察长埃贝尔。当时任国民公会议长的伊斯纳尔竟大肆漫骂巴黎，其言论可令人恼火地联想到布伦斯维克宣言：

“如果有人胆敢用那种无休无止的起义损害国民代议制，我就要以全法兰西的名义向你们宣告：巴黎将会被夷为平地，塞纳河两岸将仅留下巴黎的遗址。”

第二天，罗伯斯庇尔来到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

“当人民受到压迫并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不号召它起义的人就是胆小鬼！ 当一切法律都被破坏，专制主义甚嚣尘上，信义和廉耻心横遭践踏时，人民有责任举行起义。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雅各宾俱乐部立即宣布处于起义状态。

5月28日，斯德区传唤其他各区于次日到主教府集会以便组织起义。5月29日，33个区的代表建立了一个9人起义委员会，其中有瓦尔莱（他大概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和多布桑（他刚于前一天被国民公会开释，因为那天只有山岳派和平原派出席了议会）。5月30日，巴黎省议会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1793年5月31日，起义在主教府委员会领导下，按8月10日起义所采取的方式展开了。人们敲响警钟，擂起战鼓，鸣放警炮。下午5时许，各区和巴黎市府的请愿者来到国民公会议事厅。示威群众在外边把议会团团包围了起来。人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保卫革命和社会措施的纲领，包括开除吉伦特派领袖，撤销12人委员会，逮捕嫌疑犯，清洗行政机构，创立革命军，只让无套裤汉享有选举权，向富人征税以把面包价格限定在3苏1斤，以及向老年人、残废人和祖国保卫者的亲属发放公共救济等。但是，尽管罗伯斯庇尔同韦尼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是的，我

是要作出不利于你们的结论！”），国民公会只是通过了废除12人委员会的决议。起义失败了。

比约-瓦雷恩当晚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

“祖国仍未得救，还需要采取更重大的救国措施，必须毫不迟延地把那些乱党彻底打垮。”

6月2日（星期天），运动再起。起义委员会命昂里奥率8万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以便在国民公会拒绝满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况下，把乱党首领们当场抓起来。”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逮捕吉伦特派领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埃罗·德·塞谢尔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昂里奥下令，“炮手们，各就各位！”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只好退回议会大厅，被迫就范，通过了逮捕29名吉伦特派议员及克拉维埃尔和勒布伦两位部长的决议。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终于结束了。

吉伦特派就这样灭亡了。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山岳派把救国当作最高法则，它使无套裤汉取得了政权。在这个意义上，5月31日—6月2日起义并不是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民族反应，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暴动，一种对贵族新阴谋的防御和惩罚。外省“区民运动”的发展在这次起义之前就预示了它的意义，因为贵族反革命又以吉伦特反对派的面目发起了进攻。

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否定5月31日—6月2日起义的阶级性。的确，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政治上和议会方面同属于资产阶级（当然指明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仍是必要的）。但是，大资产

阶级被摈弃、无套裤汉登上政治舞台这些事实，毕竟使这场起义带上了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乔治·勒费弗尔采用“1793年5月31日—6月2日革命”这一提法也是有道理的。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页321。——译者

[2] 此为法国古斤（livre），在巴黎是490克，在各省为380至660克不等。——译者

[3] 瑟蒂埃（Setier），法国古时谷物容量单位，每瑟蒂埃约合160至300升。——译者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

吉伦特派刚被消灭，由山岳派支配的国民公会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联邦派叛乱而更加嚣张了。同时，被物价高涨激怒了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它的压力。政府机构也显得无力控制局势，丹东在救国委员会以谈判代替作战。1793年7月间，国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就在山岳派困于矛盾处境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出于自己的需要和仇恨，挺身而出，强制推行了各项重大救国措施。首先是1793年8月23日的“全国总动员”。为了控制人民的活动，维护同资产阶级（唯有这个阶级能够提供必需的干部）的联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革命政府。在1793年7月到12月这一期间，这个革命政府在无套裤汉和山岳派或激进民主资产阶级这一双重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该政府的一些最有远见的领导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前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亦即民族团结）。但他们能否克服联盟中的各种固有矛盾？民族危亡的局势曾使这些矛盾一度隐蔽了起来。但可以预见，一旦胜利了，这些矛盾就会重新暴露出来。

Ⅰ.山岳派、温和派与无套裤汉（1793年6—7月）

山岳派多亏巴黎无套裤汉的帮助才战胜了吉伦特派，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向巴黎无套裤汉的压力让步。在6月2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山岳派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引起吉伦特派的反动的同时刹住人民的运动。他们对于争取那部分在自己同吉伦特派斗争中保持过中立的资产阶级极为关注，因而设法照顾有产者和温和派。他们决计不实现5月31日起义委员会的平民活动分子们提出的全部政纲——除逮捕吉伦特派以外，还要把所有“上诉派”开除出国民公会，建立一支享受军饷的、负责逮捕嫌疑犯和保障巴黎粮食供应的革命军，实行谷物最高限价并把一切生活必需品纳入限价范围，清洗军队和行政机构，尤其要罢免贵族分子……山岳派极力通过抛弃恐怖和保护财产权，通过把人民运动限制在窄小的范围内来安抚资产阶级。但这种平衡是很难实现的。7月份，危

机一加剧，平衡就被打破了。

1.山岳派的和解措施

整个6月份山岳派都在等待时机。尽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6月8日曾推动国民公会否决了巴雷尔和丹东在两天前提出的撤销各监视委员会的建议（让邦·圣安德烈在辩论中曾宣称：“应该知道，人们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来扼杀自由。”），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革命军没有成立，关于强制公债的讨论突然中止。圣茹斯特7月8日关于在押或逃跑的吉伦特派议员的报告也极为温和：“自由对于被解除武装和已屈服于法律的人是并不可怕的。”问题在于通过使各省放心和消除对巴黎无套裤汉专政的顾虑来团结各省。

在社会方面，他们努力通过3项法令来满足农民的要求。1793年6月3日关于逃亡贵族地产出售方式的法令规定，这些地产应分成小块以便于贫农购买，而且购买者可以延期10年付款。6月10日关于分配公有地的法令使分配可以随意进行。据此，公有地将按居民人数平均分配，每人的地块将由抽签决定。7月17日关于封建制度的法令通过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建立在原始文书上的封建权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那些存放在各市政府书记室的封建文书应予以烧毁。吉伦特派的失败对于农民说来意味着土地的最后解放。

在政治方面，山岳派迅速通过了一部宪法，想以此洗清搞独裁的罪名，同时使各省安下心来。这部“1793年宪法”是根据埃罗·德·塞谢尔的报告，经过一场短时间的辩论后于6月24日通过的。该宪法确定了政治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该宪法正文前的人权宣言较之1789年的人权宣言更前进一步，因为它的第一条就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它还确认了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

“公共救济是一项神圣的义务。社会应当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是通过为他们提供工作，或是通过向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提供生存手段。”（第21条）

“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促进公众理性的发展，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受到教育。”（第22条）

最后，1793年的人权宣言不仅像1789年人权宣言那样承认了反抗压迫的权利（第33条），而且还承认了起义权：

“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于全体人民和对于人民的各个部分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35条）

罗伯斯庇尔在4月24日提出的财产权的定义是没有争议的：“财产权是属于一切公民的、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及劳动和产业成果的权利。”（第16条）

1789年的人权宣言只字未提经济自由。而1793年的人权宣言第17条明明白白地确认：“公民们做任何工作、栽培任何作物、从事任何贸易，都不得加以禁止。”山岳派并不愿意走社会民主的道路。

该宪法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保证作为政治民主主要柱石的国民代议制的绝对优势地位。孔多塞的吉伦特派方案中所考虑的两级选举制被否定。人民的直接选举保证立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议员对行政机构的支配地位。立法议会是用直接普选、单名投票和绝对多数当选的方式产生的，任期1年。24人的行政会议由立法议会在各省通过普选指派的83名候选人中遴选产生，因而各部部长是隶属于国民代议机关的。国家主权的行使由于公民投票制度（这种制度在孔多塞的方案中就有了设想）而扩大了范围：宪法，某些情况下一些简明的法律，都应经过人民批准。

1793年宪法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它

在付诸人民批准时以180多万票赞成对1.7万票反对的多数获得通过。有10万多投票人表示要在附加一些带温和倾向的修正案后才愿意接受该宪法。公民投票的结果于1793年8月10日公布。这一天是君主制垮台的周年纪念日，也是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节日。但是这部宪法（妥藏其本文的“圣约柜”存放在国民公会的议会大厅里）将等到和平恢复时才能实施。

2.反革命的进攻

山岳派国民公会的温和调解的政策并没有制止内战蔓延。吉伦特派在自己控制的各省起来反对国民公会，他们在旺代叛乱愈演愈烈、边境上反法联盟军队步步进逼的时候，掀起了联邦派叛乱。

联邦派叛乱是5月“区民运动”的继续。巴黎起义和开除吉伦特派的消息在里昂和波尔多加速了叛乱的步伐，扩大了叛乱的规模。那些被宣布逮捕后逃走的吉伦特派领袖与在一份反对6月2日起义的抗议书上签过名的75名右派议员联合起来，策动了各省的叛乱。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在西南部和南部，在弗朗什-孔泰，各省当局都宣布了分立。原来的区民运动领袖变成了联邦主义者，他们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审判爱国者的特别法庭，关闭了各俱乐部，还企图招募军队。冈城成了吉伦特派西部的首都。已经夺取了里昂（夏利耶于7月17日在那里被处死）的叛乱者，又相继控制了波尔多、尼姆、马赛和土伦。到6月底，已有大约60个省公开处于反对国民公会的叛乱状态。但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间，以及在诺曼底和西南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保王党的旺代。图卢兹终于不愿步波尔多的后尘，从而阻断了阿坤廷和下朗格多克两地区间的联系。普罗旺斯人的法国南部地区和里昂之间的德罗姆，在雅各宾分子约瑟夫·帕扬领导下成了爱国者的坚强堡垒。边境各省份也仍在效忠国民公会。

“联邦主义”的社会内容较其政治外貌更引人注目。联邦主义的起因

部分地在于地方分立主义持续存在，但主要还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早在1793年5月15日，罗讷-卢瓦尔省议员夏塞就写道："重要的是生命，此外还有财产。"6月2日起义后，他便跑到叛乱的里昂，作了叛匪头目。在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之后，他便逃亡到国外，直到共和四年才回国。联邦派叛乱基本上是由掌握了各省行政权力而又担心财产安全的资产阶级搞起来的，同时也得到所有旧制度拥护者的支持。而平民成分较多的各市政府则敌视这种叛乱，工人和工匠决不愿为富人作战。叛乱各省下达的征兵令遭到人民群众的冷淡和敌意。此外，叛乱的领导人中间很快发生了分裂。真正的共和派不甘心追随王党，他们对外国入侵和旺代叛乱深感忧虑，很不情愿受反动派利用。但王党分子很快就在东南部取得了联邦派叛乱的领导权。尤其是在里昂，那里的普雷西伯爵还得到了撒丁国王出兵阿尔卑斯山牵制法军的允诺。

国民公会积极组织力量镇压叛乱。它尤其注重打击首恶，对胁从则采取宽容政策。最大的威胁来自诺曼底方面，因为没有一支军队来掩护巴黎。但是，1793年7月13日，在帕西絮厄尔的几支吉伦特派纵队一看到从巴黎各区征召来的几千士兵就溃乱了。他们的首领——比佐、佩蒂翁、巴巴卢等人放弃了冈城，继而又放弃了布列塔尼，撤到了波尔多。被派到诺曼底的罗贝尔·兰代在尽量避免镇压手段的情况下迅速平定了该地区的叛乱。弗朗什-孔泰地区各省不战而降，但波尔多却坚持得比较久，直到9月18日才被攻占。在东南部，人们一度十分担心马赛、尼姆的叛乱者同里昂的叛乱者汇合起来。但德罗姆省仍忠于国民公会，落到尼姆人手里的圣灵桥又被夺了回来。曾攻克迪朗斯、夺取阿维尼翁的马赛人也被击退了。卡尔托将军的部队7月27日进占阿维尼翁，8月25日进占马赛。但8月29日，王党分子向英国人开放了土伦港，并把地中海舰队交给了英国人。里昂也在顽固地坚持叛乱。夺回这些城市需要下决心进行正规的攻坚战。10月9日里昂被攻克，土伦直到1793年12月19日才被占领。在这两个城市中采取的镇压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共和国曾在7月里处于崩溃边缘。在8月底之后，危险似乎已经消除了。

联邦派叛乱的后果同旺代叛乱的后果一样，都加速了强化中央政权的进程，使各民众组织加紧控制那些被怀疑敌视或不热衷于大革命的公民。有些吉伦特派毫不犹豫地同那些跟外部敌人结盟的王党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以有产阶级为靠山，因而这些有产阶级成员也成了嫌疑分子。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共和国融合在一起。

这时旺代叛乱又猖獗起来。自1793年6月9日以来一直控制着索米尔的叛乱分子于7月18日在维耶（属曼恩-卢瓦尔省）击溃了共和派军队。27日，他们又夺取了蓬德塞，形成胁迫昂热的态势。

外敌入侵的危险也越发严重。丹东自进入救国委员会之后，以谈判代替作战。但当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被联盟军夺回之后，法国就再没有做交易的本钱了。也许正如人们所怀疑的那样，丹东想利用王后和她的孩子做交易。然而，1793年宪法第121条已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同占领其领土的敌人决不媾和。"

在诺尔省边境线上，英国人参与了作战。约克公爵指挥一支由2万汉诺威人组成的军团，在1.5万荷兰人的支援下，打算进攻敦刻尔克。科布尔指挥的奥地利人则有条不紊地开始进攻诺尔省边境线的各个要塞。7月10日和28日，孔代和瓦朗西埃纳先后失陷。紧接着敌军包围了勒凯斯努瓦和莫伯日。担任诺尔方面军统帅的居斯蒂纳却毫无动作，他很快就因此而受到爱国者们的怀疑。

在莱茵河方面，普鲁士人在布伦斯维克公爵指挥下夺取了美因兹。该城市4月份起就遭到围攻，在克莱贝尔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梅兰（蒂翁维尔人）指挥下的2万法国士兵一直坚持到7月28日才投降。莱茵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不得不向洛特河和萨尔河撤退。朗多也陷入敌人的重围。

在阿尔卑斯山方面，皮埃蒙特人紧逼着凯莱曼的部队。凯莱曼曾派

出一些分遣队同普罗旺斯和德罗姆山谷的联邦派作战，并去围困里昂和土伦。这使他的力量受到削弱，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了莫利安纳和塔朗泰兹这两条通道。敌人很快就侵入了萨瓦，尼斯也受到威胁。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西班牙人也突入了边境，向佩皮尼昂和巴荣纳步步进逼。

边境上的共和国军队到处都在退却。由于指挥不当，军队士气严重低落。军队指挥官因平庸无能而频频更迭。贵族分子居斯蒂纳用轻蔑的口吻肆意攻击无套裤汉陆军部长、仅领有中校军衔的布肖特。在旺代，共和国军队中一派混乱。负有监督将军使命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互相反目，他们和统帅尼奥尔方面军的前贵族比隆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支持无套裤汉将军龙森和罗西尼奥尔；另一些人则控告他们俩，大家都拒绝承担失败的责任。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了。

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刺一事具体地暴露出一种巨大的危险。就在革命的巴黎，夏洛特·科代——诺曼底一个年轻的女王党分子，竟能杀害人民之友。她打算通过这一行动消灭大革命的一个首脑，然而她的行为却加强了山岳派的力量，并重新激发了革命的运动。马拉一贯深切关注无套裤汉的命运，在无套裤汉中深孚众望。他的被刺引起一阵强烈的激动。人们的复仇愿望同对各项救国措施的要求结合在一起。7月15日，巴黎为他举行了有全体国民公会议员参加的隆重葬礼，他的心脏被悬挂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大厅的穹顶上。作为“自由的殉道者”，马拉和1月20日被刺的勒佩勒蒂埃、1793年7月17日被杀害的夏利耶一起，成为革命先贤祠中的神明。

3.革命的反击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山岳派国民公会的任务更加艰巨，同时也促使人民群众去采取革命行动。

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危机是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1793年5月4日通过的谷物最高限价并不曾实行。国民公会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败，它于7月间允许各省和特派员暂停该法令的实施。巴黎无套裤汉忍受不了面包的昂贵。巴黎市府曾借助政府补贴把面包价格维持在3苏1斤的水平上。但由于到货没保障，储备日见空虚，面包铺前又排起了长队，群众人心惶惶。6月2日事件引起外省叛乱后，市场上肉类更加罕见，其他食品也纷纷涨价。较之1790年6月，1793年6月小牛肉价格上涨了90%，一般牛肉的价格则上涨了136%。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由生活费用上涨引起的骚乱。6月21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有人高喊："过去一块肥皂只卖12苏，现在却卖20苏，共和国万岁！过去1斤糖只卖20苏，现在却卖4锂，共和国万岁！"这人很快就被逮捕了。

指券的危机加重了生计危机。通货膨胀有增无已，促使物价飞涨。自从国王被处死和全欧反法联盟成立以来，纸币一直不停地贬值，到7月间已降到其面值的30%以下。指券的失信引起了资本外流、投机盛行和商品囤积，物价上涨也由此加快了。

"忿激派"利用这一局面煽动普遍的不满，责难国民公会在经济、社会方面消极保守。1793年6月8日，瓦尔莱在市府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的《关于社会国家里人权的庄严宣言》，希望"用正义的手段"打破"财富不均的状况"，希望"把那些靠盗窃、投机、垄断、囤积居奇等手段，通过牺牲公共财产而聚敛起来的财富变为国家的财产"。

6月15日，人权区提出了实行普遍限价和制定惩治囤积者法的要求。25日，雅克·鲁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带威胁性的请愿书：

"宪法就要提交主权者批准了。你们在这部宪法中禁止投机了吗？没有。你们宣布以死刑惩处囤积者了吗？没有。你们确定贸易自由的内容了吗？没有。你们禁止出售硬币了吗？没有。那么好，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全部努力。在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

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还在通过垄断对他们的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3/4的公民流着眼泪才付得出的食物价格日复一日地助长反革命的情况下，共和国也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再作一次决定吧！无套裤汉将用他们的枪矛去执行你们的决议。”

第二天，巴黎各码头上爆发了肥皂骚动。在这场持续了3天（26—28日）的骚动中，洗衣妇们卸空了运皂船，并按限定过的价格瓜分了这些货物。无套裤汉群众奋勇前进，山岳派最终也被裹挟而去。

1793年7月10日，为适应危机恶化的局势，救国委员会要重新改组。平民活动分子激情满腔，针对面临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极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国的革命资产阶级不脱离共和国，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运动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4月间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表现得平庸无能，既不能打退外敌入侵，又不能防止联邦派叛乱，也不能解决指券问题和生计危机。它不是在控制各种事件，而是在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以致局势日益恶化。7月10日，国民公会更新了救国委员会，丹东落选了。

新救国委员会由唱名投票选出，有9名成员。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职，他们是：直到最后还在拥护居斯蒂纳将军的加斯帕兰、某女贵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罗·德·塞谢尔和丹东的朋友蒂里奥。库通、圣茹斯特，让邦·圣安德烈和普里厄（马恩省人）组成了该委员会的山岳派核心。来自平原派的巴雷尔和兰代也归附了他们。他们已经深信：大革命只能靠无套裤汉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给苦于饥馑和物价高涨的城市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调动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贵族和反法联盟。

1793年7月13日马拉的遇刺促使山岳派针对政治危机的加剧采取了

更强硬的政策。埃贝尔同忿激派互相争夺人民之友事业的继承权。从7月16日起，雅克·鲁就急忙把他的报纸变成马拉《人民之友报》的续编——《人民之友马拉所庇护的法国大革命政论家报》。7月20日又出现了《勒克莱尔编人民之友报》。7月21日，埃贝尔也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嚷道："如果需要有一个马拉的继承人，如果需要向贵族提供第二个牺牲者，那么这个人早已预备好了——那就是我。"各民众报刊竞争激烈，宣传往往很富于煽动性。山岳派中一个以埃贝尔、肖梅特为首的支派，为了不脱离巴黎无套裤汉，主动接受了忿激派的纲领。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语调谴责"商人贵族、资产阶级的和贪财重利的贵族"。由于缺粮情况更趋严重，许多面包商因缺乏面粉而关闭了店门。市政府区于7月21日建立了配给卡制度，请愿书也增多了，店铺门前的长龙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63期中写道："无套裤汉这帮可怜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们是为了幸福才干这场大革命的。"

新救国委员会刚成立就遇到了被两翼夹击的危险。

1793年7月26日惩治囤积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它是国民公会的一个策略上的让步。比约-瓦雷恩事实上早就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计策——他认为解决缺粮问题的办法不是限价，而是惩治囤积者，死刑的威胁将迫使他们降低价格。7月26日，根据科洛·代布瓦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法令（囤积者指那种没有申报生活必需品的库藏及没有把这些库藏列成清单贴在门口公布于众的商人）。这一法令显然是对忿激派纲领的一个重要让步，商业活动从此受制于各区反囤积专员。实际上该法令的贯彻是拖拖沓沓的，它很快便成为给无套裤汉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为救国委员会辩护人的罗伯斯庇尔被选入该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看来，救国委员会的威望远不巩固：惩治囤积法

未经向它请示就通过了，它的最初一些决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间关于逮捕居斯蒂纳的决定，也曾在国民公会中引起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支持救国委员会，反对它的敌对者。他7月27日进入了该委员会。8月14日，卡诺和普里厄（科多尔省人）也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于9月6日进了该委员会。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和气质尽管有差异（卡诺和兰代在社会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比约和科洛则倾向于无套裤汉），但他们都是正直、有功劳、有威望的人士，求胜的意志使他们联合起来，精诚团结了一年，直至胜利之日。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

罗伯斯庇尔凭借他的革命声望，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这位“不可腐蚀者”（我们这部历史中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富于远见而勇敢无畏（他在反对那场导致宣战的普遍潮流时孤军奋战，就表现了这种品质），能言善辩，大公无私，深得无套裤汉信任。他坚守原则，但作为政治家又懂得运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现实情况让步。他把整个革命的权威都赋予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坚强有力，就应当依靠人民并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在5月31日—6月2日起义期间，罗伯斯庇尔在笔记本里写道：

“必须有一种统一的意志……为了建立共和主义的统一意志，必须有共和派的部长，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团结人民……必须让人民同国民公会联合起来，让国民公会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人）的国民教育计划：

“三年来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为公民中别的阶级做尽了好事，但对于最贫困的阶级——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公民——却几乎一无

所为！封建阶级被摧毁了，但这并不是为无产者公民干的，因为在获得解放的乡村中他们并无任何财产！捐税的摊派是比较合理了，可是无产者公民一贫如洗，什么捐税也负担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经建立，然而无产者公民却得不到文化教育……现在，穷人的革命开始了……”

尽管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看清了形势，但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形势却没有把握。革命国防的各项重大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恐怖、统制经济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机中由人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强制推行起来的。

Ⅱ.救国委员会和人民运动的高涨（**1793**年**8—10**月）

新救国委员会决心大力加强国防，在它看来这就是保卫革命。但它不想让人民运动（尤其是忿激派的宣传）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动分子们看来，要有效地保卫国防，就必须实行统制经济和全国总动员。救国委员会一度把全国总动员视作幻想，并一直敌视限价和统制经济、厌恶恐怖。巴黎各区乱哄哄地实行着的直接民主，在他们看来也与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违。救国委员会在8月间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断地退却，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于人民的革命行动而作出最后让步。

从8月初起，罗伯斯庇尔开始反对忿激派，力图使政府和国民公会摆脱这个反对派的困扰。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谴责了那些企图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风云人物和昙花一现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居心叵测地宣称：“两个领人民之敌津贴的、被马拉谴责过的人，竟充当或自以为充当了马拉这位爱国作家的接班人！”他对雅克·鲁攻击商人的言论尤为反感，痛加抨击。为了驳斥忿激派的主要论据，救国委员会派出一些能干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征调劳工收割麦子，积极抓起了粮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国民公会根据巴雷尔的建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县建立一座丰收仓。其实这只是对人民要求的一种表面上的让步，因

为由各县征购粮食并不能解决生活费用昂贵的问题。不过巴黎还是有粮食供应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对无套裤汉的号召力。

对于那些要求实施已为人民通过的宪法和进行新选举（意在促使山岳派垮台）的温和派，罗伯斯庇尔奋力予以反击。8月10日前不久，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温和派的这一愿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险性。救国委员会主张政府在恢复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不实施宪法。1793年8月11日，厄尔-卢瓦尔省议员德拉克鲁瓦（未来的宽容派分子）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了根据宪法为普选作准备的选民普查法令。罗伯斯庇尔断言，这种阴险的建议无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尔的代理人来取代被清洗出国民公会的议员。在粉碎国内叛乱和取得边境战争胜利之前实施1793年宪法会危及整个大革命。就在这一天，基层议会的代表们把这份“神圣文件”送到国民公会，把它装进一只雪松木柜便再也不拿出来了，尽管直到1793年10月国民公会才明确宣布该宪法在恢复和平前暂不实行。

1.全国总动员（**1793**年**8**月**23**日）

这时，人民运动在外部危险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逼迫下继续发展，终于促使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实行全国总动员。

全国总动员符合无套裤汉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欢迎。这一措施使革命方面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因而有希望迅速战胜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敌军。热马普战役证实了这一点。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是在1793年7月危机期间，在外敌进攻、联邦派叛乱、共和国陷于危境的情况下逐渐明确起来的。7月6日，卢森堡区曾提议巴黎各区实行总动员，向叛乱的各省进军：“让所有16岁到50岁的公民不加区别地处于被征召状态，组成武装力量。”

7月28日，团结区活动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鲁瓦重申了这一建议。他的讲演已散发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诗般的气息：

“……让所有车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个人的工作，都去造枪托、炮架、辎重车、运输车吧！让锁匠、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铁工都放下工作，都去制造大炮吧！……让祖国之友们武装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让没有武器的人送弹药，让妇女们送军粮、做面包，让祖国的赞歌送来战斗的信号吧！”

7月底的一系列失败使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各民众报刊也开始进行这种呼吁。埃贝尔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让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们同时入伍吧！哪里有危险，人们就应当冲向哪里！”

人民群众关于全国总动员的要求于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8月4日又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来巴黎接受1792年宪法的基层议会代表也重申这一要求——他们的发言人鲁瓦耶8月12日在国民公会要求人民全体动员。救国委员会却迟疑不决：该怎样对付总动员引起的大乱？怎么武装和供给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这种设想很了不起，但狂热地推崇全国总动员是无用的。”他补充道：“我们缺的不是人，而是我们将军的爱国主义道德。”在巴黎的活动分子和基层议会代表们的压力下，国民公会于8月16日采纳了总动员的原则。8月23日，救国委员会终于决定根据巴雷尔的报告提出实施办法：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所有的法国人都始终处于被征召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年轻人得奔赴疆场；已婚男人得铸造武器和运送给养；妇女们得制作帐篷、军服和去医院服务；儿童们得去把旧布撕成绷带；老人们得去公共场所鼓动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雇人代替应征的制度被废除了。征召在原则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

的或无嗣丧妻的18岁到25岁的男子将首批应召出征。他们营队的军旗上将写上："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暴君。"

全国总动员法令完全反映了无套裤汉的意愿吗？尽管他们设想出这个措施，但凭一时的冲动而发起一场进军边境的运动却是不现实的。这也说明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因为，仅仅把18至25岁无家庭负担的男子征召入伍，就需要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需要组织极大规模的武器制造。事实上，军备和给养很成问题。9月初，《迪歇纳老爹报》在制定它的行动方案时就这样自问："怎样同时进行好几百万人的进军呢？怎么武装他们、供给他们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整个共和国的生计……必须把所有和金属打交道的工人——从马掌匠到金银匠统统征集起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建立锻造工场，日夜不停地制造大炮、步枪、马刀和刺刀。"

埃贝尔直截提出了一场伟大民族战争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为了武装和供给七届征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员，必须要实行统制经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跟国防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1793年8月底，重大的问题仍一个都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依然如故。尽管救国委员会避开了政敌的攻击，革命政府却远没有巩固地组织起来。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囤积法及丰收仓法只带来一些虚幻的改善。尽管大革命唯一的财源——指券的命运有赖于限价和统制经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到现在还拒绝采取这些措施。到8月底，随着生计危机的加剧，人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同时，巴黎的活动分子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一项新的、旨在把人民意志强加给政府的行动。

曾一度和缓的生计危机由于旱灾的影响重新发生。磨坊的活计越来越少，面包铺的门前又排起长龙。每天的面粉只有400袋到货，而巴黎

的日消费量是1 500袋。对于埃贝尔来说，缺粮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鼓动手段；他把生计问题置于运动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系列反对富人和商人的论点以取悦无套裤汉。

埃贝尔在第279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祖国，呸……，批发商们根本没有祖国。他们支持大革命只是由于看到大革命对他们有利。他们曾支持无套裤汉消灭贵族阶级和各高等法院，但这不过是企图由他们取代贵族的地位。同样自从取消了积极公民，自从最不幸的无套裤汉同最富有的包税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来，这些无耻之徒们就背离了我们，开始不择手段地破坏共和国。他们把所有粮食都囤积起来，或以极贵的价格转卖给我们，或使我们陷入缺粮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发的人民运动，其势锐不可当，且富于独创性。按阿尔贝·马迪厄的说法，这是一种"埃贝尔派运动"。无套裤汉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社会要求，这确是由于受到过各家民众报刊（雅克·鲁的报纸和埃贝尔的报纸起过同样的作用）的启发。但这些报刊并不是这种意识的来源。这是一场"民众运动"，并不是埃贝尔派运动。因为，先是由埃贝尔应声虫似的写作和行动，接着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市府相继开始行动，最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作出让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发生的。

人民运动从1789年春就开始了，应当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生活物质条件的恶化中去寻找该运动的起因。这场运动在危机爆发的时代曾让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毕竟不同于这种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样）。因为它带有激励无套裤汉的前资本主义的心态特征。这种心态实质上同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面前热衷于保卫公社习俗的农民的心态是一致的。无套裤汉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态极为仇视，因为这个阶级一心要以自由（他们事业的飞跃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的名义取消深为小店主和工匠们所珍视的管

制经济和限价政策。

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反映在他们对财产权的看法上。根据1793年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对于无套裤汉来说，只有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并受到公众需要限制的财产权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运动的高潮中，巴黎的无套裤汉区（以前的植物园区）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议会应“一成不变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工资和工商业利润……贵族、王党、温和派和阴谋家们会对你们说：嗳！怎么搞的！这是损害财产权，而财产权本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难道这帮坏蛋不知道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吗？”

无套裤汉们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植物园区无套裤汉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

“……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

这个社会纲领一方面要保留私有制，一方面又要限制私有制的后果，因而它本身充满了矛盾。不过，它同领导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完全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使革命政府在热月改变中归于毁灭。但是在当时，出于对共同的敌人，对旧制度、特权和封建贵族的仇恨，并由

于反革命的严重威胁，无套裤汉和山岳派资产阶级仍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山岳派是无法孤军取胜的。它不得不由反对转而支持这一平民纲领，而且还不得不强制实行这一纲领。

危机在9月初就已形成。当埃贝尔谴责国民公会中的“催眠派”的时候，各区的情绪日益激奋，它们的行动和请愿书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热狂的气氛中，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被王党分子交给英国人了！爱国的焦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忧，加上生计问题引起的不安，构成了引发一次恐怖主义冲动的最合适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宾俱乐部为了救亡，决心采取行动。

1793年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骚动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市府要面包。这些群众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辩的。他们来自无套裤汉中最贫困的阶层，属于这些劳动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层次。他们的工资是用日益贬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极度痛苦。市府的领导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但纯属徒劳。示威者们高呼：“我们需要的不是许诺，而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即就给！”

肖梅特跳上一张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穷人，所以我很了解什么是贫穷。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公开战争，他们要把我们消灭掉。好吧！我们要先发制人！应当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

人们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国民公会。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

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 000名步兵和1 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胜利。无套裤汉强迫政府采取了他们长期要求的措施。不过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9月5日的那些决议特别富于策略性。9月4日国民公会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价制度的许诺，而这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巴黎无套裤汉由于保持对国民公会的压力，才争取到谷物和饲料的全国最高限价（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价（29日）的实行。山岳派资产阶级同样也不情愿损害经济自由。

这是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胜利。因为法制得到了维护，合法的恐怖压倒了直接的行动。救国委员会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时退向自己所选择的阵地，结果它扩大了权力，革命政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这场人民运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同时也使革命政府陷于同国民公会内部强大反对派的斗争，从而延缓了革命政府巩固的进程。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要求通过广泛清洗行政机构，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扩大镇压规模等方式强化恐怖统治。持续的生计危机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坚持主

张实行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实现早已许诺、但一再被推迟的普遍限价。

9月里，救国委员会一直在玩弄手腕，时而利用人民运动来控制国民公会，时而操纵国民公会来阻止人民运动。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时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持过人民要求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进入救国委员会。13日，被改组，从此它的成员名单须由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对于其他各委员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政府权力由此进一步集中。救国委员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员会均被它控制。救国委员会成为政府行动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众的行动一步一步强行实现的。在各区的控制下，各行政机构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陆军部的清洗在该部秘书长樊尚推动下搞得特别引人注目。市府总委员会改组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从而使它们不再受各区当局的控制。各区的议会和委员会也从自己的成员中清除了温和派、“冷漠派”和不冷不热的分子。国民公会和政府各委员会与其说领导了这场清洗，不如说接受了这场清洗。人民群众对镇压比对清洗更热心。由于各政府机关不下决心实行全面镇压，人们的恐怖主义要求变得更加强烈。9月中旬的时候，各革命委员会已在巴黎市府推动下着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现了要进行屠杀的流言蜚语。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亚培伊狱的犯人就表示过他们对去年旧事重演的担心。国民公会也感到这种危险，感到事态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为了防止对9月5日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滥加解释，国民公会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通过了“惩治嫌疑犯法”。该法律给嫌疑犯下了很广泛的定义，使之能牵涉一切革命的敌人。据此，逃亡者的亲属（除非他们曾表现出拥护大革命）、所有被拒绝发给公民证的人、被停职或被开除的公职人员均被视为嫌疑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所有在举止或交往上，言谈或文字方面颇似“暴政或联邦主义拥护者和自由之敌”的人，所有不能说明自己有正当谋生

手段的人（这是针对投机商而言的）也都被视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员会都负有开列嫌疑犯名单的责任。

在9月4日被原则上通过的统制经济也是在巴黎群众的压力下才最后建立起来的。人们认为9月11日规定的全国谷物和面粉最高限价解决不了所有问题。9月中旬，面包铺门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请愿书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区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你们在原则上通过了要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人民穷困难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着你们的决定！"同时，救国委员会也在同国民公会内部的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搏斗。为了利用人民运动的威力（人民运动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满足）来制服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决定加强对经济的管制。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价法通过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资的价格。最必需的食物的价格在各县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价格高1/3的水平上，违章者以嫌疑犯论处。要限定食品的价格就不能不限定劳动日的价格，所以该限价法也把各市镇的工资额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资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难，需要更严厉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专政由此得到决定性的发展。

与此同时，忿激派被肃清，国民公会中反对派被迫缄口。救国委员会的地位巩固了。

肃清忿激派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分裂。雅克·鲁、勒克莱尔和瓦尔莱冒险地走到了前列。担心控制不住局面的政府很容易把他们作为打击的目标。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岳派报》写道：

"人民的运动只有当暴政使它成为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的……那些坏蛋发起凶残而不正当的运动来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或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终将受到世人的耻笑和鄙视。"

救国委员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获得成效，不愿继续容忍那些"不

正规”的运动——往往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经检举，雅克·鲁于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这次他再没有能够获释。瓦尔莱的命运也是一样，由于领导过人权区反对限定区议会每周召开两次的法令，他于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这样慷慨陈词：

“你们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们的监督吗？眼下是什么时候？正是祖国面临危险，人民不得不把大权交给你们的时候，而这种大权是需要加以有效监督的！”

当时勒克莱尔正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继续进行反政府运动。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和逮捕的威胁，遂于9月21日将报纸停刊。最后还剩下女演员克莱尔·拉孔布领导的革命共和派妇女协会。该协会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时遭禁止的还有一切妇女结社。救国委员会就这样遵循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制服了各民众组织。对于那种至少是无套裤汉所理解的主权，政府是不太关心的。从长远后果看，这只会使那些民众组织与政府疏远。

经过一场极其激烈的议会辩论，国民公会内的反对派一度被迫缄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销诺尔方面军统帅乌夏尔的职务（他曾在翁德斯考特获胜，但后来在默南失利）。这是一个进攻的信号。9月25日，已退出救国委员会的蒂里奥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指责统制经济和清洗运动。他最后指出：“必须制止这股把我们卷向野蛮状态的狂潮。”这一指控反映了国民公会的隐衷。瓦朗西埃纳地区投降时正在当地任特派员的布里耶受到国民公会的欢迎，并被补充进入救国委员会。这反映了国民公会当时的精神状态。罗伯斯庇尔在这场辩论中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辩才：

“……我向你们宣布：那个当敌人进入瓦朗西埃纳时正待在该地区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的……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还是两年来由于叛变和软弱而导致10万人丧生这一事实。我们之所以吃亏，

就是因为我们对待叛徒太手软了！”

国民公会被征服了，表示继续信任救国委员会。

通过辩论，救国委员会加强了权力。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宣布法国政府“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状态”。革命政府的基础（即在救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实行一整套特别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现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价的实施要求确立这种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圣茹斯特曾宣称：“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执行法律的人们却并不革命……必须用统治者的意志去压制少数君主主义者，用征服的权利去统治他们，才能建成共和国……对于不能用正义去统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统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要贯彻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结果，所有的部长、将军和法定社团都被置于救国委员会监督之下。救国委员会还同作为新行政组织支柱的各县建立直接通信联系。专制的原则胜过了选举制原则。

人民运动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过惩治嫌疑犯法组织了政治恐怖，通过普遍限价法组织了经济恐怖。9月危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得到了巩固，它已掌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最高权力的最后确立还须经受一些新的考验。

III.雅各宾救国专政的组织（**1793**年**10—12**月）

宣布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后，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来。它全力争取边境战争的胜利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救国委员会力求使镇反正规化，把恐怖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并控制人民

的运动。然而请愿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镇压问题。9月份采取的那些措施使无套裤汉得到某些满足，但并没有使他们解除武装。他们的影响在1793年10—11月期间仍十分强大。但政府已表现出把人民运动限定和维持在狭小范围内的意图。突然间，爆发了非基督教化运动，人民运动由此重新高涨。救国委员会极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无套裤汉之间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稳固了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它的统治，同时也承认了6月2日以来的演变趋势。

1.大恐怖

1793年9月着手组织的大恐怖，10月里才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付诸实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以死刑，约占1/4。无套裤汉运动的胜利开始了革命法庭的一个新阶段：9月5日，该法庭一分为四，其中两个分庭同时工作。救国委员会和联合拟订法官和陪审员名单。富基埃-坦维尔仍然担任公诉人，埃尔芒被任命为庭长。

10月份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根据比约-瓦雷恩的报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断头台，她的处死成了“迪歇纳老爹最大的乐事”。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埃贝尔整个秋季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处死后，《迪歇纳老爹报》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热打铁把叛徒巴伊、无耻的巴纳夫……连连送上断头台。”该报第312期赞扬了神圣断头机的美德，告诫人们不要有任何手软行为。罗兰夫人、巴伊和巴纳夫相继于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处死。在1793年的最后3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

月底，被拘于巴黎各监狱的囚犯约有1 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 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 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没有内战的地区往往没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诺曼底，联邦派叛乱被击溃后，就没有判过死刑，兰代曾在那里号召普遍和解。在备受旺代叛乱蹂躏的西部各省，雷恩、图尔、昂热、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军事法庭在活动。他们对于手执武器的叛乱者，在验明身份后即行处死。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耶纵容人们不经审判便在卢瓦尔河淹死犯人。他用这种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间处死了2 000—3 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违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尔多，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也领导了镇压运动。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里昂，叛乱给共和国带来过多大的危险，恐怖就相应具有多大的规模。为了制服叛乱，从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围攻。10月12日，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决定夷平该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毁，只留下穷人的房屋及被杀害或被流放的爱国者的住宅；……这些保留下来的房屋群今后应取名为‘解放市’。”

起初库通只让人们拆毁贝勒库尔广场上的几所房子。但11月7日来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却组织了大规模镇压。审判过于宽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员会被一个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 667人被判死刑。执行死刑时用断头机来不及，还辅以步枪排射和机枪扫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于当时的形势而带上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国民公会特派员没有无套裤汉群众和雅各宾派骨干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许多特派员都以组织全国总动员为主要使命，他们坚决贯彻各项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担任其他特派员也通过向富人征税、组织革命军、创设工场和济贫院等措施，使他们的革命行

动带上显著的社会意义——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诺尔省、圣茹斯特和勒巴在阿尔萨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这样做的。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税900万锂，其中200万用于满足贫民爱国者的需要。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他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大恐怖在经济上也有鲜明表现。在巴黎，市府主要通过建立面包定量供应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时授权各区反囤积专员进行挨户搜查，并采取镇压措施迫使人们尊重限价法。1793年9月9日决定成立、10月初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各分遣队，穿梭巡回于巴黎周围各产粮区，农民们纷纷交出粮食。然而政府仍拒绝向巴黎各区的压力作出让步，坚持现行的反囤积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区要求国民公会建立一个选自贫穷公民的惩治囤积者特别陪审团，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价法的贯彻需要更严厉的手段，大恐怖通过威慑提供了这种手段。纯经济的动机不构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面包的定量供应制度，往往还发展到把面包坊收归市有。配给制度必须以正常的供应为前提，因此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2日倡导成立物资委员会，以协调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该委员会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可以支配生产、贸易和运输。救国委员会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所拥有的强制力使它得以将统制经济制度强加给工商业者。

正当恐怖统治在救国委员会日益严格的控制下逐渐正规化的时候，救国委员会还不得不去应付一种新形式的人民运动。这场运动，差点儿夺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也险些动摇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根源，既应当到1790年以来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寻，也应当到民众心态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寻。从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贵族一边。到1792年，连宪政派教士也受到许多革命派的怀疑。除了那些表示过拥护人民运动的神甫（如雅克·鲁），大部分宪政派教士仍然保持着君主主义倾向，为8月10日事件，尤其为国王的断头而痛心疾首。这一情况在1793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作为温和派的宪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倾向于吉伦特派和联邦主义。由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有所加强。许多政治家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教士法的尝试。1792年11月，康邦提议停发教士的薪水。但这些政治家也很难想象国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抛弃宗教仪式。一种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轮廓——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这种崇拜最初的壮丽表现。通过公民节庆、纪念仪式（如7月14日的典礼）、盛大葬礼（如为米拉波举行的葬礼）等，这种新宗教的各种教仪慢慢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教士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但是，1793年8月10日创立的全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则是纯世俗性的。与此同时，围绕着“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马拉，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群众崇拜热。

在非基督教化运动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巴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已反映出某些活动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圣体瞻礼期间发生的事件，寻找贵金属和解取教堂的钟制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兰西先贤祠区要求开办“自由学院”，每个星期天都要在那里宣传“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应一种潮流而生的。这种潮流的各种表现自无套裤汉参与政治生活以来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绪和国防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这场运动。贵金属可以维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钟的铜可用以铸炮。非基督教化运动还具有一种经济意义。“搜寻金银”往往既是该运动的一个起因，又是它的一个结果。

革命历的采用在奥拉尔看来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

它表明，国民公会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情绪在这方面跟人民先进分子的情绪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开始建立共和纪年的报告。据此，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分为3旬。另加5天或6天补足日，最初叫作“无套裤汉日”。这样，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礼拜天。这些旬末节冲击着宗教礼仪。1793年10月24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个关于历法的报告，为每个月都发明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这种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尝试由雾月15日（11月5日）法令补充完成。该法令创立了一整套公民节日。法案的报告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对议员们说：

“你们摆脱了偏见，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资格。你们知道怎样在被打倒的各种迷信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唯一普遍的宗教。该宗教既无秘诀也无奥义，其唯一的信条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们的法律，其高级神职人员就是我们的法官。该宗教只在祖国——我们共同的母亲和神明——的祭坛前烧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时，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击，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击。

严格意义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某些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推动下，首先在外省搞起来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纳韦尔大教堂主持了布鲁图[1]胸像的落成典礼；9月26日，他向穆兰的民众社团宣称要用对共和国和自然风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虚伪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终于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仪式，并把葬仪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处题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罗什福尔，勒基尼奥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庙；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机关过礼拜天，把它改为旬末日；德鲁埃在莫伯日下令没收用于宗教的各种珍贵物品，说

这些东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装饰物”。有些特派员还鼓励教士结婚。

非基督教化运动是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乡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还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礼。他后来建议巴黎市府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种宗教礼仪。不过市府的举措很审慎，埃贝尔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纳老爹报》上指责教士。运动的动力来自别处。共和二年雾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尔贝依附近的里斯市市府向国民公会宣布该市已用布鲁图取代圣布莱斯做自己的保护神；雾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个县的曼纳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宣布放弃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区，并在国民公会会场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面舞会活动。里斯和曼纳西的无套裤汉为什么行动起来呢？也许是受反对宪政派教士的各种反革命阴谋的挑动，也许是迫于那些受革命军部队支持的、在科尔贝依县征集谷物的本省和行政会议特派员们的压力。……就在雾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各市镇有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权利。

非基督教化运动由此加快步伐。雾月16日晚，议员莱奥纳尔·布尔东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激烈攻击教士的演说。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等极端分子在其中活动）随之宣读了一份关于取消宗教信仰预算的请愿书草稿。在雾月16—17日夜间，这一请愿活动的倡导人在议员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莱奥纳尔·布尔东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贝尔，强迫他放弃教职。戈贝尔主教遂于雾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铎们一起来到国民公会庄重地辞去了教职。肖梅特立即到市府汇报了“教士的狂热和把戏在临终时哀鸣的难忘场面”，并推动人们作出决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圣母院举行自由神节庆活动。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举行了这一节庆活动：祭坛上耸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岳，一位女演员在那里扮作自由神。参加这一活动的国民公会应肖梅特的要求，当即通过决议把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区。17日晚，杜伊勒利宫区在议员蒂里奥

的要求下放弃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维利埃区在莱奥纳尔·布尔东推动下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各革命委员会和民众社团也行动起来。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庙。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决定关闭所有教堂，从而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

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发展起来。不过，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无套裤汉之外的一些人发动下搞起来的，而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发。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种方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崇拜的盛典。传统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这种活动越来越惹眼，不久就被限制到教堂内，最后终被禁止。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仪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确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圣坛和仪仗陆续出现。由此，各种共和主义的典礼有了一种真正宗教式的排场。公民宗教仪仗在10月里日益增多。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里昂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个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运动成为殉道者崇拜的推动力。这种崇拜在巴黎各区都确立起来。教堂一旦被封闭，该崇拜便成为民众活动分子在天主教废墟上建立共和主义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对理性神的崇拜融为一体。尽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剧院小姐的形象表现出来，它仍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神明。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3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但从1793年秋季起，政府当局，尤其是山岳派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就感到了崇拜这些殉道者的危险性：这种崇拜极力宣扬马拉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的革命情绪。救国委员会对非基督教化运动展开反击，遏制了这种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从12月初就开始刹车。共和二年雾月21日（1793年

11月11日），当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禄时，国民公会拒绝表态。雾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共和国内部形势的报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在于会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力主张信仰自由。尽管他并不拥护天主教，但他觉得废除这一宗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传统宗教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革命，大革命的敌人也已够多了。罗伯斯庇尔指出了一些“外国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这些不讲道德的人”，他暗示人们：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动家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说：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弥撒的人是同样的盲信之徒……国民公会不允许迫害老老实实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这些使者胆敢利用他们的职能欺骗公民，挑起各种偏见和君主主义情绪来反对共和国，国民公会就将严惩他们。”

丹东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尔西。“外国人阴谋”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东回来后，加强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霜月6日，丹东激烈攻击反宗教假面舞会，要求“人们加以制止”。霜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性。第二天，发现风向有变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认可信仰自由。但由于不再给教士发薪，市府仍把教会和国家分离了开来。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也通过一项法令，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但霜月18日，议会又根据巴雷尔的建议明确表示无意触动已经采取的措施，尤其无意改动议员们的决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响。被封闭的教堂仍紧闭着大门。非基督教化运动仍在继续，但采取了潜在的方式，因地区及国民公会特派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在1794年春，开门的教堂越来越少。

尽管成就有限，救国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优势。它遏止了人民的运

动，没有让非基督教化运动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与此同时，军事形势的不断好转也加强了救国委员会的地位。

3.最初的胜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争取胜利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标。救国委员会若不迅速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无套裤汉陆军部长布肖特的积极配合下，救国委员会调整了对战争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战事。1793年8月14日，职业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进入救国委员会主持军务。前者负责指导作战，后者负责制造军火。但战役的计划、将军的任命都须经过救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罗伯斯庇尔（据他的笔记本中的记载所示）和圣茹斯特在指导战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让邦·圣安德烈在长期任职中领导并发展了铸造工场、步枪制造工场、硝石工场和船舰制造工场。兰代在物资委员会中勤勤恳恳地从事对军队和制造工场的供应工作。卡诺被称为"胜利组织者"是当之无愧的，但这是跟全体救国委员会的努力分不开的。所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没有参与妥善组织胜利的说法，纯系救国委员会的幸存者制造的热月党传说。这些幸存者企图把大恐怖的责任推到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把保卫共和国安全的光荣归于自己。

1793年夏天开始进行物资动员。当时什么都缺，商店和军械库都空了。而军队的兵员7月份前就已增至65万人。所有以往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都不得不在国内征集。救国委员会把当时最好的学者同自己的努力结合了起来，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系统地用来为国防服务。当时优秀学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谓多才多艺。他在共和二年雾月撰写了《大炮制造工艺》一书，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组织了巴黎规模宏大的武器制造工程，并在以革命方式采集硝石和发展火药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化学家贝尔多莱也曾忙于造火药。旺代蒙德编写了一本《白刃制

造程序》的小册子。矿务工程师哈森弗拉茨曾担任过负责军火制造的特派员……在巴黎，为了组织武器大生产运动，所有的铁业工人都受到征召，所有的花园和广场都建起炼铁炉。步枪产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间，发动了以革命方式开采硝石的运动，要求公民们把各自地窑里含硝土都收集起来，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场来冲洗硝土以提取“杀暴君的火药”。无套裤汉在硝石采集运动中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这种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产生结果。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应付了最紧急的情况，并击退了敌人的入侵。

在军队中实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进作用。救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征集、装备、武装和供养14支军队并带领它们走向胜利，应归功于全国总动员、征用、最高限价、全民军火制造以及对指挥人员的清洗和迫使将军们俯首听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拥有恐怖所赋予的权威，所有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参谋部和指挥人员受到了清洗，从原第三等级的不同成分中和穷贵族中选拔出新一代军事干部。然而救国委员会始终不愿意用一刀切的措施开除所有贵族的军职和公职。生于1762年的儒尔当被任命为诺尔方面军统帅；生于1761年的皮什格吕被任命为莱茵方面军统帅；生于1768年的奥什则做了摩泽尔方面军的司令。将军们均被置于文官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必须服从领导。1793年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一切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必须遵守同样严格的革命纪律。乌夏尔将军于1793年9月6—8日在翁德斯考特打了胜仗，攻占了默南。但他不听救国委员会的指示，突然下令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溃逃。结果，乌夏尔被解除职务并送上革命法庭，最后以破坏战役计划的罪名于1793年11月15日被判处死刑，押上了断头台。但是，不能认为压在将军们头上的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上级。当摩泽尔方面军的奥什强攻凯泽斯洛泰恩失利后，救国委员会就曾安慰并鼓励过他。由于国民公会特派员积极鼓动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军队重振了士气。“不胜利毋宁死”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口号。

胜利的形势在1793年秋即已明确。

攻克里昂标志着联邦派叛乱的结束。对里昂的围攻持续了很久。该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王党分子的煽动下进行顽强的抵抗，使得围攻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消耗了阿尔卑斯方面军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领了富尔维埃尔，但直到10月9日才进入这座被改名为解放市的城市。随后，救国委员会才腾出手来加强对土伦的围攻。迪戈米埃指挥这场围攻战，当时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辅助他。1793年12月15日开始进攻，19日即克之。后来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

旺代叛乱也是由于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战功卓著的美因兹卫戍部队开到旺代，对天主教和王党的军队给以决定性的打击。所有共和派武装力量被合编成西部方面军，由莱谢尔指挥，克莱贝尔辅佐之。两支强大的共和派纵队从尼奥尔和南特出发追赶叛匪，会师于肖莱，后于1793年10月在当地歼灭了叛乱的旺代人。但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带领2万—3万人跨过了卢瓦尔河，一直窜到格朗维尔，打算夺取一个港口以便求助于英国人。11月13—14日，他们攻打国民公会议员勒卡尔庞蒂埃负责守卫的格朗维尔城失败，遂掉头南窜，12月3—4日又受挫于昂热城下，最后夺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14日，马尔索和克莱贝尔率部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粉碎了这股匪徒。旺代叛军的残部于12月23日在卢瓦尔河河口的萨夫内被击溃和消灭。旺代战争就此告终。当然，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又渡过了卢瓦尔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领着马莱，但旺代叛乱毕竟再也不能构成直接危险了。

侵略军的撤退也是救国委员会奋斗的结果。国境线曾到处都被敌人突破。在诺尔省沿海，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8月底封锁了伦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的敦刻尔克。在桑布尔河一带，科布尔亲王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勒凯斯努瓦要塞后，9月底又向莫伯日发起进攻。在萨尔，布伦斯维克公爵率领的普军尚不甚活跃，但乌尔姆塞尔率

领的奥军却向莱茵河大举进犯，10月13日攻占“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侵入阿尔萨斯。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布了进攻令。

乌夏尔的军队在翁德斯考特战胜了掩护围攻敦刻尔克的弗雷塔格部队，从而解救了由苏昂和奥什英勇守卫着的敦刻尔克。这场战役从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战局混乱，又没有获得全胜——乌夏尔坐视弗雷塔格部队逃之夭夭，没能切断进攻敦刻尔克的英军后路。不久乌夏尔就在默南吃了荷兰人的败仗，随后被撤职并被砍了脑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战役却是共和国军队长期来的第一次胜利。

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卡诺辅佐下）统率的诺尔方面军在瓦蒂尼获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国民公会特派员和将军们一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战斗过程中却毫无动作，结果被撤职并且上了断头台。奥军则撤往蒙斯。这次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继翁德斯考特战役之后的瓦蒂尼战役证明救国委员会政策是正确的，它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信心。

解救朗多拖的时间较久。当奥地利将军乌尔姆塞尔入侵阿尔萨斯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及其在萨尔的普军仍按兵未动。圣茹斯特和勒巴被派到阿尔萨斯，博多和拉科斯特被派到洛林。救国委员会重组了东部的军队并加强了皮什格吕指挥的莱茵方面军。奥什被任命为摩泽尔方面军司令后，曾于11月28—30日在凯泽斯洛泰恩向布伦斯维克发动进攻，但未得手。奥什被提升为两军最高统帅之后，又发起攻势，1793年12月29日夺取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进占斯皮尔。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奥军也撤到莱茵河右岸。

到1793年底，入侵敌军已在全线撤退。西班牙军队在比利牛斯山脉西段被赶到比达索阿河边，在东段被赶过特克河。凯莱曼在10月里解放了萨瓦。这时物资动员也开始显出成效：全国总动员征召的兵员汇集到一起，军工生产开始上马，并于11月初向国民公会展示出它们生产的第

一批步枪。事实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国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运动日趋稳定。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攻击使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们张皇失措。救国委员会从6月2日起一直极力遏制和引导的群众激情被打了下去。同时，调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动也势在必行。恐怖统治表现出多样性。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般都依靠雅各宾俱乐部和各民众社团，信赖当地的无套裤汉。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倾向产生出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恐怖措施的贯彻也由此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员和雅各宾派固然成功地维持了民族的团结，但他们的行动缺乏纪律和协调性。这两种行政权力——一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则来自革命的运动——并存的状况往往加剧局势的混乱。看来，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使之服从中央的权力，把群众的革命自发性明确地导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标，这的确很有必要。

这种必要性，由于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而显得更加突出。由各县建立的普遍最高限价带来很多不平等现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诸如运输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区，如南部已在发生饥荒，而有些地区粮食却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现混乱和麻烦的局面。救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整顿经济管理，统一最高限价，实行对外贸易国营化，从而实现各省之间的平均分配。经济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国委员会去确立自己对整个国民生活的绝对权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宪法性法令是和这一目标相吻合的。由此确定了战时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国民公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唯一核心”（第1条）。但“根据1793年10月10日法令，一切行政司法机构和公职人员都受救国委员会直接监察。根据1793年9月17日法令，对于所有与个人有关和涉及一般治安及

国内治安的事务享有特别监察权”（第2条）。

巴黎市府的检察长变成了“国家官员”，成为革命国家的一个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员会管束。各县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选的国家官员任县长，因而基本上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各省只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员的权力，禁止各法定权力机关通过特派员搞串联和组成中央议事会。民众社团也同样不许这样做。尽管仍保留着中央革命军，各省自己的军队却解散了。各种革命税收也被禁止。

事变本身的逻辑导致中央集权的重建，导致政府的稳定和政府权力的强化。这些正是救国委员会所执著追求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人民运动的行动自由就此完结了。

与此同时，形势发展使这种专制性中央集权重新受到怀疑。大革命胜利了。12月19日收复了土伦，23月粉碎了旺代叛乱，29日解了朗多之围。恐怖统治难道不可以就此松懈、专政难道不可以就此缓和吗？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减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它突然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行动似乎已经是这种退让了），它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遭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击。

---

[1] Brutus（Marcus Junius，约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政治家，因刺杀搞独裁的恺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为偶像。——译者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救国委员会视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它不愿向人民群众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损害革命的统一；它也不愿向温和派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牺牲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统制经济，牺牲使所有人都服从的恐怖制度。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何处？革命政府极力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保持中立。但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激化。过激的反对意见和平民的不满情绪汇集起来，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间放弃保守主义立场。政府摆脱了极端派的困扰。通过镇压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民运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后来政府拼尽全力，一度顶住温和派的压力，但终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覆亡，做了从头一天起就控制着自己命运的那种矛盾的牺牲品。

Ⅰ.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通过肃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暗中打击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各种区民社团，表露出要同人民运动（它始终也只是在尾随该运动而不是在领导该运动）疏远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它受到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同时还助长了议会中和舆论界反对派的攻势。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打击乱党的斗争开始爆发，这种斗争不仅给革命政府，而且给人民

运动以致给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这两个事件，无论从其主要当事人来看，还是从其后果来看，都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既破坏了山岳派的统一，又加剧了国民公会中的纷争。

“外国人阴谋”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发出来的。丹东的这位同极端派断绝了关系的朋友，指控那些极端派分子参与一个由外国人策划的、旨在用过激做法搞垮共和国的阴谋，并特别点了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国难民，大革命开始时曾宣布欢迎一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前来参加，也的确接纳了许多外国人。有些外国人，如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甚至在国民公会占有席位；有些则以科尔得利派的姿态出现，或活动在各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如佩莱拉）。这些外国避难者很快就发挥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尤其使救国委员会深感不安的是，他们同外国工商界人士过从甚密，而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中有得到夏博保护的英国外交部的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有纳夏泰尔人（普鲁士臣民），银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奥地利臣民）。雅各宾鼓动家德菲厄和许多山岳派议员的朋友普罗利（也是银行家），有奥地利臣民、实业家弗雷两兄弟（前嘉布遣会[1]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们的妹妹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贵族居兹曼（也是个实业家）……这些外国人和某些山岳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极端措施，如领土兼并、非基督教化运动，都得到他们的推动（克罗茨和佩莱拉曾参与使巴黎宪政派主教戈贝尔退职）。此外，他们还在军需供应上搞黑市交易，并搞指券的卖空投机。

东印度公司事件在这时发生，并使山岳派陷于分裂。1793年8月24日一纸法令，取缔了所有股份公司。这一法令是在德洛内（昂热人）、

朱利安（图卢兹人）、夏博、巴齐尔、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实业家议员发动攻击后通过的。他们在谴责这些公司的同时，乘着这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投机牟利。东印度公司的银柜和文件均被查封。1793年10月8日，德洛内提出一项法案，对该公司的清算作了谨慎的安排。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条修正案，规定清算工作由国家而不是由该公司本身来进行。然而发表在《法令公报》上的最后文本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写法，即规定清算工作将由该公司主持。由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签署的法令原本竟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篡改了。法布尔、德洛内和他们的同伙曾接受了该公司50万锂贿金。共和二年雾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夏博向揭发了这一事件。夏博本人曾因其同弗雷兄弟的关系和同他们的妹妹的婚姻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猛烈攻击。另外，他还有做投机生意的嫌疑，在非基督教化运动方面也受到牵涉。因而，他打算出卖同谋以求自保。巴齐尔为他的指控作了证。

救国委员会相信“外国人阴谋”确有其事，更何况巴茨男爵的王党阴谋和实业家议员及外国避难者的阴谋牵扯到了一起。夏博的检举似乎证实了法布尔的揭发。救国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及其民族性比对贪污事件更为敏感。同时，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里仍然受到这些被检举人的攻击。雾月20日（11月10日），巴齐尔和夏博先后抨击恐怖制度、谴责各政府委员会压迫议会的暴政。国民公会在这一天作出决议：任何国民公会议员未经国民公会事先听证不得被送交革命法庭。这场辩论表明，那帮实业家议员已跟正在冒头的宽容派勾结起来。例如夏博和蒂里奥，前者有投机倒把嫌疑，后者有温和主义嫌疑，而两人都是非基督教化分子。这项决议两天后即被取消。但政府各委员会已经接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的报警（他揭发别人只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开始从一切旨在分裂爱国者的阴谋中看到外国的黑手和皮特的金钱。它们对于夏博检举的反应，是在11月17日下令将检举人和被检举人（包括夏博、巴齐尔、德洛内和图卢兹人朱利安）统统逮捕。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雾月27日（1793年11月17日）《关于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假爱

国者们残酷的温和主义和偏执的过激主义”一律予以抨击，说那些假爱国者是“外国各宫廷雇佣的密使”，他们“在危险的道路上猛推革命之车，企图使之撞碎在革命的目标上”。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再次谴责那些“外国特务”，那帮一手策动了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卑鄙的暴君密使”。在他的推动下，普罗利、德菲厄、迪比松和佩莱拉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丑闻牵涉到重要人物，公开暴露出腐化，将那些实业家议员和敌国特务之间的联系大白于世，因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圣茹斯特雾月15日写信给罗伯斯庇尔说：“若还同那伙堕落分子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就一钱不值了。”从此，人们时时处处都疑心重重，这使党派之间的争吵更趋激化，仇恨更趋强烈。“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使山岳派彻底分裂，同时加剧了针对乱党的斗争。

2. 宽容派的攻势（**1793**年**12**月**—1794**年**1**月）

丹东于1793年10月离开巴黎。这年夏天他再次结婚，这时正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镇休憩。接到了库图瓦的报警后，他得知他的朋友巴齐尔和法布尔已被牵连进东印度公司事件并预感到此事可能伤及自己。丹东遂于雾月30日（1793年11月20日）急匆匆赶回巴黎。正互相串联的温和反对派很快就聚集到丹东的周围。他们的阴谋曾由于救国委员会，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力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而得到某些便利。为反对过激派，革命政府依靠过丹东，而且一开始并没有防备宽容派的攻势将通过极端派来破坏革命政府的组织和结束恐怖统治。

丹东领导宽容派向激进革命派迅速占据的所有阵地发动攻势。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丹东起来反对反宗教的“迫害”，要求“爱惜人血”。霜月6日，他向反宗教的化装舞会提出抗议，要求“人们加以制止”，并要求各政府委员会“就被人们称为外国人阴谋的问题”提

出报告。霜月11日（1793年12月1日），丹东走得更远了。当康邦提议强制人们用现金兑换指券（这是无套裤汉的一贯主张，而且科尔得利派也在当天的一份请愿书中要求采取该措施）时，丹东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长矛”的作用已经结束：

“我们要记住：社会的大厦如果是靠长矛来推翻的，那么它的建立和巩固只能依靠理性和天才的罗盘。”

霜月13日（1793年12月3日），丹东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反击。他随即撤退，说他并无意于“割断革命的神经”。他不得不为自己作辩解。罗伯斯庇尔出于对山岳派团结的关切，出面维护了他。罗伯斯庇尔说：“爱国者的事业是一致的，就像暴政的事业是一致的一样。爱国者应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

《老科尔得利报》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丹东派攻势的规模，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被牵涉到了。卡米耶·德穆兰（作为新闻记者，他很了不起，但他作为政治家却平庸无奇）于共和二年霜月15日（1793年12月5日）开始出版他的新报纸。“皮特呵，我向你的天才致敬！”——照德穆兰的说法，所有过激的革命派都是皮特的特务。德穆兰在霜月20日出版的第2期报纸上猛烈攻击在非基督教化运动问题上有责任的克罗茨，并把他和巴黎市府检察长肖梅特联系了起来：“阿纳夏尔西和阿纳克萨戈拉以为他们在推动理性的车轮，但他们推动的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车轮。”霜月25日（1793年12月15日），《老科尔得利报》第3期出版，它对整个恐怖制度和革命政府本身提出指控。卡米耶·德穆兰借用塔西佗[2]的话，通过谴责历史上最初的一些君主的罪行，谴责了恐怖的镇压政策：

“救国委员会……曾经认为，为了建立共和国，它需要暂时采取专制君主的法律原则。”

这期报纸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唤醒了反革命的希望，使一切惶惶于

恐怖统治的人都跟到宽容派的后面。罗伯斯庇尔此时还保持着对宽容派的善意中立态度。宽容派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肆无忌惮，共和二年霜月27日（1793年12月17日），成功地欺骗了救国委员会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向国民公会检举激进革命派的两位最突出的领袖——陆军部秘书长樊尚（由于这位秘书，布肖特部长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和革命军将领龙森。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他们。大恐怖的矛头难道就要转向它的创造者了吗？……各政府委员会事先没受到征询，这个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搞垮它们的权威。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国民公会应来自里昂的一个代表团的要求（“愿继恐怖统治之后实行仁爱的统治”）和一个很有影响的妇女代表团的要求，作出了组建负责审查各种拘留案和释放错押犯人的司法委员会的决议。

然而到了霜月底，风向骤变。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在德洛内的查封令中发现了伪造的东印度公司清算法令（原件同法布尔修正案相违，其正文下面有他的签名），丹东派的处境大为不妙。更糟糕的是，激进爱国者开始了反攻。得到报警的科洛·代布瓦突然从解放市回来。雪月1日（1793年12月21日），把夏利耶的头颅和遗体从巴士底广场护送到杜伊勒利宫的广大群众和一个里昂无套裤汉代表团簇拥着科洛·代布瓦来到国民公会。他以共和国所蒙受过的危险为名，为里昂的镇压运动进行辩护。国民公会当即表示赞赏。当晚，科洛·代布瓦向雅各宾俱乐部训话。他谴责雅各宾派的软弱，赞扬龙森的干劲，并痛斥那种对被镇压者的毫无道理的同情心：

“当爱国者的心被撕裂的时候，什么人还有多余的眼泪去哭悼自由之敌的尸体？”

救国委员会也抛弃了对宽容派攻势的善意中立态度。雪月3日（1793年12月23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超党派的姿态。

在外省，对乱党的斗争实际上已在威胁政府的稳定。自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以来，革命政府同人民运动关系的破裂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方面引起政策方向的改变。许多国民公会特派员同无套裤汉断绝了联系，并把镇压的矛头转向“极端派”。在色当、里尔、奥尔良，嫌疑犯获释了。奥尔良的一名忿激派——塔布罗被关进监狱。在布卢瓦，从霜月起开始了反攻倒算。在里昂，富歇现在打击的是夏利耶的老朋友们。在波尔多，塔利安为掩饰自己的贪污而检举“过激派”。在加尔省，布瓦塞撤换了尼姆的爱国市长库尔比。到处都出现温和派与过激派的冲突。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也加入了这些冲突，而不再充当仲裁人了。救国委员会意识到危险，随即予以调解，以确立自己的仲裁地位。

罗伯斯庇尔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作的《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报告，对雪月4日散发的第4期《老科尔得利报》作了答复。卡米耶·德穆兰在这一期报纸上以自由神（“这位自由神降自上天，她不是歌剧院的美女，不是一顶红帽子，不是一件脏衬衫或一件破褂子。这位自由神是幸福，是理性，是平等，是正义……”）的名义，要求释放“那20万被你们称为嫌疑犯的公民”，并宣称：“如果你们建立一个‘宽赦委员会’，自由肯定会得到巩固，欧洲也肯定会被降服”。罗伯斯庇尔在雪月5日以战争状态为由替大恐怖作辩护。他向国民公会概述了革命政府的理论，指出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开创共和国，而立宪政府的目的则在于“维持”共和国：

“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宪法则属于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

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故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

“它应当给予好公民一切国家保护；对于敌人，它只能叫他们灭亡。”

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姿态，谴责了两个极端的派别：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阳痿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

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经比约-瓦雷恩提议，霜月30日成立的“司法委员会”被撤销，宽容派的攻势由此开始走向失败。救国委员会一度还力图在斗得不分胜负的两派之间保持公允的平衡。共和二年雪月16日（1794年1月5日），卡米耶·德穆兰出版了第5期《老科尔得利报》，向埃贝尔发起了全面进攻，指控他从布肖特领导的陆军部领钱办《迪歇纳老爹报》。但是，雪月18日（1794年1月7日），《老科尔得利报》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罗伯斯庇尔警告卡米耶，最后还主张烧掉他的报纸。德穆兰反驳道：“烧掉并不是回答。”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谴责这两大派，说他们正在威胁着革命政府，而且他们“像森林里的土匪一样”串通一气。就在同一天，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痛斥了因亲笔修改清算东印度公司法令草案而声名狼藉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他于雪月23—24日（1794年1月12—13日）的夜间被捕。第二天，当丹东为帮助朋友而出面干预此事时，比约-瓦雷恩大声嚷道：“谁坐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一边，谁就要倒霉！谁就是执迷不悟！”宽容派的攻势宣告失败，而且名誉扫地，立即处于政敌反攻的威胁之下。

3.过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过激分子的“极端派”曾一度被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否定态度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又因和某些外国极端派有牵连而受到打击，当了法布尔·代格朗蒂纳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一旦摆脱了宽容派的攻击，它就恢复了自己的影响。这个派别带动了坚持要求释放樊尚和龙森的科尔得利俱乐部，被樊尚安插满“坚定爱国者”的陆军部各机关也是它的一个堡

垒。这个派别还通过埃贝尔和莫莫罗分别在巴黎市府和巴黎省产生影响。过激派致力于释放被关押的爱国者，加强恐怖统治和巩固统制经济。

科尔得利俱乐部顽强地继续推行营救樊尚和龙森的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在各平民社团和巴黎各区进行宣传鼓动的中心论题。共和二年雨月12日（1794年1月31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宣布存在着压迫现象，并将写有人权宣言的木牌用帷幔蒙住。这种含蓄的威胁，加上缺乏起诉证据，革命政府试图以向激进爱国者让步来抵消温和派势力等原因，樊尚和龙森终于在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获得释放。

加强恐怖统治的运动由此声威大振。在第一次成功的鼓舞下，在带着无节制的复仇欲望出狱的樊尚的激励下，科尔得利俱乐部更加起劲地谴责那些“新温和派”。他们要求惩罚“压迫爱国者的人”，要求“消灭沼泽派邪恶的残余势力”（雨月18日）。这分明是要清洗国民公会。这场恐怖主义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那75名抗议6月2日起义的议员。这些议员被扣押起来，但在罗伯斯庇尔的关照下，他们没有被送上革命法庭。另外，曾于1792年春在温和派请愿书上签名者（人称“八千人帮”和“二万人帮”）也受到谴责。雨月24日（1794年2月12日），埃贝尔在科尔得利俱乐部高声喊道：“必须彻底推翻这个集团！”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决定重新出版马拉的报纸，决心用它来揭穿“那些欺骗人民的叛徒、败坏或迷惑人民的捣乱者和统治者”的假面具。

加强统制经济的运动越来越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因为，整个冬季经济形势都在不停地恶化。实行最高限价的决议并没有消除困难。面包虽然不缺了，但质量却很糟。谷稀价贵使得食品店产品质量大为下降，最高限价法实际已遭破坏，但无人受到惩罚。肉类供应的严重不足，在6月份就使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因此，请愿运动，在政策方针

问题上已趋于缓和，而在生计方面仍十分活跃。尽管建立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各种机构，对商人的敌意——这种平民心理最典型的反映——仍在不断地表现出来。在生计危机中受苦最深的有两个社会阶层：一是那些自身职业与战争需要没有关系因而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工匠；一是新闻记者。他们都视暴力和加强镇压为带来富足生活的手段。埃贝尔通过他的报纸使一度消沉的恐怖精神重新活跃起来。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345期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应当惩治那些把无套裤汉当狗看待、只把骨头扔给他们啃的肉店老板。要像对待无套裤汉的所有敌人一样，让他们做“热手游戏”（即上断头台）。让他们的鲜血像酒商压榨的葡萄汁一样流到新桥[3]下。

发动一场平民暴动的思想已经成形。生计危机将促使无套裤汉采取新的行动。

然而，一度受宽容派攻势影响的救国委员会却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这两种矛盾倾向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除了实行恐怖之外，只会求助于道德。他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的道德观。

“如果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在于道德，那么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便在于道德和恐怖。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无力的。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适应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主原则的结果。”

道德，也就是个人的忘我精神、对公共利益的献身精神和必要时的牺牲精神。罗伯斯庇尔试图用制度、用法定的和司法的保证来维持这种公民道德。至于恐怖，救国委员会则打算在革命法制的范围内加以节制，同时仍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保留下来。

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恶化。巴黎出现了严峻的形势：一场威胁革命政府生存的平民暴动似乎迫在眉睫。

4.风月危机和乱党的覆灭（**1794**年**3—4**月）

危机在共和二年冬季逐渐明朗化。革命政府建立后逐渐表现出的社会和政治演进的各种特征更加突出，并深刻地影响着风月危机。这场危机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人民运动同革命政府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社会危机。限价、对经济专制性的管理和领导，并不能保障给巴黎居民充足的供应。无套裤汉因物质生活极端困苦而怨声载道。粮食短缺和物价昂贵折磨着他们。最高限价法实施不力。工资虽得到增加，但抵消不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就像不久前面包店门前的情况一样，肉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队。人们凌晨3点就聚集到这里，拥挤、斗殴。缺乏农产品供应的巴黎中央菜市场里也吵成一团。深受其苦的工资劳动者掀起了请愿运动。建筑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军火工场在风月里不断发生骚乱。生计危机造成了过激的恐怖主义心理。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一位妇女在人权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喊道："我们还留着这些贵族干什么？难道不早就应该把这些让人民吃不饱肚子的坏蛋送上断头台吗？"

其次是政治危机。国防的需要和雅各宾派的权力概念促使革命政府愈来愈想使民众组织对自己消极服从，并把民众的民主主义做法一步步化为资产阶级的措施。无套裤汉的革命行动受到损害。巴黎各区和各民众社团的活动被引导到为战争出力方面（包括装备"雅各宾骑士"、收集硝石、抚养士兵的父母和子女），远远偏离了普遍性的政策的问题。曾逐渐被各区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各基层组织，现在转而受政府支配。但这种转变是费了很多周折和冲突才达到的。温和派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事件展开宣传，从而加剧了混乱。活动分子们了解这些情况。雪月4日（2月22日），一位演说者在"武装人"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宣布："你们若失

去了革命的运动，哪怕只有片刻工夫，爱国者就完了！他们就死期将至了。”

共和二年风月的危机集中表现了1789年的爱国者和1793年的爱国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又反映了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或山岳派）之间，关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平民观念和资产阶级（亦即雅各宾派）观念之间不可消除的对抗性。在危机的背景下，“新温和派”和“坚定的爱国者”之间由各种私仇加深了的对立越发尖锐。樊尚和龙森的拥护者们仍怒气未消。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科洛·代布瓦（从里昂回来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和四分五裂的爱国者）曾力图实现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和解，但告无效。风月9日，科尔得利派再次要求逮捕那些“不配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的叛徒们”，并特别要求逮捕卡米耶·德穆兰。激进反对派和平民不满情绪结合起来，构成了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为应付这种威胁，革命政府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措施。

共和二年风月的一系列法令就这样应运而生。早在雨月13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就通过了拨款1万锂作救济金的决议。风月3日（1794年2月21日），巴雷尔又提出一项新的普遍限价法。风月法令走得更远一些。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在作了关于在押人犯的报告之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查封嫌疑犯财产的法令。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又产生了一项法令，责成救国委员会提出“用共和国之敌的财产赔偿所有不幸者的办法”。

圣茹斯特宣称：

“现实的力量也许正在把我们引向我们所不曾想到的结局。为数甚众的革命之敌控制着财富，贫困迫使劳动人民处于从属于敌人的地位。你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民事关系导致的结果和政府的形式截然相悖，这个国家难道还能存在下去？”

他还指出：

“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他们有权以主人的姿态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说话。”

圣茹斯特在他的第二个报告的结尾处，向旧制度的君主们提出挑战：“幸福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

尽管如此，风月法令的影响却不宜夸大。阿尔贝·马迪厄对圣茹斯特“既没有得到他所希望满足的人们的理解、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一情况深为惊讶。圣茹斯特和革命政府得到了理解，这是不容置辩的。革命之敌在共和国里不得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财产应当拿来赔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共和国的爱国者。这些观点早在1793年春就开始形成，并在无套裤汉中广泛流传。因而风月法令并不带有任何特别的性质。马迪厄曾写道，圣茹斯特的结论构成“一种旨在从埃贝尔主义的混乱愿望中总结出一套社会纲领的重大企图”，对此我们也是难以苟同的。

无套裤汉和激进爱国者很早就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种更激进的纲领。另一方面，即使查封嫌疑犯财产和赔偿贫穷爱国者的计划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并深受欢迎，这些以后才能表现出影响的措施并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对解决生计危机并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怀有不容置疑的诚意，但风月法令只能归结为一种旨在对抗激进宣传的策略手腕。这个手腕失败了。到风月中期，由于革命政府无所事事，既不想实行保证无套裤汉生计的经济计划，又不想实行摆脱温和派威胁的政治计划。于是，这场危机恶化到了极点。

风月危机的极度恶化，表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的反对商人和富人的恐怖主义言论上，也表现在一些反叛性公告和起义谣传上。这些起义谣传引起各政府委员会的警惕，也使科尔得利派产生错觉，激励着他们去采取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以清除敌对分子。他们估计加强压

力可使自己最终取得优势。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上谴责新出现的“催眠派”——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派。在第350期上，他把“神圣的断头机”视为“点金石”。他还揭露政府在各派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

“有人想两面讨好，有人要拯救那些曾阴谋反对自由的坏蛋，这是白日做梦。正义将不顾催眠派的干扰而得到伸张。”

最后，埃贝尔提出一项明确的社会纲领：

“你们要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残废人发放救济，要迅速组织国民教育以圆满完成你们的事业！”

但是，科尔得利派领袖们忽视了所有革命行动日的经验，没有注意组织他们设想中的运动，也没有切实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对物资匮乏比对温和主义危险更为关注。

肃清过激派是一出迅雷般的惨剧，平民活动分子为之惶然失措，与革命政府的关系更加疏远。风月12日，革命军将领龙森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有必要发动起义。风月14日（1794年3月4日），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又被蒙上布幔，陆军部秘书长樊尚谴责那些“似乎串通一气要建立温和主义的罪恶制度”的人。卡里耶从镇压爱国者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应当举行起义——“一场神圣的起义”。埃贝尔附议道：“对，是应当举行起义了，而且科尔得利派将不是最后一批发信号消灭镇压者的人。”

看来，科尔得利派只是想搞一次群众示威，但这场示威不仅针对温和派，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革命政府及其政策。风月17日，科洛·代布瓦曾企图在雅各宾派和科尔得利派之间搞调和。对此，龙森当场报以一篇激烈的演说，大骂发明“超革命派”这个词的罗伯斯庇尔，指出“这个词成了新捣乱分子压迫最热忱的爱国者的借口”，并强烈要求人们“彻底消灭一切温和派、骗子、野心家和叛徒”。

在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对立以及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抵抗和运动这两种政策的对立。坚定的爱国者要搞运动，认为唯此才能把无套裤汉和大革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保卫大革命。埃贝尔在他的最后一期报纸中写道："只要后退一步，共和国就完了。"由于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参加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以资产阶级的保守共和国为理想的温和派说来，前进一步则是致命的。

风月中旬开始，科尔得利集团的攻势威胁了作为政府行动基础的社会平衡。救国委员会再也沉不住气了。风月23—24日（3月13—14日）夜间，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主要领袖均被逮捕，并被送上革命法庭。诉讼案把外国奸细（克罗茨、银行家科克、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迪比松）、科尔得利集团（埃贝尔、龙森、樊尚、莫莫罗）、激进爱国者（革命骑兵队上尉马聚埃尔、物资部廉洁的代孔布）和平民活动分子（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昂卡尔，马拉区反囤积专员、朴实的迪克罗凯）全都混在一起。他们在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都被送上断头台。

接着便是对宽容派的清算。丹东派一度以为他们又要得势，从风月末就开始施加压力。被查封的第7期《老科尔得利报》编写了一份针对救国委员会政策的激烈控诉状。但犹豫了许久才镇压了过激派的救国委员会是决不愿失去控制权的。早在风月28日（1794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就颁布了对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巴齐尔，夏博和德洛内等被牵涉进东印度公司案件的议员的控告令。对镇压埃贝尔及其朋党感到不安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二人在支持下，终于促使犹豫不决的罗伯斯庇尔下定决心，芽月9—10日（1794年3月29—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卡米耶·德穆兰、德拉克鲁瓦和菲利波。罗伯斯庇尔于芽月11日作了一次动人心弦的讲演。此后，国民公会便批准了这次行动。罗伯斯庇尔说：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

诉讼案把一些渎职的议员、外国间谍（居兹曼和弗雷兄弟）、一个投机商、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丹东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及埃罗·德·塞谢尔等人同丹东派首领们混在一起。丹东并无惧色，大骂控告他的人们。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犯人若侮辱国家司法即可被剥夺申辩权。所有这些犯人都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件诉讼案以一桩旨在释放嫌疑犯的“监狱阴谋”为借口，其目的是清洗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巴黎市府的国家官员肖梅特、德穆兰的遗孀和埃贝尔的遗孀、狄龙将军等，这些互相间毫无关系的人被拉到一起，并于共和二年芽月24日（1794年4月13日）被处死。

芽月的惨剧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尔得利集团的冒险企图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加速它的演变进程。虽然革命政府在危亡关头同意跟无套裤汉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这个联盟作出过让步，但它从来没有接受无套裤汉民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方针。对各政府委员会来说，反抗反法联盟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它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求控制民众组织并将它们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由于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反对派运动威胁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采取了镇压手段。但是，无套裤汉看到自己所信赖的、表达自己愿望的《迪歇纳老爹报》和科尔得利派被定罪，他们便对革命政府产生怀疑。政府虽然也处死了丹东，但这也无济于事。继这几场大诉讼案之后的镇压活动尽管有所节制，但仍在活动分子心中产生恐惧，各区的政治生活从此变得死气沉沉。革命政府和各区无套裤汉之间直接的、兄弟般的联系被切断了。圣茹斯特不久这样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芽月的惨剧实际上是热月政变的序幕。

Ⅱ.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从肃清乱党到罗伯斯庇尔派垮台，从芽月到热月，革命政府不再受到争议。尽管在客观环境影响下进行过某些改动，政府的地位仍相当稳固。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恐怖统治更加严厉，经过清洗的各级权力机关俯首听命，国民公会成为橡皮图章。但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却遭到严重削弱。1793年夏季危机期间，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曾迫使政府建立了一些符合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愿望的特别机构，如7月间设立的反囤积专员、9月间设立的革命军等。各政府委员会在无套裤汉协助下取得统治权后，曾做过大量工作来调整各个机构和统一革命军队。风月危机和芽月审判使他们得以取消人民运动的独立性，并清算人民运动所强迫建立或创造的各种机构。共和二年芽月7日（1794年3月27日）解散了革命军，12日（4月1日）取消了反囤积专员。巴黎市府遭到清洗，各区的民众社团也被取缔。人民运动被纳入雅各宾专政的轨道。各政府委员会虽获得了“强制力”，但却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在芽月到热月期间，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日益离心离德。

1.革命政府

自1793年夏季以来，革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性质一直在演变着，到1794年4月间便大致确定下来。葡月19日（1793年10月10日）法令，尤其是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构成了该政府的宪章。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10月10日的报告中，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共和二年雪月5日，即1793年12月25日）的报告及《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共和二年雨月17日，即1794年2月5日）的报告中，都为革命政府制定了理论。

革命政府是一个战时政府，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不过也只能待到敌人被打垮的时候）。由于现在是战

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这种恐怖只是用来拯救共和国的，作为“民主或人民政府之基本原则”的美德，是革命政府不至于变成专制政体的保证。美德，“也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同于公共利益的高尚献身精神”。罗伯斯庇尔得出结论：

“在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当的，凡是使人堕落的便是反革命的。”

这样一来，大革命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了：

“我们要执行大自然的意志，完成人类的计划，遵守哲学的诺言，宽恕使犯罪和暴政得以长期统治的天命。愿过去在被奴役国家中著名的法兰西超越历史上一切自由民族的荣耀而成为各民族的榜样，使压迫者为之丧胆，使被压迫者为之快慰，使世界为之增光。愿我们在用自己的鲜血巩固我们事业的时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极乐时代的灿烂曙光。”（共和二年雨月17日）

国民公会本来是“政府动力的唯一中心”，它代表着国家主权，掌握着最高权力。各委员会在它的监督下从事行政工作，执行它的决议。但在芽月以后，行政权力却成了政府体制的首要部分，议会实际上成了它的从属机构。

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共计21个）领导或控制着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实际上，只有两个委员会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这就是救国委员会和。

每月都进行重选的救国委员会这时已削减到11名成员（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巴雷尔、卡诺、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和马恩省的普里厄、让邦·圣安德烈和兰代）。它“处于行政机构的中心地位”，一切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处于它的“直接监察”之下。它通过地形测量局领导外交和战争，通过武器弹药委员会领导军火生产，通过物资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并通过共和二年花月末创建的警察局下达逮捕令，侵越的职权。虽然救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各自任有专职（如兰代专管生活资料、科多尔省的普里厄专管军火），实际上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指导政治和领导战争。

救国委员会还管辖着临时行政会议的6位部长。1794年4月1日（共和二年芽月12日），按照卡诺向国民公会作的一个报告，这6位部长为12个执行委员会所取代。这些执行委员会均由国民公会根据救国委员会的举荐任命，它们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则通过“控制政府的意图并就各项重大措施向国民公会提出建议”来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也是逐月重选的较晚些时候才稳定下来（其成员有阿马尔，穆瓦斯·贝勒，画家达维德、勒巴，下莱茵省的路易、瓦迪耶、武朗等等）。根据1793年9月17日的法令，“一切有关个人和国内一般治安的问题”均受该委员会的“特别监察”。负有实施惩治嫌疑犯法的使命，领导治安工作和革命司法，是一个恐怖机关。

各省行政机构都按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简化，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省级行政机关染有联邦主义嫌疑，因而失去大部分权力，只能负责税收、公共工程、国有财产等事务。两个主要行政区划是县和市镇，前者负责“监督贯彻革命法令和治安救国措施”，后者负责执行这些法令和措施。市政府每10天得向县政府汇报1次工作，县政府每10天也得向各政府委员会汇报1次。

检察官的编制被取消后，在各县行政机关和市政府侧畔都安插有国家官员。这些官员负责“敦请和监督各项法令的贯彻，检举贯彻过程中的各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派驻各县的国家官员每10天必须向两政府委员会作1次汇报。

各革命委员会（即1793年3月21日建立并经过当年9月17日法令改组的原监视委员会），成为惩治嫌疑犯法的执行机关。它们均由12人组成，每个市镇设1个，大城市的每个区设1个（但许多乡村并不曾有过这种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治安方面，可开列嫌疑犯名单，执行挨户搜查和逮捕。这些革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就它们的工作向作一次汇报。

民众的俱乐部和社团的革命警惕性有助于加强政府的行动。

雅各宾俱乐部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雅各宾派来源于中层资产阶级，往往是国有财产的获得者，因而都属于抵抗派人物。他们面对险象环生的形势，力图保持1789年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成果。为此目的他们曾同人民和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接受统制经济和限价政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战时措施和对民众要求的让步。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接二连三的清洗，雅各宾俱乐部的构成更趋向民主化。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所占的比例在1789—1792年间是62%，到1793—1794年间降至57%；而手工业者和军人所占的百分比在同一期间由28%升至32%；农民的比例也由10%升至11%。

无套裤汉聚集到成分更加平民化的各友好协会中。这些友好协会是在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2日成立了“两性爱国者联谊社”（该协会也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里）之后，在巴黎发展起来的。1792年8月10日以后，这些向小人物开放的区级会社在巴黎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国民公会于1793年9月9日禁止区议会为常设机关。此后，平民活动分子们把原有的民众团体改造成区民社团，或重新创立一些民众团

体。这些新型的区民社团构成巴黎人民运动的基层组织。平民活动分子们即通过这些社团左右各区政治，监督行政机构，并向市政当局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从共和二年秋季到春季，密如蛛网、行有成效的民众团体遍布共和国，其数量之多数不胜数。在一度面临反革命威胁的东南部，民众团体特别多：在沃克吕兹省，154个市镇中有139个民众团体；在加尔省，382个市镇中有132个团体；在德罗姆省，355个市镇中有258个团体；在下阿尔卑斯省，260个市镇中有117个团体。这些爱国组织在战胜国内敌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坚决拥护政府政策的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分部和表现着大革命总进程中人民运动独立性的各区民社团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对抗。芽月以后，各政府委员会依靠雅各宾俱乐部，为统一革命力量进行了巨大努力。在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总部”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在政府的压力下，巴黎各区的社团只得解散。39个区民社团就这样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消失了。各政府委员会破坏了人民运动的支柱。由于这些委员会把一个始终具有自己的愿望和民主习惯的独立运动强行纳入雅各宾派的框框，从而激起了无套裤汉的反对。于是，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抗。

共和二年春，随着国民公会驻各省特派员被召回，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最终得以加强。特派员的权力起初很广泛，后来受到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的限制。为贯彻这一法令，国民公会还在1793年12月派出一大批、也是最后一批特派员。但这些特派员必须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向救国委员会作1次汇报，并再不能授权他人，也无权征召军队或征收革命捐税。芽月30日（1794年4月19日），21名国民公会特派员被召回。救国委员会宁愿使用自己的官员，如巴黎的朱利安。他是德罗姆省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曾检举过卡里耶在南特及塔利安在波尔多的过度暴行，并使他们被召回。有时救国委员会还把自己的1名委员作为特派员派出去，如在获月里被派往诺尔省前线的圣茹斯特。

然而中央集权并不能推行到底。救国委员会还得考虑到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邦经管的国库也不受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对自己的特权极为珍惜，不大支持救国委员会警察局的工作。两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加速了革命政府的垮台。在外省，尽管救国委员会花了很大力气，政府措施的贯彻仍然很不统一。

2. “强制力”和大恐怖

惩罚意志自1789年以来就一直是革命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所指出，人民群众和大革命的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们针对“贵族的阴谋”表现出“防御反应”和“惩罚意志”。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民众的激动情绪和各种屠杀事件。也是从这里，自1789年以来陆续产生了那些常设委员会、搜查委员会和。1789年10月11日法令把关于危害国家罪的终审判决权授予巴黎夏特莱宫。1792年8月17日，建立了1个特别法庭，该法庭两天后制定了1项简捷的诉讼法，取消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9月屠杀标志着民众恐怖的顶点。由于吉伦特派对使用镇压手段（即使是合法的镇压）深为反感，1792年11月29日，他们撤销了8月17日建立的法庭。

恐怖统治的建立是危机恶化所致。但随着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恐怖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了。1793年3月10日，为了防止新的民众屠杀，成立了有权审理“所有反革命活动”的革命法庭。9月5日，该法庭受到改组，它由国民公会任命，按一种简化的诉讼程序（取消起诉陪审团）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最高法院。1793年3月21日创立的各监视委员会，按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被交由管理。此外，国民公会还建立了一些按特殊诉讼法审判的军事法庭，如1793年3月19日针对旺代叛乱分子、28日针对流亡贵族建立的一些军事法庭。对于旺代叛乱分子、流亡贵族及流放中归国的反抗派教士（所有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审判工作往往只是验明正身和宣判死刑。

在第二阶段，恐怖统治的强度是因省而异、因特派员及当地恐怖主义者的势力而异的。镇压的范围按客观环境和危险的大小，同时也根据负责人的性情以及他们对于法律文件的解释而伸缩。有些负责人把前斐扬派、老温和派、抗议8月10日起义或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的人统统治罪。经济危机的恶化、统制经济的实行，使嫌疑犯数量激增。聚敛金钱的富人、违反最高限价法的生产者和商人，都在嫌疑犯之列。最后，非基督教化运动也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统治的范围，未很快放弃圣职的宪政派教士和顽固坚持宗教信仰的教徒都遭到镇压。

在乱党垮台及芽月审判之后，恐怖统治的中央集权加强了。在此之前大恐怖一直是针对大革命的敌人的，而现在它已在伤及各政府委员会的反对派。各委员会不断加强控制。赫赫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如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耶等，渐渐都被召回。根据圣茹斯特《关于普遍治安和乱党罪行》的报告而作出的共和二年芽月27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规定：“被指控搞阴谋的嫌疑犯，不论该犯在共和国的什么地方，都必须移送巴黎的革命法庭。”花月19日（1794年5月8日），国民公会特派员们在外省建立的革命法庭和委员会均被撤销。不过勒邦在阿腊斯创立的革命法庭一直维持到获月22日（1794年7月10日）。花月21日（1794年5月10日）还成立了奥朗日民众委员会。这些都是具体环境造成的例外。

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颁布后，地地道道的“大恐怖”开始了。这是当时的环境条件所促成的。牧月1日（1794年5月20日），科洛·代布瓦遭到一个名叫阿德米拉的人的枪击，4日（5月23日），人们抓住了企图攻击罗伯斯庇尔的塞西尔·雷诺，她后来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反革命信念。贵族的阴谋就这样在大战前夕一再表现出来，反映了反革命势力的冥顽不化。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了巴黎各区，人们的惩罚激情犹如火山爆发。然而自发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恐怖统治已经简化和强化了。库通（牧月22日法令的提议人）宣布：“问

题不在于惩罚几个典型以儆效尤，而在于消灭暴政的一切死心塌地的仆从。”

被告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陪审员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大革命之敌的定义被大大扩展。“问题主要不在于惩罚他们，而在于消灭他们。”牧月法令的第6条列举了人民之敌的各种类型，即：“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在恐怖统治的最后阶段，人们一般均采用“大杂烩”的办法审案。依据贵族阴谋的宽泛概念，人们可以在一次诉讼案中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他们因反对国家的阴谋而被看作一丘之貉。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 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6月份有3批人，7月份有7批人被处死。这些人都是从几个主要拘留所（比塞特尔、卢森堡宫、卡尔默、圣拉扎尔）提来的。从1793年3月到共和二年牧月22日这一期间，在巴黎处死过1 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竟有1 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

人们对于恐怖统治的结果看法不一。关于受拘嫌疑犯的数字，有人估计为10万人左右，有人则认为达30万之众。关于被处死的人数，据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约在3.5万—4万之间，其中包括在南特和土伦未经审判被处死的人数。根据这位历史学家的统计，革命法庭和各种特别法庭宣布的死刑达16 594起：从1793年3月到9月有518起，从1793年10到1794年5月有10 812起，从1794年6月到7月有2 554起，在1794年8月有86起。从地区分布来看，16%的死刑是在巴黎判决的；71%的死刑发生在

国内主要战区，其中19%在东南部，52%在西部。定罪的动机同这地区分部情况相吻合：78%的死刑是为惩治叛乱、叛变而宣布的。思想上的犯罪行为（煽动反抗、联邦主义、阴谋）所招致的死刑占19%。经济方面的犯罪（伪造指券、贪污）所招致的死刑只占1%。至于被处死的人的社会成分，原第三等级占84%（其中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贵族只占8.5%，僧侣占6.5%。乔治·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但要知道，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对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

因此，恐怖统治基本上是为保卫革命和国家，对付叛乱分子和叛徒的一种工具。大恐怖像内战一样（它本身也是内战的一个方面），从民族中清除了那些因其贵族属性或决心与贵族阶级生死与共而不能结合到社会中来的分子。它把"强制力"授予各政府委员会，使它们得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并令所有的人遵守救国的法则。它使阶级利己主义暂时沉默，从而促进民族团结感情高涨。尤其是恐怖统治使统制经济得以强制实施，这对夺取战争胜利和完成救国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统治是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3.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是应国防的急需而建立的。在对外贸易因封锁而停顿、法国四面受敌的时候，通过全民动员征召来的战士们急需吃饭、穿衣和武器装备，城市的居民急需粮食供应。所以，自1793年夏季起，革命政府就一步步地加强统制经济。

征用工作以法国的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1793年7月26日法令强迫生产者和商人申报存货，并为核实这些存货任命了一些"反囤积专员"。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如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在

斯特拉斯堡征收了5 000双皮鞋、1 500件衬衫，雾月24日（11月14日）又从该城市的富人中征收了2 000张床来安顿伤员。各种原料——金属、绳缆、做弹药筒用的羊皮纸、硝土等——都被收集起来。教堂的大钟也被拿下来去化铜。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为民族的利益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应用由救国委员会动员起来的学者所发明的新技术。征用措施限制了企业的自由。

限价措施是征用措施的必要补充。1793年5月4日法令规定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但实际上没有实行。9月15日法令重申了这一规定，9月29日法令强制规定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比1790年价格高1/3，由各县按具体情况执行），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比1790年高一半，这一限价由各市政府负责执行）。为了贯彻这一新立法并监督贯彻的情况，国民公会于共和二年雾月6日（1793年10月27日）创立了一个从属于救国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该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于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公布了产品生产地的全国最高价目表。各个县应加上运输费（就谷物和面粉来说，每驿里[4]的运输费系4苏半）、批发商的利润（5%）和零售商的利润（10%）。这样，最高限价法强行规定了利润余额，抑制了投机，限制了利润自由。

经济国营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和外贸，军队的需求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救国委员会事实上并不曾把民用的粮食供应国营化。这种限制经济自由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在无套裤汉眼里显然带有某种社会价值。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生产部分地国营化了——或是直接通过创建国家工场，或是间接地通过向制造商供应原料，通过整顿，监督、征用和限价。国家武器弹药制造工场的投产有力地推动了军备工业的发展，如巴黎制造步枪和刀剑

的大型工场，以及由拉卡纳尔（在贝尔热拉克）和诺埃尔·普安特（在穆兰）创建的一些军火工场，还有巴黎的格勒奈尔火药厂。但救国委员会没有建立更多的国家工场（卡诺对这种工场持反对态度），并拒绝把矿业国营化。

外贸的国营化搞了几个月。从1793年11月起，物资委员会掌握了外贸大权。它向国外派出官员，征用商船，在各港口建立国营货栈。为了资助同中立国的贸易和保证在汉堡、瑞士、热那亚和美国等地购货的支付，物资委员会征集了葡萄酒、烧酒、丝绸和呢绒，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共和二年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康邦下令按平价征购外汇。在处死埃贝尔之后，对外贸的控制便开始松懈。从风月23日（1794年3月13日）起，批发商们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政府为保障粮食供应和生产，开始寻求同大商人合作。各港口的批发商被召集到各商业事务所，物资委员会派出国的官员都被召回法国。这种符合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演变只能激起无套裤汉的反对。

市民的粮食供应从未直接国营化。在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改为贸易和供应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基本上为满足军队需要而使用征调权，很少关心消费者。资本集中化的发展不足与总体统计的缺乏使得居民的需求得不到精确测定，无法制定全国性的粮食供应规划。因此实行征调以供应市场便成为各县的事务。监督磨坊主、管理面包坊，建立定量供应制度等，也由各市政府去办理。许多城市（如特鲁瓦）的面包坊完全归市府经营，有些城市（较少一些，如克莱蒙费朗）连肉店也归市府经营。对于其他产品，除了糖和肥皂以外，物资委员会不感兴趣，它仅满足于公布最高限价。而救国委员会则发展到禁止一切地方政府搞征用的地步。无套裤汉试图通过革命监督强迫商人尊重限价法，但毫无成效。地下市场，尤其是农产品的地下市场猖獗地发展起来。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反囤积专员被取消。这时，为照顾生产者、种植者、手工业者和商人，救国委员会不顾无套裤汉的

尖锐指责，渐渐放松了对民用粮食供应的管理。最后，救国委员会开始容忍各种违犯生活资料（面包除外）最高限价法的行为。

随着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的分裂日益明显，一种新经济政策在1794年春初具轮廓。深刻了解中产阶级愿望的救国委员会开起倒车，它安抚商人，放松管制，缓和统制经济的立法。统制经济的推行主要是为军队和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救国委员会不可能看不到：最高限价法的实施是导致原第三等级解体的一个因素。因为资产阶级和有财产的农民是带着反感情绪接受统制经济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虽然要求对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但当最高限价强加到自己头上时便感到气愤。

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工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工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4.社会民主

人民大众和革命的中等资产阶级尽管有某些细微差别，但都持有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财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权利徒有其名；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而且还在于私有财产——人们中流行着这种18世纪社会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是，很少有人达到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打乱社会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称；“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像当时的一切革命者一样，他谴责主张平分地产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国民公会曾一致决定以死刑惩罚土地法的拥护者。但在同一讲演中，罗伯斯庇尔断言：“财富的极端不均是许多罪恶的源泉。”无套裤汉和山岳派对于“富足”、“阔佬”及过分的财富持敌视态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铺，可以在无须受雇于他人的情况下养家活口。这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众的理想相符，它体现了小农、农村短工、手工业者、帮工以及小店主的愿望。这种理想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当时出现的关于生产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产自由必将导致资产的集中化。

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最明确的表述，是由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和罗伯斯庇尔派同时提出来的。

1793年9月2日，在要求实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和增加工资的时候，无套裤汉区（前植物园区）宣称：“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并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

然而，早在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庇尔就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首要的社会法则便是为一切社会成员保证生存手段的法则，其他的一切法则都应置于从属的地

位。”1793年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新人权宣言的讲演中，进一步冲破旧藩篱，不再把财产权看成一种自然权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由法律确定的权利：“财产权是每个公民据以享受和支配由法律保障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

圣茹斯特明确表达了这种社会价值观：“应该不富不穷，富足是一种耻辱。”在《共和制度拾零》中，他提出废除立遗嘱的自由，按直系平均分配遗产，禁止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以及把无直系亲属公民的遗产收归国有等主张，以此将财产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社会立法旨在“向一切法国人提供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使之除法律之外无须依靠其他东西，在社会地位方面也无须相互依赖。”

这就是说：“人人应该独立自主地生活。”因而，社会法的概念在共和派思想中得到复兴。他们开始认为：在经济发展趋于毁灭小财产的时候，为了重建小财产以维护相对的平等，为了防止财富垄断再现和处于依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必须建立一个有权控制财产组织的民族共同体。

山岳派的立法即源自这些原则。共和二年雾月5日（1793年10月2日）和雪月17日（1794年1月6日）的法令保证在继承人（包括私生子）之间绝对平等地进行遗产分配（这些法令的有效期上溯到1789年7月14日）。仅保证遗产的平均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没有财产的人得到财产。于是，1793年6月3日，逃亡贵族的土地被按一定规格分成小块出售，地款可在十年内分期付清。这些规定在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被推广运用于一切国有财产。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批准按居民人头免费分配公社土地。虽然土地的分割使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土地数额或变成为地产主，更多的农民却并未从这种立法中得到任何好处。1793年7月17日，封建权利被彻底废除后，农民的团结一致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的分化加剧，出现了农民地产主和大农场主。迫于对劳动力的

需要，这些地产主对农业工人获得土地和农村无产者转变为独立生产者不能不持敌对态度。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的法令规定贫穷的爱国者将从没收和分配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报偿，这反映了罗伯斯庇尔派要继续前进，并满足穷苦的无套裤汉某些要求的意愿。虽然圣茹斯特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免费让与这些财产，但法令里却对此只字不提，也从未明确地提出实施的方式。事实上，风月法令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罗伯斯庇尔派及山岳派在内心深处仍是经济自由的忠实信徒，他们不愿意干预土地问题。他们都对穷苦农民的愿望无动于衷，从不考虑改革分成制和把大农场分割为小地产的问题。他们制定不出一项符合农村无套裤汉愿望的土地纲领。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立法在制宪议会的各种设想中已体现出来，同时又超出了这些设想。1793年3月19日和6月28日的法令，建立了对穷人、儿童和老人的救济制度。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1条确认："公共救济是一种神圣的债务。"享受救济的权利在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法令中得到承认。该法提出了社会保险的原则，并在各省设立了"国家救济大册"。老人、残废军人、需要抚养子女的母亲和寡妇都将登记入册，每人都将得到一笔年金和一些救济品，并将享受送上门的免费医疗。

共和二年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圣茹斯特呼吁："必须让欧洲明白，在法国领土上你们既不愿再看到不幸者，也不愿再看到压迫者。但愿这个榜样国家能带动整个世界，把对美德的热爱和幸福传遍全球。幸福乃是欧洲的一种新观念！"

5.共和的伦理道德

按罗伯斯庇尔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所说，美德乃是人民政府的原则和根本动力："我来谈谈这种在古希腊与罗马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美德……这种美德不是别的，正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

美德是恐怖统治的矫正剂。救国委员会严厉惩罚了渎职的革命者，召回行为暴虐的恐怖主义者。尽管它不想再搞非基督教化运动，它却打算把民间崇拜（差不多到处都建立了这种崇拜）净化、完善和统一起来。因为必须通过公共教育和共和崇拜来加强群众的公民责任感。

公共教育被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确认为一项人权。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国民教育，一种公民学校，其任务——按照人权宣言区1793年7月14日提出的主张——在于教育公民们懂得“对他们义务的规定及如何实践各种美德”。最首要的是发扬公共精神、巩固民族统一。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设国立小学的法令。这种学校的教学大纲把精神修养和身体训练、伦理和体操、教学和实践都结合起来。这一法令很快遭到否定，遂为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所取代。后一法令要求创立强制性的、免费的和世俗的小学。这种学校在体制上受国家控制，但并不搞中央集权化，因而比较适合民众心理。由于要全力应付战争，革命政府不顾群众要求，没有切实实施这项法令。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由此，组织一种公民崇拜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革命崇拜在大革命初期就已发展起来：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其最早和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公民节日大为增加，这形成了达维德为之贡献了自己全部才华的新艺术。1793年8月10日，在达维德规划下，巴黎欢庆了统一和不可分割节。非基督教化运动期间，对理性神的崇拜于1793年秋季在各教堂里取代了天主教崇拜，并且很快成为激发公民责任感和共和伦理的旬礼拜活动。

罗伯斯庇尔倡导的最高主宰崇拜企图把共和信条奠定在玄奥的基础之上。罗伯斯庇尔在读中学时接受过唯灵论的教育。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迪雅克的感觉论，对于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尤其反感（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是他叫人打碎的）。这位

不可腐蚀者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相信来世。他1792年3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言论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一点。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他所作的关于旬末节的报告中，把发扬公民责任感和共和道德作为这些节日的目的：

“道德乃是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伤风败俗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如美德是共和国的要素一样……把公共道德发扬光大吧！你们要取得胜利，但尤其要消灭恶习。”

基于个人的信念，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使人民树立一种既能照顾习俗又能巩固共和道德的信仰，罗伯斯庇尔继续说：

“在立法者看来，一切有利于人间和行之有益的东西都是真理……关于最高主宰的观念即是不断地求助于正义，因此它是一种社会和共和的观念。”

花月18日法令的第一条宣布：“法兰西人民相信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为颂扬大革命的重大事件（1789年7月14日起义、1792年8月10日起义、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和5月31日起义），创立了4个重大的共和节日。每个旬末日都用以纪念一种公民的或社会的美德。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和自然神节揭开了新宗教崇拜的序幕。几天前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手持一束鲜花和谷穗，主持了这一庆典。在一片人的海洋中，由达维德布置的五彩缤纷的仪仗队伍在戈塞克和梅于尔创作的雄壮乐曲中从杜伊勒利宫的国家花园行进到马尔斯校场。牧月20日的庆典给参加者和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尧姆-泰尔区职员吉尔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在历史上还能找到这样的日子。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看，这个庆典都极为壮观……每个有感情的人都会对这个日子永世难忘。”

反革命分子马莱·迪庞也承认：“人们确实以为罗伯斯庇尔就要填平大革命的深渊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创立最高主宰崇拜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在1794年春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以及在芽月惨剧之后，花月18日法令试图用同一种信仰和伦理把不同社会阶层调和到一起。这些阶层虽然不久前一直在支持革命政府，现在却被阶级对抗弄得势不两立了。罗伯斯庇尔没有能力分析经济、社会状况，因而相信观念万能，并求助于美德。事实上，最高主宰崇拜产生了（甚至在革命政府中间）一种新的冲突：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拥护者和主张国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能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法令问题上原谅罗伯斯庇尔。

6.国家军队

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它以恐怖树立起权威，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制经济的目的在于供给和装备共和国军队。社会民主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处境，共和道德致力于加强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其宗旨都在于使人民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即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在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把全部心血都注入了军队。

军队的兵员在1794年春超过100万人，分成12支方面军。军队的来源很复杂，有正规军、志愿军，也有征召30万大军和全国总动员时入伍的士兵。按照1793年2月21日颁发、1793年底至1794年初实施的“混编法”和“编队法”，他们被重新整编为团队。军队就这样被“国有化”了。

军官队伍受到清洗和更新。国民公会提出的军官选举制原则在国民自卫军中早已严格实行。但在军队中实行时，年资仍起一定作用。根据1793年2月21日的法令，列兵可以选举下士。他们还可以从在职下级军士中指定3人作为2/3的下级军官候选人。晋升者由同级军官推选。1/3的军官职位按年资分配。将军由政府任命，其中1/3凭资历，2/3靠选派。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曾宣称：“选举各部队军官是士兵的公民权，

选举将军则是全国人民的公民权。”实际上，救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窃取了极广泛的权力，因为它常常授权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然而，下级军官的选举原则一直受到尊重。经过这样的筛选，渐渐产生了一些无与伦比的高级将领，如马尔索、奥什、克莱贝尔、马塞纳、儒尔当等许多人。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大批军事素质好、公民责任心强的坚强干部。为培养新型军事干部，共和二年牧月13日（1794年6月1日）通过了组建“马尔斯军校”的法令，规定每县派6名青年进校，使他们“通过革命教育学习共和国士兵应具备的所有知识和品行。”

军纪得到了整顿。共和二年雾月，圣茹斯特号召莱茵方面军：“你们要遵守纪律，因为它是胜利的保证。”1793年7月27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抢劫者和逃兵处以死刑。实际上，军事法庭对流亡贵族和叛乱者毫不留情，对士兵却比较宽容。特别是，救国委员会善于使军队保持民主特征。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指出：“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取胜利。”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并重的。共和二年的士兵经常出入各俱乐部，阅览爱国报刊。共和二年风月26日（1794年3月16日）的一份资料，统计了陆军部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发往共和国各方面军的报刊，其中第一种便是《迪歇纳老爹报》，其次是夏尔·迪瓦尔的《自由人报》、雅各宾俱乐部机关报《山岳派报》、德罗姆省人朱利安的《反联邦主义者报》。共和二年的法国军队是一支为结束特权、废除封建制度和消灭专制主义而战的革命军队。反革命分子，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贵族，同英国人、普鲁士人或奥地利人一样，都是它的敌人。救国委员会把共和国与自由、平等同化在一起，以此使士兵公民们相信：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

军事指挥权严格隶属于文官政权，军队只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认为，领导战争是文官政权的基本特权。1793年6月24日通过的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鉴于拉法夷特和迪穆里埃的叛变，

救国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将军们服从。居斯蒂纳、乌夏尔和其他一些将军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疏忽或无能被视作缺乏公民责任感的证据。严密注视着军事问题的圣茹斯特在讲演中大肆宣扬这样的信条；“只有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才能称颂将军”，“将军的头衔仍然带有君主制的性质”。在一项著名通令中，救国委员会专门为将军们评述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组织法：“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军人权力最应受到强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驱动的被动手柄……将军抗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甚至在战场上，文官政权也通过国民公会特派员行使着控制权。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终确认了这些特派员不受限制的权力。在1794年战争行动的前夕，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向国民公会提出警告：

“在拥有12支大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担心和提防背叛，还应对军人的势力或某个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的图谋不轨保持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共和国都是因此而灭亡的……军人政府是最坏的政体，比神权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术和战略根据新的政治、社会需要进行了改造。随着物资动员初见成效，混编成师团的共和国部队得到给养和武器装备，并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武器仍然是旧制度军队留下的：有效射程为100米的1777年型步枪、格里博瓦尔式火炮，更主要的是一种能把4斤的炮弹发射到约400米以外的加农炮。然而，1793年10月10日圣茹斯特宣布：“君主制的战术已不再适用于我们……法兰西军队的作战方式应该是一种突击序列。”

新战术是由于部队缺乏训练而被迫采取的。共和二年的法国士兵在战斗时大体先是利用地形成散兵线，然后成密集队形上刺刀冲锋。最后：战斗纵队成为共和国军队的最佳战术编队，较之传统的线性编队更

容易控制和指挥。新战术的统一在1794年基本实现：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合编成一个师，共8 000—9 000人。

由于不得不使用大量预备役士兵，战略也得到革新。旧的围攻战法仍保持了下来，要塞还是作战的支点和基地。卡诺主张集中兵力对一些决定性的据点实施不间歇的轮番进攻。在这种战法中，主要的因素不是军事科学，而是毅力和顽强斗志。共和二年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救国委员会确定了它的宗旨：

“基本的规则是不断地发动集团进攻，在军队中保持严明而不过于烦琐的纪律，使军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但又不致过于疲劳，各要塞中只留下守备部队绝对必需的东西，……处处勇于刺刀见红，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至彻底消灭之。”

牧月8日（1794年5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攻！不停顿地进攻！”最后，在果月4日（1794年8月21日）救国委员会还提出：“像闪电一样震慑敌人！像霹雳一样打击敌人！”与巧妙的战术相比，迅速的运动、顽强的进攻、勇猛的作战更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

在1794年6月间，革命政府的巨大努力结出了硕果，胜利就在眼前。但就在此时，政治危机重新爆发，统治集团陷于了分裂。

Ⅲ.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794年春末，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和巴黎都碰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之间出现分裂，议会中的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日趋恶化的经济危机使得现政权一天也离不开恐怖统治。然而，到手的胜利果实却使得这种恐怖统治更加难以维持和难以忍受。

1.大革命的胜利（1794年5—7月）

救国委员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战争政策。丹东的谈判政策被抛在一边，因为这种政策在国内曾给宽容派带来好处，并削弱过民族的斗志。救国委员会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利用反法联盟各国之间的分歧，或应科西乌斯科的呼吁去支持波兰起义者。但救国委员会很注意维持同中立国的关系。在罗伯斯庇尔作完《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共和二年雾月27日，即1793年11月18日）的报告之后，国民公会宣布尊重中立列强利益，并表示对瑞士各州和美利坚合众国怀有“公正、善意和尊重的感情”。所谓宣传战就此完结。

在诺尔省的国境上，共和国在发动战役前夕部署了3支方面军对抗科布尔从海洋一直排列到那慕尔的部队。皮什格吕所部诺尔方面军15万人将朝伊普勒方向进攻弗朗德勒地区。阿登方面军2.5万人将朝夏尔勒鲁瓦方向进攻。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4万人将朝列日方向进攻。皮什格吕行动不力，没能阻止科布尔占领朗德勒西，但他于共和二年花月29日（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库安击败科布尔，扭转了从埃斯考河到海滨的边境局势。救国委员会把阿登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合编并加强到9万人（由儒尔当统帅，圣茹斯特辅佐之。该军不久被命名为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这支军队被派去进攻夏尔勒鲁瓦，并迫其于获月7日（1794年6月25日）投降。与此同时，在伊普勒，被皮什格吕击败的科布尔也撤退了。科布尔为了保卫后方，于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向占据夏尔勒鲁瓦的儒尔当发动进攻。经过一天激战，科布尔败北。圣茹斯特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纵队不停冲杀，为夺取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不愿向国民公会报告这一点：

“我很希望有人宣传胜利，但我不希望胜利被用来满足虚荣。有人宣传弗勒吕斯大捷，而许多一言未发的人当时参加了战斗。有人大谈这次围攻，而许多默默无言的人当时坚守在战壕里。”

弗勒吕斯战役带来了比利时的解放，儒尔当和皮什格吕在布鲁塞尔

会师。接着，皮什格吕把英荷联军赶向北方，儒尔当把奥地利人赶向东方。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皮什格吕进入安特卫普，儒尔当进入列日。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迪戈米埃夺取了布卢大营（花月12日，即1794年5月1日）后，进入卡塔卢尼亚。与此同时，蒙塞在西边也跨过国境线，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热月7日，即1794年7月25日）。在阿尔卑斯山方面，进入意大利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海上，英国舰队控制着地中海并在保利的同谋下夺取了科西嘉岛。但是，大西洋的共和国舰队还是成功地坚持下来了。牧月9日、10日和13日（1794年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为了保护一支从美洲运小麦的船队，维拉雷-儒瓦耶兹的舰队开出布雷斯特基地，在维桑海面向豪威的英国舰队开战。法国的损失是沉重的（“复仇者”号被击沉），但英国人也不得不撤退。运麦船队得以安全通过。

革命政府以极大的努力消除了内部危机，夺取了胜利，并迫使反法联盟各国媾和。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我们的进军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战胜敌人，不是为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而是为了在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敌兵死亡的时候立即停止打击。”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革命政府却发生了分裂。

2.政治危机：无法达成的和解（**1794**年**7**月）

1794年7月的政治危机表现在多方面。当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政府控制下不断地集中和强化的时候，它在巴黎的社会基础和在国民公会的政治基础都在不断地缩小。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救国委员会中的不和，终于促成危机的爆发。

当人民运动日益背离革命政府时，巴黎和全国都出现了厌倦恐怖统治的舆论。

在胜利的条件下镇压已显得不再必要。因而对恐怖统治的厌倦也变得更加强烈。工商业资产阶级勉强容忍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他们盼望早日恢复1789年革命赐给他们的生产和交换的完全自由。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权受到损害。长期不得实施的风月法令似乎要重新开始实行。为“挑出”嫌疑犯，已成立了一些人民委员会。救国委员会竭力调整恐怖统治。它召回了在外的一些知名的恐怖主义者，并根据牧月22日法令重建司法和镇压方面的中央集权。然而，救国委员会的这一法令未能贯彻。在执行中歪曲了这一法令：它把性质截然不同的案件混合在一起，将被告成批地判决，同时以“监狱阴谋”为由加速镇压机器的运转。由于经济困难和“对断头台的厌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对革命政府的潮流。

人民运动自芽月惨剧后渐渐脱离了革命政府。1794年春天，在对国民公会和各政府委员会表示忠诚的一系列游行活动的假象背后，人们看到，巴黎各区政治生活在无可救药地退化，巴黎无套裤汉对现制度深怀不满。圣茹斯特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这一现象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各区的区民大会被迫循规蹈矩，被无套裤汉视为基本政治权利的市、区行政长官的民主选举被取消了。对埃贝尔主义者的镇压在悄悄地进行着。利用“埃贝尔主义”这个词打击敌视雅各宾中央集权和依恋人民民主制度的区民骨干分子是很方便的。当时，有些区曾出现骚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尽管如此，这些骚乱说明了人民反对派依然存在。马拉区在花月里又展开了对这位人民之友的崇拜活动。但牧月3日（1794年5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下令禁止一切所谓“局部的”节庆。获月底，大多数区都发生了“博爱宴会”运动，这些运动也很快遭到

谴责和禁止。

在社会方面，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使民众消费者感到不满。经过清洗、现由罗伯斯庇尔分子帕扬领导的巴黎市府为商界恢复了名誉。获月9日（1794年6月27日），帕扬质问道："那些针对鱼肉人民的吸血鬼……针对食品杂货商的无休无止的大叫大嚷，究竟有什么益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虽被限定，但政府并不征集这些物品，只满足于供应面包。面包的分配归各市政当局负责。巴黎市府明确宣布，对私人从外地调运食品的活动将不作任何限制，并命令逮捕所有阻碍贸易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黑市的活跃，破坏了限价制度。市府为了满足制造商和手工业者而牺牲无套裤汉、工人和工资劳动者等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同时禁止他们的一切请愿行动。从花月起，新限价法令的颁布和经济统制的放松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突然上涨。各个职业团体都闹起要求增加工资的工潮。巴黎市府根据勒夏普利埃法野蛮地镇压了这些工潮。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颁布的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使这种限制性政策发展到顶峰。这个工资价目表严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强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当大：一个在风月挣5锂工钱的先贤祠工地的石匠，现在只能挣3锂8苏了。恰恰在罗伯斯庇尔派当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众可靠支持的时候，工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

在国民公会中，反对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一些凶狠的恐怖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渎职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乱党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础是那些乘胜利之便要求结束恐怖统治的新宽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当作权宜之计来接受的平原派。人民运动已被制服，无须再担心发生起义。既然如此，国民公会有什么理由继续容忍政府委员会的监护呢？在不愿再受束缚的国民公会和充满强烈敌意的巴黎无套裤汉之间，革命政府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促成了自己的毁灭。

领导镇压工作的对于救国委员会的越权行为，尤其是对它的警察局的活动已忍无可忍。组成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如何马尔、瓦迪耶、武朗等。他们的精神状态接近过激派，希望延长恐怖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有赖于这种统治。这是些无神论者，因而对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对最高主宰崇拜深为不满。除了达维德和勒巴以外，他们出于个人恩怨和原则分歧，都特别仇视罗伯斯庇尔。

救国委员会如果保持团结，它是能够轻易制服这个反对派的。然而这个大委员会逐渐地也发生了分裂。罗伯斯庇尔以自己辉煌的贡献成为革命的法国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但他没有谨慎地避免触怒同事们。他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很少拉关系，对大多数人都保持距离和有所保留，好像他总是在算计，或怀有野心。关于这位不可腐蚀者有“野心”的指控，吉伦特派曾提出过，科尔得利派也提出过，现在又被救国委员会内部的卡诺和比约-瓦雷恩提出来。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在国民公会宣称；

“一切珍惜自由的人都应对那些占据显位者的德行保持警惕。”

除了性情不投和职权冲突（卡诺和圣茹斯特发生过激烈争吵，并曾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批评他的军事计划而恼火）之外，还有社会方针方面的分歧。卡诺和兰代都是归附山岳派的平原派分子，属于保守的资产阶级。他们厌恶社会民主，难以忍受统制经济。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其成员瓦迪耶曾企图丑化最高主宰崇拜）抓住一个自称“上帝之母”的名叫卡特琳娜·泰奥的老太太大做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从获月中旬起即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这种退隐对他的政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两个政府委员会于共和二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

日）举行联席会议，试图和解，但未成功。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意识到，如果不重建和谐的关系，革命政府就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抵御腐化分子和新宽容派的进攻。然而，虽然圣茹斯特和库通赞成和解，罗伯斯庇尔却拒绝这样做。他想断然粉碎由山岳派中的政敌和曾支持自己的平原派所结成的联盟。

3.结局：无法成功的起义

罗伯斯庇尔决定把冲突公诸于国民公会，这实际上是请国民公会评判革命政府的行为。而且，这样做也无异于毫无防备地冒一场巨大风险。因为，当时人民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巴黎无套裤汉对政府不是漠不关心便是心怀敌意。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向他的政敌发起进攻，把恐怖扩大化的责任推到那些伪装成宽容派的凶狠歹毒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但他不愿点出他所指控的议员的名字，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所有自知干过某件错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胁。当晚，正值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博得鼓掌，各委员会都张皇失措、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政敌开始行动了。那些很久以来便计划搞掉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在当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划了阴谋（他们向平原派许诺要结束恐怖统治）。这是一个以恐惧为唯一纽带的暂时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于11时开会。12时，圣茹斯特上台发言。这时，整个事变便迅速地展开。阴谋分子们策划的阻挠议事的手法无情地堵住了圣茹斯特的口，接着又封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口。对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昂里奥和革命法庭庭长迪马的逮捕令获得通过。在可怕的喧嚣声中，一个不出名的议员卢舍提出的对罗伯斯庇尔控告令获得一致通过。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求同他共命运。库通和圣茹斯特也随之被捕。勒巴则要求得到加入被捕者行列的光荣。罗伯斯庇尔高呼：“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旁听席上的目击者纷纷离开国民公

会，把这一可怕的消息带到各区。这时还不到下午2点钟。

巴黎市府试图发动起义，但组织工作和领导都很糟糕。3点钟之前就得到消息的市长弗勒里奥-莱斯科和国家专员帕扬，要求市府总委员会委员回到各区擂鼓集合，敲响警钟。6点钟左右，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到报警，各区都警觉起来。但48个区里只有16个区向市府的沙滩广场派遣了国民自卫军支队。芽月以来镇压各区骨干分子的后果由此表现出来。然而无套裤汉的先锋——国民自卫军炮兵连的革命积极性比步兵营要高。到傍晚6点钟，起义当局掌握了驻扎在首都的30来个炮兵连中的17个，以及32门火炮，而当时国民公会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在几个小时里，巴黎市府掌握着炮兵力量的绝对优势。只要它能有一个统帅这支力量的军官，这种优势便是一张决定性的王牌。市府派人救出了那些被宣布逮捕的议员。随后，大家来到市府商讨对策。然而国民公会很快恢复了镇静，并通过决议，宣布那些反叛的议员不受法律保护。受命纠集一支军队，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纷纷归顺。聚集在市府前的国民自卫军和炮兵既无军令也无给养。关于那些议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风声很快传开。沙滩广场上的人渐渐走散。翌日凌晨2点左右，进军市政厅，并以突袭方式占领之。巴黎市府不经战斗就被打垮了。

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晚，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和他们的19名拥护者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集体处死了。在大革命中，这是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

就这次起义尝试本身来说，失败的责任应归咎于巴黎市府的领导人和不善于行动的罗伯斯庇尔派。尽管统治机器大为加强、各区政府纷纷变节，尽管各革命委员会长期来只得俯首帖耳，但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无套裤汉赶到市政府。这一行动之所以未能奏效，其责任全在于罗伯斯庇尔派。他们坐以待毙，没有走进沙滩广场领导起义战士。从更高的角度看，这场革命运动的所有矛盾，以及无套裤汉本身的矛盾早已预示着热

月9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信徒，但在科学和经济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他厌恶爱尔维修一类哲学家的唯物主义。他关于社会和世界的唯灵论观点致使他在1794年春天的各种矛盾前束手无策。虽然他尚能从理论上为革命政府和恐怖统治辩护，但不能精确地分析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毫无疑问，不能低估保持社会势力均衡的意义，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制度中的主导作用。不过，同圣茹斯特一样，罗伯斯庇尔终究没能摆脱自身各种矛盾的束缚。他们过于重视资产阶级利益，以致不能同无套裤汉完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关注无套裤汉的需要，以致不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好感。

革命政府建立在一个由各种相互矛盾的成分组成的社会基础上，因而它缺乏某种阶级意识。罗伯斯庇尔派的靠山——雅各宾俱乐部并不能成为革命政府必要的支柱，因为雅各宾派不构成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有效政治工具和阶级政党。共和二年的制度建立在社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唯灵论观念之上，由此引出的后果对革命政府是致命的。

在政治方面，比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更严重的，是存在于山岳派资产阶级和巴黎无套裤汉之间、各区活动分子和革命政府之间的根本矛盾。在战争条件下需要一个专制政府，无套裤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为创立这种政府作出过贡献。但战争及其各种需要同民主政治产生了矛盾。尽管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共同主张民主政治，但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却各有所见。无套裤汉实行的民主政治自发地倾向于人民直接管理；而革命政府则认为这种做法不宜用以领导战争。对当选者实行监督、人民有权撤回授权、通过唱名或通过欢呼来表决——所有这些要求均表明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满足于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政治态度同资产阶级所设想的自由民主政治尖锐对立。无套裤汉曾经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粉碎贵族阶级。但他们对于革命政府强迫他们循规蹈矩、俯

首帖耳是不能原谅的。

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相互关系问题还表现在另一方面。1793年春夏季，人民运动取得胜利后，无套裤汉骨干分子却陷于瓦解。尽管不是怀有野心，巴黎各区的许多活动分子却都认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应该以得到职位作为报偿。革命政府的效率也得靠这种代价来保证。1793年秋，各行政机构都受到清洗，换上了真正的无套裤汉。于是，出现了一个效法巴黎各区选派革命特派员的新潮流。这些特派员来自无套裤汉中最孚众望和最积极的分子。他们起初构成革命官员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成就本身都要求付给他们工资。故而，这些活动分子在共和二年里转变为革命政府的公职人员。出于对既得利益的顾虑，他们变得柔顺多了。人民运动中最有觉悟的分子进入国家机关以巩固革命政权，这是国内和边境阶级斗争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现象。但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结果：人民运动衰弱了，它和政府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由于国防的进一步需要，区民组织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各区内部的民主也被削弱了，官僚化渐渐使群众的批判精神和政治斗争性变得麻木。最后，人民对不断强化专制的政府机关也放松了监督。由此，在革命政府和创立了这一政府的人民运动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罗伯斯庇尔派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曾救助弱者。圣茹斯特说“大革命冻结了”，但他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同样是不可克服的。作为自由经济的信徒，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们（首先是罗伯斯庇尔）接受了统制经济，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支持这场大规模民族战争不能没有限价和征调措施。然而无套裤汉在强迫实行最高限价的时候，却对自己的生计问题考虑得更多。大革命尽管具有民主性质，但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政府为保持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平衡，不能不在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也限定工资的价格。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然而，由于该政策取消了经济自由，限制了利润，它也就触犯了资产阶级（即

使是激进民主派资产阶级）。最高限价法只是在国家支付军工产品和对农民征集粮草等方面得以贯彻，在其他方面都遇到工商业主的违抗。无套裤汉关注的主要是价格和工资的关系，他们想借机增加工资。救国委员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结构的社会中出面解决危机，它的仲裁对有产者和制造商比对工资劳动者更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热月5日的巴黎工资最高限价法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由于缺乏阶级基础，共和二年的统制经济自然难以稳固。

被自身矛盾削弱了的革命政府随着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遇害而垮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人希望建立的那种民主平等共和国也宣告破产。但是，人民运动还要同在反动道路上愈走愈远的热月资产阶级打一场为时10个月的、顽强而绝望的后卫战。斗争是悲剧性的。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大革命的动力彻底枯竭了。

---

[1] 嘉布谴会系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嘉布谴是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因会服附有尖顶风帽而得名，1528年由意大利人玛窦·巴西（mattéo da Bassi，1495—1552年）创立于意大利。该会主张恢复方济各的原来精神和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

[2] Tacitus（55—120年），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罗马史》、《罗马编年史》等历史名著。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赖其著述而得以流传后世。在政治上他倾向于贵族共和制，反对帝制。——译者

[3] 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石桥，建于1517—1606年。——译者

[4] 1驿里=3.898公里。——译者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罗伯斯庇尔既倒，革命政府也没能维持下去。反动势力迅速加强了。除政治斗争的复杂激烈之外，社会方面的反动使热月派统治时期更为引人注目。共和二年制度的社会内容具有人民性，它主要表现为风月法令和国家救济等措施。在政治方面，它允许人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由此打破了制宪议会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的财富特权与政治垄断。

无疑，人民运动和强行建立革命政府的巴黎无套裤汉从共和二年芽月起开始退却。当时，救国委员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人民性已经减弱。从这个角度看，热月9日事变并非一种断裂，而是渐进过程的加速。从共和二年热月到翌年春天，反动一直在发展，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绅士们和无套裤汉在相互对峙着。这是决定性的时期：在这一年里，一部分人希望发生一场能最后保证大革命前途的人民大起义，另一部分人则为此而担忧。巴黎人民自1789年以来还没有被击败过。

共和三年牧月的失败标志着大革命中巴黎无套裤汉政治作用的结束和人民运动的最终覆灭。大革命重新走上资产阶级轨道。

Ⅰ.热月反动的发展

热月党统治时期充满复杂的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斗争的实质：“绅士们”（不久后，他们被称为“显贵”）想把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店主、伙计，即曾把自己的法律强加于他们的无套裤汉，从政治生活中驱逐出去。同1793年人民运动高潮期间一样，山岳派中的少数人同日益壮大的反动多数派之间展开了议会斗争。这种斗争与基层更广泛的冲突结合在一起。反动派和共和二年的革命派到处在互相搏斗。但是，由于迷失方向、陷入混乱和失去了骨干，人民运动——这个在1793年曾促进过大革命的因素，现在只是一种抵抗的力量了，它只能且战且退。

1.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终结（**1794**年夏）

摆脱了罗伯斯庇尔派的救国委员会曾经想维持政府的体制。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在国民公会宣布，热月9日的事件只是一个“不伤害政府完整性的局部震荡”，“经过正本清源的政权提供了更强大的生命力，各政府委员会得到了进一步清洗，革命政府的力量由此将百倍加强”。同时，巴雷尔还抨击“某些谈论宽容的乔装贵族”：“宽容！宽容只能对那些无意的过错而言，而贵族们的阴谋属于重罪，他们的过错就是罪行。”

事实上，共和二年的政府体制已失去它的基本特征，即失去稳定性和集权性，并随着恐怖统治的废除失去了它的“强制力”。因而，它几个星期就解体了。

政府的稳定性从共和二年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遭到破坏。这一天，国民公会根据塔利安的建议作出决定：今后各政府委员会每月应更换1/4成员，换下来的成员一个月后才有重新当选的资格。救国委员会中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和让邦·圣安德烈立刻被排除，并被塔利安和丹东派分子蒂里奥所取代。这一现象意味深长。不久，这个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的老成员只剩下卡诺一人。中的达维德、雅戈、拉维孔特里等著名罗伯斯庇尔派分子也被开除，换上了勒让德尔和梅兰（蒂翁维尔人）一类人物。即使有些国民公会议员在政府中仍拥有影响，领导集团的稳定性却不复存在了。

共和二年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法令既出，集权统治便告完结。在此之前，救国委员会的优势地位一直保证着政府的统一。这种优势地位从热月11日起便受到掌管财政委员会和控制国库（在共和二年中，唯有该部门没受到大委员会的控制）的康邦的攻击。巴雷尔于13日作出反击，说有人想就此建立“道德的联邦主义”。国民公会一度踌躇不定，但终于通过了符合康邦动议的果月7日法令。由此建立起16个委员会，其中12个主要的委员会各统管一个执行部门。救国委员会的职权被

削减到仅限于战争和外交方面。还保持着治安权和监视权。立法委员会的重要性大增：内政管理和法庭事务均属于它的权限。集权统治结束了，政权主要被政府的3个委员会所瓜分。

与此同时，恐怖统治也被废止了，革命政府的“强制力”随着它的其他动力一起消失了。牧月22日法令于热月14日（1794年8月1日）被撤销。富基埃-坦维尔锒铛下狱后，革命法庭便不再起作用。热月23日（1794年8月10日），根据梅兰（杜埃人）提出的报告，革命法庭受到改组。后来进行的一些“动机审讯”，使所有被告，即使是罪证确凿的，都获得开释，借口是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反革命动机的驱使。热月9日后，各革命委员会受到猖狂的围剿。果月7日（1794年8月24日），这些革命委员会终被取消，代之而起的是大城市中的区监督委员会和外省的县监督委员会。巴黎的48个老区被重新组合成12个新区。新建立的监督委员会作为公民委员会，成了独立于区民大会（该大会从果月4日，即1794年8月21日起被限定每10天召开1次）的政府机关。监狱敞开了大门，嫌疑犯纷纷获释。从热月18日到23日（1794年8月5—10日），仅在巴黎就有近500名嫌疑犯陆续出狱。恐怖统治就此告终。

2.温和派、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1794**年**8—10**月）

尽管原恐怖主义者竭力抗争，政治反动仍迅速表现出来。果月9日（1794年8月26日），梅埃（拉图什人）发表了措词激烈的小册子《罗伯斯庇尔的尾巴》，对恐怖主义者进行谴责。果月12日（8月29日），勒库安特尔攻击巴雷尔、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参与了暴政。3人遂提出辞职，退出救国委员会。共和二年的统治集团在一个月间被清除了。

在国民公会，山岳派丧失了全部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山脊派”了。这个“山脊派”的队伍还在不断缩小，分化出许许多多的变节分子。占多数的中间派——平原派，则由于那些改悔的恐怖主义者和山岳

派分裂分子的归附而加强了力量，并取得优势。康巴塞雷斯和梅兰（杜埃人）成为平原派的重要首领。该派别的社会倾向是很明确的。他们反对统制经济，也反对社会民主。他们属于资产阶级，希望恢复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重建社会等级制，使人民重新处于从属地位。果月27日（1794年9月13日），山脊派分子法约提议，采取新的、有利于“非有产者共和派或小土地所有者”的方式出售国有财产。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当即予以反驳：“在一个由2 400万人组成的共和国里，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自耕农是不可能的，让大多数国民成为有产者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所有人都去耕种土地或葡萄园，商业、工艺和工业很快就会毁灭殆尽。”

热月党抛弃了人民大众建立独立小生产者国家的理想。然而，跟大革命血肉相连的平原派分子仍打算保卫共和国。共和三年雾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他们以法典的形式把对流亡贵族的刑罚保持了下来。他们的政策是团结所有1789年的爱国者以堵塞反革命的道路，巩固现行制度。但是，正如1793年的情形一样，国民公会仍不能自主，它只能屈从外部的压力。

在巴黎，从共和二年热月到共和三年雾月（1794年8—10月），3种政治派别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相互对峙，形成了一种三角冲突。温和派想按1791年的方式恢复绅士们（即富裕的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新埃贝尔派”聚集在选举俱乐部里，掌握着博物馆区，它代表敌视革命政府的各民众派别。它要求在巴黎重建由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实施1793年的民主宪法。雅各宾派则仍旧主张保持战时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共和二年的镇压手段。

选举俱乐部运动分裂了人民的力量，孤立了雅各宾派，从而使反动势力得以发展。“新埃贝尔派”仅仅出于反恐怖主义和反罗伯斯庇尔的狂热便与温和派联合起来，由此促成一场新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后果将使他们痛惜不已。选举俱乐部成立于热月9日之后。在原“埃贝尔派”分子

勒格雷和原忿激派分子瓦尔莱的鼓动下，掀起了一场反对共和二年体制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巴贝夫《出版自由报》的支持。巴贝夫没有看到这些政治斗争所反映的社会冲突，他于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写道：“热月10日标志着我们恢复自由的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在共和三年葡月1日（1794年9月22日）出版的该报上，巴贝夫提出法国只存在两个派别；“一派主张保持罗伯斯庇尔政府；另一派则主张重建以永恒人权为唯一基础的政府。”

虽然巴贝夫、选举俱乐部和温和反动派之间不曾串通过（如乔治·勒费弗尔所说），但巴贝夫和选举俱乐部的行动促成了温和反动派的得势，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巴贝夫在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曾承认过这一点。

从热月11日（1794年7月29日）起，雅各宾俱乐部在勒让德尔的倡导下重新开放，由此开始了雅各宾派的抵抗运动。果月17日（1794年9月3日），根据卡里耶的要求，弗雷隆、勒库安特尔、塔利安等变节的恐怖主义者被开除出俱乐部。在奥杜安的《宇宙报》以及夏斯勒和勒布瓦的《人民之友报》的支持下，雅各宾派要求恢复恐怖制度，“把敢于自我暴露的贵族消灭掉”。果月19日（1794年9月5日），该俱乐部采纳了第戎雅各宾派的请愿，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纲领。其内容包括实行惩治嫌疑犯法，重新审议关于“动机审讯”的法令，开除一切贵族和教士的公职和限制出版自由。第戎雅各宾派的请愿书在巴黎得到8个区的拥护，一场真正的雅各宾运动在果月形成了。这场运动在共和二年第5无套裤汉日（9月21日）移送马拉遗骸入祀先贤祠的过程中达到最高潮。第4无套裤汉日（9月20日）那一天，兰代曾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一项妥协计划。他在报告中允诺保护原恐怖主义者，但拒绝展开革命的镇压运动，并谴责了那些梦想实现“财富转移”的人。他还提议恢复商业活动自由。这一报告在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受到巴黎10来个区大部分雅各宾派的猛烈抨击。雅各宾派鼓动的这种区民骚动使被反动激流

裹挟而去的大部分国民公会议员感到不安。然而，“新埃贝尔派”和雅各宾派这两个都在寻求人民支持的派别竟在相互对抗中同归于尽：胜利落到了温和派手里。

温和派的进攻使所有从右边反对共和二年体制、特别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保守的资产阶级、君主派、立宪派及各种多少被认为是旧制度拥护者的人）结成一个奇怪的联盟。他们的纲领是向恐怖主义者复仇、制服无套裤汉、阻止恢复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因而是完全消极的。他们拥有两大行动手段：一个是报刊；另一个更为重要，即“金色青年”团伙。

反动报刊现在占据上风，因为它们拥有富足的资助，而所有雅各宾派的报纸都失去了政府津贴。根据《法兰西共和国报》主编小拉克勒泰尔的建议，右派报人们为共同制定反革命策略组成了1个委员会。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是“让国民公会在经历过难以忍受的两年无政府时期之后返回正路”。他们当中有《政治通讯报》的迪索、《辩论报》的贝尔坦兄弟、《晚间信使报》的朗格卢瓦。弗雷隆的《人民演说家报》于果月25日（1794年9月11日）复刊，塔利安则于共和三年雾月1日（1794年10月22日）开始发行《公民之友报》。此外，还出现了许多指责雅各宾派的小册子，例如果月末出版的《剥去画皮的雅各宾派》和葡月里出版的《不受法律保护的雅各宾派》。这些报刊的攻击手段一般都是辱骂、诬告、诽谤和对所谓“嗜血者”、“无政府主义者”、“专横者”的讹诈。对康邦的攻击（说他是“专杀食利者的刽子手”、“财产领域中的罗伯斯庇尔”），或对在共和二年负责经济事务的兰代的攻击则反映了这类报刊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那些“绅士”，即金钱显贵，绝不肯宽恕他们。

青年团伙在果月末成为反动势力的主要进攻手段。这些团伙由一些叛变的恐怖主义者，如弗雷隆（人们称那些团伙为“弗雷隆的金色青

年”）、塔利安和梅兰（蒂翁维尔人）等人从资产阶级青年中招募而来。他们中有法院书记人员、银行职员和商店伙计。一些留在后方的军人、不按时应征入伍者和逃兵也加入了这一团伙，使之壮大了势力。

他们中一个名叫迪瓦尔的人曾在他的《热月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都是，或几乎都是不服从征召的人。有人说，我们在巴黎街头服役比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服役对国家更有用处。”

青年团伙的成员以其垂在两颊的发辫和衣服上的方领为标志。他们手持木棍，集合时喊着“打倒雅各宾派！国民公会万岁！”的口号，或高唱《人民觉醒歌》（其副歌歌词是“他们逃不出我们的手心！”）。果月末，这帮被反对者称为“花花公子”的青年人在平等宫（那里的夏特勒咖啡馆是他们的总部）向雅各宾派或被认为是雅各宾派的人发动进攻，由此挑起了最初的武斗事件。在和经过清洗的各区监视委员会的同谋下，“金色青年”很快耀武扬威起来。更为阴险的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着捍卫国民代议制的旗号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反动派不久便开始向议会中犹豫不定的多数派发号施令，迫使他们在反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对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摈弃（1794年10月—1795年3月）

在共和三年雾月，雅各宾俱乐部被解散了，选举俱乐部也停止了聚会，巴黎各区落到了反动势力手里。这一转变在热月时期的政治演变中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雅各宾俱乐部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在最后几周里缺乏人民的支持。勒瓦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从人民“辞别”之后，雅各宾俱乐部就只是“一根无力的杠杆”了。共和三年葡月25日（1794年10月16日），国民公会下令禁止各俱乐部相互串联和集体请愿，从而使雅各宾派的组织陷于瘫痪状态。雾月间，变节的人愈来愈多，“金色青年”的进攻也更加猖狂。雾月19日（1794年11月9日），“金色青年”对雅各宾

俱乐部发动了第一次讨伐。两天以后，卡里耶案件为他们提供了决战的时机。卡里耶曾于前一年冬天向巴黎解送来132名南特人。这些人被革命法庭开释之后，卡里耶受到了追究。雾月21日（1794年11月11日），罗姆在国民公会提出对他进行起诉，但态度并不坚决。为了向议会施加压力，弗雷隆号令他的“金色青年”团伙：“让我们到兽穴去突袭猛兽！”当晚，他带着他们扑到奥诺雷街，直捣雅各宾俱乐部。两派间发生了武斗，后由军队恢复了秩序。于是，各政府委员会决定关闭雅各宾俱乐部，国民公会于第二天确认了这一决定。

选举俱乐部的末日不久也到来了。在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后，选举俱乐部一度团结了所有人民反对派，因为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发展使左翼反对派敌视雅各宾的情绪大为收敛。但是，选举俱乐部从博物馆区聚会厅被赶出之后，遂于共和三年霜月初（1794年11月底）销声匿迹了。

雅各宾俱乐部和选举俱乐部这两个人民抵抗运动的中心被消灭后，对巴黎各区的征服便容易多了。从葡月底起，“金色青年”开始介入各区大会。“金色青年”的一个头头——朱利昂，成了杜伊勒利宫区的领导人。雅各宾派控制的各区渐渐都被夺走。梭镖区（原罗伯斯庇尔所在的区）似乎一直坚持到霜月10日（1794年11月30日）。一旦各区的活动分子被消灭，能够抵抗温和资产阶级和反抗反动势力的人民力量便全部清除了。搞垮了雅各宾派的名种机构之后，反动势力的矛头开始指向个人，白色恐怖日渐迫近。

在1794—1795年冬季，即共和三年霜月至风月期间，反恐怖主义和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潜在的白色恐怖。这一运动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清洗（因为恐怖主义者的骨干分子在热月9日政变的第二天就被撤职了），复仇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镇压对象首先是知名的恐怖主义者，而后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前区级政府人员都受到株连。镇压还带有某种社会色彩：它通过打击原各区活动分子来摧毁整个

共和主义价值体系。雅各宾俱乐部被取缔后，巴贝夫在共和三年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谴责了这种摈弃激进共和主义及其所有标志的倒行逆施。

卡里耶受审后，开始了反恐怖主义运动。卡里耶于霜月3日（1794年11月23日）受到革命法庭传讯，26日（12月16日）被送上断头台。他曾拒绝承担南特溺杀事件的责任，但承担了依据惩治武装叛乱法而进行枪杀的责任。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75名曾抗议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的吉伦特派议员于霜月18日（1794年12月8日）被召回国民公会。当年，多亏了罗伯斯庇尔他们才免上断头台。这些议员，加上同时被召回的几名辞职或被开除的议员，共78人（其中有多努一类的温和派、朗热内一类的反动派，甚至有萨拉丹一类倾向于王权主义的人），加强了右派势力。对原两委员会成员的攻击日益增多，于是国民公会于雪月7日作出让步，建立了一个审查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案件的委员会。康巴塞雷斯曾提议赦免他们，但白费唇舌。在此案悬而未决之际，为了摧毁国民公会温和派议员的抵抗，“金色青年”团伙进一步增强了压力。

与此同时，在巴黎各区发生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48个区中至少有37个区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以审查原区级人员的品行。11个区中有200名活动分子受到起诉（其中有152名革命特派员）。这些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遭到“公众的蔑视”，成为名副其实的贱民。政府即使没有支持这场运动，也是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霜月13日（1794年12月3日）法令反映出政府的这种放任态度：该法令要求交出共和二年特别收入（强制性公债、自愿捐款）的管理权。各区反动分子指控无套裤汉的主要内容反映了非无套裤汉化运动的社会性质，说明共和二年的经济、社会制度刺伤了资产阶级的感情。旧日的反囤积专员尤其成为众矢之的。物资征集、强制性公债、对囤积货物的没收，统统成了有损于财产权的罪行。“嗜血者”也被称为“平均主义者”，因为他们鼓吹过“分割财产”。共

和二年，资产阶级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受到损害。非无套裤汉化运动则是它反攻倒算的表现。

反恐怖主义的狂热情绪在共和三年冬季持续高涨。雨月11日（1795年1月30日），唐普尔区在国民公会控告该区原革命委员会，并请求国民公会“打击这些残暴的家伙”。风月11日（1795年3月1日），蒙特勒伊区的代表又在国民公会叫嚷：

“你们还等待什么？为什么不把这些吃人肉的家伙从地球上消灭掉？他们那苍白的脸色和塌陷的眼睛难道不足以说明他们是谁养大的吗？下令逮捕他们吧！……法律的利剑应当禁止他们呼吸空气。空气被他们污染得太久了。”

这时，花花公子们正在街上追打他们的政敌，进行所谓的“公民散步”（《晚间信使报》语）。他们洗劫被认为是雅各宾派的咖啡馆，并在雨月发动了剧院战，强迫雅各宾派演员当众认错，禁止唱《马赛曲》，要求唱《反对恐怖主义者的人民觉醒歌》。接着又展开了对马拉胸像的围剿。鉴于无套裤汉的抗议和武斗事件增多，各委员会作出让步：雨月21日（1795年2月9日），国民公会议会厅中勒佩勒蒂埃、马拉等自由殉道者的胸像，以及达维德表现他们遇难情景的绘画，在聚集在旁听席上的“金色青年”的掌声中被搬走。马拉的遗骸，以及为祖国牺牲的小英雄巴拉和维阿拉的遗骸，也被迁出先贤祠。杀人的呼声此伏彼起。风月4日（1795年2月22日），罗韦尔在谈到原恐怖主义者时声称：“如果你们不惩罚这些人，那么凡是法国人都有权杀死他们。”第二天（1795年2月23日），梅兰（杜埃人）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所有热月10日以来被撤职的公职人员必须回到他们以前所定居的市镇，以便在那里接受市政府的监督。在某些地区，这等于让他们去送死。风月12日（1795年3月2日），国民公会终于退让了，决定立即逮捕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议会从此成了“金色青

年”团伙的俘虏。“金色青年”的队伍则由于加入了日益增多的不服从征召入伍者、战场逃兵和急切要求收回被查抄财产的归国流亡者而变得更加强大。

在外省，白色恐怖早已开始。共和三年雨月14日（1795年2月2日），在里昂发生了第一起屠杀被拘押的原恐怖主义者的事件。从雪月起，整个东南部都开始发生对个人的谋杀。接着出现了一些帮会，如耶稣会，耶宇[1]会或太阳会，专门迫害恐怖主义者、雅各宾派，和所有“1789年的爱国者”，尤其是国有财产获得者。国民公会特派员，如驻马赛的尚邦或驻瓦尔省的吉伦特派伊斯纳尔，他们即使没有鼓励，也是对此持放任态度。屠杀事件愈来愈多。在里昂，每天都有雅各宾派（当地人称之为“马特冯派”）遭到暗杀。在尼姆，一批囚犯在风月5日（1795年2月23日）被人杀害。被政府击败，且遭到一些议员谴责的雅各宾派失去了任何抵抗能力。

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没有干预这些屠杀事件。当时，苦于通货膨胀、饥寒交迫的人民正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暴动情绪，国民公会十分担心巴黎无套裤汉发动反攻，因此对过度的反动和白色恐怖不得不持容忍态度。

4.旧富人与新富人，时髦女郎与浪荡公子

伴随政治和社会的反动而来的是道德的反动。人民在共和二年被视为天生具有共和美德而备受赞美，现在却到处遭到白眼。“金色青年”的头目朱利昂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当人民群众“用个人的美德给自己带来光荣时，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但他们不应插手公共事务，否则他们的“简朴”就会变成粗鲁。“激进共和主义”在牧月足以构成被逮捕的理由。在共和二年受到谴责的奢侈风气现在被恢复了名誉。在一度受到压抑的有产阶级中，共和主义严肃刻苦的精神已被荒淫放荡所取代。霜月2日（1794年11月22日），“享乐的资产阶级的喉舌”——《晚间信使

报》写道："被恐怖驱走的优雅与欢笑现在又回到巴黎了。我们戴金色假发的漂亮妇女多可爱！无论是公共的音乐会还是社团界的音乐会都是那么美妙！……那帮嗜血者、比约、科洛之流和那帮疯子竟把这种观念的转变称作反革命。"

风行一时的无套裤汉装束——长裤、工作服，尤其是平直的头发和小红帽，现在已不流行。年轻的有产者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康邦谴责这种风气说："最近有人穿着破衣装扮无套裤汉，他们的穿戴和语言都是荒诞不经的。"

跳舞之风大盛。到处（甚至在发生过9月屠杀的卡尔默狱和过去的圣絮尔皮斯墓地）都在举行公共舞会。有一种"牺牲者舞会"，只有那些家中有人死于断头台的人才能参加。参加者梳着蒂图斯式的发型[2]，把脖子后的头发剪短（就像刽子手给即将上断头台的人剪的一样），颈部系着一圈红丝线。"你"的称呼被废除，"先生"、"太太"之类的称呼又出现，取代了"男公民"和"女公民"。

沙龙里的社交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成为塔利安夫人的卡巴吕斯被她的仰慕者奉为"热月圣母"。她住在库尔拉雷纳的"茅屋"别墅里，俨然成为"时髦女郎"们的楷模。她穿的那种希腊式的半透明短连衣裙风行一时。阿姆兰夫人、雷卡米埃夫人很快也名噪一时。当贵族、大资产阶级以及后来归国的流亡者恢复旧制度社交传统的时候，一度受恐怖统治压制的金融家、银行家、军火商、投机商占据了社会的首要地位。由此，旧统治阶级和那些在指券、国有财产和军需供应品投机中发财致富的人相互融合，开始形成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极为混杂的群体，走红的女演员（如拉孔塔）在其中起的作用甚大。许多厌倦道德的国民公会议员不是被人收买，便是随波逐流。蒂博多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这样，共和派中出现了不少变节分子。其中有些是向王权主义让步，有些则纯粹是卖身投靠。"

时髦女郎和浪荡公子，这些为数很少的富人和二流子厚颜无耻的骄奢淫逸和怪诞风气激怒了坚持传统风尚的广大民众，也引起少数仍然忠于共和理想的政治家的不满。人民群众的极端贫困和少数人的奢侈腐化形成鲜明对照，突出表明了这场反动的社会性质。进入冬季后，饥荒日益严重，贫富更加悬殊，人民的愤怒情绪更趋强烈。

5.宗教的反动和对旺代叛乱者的大赦

宗教的反动也促进了反革命潮流的发展。

共和二年第2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法令实际上确立了政教分离。这一天，康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促使国民公会废除了有关宪政派教士的财政预算。由此，《教士法》被含蓄地废除，国家也完全世俗化了。惩治反抗派教士的措施仍然有效，教堂照旧关闭着。但随着反动的加强，许多法国人怀念往日的宗教仪式，教徒们终于提出了开放教堂的要求。过于理智化的公民崇拜现在已经失去任何爱国民主特征，再也不能激起无套裤汉的热情了。

宪政派教士渐渐恢复了宗教活动。雪月1日（1794年12月21日），卢瓦尔-歇尔省主教格雷古瓦要求完全的信仰自由。然而反抗派教士（在诺尔省绰号叫作“手提箱神甫”）只能秘密地做“瞎弥撒”。

共和三年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根据拉若内的绥靖协议，旺代叛乱者获得了信仰自由。自此，信仰自由再不会遇到障碍了。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根据布瓦西·当格拉的报告，国民公会准许教士和教徒在他们自己的建筑物里做礼拜。政教分离得到进一步确认，各教堂被用来每旬做一次礼拜。礼拜仍然是个人的事，任何教士，只要向自由平等宣过誓（至少按1792年8月14日的誓词，俗称“小宣誓”），都可以做礼拜。但敲钟、穿教士服和接受公众津贴仍然被严格禁止。宪政派教士的宗教活动立刻在格雷古瓦（他出版过《宗教年鉴》）的指导下重新开展起来。参加过“小宣誓”的天主教教士出版了《宗教、政治和文

学年鉴》。反抗派教士的秘密礼拜愈闹愈凶，同宪政派教士发生了许多冲突。1795年3月17日，马莱·迪庞写道："国民公会重新造就了天主教徒，也就重新造就了王党分子……没有一个教士不向教徒表达他依恋王政的意识。"

天主教徒们仍然不满意。为了平息这种不满，国民公会准备作最后的让步。因为，因经济危机而发展壮大的人民反对派此时已经同国民公会发生了冲突。

对西部叛乱者的让步是本着同样的政策路线作出的。热月9日，夏雷特还占着马莱，萨皮诺控制着博卡日，斯托夫莱仍据守莫热。但是，在一些机动部队的不断打击下，他们的兵马损失惨重。然而，除了旺代叛乱之外，在布列塔尼和博卡日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朱安党掠夺事件。热月党既然已经放弃了恐怖政策和镇压行动，便打算用调和政策来平息西部叛乱。果月29日（1794年9月15日），奥什在接受指挥权时强调指出：恐怖统治已经结束。俘虏被释放，逃避服兵役者也得到了赦免。根据共和三年霜月12日（1794年12月2日）的规定，凡在1个月内归顺的叛乱者都可以得到赦免。1795年1月间，同王党首领的谈判开始了。叛乱者受到鼓舞，一边继续进行暗杀和抢劫活动（议员布尔索雨月4日，即1795年1月23日写道："我们在进行绵羊对老虎的战争"），一边强硬地提出条件。

绥靖协议在南特附近的拉若内和夏雷特经个别商订后，于雨月29日（1795年2月17日）签字。绥靖协议规定大赦叛乱者，归还其财产（若已被拍卖则给予赔偿，即使这些财产属于流亡者），旺代人免服兵役且仍可携带武器。最后，还给予旺代人（甚至给予反抗派教士）宗教信仰自由。花月1日（1795年4月20日）在雷恩附近的拉普雷瓦莱签订的绥靖协议也规定了类似有利于朱安党人的条件。

热月党的投降毫无成效，安抚政策只是虚幻的空想。旺代叛乱者和

朱安党人可以不慌不忙地准备重启战端了。不久，朱安党叛乱就蔓延到一些新的省份。虚弱无力的热月党人束手无策。经济危机使人民运动重新高涨，这一现实迫使所有反动分子结成联盟。

Ⅱ.经济危机与货币崩溃

放弃统制经济也是热月党反动政治路线的一部分。当年国民公会迫于人民的压力而接受了最高限价，但整个资产阶级都认为这一政策与他们的利益格格不入。革命政府的解体和恐怖统治的完结必然导致对经济控制的放松以至废除，再不能对主张自由利润和自由经济的工商业者施以“强制力”了。但废除经济限制必然会引起指券崩溃、加剧通货膨胀，其结果势必使人民陷入贫困。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热月反动的社会性质。

1.恢复经济自由（1794年8—12月）

1793年9月29日颁布的关于生活必需品的普遍限价法，除了对谷物外，并未严格实行。救国委员会把对其他食物的限价抛到一边，然而也不许公开违犯它。黑市贸易已经出现，但只要还在实施恐怖统治，物价的上涨就只能是有限的。热月政变发生后，尽管国民公会在共和二年果月21日（1794年9月7日）把1793年9月11日的谷物和面粉限价法和29日的普遍限价法的有效期延长到共和三年末，但由于放松了镇压，物价还是飞涨起来。黑市盛行无忌。所有交易渐渐地都自由化了。共和三年葡月20日（1794年10月11日），一份警方报告证实：“市场上已无人遵守限价法，一切交易都在议价进行。”

1793年9月11日，为保证市场粮食供应曾规定由各县实行征集。现在，这一制度已经废弛。农民由于不再担心被看成嫌疑犯，很不情愿交出粮食，开始秘密出售。农民还在国民公会中找到了保护人。雾月19日（1794年11月9日）法令，对他们作了一些让步，主要表现为：对拒交征集品的惩罚仅限于没收原征集定额的物资。农民反抗的加强，使城市

的粮食供应日趋困难。既然革命政府已经解体，恐怖统治已被抛弃，就不可能再实行征调和维持限价了。

一部分重要经济部门（如军火工场、国内运输、对外贸易等）的国有化同样遇到很大困难，因为这种国有化只能在普遍限价的条件下发挥效能。在兰代的杰出领导下，这一体制在热月后仍继续运行了一个时期。兰代虽于葡月15日（1794年10月6日）离开了救国委员会，但又作了商业、农业和工艺委员会的主席。

军火工场的国有化激起了许多人的强烈反对。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对于国家管制、限价标准、尤其对于国家工场夺走他们的活计难以忍受。救国委员会把一些工场还给私营企业，作为最初的让步：图卢兹铸造厂和莫伯日铸造厂分别在果月和霜月里转为私营。更重要的是，它还逐步废除了巴黎的大兵器工场——先使之处于整修状态，然后把它担心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工人疏散到外省各工场。到了雨月间，该工场只剩下1000名计件工了。

外贸国有化损害了船主、批发商、金融家的利益。对他们来说，海外贸易和金融投机是利润的主要泉源。共和二年第4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20日），兰代在他关于共和国形势的报告中承认搞活外贸的必要性。农业收成不好，春天将发生饥荒，因而救国委员会打算以批准批发商人从中立国自由进口的方式搜罗粮食。国民公会让步了：葡月26日（1794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制造商自由进口他们工场所需要的产品；霜月6日（1794年11月26日）法令使未被查禁的商品都可以自由进口。然而，进口自由和限价法的实施是无法协调的，何况雾月25日（1794年11月15日）法令还允许在法国港口同中立国进行自由贸易。

反对统制经济和最高限价的活动在秋末普遍展开。共和三年雾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就“最高限价法的弊病”提交一份报告，国营经济官僚化的现象和管理上的失误（由于没有任何统计组

织，官吏们缺乏关于资源和需求的精确概念）尤其遭到攻击。并且，由于这些官僚机构充斥着共和二年制度的拥护者，这种攻击便更加凶猛。通过抨击这些机构，统制经济的原则本身，尤其是对军需供应的管制便都成为攻击的目标。金融家们想恢复以前的做法，重新迫使国家接受军火商和金融公司的服务，由此他们可以牟取暴利，大赚其钱。经济自由的拥护者发起的这场运动终于获得成功：霜月19日（1794年12月9日），商业委员会（兰代不久便被排挤出去）的一份报告作出废除最高限价的决定。

共和三年雪月4日（1794年12月24日）法令终于撤销了最高限价和统制经济。共和国内部的粮食流通完全自由了。商业和供应委员会虽保持着军需品优先购买权，但必须按时价购货。最高限价的废除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2.指券的崩溃及其后果

废除最高限价的直接后果是指券的崩溃，价格扶摇直上，令人目眩。粮食投机肆无忌惮，愈闹愈凶。纸币成了废纸，汇率暴跌。指券的价值在1793年12月曾回升到面值的50%，到共和二年热月（1794年7月）又降为面值的31%。随后，由于人们不再遵守限价法，指券价值继续猛跌：在共和三年霜月（1794年12月）为面值的20%，在芽月（1795年4月）为8%，在热月（1795年7月）为3%。价格上涨迫使国家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而且，捐税不是收不上来，就是只能收到贬值的指券。指券发行似流水，到1794年12月其总额已增至100亿锂，其中有80亿锂在市面流通。从雨月到牧月（1795年1—5月），发行了70亿锂指券，流通的指券已超过了110亿锂。农民和商人都不再接受指券而只要硬币。指券受到拒绝后贬值得更加厉害：在1794年11月到1795年5月间，指券的流通增长了42.5%，而指券的价值丧失了68%。在此期间，100锂纸币最初值24锂硬币，后来只能值7.5锂硬币。

生活必需品的涨价情况各省不一，但一般都超过纸币相对于硬币的贬值程度。同1790年相比，1795年3—4月间指券的指数是581，而价格的一般指数达到了758，其中食品的价格指数则达到了819。

粮荒加重了价格上涨的灾难性后果。尽管征调的期限延长到获月1日（1795年6月19日），农民也不再向市场供应粮食：他们担心被付以贬值的指券，何况他们已获许直接向军需委员会或供应有产者的批发商出售粮食。官方只好又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各县都向村庄派驻了国民自卫军，直至它们如数纳够了粮食。但春天一到，由于粮食歉收，这种做法也无济于事。政府企图从国外购买粮食，但这实际上办不到。当时国库十分空虚，政府只能把此事托付于私人资本（巴黎和军队的购粮问题除外）。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商业大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从国外购买的粮食到1795年5月份才开始运到。然而，长期缺粮的南部地区从初冬起，奥尔良（尽管处于博斯地区边缘）则从初春起便出现了严重饥荒。随着粮食定量减少，价格开始猛涨：在凡尔登，从1794年夏天起，工人每日定量为1斤，其他人的定量为3/4斤。这些定量到1795年春都减少了一半，而价格却都上涨到每斤20苏。许多市政府恢复了对粮食的管理——把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定量分配，并把面包价格限定在成本价以下。但这些办法也不能减轻人民群众的苦难，而同新富人的骄奢淫逸相对照，这种苦难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指券崩溃的社会后果实际上是因阶级而异的。当劳苦大众陷于绝望（共和三年的冬季极其寒冷，加深了穷人的不幸）的时候，当旧制度时代的食利者资产阶级和被偿付以指券的债权人纷纷破产的时候，债务人和投机商却迅速发财致富。一伙利用通货膨胀和倒卖国有财产，以及承包军需供应而上升到社会上层的冒险家，为旧资产阶级增添了新鲜血液。在执政府或拿破仑时代开创资本主义生产的许多实业家即出自他们之中。通货膨胀完成了社会的革命。

在食品匮乏和指券失信的双重作用下，巴黎的食物和燃料价格迅猛上涨。中央菜市场上，1斤牛肉在雪月6日（1794年12月26日）价值34苏，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竟涨到7锂10苏。如果巴黎生活费用的指数在1790年为100，在1795年1月便是580，3月份上升到720，4月份竟达900。由于工资及其他各种收入的变动，价格上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因人而异：从事大宗贸易或实业的大资产阶级和靠通货膨胀发财的新富人可以从自由市场上得到补偿，涨价丝毫伤害不到他们。而工资劳动者、职员、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食利者等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则只能随着价格上涨而步步下降。由于原料短缺和军火工场纷纷关闭（这种工场中的工人数量已由5 400人减少到1 146人），大批工人陷于失业。居民人口死亡增加，人民群众充满失望情绪。冬季的严寒加重了营养不良的悲惨后果。共和三年冬季的气温下降到18世纪的最低点：1795年1月初为零下10度，1月23日达零下15度。死亡率大为上升。冬末，给养处提供的面包和肉类（这是百姓最基本的食品）的定量急剧缩减。由于完成不了征调指标，又缺乏运输工具，供应巴黎的粮食储备渐渐枯竭。风月25日（1795年3月15日），“穷人唯一的生计”——面包定量被削减到每日1斤，唯体力劳动者能得到1.5斤。即使如此，包括植物园区在内的许多区的面包商仍不能按定量卡提供面包。格拉维利埃区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的定量是0.5斤，忠诚区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的定量是1/4斤。

共和三年芽月初的几天里，人民的失望变成愤怒，接着便演成起义。风月29日（1795年3月10日），救国委员会认识到：“我们可能在某一天不再有面包，而其后果我们将难以对付。”它枉费力气地增加了一些应急措施，如在芽月7日（1795年3月27日）规定每0.5斤面包搭配6盎司大米。然而，许多家庭主妇因缺乏燃料而无法做米饭，在饥饿的折磨下，无套裤汉再次投入运动。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的一份警方报告记述了群众愤怒情绪逐渐上升的情况：“穷困阶级使绅士们感到不安，使他们担心过分的物价上涨将产生的后果。”到风月末，冲突已在

所难免。各政府委员会本身也在进行防范。它们逮捕了许多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同时对所谓“好公民”实行武装，并纵容“金色青年”为所欲为。面临由粮荒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所有资产阶级反动派都联合起来。

III.人民起义的最后几战（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

在共和三年冬季，当指券崩溃、经济危机使人民群众陷于绝望的时候，有两种倾向在互相对抗着：一种倾向要发展反动势力，巩固绅士们的社会制度；另一种倾向最初的目标便是给正初现端倪的饥饿骚动指出方向，并使之具备某些政治宗旨。

1.巴黎人民反对派的崛起（**1794**年与**1795**年之交的冬季）

人民反对派以侥幸逃过热月镇压的基层组织为依靠。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后，雅各宾派纷纷加入人权捍卫者协会，该协会由此壮大了力量，成为市郊圣安托万，尤其是蒙特勒伊区和盲人院区强有力的无套裤汉反对派中心。在格拉维利埃区，“几乎全是由工人和很少受教育的人”组成的（一个敌对者的说法）自由和人道之友协会保证了区民大会中爱国派占多数。无套裤汉在邦迪区、伦巴第区和博物馆区仍然保持着政权。

所有反对热月反动的人渐渐地组成联盟。霜月28日（1794年12月18日），巴贝夫发起了第二次运动。他为自己曾率先参与攻击“罗伯斯庇尔体制”而懊悔，认识到只存在两个相互对峙的派别——“金色国民”和“无套裤国民”。雨月9日（1795年1月28日）他在自己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上号召“无套裤国民”起义，由此遭到逮捕。勒布瓦也在《人民之友报》上鼓动打一场反对“金色巨富”的社会战争。原雅各宾派自巴贝夫放弃反恐怖主义立场后便同他言归于好，并同巴贝夫一致要求实施可能遭到修正的1793年民主宪法。

雨月间，当惊惶不安的各政府委员会进行镇压的时候，民众活动分子展开了地下斗争。雨月20日（1795年2月8日），人权捍卫者协会被解散，包括巴贝夫在内的一些反对派遭到逮捕。绅士们夺取了一些原来是由人民群众控制的区（尤其是博物馆区）。各区的老活动分子开始重新秘密聚会。风月里出现了许多对于这种秘密会议的检举材料。风月底，爱国者们利用秘密捐款发起了散发鼓动起义的匿名标语和传单的活动。风月22日（1795年3月12日），“醒来吧，人民，时候到了！”的标语贴遍巴黎郊外各区。芽月3日（3月22日）贴出了传单《国民警钟》，芽月5日（3月25日）又贴出了《告国民公会和人民书》。粮荒的恶化使人民的情绪激动到极点。与此同时，国民公会内部出现了一场政治危机。

2.共和三年芽月（**1795**年**4**月）事件

芽月初的政治危机使国民公会的热月党多数派和山脊派（由于反动的发展而一度加强了力量的山岳派少数）发生了激烈冲突。难以调和的对立集中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关于1793年宪法，弗雷隆称之为“几个坏蛋的炮制品”；热月党多数派想在该宪法中附上一些组织法；山脊派则坚持认为该宪法是法国人民的“护城圣物”。另一方面，芽月2日（3月22日）开始了关于控告“四人团”（巴雷尔、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和瓦迪耶）的辩论。这场乱哄哄的辩论激起了民众舆论的强烈反应，也使资产阶级的舆论感到不耐烦。国民公会当机立断，于芽月9日（3月29日）和12日（4月1日）分别作出两项决议：前者否决了任何赦免主张，决定继续就“四人团”的问题进行听证；后者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组织法的委员会。

就在这时，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行动起来。自风月底（1795年3月中）起，聚集在面包坊门前的人群开始吵闹。风月27日（3月17日），一群来自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人到国民公会声称：“我们连面包都吃不饱。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芽月1日（3月21日），市郊圣安托万3个区的代表也来到国民公会，要求实施

1793年宪法和采取对付粮荒的各种措施，并愤怒谴责人民的敌人，称他们为“财富的奴隶”。愤怒的无套裤汉和“金色青年”团伙之间的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在此期间，政府也在加紧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起义。芽月1日（3月21日），西埃耶斯促使国民公会通过1项大治安法。该法规定对所有以预谋的行动和喊着煽动性口号涌入国民公会的人处以死刑。芽月2日（3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向每个区的可靠公民分发了100支步枪。芽月7日（3月27日），格拉维利埃区发生了严重骚动，并持续了两天。10日（3月30日），各区的议会都争吵不休。无套裤汉在10个区占了上风。第二天，盲人院区的代表再次来到国民公会，提出一份名副其实的民众纲领。该纲领谴责热月9日事变的各种后果，抨击废除最高限价的做法。它要求成立民选的巴黎市政府，恢复各民众团体的活动和实施1793年宪法。“我们起来维护共和国和自由了！”这一行动成为人民起义的信号。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事件表明了由于镇压而失去骨干力量的人民运动已被破坏到何等程度。这一事件，与其说是一场起义，不如说是一场示威，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乱民的大嗡大轰。他们涌入国民公会仅仅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关于实施1793年宪法和采取措施对付粮荒的意愿。富人居住区的国民自卫军毫不费力地驱散了这些示威者。起事由于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和领袖而告失败。无套裤汉支配国民公会的那段时间全消耗在喧闹声和空洞的讲演中。第二天，即芽月13日（4月2日），骚动仍在持续，尤其在市郊圣安托万和盲人院区。但当国民公会下达戒严令后，秩序很快就得到恢复。

人民失败的政治后果迅速显现出来。右派取得了优势。一位名叫安德烈·迪蒙的右派领导人声称：“必须结束这场起事。”芽月12日与13日之间的夜里，国民公会决定不经审判把“四人团”流放圭亚那。山岳派分子阿马尔和迪昂等8人的被捕（他们当即被解往阿姆要塞），以及稍晚几天康邦等8名其他议员的被捕，更加削弱了左派势力。花月17日（5月

6日），富基埃-坦维尔同原革命法庭的14名陪审员一起被判处死刑。宪法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793年宪法在此之前还不曾引起争议，辩论始终是围绕用组织法调整该宪法的问题展开的。如今则不然，花月25日（1795年5月14日），共和国区对1793年宪法展开攻击，称之为一种“由恐惧所强加、在恐惧中通过的十执政团[3]式的宪法”。反动势力越发猖獗，粮荒演成饥荒，种种因素相互交织，再次促发人民运动。

3.共和三年牧月（**1795**年**5**月）

对芽月起义的镇压和对各区活动分子的迫害不仅没有摧毁巴黎的人民运动，相反，却激发了人民的反叛精神。芽月21日（1795年4月10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所有“被认为在各区参与过暴政下恐怖活动的人”解除武装。这是道地的针对所有参加共和二年体制的人的“惩治嫌疑犯法”。在南部地区，解除原恐怖主义者武装的做法鼓舞了实行白色恐怖的屠杀者，使白色恐怖在花月和牧月猖獗到了极点。在巴黎，虽然被解除武装的人数似乎有限（所有的区加起来一共约1 600人），但这种做法打击了共和二年最优秀的活动分子。按照其中一位人士的说法，解除武装是“一种政治上的耻辱，一种肉体上的痛苦”。因为民众在关于平等的意识上，携带武器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而解除武装即意味着被开除出自由人的共同体和丧失公民权。因此，解除武装法更加激发了人民活动分子的反叛精神。

花月的饥荒使群众陷于绝望。春季的粮食供应一天比一天糟糕。巴黎的库存已经枯竭，粮食的分配只能取决于当天的进货量。芽月前最低水平的定量为每日1/4斤。这一标准在此时成了正常情况。粮食分配工作组织得很糟，家庭主妇们常常空等在面包铺门前。法国到处都出现骚动。在诺曼底，饥饿的闹事者沿着塞纳河攻打开往首都的运输船队。价格还在继续上涨。货物（尤其是燃料）到不了港，由此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的营养不足以持续数月，所有的资源都耗尽了。所以，共和三年花月和牧月饥荒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民大众是这场社会饥馑的主要

受害者，因为政府拒绝建立普遍配给制度，而富人有钱通过自由市场来维持生活。饥肠辘辘的男女民众倒卧街头，死亡率持续上升，自杀的人也增多了。反动的《晚间信使报》在花月8日（4月27日）写道：“人们在街上碰到的尽是些苍白枯瘦的面孔，从中可以看到痛苦、疲惫、饥饿和穷困。”

在有产者的心理中，除了这种怜悯心以外，还夹杂着对饥荒引起抢劫从而威胁财产的担心。

事实上，民众的愤怒已渐渐和失望情绪交织在一起。饥荒提高了共和二年制度的价值。“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警察常常报告这种恐怖主义的论调。在人们心目中，1793年宪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似一颗“希望之星”。萨特人勒瓦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个民主的许诺包含着人民的全部希望。”

花月间再次发生区民骚动。花月10日（4月29日），蒙特勒伊区宣布常川集会，并要求别的区效法自己，以便磋商给养问题。11日（4月30日）自由小红帽区爆发了一场骚乱。很快出现了一些煽动性的小册子和招贴。惶惶不安的政府调集大批军队到巴黎周围，但又不敢让这些军队深入首都，以免其受人民情绪的感染。这场动乱在花月30日（5月19日）的各区民众大会上达到高潮。这天晚上，一份题为《争取面包和夺回权利的人民起义》的小册子发出了人民起义的信号，并把起义的口号确定为：“面包和1793年宪法”。

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早晨5点，市郊圣安托万和圣马尔索敲响了警钟。而后，东部各居民区擂起战鼓。妇女们跑上街头，走遍各工场，男人们操起武器。上午10点左右，第一批妇女群众敲着鼓开向国民公会。国民自卫军的动员稍缓慢一些。中午刚过，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也出动了，沿途又有各区的营队加入，军威益

壮。与此同时，一群妇女在几个男人的支持下试图闯入国民公会大厅。大约3点钟，各国民自卫军营队来到骑兵竞技场，运动已势不可当。国民公会被淹没在起义的洪流中，起义者杀死了议员费罗并用矛尖挑起他的头颅。在长时间的喧嚷中，一位名叫迪瓦尔的炮手高声宣读了起义的纲领——《人民的起义》。但起义者完全忽视了对各政府委员会的控制，使其得以待山岳派议员被卷入起义之后，从容地发起反攻。当晚7时许，国民公会重新开始审议问题。在迪鲁瓦和罗姆倡议下通过了允许各区常川集会的决议和释放被捕爱国者的决议；苏布拉尼提出撤销治安委员会，代之以一个临时委员会。这一主张得到了采纳。然而，到晚上11点半，西部各区的国民自卫军突然气势汹汹扑向国民公会，冲进大厅，打垮了起义者。起义者四散奔逃。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14名卷入起义的议员。

共和三年牧月2日（1795年5月21日），在各民众区坚持举行非法集会的时候，市郊圣安托万重新揭竿而起。一群起义者占领了市政厅。下午3点钟左右，市郊圣安托万的各国民自卫军营队再次进军国民公会。宪兵队出现哗变。约晚上7点，人民的炮手们又像1793年6月2日一样，把炮口对准议会，严阵以待。这时，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的炮兵也发生哗变。勒让德尔奉劝议员们从容镇定，静坐受死。然而，犹豫不决的起义者并没有去击溃热月党的卫队，而当政府各委员会派10名国民公会议员前来交涉时，起义者竟轻易为假“亲善”所蒙骗。一个起义者代表团获准进入议会大厅，其发言人宣读了一份措辞严厉的请愿书，反复阐明无套裤汉对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要求。议长与他热烈拥抱。随后起义队伍便各自回区，从而放过了最后一个获胜的机会。一位起义者说：“我们的行动落空了，有人用演说欺骗了人民。”

对市郊圣安托万的军事征服自牧月3日（5月22日）起开始准备。这一天，3 000骑兵开进巴黎。第二天，许多分遣队又来加强这支军事力量。通过个别通知把一些“好公民”动员起来后，政府开始拥有一支约2

万人的队伍。默努被认命为该部队的总司令。《自由人报》写道：“巴黎宛如一座军营。”晚间，因筋疲力竭而沉睡的市郊圣安托万被政府军团团包围。牧月4日早晨，一帮帮的“金色青年”侵入该郊区，但又不得不狼狈地撤了出来。市郊圣安托万3个区的国民自卫军营队严阵以待，一门门大炮直指市区。支持着他们的有“聚集在各个角落的”一群群妇女。据一份警察局眼线的报告说：“从物质上说来，面包问题是他们起义的基础。但他们起义的灵魂却是1793年宪法。他们一般都愁容满面。”这些起义者完全没有领袖，甚至几乎没有骨干分子。他们只是由一种绝望的情绪支撑着。下午4点左右，政府军接到进军的命令。被勒令缴械后，市郊圣安托万不经战斗就投降了。到晚上8点，一切都告结束。

对起义者的镇压立即在司法和各区同时开展起来。牧月4日，宣告各监狱已经满员。

司法方面的镇压由国民公会在牧月4日建立的军事法庭进行。该法庭审判了149人，其中开释73人，判处36人死刑，18人拘留，12人流放，7人戴铐。尤其是，转向起义方面的23名宪兵中有18人被判处了死刑。迪瓦尔和德洛尔姆（波潘库尔区炮兵上尉）等5名起义领袖（都是勇敢而果断的人）以及在牧月1日因站在人民一边而受到连累的6名山岳派议员也都被判处了死刑。这6名议员走出法庭时曾用匕首自杀，迪凯斯努瓦、古戎和罗姆当场身亡，布尔博特、迪鲁瓦和苏布朗尼最后还是死在断头台上。他们后来被人们称为“牧月烈士”。

各区范围的镇压，就其长远的影响来说，意义更加重大。牧月4日，国民公会要求巴黎各区解除所谓“坏公民”的武装，并在必要时予以逮捕。这场大规模的分区清洗从牧月5日一直闹到13日，导致约1 200人被捕和1 700人被解除武装。这些人基本都是牧月起义者和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活动分子（即使他们没有参与共和三年的起义），但也有原恐

怖主义者和雅各宾派。这种清洗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和社会影响。男人被长期监禁对许多家庭即意味着赤贫化。一度使热月体制感到威胁的两股势力就这样被摧毁了。

这次起义的失败具有决定性意义。筋疲力竭、分崩离析、且因大镇压而失去领袖和骨干的人民群众发现，在自己的对立面，一个由共和派和旧制度拥护者所组成、以军队为靠山的资产阶级集团正在崛起。人民运动这一革命的根本动力既已被摧毁，大革命也就结束了。

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人民起义的失败，归根结底，是原第三等级内部阶级冲突的一段最富于悲剧性的插曲。由于法国的资产阶级占据支配地位，人民运动根本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正如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之间的对抗曾毁灭了共和二年体制一样，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人民运动失败的命运，何况人民运动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促使其本身日趋退化。

无套裤汉并不是一个阶级，人民运动也不曾构成阶级政党。手工业者、店主、帮工、短工等，曾同少数资产阶级一起组成了联盟。该联盟曾向贵族显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但在这个联盟内部，靠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利润为生者（如手工业者和店主）和仅靠工资为生者（如帮工和短工）之间也出现了对立。革命斗争的需要促使无套裤汉团结起来，使他们中不同的利害冲突降到次要地位。不过，这种革命斗争无法取消这些冲突。我们还应指出使这些对抗活动更加复杂化的社会心理特征。无套裤汉内部的这些矛盾并不能和有产者、产业主与工资劳动者这两类人之间的矛盾完全等同起来。工资劳动者中的职员、教员、艺术家等，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把自己看作资产阶级，而不愿与下层人民为伍，即使他们支持下层人民的事业。

因此，社会成分混杂的无套裤汉缺乏阶级意识。他们一般都敌视新生的资本主义，但这并非出自同样的动机。手工业者担心自己沦为工资

劳动者；帮工则憎恶囤积居奇者，因为这帮人提高了他的生活费用。虽然以工资为生，帮工们却毫无自己独特的社会意识。阶级团结的意识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的集中化唤醒，帮工的精神状态基本上还是由手工作坊造就的。但不容否认，在以工资为生的无套裤汉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感。这种一致感不仅突出体现在他们的手工职业和他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们的衣着和生活方式上。此外，他们都缺乏教育，这一情况在人民群众各阶层中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有时还产生一种无能感。因此，巴黎无套裤汉一旦失去了中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能人”，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有过一些畏畏缩缩的协调企图，巴黎无套裤汉却始终缺乏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建立在阶级成分和严格纯化基础上的、纪律严明的政党。虽然有不少活动分子曾努力对人民运动加以训导，但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纪律观念的活动分子仍占多数。至于群众本身，除了对贵族阶级的仇恨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他们意态朦胧地期待着大革命的胜利。他们要求最高限价以便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当革命政府把统制经济转向为国防事业服务时，他们便和政府疏远了，全然不懂革命政府的垮台会带来无套裤汉的毁灭。

历史进程的辩证法本身最终也体现在人民运动的退化过程中。5年持续不断的革命斗争慢慢地使人民运动失去了自己的锐气和活力。同时，群众也因“伟大希望”的实现总是推迟而渐渐泄了劲。罗伯斯庇尔曾经写道：“人民厌倦了。”共和三年风月27日（1795年3月17日），市郊圣马尔索和圣雅克的无套裤汉说：“我们对于自己为大革命做出的一切牺牲简直感到懊悔。”月复一月不间断的战争削弱了无套裤汉，征召入伍把他们弄得衰竭不堪：入伍者都是最年轻、最有战斗性、最有觉悟和最积极的分子。保卫新祖国是他们首要的革命义务。从共和二年起，巴黎各区国民自卫军营队的很大一部分成员是超过50岁甚至60岁的老人。

人民运动的这种老年化不可救药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

然而，我们对于在共和三年牧月的镇压下销声匿迹的人民运动却不应作出完全消极的评价。自1789年7月以来，尤其是自1792年8月10日以来，它曾向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从1789年到共和三年，巴黎无套裤汉一直是革命斗争和国防事业的积极因素。人民运动在1793年使革命政府得以建立，从而导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外反法联盟的失败。人民运动的胜利在1793年夏天还把恐怖提上日程，旧制度就是在这种恐怖的猛烈打击下被彻底摧毁的。热月政变引起了普遍的反动，但截至此时，恐怖统治已为新社会关系的建立扫清了场地。

由于共和三年牧月的失败，人民被长期赶出了政治舞台。他们希望建立—个平等的社会民主制度的理想破灭了。1789年的体制和制宪议会的业绩得到恢复。在实现经济自由和恢复纳税者掌权的制度这一基础上，开始了显贵们的资产阶级统治。

---

[1] 耶宇（Jéhu，公元前841—前814年），古以色列王国第10位国王。——译者

[2] 蒂图斯（Titus，39—81年），古罗马皇帝（79—81年在位）。“蒂图斯式的发型”指一种前后一样短的发式，仿自古代蒂图斯的雕像。——译者

[3] 源出古罗马共和国由10位执政官组成的政府机关，尤指公元前451—前450年前后两任十执政团。后一任十执政团在执政1年期满后拒不退位，终为一场革命所推翻。——译者

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1795年酷似1789年，一个是共和三年，另一个是自由元年。

自1789年，特别是1792年8月10日以来一直是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决定因素的无套裤汉及人民运动，这时已被清除出政治舞台。反对贵族、国内反革命以及国外反动势力联盟的战争需要，曾一度迫使山岳派同无套裤汉联合起来。为此，山岳派不得不答应试行人民民主。有产者对这次尝试曾长时间保留着噩梦般的回忆：他们的自由被妨碍，利润受限制，小人物居然把法律强加在他们头上。由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得到加强，它的态度更加强硬了。因此它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重现共和二年的试验。它独断专行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显贵”们的至尊地位已被恢复，国家的概念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重新确立起来。

共和三年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布瓦西·当格拉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发表的开场白中把这些原则阐明得一清二楚：

“总之，你们必须保护富人的财产……一个明智的人所能要求的，仅是公民的平等权利……绝对平等只是幻想。若要实现绝对平等，必须要在思想、道德、体力、教育和财产方面人人都能完全平等。”

早在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发表过同样的论调：

“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

热月党和吉伦特派如此奇特的一脉相承。布瓦西·当格拉接着说

道：

“我们应该让最优秀的人物来统治。他们是最有教养、最能维护法律的人。然而，除了极少的例外，你们只能在以下的范围内找到这样的人才：他们拥有产业，热爱自己产业的所在地，忠于保护产业的法律，酷爱有益于产业的平静；他们还因为拥有财产以及由此而来的舒适生活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这就使他们能够有远见卓识，准确地讨论同自己祖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法律的利与弊……一个由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是一个有社会秩序的国家，而一个由无产业者统治的国家则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经济的自由必然与私有权紧密相关：

“假如你们给无产业者无限的政治权利，假如有一天他们坐在立法者的席位上，那他们就会鼓动或纵容动乱而毫不顾忌后果。他们将会对商业与农业制订或同意制订极其有害的税率。因为他们自己感觉不到，不会害怕，并且也预料不到这些税率将会带来的可怕后果。最终他们将把我们重新推向我们刚刚摆脱了的激烈动乱之中。”

这是对共和二年尝试的无情谴责，并且也杜绝了民众各阶级的一切希望。于是，根据1789年的传统，热月党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的和解勾画出了一幅由“显贵”们，即至少是富裕的有产者组成的国家的轮廓。布瓦西·当格拉曾明确指出：

“无产业者必须在德行方面不懈地努力，才能对并不维护他们的秩序感兴趣。”

从此，财产私有权便被资产阶级认为是非我莫属的了。山岳派的立法曾一度使私有财产的获得比较容易，但这时以自由经济需要为名，完全剥夺了无产业者，尤其是小农获得私有产业的可能性。早在共和二年

果月22日（1794年9月8日），下夏朗特省议员洛佐就强调了这种必要性。他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要使全体法国人都变成地产主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以及这种变化将会带来的有害后果”的报告。因为，企图通过平分土地来消灭贫困纯属幻想。即使可以让全体农民都变为独立的自耕农，共和国也完全没有理由为之庆幸。因为到了那时，大农场主、商人、工厂主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自己企业所必需的劳动力？无产阶级的存在是建立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

然而，贵族也毫不甘心。经过短暂的和平之后，战争再次爆发。资产阶级国家和“有产者共和国”之间的脆弱平衡，因其自由的形式而注定了它是弱不禁风的，这时它再次受到了严峻的考验。1799年如同共和二年，祖国的危急迫使人们采用专权的办法。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社会上的优先地位是完全不容许人民群众妄加评论的。革命的专政被摈弃，于是只有实行军事独裁。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意义所在。共和八年，有产者共和国的显贵们把国家限制在共和三年规定的狭窄的纳税者范围内。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在共和三年牧月，巴黎无套裤汉运动被镇压下去，反动势力加速扩展。但是，过分的白色恐怖，特别是暴露出流亡分子叛国行径的基布隆登陆，终于使局势转为对革命有利。与此同时，热月党开始享受到革命政府努力的成果。因为，反法联盟解体了。

热月党更加坚持他们的妥协与折中政策。对外，他们回到了传统的外交。他们不断地征战，企图以兼并与征服来取得和平。对内，他们同右派相勾结以完成自己的大业。这样，温和的共和派同君主立宪派一起，通过共和三年的宪法，奠定了显贵政权的基础。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新的立宪尝试就因保王党人的反对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而被破坏了。

Ⅰ.牧月之后白色恐怖和基布隆登陆（**1795**年**5—7**月）

共和三年牧月镇压了一切来自民众的反对派，反动势力愈加猖獗，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恢复宗教崇拜便是其第一个后果。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根据朗热内的提议，教堂还给了信徒。然而，在教堂以外的宗教崇拜仍是被禁止的。按照“兼容并蓄”的原则，每旬一次的崇拜，宪政派天主教以及罗马天主教共同享用各教堂。由此产生了无穷的冲突。全体教士必须宣誓服从共和国的各项法律。宪政派便趁此机会在格雷古瓦的领导下重建他们的教会。以前曾拒绝宣誓的罗马派教士，如同在对待1792年的“小誓言”时一样，也分裂为两大派：“宣誓派”以圣絮尔皮斯修道院前院长埃默里神甫为榜样；“反抗派”则坚持进行秘密宗教活动。宗教的骚乱持续不断。

指券因无套裤汉运动被镇压而遭破坏，因为热月党资产阶级对它完全放任不管。国民公会于共和三年获月3日（1795年6月21日）制订了与继续发行相应的贬值比例，从而最终对纸币的破产加以认可。热月2日

（1795年7月20日），国民公会下令土地税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它最后还同意官员的薪俸可以浮动。国库已经空虚，然而纸币仍以每月将近40亿的速度继续发行。指券的价值在芽月（4月）只相当于其面值的8%，在获月降到5%，而在热月（1795年7月）跌到了3%。

白色恐怖因牧月民众运动的失败受到了决定性的鼓动。

在国民公会里，除了科多尔省的卡诺和普里厄以外，共和二年各委员会的成员以及12名山岳派议员都经签署被捕入狱。吕尔和莫尔因受到威胁而自尽。国民公会于牧月12日（1795年5月31日）取缔了革命法庭，并且撤销了对联邦党人的一切判决。

在外地各省，前恐怖分子都遭到审判。因此，奥朗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以及索姆省的勒邦都被枪决了。花月20日（5月9日），国民公会准许现已落入前联邦党人及真正的保王党人手中的行政机构向司法警官揭发恐怖分子。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共和二年的积极分子到处被人追捕，即使他们不被判刑，也会遭到百般的刁难与折磨，致使他们无法继续生存。大多数城市都有了自己的“金色青年”，在当局的纵容下，他们成了街上的主人。一帮帮刽子手，如耶稣会、耶宇会以及太阳会使东南部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在隆-勒-索尼耶和布尔等地犯人被屠杀。在里昂，花月5日与15日（4月24日及5月4日），监狱被强行打开，犯人全被处死。在蒙布里松与圣艾蒂安也发生了大屠杀。马赛的太阳会于花月22日（5月11日）及热月27日（8月14日）两度在埃克斯枪杀囚犯。无套裤汉在雅各宾派的最后堡垒土伦起义，但在牧月4日（5月23日）被镇压下去了。白色恐怖更是变本加厉。太阳会于牧月17日（6月5日）在马赛枪杀了圣让要塞的全体政治犯。在塔拉斯孔，当着当地贵族的面，并且在他们的掌声中，把雅各宾派分子从勒内王的城堡上推到了罗讷河里。在萨隆、尼姆和圣灵桥等地也都发生了大屠杀。一名国民公会议员牧月13日（1795年6月1日）写道：“到处都在绞死人”。

随着白色恐怖的加紧，保王党也开始复苏。那些仍然坚持共和立场的热月派，在看到保王党的崛起使大革命的拥护者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威胁后，终于也警觉起来。巴黎的新闻界通常总是倾向保王党的。牧月17日（1795年6月5日）的《导报》这样写道："到处都表现出最狂热的希望，似乎国民公会只能宣告实行王政了。"

在巴黎，反抗派教士以及归来的流亡分子肆无忌惮地耍弄阴谋，到处散发英国货币。在外地各省，自由树被砍倒，三色标志被踩在脚下。但是，保王党内部也存在分歧。立宪派企图以一直关押在唐普尔的路易十七为旗号上台执政（后者于牧月20日，即1795年6月8日死去）。结果是主张恢复旧制的专制派占了上风。普罗旺斯伯爵德·韦罗纳自命为路易十八，于1795年6月24日发表了宣言。他许诺恢复秩序、议会以及教会的特权，并声称要惩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人。在他周围的人主张吊死制宪议会议员，并且枪毙那些攫取国有产业的暴发户。在全法国，持有相同观点的保王党人正在准备叛乱。他们在弗朗什-孔泰、阿尔代什、上卢瓦尔、洛泽尔等地恢复了地盘，同时他们还通过巴黎的"王家代办处"进行收买贿赂活动。1795年5—6月间，莱茵方面军皮什格吕上将被收买起事。自牧月初起，朱安党人重新拿起了武器。在保王党复辟的危险面前，热月党终于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基布隆登陆表明（如果还有这个必要的话）保王党与英国的勾结，终于重新燃起共和主义的热情之火。有远见卓识的马莱·迪庞于1795年6月21日指出这种勾结对保王党事业的危害：

"内战只是幻想，借用外力进行战争更不可。在法国，对反法联盟的武器及其政策即使不是人人切齿痛恨，那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唾弃的了。"

国民公会对西部叛乱分子的让步，牧月后接踵而来的镇压以及政府的软弱却使主张诉诸武力的人得到鼓舞。登陆是在皮伊泽领导下准备

的。英国政府提供了金钱、舰队以及流亡军的军服。这些亡命徒在代尔维利和松布勒依的指挥下组成两个师。登陆于获月9日（1795年6月27日）在布列塔尼的南岸基布隆半岛上进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帮朱安党徒在卡杜达尔领导下起来响应，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却无动于衷。保王党内部的不和使他们的指挥陷于瘫痪，代尔维利与皮依泽也对立起来。从牧月初开始就警觉起来的政府，抓紧时间把部队都集中在奥什的指挥下。他在基布隆半岛击退朱安党徒的进攻后，筑起了坚固的工事。保王分子在获月19日（7月7日）企图突围。结果惨遭失败。获月28日他们再次失利。共和军于热月2—3日夜间（1795年7月20—21日）发起进攻。流亡军被逼到半岛的尽头。皮伊泽逃上英国军舰，松布勒依则宣布投降。根据当时的法律，手持武器，身着英国军装被捕的748名流亡分子作为联盟军的帮凶及叛国分子被全部枪决。

流亡分子在基布隆的这次失败的登陆，在全国进一步激起对英国的仇恨。它巩固了共和国。与此同时，反法联盟却最终陷于瓦解。

Ⅱ.征服的和平（**1795**年）

热月党毁坏了革命政府建立起来的事业，但他们仍然享受到共和二年国防政策带来的不少好处。此外，正当在不同利益的促使下反法联盟陷于瓦解时，他们也趁机大捞好处。

共和二年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共和国军在弗勒吕斯就已开始取得胜利。热月9日，比利时再次被征服。整个夏天，军事行动处于停滞状态。9月份军队又开始前进。儒尔当统率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于共和三年葡月11日（1794年10月2日）强行穿越拉罗埃尔通道，把克莱费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赶到莱茵河彼岸。与此同时，摩泽尔方面军和莱茵方面军也占领了帕拉蒂纳。皮什格吕率领的北方军越过冰冻的默兹河及莱茵河各支流。荷兰被占领，封锁在泰克赛尔的舰队也被轻骑兵攻占。1795年1月，巴达维亚共和国宣告成立。在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军处于

守势，在比利牛斯地区，它则于秋天侵入了卡塔卢尼亚。在西部，圣塞瓦斯蒂安从1794年8月起就被蒙赛的部队所占领。

国土得到了解放。而且，征服荷兰使共和国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利益。当反法联盟瓦解时，热月党正处在强有力的地位。

1.热月党的外交与反法联盟

在外交上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热月党是受反动势力钳制的。共和三年的救国委员会已丧失了一切权威，再不能对多疑的议会，甚至反革命的反对势力等闲视之。后者叫嚣要立即取得和平，恢复曾占领过的土地。雾月14日（1794年11月4日），塔利安提议实现使法国回到“前国界”的和平。10天后，巴雷尔揭露那些主张“虚假和平”的人，前山岳派愤怒了。布尔东在雪月8日（1794年12月28日）叫嚷：“有人企图使我们军队取得的成就付诸东流。”雨月11月（1795年1月30日）他又呼叫：“我们将推进到大自然规定的疆界为止。”自然边界已成为各党派政策的筹码以及共和主义的试金石。

其他诸因素也在起作用。军队的态度十分明确。在共和三年的危机中，军队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它的经济作用也十分可观。战争不仅开始以战养战，而且还供给国内。虽然共和二年花月建立的旨在掠夺被占领国家的撤退代办处被热月党政府取缔，但是，在布鲁塞尔以及莱茵河地区的埃克斯-拉-夏佩尔建立的法国行政机构在征调时却强行使用指券。在同巴达维亚共和国的谈判中，法国政府坚持索取战争赔偿，为以后的战争筹措资金。

然而，兼并政策使热月党发生了分裂。对尼斯和萨瓦是从来没有异议的，有分歧的是比利时及莱茵河左岸地区。卡诺坚持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只满足于对以前的边界作战略性调整。这也是温和派和立宪派保王党人的主张。最后，共和派同意兼并比利时。然而关于莱茵河地区，他们还举棋不定。杜埃人梅兰和蒂翁维尔人梅兰对此极为反感。

但是，风月15日（1795年5月5日）选入救国委员会的勒贝尔与西埃耶斯却是狂热的兼并主义者。他们一人主张收复自己的故乡阿尔萨斯；另一人则主张为将来最终摊牌取得抵押品。这离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的政策已经滑得很远。热月党已经重新回到传统的外交政策。

由于各种不同利害关系的争斗，反法联盟正在瓦解。因为普鲁士后悔自己在西方的卷入，并且在瓦尔米被打败，便转向东方寻求补偿。1793年1月23日，它伙同俄国再次瓜分波兰。1794年3月，科西乌斯科领导波兰起义，普鲁士军围困华沙城，但是未能把它攻占（1794年9月6日）。11月6日，在苏沃洛夫的大军面前，华沙投降了。而这时，同叶卡特琳娜二世重归于好的奥地利政府却乘机占领了克拉科夫。于是，第3次瓜分又开始着手进行。为了抢先行动，普鲁士决定把军队开往东线，以迫使奥地利和俄国接受它为谈判的一方。普鲁士部队越过了莱茵河。1794年11月，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决定派人前往瑞士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巴泰勒米谈判。对波兰的第3次瓜分于1795年1月3日达成协议。没有被征求意见的普鲁士只得到微薄的份额。波兰危机导致反法联盟的崩溃。

2.1795年的各项条约

法国自1794年11月起开始和普鲁士进行的谈判，在弗雷德里希-威廉把亲法的戈尔茨伯爵派往巴塞尔以后就更为加紧了。巴泰勒米奉命以补偿的代价争取普鲁士对于法国可能对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兼并表示认可。1795年2月戈尔茨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哈登伯格表现得不如前任友好。他要求北德意志在普鲁士的担保下实行中立。最后，由于普鲁士国王急于把驻扎在韦斯特法利的军队调往波兰，他便在莱茵河问题上作了让步，命令他的部长签约。巴泰勒米同意北德意志实行中立，并自己承担责任，于共和三年芽月15—16日（1795年4月4—5日）夜间签了约。

同普鲁士签订的巴塞尔条约明确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和普鲁士国王

之间和平、友好、和睦相处”。法国军队将撤离莱茵河右岸的普鲁士领土，但仍继续占领莱茵河左岸地区直至全面和平实现。按照秘密条款，两大强国保证恪守中立。特别是根据第2条，“假如在德意志帝国和法国实现全面和平之后，莱茵河左岸地区仍归属法国，普鲁士国王陛下将同法兰西共和国就位于莱茵河左岸的各普鲁士公侯国，商谈如何以双方同意的领土补偿实行转让。”

同荷兰签订的海牙条约于共和三年花月26日（1795年5月16日）由勒贝尔和西埃耶斯签署。由于普鲁士已经签约，因此和法国友好的巴达维亚领导人只能在热月派的要求面前屈服。法国得到了荷属弗兰德、马埃斯特里奇和旺洛。这些地方只有在法国兼并比利时之后才能保得住。执政一职被取消。在两个共和国之间缔结了攻守同盟，直到战争结束。巴达维亚共和国同意负担一支2.5万人的占领军，并保证用“荷兰货币现款，即现钞或对外汇票”（第20条）支付1亿盾的赔偿。

同西班牙签订的巴塞尔条约于共和三年热月4日（1795年7月22日），由巴泰勒米和西班牙特使依里亚特共同签署。蒙赛以占领毕尔巴鄂和维多利亚，以及直达埃布罗河的米朗达的辉煌战绩，加速了谈判的进程。结果法国撤离占领地区，但得到了安的列斯群岛上圣多明各的西班牙部分。一年之后，即共和四年果月2日（1796年8月18日）在圣依尔德丰斯签订的攻守同盟条约，进一步完善了第一项条约。

同奥地利的谈判没有结果。在获悉巴塞尔和约的消息后，奥地利的态度变得强硬了。它加强了同英国和俄国的结盟，并且还从英国得到一笔维持20万军队的援款（1795年5月20日）。从热月起兼并主义者占优势的救国委员会，主张保留比利时，把巴伐利亚让给奥地利作为补偿。但是，奥地利拒绝承认以莱茵河作为法国东部的边界线。共和四年葡月9日（1795年10月1日）比利时被兼并。这时，决裂已成定局，在可悲的条件下战争重新爆发。

3.军队与共和三年之战

国防的瓦解事实上是因革命政府四分五裂，统制经济被放弃以及货币崩溃而造成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战争物资的制造和军队的供给。国营工场的生产日渐被压缩，而私营企业却蓬勃发展起来。共和三年霜月21日（1794年12月11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向私营企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甚至可以为它们强行征用劳力”。革命政府经营的硝石矿开采也在芽月17日（1795年4月6日）还给了私营部门。最后，在牧月25日（1795年6月13日），巴黎各区的军服工场被廉价处理给私营承包商。

军需供给也受到货币危机与政府财政疲软的影响。士兵缺乏面包，征用再也得不到保证。用不定期领到的、以指券支付的军饷，士兵们简直什么都不能买。共和三年获月26日（1795年7月14日），一名中尉这样写道：“用共和国每月发给我的170锂，我没有钱给马钉掌，没有钱洗衣服……然而，我不能够不穿套裤、皮靴与衬衫出门。我现在几乎样样都缺乏。”由于战争物资的制造与供给以及军事运输已都仰仗私营企业，因此这些部门成为财团重要的致富来源。承包阿尔卑斯与意大利方面军运输的朗谢尔公司或米歇尔-鲁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军队的人员在减少。惩治不服从征召者与逃兵的条例再也不像共和二年那样严格执行，因此军队的兵员骤减。从1795年3月起，号称110万人的军队，实际上只有45.4万人。在春天里，军队的减员加剧，致使在莱茵河地区的共和国军队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政府的无能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它居然放过了“全国总动员”纪念日的机会，没有号召年满18岁的单身青年入伍。只有1793年应召入伍的士兵还在无限期地服役。公民责任感与纪律仍然得到维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这样做）。对于前贵族和教士们的敌视，对王政的仇恨情绪始终很强烈。雅各宾思想在军队里比在老百姓中更加持久。此外，军队还因热月党政府对制止反动势力软弱无能而蔑视它。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1795年战争不可能是一场决战。它开始得很晚。整整一冬，儒尔当率领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和皮什格吕统率的莱茵方面军样样都缺，成了十足的步行军。到共和三年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儒尔当才越过莱茵河，击退了克莱费率领的奥地利军队。被孔代亲王的手下人及英国钞票收买的皮什格吕对儒尔当支持不力。10月初，克莱费发起反攻，儒尔当被迫撤回莱茵河西岸。11月，奥地利军入侵帕拉蒂纳。这次战役于1795年12月以停火宣告结束。

实现全面和平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热月党没能用军队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兼并政策反而加强了英奥联盟，9月28日俄国也加入了这一联盟。1795年12月宣布停战之后，国民公会休会了。热月党把战争的沉重后果转嫁给他们不久前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政权。

III.资产阶级政权的组成

由保守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组成的中右联盟主宰着国民公会新宪法的辩论与表决。由于白色恐怖的猖獗以及基布隆登陆表明了王党复辟势力的危险性，人们一度曾以为联盟会发生分裂。在1795年夏天，这种危险唤醒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共和三年获月26日——攻占巴士底狱纪念日，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马赛曲》重新响彻天空。《导报》写道："很难描绘这被人们遗忘已久、意想不到的乐曲所产生的效果。"无套裤汉重新出现，并且和军人一起追捕"金色青年"。这是一场"黑领人发起的战争"。

政府对那些不应征入伍者和逃兵也采取了若干有力措施，而且还资助重建了共和派的报纸。获月6日（1795年6月24日），前吉伦特派，坚定的共和党人卢韦创办了《哨兵报》。但是，平原派并不想对左派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们需要右派的支持来表决通过新宪法。由此，产生了一些很能说明问题的妥协：在热月9日与8月10日的节日庆典上，同时演奏了《人民的觉醒》与《马赛曲》两首乐曲。热月21—22日（1795年8月8

—9日），包括富歇在内的6名前山岳派被捕。共和三年宪法的讨论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进行的。

1.共和三年宪法

从获月5日至果月5日（1795年6月23日至8月22日）对由布瓦西·当格拉提交国民公会的宪法草案足足讨论了两个月。草案是由芽月29日（1795年4月18日）任命的一个11人委员会制订的。这个委员会里既包括共和派的多努、拉勒韦利耶尔、卢韦、蒂博多，也包括布瓦西·当格拉、朗热内这样的保王派。温和的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一致同意既反对民主，也反对专政，并且主张回到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来解释的1789年原则上来。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的领导权应当回到“显贵”们，即至少是富裕的产业主们的手中。对此，布瓦西·当格拉在他获月5日（1795年6月23日）所作的报告里阐述得十分明确；“绝对平等只是幻想。”

共和三年的人权宣言比1789年有了明显的后退。在讨论过程中，热月26日（1795年8月13日），梅尔强调指出了“在这个宣言里写进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将会带来的危险。他说：“我们对词汇的滥用已够触目惊心，再也不能使用那些无用的词句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1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被抛弃了。朗热内在热月26日这样声称：

“假如你们说在权利方面人人平等，那些被我们以维护公众安全为由剥夺或中止了公民权的人便会借机起来叛乱，反对宪法。”

热月党和立宪派一样（只是更为谨慎），只坚持公民的平等权利。根据宪法第3条，“平等就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793年人权宣言里承认过的社会权利不复存在。起义权也被取消。相反，1789年人权宣言里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在这里规定得和1793年人权宣言里一样明确：

“财产权就是享受和支配自己的财产、收入、劳动成果和技艺的权

利。”（第5条）

这就全面肯定了经济自由。热月党认为有必要在权利宣言之后补充一项义务宣言。在义务宣言第8条里规定：

“土地的耕种，一切生产，一切劳动工具以及全部社会秩序正是建立在确保私有制的基础上的。”

选举权受到了限制，布瓦西·当格拉曾这样宣称：“由有产者治理的国家是一个有社会秩序的国家；相反，由无产业者治理的国家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国家。”

但是，为取得选举权必须缴纳的税额条件比1791年要宽：任何年满21周岁，在当地住够1年并且纳税的法国人都是“积极公民”。他们在区的首府召开“初级议会”，推举出“选举人”。“选举人”的最低条件是：年满25岁的法国人，其产业（在拥有6 000或6 000以上人口的市镇）收入相当于200个工作日的价值，或者其房租收入相当于150个工作日的价值，或者其地租收入相当于200个工作日的价值。全国大约3万名“选举人”。在各自省会召开“选举议会”，并且在不受纳税额限制的前提之下，选举产生立法议会成员。

国家权力机构的组织是严格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进行的。根据权利宣言第22条，“没有分权就不可能有社会保证。”这就避免了任何独裁的威胁。

立法权交给两院：一个是由40岁以上、不论婚否的250名成员组成的元老院；另一个是由30岁以上的500名成员组成的五百人院。两院每年改选其中1/3的成员。五百人院提出法律草案并作出决议，元老院对它们进行审议并形成法律。

行政权交给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府的成员由元老院在五百人

院提出的一份50人的名单上挑选任命。每年改选其中的1名。督政府负责确保共和国的内外安全。它拥有军队，但没有指挥权。它还通过任命特派员监督和保证法律在各行政和司法部门得到贯彻执行。各执行委员会都被撤销，代之以由督政府任命的、而且只向它负责的6名部长。6名部长并不组成政府机构。督政府对由选举产生的6名委员负责的国库没有任何权力。它不能提出法律，并且只能以“公文”的方式同议会两院进行联系。

行政机构重新分散和简化。每个省都由选举议会任命5名成员组成省的最高行政机构。县的建制被撤销，因为在共和二年，各县已经完全转变成为革命的区划了。农村的小镇在各区的市级行政机构领导下组合起来。与此同时，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由于实行市镇建制并选出市长，因而失去了自主权。它们被划分为若干个市。这套行政机构实际上比人们所说的更为集权。各行政机构等级森严，市级得服从省级，省级则服从部长。特别是在每个省级或市级的行政机构里，都有一名政府任命的“特派员”代表中央政府。督政府的特派员们监督并要求实施法律，出席市级或省级议会的辩论，并且督促各级官员。各省的特派员直接同内政部长联系。由于各级行政机构每年都有部分成员被更换，特派员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稳定的作用。督政府有权直接干预行政事务，使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根据宪法第196条，督政府可以撤销行政机构颁布的法令，可以中止或撤销行政官员的职权，并且任命替补人员直至下一次选举为止。显然，这不再是共和二年雅各宾式的集权，但它与1791年宪法规定的权力全面分散也相差甚远。

实施宪法必然是危险的。因为革命尚未稳定（惩治流亡分子和反抗派教士的特别法继续有效），财政破产迫在眉睫，战争仍在延续。但是，热月党人最害怕的是无套裤汉卷土重来以及议会或个人的专政。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谨慎措施致使各级政权解除了武装，变得很不稳定（每年有一半的市政府成员，1/3的议员以及1/5的省政府成员和督政府

成员被更换），并且还采取某些措施解决行政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始终存在的冲突与矛盾。当时，由于危机持续存在，并且害怕新政权被对手夺去，热月党人从一开始就对他们希望建立的自由体制进行了篡改。

2.新制度的建立

共和三年夏天，危机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物价飞涨，投机活动猖獗，一小撮暴发户的骄奢淫逸空前地激怒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指券的流通量在取消最高限价时为80亿，到了共和四年雾月1日（1795年10月23日）竟达到200亿。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关系被搞乱，债务人、佃农和房客都用贬值的纸币来清账。工资追不上飞涨的物价（夏天里，每斤肉的价钱从8法郎上涨到20法郎），在不少地区收成又很差，因此，除了规定价格外，重新实行了共和二年的强制性措施。它们是：热月4日（1795年7月22日）关于进行征用与强制在市场上出售商品的规定，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制订的粮食贸易法的一系列规定（这一项法律将持续到1797年一直有效）。在巴黎，每斤面包的价格规定为3苏，而这一年夏初，自由市场上面包竟达16法郎1斤。每天的面包的配给量在青黄不接时曾降到1/4斤，收获后又回升到3/4斤。巴黎的生活费用指数也随之猛涨。以1790年的指数为100，到1795年7月为2 180，9月为3 100，11月则高达5 340。在这种情况下，警方承认8月10日推翻王朝纪念日“在冷漠的气氛中”度过，也就不足为奇了。

关于“2/3名额”的法令，其目的是防止王党反对派在选举中取胜。热月党人意识到自己很不得民心，同时也了解立宪保王派企图通过选举的合法途径达到自己目的的阴谋，因此他们抓住政权牢牢不放。宪法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曾这样问道：“宪法将庄严地交在什么人的手里呢？”共和三年果月5日（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规定，各选举议会必须在现任的国民公会议员中选出2/3（即750名中的500名）的新议员。果月13日（8月30日）的法令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如果这一比例没有达到，其不足之

数可以由国民公会议员自行遴选。这样做的结果既消灭了前山岳派的势力，又剔除了君主立宪反对派，大大有利于热月党人。

公民投票批准了宪法及其附件。虽然纳税选举资格法已经确立，但它还是通过全民投票生效的。军队也参加了投票。初级议会从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起召开。国民公会使一些反对流亡分子和反抗派教士的措施重新生效。取消了那些没有从流亡分子名单上被注销的人的公民权，他们的亲戚不准担任公职。以前被流放的神甫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相反，被解除武装的前恐怖分子则恢复了投票权。但是，果月6日（1795年8月23日），各人民团体最终被取缔。共和四年葡月1日（1795年9月23日），国民公会宣告宪法通过。根据葡月6日公布的数字，有100多万票赞成，不到5万票弃权。但是，不作为这次公民投票主要内容的“2/3名额”法却只以20.05万票对10.08万票被通过。实际上，250多个初级议会提出了对宪法的保留意见；19个省以及巴黎（除了一个区以外）全都反对“2/3名额”法。

共和四年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保王党的叛乱使原定于20日的选举提前进行，并且加剧了自上月以来在巴黎开始的骚动。果月20日（1795年9月6日），巴黎勒佩勒蒂埃区，即交易所与投机市场所在的区，通过了一项“保证法令”，拉封登-德-格勒奈尔区议会则变成为常设机构。那些保王党占优势的初级议会把无套裤汉和前恐怖分子都逐出大门。公民投票的结果宣布之后，骚动更加厉害。巴黎有18个区反对投票的结果。葡月9日（10月1日），同时传来了果月27日（9月13日）夏托纳夫-昂-蒂默莱与德勒两地保王党徒叛乱和被镇压的消息。巴黎勒佩勒蒂埃区号召起义。葡月11日（10月3日），至少有7个区开始叛乱。国民公会宣告不间断地开会，任命了包括在内的一个5人特别委员会，并且向无套裤汉发出了号召。葡月12日（10月4日），一项法令撤销了对前恐怖分子解除武装的法令，3个“八九年爱国志士营”组建起来了。因为有军队司令默努上将的同谋，叛乱在葡月12—13日的夜间发展起来。叛

乱者建立起1个中央委员会。首都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叛乱分子的手中。国民公会被包围。受命组织反攻的于13日清晨同包括波拿巴在内的一部分将军联合起来。米拉成功地夺取了萨布隆军营的火炮。2万多名叛乱分子由于缺乏武器装备，终于被摧垮和打散了。对他们的镇压是有节制的。葡月13日夭折的叛乱并没有妨碍热月党同保王党的和解。于是，这一危险再次唤醒人们的共和主义意识。弗雷隆被派往南方去镇压白色恐怖，3名右派议员经签署被捕。最后，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休会之前投票通过对“纯属革命问题的各项案件”实行全面大赦的决议。

然而，从葡月20日（1795年10月11日）开始进行的选举打乱了热月党的盘算：只有379名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当选（其中还包括124名候补议员）。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温和派或伪装的保王派，如：布瓦西·当格拉与朗热内等。新当选的1/3议员主要是保王派和天主教徒。对热月反动负有责任的、变节的山岳派，如弗雷隆、塔利安等，都被击败。塔利安揭露出存在着的危险：“假如不把保王党从行政机构与司法部门里清除出去，3个月之内反革命势力就会按照宪法程序确立下来。”然而，温和的共和派拒绝取消选举结果。在这样的宽容气氛之下，开始了新的立宪尝试，建立了督政府。

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在“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中闭幕。持续了3年多的国民公会遵循了一条曲折的政治路线。实际上，从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它的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结束贵族的统治，永远不让旧制度复辟。除了共和二年那一段民主时期外，热月派控制的国民公会继续执行制宪议会的政策：确保资产阶级依靠社会优势和聪明才智取得的统治地位。既不是九三年式的民主，也不是八九年前的贵族政治。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大权应该掌握在“显贵”们的手中。由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成为开放的社会阶层。

热月党人认为在自由制度的范围内，在一个内战外患交困的国家里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社会优势与政治权威。旺代的叛乱之火尚未完全熄灭，反法联盟也没有粉碎。热月党通过共和三年宪法，强求新政权确保与维护包括被兼并的9个比利时省份在内的“法定边界”，并且用“自然疆界”的观念来指导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督政府的政策。1796年春，战争重新爆发。新政权继续作战的本钱只是贬了值的指券和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实施共和三年宪法（其主要特点为每年进行选举、要求实现社会安定和全面和平）使上述困难更加突出。像共和二年那样求助于人民的力量这种可能性已被摈弃。为了反击贵族的不断进攻，组成督政府的热月党人只得违背立宪原则，很快就诉诸军队了。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资产阶级国家局限在纳税人共和国的狭窄范围内，将贵族和民众各阶层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实践毫无成效，这些都注定它是不可能稳定的。热月党的“显贵”们既害怕保王主义，又惧怕民主，因此他们拼命地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共和三年立宪巧妙的平衡，除了造成政府的无能或诉诸武力，没有带来其他任何后果。政府的双重排斥政策在国内遭到双重的反对，这使督政府的稳定政策已经受到损害。稳定政策本要求迅速恢复和平，但是战争在继续，征战仍在加紧进行。于是，罗伯斯庇尔1792年1月2日在反战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将军们“成为民族的希望和偶像”的预言开始应验了：“假如这些将军中的一名注定要取得成功……他怎么可能不对他的党派产生巨大影响呢？”

Ⅰ.国内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继热月党之后，督政们企图借以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极其狭窄的。

在有产阶级方面，贵族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外。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规定，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任何公职。此项法律于共和五年被保王派多数取消后，果月18日再次恢复。不久后，西埃耶斯提议流放那些曾在旧制度下担任过公职或享受过特权的贵族，并且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社会地位。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坚持了第二条措施。这项法律之所以从未被实行，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排斥的政策不仅限于贵族。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督政府资产阶级也同样不信任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更加接近贵族阶级的、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主义者和绝对君权主义者一样被拒之门外。督政们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保守的。但是他们拒绝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害怕被他们引向复辟之路。

平民各阶层对共和二年的记忆犹新，以及社会上的恐惧心理，在整个督政时期始终是导致反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最终使雾月18日政变合

法化。平民各阶层中的最有觉悟的人士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被摈弃于国家以及他们曾为之斗争的共和国之外。“平等派密谋”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正当革命运动在新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进时，资产阶级的恐惧成为政府手里用来反对“排斥派”、“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强盗”和“吸血鬼”的有力杠杆。“显贵”们和上层阶级最害怕的是回到共和二年。因为在那个时代，富人被怀疑，穷人制定法令，传统的社会价值都被推翻，政治上的民主导致了社会平均化。“土地法”和财产均分的幽灵仍然异常强大。共和四年霜月10日（1795年12月1日），鲜为人知的多希在五百人院声称反对建立累进税收制，他说：

“国家只有尽可能地使公民发家致富，产业才能兴旺起来……累进税收制是反对富裕公民的一项例外的法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产业划分为极小的份额。这种制度在国有财产的让与中已经实行得太多了……一句话，累进税收制是土地法的真正起因，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加以扼杀……立法机构要强烈声明反对任何摧毁社会和谐以及明显地侵犯产权的原则。只有对产业怀有宗教般的尊敬，才可能使全体法国人同自由、共和国紧密相连。”

然而，这等于把曾创建这个共和国，但又没有财产的人们摈弃于共和国之外。

督政府建立在产业、纳税资产阶级及共和派“显贵”们的狭窄基础上的这种稳定，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督政们、雅各宾派和保王派

新政权的最初阶段是建立共和三年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机构。事实上，从热月党国民公会到督政府，在位的都是同一些人。

根据“2/3名额”法，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里共有511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四年雾月6日（10月28日）指定了379名国民公会议员为新议

员。此后，经各省选举议会挑选又补充了15名，再加上19名科西嘉和海外殖民地延长任期的代表，共计413名国民公会议员。他们不是温和派便是反动派。朗热内得到39个省的提名，布瓦西·当格拉得到36个省提名。这些重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了“法国选举议会”，他们不仅补足甚至还超过了2/3。新的1/3议员加强了右派的势力，如君主立宪派巴尔贝·马尔波瓦、杜邦·德·内穆尔、波塔利斯，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布瓦西·当格拉、亨利·拉利维埃尔和伊斯纳尔。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由以前的吉伦特派（如拉勒韦利耶尔、卢韦）、平原派（如勒图尔纳、西埃耶斯）或前山岳派（如、塔利安）组成。他们之中有158名弑君者，但其中有的已发生了变化。据比较有把握的估计，议会两院里有158名保王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305名共和派（大多数是热月党人）以及226名共和三年宪法的拥护者。督政的遴选是由最后这一部分人的意志决定的。

督政府成员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名单挑选：元老们决定留任、拉勒韦利耶尔、勒图尔纳和阿尔萨斯人勒贝尔。后者曾代表山岳派先后参加过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他的威望很高，始终是自然疆界[1]的维护者。对勒图尔纳有着巨大影响的前工程兵军官卡诺，保持着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声望。但他坚定地转向保守派，因而他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声望。处在这两个正直、勤奋和忠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派别之间的是。他是热月9日和葡月13日的打手，前子爵和军官，一个凶狠的前恐怖主义者。他对大革命无疑是有感情的，但又随时准备待价而沽。

督政府设立在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里，并建立了1个秘书处，后来成为波拿巴的国务秘书处。被任命的6名部长是：内政部长贝内泽克，财政部长，弑君者拉梅尔-诺加雷（一直担任到共和七年），司法部长、关于嫌疑犯的法令起草人梅兰（杜埃人），对外关系部长德拉克鲁瓦（也是弑君者），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由两名第二流的军官担任。以后又成立了第7个部，即警察总部，由科雄任部长。

“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雾月14日（1795年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真正的政府纲领。在政治方面，督政府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

总之，“在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混乱基础上恢复社会秩序”。这是一项稳定、平衡，折中然而又是反右的纲领。纲领虽然对雅各宾派没有任何影射，但是却号召人民反对“耍弄阴谋的保王派和不断鼓吹幻想的狂热分子提出的任何卑鄙建议”。

这时葡月刚过，督政府一上台便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

在政治领域里，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但还必须使各权力机构之间不发生任何严重的争端。各督政官和选举并支持他们的多数派协调一致地开始了他们的政务。各级地方政权和法院也建立起来。当各选举议会没有完成选举便闭会时，督政府就任命议员，并选择替补者。这样，从一开始督政府的权力就在不断扩张。但是，它的政令没有被严格地服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从未如数付给薪俸。议会两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很快就面临着和热月派国民公会同样的反对派。

葡月在巴黎被击败的保王派，继续在西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制造混乱。英国提供了武器和伪造的指券。1796年1月，斯托夫莱重开战火。奥什虽然没有严格执行反对反抗派教士的法律，却积极调动部队，加强岗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武装。斯托夫莱被捕后，于1796年2月25日在昂热被枪决。3月29日夏雷特也在南特被枪决。在罗亚尔河以北，卡杜达尔在莫尔比昂，弗罗泰在诺曼底的丛林地区，塞波在曼恩纷纷投降。6月份，西部军被解散，保王派终于彻底垮台了。然而各地零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保王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流亡

派失去了勇气，诉诸武力派在诉诸宪法派面前让步了。后者的目标旨在下次选举中夺取多数以合法地推翻共和政府。在这之前不敢采用武力行动，并已辞去司令官职务的皮什格吕也赞成这个策略。

雅各宾派一度曾利用了政府的善意。督政府把雅各宾派安排在一部分行政机构里，允许他们的刊物出版，甚至还资助杜瓦尔的《自由人报》。各种俱乐部纷纷重建起来。“先贤祠俱乐部”于共和四年雾月25日（1795年11月16日）开幕，很快就发展了1 00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国民公会议员，如德鲁埃。格拉古·巴贝夫于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他写道：

“一般说来什么是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公开爆发的战争。”

巴贝夫揭露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反民主性质：

“除了1795年以外的其他所有权利宣言，都是以一条象征永恒正义的重要格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作为开始的。在这之前，人们曾大踏步迅速地向这一目标前进。以后他们就倒退了，违反了社会和革命的目标，只是为实现‘少数人的幸福’和‘大多数人的不幸’。我们敢于这样说：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反对，直到热月9日以前革命一直在前进，以后就倒退了。”

在一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阿马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支持下，左派的进攻加强了。

督政府终于担心了。霜月14日（1795年12月5日）签署了对巴贝夫的逮捕令，从此他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在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举行的纪念处决路易十六的仪式上，勒贝尔的演说标志着刹车。虽然他愤怒地谴责保王派，但是他也抨击了那个“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

渗透到议会内部规定法律的时代……希望善良的公民放心。”

事实上，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如何解决热月党执政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经济和财政问题。当时，货币崩溃，经济凋敝。金融危机加剧了货币危机，税收再也不能入库，国库一贫如洗。勒贝尔请求“那些漠然置之的人关心共和国，并且和广大的共和派站在一起。在共和国面前任何派别都应消除。”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货币的灾难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它使一度曾出现过的政治团结成为泡影。由于害怕左翼反对派利用这一机会掀起民众运动，督政府来了个向右转。

2.革命纸币的破产（**1796**年）

督政府建立时，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100锂指券只值15苏。由于国库空虚，印指券的机器不断增大印量，从而使其价值很快就低于纸张本身的价值。在4个月里，纸币量翻了一番。共和四年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总量达到了390亿。霜月19日（1795年12月10日）规定的累进比例强迫借款，是一种对资本真正的课税，可以用金属货币、谷物或者相当于面值1%的指券来偿付。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市价甚至还要低3—4倍。借款只收到270亿纸币和120亿硬币。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极大的不满，他们是占纳税人中1/4的纳税最多的人。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政府不得不停止发行并废除了指券。

一种新的纸币——“土地票”代替了指券。重新使用金属币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金属币只有3亿左右，而在旧制度末期却有25亿。建立一座国立发行银行的主张被摈弃后，共和四年风月28日（1796年3月18日）的法律建立了土地票，其中24亿立即发行。以尚未出售的国有财产作为抵押的土地票（它的发行原则同指券完全相同）被用来以30∶1的比例代替指券，而与此同时指券却以l%的价值被用来支付强迫借款。土地票的市价是硬性规定的，它们被用来以平价购买国有财产。

土地票在6个月内就完成了指券在5年里经过的历程。

货币引起的灾难确实已迫在眉睫。土地票曾被宣告与黄金等价，但同时又相当于指券的30倍。而指券这时已贬值为原值的0.25%。法律本身也规定100法郎土地票只相当于金属币7.5法郎。首批土地票刚开始发行就贬值到其原值的65%—70%。芽月15日（1796年4月4日）它贬值了80%，花月1日（1796年4月20日）又贬值了90%。从此，食品有3种价格，但这并不能减少交换和供给的困难。芽月27日（4月16日），巴黎中央物价局规定每1斤面包售价为35锂指券或1锂3苏4德尼耶[2]土地票，而用硬币只需3苏。国有财产被大量侵吞后减少了抵押，促使了土地票的破产。共和四年花月6日（1796年4月25日）的法律决定继续出售国有财产，并规定平价出售的方式，可以用相当于原面值的土地票支付。其结果是购买者蜂拥而来，简直是一场抢劫。这对那些土地票持有者，尤其是国家承包商极为有利。以2万锂购得一座城堡的人，仅卖掉其中的栅栏门和栏杆就能获得8 000锂。牧月，每1斤面包涨到了150法郎[3]指券。甚至连乞丐也拒绝接受人们施舍的纸币。

革命纸币的消亡起因于这一痛苦的经验。其过程和指券完全相同，只是它缩短为两个月。获月29日（1796年7月17日）取消了规定的市价。热月13日（1796年7月31日）规定，支付购得的国有财产要用相当于市价的土地票。然而这作为制止滥售国有财产的措施已经为时太晚。同样的规定渐渐扩展到了薪水、年金、纳税和房租的支付。到了共和四年年底（1796年9月中），关于纸币的幻想破产了。然而它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流通。金属币重新出现了。但是，国家只能收到纸币，因此并没有得益。共和五年雨月16日（1797年2月4日）的法律决定停止使用土地票，把它贬为原值的1%。这项法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只不过正式认可了已经既成事实的破产。革命纸币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督政府之所以能重新使用金属币，是因为利用了共和四年的胜利带来的好处。共和五年芽月5日（1797年3月25日），督政府收到了桑

布尔-默兹方面军上缴的1 000万硬币，意大利方面军的5 100万硬币。战争供养了政府。

对于公务员、靠年金生活者以及民众各阶层来说，这种局面引起的社会后果像通常一样是灾难性的。共和四年获月22日（1796年7月10日），伊塞尔省的行政长官认为，由于薪金欠缺，当一名办公室主任还不如苦役犯。他写道：

“政府为任何一名苦役犯、在押犯或被判刑的犯人的支出都超出我们各办公室主任薪金的4倍。他们每日的薪金降到只有6锂2苏8德尼耶。用以维持生存的开支早就迫使他们卖掉了生活最必需的家具和用品；他们不得不去领取只发给贫民的面包。”

共和四年的冬天对于那些被飞涨的物价压垮的、依靠工资为生的人是十分可怕的。1795年的收成不佳，农民只愿接受硬币，征用再也实行不了，因此市场变得空空荡荡。督政府只得从国外进口，并严格实行消费配给制度。

在巴黎，每日1斤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了75克，其余部分由大米替代。但是因为缺乏木材，家庭主妇无法煮熟这些大米。整整一冬天，各地警察的报告都以令人厌倦的单调语气叙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满，这同投机商的骄奢淫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月28日（1796年2月17日）警察总局的报告指出：“巴黎看来很平静，但是人们的思想很动荡。人们一向认为，物价上涨是那些被称作投机商的、寡廉鲜耻的人从事非法交易的必然结果。这种长久以来毁坏了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残酷灾难对穷苦老百姓打击最大。他们的怨恨、不满和激烈的演说到处都能听到。”

人民大众不满的情绪很自然地转向督政府，并且有利于雅各宾反对派。这时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里正在讨论恢复最高限价的问题。在风月的最初几天里，警察的报告都强调指出民众各阶层动荡的加剧，并且要

求规定价格。据风月5日（1796年2月24日）的报告："工人们准备自己增加工资，但是他们说这将取决于未来的定价；……'定价'这个词被人民大众理解为降价。"

由于害怕人民大众因不满而聚集在雅各宾反对派的周围，督政府于风月日（2月26日）下令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同时它还追捕左派记者，把那些著名的雅各宾人士从政府各部门赶走。

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密谋"标志着左翼反对派采取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3.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1795—1796**年）

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中第一个解决了肯定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之间的矛盾的人。在他以前，一切忠于人民事业的政治家都曾遇到过，但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如同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巴贝夫宣告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革命应该保证人人享受平等。但是，由于私有制必然导致不平等，土地法，即地产的平分"只能维持一天"（"从它实行的第2天起，不平等又重现了"）。因此，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由《人民的保民官报》发表的《平民宣言》里提出的这一纲领，与雅各宾和无套裤汉所主张的、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组织小生产的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革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突进。"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是大革命中诞生的第一种新社会的革命思想。通过巴贝夫主义，那时还只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思想意识；通过"平等派密谋"，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了政治史。

巴贝夫主义必然会带有时代烙印。显然，自学成才的巴贝夫，他的

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阅读了卢梭、马布利的著作以及当时被认为是狄德罗的作品，而实际是摩莱里所作的《自然法典》之后产生的。但是巴贝夫超越了空想阶段，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他始终是一名积极的战士。巴贝夫的思想体系是通过同他故乡庇卡底的社会现实的接触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巴贝夫在庇卡底农村取得的经验决定了他的农业共产主义的某些特点。巴贝夫1760年出生于圣康坦，父亲是征收盐税的小雇员，母亲是不识字的女仆。他本人定居在桑泰尔的卢瓦，这是一片富庶的农业区。那里的农村公社，尤其是集体使用权和公社习惯根深蒂固，并且坚决反对把农业集中在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主手中。巴贝夫曾先后为土地赋税簿籍特派员，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4]，即封建权利的专家，并一度担任公社法院的书记官。因此，他对庇卡底的农民，对他们的问题和斗争有着切身的体会。显然是有感于这种经验，早在革命开始前他就主张事实上的平等和共产主义。在他1789年发表的《永久地籍册》里，他倾向于土地法，即1848年所谓的“平分财产者”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他1785年的关于大农庄的一篇论文和1786年6月给阿腊斯学院[5]书记杜波瓦·德·福瑟的信里，他预见到要建立“集体农庄”，即真正的“友好公社”：

“50、40、30、20个人联合起来，到这个农庄来共同生活。他们以前各自为生时终日惶惶，不得温饱。现在联合起来，很快就能走上富裕之路。”

这已经是劳动公社了。在“平等派密谋”发生前10年，巴贝夫就不仅提出了权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生产问题，预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劳动：

“把土地划为相等的小片分给个人，这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如果联合起来劳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巴贝夫的革命经验对于他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89年的人权宣言曾宣告了权利的平等。然而事实很快便表明，它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还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品，匮乏的问题，即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巴贝夫在1791年8月20日给瓦兹省的库佩的信里写道：“谁会留恋一种表面的平等？”在同年9月10日他给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库佩的信里写道：

“……因此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食品发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食品。必须实行土地法以达到真正平等。”

在热月9日以后，巴贝夫显然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大众极度的苦难事后向他表明了最高限价、统制经济和生产国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义，以及主要在共和国军队里实施的共和二年经验的重要性。巴贝夫在《平民宣言》里这样写道：

“这个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经验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我们12支军队的120万官兵进行过的实践（在小范围内可行的，大范围里也行得通）。”

巴贝夫现在放弃了土地法，因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并且他还特别声明，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在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给日耳曼的信里，他阐明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主要精神，即“人尽其才，各施所能”：

“全体劳动者和制造者都将为公仓劳动。每人都将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交给公仓。根据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确定的分配员，把整个团体的全部丰富多样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一个公民。”

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这主要是分配的共产主义。然而巴贝夫由于受到故乡庇卡底的启示，预感到在农业方面有必要实行生产的共

产主义以及建立土地劳动的集体组织。但是，他没有见到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聚和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他对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抱有偏爱。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任何对建立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把他视为经济上的悲观主义者。当时的环境局限，资本主义集约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规模生产，以至巴贝夫本人的气质和他的社会经历，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只预见到物资的匮乏和生产力的停滞，看不到生产力的高涨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这就决定了巴贝夫主义处在18世纪说教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

“平等派密谋”是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共和四年冬天里（1795—1796年），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不久后他为督政府所迫转入地下）。“平等派密谋”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小批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以及前雅各宾派（现为“先贤祠俱乐部”成员，如阿马尔、德鲁奥、兰代等）。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邦纳罗蒂却不同，他在农村公社一直很活跃的科西嘉以及热诚支持罗伯斯庇尔的意大利奥奈依这两个地方担任过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平等派密谋”制定共产主义纲领和进行政治组织建设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共和四年芽月10日（1796年3月30日），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和巴贝夫一起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安托奈尔、邦纳罗蒂、达尔泰、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尔万·马雷夏尔。巴黎12个区各有一名宣传员，在他们领导下，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当时的条件很有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谋”的政治组织采取的办法和在这之前的民众运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其外围是同情者，爱国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义上的民主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赞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后则是需要引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派密谋”的组织非常完备，但是和广大群众的必要联系似乎没有确实

的保证。因此，这种做法超越了人民起义的传统，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概念。这是马拉曾预感到而未能明确指出的问题。这种概念认为：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后，再把权力交还给根据政治民主的原则选举、甚至普选产生的议会将是很幼稚可笑的。在改造社会，建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邦纳罗蒂，这一思想传给了布朗基，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实践，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义。

面对巴贝夫主义的宣传，督政府发生了分歧。模棱两可，在各派之间调和；勒贝尔不知是否要像对付王党一样，进行一场反对雅各宾派的镇压；卡诺已义无反顾地转向主张专制保守的反动方面。根据卡诺的提议，梅兰（杜埃人）被解除警察总部部长之职，由科雄接替。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一切企图“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义进行掠夺、瓜分私有产业的人”判处死刑。

然而巴贝夫继续加紧准备。他和同时期建立的国民公会议员委员会进行了接触，并且在花月18日（1796年5月7日）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进入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建议新选出的议会。但是，从花月11日（4月30日）起，忠于起义的警察部队被解散了。更严重的是，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格里泽尔向卡诺告发了“平等派密谋”。因此，共和四年花月21日（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捕，他们的全部文件都被截获。被捕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再次被恐惧慑住了。

在格雷奈尔军营发动的哗变于共和四年果月23—24日夜间（1796年9月9—10日）失败了。它是由共和二年的人士，即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而不是巴贝夫分子发动的。他们是由卡诺和警察总部部长科雄一手制造的一起警察挑衅事件的牺牲品。在这一事件的131名被捕者当中，只有6人订阅了巴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报》。驻扎在唐普尔的一个军

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30名被告，这次审判后来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

旺多姆的审判到共和五年才得以进行。原来希望尽量少捕人，西埃耶斯等人则因担心王党借机东山再起，也赞同的主张。卡诺却显得坚定不移，并主宰着督政府。果月9—10日的夜里（8月26—27日），“平等派密谋”的成员被装在囚笼里遣送到了旺多姆。他们的妻子，其中有巴贝夫的妻子和他的长子步行跟在车队后面。直到1797年2月底案件才在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一共进行了3个月。在被宣判死刑后，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和达尔泰自杀未遂，第二天他们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

“平等派密谋”的重要意义到了19世纪才显示出来。在督政府的历史中，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显然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巴贝夫及其行动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在共和四年热月26日（1796年7月14日）巴贝夫给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的信中，他叮嘱后者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搜集起来，并且把“被当今的腐化分子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邦纳罗蒂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部著作对革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4.保王派的进展

继巴贝夫的密谋失败后，对雅各宾派的镇压把督政府推向了右边，并且使保王派的威胁上升了。

从1796年夏天起，保王派的活动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邦雅曼·贡斯当在斯塔尔夫人的建议下鼓励立宪保王派团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定支柱——督政府的周围。此时，在南方掀起了白色恐怖。那里的王党分子维络被任命为马赛军团司令。面临右派势力的猖獗，议会两院虽然维

持了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通过的大赦前恐怖分子的决定，但是他们仍投票决定把被赦免者开除公职（共和五年霜月14日，即1796年12月4日）。这一项法律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法令里针对教士的恐怖主义条文。既然有关规定不再执行，宗教在各教区又恢复起来。教士的影响只能对反动派有利，而且把雅各宾派开除公职也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卡诺越来越向右转，而拉勒韦利耶尔由于反对教会干预政治而同勒贝尔和靠近：三人督政开始对保王势力的进展警觉起来。

同时，英国和王党的阴谋确实证明右派无意和共和国安然相处，他们始终准备夺取政权。流亡在勃朗康堡布伦斯维克公爵那里的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拒绝任何让步。保王派的活动在立宪君主主义和绝对君主主义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巴黎，他们的代表布罗基耶神甫领导着一个办事处，甚至在督政府的卫队里他们也安插了内线。1796年夏，办事处建立了一个“秩序之友”协会，公开主张以君主立宪反对现政权，但暗地里它由一个名为“正统之子”的小组推动着，这些人主张通过暴动恢复绝对君主制。前制宪议会代表当德雷力主合法斗争，他把“秩序之友”协会改为“博爱学社”，为下次选举作准备。“学社”在不少省份设立分支，各分支机构中也存在着两派的对立：一派是主张合法斗争的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暴力的绝对君主派，例如在萨特省（那里的“学社”是由一名朱安党人组织的）和波尔多。金钱由伦敦提供，通过安插在瑞士的英国间谍维克汉转来。因此报刊和关于选举的宣传都得到资助。虽然共和五年雨月11日（1797年1月30日）布罗基耶被捕，他的一名同伙也被迫招供，但保王派的宣传仍在继续。

政治和社会气候确实对保王派有利。流亡者和被遣送国外的教士成群结伙地归来。宗教问题成了对反动派有利的一块沃土。大量共和派和反抗派教士一样，认为罗马天主教同共和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宪政派教会看到自己力量在削弱。1797年初在拉勒韦利耶尔支持下建立的

新崇拜形式——“有神博爱教”（每10天礼拜1次）只在少数开明资产者中有市场。反动浪潮尤其利用了财政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

在土地票垮台和恢复使用金属币以后，财政形势很艰难。继通货膨胀而来的是通货紧缩：硬币非常稀少，加上1796年是个丰收年，因此价格体系全被打乱。不过，极端贫困的人民大众至少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但是战争仍在继续。督政府竭力使收支平衡，但没能成功。议会两院出于政治考虑拒绝在财政方面作任何有效的努力。关于税收的表决为时太晚。共和五年牧月18日（1797年6月6日）才通过当年的土地税，热月14日（8月2日）才通过动产税。督政府曾建议在每个省建立由国家官员组成的直接税征收处，但是没有执行。它还提议对火药、硝石和盐课以一定数量间接税。对此，五百人院同意，元老院却反对。为了使出售国有财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恢复了拍卖，但其好处微乎其微。

财政的应急措施占了上风。征购的做法仍维持下来以保证供给军队粮食、饲料和马匹。对此可以用税收的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来支付。如同放弃了统制经济后的热月党一样，督政府也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家、银行家、供应商和军火商。它落到了受他们支配的地步。在使用了各种招数，包括抵押王冠上的钻石（其中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重137克拉的大钻石），转让巴达维亚期票（即根据海牙条约荷兰对法国的战争赔款）之后，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的法律授权督政府可以使用国有财产作为支付手段。某一供应商就这样在诺尔省得到了600公顷土地。不久后竟然发展到向债主转让某项国家收入的地步。这种所谓的“债权转移”，实际是恢复了旧制度时实行的“预先付款”的办法。于是，有人获得了在国家森林的伐木权，有人得到某一省的税收权，向意大利方面军供应军需的弗拉沙公司则获得了拍卖在利弗纳截获的英国货品的权利。

财政措施的弊端、政府的无能、一小撮政客（以为代表，还有金融家乌弗拉以及富歇、塔莱朗等人）的唯利是图使贪污腐化恶性膨胀起来。有人因囤积食盐致富，有人则搞国有财产投机而发财。伤风败俗也蔚然成风，尤其使观察家震惊的是，这和共和二年斯巴达式的风尚简直有天渊之别。但此风只侵染到一小撮暴发的有闲阶层。他们以疯狂地寻欢作乐为常事。有人笼统地称此为“督政府时期的社会”。这个社会为第一帝国时期上流社会的风气开了先河，不过它更为放荡，但在排场之奢华上仍稍逊一筹。政府里共有两个人属于这个糜烂社会：一个是原子爵；另一个是原主教塔莱朗。商人、暴发的新贵、银行家、供应商、股票和债券投机商以及发革命财的人都麇集在这两人的周围。但是他们随时准备为了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政权而出卖现政权。

现政权在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丧失威信。各级官员只能不定期地得到薪俸。各公共机构由于缺乏经费很难开动起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督政府把法院、中心学校和公共救济交给各地方负担。然而，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和中央政府一样糟糕。当政府有能力时，年金的1/4由硬币支付，其余的3/4则用税务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支付。这些票据又被投机商用极低廉的价格收买。共和五年的选举临近时，督政府财政上的无能加剧了人民大众的不满，而这对敌对的保王派却十分有利。

Ⅱ.对外征战（**1796—1797**年）

自从革命政府垮台以及它的国防政策彻底失败后，战争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这些性质在第一督政府时期更加明朗了。战争不再由统制经济支持（统制经济已变为自由经营和自由赢利），军队的物质形势恶化了。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更有甚者，那些不再受革命政府和恐怖时期的平均主义约束的将军们正在摆脱政权机构的监护，并且任凭自己的野心膨胀。在这方面，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由个人野心支配的冒险性活动取代了国家利益。当这种倾向被笼罩在胜利的光辉之中时便显得更加危险。

1.第一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第一督政府时期军队在继续堕落，因为在军队和其他部门一样，督政府只是继续执行热月党的政策。纸币的破产、政府财政上的无能以及供应商的舞弊，不免也影响到吃得很坏、穿得很差、待遇很可怜的士兵的条件。穷困对部队的数量也产生了影响。不服从征召和开小差的恶习侵蚀着共和国的军队。五百人院责成一委员会起草一项抑制这种恶习的法案。共和四年雾月19日（1795年11月10日），议员迪皮伊揭露了造成这种恶习的深刻原因：

“敌人利用反动势力同情者的热狂，使你们把一切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恶习的强制手段都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仅恐怖主义这个词就为反法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胜过任何武器。我巡视了共和国的几个省，看到一帮帮的逃兵在路上逛荡，像我一样逍遥自在，没有任何人依据反逃兵法去逮捕他们。怎么回事呢？听说他们的家长一般都是市长或市政官员……况且，这些官员如果执法严明，还有成为那种可恶的、曾使法兰西尸横遍野的反动势力牺牲品的危险。”

这就充分揭示了这种恶习的根源。由于对共和二年的一切回忆都怀有强烈的仇恨，并且企图拉拢反动派以钳制人民的斗争，督政府和热月党国民公会一样，在制止这种恶习方面是软弱无能的。

同时，军队的士气也在发生变化。显然，在军队里共和二年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前贵族和教士的敌视以及对王政的仇恨很强烈。但是革命的火焰没有维持，革命的热情也在逐渐淡漠。对共和二年人们提出的暴力思想很敏感的部队，跟不上督政府折中政策的千变万化，也不能热情地赞同显贵们的中庸思想。军队同现政权越来越疏远，它对老百姓也更加蔑视。于是出现了一个在第一帝国初期广泛使用的字眼“佩坎”（指平民百姓）。由于军事机构本身的特点，民主感情仍然得以保持。即使像民主选举产生军官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设立陪审团等民主程序被取消了，

在军人晋升时，知识占的分量始终很小，聪明才智和勇敢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一名普通战士只要勇敢，就有希望很快晋升到最高层。当然这不免会鼓励野心和冒险精神。

一直支持着军队的民族感情此时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自从实行“全民总动员”以来，部队的人员再也未更换。对外征战使军队远离法国，渐渐地士兵们同国内的老百姓越来越脱离。由于部队驻扎在国外，它们必然变成为职业军队，变得只听从指挥他们的将军。对国家的忠诚慢慢地让位于对一名长官、对冒险精神、不久又变为对掠夺精神的忠诚。共和二年时，人们曾作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加强军队和人民的联系。然而此时，人们却竭力要士兵们忘记自己也是公民。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2月12日的演说里强调：“只有当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时”，才能取得胜利。而在意大利战役前夕，波拿巴在1796年3月26日的宣言里却声称：

“士兵们，你们一无所有，吃得很差。我要把你们带到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去。富饶的省份，豪华的城市将要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将在那里找到名誉、光荣和财富……”

爱国主义被抽空了共和主义与人道的内涵，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公民责任感和革命热情很快被对外国的蔑视，对军事荣誉的追求以及民族虚荣心所替代。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很快便极力颂扬“习惯于征服的伟大的民族”。这是从第一督政府末期起开始流行的、引起人们骄傲的一句话。第一帝国认可了它。

由救国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建造起来的战争工具，在投入1796年的战役前夕，同反法联盟各国旧制度的军队相比仍然是优越百倍的。为了加强在将领和供应商面前的权威，督政府效仿特派员制度，设立了派往各部队的“军事委员”，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军事委员或是督政府，它们在将军们的面前没有“强制力”。现在，将军们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波拿巴的军事天才使他进入了最高层。在制订战略原则，组成和

使用战术单位等方面，波拿巴的天才不久就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他在总的方面仍然是忠于革命传统的。他革新了战争艺术，而他使用的是革命创建起来的民族军队。

2.波拿巴在意大利（**1796—1797**年）

自从1795年签订各项条约以来，反法联盟的规模缩小了，其主要成员只有英国和奥地利。显然，军事和财政形势都不佳的奥地利，假如能肯定得到象巴塞尔条约规定的向普鲁士所作的补偿，它本来也会放弃莱茵河左岸的。至于英国，因为受到带有严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威胁，尽管它一直讨厌看到法国在荷兰站住脚跟，但它这时也没有能力在大陆再进行一场军事行动。

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早已由被看作不可更改的“法定边界”的概念所规定：共和三年宪法的第332条绝对禁止“割让共和国领土”。兼并比利时是得到曾通过宪法的公民投票确认的。对阿维尼翁和萨瓦的兼并更是如此。只剩下莱茵河左岸的问题了。跟在右派后面走的卡诺主张实行从前的、然而是经过改善的边界；而领导外交的勒贝尔却主张“自然疆界”，也就是同意兼并。他企图在自然疆界外获得一些抵押品，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张得到了督政府的赞同。为了把这些条件强加给奥地利和英国，就不能被动地听任征战自然地发展。

卡诺制订的1796年战争计划规定德意志南部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莱茵-莫塞尔方面军分别在儒尔当和莫罗指挥下将向维也纳挺进；而不太重要的阿尔卑斯方面军和意大利方面军分别在凯莱曼和谢雷指挥下将夺取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并把它们作为谈判的筹码。集中在布雷斯特的爱尔兰方面军在奥什的指挥下将对英国起威慑作用。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四年风月12日（1796年3月2日），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取代谢雷。它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因此被打乱了。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个亲法的小贵族

家庭。1779年他成为王家奥顿中学的奖学金生，后来进入巴黎军事学校附属的王家布里埃纳中学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贵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岁的波拿巴在参加会考时，在58名应考生中取得第42名。从此，他被任命为炮兵助理中尉。从瓦朗斯到奥索纳，然后又回到瓦朗斯，在这些迁移中他过的是军营里小军官的那种清苦的、无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爱国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爱国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岛多次逗留期间，波拿巴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得不到保利的信任，当保利和国民公会闹翻、求助英国人时，波拿巴于1793年6月离开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上尉，并被派往阿维尼翁组织火药运输队。这时他真诚地拥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博凯尔的晚餐》的书，并且得到国库的资助，于1793年8月在阿维尼翁印刷出版。此书的内容是1名军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制造商以及马赛的1名商人之间的谈话。其大意是人们说服倾向吉伦特派的马赛人，要他相信“山岳派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国民公会是“团结的中心”，必须拯救“处在最残酷的反法联盟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因为它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离开了故乡科西嘉并放弃了该岛独立的幻想。波拿巴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来。他的同乡、特派员萨利赛蒂于1793年9月17日把包围土伦的炮兵部队交给他指挥。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12月19日土伦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晋升为准将。意大利方面军的特派员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保荐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夸奖了“公民波拿巴出类拔萃的优点。”

热月政变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事件于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传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员撤去了指挥职务，并且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被关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但是他的军事生涯遭到了奥布里的阻挠。这是一名隐藏的吉伦特分子，而且是国民公会军事问题的报告人。他激烈批评波

拿巴“过早地晋升和具有无节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为西部军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绝了。6月，当他被任命为西部军的步兵将军时，他再次拒绝。

从那时起，公民波拿巴变成了寻找自己道路的冒险家。热月的失宠仿佛打断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除了自己的野心，他不再有任何准则。有几个月他的处境很凄惨。葡月使他重新投入洪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这一天他所起的作用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美称。从此，他依靠得到不断晋升的前途有了保障。10月16日他还是一名少将，26日就被任命为国内方面军的总司令。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波拿巴和约瑟芬·塔谢·德·拉帕日里的爱情。约瑟芬比他年长6岁，是1794年被处以绞刑的博阿尔内子爵的遗孀。据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是个已经有点厌倦的女人，但仍很迷人，并且很有经验。波拿巴给“温柔的、无与伦比的约瑟芬”的第一封信写于1795年10月28日。这种炽烈的情火在他写于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全部信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信件对嘉奖、功名嗤之以鼻。乔治·勒费弗尔写道：“很难相信波拿巴不知道约瑟芬和的关系，没意识到她对后者的影响可以对自己有用。”

1796年3月2日，波拿巴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取代了谢雷。9日，他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结成了夫妇。两天后他离开巴黎前往设在热那亚海岸的萨沃纳司令部。

意大利战争决定了反对奥地利斗争的命运。战争计划早在共和二年就由救国委员会制定出来：在征服皮埃蒙特之后，先夺取伦巴第，然后通过阿尔卑斯山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波拿巴带着3.8万名战士，4.8万金法郎和10万法郎汇票（没有被全部接受）投入了战争。战争进行的速度极其迅猛。

在皮埃蒙特，波拿巴只用了十几天，经过蒙特诺特战役（1796年4月12日）、米尔西莫和蒙多维战役（4月21日），成功地把博利厄指挥

下的3.5万名奥地利军和科利部下的1.2万名皮埃蒙特军隔离开，并迫使科利退守都灵。4月28日，撒丁国王签订了谢拉斯科停战协定。根据1796年5月15日签订的巴黎条约，撒丁国王把萨瓦以及尼斯、唐德和伯依3块伯爵领地割让给法国。

在伦巴第，波拿巴把博利厄赶到了波河以北，赶过了泰森河。然后，他挥师南下，从普莱藏斯渡过波河，在阿达的洛迪桥（5月10日）一举击溃敌军，1796年5月15日进入了米兰。后来司汤达在他的《帕尔马修道院》里写道："全世界发现，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有了一个继承人。"越过曼乔河之后，5月30日波拿巴包围了芒图。帕尔马和莫代纳公爵签订了停战协定，波洛涅城向法国人敞开。6月23日，罗马教廷也接受了一项协议。被征服的国家被迫缴纳沉重的战争赔款，这激起了一部分居民反对占领者。只有主张成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的当地雅各宾派站在法国人一边。而督政府只是想夺取一些筹码以便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在此期间它尽量盘剥被占领国家：波拿巴可能从意大利掠夺到5 000多万，其中的1 000万交给了督政府。然而奥地利人始终控制着通向阿尔卑斯山的交通要道芒图。奥地利军队曾4次从阿尔卑斯山下来企图为芒图解围。但是乌尔姆塞尔率领的部队于8月5日在卡斯蒂格利奥纳被击败，1796年9月8日再败于巴萨诺。阿尔温克齐的部队经过11月14—17日在阿科尔周围浴血奋战后也被击退，1797年1月14日在里沃利再次被打败。2月2日芒图投降，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打通了。

德意志战争并没有取得督政府所期待的决定性成功。担负主要任务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部队计划通过多瑙河谷到达维也纳。1796年5月31日儒尔当越过莱茵河，但被查理大公[6]击退了。可是，由于同莫罗对峙的乌尔姆塞尔在波拿巴得胜后被派往意大利，法军对查理大公重新发起了进攻。6月24日莫罗渡过莱茵河到达慕尼黑。与此同时，儒尔当先后夺取了科隆和法兰克福，并于8月一直挺进到与波希米亚的交界处。但是

法国军队没有会师。查理大公趁机对它们分别出击，首先逼使在马因河谷两次被打败的儒尔当于1796年9月底撤回莱茵河左岸。莫罗被发现后也不得不撤退。由于大公竭力切断他的退路，莫罗率部进入黑森林地区的隘路。1796年10月26日他在于南格渡过了莱茵河。冬天，凯尔和于南格两座桥头堡丢失了。

在奥什率领下对爱尔兰的远征也遭到失败。法国舰队于1796年12月起航，被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1797年1月，督政府下令没收在法国领土上的一切英国商品。英国的经济形势恶化，逼使它进行谈判。1796年10—12月英法曾在里尔进行过谈判，当时英国方面以马尔迈斯比里为代表，比利时问题导致了这次谈判的破裂。

因此，在1797年战役的前夕，意大利方面军成为督政府主要的希望所在。波拿巴恢复了被占领国的和平。他完全不顾督政府的指示，于1796年10月15日在莫代纳和从教皇那里夺得的几块领土上建立了“波南共和国”。1797年2月19日，他同教皇庇护六世签订了托朗蒂诺条约。督政府要求他摧毁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波拿巴却满足于得到几百万赔款和迫使教皇割让阿维尼翁、弗内森伯爵领地以及其他几块领地。他的政策越来越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797年3月20日，法军重新发起了对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奥军由查理大公率领并在人员上大为加强。波拿巴强行通过了塔格利亚曼托隘口，然后越过塔尔维山口，先头部队在马赛纳率领下到达塞姆芒。

同时，在德意志南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在奥什率领下于1797年4月16日越过莱茵河，18日在科隆附近的纽维德获胜。莫罗也开始行动。但是在1797年4月18日这同一天，波拿巴在斯蒂里亚的莱奥本和奥地利同时签订了停战协议与和平条约的预备性条文。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十分珍视他的胜利成果，害怕被人抢先当上和平使者。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确认了波拿巴意大利政策的胜利，但是没有实现莱茵河的自然边

界。然而国内政治的发展迫使督政府只得认可既成的事实。

III.果月与康波福米奥（1797年）

在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中保王派取得了胜利。国内形势以及舆论的厌倦使督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将军们。督政府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绝对不可能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共和国。而它对外政策的方向必然取决于国内危机如何解决。反法联盟对此完全了解，因此它设法拖延莱奥本停战后在于迪纳开始的谈判，以及后来由英国特使马尔迈斯比里在里尔恢复的谈判。假如保王的右派获胜，英奥就希望得到更优惠的条件。因此，督政府和波拿巴的团结加强了。波拿巴知道，保王的两院绝不会同意他的意大利政策。获月5日（1797年6月23日），因为威尼斯事件，波拿巴在两院遭到严厉的抨击。至于督政府，它又怎能拒绝救星的要求呢？通过互相影响和让步，果月的政变和康波福米奥条约紧紧相连。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则是波拿巴。

1.共和五年的选举和反动派

尽管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了辉煌战绩，而且督政府也曾想利用这些战绩。但是，共和五年芽月议会两院的选举（更换1/3议员，其中有1/2是前国民公会议员）仍然受到保王派的影响。选举活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除了十几个省外，各地的督政派都遭到了惨败，只有11名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当选，而且其中有好几名保王分子。新当选的1/3议员大大加强了王党右派的势力。

正当督政府发生分歧时，反动阵营却立刻组织起来。得到拉勒韦利耶尔支持的勒贝尔意识到眼前的危急，主张必要时宣布选举无效，把形势重新掌握在手。卡诺屈从于选举的结果，拒绝了这一主张。则像往常一样持保留态度。牧月1日（1797年5月20日）两院集会，指定巴尔贝-马尔波瓦为元老院议长，汝拉地区当选的皮什格吕为五百人院议长。勒图尔纳经抽签被确定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于是两院就在这一天决定由

巴塞尔条约的谈判使者、声名狼藉的君权主义者巴泰勒米接替他。然而右派有点犹豫。他们在“克利希俱乐部”集会，但未能确定政策。主张立即复辟的“白色雅各宾派”只是少数，占多数的君主立宪派反对使用暴力。号称“肚皮派”的小集团也倾向保王党，主张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并且等待时机。“白色雅各宾派”希望皮什格吕能发动一场政变，但皮什格吕表现得优柔寡断。

反动派采取的措施有利于流亡者的家属和教士。由于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的规定，流亡者的家属重新可以担任公职。果月7日（1797年8月24日）的法律取消了1792年和1793年的镇压措施。然而，教会的成员仍须发表忠于法律的声明，反流亡者法律的主要部分继续有效，被赦免的恐怖主义分子被允许重新担任公职。在外地各省，反动势力通常很嚣张。博爱学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得到发展。流亡者纷纷归来，被放逐的教士到处自由来往，而获得国有财产的人却遭到了攻击。在普罗旺斯再次发生暴力事件，督政府只得派兵前往镇压。共和派力图团结在各立宪派俱乐部里，以对抗反动势力的嚣张。但是，督政府害怕这样会加强雅各宾势力的影响，因此听任两院于热月5日（1797年7月23日）把它们取消。督政府的这种消极状态助长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他们试图剥夺督政府全部的财政权，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牧月30日（1797年6月18日）五百人院决定把全部财政权交给长期以来以反革命著称的国库，不过元老院拒绝了这一议案。

督政府同两院的冲突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这时不再继续观望，转而支持勒贝尔和拉勒韦利耶尔反对卡诺和巴泰勒米。他的抉择在卡诺为取悦右派而更换部长的时候公诸于世了。热月26日（1797年7月14日），被保王派憎恨的梅兰和拉梅尔保留了原职，由斯塔尔夫人介绍给的塔莱朗被任命为对外关系部长，奥什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因为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十几天来一直在向巴黎进军。

2.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1797**年**9**月**4**日）

共和五年芽月选举引起的督政府和两院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在没有任何宪法程序的情况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号召人民；或是像葡月13日那样诉诸于军队。显贵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排除第一种可能性，拉勒韦利耶尔事先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结果只能是求助军队。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的波拿巴和奥什同意了。获月，波拿巴提供了皮什格吕背叛的证据，这是在保王派特务当特雷格的文件里发现的一份材料。获月13日（1797年7月1日）奥什命令部队向巴黎进军。于是督政府只得听命于将军们，尤其听命于波拿巴。他支持政府反对两院只是为了迫使其接受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和他的意大利政策。

获月28日（1797年7月16日）当两院得知政府改组以及军队进入法律规定的禁区后，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危险。他们准备对3名督政官——、拉勒韦利耶尔和勒贝尔提出控告。获悉皮什格吕已经背叛的卡诺拒绝赞同复旧。热月25日（1797年8月12日），议会两院为了武装富人居住区的资产阶级，下令组建国民自卫军精锐连队。这时督政府也加紧防范准备。波拿巴派奥日罗担任指挥，一些小股部队利用各种借口进入了巴黎。果月10日（1797年8月27日）拉勒韦利耶尔向“山内共和国”[7]的特使声明：“督政府决不同共和国的敌人妥协”。右派决心使用武力，但“三督政”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共和五年果月18日晨（1797年9月4日），巴黎被军队占领了。皮什格吕和12名议员被捕并监禁在唐普尔，巴泰勒米也遭到同样下场。卡诺逃脱了。政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一项法令规定，凡企图复辟王政或1793年制宪议会者立即枪决。果月19日（9月5日）夜里，两院集会投票通过了“三督政”提出的特别措施。49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177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并不予替补；包括卡诺、巴泰勒米和皮什格吕在内的65人被判处流放圭亚那（人称“不流血的断头机”）。杜邦·德·内穆尔等议员辞职。两院里的多数颠倒了过来。

对流亡者和教士的镇压措施重新生效：流亡者必须在15天之内离开法国，否则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再度被逐出各公职岗位，甚至被取消投票权；曾被放逐的归国教士必须再次流亡国外，否则要被流放到圭亚那；教会所有的教士必须宣誓憎恨王政和1793年宪法。对反对派的报刊也采取了严厉措施，42家报纸被取缔。与此同时，俱乐部被允许恢复活动。督政府的权力增大了，它被授权清洗各级行政机构和法院，可随意宣布戒严。

果月18日政变对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起来的自由共和国体制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右翼反对派遭到严重打击，他们因立法机构被削弱而非常恼怒，准备伺机报复。政变靠将军们及其部队的支持才得以成功。督政府认为军队的力量已不十分可怕，因为这时大陆实现了和平。然而，这并不是自然疆界的和平，而是威望与日俱增的意大利征服者的和平。随着其威望的增大，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康波福米奥和约（**1797**年**10**月**18**日）

1797年4月18日由波拿巴签订的莱奥本和约预备性条文仿佛标志着回到了旧制度时的外交路线。督政府企图利用伦巴第作为取得莱茵河左岸的筹码，波拿巴便用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土换取了伦巴第。这样，奥地利就得到了亚得里亚海的入海口。奥地利虽然放弃了比利时，但莱茵河左岸的命运仍悬而未决。这将要在同帝国举行的一次旨在缔结和约的会议上予以讨论。这就彻底破坏了督政府的莱茵河政策。然而督政府仍然批准了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因为国内形势迫使它只得这样做。唯有勒贝尔投票反对，因为他的关于莱茵河左岸的民族政策被牺牲了。

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迅速地发展起来。他支配着意大利。在伦巴第、瓦尔特利纳、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陆地和波南共和国的基础上，他建立了山南共和国，并为它制定了一部宪法。在热那亚，原来的共和国被意大利雅各宾派改为利古里亚共和国。1797年5月2日，波拿巴向威

尼斯共和国宣战，12日攻入了威尼斯。于是他在于迪纳同奥地利政府代表开始了缔结永久和平的谈判。

同时，英国也决心重开谈判。不久前它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银行和财政危机；爱尔兰爆发了起义；1797年春舰队里的反叛此起彼伏。7月，皮特派遣马尔迈斯比里前往里尔重开谈判。

此时，里尔和于迪纳两地的谈判都毫无结果。只要法国国内危机尚未缓解，一切都只能悬而不决，因为反法联盟各国期望法国保王的右派得势，以便得到更有利的条件。但是，果月18日政变的成功使勒贝尔领导的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加强硬了。里尔的谈判（1797年7—9月）失败了。督政府要求恢复法国及其盟国的殖民地，但并不要求恢复在大陆上征服过的地盘；英国拒绝放弃从荷兰手里夺来的开普敦和锡兰，由此造成了谈判的破裂。于迪纳的谈判是在波拿巴和奥地利首相蒂居的特使科本兹尔之间进行的。

康波福米奥条约是1797年10月18日在波拿巴的驻扎地帕萨里亚诺签订的。波拿巴不顾督政府要求取得莱茵河左岸和重建威尼斯的指示，竟然把伊斯特里亚、达尔马西、卡塔罗河口、威尼斯城以及直到阿迪日的威尼斯陆上领土都让给了奥地利。在原威尼斯领土上，法国只保留了爱奥尼亚群岛（科尔富、藏特、塞法洛尼……）；奥地利则承认山内共和国为“强大的独立国家”，它还放弃了比利时。至于莱茵河左岸，在秘密条文里，奥地利同意法国一直兼并到莱茵河同奈特河的汇合处（即前特雷弗和美因兹选帝候的领地帕拉蒂纳），但科隆地区除外。奥方承诺，在法国和帝国在拉斯塔特举行的会议上，将“进行斡旋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取得这条边界线”。督政府虽然很失望，但仍然批准了条约。它怎么能抵制呢？在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里，当人们得知实现和平时都禁不住欢喜雀跃起来。于是督政府只得同意。

革命的民族违背了原则，“拿别国人民作了交易”。为了同奥地利达

成一项不稳固的协议，法国抛弃了同普鲁士的结盟。奥地利虽然战败，但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毫无损失，因为它用伦巴第换取了威尼斯的部分领土。与民族传统和民族意志格格不入的波拿巴“意大利体制”战胜了督政府的“莱茵河体制”。这时的波拿巴早已开始酝酿新的计划了。在康波福米奥谈判中，他对奥国全权特使科本兹尔宣称：“法兰西共和国把地中海视为自己的海洋，并且要在那里称霸。”同时，他促使督政府夺取马耳他，他说：“这个小岛不用我们付出任何代价。”

在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和地中海计划里，战争已经开始酝酿。果月18日政府借助了军队的力量，这加强了军队在共和国中的作用。督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将军们的行动。

---

[1] 法国边界在大西洋、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方面都已是自然的疆界，唯有东北边还不是。1789年，克洛茨著书主张法国应扩充到莱茵河，以完成自然的边界。从此，“自然疆界”就成为法国扩张主义的目标。——译者

[2] 1个德尼耶相当于1/12苏。——译者

[3] 1法郎与1锂的价值相等。——译者

[4] 据索布尔《法国革命》端木正译本第222页译者注：“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Feudiste）这个职业是旧制度末期封建领主所雇用的人，专从一些古旧的封建文契寻找生财之道的剥削农民的“法律根据”，以便重新严格主张那些久已被遗忘，甚至若干世纪没有运用的“权利”。

[5] académie在此意为学术机构，其成员为当地有名望的学者，性质与设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相同，但彼此是独立的。——译者

[6] 查理大公是奥地利皇帝弗朗索瓦二世的三弟，在欧洲反动王公贵族军官中，尚属能战者。——译者

[7] “山内共和国”指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借用古罗马时的用名，共和国以米兰为首都，至1802年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译者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在果月政变和康波福米奥和约之后，督政府在国内广泛采用了专制的办法。它取得了某些成效，同时也为以后的执政府作了行政上的准备。但是，政治上的稳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政权的社会基础同热月党的社会基础同样狭窄。只要大陆和平继续维持，现政权便能存在下去。但这必须以损害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实施为代价。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和重新开战引起了最终的危机。雾月18日既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显贵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但是政变既诉诸于军队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显贵们也由此失去了政权。

Ⅰ.镇压与改革（1797—1798年）

政府的组成在果月政变后有了变动，但是在人员和机构方面仍然很不稳定。政府成员部分地更新了。督政府内卡诺和巴泰勒米分别由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他仅是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杜埃人梅兰（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替代。在前部长中只有拉梅尔留任，其余的部长除了接替司法部长梅兰的比利时人朗布雷奇外都很平庸。实际上，执行机构的行动总要受共和三年宪法中有关自由主义的规定所钳制。它对议会两院和国库没有任何法定的干预权。于是产生了加强执行机构权力的想法。但是修改宪法的程序极其复杂，根据宪法第338条，这需要9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问题摆在那里，一切都可能被每年一度的选举结果否定掉。

1.特别政策

果月政变后建立起来的特别政权虽然被称作“督政府的恐怖”，但它不过是共和二年政权苍白无力的返照。对于热月派资产阶级来说，不可能实行救国委员会曾实施过的经济独裁，并且督政府始终不具备革命政府所特有的“强制力”。确实，由于实现了大陆和平，并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已蜕化为小股的匪帮，当时的危险并不严重。一些军事委员会粉碎了果月18日以后在圣灵桥、卡庞特拉和蒙托邦等地发生的骚乱。共和六年雪月30日（1798年1月19日）的法律规定，凡两人以上合伙谋杀者将判处死刑。镇压的治安性质比恐怖成分更明显。搜查住宅、行政拘留、

干涉通信秘密、限制报刊的自由（并未恢复检查制度，而是取缔了大量报纸，如在共和四年霜月16日和27日，即1797年12月6日和17日）、监视剧院、清洗行政人员，所有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流亡者和教士这两类人。它们并不是根据新的立法，而是严格执行现存的法律。

对付流亡者，只需使用根据果月19日法律重新生效的一系列立法。共和六年，各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160名归来的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如絮尔维尔确实曾在阿尔代什重新拿起过武器。有的人可能走得更远。西埃耶斯在这方面象征着既要摧毁贵族，又要摧毁民主的革命资产阶级。他提出要消灭一切贵族。他的主张未被接受，但是根据他的提议却通过了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法律，把贵族置于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

“前贵族和被授予爵位的人，只有在具备根据宪法第10条关于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的条件和期限后，才能在各地初级议会、市镇议会和选举议会里行使法兰西公民权，才能被任命担任公职。”

这项法律的实施细则从未规定，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1792年和1793年针对教士的法律继续有效。但是，对于归国的被流放教士不再流放到圭亚那，即“不流血的断头机”，取而代之的是默许的死刑。一些被列入流亡者名单的教士因此被枪决。此外，督政府可以通过个人签署的法令，把即使遵纪守法但拒绝根据果月19日（1797年9月5日）规定宣誓憎恨王政的一切教士流放。大约有1 700—1 800名教士受到这些措施的制裁。263名教士被流放到圭亚那，1 000名教士被拘禁在雷岛或奥莱隆岛。

果月18日政变后，督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激烈地反教会的。果月19日法律的第25条要求严格执行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法律关于宗教崇拜活动及其治安问题的规定：任何公开仪式，任何崇拜的外部

标志都被禁止。共和六年热月17日（1798年8月4日）法律规定必须遵守10天一旬制；果月23日（1798年9月9日）的法律又规定必须使用共和历。它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和美妙的创造”，现在称作“共和国年鉴”，无论平民和官员都必须遵守。共和六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的法律规定，私立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必须接受市政当局的视察，“以便了解那里是否遵守10天一旬制，是否庆祝共和国的节日，是否对公民的名称引以为荣”。人权和宪法的权利应该是“学校启蒙教育的基础”。由国民公会规定的旬末节和全国性节日必须按期庆祝。有的人甚至想走得更远，使共和国成为与天主教对立的一种真正的世俗宗教。督政府的大多数拒绝重新搞“最高主宰”崇拜。但是拉勒韦利耶尔却竭力推荐由书商舍曼于1797年1月创立的“对上帝的崇拜者和人类的朋友顶礼膜拜”的“有神博爱教”。这种新教宣扬，“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信条和道义”，它企图“通过宗教把人们同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职责联系起来”。虽然它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从未能触及到普通老百姓。拉勒韦利耶尔被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谴责为鼓动宗教狂热。

督政府终于激怒了广大的信徒。但是它遏制了教会反对派和那些拒绝宣誓憎恨王政的教士们的反对。特别措施使它能在一段时间里削弱反革命势力。雅各宾派想利用当时的形势，督政府则准备用特别措施对付他们。

2.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和对雅各宾派的镇压

准备共和六年选举很快成为果月18日后督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被开除的议员加上两院1/3任期已满的成员，共有473名议员要被替换，其中包括一半前国民公会议员。这一变动的意义极为重要。现政权通过共和六年雨月12日（1798年1月31日）的法律做好了防备，法律授权现任的两院审查新当选议员的权限（应当理解为清洗）。然而很快就显示出来，威胁政权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被果月镇压吓坏的、并已经瓦解的保王派，而是来自左面的反对派。

果月18日以后，“新雅各宾派”的宣传主要通过各“立宪派联谊会”迅速开展起来。大量被任命替代被清洗分子的特派员和各行政长官都支持这些联谊会。督政府感到了危险，于是就利用社会上对当时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新雅各宾派的恐惧，提前下手把任何民主的企图置于死地。风月9日（1798年2月27日），在平等宫“立宪派联谊会”（又称萨尔姆俱乐部），邦雅曼·贡斯当提出了4点政纲：“为恐怖主义恢复荣誉；警惕专制危险；给王政主义应有的鄙视；准备选举以巩固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国是指共和三年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共和国。“立法者的一切手段都在于维持、巩固和确保”财产权。

督政府在选举前给全体法国人（雨月28日，即1798年2月16日）、各地初级议会（风月9日，即2月27日）和各地选民（芽月4日，即3月24日）的致词里都阐明了同样的论点。它揭露了两重危险，即“来自两方面的反对派”，并提出了：“既不要恐怖，也不要反动！既不要王政，也不要专政！”的口号。督政府不顾关于共和派的分裂将产生有害后果的警告，以反对雅各宾主义和过激为借口，准备清除反对派，加强自身的权威。

共和六年的选举是在政府加强了行政压力并经过精心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选举过程中，在各选举议会里发生了由梅兰挑动的多起分裂，这使得督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选举结果有效与否。在巴黎，当左派占多数的选举议会在奥拉托利大厅集会时，另一个在政府授意下由609名选举人中的212名“分裂分子”组成的大会却在法兰西研究院召开。新当选的议员没有任何可以恐吓资产阶级的手段，而督政府却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个顺从的多数派。两院里拥护督政府的议员支持由分裂派选出的议员，并要求宣布他们的当选有效。花月8日（1798年4月27日），雷尼耶在元老院宣称：“为了保证法国不再看到革命恐怖重新出现在法兰西大地上，你们必须宣告，戴红帽的保王派的危险性毫不次于戴白帽徽的保王派。他们将不得进入此地，除非从你们身体上踩过。”花月18日

（5月7日），谢尼耶同时谴责“保王乱党”和“无政府乱党”。五百人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串通一气，不顾儒尔当将军的抗议，通过了开除新当选议员的名单。元老院也屈从了。

政府揭露了一起“分为两股的阴谋”后，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的法令宣布并没有发生过分裂的8个省的选举结果无效；对19个省由分裂派议会选出的议员给予承认；取消了60名法官或行政官员的当选议员资格。总共有106名议员被宣告当选无效。相反，政府提出的191名候选人被选入两院。其中85名是督政府任命的特派员和官员，另106名是法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在理论上是经选举当上议员的，但实际上其中很多人是由政府安插的。督政们就这样掌握了两院大多数，但由于采取了这些虚伪的暴力措施，政府的威信则更为下降。政府的威望并不因为它在花月27日（1798年5月16日）改组时任命特雷拉尔接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而有所回升。新任督政官是律师、前立宪派和弑君派国民公会议员。他是个第二流的人物，并且是一个拙劣的政治家。然而执行机构在一段时期里还是得到了加强，这使它能把果月政变后开始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3.第二督政府进行的改革

从共和六年花月到共和七年芽月的选举，从1798年春到第二年春天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督政府重新获得了某种平衡和力量。经过清洗的两院不再是反对派了。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法国的经济和财政改组开始了。有两名部长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们是财政部长拉梅尔和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这项主要在行政方面进行的持久性改革事业为波拿巴后来的改革作了准备。共和六年和七年的法律为执政制奠定了基础。

财政的复兴和税务的改革在果月政变后立即开始。

“2/3破产法”（又称“拉梅尔清算法”）通过共和六年葡月9日（1797

年9月30日）的财政法解决了登入“公债大册”里的债务问题，通过霜月24日（1797年12月14日）的法令解决了国家拖欠的债务问题。有1/3的债务因被登入“公债大册”而得到保证，过期未付的款项不用硬币支付，而是用“1/3保证票”的票据来代替。持票人能以此缴纳税收或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货币部分。“1/3保证票”免征一切税收。其他2/3被调整的债务用国库发的票据支付，持票人可用来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其余部分。这样，国家预算减轻了1.6亿多，以此作为偿还2/3债务的利息的费用。实行破产使形势好转。后来的执政府得益匪浅，它还通过一次补充破产清算了过去遗留的问题。1801年3月，“2/3调整票”被兑换为债券，其利息为5%，按本金的0.25%计算，这意味着它比共和六年的面值损失了95%。

税收的改革旨在增加收入并使之经常化，从而使预算得到平衡。

直接税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1789年以来的有关原则被废除了。制宪议会曾规定只有民选的机构才能制订直接纳税人名册并征收税金。共和六年雾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令决定在每省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长的“直接税办事处”，由督政府特派员以及负责决定课税基数和收税的官员组成。这一项法律为波拿巴共和八年的改组提供了模式。

税务制度彻底改革了。共和七年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令设立了一项新的直接税——门窗税，这是根据住宅规模大小估算的、对收入的一种总税收。1798年秋起，现有的各类税收都进行了调整，如营业税（10月份）、土地税（11月份）、动产税（12月份）。间接税也稍有恢复。五百人院通过的盐税遭到元老院否决，对进口烟草的税金略微有所提高。此外还规定对公路征收所谓“买路钱”以及对公共车辆座位征收相当票价10%的税金。印花税额有所增加，并且还扩大到报纸和广告。共和七年葡月27日（1798年10月18日）的法令恢复了巴黎的入市税，以保证公共救济资金的来源。共和七年霜月22日（1798年12月12

日）的法令改革了税收登记办法。以上的改革都很有成效，这些税务法令的基本部分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但是财政赤字尚未消灭。共和六年赤字达到2.5亿。拉梅尔估计共和七年赤字为6 600万。于是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出售国有财产、借贷、剥削被占领国家（远征埃及的部分经费由伯尔尼金库支出）。督政府现在完全受气焰嚣张的金融家、供应商和实业家的摆布。贪污腐化日益成风，在陆军部长谢雷的周围尤为严重。这种恶习根深蒂固，甚至连波拿巴的专制制度也未能加以制止。

经济上的困难部分地抵消了政府卓有成效的努力。通货紧缩引起了信贷利率的上升和物价的下跌，而这些又妨碍了经济的复苏。市场上流通的硬币很少，人们的积蓄使它更为减少。在共和九年执政府时期，市面上只有10亿左右的硬币流通，而1789年时的流通量为25亿。

信贷利率很高，通常每月至少为10%，短期的为7%。虽然1796年佩勒戈和雷卡米埃建立了“来往账户银行”，1797年建立了“商业贴现银行”以及在鲁昂等地也开办了几家银行，银行机构仍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对股东的贴现。

通货紧缩引起的物价下跌，由于1796年到1798年连续丰收而更为严重了：农产品的价格一般要比丰收的1790年低1/4到1/3。供应的矛盾不尖锐了，面包降到2个苏1斤，这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通常拥护政府的选民——大地主、大农场主等农业生产商的不满情绪却增长了。政权的威信再次受到了损害。

同样，农业危机也影响到工业。工业从战争的影响中艰难地恢复过来，但很难适应扩大了的边界。在1788年雇佣360名工人，而在共和六年只雇佣60名工人的里尔毛纺织厂主，抱怨受到来自兰堡、韦尔维耶、埃克斯-拉-夏佩尔等地的粗呢的竞争，这些都是被占领或新兼并的国家

和地区。农产品价格的低廉削弱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此也限制了市场的繁荣。信贷的缺乏则挫伤了人们的事业心。公路状况不良和完全无保障也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

对外贸易陷于瘫痪状态。1797年，远洋贸易船队的载货量只有1789年的1/10，与海外诸岛之间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对埃及的远征，和地中海东岸国家的贸易也中断了。虽然兼并了不少地区，但共和八年的出口量降到几乎只有1789年水平的一半。这时英国商品充斥德意志市场，但法国工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家却竭力反对建立一个包括卫星国在内的统一市场。他们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并且很想对那些姐妹共和国实行专有殖民体制。共和七年花月9日（1799年4月28日）的关税法重新使用了1791年的条款，并且更为严厉：对制造品都课以进口税；对奢侈商品或法国生产的商品出口则课以原料税。这种关税制度将成为执政府时期海关政策的基础。

督政府的经济事业（其主要倡导者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在这种条件下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展开。内政部长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主要是提出建议，而不是强迫命令。纳夏托主张建立新型农业，淘汰无用的牧场，改组和重新划分市镇。但他只限于下达通报，鼓励生产。为促进工业生产，他于1798年秋在马尔斯校场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博览会，并取得很大成功。他对人口开展系统普查，进行农业统计调查，增办中心学校，改善公共救济，还在每个市镇设立“慈善办公室”。但是这一切收效甚微。工业生产低于1789年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棉纺织业的技术发展缓慢。毛纺织业和冶金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的财富积聚主要表现在商业里。布瓦耶-丰富雷德、理查与勒努瓦尔、泰尔诺，以及更老的沙普塔尔、奥贝尔康夫等实业巨头，都是老式的资本家。他们通常把活计分到各户加工，而不是集中在工厂生产。除了制造业，他们还经营商业和银行业务。法国仍然像个农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尽管已经宣布了圈地和种植的自由，老式的农村却仍然维持着，马铃薯、饲料

根块等新作物发展得很慢。

督政府时期经济上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困难。共和二年那样的统制经济和对利润的限制已不复存在。因此，只得靠被征服国家来维持政权和军队。而当共和七年的失败把军队重新带回法国国土时，督政府只得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更失去民心。政治问题再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Ⅱ.第二督政府与欧洲（1797—1798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只有英国仍坚持反对法国。为推动反英斗争，看来有必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大陆和平。然而，督政府推行了一套大陆扩张政策，迅速破坏了外部稳定的一切可能。更有甚者，它还被拖入了对埃及的远征，从而把冲突扩大到地中海。这种冒险政策终于使国内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

1.反英斗争

共和六年雾月5日（1797年10月26日），督政府决定建立一支由波拿巴指挥的英国方面军。督政府在霜月1日（1797年11月21日）的宣言中，表示了法国的不满，谴责圣詹姆斯内阁是“欧洲最腐蚀人和最腐败的政府”。它指出了与此相关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航海和殖民地方面的利益：“这个内阁必定渴望战争，因为战争使它致富。”它还追述了英国对法国的殖民地和盟国的巧取豪夺。瓜德罗普于1794年被维克多·于格重新征服。但是，马提尼克、圣卢西亚岛和多巴哥却丢失了。在圣多明各，即使图森·卢韦尔蒂尔赶走了英国人，督政府的权威也很微弱。西属特立尼达与荷属圭亚那都被英国人占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在锡兰和开普敦扎下了根。法国的殖民地贸易遭到彻底破坏，外贸航运在英国的包围下处于瘫痪状态，海军也十分虚弱。宣言还痛斥卑鄙的阿尔比荣[1]：“在它的财富里凝聚着各国人民的血和泪，它是在人民的尸骨堆上致富的。”在政治上对英国的不满同样很强烈。督政府还指出，英国用金

钱资助反法联盟军以及土伦、吉布隆和旺代等地的叛乱："让英军到伦敦去下达和平令吧！"大约5万名法军在布雷斯特集中了。

然而，法英之间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性的。一直对制造商有利的、重商主义方式的封锁变得更为严厉了。尽管1793年3月1日国民公会法令在理论上禁止英国商品的进口。但是，法国商品需要出口，法国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需要进口，这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不得不灵活变通。现在，法国对封锁的设想更加具有战争性了，企图把它作为迫使英国破产，阻止英国出口的一种手段。共和五年雾月10日（179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令下令截获运载被禁英国商品，特别是纺织和五金产品的任何船只。然而，必须再次考虑制造商和中立国的利益。但是在果月18日政变后，任何随和的做法都被摈弃了。共和六年雪月29日（1798年1月18日）的法令宣布，凡是接受过英国检查或运载英国商品的中立国船只，都要截获。海上行劫大为增加。中立国的船只在法国港口几乎绝迹了，于是只得转向和美国的贸易。这样，主张对成品禁运的工业家抗议原料的匮乏，而那些富有的消费者则抱怨来自殖民地食品的消失。

面对法国的威胁，英国的对抗更强硬。对外国入侵的害怕激起了民族感情。皮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特别是对1799年收入200镑以上者征收10%所得税，来筹集资金。军事努力继续进行，津贴制的建立，使入伍者增加，但由于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兵员缺乏，不可能对大陆进行任何重大的征战。舰队是英国实力的基础，它保证英国的制海权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它将挫败法方任何登陆的企图。英国舰队打败荷兰舰队后，1797年2月14日又将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圣樊尚角击败，卡迪斯港被封锁。纳尔逊舰队进入了地中海，而法国的布律耶斯舰队竟然无法穿过地中海返回布雷斯特。

波拿巴风月（1798年2月底）的报告，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波拿巴一切都为了他的东方幻想，正在加紧准备远征埃及。而督政府却把

手渐渐伸向西欧，其结果是导致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

2.伟大民族和姐妹共和国

康波福米奥媾和以后，督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久就引起了各大国，尤其是奥地利的不安。这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扩张。果月18日政变后革命热情重新高涨，给宣传注入了一种新的推动力，其目标仍然是把各国人民从贵族和暴君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伟大民族”的周围将是各姐妹共和国。它们是政治上被奴役，经济上被剥削的卫星国。反英斗争也助长了扩张政策：必须从英国手里夺取大陆市场，检查各主要港口和通道以肃清走私。1798年，自由城市牟罗兹被并入法国，日内瓦则成为莱芒省的省会。

果月18日后，1798年1月22日，法国驻海牙代表德拉克鲁瓦、巴达维亚军队总司令达昂代尔和占领军司令儒贝尔一起发动了一次同样性质的政变，巴达维亚共和国被重新改组。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起来，各级官员必须宣誓“憎恨原执政官、联邦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但是花月22日后，中央集权的民主派被谴责为无政府主义者，政府进行了清洗，显贵们又占了上风。

瑞士共和国取代了由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各独立州组成的旧联邦。瑞士的爱国志士，如巴塞尔人奥克斯和沃州人拉阿尔普，主张结束寡头政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沃州被法国占领。波拿巴在其中起了作用。他已把瓦尔特利纳并入伦巴第，并希望通过瓦莱地区保障山内共和国同法国的交通往来。1798年2月13—14日夜间，布吕纳的部队向伯尔尼进军，占领了它的国库。一部督政式的宪法被在阿罗召集的议会所接受。但是还必须扑灭施维茨、于里、恩特瓦尔德等山区各州的起义。为了镇压反抗，督政府驻瑞士方面军的特派员拉皮纳于1798年6月16日运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了一场政变。奥克斯和拉阿尔普被选为瑞士督政官，从而加强了民主派的力量。

1798年2月21日山内共和国被迫接受一项同盟条约和一个贸易协定，它将继续被一支2.5万人的军队占领，并供给其费用。为使上述条约得到批准，督政府干预并清洗了山内共和国的议会两院。1798年6月，督政府对驻米兰的特命全权公使特鲁韦的指示表明了它企图对各姐妹共和国维系臣属政策：山内共和国必须“只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效劳，并且帮助它成为整个亚平宁半岛上一切政治争执的仲裁人。山内共和国必须相当强大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永远不能强大到损害我们利益的程度”。必须使山内共和国的当局保持“自卑感”。督政府特别仇视领导山内共和国，主张意大利统一的雅各宾派。因为，一个共和制的、然而又是分散的意大利对它的政策更为有利。

1797年12月28日，在意大利爱国志士发动的一次暴动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但是其结果却转为有利于反对派。于是他们就攻击对此负有责任的法国人，迪福将军被杀。于是，意大利方面军司令贝尔蒂耶向罗马进军（那里的革命者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教皇被迁往西也纳。有多努和蒙日参加的一个公民委员会强行通过了一部督政式的宪法。马赛纳取代了贝尔蒂耶，罗马共和国遭到了供应商和将军们的洗劫。

皮埃蒙特虽然在1797年有过一次革命尝试，但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后来还发生过山内共和国爱国者挑起的骚动，但是它仍然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果月18日之后，撒丁国王批准了一项同盟条约。1798年6月27日，督政府特使迫使撒丁国王接受一项准许法国部队占领都灵的协议，这对当地革命者的骚动十分有利。

康波福米奥和约规定的、旨在决定莱茵河左岸命运的拉斯塔特会议，在1797年11月16日开幕。在前奥属比利时、列日前主教区以及被兼并的前荷兰领土上（分为9个省并实行法国革命法律），法国的统治是很牢固的。在莱茵河地区，被占领的地方建立了4个省份。奥地利首相蒂居对法国的扩张采取忍让政策，期望得到法国的回报。法国特使特雷

拉尔要求得到包括科隆在内的莱茵河左岸全部领土。对此，1798年3月9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原则上表示同意。奥地利全权代表科本兹尔立即要求得到补偿，特雷拉尔拒绝了。4月在维也纳，一些捣乱分子袭击了升着三色旗的法国使馆。人们以为两国要断交了。

花月22日消除了这种印象。督政府开始追捕左派。在各姐妹共和国它同雅各宾派闹翻了。尤其在意大利，它树敌很多，并且还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但是反雅各宾的反动势力光靠自己不可能使法国同奥地利和解。督政府拒绝在它的禁猎地意大利对奥地利作出补偿，于是就把它逐步推向了英国方面。而这时对埃及的远征又使共和国树立了许多新的敌人。

3.在埃及的冒险（**1798**年）

远征埃及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要追溯到波拿巴的“东方幻想”，这有他在康波福米奥表示的要确保法国占领爱奥尼亚群岛的打算为证。显然，在共和六年选举前夕，督政府对于能摆脱一名令人捉摸不定的、野心勃勃的将军，并不恼火。名义上臣属苏丹的埃及对法国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地方。马赛的商人和那里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早在1796年，法国驻开罗领事马加隆就建议占领埃及，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产生了用埃及补偿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损失的想法。共和五年获月15日（1797年7月3日）塔莱朗在法兰西研究院的演说里，对这一想法作了进一步发挥：《论目前形势下在新殖民地可以得到的好处》。塔莱朗在这一事件里的作用同样也令人捉摸不透。他主张同英国缔约，因此不会不了解，征服埃及必然会引起英国对通往印度道路的安全产生忧虑，还会促使土耳其反对法国。难道是为他的朋友波拿巴的荣誉锦上添花？或者像他情妇格朗特夫人的信里所说，把英国方面军的威胁引向一个更远的目标，从而“有利于他的英国朋友”？共和五年热月9日（1797年8月16日），波拿巴已经在谈论占领埃及的好处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感到，要真正摧毁英国，我们必须夺取埃及。”共和六年风月5日

（1798年2月23日），波拿巴向递交了一份计划，督政府于15日（3月5日）批准了这份计划。

远征的准备工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极度秘密的状况下进行。在两个月内，由55条战船组成的一支舰队以及280条运输船集中到土伦。远征军共5.4万人，其中3.8万人为作战部队。波拿巴带着一个庞大的参谋部和一个由187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组成的委员会。

远征埃及于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启程。6月6日舰队经过马耳他，不经战斗马岛就落入法军手中。舰队避开纳尔逊，抵达亚历山大港，并于7月2日攻占了该城。部队直奔开罗。当时的埃及名义上由贝伊政府统治，实际的主人是剥削这个国家的“马穆鲁克”[2]。7月21日在金字塔下，他们的骑兵被布成方阵的法国步兵击败。由于缺少骑兵，波拿巴未能乘胜追击。7月23日他进入了开罗。但是，1798年8月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袭击了阿布基尔附近的由布吕耶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并把它一举歼灭。只有两条战舰得以幸免。一下子，英国成了地中海的主人，而波拿巴当了自己征战的俘虏。

波拿巴在埃及的冒险和他在意大利的征战完全一样，是法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次征战把共和国最优秀的部队派往远方。然而对英斗争还在继续，大陆和平很不稳定。因此，它是不符合民族利益的。直到那时为止，革命的法国对东方事务是不感兴趣的。自从1796年占领开普敦以来，英国一直自诩为通往印度道路的主人，这时它又发现了苏伊士通道的重要性。土耳其和俄国先后开始不安。于是组成了这3个列强的联盟，这是走向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第一步。

4.第二次反法联盟（**1798—1799**年）

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1798年4—12月）是欧洲对督政府侵略政策的反击。在好几个月里，英国一直力图在大陆上为法国树立一个新的敌人。没有它，英国不可能对法国予以决定性的打击。东方和意大利发

生的一些事件给它造成了这个机会。

埃及事件促使俄国和土耳其向英国靠拢。土耳其于1798年9月9日向法国宣战。在俄国，半疯子保罗一世继承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王位。他对法国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因此接纳了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把他安顿在米托。特别是他重新实行向地中海的扩张政策。反法斗争使他同土耳其言归于好。根据1798年12月23日的条约，土耳其向俄国开放它的港口和海峡。一支俄国舰队进入地中海，并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1798年12月29日，英国、那不勒斯和俄国结成联盟，决定在意大利进行干预。

恰好罗马事件在半岛上又点燃了战火。在纳尔逊的鼓动下，那不勒斯的君主费迪南三世和亲英的玛丽-卡罗琳娜向罗马共和国发起进攻。1798年11月26日，那不勒斯部队在奥地利将军马克指挥下攻占了罗马。督政府对此予以反击，首先占领了皮埃蒙特，因为它的国王是英国人公开的间谍。然后，尚皮奥奈发起进攻，并于1799年1月23日解放罗马，夺取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后乘坐英国战船逃往西西里。那不勒斯遭到一场浩劫。虽然督政府指示把那不勒斯留作未来谈判的筹码，尚皮奥奈仍然在那里建立了帕泰诺普共和国。这时普鲁士恪守中立。奥地利经过一阵犹豫，在俄国准备好干预意大利时下定了决心。它同意俄国部队通过自己的领土。鉴于这一形势，督政府于共和七年风月22日（1799年3月12日）向奥地利宣战。它立即出兵占领了托斯卡纳，并把教皇迁往瓦朗斯。

第二次欧洲反法联盟在1799年12月因瑞典国王居斯塔夫四世的加入又壮大了力量。然而奥英之间却没有任何条约。虽然各大国一致同意把法国赶回旧日的边界，但是它们之间的默契是有限的。英国和俄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互相冲突，正如奥地利和俄国在意大利的利害冲突一样。这一回，又是英国作了巨大努力资助第二次反法联盟。然而它国内的工人运动却在不断高涨（禁止罢工的“联合法”制订于1799年7月12日）。俄

军共投入了8万人，因此人力上的优势转向了联盟军。战争逐渐扩展，到1799年春已经全面展开。

1799年4月28日拉斯塔特谋杀案[3]尤其表明了这场战争不可调和的性质，这是一场欧洲的贵族反对革命民族的战争。那天夜里，正当法国全权代表们离开会议时，遭到了奥地利轻骑兵的杀害，3名代表有2名身亡。西埃耶斯认为“消灭法国的警钟”在各君主国的首都已经敲响。督政府无须动员就点燃了全国的怒火。

共和七年花月17日（1799年5月6日）督政府声明：

“必须捍卫的不仅仅是自由的事业，而且还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业。”

战争再次具有了革命的性质。

III.最后一次革命危机（1799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大陆和平曾使督政府有所加强，并得到某种稳定。战争的再度爆发以及1799年春季战役的失败，使政权的平衡成了问题。从雅各宾派的加强发展到温和的反动，最后导致了共和八年雾月的军事政变。

1.共和七年的军队和1799年春季战役

共和七年的军队所遇到的困难和1793年救国委员会采取战时措施以前的困难一样严重。但是，它重新获得了一部分正在失去的人民。为了解决兵源问题，督政府重新实行了“全民总动员”。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20至25岁青年的义务兵役制升格为经常性的征兵制。然而义务并不等于必须服役。立法机构作为仲裁者有权根据形势征集必要的兵员，补充或扩展部队。法律也按民主原则规定了晋升制度：

“除了在工兵或炮兵部队服役者，以及在战场上有显赫战功者外，任何法国公民只有在部队当过3年战士或士官后才得晋升为军官。”

共和七年葡月3日（1798年9月24日），有20万青年被征召，以后又陆续不断地征召，直到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的法令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征召为止。共和七年芽月28日（1799年4月17日）法令规定的替换制在获月14日（7月2日）被取消了。

实行征兵并非毫无困难，一方面特别缺乏有效的户籍管理，另一方面士兵逃亡时有发生。大量人员不合格。在葡月3日动员的20万人中，只有14.3万名合格者，其中9.7万到兵站报到，而最终只有7.4万人到达部队。共和七年的军队同共和二年的部队一样，在数量上不占优势。而且，出售1.25亿锂的国有财产仍然不能把它像样地装备起来。这不仅是为时太晚，而且是因为资金不足。共和七年的士兵驻扎在长期受法国剥削的卫星国里。他们同共和三年的士兵一样，面临着物资匮乏。征兵措施把新兵和1793年以来留在军中并渐渐变为职业兵的士兵混编在一起。这样，共和七年的军队部分地恢复了共和二年军队所特有的民众精神。

1799年战争主要是大陆战争。自从阿布基尔事件以后，英国人成了海上霸主。1798年8月由安贝尔将军指挥的对爱尔兰的远征，只不过是一次有头无尾的军事行动。在大陆上，战事的进展缓慢。根据1799年春的作战计划，3支减员的部队将分别占领荷兰、莱茵河与那不勒斯。儒尔当统率的4.5万人的多瑙河方面军将经过德意志南部向维也纳进军。谢雷统率的4.5万人的意大利方面军将经由威内西亚和卡兰西亚向维也纳进军。在中路，马赛纳统率的瑞士方面军保证交通来往无阻，威胁蒂罗尔并构成一支机动力量。奥地利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部署：7.5万人在查理大公统率下驻扎在巴伐利亚，6万人在克雷率领下驻扎在威内西亚，2万人驻扎在蒂罗尔。至于波拿巴统率的东方军，督政府期望它发挥钳制作用。

在德意志，战局开始得不妙。1799年3月25日，儒尔当在斯托卡克败于查理大公，引起他左翼的贝尔纳多特率领的莱茵方面军一起后撤。

在意大利，谢雷试图强行越过阿迪日隘口，在韦罗纳被战败，于是后退到了阿达，他把指挥权让给了莫罗。这时苏沃洛夫统率下的俄国军队进入了战斗。他们在1799年4月27日强行通过了阿达各隘口，特别是卡萨诺隘口，逼使莫罗撤离米兰和伦巴第。由于对督政府政策的失望，意大利爱国者——主张统一的雅各宾派站到了联盟军一边，起义反对法国人。莫罗的军队在亚历山大里亚重新集结，并向热那亚后撤。在那不勒斯方面军中，麦克多纳尔德取代了尚皮奥奈，指挥着部队在艰难地北进。苏沃洛夫转过头来挡住了他的去路。在特雷比河岸进行的一场历时3天（1799年6月17—19日）的激烈战斗中，麦克多纳尔德战败，并开始朝热那亚撤退。

在瑞士，马赛纳起初占领了格里宗，侵入沃拉尔贝格。但由于法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失利，他的两翼都暴露了，因此他也开始后撤。他遭到了查理大公的袭击。1799年6月4日，他赢得了第一场苏黎士战役。但是，他放弃了城市，退到利玛河后面构筑工事。勒库尔布将军此时也撤离了圣哥塔公路和勒斯山谷。

共和国军队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但是自然边界仍然保持着完整。联盟军内部的分歧给了督政府一点喘息的机会。奥地利政府不喜欢看到俄国人出现在意大利。蒂居首相考虑把苏沃洛夫派往瑞士以便使自己在半岛上为所欲为。在法国，危险唤醒了民族意识，激起了革命热情的新高涨。

2.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

在外部战事失败之前举行的共和七年选举，是在不利于督政府的气氛里进行的。经济萧条、税收加重、实行征兵，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比利时各省于1798年11月发生起义。西部各省虽然免于新的征兵，但也再

度发生了朱安党骚乱。督政府在雨月23日（1799年2月11日）的通报中再次谴责了保王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危险：“法国公民们，你们战胜了阴谋的欧洲，目前只需要你们战胜国内的敌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动员有产者：“难道你们愿意看到最高限价法出现吗？”在风月14日（3月4日）的通告里，他抨击了保王势力的威胁：“公民们，不要憎恨，不要复仇，尤其不要反动。”但是他主要致力于唤起资产阶级对恢复“1793年可憎的制度”的恐惧心理：“公民们，共同的利益使你们团结起来，振臂高呼：法国永远不再要无政府主义！”

督政府使用了通常的高压手段：革职，委任特派员，像在萨特一样组织分裂派选举大会。然而反对派的势力十分强大，以至于在187名正式候选人中有127人被击败。但是两院的多数并没有因此改变：虽然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有所加强，但热月派的资产阶级仍占优势。在1799年春战事失利后出现的危机里，热月派资产阶级终于占了上风。

第二督政府是在一种日暮途穷的气氛中倒台的。军队面临着最严重的匮乏，从各条战线向后撤退。意大利丢失了。保王派重新拿起武器。沉重的税务负担激怒了有产者。正当政府的威信日渐下降时，一次偶然事件帮了反对派的忙：花月20日（1799年5月9日），抽签结果决定最强有力的勒贝尔作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花月27日（5月16日），元老院指定西埃耶斯接替他。前者反对共和三年宪法是人所共知的。牧月21日（6月9日）西埃耶斯正式上任，他在窥测了当时形势的支持下，鼓动两院反对他的督政同事。两院于牧月28日（6月16日）宣布进入常设状态。当天晚上，他们以违反宪法第136条为由，取消了特雷拉尔的当选资格。根据宪法，从不当议员到被选入督政府必须相隔一年。第二天，特雷拉尔被戈耶取代。他是共和二年的司法部长、优秀的共和派，但却是一个第二流的人物。

共和七年牧月30日（1799年6月18日），议会两院再度向督政府发

起进攻。它是由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卡尔瓦多斯·贝特朗领导的："你们扼杀公众舆论，取消了自由，迫害共和派，禁止一切创作，抹杀真理。"两院准备报复花月受辱之仇："共和六年法国人民把他们信得过的人选到各级议会，你们竟敢说选举是无政府主义阴谋的结果，你们破坏了国民代表制。"布莱·德·拉默尔特接着说："自从果月18日建立了独裁政权以来，立法机构始终处于被蹂躏状态。"他攻击梅兰是"一个目光短浅、热情不高、只图报小恩小仇、胸无大志的人"；而被宗教狂热驱使的拉勒韦利耶尔在致力于"创立一种谁也不知为何物的宗教。为此他抛弃了一切革命理想，践踏一切符合良知的规章制度。"

梅兰和拉勒韦利耶尔被勒令辞职，并且也被他们的同事所抛弃，他们只能让步。获月1日和2日（1799年6月19日和20日），弑君者、前国民公会议员罗歇·迪科和当时路过巴黎的不很知名的将军穆兰当选为督政官。

共和七年牧月30日这一天与其说是政变，倒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议会起义日。它是前一年花月被整肃的两院对执行机构的一次复仇。吕西安·波拿巴[4]在五百人院宣告："立法机构恢复了在国家里应有的首要地位。"

包括督政官和各部部长在内的政府成员根据两院意志进行了调整：贝尔纳多特将军任陆军部长，康巴塞雷斯任司法部长，富歇任警察总局局长，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罗贝尔·兰代为财政部长。以上的任命意义重大：坚定的共和派重新执政了。正在这时，反法联盟军的胜利又使得共和国濒于危险境地。

3.新雅各宾派的加强与温和的反动

革命的高涨和民族愿望再次联结在一起。团结一致反对果月派的牧月派在胜利后发生了分歧。在两个月里，新雅各宾派压倒了热月党资产阶级，并且强制推行了他们的救国政策。这些人是在共和五年的选举中

被保王派击败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六年花月又被果月派逐出议会。鉴于当前祖国面临的危险，他们很自然地重新使用起共和二年的办法。热月14日（1799年8月1日）恢复了新闻自由，雅各宾派的报刊重新出版。各俱乐部重新开放，并日渐增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平等与自由之友社”，又名“马内日俱乐部”，这是以它在杜伊勒里宫聚会大厅的名称命名的。俱乐部于获月18日（1799年6月6日）集会，第一任“协调员”是德鲁埃。他是在瓦雷恩阻止国王出逃的英雄，并是巴贝夫的战友。许多议员都参加了马内日俱乐部。处于少数的雅各宾派推动着两院焦虑不安的多数。为了对付外部局势，多数派同意动员全国人力和财力。

征兵法开始全面实行。由儒尔当在共和七年获月10日（1799年6月28日）提出并获得通过的法律，把五届的适龄青年全部都动员起来。获月14日（7月2日），替补制被取消：“凡是被替补的人，只要其替补者逃亡，退役或被征召，他们就必须亲自上战场。”

获月10日，原则上通过了决议：向富裕公民强迫借款1亿法郎作为征兵用的开支。热月19日（8月6日）对具体实施办法作出了规定。根据累进的比例，对缴纳100法郎以上动产税或300法郎以上土地税的全体公民的收入都要征借。收入与免征税的资本（第7条特别指出，这是指通过“经营、供应、投机”所得的收入）须由不被征借的公民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作出估价。

获月24日（7月12日）通过了人质法。五百人院的一位议员认为这是为了“制止在南方和西部各省已经出现的强盗行为和朱安党叛乱的征兆”。在一个被立法机构确认“明显发生骚乱”的省份，中央行政当局有权抓流亡者的家属、前贵族以及“被公认参加了凶手集会或集团”者的家属作为人质。这些人被认为应“在个人和民事上都对国内发生的仇恨共和国的暗杀和抢劫负责”。凡有人暗杀1名官员、军人或国有财产的获得者，都要流放4名人质。对于每一次暗杀，人质都必须在民事和道义上

负责，交罚款5 000法郎，赔偿遗孀6 000法郎，死者的孩子每人3 000法郎。人质法引起了所有抱怨革命的人们的反对。至于受到该法保护的那部分人，强迫借款也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边。

反对雅各宾派的反动势力不久便表现出来。早在获月26日（7月14日纪念日），西埃耶斯就唤起人们谴责“那灾难的时代。在那时，一切概念都被混淆，以至于那些没有任何正式职务的人，顽固地想插手一切事务”。

热月23日，“在8月10日”纪念日之际，出现了再次声讨“这种被法国人深恶痛绝的恐怖”：“不，他们完全不是共和派……这些人疯狂地挑衅，使公共财源枯竭，彻底破坏了信贷，毁灭了商业，使一切工程都陷于瘫痪。”

如果说征兵到处都遭到冷遇，那么强迫借款则特别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有组织地进行消极抵抗。早在热月13日（1799年7月31日）借款法实施细则投票之前，《政论家》报就指出：“从前人们喜欢炫耀，甚至夸大自己的财富，而今天人们则以同样的感情来隐匿自己的财富。奢侈销声匿迹了。许多人，尤其是地产主必须这样做。另一些人则设法逃避他们所惧怕的巨额纳税。也有的人为了更确实地证明自己的穷困，人为地制造破产。”

报刊上发起运动敦促督政府同“吸血鬼们”决裂。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有产者的恐惧心理，这些感情由于“马内日俱乐部”的主张而变得更为强烈了。儒尔当将军在7月14日纪念日祝酒时提议“让梭镖长矛重新复活！”获月25日（7月13日），《导报》写道：“据说，许多人害怕这个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他们开始高喊：‘打倒雅各宾派’，并且把石块扔向会议大厅。”

在公共场所的谩骂打斗越来越多。但是，雅各宾派即使得到前无套

裤汉运动骨干，如职员、手工业者和小业主的支持，也无法把群众重新发动起来。自从区的建制撤销以来，群众始终处于无组织状态，并且被长期的迫害压垮了。雅各宾派孤军作战，又没有明确的社会纲领，因此无法同得到行政机构、警察以及果月政变以来2万名驻军强有力支持的政府进行对抗。

封闭俱乐部标志着督政府和雅各宾派的决裂。热月8日（1799年7月26日），“马内日俱乐部”在元老院被揭发蓄谋“复活恐怖，搜索一切逃亡者的名单”，因此它不得不离开马内日大厅，迁往巴克街。热月11日（7月29日），警察总局局长富歇，立即向两院提交一份报告，强调“必须保护政治会议的内部讨论，共和国将竭尽全力使之对外部严格保密”。五百人院否决了这份报告。热月26日（8月13日），富歇封闭了“马内日俱乐部”，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然而保王派的危险和军事上的失利使得雅各宾派在这场风浪中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热月18日（8月5日）在上加隆地区发生了保王派的暴动。曾一度受到威胁的图卢兹坚持住了。该市的行政大权掌握在雅各宾派手中。热月26日（8月13日）消息传到巴黎，两院立即授权进行为期1个月的住宅搜查以“抓获流亡者、煽动士兵造反者、刽子手和强盗”。果月1日（8月18日）暴动在蒙特雷若被镇压。夏天，骚动在西部再度发生。

乘军事失利之机，雅各宾派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热月28日（8月15日），儒贝尔在意大利战败身亡。果月10日（8月27日），英国人在荷兰的海尔代尔帮助一支2.5万人的俄国军队登陆。像1793年一样，共和国的边界又受到了威胁。果月27日（9月13日），儒尔当将军向五百人院建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他列举了国家在四面八方受到的危险：“意大利在枷锁下；北方的野蛮人在法国的大门口虎视眈眈；荷兰遭到入侵；舰队被叛徒出卖；瑞士惨遭蹂躏；保王党匪徒在许多省份为非作歹；共和派却以恐怖主义分子和雅各宾派的罪名被流放。这是历史

的再次被颠倒，保王势力的警钟将要在全法国土地上敲响。”

儒尔当的建议引起激烈的争论。吕西安·波拿巴否定了这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让督政府符合宪法的权力得到扩大，比被革命力量牵着鼻子走”更为有利。

问题的实质所在：为了对付面临的危险，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依靠人民，或是加强执行机构的权力。多努更加明确，他害怕“回到1793年的制度”。儒尔当的建议在第二天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共和八年葡月2日（1799年9月24日），加罗（吉伦特派）促使五百人院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凡是“建议或接受损害共和国目前疆界完整性的和平条件”的人，将处以死刑。这是雅各宾派的最后一次胜利。这时，由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外部的形势已经好转。

4. 1799年夏季的战事

战事最初对法国不利，但是反法联盟的分歧使得局势迅速地扭转了。

在意大利，没有等尚皮奥奈的部队穿过皮埃蒙特前来会合，儒贝尔就发起了进攻。1799年8月15日战斗一开始，他就战死在诺维。他的部队也被苏沃洛夫率领的俄军打败。意大利丢失了。奥地利首相蒂居企图把它据为己有，他设法摆脱俄国人。

在瑞士，马赛纳同查理大公统率的奥地利军以及占领苏黎士和利玛河一线的柯萨科夫率领的俄军对峙。奥地利政府担心英俄联军在荷兰登陆，因此下令查理大公离开瑞士前往美因兹。9月11日，苏沃洛夫开始上路接替他。在两支俄国军队会合之前，法军对它们进行了分兵出击。勒库尔布将军攻占了圣哥塔和勒斯山谷。当他钳制住苏沃洛夫的时候，马赛纳向孤立困守在苏黎士城里的柯萨科夫发动进攻，并迫使他越过莱茵河。这是第二次苏黎士胜利（1799年9月25—27日）。然而，苏沃洛

夫还是越过了圣哥塔，击败了勒库尔布的部队。但是，他很快遇到了得到马赛纳支持的莫尔蒂耶部队的阻击。于是他转而进攻坚守在兰特山谷的莫利托尔将军。由于没能通过隘口，他只得向沃拉尔贝格撤退。这样，瑞士又重新为法国人所掌握。狂怒的保罗一世于10月23日下令把部队全都召回俄国。

在荷兰，8月27日登陆的英俄联军遭到失败。约克公爵首先发动进攻。但是，1799年9月19日在卑尔根，10月6日在卡斯特里库姆他两度败于布吕纳的部队。18日他签订了撤离阿尔克马尔的协议。

1799年秋初，反法联盟军的进攻被粉碎，疆界的完整得到保障。波拿巴和他的埃及方面军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贡献。相反，东方的钳制失败了。

远征埃及的失败源于阿布基尔的失利。法国军队陷入了死胡同。波拿巴赶在土耳其进攻之前于1799年2月向叙利亚进军。他在蒙塔鲍尔获胜，但在圣让达克尔失利了。因为后者有英国人在海上的支持。5月20日他只得下令向埃及撤退。然而，英国人部署在罗德岛的一支土耳其军队从阿布基尔登陆。这支部队1799年7月25日被波拿巴在阿布基尔就地击溃。虽然波拿巴是个胜利者，但是他的军队已经被当地的气候和战争拖得很虚弱。因此他仍然是自己发动的这场征战的俘虏。波拿巴认为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于是把指挥权丢给了克莱贝尔，于8月带着两艘驱逐舰秘密离开埃及。他避开了英国巡洋舰，于共和八年葡月17日（1799年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

外部危险被制止，温和的反动派占了上风。雾月2日（10月24日），元老院否决了加罗关于对接受损害法兰西领土完整的建议的人处以死刑的提议。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强迫借款的原则遭到异议：雾月17日在五百人院，一个不知名的议员要求撤销这种“累进和专断”的借款。雾月18日的政变将使得有产者最终安下心来。

Ⅳ.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波拿巴于葡月17日（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22日（10月14日）到达巴黎。这一消息十分惊人。《对外关系信使报》葡月23日写道："波拿巴在法国登陆是人们已经听说多次但从未相信的事件之一"。同一天的《导报》写道："……大家都如痴如醉。一直陪伴着波拿巴的胜利这时抢先了一步，他的到来对濒临死亡的反法联盟将是致命的打击。"

舆论把波拿巴看作康波福米奥的和平使者，是将能迫使欧洲再度恢复和平的人。确实，由于瑞士和荷兰战事的胜利，入侵的危险被排除了。战争结束了，在来年春天之前波拿巴不可能被任命指挥重大战役。他不愿意让督政府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荣获恢复和平的功劳。于是，他开始向以西埃耶斯为主谋的、积极主张政变的人靠拢。

1.社会上的恐惧和宪法修正论

政治问题及其社会反响实际上升到首要地位。危险排除了，但是一切仍然悬而未决。对外战争还在继续，来年春天将重新开战。内战再度爆发。葡月22日（10月14日），朱安党人先后夺取了勒芒和南特，随后立即被赶走。但这是一次意义深长的警报。共和八年春天又将进行选举。无论保王派还是雅各宾派获胜，政府的稳定将会再度受到影响。共和三年的宪法是争论的中心：并非对它建立在纳税人基础上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它的自由主义和各方权力的平衡，尤其是每年一度两院1/3议员的更新。果月政变后，督政府已经通过建立潜在的独裁体制解决了问题。每年一度的选举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必须使它不能如此频繁地进行——这是早在花月22日之后多努提出的要求。他虽然是共和三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但是他对政府的不稳定已经感到厌倦。他既憎恶王政复辟，也讨厌民主化。在多努的周围，以《哲学旬报》为机关刊物的思想家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邦雅曼·贡斯当早在共和五年（1797年）春就发表了一部题为《政治反应》的著作，要求有一个"强有力和稳定的

政府”：“只有它才能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可侵犯”。斯塔尔夫人自然同意这些观点。具有杰出宪法头脑的西埃耶斯是个宪法修正论者。国民主权的原则仍然是不可侵犯的：热月党资产阶级若要放弃这一原则就得否定自己，并且还会让神权的信徒占了便宜。因此就要把主权原则同建立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执行机构的要求调和起来。西埃耶斯设想用自行遴选代替选举，这将成为共和八年宪法的特点。热月党和督政府通过“2/3名额”法以及果月和花月的清洗，已经虚伪地使用过这种手段了。共和八年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督政府宪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雾月政变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它轻易成功的原因所在。假如不符合新社会统治阶级的要求，它就不会成功。热月派确认了保守资产阶级的优势和政治权力。督政府捍卫了这些特权。但是在共和七年，雅各宾势力的高涨仿佛威胁到了有产者的特权。社会上再次出现恐怖情绪，它构成了宪法修正论的牢固基础。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的两种人，特别希望安宁和社会稳定。

首先是有产业的农民。他们希望和平地劳动，社会秩序不被经常不断的抢劫所扰乱。他们仇视任何复辟企图，因为复辟就会恢复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停止出售国有财产，从而影响他们和平地享用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也同样惧怕人民运动的高涨，那样只会引起“无政府主义”，为实行“土地法”和瓜分财产开方便之门。他们准备支持确实能对付这两种危险的政权。

另外是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看到自己事业的兴旺因政权不稳定和战争连绵不断而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强迫借款可能导致税务平等，因而对此十分害怕，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土地法”。他们希望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保护其利益，永远保障其权利，使他们能加紧经济革新。商业资产阶级和有产业的农民构成了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社会基础。大部分显贵都来自他们的行列。

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修改程序在它的第13条里已有规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要求两院进行连续3次投票，召集“修改宪法会议”，整个过程需历时9年。既然不可能这么办，于是只有政变。西埃耶斯下定了决心。但是，还必须像果月18日政变一样，求助军队迫使两院的多数就范。不过，共和五年的多数派是保王派，而共和八年的多数派却是共和派。儒贝尔将军感到自己能领导这次行动便表示同意。但是，1799年8月15日他不幸战死在诺维。西埃耶斯转向莫罗，但莫罗犹豫不决。正在这时波拿巴登陆了。莫罗对西埃耶斯说：“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人。”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能引起幻想的雅各宾派经历，他的威望和野心，他毫无顾忌的行为以及他擅自抛开埃及指挥权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为他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政变的准备进行得很迅速。塔莱朗在波拿巴和西埃耶斯之间调停。其他督政官中，被迫恪守中立并表示同意；罗歇·迪科像影子一样追随西埃耶斯。元老院议长被收买了。雾月1日（1799年10月23日），吕西安·波拿巴被选为五百人院议长。军队的经费主要由被雾月7日（1799年10月29日）的法律激怒的供应商提供，因为这项法律剥夺了他们优先由国库支付的权利。阴谋家把要求全面和平的愿望和修改宪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更有甚者，他们利用社会恐惧驾驭两院，使资产阶级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平等派恐怖主义的阴影再次引起资产者惊恐万状，甚至斯塔尔夫人也可为此作证。

半官方的《导报》于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写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包括自由、产业以及保证它们的宪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了。”《导报》还指出：“强迫借款这项强盗法律毁坏了我们的财政，人质法给我们带来了内战，共和八年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吞噬了，任何信贷都不复存在。”

共和二年的幽灵萦绕着资产阶级。它渴望永远摆脱这一幽灵。

2.政变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元老院于清晨7点开会。一些部队借口检阅，集结在杜伊勒利宫。一个不知名的议员以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厅巡视委员会的名义，揭发一起虚无缥缈的阴谋（“阴谋家……只待发出信号就会举起匕首向全民代表机构的成员刺去”）。第二天的《导报》更加明确地或更有创造性地提到了雅各宾派的计划：“改两院为国民公会，排除不合他们口味的人，把政府交给一个救国委员会。”

元老院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第102条的规定，投票决定把两院迁往圣克鲁。波拿巴将军“负责执行此项法令”，巴黎的部队归他指挥。这是非法的措施，因为它属于督政府，而不属元老院的权限范围。督政府就这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它的卫队也归波拿巴指挥），它只得屈从。辞职隐退到自己的庄园格罗布瓦。穆兰气急败坏，但又无能为力，他和戈耶被莫罗监禁起来，直到他们辞职为止。关于这一天的意义，雾月19日的《导报》是这样阐明的：“人们议论关于强迫借款法和人质法的报告，以及不再增添流亡者名单问题。”

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1点左右，两院在圣克鲁集会。波拿巴在城堡周围集结了4 000—5 000部队。在元老院，前一天缺席的议员要求作出解释，并对是否存在什么阴谋提出怀疑。在吕西安·波拿巴主持的五百人院，从会议一开始左派就用唱名的方式强迫每个议员上讲台重新宣誓忠于宪法。事情可能要拖延下去。于是波拿巴出面干涉。

在元老院，他保证忠于共和国，否认自己想要“建立一个军政府”，并且控告五百人院里“有人企图恢复国民公会、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他对可能反对他的“正直的”战友们进行干预的人发出威胁：“我已看到战友们的刺刀。”至于宪法，它已“遭到了3次蹂躏”，不复存在了。“督政府也不存在了”。最后他允诺：“致使我拥有这些特别权力的危险状态一经消失，我就放弃这些权力。”

波拿巴在掷弹兵和将官们簇拥下来到五百人院。全体议员顿时站了起来，因为不经召唤波拿巴没有权利进入议会大厅。有的议员抓住他的衣领，推搡他。有人则高喊："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波拿巴只得在几名士兵保护下退出会场。讨论在混乱中继续进行。吕西安竭力为其兄辩护，但不起作用。一队士兵奉波拿巴之命把他劫走。军队，特别是两院的卫队犹豫不决。吕西安骑在马上鼓动他们。他谴责一小撮手持匕首的代表企图暗杀他们的将军，恐吓大多数议员。他终于说服了士兵，他们出动了。一队士兵在米拉和勒克莱尔率领下，敲着战鼓进入橙园大厅，驱散议员。议员们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和五百人院的少数议员着手组织了临时执政府。他们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并把62名"经常胡作非为"的议员从全民代表机构里开除出去。成立了一个由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名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官"被授予指导政府的全权。议会两院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后者被赋予投票通过执改官提出的法律、准备修改宪法的权力。根据第12条，该宪法的目的是"确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民的主权、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代议制、分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

最后，元老院取消了使供应商惶惶不安的措施，恢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优先权。3名临时执政官宣誓后回到了巴黎。

一份张贴在巴黎的通告（雾月24日），即1799年11月14日的《导报》提请人们注意这份通告充分表达了政变后资产阶级的愿望：

"法国需要实现伟大和持续的事业。动荡把它毁了，现在它祈求安定。它不要王政，王政已被废除。它需要执法的权力机构行动一致。它要一个独立、 自由的立法机构……它希望代表们属于稳健的保守派，而不属于动乱的革新派。总之，它要采摘10年牺牲结出的果实。"

现在要最终结束革命时代了。巩固应取代动乱，有产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应最终确立。在这方面，雾月政变同热月以及1789年的路线完全一致。如果说资产阶级愿意加强行政权，恢复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它并没有放弃实施自由的权利，只要这对它的私利有好处。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打算成为泡影。雾月分子企图建立的专制制度，很快变得只对波拿巴的个人权力有利。社会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军事独裁。

---

[1] 阿尔比荣（Albion），凯尔特语，意即英国，常含贬义。——译者

[2] “马穆鲁克”是土耳其-埃及一支部队的名称，源自13世纪，最初由奴隶组成，后成为统治埃及的集团。拿破仑收编他们参加法军。1811年白色恐怖时，被总督哈麦德·阿里在开罗屠杀殆尽。——译者

[3] 拉斯塔特为德意志西部城市，1797—1799年间，法、奥、普三国代表在此谈判，讨论莱茵河左岸问题。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谈判中断。1799年4月28日，当法国代表准备回国时，受到奥地利骑兵的砍杀。——译者

[4] 吕西安·波拿巴系拿破仑·波拿巴之弟。——译者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随着雾月政变，一直没能实现的最后稳定的时刻终于来临。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与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表示的愿望还相差甚远。社会还在融合，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尚未完善。国家的各个机构虽然经过督政府努力改革，但仍然效率低下。行政机构的组织也很不完善。持续不断的战争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泡影。然而，主要的成果已经取得。尽管有过1799年夏那次最后的恐惧，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显贵们的至尊社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社会方面，自从1795年春巴黎的无套裤汉运动被粉碎以来，革命就终止了。从社会的继承性和机构的确立这两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是这场革命悲剧的必然结局。

革命事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它对于法国和当时世界的命运来说，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在欧洲和世界上确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方式因各国的特定条件而异。早在1789年前，英美两国的革命已经使盎格鲁-萨克逊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共和二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及争取平等的伟大尝试，赋予了法国革命完全不同的意义。

通过摧毁封建结构、宣告经济自由，大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进程。此外，贵族的反抗、内外战争也迫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摧毁旧社会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团结民众各阶层，它只得把原先只是为反对贵族而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置于首位。因此，法国革命事业在它后来的进程中表现出许多矛盾方面。这使它更加光辉，更加伟大。1789年大革命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共和二年，它曾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等社会的轮廓。它是争取资产阶级平等和民族团结统一的革命。但是，共和二年的制度曾试图超越这种表面平等，并且给团结统一赋予社会内容，即把民众各阶层真正纳入国家范围内。这是一项由于矛盾重重而注定要失败的宏伟事业。但是它曾使全世界为之发抖，其反响至今仍在延续。

Ⅰ.新社会

假如考虑到1789—1799年这个时期社会冲突深刻的统一性，旧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民革命潮流的重要性，并试图对法国革命作出总结，人们就会发现，任何简单化的模式都与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摧毁了旧的生产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土地贵族（但需要具体说明其程度）。但是，特别是由于通货膨胀，革命也同时摧毁了在不同程度上和旧制度融为一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此外，革命依靠经济自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但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与传统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阶层的衰亡，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牢固地确立下来（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

1.封建贵族的灭亡

土地贵族及其特权是革命资产阶级在农民和无套裤汉运动的帮助下，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之后被摧毁的。

贵族的土地基础通过取消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以及出售国有财产被摧垮。

封建捐税的收益极不相同，但不容忽视。它是许多贵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面。使农民附属于贵族的针对人身的捐税权从8月4日夜里起就和什一税一起被取消了。1790年3月15日首先宣布针对土地的封建捐税可以赎买。立法议会在1792年6月18日宣布，取消没有原始文书证明的额外捐税，并不必赎买。8月25日又取消了对任何封建捐税的赎买。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17日永久地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税，并下令销毁一切封建契据。

出售国有财产对贵族也是沉重的打击。从1789年11月2日起，国有财产的首要来源——教会产业被收归国有。8月10日后一切例外都被取消，先后被没收的有教会工场的产业（1792年8月19日），马耳他修士

会的产业（1792年9月2日），各圣职人员团体的产业（1793年3月8日）以及救济机构的产业（1794年7月12日）。1792年2月9日，国有财产的第二来源——流亡者的产业被收归国有，这一法律在3月30日被再次重申。1792年7月17日决定出售这部分产业。

由于归还被贵族以及新的继承法强占的乡村公社产业，贵族的地产更少了。1790年3月15日，制宪议会取消了在公社产业中实行了30年的“财产分类”办法。1792年8月28日，立法议会承认各市镇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新的继承权引起了财产的分散。1790年3月15日的法律取消了“长子权和男性特权……以及根据人的身份差异导致的分配不平均”。1791年4月8日的法律规定，在无遗嘱继承时分配必须平等。共和二年雾月5日和雪月17日（1793年10月16日和1794年1月6日），山岳派的法律重申要平均分配。立遗嘱人有直系继承人时只能支配1/10财产，只有旁系继承人时可以支配1/6财产，而且这部分财产只能授予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国民公会同意私生子参加分配其父母的财产。共和二年雾月12日（1793年11月2日）的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和合法子女同样的份额。这些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789年7月14日。然而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废除了追溯效力。

贵族的人身和他们的财产一样也受到了打击。不算群众性的屠杀与合法的处决，僧侣和贵族作为社会等级消亡了。8月4日夜，把法国人分为3个等级的制度取消了，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切差别都不复存在。从此贵族降到了和普通公民同样的地位。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废除了世袭贵族、称号和纹章。而且，封建制的废除、administrative reform 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取消了领主对农民的一切特权，在法律上，他们和普通人等同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6条宣告，一切公民都可在国家机构担任公职，甚至要职。1790年2月28日的法律对军衔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出身不再享受任何特权。随着危机的加深，贵族除了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者外，都被逐渐革去公

职。尽管人民大众不断呼吁，救国委员会却从未同意通过普遍措施剥夺贵族的公民权。反对贵族的立法在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都继续维持。这一点再次表明，即使在热月党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意识始终未变。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公职。此项法律被共和五年的保王派多数废除，果月18日政变后又重新恢复。在西埃耶斯的提议下，当局甚至考虑要驱逐在旧制度下担任过职务的贵族，并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即使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只采纳了这些措施的第2部分，而且也从未实施过，它们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

穿袍贵族的消亡不仅是由于对贵族产业的打击，而且更可能是由于取消了买卖官职，并且规定用贬值的指券按官方价格偿还这些官职。建立在选举原则基础上的行政和司法改革，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通常是这类无职位的官员。

然而我们也不能言过其实。贵族从未被完全和永久地剥夺财产。即使所有贵族因废除封建制度和领主特权而遭到损失，但只有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许多贵族经过这场革命并无重大损失，而且还保留了地产。当然这些地产现在已成为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类型的产业。此外，假离婚、通过顶替人赎买等方法也使一些流亡者保留或收回了部分地产。这样，一部分旧贵族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失去了头衔，但仍然保持了一部分传统的地位。到19世纪，他们便和上层资产阶级融合在—起。

2.经济自由和民众各阶层的命运

和摧毁贵族一样，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在顽强地摧毁着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水火不容的旧的生产和交换体系。显然，共和二年他们不得不向无套裤汉运动妥协，并重新接受限价和经济统制，但这只是反对贵族的斗争所必需的一段插曲。热月9日以后，在人民运动的废墟上，自由经

济成功地确立起来，其后果对传统的平民各阶层尤为严重。

毫无疑问，从取消间接税到恢复入市税之前，城市各平民阶层一直能得到某些好处（间接税是使他们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但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好处。这种情况至少一直维持到督政府后期粮食丰收、物价下降时为止。1791年2月2日的“达拉尔德法”废除了行会。在手工业者里，如果说帮工从此可以自己开店，因而感到很民主，那么该法律却损害了师傅的利益。广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虽有提高，但持续的失业、救济机构的瓦解、尤其是纳税人政权和勒夏普利埃法使他们的低下地位合法化，这些因素造成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自由经济促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并由此加快企业的集中。随着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变，传统平民各阶层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当然，不应该过分夸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进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势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限制。并且，资本主义只是在某些部门，如棉纺织业里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它将必然使广大的无套裤汉沦为无产者。资产阶级革命把不能自卫的城市人民各阶层交给了新经济形式的领导者。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禁止“结社”和罢工，它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

无套裤汉的分化是因革命加速了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在构成1793—1794年间民众运动骨干的中小生产者和商人里，有的人发财致富成为工业资本家；有的人仍然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大部分人则逐渐被淘汰，从而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手工业者和帮工预感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从手工业者上升到工业资本家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惨遭失败啊！）。帮工知道机器会增加他们的失业；手工业者则明白资本主义的集中会导致他们的工场倒闭，使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整个19世纪，手工业者

和小店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应该指出从1848年6月到1871年巴黎公社这一时期，他们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变为传统的人民阶层是很有意义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阶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退化的程度，同时可以了解19世纪历次革命尝试的某些动机和弱点。

3.农民的解体

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各阶层带来的好处是不平衡的。把这些阶层联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消灭封建制）一旦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差别就开始加大。革命极大地增强了有地农民的力量。只占有小块土地或无产业的小农经过激烈的斗争，在革命后不像城市人民各阶层那样一无所有。即使革命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但它却没能把它完全摧毁。

有产业的农民独自享受到废除什一税、封建实物捐税以及实行税收平等的好处。各类佃农和无地农民只能从取消奴役和涉及人身的特权中得到好处。国有财产出售的具体方式有利于加强已经拥有地产的自耕农、大农场主以及大农业发达地区的佃农的产业。即使在对农民最有利的时期——山岳派制定法律的时期，国有财产拍卖也只对有产业的农民有利。1793年6月10日法律规定分配公共土地，这有可能使贫困农民成为私有产业拥有者，进入农业集约化的渠道。但实际上，不分年龄和性别，按居民人头分配土地会造成地产分散，因此遭到大部分农村公社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每人得到的份额太小，而共同经营牧场则更为有利。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和小农的利益，正像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还有别的牌可打（如分割大农场）。“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也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做。有产阶级把大部分国有财产都据为己有。在诺尔省，教会的地产不复存在（在1789年它高达总数的20%）；贵族的地产在1802年从22%降到了12%，由此可见特权阶级毁灭的程度。在这同一时期里，诺尔省资产阶级的地产从16%上升到28%以上；农民的地产从30%上升到42%以上。但是，只有考虑到当时北方农村人

口急剧增长，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上述结果。

新确立起来的财产权的观念是有产业农民的观念，即资产阶级的观念。农村广大群众并不仇视个人产权的原则，但是他们认为个人产权绝不能超越集体权利，即共同放牧权和二茬草权、拾落穗权、森林使用权。公有地被小农认为是公共财产。制宪议会宣告了耕种和圈地的自由，废除一切规章限制，导致“强迫轮作”和“义务轮作”在原则上被淘汰。人工草场即使不圈围栏也不能实行共同放牧权。这样，大革命加强了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地位（除规定最高限价时期外），自由贸易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实力。当然，农民永远颂扬大革命使他们的村庄结束了贵族统治。土地革命虽然表面激烈，其实际效果却很温和，甚至“保守”（勒费弗尔语）。从此，少数强大并忠于新秩序的有产业农民在保守的抉择方面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贫苦农民的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保住了其传统地位的主要方面。从总体来看，他们没能获得地产。但是，革命中的历届议会没有敢永久地摧毁农村公社，废除公共产业和集体使用权。围圈土地是准许的，但并不强迫。这一规定在整个19世纪一直保持着，未被淘汰，因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规定共同放牧权的废弃取决于全体村民的意志。因此，革命在这一领域里只达成了一项妥协。但是，当人们把法国农业的发展和英国农业的发展进行比较时，就可发现其全部意义。集体使用权按照农民的意愿被保留下来，然而土地和经营的分散却大大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小生产者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给法国的政治史带来某些独有的特点。假如圈地和地产重新组合像在英国一样被强行规定，那么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将会和工业领域一样获得彻底胜利。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会使贫苦农民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些细微差别，在旧制度时的农民社会结构里就可以见到这些差别。在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场主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农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和大工业必要的劳动力。在进展缓慢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地区，农村公社因其内部有地农民和竭力维护土地和树林使用权的贫苦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遭到破坏。于是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峙，一种是过时的旧形式，一种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个人主义的新形式。这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隐约的、尖锐的斗争。它经常通过传统的农村骚乱表现出来。最后一次斗争发生在1848—1851年间，这既不是最缓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斗争。

4.新老资产阶级

准备并进行了这场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不同的阶层受益程度各不相同。资产阶级仿佛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它的内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在它的队伍里，原来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地位最为显赫，现在他们已让位于那些商人、企业家以及领导生产和交换的人了。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即和旧的经济、社会体系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贵族同样的命运。拥有封建领地并一直依靠各种土地收入过着阔绰生活的资产阶级丧失了封建捐税收入，而他们收取的房租和地租一直被用贬值的指券来支付。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才规定地租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官员”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一样，也因废除了买卖官职而毁灭。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也因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律师等级、地方学院和大学而遭到打击。商业大资产阶级则因废除了间接税的承包制而受到影响。1793年8月24日国民公会甚至取消了股份公司。大金融集团也因交易所被关闭，兑现银行消失而深受其害，如同共和二年受到限价和管理条例，即限制利润的约束一样。革命捐税和强迫借款对已有的财产是沉重的打击。此外，还应

看到革命对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的打击以及通货膨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的资产阶级比工商业资产阶级更喜欢把余钱用于发放抵押贷款或购买公债券。共和三年，指券的垮台促使债务人用贬值的纸币归还本金，了结抵押债务。共和三年获月23日（1795年7月10日）的法律禁止索还1792年7月1日以前的债务和提前索还其他债务。国民公会时期康邦的“清理永久和终身债务法”以及督政府时期拉梅尔的“2/3破产法”（即“清理法”）对他们又是新的打击。这些事实都说明为什么大部分旧制度时的资产阶级站到了反革命一边，并且和贵族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如果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地产，而动产只占其财富的一小部分，这些资产阶级只要没有逃亡，就保住了他们的大部分产业。混乱的局面结束后，他们重新有了收入。他们的至尊地位虽然因拥有地产而得到社会认可，但却远不如从前那样无可争议了。

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头面人物了，这就是金融和经济巨头。从事投机活动，出售国有财产，提供军队的装备、武器、供应以及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这些给工商业者提供了扩展事业的新机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财富积聚不断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的进展是缓慢的，企业的规模通常都不大，商业资本主义仍占优势。然而，主要在纺织行业里已出现了一些大企业，例如：巴黎的理查-勒努瓦尔、帕西的博温斯、波尔多的拉舍夫蒂耶尔、亚眠的雅奈特等开办的工厂。多菲内的佩里耶（又名米洛尔）、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都是大工业家。但是这些新的巨大财富的来源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而是投机倒把和军需供应。大量“公司”利用督政府的软弱掠夺国家财富：朗谢尔公司和博丹公司专长军需供应；弗利斯公司专长服装；莫纳隆公司专长炮兵车辆。资产阶级因吸收了这些“新富豪”而更新了队伍，其中金融家乌弗拉是最典型的人物。这些人经常给督政府这家“大公司”定调。他们是新社会真正的冒险家，通过他们的事业精神和冒险欲望使领导阶级复苏。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鼻祖，从他们的行列里出现了一批工业资本的创始人，他们撇开投机事业，把资本投入生产。

当时的形势使那些比资产阶级低一等的大量小商人和少部分手工业者扩大了经营，增加了生产，积累了财富，从而脱离了平民行列而进入资产阶级队伍。在这方面，投机经常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手段。新的领导阶级不久就在这个中产阶级队伍里吸收各级公共行政机构的官员和自由职业者。

经过10年动乱，新社会的各种特点尚未最终定型，但是它们的轮廓已经很清楚。有产者要求恢复秩序的愿望，无论是为了保护拯救下来的原有财富，还是为了和平地享受新积聚的财富，都有助于执政府的稳定。新社会的结构在拿破仑时期得到巩固。于是，在建立保证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国家机构时，开始了新统治阶级各类成员的融合：焕然一新的资产阶级和归顺他们的贵族在富有农民的协同下把国民和财产等同起来。这样，1789年人们为大革命确立的目标之一终于达到了。

5.意识形态的冲突：进步与传统，理性与感情

思想运动在整个革命时期反映了社会、政治冲突。传统的社会框架解体后，许多人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引起不同人之间的混杂以及人们的思想易于激怒。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非理性的威望和力量。革命是启蒙时代的结局。反革命用权威和传统来对抗理性主义，并诉诸感情和本能的潜在力量来反对它。聪明才智的优势地位受到了直觉的挑战。反理性主义的反动也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古典美学和古代的影响通过达维德还继续有力地统治着造型艺术，那么传统的文学形式却被抽空了全部实体。古典的科目很难抵御社会变迁、个人解放以及感情的激怒带来的冲击。像整个社会一样，文化生活也处在动荡之中。

科学研究仍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天下。1789年出版了拉瓦西埃的《化学论》，1796年拉普拉斯发表了《行星体系阐述》，1799年蒙日发表了《画法几何论》。这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史上3个重大的年

代。拉瓦西埃分析了空气和水，并创立了普遍原理，如物质不灭的原理，总结了当时化学研究的全部成果。拉普拉斯为了解释世界的起源，提出了星云说的假设，即星云的逐渐凝聚可能产生恒星和行星。至于蒙日，他创造了一门新的数学学科——画法几何学。在自然博物馆任教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居维埃、若弗鲁瓦·圣依莱尔、拉马克。共和八年，即大革命末期，居维埃发表了《比较解剖学教程》，这是划时代的科学综合。而一直主张物种不变学说的拉马克在1794—1800年这一期间构想了物种变异论的伟大假设（他的《动物学哲学》1809年才出版）。

人文科学领域是“思想家”们的沃土。他们维护了理性和经验的首要地位。1795年后，这些“思想家”云集在法兰西研究院的第二分部，即道德和政治科学部以及国民公会创办的各高等学府里。他们拥有《哲学旬报》，并通过其门徒掌握各中心学校。他们对传统和恢复宗教仍然持反对立场。

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介绍迪皮伊的著作，即出版于共和三年的《一切崇拜的根源》时指出：“神学是世界幼年时代的哲学，现在到了它让位于理性时代的时候了。它是想象的成果……而另一种哲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基础上的。”

因此当时的思想意识处于18世纪的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1795和1796两年，卡巴尼医生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了组成《人的肉体与精神之关系》（1802年）的12篇论文中的前6篇。由此可见，他是心理生理学的创始人。另外，他也很关心建立道德科学，认为这和人体科学一样可靠，能够为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义提供坚实的基础。硝石制造所的医生皮奈尔在同一时期创立了心理病理学。1798年他发表了《论精神错乱或痴想：医理与哲理的探讨》。许多关于习俗研究或思想史的著作仍然充满18世纪的精神。继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1756年）之

后，曾以故事集《埃及和叙利亚游记》（1787年）闻名的沃尔内，于1791年当制宪议会的议员时发表了《论毁灭或关于古帝国的衰亡的沉思》[1] 这一巨著。他在作品里重申了18世纪反宗教的全部论点。斯塔尔夫人以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年）为扩展文学批评作出了贡献。她指出："我试图分析宗教、道德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这是把历史批评引入文学作品的研究。

然而本世纪哲学的最后一部杰作是由孔多塞撰写的。他同吉伦特党人一起被捕和监禁，于1794年写出了《人类精神进步之概述》，对人类可以尽善尽美并无穷尽地进步表现了坚不可摧的信念。他认为，科学领域的进步也是无止境的：

"随着人们对更多事物间众多联系的认识，他们就能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表达它们，并能用可以举一反三的形式介绍它们。"

在从属于科学的技术领域里，进步同样是无穷尽的。在道德科学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样受一些可认知的规律支配。为了对笛卡儿这位思想和方法的革新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国民公会于1793年10月2日通过法令，把他的遗骸迁入先贤祠："勒内·笛卡儿不愧享受伟大人物应有之荣誉。"

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潮流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那些因种种原因曾遭受革命冲击或苦于旧社会的瓦解的人很快就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本世纪的思想。这种对启蒙时代的谴责，从1794年起在流亡者中间表现出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父萨巴蒂耶·德·卡斯特尔在他意味深长的著作《用以了解政府真正原则的道德和政治的思想与观察》里写道："人民越是受到启蒙就越是不幸。"权威、传统、启示宗教、壁垒或庇护所再度流行起来。归咎于启蒙思想和革命的那些错误被认为来自一种虚假的信仰，即以为原则是由人类制定的，而实际上原则是不能分析，并且是超越理性微不足道的能力的。

这一运动在法国本土还很弱小，而它在国外流亡者中间却越来越大。一些人只满足于非理性地解释事态的发展。巴吕耶尔神父在他1797—1799年发表于汉堡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史的回忆录》里，把法国革命归结为共济会的一次可悲的阴谋：

“在这场法国革命里，所有事态，以至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都是经过事先预谋、策划、安排、决定和规定的。一切都是最卑鄙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因为这都是由那些惯于在秘密社团里策划阴谋，并且善于选择时机促使阴谋得逞的人准备并引导的。”

另一些人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天数或“事物的力量”。夏托布里昂在他1797年发表于伦敦的《革命的历史、政治、道德面面观》里频繁地引述“事件的命定性”，“支配着各帝国的天数”，“这种叫做事物力量的必然性”。但他最终发现自己对此不能理解和无法解释：

“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去了解造成各国动乱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感到有些事情无法解释。有一种我不了解的、不知隐藏在何方的因素，而它仿佛是一切革命的动力因。”

加入英籍的日内瓦人马莱·迪庞表现了同样的反理性主义。他用“事件的命定性”、“事物的强制性，即这种独立于人和政府的力量”来解释大革命。从“事物的力量”到“上帝的旨意”只相差一步。

反革命的理论基础首先是由1796年同时出版的、大同小异的两部著作构成的。一部是博纳尔子爵的《论世俗社会里政治与宗教的力量》；另一部是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论法国》。

在《论法国》里，约瑟夫·德·梅特尔肆无忌惮地用神力来解释事件的发展：

“我们大家都被一条看不见的锁链拴在上帝的宝座上。这条锁链拴

住我们但并不勒紧……在革命的年代，拴住人们的链子突然缩短，因此人们的行动受到局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是法国革命牵着人们的鼻子走，而不是人们在进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的人们是不由自主的，并且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们被事态的发展推到这一步……他们只是受到某种更英明的力量的驱使而已。”

上帝“惩罚是为了使人再生”；法国违背了基督教的感召，因此必须要接受血的洗礼以获得新生；反革命将在上帝规定的时刻发生。这些系统观点为“圣彼得堡之夜”做好了理论准备，对于战争更是如此。“战争本身是神圣的，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正统王权派找到了理论家，王位僭望者奖给约瑟夫·德·梅特尔50枚金路易以资鼓励。

在《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里，德·博纳尔提出了一种超越；事物发展和摆脱偶然性的社会实体的理论：

“人们不能给予宗教或政治社会任何结构，正如他们不能给予物体重力或给予物质体积一样。”

君主制是典型的“法定社会”，它的特点是权力的统一，具有必要的社会区别和等级，笃信基督教。法国君主专制的成功与失败，历来取决于它是否忠于内在的构成法则。《论政治和宗教的力量》尤其以尽力抽象为特点，是流亡者队伍中理论复兴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这些著作都发表在国外，因此起初在法国鲜为人知。法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主要利用顽固的反理性潮流。卢梭颂扬的感情和直觉的潜在力量是人们对付当时苦难的一种手段。此外还有从神秘学和天启论演化而来的秘传学说，以及虽已分裂但仍然起作用的传统宗教。尽管在社会方面很保守的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继续仇恨天主教，在人民群众里宗教活动已明显减少，但是传统的宗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庇护所和一种安慰，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座壁垒和一种保障。这些态度为波拿

巴恢复宗教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学运动也表现出同样的对立。革命的冲击造就了一些新的形式，但是政治的激情没有能力更新旧有的古典形式。然而语言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单词被赋予一种新的感情色彩。人们喜欢用的词有国民、祖国、法律、宪法……厌恶的词有专制、贵族……它们仿佛被一种内在力量改变了面貌。

传统的形式——戏剧与诗歌，除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外，由于一味效仿过时的古代模式，僵硬地拘泥于形式和规范而陷入绝境。

在诗歌方面只有一些二流的诗人，如德利尔神甫（1758—1813年）、埃库沙尔-勒布伦（又名勒布伦-潘达尔，1729—1807年）。后者的主要诗作是《“复仇者”号颂》（1794年）。对爱国主义的颂扬和政治的激情导致一些更加有力，更加振动人心的作品问世。祖国成为新的崇拜对象。罗热·德·利尔的《莱茵军战歌》（《马赛曲》，1792年4月25日）和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出征歌》（1794年7月14日）的诗句都是奉献给祖国的。自由和爱国主义激励着安德烈·谢尼埃（1762—1794年）的灵感，他于1791年写出了《网球场誓言》。不久，他的革命热情衰退。由于被怀疑，共和二年风月17日（1794年3月7日）谢尼埃被捕入狱。他写出了《年青的女囚》和《讽刺诗》，它们在形式上借鉴古代诗歌，并且洋溢着个人的狂热感情，开创了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先河。

戏剧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时代的冲击。形式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内容变成了民族的和共和主义的。1791年1月13日，制宪议会废除了王政时代的审查制度和戏剧方面的一切特权，“任何公民都可以开设公共剧院，上演各种形式的戏剧”。巴黎开设了约50座剧院，艺人由旧制度下的贱民变为演员公民，他们在革命运动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1793年，剧院成为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8月2日，国民公会下令在各市政府指定的剧院每星期演出3场“关于布鲁图斯、威廉·泰尔的悲剧以

及其他表现革命光荣事件和自由捍卫者高超品德的戏剧。每星期有一场的演出费用由国家支付。任何剧院如上演败坏公众思想，唤起对王政可耻的迷恋的剧本将被关闭。”

共和二年风月20日（1794年3月10日），法兰西剧院改为人民剧院。有些剧本不折不扣地取材于当时的时事，如西尔万·马雷夏尔写于1793年的《对国王们的最后审判》是一部独幕散文预言剧。剧中表现所有的君主都被流放到一座岛上。最多产的剧作家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1764—1811年）。他的悲剧或取材于古代（《卡依于斯·格拉絮斯》，1792年；《蒂莫莱翁》，1791年），或取材于民族历史（《查理九世》，1789年；《让·卡拉》，1791年），但都洋溢着革命精神，影射时政。然而，除了过时的形式外，这些丰富的应时剧无一能流传后世。

一些与革命运动直接有关联的新形式应运而生。文学艺术为斗争服务，它通过报章杂志和议会及俱乐部的讲坛表现出来。然而这些新形式同历史的关系比文学更为紧密。

如夏托布里昂所说，政治雄辩是“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过程中无需培养就能自动发展起来”。确实，雄辩是革命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雄辩受到启蒙哲学的培育，有时很抽象，充满了对古代的回忆；有时不免富于夸张，而通常又是热烈和燃烧着激情的。米拉波到1791年4月2日去世前始终以他那运用自如的力量、他那强壮的体魄和刚劲的丑陋统治着制宪议会的讲坛。他《关于1/4捐税》和反对破产的演说（1789年9月24日），以及他对控告者的回答（1790年5月22日）一直堪称佳作。韦尼奥的雄辩更加优美、流畅，这位吉伦特派的雄辩家喜欢大段发挥和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并乐意使用普通的修辞手法，如重复，譬喻，回顾希腊、罗马等。丹东以即兴演说著称，他不太考虑演讲艺术和篇章结构。他的风格类似米拉波（人们给他的外号是“平民的米拉波”）。罗伯

斯庇尔的雄辩尽管常常缺少自发性（他总是预先精心准备他的演说），但他却以逻辑性强和原则的坚定性，以及热烈而有节制的激情使人信服。圣茹斯特的雄辩术更为有力，他的文体有时更为艰涩，充满了经过精心推敲的句子（如“把自由变得冷酷无情”）。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政治雄辩的学院气变得较重，渐渐失去了光彩。到了执政府专制时期，雄辩之风告终。

由于新闻自由，政治新闻业从1789年起得到了巨大发展。1792年以后实际上对报刊有所限制，但仍然阻挡不了其发展趋势。旧制度时期以文学为特色的刊物（《法兰西报》是周刊；《信使》为月刊）由新闻报刊所取代。它们无疑是革命时期真正的文学形式。保王派的报纸被迅速淘汰。里瓦罗尔为之撰稿的《全国政治报》从1790年起停刊；《使徒行传》于1791年10月停刊；鲁瓦尤神甫的《国王之友》于1792年5月停刊。从1789年起，爱国者的报刊在政治和文学上占据统治地位。它们主要是：埃利泽·卢斯塔洛的《巴黎的革命》、马拉的《巴黎政论家报》（从第6期开始改为《人民之友报》）以及卡米耶·德穆兰的《法国和布拉邦特的革命》。此外还有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邮报》（1789—1791年）、孔多塞为之撰稿的《巴黎编年史报》（1789—1793年）、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报》（1789—1793年）以及罗伯斯庇尔在1792年5—8月出版的《宪法捍卫者报》。共和二年霜月（1793年12月），卡米耶·德穆兰创办了后来只出过7期的《老科尔得利报》。在这些政治新闻报刊上可以看到革命雄辩的特点，如对主义执著追求，激烈地论战，比较讲究修辞，引述古代历史。《老科尔得利报》的第3期仿佛就是塔西佗文章的改写。平民新闻的主要代表是马拉的报纸以及1790年11月由埃贝尔创办的《迪歇纳老爹报》。埃贝尔是一位满腔热情、富于想象的优秀记者。他文体色彩浓艳，努力反映人民的愿望并成为其代言人。热月政变后，报刊从整体上看是反雅各宾的和保王的。以上这些大量的政治报刊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有3份：创办于共和二年花月的《哲学、文学与政治旬报》；潘库克的《民族报》（又名《世界导报》），

它创刊于1789年11月24日，至1803年改为官方报纸；《辩论与法令报》，它的第1期出版于1789年8月29日，其后来的历史相当悠久。

如果说大革命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一些制约，那么在艺术领域里却出现了能够满足伟大时代和广大公众要求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音乐、国家节日庆典的布置图和壮丽场面等方面，大革命都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峰。这些艺术不是以引起少数玩赏家的兴趣，而是以激发团结一致的人民的革命热情为目的的。

经常有人指责大革命破坏了文物。如果说确实有许多文物遭到破坏，那么历届革命议会为保护国家艺术遗产所作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在制宪议会时期，文物委员会曾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考察和审定一切值得保护的文物。在国民公会时期，公共教育委员会和临时艺术委员会也起到同样的作用。1791年5月26日，制宪议会责成卢浮宫汇集一切科学和艺术杰作。共和二年雪月27日（1794年1月16日），国民公会决定这一艺术宝库由4个部分（绘画、雕塑、建筑、古代文物）组成的博物馆加以保管。亚历山大·勒努瓦尔把大量艺术珍品，尤其是因民众憎恨王政而摧毁的圣德尼修道院[2]里的雕像，集中到小奥古斯坦修道院。共和二年果月15日（1794年9月1日），国民公会以此为基础创建了法国文物博物馆。

艺术家也获得了解放。在达维德的推动下，他们从1790年起对于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垄断罗马学校和美术作品展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美术作品展览从1791年起向全体艺术家开放。1793年8月8日，绘画与雕塑学院和其他所有学术院、大学同时被取消。在这一领域里，革命的冲击也使创作者的灵感为之一新。

1793年的美术作品展览说明上写道：“庄严朴素的共和派也许感到惊奇，为什么在欧洲联盟包围自由之土的时刻，我们仍然致力于艺术……我们决不同意这句名谚：战火之下无艺术。我们很愿意重提一件

往事：在被围困的罗德斯城中，普罗托热纳[3]专心描绘着一幅杰作。”

在最危急的时刻，这短短几行字表明了整个革命时期鼓舞着大多数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艺术不能脱离争取自由的总斗争。1793年3月19日，在向国民公会赠送一幅表现米歇尔·勒佩勒蒂·埃因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而被刺杀的油画时，达维德宣告：

“我们每人都应以大自然赋予的才华为祖国尽责。尽管形式不同，但大家的目标必须是一致的。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竭尽全力用一切手段启发同胞，不断向他们呈现英雄主义和德行的最崇高表现。公民们，上天把财富赠给了他所有的孩子，他要求我用绘画的手段表达我的灵魂和思想。”

达维德（1748—1825年）作为画家和共和国节日的组织安排者统治着革命艺术。遵循温凯尔曼的教导（他出版于1764年的《古代艺术史》在1766—1793年曾3次被译成法语），达维德转向仿古。他在描绘只能感觉得到的颜色和掌握易于理解的形式上达到了高超的技艺。达维德同法国18世纪的艺术传统决裂。他首先以古代的系列作品出名：《贺拉斯三兄弟宣誓》（1784年）于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中重新和《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布鲁图斯》（1789年）一起展出。此外还有《萨宾妇女》（1799年）以及完成于1800年至1804年的《列奥尼达斯》。达维德一度曾放弃描摹古代形象，让他的艺术为革命服务。他勾画了《网球场誓约》的草图（1791年在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绘制了国家节日庆典的许多布置图，创作了《自由的殉道士勒佩勒蒂埃》和《马拉之死》。在画中，马拉躺在浴缸里，身上盖了一幅被单，胸膛被刺穿，为国殉难。画面上可以看到马拉赤裸的上身和流血的伤口，缠着白色马德拉斯布的脑袋垂在肩上，嘴角仿佛发出了痛苦的微笑，在下垂着地的手里还紧握着他用来写作的笔。地上是凶手的匕首……这幅动人的名画悬饰在国民公会大厅。它颂扬公民的高尚品德，唤醒代表们警惕救国事业

所处的危险。从达维德的古代画到他的革命画，其统一性来自高尚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

然而，18世纪的艺术继续存在。特别“敏感”的画家格勒兹（1725—1805年）仍活着，此外还有更为细巧而又是无可比拟的画家弗拉戈纳尔（1732—1806年）和喜欢描绘废墟的浪漫主义画家于贝尔·罗贝尔（1733—1898年）。罗贝尔的某些作品表现了现代生活的确切含艾。普律东（1758—1823年）和达维德一样醉心于描摹古代形象，但是他的作品里已经表现出浪漫主义前期的某些特征。最后，在雕塑领域里有以仿古雕像并尤其以人物塑像著称的乌东（1741—1828年）。

音乐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双重性。通过格雷特里（1741—1813年）和达莱拉克（1753—1809年），18世纪的传统得到了继承。但与此同时，革命的激情使得灵感和方法为之一新。戈塞克（1733—1829年）、梅于尔（1763—1817年）以及格雷特里创作了大量赞歌，在国家节日时由庞大的群众合唱队演唱，歌颂爱国主义热情和共和国的公民责任感。《7月14日之歌》的曲调取自戈塞克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联盟节颂歌》谱的曲，它始终是最优秀的歌曲之一。梅于尔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歌词谱写的《出征歌》和《马赛曲》一样，都是热月反动时期和督政府时期共和派战士对抗保王派歌曲《人民的觉醒》的战歌。戈塞克首先倡议成立国立音乐研究院，该倡议于共和二年雾月18日（1793年11月8日）被国民公会采纳而得以实现。共和三年热月16日（1795年8月3日）这所研究院改名为音乐学院，以“演奏和教授音乐”为目的，其领导核心由5名督察员组成：戈塞克、格雷特里、梅于尔、勒絮尔和谢吕比尼。这足以说明，在这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各种形式平分秋色，18世纪的艺术和新的表现形式在一起共处。

因此，知识界和艺术界同整个社会一样，其特点是既有决裂也有继承。理性主义和传统，智慧和感情互相冲突。古典艺术形式始终占统治

地位，但是浪漫主义已经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翻译了奥西昂的作品。斯塔尔夫人在1800年申明她偏爱北方文学：“北方人民遭受的苦难比享受到的乐趣更多。但他们的想象力却因此更为丰富。”这时还出现了无视时代苦难，以骑士和行吟诗人为主题的、关于“美好的古代”的传说。这种传说很快又加上了夏托布里昂大力宣扬的对伤感的天主教的追忆。通过这种感觉和思想的更新，贵族和流亡者隐隐约约地寻找使自己融合进新秩序的办法。新的资产阶级同样怀有寻求稳定的愿望。它并不关心思想意识，对原则也很漠然，只考虑享受和往上爬。因此，它特别要求维护既得的新特权：这也是革命事业的主要成果。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超过了思想意识的对立。富有的资产阶级和平静下来的贵族准备支持能保障他们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或是新近取得的或是部分地恢复的）的强有力政权。

Ⅱ.资产阶级国家

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建立在神授权力理论基础上并保障贵族特权的君主专制国家，代之以建立在国民主权和公民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和世俗国家。按照纳税多寡来执行这些原则，从而使新建立的机构和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协调一致。因此，新国家只能是一个保护新统治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国家。

1. 国家民主权和纳税组织

8月4日夜晚实现了在法律方面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民不论出身如何一律平等。“各省、公国、地方、县、市和居民区的特权”也都被永久取消。买卖官职被废除。1789年11月3日的法令决定无限期关闭各级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一切限制国家权力的因素都被扫除，包括特权、中间体；地方主义、旧自主的残余等。旧的国家机器垮台了。经过根本的改造，国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了。

国家的改造及其权力的削弱源于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国家不再是君

主的私有产业，当家做主的人民是国家的本源。根据天赋权利的理论，社会建立在其成员之间自由契约的基础上；从此，国家也建立在政府和被统治者之间契约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必须为公民服务，正如1789年人权宣言第2条指出的，国家应该保证维护人的天赋权利。1791年的宪法把君主置于国民之下，把执行机构从属于立法机构，并把权力严格分开。通过选举，它把国家机器置于公民手中。于是，中央权力因公共机构重新组织而被削弱。在地方，自治也取代了中央集权。1789年12月14日关于市政府组成的法律，12月22日关于初级议会和行政议会组成的法律，都规定了最广泛的权力分散。国家被解除了武装，税收不再由它掌握，维护治安也由各市政当局负责。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然而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民主权只掌握在纳税人手中，积极公民依附于显贵，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私产。贵族的反抗和内外战争考验了这个新的结构。但它自1792年8月10日后便不复存在。

国家权力的加强是和革命政府的建立与稳固同时实现的。1792年8月10日王政垮台后，执行机构得以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不折不扣地贯彻国民主权的原则和实行普选把国家扩大到全民的范围，而恐怖又消灭了敌对分子。在这个新的社会基础上，共和二年的雅各宾民主国家不得不再次成为专权的国家，为了拯救国家必须这样。它的专权主义还因1789年事业的两个特点，即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而得到加强。但这两个特点直到1793年才取得了合乎逻辑的后果。根据理性主义，国家机构必须服从于一种严格合乎逻辑的思想。国家是理性的工具。任何人和事都必须服从理性，它的权威大为加强。根据个人主义，中间体、组织与社团都被取消。新国家只承认个人，并直接掌握他。面对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公民的权利不再得到保障。“自由的专制主义”建立后，公民就无能为力了。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的报告里，对此作了解释：

“立宪政府主要关心公民的自由；而革命政府则关心公共自由。在

立宪制度下，几乎只需保护公民不受滥用公共权力的损害；而在革命制度下，公共权力本身被迫实行自卫以对付各个乱党的攻击。”

因此，在雅各宾派看来，环境可以使恢复国家权威和中央集权合法化。1793年9月29日的最高限价法把经济领导权交给了国家。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法令则把一切法定社团和公务人员置于救国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把警察总局置于领导之下。然而，双重的矛盾破坏了共和二年雅各宾的专权国家。统制经济把产业主、生产商同雇工、消费者对立起来。此外，雅各宾的集权触犯了无套裤汉要求直接民主的自然倾向。救国委员会的专政把民众活动分子置于严格纪律约束之下，并且镇压拒绝服从的人。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国家并不像1791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那样建立在某个阶级的社会基础上，因此它很不稳固。热月9日以后，大厦崩塌了。

资产阶级的自由国家又得以恢复。经济摆脱了国家的控制。共和三年宪法回到了制宪议会的自由体制。纳税人选举制把人民大众排除在政权之外。经过共和二年民主的尝试后，显贵们的阶级意识变得更加强烈了。如果说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三权分立，并且剥夺了执行机构的一切财权，那么它却强化了国家的权力，并且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集权。督政府负责共和国的内外安全，掌握武装力量（宪法第144条）。它可以签发传票和逮捕证（宪法第145条），任命专员监督和保证法律在各级行政和司法机构得以实施（宪法第147条）。行政权并不完全分散，市政当局服从省政府；省政府服从部长。拥有很大权力的督政府特派员直接同内政部长保持联系，在各级行政机构代表政府并确保它的权威。在实践中，对国家权力的维护更表现在直接任命大批在理论上由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和法院，扩大规章制定权，加强警察机器及其专断权方面。由于人民大众被纳税人选举制排除在外，贵族尚未顺从，一部分资产阶级敌视当局，因此督政府时期国家的社会基础极为狭窄。由此导致了对宪法的蹂躏，共和五年果月以及共和六年花月两次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

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立法机构服从于执行机构。各姐妹共和国的执行机构得到加强，在荷兰、瑞士、罗马都如此。每年一度的选举保留了自由体制的特点，却造成执行机构不断受议会多数变化的制约，从而导致它的瘫痪。1799年，对外战争和雅各宾派势力的抬头使资产阶级认为必须最终加强执行机构，这就是雾月政变的由来。

共和八年的宪法以自行加聘取代了选举，最终制服了立法机构，并把行政权力集中在首席执政官的手里。1789年人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国家终结了。军事独裁虽然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却捍卫了显贵们的社会优势。新的专权国家不久就把社会基础扩大到归附于它的贵族。而它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

2.世俗化与政教分离

遵循着事态发展的必然逻辑，革命逐渐用一个世俗的、与宗教分离的国家代替了王位与祭坛结合的神权国家。

享有特权的公共崇拜制度首先代替了国家宗教。制宪议会最初根据人权宣言第10条只是对此予以容忍。但是到1790年4月13日，制宪议会认为“它对信仰和宗教观点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权力”，因此拒绝继续把天主教视为国教。1790年7月12日通过的教士法仍然承认天主教对公众信仰的垄断。户籍、教育、救济等事业仍在教会掌握之中。由教士法引起的教会分裂成为促进演化的重要因素。对反抗派教士的斗争和对宪政派教士越来越强烈的仇视渐渐打击了教会，继而对宗教本身也带来了损害。

国家世俗化在1792年8月10日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8月18日，鉴于“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不能容忍任何行会”，立法议会取消了从事教育和救济的宗教团体。各医院和慈善机构、各学院和大学的财产都被出售。教育和救济全部实行世俗化。8月18日的法令还规定，除了司祭在执行职责时外，其他任何人一律禁止穿着法衣。8月26日，反抗派教士

被勒令在15天内离开法国，否则就被流放到圭亚那。尤其是，1792年9月20日立法议会决定实行户籍世俗化，从此把它交给各市政当局管理。同一天，鉴于“婚姻只是一种世俗的契约”，“离婚的权力来自个人自由，而不可解除的契约将是不幸的”，立法议会规定允许离婚。

政教分离是内战和抛弃基督教信仰导致的结果。起初，国民公会曾同宪政派教会和解，在它1792年11月30日的致词里否认自己有意剥夺公民“由教士法规定派给他们的司祭”。1793年6月27日，国民公会宣布将教士的待遇列入公债。但是它对待反抗派教士比立法议会更为严厉。1793年4月23日，它下令把他们立即流放到圭亚那。不久，宪政派教士被怀疑为保王派和温和派。渐渐地，仇视的措施越来越明确。从1793年7月起提出了教士的婚姻问题。8月12日，国民公会决定“天主教司祭不再因结婚而被免职”，结过婚的教士可以重新或继续履行圣职。1793年10月5日决定采用革命历法，建立10日休息一天的制度，接着又抛弃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政教分离的决定性阶段。尽管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的法案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教堂仍然被关闭。这种实际状况在热月9日后得到认可。根据康邦的提议，共和二年第2个无套裤汉日（1794年9月18日），国民公会通过法案决定共和国从此不再支付“任何宗教信仰的费用和教士的薪俸”。这是不言而喻地废除了教士法，实行了政教分离。

共和三年风月3日（1795年2月21日）的法律严格规定了政教分离的体制。共和国不为任何的宗教信仰支付费用，法律不承认任何司祭，宗教的一切公共活动和外部表现都被禁止。然而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国民公会允许自由使用未出让的教堂设施，但同时规定各种崇拜都可以使用。共和四年葡月9日（1795年9月29日）的法令把所有这些措施法律化，并强迫司祭宣誓“忠于并服从共和国各项法律”。为打击反抗派教士，国民公会通过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令坚持1792年和1793年的法律。督政府在共和五年果月19日（1797年9月5

日）法律的第24条及后面几条里重申了以上原则。与此同时，督政府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世俗化。共和六年芽月14日（1798年4月3日）的法令规定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必须使用共和历，热月17日（1798年8月4日）建立了10天一休的制度，果月13日（1798年8月30日）又规定了旬末日的庆祝办法。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天主教会影响和威望的衰落已经不可否认，它表现为四分五裂的教会穷困潦倒并开始瓦解，宗教活动衰退以及平民各阶层中不信教人数增长。教会和革命在思想意识上不能调和，因此它们始终是互相敌对的。

由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以及全国大多数人对传统宗教的怀念致使执政府时期的宗教得到迅速恢复。但是，波拿巴把宗教看作使社会服从的手段，把教会看成政府的工具。因此，虽然他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但拒绝给它以国教的地位。他通过组织条例把教会紧紧置于国家控制之下。政教分离消失了1个世纪，但是国家仍然是世俗的。

3.国家各部门

革命完全重建了国家机器，使新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机构同资产阶级社会及自由国家的总原则协调一致。

各地方行政机构由制宪议会根据合理的计划重建起来。国民主权的原则得到了贯彻。行政长官由选举产生。权力分散就由此得以实现。中央政权不能专横地对待代表人民主权的地方机构。地方机构都经选举产生并集体行使权力，因而使得行政机构有所削弱。此外，频繁的选举也引起了不稳定。根据1791年宪法，各省、县级行政机构每两年更换其成员的一半，各市镇级行政机构每年更换一半成员。根据共和三年宪法，每年各省行政机构更新1/5，市镇行政机构更新1/2。在这种情况下，要组成一个精通业务的行政班子是困难的，在各市镇和农村地区尤其如此。各省和县的行政机构主要从资产阶级里招聘人才，而各市镇的行政人员则主要来自手工业主、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中产阶级。1793年，

在县级、尤其是市镇级出现了民主化倾向，甚至连无套裤汉也能参加政权。在农村，由于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市镇政府的组建通常很困难。因此共和三年宪法决定建立区级政府，由每个市镇出一正一副两名负责人员组成。但是这一做法没有成功。

然而中央集权的倾向在机构合理化过程中已经开始萌发。1793年革命的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革命政府建立了常设行政机构，并且通过清洗实际上用任命取代了选举。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 的法令规定在各市县级行政机构设立“国家官员”。他们负责每10天向政府的两个委员会汇报1次。办公机构得到加强并实行了民主化。

共和三年宪法通过恢复纳税人选举制把行政垄断权归还给显贵资产阶级。但它还企图通过向各省市级行政机构任命政府特派员来强化国家行政机构。此外，督政府在各方面继续努力改组行政机构，这方面有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的突出业绩为证。波拿巴的军事独裁正是部分地建立在这种机构改革的基础上。但是，选举仍然保持，不稳定局面继续存在，有时还有不称职的现象。通过共和八年雨月28日（1800年2月7日）的法律，波拿巴取消了选举，建立了一支由他任命的官员队伍。他就这样稳定了行政机构，加强了它为专权国家服务的能力。

司法机构由制宪议会根据和行政机构同样的原则进行了改组。但在这方面，选举没有造成同样的困难。根据1790年8月16日的法律，法官由选举产生，任期6年，连选得连任，任何“没有在法院里当过5年法官或司法人员的人”都不得当选。

共和三年宪法把任期缩短为5年。这些措施仍然旨在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和权能。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制宪议会表现出极大的自由主义。没有任何机构负责追查罪犯，检察院被取消了。除了初步预审外，诉讼程序是公开的。控告和审判两重陪审团的建立保护了被告的权益。

司法组织自然也承受了当时形势的冲击，它同国家结构朝着同一方向演变。国民公会取消了关于被选资格在能力方面的条件。只要年满25岁就能当选。在这种情况下，诉讼程序趋于简化。行政机构同时把司法权也抓在手里。革命政府实现了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司法机构同它的分离状况实际已告结束。恐怖主义司法体系的特点是：一方面建立了程序简便的特别法庭；另一方面取消了普遍法的保障。在督政府时期，司法组织并非没有受到这种做法的左右。督政府被宪法授予签发传票和逮捕证的权力。特别法庭以军事法庭的形式继续存在，以审判朱安党或雅各宾派等政治反对派。

最后，革命事业在法典方面并没有完成。大革命摧毁了封建法和教会法并反对罗马法，企图订立一套全国统一的法律。1790年8月，制宪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建立“一部由简单、明了、符合宪法的法律组成的法典”。1791年9月25日通过一部刑法，28日通过乡村法。1793年8月，在最危急的时刻，国民公会讨论了由康巴塞雷斯代表立法委员会提出的民法草案。各届革命议会在这方面即使未能大功告成，却也硕果累累。关于一些基本问题的“纲举法”为后来奠定了基础：婚姻和离婚，继承和立遗嘱权，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典押。在这方面，热月派政府和督政府时期与山岳派立法相比明显后退。在继承方面，法律的追溯性被取消了。

这样，执政府时期出现了法律的稳定性，它体现了社会的稳定。恢复对法官的任命和逐渐恢复检察院使国家的权力得以加强。

制宪议会建立的财政制度主要表现为实行税务平等和设立3大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和营业税）。由于取消了间接税，国家失去了重要的经常性的财源。因为一切财政机构都被废除，课税基数的制定与征收都由各市政当局负责，所以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权力被削弱。事态的发展使国家权威的强化曾一度受阻。

国民公会时期对制宪议会制定的税务制度进行了改革。1793年3月

12日取消了营业税，并决定对工商业收入征收动产税。由于内战，1793年的税收减少，山岳派的国民公会便决定征收革命捐，并且进行强迫借款。该措施于1793年5月20日原则通过，9月3日具体落实。其总数确定为10亿，根据累进的比例向收入超过1 500法郎（单身者超过1 000法郎）的公民借款。热月党又回到制宪议会确定的体制，并于共和四年果月6日（1796年8月23日）恢复了营业税。为了同贬值进行斗争，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规定，土地税的一半由按票面价值的指券缴纳，另一半由按1790年价格的谷物缴纳。共和七年，整个税务体制由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进行了彻底改造。根据霜月3日（1798年11月23日）的法律，动产税率有了很大提高。雾月1日（1798年10月22日）法律规定的营业税改变了课税基数的基础，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律决定设立第四种直接税——门窗税。同时还改革了注册税（霜月22日，即1798年12月12日的法律）和印花税（雾月13日，即1798年11月3日的法律）。这些基本立法的主要部分在以后一个多世纪里一直有效。这样，有产者得到了满足，国家的收入则仍然下降。但是，议会两院拒绝恢复间接税，只满足于征收烟草税，公路税（又称买路钱）和公共车辆的座位税。

税金上缴情况不好在很大程度上要应归咎于制宪议会确定的征收制度。因为根据这一制度，负责收税的市政当局不可能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共和六年雾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律决定在各省建立由特派员组成的直接税收办事处，帮助各市政当局进行一切“与直接税的课税基数、征收以及诉讼有关的工作”。这还不是专门的行政机构，而是一个普通的检察机关。

在督政府时期，国家财政权力的强化有很大进展。波拿巴只满足于在许多方面使用前人创造的工具。他用专制国家取代了自由国家，建立起一个只隶属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的财政机构，不久又制作出作为土地税唯一合理依据的土地册。这样，他进一步完善了督政府建立的制度。由

于最终稳定了有产者的信心，他使国家的威信得到恢复。第一帝国时期间接税（包括盐税）的恢复标志着税收制度演变的终结，也表明专权国家的强大。

III.民族统一和权利平等

法国大革命赋予某些名词以崭新的革命意义。“民族”就是其中之一。当敌人的炮火在瓦尔米即将摧毁法国防线时，凯莱曼在普鲁士人面前喊出了“民族万岁”的口号，使敌人惊讶不已。这一口号传遍了志愿军队伍，使得敌人犹豫了。歌德指出：“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从1789年起，“民族”这个词就有了新的涵义。在激动的心灵里，在信念和希望所鼓舞的自发群众运动里，它的涵义进一步明确。民族是一个整体，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等级和阶级都不复存在，全体法国人组成了法兰西民族。这个关键的字眼响彻在集体灵魂的深处，解放出潜在的力量，提高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但是，在这个字眼掩盖下，新秩序的现实迅速形成。费迪南·布吕诺在他的《法语史》里指出：“民族”属于那种能“使人们产生幻觉的词”。民族的社会涵义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演变。如果说，在革命期间民族统一有了不容争辩的进展，那么权利的不平等却在新的民族国家里造成一个根本矛盾。由于它建立在纳税制度狭窄的范围内和私有制基础上，所以，实际上它把广大人民群众排除在外。

1.统一的进展

在革命过程中，法兰西民族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新的机构组成一个在行政和经济上统一的国家框架。在反对贵族和欧洲联盟的革命斗争中，民族意识大为增强。

制宪议会进行的机构合理化改革，革命政府恢复中央集权以及督政

府在行政方面的努力摧毁了自治和地方主义，建立了统一国家的一整套机构，从而完成了旧制度王朝未竟的事业。同时，通过公民人人平等、1790年的联盟运动、雅各宾俱乐部各地分部的发展、1793年反对联邦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大会，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的意识在觉醒，并逐渐形成。

新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民族的统一。封建的分散状态被打破，国内的通行税和关卡被废除。“关卡后移”至政治边界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统一。保护主义的关税使得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的竞争。在交通工具发展允许的范围内，国内的自由流通促使并巩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统一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1790年5月，制宪议会建立了度量衡委员会。1791年3月26日，它通过了新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将建立在“地球子午线长度和10进位制”的基础上。德朗布尔和梅香在1792年测量了自敦刻尔克至巴塞罗那的子午线。阿维和拉瓦西埃确定了1容量单位的蒸馏水零度时在真空中的重量。1792年7月11日，这个委员会确定了长度和重量的学术名称：米（mètre）和克（gramme）。1793年8月1日和1795年4月7日（共和三年芽月18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决定性的法案。1795年的法案确定米的长度为“从北极到赤道的子午线的1/10 000 000”；克的重量为“体积为1/100米的立方的纯净水在冰融温度时的绝对重量。”

还需要把米制加以施行。在革命期间一拖再拖，始终没能实行米制。执政府下令从共和十年葡月1日（1801年9月23日）起开始实行。但在实际生活中，新的度量单位只是很缓慢地才取代了旧制。

国民军队增强了民族意识，因而是统一的有力工具。制宪议会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拘谨。它只是取消了民兵，并于1790年2月28日规定人人均可捐纳军衔。1791年3月9日关于前线部队的组织法坚持了志愿应征制度。制宪议会同时使一种革命创举——国民自卫军合法化，可是它只限积极公民参加。1790年12月6日的法律规定了总原则，1791年9月19日的

法律重申和进一步明确了这些原则。前线军队的瓦解和国王出逃时引起的战争威胁使制宪议会决心在国民自卫军里动员10万名志愿军组成营队（1791年6月21日）。除了这些1791年的志愿军，立法议会也进行过征兵。王政的倾覆、民族的危机以及无套裤汉走上政治舞台，这些因素决定性地促成了统一军队的组成。从1792年7月起，消极公民也被编入国民自卫军，这使它成为真正的国民军队。1793年2月24日，国民公会下令征兵30万。从21日起，它就决定把原有的前线团队和志愿军营队进行混合编制。

实际上统一化的进展是缓慢的。只是在共和二年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的法令里才明确规定了组编办法。另外，虽然1793年8月23日进行了大规模动员，但并非所有法国男人都被征入军队服役。尽管征调是普遍性的，但只有18至25岁的单身汉或无儿女的鳏夫才被征召入伍。而且，第二年热月党的国民公会没有进行任何征召。可见，义务服役仍是一种例外。共和六年果月19日（1798年9月5日）通过的关于征兵的儒尔当法，使义务兵役经常化了：

“每个法国人都是士兵”（第1条）；

“征兵的范围是20—25周岁的全体法国人”（第15条）

但是立法机构关于具体征召对象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并非全体够条件的人都被征召。尤其是，共和七年芽月28日（1799年4月17日）的法律纳入了可以替补的原则。热月14日（1799年7月2日），这项原则被取消。波拿巴为了满足显贵们的要求又把它恢复了。尽管有以上限制，混合编制以及每年一度的全国动员（实际上各阶级都被征兵，如共和七年和第一帝国时代）使军队真正地统一化和民族化了。诚然，在热月政变后，反动势力慢慢地改变了军队的公民精神。但是，武装国民的原则仍然存在。只要勇敢就能迅速晋升仍是人民平等的象征。在这两方面，波拿巴继承的无可比拟的战争工具始终是民族统一的基本因素之一。

法语也朝着同样的方向演变。大部分法国人在1789年只讲方言和土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被排除在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流之外。制宪议会出于对地方自治的关心，捍卫了语言的地方特色。1790年1月14日，制宪议会下令把它的法令译成在各地使用的所有方言。把战争民族化的国民公会却致力于把法语变成全国通用的民族语言。因为语言的统一有助于民族的统一。各俱乐部和人民团体在这方面作了巨大努力。在俱乐部里，用法语表达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恐怖时期，方言仿佛是反革命和欧洲反法联盟的帮凶。为反对使用方言，如在阿尔萨斯，人们曾搞起过“语言恐怖”，圣茹斯特在那里执行公务时曾对此积极倡导。共和二年雨月8日（1794年1月27日），巴雷尔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告废除旧日的方言，他说：

“联邦主义和迷信使用下布列塔尼语；流亡者和对共和国仇恨的人说德语……说君主国家和巴比伦塔相像是有道理的[4]。在民主国家里，让公民不懂民族语言因而不能监督政权，这就是出卖祖国……曾光荣地表达《人权宣言》的法语应该成为全体法国人的语言。我们应该把沟通思想的工具、革命最可靠的代表——共同语言交给全体公民。”

因此，国民公会规定一切公文和公证书必须使用法语，在居民讲布列塔尼语、巴斯克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各省份，10天之内将分别任命1名教师。热月政变后，政府又开始宽容，不久又把公文都译成方言了。在语言教学里也表现出同样的反动倾向：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关于小学的法律规定要教授“基础法语”，而在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4日）的法律里，教授法语只字未提，甚至连用法语讲授也未提及。取代拉丁语的民族语言只是在各中心学校和高等教育里才最终站住脚跟。民族统一在这个领域也带有某种社会歧视。

最后，公民意识的形成有助于民族觉悟的提高。因此，历届革命议会对教育很重视，这是为了培养公民。在制宪议会期间，由各教区神甫

在主日布道时宣读议会的法令和通告。公共教育计划中都包括阅读和评价《人权宣言》与宪法的内容。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1月19日）的法律规定，最基础的课本内容应是“人的权利、宪法、英勇和高尚行为”。热月党议会关于小学的法律也规定了同样的教学内容（自然是共和三年的《人权宣言》与宪法）以及“共和道德基础”教育。

盛大的国家节日符合这一目标。第一个国家节日是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1791年7月11日，为庆祝伏尔泰的遗骸入祀先贤祠，由达维德按照古代葬礼设计的活动则成为第一次真正的哲学节。从此，每逢重大事件就举行盛大纪念活动。届时，画家达维德、诗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音乐家戈塞克和梅于尔通常总要施展他们的艺术才华。1792年4月15日为自由节，1793年8月10日为共和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为最高主宰节。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法令建立了对最高主宰的崇拜，规定了旬末节，并为庆祝革命光荣事件或颂扬“人们最宝贵、最有用的品德”创立了全国性盛大节日。共和三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4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法案规定了7个全国性重大节日。共和三年的宪法原则上规定，国家节日的目的是“维系公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使他们忠于宪法、祖国和法律”。在督政府时期，最辉煌的节日是康波福米奥和平节，追悼奥什节和纪念卢梭节。1798年7月27日这一天，自由女神和艺术诸神在庄严华丽的礼仪中受到赞颂。

盛大世俗节日的演变也表明国民心态的发展在社会方面始终受到局限。

节庆活动的顶峰是在共和二年。当时的节日具有充分的国民意义。人民并不是列席者，而是参加者，是节日的基本因素。节日颂扬人民在民族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一新艺术的创造者达维德运用了造型艺术、绘画与雕塑的一切手段。在庞大合唱团演唱或大规模器乐合奏中，音乐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服装艺术和装潢艺术也被利用起来。最后，由仪仗队伍的排列布局把这些艺术综合在一起。国家节日使具有共同爱国信仰和一致忠于共和国的全体人民焕发了最高的热情。

随着反动势力的发展，盛大节日失掉了它的政治、社会内容。前不久在节庆中作主角的人民逐渐沦为配角，后来又成了观众，致使这些活动失去真正的国民性。不久，军事检阅和“官方”庆祝活动取代了国家节日。人民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国民团结不过是掩盖权利不平等的幌子。

2.权利平等和社会现实

1789年《人权宣言》第1条宣告的权利平等在理论上是民族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第3条肯定的国民主权原则也如此。理论上宣告人人平等；废除旧制度的社会等级赖以存在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权；个人主义观念在制宪议会涉及社会关系的成果中起主导作用，这一切都是构成一个平等社会和统一民族的基础。但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把财产权列入天赋权利，把经济自由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的原则。这样它就在新社会里埋下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同样，在政治成果方面，国民主权原则和纳税人选举制也是互相矛盾的。无疑，1789年资产阶级提出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是为摧毁贵族的特权。对于人民，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理论上的平等。不可能实行社会民主，政治民主也被抛弃。法律上的国民只局限在纳税资产阶级的狭窄范围内。

然而，人民大众对权利平等却有更具体的观念，并且把资产阶级只在理论上肯定的东西予以认真对待。他们要对1789年“伟大的希望”赋予真正的含义。民众运动的积极分子从权利平等推断出生存权利。他们认为，承认并落实人的生存权利将能使平民各阶层和民族完全融合成一体。生计问题是提高觉悟的有力因素。全部财产权的后果，即经济与利润自由同权利平等原则和统一民族的构成是互相矛盾的。形势的发展把

这个问题提到首位，并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通过普选和武装无选举权的公民把平民纳入国民范围，它标志着政治民主的实现。同时，反对欧洲联盟和镇压反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了新的国民实体的社会性质。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尽管再次使用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权的定义（第16条），然而它在第1条里却强调：

“社会的目标是人人幸福。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保证人人享受其天赋的、永不失效的权利。”

受救济权和受教育权也得到承认（第21条与22条）。在1793年夏的政治、社会斗争中，民众运动的领导人走得更远。他们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从而为包括民众各阶层在内的统一民族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久，他们从生存权又自然地引出了“享受的平等”的结论。

1793年8月20日，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代表各初级议会特派员在国民公会宣告：“法兰西共和国仅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法律和风俗习惯密切配合以消除享受上的不平等。”

因此，共和二年人民大众对限制财产权，肯定劳动权、享受救济权和享受教育权提出了不懈的要求。

作为共和二年平等共和国特点的社会民主尝试是难以持续的。在一直被肯定的私有制基础上，以限制利润为主要特点的统制经济体制企图把有产者和无产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工的利益加以调和。对立不仅表现在主张自由经济和主张物价管理的两种人之间，甚至表现在无套裤汉内部。手工业者和小店主所坚持，帮工所向往的私有制原则，不仅同他们要求的物价管理和规定价格相矛盾，而且也同他们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有限财产权观念背道而驰。这些大量矛盾导致了共和二

年社会体制和革命政府的必然垮台。由于政治与社会民主被抛弃，曾一度扩大到人民大众范围的国民重新被限定在有产者和纳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狭窄框架内。

经济自由使一切社会民主的尝试和无套裤汉要求“享受的平等”成为泡影。经济自由与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被“平等派密谋”的理论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解决了。他们在批评生产资料私有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的《平民宣言》放弃了只能持续一时的土地法，废除了继承权，并且特别规定取消地产权。“财富和劳动的公社”可以达到享受平等，它是获得权利真正平等和实际的国民团结的先决条件。这些是后来引导社会主义理论家们思路的丰富思想源泉。

然而热月党资产阶级不仅惊恐万状地抛弃一切社会民主的思想，而且还抹杀任何政治平等的痕迹。共和三年宪法恢复了纳税人选举制，它的《人权宣言》特别明确指出：“平等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是保护，或是惩罚。”（第3条）。这只是公民权的平等。这就恢复起1789年的传统，肯定了显贵的，即至少是富裕有产者的国民范围。1799年6—7月的民族危机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脆弱的平衡。但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与政治上的至尊地位再也不会被人民大众所动摇。反动倾向迅速表现出来，这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含义。民族仍局限在共和三年显贵们规定的范围内，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统一主要指机构的统一，而不是指国民的社会内含。

3.社会权利：救济与教育

无套裤汉设想的权利平等必须消除生活条件的不平等。被救济权只是这个总要求的一个方面，即确保每个公民的生计。通过要求受教育权，无套裤汉雄心勃勃地想和“有才能的人”平等，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这两重希望被资产阶级革命化为泡影。旧制度下负责救济的教会

被没收财产后，救济事业被世俗化，并被制宪议会办成一个公共机构。1790年，制宪议会建立起一个乞丐问题委员会，其理论是：社会有责任对其穷苦成员进行救济，国家应对此负责，并予以负担。1791年宪法的第1编（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规定建立“一个公共救济的总机构，以扶养弃儿，帮助穷苦的残疾人，并且为没有工作的健康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实际上，制宪议会无力在这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它只是维持现状，仅仅不把医院产业作为国有产业出售。然而，由于废除了什一税和封建捐税，医院的财源减少了。于是，议会努力用政府补贴予以补偿。它所采取的仅有的两条重大措施是1790年5月30日和8月31日通过的两项关于建立慈善工场的法案。立法议会以公共救济委员会代替了乞丐问题委员会，它在1792年8月19日取缔了从事救济事业的宗教团体，使形势严重恶化。实际上，旧的医院体制被摧毁后没有建立任何新的机构来替补它。

国民公会对救济立法予以新的推动，但未能付诸实践。1793年3月19日关于全面建立救济机构基础的法案指出：

“第一，只要健康，人人都有权利通过劳动获得生计，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要予以无偿的救济；第二，由国家负责为穷人提供生计。”

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在第21条里重申了同样的原则：“公共救济是神圣的职责。社会应该保障不幸公民的生计，或是为他们提供就业，或是为丧失劳动能力者提供生活资料。”1793年6月28日—7月8日的法律同意为穷苦的或被遗弃的孩子、老人及穷人提供救济。1793年10月15日“关于消灭行乞”的法律具体规定了“救济工作”，但同时也决定建立对流浪汉的“镇压所”。这是仿效旧制度慈善事业的做法：“禁闭穷人”和设立慈善工场。可是，财政困难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和市政当局所作的努力。因此，在共和二年整整一冬，各人民团体不断提出各种要

求。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决定建立“全国慈善基金”的法律，描绘出无套裤汉心目中模糊的社会救济制度轮廓，但这只限在农村实行：在各省对一小部分残废或超过60岁的农民与手工业者以及有子女负担的母亲或寡妇发放救济。在各部被取消后，建立了一个公共救济委员会。这是真正的救济部，负责军人救济和医疗救济的分配。共和二年获月23日（1794年7月10日）的法令宣告“各医院的资产和负债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均为国有。这即是把救济事业国有化了。接着是热月党执政。除了人民群众希望的破灭，山岳派的立法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的资产阶级更为现实、自私，它既不像制宪议会发表理论上的宣言，也不像国民公会制定宏大的计划。它只是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热月党归还了尚未出售的医院和济贫院的财产。督政府认为把救济事业国有化是不可能的，因此就把它市有化。共和五年葡月16日（1796年10月7日）的法律规定将医院和济贫院置于市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其财务管理由一个行政委员会负责。这个委员会由市政府任命和监督，并被授权恢复被没收的医院产业。虽然这些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各医院的财务状况通常很糟糕。共和五年霜月7日（1796年11月27日）的法律决定建立慈善办公室，责成各市政府负责救济穷人，其经济来源是从演出收入中提取“穷人税”（每法郎2苏）。乞丐将被关起来。最后，共和五年霜月27日和风月30日（1796年12月27日和1797年3月20日）的法律规定，被遗弃的儿童将由医院和济贫院收容，其费用由国家负担，然后在行政委员会的监督下，交给乡村里的农户扶养。

这样，革命后的救济事业完全世俗化了。与制宪议会的雄心以及山岳派国民公会的宏伟立法相比，督政府在原则方面有了明显的后退。诚然，它确实想在财力许可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好。在这个范围内它的努力是有效和持久的。但由于从传统的慈善观点出发，并且被纳入督政府时期整个机构改革的范畴内，这种资产阶级立法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即改变享受不平等的状况，也不能使他们能在社会方面和国民

融为一体。

教育一直是历届革命议会关心的问题，但是它的改革却使广大民众大失所望。制宪议会很早就宣布为全国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它还把“全体公民接受公共教育，免费享受人人必不可少的那部分教育”的原则列入了“宪法保证的根本措施”之内。实际上，它只是在1790年10月28日决定停止出售学校的产业和资助各中学，以保证现有各级学校的正常运转。到了1791年9月10日制宪议会才听取塔莱朗的报告，但并未予以讨论。企图做一番事业的立法议会建立起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制订“公共教育全面组织”计划。这一计划由孔多塞于1792年4月20日与21日两天在议会讲坛上宣读。这是历届革命议会通过的最重要的计划，它以视野的宽阔和固有的乐观主义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它旨在通过教育发展一切能力和才华，“并由此建立公民之间事实上的平等”。这将能纠正纳税制造成的不平等。革命将以此促使“人类全面地、逐步地完善。这是任何社会机构都应为之努力的最终目标。”

立法议会没有时间讨论孔多塞的计划。

国民公会把教育列入人权范围之内：

“根据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教育为人人之必需。社会必须尽一切力量促进公共理智的进步，使全体公民都能接受教育。”

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的“国民教育计划”。计划受卢梭思想的启发，规定由国家垄断教育。然而，民众活动分子在1793年7月接受宪法的祝词里，却要求建立一种能对孩子同时进行公民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教育制度。他们的愿望直到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关于“首批学校”的法案公布后才得以实现。法案决定建立免费的义务教育制，规定教育是自由的，但

受国家监督，且分散在各地，这相当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但是尚需把这些付诸实践。由于革命政府一直为战争所困，它对此无暇顾及。由于无套裤汉对教育曾寄予更大希望，并把它当作巩固现制度、实现权利平等的手段，因而他们最终的失望更大。

热月党资产阶级最初保持了山岳派的事业。但渐渐地，它让政策服从于本阶级的利益，取消了免费和义务的原则。共和三年葡月10日（1794年10月1日），国民公会决定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对由各县指定的具有高度公民责任感的1 300名青年进行为期4个月的培训，结业后他们返回各地负责培养小学教师。共和三年雾月27日（1794年11月17日）的法律决定：在每1 000居民中建立1所小学，但不实行义务教育；教育建立在独立于任何启示宗教的共和道德基础上；小学教师由县政府指定的评审委员会挑选，其薪金由国家负担；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在法定当局的监督下，开设私立的、自由的学校”。

中等教育对热月党资产阶级更为重要，它关系到社会和新国家的干部培养。根据拉卡纳尔的报告，共和三年风月7日（1795年2月25日）的法案决定在各省建立一所“中心学校”，进行“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教育”。学生上3个周期的课程：12—14岁，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自然史、绘画；14—16岁，数学、物理和化学；16—18岁，通用语法、纯文学、历史和法律。通过突出科学、法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实现了现代化。研究和普及以特有的方式在教育中结合起来。经教育评审委员会遴选的教师由各省行政长官任命。中心学校的教学大纲与方法同启蒙时代的思想运动是一致的，其保守的反动倾向则表现在没有免费制度。这一缺陷由于对“祖国的学生”发放奖学金而有所弥补。

高等教育同样受到热月党人的关注。旧的大学和研究院都被取消。1793年6月14日，山岳派把王家花园加以改造，建立了自然博物馆。其目的是“对公众进行完整的自然史的教育，重点为农业、商业和艺术方

面的成就”共和三年葡月7日（1794年9月28日），国民公会创建了中央公共工程学校，一年后改为综合工科学校。葡月19日（1794年10月10日），根据格雷古瓦的报告，工艺博物馆从此主要服务于实用科学，如存放机器和模型，它也是教授“使用对工艺有用的机器和工具”的一个教学机构。共和三年霜月14日（1794年12月4日）的法令决定在巴黎、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建立3所“卫生学校”。此外，还有分别建立于共和三年芽月10日（1795年3月30日）和获月7日（1795年6月25日）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经线办公室。为圆满完成这一宏大事业，国民公会于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决定建立国立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研究院分为3个部分（物理与数学、道德与政治、文学与美术），其宗旨为“通过不间断的研究、公布发明以及与专业团体和外国学术机构保持联系来完善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应该表现和发扬科学的统一性和关联性。设立国立研究院的法律报告人多努宣告：“这是个能使科学与艺术永远接近，并将它们置于进步与实利互相作用之下的制度，其结果之佳是不可估量的。”

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重大法律把以上各方面的创举汇成一体：小学、中心学校、专科学校和国立研究院。但是反动势力又有加强。继义务之后，免费也被取消。国家只向小学教师提供住宅，其报酬则由学生负担。督政府继承了这项法律。它努力发展中心学校，使之在1796—1802年间得到很大发展。但是1802年，波拿巴把蓬勃发展的中心学校取消了。由于国家无钱到处开办小学和培养必要的教师，私立的非世俗学校便发展起来。不过它们均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监督之下。根据共和五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督政府的法令，“这种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必须制止大量私立学校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有害原则四处蔓延”。

大革命末期，教育方面的业绩虽然是宏伟的，但是还很不完善。教会的垄断废除了，教育实现了世俗化和现代化，但是在社会上它仍然是

少数人的特权。共和二年风月，巴黎“无套裤汉区”要求紧急组织小学教育，“以便每个人都能获得享受其全部天赋权利所必需的才能和德行”。这同孔多塞的伟大思想是一致的，即通过教育达到事实上的平等，并“真正实现法律规定的政治平等”。经过10年革命，现实同原来的希望还相差甚远。

4.贵族对有产者国家的归顺

通过把一切有产者（资产阶级和前贵族）纳入纳税人的范围内，民族的社会基础在雾月政变前夕逐渐走向稳定。内战和恐怖曾一度把为数众多的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排除在民族统一之外。从督政府末期开始，他们重新回到民族范围之内。

流亡者队伍里感情的变化有助于贵族归顺新的民族。他们因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名誉观或阶级的自私心而离开法国。他们曾长期轻蔑地对待“民族”和“祖国”这些字眼。但是他们通过流亡生活的艰辛开始重新学习认识法国，对这个不再有“我的宗教和我的国王”而是有“土地与祖先”的新祖国产生感情。流亡时间愈长，对故土的怀念和遗憾就愈加强烈。流亡者被没收了地产，他们现在发现了地产的感情价值。名誉观以及对国王个人的忠诚让位于对从孩提时代起的温柔和伤感的怀念。巴黎成为国际城市，而流亡者发现了失去祖国的敏感现实。这个新主题在“忧伤和遗憾”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流亡者中迅速扩展，并为夏托布里昂《甜蜜的回忆》揭开了序幕。《基督教之真谛》的作者1802年写道：“为了描绘人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感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颓丧，一般人说：这个人患了思乡病。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症，只有回归祖国才能治愈。”

同时，贵族的政治归顺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也在作准备。前制宪议会议员穆尼埃认为，产业应成为新秩序的支撑点。从1795年起他就观察到，“现在大多数法国人所渴望的，除了恢复秩序以外，就是休息、个

人安全和尊重财产”。他在1798年3月4日的一封信里写道：“我看只有一种救国的办法，即从财产权中寻求支持。”财产权的基础改变了。穆尼埃意识到，它已经带来新的稳定，因此必须顺应这一新的现实。马莱·迪庞在1799年1月25日的《不列颠信使报》上提出了归顺的基本条件：“接受对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形式。”

于是，经过10年革命，流亡贵族和资产阶级有产者合流了。尽管过去种种因素曾使他们对立，现在他们却通过故乡和地产的秘密渠道协调一致，把法国土地和法兰西祖国等同起来。他们毫不关心那些没有产业，因而无法用土地概念使爱国主义具体化的人。通过改变土地所有制，革命确实使有产者与土地联系得更紧了。废除封建捐税、教会什一税和出售国有财产使有地产的农民失去了一切革命精神，在他们和广大无地产农民之间掘出了一道鸿沟，加强了他们同城市资产阶级之间保守的联盟。祖国在1789年还是个抽象的概念，其中的希望多于现实。现在，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取得或加强了地产，因此祖国对于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和明确的形式了。这就是全权拥有的土地。爱国主义被抽掉了1789年的政治与社会内容，具体化为地产。流亡贵族则通过完全不同的道路恢复了比传统偏见更有力的本能和感情价值，从而也使祖国的概念具体化，把它同土地等同起来。这为归顺于有产者的国家创造了条件。

波拿巴的事业在这方面完全符合上述两种人的愿望。他把社会稳定在土地的基础上，从而把归回的流亡者纳入新的社会等级里。他在加强专制原则的同时逐步使贵族适应当初为反对他们而建立的新秩序。通过共和十年花月6日（1802年4月26日）元老院的法令，波拿巴为流亡者归国敞开边界，并且宣布要“用一切能团结法国人和安稳家庭的办法来铸造国内和平”。没有任何东西像产业一样能安稳家庭，能把资产阶级的法国和贵族的法国联合起来。

这样，归顺的贵族被纳入资产阶级国家后，开始了新统治阶级的各成分的融合。1789年人们为革命制定的目标之一达到了。

---

[1] 本书中不少历史事实取自东方各大帝国。作者的结论是：人的一切不幸是由于放弃了“自然宗教”，尤其是由于专制主义和神权统治的弊害。——译者

[2] 圣德尼修道院建自7世纪，后为王室墓园，是帝王祭祀祖宗并在死后安放陵墓的地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很多，尤以文艺复兴时期古墓为贵。大革命中曾受到一些损失。——译者

[3] 普罗托热纳是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名画家，作品力求完善，往往经年累月始成。——译者

[4] 根据《圣经》（《创世记》），巴比伦塔是人们为与天接近而建造的高塔。造塔之事惊动了上帝，它使人们的语言不再相通，从而导致建塔失败。——译者

革命遗产

以上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社会意义以及这个日子全部重要性的根源。显贵们的统治开始了。在很长时期内它将不再会受到挑战。由于“民族”和“祖国”这两个概念仿佛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因此在1789年初显得格外革命。但它们在不断缩小并变得僵化，现在已经被限制在产业的范围内。国家的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发生变化。波拿巴继承督政府的事业，改善机构，加强国家的权威。但是他并未改变其性质。显贵们认为国家是为尊重他们的法律，维护他们的秩序而建立的，如同是保护他们特权的壁垒。在这个意义上，雾月18日政变使他们最终踏下心来。而这个进程从热月9日和牧月就开始了。

显然，波拿巴使雾月分子们的打算落了空。他扼杀了自由，甚至连资产阶级的自由也未能幸免，并建立了他个人的政权。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这一点。在这个领域里也一样，尽管波拿巴具有个性力量，但延续性只是在表面上中断了。实际上，自从革命投入战争以来，这个进程就开始了。早在1792年1月，罗伯斯庇尔就预见到这一点。内外战争连绵不断，资产阶级因为害怕社会民主而抛弃民众的支持，这必然会促使有产者的共和国在自由的门面下逐渐加强行政机构的权力。督政府紧抓行政权不放，从不顾忌违背宪法。它使用伪善的强力手段和诉诸赤裸裸的自行加聘来改变选举结果。与此同时，它也真心实意地进行改革和整顿。波拿巴生性喜欢统治别人，他大权在握以使其行之有效。他使一种自己无法中断的进程加速发展。执政府传奇般的辉煌成就不能抹杀督政府事业的全部光辉，而且这两个时期是紧密相关的。

为了享有实现稳定的功劳，波拿巴不久就宣称：革命结束了。革命从1795年春和牧月悲惨的日子起就告终结。从那时起，资产阶级在接连不断的幌子（其本质始终如一）掩盖下，寻找自己的平衡点。无论热月党、督政们或雾月分子，其目标都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成果最终肯定下来。波拿巴向他们保证既不复辟王政，也不恢复共和二年的民主制度，从而实现了显贵们的愿望。他使贵族与资产阶级秩序，教会与新国

家重归于好，实践了1789年的诺言。

然而，10年的革命曲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的现实，它基本上符合资产阶级和有产者的愿望。旧制度下的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和至尊地位，封建制的最后残余也被一扫而尽。法国大革命清除了一切封建残余，使农民摆脱了领主捐税、教会什一税，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村公社的束缚，摧毁了行会的垄断，统一了全国市场。它加快了社会发展，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外，大革命还摧毁了各省的地方主义和地方特权，粉碎了旧制度的国家机器，使督政府到第一帝国期间有可能建立一个符合资产阶级经济与社会利益的现代国家。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它是最辉煌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激动人心的阶级斗争使以前的历次革命黯然失色。然而，正如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里指出的，同英美狭窄与保守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广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是由于贵族阶级的顽固使得任何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政治妥协都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资产阶级同样顽强地要彻底摧毁旧秩序。但是，它只能在人民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曾提到恐怖时期的“猛烈锤击”和法国革命的“巨型扫帚”。其社会与政治工具是得到城乡人民大众支持的、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专政。构成这些城乡人民群众的社会阶层把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独立小生产者的民主作为理想，希望自由地劳动与交换。

共和二年的尝试尽管最终失败了，但仍有其参考价值。1793年的人们，尤其是罗伯斯庇尔主义者，曾试图克服在原则上的权利平等同自由经济后果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以求在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框架内实现享受的平等。这是一次宏伟的尝试，但又因无法实现而成为可悲的。它使人们看到，在社会一部分人的愿望与历史必然的客观状况之间存在的不

可克服的矛盾。事实上，怎么可能既肯定财产权的永久有效性，即承认私人利益和自由获利的要求，同时又想消除这些权利给某些人带来的后果，从而缔造一个平等社会呢？

这是否像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在形容这场“传统革命”时所说的“超前的时代”呢？……的确如此。共和二年的尝试为19世纪的社会思想提供了养料，并对19世纪的政治斗争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山岳派描绘的轮廓逐渐明朗了。首先，无套裤汉曾徒劳地把公共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民主的必要条件之一并为之大声疾呼。今天，公共教育早已普及。但与此同时，经济自由和资本主义集中化扩大了社会差距，加剧了矛盾。享受的平等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即。为捍卫自身生存条件而挣扎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他们是1793年无套裤汉的后代），始终向往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小产业，他们一直在空想与奋起反抗之间徘徊。同样的矛盾和无能为力始终影响着每一次社会民主的尝试，1848年6月的悲剧就是明证。共和二年圣茹斯特在《共和机构》第四段写道：“既不要富人也不要穷人”。另外，圣茹斯特在他的记事本里还写道：“不承认平分财产”。充满幻想的共和二年不就是乌托邦时代吗？……平等共和国属于超前的世界，它是人们始终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伊卡里亚岛。

然而，从革命一开始巴贝夫就提出以“财产和劳动公社”作为达到享受平等和共同幸福的唯一办法，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废除私有制和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曾在《人民的保民官报》里比较模糊地作为实现真正社会民主的必要条件被提出来。巴贝夫主义同共和二年的思想相比是一个很大发展，在产生于革命的新社会里，它是革命思想的第一份蓝图。邦纳罗蒂把巴贝夫主义传播给1830年的一代人，它是社会主义思想与行动的起源。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从法国大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即不属于资产阶级范畴，而属于新社会范畴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从那时起就处在当时世界历史的中心，处在曾经并继续使各国产生差异的各种社会与政治潮流的汇合处。它是热情的结晶，它为自由、独立进行的斗争和对兄弟般平等的向往永远激励着人们的革命热忱，或者引起另一些人的仇恨。它是智慧的结晶，因而成为特权与传统攻击的目标。同时，由于它努力使社会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多少有识之士为之倾倒。法国大革命始终受人尊敬或被人惧怕，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里。

附录 阿尔贝·索布尔的两篇论文

第一篇 群体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1]

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早在革命初期，英国历史学家伯克在他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1791年）里就认为，1789年10月闯进凡尔赛宫的群众只是一群“凶狠的野蛮人，残暴的杀人犯”，而那些押送王室回到巴黎的妇女则是“以最卑鄙和堕落的女人形象出现在地狱里的泼妇”。大约1个世纪以后，在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1875年）一书里，斥责和咒骂的词语更为丰富。在他的笔下，被1789年“大恐惧”煽起造反的农民是“走私犯、私盐贩子、偷猎者、流浪汉、乞丐、惯犯”。7月14日的巴黎人是“浮上来的社会渣滓……首都仿佛落到了最低贱的平民和强盗的手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有的几乎赤身裸体，大部分人像野人一样青面獠牙，煞是吓人”。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军的妇女是“娼妓……加上洗衣妇、乞丐、光脚的女人以及花钱雇来的下贱女人”。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的起义者“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是从事最卑鄙职业的、嗜血成性的、污秽地方的打手和走狗”。总之，革命人民是“在紫红色地毯上打滚的一头畜牲”。泰纳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冲击下写这本书的，社会恐惧使他发出这些咒骂。这种史学传统并未中断，无论马德兰或加克索特的著作都是如此。

与此相反，米什莱和坚持共和传统的史学家却认为，革命群众具有人民的各种美德。恶的化身巴士底狱是被善的化身人民的力量推倒的。米什莱写道：“巴士底狱……投降了，内疚使它心慌意乱，使它发疯，从而丧失理智”；是“人民，全体人民”战胜了它。是人民解决了1789年9月的危机：“只有人民找到了救急的药方，他们去寻找国王”。革命群众的基本成员——妇女被恢复名誉，并受到赞扬。“人民之中最具有人民性的，我指的是最本能、最有灵感的，肯定是妇女。”米什莱在书的结

尾写道："所有的法国革命史到目前为止都是以君王为主体撰写的，有的以路易十六为主，有的以罗伯斯庇尔为主。而这部法国革命史则是第一部共和史。它摧毁了偶像和神。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它只有一个英雄：人民。"路易·勃朗的《法国革命史》（1847—1862年）远没有如此高昂的热情，但它也属于同类。奥拉尔的《法国革命政治史》（1901年）也是如此。他是一位激进的大学教授，重视史实，文体简练。他说："整个巴黎都奋起了，它武装起来攻占了巴士底狱。"

但是，这个被颂扬或受羞辱的人民到底怎么样呢？无论米什莱或泰纳，不管他们有多大功绩，都不屑对此进行仔细的分析。如果说，米什莱表达出人民灵魂之精髓，泰纳预感到作为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因素的社会心理之必要性的话，那么，是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1901—1903年）里，最终改变了以往观察事物的角度。这是一部真正"从下面"看的历史。法国大革命第一次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被真实地讲述，并被建立在经济与社会实际的基础之上。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扩展到全世界，经济问题在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益发展和明确的阶级对立愈加尖锐。因此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些事实对史学研究不能不产生影响。从那时起，史学家对直到那时一直被排列在资产阶级后面的人民群众开始重视起来。他们开始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命运以及促使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例如1788—1789年的荒年。这样，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开创了大革命史学的新纪元。

阿尔贝·马迪厄发表于1927年的《恐怖时期昂贵的生活和社会运动》一书的某些方面也表现出这种革命史学的特点。在乔治·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诺尔省农民》（1924年）和他去世后发表的《奥尔良研究》（1962—1963年）中，这种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一部社会史，欧内斯特·拉布鲁斯说得更明确，"这是不可分割的革命现实的社会政治史"。乔治·勒费弗尔善于把关于旧制度末期和革命时期产业分

布和土地耕种问题的最严密的定量方法，应用到人的心理状态研究上，对人民恐惧和惊慌加以描写，对革命群众的心理进行探索。《1789年的大恐怖》就是明证，这部著作始终具有参考价值。

从此，确立了两种研究路线。掀起革命运动的群众的社会组成究竟如何呢？是什么原因把他们动员起来并集合在一起？这项研究很艰难。平民百姓不写书，或写得很少。而且，有助于了解巴黎民众社会结构的税务文件，有助于了解巴黎无套裤汉社会倾向与政治表现的市区各类档案，以及各级议会及民众团体的会议记录等大量文件，在1871年“流血的一周”里都被付之一炬。剩下的只是保存在国立档案馆和警察总署档案馆里的警察与法院的档案材料了。显然这是必须谨慎对待的材料。但是它们非常丰富，需要进行统计和描述研究。

一、从聚合体到集体

“革命群众”——对于勒邦博士引入到法国大革命史中（《法国革命与革命的心理》，1912年）的这个词的含义还需要加以明确。否则，一般的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将成为不自觉的人群在比较真诚的领导人鼓动下聚集闹事的结果。乔治·勒费弗尔在一篇已成为经典作品，题为《革命群众》（1934）的文章里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把“聚合体”与集体加以区分。

1789年的全体群众并不都具有同样的性质。1789年的战士和10月5日早晨由门房文书马亚尔领导的、主要由妇女组成的队伍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标志。各地的农民造反也如此。特别是，1789年的这些群众最初的聚合如果不是出于偶然，至少也不是出于革命的原因。7月12日是个星期日，天空晴朗，在鲁瓦亚尔宫及其周围有一些人群。这些普通散步者的聚合体的思想状态因获悉内克被革职而发生变化，它突然之间变成为革命集体。在马孔省的依热，7月26日星期天，农民做了弥撒后像往常一样聚集在教堂前，接着人群突然变成了攻打城堡的革命集体。于是，

马孔省的农民起义开始了。集体的特点是具有共同觉悟，在更高水平时则具有良好的组织。例如，1792年6月20日的游行、1792年8月10日的起义、1793年8月10日的“共和国团结和不可分割节”及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日，都出现了出于共同的义愤，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而组成的群众集体。巴黎各区和国民自卫军都为此提供了骨干。

“聚合体”只是不自觉的、短暂的人群聚集，例如在鲁瓦亚尔宫和杜伊勒利宫花园散步的人群。“半自觉的聚合体”则是像星期日弥撒后在广场上的人群，以及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市场占极重要地位）或是在面包店和杂货铺门前排队的人群。这种集合并非有意识，农民上市场，家庭主妇去面包店是为了采购，而不是去集会。但是这种集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必需。亚瑟·扬在1788年嘲笑去市场出售蔬菜或家禽的农民所花费的时间价值比商品本身更高，这是毫无道理的。这种半自觉的集会对于群体心态的形成和组成集体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家庭主妇排的队伍最有可能变为造反的集体，1793年2月25日巴黎抢劫杂货铺就是一例。还有其他的半自觉聚合体，如1789年春夏在各城市聚集起来，等待信件和聆听朗读议员或义务通讯者所寄信件的人群。人们意识到这种聚集对群体心态形成的重要性，例如在雷恩，它们曾多次演变成革命集体。这种聚合体中潜在着某种被压抑的群体意识，只需外部发生事件就能使之变为明确的觉悟，从而使每个人产生团结一致的感情。一种强烈感情和一种剧烈心理刺激突然唤醒群体意识，从而把聚合体变为革命集体并准备付诸行动。

因此，“集体”意味着存在一种预先已形成的群体心态，它的形成显然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虽然1789年的这些条件终于使整个第三等级奋起反抗特权和王公贵族，但是这种革命的群体心态却在历史上早就萌发了。它建立在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对过去斗争的回忆，通过闲谈、晚间聊天世代流传，并通过歌曲、演说以至印刷品广为传播。当

然，人民大众不可能接触到书刊（对历书、歌曲集和图片应予以重视）。但是在城乡资产阶级范围内，书刊的影响很大。普及和推广便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的。每个农民对领主的憎恨都汇成一体，在农民的眼里，所有的领主都要对此负责。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领主的群体表象，即典型的敌人。农民把遭受到的由荒年和失业造成的经常性和临时的灾难全都归咎于领主，因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是无法对其原因加以分析的。1788和1789两年的情况便是如此，经济危机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爆发。在这种群体表象里还加入了一些感情色彩，它们成为强大的革命推动力。这就是对于怀有恶意的敌人的惧怕，以及向往摧毁这种恶意后实现极乐世界。

革命心态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时只需发生一桩外部事件，如征收什一税官吏的到来，有人宣告强盗来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口角或排队的妇女之间发生的争吵，聚合体就立即会变成革命的集体，或是为了进攻，或是为了自卫。诚然，还需指出，参加集体的男女所具有的群体意识不尽相同。

“自发集体”是从聚合体突然演变而来的。一开始它并没有任何组织。在采取一些纯粹的否定行动后，如谴责法制、破坏传统首领的权威、摧毁现有秩序等，集体很快就自发地建立一套机构。在行动过程中，领导人物会突然显露并树立起权威。为了协调运动，新机构的框架也会逐渐确立。在1789年7月的骚乱中，革命人民到处以自己指定的委员会取代了传统权威。在巴黎，他们利用为三级会议选举而设立的县的建制组织政治生活和国民自卫军。

“自觉集体”是事先秘密组织好的。它利用自发革命行动建立的机构框架，如国民自卫军营队和1790年5月为取代县而建立起来的区。1792和1793两年的起义就是这样准备的。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位的斗争是由起义市府组织的。同年5月31日至6月2日消灭国民公会吉伦特派的行

动是由主教府委员会组织的。

革命群众创造性的效率因群体意识的水平和组织程度而异。市场上一般的革命群众聚合体往往只满足于对某个商人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规定几项市场条例。自发的、然而有组织、有目标的群众集体，如果不指定新的权威机构取代被指责为囤积者帮凶的市政府，那么它也会迫使市政府实行整体的物价管理。有明确目标的自觉集体对中央政权和整个制度提出异议，要求实行限价和征用，认为这是解决缺粮和物价昂贵的唯一有效措施。最后，它还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改革。这样，从1789年的小麦骚动便发展到1792年秋在博斯市场上的限价运动和1793年9月4—5日的巴黎市民运动。这一运动导致9月29日通过全面限价法。

对于这些革命群众的组成还需进行仔细的分析。

二、革命群众

革命群众，是指1789年7月14日摧毁了巴士底狱的群众，1792年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并推翻了王位的群众；他们也是共和三年牧月那些标志着人民革命告终的动荡日子里的群众；他们还是英国历史学家乔治·吕代在他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中的群众》（1959年）里描写和分析的群众。

历史学家在称呼7月14日的胜利者时，一般都使用“市郊圣安托万的工人”、“人民”、“整个巴黎”等字眼。他们这样做是不能原谅的，因为我们掌握了1790年制宪议会精心制定、并多次验证的3份名单提供的详细情况。名单上列有800—900名“攻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最准确的名单是门房文书马亚尔（又名塔普迪尔）制定的。他本人是胜利者之一，并且担任他们的秘书。根据他的名单，当时有幸存者662人，其中非军人约600人。

在这些人中很少有富人，饶勒斯早已指出这一点：“在战士的名单

里，找不到食利者和资本家。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部分地完成了。”然而仍需指出，有几名战士至少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啤酒批发商桑泰尔，3名工场主，4名商人，4名资产者以及几名富裕小商人。各种匠人、手工业者和帮工占了优势：近2/3的战士分属30来种行业（多数是木器业的：49名细木器工、48名高级细木工。另外还有41名锁匠、28名鞋匠……）。将近1/4的战士是店主（21名小店主、11名酒商、3名小酒馆老板……）。根据当时的惯用词汇很难确定其身份（因为当时喜欢用职业称呼，而不用在生产中或社会上的地位来称呼）的雇佣劳动者似乎占少数，只有近150人（其中25名脚夫可以确定其身份）。只有一名妇女：昂赛尔纳的妻子玛丽·夏庞蒂耶。她是市郊圣马赛尔的圣依波利特教区的洗衣工。以上都是幸存者。关于攻打巴士底狱时牺牲的98人只有很少材料。据饶勒斯引述卢斯塔洛的话：“30多人留下的妻子儿女陷入了绝境，必须立即予以救济。”

在635名可以鉴别其出生地点的幸存者中，400人出生在外省，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市郊圣安托万定居多年（602个有地址可查者中的425人）。其他人住在巴士底狱附近的地区，如圣保尔和圣日尔凡。大约12个人住在市郊圣马赛尔。有一点需要指出：居住在离巴士底狱1—2公里处的胜利者很少（其中有1名住在圣奥诺雷的锁匠以及住在格罗-卡佑的1名白铁工人……）。更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大部分胜利者是作为刚组成的资产阶级民兵到巴士底狱来取得武器的。这就驳斥了（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关于这是流氓和“社会渣滓”发动的革命行动日这样一种讹传。

泰纳认为，参与8月10日攻占杜伊勒利宫和推翻王位的人“几乎都是最低贱的平民或从事最低下职业的人”。泰纳只是根据印刷的资料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本来可以到国家档案馆去查阅巴黎各区开列的伤亡者名单（同时也是国民公会发放补助的名单）。在8月10日伤亡的300多巴黎人分属于120种不同的职业。其中95人是手工业者或小店主（13名木

工、12名鞋匠、8名高级细木工、6名煤气工、4名假发师……）。这些人当中有37名帮工和18名其他雇佣劳动者（其中7人为码头工人、车夫或壮工）。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的人中有1名建筑师、1名外科医生和1名画师；还有2名资产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雇佣劳动者占有很大比例，但是他们与手工业和小店铺这两个行业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他们所占的比例甚至还不到一半。

然而，首都的各区几乎都有人参加：在48个区里有44个区参加。历史上的各郊区仍保持革命先锋的地位。盲人院区有8人阵亡，50人受伤；圣安托万的蒙特勒伊区有18人伤亡；在圣马赛尔的费龙斯泰尔区有19人伤亡，天文台区有18人伤亡。这两个郊区的伤亡人数约占8月10日的伤亡总数的1/3—1/2。除了这些巴黎的牺牲者外，马赛的国民自卫军战士还有24人牺牲，18人负伤。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国性起义。8月10日的战士，既不是法兰西王子们的教师图尔泽尔夫人所说的“一支强盗部队”，也不是保卫派记者佩尔蒂耶所说的“一群走投无路的柏柏尔人，马耳他人、意大利人、热那亚人、皮埃蒙特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是典型的无套裤汉，将要进行9月屠杀的正是这些人。

大多数声称提供了参加9月屠杀准确名单的材料都不可靠。在这方面唯一可信的材料是共和四年（1796年）对39名被认为参加了1792年屠杀的人提出的起诉记录。除了3人外，其余全部都因无确凿证据被释放。他们都是30岁以上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9月屠杀》（1935年）的作者、历史学家皮埃尔·卡隆指出，司法部长丹东的秘书法布尔·代格朗蒂纳1792年11月5日对雅各宾派所做的证词更符合实际。他宣告：“是那些参加过8月10日起义的人攻占了亚培伊狱……”

共和三年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和牧月1—4日（1795年5月20—25日）的人民起义，是巴黎无套裤汉作为自主的政治力量为迫使热月派国民公会接受他们的意志而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它的失败以及市郊

圣安托万被解除武装使无套裤汉的政治作用告终（直至1830年7月再度兴起）。这是饥饿和贫困的造反。“面包是他们起义的物质原因”，一名警察局密探这样说道。这更加表明，无论芽月还是牧月，妇女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革命的日子里，她们只比1789年10月略为逊色。同往常一样，大部分起义者都是近郊平民区、市场附近的地区和首都市中心的男女市民。在几百名因参加牧月1—2日事件而被捕的人中，有168人的职业是明确的；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另有58名分属于40几个区的雇佣劳动者。这些区包括波潘库尔区（13人被捕），军械库区（12人被捕）、盲人院区（10人被捕）、阿尔西斯区（10人被捕）。这份材料只反映芽月和牧月参加暴动情况的一个侧面。同往常一样，站在运动前列的是市郊圣安托万的3个区和市郊圣马赛尔的4个区。它们得到市中心各区的积极支持，如阿尔西斯区、人权区、忠诚区（市政厅所在地）、伦巴尔区、市场区、格拉维利埃区、小麦市场区。并且北部各区也给予了支持，如普瓦索尼耶尔区和北郊区。西部的博物馆区和杜伊勒利宫区都派来了妇女支援。但是从整体看，西部像在热月9日一样，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来保卫国民公会及其各委员会。

实际上，168名参加牧月1—2日起义的被捕者只是全体被捕者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无法考察的被捕者也只是全体起义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因为大部分起义者都逃脱了警方、各区以及司法机关的追捕。在因直接参加起义而被捕的男女总数里，还包括相当多的（不可能有确切的数字）在牧月5日后镇压恐怖主义活动时被各区议会逮捕的人。此外，由于仅根据职业称呼不可能确定社会身份（如往往难以区分师傅和帮工），所以要确定参加人民起义的各社会与职业阶层的精确数字便更加不易了。但是，缺乏有效的数字分析并不妨碍发现这样的事实：在工场主、手工业者、小商人、职员等1789年以来经常参加巴黎起义的各类人员中，雇佣劳动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些描述性的材料，在牧月2日的各非法议会中，在武装力量的营队里，在国民公会被入侵的大厅里，各区的武器和弹药制造工人、手工行业的帮工、建筑业的季节工活

动更为频繁，人数更多。

这样，革命群众的组成就明确了。他们既混杂又统一，并且都是巴黎底层的小市民。他们复杂的社会结构为芽月和牧月的行动以及1789年以来的人民起义都打上了同样的烙印。1830—1871年间的巴黎起义也继承了这些传统。他们既不是缺乏社会联系的局外人或“自治人”，也不是没有经过技术培训、因失业和贫困而扰乱秩序并易于被闹事者利用的无产者。他们是手工业者、帮工、职员、小业主、小商贩、小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的集合体。他们都被昂贵的生活和政治危机所激怒。

在起义中，无套裤汉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参加这些革命行动的还有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靠年金生活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夺取巴士底狱、马尔斯校场事件（1791年7月17日）、攻打杜伊勒利宫、共和三年牧月的爆炸性事件中都是如此。妇女在向凡尔赛进军、生活必需品骚动和1792年及1793年的抢劫杂货铺以及牧月的斗争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相反，在以政治性为主的斗争中（如马尔斯校场事件或攻打杜伊勒利宫）很少有妇女参加。1789年4月28日在市郊圣安托万发生的雷维庸事件中，几乎没有妇女参加。这是雇主与雇工之间发生的唯一一次真正冲突。在比较有组织的斗争中，手工业者往往是主要参加者。帮工，学徒通常和工场主一起行动。马尔斯校场事件和攻打杜伊勒利宫就是如此。斗争的热情在某些行业，如家具业、建筑业比较持久。木器工和高级细木工、瓦匠和木匠是革命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鞋匠和锁匠也是重要成员。相反，在集中生产的工场工人中，除了煤气工人外，参加上述斗争的人较少。

上述分析证实了大革命史学的一个传统论点：圣安托万和圣马赛尔两个郊区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占优先地位。圣安托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参加从雷维庸事件到共和三年牧月起义各次斗争的人数最多。在夺取巴士底狱斗争中市郊圣马赛尔的参加者很少。它从1791年夏起赶了上来，但

在历次斗争中，它的参加者总是少于圣安托万。巴黎市中心的某些区也表现出革命的持续性，如阿尔西斯区、伦巴尔区、格拉维利埃区、博物馆区、奥拉托利会区、市场区和邦孔赛依区。

从泰纳到加克索特，保守的史学强调在革命群众中有流浪汉、无赖和罪犯，并且这些人是革命群众的主要成分。这是警察当局、反革命记者和回忆录作者对革命群众的指责。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有产者对“危险阶级”的惧怕。实际上，这种指责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根据。在我们掌握的68名雷维庸事件的被捕者和死伤者中，只有3个流浪汉和3个有前科的人。其中2人因犯轻罪曾短期服苦役，第3人是一名代号为“V”的码头工人，他是个小偷。在39个被指控为9月屠杀的帮凶并于共和四年被判刑的人中，没有一人以前上过法庭。攻占巴士底狱的662名胜利者，人人都有住宅和固定工作。文件表明，在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1795年春）的被捕者中既没有乞丐，也没有流浪汉。更令人惊奇的是，在1792年1月和1793年2月抢劫杂货铺的事件中也是如此。

在接近社会边缘的阶层中，那些住在包租房里，即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和失业者是革命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慈善工场的失业者曾参加了夺取巴士底狱前夕烧毁各入市税征收处的骚乱活动。至于那些没有固定住处的劳工，由于他们的数量多（根据唯一把他们单独统计的1795年人口普查，他们有将近1万人，分布在25个区），因此他们在参加斗争者中所占的比例高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他们占巴士底狱胜利者的1/10，杂货铺抢劫者的1/6，马尔斯校场事件参加者的1/5。

以上这些是构成革命群众基本成分的旧式的民众阶层，在当时被称作“无套裤汉”或“无套裤汉阶层”。在现代社会学看来，这些词的含义较泛；但是从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它们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不知是谁根据人们的穿着方式发明了这个能区分其政治与社会地位的单词，有可能是贵族莫里神甫。而且，当山岳派获胜时，热情的积极分子和共和派都

自称是无套裤汉。但是，佩蒂翁1793年4月10日在国民公会作了更明确的解释："无套裤汉并不是指除了贵族以外的全体公民，而是指那些区别于有产业者的无产业者。"

无套裤汉以他们的服装区别于人，并且同更高的社会阶层是对立的。长裤是人民大众的标志，正如套裤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标志一样。一直身穿套裤的罗伯斯庇尔则把"穿金色套裤者"和无套裤汉对立起来。共和二年获月25日（1794年7月13日），一名警方密探在他的报告里把无套裤汉同"穿长统丝袜者"对立起来。巴贝夫则发展了词的意义，把全体法国人分为"套裤汉"和"无套裤汉"两大类。

此外，无套裤汉还因其他行为区别于他人。他们仇恨贵族、商业和财富，甚至憎恶富裕。是这种对立使得前第三等级内部的社会界限难以分明，而且无套裤汉本身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社会阶级。他们同贵族当然有明显区别，但是同中小资产阶级的界限就不明确了。心态中的人民性是他们同后者区分的重要标志。仅靠社会属性不能确定其是否为无套裤汉。一个反革命的劳工就不能成为一名好的无套裤汉；而一名爱国的资产阶级则很乐意被称为无套裤汉。社会属性由政治定义加以明确，二者不可缺一。这里既不凭口头的爱国主义，也不靠简单的思想赞同，而在于实际的政治表现。无套裤汉参加了历次全部的革命行动。共和二年西部方面军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主席布鲁图斯·马尼耶在一封被截获的信里曾批评"政府对无套裤汉恨之入骨"。共和三年获月21日（1795年7月9日）当他被传讯时，有人问他，他所谓的无套裤汉指什么人。他说："无套裤汉就是攻打巴士底狱、8月10日和5月31日事件的胜利者，尤其是那些人们似乎要与之势不两立的人。"无套裤汉既通过他们的政治表现，又通过他们的社会条件区别于他人。但社会条件比政治表现更难以确定。

政治动机远不能被排除在人民大众的表现之外，他们仇恨贵族，认

为贵族在搞阴谋，要求摧毁特权和实现权利平等。但比这更重要的则是饥饿，它是掀起民众运动的主要因素，也是把手工业者、小业主、工人、职员等不同阶层团结起来的凝聚剂。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大商人、承包人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囤积居奇者。

巴黎法兰西卫队区的裁缝雅各布·克利克说过："采购者仿佛和农场主串通，把一切货物以最昂贵的价格出售，以便让工人饿死。"他因为这句话于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被捕。在审讯时他大声宣告："我被不幸激怒了。我是3个幼龄儿童的父亲，没有财产。我必须每天工作来养活5口人，在刚过去的这个严寒的冬天里，我几乎没有活干。"

三、革命暴力

阴谋这一主题具有感情色彩，并包含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一切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一切事件都具体化为人的形象。其他社会阶层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一整套符号，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服装都有其象征的意义，并且可以表达各种喜怒哀乐。这就是巴黎小市民的革命激情所在。以及他们的热情迅速高涨和复仇心理迅速膨胀的原因。若有人通过动作或语言表现出他属于使人民遭受饥饿的那股凶恶势力，那么小老百姓就会把一切怨恨和苦水都集中发泄到他的身上。他们不攻击整个制度，而是向那些成为替罪羊的个体或象征——人或产业——复仇。

平民对于"人"的复仇形式有焚烧或悬吊模拟像和组织相当严密的谋杀。

关于悬吊模拟像，根据书商阿尔迪的日记，1774年曾悬吊过财政总监泰雷神甫和大法官莫普的模拟像。他们被视为导致面包昂贵的罪魁。关于焚烧模拟像，1788年9月18日在格勒诺布尔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司汤达在《亨利·布吕拉尔传》里写道："对于前不久在

丰塔尼尔一次欢快的大火里焚烧掉拉穆瓦尼翁模拟像之事，我几乎想不起什么来了（他出生于1783年，当时只有5岁）。我为那个用稻草扎起来的穿着服装的巨大模拟像感到惋惜。”根据书商阿尔迪的记载，在1789年4月27日市郊圣安托万反对工场主昂里奥和雷维庸的骚动中，好几百人的队伍从圣热纳维叶夫山走向市郊圣马赛尔。他们举着悬吊的昂里奥和雷维庸的模拟像，并高喊：“第三等级判处雷维庸和昂里奥在公共场所吊死并烧成灰。”

关于杀死替罪羊，1789年7月22日在巴黎沙滩广场杀死了巴黎总督贝蒂埃·德·索维尼及其岳父参政员富隆·德·杜埃。后者有一次曾说，假如人民没有面包，可以去吃草料。据阿尔迪记载，富隆在维里被捕，被带到巴黎市政厅前，“下颏上挂着一串荨麻，嘴里塞满青草，胸前挂着一捆草料，仿佛是一条锁链。”拉法夷特从市政厅的阳台上提议“同意把富隆老爷送往监狱的人举手”。但是人群高呼：“吊死他，吊死他，不要送监狱！”于是，富隆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立即被绳子吊在一根路灯柱上，升到30呎高处。但是绳子断了，后来又重吊了好几次。最后人们把他的脑袋砍下，扎在一条长矛尖上。”贝蒂埃被逼迫亲吻他岳父的脑袋，然后也被杀死。羞辱之极的是，他们的尸体被脱光衣服在街上拖拉示众。1789年夏，像这样当了不幸的替罪羊的大有人在。10月21日，面包店老板弗朗索瓦因为隐藏了小面包而被抓起来拖到沙滩广场，吊到路灯柱上。他的脑袋被砍下插在长矛尖上游街。

对于产业，人民大众的行动是从最普通的自卫反应——限价到以抢劫和焚烧进行惩罚。

人民大众限价的做法来源于小市民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他们可以把不动产，如土地、房屋视为私有财产，也可以把动产视为私有财产，如工具和劳动产品。但是他们从来不把生活必需品看作私有财产，尤其当粮食缺乏时更是如此。在饥荒之年拥有生活必需品只能是靠囤积居

奇；在人民大众的词汇表里，囤积居奇是一个意义很严重的单词，透过它表现出阴谋。由此产生了骚乱，如1793年2月25日人民到各店铺巡视以查明存货，并予以出售。这就是人民大众的限价，是饥饿的群众反对商人和囤积居奇者的自卫武器。由于记得王政时代在饥荒年月实行过限价措施，他们在这方面的信心更强了。在大革命初期，人民大众曾借国王的许诺或是地方当局迟迟不实践诺言，把他们强加的限定价格合法化。在1775年5月3日巴黎的面粉战中，奋起的人民就“根据国王的命令”限定过面包的价格。

当限价被拒绝时，抢劫就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惩罚愿望。1792年11月，安德尔-卢瓦尔省的行政长官在汇报省里的骚乱活动时，要求对必需的生活用品实行限价，以此作为危害较小的措施。人民群众要求限价，如若不予同意，他们就会武装起来，掠夺财产。1793年2月25日，那些拒绝实行限价的杂货铺被抢劫一空。根据《巴黎的革命》报导，示威者问道：“你有糖、咖啡和肥皂吗？我们通知你，如果你想要我们尊重你的财产，就得以我们规定的价格出售所有这类商品。”根据共和三年的一份揭发材料，同一天在市场区，“他们为在杂货铺的抢劫正名。他们说，人民有权利惩罚那些贪婪的杂货商”。法兰西卫队区的谢诺走得更远。他于同一时期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抢劫的目的是符合道德的。”抢劫符合无套裤汉固有的平均主义要求。生存条件的极大差异使个人的索回合法化了。然而，抢劫的狂热甚至在到达顶点时也只是针对出售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店。

捣毁是人民大众复仇心理的一种更高程度的表现。1789年4月27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捣毁了昂里奥和雷维庸的工场。这一事件早已闻名一时。7月11日捣毁了囤积大量谷物和面粉的遣使会会士的住宅。据书商阿尔迪记载，“看到被他们称为囤积的大量物资时，造反者怒火万丈。为惩罚这些罪犯，他们毁坏了家具，进到地窖，捅破了所有酒桶。”1793年7月底，巴黎的供应困难到了极点。妇女们团团包围了各面

包铺。20日，在莫贝尔广场被鸡蛋的昂贵激怒了的人民群众冲到货架上把陈放待售的鸡蛋全部砸烂。惩罚的意志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就会表现出来。

焚烧经常伴随着捣毁同时进行，但是它具有另一种象征意义。它那既壮观又彻底的破坏能力使之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必能起净化作用的价值。造反的人民正是用火来摧毁一切压迫和贫困的象征：1788年8月烧毁夜间哨所；攻占巴士底狱前焚烧巴黎入市税征收处；大恐惧时烧掉土地赋税簿籍和几座城堡。据书商阿尔迪记载，1788年8月29日，鲁瓦亚尔宫街区的青年人和圣安托万及圣马赛尔两个郊区的居民来到沙滩广场，焚烧了掌玺大臣拉穆瓦尼翁的模拟像。“然后人群涌向设在新桥附近的哨所，把其彻底捣毁。他们赶走了里面的哨兵，夺走了他们的制服与武器以及在哨所里发现的一块金表和一块银表，并把它们统统扔进多菲纳广场上的火堆里烧毁。”这一天被捣毁和焚烧的还有其他8座哨所。民众把一切不能搬到多菲纳广场的东西都付之一炬。这是一场欢乐的大火，被作为象征而扔进火里的有市场的门、哨所的岗亭、警卫队员的武器和制服。焚烧完结后，运动也告结束了。1789年7月11日晚，烧毁拉肖塞当丹的入市税征收处引起了一场攻打入市税征收处的战争。到7月13日，40多个入市税征收处被焚烧，门窗、账本和收据统统被付之一炬。

对产业和人进行复仇，人民群众在饥荒年月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根深蒂固思想的表现。它产生于贫困与不安全。农民社会的可靠团结所提供的一整套保证逐渐消失也使这种报复变得更加强烈。

因此，暴力成为民众运动的特点之一。它使资产阶级终于和贵族决裂。

对于这种诉诸并颂扬暴力的行为，有时还需寻找其生物学方面的根源。共和三年牧月关于前恐怖主义分子的报告经常强调他们易怒和暴躁

的性格。这就使他们容易发火，“使他们说出一些脏话而既不考虑也不感觉其后果。”更为普遍的是，反动派把所有的恐怖分子都不加区别地称作“嗜血者”。虽然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来理解警方的揭发和报告，然而也不能不指出：对于某些人来说，暴力确实意味着流血。共和三年牧月9日（1795年5月28日）被捕的法兰西卫队区的呢绒剪毛工阿尔比洛，以其对妻子和邻居态度粗鲁而闻名。他性格“冷酷、野蛮”，宣称从9月大屠杀里得到了很大乐趣。在同一地区，一个名叫雅叶的人在共和二年说过“他想看到血流成河，一直流到他的脚腕”。他因此于牧月6日（1795年5月25日）被捕。妇女也常常赞同这种恐怖主义的狂热。勒佩勒蒂埃区的一个名叫博德雷的汽水女工，因为说过“她要吃那些反对无套裤汉的家伙的心”，于牧月8日（1795年5月27日）被捕。她也是用同样的原则扶养孩子的，“她的孩子们总是在说杀头、砍脑袋、血没有流够之类的话”。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方面，而且对此还需加以分析。也有的恐怖分子在日常生活里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邻居，是个“规矩人”。例如军械库区的鞋匠迪瓦尔。共和三年牧月11日（1795年5月30日），他因参加了1日的骚动而被判处死刑。据北郊区民政委员会的报告，在牧月5日（1795年5月24日）被捕的油漆匠约瑟夫·莫尔洛的身上体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人，“一个是受他本性指导的人：温和、诚实、慷慨，集所有的社会美德于一身，并默默无闻地奉行着这种美德；另一个是为当时的危险驱使的人，在血腥的色彩中集一切极端的罪恶于一身”。对祖国的忧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心、骚乱时的气氛、警钟声、警炮声以及紧急集合号音，所有这一切促使这些人怒不可遏，造成了他们的第二性格。此外还有其他原因。生存条件造成的可悲的生物学后果、拥挤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房间（尤其是缺水）、有害健康的道路系统、地下管道难以想象的破烂不堪、健康的恶化以及风俗和行为的败坏，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暴力。因此，资产阶级感到在他们周围生活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大多数是勤劳的，但是由于生活条件不同，他们在外形、智力和道德方面都存

在明显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的阶层。

然而，人民群众的暴力行动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它具有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贵族的反抗迫使人民拿起武器。牧月5日被捕的小学教师穆萨尔在他的辩护书里这样写道：“有人会说，我太狂热了。不错，正义的热情在我身上燃烧，我充满自由的激情，我将永远热血沸腾地同祖国的敌人斗争到底。”断头台之所以深得民心是因为它是国民复仇的工具。它有以下各种美称：“国民铡刀”、“人民斧头”，“平等的长柄镰”等。1789年以来贵族的阴谋加剧了人民大众对贵族的阶级仇恨，这也是造成民众暴力行为的一个因素。共和二年风月6日（1794年2月24日），一个警方密探记下这样两段话：“现在还有断头台吗？”一个衣着入时、个子不高的人问道。“有。”一个坦率的爱国者答道，“因为背叛一直存在。”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无套裤汉赋予暴力和恐怖的政治意义。

在共和三年，使用暴力具有更加确切的意义。恐怖是经济统制的工具，它使全面限价得以实现，从而保证人民得到每天必需的面包。反动势力正好与放弃限价和严重缺粮同时发生。因此有人把恐怖和每日的面包等同起来，就像他们把人民政府和恐怖视为一体一样。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共和国区的木匠里希耶宣称：“在罗伯斯庇尔统治下，虽然鲜血流淌，但面包不缺。如今血不流了，但面包也没有了。因此，为了吃上面包，应该继续流血。”无套裤汉不会忘记，在恐怖时期他们是不缺面包吃的。人民大众的暴力行动和恐怖行为与要求得到每日必需的面包紧密相连。

假如没有人民大众的革命暴力，资产阶级革命怎么能胜利呢？不管群众对此怀有怎样特殊的目的，暴力和恐怖还是为资产阶级广泛清除了封建制和君主专制的残余。我们也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本身在同贵族斗争的危急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暴力的。“难道这些血就那么纯洁

吗？”1789年7月巴纳夫就曾这样说过。

---

[1] 这是索布尔1980年3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组织的历史运动”分部组织的关于“心态与意识”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本文首次发表在该所1981年第二季度《历史手册》第5期。

第二篇 什么是大革命？[1]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模糊地看到，甚至祈愿这类事件的发生。现在革命已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了现实。但一旦跳出思辨的范畴，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打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一些人的希望和信心，使另一些人仇恨和恐惧。在5年里，对于长期为每日面包所迫的人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希望或威胁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人都接受它。从那时以来，"革命"这个词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力量。它激起虔诚或仇恨，恐惧或希望，永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

一、"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

米什莱在他的《法国革命史》（1847年）的引言里，把革命说成是"法律的降临、权利的复兴、正义的反应"。他还说："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公正的反应，永恒正义的迟迟降临。"这一定义令人赞叹，但它类似于把大革命解释成一种神话（索雷尔式的含义）。乔治·索雷尔认为，神话是用迷人的独特方式所表现的未来，他许诺同心协力可以实现这个未来。神话激发想象，鼓舞心灵，鼓励人们去组织和去宣传，发动人民群众并增强他们的活动能力。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带有神话色彩。三级会议的召开被当作预示美好时代即将来临的"好消息"。在这个美好的时代，生活将更为公正。共和二年，同样的神话、同样的希望曾使无套裤汉为之振奋。它们经历了历史的变迁：1848年2月，1871年3月，1936年春以及1968年5月就是明证。这些神话和希望依然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

让我们询问一下当时的人吧！在大革命初期，他们往往乐意把它设想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使人民迅速摆脱奴役，一举获得自由的自动爆炸。对这种轻而易举和突如其来取得胜利的信念，没有人比拉法夷特表达得更确切了："人民一旦想要自由，他们就是自由的了。"在大革命的前夜，马拉在他的《祖国献辞》中也展现了一幅同样的图景；在自由获得胜利的第2天，法国立即起了变化。同样的想法在卡米耶·德穆兰的《自由法国》里也有所表现。这种天真的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在《一切都会好》的歌中。尼韦尔内省的一份陈情书写道："更晴朗的一天即将破晓。"

然而，早在1789年夏，最明智的人就开始疑虑了。罗伯斯庇尔在给他朋友布依萨的一封信里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会自由吗？我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考虑。"而卢斯塔洛则更为悲观，他在《巴黎的革命》（第8期，1789年8月29日—9月5日）中写道："我们曾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加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现在可以看到，并不因为革命符合理性的法则，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爆炸，并且立即建立起完美、永恒的制度。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通向乐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米拉波在他第19封《致委托人书》中写道："迦太基丝毫没有被摧毁。"旧制度的抵抗不仅还存在，而且随着革命的进展变得更加剧烈。在最危急的时刻（物价上涨，人民骚动，尼尔温登失败，迪穆里埃背叛以及旺代叛乱），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给巴雷尔："现在经验证明，革命远远没有完成……我们或是将国家之舟驶进港口，或者与它同归于尽。"

革命是突然的爆发还是漫长的过程？最有远见因而也最坚定的革命者力图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他们认识到，一场革命不仅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且还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本身也会放射出新的光芒照耀着它的进程，并且向政治家，向那些至少会用眼睛观察的人，揭示出革命整体的各个方面。由此，对大革命进展的分

析，从1789年到1793年，再到1796年在不断丰富。它从西埃耶斯发展到罗伯斯庇尔，再发展到巴贝夫。

早在三级会议召开前，西埃耶斯在他著名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里，用阶级的语汇鲜明地提出了政治与社会问题：第三等级同贵族的对立。“谁敢说第三等级本身还不具备组成完整民族所必需的一切？他是一个强健有力的人，但却被捆住了手脚。假如废除特权等级，全民族不会因此有所损害，相反会得到加强。那么什么是第三等级呢？是一切。不过它还处在被束缚和被压迫的状态。废除了特权等级它将会怎样？是一切，而且是自由和繁荣的一切。没有第三等级将一事无成，没有其他等级，一切将会无限美好……贵族等级并不进入社会组织。它的确成为民族的累赘，但是它不能成为民族的组成部分……只有在最糟的国家中才会有这样的现象：不仅一些孤立的个人，而且整整一个阶级不劳而获并引以为荣。他们坐享其成而不生产，吞噬着劳动果实中最精华的部分。这个阶级由于它的毫无作为而自处于整个民族之外。”他还更明确地指出：如果说僧侣属于“一种为公众服务的职业”，那么贵族只不过是“没有职务、毫无用处的阶级。贵族阶级成员仅靠享有属于他们个人的特权来生存……他们不属于真正的人民，单靠自己就不能生存。他们依赖于一个实际的国家，犹如依靠树汁为生的树瘤，消耗并吸干树汁”。用寄生阶级来形容贵族再合适不过了。对于西埃耶斯来说，除了废除贵族特权，摧毁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革命还能是什么呢？

4年的政治与社会斗争使罗伯斯庇尔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作为最有远见的人，他始终牢记革命的总路线。早在1789年7月，他就揭露了贵族的阴谋。但是，革命实践使他渐渐意识到革命在政治、道德和社会方面的必要性。

政治方面的必要性：革命的成功要求摧毁旧秩序，必要时可以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1792年11月5日，为回答吉伦特党人卢韦的进攻，罗

伯斯庇尔谈到8月10日起义和推翻国王，他问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逮捕不合法吗？难道需要拿着刑法来评价救国所必需的预防措施？……我们非法地砸烂了那些招摇撞骗，辱骂自由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公民的武装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指责我们在商讨救国大计的议会中把革命公认的敌人赶走吗？……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像革命、国王下台、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非法，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非法。"在正常时期，法律是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终止合法的保障会带来的危险，但他仍坦率地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难道暴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

道德方面的必要性：世上有一种革命的伦理。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6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报告。正因为使用革命暴力会引起一些过火行为，所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用美德、即公民道德来加以纠正。"这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私人生活不规范，它就不能实现。在共和二年芽月26日（1794年4月15日）的报告里，圣茹斯特描绘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又明晓事理，勤俭节约，朴实真诚，是一切谎言、宽容和徇私行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是一位善良、廉洁的英雄"。

社会方面的必要性：共和二年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声称："事物的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到的结局。"所谓事物的力量，指的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即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紧密相连的迫切需要。他更加明确指出："请设想，假如国内关系（即社会关系）发展到与政府形式背道而驰的地步，一个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圣茹斯特在这里强调了必要的协调法则：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将革命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掘坟墓。"这一预见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还在悲剧性地显示

出来。

热月的反动，通货膨胀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可怕的冬季里群众难以名状的苦难，牧月的人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得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里作了正确的解释。“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它是长期不断的，当政府使一些人攫取一切，使另一些—无所有时，战争就开始了……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它就激烈地展开，双方都用尽一切手段来取胜。”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的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表达得更加清楚。革命停顿了就要后—退。法国大革命不顾一切反对和障碍，直至热月9日一直是向前推进的，此后它就后退了。但愿人民在希望中觉醒。“但愿他们推翻所有这些古老和野蛮的制度，代之以合乎自然和永恒的正义的制度”。人民只有经过彻底的动荡才能解除苦难。有良知的人都会宣扬内战。“在内战中，以刽子手为一方，以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另一方，有什么内战比这更令人愤慨？……双方都能进行自卫的内战难道不是更好吗？”《宣言》以这个预言性的号召结束（哪一场革命没有预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到了极点，它们不能再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荡才能改变！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让各种成分都打乱、交叉、互相冲突！让一切都回到混沌状态，一个崭新的、再生的世界将在这混沌状态中诞生！”

因此，那些经历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人的话可以证明，革命是包含

着动荡、变革、破坏和重建的相当长的过程。必须把旧制度根本摧毁，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世界。暴力通过阶级斗争产生历史。

二、必然的革命

罗伯斯庇尔或巴贝夫都未能对革命过程的这种分析更加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从大革命时期的巴纳夫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米涅和基佐再到马克思，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不断深化。

巴纳夫第一个对法国革命作出远远超过所谓特殊范例说法的解释，并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我们知道，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里对巴纳夫写于1791年底的《法国革命导论》是何等重视。根据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制宪议会规定它的议员不得重新当选，因此巴纳夫退出了政治生活。饶勒斯认为，巴纳夫是第一个“最明确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第一个提出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理论的人”。

工场巡视员罗兰在1785年写道，多菲内省的企业集中，门类多样，冶金和纺织业占重要地位，这使它成为王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巴纳夫在这个工业区长期生活过，因此得出看法，工业将导致掌握这种产业的阶级取得政权。他提出这样的原则：土地贵族为他们自己建立的制度妨碍并推迟新纪元的到来。但是，“久而久之，可以这样说，政治制度要接受地方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必然要适应特定地区新的经济条件。一旦工艺和贸易渗透到人民中去，并成了为劳动阶级服务的致富手段，一切政治规律方面的革命就在酝酿之中了。财富的再分配导致权力的再分配。如同拥有土地提高了贵族地位一样，工业增强了人民的权力。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是不难发现的，它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的现象。“所有欧洲政治共同的发展规律在法国孕育了一场民主革命，并使它在18世纪末爆发。”饶勒斯这样评论道：“革命的资产阶级

对自己的力量，对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运动，具有非常现实和透彻的意识。”“巴纳夫对多菲内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了绝妙的分析和解释。他明确宣告工业资产阶级与诞生于暴力、拥有封建地产的地主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克服的冲突。

因此，巴纳夫上升到历史普遍规律的高度。“如果孤立地，脱离我们周围环境和以前时代的历史来看这场震撼法国的大革命，就决不能对它得出正确的看法。为了判断其性质，剖析其真正的原因，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只有纵观自封建时代至今指引着欧洲各国政治的全部运动……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总原因。”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够读到巴纳夫的著作。他的《导论》1843年才由他的同乡、德罗姆省的贝朗瑞出版。但是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投身反对极端反动派、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以历史作为政治武器。他们出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强调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性和历史必然性。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和米涅的同名著作分别出版于1823年和1824年。夏托布里昂在他的《历史研究集》里称他们为“宿命论学派”。他们两人确实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及其后续各阶段里看到了既定原因合乎逻辑的发展。两人都认为恐怖是必要的坏事，因为没有它也就不能拯救国家了。

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里贯穿了一种“必然力量”的思想，它推动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克服一切障碍直至最终达到目的。“尽管共和主义产生了无套裤汉思想，无套裤汉思想又产生了委员会制度以及后来的十头政治甚至三头政治，但它们只是自由思想，即大革命固有的思想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思想并不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且，“革命还具有军事性质，由于它一直同欧洲不断进行斗争，因此它必须使自己强有力和稳固地确立起来”。……“雾月18日政变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它并不排除自由意志。人完全保持对

其行为的责任。

米涅在为《法兰西信使报》撰写的文章里，比他的《法国革命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革命哲学。他深信，革命都有“共同的进程和某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对一场革命作出解释，也就解释了所有的革命……同样的现象是通过相同的规律反复出现的”（1822年5月25日）。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这两条宿命论的基本原则贯穿了米涅的全部《法国革命史》。

变革的必然性：变革是生存的本质所在，世上不存在不变的历史。革命都服从于一种合理性：“（革命）从来不是任性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区区小事而闹得天翻地覆。”

暴力的必然性；暴力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同社会阶级的冲突也是紧密相连的；分析暴力的发生，就是解释“革命的进程”。找出暴力的伦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在米涅看来，革命暴力是件坏事，但它是必要的坏事。然而他在追溯这件坏事的根源时，发现了它的合法性：“如果说革命在世界经济中是完全必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灾难就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反抗这种必要性的人，而不是运用暴力的人……应该用血泪控诉那些武装起来压迫别人的人，而不是控诉为正义而战斗的人。”（1822年12月8日）

在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出版）里，他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从历史的必然这层意义上看，革命不仅在发动阶段，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次变革势在必行、并且时机又已到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一切事物都会促使它成功。”1789—1791年的第一次革命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是使法国制度同“新的利益和需要”（即资产阶级的）协调起来所必需的。1792—1794年的第二次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它是由国内外贵族反革命的抵抗挑起的，它服从于暴力的必需，是革命政府和恐怖的“可

悲的必然”。“特权等级曾企图阻止革命，欧洲也曾试图使它屈服，而当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掌握最高主权，而外部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然而，尽管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目的还是达到了：旧社会在革命中被摧毁，新社会在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基佐和梯也尔、米涅遵循同一路线。泰纳认为，基佐是“哲学派”和“思辨历史”最出色的历史学家。

在《法国史论集》的第4篇（1823年出版）里，基佐强调政治制度是由“社会状况”、各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人的状况”决定的，而归根结蒂，“人的状况”是由“土地的状况”决定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阶级关系，人的地位和国家的结构。

1826年，基佐开始出版他的《英国革命史》。他说：“人们或是为之庆贺，或是感到惋惜，或是祝福它们，或是诅咒它们，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这些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些人把革命同历史完全隔开……让它们单独承受咒骂或享受荣誉。现在是抛弃这些幼稚骗人的空话的时候了。”这两场革命都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革命）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全都是在它们爆发前曾被千百次说过、希望过、做过或尝试过的。”在他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集》里，基佐早已强调“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甚至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这些根源，主要应该从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中去寻找。

1828—1830年间，基佐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明史》。他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看做法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人民大众和贵族之间，资产阶级慢慢地确立起新社会的框架，并且使新社会的思想逐步明确。1789年革命则是对这个新社会的确认。“人人都知道第

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它是法国文明最积极、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归根结蒂，是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特性。从社会的观点以及从它同我国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逐渐扩大，其地位不断提高。它首先是有力地改变了、然后是战胜了、最后则是吸收或几乎吸收了其他所有阶级。”（第46讲）对社会冲突进行的精确分析，使基佐能理解法国革命与上一世纪英国革命不同的特点。“上层阶级盲目的争斗使建立自由政府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与贵族不是团结起来抵抗专制主义，或建立和实行自由体制，它们各自为政，势不两立，热衷于互相排斥。一个阶级拒绝实行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反对任何优势。”（1857年版的前言）整个这段话都是需要引述的。基佐最后总结道：“贵族和资产阶级未能一致行动以便共同获得自由和强大起来，他们使自己连同法国一起陷入了革命。”

因此，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大家都知道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信中的这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2] 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基佐，还有奥古斯坦·蒂埃里。他在185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称奥古斯坦·蒂埃里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何等重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是如何对国民公会感兴趣，以致曾一度想撰写这段历史。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马克思开始探索那个有能力要求取得全面优势的“特殊阶级”的特点。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

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阶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3] 在这后面的几行话，很明显是引述西埃耶斯及其小册子里的话。

那么，这个“一般障碍”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共产党宣言》中（1848年出版）。马克思在他一段著名的话里提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提请注意这句话后，他强调：在18世纪末，现存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所有制以及农业和手工工场的组织，都不再适应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因此，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

这样，马克思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并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4]

三、革命的道路

在简要回顾了这些历史编纂学概况后，我们大概可以确定革命的概念，并且由此来确定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特征。某些人滥用这个词，或者

恣意抛弃这个概念，这都会造成贬低革命的意义或者故弄玄虚。滥用革命一词的例子有：人口革命、经济革命、精神革命、价格革命、饮食革命、性革命等等……抛弃这个概念的表现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为了强调改良或过渡而否定革命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我们首先要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这个词的奇特命运。这个词的原意是“回到原来的地点”。利特雷[5]给“革命”，所下的定义的第一个意思是：“一个星球回到它的出发点。”从柏拉图的《蒂梅欧篇》到维科[6]的《周而复始论》，历史和人类运行的循环论同星球运行的这一定义并非没有相似之处：革命被认为是恢复时代进程中被中断的原来的秩序。博絮埃、德·博纳尔和约瑟夫·德·梅特尔都认为革命是神的旨意。启蒙哲学则认为革命是自然法则。曾经有过一种原始的秩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找回这个失去的天堂。革命斗争结束，即历史的结局将是天国的重建，或是在社会灾难降临之前的人国的重建。根据1789年8月26日的《人权宣言》，“对人权的无知、忘却或蔑视，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自然权利指先于任何社会早已存在的，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恢复这些权利将导致人类复兴和“人人幸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同旧秩序决裂，并从根本上把它彻底推翻，也就是柏拉图在《共和国》里所指的métabolé（即推翻、彻底改变）。为了使人类免遭不幸，苏格拉底要求推翻作为希腊公民秩序基础的三大堡垒：财产、家庭和民政与司法的官衙地位，即国家机器。按照同样的准则，在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曾秘密写信给国王：“请比较一下新秩序和旧制度……除了没有高等法院、自治税区、僧侣、特权和贵族等级外，其他不都是一样吗？”而托克维尔评论道：“由于法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更换一个旧政府，而是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它不得不同时向一切已确立的权力进攻，撕毁所有已被确认的势力，清除各种传统，革新习俗，并在某种程度上把长期形成的、基于崇敬和顺从的一切思想从人们头脑里清除出去。”真正的革命

不仅要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而且还要破坏社会组织以及指导这个社会组织的各项原则。

然而，同历史和革命的循环观念相反，革命决裂的概念认为，在革命前已经存在某种结构、某种形式，而革命后建立起一种新秩序，它同旧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破是为了立。但是以前已经消失的东西还能再恢复吗？卢梭的两篇论文就是探讨这一前景的。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设想了一种原始、纯洁的社会状况，由于爱财和追求奢侈所造成的变动这种状况被扰乱了。但是卢梭非常注意历史进程的矛盾性："人们不久就看到奴役和苦难在萌芽，并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2部分）因此，循环后的合拢只是表面的。这里是"结束了循环并与原出发点重合的终极点"。但是，从目前的法则回归到弱肉强食的法则实际上是引回一种新的自然状态，它不同于我们最初的那一种自然状态"。卢梭撰写的《社会契约论》正是为了更确切地阐明这种新的状态。

因此，破是为了再立。归根结蒂，革命并不是要回到什么神秘的黄金时代，而是朝着更合理、更公正的未来迈进。从1789年到共和二年，革命的含义正是这样演变的。这个词从意味着1789年事件所引起的动荡和决裂，不久就变为相反的意思：革命是一种激烈的行动，然而它是有节制的；革命是一种果敢的行为，然而它是有条不紊的。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革命政府组织法的内容和名称也表明了这一点。霜月11日，丹东曾竭力强调："如果说人们要用长矛来推翻旧制度，那么，他们要用理性和智慧的罗经来建立和巩固宪法的大厦。"

这是什么样的大厦？它将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这里，人们需要最精确地说明"革命"这个词的含义，而所谓的政治科学词汇往往会造成混乱。只有社会的革命才是革命，政变决不是革命。在这方面，把19世纪的《利特雷词典》同20世纪的《罗贝尔词典》进行一番比较很能表

明革命一词的定义不断精确的发展过程。在《利特雷词典》里，革命的定义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罗贝尔词典》的定义是："社会与道德秩序"的突然和激烈的改变。在革命过程中，包括恐怖和内战在内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摧毁了旧的社会关系。革命阶级通过专政强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社会关系终于同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协调起来了。

因此，革命就是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彻底变革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革命涉及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后一种变革是由于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力水平越高，革命阶级的觉悟越高，团结越紧密，能量越大，革命也就完成得越彻底。法国大革命正是如此。

革命不能由上面强加。如果说改良可以由上面施行，那么革命则必然是由下面发动的。改良并不动摇社会的基础结构，相反，它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长久利益。改良在现存社会的框架内进行，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个社会。改良不等于革命在时间上的拉长，它和革命的区别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内容。改良还是革命？这不是选择一条通向同样结局的较快或较慢的道路的问题，而是明确一个目标的问题，即或者建立一个新社会，或者对旧社会进行表面的改动。从杜尔哥到洛梅尼·德·布里耶纳的改良运动都不主张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而是主张改良旧秩序。它力图减少弊端，而不是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只有革命才消灭特权和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1830年最终稳坐江山，乃是因为革命，而不是改良。革命保障了社会从过时的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通向未来的阶段。这为资产阶级占有这个国家创造了条件。

革命在长达1个世纪以上的过渡时期中也不会减弱。某些人认为，过渡也和革命本身的剧烈阶段一样构成一个过程。它标志着两种对立的生产方式之间进行决战的必然性。米歇尔·格勒农和雷吉纳·罗班这样写

道："过渡问题的提出远不是抹杀资产阶级革命在通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战略地位。相反，它恢复了资产阶级在过渡阶段的关键性政治时期所处的中心地位。这个政治时期使政治与法律得以调整，实行权力的再分配，并且建立所有足以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形态。"这样一来，革命"现象"只是德尼·里谢称之为新生资本主义"缓慢、然而是革命的转变"的一种表现或一种波折，是拉开通向上层建筑的最后一道门闩，是对封建主义残余的最后清扫。实际上，单独地提出过渡问题，甚至把它同革命和革命必然性的问题对立起来，就是用否定革命的决定性和必要性的办法来讨论革命的问题。如果认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打开了通向上层建筑的门闩，或只是改善了上层建筑业已形成的适应性，这就是把大革命的作用与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各种机构的改组相提并论，将它贬低为对社会进行简单的修整了。

持过渡论者与持改良论者的思想前提相似得出奇。因为，正像托克维尔所问的，假如1789年时只有"上层建筑和社会"的门闩需要打开，只有资本主义的平衡需搞得"更好些"，那么，何必有"这场离奇和可怕的革命"呢？"在摧毁各项政治体制后，革命又废除了各项民事体制；在改变法律之后，它又改变了风俗、习惯，甚至语言；在破坏了政府机构之后，它又动摇了社会基础，而且最后仿佛还要向上帝本身开战"。正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假如只是对"政治与法律进行调整"，那么为什么还要有"这场可怕的动乱"，为什么还会产生这种"空前强大的威力"？"这威力冲破各帝国的壁垒，砸碎所有王冠，蹂躏其他民族，同时又奇怪地赢得它们支持自己的事业"。

---

[1] 本文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1981年1—2月号（总第217—218期），题为《国家与社会》。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332。——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2。——译者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117。——译者

[5] 爱弥尔·利特雷（1801—1881年），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他编纂的《法兰西语言词典》在法国影响很大。——译者

[6] 让-巴斯蒂特·维科（1668—1774年），意大利哲学家，著有《历史哲学原理》。——译者

阿尔贝·索布尔著作目录[1]

巴黎第一大学弗朗索瓦兹·布律内尔汇编

1.专著

△《圣茹斯特的政治、社会思想》（用笔名皮埃尔·代罗克勒发表）

—（Sous le pseudonyme de Pierre Derocles），*Saint -Just*：*ses id ées politiques et sociales*， Paris，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1937，173p.

△《1789年，自由共和元年 文献与评注》

—1789.*L 'an I de la Libert* é.*Textes et commentaires*， Paris，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 1939， 302p. Nouvelle édition remaniée， Paris，Editions sociales， 1950， 352p. Ré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Editions sociales， 1973，352p. Traduction italienne，Episteme Editrice，1966.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军（1789—1794年）》

—*L 'Arm* é*e nationale sous la R* é*volution*（1789-1794），Paris，Editions France d'abord，1945，137p.，préface de Joinville. Une première version de cet ouvrage a été publiée sous le titre *La Naissance de l 'arm* é*e nationale*（1789-1794） en 1939， aux Editions sociales internationales，Paris.

△《四八年》

—*Quarante -huit*， Paris， Union nationale des intellectuels，s.d.，plaquette.

△《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

—*La R* ê*volution fran* ç*aise* （1789-1799），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48， 390 p.；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1951.

△《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 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 1793年6月2日——共和二年热月九日》

—*Les Sans -culottes parisiens en l 'an* Ⅱ.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 ê*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 dor an* Ⅱ，Paris，Librairie Clavreuil，1958，1168p.； deuxième édition，1962. Adaptations： italienne （Bari，Laterza，1960）， allemande（Berlin，Rütten-Loening， 1962），anglaise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4），russe（Moscou，Progress，1966）

△《旧制度末期的蒙彼利埃农村 从土地赋税簿籍看地产与种植》

—*Les Campagnes montpelli* é*raines* à *la fin de l 'Ancien R* é*gime* . *Propr* é *et cultures d 'apr* è*s les compoix*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58， 154p.

△《共和二年的战士》

—*Les Soldats de l 'an* Ⅱ， Paris，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collection 《Portraits de *l* 'histoire》，1959， 298p.

△《法国大革命简史》

—*Pr* é*cis d 'histoire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Paris， Editions sociales，1962， 530p. Edition revue： Paris， Gallimard，collection 《Idées》， 1964， 2 volumes， 378p.chacun. Nombreuses traductions，

dont： roumaine（Bucarest， 1962）， hongroise（Budapest， 1963）， italienne（Bari，1964），tchèque（Prague，1964），brésilienne（Rio de Janeiro，1964）， espagnole（Madrid， 1966）， en hébreu， allemande（Francfort，1973），anglaise（Londres， 1974）， néerlandaise（Amsterdam，1975）， américaine（New York， 1975）.

△《格里历与共和历对照表》

—*Concordance des calendriers grégorien et républicain*， Paris， Librairie Clavreuil， 1963， 87p.

△《法国大革命》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P.U.F.， collection《Que sais-je？》，1965， 128 p. Cinquième édition revue et mise à jour， 1975. Traduction catalane（Barcelone， 1968）， allemande（München， 1977）.

△《路易十六诉讼案》

—*Le procès de Louis* ⅩⅥ，Paris，Julliard， collection《Archives》， 1966， 268p.

△《大革命前夕的法国 Ⅰ.经济与社会》

—*La France à la veil le dela Révolution*. Ⅰ：*Economie et Sociêtê*， Paris， Sedes， 1966， 196 p.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1974， 286p. Traduction japonaise（Hosei University Press， 1982）.

△《农民、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

—*Paysans*， *Sans-culottes et Jacobins*， Paris， Librairie Clavreuil，

1966， 388p.， recueil d 'articles.Traduction espagnole（Madrid， 1971）.

△《罗伯斯庇尔——丹东》

—*Robespierre* /*Danton*， Roma-Milano， Compagnia Edizioni Internazionali， 1966， collection 《Giano—I tascabili doppi》， 2 fois 80 p.

△《督政府与执政府》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aris， P.U.F.， collection 《Que sais je？》， 1967， 128p.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mise à jour， 1972.

△《马拉》

—*Marat*， Roma-Milano， Compagnia Edizioni Internazionali， collection 《Giano—I tascabili doppi》， 1967， 78p.

△《无套裤汉》

—*Les Sans -culott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collection 《Points-Politique》， 1968， 256p. Deuxième édition，1979.

△《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

—*La Premi* è*re R* è*publique*， 1792-1804， Paris， Calmann-Lévy， collection 《Vie et mort》， 1968， 365 p. Traduction russe（Moscou， 1974）.

△《文化与法国大革命 Ⅰ.旧制度的危机》

—*La Civilisation et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Ⅰ： *La Crise de l 'Ancien*

égime， Paris， Arthaud， collection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1970， 636 p.

△《18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

—*La Societ* à *francese nella seconda met* à *del* Ⅹ -1.45*mm* Ⅷ *e s* .，Napoli，Giannini Editore，collection 《Economia e società》， 1971，446p.

△《共和二年的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1793—1794年）》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 évolutionnaire en l 'an* Ⅱ，（1793-1794）， Paris， Flammarion， collection 《Science》， 1973，508p.

△《第一帝国（1804—1815年）》

—*Le Premier Empire* （1804-1815），Paris， P.U.F.， collection 《Que sais-je？》， 1973， 128p.

△《大革命的农民问题，1789—1848年革命史研究》

—*Probl èmes paysans de la R évolution*， 1789-1848. *Etudes d 'histoire évolutionnaire*， Paris，Francois Maspero， colleçtion 《Textes à l 'appui》， recueil d 'articles， 1976， 447p. Traduction espagnole（Madrid， 1976）.

△《启蒙时代 第1卷：高潮，（1715—1750年）》

—*Le Si ècle des Lumi ères*， *tome* Ⅰ：*L 'essor*， 1715-1750， Paris，P.U.F.， collection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1977， 2 volumes，1042p.en collaboration avec Guy Lemarchand et Michèle Fogel.

△《法国18世纪乌托邦简史》

—*Pour une histoire de l 'utopie en France*， *au* ⅩⅧ *e si* è*cle*，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77，83p.， en collaboration avec Irmgard Hartig.

△《理解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问题（1789—1797年）》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Probl* è*mes polit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 ç*aise* （1789-1797），Paris， François Maspero， collection 《Textes à l 'appui》， 1981， 384p.

△《文化与法国大革命 Ⅱ.法国大革命》

—*La Civilisation et la R* è*volution fran* ç*aise* . Ⅱ：*La R* é*volution fran* ç ， Paris，Arthaud，collection 《Les grandes civilisations》， volume 1，1982，volume 2 à paraître en 1983.

△《共和二年巴黎各区级人员录》

—*R* é*pertoire du personnel sectionnaire parisien en l*， *an* Ⅱ， Paris， paraltre， en collaboration avec Raymonde Monnier.

2.资料整理、文献出版与评介工作

△《巴黎各区的文件 （1790—共和四年）简明索引》

—*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 （1790-*an* Ⅳ）.*R* é*pertoire somma* ， Paris， Commission de recherche et de publication des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vie économi 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50， 125p.

△《临时政府和行政权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848年2月24日—6月22

日》

—*Procès-verbaux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et de la Commission du pouvoir exécutif .24 février -22 juin* 1848， Paris， Comité national du centenaire de 1848， 1950，432p.（sous la direction de C.-H.Pouthas）.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文集演讲录》

—*Oeuvres de Maximilien Robespierre . Discours*， Publication de la Ⅵ section： de l' 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t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sous la direction de Georges Lefebvre， en collaboration avec Marc Bouloiseau：

Tome Ⅵ：1789-1790， Paris， P.U.F.， 1950，704p.

Tome Ⅶ：*Janvier -septembre* 1791，Paris，P.U.F.， 1952，784p.

Tome Ⅷ：*Octobre* 1791-*septembre* 1792， Paris， P.U.F.， 1954，482p.

Tome Ⅸ：*Septernbre* 1792-*Juillet* 1793，Paris， P.U.F.，1958， 642 p.

Tome Ⅹ： *Juillet* 1793-*Thermidor an* Ⅱ， Paris， P.U.F.，1967，655 p.

△《百科全书选摘》

—*L 'Encyclopédie . Textes choisis*， Paris， Editions sociales，collection 《Les classiques da peuple》， 1952， 260p.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1962.Trois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1976，Traduction espagnole， Grijalbo， 1979 et italienne， Editori Reuniti，

1970.

△《圣茹斯特 演讲与报告》

—*Saint -Just . Discours et rapports* ， Paris， Editons sociales， collection 《Les classiques du peuple》， 1957，222p.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1970. Traduction italienne， Editori Reuniti 1966.

△《巴黎的无套裤汉 人民运动史文献，（1793—1794年）》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 1793-1794，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57， 532p.， prêface de Georges Lefebvre， textes inédits es français， traduction allemande en regard， en collaboration avec Walter Markov.

△《巴贝夫手稿和已出版著作总目录》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irm* é*s de Babeuf* ， Paris， Commiss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6， 220p.， en collaboration avec Ⅴ. Daline et A.Saitta.

△《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

—*Jean Jaur* è*s . 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Paris， Edition sociales， 1968-1973， 6 volumes et index， édition revue et annotée.

△《迪歇纳老爹报》

—*Le p* è*re Duchesne* ， Paris， EDHIS， 1969， introduction 《Jacques-René Hébert et *Le P* è*re Duchesne en l 'an* Ⅱ》， tome Ⅰ， p.3 à 107.

△《让·梅叶全集》

—*Oeuvres compl ètes de Jean Meslier*， Paris， Editions Anthropos， 1970-1972， 3 volumes， préfaces et notes des tomes Ⅰ et Ⅱ， en collaboration avec Jean Deprun et Roland Desné.

△《启蒙时代的乌托邦》

—*Utopies au si ècle des Lumi ères*， Paris， Micro-éditions Hachette， s.d.， 17p.，étude et bibliographie.

△《从乌托邦到大革命 巴贝夫与巴贝夫主义》

—*De l 'utopie à la R èvolution . Babeuf et le babouvisme*， Paris， Microéditions Hachette， s.d.， 15p.， introduction et catalogue.

△《巴贝夫文集 第1卷：大革命前的巴贝夫》

—*Oeuvres de Babeuf*， tome Ⅰ： *Babeuf avant la R évolution*，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llection 《Mémoires et Documents》， 1977， 412p.，en collaboration avec Ⅴ.Daline et A. Saitta， introduction 《Babeuf， le babouvisme et la Conjuration des Egaux》， p.7à 22.

△《格雷古瓦修士文集》

—*Oeuvres de I 'Abb é Gr égoire*， Nendeln-Paris， KTO Press-EDHIS， 1977， avant-propos 《Une conscience religieuse en temps de Révolution. L 'Abbé Grégoire》， tome Ⅰ， p.Ⅸ à Ⅺ.

△《阿纳卡西斯·克洛茨文集》

—*Oeuvres d 'Anacharsis Cloots*， München-Paris， Klaus Reprint-EDHIS， 1980， Préface， tome Ⅰ， p.Ⅶ.à ⅩLⅡ.

△《卡米耶·德穆兰文集》

—*Oeuvres de Camille Desmoulins*， München， Klaus Reprint， 1980， avant-propos 《Notes sur la vie politique de Camille Desmoulins》， tome Ⅰ， p.Ⅶ à ⅩⅩ.

3.由索布尔主持或由他撰写引论、前言、绪言和后记部分的著作

△《巴贝夫与巴贝夫主义问题》前言部分

—*Babeuf et les probl èmes du babouvism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63， 320p.，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tockholm， août 1960， avant-propos， p.7 à10.

△《吉尔贝·罗默（1750—1795年）与他所处的时代》前言部分

—*Gilbert Romme*（1750-1795）*et son temps*， Paris， P.U.F.， 1966，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d 'études du Massif Central， Colloque de Riom et Clermont， juin 1965， avant-propos， p.5 et 6（avec Jean Ehrard）.

△《梅叶神甫研究》前言部分

—*Etudes sur le cur* é *Meslier*，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et Centre aixois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 ⅩⅧ^{e} siècle， 1966， 127p.，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Aix-en-Provence， novembre 1964， avant-propos， p.5 à 7.

△《“罗伯斯庇尔”讨论会专集》前言部分

—*Actes du colloque* 《*Robespierre* 》，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67， 331 p.Ⅻc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Vienne， septembre 1965， avant-propos， p.Ⅶ à Ⅺ.

△《在法国统治下的国家（1799—1814年）》引论部分

—*Les Pays sous domination fran çaise* （1799-1899），Paris，C.D.U.， 1968， 259 p.， introduction 《Problèmes sociaux des pays sous occupation française（1799-1814）》，p.1 à15.

△《“圣茹斯特”讨论会专集》前言部分

—*Actes du colloque* 《*Saint -Just* 》，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istes， 1968， 467p.， Sorbonne， juin1967， avant-propos 《Pour relire et comprendre Saint-Just》， p.5 à 8.

△《米拉波家族和它所处的时代》前言部分

—*Les Mirabeau et leur temps* ，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 et Centre aixois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 ⅩⅧe siècle， 1968， 258p.， avant-propos， p.7 et 8.

△《巴兹的密谋》（阿·德·勒斯塔皮著）前言部分

—Lestapis（Arnaud de）， *La Conspiration de Batz* （1793-1794），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69，276p.， avant-propos，p.Ⅶ à Ⅹ.

△《关于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革命史的研究》（克·马佐里克著）前言部分

—Mazauric（Claude），*Sur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Contributios* à *l*

'*histoire de la r évolution bourgeoise*， Paris， Editions soeiales， 1970， 239p.， avant-propos， p.5. à 9.

△《科西嘉历史问题（从旧制度到1815年）》前言部分

—*Probl èmes d 'histoire de la Corse* （*de l 'Ancien R égime* à 1815），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71， 303 p.， Actes du colloque d 'Ajaecio， octobre 1969， avant-propos， p.5 et 6.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欧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讨论会专集》前言部分

—*Actes du colloque* 《*Patriotisme et Nationalisme en Europe* à *l 'époqu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et de Napol éon* 》， Paris， Société des etudes robespierristes， 1973，222 p.， ⅩⅢ^{e} Congrès des sicences historiques， Moscou，août 1970， avant-propos， p.5 et 6.

△《犹太人与法国大革命》前言部分

—*Les Juifs et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Toulouse， Privatcollection 《Franco-Judaïca》， 1976， 234p.， colloque de la Sorbonne， novembre 1974， avant-propos，p.1 et 2（avec Bernharà Blumenkranz）.

△《圣茹斯特的政策与使命》（让-皮埃尔·格罗著）前言部分

—Gross（Jean-Pierre）， *Saint -Just . Sa politique et scs missions*， Paris，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on française， collection 《Mémoireset Docments》， 1976， 571 p.， avant-propos 《Saint-Justou "la force des choses"》， p.7 à 10.

△《对法国大革命中农民史的研究》引论部分

—*Contributions* à *l 'histoire paysanne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7， 413 p.， recueil collectif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 Albert Soboul， introduction 《Problèmes agrair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9 à 43. Traduction portugaise，Lisbonne，Horizonte， 1978.

△《大革命的节日》序言部分

—*Les F* ê*tes de la R* é*volution* ，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77， 645 p.， colloque de Clermont-Ferrand，juin 1974，préambule， p.1 à 7（avec Paul Viallaneix）.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新路 阿·马迪厄——乔·勒费弗尔讨论会》前言部分

—*Voies nouvelles pour l 'histoire de la Rovolution fran* ç*aise . Colloque Albert Mathiez -Georges Lefebvre* ，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collection 《Mémoires et Documents》， 1978，403 p.，Sorbonne， novembre 1974，préface，p.7 à 11.

△《法国近现代史，第1卷：1789—1799年》（弗·安克和克·马佐里克编著）前言部分

—Hincker（François） et Mazaurie（Clau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 tome 1：1789-1799，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8，448 p.， préface， p.7 à 15.

△《拿破仑的大法院》前言与结论部分

—*Le Grand Sanh* é*drin de Napol* é*on* ， Toulouse， Privat， collection

《Vranco-Judaica》，1979，228 p.，colloque de la Sorbonne，décembre 1997，avant-propos，p.Ⅴ et Ⅵ et conclusions，p.140 à 151（avec Bernhard Blumenkranz）.

△《金色青年》（弗·让德龙著）前言部分

—Gendron（François），*La Jeunesse dor ée*，Québec，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u Québec，1970，450 p.，préface，p.Ⅸ à Ⅻ.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讨论会专集》引论部分

—*Actes du colloque*《*Girondins et Montagnards*》，Paris，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1980，367p.，Sorbonne，décembre 1975，introduction《Girondins et Montagnards》，p.7 à 18.

△《纪念约瑟夫·巴拉（1779—1793年）诞辰200周年文集》担任主编并撰文《关于巴拉诞辰200周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Joseph Bara*（1779-1793）. *Pour le deuxi* è*me centenaire de sa naissance*，Paris，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et Ville de Palaiseau，1981，164 p.，recueii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Albert Soboul，《A propos du bi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Bara. Présenc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p.9 à 18.

△《法国大革命中的指券》（莫·米斯赞斯基著）前言部分

—Muszynski（Maurice），*Les Assignat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Bruyeres-le-Chatel，collection《Histoire du papier monnaie français》，1981，163 *p*.，*Pr éface*，*p*.3 à 6.

△《巴贝夫与他的同路人》（罗·勒格朗著）序言部分

—Legrand（Robert），*Babeuf et ses compagnons de route*， Paris，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1981， 456 p.， avant-propos， p.Ⅶ à Ⅸ.

△《巴黎市府公告，1793—1794年》前言部分

—*Affich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1793-1794， Paris，EDHIS，1975， préface.

△《大革命在多姆山省》序言部分

—*La R évolution dans le Puy -de -D ôme*， Paris， Commissio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collection《Mémoires et Documents》， 1972， 321 p.， avant-propos，p.7 à 9.

△《1788年，争取农民财产权的革命斗争》（莫·法伊维克和拉罗施富科著）前言部分

—Faillevic（Maurice）et La Rochefoucauld（Jean-Dominique de），1788， *Luttes r évolutionnaires pour une propri ét é paysanne*， Paris，Antenne 2. Editions sociales， 1978， préface p.9 à 42.

4.主持出版和再版的乔治·勒费弗尔的著作

△《法国大革命中诺尔省的农民》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Bari，Laterza， publication et préface de la deuxièmeédition（avec Armando Saitta）， 1959.

△《热月党人》

—*Les Thermidoriens*， Paris， A. Colin， révision et mise à jour de la quatrième édition， 1960.

△《奥尔良研究 Ⅰ.关于18世纪末的社会结构研究 Ⅱ.生计与最高限价，1789年——共和四年》

—*Etudes orl éanaises*. Ⅰ. *Contribution* à *l 'étude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la fin du* Ⅹ -1.45*mm* Ⅷ^{e} *si* è*cle*. Ⅱ. *Subsistances et maximum*. 1789-*an* Ⅳ， Paris， Commission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62 et 1963， 2 volumes， 276 et 476 p.

△《法国大革命》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Paris， P.U.F.， collection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révision et mise à jour de la troisième édition， 1963 et de la quatrième édition， 1968， nouvelle édition revue， à paraître.

△《法国大革命研究》

—*Etudes sur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Paris， P.U.F.， révision et mise à jour de la deuxième édition， 1963.

△《拿破仑》

—*Napol éon*， Paris， P.U.F.，collection《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révision et mise à jour de la cinquième édition， 1965 et de la sixième édition， 1969.

△《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瑟堡》

—*Cherbourg* à *la fin de l 'Ancien R égime et au d ébut de la R évolution* *Caen*， *Cahiers des Annales de Normandie*， 1965， 296 p.

△《1789年》

—*Quatre -vingt -neuf* ，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nouvelle édition avec préface et postface， 1970， 308 p.

△《近代历史编纂学的产生》

—*La Naissance de l 'historiographie moderne* ， Paris，Flammarion，collection 《Nouvelle bibliothèque scientifique》，publication et avertissement（avec Fernand Braudel）， 1971， 348 p.

△《督政府时期的法国（1795—1799年）》

—*La France sous le Directoire* （1795-1799），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publication（avec Jean-René Suratteau） et avant-propos，1977， 937 p.

△《对历史的思考》

—*R éflexions sur l 'histoire* ， Paris， François Maspero，collection《Textes à l'appui》， pubication et préface， 1978， 282 p.

5.论文和与人合写的著作

△《大面积耕作地区一个农业集中化的典型，普伊泽-蓬图瓦兹（塞纳-瓦兹省）和托马森家族的产业》

—《Un exemple de concentration agraire en pays de grande culture. Puiseux-Pontoise（Seine-et-Oise）et la propriété Thomassin》， La Pensée， 1946， n° 8， p.51 à 66. *Repris dans Paysans* ，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 *op . cit .*， p.99 à 120 et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de la R évoluti*……， *op .cit .*， p.245 à 266.

△《关于农村公社专题论文的研究计划提纲》

—《Esquisse d'un plan de recherches pour une monographie de communauté rurale》， *La Pens ée*， 1947， n° 13， p.34 à 50.

△《森林与居住条件》

—《Forêt et habitat》， *La Pens ée*， 1947， n°14， p.58 à 64.

△《关于几项地方研究成果》

—《Sur quelques études locales》， *La Pens ée*， 1948， n°17， p.59 à 64.

△《1848年的农民骚动，资料》

—《Les Troubles agraires de 1848. Documents》， *Revue de* 1848，1948， n° 180， p.1 à 20， n° 181， p.39 à 61.

△《1848年的农民问题》

—《La Question paysanne en 1848》， *La Pens ée*， 1948， n° 18，p.55 à 66， n° 19， p.25 à 37， n° 20， p.48 à 56. Repris， sous le titre 《Les Troubles agraires de 1848》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 *op .cit .*， p.307 à 350 et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de la R évolution* ……，*op .cit .*， p.293 à 334.

△《根据国家图书馆的手稿看圣茹斯特的“共和机构”》

—《Les “Institutions républicaines” de Saint-Just d'après les maunscrits de la Bibliothêque nationa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8， n° 3， p.193 à 262.

△《地方研究专栏》

—《Chronique des études locales》， *La pens ée*， 1949， n° 24，p.83 à 90.

△《未公布的圣茹斯特笔记》

—《Notes inédites de Saint-Jus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49， n° 4 p.289 à 293.

△《法国18世纪末的农村公社》

—《La Communauté rurale， en France，à la fin du ⅩⅧe siècle》，*Le Mois d 'ethnographie fran çaise*， 1950， n° 3， p.33 à 36.

△《大革命史专栏，从路易十六、路易十七或其假冒者一直到贝当》

—《Chronique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Louis ⅩⅥ à Pétain， en passant par Louis ⅩⅦ， ou les falsificateurs à l'oeuvre》， *La Pens ée*，1950， n° 29， p.97 à 100.

△《巴黎各区的文件，1790年——共和四年》

—《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parisiennes.1790-an Ⅳ》，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0， n° 2， p.97 à 108.

△《圣茹斯特一篇未公布的手稿："论身份的性质，论居住区，或政府独立性的法则"》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Saint-Just： "De la Nature de l'état civil，de la cité， ou les règles de l'indépendance du gouvernemen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1， n° 4， p.321 à 359.

△《卡尔·马克思与法国革命的经验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来源》

—《Karl Marx et l'expérience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e. Les origines de la théorie de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La Pens ée*， 1951， n° 36， p.61 à 69.

△《百科全书与百科全书运动》

—《*L 'Encyclop édie* et le Mouvement encyclopédiste》， *La Pens ée*， 1951， n° 39， p.41 à 51.

△《大革命前夕诺曼底的一个农村公社：圣图昂港的雷奥蒂厄》

—《Une communautérurale de Normandie à la veille de la Revolution： 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Ouen》， *Annales de Normandie*， 1952， n° 1.

△《大革命中的一个农村公社：圣图昂港的雷奥蒂厄（下塞纳省）， 1789—1795年》

—《Une communauté rural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Les Authieux-sur-le-Port-Saint-Ouen（Seine-Inférieure） 1789-1795》，*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3， n° 2， p.140 à 160. Les de derniers articles sont repris en synthêse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67 à 97 et dans *Probl émes paysans … op .cit .*， p.215 à 244.

△《日本的知识分子与和平资料》

—《Les Intellectuels Japonais et la paix. Documents》， *Le Pens ée*，

1953， p.145 à 149.

△《法国大革命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Classes et luttes de classe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Pens ée*， 1954， n° 53， p.39 à 62. Voit également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 Studies* （*Reki Shiga Kuke Nyu* ）， Tokyo， 1953， n° 165.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 p.25 à 54.

△《巴黎的最高工资限额与热月九日》

—《Le Maximum des salaires parisiens et le 9 thermidor》，*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54， n° 1， p.1 à 22（encollaboration avec George Rudé）.Repris dans *Paysans*，*Sans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p.161 à 182 et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op .cit* .，p.127 à 145.

△《罗伯斯庇尔与人民运动，1793—1794年》

—《Robespierre and the Popular Movement， 1793-1794》 *Past and Present*， 1954， n° s，p.54 à 70.

△《关于圣茹斯特在莱茵方面军的使命（共和二年雾月）》

—《Sur la mission de Saint-Just à l'armée da Rhin（brumaire an Ⅱ）》， *Annales historiqv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4， n° 3， p.193 à 207， n° 4，p.298 à 337.

△《向乔治·勒费弗尔致意》

—《Hommage à Georges Lefebvre》， *La Pens ée*， 1954， n° 58， p.91 à 94.

△《法国大革命研究：无套裤汉与革命政府》

—《Recherch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ans-culottes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L 'Information historique*， mars 1955.

△《共和二年的劳动问题》

—《Problèmes du travail en l'an Ⅱ》，*Journal de psychologie*，1955， n° 1， p.39 à 58. Voir auss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6， n° 3， p.236 à 254.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 121 à 142 et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op .cit .*， p.109 à 126.

△《圣茹斯特》

—《Saint-Just》， *L ' Information historique*， janvier 1956.

△《圣茹斯特与“环境所迫”》

—《Saint-Just et “la force des choses”》，*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6， n° 1， p.83 à 93.

△《大革命中的宗教感情和人民崇拜 “爱国圣女”与“自由烈士”》

—《Sentiment religieux et cultes populair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Saintes patriotes” et “Martyrs de la liberte”》，*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eligions*， 1956， n° 2，p.73 à 87. Voir aussi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7， n° 3， p.193 à 213. Repris dans *Paysans*，*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183 à 202 et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op .cit .*，p.169 à 185.

△《人民民主的根源》

—《Origine de la démocratie populaire》，*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Reki Shiga Kuke Nyu*），1956，n° 197.

△《一场历史讨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

—《Une discussion historique：du féodaisme au capitalisme. Contribution à propo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La Pensée*，1956，n° 65，p.26 à 32. Repris dans Dobb（Maurice） et Sweezy（Paul M.），*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problémes de la transition*，Paris，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1977，tome 1，p.227 à 238.

△《18至19世纪法国的农村公社，基本的问题》

—《La Communauté rurale en France. ⅩⅧe-ⅪⅩ3 siècles. Problèmes de base》，*Revue de synthése*，juillet 1957，p.283 à 315. Voir aussi *La Pensée*，1957，n° 73，p.65 à 81 et *Past and Present*，novembre 1956《The French rural community》.

△《共和二年的革命政府和人民团体 法兰西先贤祠友好协会》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et sociétés populaires en l'an Ⅱ. La Société fraternelle du Panthéon-Français》，*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57，n° 1，p.50 à 55.

△《共和二年人民民主的政治表现》

—《Aspects politiques de la démocratie populaire en l'an Ⅱ》，*La Pensée*，1957，n° 71，p.22 à 34.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op. cit.*，p.55 à 69.

△《答让·多特利》

—《Réponse à Jean Dautry…》，*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8， n° 2， p.92.

△《罗伯斯庇尔与人民团体》

—《Robespierre et 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8， *n* ° 3， *p* .50 à 64. Repris dans *Paysans*，*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op .cit* .， p.223 à 239.

△《罗伯斯庇尔与共和二年的人民团体》

—《Robespierre et 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en l'an Ⅱ》，*Bulletin de la Soci ét é d 'histoire moderne*， 1958， n° 3.

△《纪念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诞辰200周年》

—《Maximilien Robespierre， pour le 200e anniversaire de sa naissance》， *Les Cahiers rationalistes*， 1958， n° 174.

△《罗伯斯庇尔与革命政府的组成（1793年7月27日—10月10日）》

—《Robespierre et la formation du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27 juillet—10 octobre 1793）》，*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1958， n° 4， p.283 à 294.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240 à 256.

△《共和二年的巴黎无套裤汉 论文介绍》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 Présentation de thèse》， *L*

'*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59， n° 1.

△《共和二年的人民运动与革命政府1958年11月29日的论文答辩》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a en l'an Ⅱ. Soutenance de thēse du 29 novembre 1958》，*La Pens ée*， 1959， n° 83，p.65 à 73.

△《共和二年的革命战争问题》

—《Problèmes de la guerre révolutionnaire en l'an Ⅱ》，*La Pens ée*，1959， n° 85， p.33 à 48.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专家，1874—1959年》

—《Georges Lefebvr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74-1959》， *La Pens ée*， 1959， n° 88， p.7 à 19.

△《1793年8月人民斗争的插述 巴黎山岳区和纪尧姆-泰尔区的“新生”》

—《Episodes des luttes populaires en août 1793. La “régénération” des sections parisiennes de la Montagne et de Guillaume-Tell》， *Annat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9， *n* ° 4， *p* .328 à 331.

△《从旧制度到帝国 民族问题与社会现实》

—《De l'Ancien Régime à l'Empire. Problème national et réalités sociales》， *L '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60， *n* ° 3， *p* .59 à 64， *n* ° 4， *p* .96 à 104.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 cit .*， *p* .247 à 283.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专家，1874—1959年》

—《Georges Lefebvre， 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74-1959》， *La Pensée*， 1959， n° 88， p.7 à 19.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史专家，1874—1959年》

—《Georges Lefebvre，historien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74-1959》，*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0， n° 1， p à 20.

△《巴黎各区人员和拥护巴贝夫的人员》

—《Personnel sectionnaire et personnel babouvist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0， n° 4，p.436 à 457. *Voir au Babeuf et les problèmes du babouvisme*， *op.cit.*， p.107 à 131，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culottes et Jacobins*， *op.cit.*， p.281 à 305 et dans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op.cit.*， p.147 à 167.

△《1793年9月人民斗争的插叙 徽章之战》

—《Un épisode des luttes populaires en septembre 1793. La guerre des cocard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1， n° 1， p.52 à 55.

△《意大利复兴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 研究方向提纲》

—《Risorgimento et révolution bourgeoise. Esquisse d'une direction de recherche》. *La Pensée*， 1961， n° 95， p.63 à 73. Voir aussi *Problemi dell'Unità d'Italia*， Rome， 1962， p.801 à 816.

△《关于无套裤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的一场争论》

—《I sanculotti： una discussione trastorici marxisiti》， *Critica Storica*， 1962， n° 4（avec S.-A.Lotte， G.Rudé， J.Zacker）.

△《启蒙思想的影响所及 大革命中的人民阶层与卢梭主义》

—《Audience des Lumières. Classes populaires et rousseauisme sous la Révolution》，*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62， n° 4， p.421 à 438. Voir aussi *Utopie et institutions au* Ⅹ -1.45*mm* Ⅷ *e siecle . I Pragmatisme des Lumi éres*， Paris-La Haye， Mouton， 1963， p.405 à 424.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203 à 222.

△《帕斯卡尔时期的克莱蒙》

—《Clermont au temps de Pascal》， *Pascal pr ésent* .1662-1962， Clermont， 1963， p.201 à 229.

△《让-雅克·卢梭与雅各宾主义》

—《Jean-Jacques Rousseau et le Jacobinisme》， *Etudes sur "Le Contrat social "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 （Actes des journées d'études organisées à Dijon pour la commémoration du 200e anniversaire du Contrat social，1962），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64， p.405 à 424.Voir aussi *Studi Storici*， 1963， n° 1.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257 à 279.

△《地方史研究》

—《Des recherches d'histoire locale》， *Revue de HauteAuvergne*， 1964， p.1 à 4.

△《关于“哲学”定义的笔记（18世纪）》

—《Notes pour une définition de la “Philosophie”（ⅩⅧ siècle）》，*L '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64， p.47 à 53.

△《关于18世纪土地文件研究的笔记地税、地籍及土地税收簿籍》

—《Note sur l'étude des documents fonciers du ⅩⅧe siècle. Terriers，cadastres et compoix》， *Actes du* 89° *Congr* és *national des Soci* ét és，*savantes* . *Lyon*， 1964， *Section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Paris， Imp. nationale， 1964， p.231 à 257.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 *op .cit .*， p.43 à 66 et dans *Probl* émes *paysans* …，*op .cit .*， p.63 à 86.

△《关于大革命前夕地税的实行》

—《De la pratique des terriers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Annales*， *E .S .C .*， 1964， n° 6， p.1049 à 1065.

△《从地税的实行到封建六书的焚毁》

—《De la pratique des terriers au brûlement des titres féodaux》，*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64， n° 2， p.149 à 15[illegible]

△《学徒问题（18世纪后半期）：社会现实与经济需要》

—《Problèmes de l'apprentissage（seconde moitié du ⅩⅧe siècle）.réalités sociales et nécessités économiques》， ⅩⅧe *Colloque d ' histoire sur l 'artisanat et l 'apprentissage*， Aix-en-Provence， 1965， *Ed* . Ophrys， 1965， p.7 à 23. Voir aussi *Studi Storici*， 1964， n° 3， p.449 à 466. Repris dans *Paysans*， *Sans -culottes et Jacobins*，*op .cit .*， p.142 à

160.

△《从大革命到帝国时的法国：人民主权与独裁政府（1789—1804年）》

—《De la Révolution à l'Empire en France：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autoritaire（1789-1804）》， Gouvernés et Gouvernants，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pour l'histoire comparative des institutions， ⅩⅩⅥ， Bruxelle.s， 1965， p.9 à 46.

△《1815年欧洲的总结 社会方面的总结提纲》

—《Le Bilan de l'Europe en 1815. Esquisse d'un bilan social》， *Comit* é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 Ⅹ -1.45*mm* Ⅱ *e* *Congr* ès *international* ， *Vienne* ， 1965， *Rapports* . Ⅰ， *Grands th* è*mes* ， Vienne， 1965， p.517 à 545. Partiellement 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347 à 371.

△《巴黎产业工人阶级的起源，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Aux origines de la classe ouvrière industrielle pari sienne， fin ⅩⅧe -début ⅪⅩe siècle》. *Troisi* è*me Conf* è*rence internationale d ' histoire* è*conomique* ， *Munich* ， 1965， Paris-La Haye， Mouton， 1965， p.187 à 192.

△《介绍吉尔贝·罗默（1750—1795年）》

—《Présentation de Gilbert Romme（1750-1795）》，*Gilbert Romme*（1750-1795） *et son temps* ， *op .cit* .，Paris，P.U.F.， 1966， p.7 à 21.

△《社会史中的描述与估量》

—《Description et mesure en histoire sociale》， *L 'histoire sociale . Sources et m éthodes* ， Colloque de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Saint-Cloud，mai 1965， Paris，P.U.F.， 1967， p.9 à 25.

△《被法国占领国家的社会问题（1799—1814年）》

—《Problèmes sociaux des pays sous occupation française（1799-1814）》，*Les Pays sous domination fran çaise* （1799-1814），*op .cit .*，Paris， C.D.U.， 1968， p.1 à 15.

△《拿破仑与意大利，或“不成功的革命”》

—《Napoléon et l'Italie， ou “la Révolution manquée”》， ibid， p.78 á 91.

△《华沙公国（1807—1813年）司法结构与社会现实》

—《Le Duché de Varsovie（1807-1813）. Structures juridiques et réaliés sociales》， *ibid .*， p.172 à 192.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393 à 414.

△《为了重读和理解圣茹斯特》

—《Pour relire et comprendre Saint-Jus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8， n° 1，p.la 4.Voir *Actes du colloque Saint -Jus* ， *op .cit .*

△《关于日本对大革命的研究》

—《Note sur les études concernant la Révolution au Jap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8， n° 2， p.260 à 268. Repris dans *Probl émes paysans …*， *op .cit .*， p.419 à 427.

△《法国大革命与“封建制”》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éodalité”》，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68， n° 3， p.289 à 298.

△《法国大革命与“封建制” 关于封建捐税》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éodalité”. Notes sur le prélèvement féodal》， *Revue historique*， 1968， n° 487， p.33 à 56. Repris dans *Problèmes paysans* …， op.cit.， p.89 à 115.

△《19世纪法国农村社会中的“封建”残余》

—《Survivances “féodales” dans la société rurale françaisé au ⅩⅨ^{e} siècle》， *Annales*， *E.S.C.*， 1968， n° 5， p.965 à 986. Repris dans *Problèmes paysans* …， op.cit.， p.147 à 166.

△《关于再版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尊重原文与公诸于世》

—《Apropos d'une réédition（*l'Histoire socialiste* de Jaurès）： Respect et mise à jour》， *La Pensée*， 1968， n° 142， p.41 à 44.

△《结构的内部运动》

—《Le Mouvement interne des structures》， participation à la soirée d'étude du 23 février 1968 sur《Structure sociale et Histoire》， *Raison présente*， 1968， Repris dans *Structuralisme et Marxisme*， Paris， U.G.E.， collection 《10/18》， 1970， 317p.， p.165 et suivantes.

△《英雄，传说与历史》

—《Le héros， la légende et l'histoire》，*La Pens ée*，1969， n°143， p.37 à 61.

△《从伏尔泰到狄德罗，或者“什么是哲学家？”》

—《De Voltaire à Diderot， ou “Qu'est-ce qu'un philosophe？”》，*Revue de collaboration franco -japonaise*（*Nichifutsu Bunka*）， 1969， n°24， p.1 à 27.Voir aussi *Anais de Historia*， Faculdade de Filosofia，ciencias e letras de Assis， 1970， n°2， p.115 à 146.

△《大革命在当时世界的历史地位》

—《La Révolution dans I'histoire du monde contemporain》， *L 'Information historiquc*， 1969， n° 3， p.107 à 123. Voir aussi *Studien über die Revolution*，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69， p.62 à 93；*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1970， n°62， p.1 à 40；
Lefebvre（Georges），*Ouatrevingt -neuf*， *op .cit .*， postface， p.249 à 303.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 p.349 à 380.

△《共济会与法国大革命》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vant-propo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69， n°3，p.373 à 377.

△《农民运动与土地骚乱（1789年至19世纪中期）》

—《Mouvements paysans et troubles agraires（1789—milieu de ⅪⅩ^e^ siècle）》， *Rapport pr ésent é en* 1969 *devant la section fran çaise de la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 sociales*（*enqu ête sur*《*Mouvements paysans et probl èmes agraires de la f*

XVIH e si è*cle* à *nos jours* ）.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uns* …， *op .cit* .， p.n67 à 292.

△《农民运动与“封建制”，从旧制末期至19世纪中期》

—《Les Mouvements paysans et la “féodalité”， de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vers le milieu du xⅠx^{e} siècle》， *Rapport pr* é*sent* é *au* Ⅹ -1.45*mm* Ⅷ *e Congr* 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 Moscou， 1970. Repri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337 à 345（version abrégée）.

△《农民运动与封建制 从旧制度末期至19世纪中期》

—《Mouvements paysans et Féodalité. De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vers le milieu du xix^{e} siècle》，*La Pens* é*e* ， 1970， n°149， p.56 à 72.

△《梅叶和他所处的时代》

—《Meslier et son temps》， *La Pens* é*e* ，1970， n° 151， p.39 à 66.

△《英雄与历史》

—《Le Héros et l'Histoir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 ç*aise* ， 1970， n° 1， p.1 à 7. Voir aussi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 1970， tome ⅩⅦ， colloque *La France* à *l* 'é*poque napol* é*onienne* ， Sorbonne， octobre 1969， p.333 à 338.

△《“旧制度的封建制”问题 关于18世纪封建捐税》

—《Problèmes de la “feodalité d'Ancien Régime” . Note sur le prélèvement féodal au xvllll^{e} siècle》， *L* '*Abolition de la* “*F* é*odalit* é” *dans* *monde occidental* ， Paris， C.N.R.S.， 1971，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Toulouse， novembre 1968， tome Ⅰ， p.115 à 127.

△《法国大革命与封建制：封建捐税》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féodalité， le prélèvement féodal》，*Sur le f éodalisme*， Paris，Editions sociales，1971， Journée d'études du C.E.R.M.， avril 1968， p.73 à 85.

△《革命国家的问题 从法国大革命到1871年公社》

—《Problèmes de l'Etat révolution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la Commune de 1871》，*La Pens ée*， 1971， n° 158， p.3 à 21（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au colloque sur la Commune de 1871， Varsovie， avril 1971）.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p.81 à 107.

△《从共和二年到1871年公社 法国的双重革命传统》

—《De l'an Ⅱ à la Commune de 1871.La double tradition révolutionnaire français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1， n°4， p.535 à 553.Voir aussi 《L'An deux》， *Le Mouvement social*， 1972， n°79， Colloque universitaire pour le centena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Paris， mai 1971， p.15 à 31.

△《让·默弗雷，1901—1971年》

—《Jean Meuvret， 1901-1971》， *Revue d '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972， tome ⅩⅨ， p.1 à 5.

△《19世纪前的劳动》

—《Le Travail jusqu'au ⅩⅨ^{e} siècle》， *La France et les Fran çais*， Paris， Gallimard，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1972， sous la

direction de MichelFrançois， 《L'Organisation du travail du ⅩⅧe au xxe siècle》， par Jean Bruhat et Albert Soboul， p.348 à 390.

△《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社会批评和乌托邦》

—《Lumières， critique sociale et utopie pendant le ⅩⅧe siècle français》， *Histoire g* é*n* é*rale du socialisme* ， Paris， P.U.F.， 1972， sous la direction de Jacques Droz， tome Ⅰ， p.103 à 194.

△《乌托邦与法国大革命》

—《Utopie et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bid* .， p.195 à 254.

△《现实与新观念》

—《Réalités et idées neuves》， *Manuel d 'histoire litt* é*raire de la France* ，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2， sous la direction de P.Abraham et R.Desné， tome Ⅳ， 1789-1848， 1re partie， p.17 à 58.

△《争取平等的斗争，1793年》

—《Les luttes pour l'Egalité， 1793》， *Quatre -Vingt -Treize* ， Romorantin-Paris， Editions Martinsart， collection 《L'Humanité en marche》， 1972， p.29 à 130.

△《关于一篇新论文 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

—《A propos d'une thèse récente. Sur le mouvement pay san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73， n° 1， p.85 à 101. 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117 à 134.

△《保罗-路易·库里埃与法国大革命阅读笔记》

—《Paul-Louis Courier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tes de lectur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3， n°4， p.528 à 538

△《法国大革命 民族问题与社会现实》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roblème national et réalitsés sociales》， *Actes du colloque* 《*Patriotism*， *et Nationalisme en Europe* à l'é*poque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et de Napol* é*on* 》， Paris， 1973， *op .cit .*， p.29 à 58.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 p.247 à 283.

△《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运动》

—《Sur le mouvement paysan dans la Revolution》， *La Pens* é*e*， 1973， n° 168， p.97 à 108.

△《共济会与法国大革命》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Pens* é*e*， 1973， n°170， p.17 à 26.

△《马赛尔·雷纳尔（1899—1973年）》

—《Marcel Reinhard（1899-1973）》，*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4， n° 1， p.1 à 2.

△《平等 口号的力量和危险性》

—《Egalité.Du pouvoir et des dangers des mot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4， n°3， p. 371 à 379.Voir *Th*

Consortium o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50-1850. *Proceedings* 1974，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es of Florida， 1978， p.13 à 21，《Equality： On the Power and Danger of Words》.

△《从启蒙时期到大革命时期的科西嘉》

—《La Corse des Lumières à la Révolution》，avant-propos，*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èaise*， 1974， n°4， …， op.cit.， p.481 à 482.

△《革命国家的几个问题，1789—1796年》

—《Some problem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1789-1796》， *Past and Present*， 1974， n°65， p. 52 à 74.

△《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史学 关于最近的论争》

—《L'Historiographie class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ur des controverses récentes》，*La Pens ée*， 1974， n°177， p.40 à 58.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323 à 345.

△《共济会与法国大革命》

—《La Franc-Maçonneri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M élanges Lesnodorski*， Varsovie， 1974， p.381 à 392.

△《一个见证：保罗-路易·库里埃与大革命》

—《Un témoignage： Paul-Louis Courier et la Révolution》 ，*Paul - Louis Courier . Actes du colloque de Sorbonne*， novembre 1972， Véretz，1974， p.55 à 65.Repris dans *Probl émes paysans* …， *op .cit .*， p.167 à 180.

△《法国大革命史的理论问题》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Aujourd 'hui l 'histoire*，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4， 349 p.，ouvrage collectif sous la direction d'A.Casanova et F.Hincker， p.261 à 272.

△《法国大革命 历史的解释与科学问题》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nterprétations historiques et problèmes scientifique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1974.

△《阿尔贝·马迪厄——乔治·勒费弗尔 纪念他们诞辰100周年（1874—1974年）》

—《Albert Mathiez-Georges Lefebvre. Pour le centième anniversaire de leur naissance（1874-1974》），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5， n° 1， p.1 et 2.

△《回顾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生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

—《Le Parcours d'une vie d'historien. Georges Lefebvre（1874-1959》）， *La Pens ée*， 1975， n° 181， p.14 à 34.

△《乔治·勒费弗尔（1874—1959年）纪念他诞辰100周年》

—《Georges Lefebvre（1874-1959）. Pour le 100e anniversaire de sa naissanc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5， n° 2， p.177 à 202. Partiellement 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431 à 440.

△《1818年与第二共和国》前言部分

—《1848 et la seconde République》， avant-propos（avec Maurice Agulh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5， n°4 p.497 et 498.

△《法国的农村公社问题（18—19世纪）》

—《Problèmes de la communauté rurale en France（ⅩⅧ^{e} - ⅩⅨ^{e} siècles）》， *Ethnologie et Histoire . Forces productives et probl èmes de transition*， Paris， Editions sociales， 1975， p.369 à 395. 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183 à 214.

△《雅各宾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或未成功的土地革命》

—《L'Italie jacobine et napoléonienne ou la révolution agraire manquée》，*Annuario dell ' 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l 'Et à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Roma， 1975， volume ⅩⅩⅢ-ⅩⅩⅣ， Rapport présenté au colleque de Rome（mars 1974）sur l'Italie jacobine et napoléonienne， p.45 à 63.Repris dans *Probl èmes paysans …*， *op .cit .* p.373 à 392.

△《关于法国18世纪乌托邦历史的笔记》

—《Notes pour uue histoire de I'utopie en France au ⅩⅧ^{e} sièc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6， n° 2， p.161 à 17 Repris dans Hartig （Irmgard）et Soboul（Albert）， *Pour une histoire de l 'utopie …*， *op .cit .*， Paris， 1977， p.5 à 28.

△《启蒙时期的罗马尼亚人国家……》

—《Les pays roumains à l'âge des Lumières…》， *avantpropo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6， n°3， p.321 et 32

△《关于安托万·佩尔蒂埃的一篇文章……》

—《Sur un article d'Antoine Pelletier…》， *La Pensée*， 1976， n° 187， p.36 et 37.

△《关于米歇尔·格尔农和雷吉娜·罗班的一篇文章……》

—《Sur l'article de Michel Grenon et Régine Robin…》 *ibid*.， p.31 à 35.

△《革命的冲击，1789—1797年》

—《Le Choc révolutionnaire， 1789-1797》，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Paris， P.U.F.， 1976， tome 3， 1789—*années* 1880， 1er volume， p.3 à 64， publié sous la direction de Braudel（Fernand）et Labrousse （Ernest）.

△《经济复兴和社会稳定，1797—1815年》

—《La Reprise économique et la stabilisation sociale， 1797-1815》， *ibid*.， p.65 à 133.

△《阿尔贝·马迪厄（1874—1932年）第戎讨论会，1974年11月》

—《Albert Mathiez（1874-1932），Colloque de Dijon， novembre 1974》，*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7， n° 1， p et 2.

△《雅各宾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前言部分

—《L'Italie jacobine et napoléonienne》， avant-propos（avec Armando Saitta），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77

n° 4，p.501 et 502.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法国大革命和过渡的道路问题》

—《Du f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problématique des voies de passage》， *La Pens ée*， 1977， n° 196， p.61 à 78.

△《法国大革命中的土地问题》

—《Problèmes agrair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Contributions* à *l 'histoire paysanne*， *op .cit* .， Paris， 1977， p.9 à 43.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

—《Contribution à propo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obb（Maurice）et Sweezy（Paul M.）， *Du f éodalisme au capitalisme* : *probl èmes de la transition*， Paris， 《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1977， 2 volumes， tome 1， p.227 à 238. Voir aussi *Comprendre la R èvolution* …， *op .cit* .， p.71 à 79.

△《从旧制度到大革命 地区性问题和社会现实》

—《De l'Ancien Régime à la Révolution. Problème régional et réalités sociales》， *R égions et r égionalisme en France du* Ⅹ -1.45*mm* Ⅷ^{e} *si 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P.U.F.，1977， p.25 et suivantes.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 p.215 à 245.

△《巴贝夫、巴贝夫主义和平等派的密谋》

—《Babeuf， le babouvisme et la Conjuration des Egaux》，*Oeuvres de Babeuf*， *op .cit* .， Paris， 1977， tome Ⅰ， p.7 à 22.

△《罗伯斯庇尔或雅各宾主义的矛盾》

—《Robespierre ou les contradictions du jacobinism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8， n° 1， p.1 à 19.

△《卢梭主义的影响所及和实用主义 大革命的预言家们（1788—1795年）》

—《Audience et pragmatisme du rousseauisme，Les Almanachs de la Révolution（1788-1795）》，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 1978， n° 4， p.608 à 640， en collaboration avec Gundula Gobel.

△《法国大革命和平等》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galité》， *Lendemains*，1978， n °12. Repris dans *C 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op .cit .*， p.371 à 380.

△《饶勒斯、马迪厄和法国大革命史》

—《Jaurès， Mathiez et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79， n° 3， p.443 à 454. 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 p.287 à 298.

△《开明专制的历史功能》

—《Sur la fonction historique de l'absolutisme éclairé》， Rapport de synthèse présenté a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pour le bicentenaire de la mort de Voltaire et Rousseau， Paris， juillet 1978，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9， n°d， p.519 à 534.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 cit .*， p.9 à 23.

△《共和二年巴黎各区妇女的斗争活动》

—《Sur l'activité militante des femmes dans les sections parisiennes en l'an Ⅱ》， *Bulletin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 année 1979， Paris， 1980， p.15 à 26.Repris dans *Comprendre la Révolution*…， *op.cit.*， p.203 à 214.

△《大革命的启示：农民问题与资产阶级革命》

—《Alla luce della Rivoluzione： problema contadino erivoluzione borghese》， *La Rivoluzione Francese*， *problemi storici e metodologici*， Milano， Franco Angeli Editore， 1979， Quaderni della Fondazione Basso， p.99 à 128.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

—《Zum problem des Übergangs Vom Feudatlismus zum Kapitalismus》（voir La Penske 1956， n°65，p.26）， 《Uber die Bauernbewegung》（voir *A.H.R.F.*， 1973， n°1， p.85）， *Gebur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789， Frankfurt-am-Main，1979，textes de E.Labrousse，G.Lefebvre，M.Dommanget， M.Vovelle et A.Soboul， réunis pat Irmgard Hartig， p.171 à 180 et 181 à 198.

△《阿纳夏尔西·克罗茨，人类的演讲者》

—《Anacharsis Cloots. L'Orateur du genre humai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0， n°1，p. 29 à 58.

△《关于克洛德·马佐里克的研究工作》

—《Sur les travaux de Claude Mazauric》，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I*

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0， n° 3， p.473 à482.

△《旺代叛乱的起源》

—《Aux origines de la Vendée》， *Echange*， 1080. Repris dans *Vendée -Chouannerie*， Nantes， Reflets du Passé， 1981， p.127 à 181.

△《关于旺代叛乱的社会根源》

—《Aux origines sociales de l'insurrection vendéenne》，*La Pensée*，1980， n°215， p.132 à 150.

△《“要求平均地权”的农民与法国大革命》

—《Les Paysans 〈partageux〉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Histoire*， 1980， n° 26， p.30 à 37.

△《拿破仑时期的大地产》

—《La Grande Propriété foncière à l'époque napoléonienne》，*Annales historiques a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81， n° 3， p.405 à 418（en collaboration avec Anne-Marie Boursier）.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Présenc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Joseph Barc*（1779-1793）…， *op .cit .*， Paris， 1981， p.9 à 18.

△《关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红色神甫”》

—《Sur les “curés rouges” dan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ine Jury für Jacques Roux . Dem Wirken Walter Markovs Gewidme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81， p.21 à 33. Repris dans *Comqrendre la R évolution …*， *op .cit* ，p.187 à 201.

△《什么是大革命？》

—《Qu'est-ce que la Révolution？》， *La Pens ée* ， 1981， n° 217/218， p.33 à 45.

△《大革命时期的宗教意识 格雷古瓦修士（1750—1831年）》

—《Une conscience religieuse au temps de la Révolution. L'abbé Grégoire（1750-1831）》， *La Pens ée* ， 1981， n° 221-222， p.161 à 172.

△《群伴暴力与社会关系——革命群众（1789—1795年）

—《Violence collective et rapports sociaux.Les foules révolutionnaires（1789-1795）》， *Cahiers d 'histoire de l 'I .R .M .*， 1981， n° 5（39）， p.155 à 174.

△《拿破仑面前的西班牙：一场未成功的革命？》

—《L'Espagne face à Napoléon： une révolution manquée？》， *La Invasib Napole ònica* ，Bellaterra， Publicacions de la 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 1981，colloque de I'Université autonome de Barcelone，décembre 1980， p.185 à 198.

△《拿破仑，伟人与历史》

—《Napoléon，le grand homme et l'histoire》， *La Pens ée* ，1982，n° 228， p.97 à 103.

△《乔治·库通》

—《Georges Couthon》（titre à préciser），conférence prononcée au Colloque Couthon， Orcet-Clermont， décembre 1981，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à paraître.

△《塔利安夫人》

—《Madame Tallien》， conférence prononcée à l'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Fontenay-aux-Roses， 19 juin 1982， á paraître.

6.其他文章

△《关于共和二年反对各委员会的势力》

—《Sur l'opposition aux Comités en germinal an Ⅱ》，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0， n° 4， p.365.

△《关于给罗伯斯庇尔的一封信》

—《Sur une lettre adressée à Robespierre》， *ibid* .， p.366.

△《关于热月九日》

—《Sur le 9 thermidor》， *ibid* .， p.366.

△《关于热月九日夜库通的负伤》

—《Sur la blessure de Couthon dans la nuit du 9 thermidor》， *ibid* .， p.367.

△《关于圣茹斯特年幼时被禁闭在教养所一事》

—《Sur la détention du jeune Saint-Just dans une maison de

correc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1， n° 1， p.87.

△《关于比佐的财产》

—《Sur la fortune de Buzo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lion fran çaise*， 1951， n°2， p.181.

△《戈尔萨的财产》

—《La fortune de Gorsas》， *ibid* .， p.183.

△《关于热月九日》

—《Sur le 9 thermidor》， *ibid* .， p.189.

△《关于吉伦特派的财产：佩蒂翁》

—《Sur la fortune des Girondins， Pe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1， n° 3， p.298.

△《关于玛丽-约瑟夫·谢尼埃的“蒂莫莱昂”》

—《Sur le “Timoléon” de Marie-Joseph Chénier》，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lion fran çaise*， 1952， n°4， p.420.

△《关于共和三年牧月的日子》

—《Sur les journées de prairial an Ⅲ》， *ibid* .， p.421.

△《絮雷恩教区的陈情书》

—《Le Cahier de doléances de la paroisse de Suresn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4， n° 2， p.168.

△《安德烈·谢尼埃在圣拉扎尔的入狱登记》

—《L'Ecrou d'André Chénier à Saint-Lazare》， *ibid* .， p.174.

△《共和二年格拉古·巴贝夫在圣佩拉吉的入狱登记》

—《L'Ecrou de Gracchus Babeuf à Sainte Pélagie en l'an Ⅱ》， *ibid* .， p.175.

△《“巴黎省革命与法定当局”向国民公会的上书（1793年6月2日）》

—《L'Adresse des “autorités révolutionnaires et constituées du département de Paris”， à la Couvention（2 juin 1793）》， *ibid* ., p.179.

△《关于吉伦特派的财产》

—《Sur la fortune des Girondin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çaise*， 1954， n° 3， p.257.

△《关于共和四年时波拿巴将军的见证》

—《Témoignage sur le général Bonaparte en l'an Ⅳ》，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5， n° 4， p.380.

△《共和二年的清洗调查表》

—《Questionnaires pour l'epuration en l'an Ⅱ》，*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0， n°1， p.74.

△《农村的无套裤汉和乡间资产阶级》

—《Sans-culottes des campagnes et bourgeoisie rural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7， n° 2， p.167.

△《下朗格多克的恐惧（1789—1790年）》

—《La Peur en Bas-Languedoc（1789-1790）》，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çaise*， 1959， n° 2， p.162.

△《圣茹斯特给公证人加罗·德·库西的一封信》

—《Une lettre de Saint-Just au notaire Garot de Coucy》，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62， n° 2， p.223.

△《圣茹斯特的一项声明》

—《Une proclamation de Saint-Just》， *ibid* .

△《圣茹斯特的一份亲笔原稿》

—《Une minute autographe de Saint-Just》， *ibid* ., p.225.

△《巴贝夫的一封信》

—《Une lettre de Babeuf》，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63， n°1， p.75.

△《巴贝夫给妻子的一封信》

—《Une lettre de Babeuf à sa femme…》， *ibid* ., p.78.

△《巴贝夫给埃齐恩的一封信》

—《Uae lettre de Babeuf à Héslne…》， *ibid* .， p.79.

△《耶稣、马拉和巴贝夫》

—《Jésus， Marat et Babeuf》，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4， n°1， p.100.

△《罗伯斯庇尔与1851年的共和行动》

—《Robespierre et l'action républicaine en 1851》， *ibid* .， p.102.

△《旧制度末期下普瓦图的初级教育》

—《L'instruction primaire en Bas-Poitou à la fin de l'Aucien Régim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4， n° 4， p.498.

△《罗伯斯庇尔家人的通信》

—《Correspondance des Robespierr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6， n° 3， p.421.

△《巴贝夫手稿和出版物清单补遗》

—《Supplément à l'*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 é*s de Babeuf* 》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 1968， n° 4， p.540.

△《巴贝夫反对圣体瞻礼活动，1793年5月》

—《Babeuf contre la procession de la Fete-Dieu， mai 1793》， *ibid* .， p.543.

△《共和三年巴贝夫在阿腊斯的博代监狱》

—《Babeuf à la prison des Baudets d'Arras en l'an Ⅲ》， *ibid .*，p.545.

△《马拉尸体解剖记录》

—《Procès-verbal d'autopsie de Marat》，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1， n° 1， p.144.

△《阿纳夏尔西·克罗莰的一封信》

—《Une lettre d'Anacharsis Cloots…》，*ibid .*， p.145.

△《关于封建捐税》

—《Sur le prélèvement féodal》，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4， n° 3， p.412.

△《1960年时的封建残余》

—《Survivances féodales en 1960》，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7，n° 1， p.102.

7.论著评介

△《让-保尔·马拉》《施勒著）

—Scheler（Lucien）， *Jeah -Paul Marat*， Paris， 1945， *La Pens é*， 1946， n° 6， p.150.

△《斯巴达克斯》（凯特勒著）

—Koestler（Arthur）， *Spartacus*， Paris， s.d.， *La Pens ée*， 1946， n° 8， p.123.

△《上卢瓦尔省的农民生活》（鲁雄著）

—Rouchon（Ulysse）， *La Vie paysanne dans la Haute -Loire*， Le Puy， 1933-1941， *La Pens ée*， 1946， n° 9， p.140.

△《新民主》

—Démocratie nouvelle， *La pens ée*， 1947， n° 13， p.107.

△《苏联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菲谢尔著）

—Fichelle（André）， *G éographie physique et économique de l 'U .R .S .*， Paris， 1946， *La Pens ée*， 1947， n° 13， p.133.

△《法国农业问题……》（迪蒙著）

—Dumont（René）， *Le Probl ème agricole fran çais …*， paris， 1946，*La Pens ée*， 1947， n° 14， p.133.

△《上布列塔尼的面貌与农民》（苏伊埃著）

—Souillet（Guy）， *Pays et Paysans de Haute -Bretagne*， s.l.n.d.， *Pens ée*， 1948， n° 16， p.131.

△《法国的犹太人》（昂谢尔著）

—Anchel（Robert）， *Les Suifs de France*， Paris， 1946， *La Pens*， 1948， n° 18， p.139.

△《路易·达维德》（恩贝尔著）

—Humbert（Agnès）， *Louis David*， Paris， s.d.， *ibid .*， p.147.

△《日耳曼中欧的经济》（克洛齐埃著）

— Clozier（René）， *L 'Economie de l 'Europe centrale germanique* ， Paris， 1947， *La Pens ée* ， 1948， n° 20， p.144.

△《法国的边界》（迪翁著）

—Dion（Roger）， *Les Fronti ères de la France* ， Paris，1947， *La Pens ée* ， 1948， n° 21， p.143.

△《法国农业史……》（格罗马著）

—Gromas（Raymond），*Histoire agricole de la France* …， Mende， 1947， *La Pens ée* ， 1949， n° 22， p.138.

△《马蒂厄·德·东巴尔》（塞尔克莱著）

—Cercler（René）， *Mathieu de Dombasle* ， Paris，1945， *La Pens ée* ， 1949， n° 23， p.141.

△《农民……》（谢瓦利埃著）

—Chevalier（Louis）， *Les Paysans* …， Paris， 1947， *La Pens ée* ， 1949， n° 24， p.134.

△《近代社会的形成》（萨尼亚克著）

—Sagnac（Philippe），*La Formation de la societe moderne* ， tome Ⅱ， Paris， 1946， *ibid* .， p.135.

△《圣茹斯特……》（卡尔韦著）

—Calvet（Henri）， *Saint -Just* …， Monaco， 1949，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çaise， 1950， n° 3， p.279.

△《吉伦特派……》（莱勒蒂埃著）

—Lhéritier（Michel）， *Les Cirondins* …， Monaco， 1950，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51， n°2， p.203.

△《韦尼奥》（莱勒蒂埃著）

—Lhéritier（Michel）， *Vergniaud*， Monaco， 1950， *ibid*.， p.203.

△《罗伯斯庇尔》（卡尔韦著）

—Calvet（Henri）， *Robespierre*， Monaco， 1950， *ibid*.， p.207.

△《文集，1931年6月—1932年2月》（多列士著）

—Thorez（Maurice）， *Oeuvres*， *juin* 1931-*f évrier* 1932， *La pens ée*， 1951， n° 35， p.127.

△《文集，1932年3—5月》（多列士著）

—Thorez（Maurice）， *Oeuvres*， *mars -mai* 1932， *La Pens ée*， 1951， n° 37， p.119.

△《关于R·鲁的一篇文章》

—《A propos d'un article de R.Roux…》，*Annales*， 1952， n° 4.

△《20个世纪的历史》（索雷尔著）

—Saurel（Louis）， *Vingt si ècles d 'fiistoire*， Paris， 1952， *La Pe*

ée， 1953， n° 46， p.149.

△《观察工人运动》（卡塞尔和马尔凯著）

—Caceres（B.）et Marker（C.）， *Regards sur le mouvement ouvrier*， Paris， 1951， *ibid*.， p.150.

△《新战士即将崛起》（扎波托基著）

—Zapotocky（A.）， *De nouveaux combattants se lèveront*， Paris， 1952， *La Pensée*， 1953， n° 47， p.154.

△《英国农村史》（洛德·厄恩利著）

—Lord Ernle， *Histoire rurale de l'Angleterre*， Paris， 1952， *La Pensée*， 1953， n° 48/49， p.306.

△《多瑙河口热那亚人的作用……》（康皮纳著）

—Campina（B.）， *Le Rôle des Génois aux bouches du Danube* …， Bucarest， 1953， *La Pensée*， 1954， n° 53， p.148.

△《论贝里农村的社会阶层》（沃尔科维施著）

—Wolkowitsch（Maurice）， 《Essai sur les catégories sociales à la campagne en Berry》， *Norois*， 1954， *La Pensée*， 1958， n° 63， p.146.

△《德意志作家看法国大革命……》（布歇著）

—Boucher（Mauric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ue par les écrivain allemands* …， Paris， 1954，*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

，1956，n° 2，p.220.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Annales historiqu 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60，n° 3，p.342.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ibid*.，1961，n° 4，p.409.

△《埃贝尔，迪歇纳老爹……》（雅各布著）

—Jacob（Louis），*H ébert*，*le P ère Duchesne*…，Paris，1960，*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62，n° 1，p.110.

△《地方研究专栏》

—《Chroniques des études locales》，*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64，n° 4，p.523.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Annales histob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1965，n° 2，p.231.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ibid*.，1966，n° 3，p.467.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ibid*.，1967，n° 4，p. 542.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Annales historig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ç*aise*， 1968， n° 3， p.416.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ibid*.， 1968， n°4， p.561.

△《经济史研究……》（默弗莱著）

— Meuvret（Jean）， *Etud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 paris， 1971，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2， n° 2， p.28

△《君主制度的崩溃……》（沃韦尔著）

—Vevelle（Michel），*La chute de la Monarchie* …， Paris， 1972，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2， n° 2， p.297.

△《雅各宾共和国……》（布卢瓦佐著）

— Bouloiseau（Marc）， *La R* é*publique jacobine* …， Paris， 1972， *ibid*.， p.297.

△《欧洲旧制度下的贵族与权力》（梅耶著）

— Meyer（Jean）， *Noblesses et pouvoirs dans l'Europe d'Ancien R* é*gime*， Paris， 1973，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5， n° 2， p.303.

△《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所西代斯基藏书》

—《La bibliothèque Sidersky à l'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ibid*.， n° 3， p.486.

△《说明》

—《Notic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77， n° 3， p.483.

△《图书简介》

—《Notices bibliographiqu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 évolution fran çaise*， 1980， n° 1， p.154.

---

[1] 为方便读者查考，我们将著作的标题译成中文，同时将其外文标题和出版状况附上。——译者

法汉人名对照表

A

Admirat 阿德米拉

Aiguillon（duc d'）埃吉荣公爵

Alexandre亚历山大

Allarde（d'） 达拉尔德

Alvinczy阿尔温克奇

Amar阿马尔

Ancard昂卡尔

Anselme昂塞尔姆

Antonelle安托奈尔

Antraigues（d'）当特雷格

Arbulot阿尔比洛

Arnouville

（Machaul td'）达尔努维尔

（马肖）

Aubry奥布里

Audoin奥杜安

Augereau奥日罗

Aulard奥拉尔

Azéma阿泽马

B

Babeuf巴贝夫

Bara巴拉

Barbarowx巴巴卢

Barbé-Marbois巴尔贝-马尔

波瓦

Barentin巴朗坦

Barère巴雷尔

Barnave巴纳夫

Barras巴拉斯

Barruel巴吕耶尔

Barthélemy巴泰勒米

Basire巴齐尔

Bassville巴斯维尔

Batz（baron de）巴茨男爵

Baudot博多

Baudray博德雷

Bauwens博温斯

Bailly巴伊

Bayle（Moyse）贝勒（穆瓦斯）

Beauharnais 博阿尔内

Beaulieu博利厄

Beaurepaire 博勒佩尔

Bénézech贝内泽克

Bentham边沁

Bérenger贝朗瑞

Bernadotte贝尔纳多特

Bernier贝尔尼

Bernis贝尼斯

Berthelot

（Marcelin）贝特洛

（马赛兰）

Berthier贝蒂埃

Berthollet贝尔多莱

Bertin贝尔坦

Bertrand贝特朗

Beurnonville 伯尔农维尔

Billaud-Varenne比约-瓦雷恩

Biron比隆

Blaise布莱斯

Blake布莱克

Blanqui布朗基

Bloch（Marc）布洛克（马克）

Bodin博丹

Boisgelin布瓦日兰

Boisset布瓦塞

Boissy d'Anglas布瓦西·当

格拉

Bonald博纳尔

Bonaparte

（Napoléon）波拿巴

（拿破仑）

Boncerf邦塞

Bonchamp邦尚

Bonneville博纳维尔

Bossuet博絮埃

Bouchotte布肖特

Bouillé布耶

Boulet布莱

Bourbolte布尔博特

Bourbons波旁家族

Bourdon（Lénard）布尔东（莱奥

纳尔）

Bourgoing布古安

Boursault布尔索

Boyd（Walter）博伊德（瓦尔特）

Boyer-Fonfrède布瓦耶-丰弗

雷德

Boze博兹

Breteuil布勒特伊

Brienne

（Loménie de）布里埃纳

（洛梅尼·德）

Briez布里耶

Brissot布里索

Broglie布罗格利

Brottier布罗基耶

Brueys布律耶斯

Brune布吕纳

Brunel

（Françoise）布律内尔

（弗朗索瓦兹）

Brunot

（Ferdinand）布吕诺

（费迪南）

Brunswick（ducde）布伦斯维克

公爵

Brutus布鲁图

Buffon布丰

Buissart布依萨

Buonarroti邦纳罗蒂

Burke伯克

Burns彭斯

Buzot比佐

C

Cabanis卡巴尼

Cabarrus卡巴吕斯

Cadoudal卡杜达尔

Calonne卡洛纳

Cambacérès 康巴塞雷斯

Cambon康邦

Camus卡米

Canclaux康克洛

Camot卡诺

Caron（Pierre）卡隆（皮埃尔）

Carra卡拉

Carrier 卡里耶

Carteaux卡尔托

Castres

（Sabatier de）卡斯特尔

（萨巴蒂耶·德）

Cathelineau 卡特利诺

Catherine Ⅱ 叶卡特琳娜二世

Cazalès卡扎莱斯

César恺撒

Chabot夏博

Chalier夏利耶

Chambon尚邦

Chainpionnet 尚皮奥奈

Chaptal夏普塔尔

Charette夏雷特

Charles（archiduc）查理大公

Charles Ⅳ 查理四世

Charles Ⅸ查理九世

Charpentier

（Marie）夏庞蒂耶

（玛丽）

Chartre（duc de）夏特尔公爵

Chasles夏斯勒

Chasset夏塞

Chateaubriand夏托布里昂

Chaumette

（Anaxagoras）肖梅特

（阿纳克萨戈拉）

Chauvelin肖夫兰

Chénier

（Marie-Joseph） 谢尼埃

（玛丽-约瑟夫）

Cherubini谢吕比尼

Chesnaux谢诺

Cicé（Champion de）西塞

（尚皮翁·德）

Clavière克拉维埃尔

Clerfayt克莱费

Clermon-Tonnerre

（comte de）克莱蒙-托内

尔伯爵

Clique（Jacob）克利克（雅各布）

Cloots（Anacharsis）克罗茨（阿纳夏尔西）

Gobenzl科本兹尔

Cobourg科布尔

Cochon科雄

Colbert科尔贝尔

Coleridge柯勒律治

Colli科利

Condé（prince de）孔代亲王

Condillac孔迪雅克

Condorcet孔多塞

Cohstant贡斯当

（Benjamin）（邦雅曼）

Corday（Charlotte）科代（夏洛特）

Corneille高乃依

Coupé库佩

Courbis库尔比

Courtois库图瓦

Couthon库通

Custine居斯蒂纳

Cuvier居维埃

D

Daendels达昂代尔

Dalayrac达莱拉克

Dalbarade 达尔巴拉德

Dampierre

（coomte de）当皮埃尔伯爵

Dansard当萨尔

Dandré当德雷

Danton丹东

Darthé达尔泰

Dauchy多希

Daunou多努

David达维德

Davout达武

Delacroix德拉克鲁瓦

Delambre德朗布尔

Delaunay德洛内

De Lessart德莱萨尔

Delille德利尔

Delorme德格尔姆

Descartes笛卡儿

Descombes代孔布

Desfieux德菲厄

Desmoulins

（Camille）德穆兰

（卡米耶）

Destutt de Tracy德斯蒂·德·特拉西

Diderot狄德罗

Dietrich迪特里希

Dillon狄龙

Dobsen多布桑

Dodun（madame de）多登夫人

Dolivier多利维尔

Doué（Foulon de）杜埃（福隆·德）

Drouet德鲁埃

Dubois-Crancé迪布瓦-克朗塞

Dubuisson迪比松

Duchesne迪歇纳

Dueos（Roger）迪科（罗歇）

Ducroquet迪克罗凯

Dufourny迪富尔尼

Dugommier迪戈米埃

Duhem迪昂

Dumas迪马

Dumont（André）迪蒙（安德烈）

Dumouriez迪穆里埃

Du Pan（Mallet）迪庞（马莱）

Duphot迪福

Duplay迪普莱

Dupont de 杜邦·德·

Nemours内穆尔

Du Port（Adrien）迪波尔（阿德里安）

Dupuis迪皮伊

Duquesnoy迪凯斯努瓦

Duroy迪鲁瓦

Dussault迪索

Dural（Charles）迪瓦尔（夏尔）

E

Eckermann厄凯曼

Ecouchard-Lebrun

（dit Lebrun-Pindare）埃库沙尔-勒布伦（又名勒布伦-潘达尔）

Eglantine（Fabre d'）代格朗蒂纳（法布尔）

Elbée（d'）代尔贝

Emery埃默里

Engels恩格斯

Epinay（madame d'）德比内夫人

Epremesnil

（Dural d'）代普勒梅尼

（迪瓦尔）

Espagnac（abbé d'）代斯帕尼亚克修士

F

Fayau法约

Fénelon费内隆

Féraud费罗

Ferdinand Ⅲ费迪南三世

Fersen（Axel de）费尔桑（阿克塞尔·德）

Fellce弗利斯

Fichte菲希特

Flachat弗拉沙

Fleuriot-Lescot弗勒里奥-莱斯科

Fleurus弗勒吕斯

Fleury（Joly de）

Fonbranassot丰布吕纳弗勒里（若利·德）

Forster福斯特

Fosseux福瑟

Fouché富歇

Foullon de Doué富隆·德·杜埃

Fouquier-Tinyille富基埃-坦维尔

Fox福克斯

Fragonard 弗拉戈纳尔

François Ⅰ 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Ⅱ 弗朗索瓦二世

Frédéric-弗雷德里希-

Guillaume Ⅱ威廉二世

Fréron弗雷隆

Frey弗雷

Freytag弗雷塔格

Frothé弗罗泰

G

Garat加拉

Garrau加罗

Gasparin加斯帕兰

Gaston加斯东

Gaxotte加克索特

Gensoné让索内

Germain日耳曼

Girbal吉尔巴尔

Girey-Dupré日雷-迪普雷

Gobel戈贝尔

Godoy戈杜瓦

Goethe歌德

Gohier戈耶

Goltz（comte de）戈尔茨伯爵

Gorsas戈尔萨

Gossee戈塞克

Goujon古戎

Grangeneuve格朗热纳夫

Grant格朗特

Greer（Donald）格里尔（多纳尔德）

Grégoire格雷古瓦

Grenellc格雷奈尔

Grenon（Michel）格勒农（米歇尔）

Grétry格雷特里

Greuze格勒兹

Guadet加代

Guillaume-Tell 纪尧姆-泰尔

Guillotin吉约坦

Guizot基佐

Gustave Ⅲ 居斯塔夫三世

Gustave Ⅳ 居斯塔夫四世

Guyot居约

Guzman居兹曼

H

Hamelin阿姆兰

Hanriot昂里奥

Hardenberg 哈登伯格

Hardy阿尔迪

Hassenfratz哈森弗拉茨

Haüy阿维

Hébert埃贝尔

Hegel黑格尔

Henri Ⅱ亨利二世

Henri Ⅳ亨利四世

Henry larivière亨利·拉里维埃尔

Herbois（Collotd'）代布瓦（科洛）

Herman埃尔芒

Hervétius 爱尔维修

Hervilly（d'）代尔维利

Hoche奥什

Horace贺拉斯

Houchard 乌夏尔

Houdon乌东

Howe豪威

Hugues（Victor）于格（维克多）

Humbert安贝尔

I

Isnard伊斯纳尔

Isoré伊佐雷

J

Jagot 雅戈

Jaillet雅叶

Jaurès（Jean）饶勒斯（让）

Jeannettes 雅奈特

Jéhu耶于

Joffre霞飞

Joséphine 约瑟芬

Julian朱利昂

Julien朱利安

Joubert儒贝尔

Jourdan儒尔当

K

Kant康德

Karamzine 卡拉姆津

Kaunitz考尼茨

Kellermann 凯莱曼

Kléber克莱贝尔

Klopstoek 克洛普施托克

Kock科克

Korsakov 柯萨科夫

Kosciuszko 科西乌斯科

Kray克雷

L

Labrousse

（Ernest）拉布鲁斯

（欧内斯特）

Lachauvetière拉舍夫蒂耶尔

Laclos拉克洛

Lacombe（Claire）拉孔布（克莱尔）

La Contat 拉孔塔

Lacoste拉科斯特

Laeretelle 拉克勒泰尔

Lacroix

（Sébastien）拉克鲁瓦

（塞巴斯蒂安）

La Fayette拉法夷特

Laharpe拉阿尔普

Lakanal拉卡纳尔

Lally-Tollendal拉利-托朗达尔

Lamark拉马克

Lamartine 拉马丁

Lambert

（madame de）朗贝尔夫人

Lamerville

（Heurtault de）拉梅维尔

（欧尔多·德）

Lameth

（Allexandre de）拉梅特

（亚利山大·德）

Lameth

（Charles de）拉梅特（夏尔·德）

La Meurthe

（Boulay de）拉默尔特

（布莱·德）

Lamoignon 拉穆瓦尼翁

Lanchère朗谢尔

Lange朗日

Langlois朗格卢瓦

Lanjuinais朗热内

Laplace拉普拉斯

La Revellière拉勒韦利耶尔

La Rochefoucauld-

Liancourt（duc de）拉罗什富科-

利昂库尔公爵

La Rochejaquelein拉罗舍雅克兰

Lasource拉苏尔斯

Launay洛内

Lavicomterie拉维孔特里

Lavoisier拉瓦西埃

Lebas勒巴

Lebois 勒布瓦

Lebon勒邦

Lebret勒布雷

Lebrun勒布伦

Lebrun-Tondu勒布伦通迪

Le Carpentier勒卡尔庞蒂埃

Le Chapelier勒夏普利埃

Léchelle莱谢尔

Leclerc勒克莱尔

Lecointre 勒库安特尔

Lecourbe勒库尔布

Lefebvre

（Georges）勒费弗尔

（乔治）

Legendre勒让德尔

Legrand勒格朗

Legray勒格雷

Leguinio勒基尼奥

Lemarchand（Guy）勒马尔尚（居伊）

Lenoir勒努瓦尔

Léon（Pierre）莱昂（皮埃尔）

Léopold Ⅱ莱奥波德二世

Lepeletier 勒佩勒蒂埃

Lequinio勒基尼奥

Lescuyer莱斯居耶

Lesueur勒絮尔

Letourneur 勒图尔纳

Levasseur 勒瓦瑟

Lézardière 莱扎迪埃尔

L'Hospital

（Michel de）洛皮塔尔

（米歇尔·德）

Liancourt（duc de）利昂库尔公爵

Lindet（Robert）兰代（罗贝尔）

Lisle（Rouget de）利尔（鲁热·德）

Littré利特雷

Louchef卢舍

Louis ⅩⅣ 路易十四

Louis ⅩⅤ路易十五

Louis ⅩⅥ 路易十六

Louis ⅩⅦ 路易十七

Louis ⅩⅧ 路易十八

louis-Philippe路易-菲利普

Loustalot（Elysée）卢斯塔洛（爱利泽）

Louvet卢韦

Loyseau卢瓦佐

Lozeau洛佐

Luckner吕克奈尔

M

Mably马布利

Mac-Donald麦克多纳尔德

Machaut马肖

Mack马克

Magallon马加隆

Magnier（Brutus）马尼耶（布鲁图）

Mailhe梅尔

Maillard马亚尔

Maistre

（Joseph de）梅特尔

（约瑟夫·德）

Malesherbes马尔泽尔布

Malmesbury马尔迈斯比里

Malouet马卢埃

Marat马拉

Marchais（Georges）马歇（乔治）

Maréchal（Sylvain）马雷夏尔

（西尔万）

Marie-Antoinnette玛丽-安托瓦内特

Marie-Caroline玛丽-卡罗琳娜

Marie-Thérèse玛丽-泰雷兹

Marlot（Joseph）马尔洛（约瑟夫）

Marmont马尔蒙

Marquant马尔康

Marx马克思

Masséna马赛纳

Mathiez（Albert）马迪厄（阿尔贝）

Maubeuge 莫伯热

Maupeou莫普

Maure莫尔

Maury莫里

Mazauric（Claude）马佐里克（克洛德）

Mazuel马聚埃尔

Méchain梅香

Méhée梅埃

Méhul梅于尔

Menou默努

Mercier（Sébastien）梅西埃（塞巴斯蒂安）

Merlin de Douai梅兰（杜埃人）

Merlin de 梅兰

Thionville（蒂翁维尔人）

Michel米歇尔

Michelet米什莱

Mignet米涅

Milord米洛尔

Mirabeau米拉波

Miranda米朗达

Molitor莫利托尔

Momoro莫莫罗

Moncey蒙塞

Monge蒙日

Monneron 莫纳隆

Montesquieu孟德斯鸠

Montesquiou孟德斯基乌

Montsabert

（Goislard de）蒙萨贝

（克瓦拉尔·德）

Moreau莫罗

Morelly摩莱里

Mortier莫尔蒂耶

Moselle摩泽尔

Moulins穆兰

Mounier穆尼埃

Moussard穆萨尔

Murat米拉

N

Narbonne

（comtedde）纳博纳伯爵

Necker内克

Nelson纳尔逊

Nemours

（Dupon de）内穆尔

（杜邦·德）

Neufchâteau

（François de）纳夏托

（弗朗索瓦·德）

Nivernais 尼维尔奈

Noailles（vicoillte）诺阿耶子爵

Noël诺埃尔

O

Oberkampf 奥贝尔康夫

Ochs奥克斯

Orléans（dtlc d'）奥尔良公爵

Ormesson

（Lefebvre d'）多梅松

（勒费弗尔）

Ossian奥西昂

Ouvrard乌弗拉

P

Pache帕施

Paine（Thomas）潘恩（托马斯）

Panckouke 庞库克

Paoli保利

Pâris巴里

Paul Ier 保罗一世

Paulet（Charles）波莱（夏尔）

Payan（Joseph）帕扬（约瑟夫）

Peltier佩尔蒂耶

Pereira佩莱拉

Périer（dit Milord）佩里埃（又名米洛尔）

Perregaux 佩勒戈

Pétion佩蒂翁

Philippe-Egalité菲利普-平等

Philippeaux菲利波

Pichegru皮什格吕

Pie Ⅵ庇护六世

Pinel皮奈尔

Pitt皮特

Platon柏拉图

Pointe（Noël）普安特（诺埃尔）

Polignac（duc de）波利尼亚克公爵

Polycarpe 波利卡普

Pompadour

（madame de）蓬帕杜尔夫人

Portalis波塔利斯

Précy普雷西

Priestley普里斯特莱

Prieur普里厄

Proli普罗利

Protogène 普罗托热纳

Prudhomme普律多姆

Prud'hon 普律东

Puisaye皮伊泽

Q

R

Rabaut-Saint-

Etienne拉博-圣艾蒂安

Ramel-Nogaret拉梅尔-诺加雷

Rapinat拉皮纳

Raynal雷纳尔

Rebecqui勒贝基

Récamier雷卡米埃

Régnier雷尼耶

Reinhard（Marcel）雷纳（马塞尔）

Renault（Cécile）雷诺（塞西尔）

René勒内

Reubell勒贝尔

Réveillon 雷维庸

Reymond雷蒙

Richard理查

Richet（Denis）里谢（德尼）

Richier里希耶

Riquetti里凯蒂

Rivarol里瓦罗尔

Robert（Hubert）罗贝尔（于贝尔）

Robespierre

（Augustin）罗伯斯庇尔

（奥古斯坦）

Robespierre

（Maximilien）罗伯斯庇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in（Régine）罗班（雷吉纳）

Rochambeau罗尚博

Roederer罗德里

Roland罗兰

Romme罗姆

Ronsin龙森

Rossignol罗西尼奥尔

Rousseau卢梭

Roux（Jaeques）鲁（雅克）

Rovère罗韦尔

Royer鲁瓦耶

Royou鲁瓦尤

Rudé（Georges）吕代（乔治）

Ruhl吕尔

S

Sagnac 萨尼亚克

Sailly（Jeanson de）赛伊（让松·德）

Saint-André

（Jeanbon）圣安德烈

（让邦）

Saiht-Fargeau

（Lepeletier de）圣法尔若

（勒佩勒蒂埃·德）

Saint-François

d'Assise圣弗朗索瓦·达西兹

Saint-Hilaire

（Geoffroy）圣依莱尔

（若弗鲁瓦）

Saint-James圣詹姆斯

Saint-Jean-d'Acre圣让达克尔

Saint-Just 圣茹斯特

Saint-Louis圣路易

Saint-Simon圣西门

Saint-Sulpice圣絮尔皮斯

Saladin萨拉丹

Salicetti萨利赛蒂

Santerre桑泰尔

Sapinaud萨皮诺

Saubrany苏布拉尼

Sauvigny

（Berthier de）索维尼

（贝蒂埃·德）

Scépeaux塞波

Schérer谢雷

Séchelles

（Hérault de）塞谢尔

（埃罗·德）

Servan塞尔旺

Sèze（de） 塞兹（德）

Sieyès西埃耶斯

Simiand西米昂

Simoneaa 西莫诺

Smith（Adam）斯密（亚当）

Soboul（Albert）索布尔（阿尔贝）

Soboul（Marie）索布尔（玛丽）

Socrate苏格拉底

Sombreuil 松布勒侬

Sorel（Georges）索雷尔（乔治）

Soubrany苏布朗尼

Souchu苏许

Souham苏昂

Souvorov苏沃洛夫

Staël（madame de）斯塔尔夫人

Stendhal司汤达

Stofflet斯托夫莱

Surville絮尔维尔

T

Taboureau 塔布罗

Tacite塔西佗

Taine泰纳

Talleyrand-塔莱朗-佩里

Périgord戈尔

Tallien塔利安

Talon塔隆

Target塔尔热

Ternaux泰尔诺

Terray泰雷

Théot泰奥

Thibaudeau蒂博多

Thierry（Augustin）蒂埃里（奥古斯坦）

Thiers梯也尔

Thou（François

Auguste de）图（弗朗索瓦·

奥古斯特·德）

Thouret图雷

Thugut蒂居

Thuriot蒂里奥

Tocqueville托克维尔

Tourzel图尔泽尔

Toussaint-

Louverture图森-卢韦尔

蒂尔

Tracy（Destutt de）特拉西（德斯蒂·德）

Treilhard 特雷拉尔

Tronchet特龙谢

Tronchin特龙香

Trouvé特鲁韦

Turgot杜尔哥

U

V

Vadier瓦迪耶

Valence瓦朗斯

Vandermonde旺代蒙德

Varlet瓦尔莱

Vauban沃邦

Vergniaud 韦尼奥

Vérone（de）韦罗纳（德）

Viala维阿拉

Vico维科

Victor-Amédée III维克多-阿梅代三世

Villaret-Joyeuse维拉雷-儒瓦耶兹

Vincent樊尚

Volney沃尔内

Voltaire伏尔泰

Voulland武朗

W

Wendel旺代尔

Westermann韦斯特曼

Westphalie 韦斯特法利

Weydemeyer魏德迈

Wickham 维克汉

Wilberforce威尔伯福斯

Willot维洛

Winckelmann温凯尔曼

Wordsworth沃兹沃思

Wurmser乌尔姆塞尔

Y

York（duc d'）约克公爵

Young（Arthur）扬（亚瑟）

Yriarte依里亚特

法汉地名对照表

A

Aarau 阿罗

Abbaye亚培伊狱

Aboukir阿布基尔

Adda阿达

Adige阿迪日

Adriatique亚得里亚海

Afrique非洲

Air埃尔（河）

Aix埃克斯

Aix-la-Chapelle 埃克斯-拉-夏佩尔

Ajaccio阿雅克修

Albi阿尔比

Alexandrie 亚历山大（埃及）

Alexandrie亚历山大里亚（意大利）

Alkmaar阿尔克马尔

Allemagne德国

Allobroge阿洛布罗日

Alpes阿尔卑斯山

Alsace阿尔萨斯

Amiens 亚眠

Ammi-Moussa阿米-姆萨

Amsterdam阿姆斯特丹

Angers昂热

Anjou安茹

Angleterre英国

Antibes昂蒂布

Antilles安的列斯群岛

Anvers安特卫普

Anzin安赞

Aquitaine阿坤廷

Arcis-sur-Aube奥布河畔的阿尔西

Arcole阿科尔

Ardèche阿尔代什

Ardennes阿登

Argogne阿尔戈尼

Argonne阿尔戈纳

Arras阿腊斯

Artois阿尔图瓦

Athènes雅典

Aube奥布

Auch奥施

Aunis奥尼

Australie澳大利亚

Autriche奥地利

Autun奥顿

Auvergne奥弗涅

Auxonne 奥索纳

Avignon阿维尼翁

B

Babel巴比伦

Bâle巴塞尔

Barbarie柏柏尔地区

Barcelone巴塞罗那

Bas-Languedoc 下朗格多克

Bassano巴萨诺

Basses-Alpes 下阿尔卑斯

Bastille巴士底狱

Bavière巴伐利亚

Bayeux巴耶

Bayonne巴荣纳

Béarn贝亚恩

Beauce博斯

Beauvaisis博韦齐

Belgique比利时

Bellecour贝勒库尔

Bergen贝尔根

Bergerac贝尔热拉克

Berne伯尔尼

Berry贝里

Besançon贝藏松

Beuil伯依

Bicètre比塞特尔

Bidasoa比达索阿河

Bilbao毕尔巴鄂

Blankenbourg 勃朗康堡

Blois布卢瓦

Bocage博卡日

Bohème波希米亚

Bologne 波洛涅

Bondy邦迪

Bonne-Espéran-

ce（cap de）好望角

Bordeaux波尔多

Bouches-du

R-hône罗讷河口省

Boulou布卢

Bourbonnais波旁内

Bourg布尔

Bourges布尔日

Bourgogne勃艮第

Brabant布拉邦特

Bréda布雷达

Brest布雷斯特

Bressuire希勒西尔

Bretagne布列塔尼

Brie布里

Brienne布里埃纳

Bruxelles布鲁塞尔

Budapest布达佩斯

C

Cadix卡迪斯

Caen冈城

Caire（le）开罗

Cambrésis康布雷齐

Campoformio 康波福米奥

Cap开普敦

Carinthie卡兰西亚

Carmes卡尔默狱

Carpentras卡庞特拉

Carrousel骑兵竞技场

Cassano卡萨诺

Castiglione 卡斯蒂格利奥纳

Castricum卡斯特里库姆

Catalogne卡塔卢尼亚

Cattaro卡塔罗（河）

Céphalonie塞法洛尼

Ceylan锡兰

Châlon-sur-

Marne夏隆（马恩河畔）

Chambery尚贝里

Champagne香槟

Champ-de-Mars马尔斯校场

Champs Elysées香榭丽舍大街

Charente-

Inférieure下夏朗特省

Charleroi夏尔勒鲁瓦

Charleville夏尔维尔

Chartres夏特勒

Châteauneuf-en-夏托纳夫-昂-

Thimerais蒂默莱

Châtelet夏特莱

Chaussée

d'Antan（la）拉肖塞当丹

Cherasco谢拉斯科

Chine中国

Cholet肖莱

Cisalpine

（République de）山内共和国

Clermont-Ferrand克莱蒙费朗

Clermontois 克莱蒙图瓦

Cliehy克利希

Coblené科布伦茨

Comtat Venaissin弗内森伯爵领地

Cologne科隆

Conciergerie 孔西埃热里狱

Condée孔代

Constantinoble君士坦丁堡

Corbeil科尔贝依狱

Corfou科尔富

Corse科西嘉

Côte-d'Or科多尔省

Cours-la-Reine库尔拉雷纳

Courville库维尔

Cracovie克拉科夫

Creusot克勒佐

D

Dalmatie达尔马西

Danube多瑙河

Dauphiné多菲内

Dijun第戎

Douai杜埃

Dreux德勒

Drôme德罗姆

Drouet德鲁埃

Dunkerque敦刻尔克

Durance迪朗斯

E

Ebre埃布罗河

Egypte埃及

Epinay埃比内

Escaut埃斯考河

Espagne西班牙

Etampes埃唐普

Etats-Unis美国

Eure-et-Loire厄尔-卢瓦尔省

Europe欧洲

Evreux埃费勒

F

Finistère费尼斯泰尔

Flandre弗朗德勒

Fleurus弗勒吕斯

Fontanil丰塔尼尔

Force福尔斯

Fourvière富尔维埃尔

France法国

Francfort法兰克福

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

Fréjus弗雷儒斯

G

Gard加尔

Gênes热那亚

Cenève日内瓦

Gironde吉伦特

Glacière，la 拉格拉西埃尔

Gotiadeloupe 瓜德罗普

Grande-Bretagne大不列颠

Granville格朗维尔

Graviliers格拉维利埃

Grenelle格勒奈尔

Grenoble格勒诺布尔

Grève（place de）沙滩广场

Grisons格里宗

Grosbois格罗布瓦

Gros-Caillou 格罗卡佑

Guyane圭亚那

Guyenne吉埃纳

H

Hainaut埃诺

Ham阿姆

Hambourg汉堡

Hanriot昂里奥

Haute-Garonne上加隆

Haute-Guyenne 上吉埃纳

Haute-Loire 上卢瓦尔

Haute Marne 上马恩

Havre，le勒阿弗尔

Hayange阿杨日

Haye，la海牙

Helder海尔代尔

Helvétie瑞士

Hérault埃罗省

Hollande荷兰

Hombourg翁布尔

Hondschoote 翁德斯考特

Hongrie匈牙利

Huningue于南格

I

Ile-de-France法兰西岛

Ile de Ré雷岛

Ile d'Oléron 奥莱隆岛

Iles Ioniennes爱奥尼亚群岛

Ille-et-Vilaine伊尔-维兰省

Indes印度

Indre-et-Loire安德尔-卢瓦尔省

Irlande爱尔兰

Istrie伊斯特里亚

Italie意大利

J

Jacgerthal雅热塔尔

Japon日本

Jemappes热马普

Juras汝拉山脉

K

Kalserslautern凯泽斯洛泰恩

Kehl凯尔

L

La Croix-aux-拉克鲁瓦奥布瓦

BoisLandau朗多

Landrecies朗德勒西

Languedoc朗格多克

Laon拉翁

La Roche-

Bernard拉罗舍贝尔纳

La Rochelle拉罗舍尔

La Roer（le

passage de）拉罗埃尔隘口

La Touche拉图什

Lauter洛特河

Leipzig莱比锡

Léman莱芒省

Leoben莱奥本

Le Quesnoy 勒凯斯努瓦

Levant利凡得

Liège列日

Lille里尔

Limbourg兰堡

Limmat利玛河

Limoges利莫日

Limousin利穆赞

Linth兰特

Livourne利弗纳

Lodi洛迪

Loire卢瓦尔河

Loiret卢瓦雷

Loiret-et-Cher卢瓦尔-歇尔省

Lombardie伦巴第

Londres伦敦

Longwy隆维

Lons-le-Saulnier隆-勒-索尼耶

Lorraine洛林

Lot洛特

Louvain卢万

Lozère洛泽尔

Luxembourg 卢森堡

Lyon里昂

M

Machecoul马什库尔

Mâconnais马孔

Madrid马德里

Maestricht马埃斯特里奇

Magallon马加隆

Maine曼恩

Maine-et-Loire曼恩-卢瓦尔省

Main（vallée du）马因河谷

Maison-Commune梅宗-科米纳

Malte马耳他

Manchester曼彻斯特

Mans（le）勒芒

Mantoue芒图

Marais马莱

Marne马恩

Maroc摩洛哥

Marseille马赛

Martinique马提尼克

Maubeuge 莫伯日

Mauchamp莫尚

Mauges莫热

Maurienne莫利安纳

Mayence美因兹

Méditerranée 地中海

Méissen梅桑

Mende芒德

Menin默南

Mennecy曼纳西

Metz麦茨

Mezières梅齐埃尔

Milan米兰

Millesimo米尔西莫

Mincio曼乔河

Miranda米朗达

Mitau 米托

Modène莫代纳

Mondovi蒙多维

Mons蒙斯

Montauban蒙托邦

Montbrison蒙布里松

Montenotte 蒙特诺特

Montmédy蒙梅迪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Montreuil蒙特勒伊

Mont-Thabor 蒙塔鲍尔

Morbihan莫尔比昂

Moscou莫斯科

Moselle摩泽尔

Moulins穆兰

Moyen-Orient中东

Mulhouse牟罗兹

Munich慕尼黑

Munster明斯特

N

Namur那慕尔

Nancy南锡

Nantes南特

Naples那不勒斯

Navarre内瓦尔

Neerwinden 尼尔温登

Nette奈特河

Neuchâtel纳夏泰尔

Neuwied纽维德

Nevers纳韦尔

Nice尼斯

Niederbronn 涅代布隆

Nièvre涅夫勒

Nîmes尼姆

Niort尼奥尔

Nivernais尼韦尔内

Nord诺尔

Normandie诺曼底

Notre-Dame

de Paris巴黎圣母院

Novi诺维

O

Oise瓦兹省

Oneglia奥奈依

Orange奥朗日

Oranie奥兰地区

Orient东方

Orléanais奥尔良地区

Orléans奥尔良

Ouessant维桑

P

Pacy-sur-Eure帕西絮厄尔

Palatinat帕拉蒂纳

Pamiers 帕米埃

Paris巴黎

Parme 帕尔马

Parthenay帕尔特内

Pas-de-Calais加来海峡省

Passariano帕萨里亚诺

Passy帕西

Pau波城

Pays-Bas荷兰

Perpignan佩皮尼昂

Périgord佩里戈尔

Picardie庇卡底

Piémont皮埃蒙特

Pillnitz皮尔尼茨

Plaisance普莱藏斯

Pô波河

Poissy普瓦西

Poitiers普瓦提埃

Poitou普瓦图

Pologne波兰

Pontivy蓬蒂维

Pontoise蓬图瓦兹

Pont-Saint-Esprit圣灵桥

Ponts-de-cé蓬德塞

Popincourt波潘库尔

Provence普罗旺斯

Prusse普鲁士

Puy-de-Dôme多姆山省

Pyrénées比利牛斯山脉

Q

Quercy凯尔西

Quiberon基布隆

Quinze-Vingts盲人院

R

Rambouillet 朗布耶

Rastatt拉斯塔特

Reims兰斯

Reischoffen 雷斯肖芬

Rennes雷恩

République batare巴达维亚共和国

Retz雷茨

Reuss勒斯

Rhénanie莱茵河地区

Rhin莱茵河

Rhodes罗德斯

Rhône罗讷河

Rhône-et-Loire罗讷-卢瓦尔省

Riom里奥姆

Ris里斯

Rivoli里沃利

Rochefort罗什福尔

Rome罗马

Rothau罗托

Rotterdam鹿特丹

Rouen鲁昂

Rousillon鲁西荣

Roye卢瓦

Ruffec吕费克

Russie俄国

S

Sablons萨布隆

Saint-Cloud 圣克鲁

Saint-Denis圣德尼

Saint-Domingue圣多明各

Sainte-Geneviève圣热纳维叶夫

Sainte-Menehould圣默努

Saint-Etienne圣艾蒂安

Saint-Fargeau圣法尔若

Saint-Florent-

le-Vieil圣弗罗兰勒维

埃伊

Saint-Germain圣日耳曼

Saint-Germain-

en-Laye圣日耳曼昂莱

Saint-Gervais圣日尔凡

Saint-Gothard圣哥达

Saint-Hippolyte圣依波利特

Saint-Honoré 圣奥诺雷

Saint-Ildefonse圣依尔德丰斯

Saint-Jacques圣雅克

Saint-Lazare 圣拉扎尔

Saint-Lorent-

sur-Sèvre圣洛朗絮塞夫尔

Saint-Lucie 圣吕西亚岛

Saint-Marceau圣马尔索

Saint-Marcel圣马赛尔

Saint-Paul圣保尔

Saint-Quentin圣康坦

Saint-Sébastien圣塞瓦斯蒂安

Saint-Sulpice圣絮尔皮斯

Saint-Vincent

（cap）圣樊尚角

Salon萨隆

Salpétrière萨尔佩特利埃尔狱

Sambre桑布尔河

Sambre-et-Meuse桑布尔-默兹

Sardaigne撒丁

Sarre萨尔

Sarthe萨特

Saumur索米尔

Savenay萨夫内

Savoie萨瓦

Savone萨沃纳

Saxe萨克森

Scarpe斯卡普河

Schwytz施维茨

Sedan色当

Seine 塞纳河

Semmering赛姆兰

Sénégal塞内加尔

Sens桑斯

Sicile西西里

Sienne西也纳

Sologne索洛涅

Somme索姆省

Spire斯皮尔

Stokach斯托卡克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

Styrie斯蒂里亚

Suède瑞典

Suisse瑞士

Surville絮尔维尔

Syrie叙利亚

T

Tabago多巴哥

Tagliamento 塔格利亚曼托

Tarascon塔拉斯孔

Tarbes塔布

Tarentaise塔朗泰兹

Tarn塔尔纳

Tarvi塔尔维

Tech特克

Temple唐普尔

Tende唐德

Tessin泰森河

Texel泰克赛尔

Thiérache蒂埃拉施

Thionville蒂翁维尔

Thouars图阿尔

Tirlemont蒂尔勒蒙

Tolentino托朗蒂诺

Toscane托斯卡纳

Toulon土伦

Toulouse图卢兹

Tourcoing图尔库安

Tournai图尔内

Tours图尔

Trébie特雷比

Trèves特雷弗

Trinité特立尼达

Troyes特鲁瓦

Tübingen杜炳根

Tuileries杜伊勒利宫

Turin都灵

Turquie土耳其

Tyrol蒂罗尔

U

Udine于迪纳

Union Soviétique苏联

Unter wald恩特瓦尔德

Uri于里

V

Valais瓦莱

Valence瓦朗斯

Valenciennes 瓦朗西埃纳

Valmy瓦尔米

Valteline瓦尔特利纳

Vanloo旺洛

Vannes瓦纳

Var瓦尔

Varennes瓦雷恩

Varsovie华沙

Vaucluse沃克吕兹

Vaud沃洲

Vendée旺代

Vendôme旺多姆

Vénétie威内西亚

Venise威尼斯

Verdun凡尔登

Versailles凡尔赛

Verviers韦尔维耶

Vicherey维施雷

Vichy维希

Vienne维也纳

Vihiers维耶

Viry维里

Vittoria维托利亚

Vivarais韦瓦雷

Vizille维齐耶

Vorarlberg 沃拉尔贝格

Vosges孚日山脉

W

Wattignies瓦蒂尼

Wissembour 维桑堡

Worms沃姆斯

Y

Yonne荣纳

Ypres伊普勒

Z

Zante藏特

Zürich苏黎士

对这些投身革命的群众，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他们。历史学家并没有忽视他们，大家都强调他们作用的重要性，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成功。但是，不管赞同还是反对，他们都是从“上面”，高高在上地看待这些群众，致使革命群众成为一种脱离实体而抽象的、善与恶的化身。

——阿尔贝·索布尔

上架建议　历史/法国史

ISBN 978-7-303-18834-5

9 787303 188345

定价:85.00元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

1789—1815

[英] 哈里·狄金森 著
辛旭 译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1789—1815）

【英】哈里·狄金森　著
辛　旭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激进主义与法国大革命：1789-1815/（英）哈里·狄金森著；辛旭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ISBN 978-7-303-21264-4

Ⅰ.①英… Ⅱ.①哈… ②辛… Ⅲ.①法国大革命－研究 Ⅳ.①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5585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YINGGUO JIJINZHUYI YU GAGUO DAGEMI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30mm×980mm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55千字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谭徐锋 潘永强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前言

发生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终结了英国历代君主试图在不列颠建立绝对政府体系的目标。这一温和革命生出有限政府的形式，君主在这一体系内倘不能与议会合作则无法有效统治，国王与其宰辅只能在法律原则下进行统治。不过，这并非创造了民主政体。君主仍然掌控着英国国家官僚体系、教会系统、军队与海事方面委任大臣与官员的权力。这就使得君主能对那些安坐于上、下两院的多数人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能坐在两院立法的这些人主要是大地产所有者、富裕的金融家、大商人、律师以及海陆军队的官员。当选下议院议员要拜占英国人口总数20%的成年男性投票所赐，而这些具有投票权的男人主要是中产阶层的农场主、商人、手工匠人和律师。当选的下议院议员则为着代表广大乡村与历史悠久的城镇利益。那些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谢菲尔德，都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下议院议员。因此，英国18世纪的政治体系不是为着所有人的利益都能有所代表，而是只为着代表某些非常富裕的男性或至少是为代表中产者的利益。

18世纪最后几十年，由于商业利益需求、工业化发展以及城市扩张，此政治体系弊端引发的诸多不满也日益增长，并因此带来英国社会与经济变革。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男性与知识分子们开始主张政治改革，要求赋予更多男性以投票权，允许新的工业城市选举自己的下议院议员，并且要将选举常规化，每年都进行大选。其中有少数改革者希望能将投票权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到18世纪80年代早期，议会里开始讨论改革提案。这样看，温和适度的改革是有可能在著名的《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前就可以达成的。不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阻碍了这一切可能的发生。

1789年刚刚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使得法国比起同期的英国更加激进也

更加民主，这让英国激进分子备受感召并力图效仿。遗憾的是，这种激进政治变革的和平面相在法国国内并未持续下去。更加激进极端的政治诉求导致以法王路易十六连同法国贵族，奥地利、普鲁士保守君主们一起坚决反抗激烈变革，这种反对力量毁灭了激进宪政变革中的和平努力。因之而来的系列法国事件也就变得越来越激进暴力，逐步走向恐怖统治并引发内外战争。18世纪90年代末，出于对法国陷入政治混乱局势的担忧，导致拿破仑·波拿巴这位功勋卓著的法国将军开启了军事独裁统治，从而结束了更自由的法国政治体制的进展。法国局势的进程令英国人尤其是有产精英与社会中等阶层人士震惊。他们决意抵抗英国改革者希冀追随并效仿法国模式的努力。法国大革命先是鼓舞了英国激进分子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甚至也鼓励了一些爱尔兰激进分子试图在1798年发动暴力革命；不过之后的法国事件却成为说服许多不列颠有产精英反对政治改革的理由。只有当拿破仑军事独裁体制已然证明，法国的追求不再是民主政治变革了，不列颠精英才开始不再反对在不列颠开展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运动。这种观点上的改变受到了由英国商业发展、工业化进程和城市扩张所引起的持续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1815年，英国改革者重又发起议会改革运动。因此，英国改革运动的兴起、衰落与再兴，与1789年至1815年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展紧密相连。对这些变化的阐释与分析就是本书的主题也是所欲解决的问题。

1789—1815年不列颠内部的政治进程，很长时间以来都是英国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热点。本书试图提供这几十年来几代杰出历史学家就这一主题所做研究的一份清晰的概要与综合。自这本书首次在英格兰的牛津印刷出版后，学界已有一些新的研究出现。这些新研究并没有改变本书观点，但它们加强了本书的论据。这些新的成果作为参考文献附列其后，供大家参考。我很感激四川大学辛旭博士译介本书的努力。她的翻译使得更多的中国历史学人与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了解英国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这些异常重要的事态发展。中国学人和学生们从这份薄薄的小册子里可以窥见18世纪90年代那些勇敢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在政治改革

的努力中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和苦痛，不过，也要清楚知道，除爱尔兰那些武装颠覆国家的激进主义者外，只有个别激进分子被判刑处死。这本小书还将让我们看到英国是如何避免发生暴力革命，逐渐学会通过进化方式缓缓取得进步的。英国的主要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从1689年至今逐渐发生嬗变的。相反，法国在1789年以迅猛而又暴烈的革命终结了强有力的君主统治，却在国内暴力与国外战争连绵多年之后，于1815年复辟。由1789年大革命制造的这种分流，从来都未复原。自那之后，法国宪法频繁更迭，而1789年至今其政治体制则更是历经多种形式：三次君主立宪、两次帝制、五次共和体制。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

- 第一章 英国雅各宾派
  - 起源与影响
  - 组织与构成
  - 目标与设想
  - 方式与活动
- 第二章 保守派的反击与政府的镇压
  - 意识形态与宣传
  - 效忠派社团（Loyalist Associations）
  - 合法镇压及政府迫害
- 第三章 地下革命
  - 爱尔兰革命
  - 不列颠的联合社团
  - 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利用
- 第四章 激进主义再发动
  - 阻碍与机遇
  - 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
  - 目标和方法
- 附录 不列颠及其意识形态十字军讨伐法国大革命
  - 一、法国革命信念的威胁
  - 二、英国的意识形态运动
  - 三、抗击法国革命纲领之战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英国雅各宾派

起源与影响

从1789年最初激动人心的那几个月开始，以及随后的许多年间，法国大革命都刺激着英国内部激烈的政治辩论，公众围绕着英国宪法改革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深刻的两极分化。不过，这种形势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全面鼓动政治改革呼声兴起的情境。早在1789年之前，英国的社会、经济变革已经刺激了激进主义的产生。此外就对政治目标的影响而言，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唯一的来源，那些英国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或方法也产生了影响，不久之后，他们被称为英国雅各宾派。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激进分子们，早已从对于寡头统治的长久敌意以及对18世纪英国贵族社会等级制的批判传统中，汲取了部分灵感与诸多思想。

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合力创造出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贵族精英权力及其政策加以批评的意见氛围。这些变化对英国中等阶层，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们的政治意识，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然而，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也吸引了许多技艺娴熟的手艺人及工匠加入到政治改革浪潮中。18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迅速增加，在较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增长尤为剧烈。伦敦居民人口已经接近100万，同时，伯明翰、布里斯托、爱丁堡、格拉斯哥、利兹、利物浦、曼彻斯特、萨瑟克（Southwark）的人口总数也都增加到5万～8.5万人。另有十多个城镇的居民增加至2.5万～5万人，至少有20多个城镇人口超过了1万。人口增加以及城市扩充必须要靠农业、商业、制造业的高度经济扩张来支撑。反过来，这些改变也生发出一个愈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来。伴随着财富的日益增长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他们开始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以及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地产精英的政治决策对中等阶层的财富状况影响甚巨，许多中等阶层民众对此种政治依赖充满厌憎之情。政治上的虚弱产生的经济后果就是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稳步地从大地主那里转嫁到了那些生产、售卖和使用大众消费品的人们身上。更有甚者，政府的

政策会带来战争，而战争不但会扰乱贸易秩序，也导致了对贸易与手工业者商业活动的立法限制。这种种牢骚不平之气，也可以在一些非常低的社会阶层民众如小店主、商人、工匠身上感知得到。而贫困的劳工阶层面临物价上涨、工资水平不断降低的局面，却得不到任何保护。特别是当这些状况可以直接追溯到雇主的自私或统治阶级的某些特殊政策时，他们便会表达出对统治精英的强烈愤恨。

18世纪许多城市的人口充分增长，经济模式转型，使得这些城市中心的政治文化在广度上得到扩展，并变得愈加复杂。这种生机勃勃的政治文化尤其使中等阶层能够创建他们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表达他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见解，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利与自由的先进理念。俱乐部与会社使中等阶层能够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持，自我组织，以从贵族精英的掌控中独立出来。这些协会的成员们学着不借助贵族的领导而由他们自己组织活动。他们对于统治精英的批判精神日渐增长，并最终将这些组织变为协同开展政治活动的工具，用以挑战社会高等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这些俱乐部和社团最初是为着社交或者娱乐而兴起的，但是很快就变得更具教育性和政治性，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随后被政治激进主义者开发利用。

快速扩张的报刊是这些社团成员获取丰富政治信息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途径，倘若没有它们，这些社团是不可能益发政治化的。18世纪晚期，仅伦敦就有13种日报、10种一周发行三次的报纸，而在地方上，周报数目已超过50种。到1775年，报纸的年销售总量高达1250万份，截至1793年，其年销售量已达到1700万份。除此之外，还有无数月刊登载大量政治信息及宣传文字，而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也会产生数目众多的独立小册子。在较为成功的出版物中，它们大多都在政治上反对内阁。这些繁盛无比、发行量巨大的报刊在鼓舞大众批判政府精英以及使他们知晓改革政治系统的建议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政府精英的反对者们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很久之前，就已经通过出版物来从事政治宣传运动

了。这些人反对执政者权力的日益膨胀及腐败，而政府恰是通过这种手段使议会独立与国家自由遭到了破坏。他们针对王室庇护权展开常规攻击，但持久的要求则是经济改革，他们希冀借此减少王室庇护权，降低王权对议会的影响。早在院外有组织的激进运动兴起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要求更为频繁的普遍选举，以及将衰败的小自治市镇在议会中的席位重新分配给那些没有代表权的大城镇，及人口更为稠密的郡县。早在激进派开始争取大幅扩展公民权利之前很久，出版物上就已经不断地呼吁作为一个英国人的权利与自由了。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皇权与贵族寡头统治的反对者们就已经断言，所有人都应享受到法治的保护，应该免于遭受专制、暴力政府的干涉。他们坚持所有人都该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主权存在于全体人民之中，作为最后的手段所有人皆可用强力反抗一个专制的政府。

中等阶层对于自己现有社会、经济地位的不满，他们开创生机勃勃的城市政治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媒体的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的政治权利意识结合在一起，就创生出对地产精英政治主导地位进行持续挑战的潜在力量。一场深刻且持续的政治危机，则可将此潜能变成现实。此种危机能够瓦解统治阶级的权威，也可使中等阶层确信，整个政治体制都需要加以改革。第一场这种性质的危机发生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前几十年。当时出现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违宪方式来增加王权的政治运动，这令时人越来越不安。现代的历史学家已经证明这种担忧被肆意甚至是毫无根据地放大了，但在当时，它造成了内阁持续不稳，激起了公众对于宪法与臣民自由的平衡是否受到了威胁的激烈争论，还导致了无论是英国本土还是美洲殖民地对政府政策的反对。美洲殖民地通过武力来确保自己的政治独立；在英国本土，看似风平浪静，但精力充沛的反对派们对寡头政治统治的反对不断郁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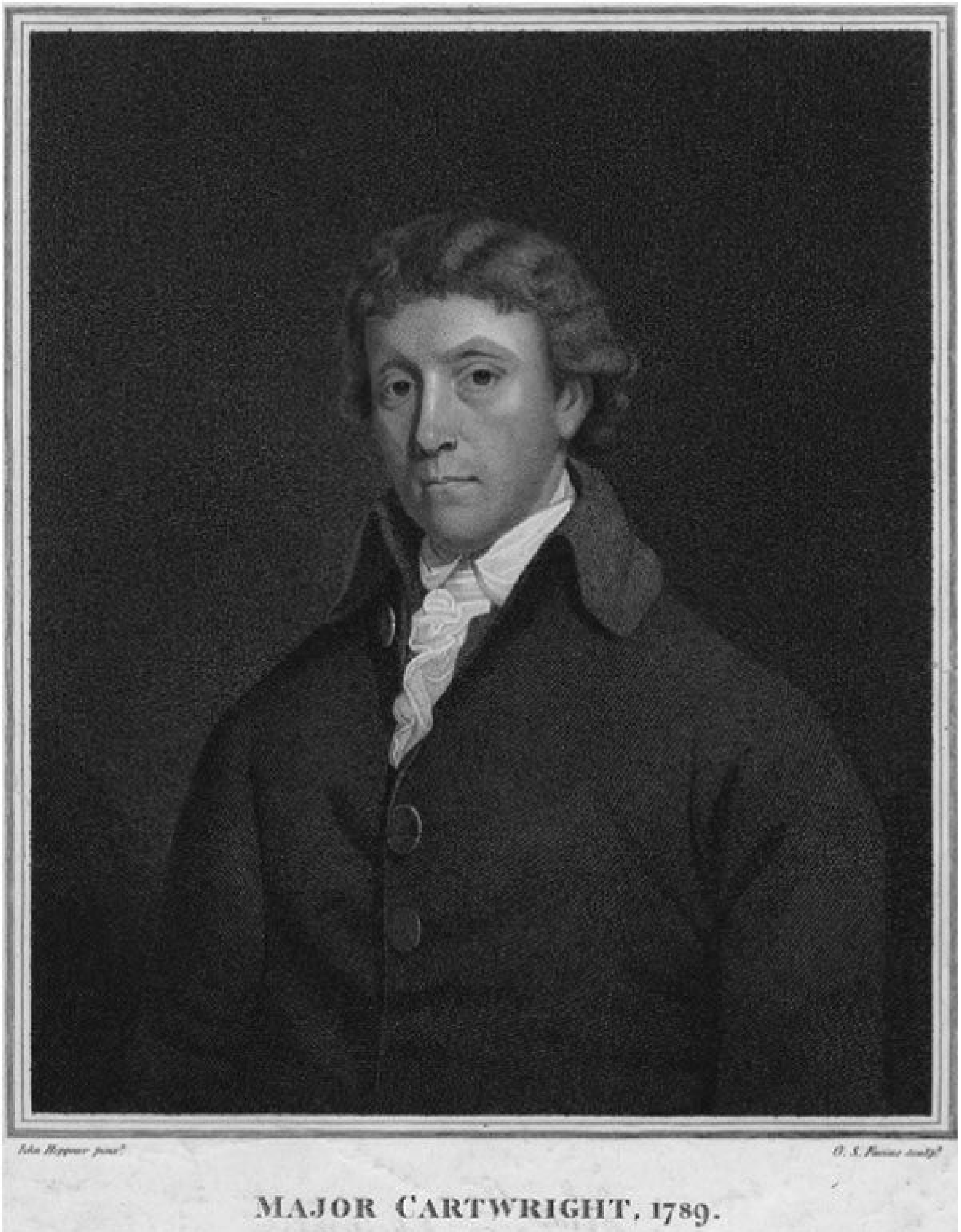
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领导了18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的请愿运动，之后则由克里斯托弗·怀威尔（Christopher Wyvill）发

起的“联合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接棒。这些运动意图凝聚公众政治观点，造就一些院外组织（extra-parliamentary organizations）努力发动宪法改革。这些改革运动充分利用了伦敦和一些较大的地方城市中蓬勃繁盛的出版业、俱乐部及社团。他们创办了一系列新型的政治会社，例如“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宪法资讯社”（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简称SCI，或译为“宪法信息社”）以及各种各样有关宪政改革的会社及郡县联合会。这些组织将政治活动家们彼此紧密联系起来，将改革宣传活动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中。他们还组织了全国性的请愿运动来证明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并对政府跟议会施加压力。在他们参与的这些激烈的政治论争中也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改革提案以及有关臣民自由权利的更激进的观念。更稳健的改革者基于经济改革的传统要求，其目标意在限制王室庇护权，因为当权者可以利用这种权力对议会组成及其决议施加影响。但其他改革者们认为此类稳健的政策远远不够。在他们看来，对臣民的自由权利的护卫是首要之义，只有当更多的公民被议会接纳为代表，议会可以代表全体人民时，臣民的自由才有可能被保障；而只有通过议会改革，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尽管有少数改革者还有其他更多诉求，但对许多改革者来讲，他们要求的是更为经常性的普选，或者是将议会席位重新分配给已经发展的较大的城镇或人口最为稠密的郡县。早在18世纪80年代，威斯敏斯特协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的激进领袖们就已经草拟了后来变得鼎鼎大名的“议会改革六点方案”（six-point programme of parliamentary reform）：普遍的男性公民选举权、议会年度选举制、选区平等制、无记名投票、废除针对下议院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及付费要求。一些激进派的宣传者们，如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宣称，这些激进的改革并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而仅只是要恢复久远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已然存在的民主的代表选举体系。不过，其他激进派理论家们，如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则反对将改革的合法性诉诸于英格兰古老的宪法体制。他们宣称，激进的议会改

革理应被批准，因为实行民主的代表选举制是将所有人[1]都具有的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自由权的唯一道路。普赖斯及其同道坚持认为，所有人都具有自然赋予的、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及财产权，只有当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来选举立法机关代表，由这些代表通过立法手段有效管理人们的生命、自由及财产，这些权利才有可能得以维护。

许多用以消减王室庇护权影响的法案因这场改革运动的推动而诞生。这些法案甚至已经在下议院推行，其后续目标是达成适度的议会改革。1783年，下议院议员中一个重要的少数派准备投票支持议会改革。等到1785年，首相小皮特（Younger Pitt）因为提议去除最小的36个议会选区的席位而获得174位下院议员的支持——他们人数虽少，却是意义重大。很明显，院外改革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跨出了巨大的一步，但是它基础不牢，根基不厚。只有极为少数的改革者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即使是那些更为坚定的激进主义者们，可能也只是将他们的政治关怀止步于男性户主或那些缴纳了直接税或地方税的人获得选举权，就心满意足了。没有任何一个激进主义者认真指望过让劳动大众除了投票行为之外，还能在其他国家事务中承担积极的角色。这种有组织的改革运动机构依旧牢牢地掌握在有一定财产并且受过教育的人手里，而他们都来自社会的中等阶层。他们痛恨大地产精英过度的政治影响力，决心要增加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但他们并不希望穷人来参与管理国家，实际上他们也不愿意穷人真的坐在下议院来参政议政。并且，在他们要改革选举体系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国王、大地主阶级与平民的微妙平衡，以达到君主制、贵族制及民主制的混合。在他们看来，那才是理想的宪政。激进主义者并不渴望推翻君主制政府或者废除贵族阶级特权。他们也并没有组织一场真正改变社会等级制度或者是对国有财产进行更平等再分配的运动。几乎所有的激进改革派最初的目标都是降低税收及政府管理成本。他们的纲领根本不曾直接呼吁社会底层民众的参与，而对此类群体来说，这纲领也缺乏强烈的吸引力。

图一《约翰·卡特赖特像》



图一《约翰·卡特赖特像》

格奥尔格·西格蒙德·法丘斯（Georg Siegmund Facius）绘

约翰·霍普纳（John Hoppner）点刻雕（点彩），1789年

画面尺寸414mm×288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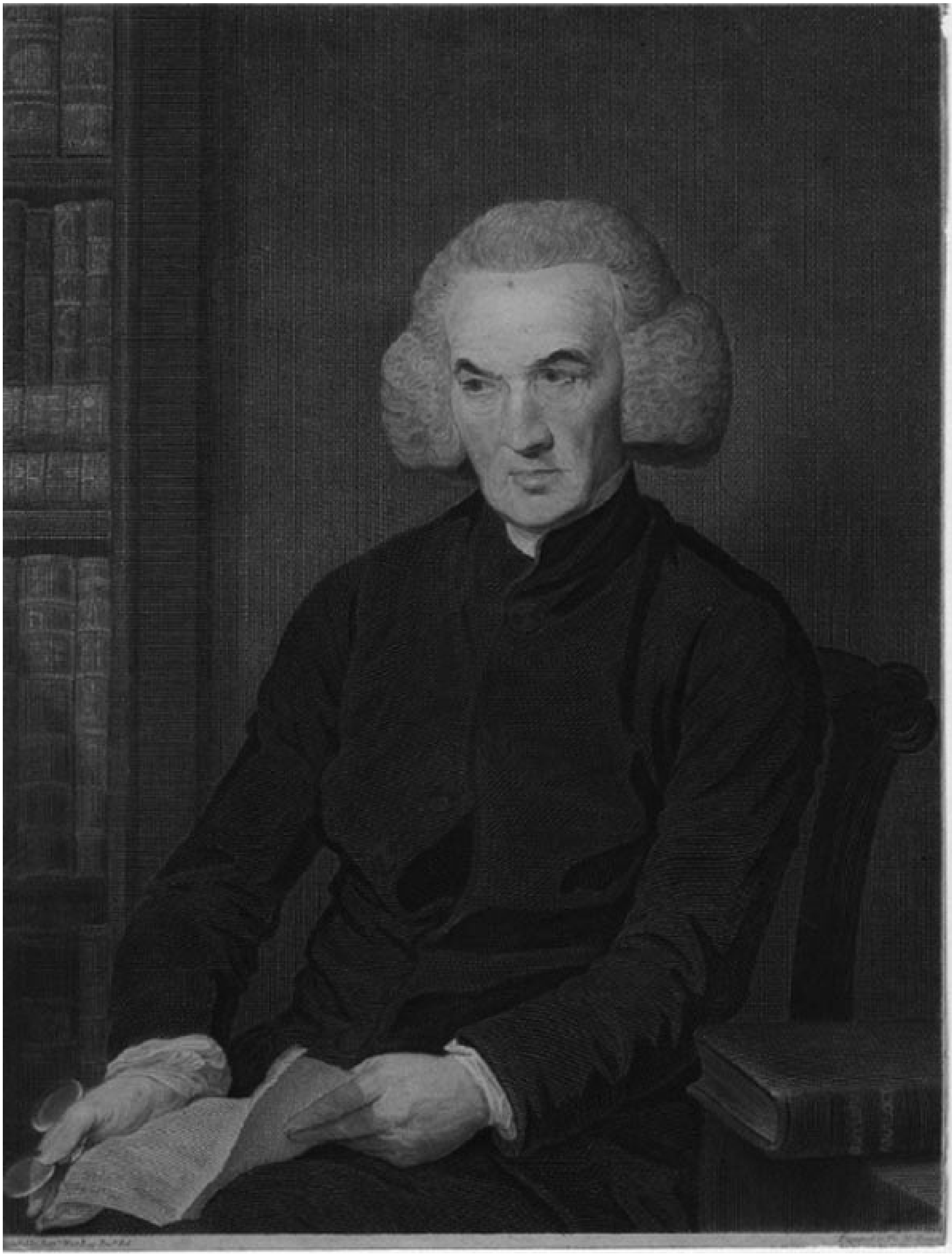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经济的迅速复苏及国内政治恢复稳定，使得激进派和议会改革事业的支持率突然降低。不过，到18世纪90年代早期，激进主义不但已经复苏，而且大力推进，恢复了十年前所曾占据过的地位。改革运动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激进，目标越来越具革命性，对于大众而言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诸多因素合力造成了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但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还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1787年，新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宪法被批准通过。这向英国激进派展示出，依据大众的意志，为保护人们的主权及他们的自然权利而组建一个政府是有可能的。美国事例表明，政治上的平等可以跟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以及保有适度区分的社会结构相协调。一个更为公平的人民代表制并不必定引起社会无序或者内战，这就是美国人提供的经验证据。美国革命的激进政治后果更加突显了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保守的政治发展历程。为了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而创建了“革命社”（Revolution Society）的改革者们，以强有力的方式指明了这种对比。革命社成员坚持认为，1688—1699年革命的根本原则远比后来的政治发展所能指示出的要来得激进。他们坚信，光荣革命奉人民主权学说为神圣不可侵犯之信条。1789年11月4日，理查德·普赖斯，这位富有经验的改革家，在面对革命社所发表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中断言，光荣革命已经宣告了那些内在于自由男性天性中最重要的权利，包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反抗专制与暴政的权利，而所有权利中最激进的则是：“有权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倘其统治有误，公民有权解散其统治；公民有权构建一个为我们自己服务的政府。”不幸的是，这些权利并没有在1688—1689年间全部实现，但是，此时此刻，是时候实现它们

了。由非国教徒主导的革命社在争取废除“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案”（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该法案规定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公职只能由圣公会教徒担任。自1787年到1790年，发起废除该法案的非国教徒和他们在自由派圣公会教徒中的盟友一起，在媒体和议会里宣扬，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自然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国家并无任何合法权威来将某种特定的宗教观点强加于公民身上，以致剥夺他们的权利。政治自由是确保所有自然权利的最佳方式，这些人因为追求宗教信仰平等，被引导着投入到了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中。

图二《理查德·普赖斯像》



图二《理查德·普赖斯像》

托马斯·霍洛韦（Thomas Holloway）在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线雕版画基础上绘制并出版

1793年6月4日发表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理查德·普赖斯在革命社发表的演说之所以激发了人们对革命的兴趣；1790年议会对是否废除“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案”的辩论之所以如此激烈，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法国所发生的那些戏剧性的、令人震惊的事件对英国国内政治兴奋氛围的刺激。在这个长期以来都被视作绝对君主制绝佳典范的国度（法国）所爆发的革命，使得人们欢呼雀跃，把它当成一个自由的新时代唾手可得的可信证据。法国的政治事件在随后的几年里对英国政治产生了可谓充电一般的效应。法国革命突然爆发，令世人惊讶；它引发了一场波及了整个欧洲的政治地震，对于英国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且广泛扩散到全社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欧洲最强悍的君主被其臣民羞辱，贵族根深蒂固的特权遭到谴责，教会改由世俗力量控制，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被公开宣扬，他们还选出代表组成议会负责起草新宪法。此时，英国持各式观点的改革者们都受到这一事件的刺激，也投身于实践当中。约翰·卡特赖特公开宣布：“先生们，法国人，不但伸张了他们自己的权利，还促进了全人类的普遍自由权利！”理查德·普赖斯也宣言：“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刻啊！我如此感恩，在我有生之年可以亲眼目睹……人的权利较之往昔获得了更好的理解：每个国家都在绘制自由蓝图，你看，这个自由理念我们好像已经丢弃许久……我见证了人民争取并扩展自由的深深期盼；人类历史即将开始一场普遍的修正。”（Dickinson，1977，p.236）

法国事件激励了英国废除“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案”的运动，鼓励革命社在1789年11月4日这天向法国国民议会发送贺信，它还使得停滞

多年的宪法资讯社元气复苏。丹尼尔·亚当斯（Daniel Adams），这位勤勉的宪法资讯社社长，建立了会员制，甚至还吸引了几位出身更加卑微的人如雕刻工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皮匠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参加进来。宪法资讯社恢复用激进刊物传播思想的做法，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政治联络网，重新开启了有关英格兰与威尔士的议会代表状况的调查。最后，它终于推动T.H.B.奥德菲尔德（T.H.B.Oldfield）的《选区史》（*History of the Boroughs* ）在1792面世。该书意义重大，提供了可以使人们对代表制体系加以强烈谴责的有力证据。1790年3月，宪法资讯社最著名的会员之一，亨利·福拉德（Henry Flood），曾动议下议院：针对所有已经衰败的选区，每个选区削减一个代表席位；增加100个额外席位给成长中的郡县；赋予常住居民户主以选举权。在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中，尽管福拉德声明，若及时向有产中等阶层让步，英国将可以避免法国所发生的那些过度行为，但他仍然论辩到，法国的发展已经使英国国内改革较之以往更加迫切。

福拉德并没有获得议会的更多支持，但是法国事件的确鼓励了少数辉格党反对派致力于稳健的政治改革。1790年7月14日，“辉格俱乐部”（the Whig Club）筹备了一场盛大的改革宴会（a monster reform banquet）来纪念攻陷巴士底的日子。超过650多位自由之友参加了盛宴。宴会上通过了很多决议，人们为法国自由的建立欣喜欢庆，誓言为在英国国内进行议会改革而全力以赴。但是这次会议警醒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也加剧了保守辉格党与自由辉格党人之间的分歧，自由辉格党中的一些人此后继续支持政治变革。1792年4月，自由辉格党人建立了人民之友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并且宣称他们为了避免英国也面临已然落在法国人头上的那种大灾难，支持温和适度的改革。人民之友协会的一位成员——乔治·蒂尔尼（George Tierney），利用奥德菲尔德的研究发表了一份《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代表制现状报告》。1793年与1797年，自由辉格党人曾试

图利用这份报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确保通过一份议会改革法案，不过却是徒劳无功。

毫无疑问，法国的政治事件在复苏那些富有经验的激进派对英国国内改革的兴致一事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人里包括了约翰·卡特赖特、理查德·普赖斯、克里斯托弗·怀威尔、约翰·霍恩·图克（John Horne Tooke）等。法国大革命鼓舞革命社做出新的政治努力，唤醒了沉睡的宪法资讯社，鼓励辉格党内的自由派重新推动经济改革和适度的议会改革。但是，法国大革命最大的影响却体现在那些18世纪90年代早期涌现出来，遍布于伦敦和其他地方郡县更为激进的新社团身上。这些新的激进派经常被称作英国雅各宾派。它们竭力发展组织机构，将其成员成分扩展到更低的社会阶层，推进更具革命性的目标，并且发展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新方式。法国大革命唤醒这些人投入政治行动，并为他们提供了纠正自己所受社会不公的理念，不过，却是18世纪90年代的经济形势才真正让这些激进派能够偶尔吸引到群众性的支持。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简单地为欧洲受压迫的人民树立一个政治范本。1792年到1793年的欧洲局势动荡不安，导致英国发生经济萧条，最终带来了失业率的增高和工资水平的下降。1793年初英、法之间爆发了一次持续甚久、过程痛苦且消耗巨大的军事冲突，使得英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手工业出现了持续性的混乱。战争不仅严重影响了贸易，也因为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隐性税收增加，而一步步地加重了中下层人们肩上的税收负担。1795年到1796年，英国经济的不景气已经达到了危机时刻。正当穷苦人民面临越来越低的工资和越来越高的税收之时，严重的农产品歉收又将食品价格推向创纪录水平。整个18世纪90年代，尤其是1792年到1796年间，贫困是激进政治事业的主要推手。



图三《埃德蒙·柏克像》

约书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画室绘

布面油画，约1769年或之后

画面尺寸756mm×629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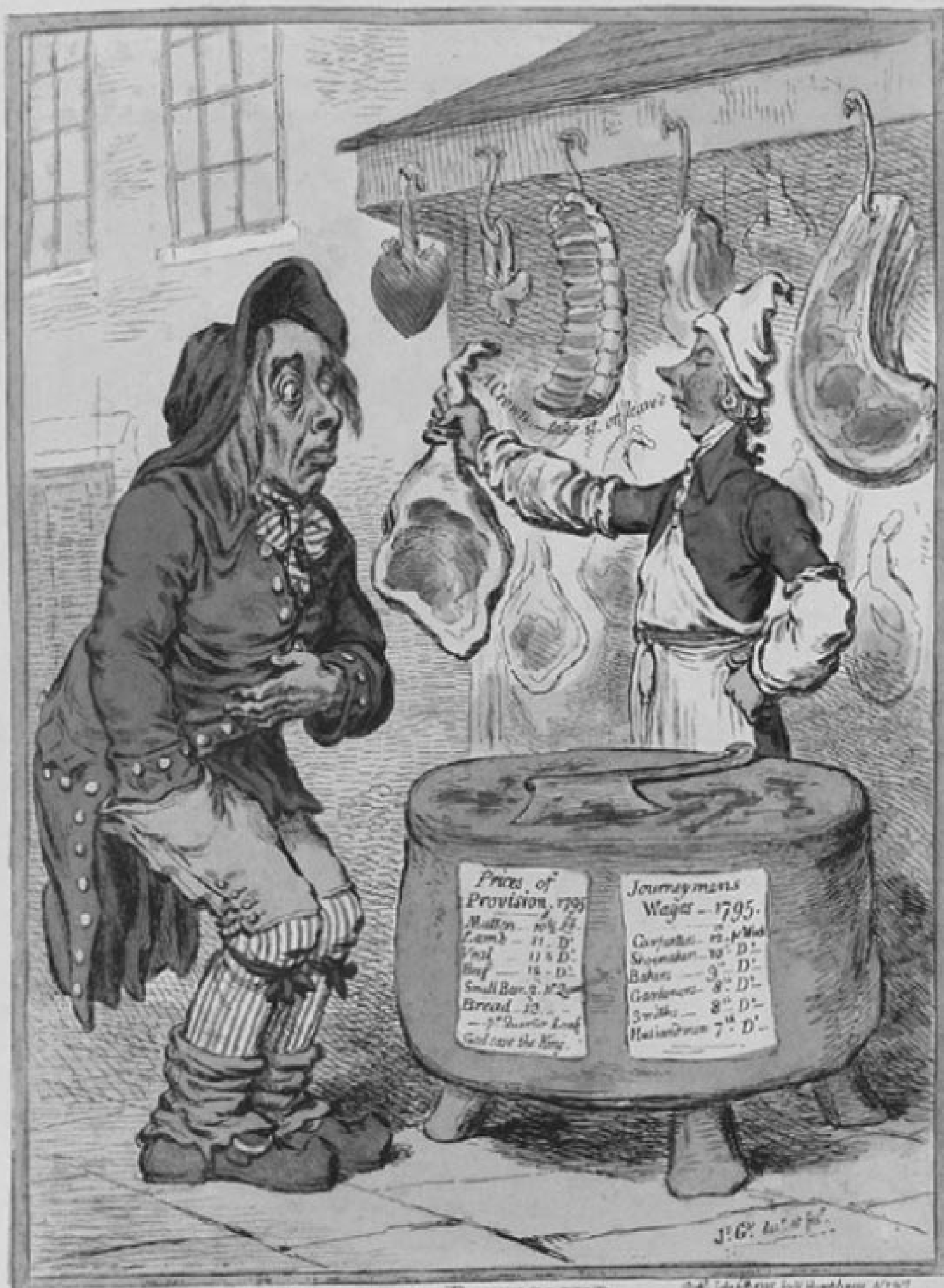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

[1] 18世纪文献有关政治权利的讨论所指涉的“所有人”皆用“all men”这样的字眼。本书作者在其早期著作包括本书中援引文献并未特意指出这一词汇在文本中的特别深意，但在《十八世纪英国的大众政治》一书中他明确写道：“在争取‘人’（man从字面含义上看专指男性）的权利中，大多数激进分子按照字面意思将其理解为成年男性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这一解释不但明确了成人普选权的历史含义，实际上也从历史学技艺层面提示我们，在阅读那一时期的历史文献时应该关注文字在当时语境下的具体含义。

组织与构成

到此时为止，“伦敦通讯社”（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简称LCS）是新建立的激进社团中最重要的一个。该社团在1792年1月25日这天建立，当时仅有九位男性成员。他们由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这位地位卑微的鞋匠领导，在斯特兰德（Strand）的贝尔酒馆（Bell tavern）开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即当时面临的经济贫困与高昂物价。其中八位成员赞成建立一个社团，每周集会一次，每次集会征收一便士作为会费。托马斯·哈代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兼会计，不过律师莫里斯·马格利特（Maurice Margarot），很快成为首任主席。尽管通讯社最初关注的是许多下层社会成员都面临的经济贫困问题，但为了拯救他们的不幸，社团采用了一套政治纲领决意走政治道路。通讯社成员献身于政治活动，要求赋予成年男性普选权、实行议会年度选举制以及重置议会席位，把衰败小选区的席位转到大市镇手中。哈代与其同道们致力于将他们的理念扩散到整个伦敦，传遍全国。他们获得了高速且非凡的成功。在伦敦主城区就建立了很多分支机构或小组。每一个小组都预计招募至少30个会员。超过这个数目之后加入的会员被登记到余册里，当超额数目达到16人的时候，就开始建立新的分支小组。事实上，很多分部的会员数量都超过了预想的最大值，所有支部中最活跃的是第二分部，截至1795年年末，它已经拥有700多个会员。当1795年的“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禁止50或以上人数政治集会时，伦敦通讯社却因其有此种特殊的组织机构形式而不受该禁令的限制。



The BRITISH-BUTCHER,

Supplying JOHN-BULL with a Substitute for BREAD.

BILLY the BUTCHER'S advice to JOHN BULL.

Since Bread is so dear, (and you say you must Eat,)
For to save the Expence, you must live upon Meat;
And as Twelve Pence the Quartern you can't pay for Bread
Get a Crown's worth of Meat, — it will serve in its stead.

P.H.

图四《英国屠夫威廉·皮特》

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绘，汉纳·汉弗莱（Hannah Humphrey）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5年7月6日发表

画面尺寸401mm×260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又名《面包的价格》，表现的是1795年英国谷物歉收、粮食价格奇高时候的英国普通人生活。画家笔下一个又饥又愁的普通英国人甚至连买块面包都囊中羞涩的时候，毫无同情心的首相威廉·皮特却以极其不屑的表情拿出一大块昂贵的牛肉要卖给穷人，这当然是那穷人绝对无法负担的。

到1792年5月，伦敦通讯社已经有9个分部，每一分部都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周四晚上召开的总委员会会议；分部每三个月选举一次他们的秘书长与总委员会代表；总委员会则要选出一个规模较小的执行委员会，它由一位秘书长、主席和6个普通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通讯社的活动与政策，其成员每周要碰头两至三次，这使得居于通讯社领导层的会员每周有四到五个晚上都忙于政治会面。随着通讯社向更广阔的区域不断扩展，导致会员往来集会的交通问题日益严峻。通讯社最终决定将伦敦按照地理位置分成四个片区，在分部与总委员会之间增加一个片区委员会。片区委员会成员也由分部选举产生。因此，到1795年，通讯社已经具备了一种精妙的组织机构形式，它可以使其政治行动突破法律、经济乃至地理位置上的局限（Collins，1954）。

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成员名单，加之我们也需要区分出核心积

极分子与偶尔参与分部集会的成员，因此要想精确地重建伦敦通讯社的规模或者是清晰地把握其成员的社会地位情况并不容易。很明显，一些分部极为活跃，参与者众多，但也有一些分部只是断断续续的存在着，其活动难以确定。也许只有一半的分部费心选举参加总委员会的代表。伦敦通讯社号称其会员总数在5000人左右，而这一数目也被许多历史学家认可。不过，最近对活跃分子人数的估算表明，截至1792年年底，伦敦通讯社共有650位固定会员坚持参加聚会，且这一数字在整个1793年停步不前。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固定会员的人数在250人与1000人之间波动，而在1795年下半年达到了顶峰。尽管政府出台了许多压制性措施，但1795年秋季，通讯社每周的出勤人数还是超过了1500人，其中有一周大约有3576名成员参加了各分部会议。在那段时间里，活跃会员的总数大概有3000人，不过到了1796年春季，这个数字减少至不到2000人，而到了该年年底，则下降到1000人。到1797年，活跃会员人数骤跌到600人左右，而在1798年社团被强制解散前，通讯社的积极分子只有400人左右（Thale，1983，pp.xxiii-iv）。显然，伦敦通讯社能够吸引更多的同情者（sympathizers）来参与其户外大型集会，而它的纲领也确实得到了广大非会员的支持认可。尽管如此，伦敦通讯社仍不可被当作是一个真正的群众社团——因为它的每周集会难以吸引到足够比例的伦敦城中的贫困劳动力，而这对定义群众团体来说十分重要。

由于没有任何细节性的证据，多数历史学家满足于将伦敦通讯社描述为主要由零售商和工匠构成的社团。当然，其中一些最著名的活动家确实是小商人：比如托马斯·哈代、约翰·阿什利（John Ashley）都是皮鞋匠，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是个裁缝，本杰明（Benjamin）与约翰·宾斯（John Binns）曾经是水管工，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则是一个制帽工匠。但另一方面，有关伦敦通讯社更多积极分子的证据则向人们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一份调查表明，347个活动家中一半是零售商和工匠，其中有43人从事制鞋或相关贸易活动，27人的工作与纺织业有关，24人做裁缝生意，14个手表制造

者，7个木匠，7个细木工，等等。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似乎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们大多都设法通过自学达到了通常的受教育水准。然而，这一组调查中，其他一些活动家都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有8位律师，8位医务工作者，10个书商，11个教士，还有各种行业的店主（Thale，1983，p.xix）。另一组调查样表表明，大约61个伦敦通讯社活动领袖中，仅有16个可以明确的定义为零售商或者工匠，其余的那些领导成员主要是由书商、印刷工、出版商、文人及法律或者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这些领袖人物包括约翰·博恩（John Bone）、罗伯特·克罗斯费尔德（Robert Crossfield）、丹尼尔·艾萨克·伊顿（Daniel Isaac Eaton）、约瑟夫·杰拉尔德（Joseph Gerrald）、约翰·盖尔·琼斯（John Gale Jones）、莫里斯·马格利特、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以及约翰·赛尔沃（John Thelwall）（Lottes，1979，pp.360-373）。显然，零售商和工匠在伦敦通讯社的领导层里扮演了重要但却并非主导作用的角色。在分部的活动家或者是普通会员中，零售商和工匠占据的比例毫无疑问要大得多，但是，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通讯社曾经做过多少努力，去吸引非熟练工或者赤贫之人。无论通讯社的反对者怎样指控，也不管有些历史学家如何断言，伦敦通讯社都依旧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者社团（Davis）。

这类激进社团组织并不局限于伦敦。外省社团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兴起。其中，1791年11月或者12月（具体月份不详）成立的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Sheffield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是最为激进、最能引人兴趣的一个。伴随着伦敦通讯社的兴起，躁动不安的经济形势以及公众对法国所发生政治事件的强烈关注，形成一种社会氛围，激励了一些活跃分子组织起来建立社团，来推动激进的议会改革事业。短短的几个月内，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就已经从少数几个人发展到了数百人，他们在遍布全城的酒馆、公共场所碰面集会。到1792年3月，会员总数已突破1500人；1792年6月，大约为2500人，不过积极分子要比总数少很多，大概在600人。会员们每周在他们

的支部或者分部里聚会，每一个小群体都要选出一位代表参加总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负责之事包括分发政治文献、组织书写请愿文书，与伦敦通讯社及伦敦宪法资讯社交流意见沟通想法，他们还要给相邻市镇如利兹、德比（Derby）、诺丁汉、斯托克波特（Stockport）的激进组织提供建议。

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最著名的会员有约瑟夫·盖尔斯（Joseph Gales），他是《谢菲尔德纪事报》（*Sheffield Register* ）的出版商；有亨利·雷德黑德·约克（Henry Redhead Yorke），一位经济独立、奔走于各地的鼓动家；还有著名的刀剪制作大师威廉·布鲁姆海德（William Broomhead）。大多数活跃分子看起来都是某些领域的行家（small master）或者技艺娴熟的工匠，如刀剪师、锉刀铁匠、剃刀制作者等，他们都在谢菲尔德钢铁工业链上的一些小作坊里工作。与伦敦通讯社的许多会员一样，这些人也都面临着由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欧洲危机带来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的不利局面。1793年春天，苦难的形势令这些激进分子们征集到了将近4000个签名，要求实行议会改革；而在1794年2月28日这天，则有多达5000～6000人在户外集会，支持讨论通过一份要求境外和平、国内自由的决议（Seaman，1957）。

其他一些大型的地方城市也冒出了不少激进社团，它们中有些受到了更早的改革社团的影响，有些则仿效伦敦通讯社和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的样板而成立。早在1790年10月，曼彻斯特就出现了一个“立宪社”（Constitutional Society）。它的领导人是棉花商人托马斯·沃克（Thomas Walker）与大律师（barrister）兼化学家托马斯·库珀（Thomas Cooper）。他们皆受从前的老改革家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深刻影响。在社团组织形式上他们则效仿了伦敦宪法资讯社的模式。他们的社团每个月仅集会一次，每次50～100人不等。集会的成员基本来自中产阶层，他们相聚一起，主要目的是讨论如何印制和分发激进主义的宣传小册子。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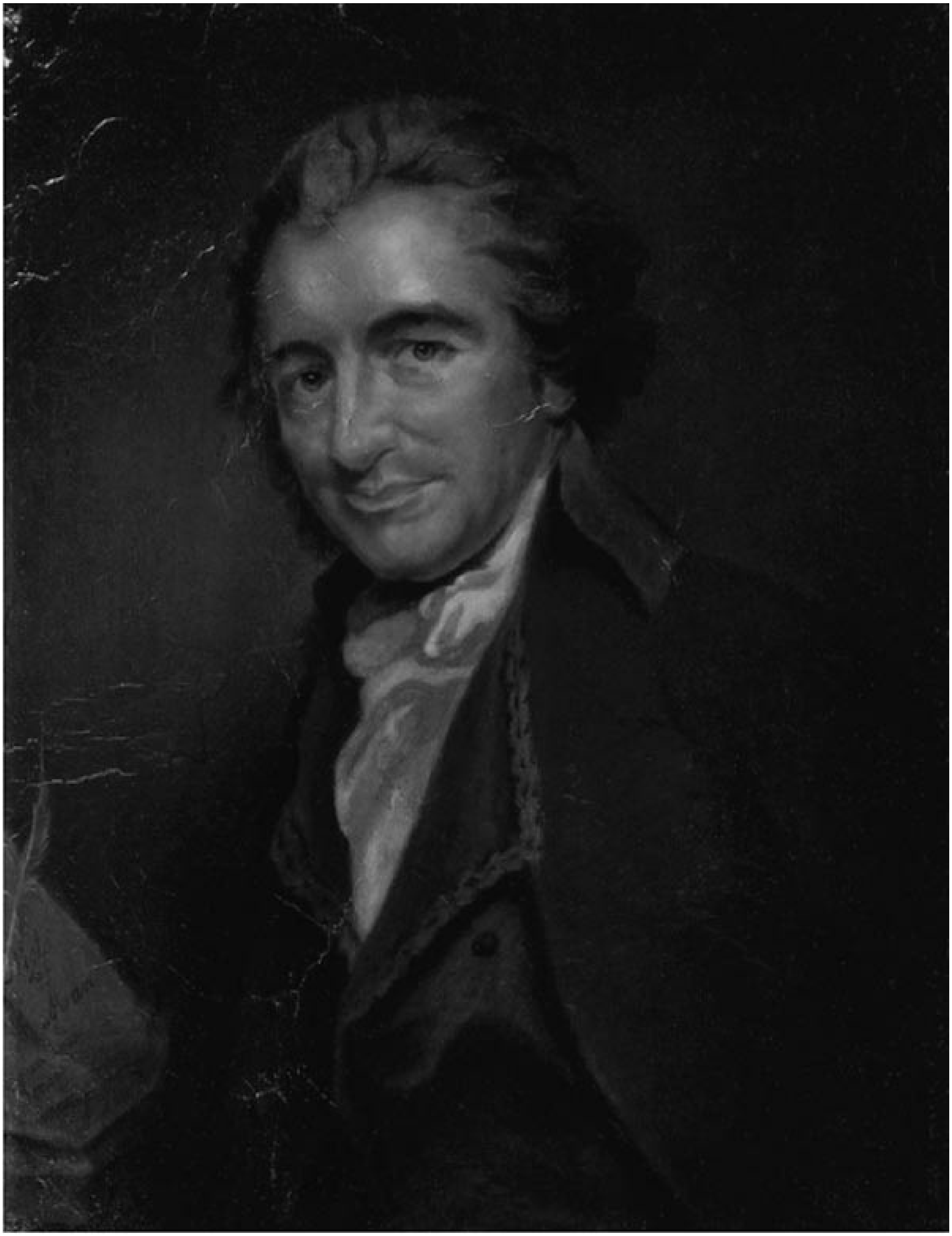
1792年3月到1793年3月，一年的时间里，这个立宪社团发行了一份非常出色的周报——《曼彻斯特先驱报》（*Manchester Herald* ）。1792年5月人们成立了爱国社（Patriotic Society），6月又创办了改革社（Reformation Society），这类社团的出现皆受到当时急剧增长的激进主义热忱所驱使。这些新社团吸引了许多工匠、零售商，乃至有几位劳工也参与其间。保守派于1793年对激进政治运动加以反攻，破坏了激进分子的努力；但在此之前，这些社团已经在短短几个月内与立宪社合作，参与到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中（Handforth，1956）。激进派在诺威奇（Norwich）的发展也遵循了类似的路线。1788年成立的、主要由中产阶层非国教徒、商人及专业人员主持的革命社，领导了改革运动。1792年，许多由工匠、零售商、小店主组建的更为激进的俱乐部与革命社联合起来。激进团体的政治领导权转移到这些新兴社团手中，他们选出代表参加每两周一次的会议（Jewson，1975）。大体与此同时，一些类似的激进社团在其他许多市镇如伯明翰、德比、利兹、莱斯特（Leicester）、诺丁汉、纽卡斯尔（Newcastle）、斯托克波特、爱丁堡、敦提（Dundee）还有斯特灵（Stirling）涌现出来。几乎所有这些社团都是由小商人、专业人员、小店主以及零售商组成。他们通常在地方的小酒馆里定期集会，其活动刊登在地方报纸上。这类社团中，许多规模都非常小，只能吸引到几十个固定会员。大多数这类社团在1793年强有力的保守派的猛烈打击下一命呜呼。18世纪80年代中期，伯明翰的立宪社就已经衰败，但它在娴熟老练的改革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领导下得以复兴。它所吸引的主要是专业人员、中产阶层商人及手工业者，还有生气勃勃的非国教徒。对于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这位谢菲尔德剃刀制作商而言，这太温和了。1792年11月，哈里森组建了“伯明翰宪法资讯社”（Brimingham SCI）并与伦敦通讯社建立了联系。但是在伯明翰，既非激进者也非稳健的改革者掌握着政治控制权。1793年5月，一份支持成年男性公民普选权的请愿书只征集到了2720个签名；到1795年，激进主义已经在伯明翰凋萎。莱斯特的情况也一样：当地改革

者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革命社里那些家境较为丰裕的温和派成员，另一派是宪法资讯社中那些出身更为卑微的激进派会员，但是这两派都很快遭遇了来自于保守主义反对势力的强力镇压，最终在1795年年底终止了活动。其他一些重要的地方城市，如布里斯托、赫尔（Hull）、利物浦、普利茅斯（Plymouth）和朴茨茅斯（Portsmouth），都不能维持像上面这些大规模的激进派社团的活动，甚至像它们一样短命的社团都不行。很显然，相较从前，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议会改革事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在有些区域的城市工匠及零售商中，它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但其失败则在于并未能获得举国一致的支持，甚至也没有把国内所有的社会团体都团结起来，共谋改革大业。

目标与设想

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雅各宾派采用了早期改革者中更为激烈的政治纲领，尤其是由“威斯敏斯特联合会”（Westminster Association）在1780年首先倡导的著名的议会改革六点方案。伦敦通讯社与地方社团将他们的目标集中在争取成年男性公民普选权、议会举行年度选举，以及议会选区公平化（equal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ies）这几项内容上，并透过演说、决议、请愿书等方式表达出来。在1792年8月16日发表的一份“告全国人民书”中，伦敦通讯社呼吁“议会每年选举一次；选举应中正无偏，不可私下买卖；全体国民皆应在其中平等拥有自己的代表”（Thale，1983，p.18）。英国雅各宾派的普遍共识即是，投票的权利应该赋予全体人民，而不是据其财产状况来决定。他们声言，否定一个人（成年男性）的公民权即是诋毁他的道德品性，无异于宣称他不够资格成其为人；拥有财产并非一个人道德品性与公民美德的证明，贫穷也不是缺失此类品格的证据。许多激进的社团坚持认为，他们要求的所有臣民的投票权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权利，都曾在英国古代宪法体制中实施过，议会改革六点方案不过是单纯地要求恢复英国人民历史上曾经享有的权利。不过，一些主要的激进派理论家欲图摒弃这种诉诸于历史合法性的呼吁，他们更强调的是，所有成年男性都具有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因更早期的约翰·洛克、理查德·普赖斯等理论家断言，所有人都拥有自然权利，他们便将新的理论建立在这些人的理性理论之上，从而丢弃了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改革家如约翰·卡特赖特、约翰·霍恩·图克等人先前的主张。尤其当保守派宣称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着财产特权的时候，激进派理论家们便开始意识到诉诸于历史证据于其诉求不利，因此他们更愿意将其诉求表达为：所有成年男性皆应当（ought）拥有这些权利，这是因为人生而平等，具有共同的人性。托马斯·潘恩在其1791年出版的《人权》（*Rights of Man* ）第一卷中，刻意抛弃了任何诉诸往昔的做法，而坚称每个时代都有权建立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要这适合自己的

目标。潘恩对光荣革命不屑一顾，当它不过是英国人的自吹自擂，还不恰当地把它跟更激进的法国、美国革命作对比。埃德蒙·柏克则立场坚定地为光荣革命辩护。他认为只要人民认为英国革命的条款是有利的，人们就应该接受光荣革命的权威。当今时代可以自由地反对过去的专制，并且开创一个拥有更广阔自由的新时代。潘恩与其他激进的理论家们都一致认为，所有人都生来平等，都拥有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从法律的角度看没有任何政府可以侵犯它。这些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自然权利能在公民社会中得以伸张，必须对那些掌权者的权力加以限制，也必须将之置于人民主权的控制之下。成文宪法中必须有对行政或者立法机关权力加以限制的条款，也必须清晰表述所有臣民的公民权利。至为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应该在国家的决策过程中保有一个可以积极发声的公民位置，如此一来人民的最高权力意志方可能对那些当权者的行为保持警醒并对其进行持久的监督。



图五《托马斯·潘恩像》

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在1792年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布面油画基础上做出雕版画，此幅是1876年奥古斯特·米列埃尔（Auguste Millière ）的雕版画复制品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这一强调所有人都具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信条引领一些激进派比他们之前的任何改革者都走得更远，使他们对所有因世袭而获得的荣耀、头衔和特权加以谴责。托马斯·潘恩鼓吹创建一个民主共和体制，但是几乎没有哪个雅各宾派社团达到他的程度。雅各宾派们可能在下面这些问题上非常赞同潘恩的理论：由世袭继承而来的立法者身份没有任何道德正义可言，把国家拆分开来变成国王的、贵族的和平民百姓的不同权益，也不具任何理性根基。但雅各宾派们也意识到，任何公然攻击君主制或者贵族制的言行，都会导致有产精英阶层撤回对他们的支持，这种支持却是他们一直期待获得的。尽管如此，这些社团很显然还是相信世界上的多数痛苦都由国王和贵族的自傲、自大及野心所产生。世上至为不公正之事就是通过向穷人征税的方式而暴敛大量金钱，用以支持一小部分人的奢靡生活；那些声称力量、勤勉、智慧、诚实或者美德都是英国大地产家族世代相袭的独有品质的说法，违背了自然提供的证据。他们相信，每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差别只能凭借个人固有的才能来赢得，而这点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所体现。

尽管英国雅各宾派坚称所有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但是有一点还不是太清楚，即他们是否也真诚地渴望生活在一个由人民统治的政府之下。这些激进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于中产阶层的男性，或者来自工人之中较有声望、技艺高超的那个阶层。他们中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摆脱这种假定：理应由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来治理和领导劳工大众。例如，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约翰·赛尔沃（John Thelwall）都期望下层阶级可以遵从中层阶级或者上流社会中开

明男性的领导。进一步，严格来说，大多数激进派人士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所关心的只是成年男性的自由权利，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他们认为女性的地位与儿童相类，都是依附性造物（dependent creatures），没有独立进行政治判断的能力。即便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这样一位深切关怀女性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作家，也没有去费力开展争取女性投票权的活动。只有一两个激进分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曾经暗示女性也应该被赋予选举权，但是激进运动所全力以赴确保的乃是成年男性的选举权（Claeys，1995）。

18世纪90年代，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激进派社团，首要关注的事情都是争取议会改革。这一关切重点对往后的几代改革者来说令他们相当困惑，因为他们已习惯认为，只有依靠经济改革才能改善穷人的处境。但是英国雅各宾派对议会改革的关注，出于两个强烈的动因。一方面，他们担心对私有财产的任何攻击都可能会使有产精英阶层疏离于改革，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会煽动穷人攻击中等阶层以及技艺娴熟的零售商和工匠们的小额财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确信，穷人遭遇的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公实际上均是由现存政治体制所造成，它可以通过对这一体系的激烈改革加以消除。造成大众在经济上苦痛的首要原因是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而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少数富有的地产精英阶层把持了政治体制，才导致政府和议会忽视了其他人的利益。为了支持君主政体和贵族统治的奢华侈靡，为了腐化立法机关而必须挥霍大量金钱，为了支付对外战争的巨额开支，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把一副沉重的税收负担压在中下层民众的肩上。在现存的腐败统治体系下，为了使少数统治阶级富裕起来，大多数的人口贫困不堪。经济上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也是无可避免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被政治体制粗暴地拉大了——这个体制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助力少数人，而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的。经由议会改革，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的政府，不再把大量金钱耗费在政治贿赂、对特权精英滥施奖赏以及战争侵略上。它也会放弃富有侵略性的外

交政策，因而减少用于武装力量上的开支。通过这些方式节约下来的积蓄将意味着税收的降低，也会把更多金钱存留在普通百姓的腰包里。

对于许多激进分子而言，政治上的改革是实质性的第一步，接下来将会由一个更顺应民意的立法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其他改革。议会改革也会促使废除现存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中止狩猎法（game laws），并改革那些导致众多小债务人锒铛入狱的法律，等等。伦敦通讯社在1792年8月16日致大不列颠全体居民书中声称，英国人将亲眼目睹以下的政治自由归还到他们手中：

出版自由，法律简化，法官无偏无倚，评审团自主独立，紧缩不必要的空间与开支，减少无节制的薪酬，公共服务更为优良，税收降低以及穷人可以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年轻人获得更好的教育、减少入狱羁押、老人得到更多的福利，以饥饿贫民为代价的奢华盛宴将越来越少。（Thale，1983，p.18）

潘恩的《人权》第二卷于1792年出版后，获得了极大成功，影响深远。此书表明，一个经过改革的政府如何可以纾解穷人的不幸。潘恩论证到，一个民主政府将会降低贫民肩负的税收，与此同时，又会向富人征收一笔特殊财产税，以募集到充足的资金来改善穷人的处境。他提议设立儿童补助金，由此穷困家庭每个孩子每年可以获得4英镑，直到他们年满14岁；每年发放6英镑的养老金给50岁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者则可以获得10英镑；贫困家庭每生一个孩子，可以得到1英镑的产妇津贴；每一对贫困夫妇结婚时，也将获得1英镑的结婚证书补助。潘恩对于整个改革方案所做出的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就体现在这非凡的寥寥几个页码中。

尽管这些激进派分子们希望议会改革能够降低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困境，但是他们坚决否认自己是社会和经济平等主义者，反对没收私有财产和重新分配国家财产的观念。伦敦通讯社和曼彻斯特的激

进分子们印刷的传单中，明确拒绝任何有关破坏私有财产原则或者继承权的建议。曼彻斯特宣传册的作者们坚定不移地表示：

改革之友们所坚称的平等乃是一种权利的平等（EQUALITY OF RIGHTS）……因劳动和成功的事业所导致的不平等，是超级勤勉和好运的结果，此种不平等正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由此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是：此一取之有道的财产，理应子父相承。倘财产无法获得保障，则将破坏所有催人奋进的动机，并从根本上摧毁公众之幸福。

甚至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的工匠们也声称：

吾辈要求权利的平等，包括政治代表权的平等……并不是要那空想的财产上的平等——此类声言倘若被付诸实践，则吾辈断言，世界必将荒芜，亦将再次沦入最黑暗最狂野的蛮荒时代。（Dickinson，1977，p.255）

即使是托马斯·潘恩本人，也畏惧社会革命。他因此提议仅仅征收财产税，以支付他的社会福利计划。约翰·赛尔沃想要改善穷人的可怕处境，但他坚信，任何对于私有财产的攻击都将导致社会的全面混乱，也会引起较之此前更加令人不可忍受的暴政统治。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在《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一书中，表达了他虔诚的心愿：富人可以自愿放弃多余的财富，分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们。在他的乌托邦世界里，财富可以自己来到最急需之人的手中。葛德文完全反对用暴力或者法律途径强行剥夺富人的财产。只有托马斯·斯彭斯在他的一些出版作品里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土地计划”（Land Plan）。该计划设想，将每一教区内的土地与自然资源都交由地方教区法人机构（parochial corporation）管理，此机构成员由居住在地方教区内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共同构成。土地与自然资源可以租借给最高竞价者，所得收入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平等地分配给社区里的每一个居民（Dickinson，1982；Dickinson，1977，

chapter 7）。

方式与活动

英国雅各宾派致力于激进的议会改革，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是如同潘恩一般的共和派，也没几个人曾经制订过社会与经济改革方面的方案。他们显然并不确定，以何种方式才能最好地改善民众的现状。他们同样不确定的是，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与策略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并且，对于这些方式与策略，他们之中还存在着许多分歧。诉诸理性，发起一场宣传运动以揭露现存政治体制的弊端，提升人民的政治意识，这是几乎所有人都支持的策略。他们发现如果理性的劝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那在下一步该采取何种政策上他们很难达成共识。只有一小群人考虑采用某种类型的暴力（physical force）方式，以向政府精英施压，使他们无法抗拒。几乎没有人还在打算进行暴力革命。只有当政府的镇压使激进改革的公开宣传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时，革命才能找到更多的支持者（见第三章）。

激进派达成重要共识的一个领域是，决心教育大众，使大众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很多人乐观地相信，宣传运动是完成议会改革目标的充分手段。1792年3月24日，各激进派社团的代表在诺威奇召开的一次大会宣布：

我们相信，给大众以政治知识的教导，教会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自然的、应有的权利，乃是实现伟大改革目标的唯一一种有效方式。这是因为，一旦人们弄明白政府在滥用权力，他们就会乐意动用任何一种合法手段来修正这种滥用。（Dickinson，1977，p.260）

所有的激进派社团都组织集会来讨论政治，并且协助分发已印制好的政治宣传品。例如，那些参加分部会议的伦敦通讯社成员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聆听某人在集会上朗读政治文献，或者参与各样政治讨论。争论在严格的行为规则指导下有序进行：不可酒气熏天，不可大吵大

叫，不可打断演讲。所有发言者都向会场主席致敬，没有人一次发言时间超过10分钟，没有人可以发言两次——除非所有想要发言的人都已经发过一次言。此种实践的目的显然是要提升成员们的政治教育水平，与此同时，在他们心中浇灌下既遵守规则又自尊自重的信念。他们被教导在为自己行动之前，要先学会为自己思考，懂得思考是行动的前奏。为了广泛地传播其观念，伦敦通讯社推销了很多大幅宣传单和小册子，分发了大量它们自己印制的演说文章，还试图创办自己的政治杂志。1794年12月至1795年1月，他们设法出版了一份8个页码的周刊《政治人》（*The Politician* ），共出4期。1796年6月至1797年5月，出版了月刊《道德与政治杂志》（*The Moral and Political Magazine* ），每期48页，一共出了12期。这两种出版物都收录了大量政治题材的书信，一些摘录自激进主义者比如约翰·赛尔沃、约翰·霍尼·图克的政治演说和发言稿，还有一些简短的论文和选自经典政治作品中的段落。但不幸的是，在伦敦通讯社出品的大约3000～4000份定期出版物中，只有一半可以卖出去，而办这份月刊却消耗了该社的大量资金与资源。正如其名所暗示的那样，伦敦通讯社也耗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来联络遍布全国的激进团体，而且还要与法国保持联系。

各地方的激进派社团同样也要组织定期的政治辩论、投入高额资金印刷出版物、分发印制好的宣传品。曼彻斯特的激进派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周报《曼彻斯特先驱报》，尽管它仅仅存在了一年的时间——从1792年3月到1793年3月——而最终遭到政府查办而停刊，但它相当杰出。谢菲尔德的约瑟夫·盖尔斯创办了《谢菲尔德纪事报》，在该地区广泛发行；有一度，他还创办了另一份半月刊，名叫《爱国者》（*The Patriot* ）。从1792年4月到1794年6月，《爱国者》报道了英国和法国激进派的发展，发表社论和政治通信，并且转载摘抄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文献。《内阁》（*The Cabinet* ）是当时另一份精彩的周刊，它于1794年至1795年在诺维奇（Norwich）出版，刊登类似的题材。另外，理查德·菲利普（Richard Phillips）创办的《莱斯特先驱报》（*Leicester Herald* ），从

1792年5月一直延续到1795年11月；德比的激进派们一直支持《德比信使报》（*Derby Mercury* ）；《纽瓦克先驱报》（*Newark Herald* ）则为诺丁汉的激进派助力；剑桥的人们得到《剑桥情报员》（*Cambridge Intelligencer* ）的援手；而那些住在泰恩赛德（Tyneside）的激进派有来自所罗门·霍奇森（Solomon Hodgson）主政的《纽卡斯尔时报》（*Newcastle Chronicle* ）的同情助力。

有几个激进派的理论家和出版人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让大众接触到他们的政治观点。其中如约翰·赛尔沃与亨利·雷德黑德·约克（Henry Redhead Yorke），到处开设讲座，但大多数人依靠的是出版自己的作品。丹尼尔·艾萨克·伊顿（Daniel Isaac Eaton）1793年9月至1795年1月创办了《大众政治》（*Politics for the People* ）。该周刊很便宜，每期只卖2便士。托马斯·斯彭斯在1793年到1795年出版的《精饲料》（*Pig's Meat* ），[1] 是所有激进派期刊中最便宜的一种，每期只要1便士。赛尔沃的《论坛报》（*The Tribune* ）于1794年3月到1795年4月，每周出版一期。因着渴望接触更广大的民众，这些激进派人士几乎搜遍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所有谈论改革的文献；他们还以一种廉价而易于领会的方式来传播这些信息，以教导大众知晓自己的政治权利。其他许多激进主义者制作了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的单独的小册子，不过没有一本能够跟潘恩《人权》（*Rights of Man* ）（1791—1792）一书的成功相提并论。《人权》一书印制了许多种廉价版本，发行到了数万，也可能是几十万读者手中。该书大获成功在相当大程度上归因于潘恩激进观点的吸引力，尤其是有关缓解贫穷劳工之困苦的论述，但也要归功于潘恩擅于与普通民众沟通的特长。潘恩很在意他的受众，也很明了他期望对读者施加何种影响。他的风格直率、清晰，他选取的案例经过了精心编排，井然有序。他还具备一种绝世天赋，即能够把清晰、理性的论证与直击人心、激发想象的能力结合在一起。潘恩的著作并不像威廉·葛德文的《政治正义论》那样具有哲学上的深度（该书因而在激进派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但是以他能收获巨大的受众群这一点而言，他超越了其他所有激

进派理论家（Claeys，1989，chapter 3，4 and 5；Philipe，1988；Speck，chapter 5.）。

尽管激进派社团在18世纪90年代最首要的职能是政治教育，但是他们中仍有一些人认识到，有必要展示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证明大众对他们的支持，因为这可以向政府精英们施加压力。不同的激进派社团都在努力推动联合行动。1793年他们试图合作请愿，对查理斯·格雷（Charles Grey）的议会改革动议表示支持，不过这些联合行动并不能与早前由威尔克斯（Wilkites）发起的请愿运动以及联合运动（Association movement）相提并论。由于没有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仅只一些轻率的独立请愿，无法证实激进事业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递交到下议院的请愿书共有36份，但其中有24份来自苏格兰，没有一份是从英格兰郡县来的。谢菲尔德请愿征集到了约8000个签名，来自伦敦的请愿书，可以确定仅有6000个签名；而在诺威奇的请愿书中签名者不超过3700人（Goodwin，1979，pp.277-280）。当然，这些数据意味着，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民众渴望议会改革，但是他们没能体现出群众性的支持，也没能表现为一股支持变革的不可抗拒的潮流。1795年，激进派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是因为，他们联合了议会中的福克斯反对派（Foxite opposition）及院外的温和意见派，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抗议行动，来反对政府的镇压法。当时就这一议题大约有超过130000个签名的95份请愿书呈递给了议会。激进派在捍卫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传统方面，赢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广泛支持；但即便如此，他们这一次还是无法阻止镇压法被立法写入法令大全。

一些激进派准备走得更远一些，不只是采取政治游说与请愿这样一些业已完善的技术。1774年詹姆斯·伯格（James Burgh）首次提出“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的理念，托马斯·潘恩、约瑟夫·杰拉尔德（Joseph Gerrald）都步武其后，加以鼓吹，现在激进派们要着手将其落实。这些理论家们认为“国民公会”可以效仿美、法革命，起草一部成文

宪法，来挑战现有的国家政治体制。激进派活动家中几乎没有人打算迈出如此革命性的一步，但是他们支持国民公会，因为这样可以将不同的激进社团团结起来，在改革方案上达成一致，以提交给议会与民众。1792年12月，当80个苏格兰激进社团的160位代表在爱丁堡集会时，这些苏格兰改革家们算是迈出了实践“国民公会”的第一步。在此次会议上，他们达成共识，决议支持温和的议会改革，然而代表中的两位领导人物，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威廉·斯格文（William Skirving）却持有更激进的看法。缪尔在大会上宣读了一份来自于都柏林“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演讲——这演讲被有些人认为具有煽动性。由于休会采用了法国大革命的程序，包括雅各宾派“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大会打上了法国大革命的印记。1793年4月30日在爱丁堡再次举行国民公会，代表们也再次分裂为温和与激进两派，不过在激进派们的支持下，通过了一份决议：邀请英格兰代表来参加在秋季举行的更大规模的公会。可是，在秋季大会举行之前，托马斯·缪尔就被控犯下了言论煽动罪，而被判处流放博特尼湾（Botany Bay）。

缪尔受到的这种不公正、报复性的审判激起了广泛的民愤，再没什么可以阻止英格兰激进派社团选派代表前往爱丁堡集会了。伦敦通讯社选出莫里斯·马格利特（Maurice Margarot）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作代表，伦敦宪法资讯社的代表是查理·辛克莱（Charles Sinclair）和亨利·雷德黑德·约克。马格利特同时也代表诺威奇的激进派。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最后选出了一位他们自己的代表。尽管只有这几位英格兰代表设法参加了爱丁堡的“国民公会”，但由于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这几个人在大会审议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设计了大会规程，主持了会议，制定出政策。他们对激进议会改革的投入、对法国革命步骤的认同，以及对现政权毫不妥协的挑战，都给苏格兰的激进派留下深刻印象，但同时也令当局惊慌。国民公会于1793年11月19日开幕。虽然他们表现出万众一心抵抗镇压的英勇，但还是没能阻止苏格兰当局于12月5日和6日强行终止会议议程。尽管国民公会从来没有提倡过暴力行动，但是包括斯格文、

马格利特、杰拉尔德在内的几位领袖会员还是被判处煽动暴乱罪，流放到博特尼湾。创办“国民公会”是激进派理念的重大创新，但他们严重误判了大众对其活动的支持力度，也危险地低估了它在当局那里引发的恐惧心理（Goodwin，1979，pp.284-306；Harriis，2008，chapter 3.）。

18世纪90年代，在激进派所采取的策略中，最明显的弱点是没能团结贫困劳动力参与到议会改革大业中。几乎没有哪个激进主义者对组织劳工表示出激赏之意，他们也没有试图利用暴乱和群体游行向政府精英施压的大众传统，或者是打算来一场以法国革命为模型的暴力革命。激进运动的领导人都来自社会中等阶层，他们很少直接跟工人团体联系，也害怕因为看起来像是在宽容暴力或是直接的暴力行动而令有产阶级与他们相疏远。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确保获得政治上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

尽管许多工厂里已经出现了各种工会组织，并且也已经通过大量扰乱生产秩序的暴力活动及有效的组织工人罢工证实了它们的实力，但大多数激进派仍不认为，工人的产业优势有可能是政治变革的有力武器。大多数激进派理论家仍然受到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观念的制约，个体自由也仍旧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有一些迹象表明，有少数的激进人士正在逐渐开始意识到组织起来的工人的重要性及劳工理论的概念。约翰·赛尔沃和托马斯·潘恩都控诉道：有钱的雇主有能力联合起来把雇工的工资和生活条件稳定在某种水平上，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当工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组织起以和平方式撤回自己劳动力的运动时，却遭到当局的反对。赛尔沃、威廉·葛德文认识到劳动力在创造财富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不过，他们并没有将这一洞识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劳动理论，因而也无法更加有力地去论证如何更为公平地分配财富。赛尔沃也朦胧地意识到，穷人们的劳动条件使得他们在一天的大部分时光里都聚在一起，这样的工作环境会促使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也让他们更有机会把自己那可被量化的力

量联合起来。但是这一意识并没有引导赛尔沃进一步设想，如果工人们能更好利用他们那可以加以计量的力量与经济的价值，那他们就可能走上自救的道路。没有任何一个激进派提倡采用经济行动，比如说，通过工厂罢工的方式，迫使有产阶级做出实质性让步。激进派很少有人出身于贫穷的下层阶级，或者全然认同于劳工大众。在实际事务中，激进派社团成员和工会活动家有一些交集，但这种现象并没有让人想到，应利用工会活动从事议会改革大业。当然，也有一些零星事例，比如，政治口号被用在劳资纠纷和粮食暴乱中，就像1792—1793年间在泰恩赛德、1795年在谢菲尔德发生的事件，但这些暴乱与罢工首要关注的并不是政治议题，并且事件参与者中很少有人属于政治激进派（McCord，1968；Wells，1977a）。

自1795年起，激进派受到政府的不断镇压，有迹象表明，他们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开始对群众示威游行的价值表示出赞赏之意，但并没有把利用广泛暴动当做影响寡头统治的策略。激进派偶尔组织过吸引到上千人参加的公共聚餐或者户外集会，但直到1795年，伦敦通讯社才开始举办超大型集会，以展示群众的支持，来鼓动改革大业。1795年10月26日，据说由超过十万人组成的一个浩瀚人群，集聚在哥本哈根庄园（Copenhagen House）附近的一块空地上，聆听约翰·赛尔沃、约翰·盖尔·琼斯和约翰·宾斯（John Binnes）支持政治改革与对法和平的演讲。这次集会促使政府以“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Seditious Meetings Act）和“叛逆法”（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的名义实施了镇压，但在这些措施被批准之前，激进派又组织了另外一些类似的集会。1795年11月12日，依然是在靠近哥本哈根庄园的空地上，举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也许是当时最大的以政治事业为目标的群众集会。约翰·赛尔沃、约翰·阿什利以及理查德·霍奇森在集会上谴责了政府的政策。当年12月7日，另一个类似的抗议集会在马里波恩场（Marylebone Field）举行。这些公众们表达了对政府镇压政策的群起反对，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抗议高昂的粮食价格以及巨额的战争消耗。要所有出席集会的人都支持一个激进的议

会改革是不大可能的，但这些集会方式却是激进派策略上的富有意义的革新。但是，它们并不意味着激进派已经计划从和平的群众游行转向武装暴乱，尽管当局确曾有此疑惧。1795年谢菲尔德发生粮食暴乱时，一些激进分子试图煽动暴乱者们抗议对法战争、要求议会改革；当1800年英格兰西北部发生了粮食暴动事件时，一些激进分子也采取了类似策略，但这都只是一些孤立的案例，不能被纳入政治激进派的任何一种总体战略中（Goodwin，1979，pp.391-398）。

在寻求实现政治变革的努力中，英国雅各宾派应用了许多与早期改革者相同的策略。不过，在对盘根错节而又自信满满的有产阶级施加压力这一让人望而却步的事业上，他们的确又探索了一些新方法。但他们没能发掘出劳工中那些已经被组织起来的力量，而且他们也并不愿意唤起一波破坏工厂秩序或者武装暴动的风波。当统治阶层拒绝接受改革，反而用镇压与迫害的方式解决问题时，大多数激进主义者丧失了信心，或者至少，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行为变得更加温和了。然而，也正因如此，少数激进分子万不得已，开始转而采取密谋和暴力斗争的方式。大部分激进主义者一向宣称，他们从未希冀在英国发起一场暴力革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声言。面对18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的镇压，一小部分边缘的英国雅各宾派的确采取了改革前辈们极力反对的密谋、叛逆、暴力斗争等方式，第三章将具体探讨这些行动。但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采用和平运动方式为何不能实现改革目标？保守主义的力量是如何将激进分子推向革命的？



图六《哥本哈根庄园》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5年11月16日发表

画面尺寸258mm×360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表现的是激进派的一场集会。他们大多是穷苦阶层，聚集在伦敦哥本哈根庄园附近的空地上。三个激进派领袖站在人群前面木头搭成的平台上，底下的普通民众看起来都很丑陋，而且皮肤很黑———正是他们在支持激进事业并高唱改革请愿。

[1] 一些地方也将这份杂志译为《猪肉》。从字面看，意思是给猪吃的食物（food for pigs），实际上它的目标读者皆为改革者，蕴含着杂志所发表文字皆为阶层较低者所写之意。此处译法希望突出该杂志名之喻指，传递原刊主旨精髓。

第二章 保守派的反击与政府的镇压

研究18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的历史学家们常醉心于改革者们高贵而又充满英雄气概的努力，以至于倾向夸大那些渴望政治变革的激进主义者们的力量与团结。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意识到以下这些问题：除了争取更加平等的人民代表权，激进派之间很少存在共识；他们从未建立起组织机构，或开发出能对统治阶层施加不可抗拒压力的某些策略；在他们的改革方案中，也没有能够团结那些数量巨大的贫苦劳工，动员他们使之成为改革方案的后盾。只有当经济不景气，激进派充当了贫困劳工的代言人时，才获得他们最大力度的支持。而必须要等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深入发展，足以改变英国的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改革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由于错判了18世纪90年代激进派的力量，对激进派抱有同情的历史学家遂不得不去解释激进主义的失败原因。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出在法国的过度革命导致了英国有产阶级的恐慌，政府由此出台政策镇压国内一切潜在的激进威胁。这其实只是激进派改革事业溃败的一部分原因。统治阶层确实采取了一个强有力的镇压政策来削弱改革运动，但是激进派可不是单纯就向更大的军事压力退缩屈服的。保守派，即改革的反对者们应时而生，他们发展出一套理论，从学理、道义上为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辩护，这套政治理论不但令有产阶层精英，也令英国大部分民众信服。保守主义最终在反攻中占了上风，这是法律及社会秩序力量的一次成功，也是一次宣传的胜利。

意识形态与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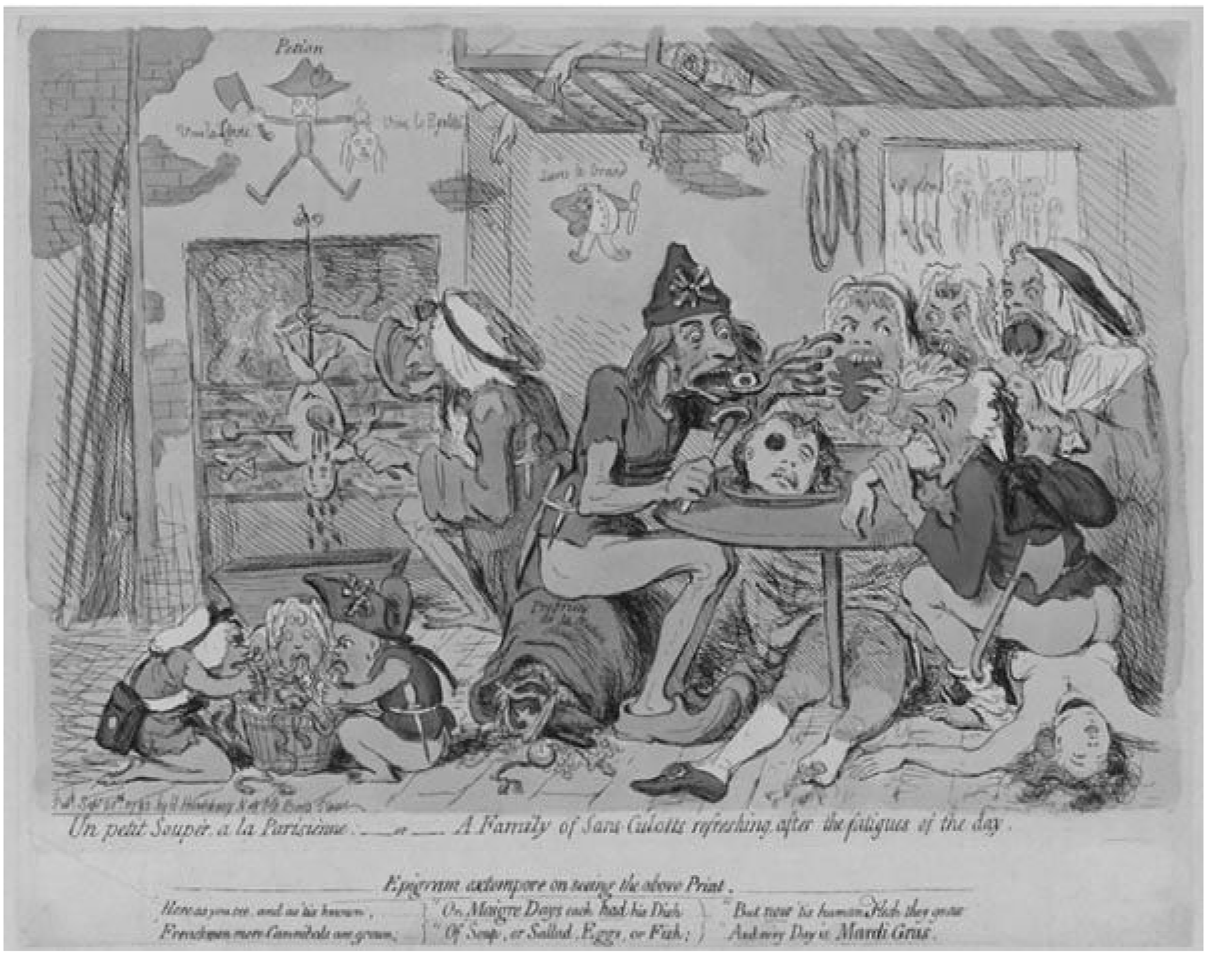
英国大部分有产阶级不需要法国大革命，甚至不需要埃德蒙·柏克在《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中以精妙的论证所教给他们的东西：畏惧激进改革，奋力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柏克认识到大革命是对全欧洲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威胁，尽管有产阶级不及柏克敏锐，但法国事件确实提高了他们认为政治形势危如累卵的意识。不过早在18世纪90年代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明显表现出对英国宪法品质的坚定信念，以及抵制变革之坚决。可是，法国与英国国内事态的发展将那些长久以来潜藏于表面之下的观念转化为一种明确的态度：一是对现存宪法几乎不假思索的接纳、一是对变革的本能式畏惧，再就是信奉权力仅能赋予有产阶级精英的观念。一旦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受到了来自国内激进分子跟国外革命者的挑战，主流秩序的辩护士们很快就发展出一套具有相当吸引力、能够持久起作用且具备智性力量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激进主义的威胁，保守派反击的首要目标是，广泛地说服公众，尤其是让政府管理精英们相信，英国雅各宾派所诉诸的改革目标将会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摧毁现有的政治社会秩序。他们因而拿法国的混乱局面来对比英国的稳定与繁荣。保守主义者的第二个目标是攻击激进主义论证的思想基础，清晰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为现存秩序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总之，所有的策略都是要证明，激进派不适合管理国家，而在英国现有宪法体制下保有权力的当政者们，恰好就是那些在一个法治良好的国度中理应行使权力的人。

大量的保守派出版物连篇累牍地挖掘诸如“九月大屠杀”、“路易十六及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Marie Antoinette）上断头台”等事件，他们用生动鲜活的笔触描摹血淋淋的细节，以此证明革命的恐怖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在他们的描述中，法国大革命既摧毁现有秩序、等级制度以及社会公正，同时又令穷人的处境更加艰难。英国的激进派也被刻画成

嫉妒贵族统治阶级理应享有的荣耀和特权的危险的煽动家、野心勃勃的抗议者。在他们看来，雅各宾派激进主义者所能蛊惑的英国人，不过是社会上那些混混、浪荡子、小偷、骗子或者身无分文的乞丐。英国雅各宾派的改革目的就这样被刻意歪曲，实现其改革理念将产生的后果也被大加夸张。激进派所要求的议会改革被描绘成君主制及贵族政治走向灭亡的第一步，而其对政治特权的攻击则被看作是威胁私有财产及整个社会区隔的序幕；他们不遗余力地促进所有人的平等，不只使富人被掠夺殆尽，也会彻底毁掉穷人。只有煽风点火的混混才能在革命引起的混乱中获利。为了与国外革命已经导致的恐怖局面和国内激进派的威胁作对比，保守派宣传家们将不列颠描述为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国家，其国民在平等公正与法治体系下享有自由和财产，安居乐业。他们宣称，真正的自由建立在生命安全与财产保障之上；在英国，穷人与富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能够安然地保全自己的资产；有产精英阶层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责任，为那些勤勉的穷人提供保障。

英国人在历史上就对法国怀有刻骨仇恨，也一直恐惧激进变革，此类政治宣传便诉诸于这一简朴的情感层面。但到18世纪90年代，保守派发展出一套更为复杂精妙的思想，以回应改革呼声。保守派思想家宣称英国乃是一个混合型政府，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构成的体系综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优点，因此英国宪法能够确保自由、稳定与繁荣。任何对于君主制或贵族制的攻击都会导致危险的不稳定的民主制度，到那时，所有的从属关系都将湮灭无存，理性的声音也将被暴力与狂热所吞没。避免混乱局面出现的关键在于国王和上议院应该运用其庇护权来影响下议院的构成，这样便能尽力巩固立法三方的关系，使之成为和谐的整体。自由与稳定犹如双星，只有当财产可以发挥其天职的时候才能确保这双星之利。有产者理应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因为他们为这个国度贡献了如此丰厚的财富；也因为他们必定能够充分考虑自己以及整个国家利益，投好其拥有的一票。拥有财富可以使得一个人与他的国家紧密相连，这也会让他为了保护财富而不断奋斗。相反，无产

者并没有稳定的利益需要去保护，且须受制于他人的意愿。穷人孤陋寡闻，随时准备听命于他们直接的雇主，又很轻易地受到不安分的煽动分子的挑唆。因此，拒绝给这些人以选举权是相当合理之事。虽然现存的选举制度还有许多明显的不规范，甚至有些荒谬，但它毕竟建立了一个代表着国家中强大、合法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的下议院。那些财富最丰、地位最高、才华最为超群之士才可被选作人民的代表。既然是这些最卓越之人就座于议会之中，那如何选举则无关紧要。



图七《巴黎小夜宵》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2年9月20日发表

画面尺寸287mm×362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是有关法国雅各宾派的画作。画家把法国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表现为食人族，他们和食人族儿童正在食用在法国大革命“九月屠杀” 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贵族的身体。

保守派政治宣传并不满足于仅仅证明现存政治体制下的诸多实际好处，或者只为展示这些好处是如何实现的；它也意欲摧毁激进派所诉诸的自然权利学说中的道德与智识基础。保守派思想家们不接受天然平等的概念，也反对所有人都应该享有选举权一说。他们同样不认为，公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建立仅为着将人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转化为广泛的公民自由，或者当权者应该听从纯粹理性的教诲。

尽管保守派承认所有人都具有一种共同的人性，但他们认为人跟人的身体、心智及命运诸方面既然如此的不平等，那么人们就不该要求在国家权力分配上达到平等。只有少数人具有可靠的判断能力、足够的智识和能力能够对他人发号施令。这些品质最有可能与生俱来，命运安排了一小部分人可以享有独立，拥有闲暇的时光和受教育的机会，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做好准备，去胜任管理他人的任务。这是自然所赋予，不可抗拒的，所以具有天赋的这一小部分人应该在国家机关中享有最大的权力，而天赋差的人应该服从天赋比他们高的人。欲摧毁社会中的自然等级，强行建立一个不自然的平等秩序，便不得不动用暴力。尽管所有人都拥有判别正义的权利，拥有合法保护他们的生命、个人自由及私有财产的权利，但他们并不具有自然赋予的运用政治权力的权利，也不具备选举立法者的投票权。这类权力并不是所有人皆能拥有的自然权利，而是任何一个公民政府皆可以以它认为适当的方式自由地授予或者否认的权利。它不是自然权利，因为它既不可以当作保有公民政府的必要手段，对于保护臣民来说，也不是必不可少之物。谁才可以完全被

信赖地赋予此项权利呢？这需要审慎决断，便宜行事。每一个社会在此议题上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因此对英国人来说，将投票权授予有产的少数人是合理正当的。

在激进派坚持认为公民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将人的自然权利转换成广泛的公民自由权的当儿，保守派理论家们也坚持说政府有必要保护私有财产、维护自然的社会区隔、抑制人自私与狂热的本性。最稳定的政府是人的需要和敬畏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的理性与意志的产物。政府权威并非仰赖任何原始契约或者任何已知的基本原理，而是依赖于一个社会特殊的历史与经验。英国宪法亘古以来便已存在，它是经验累积的产物，是数世纪以来不断试错的结果，因而也是规范性的。它已经为适应改变了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人民习性做了成千上万次调整。在判断像这样一部宪法的价值时，定要清楚人的经验远甚于人的理性。就算是那些最聪明、最敏锐的人也不敢擅自认定他们的理性已经超越人类千百年的历史经验，倘有这种想法，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狂妄自大。尊重一个社会的历史过往，接受它的现存法治的权威，这要比努力在思辨理论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秩序，或意图将权威诉诸于抽象的普世原则更让人钦佩。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不可以被轻易重塑，也不应该随意更改。对政治行动来说，仅有抽象理性原则是不够的，不能做出有效指导。审慎的首要原则是，更看重一个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传统及偏见，而非纯粹理性（Dickinson，1977，pp.270-318）。

1790年11月埃德蒙·柏克的著作《反思法国大革命》出版。这本书充斥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夸张敌意，和对英国激进派智识论点的精妙攻击。在许多有产精英们仍在观望、对法国大革命持保留意见的时候，柏克即已决定警醒国人，使他们注意他察觉到的法国革命中所蕴含的危险。他惊骇于法国的革命进程，也非常恐惧在英国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变化。柏克大部分著作都在针砭理查德·普赖斯及其他渴望议会改革的激进派们。在柏克看来，如果没有人反对这些激进派们，那他们将会摧毁

现存的教会与国家秩序，消灭社会层级、和谐及公正，并怂恿贫困群众抢夺富人的财产。柏克的这些担忧并未立即为人们接纳，不过，随着法国社会日益步入混乱无序状态、恐怖行动成为家常便饭，再加上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英国国内雅各宾派力量不断壮大，人们越来越重视他对这个国家发出的警告。对法国革命者的怨憎，对英国雅各宾派将如法炮制法国革命的担忧，成为议会与媒体政治宣传的基调。一拨政治家开始追随柏克，重申他的观点，而其追随者数目也还在不断增加。由于越来越多的保守辉格党以柏克为榜样，并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及其他很多自由辉格党决裂，所以政府获得的议会的支持也在稳步增长。在议会中，甚至只是极为温和的改革，也难以找到足够的支持者——这令他们的人数迅速减少到只有50位议员左右。

尽管人们并不一定接受柏克所有的具体观点，但这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保守主义文献，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潮流，而它们全都笼罩在“柏克忧惧”（Burke’s fears）之下。其中，最为精妙、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有约翰·鲍里斯（John Bowles）的《对托马斯·潘恩〈人权〉的抗议》（*A Protest against T .Paine’s Right of Man*，1792），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的《议会改革不可避免之后果》（*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a Reform in Parliament*，1792），威廉·文森特（William Vicent）的《短评“拉平”》（*Short Hints upon Levelling*，1792），罗伯特·内尔斯（Robert Nares）的《政府的原则》（*Principles of Government*，1792），亚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国的例子：给不列颠的警告》（*The Example of France，A Warning to Britain*，1793），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的《考量英国政府》（*Thought on English Government*，1795）。另外还有一些出自保守主义牧师如塞缪尔·霍斯利（Samuel Horsley）、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理查德·沃特森（Richard Watson）之手的布道词。为了对抗英国雅各宾派的崛起，许多效忠派（Loyalist）组织也涌现出来。这些保守主义作品中的一部分，就是经他们的手得以在底层大众中传播开来的。这些组织也模

仿激进派如丹尼尔·伊顿、托马斯·斯彭斯等人的方式，推出了自己的出版物。他们发行了很多廉价的保守主义小册子，有论文、信件、演讲、诗歌，有的则从政治学经典著作中摘录片段而成。在“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宣传品中，一本颇具战斗经验的杂志是由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约翰·胡克曼（John Hookman）在1797年11月至1798年7月创办的周刊《反雅各宾》（*The Anti-Jacobin* ）。保守派的政治领袖们不定期给杂志供稿，令这一文萃类杂志通过各种渠道的销量，每周可达2500份左右，此后他们还出了该杂志的合集，共发行了四版。《反雅各宾》后来被《反雅各宾评论》（*The Anti-Jacobin Review and Magazine* ）取代，这份月刊一直活跃到1821年。但是更为成功地深入下层民众之中的保守派政治宣传是由汉娜·莫尔（Hannah Moor）做到的。1792年，她受到伦敦主教的支持鼓励，出版了非常成功的《乡村政治》（*Village Politics* ）一书；之后，在1795年至1798年期间，又发表了一系列类似的小册子，都收入《便宜小智库》（*Cheap Repository Tracts* ）丛书。丛书中有接近一半的小册子都是由汉娜·莫尔独立完成的，而其余部分则是由与她观点相近、目标相同的人士供稿。该套丛书每册定价1便士或者0.5便士，到1798年，丛书已经销售了近200万册。这些书在车间、学校、济贫所，乃至于军队中广为流传，尽管许多买主都是有产人士，他们为了向底层民众灌输保守主义价值的教诲才买这些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书确实比潘恩及其他一些激进派宣传家的作品获得了更多读者。（Hole，1983，pp.53-69）。



图八《嗅出一鼠；或，无神论革命者午夜盘算受惊扰》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0年12月3日发表

画面尺寸258mm×365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是各种与威廉·皮特相关的讽刺画之一。这幅画表现的是，理查德·普赖斯正伏案奋笔疾书激进读物时，却被背后伸出来的埃德蒙·柏克那颗巨大如幽灵般的头颅所惊吓。普赖斯本是非国教徒牧师，画家却有意“误”称他为“无神论者”，暗指他与法国革命者有所契合。

对保守主义宣传来说，政治讽刺画和卡通漫画既吸引受过一定教育

的公众，也是通向下层阶级民众的另一条道路。包括伊萨克·克鲁克香克（Isaac Cruickshank）、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在内的许多讽刺画家们明确赞颂英国宪法，希望保护它，使其免于外来的（without）攻击和内部的（within）颠覆。[1] 在印刷出来的大量讽刺画中，潘恩、普赖斯、普里斯特利都被描绘成危险的阴谋家，正密谋采用暴力方式破坏宗教秩序和国家宪法。“革命社”成员被攻击成举杯诅咒国王倒台的人，诺威奇的激进派们被谴责为时刻准备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要出卖自己国家的人，伦敦通讯社员们则被描绘成是一群既野蛮又贫困的阴谋家。许多印刷品都警告，如若英国人所珍视的宪法被法国模式所替代，则国家必将陷入恐怖状态，到那时，暴力充斥、混乱无序与贫穷困苦将是不可避免的后果。此类印刷品中，很多都得到效忠派团体的大力资助，因而它们可以以更为廉价的价格打包购买，以向底层民众散发（Bindman）。

这场保守派政治宣传战中涌现的许多作品不是由政治精英主笔，就是直接受到他们的鼓舞而创作。这一点跟对报业的调查所清楚显示的结果并不总是相同。伦敦的一些著名报业都是由有产精英们把持操控或受其资助的，因此保守派的政治宣传有望出现在那些亲政府的报纸如《太阳报》（*Sun* ）、《真正英国人》（*True Briton* ）、《预言报》（*Oracle* ）等上面。但在各郡县，地方报业操纵在独立的中产阶级经营者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明显地持保守派观点，也认定他们的大多数读者如他们一般。史家倾向于强调激进主义媒体在地方上的兴起，但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也还存在许多报纸，源源不断地发布各种经过设计的消息和观点，立意要稳固现状。保守派的《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Mercury* ）、《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Chronicle* ）至少卖得跟激进派的《曼彻斯特先驱报》一样好，并且持续的时间比它还要长。在泰恩赛德，改革派所出版的《纽卡斯尔时报》正面临着来自保守派报纸《纽卡斯尔广告人》（*Newcastle Advertiser* ）和《纽卡斯尔报》（*Newcastle Courant* ）的严峻竞争压力。《纽卡斯尔报》尤其要定

期发表文章责难那些蓄意破坏政府的人，同时频繁刊发能破坏激进事业发展的新闻。1794年5月14日，每一个《纽卡斯尔报》读者都收到了一份随报赠送的四页宣传册，题为《穷人的朋友》（*The Poor Man’s Friend* ），意在警示底层大众不要被野心勃勃的狂热分子引入暴动与混乱中。在莱斯特和伯明翰，甚至是诺威奇和谢菲尔德，保守派报纸也都在很起劲地抨击他们的激进派竞争对手。在那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保守派轻易就大获全胜，因为人们每天都要精读诸如《约克报》（*the York Courant* ）、《切姆斯福德时报》（*the Chelmsford Chronicle* ）、《苏塞克斯广告人周报》（*the Sussex Weekly Advertiser* ）这类保守派报纸。



A DEMOCRAT, _ or _ REASON & PHILOSOPHY.

Mr Fox

图九《一个民主派；或，理性与哲学》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3年3月1日发表

画面尺寸363mm×262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是有关福克斯的印刷品。画家把议会反对派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表现为追随法国人的嗜血激进分子，腰插沾血的匕首，对着英国土地张开血盆大口。他头戴法国的“自由之帽”，口唱法国革命歌曲“Ca Ira”（《将来会更好》It will be fine），欢乐起舞。画中人物没有穿裤子，暗指此人是激进主义者（sans鄄culotte，法国激进派术语，即“无套裤汉”）。画中人物并没有被点名，但从他的络腮胡须、浓密的体毛等特征来看，画家显然描绘了一个辨识度极高的福克斯形象。



图十《恐怖必定降临于法国入侵时；或，弑君和平之缔结的强大理由》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6年10月20日发表

画面尺寸325mm×437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表现的是对法国侵略的恐惧。这幅画属于政府的文宣作品。政府试图让民众了解： 如果以福克斯为首的议会反对派支持激进改革，法国革命的危险也会降临到英国人的头上。政府以此来恐吓民众。画作描绘的就是丑陋的法国军队胜利行进到伦敦中心的景象： 国王已被砍头，贵族、法官、大臣们不是被砍头就是被绞死。首相威廉·皮特被束

缚于权杖杆子之上还试图够取法国红色自由之帽，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正拿桦树条鞭笞皮特，而后面的人群则打起法国国旗。一头约翰·牛（普通英国人的象征）开始发疯，像个愤怒的暴民一样在街道上横冲直撞。整幅画的背景是伦敦塔在焚烧。

---

[1] 这里的“外来”指的是统治精英以外的民众，“内部”则指的是政治精英集团内的激进分子。

效忠派社团（**Loyalist Associations**）

人们通常认为，那些持有自己政治目标的院外社团是18世纪晚期激进派团体的特有成就。事实上，这一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传播广泛并为人所熟知的团体中，也有一些是由反对变革、希望挫败改革者目标的人建立起来的。18世纪90年代，有好几个保守派或者效忠派社团在整个不列颠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社团可并不简单地只是有产精英强塞给无政治敏感的大众的产物，实际上它们吸引了整个英国中等社会和较低一些阶层的许多人士。渴望维护现状是许多普通民众的本能反应，他们很清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英国所取得的显著进步，也了解法国目前法律崩溃、秩序混乱的状况，并拿这两种境况来进行对比。

1787年到1790年，非国教徒开展了要求撤销《宣誓条例》（Test Acts）与《市镇社团法案》（Corporation Acts）的运动，保守派社团把这一事件当作是它们反对改革的首次亮相。这一次非国教徒的政治运动令英国圣公会教士备感压力，他们高呼“教会危险了”这个老旧的口号，以图凝聚共识，反对撤销法案。正在人们就此一议题辩论不休的时候，1790年3月，埃德蒙·柏克挺身而出，攻击了非国教徒们所诉诸的自然权利说的全部原则。他指责理查德·普赖斯等理性非国教徒（Rational Dissenters）和无神论者、无政府主义者有如一丘之貉，他们那具有颠覆性的改革方案意欲摧毁业已存在的教会和国家秩序。柏克加入这场论战对保守派阵营是一桩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不过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遍布全国许多地区的教会与国王俱乐部（Church and King clubs）所推动的宣传。为了挫败非国教徒和改革者的联盟，这些俱乐部做好了充分准备，欲图诉诸威慑手段。1791年7月的“巴士底狱日”那天，正当伯明翰的非国教徒和改革者们组织庆典时分，三个地方法官火速组织并指导了一场大众示威集会，以示抵制之意。这场原本是为了表达对教会与国王效忠之情的示威集会，很快堕落成为一次暴力骚乱，而法官们却已经

无法控制局面。效忠派们捣毁了非国教徒们集会的房屋，也将资深改革者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住处洗劫一空。普里斯特利和其他几位非国教徒被驱逐出城，改革运动的力量大为削弱。尽管信奉国教的地方法官袒护了许多暴乱者，但情况也很明显，在伯明翰，保守主义的态度是何其盛行（Rose，1960）。曼彻斯特的一个教会与国王俱乐部反对任何要求撤销《宣誓条例》与《市镇社团方案》的行为，并警觉地关注着致力于议会改革的激进派团体的创立。俱乐部成员们指控地方激进派阴谋颠覆宪法，也谴责那些威胁要把混乱和无序引入英国的人们的野蛮理论和煽动性原则。1792年12月，教会和国王俱乐部的一伙暴徒将恐惧和仇恨直接宣泄到曼彻斯特那些著名改革者的人身和财产上。尽管有证据表明，地方法官们对那些暴乱者给予了无声的嘉许，甚或可能是积极的鼓励，不过，平民大众对于改革者抱有敌意，也是非常明显的。



图十一《伯明翰祝酒》

詹姆斯·吉尔雷绘，塞缪尔·威廉·福雷斯（Samuel William

Fores）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1年7月23日发表

画面尺寸284mm×518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表现的是包括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内的议会反对派们在伯明翰举杯庆祝“巴士底狱日” 的一幕。福克斯位居画面中心，画面左侧是理查德·谢里登。激进派思想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正在敬酒。画面右侧则是群聚的普通激进派分子。

曼彻斯特骚乱是1792年年末一个更广泛的保守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将保守派和效忠派的观点团结合一，以对抗激进派。法国所发生的事件强化了政府对于国内改革的恐惧，导致它于1792年5月21日发布一份王室公告，来抵制诸多深具煽动性的政治文宣。全国许多地区都组织集会表示支持，王室公告发表在报纸上广为传播。到1792年9月，来自全国各处的地方士绅、法官、国教会教士们鼓动起草了大约386份效忠国王的誓言，以表达他们矢志统一公众意见，支持现行宪法的决心。政府被这种公开表达的民众支持所震撼，开始考虑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国内挖掘保守派的主张，以其声势来震慑激进派。1792年11月23日，一份亲政府的晚报《星报》（*Star* ）刊载了一则公开通告，推动组建了“保护自由与私有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against Republicans and Levellers，简称APLP）。发布这份通告的是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他后来宣称此举是一次独立行动，但他此前曾做过纽方兰（Newfoundland）的首席法官，也担任过威斯敏斯特警察法院法官的政府出纳员。就算他没有直接受到政府的鼓励，至少也心知肚明：内阁会对该计划加以赞许。政府一定是欢迎这一提案，并且会帮助它面世的。

1792年11月，第一家“保护自由与私有财产、反对共和派与平等派协会”（APLP）由里夫斯在伦敦的一家名叫“皇冠与铁锚”（Crown and Anchor）的小酒馆创建。截至当年12月，在首都及其邻近的郡县也建立了几家“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APLP）。到1793年初，该协会先是向西部扩散，紧接着到达内陆腹地，最后则直达北部和东部。尽管“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APLP）在诺福克（Norfolk）、林肯（Lincoln）的力量相当微弱，而且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坎伯兰郡（Cumberland）及威斯特摩兰郡（Westmorland）有可能从未建立过该社团，但它仍然迅速地成为全英国最大的政治社团。可以确知的隶属于该协会的组织，总计就达数百所；里夫斯宣称全英有2000个“保、反、平协会”（APLP），可能也并非大言。大多数活跃会员都是地方上的有产人士，不过他们都能从更低阶层民众那里获得大力支持。在乡村地区，乡绅、自耕农、教士在这些效忠派社团的委员会中扮演了骨干角色，而商人、手工业者和专业人员则是城市效忠团体的主要活跃分子。例如，在曼彻斯特，37%的会员是手工业者，零售商占到14%；而在伯明翰，三分之一的成员都是教士。底层民众并不在积极分子之列，但他们一定受到鼓舞去支持效忠派的宣言。我们看到，成打的效忠派宣言上都有数百个地方人士的支持签名，有几份的签名超过上千，而一份来自巴斯的记录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上面有5033个当地居民的签名。看起来，相比激进派社团而言，这些效忠派社团的数量似乎更多，并且可能更受欢迎。

这些效忠派社团采用了和激进派社团一样的组织形式和某些宣传策略。每一个社团也都任命一位主席、一位秘书和一位财务人员。他们也筹集捐助，组织讨论、聚餐、游行；通过宣言和决议等活动；而且社团之间保持联络、互通信息。出品和分发大量的印刷宣传物也是他们的活动方式。里夫斯在伦敦领导的“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APLP）就出品了许多最为优秀的政治文献，不仅印制他们自己的宣传小册子，还传播了数百份保守主义的小丛书，包括汉娜·莫尔、威廉·佩利、约翰·鲍里斯

等人的作品。曼彻斯特的社团也几乎同样活跃，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它就印制分发了10000份他们自己撰写的保守主义宣言，还有6000份出自其他人之手的宣传小册子。几乎所有的效忠派宣传册都在大力强调，法国已经坠入了政治混乱状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在英国宪法保护下的人们正在享有的诸多美好生活。他们指控英国的激进派已沦为法国的工具或者受到了法国的欺骗，呼吁英国人民团结起来，去捍卫现存的社会秩序（Dozier，1983，pp.53-69，76-97；Mitchell，1961；Ginter，1966；Dickinson，1989，chapter 5.）。

效忠派社团并不满足于说服的方式。为了击败激进派对手，他们还要诉诸于恐吓与迫害。在曼彻斯特，以再度活跃起来的“教会和国王俱乐部”为基础的效忠派社团，鼓动了1792年12月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一伙暴徒袭击了托马斯·沃克的家宅，《曼彻斯特先驱报》的办公室也遭了殃。1792年到1795年，另有几场暴动发生在曼彻斯特、利物浦、索尔福德及兰开夏郡南部的其他地方。由于卷入暴乱的人数经常过于庞大，因而他们不应是被雇佣来的地痞流氓（Booth，1983）。在其他很多地方，效忠派为了震慑住他们的激进主义对手，组织了很多大型招待会、游行、焰火晚会以及其他类型的活动，用以展示公众的支持。1792年年末到1793年年初，在遍布全英的几十个城市中，人们起而烧毁托马斯·潘恩的画像。许多效忠派团体警告那些旅馆和酒馆的小老板们，如果这些小业主们允许激进派分子在他们的地盘上组织煽动性集会，那他们自己的营业执照就将被吊销。倘若无法进入这些公共空间，激进主义者们也就很难组织大型集会或者定期集会。很多小旅馆和酒馆经营者都收到了这一类的恐吓。1792年12月20日，巴斯的大约111个旅馆客栈老板郑重宣告，不接待将会危害到公共秩序的集会。在苏赛克斯，约有700个旅馆签署了类似的声明，此后其他许多城市也都循例而行。还有很多效忠派社团很积极地仔细侦查当地激进派的活动，及时向当局上报各种可疑行为。在很多地区，他们都充当了政府的耳目；有时候他们甚至自掏腰包给提供煽动活动证据的线人以奖赏。

许多效忠派社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它们所在地方的激进派势力被他们迅速摧毁，效忠团体也就随之解散。随着英国内部爆发革命的威胁逐渐式微，效忠派的宣传力度也在减弱，其社团活动渐渐丧失了焦点与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讲，1793—1795年，由于法国入侵的危险日益临近，许多效忠派社团将它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战争动员上面。越来越多的效忠派参加了军队；保卫国家，争取对法战争的胜利，乃是他们的首要目标。效忠派社团帮忙提高津贴，以资助海军士兵的招募；筹措资金，以救济烈士遗属；掏钱购置更多的衣物跟补给，以向位于佛兰德斯（Flanders）的英军提供给养。为了以上目标，人们在伦敦、朴茨茅斯、南安普顿（Southampton）、纽卡斯尔、曼彻斯特及许多其他大城市中，总共筹集了好几万英镑。随着战争不断扩大、入侵威胁不断增加，效忠派社团甚至转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招募对象，他们对外抵御任何随时可能降临的侵略，对内则恐吓任何残存的激进派力量。

与法国的战争最大限度地消耗了英国政府的人力资源，因为政府希望尽可能迅速地扩充海军与陆军。此时的英国政府一方面需要抵御外来侵略的军力，一方面需要维护国内社会秩序的警力，为此，它迅速地将眼光转向了地方军事武装（民兵）。政府鼓励那些最孔武有力的优秀男子加入正规军，然而这样一来，地方武装也就被顺带缴了械；除此之外，在某些地区，还建立了反对投票服兵役的人民抵抗组织（popular resistance），随后，这些组织又被用来镇压暴动和工厂骚乱。显然，此时急需一个更强大、更可靠的军队，以同时抵制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双重颠覆的危险。这一认识导致人们对组建一支准军事志愿军提出了各种建议——这支军队将有产阶级武装起来，而解除那些不可靠的穷人们的武装。这些提案被呈递给政府。1794年2月，内阁探讨了招募乡绅和乡村自耕农进入骑兵军的可能性。1794年3月，政府决定，在已有的效忠派组织的基础上组建一支这样的军队。这一决定使志愿军的征募合法化了。志愿加入骑兵队伍的精英人士需要自备战马（理所当然，这一要求也就把征募队伍局限在了有产阶层人士之中），但是政府准备为他们和

步兵团提供武器、制服和装备。为了支付这些开支，政府并没有向议会伸手，申请公共财政的支持，而是直接转向效忠派们，呼吁他们提供私人捐资。短短几个星期，17个郡县及6个城市中的人们所允诺捐献的金额就接近10万英镑。尽管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效忠派捐资。贵族阶级和乡绅的贡献最大，但也有一部分资金是从中产阶层那里募集到的。诸如约克郡和威尔特郡（Wiltshire）这样的郡县，所提供的资金最为丰沛。在几个城市里，包括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艾克塞特（Exeter）及布拉德福德（Bradford），效忠派团体或是征集同志，组织归属于他们的志愿军队伍；或者干脆自我奉献，整个儿地投入志愿军中。在其他很多地区，效忠派团体为新组建的国防军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和很多高级军官。1794年年底之前，大量男子应征入伍；不过志愿军的队伍还在持续增长，直到1804年英国面临入侵时，志愿军已经达到了45万余人。虽然从来没有征召与法国人正面作战，但在维护国内秩序上，志愿军确实成为一支主要的警察武装。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志愿军的首要意义在于充当政府宣传的工具。它证明了有产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斗争的意愿是多么强烈。只有品性非常可靠的穷人才被允许作为地主或雇主的私人战士加入军队；即使参了军，他们仍得听命于他们自己的地主或雇主。是否愿意提供与本人所在的阶级层次相适当的服务，已成为是否忠诚于现政权的一次政治考验。游行、军事演练、庆祝晚宴上的爱国演讲都经过精心设计，为的是展示有产阶层的力量和献身承诺。志愿军不只是要威胁他们的激进派对手，也极大地鼓舞了公众的忠诚感和爱国主义情怀（Dozier，1983，pp.138-171；Western，1956）。



图十二《约翰·牛左右为难》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2年12月19日发表

画面尺寸311mm×388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画的是首相威廉·皮特站在海岸遥望对岸的法国。他问约翰·牛： 倘若法国入侵，是否准备好与法一战？约翰·牛显出很害怕的样子，表示并不确定是否要去战斗。约翰·牛一手拿着激进主义花环，一手拿着效忠派花环。他的一个口袋里装着柏克的保守主义小册子《反思

法国大革命》，一个口袋装着潘恩的激进著作《人权》。这幅画表现了普通英国民众很难抉择，是追随法国式激进主义，还是站在保守主义一方来反法。

合法镇压及政府迫害

1792年5月21日，政府发布的反对一切煽动言论的王室公告，标志着政府动用其行政、司法及立法权力着手破坏与摧毁英国激进派运动的第一步。尽管英国对激进派的镇压比同一时期的法国所实施的镇压温和得多，相比起一些现代政权的政策来说也颇形逊色，但人们有时仍将当时英国政府的策略称为“皮特的恐怖统治”（Pitt’ s Reign of Terror）。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英国政府决意要摧毁激进派的威胁，令许多仁人义士遭受苦难，而他们唯一的罪责就是渴望改善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境况。

一旦政府确信激进派严重威胁到了法律和社会秩序，内政部就被命令，着手调查激进派的活动，详细审查他们的作品。内政部的成员包括一位国务大臣[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其任期到1794年结束，继由波特兰公爵（Duke of Portland）接替]，两位常务副大臣——18世纪90年代最活跃的是埃文·内皮恩（Evan Nepean）与约翰·金（John King），以及十几位办事员组成。另外，内政部官员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负责管理创办于1792年的伦敦警察局；从1793年开始，在内政部下设立了一个二级机构“境外处”（Alien Office），由威廉·维克汉姆（William Wickham）负责，职责是监视所有到访英国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部内还设立了一个很小的情报部门，詹姆斯·沃尔什（James Walsh）是其中极为活跃的分子。内政部可以要求伦敦警局和领俸地方法官提供援助，同时它也从许多与政府有共鸣的治安官（JPs）[1] 以及遍布全国的数百个邮局和边检人员那里收集情报。治安官们上报任何有关社会失序的事务，邮政局负责查看可疑人员的信件，海关人员则密切留意所有进出英国的旅人。英国驻外官员们也要报告已离境的英国及爱尔兰激进分子在国外的活动。地主、雇主、牧师和小旅馆老板等私人个体，也要向内政部上报他们所在区域内激进派的活动。

在交上来的情报中，有些信息显然是危言耸听夸大其词的，有些信息则是出于怨恨的动机，或是挟私报复，或是信息提供者希望借此高升。所有这一类证据常常是不可靠的，带有偏见，不过内政部并不像其批评者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天真幼稚，容易受骗。它已学会从海量的报告跟密信中筛选出相对真实的信息，它也并非时时信任告密者。

内政部最饱受批评的一点是起用间谍及为告密者支付酬金——其中一些告密者还由此开启了日后身为一个特务的成功事业。批评者们谴责这些告密者们为了自己的职业而肆意捏造证据。告密者甚至被指控为是煽动家：他们故意诱使那些愚笨之人去大讲煽动性的言词，或是鼓励他们参与颠覆活动，然后将其出卖给当局。看起来，有一些间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活动的。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是名政府特务。他在1795年加入了伦敦通讯社执行委员会，之后还加入过“英格兰人联合会”（united Englishmen）的阴谋活动。虽然从18世纪90年代末开始，政府特务变得远不那么可靠了，但在最初，内政部的确雇用了一批效率极高且隐蔽极佳的特务，他们成功地潜入伦敦通讯社及其他激进派社团内部，递交了一些极为详细而又可靠的报告。乔治·利那姆（George Lynam）、威廉·梅特卡夫（William Metcalfe）、约翰·格罗夫斯（John Groves）等人都曾成功地伪装成真正的激进分子，但实际上却为政府提供着清晰而精准的情报。随着间谍的大规模应用，政府有时也会雇佣到一些效率较低或者并不那么严谨的人，但是内政部并不总是被不可靠的特务，比如威廉·巴罗（William Barlow）的那些夸大其词的报告所欺骗。自从政府真诚地相信它面临着阴谋团伙的颠覆威胁，而且到18世纪90年代末还真的遭遇到了一次之后，内政部便无路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雇佣间谍、收买线人。（Emsley，1979；Wells，1983，chapter 2）。

政府大臣们的确相信革命派阴谋的存在，也确信付诸严酷行动来抵抗激进派威胁是正当合理之事。在他们的观念里，这种威胁值得动用司法的或立法的权力来解决。在这种观念支撑下，导致了最声名狼藉的司

法判决案例，即1793—1794年对苏格兰暴动的审判，以及1794年在英格兰举行的叛国罪审判。1793年，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托马斯·缪尔与托马斯·菲舍·帕默（Thomas Fyshe Palmer）被判处流放到博特尼湾。1794年年初，威廉·斯格文、莫里斯·马格利特与约瑟夫·杰拉尔德也因为参与爱丁堡国民公会的活动而被审判。为确保能将这几人定罪，法庭精心挑选陪审团成员和一位对激进派深怀敌意的法官来行使司法权力。这场粗暴的审判引起了广泛的愤慨，因此当1794年年末几个英国激进派领袖遭到“叛国罪”之名的指控时，托马斯·厄斯金（Thomas Erskine），这位具有高超专业素养的法律专家便挺身而出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当时托马斯·哈代、约翰·霍恩·图克、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约翰·塞尔沃及其他几位领袖皆被控以叛国罪（high treason），每一片呈堂证供都为的是让陪审团相信，英国只不过侥幸地逃脱了暴力革命。厄斯金的能力就在于能毁掉这些上诉，瓦解关键证人证词的可靠性与真实性。几个回合下来，他们陆续被宣判无罪，民众对此欢呼雀跃；最终，政府放弃了对这些人处以叛国罪的努力，还释放了其他一些因涉及此案而被羁押的囚犯（Wharam）。

图十三《威廉·科贝特像》



图十三《威廉·科贝特像》

乔治·库克（George Cooke）绘

布面油画

约1831年

画面尺寸914mm×711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18世纪90年代，政府在其他一些叛国罪审判案中几无所获，即使在审判那些真的参与了革命阴谋的成员时，也并没有获得成功。的确，1794年，政府处死了一名密谋攻占爱丁堡城堡的领导人，但在1798年，它逮捕了很多与法国、爱尔兰革命者关系密切的激进派分子后，它仅能对这些阴谋者中的一人即吉姆斯·考格力牧师（Revd James.Coigley，或称O’coigley）[2] 加以定罪，判处死刑。而其他人，如亚瑟·奥康纳（Arthur O’ Connor）、克罗纳尔·德斯帕德（Colonel Despard），尽管几乎可以确定策划了暴乱，这回却都逃脱，没能定罪。在那些被控告出版煽动性毁谤文字或发表煽动性言论案件的审判里，政府则要成功得多。许多人都因为此类罪责而被逮捕，尽管最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真正进入审讯，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类案件很难找到决定性的证据，而且陪审团也常常并不愿意为他们定罪。遇到重大的案件，政府会费尽心机，以确保能给事主定罪。这种情况下，政府会诉诸于“职权讯问”（ex-officio informations）[3] ，该措施允许总检察长避开在大陪审团面前进行的初步听审，而直接进入对被告的审判阶段。有时被告对他被控以何种罪名毫不知情，而且对于总检察长而言，也并不一定非要将案件送审。起诉的威胁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挂在被告头上；如果不能支付保释金，从技术上而言，被告可以无须审讯就可直接被收监。丹尼尔·艾萨克·伊顿、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Gilbert Wakefield），以及之后的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全都在“职权讯问”之下遭遇折

磨，在没有得到任何宣判的情况下，被收押在监好几个月。假如情况特别复杂，则法律允许总检察长召集组成一个特别陪审团，其成员皆来自社会上层，受过优质教育。郡行政长官首先拟出一个由48位合乎规定的人士组成的陪审员名单，但这一名单要得到公诉署（The Crown Office）的首肯，之后检察当局还要彻查名单，删掉12个人，以防止那些有可能对被告产生同理心的人进入陪审团。据证，18世纪90年代的伦敦，即使普通的陪审团审判都充斥着大量不可靠的证据——它们都来自同样几个人，而这几人服务于不止一场政治案件的审判。在另一些案件中，当局则早已准备好起用有污点的或不可靠的证词来将人构陷入罪。毫无疑问，曼彻斯特激进派领导人托马斯·沃克就是这样被诬陷犯下阴谋叛乱罪的。

在所有卷入煽动诽谤罪的审讯中，大多数被告最后都被判处有罪。尽管这样，18世纪90年代，被判处有罪的总人数降至不足200人，这几乎不可能构成恐怖统治政府。尽管如此，许多激进派领袖还是被判以煽动诽谤罪，比如丹尼尔·艾萨克·伊顿、托马斯·斯彭斯、约翰·赛尔沃、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托马斯·沃克、《莱斯特先驱报》的法人理查德·菲利普、《纽瓦克先驱报》的法人丹尼尔·霍尔特（Daniel Holt），以及《谢菲尔德信息报》（*Sheffield Iris* ）的编辑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托马斯·潘恩在本人缺席的状况下被判有罪。而在政府的迫害和恐吓之下，一批杰出的激进派领袖被迫流亡，他们中有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约瑟夫·盖尔斯、约翰·阿什利，还有曾出版《曼彻斯特先驱报》的马修·福克纳（Matthew Falkner）和塞缪尔·伯奇（Samuel Birch）。另有很多人羁押候审长达数月，虽然后来被无罪释放，但他们在被关押期间，不但收入无着，又还得花上一笔辩护费用，困苦不堪。即使最终裁决结果为无罪开释，但是恶意诉讼仍会让人饱受折磨。有一些激进派领袖甚至并未被判有罪，也还是入狱数月，例如托马斯·斯彭斯、亚瑟·奥康纳、克罗纳尔·德斯帕德，还有约翰·宾斯和本杰明·宾斯兄弟。多数政治审判中的无罪开释案例清楚地证明，在努力击垮激

进分子的过程中，当局可能并没有全面破坏法律原则；但他们确实歪曲、滥用了法律程序，表现出冷酷无情的决心，以使其批评者们噤声。

在力图挫败激进派之战中，政府也许并没有建立恐怖统治，但是部长大臣们毫无疑问地确保议会对新立法的支持。新的立法可以增强他们在这场打击激进派运动中的力量，粉碎非国教派所有危险的示威宣传。为了使议会确信需要采取这样的镇压手段，1794年与1799年，政府准备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大群目击证人以及情报人员，提交给下议院的秘密委员会。镇压法律的颁布，在当时即受到自由派与激进派的痛斥，而此后也一直为许多历史学家所诟病，但事实上，此举的实际效用远没有人们经常所宣称的那样大。这些立法中的《暂停人身保护令》（The Suspension of Habeas Corpus）颁布后，允许政府可以不通过审讯直接将嫌疑犯入监，的确是强烈侵犯了一个人的公民自由。不过这项法案仅在1794年5月至1795年7月、1798年4月至1801年3月间执行，并且当局其实很少采取这样特殊的方式来使反对者三缄其口。只有极少数激进派分子未经判罪便被监禁关押。1795年不很名誉的“两法案”（Two Acts）也只是表明政府的警觉及决心，但它们对于作为摧毁激进派的措施而言并不是很高效的武器。其一是《叛国行为法》（The 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它以令人惊惧的方式扩大了叛国罪的内容，把任何以语言或文字“图谋或策划”处决或罢黜国王的人，以及试图强迫国王撤换大臣或恐吓议会的人，都划入其中。尽管这项法律的规定极为广泛，颇形危险，看似会使那些直言不讳批评政府的人们轻触法网，但它其实从来没有被付诸实施，也没有哪个激进人士在此一条款下被起诉定罪。其二是《煽动集会法》（The Sedition Meetings Act）。该法在控制公共集会方面也给了地方法官更为广泛的管理权，但这项法律并没有立即停止激进派社团的运行。事实上，在该法律通过后一年里，伦敦通讯社的活动次数甚至还增加了。只有约翰·盖尔·琼斯（John Gale Jones）因为在伯明翰举办的一场激进派集会，而被判以“煽动集会罪”，至于其他激进派，尚未进入针对触犯此项法律的审讯程序，就已经被判处无罪或者释放。

其他的镇压法令也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有效，或时常被付诸执行。1797年海军兵变之后，议会仓促通过了一项法案，在军队中煽动暴乱被定为罪大恶极。在这项法令下被起诉的案件只有一例，但即便在这一例中似乎也并没有谁被建议判处死刑。1799年，那些起到带头作用的激进派社团正式被法律禁止，但实际上这些社团在那时已经处于瓦解状态，立法几乎是不必要的。1799年，议会立法规定，所有的工人组织及工会都是不合法的（1800年的规定更为全面）。人们认为这些组织是要共谋限制贸易合作。这项法案当然属于报复性的阶级立法之一，它试图削弱工人为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环境的能力，但实际上它还是没有摧毁所有的工会组织，也无法阻止工人们联合起来采取工业行动。1800年的法案也很少执行，甚至当雇主试图铲除其手下的工人们已经组建的工会时，他们也更愿意采用普通法的规定来起诉工人，而不是诉诸这项特殊法案中的规定（Emsley，1981；Prochaska，1973；M.Dorothy George，1927-1929）。

尽管政府的镇压法案并没有被经常执行，但这些法令得以通过，本身就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犯，而且它们也成了时刻悬于激进派和工会组织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此意味相同的是，政府并未大量逮捕激进派人士，但却起诉、袭击、恐吓了许多激进派领导人物。这些行动摧毁了激进派社团中得力的领导阶层，使得最有能力的激进派宣传家们万马齐喑，威吓了很多老百姓，使他们放弃改革运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深深地质疑，18世纪90年代晚期激进运动的瓦解是否仅仅可以归咎于司法与立法措施。有产阶层发动的保守主义宣传运动极为有效，令相当一部分人确信：从最好的角度来讲，激进派只是一群愚蠢的革新者；从最坏的方面而言，他们是危险的卖国贼。法国内乱促使很多英国人对他们在英国宪法保护下享有的稳定产生宝爱之情，而与法国的战争又唤醒了深植于人们心中的爱国热情，相比起任何一种政治改革的愿望而言，这种热忱都更为强烈，亦更为广泛。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激进派曾经在18世纪90年代俘获过有产阶层的情感与心智，甚至说获得过广大

劳动阶层的拥护。但是，否认政府的决心也是徒劳的，它的确使得激进派的目标成为不可能之事。而有产精英们给那些诚挚追求改善同胞处境的英勇之士所带来的无尽折磨，堪称冷酷无情。

---

[1] 即“Justice of the Peace”。治安官由大臣推荐地方上有资财、受过教育的人给国王，经国王遴选来担当。他们受命管理城镇和乡村的治安，可以处理一些小的案件和纠纷，有权罚款或者把某人短期监禁于地方监狱，但无权施以死刑、流放或长期监禁。

[2] 考格力是罗马天主教会牧师，因而也可以被称之为“神父”（Father）。大多数土著爱尔兰人并非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而是凯尔特人（Celts）。他们常保留他们的凯尔特化姓名，但听起来却像是英语姓名。英伦三岛的贫穷阶层到中世纪才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姓”，这种“姓”通常建立在父亲的第一个名字之上。英格兰人用后缀“son”来造姓，“Richardson” 意思是“Richard”之子，同理还有Dickinson等；苏格兰人在造姓方面用的是前缀“Mac”，比如“MacDonald ”，意思是“Donald”之子；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诺曼法国人用前缀“Fitz”造姓，如“Fitzpatrick”，意思是“Patrick” 之子；凯尔特爱尔兰人则用“O’”，比如“O’Sullivan” 就是“Sullivan”之子的意思。“Coigley”是考格力牧师家姓的英文版，凯尔特姓是“O’Coigley”。原文中使用的是他的全称姓名，但人们通常可以只称呼他的英文版，即考格力。

[3] ex-officio是以一个拉丁文词汇，意思是“根据职务的要求理所应当的”“当然的”。这里根据上下文，姑且做此翻译，若有不妥，尚祈方家指教。

第三章 地下革命

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派社团一直明确宣布，不会使用任何武力来实现改革目标；甚至是1794年被指控犯下了叛国罪的激进派领导人，也因没有鼓动暴力革命而被无罪释放。英国是否需要一场革命？对此问题，几乎所有激进派理论家都保持谨慎态度。约翰·赛尔沃认为，专制政府有可能挑起一场革命，但他始终坚持说，他自己期待看到的是社会的逐步变革。威廉·葛德文坚决反对采取暴力手段促成政治改革。而托马斯·潘恩的态度要更暧昧些。他支持通过国民公会来创建一部新宪法的理念，但他从来没有建议人民拿起武器。他和托马斯·斯彭斯两人，看起来都是在执政阶层已经诉诸武力来保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之后，才设想求助于武力这一办法。只有詹姆斯·奥斯瓦德（James Oswald）在他1793出版的《大不列颠宪法评论》（*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一书中，似乎确信激进派的改革永远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达到。他坚持认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保障人权，但他自己则并未卷入暴力行动。

尽管在18世纪90年代并不存在任何有影响的革命意识形态，尽管激进社团明确承诺坚持和平游说的方式，但政府确信一个真正的革命威胁已然存在。大量证据、一系列目击证人分别于1794年、1799年、1801年及1812年被提交到议会里的秘密委员会面前，力图证明激进运动的关键因素就是要暴力推翻现政权。它毫无困难地说服了议会中的保守多数派，让他们相信革命阴谋的确存在，但许多历史学家却没有这么轻易就接受这些证据。

这些证据中的一部分肯定是由地方当局收集到的，他们很容易就被一些哪怕十分微小的政治抗议或社会失序的迹象惊吓到。其中有很多证据都是由间谍和政府特务收集来的情报，而他们所做只为逢迎上级，并不在意这些证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既然革命阴谋家无论何时，总是尽可能避开公众，进行秘密操作，即使是那些试图保持客观的情报收集者也不得不倚重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和二手报告。当更为可靠的革命阴谋

证据在手时，历史学家们仍得考虑，这些策划究竟是实际行动的蓝图（就任何意义而言），抑或仅是一些自欺欺人者的幻想；是一小部分精神错乱的狂热分子所为，还是代表了大众对当时社会秩序的深刻醒悟。极有可能的是，同样的证据也可以被不同历史学家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家自身的倾向及他的历史想象力。维奇（Veitch，1913）、坎农（Cannon，1973）、托米斯和霍尔特（Thomis and Holt，1977）倾向于淡化革命对英国产生的威胁，而汤普森（Thompson，1968）和威尔斯（Wells，1983）则大费周章致力于证实革命者们赢得了多么重大的支持力度。古德温（Goodwin，1979）、丁威迪（Dinwiddy，1974，1979）承认，的确存在一场革命运动，但他们却不太相信革命的效力或民众对它的支持力度。看起来，历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可能永远无法达成完全一致，但是为了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有必要来考察一下爱尔兰革命，看看它们与英国各种社团联盟的联系及对后者的影响，也要来看一下政治目标对那些暴力性的经济抗议行动的影响程度。

爱尔兰革命

18世纪90年代初，一场激进主义运动在爱尔兰兴起。从它的起源、目标，甚至社会组成等方面来看，都与英格兰、苏格兰的激进运动相类似。在爱尔兰，狭隘的寡头政治控制着政府行政，并利用其特权干涉立法机构的组成与决议。而这个寡头政府又受到掌控爱尔兰行政机关任命权的英国政府的严重影响，反倒是爱尔兰绝大多数人口对议会选举和国家决策过程都没有任何实际影响。无论如何，由于种族和宗教歧视，爱尔兰的政治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由富人、圣公会信徒和盎格鲁—爱尔兰地主组成的新教势力（the Protestant Ascendancy），拒绝给予非国教徒们在国家层面上任何重要的政治权利，这尤其针对主要居于阿尔斯特（Ulster）[1] 的苏格兰后裔，同时坚决反对给予占有全部人口至少三分之二的爱尔兰天主教原住民以任何形式的政治代表权。因此，与英格兰状况相同，在爱尔兰，更广泛的政治自由的吁求也系于对更大宗教自由的欲求之上，然而，其面临的壁垒也更高。

早在1790年年初，一些贝尔法斯特新教激进分子就开始宣称，支持议会改革和给予天主教徒更广泛的公民权。到1791年春，威廉·德伦南医生（Dr William Drennan）、西奥博尔德·乌尔夫·托恩（Theobald Wolfe Tone）、塞缪尔·尼尔森（Samuel Neilson）和托马斯·罗素（Thomas Russell）已经开始讨论建立一个爱尔兰人联合会（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其宗旨就是将新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开展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这些新教徒相信只有获得多数天主教徒的支持，他们才可能战胜强大的、根深蒂固的爱尔兰统治精英。为了消除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强烈不信任感，乌尔夫·托恩于1791年9月出版了《爱尔兰天主教徒之主张》（*An argument on behalf of the Catholics of Ireland*）。他在书中论证道：如果天主教徒不因改革运动的鼓舞而要求收回他们在17世纪被没收的土地，他们的政治力量将是可信的。但是在现阶

段，托恩打算仅把公民权赋予那些拥有10英镑固定资产的天主教徒。从天主教徒的角度来看，他们倾向于对新教徒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自己的代表——天主教总务委员会的委员们在都柏林集会，担心如果他们对法国革命者或者爱尔兰激进分子表现出太多同情心，那么对爱尔兰统治阶层有着深厚影响力的英格兰政府将会在赋予天主教徒公民权问题上拒绝做出让步。

1791年10月，托恩、德伦南、尼尔森在贝尔法斯特成立了第一个“爱尔兰人联合会”。尽管协会坚称，如果不把所有的爱尔兰人宗教派别都囊括进来，则任何一种代表制改革都是不可行的，或者是不公正的，但该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都是新教徒。一个月后，在都柏林成立了一个以纳伯·坦迪（Napper Tandy）为秘书长的协会，非常成功地吸收了更多杰出的天主教徒加入其高层。到1793年，都柏林的协会成员共计400人左右，其中有一半都经常参与集会。虽然协会的领导者和积极分子多为新教徒，但是其会员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数量几乎各占一半。协会中大约四分之一的成员是主要从事法律和医疗事务、图书销售和印刷产业的专业人员；还有同样多从事织物贸易的商人和制造商，但都柏林协会的多数行政部门还是由专业人员把持；也有许多会员来自中产阶层；还有少数工匠和手工业者，但并没有获得贫苦劳工的显著支持。实际上，该协会在1794年最终开始支持男性普选权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相当数量的会员（McDowell，1940）。

图十四《西奥博尔德·乌尔夫·托恩像》



图十四《西奥博尔德·乌尔夫·托恩像》

T.W.赫法姆(T.W.Huffam)原作，佚名画家复制

19世纪中期

画面尺寸260mm×183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爱尔兰人联合会发现成员们很难在政治纲领上达成一致，也很难赢得新教和天主教群众的支持。由于国家中的天主教徒明显居于多数，普选权的原则使得许多新教改革者忧心忡忡。不过，天主教徒担心新教地主向他们的天主教佃户和雇工施加压力，而支持无记名投票的主张，很多新教徒显然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支持保留公开投票方式。直到1794年年初，爱尔兰人联合会才最终发布了他们的激进纲领：他们支持激进派包括普选制在内的所有议会改革要求，但是不包括无记名投票。很多天主教徒都不无道理地担心，许多新教革命者并非全心全意支持天主教和新教的完全平等。天主教的领导者们依旧相信天主教委员会，但许多天主教农民开始转向一个名为“捍卫者”（Defenders）的秘密天主教组织。“捍卫者”承诺要纠正社会、经济和宗教的不公。从1795年9月开始，北爱尔兰那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新教徒成立了包括“橙带党”（ the Orange Order）在内的一些敌对教派组织。爱尔兰人联合会尽其所能努力弥合这一鸿沟，但成效甚微。从此，许多爱尔兰人尤其是许多北部爱尔兰人（Ulster）的生活毁在了教派之间的暴力纷争中（Curtin；Dickson，chapters 12，13，14，16，17）。



图十五《精忠报国爱尔兰人联合会会员》

佚名画家

设色石版画

1798年或之后

画面尺寸541mm×695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爱尔兰人联合会首先试图依靠激进演说和获取群众支持来达到目标。他们既不是共和主义者，也不是要致力于从不列颠完全独立出来。

在这一阶段，他们也的确没有考虑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是爱尔兰新教势力的不妥协，英国政府压榨爱尔兰行政当局的失败，再加上法国人从旁不断煽风点火，加大挖掘爱尔兰人心中郁积的对英不满，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将爱尔兰人联合会推向了好斗的共和主义少数派分子之手。阿瑟·奥康纳（Arthur O’Connor）和爱德华·菲茨杰莱尔德爵士（Lord Edward Fitzgerald）领导了这个少数派，他们建立了一个更加隐秘、靠盟誓结合的新团体，意欲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倘若必要，不惜采取武力。政府无力或不愿去遏制宗派之间的暴力纷争，以至于许多天主教徒胆战心惊，准备支持好斗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以作万不得已之选。这些暴力分子深思熟虑，欲寻求法国的军事援助。对于法国人而言，干涉爱尔兰事务可以开拓更多利益：一方面，这是一条消耗英国军事资源的途径；另一方面，这是对英国支持法国境内保皇派的报复。1796年乌尔夫·托恩等人受命前往法国，以军事和外交利益游说法国政府干预爱尔兰事务。这些爱尔兰外交使者夸大了爱尔兰的革命潜能，他们声称只要法国首先发动一场实质性的武力入侵，爱尔兰内部就会爆发大革命。虽然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好战分子有决心，有目标，但是他们太过依赖法国的军事援助，外部入侵力量越来越被他们视为成功的关键所在。

尽管拥有革命理想，且愿意考虑进行武装起义，但爱尔兰人联合会内的新兴好战团体仍然遭受着诸多因素的不利影响：内部分裂，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也没有获得大众支持。他们也尝试过建立一支军事组织，提出了几个武装起义的初步计划，但联合会却从来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并实现这些方案。事实上，在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之外，爱尔兰人联合会一向不是十分强大。另一方面，天主教社团“捍卫者”却拥有数量更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而且他们还拥有一支更为有效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缺乏清晰的战略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1796年，这两个社团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但从未完全整合为一。法国方面也从未能够或者也不愿意去进行一场规模足够保证胜利的入侵。

1796年12月，一支重要的法国部队被派往爱尔兰，但他们却遭遇恶劣天气，迅速溃散，狼狈逃回法国，更谈不上登陆作战了。当时只有很少的英国常备军驻扎爱尔兰，这样法国也就失去了入侵的黄金时机。经历这次巨大失败，法国不愿再次派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除非爱尔兰人首先发动起一场大规模叛乱。而爱尔兰人又不愿意在法国人露面之前就冒险武装起义。双方都希望对方率先行动（Elliott，1982）。

对各方来说，这种情况最终都是灾难性的。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好斗领导层既无法发动一次起义，又不能同时确保法国的支持，遂四分五裂。行动迟缓撕裂了领导层，也粉碎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脆弱的凝聚力。缺乏决断力，内部争吵不休，意味着联合会既没有坚实的领导，也不会有清晰的战略可被采纳。阿瑟·奥康纳以及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一个清晰连贯的行动计划，任由底层民众去实施独立却无效的行动。爱尔兰当局立即回应，决意粉碎一切政治不满的迹象。奥康纳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他们主办的报纸——贝尔法斯特的《北极星》（*the Northern Star*）被关闭停刊；他们的支持者被解除武装，整个北部爱尔兰处于军管之下。爱尔兰人联合会一部分领导人逃往英格兰或法国，希望在这些国家找到支持力量。经过几个月的羁押，奥康纳也最终踏上了前往英格兰之路。

真正的叛乱爆发于1798年，那主要是一场大众造反活动，起因于渐感绝望的天主教徒决定起而保护自己免受橙带党的暴力威胁。尽管爱尔兰人联合会也曾密谋叛乱，但现今他们却无法充分利用这种形势。内部分裂、当局既警觉又残忍、加上联合会领导人如爱德华·菲茨杰莱尔德爵士等锒铛入狱，这一切都使得爱尔兰人联合会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行动。1798年，他们还未曾对武装起义的策略做好充分准备，就被迫卷入了一场天主教叛乱；如果他们袖手旁观，任由当局镇压起义，那他们自己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爱尔兰人联合会尚没有能够控制局势，起义就发生了；而法国的军事支援没能到达，使得他们困难倍增。联合会

的领导层优柔寡断，乱作一团，而当初主张在爱尔兰发动激进改革的新教徒和有产精英们对他们事业的支持，也被严重削弱。在一小股法国军队到来之前，爱尔兰政府就已大开杀戒，镇压了起义（Gahan）。

这次失败的结果就是，爱尔兰人联合会急剧衰退，再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很多协会领导人被捕。乌尔夫·托恩自杀身亡，而其他领导人，包括阿瑟·奥康纳在内，与当局达成协议，同意认罪，以换取流放。正是这起挽救他们性命的交易，使得政府根本不需要将自己的间谍和情报人员作为主要证人召唤出庭，就已经证明了的确存在革命的阴谋，而爱尔兰人联合会是参与其中的。

除非法国人能够成功地武装登陆，否则爱尔兰人联合会是不愿意再次挑战新教势力的。而法国人也同样下定决心，不看到爱尔兰人联合会有能力发起一场大规模叛乱，就不再冒险远征。爱尔兰人联合会仍然畏惧天主教徒的势力，也无法确保能够得到新教徒的重要支持；他们虽然继续密谋反叛活动，却收效甚微。联合会不再是爱尔兰境内永久性的或有效的组织，它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已流放，无法接触到境内的真实形势。爱尔兰当局则派人继续潜入到一些残存的小革命团体中，多次捕获密谋者。1803年7月，罗伯特·埃米特（Robert Emmet）意识到其密谋已经败露，遂匆忙发动了一场攻占都柏林城堡的进攻，自然是徒劳无功。他期望能成为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者们的领导，但是他的追随者们却乱作一团，起义成为一场灾难。像1798年一样，这场武装叛乱加剧了爱尔兰境内的宗教分裂，导致爱尔兰人联合会进一步崩溃瓦解，以致于他们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重要基地丧失殆尽。他们的领导阶层现在完全以欧洲大陆为根基，在爱尔兰境内的有力支持几乎全部消失，而法国也不再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Elliott，1982；Wall，1965；Bartlett，chapters 5，6，8，9，15，16，21，22）。

---

[1] 即北爱尔兰，此处沿用历史上对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旧称。

不列颠的联合社团

爱尔兰人联合会充分认识到，要取得爱尔兰革命胜利必须依赖于其他地方的各种事件。他们清楚法国的军事援助至关紧要，但也同时意识到，在不列颠使用政治颠覆手段会给英国政府带来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显而易见，不列颠的一次成功革命能够扭转爱尔兰境内的政治形势，不过即便不列颠仅只存在武装暴动的威胁也会起到牵制作用，迫使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激进分子让步。因此，爱尔兰革命者及其特使们不仅努力寻求法国的军事援助，也在谋求爱尔兰、法国和英国革命力量的联合。他们纵横来往于英法两国间，其行动获得英国人中的爱尔兰同情者的协助，尤其是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和伦敦最贫困地区的人们。爱尔兰人联合会也长期驻扎英国，以便与英国最好战的激进团体建立起坚固的联系，煽动颠覆活动。像威廉·达克特（William Duckett）这样一些特使，早在1795年年初就与英国人建立了联络；到1796年年末，爱尔兰人联合会在不列颠境内建立起来。来自爱尔兰的密使们走遍英格兰与苏格兰各地，谋求建立支持其事业的同心社团，也准备采取革命手段实现激进政治改革。英国的爱尔兰移民们在大部分此类社团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阿瑟·奥康纳1797年逃亡到英国后，继续在那里展开武装叛乱计划。詹姆斯·考格力牧师也带着与英国革命团体建立联系的使命从法国归来，随即加入了奥康纳的计划。

这样，好战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会员将革命活动带到了英国。他们最初联系的人以及在早期支持他们的人，多是已在兰开夏郡、苏格兰中部、伦敦的贫民聚居区里定居下来的爱尔兰人。尽管如此，如果将英国的革命活动视为主要是从爱尔兰输入的舶来品，可能也太过于武断了。英国激进运动内部早就存在一批好斗的少数派，政府的镇压政策逼迫他们越来越走向阴谋颠覆之路。早在1792年12月，英国报纸就声称政府只有采取及时而极端的手段，才能将伦敦暴乱的危险计划消灭在萌芽阶

段。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新兴的激进团体确定牵连于任何的反叛阴谋中，但确有一些证据表明，有几位法国的革命者当时正在伦敦，并竭力挑起事端。当然，政府并没有捏造情节。大臣们当真震惊了，赶紧召集更多的军队前来驻守伦敦，防止任何可能的暴乱（Emsley，1978）。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到处流传的谣言说激进分子们正在秘密收罗武器，执锐练兵。实际上，罗伯特·瓦特（Robert Watt）已于1794年因计划起兵攻占爱丁堡城堡而被以叛国罪之名处死。不过，直到1796—1797年左右，英国激进派中才有更多的好战分子慎重考虑进行革命。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完全是因为政府的镇压政策，以及由高额税收、食物短缺和贸易混乱引致的大量经济窘迫造成的。早在1796年12月，本杰明·宾斯，这位伦敦通讯社的杰出领导人就访问了都柏林，并与爱尔兰人联合会里的革命派建立了联系。很快，那些爱尔兰流亡者不仅在不列颠建立了爱尔兰人联合会，还鼓励那些对政府心怀不满的激进分子们建立起类似的革命组织。



图十六《爱尔兰人联合会会员当值》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8年6月12日发表

画面尺寸195mm×269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画的是激进的爱尔兰人联合会会员。他们相貌丑陋，性情残酷，热衷于攻击良民，奸淫妇人，偷窃人家家畜，最终烧毁人家的房屋宅舍。

1797年年初，敦提（Dundee）的乔治·米尔梅克（George

Mealmaker）[1] 组建了一个苏格兰人联合会，采用了与爱尔兰人联合会一样的章程。到1797年5月，该组织声称其在敦提和珀斯（Perth）地区已有2871名成员；而到9月，这一数字大概为9653名，并且还在持续增长。是否所有的成员都致力于暴力革命，当然大为可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确已经武装起来，并且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的军事化行为使苏格兰的激进运动发生了分裂。与此同时，在兰开夏郡，以及英格兰西北部的接壤地带，一个名为英格兰人联合会的组织也在1797年春天成立，其成员要进行秘密宣誓效忠组织，献身于激进的议会改革事业——必要时不惜采取武力。协会沿用了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架构：从地方分支到地区、郡县，再到省一级，所有的团体都被纳入一个金字塔形的组织中。如同在苏格兰一样，它们的军事行为使它们与一些较为温和的革命组织如曼彻斯特立宪社产生了裂痕。还是在英格兰西北部，同样如在苏格兰一样，爱尔兰的移民们与主要来自纺织工业的工人一道积极投身其中。

1797年夏季，詹姆斯·考格力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French Directory）指派作为爱尔兰人联合会赴英大使，到达曼彻斯特；其目标是筹集资金，并评估英格兰西北部共和主义的力量。他看起来会见了英格兰人联合会在这一地区的大概35个分会的领导人。当年底，据说仅在兰开夏郡一处，英格兰人联合会的分会已有80个左右，每个分会都有15～30多个会员。威廉·奇登（William Cheetham，or Chetham）是该地区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在柴郡（Cheshire）、西约克郡、诺丁汉郡和德比郡，或许在中部的其他几个地方，也都存在着英格兰人联合会。毋庸置疑存在革命团体，但英格兰人联合会的网络推进还处于筹备阶段时，他们的领导人就被捕了。关于他们活动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于政府特务，在当时，这些探子的情报并不特别可靠，不过也有一些证据是由被捕的英国人联合会成员们自己提供的。说武装暴动已迫在眉睫不太可能，但是考虑发动革命的意愿是真实存在的。参与起义密谋的大部分人是贫困的爱尔兰和英格兰纺织工人，或者贫穷的纺纱工、裁缝、鞋匠，甚至是

底层劳工。比起英国雅各宾派团体，英国人联合会吸收的成员居于社会的更底层。

在伦敦地区，政府的镇压政策激怒了伦敦通讯社一些更为激进的会员，他们也开始考虑建立秘密组织和适时使用暴力的必要性。约翰·宾斯、本杰明·宾斯、约翰·博恩、托马斯·埃文斯及通讯社其他一些会员与在伦敦的爱尔兰人联合会员如阿瑟·奥康纳、詹姆斯·考格力等建立了联系。而流放中的通讯社前秘书长约翰·阿什利（John Ashley）则与驻法爱尔兰人联合会取得联系。好战分子们开始在伦敦建立起几个革命团体，包括“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和“不列颠人联盟”（United Britons），也即后来人们熟知的英格兰人联合会。“不列颠人联盟”成立于1797年年初，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他们期冀法国能够在英格兰暴动以及同时举行的爱尔兰起义时提供援助。联盟所招募到的新成员中，包括了托马斯·埃文斯和亚历山大·格罗威（Alexander Galloway）这些杰出的伦敦通讯社的会员。联盟开始收枪买马，演武练兵。尽管不列颠人联盟一直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使们如詹姆斯·考格力，以及伦敦爱尔兰人居住区的各个爱尔兰人联合会之间都保持着联络，但它们却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未能采取一致的行动策略。宾斯兄弟的确使得伦敦通讯社和英格兰人联合会都投票支持爱尔兰人民对自己所遭受苦难的反抗，这些信息由本杰明·宾斯带往都柏林，在那里，他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们进行了磋商。在伦敦，宾斯兄弟、克罗纳尔·德斯帕德和克罗斯费尔德医生（Dr Crossfield）等人建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旨在将伦敦的爱尔兰和英格兰革命团体的力量联合起来。1798年年初，詹姆斯·考格力为了团结首都外各团体的革命力量作为伦敦组织的后盾，再次造访曼彻斯特和英格兰西北部地区。有证据表明英格兰西北部和苏格兰都在进行收集武器和军事演练，不过这些活动因为1798年1月乔治·米尔梅克等人在敦提被捕而受阻。

当局显然开始派人潜入到各秘密团体中，跟踪革命领袖，尤其不放

过正奔走于各地协调军事行动的詹姆斯·考格力。虽然政府和革命领袖自己都夸大了群众参与秘密革命活动的程度，但毫无疑问，到了1798年年初，策划一场起义的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这些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希望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深值怀疑——但确定的是，这些武装团体之间显然没有结合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至于何时或如何发动一场武装起义，他们也并无一致或协调的策略。

不过，当政府获得了足够确凿的证据，证明几个革命领袖（包括詹姆斯·考格力、阿瑟·奥康纳和约翰·宾斯等人）正前往法国，期求法国对他们的密谋计划予以支持时，便给了他们沉重一击。1798年2月28日，这几个人被抓了起来。很快，本杰明·宾斯、托马斯·埃文斯、克罗纳尔·德斯帕德和克罗斯费尔德医生等人也在伦敦被捕。4月18日，伦敦通讯社的13个成员正在讨论建立一个英格兰人联合会分会时被捕；次日，通讯社全体常委皆被逮捕；1798年4月10日曼彻斯特英格兰人联合会的爱尔兰领袖詹姆斯·迪克森（James Dixon）被抓；其他的同谋者们也纷纷在兰开夏郡、苏格兰和爱尔兰遭到拘捕。其余许多革命者们潜入地下。这样一来，至少在不列颠，革命阴谋是暂时被粉碎了。由于政府不愿暴露自己那些有价值的线人，尤其是它派驻汉堡（Hamburg）的间谍，这使得它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为大部分被捕的革命者定罪。比如阿瑟·奥康纳，竟能召唤辉格党议员领袖来做他的人品证人，可是他随后即招供自己参与了爱尔兰叛乱，令证人们尴尬不堪。只有詹姆斯·考格力因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这是因为他被捕时，当局在现场缴获了一些敦促法国发动侵略的文件。不过，政府将这许多被宣判无罪的人一直关押到1801年，直到镇压法令失效后才将其释放。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alarm'd, _Vide. Guilty Conscience

图十七《伦敦通讯社》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8年4月20日发表

画面尺寸258mm×198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是关于伦敦通讯社的画作，表现的是曾经热闹非常的伦敦通讯社到1798年（画家做此画时）已沦落为一个小团体。它的成员面容丑陋，正秘密聚集在地下小酒馆中阴谋策划革命。

1798年夏天，有人报告英格兰人联合会正在伦敦复苏。还有间谍向政府报信，有一些组织正在伦敦东区进行军事演练，试图倾覆首都的武装力量。但与伦敦爱尔兰人联合会仍然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英格兰也没有发生可以牵制派往爱尔兰军队的暴动，致使1798年爱尔兰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爱尔兰起义的失败的确导致数百位爱尔兰人联合会的成员逃亡国外，许多人都逃到了伦敦，在此他们很快又加入进一步的革命密谋活动。1799年，英格兰人联合会确实也在伦敦复苏。议会秘密委员会稍后的报告声称，伦敦有40支英格兰人联合会的分部，其中有20支尤其活跃。这些消息随后被革命者自己予以证实。在英格兰的西北部、中部的一些地区，以及苏格兰的中部，也有一些相类的革命团体复苏，但它们缺乏活力，也没有连贯的策略。有关他们活动的证据非常欠缺，而且已有的大部分证据也不可靠，但是有一些革命团体继续存在，似是无须怀疑的。理所应当，所有这些组织都担心仍有政府间谍混迹其中。当然了，逮捕还在继续。这使得参加秘谋活动的人数急剧减少，只剩下一些孤立的群体，偶尔秘密集会一下，有的则是夜聚晓散。（Goodwin，1979，Chapter 11；Hone，1982，chapter 2；Wells，1983，chapters 3，4，6，7；Booth，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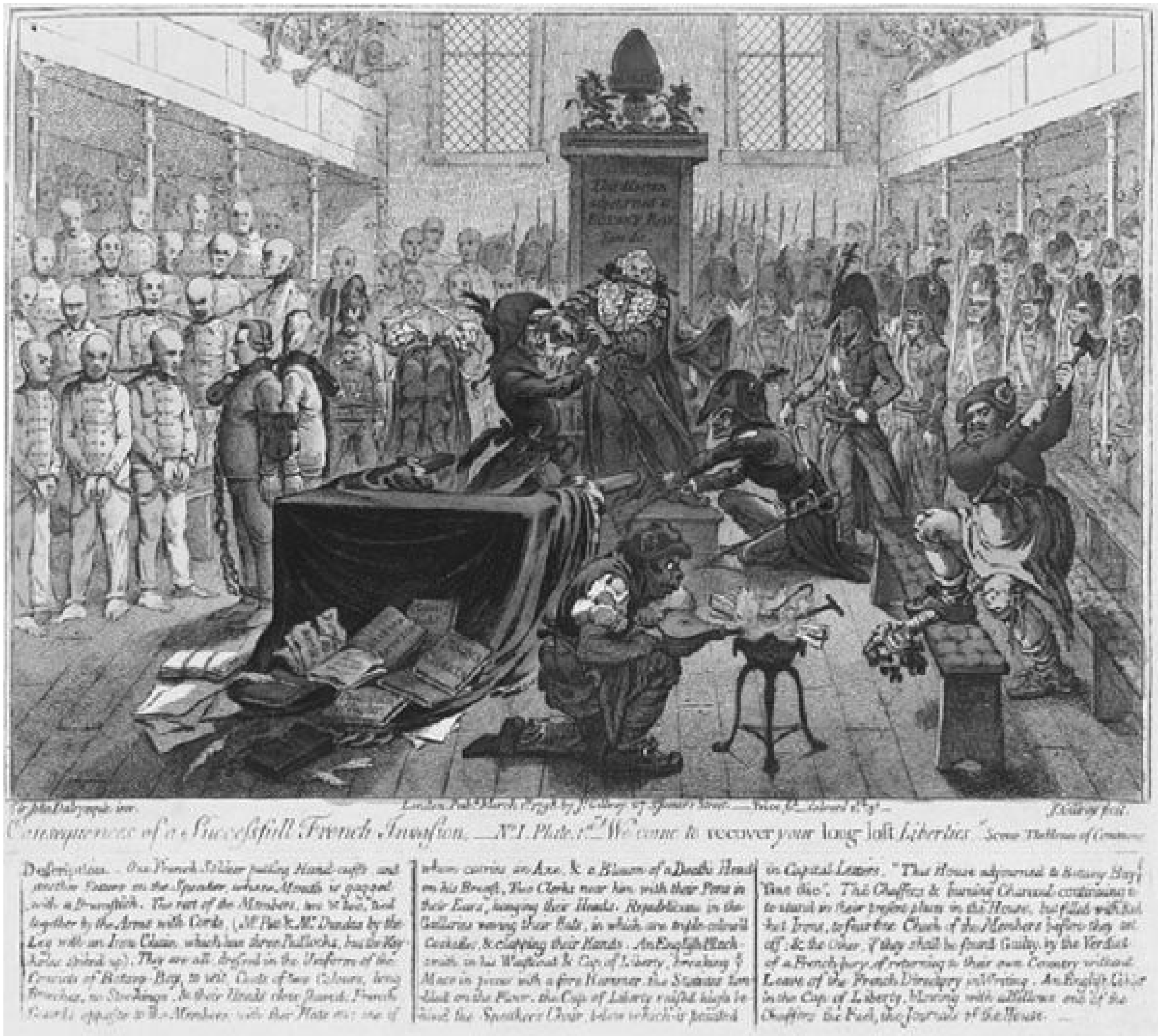
1801—1802年，英国国内厌战情绪流行，食物价格居高不下，经济萧条，导致大众对当局广泛不满，残余的革命势力也开始复苏。又有许多报告称英格兰人联合会和爱尔兰人联合会在兰开夏郡南部、约克郡西部地区以及伦敦，举行各种集会。社会上还谣传说，少数革命强硬分子聚在西北部旷野地带，利用严峻的经济困境，发掘人们心中的不满，组织夜间集会，进行军事演练。政府立即出击，将该地区几个有效的革命机构摧毁殆尽，还发起了一系列拘捕行动。在西北部地区展开的革命行动时有时无，缺乏组织，既没有连贯的战略，也没有获得群众支持。尽管如此，这些活动，加上爱尔兰人联合会在不列颠的复兴活动，已经足以激励克罗纳尔·德斯帕德1802年在伦敦谋划一场武装起义了。跟其他许多件谋反案例一般无二，政府间谍很快就打入该计划。当局侦知，密谋者们准备收买几支首都驻军，欲图攻占伦敦塔、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以及伍尔维奇军械库（Woolwich Arsenal）。当局还获悉，多名革命团体代表被派往西北地区筹募资金，同时去提醒当地的革命势力，留意伦敦的革命信号，以步武其后，随即发动一场总起义。然而，这些计划似乎并不大可能落实；克罗纳尔·德斯帕德也不大可能早在1802年11月就计划发动武装起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和他的同谋者们在准备起事之前，都希望等待一次新的爱尔兰叛乱和法国的又一轮进攻。1802年11月政府决定防微杜渐，将一切革命阴谋扼杀在萌芽状态，克罗纳尔·德斯帕德与其他几人都被逮捕。经历了此前的审讯失败，政府此次更加谨慎，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提供确信证词而又不暴露其消息源和经手者的证人身上，对他们进行交叉询问，从而建立了确定的证据（Elliott，1977）。由于逮捕德斯帕德过早，使政府未能最大程度地揭出整个阴谋，但1803年它成功地将德斯帕德定罪并处死，的确收到杀鸡儆猴之效，令支持暴力革命的人数急剧减少。在此后几年，一些英国反叛者看起来仍然坚信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在随后的对法战争的年代里，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联合行动，缺乏一个连贯性的策略，也仍然没有获得更多的大众支持。1803年后，只有靠法国的成功入侵，这些

郁积在伦敦和西北地区的革命之火才会重新点燃。

---

[1] 此处的“Mealmaker”也是英国中世纪以来造姓法的一种，即以家庭先祖曾经的营生为姓，如Baker，Butcher，Mason，Carpenter，Farmer，Smith，Painter，Taylor，Joiner等姓氏皆来源于先祖的实际生产活动。由此可以推测乔治·米尔梅克的祖上曾经是食物制造商。

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利用



图十八《法国成功入侵的后果》

詹姆斯·吉尔雷绘并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798年3月1日发表

印版尺寸125/8 in.×141/4 in.(322mm×362mm)

画面尺寸163/8 in.×173/4 in.(416mm×450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是画家受命所作的四幅系列漫画之一，也是该系列最成功的一幅。此画表现的是法国军队成功占领下议院的场景。下院议长镣铐加身，口塞异物，发声不得；小皮特和内政大臣亨利·邓达斯皆锁链下狱。画面左方是政府的支持者，他们个个身穿囚服。画面右侧是一个头戴法国自由帽的激进分子，正在砸毁皇家权杖（此物为议会开会议事的礼器，在漫画中用来表示下院开会之意）———此人显然是福克斯。与此同时，处在画面中心的，是另一个激进分子在焚烧国家律法文本。

经济困窘一直是能令激进事业招募到同志的主要原因，一些好战的激进分子也准备利用群众对经济的不满来谋得贫苦大众对政治改革方案的支持。粮食骚乱和工厂罢工中，有几个人打出了政治标语。这些案例虽然比较孤立，但也可以明显看出，少数激进派活动家偶尔试图给大众骚乱注入一些政治信息——而从起因来看，这些骚乱的实质其实是经济性的。总的说来，政治激进主义和经济骚乱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也并不充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激进的活动家们从来都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策略，以充分利用劳工大众的悲惨境遇；他们也没有设法发掘底层劳动者的力量，推动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众示威，或者组织有效的工会。尽管如此，很多历史学家察觉到，1797年海军兵变、1801—1802年“黑灯风潮”（Black Lamp）以及1811—1813年广泛的卢德骚乱（Luddite disorders）诸事件，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维度。但也有很多历史学家否认了这一点，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由于严苛的经济困境而引发的暴力抗议活动。

从很多方面来讲，18世纪90年代最令人震惊的颠覆性活动乃是皇家海军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而他们本来是抗法保国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种不满的最初动因，毫无疑问也是1797年海军兵变主要的推动力，是水兵们对低薪资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强烈不满，不过在这场

兵变中存在几分政治动机，还需进一步研究。18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也导致皇家海军中普通水兵那已经非常微薄的工资进一步缩水。这些水兵们常常要扬帆出海，保卫国家，却不得不将他们贫困的家庭弃置不顾。在海上，伤亡的风险极高，也极大地增加了水兵家庭被不知感恩的国家遗弃不理陷入赤贫的概率——国家从未对这些水手为国献身的英勇行为给予应有的尊重。战舰上的生活条件令人震惊，使得大部分船员的不满愈益增长：居所逼仄狭窄，极不健康；食物也随着出海时间的增加而稳步恶化；至于军纪，则是又暴力又野蛮。在有些船上，造成这些实实在在的不满情绪的是严重的不公：长官体罚下属，对船员的福利待遇漠不关心。海员们就此状况向海军部申诉，请求予以纠正，却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对海军中长期不满情绪的漠视，终于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可能的时候，引发了一场惊人的大范围兵变。1797年4月，停泊于斯皮特海德（Spithead）的英吉利海峡舰队（the Channel fleet）拒不出航，要求纠正此前所遭遇的巨大不公；5月，诺尔（Nore）的北海舰队（the North Sea fleet）也起而效尤。政府被事件彻底震惊，迅即做出让步，快速结束了第一次兵变。可是诺尔的水兵们组织更为严密，而且他们提出的要求更高，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打发掉的。船员们从每条船上各选出两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由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担任委员会主席。而且有人放话如果所提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把舰队开到法国。政府面对这种危机，态度反而更为强硬，虽然做出一些让步，但这些手段却是处心积虑要使兵变者分裂之举——不过海员们其时已经就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的问题产生了严重分歧。这场兵变最终受到沉重打击。1797年6月，许多参与者停止抗争，当局得以将36名领导者处死，但对数百名骨干“网开一面”，判以较轻的刑罚。

1797年的这些事件，即便只是一场单纯的海军兵变，也显示了这个国家令人担忧的脆弱之处，但真正触动政府神经的是一种恐惧：他们担心是雅各宾煽动分子挑动了海军造反。尽管内政部调查人员并没有找到海军兵变者和政治激进分子之间的确切联系，但首相威廉·皮特似乎深

信两者之间必有关联。参与兵变的人没有谁被指控参与了政治叛国活动。大部分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海军兵变仅仅是由战舰上恶劣的生存环境所致，水手们的行为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动机。但史家康拉德·吉尔（Conrad Gill）在著于1913年的《1797年海军兵变》（*The Naval Muitinies of* 1797）一书中，却断言兵变背后混杂了经济和政治两类原因。水兵们的组织、语言和宣誓的运用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这些迹象无不反映出爱尔兰人联合会和伦敦通讯社的组织结构及实践的影响。吉尔并没有对这些可能存在的联系进行更细致的研究，不过，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最近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此次海军兵变是那个时期最重大的革命前兆，他坚持认为一场普遍的革命危机通常源自两个东西的结合：广大群众对物质条件的极度不满，以及政治上觉醒的少数人对纠正不公的愿望表达（1968，pp.183-5）。罗杰·威尔斯（Roger Wells）更具细节的研究再次强化了这些论点（1983，chapter 5）。他的研究凸显了一个事实：1797年的114000名海员中，爱尔兰人高达15000人，其中多数是“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捍卫者”的前会员——政府此前为了降低爱尔兰造事者的人数，强迫他们加入海军。有证据显示，在兵变前英吉利海峡舰队中就设有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组织，他们选派了两名代表到诺尔的北海舰队，煽动在那里服役的爱尔兰水手们闹事。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们肯定渴望利用兵变来提升法国入侵爱尔兰的成功概率。他们力图延长兵变时间，甚至敦促更为激进的爱尔兰船员们直接把船开到法国去。

当然，并不是兵变中所有领头者都是爱尔兰人。但有证据表明，很多参与兵变的英国海员是“配额兵”（quota men）[1]——他们是被地方政府以奖金为诱饵诱使到舰队服役的。接受奖金的大多是当时身负债务的小店主、商人和工匠。这些人比大部分普通的海员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也正是与当时的激进社团有联系的那一类人。兵变者的组织结构，以及选派代表、舰船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等，都很显然反映出激进团体的影响。兵变期间还有几次谋求政治变革的讨论，而且有证据表明，伦

敦通讯社成员曾经造访过海军船坞，舰队中还出现过激进分子的传单。尽管这些证据相当粗略，也并不全然可靠，但是爱尔兰人联合会和伦敦通讯社看来的确与舰队建立了联系，而且一些兵变者已经具有了政治意识。尽管如此，我们仍要掂量现有证据的分量。而且，绝大多数海军兵变者的实际行为也表明，争端的首要原因还是薪酬和工作条件问题，在这些要求获得支持而得以改善后，兵变很快就被瓦解了。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也讨论了1801年到1802年间西约克郡的“黑灯风潮”，认为它是工业抗议和革命密谋的混合物（1968，pp.515-528）。虽然他也同意羊毛工人的大部分骚乱背后原因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不满，但他相信英格兰人联合会在该地区的残存势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当时的局势。在他看来，夜间集会和秘密会议就是正在偷偷预备革命的证据。他在罢工组织者那里看到了暗藏的政治目标，而且他还引证了在抗议者中间流传的一份革命传单。汤普森的论据太过于依赖一名政府特务的报告，而这名特务随后即由于递交危言耸听的报告被解职。确实，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这些夜间秘密集会是在从事进一步的政治密谋——其实毋宁说它们感兴趣的还是工人们的经济利益（Dinwiddy，1974）。不过，尽管汤普森可能夸大了这一时期工人骚动中的革命因素，但若将经济抗议和政治改革吁求看作两个全然分离的领域，则也可能是错误的。要记得，仅仅不久前，英格兰人联合会还在这一地区繁荣昌盛。1802年，两位英格兰人联合会领导人威廉·李（William Lee）与威廉·罗克力（William Ronkesley）因举办秘密宣誓和囤积兵器而被定罪。这两个人以及该地区其他一些人，都跟伦敦德斯帕德叛乱集团保有联系。

在德斯帕德叛乱集团被粉碎和“黑灯风潮”失败之后的十年里，很少有革命活动的证据；虽然爱德华·汤普森认为，这些活动只是因为遭到镇压而被迫转入到了地下，1811到1813年间的卢德骚乱使它们再次喷薄而出。汤普森承认，卢德分子是为实际的经济不公而抗议，那种绝然的

不幸感召了大量群众参与进来，且令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卢德主义（Luddism）是一场准颠覆运动（quasi-insurrectionary movement），它持续不断的徘徊在晦暗不明的革命目标边缘。”（1968，p.604）尽管卢德骚乱并非是一场全然自觉的革命运动，可是存在着发展成革命的趋势。这一观点同哈蒙德（J.L.and B.Hammond，1979 edition）、达沃尔（F.O.Darvall，1934））以及马尔科姆·托马斯（Malcolm Thomis，1970）提出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卢德运动卷入了任何政治密谋，也不存在武力推翻政府的卢德计划。

史家大都赞同，是经济原因引发了诺丁汉、南兰开夏与西约克郡的卢德抗议。诺丁汉与兰开夏郡的机器针织工、手摇纺织机织工都分别受到不同形式的剥削。他们要为所使用的织布机、针织机付出高昂的租金，而得到的报酬却极为微薄，还眼睁睁地看着雇主们雇佣工资更低的半熟练工人。只有在西约克郡，拥有高超拉毛技术的工人担忧的是，各种新引进的机器以及起绒机、剪毛机将取代他们的手工技艺。只是在向议会请愿无果，而他们参加的那个世故的工人组织又无力确保改善令他们不满的境况之后，所有这三个地区的工人们才诉诸暴力反抗。议会未能实施措施，也没有改善工厂里的家长制立法，以保护工人免受雇主的剥削。是雇主的麻木不仁和政府精英的漠不关心把工人们推入绝望境地，被迫捣毁机器与毁坏雇主财产乃是他们所能诉诸的最后一招。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卢德骚乱，尤其是发生在1812年的几次最为严重的骚乱，是由于更为和平的抗议失败才导致的后果。达沃尔和托马斯坚持认为，卢德分子转求暴力手段，以之作为最有效的斗争方式，因其迫使雇主直面他们无法接受的财物丧失的前景，从而不得不做出让步。不过，尽管这些历史学家承认骚乱工人持有军械，甚至偶尔使用了武器，他们还是断言，愤怒的工人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而被迫转向暴力行动，或者还有一些犯罪团伙利用了卢德地区的骚乱情势趁火打劫

中饱私囊。可以说，那种认为不满的卢德分子怀揣政治目的进行秘密集会的证据，其来源可疑。许多地方官员都抱着杞人之忧：当他们发现卢德分子的组织非常严密很难打入时，他们可给吓坏了。很多间谍都只有在骚乱看起来已经具有威胁时才受到政府雇用，因此他们倾向于夸大失序混乱的严重程度。他们报告的很多关于军备武装和军事训练的信息都基于谣言和道听途说。不过可能有少数政治激进分子在骚乱地区内从事革命密谋行动，据云他们是那些失败了的早期革命组织的残余势力，而他们并未与暴动者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也没有获得当地群众的普遍支持。尽管政府担心深潜地下的革命阴谋，但真正对秩序造成威胁的还是到处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大肆攻击雇主及其财产的活动的失控。这些高度组织化、领导得当的卢德团伙当然是无法无天，破坏了法律，而他们在地方上也获得了相当多的同情，但是他们并没有密谋要推翻现存的宪法体系。

不过，爱德华·汤普森强调，不要忽视或低估了所有当时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了激进分子的代表们当时往来奔走于整个卢德地区，鼓励工人收集武器、进行秘密武装训练，为将来的暴动做准备。在他看来，有少数的政治激进分子给卢德运动注入了政治因素，至少是在那些不满情绪尤其高涨的地区更是如此。他同意，诺丁汉郡的卢德运动基本上完全是一场工业纠纷，其刺激因素纯粹是经济上的不满，但他坚持认为在兰开夏郡南部以及约克郡西部的部分地区，一直存在着革命密谋的传统，对法战争也带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心生怨望，这些因素产生了一些秘密的政治活动，以及对武装暴动的初步准备。的确，一些卢德分子一直在攻击政治腐败，以及维持对法战争所导致的横征暴敛（Thompson，1968，pp.569-659）。

约翰·丁威迪（John Dinwiddy）并不总是接受爱德华·汤普森有关此一时期革命活动的论证，但最近他得出结论：汤普森没有将工业抗议和政治行动竭然分开是正确的。这两种行为方式通常直接密切相关，而且

由同样的不满所引发。工业行动的失败可能会导致要求变革政治体制，而政治行动则以改进经济状况为目标。有清楚的证据表明，1811年间南兰开夏郡的手摇织布机厂的织工们决意向议会请愿，以改善他们的经济惨境。1811年10月，曼彻斯特的纺织工人委员会印制散发了一篇演讲辞，有力地指出，立法机关拒绝改善他们的悲惨处境与要求激进议会改革之间的关联。1812年3月的织工请愿，抗议旷日持久的对法战争劳民伤财；他们宣称只有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才能带来和平。这次抗议请愿没有任何结果，似是激怒了一些纺织工人，令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政府间谍报告说，一场广阔的革命运动正在该地区酝酿，几乎可以肯定是对形势发展的夸大。不过，1797—1802年间曾在这一地区存在过的那种秘密政治活动，此时似乎的确有所复兴。1812年头几个月，尤其是在曼彻斯特和博尔顿（Bolton）地区，关于政治委员会、秘密宣誓、夜间集会、武器和资金筹备这些行动的证据相当充分。各种支持议会改革的决议与请愿活动从南兰开夏的工业区爆发，直达相邻的柴郡和约克郡，而且其间也掺杂着一些暴乱和攻击私有财产的行为。看起来，在那些以请愿、决议、演说等方式参与宪政改革运动的人和那些进行暴动与秘密袭击私产者之间，我们无法做出截然二分。一些不能完全忽视的证据表明，有地下政治团体将他们的政治活动传播到了西约克郡的一些工业城市，比如哈利法克斯（Halifax）、巴恩斯利（Barnsley）、赫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谢菲尔德、利兹等。应该说在1812年的英格兰西北部，成型的武装革命计划尚不太可能，或者说并不存在广泛的革命运动，但是已有证据表明，一些抱着革命目标的工人团体正在开始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革命动员（Dinwiddy，1979）。

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质疑有关卢德主义的传统看法，即认为卢德运动全然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目标的革命运动。但爱德华·汤普森及其追随者们可能过于夸大了19世纪早期英格兰工业地区革命运动的规模、有效性、所获得的支持度以及活动的持续性等问题。这些革命运动是否对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或者说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希望变成这个国

家的巨大危险，都还值得怀疑。实际上，从数量上看，密谋团体还很少，它们松散地结合在一起，零零星星地有一些武器；他们既没有一个清晰连贯的政治策略，也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然而，尽管我们持有一些保留意见，却没有理由再坚持以下观点了：跟1797年的海军兵变及1801—1802年的“黑灯风潮”相比，1811—1812年的卢德骚乱只是孤立的、简单的经济萧条的产物，仅以物质状况的改善为目标。

---

[1] 皇家海军在英国控制海域，抵抗外来入侵方面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然而，服役海军却十分艰苦且薪酬低廉，水手们宁愿服役商船也不愿当海军，因此当时皇家海军并无足够的海员能够从事长期战争。为了征募海员，首相威廉·皮特于1795年提议出台“配额制”（ The Quota System），要求英国各城市按其人口比例及港口数量提供相应名额的海员。这是一项较难完成的任务，各城市想方设法，有出金悬赏征募海员使其甘心服役的；也有直接将本应入狱的罪犯送去当海军作为不入监牢的报偿。该制度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随之宣告终结。

第四章 激进主义再发动

18世纪90年代初，激进运动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在英国日益壮大，但很快就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先是增长受到抑制，继而活动的开展也被严重压制。政府的镇压和一波保守主义浪潮，再加上由于与革命法国进行的长期而又艰苦的战争唤起的爱国情操，合力抑制了激进社团的快速增长。好战的激进分子被迫转入地下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但是政府特务打入了许多革命团体里面，这使得他们那些最为危险的密谋被揭穿而无法实现。那些革命活动从来没有详细的实施方案，没有一个相互协调的革命策略，也没有广大支持者，或曾在爱尔兰之外的地方真正发动过。在议会外的群众激进运动的崩溃，恰逢辉格党党内改革力量衰减分裂之时。1797年辉格党动议进行温和议会改革，却只获得了极少数人的支持，该党就此失去了对这项事业的兴趣。

至少有十年时间，政治改革没有再次成为严肃的议会辩论议题，也不再是受到广泛大众支持的事业，但是公众渴望更大自由的愿景，作为一个讨论的话题，却从未全然消失。许多城市如伦敦、诺维奇、利兹和纽卡斯尔，都还有小的改革者团体继续开展活动。1802年，因改革者的保驾护航，H.库姆（H.C.Combe）、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和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Sir Francis Burdett）分别赢得了伦敦、诺维奇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的选举，只不过由于反对者上书请愿，博迪托爵士最终并没有得到该席位而已。改革事业逐渐成为一个公众讨论的话题，出现在报纸、各种宣传小册子和辩论协会中。克里斯托弗·怀威尔、约翰·卡特赖特和约翰·霍恩·图克这些资深改革者们不但重回战场，还获得了弗朗西斯·博迪托（Francis Burdett）、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亨利·亨特（Henry Hunt）这一拨颇具才干的新人的支持。1807年博迪托爵士在国内最大的选区威斯敏斯特当选议员，表明了激进主义力量在大城市里日益壮大。待到1810年5月，115名议员支持托马斯·布兰德（Thomas Brand）的稳健议会改革提案，证明自由大业再一次成为政治领域的鲜活议题。尽管上述事实乃是激进主义复兴的重要标志，但它们同样也证明，自18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改革事业已是何等

衰败，而改革者未来想要收复在这些年里丢掉的所有失地，又是何等困难。很显然，有一些利于激进主义复兴的条件，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严重障碍，阻碍它阔步向前。面对这些机遇和障碍，激进主义必须调整它的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其政治宣传方向，并重建其组织（Spence）。

阻碍与机遇



图十九《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像》

亚当·巴克（Adam Buck）绘

水彩画，约1810年

画面尺寸195mm×162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曾经联手摧毁了18世纪90年代激进运动成果的各种保守力量，到19世纪初对改革或许已不再那么仇恨和恐惧了，但他们已更加深信不疑：激进的变革就是灾难的前奏。1799年和1801年议会秘密委员会调查英国革命阴谋的报告并没有引发恐慌，相反坚定了政府粉碎任何政治不满迹象的冷酷决心。1803—1805年英法战争期间，严重的法国入侵威胁并没有导致对少数残存革命分子发动一场如猎巫一般可怕的政治迫害，但此种威胁确也激起了一股抵抗入侵的强烈决心，并同时迸发出维护现有秩序的爱国主义浪潮。当然，激进分子依旧要面对镇压、恐吓和污蔑等，但他们真正失去的是意识形态的根据，并且双方都逐渐意识到这一政治辩论中的巨变。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思想论争从对未来进步的辩论转变成了一场对于当前灾难的争论。法国大革命后，发生在欧洲的如潮水一般的系列革命事件摧毁了激进主义者的乐观希望，也强化了保守主义者的悲观预言。

激进派相信，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将预示着理性与正义时代的到来，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里才有和平与繁荣。而保守主义者则预言，革命性的改变势必将摧毁旧政权的稳定和秩序，从而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届时，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能够得到保障。爱德蒙·柏克曾经预言，法国大革命将导致军事独裁，它将在激进变革给人民带来的彻底混乱中强行制造出某种秩序。从恐怖的无政府状态，经由督政府的腐败，再到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法国发生的事件一一证实了此一惊人预言。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和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这些人在早期还是法国革命的同情者，后来也逐渐认识到法国并没有推进自由事业，而是从一种形式的暴政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暴政。法国已经不再是欧洲人民希望的灯塔，而成为毫无节制的侵略者，意图一个接一个的毁灭其他国家的独立和公民自由。拿破仑征服了荷兰、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班牙，这向英国人民证明，他的目标不是把自由传播到国外，而是将法国的势力扩大至整个欧洲。更令人担忧的是，拿破仑准备入侵英国让“她”臣服于他的意志，当这看来已不可能时，就希望通过削弱英国的经济，使她再也不能挑战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这些危险动摇了英国内部的激进主义诉求，并极大地激起了英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时人心中，法国大革命和社会混乱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拿破仑这个名字与专制和军事侵略同义。因此，激进改革将带来和平与繁荣这一观点越来越难以为人接受，也很难再主张说，英国政府是反动派，正在向一个仅只希望改革其国内政治制度的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的、不必要的战争。英国此时已淹没在保守主义的政治宣传里，大部分的宣传目标都针对社会下层，但这些文献都不再专注于挑战自然权利理论的智识基础，或者试图反驳激进主义所声称的法国是自由之友这一观点，因为保守主义在这一场观念宣传之战中已经获得了胜利。保守派转而说服英国民众相信法国军事胜利的必然结果就是导致整个英国被掠夺一空而荒芜一片。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一切他们所珍视的东西，整个英国必须团结起来，投入与外国暴君的斗争中（Klingsberg and Hustredt，1944）。

以上局势及氛围不但有利于保守派，而且耗时费财的战争在遏制拿破仑野心的同时，也给那些希望在国内进行温和政治改革的人们创造了机遇和有利条件。这场战争对大部分人民来说，都是一付沉重而苦涩的负担，令人充满强烈的厌憎之感。政府为极大地增加财政收入，提出各种各样新的估定税（assessed taxes）、遗产税，也创造出令人厌憎的所得税。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政府每年征收高达六千万英镑的战时税，

但即使是这样，也只占战争消耗的58%左右。为了填补每年的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筹集巨额贷款，大量增加国家债务。1790—1815年，英国的国家年度支出总额增长了五倍；国债则从1793年的2亿3千8百万英镑上升到了1816年的9亿零2百万英镑；而战争的总成本已达到了惊人的15亿英镑之多。如此巨额的资产征敛与财政支出，需要大力重组财政部和专业化的财政人员，需要任命更多的收税员与税务稽查员，还需要极大地扩充军备与海军造船厂。陆军和海军急剧扩张，成千上万的人充当志愿军和民兵，这些力量加起来，使得英国需要担负大约785000人的兵力。政府比以往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为这些军事力量提供食物、武器、制服、船只、马匹、装备以及其他各种补给。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行政机构极大地增加了它们在国家财政、商业和制造业等各项事务中的人手、权力以及影响（Harvey，1978，pp.334-337；Emsley，1979b，pp.106-109）。战争的负担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人们公开批评高额的税率、食物的短缺、因持续军事冲突而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以及在1807—1808年之后变得愈发严峻的贸易混乱。战争造成的所有这些直接后果都加诸中等阶级和社会底层中那些富有生产能力的人民身上，使得他们苦难深重。与此同时，战时调动国家资源的需要，也使得行政机关规模膨胀，权力增大，养肥了少数发战争财的奸商。人们把战时税收和战争借贷视为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同时也是对政治自由的严重威胁。这场战争的财政需求为大多数人口带来了日益沉重的税务负担，但通过使用和支出这笔巨额资金，金融家、政府承包商、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却把自己的腰包塞得鼓鼓囊囊。这种“战时体制”（war establishment）是与统治寡头的特权紧密相关的，它在国内创造了一个利益集团，其势力之巨，无论是议会还是政府，无论是它们的构成还是它们的决策，概莫能出其外。统治寡头和战时体制以中等阶级和低层民众为代价形成了一个“邪恶联盟”（an unholy alliance），它赞成扩张政府权力，为此不惜牺牲议会的独立性和臣民的自由。

人们一向从理想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这场战争，因为它损耗巨大，野

蛮残酷，摧毁一切。对很多自由主义者和非国教徒来说，这场战争是对理性、正义与基督教信条的冒犯。从更加务实的角度看，战争负担逐年加重，也使得人们难以容忍。自由派观点越来越担心战时体制的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制造业从业者对于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政治层面的破坏，感到十分厌恶，但政府却对他们的心声不理不睬。结果就是导致自由主张和经济利益结成同盟寻求和平之道。他们建立了“和平之友”（Friends of Peace）组织，尽管它从来都不是个正式的组织机构，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确定的成员，但它仍然精心组织了一场院外运动（extra-parliamentary movement），以引导公众认识到战争所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最为激烈的反战抗议来自中部和北部的制造产业地区，它们由一些杰出的制造商协同合作，精心策划。其中很多人都是非国教徒，并以其自由观念广为人知，包括利物浦的威廉·罗斯科（William Roscoe）、波特里斯（Potteries）的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谢菲尔德的埃比尼泽·罗兹（Ebenezer Rhodes）、莱斯特的约翰·考特曼（John Coltman）和德比的威廉·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他们的观点在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上，比如《利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 ）、《谢菲尔德信息报》和《莱斯特纪事报》（*Leicester Chronicle* ），被广泛宣传。1807—1808年，由于枢密院威胁要阻止所有中立国与法国的贸易活动从而限制英国的贸易出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请愿抗议活动。这些中立国是老客户，常购买或运载英国货品。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领导了南兰开夏郡的请愿，随后西约克郡许多大型城镇也加入其中。无数份请愿书，超过150000个签名，被送达议会。这场请愿运动并没有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但是，1812年，正在经济危机和卢德骚乱达于巅峰之际，另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再次爆发。这一次抗议活动从南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开始，席卷整个中部地区，由亨利·布鲁厄姆（Henry Brougham）居中协调。他列举事实炮轰政府，其盟友们则在地方出版物上大做宣传。至少有5000人出席了谢菲尔德的抗议集会，而伯明翰集会参加者更多。大约5万人

在请愿书上签名。1812年6月23日，政府决定撤销枢密院令，这对这场由国内最重要的制造业地区组织的了不起的合作运动不啻为一褒奖（Cookson，1982）。

反战抗议并不限于这类院外运动，更不只是集中在对英法战争所导致的经济代价的批评上。在议会内外也有相当多的批评声音，指责政府在处理战争事务的不力及它的部分代理人的腐败。军事灾难和政治丑闻更是突出了政府的无能，也成为批评者集中表达其挫折感和愤怒的标靶。这些事件也使得议会内外的反对者们不但将责任推到个别的大臣身上，而且也将其归咎于整个政治体制。公众对军事失利以及政府腐败的关注无疑大大助长了议会改革的要求。

举例来看。1808年8月，英军在葡萄牙与法国签订了一份《辛特拉协定》（the Convention of Cintra），允许战败的法国军队带着他们所有的物资和装备撤回法国。消息传来，引起公众广泛而又极大的愤慨。各界人士曾对此役寄予厚望，现在则都惊骇于这一背叛行为，公共媒体充斥着对协定的批评之词。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举行抗议集会，政府开始失去公信力。一年后，瓦尔特伦远征（the Walcheren expedition）的失败甚至引起了更大的公众愤怒，政府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刁难的调查委员会的质询。政府内阁试图减少公众对这次调查的关注，因而将记者们挡在了下议院的长廊外，这真可算是一桩考虑不周的行为。当伦敦通讯社的前领导人约翰·盖尔·琼斯提议，要在伦敦的一个辩论团体讨论此事时，政府以侵害议员特权的名义将其逮捕下狱。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在下议院对琼斯被捕入狱提出抗议，并将他的观点发表在威廉·科贝特主编的《政治纪事报》（*Political Register* ）上。博迪托爵士这些行动同样被斥责为对议员特权的侵犯，下议院在1810年4月6日这天投票表决将博迪托移送至伦敦塔关押。在投票表决之后的三天里，博迪托拒绝被捕，他的反抗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大批民众聚集到博迪托住所附近，还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其中至少有两人在与军队的冲突中死

亡。博迪托被监禁后，公众的政治热潮也并没有退去。伦敦城里的墙上到处都是用粉笔写的标语口号，如“永远的博迪托”，“不要国王”（No King）和 “改革议会，做自己的主人”。类似的标语还出现在伯明翰、纽卡斯尔、卡莱尔（Carlisle）、埃克塞特（Exeter）和坎特伯雷。一封从曼彻斯特寄来的致博迪托的信件有17940个签名。伦敦市议会也向议会请愿主张议会改革，这是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头一回。诺丁汉、雷丁（Reading）、考文垂（Coventry）、坎特伯雷、赫尔、罗切斯特（Rochester）、贝里克（Berwick）、武切斯特（Worcester）和伯克郡（Berkshire）等地也组织了类似的请愿活动。以约翰·威尔克斯一样的方式，博迪托也成为自由的殉道者，家喻户晓，而民众对议会改革议题的热情，虽然只是暂时性的，但也已瞬间爆棚。（Harvey，1978，pp.214-215，268-270；Dinwiddy，1980，pp.20-22）。

无论在议会内外，人们越来越确信，政府对位高权重者的腐败视而不见，这也刺激了对议会加以改革的吁请。对政府庇护权和金融腐败的敌意早就四处散播，根深蒂固，而1805和1809年分别爆出的梅尔维尔丑闻（the Melville scandal）与约克公爵情妇事件，更使公众义愤填膺。1805年，一份关于海军行政管理部门的报道曝光了海军出纳人员挪用公款的证据，而时任海军财政主管梅尔维尔子爵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Viscount Melville）并未阻止此项挪用。虽然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子爵还是受到下议院责难，并被迫辞职。但是这并不能平息公众怒火。十多个大郡县和许多大市镇，包括伦敦、威斯敏斯特、南安普敦和考文垂在内，都举行了公共集会。多份请愿书被送达议会，恳请拯救国家于贪婪、贪污和欺诈之中。在米德塞克斯郡的集会上，约翰·卡特赖特提议进行议会改革，尽管这一提案被劝阻而没有写入集会的决议里，但人们对于他所提议的主题本身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议会对军队总司令、约克公爵卖官一案的调查，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热情的高涨。约克公爵的情妇说服这位司令大人把军队委员会的委员席位卖给那些贿赂她的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议会内的一小撮激进分子和他们的院外支持

者一起，利用这桩公共丑闻获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这回，至少15个郡和不少于56个市镇的中产阶级也参与到公共抗议集会中。从外在形式看，很多地方的这类集会都像是抗议贵族精英的一场骚乱。威廉·科贝特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强烈谴责约克公爵，对汉普郡（Hampshire）的高调反体制演说提供了一大助力。在利物浦，人们被敦促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善他们遭遇的不公。1809年5月1日，1200人出席了在伦敦“皇冠与铁锚”酒馆（Crown and Anchor tavern）举行的一场晚餐会，而他们代表了大约27个选区。出席者中包括了约翰·卡特赖特，弗朗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和罗伯特·威瑟姆（Robert Waitham）。他们聆听了弗朗西斯·博迪托有关议会改革问题的慷慨陈词（Harvey，1978 pp.155-160，233-247）。显然，当人民足够觉醒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表达对贵族精英的极大愤恨之情。可惜的是，激进分子们从来没能找到一个足够重大的议题，以有效地聚焦公众的关注力，直到议会改革成为一个无可抵挡的要求。这一类偶尔出现的丑闻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但它们确也表明中产阶级对政治精英已逐渐不再抱有幻想。

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

19世纪初期再次兴起的改革运动在思想观念上更为温和，其宣传对象虽并不完全是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却是其首要的目标人群。当然，政府的镇压和对激进理念的敌意仍然使得继续公开讨论自然权利理论十分困难，但看起来，当时公众也的确对如此极端的理论并没有多大兴趣。即使是在改革者中，现在对曾在18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潘恩、葛德文和斯彭斯这类作家的政治理念的兴趣也不大。虽然潘恩的影响在1815年后又重新恢复，但此时基本可说是土崩瓦解。葛德文的影响更是昙花一现，以至于雪莱（Shelley）发现他在1812年居然还活着时，备感惊讶。斯彭斯依然在兜售他的土地计划，但是其著作的发行量极小，此时他能影响的唯有一小拨和他在一家伦敦酒馆里相聚的追随者了。

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回重新兴起的关于议会改革的辩论中，很多领袖人物都是富有经验的资深改革者，他们的职业革命家身份可以追溯到威尔克斯时代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约翰·卡特赖特、克里斯托弗·怀威尔、卡佩尔·洛夫特（Capel Lofft）、约翰·霍恩·图克与其他老活动家一起又重回战斗前线。而且，这些改革家往往会重启激进运动的早期理念，他们相信这些理念在现今局势下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约翰·卡特赖特和约翰·霍恩·图克两人都诉诸于英格兰古代宪法概念，声称激进改革能够使选举体制恢复其早期的纯洁，导向人民传统权利的复兴。他们再次向历史上的英国人权利寻求依据，而不是诉诸所有人类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古代宪法历史悠久，令人敬重，改革者回溯历史的观念对弗朗西斯·博迪托和托马斯·布兰德在内的激进议员们产生了影响。当他们分别在1809年、1810年和1812年提出议会改革动议时，他们坚持说自己从未想要更改或重写宪法，他们只是要移除宪法内不合历史内容的创新举措，恢复古老的选举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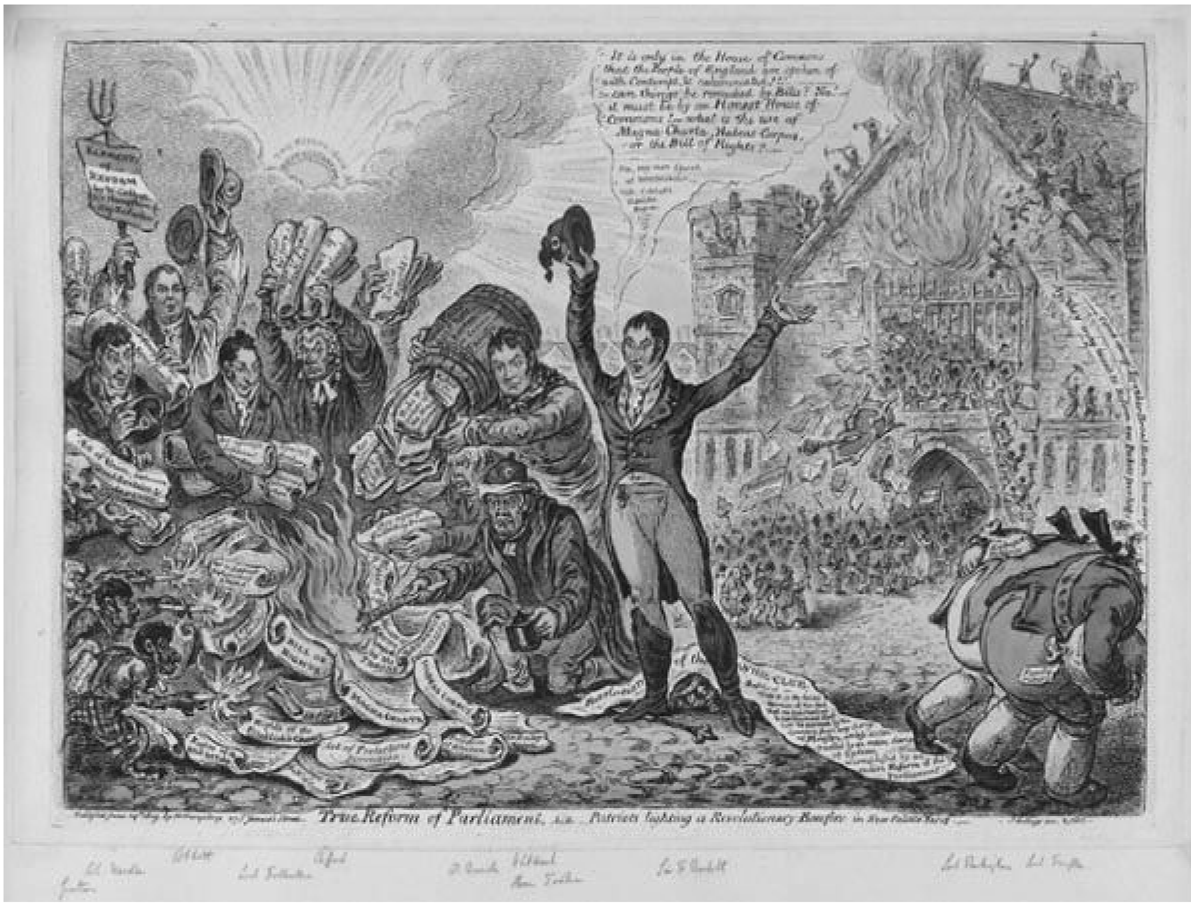
比再次呼吁回到古代宪法更为重要的，是复兴传统国家对待暴政加剧和政府庇护权扩张的态度。过去两个世纪各种政治争论中充斥着人们对于加剧的暴政和政府庇护权扩张的忧惧，而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呼吁进行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因。英法大战的影响导致政府权力再一次受到关注，公众担忧政府能够利用巨大的特权来破坏议会的独立和臣民的自由。对政府阴谋反对自由的恐惧与日俱增。这反过来又重新唤起人们要求经济改革和议会改革这一传统的解决方案。如同过去经常主张的一样，人们再次提出：必须采取措施降低税收和国债，削减民事和军事设施的规模，裁减政府冗员，减少坐在议会里领取养老金的议员人数。只有通过立法方式削减政府的庇护权，进行改革以加大民众对下议院的影响力，才能恢复宪法原有的和谐与平衡。克里斯托弗·怀威尔曾在1779年建立约克郡协会（Yorkshire Association）致力于推进此类政策，现在鉴于对法长期冲突所造成的直接后果的严重性，使他确信他的方案较之以往更需迫切落实。1804年他曾支持博迪托在米德塞克斯的竞选活动，1805年12月他又试图让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支持他这一理念，到1806年末，他已经制订出详尽的改革计划。虽然约翰·卡特赖特希望施行的方案比怀威尔的更加激进，但他也同意怀威尔的下列论断：行政腐败和政府庇护权是对自由的重大威胁。1809年，他将自己的这种担忧倾泄在《改革的理由》（*Reasons for Reformation* ）一书中。

然而，主张削减政府庇护权和减少腐败的最积极宣传家，却并非一个资深改革者，而是一个此前支持政府管理及其保守政策的人。此人即是威廉·科贝特。他后来成为19世纪早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激进主义宣传员。科贝特过去写了许多小册子来为政府政策辩护，自1802年以来，他还在其主编的周报《政治纪事报》上礼赞现行宪法，证明对法开战的必要性。不过，在1804年，他却被判以诽谤罪，原因是批评政府在爱尔兰的政策，还说政府面对法国的入侵缺乏充分准备。此番入狱令他亲自品尝到政府迫害的滋味，遂转变为一个激进主义者。到1806年他已经成为一名令人信服的反对政治腐败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纪事报》

开启了一场尖锐而持久的控诉，对象是庞大的庇护赞助系统，及其广泛而不断增长的对岗位、荣誉、合约、晋升、养老金和酬金进行分配的权力。他以每周致读者一信的方式，发表了大量文章，谴责政府大臣们把持着一个由政客、金融家、承包商、公务员、现役军官甚至牧师组成的腐败系统。税收负担之沉重和国债额度之巨大，使得科贝特深感震惊，他坚持认为现有的金融系统使得一小部分握有权力的人得以中饱私囊，与此同时，却使国家陷入贫困。他谴责证券商、掮客、承包商、银行家和所有那些通过与政府签订经济协议而获取私利的人。在科贝特看来，这些寒贱出身的暴发户能在权力系统中攀爬到高位，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人品德如何高尚，而是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利发财。正是这些人的私利之需，才导致了税率提升、政府挥霍、票据信用崩溃、金融投机，以及臃肿的官僚机关和广泛的政治腐败。若不对此加以限制，他们必将毁坏宪法，腐蚀这个国家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基础（Spater，1982，chapter 9，11-15）。

用生动而富有戏剧性的语言解释腐败的危险，正是科贝特之所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对《政治纪事报》的那些读者们——农民、小店主和商人——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原因。不过，《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这份主要面向议会内的自由分子和英国中产阶级中更为理智之人的杂志，斥责科贝特语言粗鄙，也拒绝接受他的政治极端主义，不过他们与科贝特共同警告，行政力量和政府赞助权的膨胀极其危险。1809年7月，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在《爱丁堡评论》上撰文抨击税收负担，表达了对政府特许权扩大的担忧，还攻击了一小撮人垄断国家权力的现象。在此后的几期中，《爱丁堡评论》发起了对经济改革的讨论，以之削弱政府对议会的影响力，支持适当扩大选举权，和对议会席位加以适度的重新分配。从1808年1月起，利·亨特（Leigh Hunt）就在《观察家》（*The Examiner*）杂志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到1812年，该杂志的发行量已上升到大约12000份。亨特礼赞英国宪法原则，反对激进的议会改革，但他同样赞同科贝特关于政府腐败

的警示。《观察家》大加指责对法战争——这也被亨特视为导致政府扩张规模、资源和开销的主要动因。1809年，它加入到对约克公爵的进攻中，而政府挥霍无度作为政治腐败源头之一，成了被定期批判的议题。利·亨特提倡经济改革，并支持将选举权扩大到纳税家庭的户主中。



图二十《真正的议会改革》

詹姆斯·吉尔雷绘，汉纳·汉弗莱出版

手绘蚀刻，凹版腐蚀制版印刷，1809年6月14日发表

画面尺寸312mm×441mm

现藏于伦敦国家肖像馆

该图表现的是19世纪10年代早期受到民众支持的激进改革运动景象：受人尊敬的激进派领袖弗朗西斯·博迪托爵士正带领一群普通民众焚烧议会与国家律法，画面右侧，两个携金袋的富人正在逃跑。

19世纪初对改革派发生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他们对行政权力扩大和政府腐败的担忧，但已有些迹象表明，一个新的智识因素的影响力开始在激进派圈子中浮现出来。这就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议会改革所发展出来的功利主义辩护。他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议会改革方案》（*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尽管直到1817年才正式出版，但自从1809年起就一直在私下里流传。边沁的理念在变得家喻户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在他不断扩大的崇拜者圈子中广为人知了。利·亨特、弗朗西斯·普莱斯、约翰·霍恩·图克和弗朗西斯·博迪托都属于这个圈子。到1813年，边沁已经与伦敦激进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的理念也开始型塑他们的议会改革理由。边沁完全拒绝接受自然权利学说，但他仍然认为议会改革是防止恶政和保障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最有效手段。他的功利主义哲学使他断言，每一个人都更看重自己的利益多过他人利益，而一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既然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那么所有个体加在一起一定就是公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了。不幸的是，根据同一个论点，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统治者都更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的利益。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职权，他们需要被时刻监督，任何策略的运用都要确保它们为被统治者谋福利。要使统治者服务于政府的恰当目的，即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赋予每个人以同等的权利去判断并控制掌权者的行为。只有当议会是由全体人民选举而成，那些代表们才会热衷于促进公益，因为这样做乃是确保自己再次当选的最佳方式。因此，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使他得出结论：代议制民主是最有效的制度，既能够限制统治者自私自利，也能促进最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切身利益。所以，议会改革可以用实践的、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理由来加以证明（Schofield，chapters 4，6）。

目标和方法

有许多理由可以去批评19世纪早期的政府，而且对政治腐败危险的担心也在中产阶级中不断增长。尽管如此，有产精英对革命的普遍畏惧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使他们很难在什么是改革宪法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争取人们对这些举措的支持上达成共识。可以根据改革者的目标将他们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满足于缩减政府特许权，一类想要适当扩大选举权和对议会席位加以有限度的重新分配，还有一些人继续支持全部的激进议会改革六点方案。改革者们还在如何争取公众支持他们观点的问题上产生了更大分歧，部分人只想着把更富裕和受教育程度更高一些的中产阶级网罗进支持者行列，还有一些人则想要寻求取得整个国家民众的支持。

辉格党是议会里的反对派，尽管他们对行政机关的专制和不断增长的政府腐败怨声载道，但他们对议会改革政策的支持却小心翼翼，极为谨慎。他们斥责院外激进派心怀叵测、误入歧途，试图通过激起公众义愤和抗议来威慑立法机关。因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无为”策略，所以在1812年改革诉求被拒之后，辉格党人并未受到冲击。首相斯宾塞·波西瓦尔（Spencer Perceval）在下院被刺身亡，卢德骚乱的暴力干扰以及欧洲大陆上戏剧性的军事发展，都使得议会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政治改革。尽管如此，议会中辉格党人不得不认清现实，假若他们想要确保获取议会的多数席位的话，他们现在所面临的紧要任务就是和激进派或进步派议员们合作。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不过只有二十来个人，最杰出的是弗朗西斯·博迪托、托马斯·布兰德、塞缪尔·怀特布莱德（Samuel Whitbread）、塞缪尔·罗米利（Samuel Romilly）、亨利·布鲁厄姆（ Henry Brougham）、科克伦勋爵（Lord Cochrane）、托马斯·克里维（Thomas Creevey）、彼得·莫尔（Peter Moore）、威廉·迈德克斯（W.A.Madocks）和G.L.沃德尔（G.L.Wardle）等人。这些人支

持经济改革和适度的议会改革。1809年，博迪托大力主张进行更频繁的选举、制定同等大小的选区规模，以及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直接向国家、教会纳税或向穷人捐款的男性户主那里。博迪托这项动议被认为太过于激进，只获得了12票的支持。一年后，托马斯·布兰德拿出了一个更温和的提议。他的方案以相类方式扩大选举权，但仅只要求将一些衰败选区的席位重新分配给一些大的城镇。该议案得到了115位议员的支持，这是自1785年以来以及随后的许多年中所有关于改革的方案中所获得的最高支持。

在议会外，博迪托仍然被视为极端主义者，比如一些出版物像《爱丁堡评论》和利·亨特的《观察家》，以及像克里斯托弗·怀威尔这样的改革者，都持这样的看法；但也有更多的改革者被他说服。弗朗西斯·普雷斯以及很多威斯敏斯特激进分子们都十分赞同博迪托关于扩大中产阶级选举权，尤其是将选举权扩展至小商人、小店主和有独立财产的工匠中的观点。尽管普雷斯曾经是伦敦通讯社的早期成员，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支持大众民主。不过，约翰·卡特赖特仍在鼓吹成年男性普选权，尽管他为了确保激进运动的团结一致偶尔不得不放弃原则妥协一下。威廉·科贝特和年轻的利·亨特则决定，一心落实一份十分激进的改革计划。这些激进事业最重要的代言人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惟我独尊的人。他们的竞争野心、总是与人冲突的个性，导致他们极难在激进计划上达成一致，或是找到一个将其付诸实践的最佳手段。

院外改革运动严重依赖于少部分激进分子如博迪托、卡特赖特、科贝特和普雷斯等人的能量和宣传。遗憾的是，这些议会改革的发言人没能设计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基础，以募集群众的支持。他们最大的成功在于传播观点方面，主要渠道则是单独的小册子，诸如《政治纪事报》和《政治家》（*the Statesman* ）这样的杂志，以及数量越来越多的同情激进观点的地方报纸，例如《利兹信使报》、《莱斯特纪事报》、《谢菲尔德信息报》、《约克先驱报》（*York Herald* ）、《泰恩信使报》

（*Tyne Mercury* ）和《诺丁汉评论》（*Nottingham Review* ）。然而就永久性政治组织来讲，激进派在此一时期的成就不如前些年。一些辩论社团得以重建，也出现了几个短命的政治俱乐部，但是，相较于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社团来讲，只是可怜兮兮的替代品。不过，一些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也开始初露端倪。一开始，它们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却也预示了更好的前景。

1807年，包括弗朗西斯·普雷斯、约翰·里克特（John Richter）、保罗·勒麦特（Paul Lemaitre）、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乔治·普拉（George Pullar）和塞缪尔·布鲁克斯（Samuel Brooks）在内的大约二十个激进派活动家组成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Westminster Committee），支持博迪托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选举，以对抗现存的议会党派候选人。博迪托同意参加选举，但条件是他不投入资金，不去做竞选游说，也不参加公开的竞选活动。作为一个家财万贯的显贵，博迪托欲图与出身卑微的店主和商人们保持距离——而他们中有些是之前伦敦通讯社的成员，满希望能去操持他的选举。威斯敏斯特区是国内最大的国会选区，大约有17000名地方纳税人具有投票资格。这个选区太大，以至于无法实施贿选或者给选举施加确定的影响，因此该地区一直存在“独立”候选人的历史。虽然并没有正式的组织，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成员们决意代表有一点家财的小人物向拥有财富、地位和权势的精英阶层发起一场斗争。他们对横亘在威斯敏斯特贵族精英和和商人、店主之间的令人厌恶的社会和经济壁垒十分不满——要知道正是商人、店主的劳动满足了精英所需，委员们因之敦促威斯敏斯特的选民向这些被认为是人上人的精英们展示自己的独立性。尽管博迪托从来都不仅仅是作为商人利益的代表者来参加选举的，但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却想要建议甚至指导他如何做一个国会议员。委员会投入这场选战的资金有限，但他们以巨大的能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效率游说拉票，争取到更多选民，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借助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他们得以在整个选区内鼓吹其激进观念。选举的结果成绩非凡：博迪托高居榜首，另一

位改革者科克伦勋爵荣获亚军。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也是对未来难得的经验，但其他一些大的城市选区却没有紧随其后，取得类似的成就。而且，博迪托和科克伦勋爵既无精力，也无野心在下议院领导一个活跃的激进群体（Main，1966）。

伦敦的一些激进领袖人物也非常努力地在首都和其他地方建立更多的永久性政治社团。1811年，托马斯·诺斯莫尔（Thomas Northmore）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取名“汉普顿俱乐部”（Hampden Club），专门致力于议会改革事业。诺斯莫尔强调社团吸收有产男性加入的重要性，他还建议成员们应该具有与成为议员所要求的同等的财产资格。此举受到博迪托的鼓励，而为其友人约翰·卡特赖特所反对。卡特赖特对俱乐部会员推荐资格的排他性大加批判，也对持此资格进入俱乐部的会员是否能够真正投身于议会改革而心存疑虑。卡特赖特自己也支持了一个激进的议会改革纲领，并且希望这个改革平台能够稳获大众的普遍支持。1812年春天，他终于加入汉普顿俱乐部，成为其中一员，可是1812年6月，为了促成一个作为汉普顿俱乐部竞争对手的政治社团，他辞去了在汉普顿俱乐部的职务。直到1813年5月，他才又重返汉普顿俱乐部，这一回为的是联合各种力量，去支持更加有限的议会改革。

在这期间，卡特赖特曾努力建立另一个激进社团。1812年6月，他试图恢复最初由他于1808年创办的“议会改革之友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Friend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现今，它被称为“依宪议会改革联合会”（Union for Parliamentary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或者更简单地称作“联合社”（the Union Society）。这个协会寻求比汉普顿俱乐部更为激进的政治纲领，但它仍然没有致力于推动成年男性普选权，也不追求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政治诉求是，所有缴纳直接税的男子都有投票权，支持年度议会选举。由于协会每年征收3基尼的会员费，使得所有底层阶级民众都被排除在外。尽管威廉·科贝特、议员乔治·沃德尔和年轻的利·亨特都同意加入，但“联合社”还是

由于没能争取到一百个赞助者而衰败下去。正是由于这次失败，再加上他开始产生杰出的激进分子小团体应该联合起来的信念，才促使卡特赖特重新加入汉普顿俱乐部。到1814年，卡特赖特已经赢得汉普顿俱乐部对他更为激进的改革计划的支持，但唯一的代价就是俱乐部成员数量锐减。1814年12月，只有三位成员参加了俱乐部的聚餐晚宴；到了1815年3月，俱乐部晚宴上竟只剩下卡特赖特一人形影相吊。

显然，伦敦还没有做好迎接激进社团复兴的准备，但卡特赖特将以他在地方上的成功展示未来发展之路。在首都的失败，使得卡特赖特转向了地方上的劳工大众。与大部分其他激进主义活动家都不同，卡特赖特此时已做好准备去信赖普通民众。他无疑是当时首都的激进分子中唯一一个走向乡村做竞选游说的人。1812年夏天，卡特赖特的首次巡访活动在曼彻斯特地区展开。这次活动尽管获得了几个朋友以及他的秘书托马斯·克利里（Thomas Cleary）的支持，但主要依靠他自己的资金及努力。他走访了一些工业制造中心，力图找到一些地方领导人，教会他们如何建立政治社团和地区委员会，如何利用媒体进行改革宣传，如何组织工人志愿者团体以赢得大众支持进行议会改革。经过这番努力，1812年10月，哈利法克斯成立了“联合社”的一个分会；之后两个月内，大约17000名当地民众在一份要求议会改革的请愿书上签名。卡特赖特的确鼓励了这一地区的激进活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不过是向“早已皈依的对象传教”。这一区域一直就有政治激进主义的传统，曾经盛行过卢德骚乱，而枢密院令对棉纺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也已经刺激起了复兴议会改革的愿望。1812年5月，一份来自普雷斯顿（Preston）的请愿书抗议政府对公共资金的支出过多；几天之后，曼彻斯特也举行集会，谴责对法战争花费巨大，几乎要毁灭国家，要求彻底进行议会改革。

有了最初的成功后，卡特赖特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文本，给那些没有向议会请愿经验的人做模板。他把它印了许多份，带着它们走上了1813年的第二次“传教”之旅，沿途散发。这次旅途花了29天，走了900英

里，访问了不下34个城市居住区，莱斯特、赫德斯菲尔德、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博尔顿、利物浦、斯托克波特、纽卡斯尔、伯明翰、格洛斯特（Gloucester）、布里斯托和雷丁等都包括在内。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虽然他没有时间亲自指导真正的请愿组织，但他与很多地方改革者建立了重要联系，还把一批已经印好的请愿书存储在对改革抱有同情的绅士、教士、商人、职业人士和受人尊重的零售商那里。卡特赖特声称他在1813年的这次行脚中征集了130000个签名，请愿支持要求赋予纳税户主选举权和年度议会选举。三万人在曼彻斯特请愿书以及其他请愿书上签名，这些请愿书来自大部分他曾经到访的地方（Miller，1968 and 1974）。

卡特赖特的努力在1815年后取得了最为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他将汉普顿俱乐部和联合社推广到中部工业地区和英格兰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而且为激进议会改革事业争取到了数量令人惊叹的大众支持者。他早期的宣传游历活动已经证明，公众对未经改革的投票制度及其政治、经济后果的不满日益增长。卡特赖特的经历有助于表明，严重的经济压力蕴含着可以被转化为巨大政治觉醒的潜力。1815年后，随着战争结束，法国不再对英国构成威胁，激进运动道路上的一个强大障碍物也得以消除。与此同时，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促使公众重新把注意力集中于内部事务，并提出一项课题，将大众的不满聚焦于议会改革的诉求上来。1815年之后，激进主义花繁叶茂，但我们要知道，它是建立在19世纪初期那些改革先驱们的成就基础上的——在没有那么好的光景里，他们一直坚持改革大业，使其活力永存。

附录 不列颠及其意识形态十字军讨伐法国大革命

1789年，大革命在巴黎的爆发无疑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法国大革命也成为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国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激励了其他国家的改革者，同时法国人试图将他们的革命纲领传递给欧洲其他国家，并由此挑起了激烈而持久的战争，这一切对欧洲主要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英国，法国大革命激励了新的发展方向并且鼓励了已有的改革趋势，但同时它也验证着变革的阻碍。就法国大革命对于英国的影响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于当时英国思想界气氛及议会内外的政治发展有着极为深刻且持久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整个英国的文学、哲学及政治学所环绕的最重要议题就是“法国大革命”。最初，一些英国观察家并不确定该如何应对法国如此惊心动魄的革命事件，另外有部分人则试图保持中立。不过，对英吉利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了浓烈兴趣的人们，他们多数不是表现出高度积极正面的态度就是以极其负面的方式去看待它。这种持续递增的尖锐的两极观点，既催化出了激进的政治改革活动，也鼓励了确信法国革命纲领不会在英国土壤上扎根的忠诚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发展。因此，英国对于法国大革命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的观点：一部分人认为法国革命原则将给英国国内所需的改革带来很大希望；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国革命思潮会给英国带来动乱，如同法国内部一样出现恐怖的政治局面。[1]

法国大革命的早期阶段激发了如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等许多英国自由思想家们的正面反应。众多政治激进分子如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等人，也因法国事件的鼓舞而要在英国发动宪政改革。当法国革命原则迅速传播与法国战火的推进，激起了英国国内的保守反应与挑起对法战争之时，英国的自由派舆论反对国内镇压，同时也谴责被认为是对法国内政不必要的干涉的政治主张。当英国国内反动势力成功削弱宪政改革运动之时，一小部分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激进分子开始密谋策划武装暴动，并在此种情况下，转向法国人，希冀求得法国的政治同情、革命鼓舞以及军事支持。

那些没有受到法国革命原则感染的英国人，他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而有所改变。最初，保守派相当乐意看到法国由于政治失序而导致国家力量逐渐衰微。但当大革命的理念与行动在法国全面展开，旧制度被成功倾覆，许多英国人这才益发焦虑起法国人所展开的暴力攻击，认识到它不但旨在推翻法国旧制度，而且也会打击到整个欧洲文明。对于许多保守派而言，他们最先也是最根本的忧虑在于法国革命原则将传播至法国边境线以外。尤其当目睹法国革命思潮已经摆好架势就要作用于英国自身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时，着实让他们大吃了一惊。众多保守派观点都不仅仅满足于支持镇压内乱以彻底击败激进分子对于政治变革的要求这一面。他们也准备拿起武器，与试图将革命输出到整个欧洲的法国力量奋然为敌。有一小部分保守派思虑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一场仅旨在制止革命原则传出法国的防御战绝不可能有效地反击法国革命的威胁，必须将大革命思潮的癌细胞在源头就予以切除，也就是说要深入法国直捣黄龙。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地谴责法国革命纲领，即使是在法国境外开展政治、军事行动来抵制激进的法国革命思想，也并不如其所愿。他们敦促对法国开展意识形态讨伐，直到革命思潮彻底地灭亡在它的诞生地。

---

[1] For the contrasting views in Britain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see H.T.Dickinson，“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Britain”，*Contemporary*

Review，255（1989），20-26；H.T.Dickinson，“Counter-revolution in Britain in the 1790s”，*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102（1989），354-367；H.T.Dickinson，*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Oxford，1985）；and the various essays i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ed.H.T.Dickinson，（London，1989）.

一、法国革命信念的威胁

1789年，英国保守舆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感到吃惊并且有点被震撼到了，但它尚未关注到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写道：“英格兰惊讶地盯着法兰西，看着它正在为自由而战，不知道是该谴责还是鼓掌！”[1] 不过，外交大臣利兹公爵（Duke of Leeds）很高兴地看到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法国已遭致损害。[2] 甚至两年之后，威廉·伊登（William Eden）也公开承认：“我由衷地憎恶也决不会支持这所谓的抽象民主体系；但我不确定法国人为了维系一个混乱、效率低下的政府正在持续斗争，难道不会对吾国的政治利益有利，能最好的确保吾国的永久繁荣。[3] 1790年初，埃德蒙·柏克在其《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试图警告英国舆论小心法国革命的威胁。但直到1792年，他对于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英国的担忧才被英国人严肃对待。[4] 确切地说，是1792年战争的爆发、九月大屠杀及路易十六被废黜（随后被送上断头台）系列事件发生，才使得英国保守派确信，法国大革命会严重威胁英国的政治稳定乃至整个欧洲的稳定。此后，革命进程的不断推进及暴力的蔓延，确证了英国人的担忧。一些保守主义者甚至开始相信法国人正在上演一场席卷整个欧洲文明的政治阴谋。

柏克与其他许多保守派的宣传家警告道：法国的新秩序是建立于最抽象的普世原则、最狂热的思辨推理之上的。法国人吁求的普世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诉诸的自由、平等及博爱等抽象概念，已将他们置于太过依赖人类理性的危险之中。他们正在忽视神圣天命、人性弱点以及沉重的历史经验教训。法国的革命者们是基于社会分工与政治制度的形成乃是人类理性造物这一危险的错觉而行动的。一定要将这一有关人类理性的毫无根据的信念摈弃。人类必须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形成，部分地是神圣天命的创造物，部分地是历经数百年不断变化、适应调整及应对无数的突发事件汇集而成的产物。法国人不明

智地否认了天命（the dispositions of God），同时也忽略了人本质上易犯错的弱点。他们对人类理性的过度自信，把人的意志拔高于宗教信仰、正义及历史经验之上，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迅速陷入无序混乱与无节制的恐怖之中。法国将走上独裁专制的统治道路，这会威胁到法国人民的自由与整个欧洲的稳定。

保守派的宣传家们不仅仅抨击法国革命的基本原理。他们反复警告，这些革命纲领已经导致了暴力和无节制的武装行动，如此无法无天的行为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柏克提到法国革命者时这样形容他们："放肆的、残忍的、野蛮群众"。[5] 约翰·鲍尔斯（John Bowles）将法兰西共和国描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体系、无限制的放任自流"，[6] 阿瑟·扬（Arthur Young）这样总结法国革命："它已经给法国带来了更深沉的不幸、贫穷和毁坏，以及越来越多的监禁和流血杀戮，甚至还会发生毁灭性的灾难。大革命在四年里对法国的破坏比旧制度在一个世纪里所做的还要多"。[7] 大众暴力已经使君主政体、贵族阶层、教会和法律体系本身开始恶化。它使所有的财产不再安全，也逐渐动摇了业已形成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整体精神。法国大革命鼓舞穷人与弱者劫掠富人的财产，弃绝长久以来他们给统治精英表达的忠诚！它不是短暂的罪恶行为，而是"制造未来的手段，（如果未来是可能的）则它会导致诸多更坏的恶"。[8] 因此，法国大革命应被谴责为一个庞大的、吞噬一切的专制体系，它不但摧毁贵族阶级的特权，而且也会破坏整个法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毁掉穷人的生活。由于法国人追求过度的自由，致使他们从一个危机跌滚至另一个危机。他们先是毁了君主政治、贵族阶级、教会统治，然后就是摧毁了整个法律规则和司法体系。在一个由暴徒肆无忌惮地放纵意志的国家，无论是政府、私有财产还是社会层级都不会长期存在下去。

法国内部极度的暴力行动与反复的不稳定主要归咎于它当下的政治法则，此法则由无约束的人类意志所决定，不再顺应神意安排。在此种

政治法则指导下，法国人背弃了真理、公正与美德，屈服于无德、背信弃义及肆意纵行。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对教会财产的攻击，而是对井然有序的宗教组织本身的猛然袭击。这是法国人首次被说服接受这样的法则：没有上帝，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以至于他们被教唆去相信，可以自由地犯下任何罪行。[9] 他们反对宗教的限制，拒绝圣经权威。他们的军人作为无神论使徒正在向全世界开拔：[10] “法国军人被教诲，大革命所反对的不是基督教的腐败形式；它反对的就是基督的圣名；它反对的就是上帝的最高统治；它反对的是那些人们铭记于心的法则。人们珍重那些法则，认为它在艰难中给人以宽慰，在困苦生活中给人以鼓励与指导，是心的力量与快乐的源泉。”[11]

法国大革命的所有不足之处越来越多地被归咎于雅各宾派。英国保守派宣传家们抨击雅各宾主义是一种“瘟疫”，一种“传染病”，是“危机”和“灾难”。[12] 雅各宾派应对传播暴乱与政治不满，对向人民鼓吹政治平等法则的煽动性言论，对教唆人们蔑视宪法、反对宗教、轻视社会层级等行为与思想负责。埃德蒙·柏克形容雅各宾派是“一群绝望的无名的冒险家”[13] 和“一帮武装狂徒，正在到处散播暗杀、盗窃、叛乱、欺诈、内讧、镇压及无信仰的思想”。[14] 他也把雅各宾主义看作是“一群深具创新能力的天才对其国家性质的反叛。[15] 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尔（Augustin de Barruel）率先详尽地发展了法国大革命是雅各宾派的阴谋产物这一概念，此概念在1789年前已由法国哲学家、共济会员及德国的光明会宣传过，他们认为它是不道德法则的产物。[16] 1797年，这个流亡教士、历史学家写作了《雅各宾派历史回忆录》。该回忆录迅速被译成英文，它猛烈地抨击了雅各宾主义并成功使很多人放弃了对它的信仰。[17] 富于战斗力的保守派旋即受到鼓舞而创办了系列期刊如《反雅各宾派》、《反雅各宾评论》。约翰·鲍尔斯经常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谴责雅各宾主义是“谋反。它反一切宗教、反一切君主制、反一切贵族阶级、反一切法律、反一切投反对票的人、反对所有的政府及财产所有权——总而言之，它反社会、反对已成形社会秩序下的一切事

物”。[18]

尽管英国的保守派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感到震惊，但正是雅各宾主义的后果对欧洲这个整体而言，尤其是在英国，引发了严重的恐慌。根据埃德蒙·柏克的观点，“雅各宾派决心要摧毁世界上所有‘老旧社会’（ old Societies）的全部结构与肌理，按他们自己的样式重造新社会”。[19] 人们谴责法国人鼓吹要在新型纲领下建立一种新型政府，此新政府无法与现存的欧洲政治体系共存，或者说，它不能与任何一种社会文明体系共存。[20] 据称法国人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因此认识到，必须推翻欧洲所有现存政权，共和国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荣下去。雅各宾派也很清楚他们没有未来，除非是创建一个新的欧洲体系。[21] 因此，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发动世界革命而创造一个普世帝国。[22] 正是这一方针，指导他们鼓励所有对欧洲合法政府的抵抗和反叛：“他们不满足于颠覆自己的政府，新纲领的宣传家宣称反对尘世所有政府的战争已经开幕。他们誓言时刻准备着，去扶持每一个将要拿起武器反抗君主的臣民；他们对每一个但凡吸收他们理念的人敞开庇护的大门；他们派遣密使，从埃及到北极广泛散播纷争的种子。”[23]

---

[1]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 ed.T.W.Copeland et al （10 vols.，Cambridge，1958-1970），vi，10.To the Earl of Charlemont，9 Aug.1789.Hereafter cited as *Burke’s Corr* .

[2] John Ehrman，*The Younger Pitt* （London，1983），ii，4.

[3]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J.B.Fortescue Mss* （London，1894），ii，97.William Eden，Lord Auckland，to William Grenville，13 June 1791.

[4] F.P.Lock，*Bur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1985），chap.5.

[5] Edmund Burke，“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Bohn edition，6 vols.，London，1854-1856），iii，14.Hereafter cited as *Burke’s Works* .

[6] John Bowles，*The Dangers of a Premature Peace* （London，1795），p.12.

[7] Arthur Young，*The Example of France*，*a Warning to Britain* （London，1793），pp.12-13.

[8] “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Burke’s Works* ，iii，13.

[9] Richard Watson，*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1798），pp.29-30.

[10] William Vincent，*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Associated Volunteer Companies* （London，1799），pp.14，22.

[11] George Hill，*Instructions Offered by the Present War*，*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Edinburgh，1793），p.23.

[12] Emily Lorraine de Montluzin，*The Anti-Jacobins* 1798-1800 （London，1988），p.6.See also William Playfair，*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 （London，1795）.

[13] “Remarks on the Policy of the Allies”，*Burke’s Works* ，iii，417.

[14]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Burke’s Works* ，ii，529.

[15]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Burke’s Works* ，v，207.

[16] See Emily Lorraine de Montluzin，*The Anti-Jacobins* 1798-1800，pp.16-17；and Bernard N.Schilling，*Conservative England and the Case against Voltaire* （New York，1950），pp.218-277.

[17] See，for example，John Robison，*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Carried on in the*，*Secret Meetings of Free Masons*，*Illuminati and Reading Societies* （London，1797）；and Rev.Lewis Hughes，*Historical View of the Rise*，*Progress and Tendency of the Principles of Jacobinism* （1799）.

[18] John Bowles，*Reflection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2nd edn.，London，1801），pp.60-61.See also the “Portrait of a Jacobin” in Betty Bennett，*British War Poetry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 1793-1815 （New York，1976），p.162.

[19] *Burke's Corr*.，viii，130.To William Smith，29 Jan.1795.

[20] "Thoughts on French Affairs"，*Burke's Works*，iii，349；and John Bowles，*The Dangers of a Premature Peace*，p.14.

[21] "An Appeal from the New to the Old Whigs"，*Burke Works Works*，iii，10；*The Anti-Jacobin Review*，i（1798），4-5；and the *British Critic*，xii（1798），427.

[22]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Burke's Works*，v，304-305.

[23] William Vincent，*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Associated Volunteer Companies*，p.20.

二、英国的意识形态运动

英国的大部分有产精英并不需要法国大革命来教导他们如何去敬畏激进的政治改革，或者说鼓励他们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辩护。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很久，英国人已经显示出对于英国宪法优点的坚定信念及对于激进改革的坚决抵抗。社会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英国宪法很出色地平衡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所谓的大众民主政治将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也会危及私有财产的 安全。人们通常认为有产之人拥有权威所需的教育、闲暇、经验以及社会财富，与之相反，穷人通常是懒惰、无知、固执的人，他们“轻易就成为蛊惑民心的煽动家的‘猎物’”。因此，在国家政治中，否定穷人的政治行动角色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政府应精心维护他们的公民自由。

法国大革命一旦被当作对英国国内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物，并且它一旦被认为会对现存体制构成暴力威胁，英国的保守派思想就不可避免地害怕它的影响并且要制止它的发展。埃德蒙·柏克是最早认识到法国革命纲领会蔓延开的人，主张从根本上抵制革命纲领，因为它会给英国本土带来直接和惊人的威胁。1790年，他公开表明：“事实上，我的目标不是法国，首要考虑的，唯有吾国。”[1] 在《反思法国大革命》（1790）一书中，他承认：“吾之关怀惟是吾国之和平。”[2] 他竭力提请读者警惕英国的激进派们已经对社会构成了威胁，尤其要注意理查德·普赖斯，因他已受蛊惑，相信法国正在为人类的自由注入了新的活力。[3] 到1792年，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的影响更加恐惧起来。他告诫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注意法国革命纲领的威胁：“按照那些革命纲领的特性与实践方式来分析，如果它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是不会在法国社会中倡导开来的。依此类推，在不遥远的未来，它也一定会颠覆英国宪法体系。”[4]

1790年，人们普遍认为柏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担忧是夸大其词的，

甚至有人认为他因恐惧而有些错乱。但到1792年末，一大波积极的保守派宣传向英国人袭来，他们警告英国人注意法国大革命的威胁，尤其要注意英国国内被革命光辉蒙蔽的追慕激进的人的威胁。资深的宣传家们如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威廉·科萨克·史密斯（William Cusac Smith）、罗伯特·内雷斯（Robert Nares）、弗朗西斯·普罗登（Francis Plowden）、萨缪尔·霍斯利（Samuel Horsley）、理查德·海（Richard Hey）以及约翰·里夫斯（John Reeves）都纷纷加入柏克战线，力图阻止激进宣传的扩散，极力抵抗法国革命纲领的传播和影响。这些保守派的理论家们警告道，法国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不抵制这些危险的理念，它们将摧毁已建立的教会与国家体系，消泯社会层级，破坏社会和谐与正义，煽动无产者来掠夺社会上层的财产。他们谴责激进派奠基于普世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概念和人民主权论的政治主张，强调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因其实用性、道德性，合乎自然法则、历史经验及早先惯例而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5]

这些保守理论家们精妙的论点毫无疑问产生了效果，它削弱了英国有产精英阶层对于法国纲领的思想兴趣，但它更加务实、名副其实的动机是要将英国大众转化成富有战斗精神的效忠派，决心捍卫现有体制和传统价值观，抵制国内激进分子与法国革命者的威胁。在抵制法国革命的宣传战中，保守派出版的刊物总量远远超过激进派的出版物。为了让下层阶级接受其观点，他们以表达明晰、意图明确的风格写作这些宣传手册，并大量发行。[6] 1795年到1798年间，由汉娜·莫尔（Hannah More）和她的合作者执笔的道德训诫故事《便宜小智库》（*Cheap Repository Tracts*），共发行了两百多万册。[7] 这些故事书被大量购买，成批运往陆军部队、海军基地、学校、医院、济贫院、监狱及各类工作场所。尽管这不是直接参政，但很清楚，这些手册就是用来劝诫穷人们接受现有社会秩序，放弃任何激进变革要求的。英国上下各类效忠派组织也分发了成千上万的政治宣传手册，如《威廉·阿什赫斯特爵士控告米德尔塞克斯大陪审团》（Sir William Ashurst’s Charge to the Grand

Jury of Middlesex ）（1792）；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创作的约翰·牛家庭通信集系列作品；西奥多·普赖斯（Theodore Price）以笔名约伯·诺特（Job Nott）创作的各类流行手册。[8] 保守派也利用各类报纸和期刊持续抨击法国革命信条。伦敦的《星报》《太阳报》《真正英国人》《观察家》等都发表了很多效忠派观点。地方报刊也将类似的观点刊登出来，如《约克报》（York Courant），《利物浦凤凰报》（Liverpool Phoenix）、《曼彻斯特信使报》（Manchester Mercury）、《莱斯特杂志》（Leicester Journal）、《纽卡斯尔报》（Newcastle Courant）、《苏格兰信使报》（Caledonian Mercury）等。效忠派的期刊包括《旁观者》（The Looker On）、《战斧》（The Tomahawk）、《英国批评家》（British Critic）、《反雅各宾》（Anti-Jacobin），而其中最成功的期刊是《反雅各宾评论杂志》（Anti-Jacobin Review and Magazine）。保守派的各类出版物几乎囊括了所有可以表达政治观点的载体，如诗集、流行民谣、小说以及政治漫画。[9] 甚至有种更为广泛的宣传，即隶属于各个宗教团体的英国教士们，将成千上万的政治布道辞（而且经常是以印刷成文的形式）传播给每个人。[10]

效忠派蓄意设计的宣传刊物主要针对中下层民众，这些刊物的写作风格简洁但语调慷慨激昂，为的是引起民众强烈的反响。几乎所有这些出版物都在以英国公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政治恐怖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努力要表明的是，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样板，并不仅仅是贵族精英阶层蒙受巨大损失。从表面看，法国统治阶级可能是大革命最明显的牺牲品，但数以百万计的法国普通公民更是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和军事侵略的受害者。倘若英国的中下层阶级被法国革命纲领所诱导或者试图跟随法国革命的步伐，那他们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反而会蒙受巨大损失。法国大革命的理念、体制与支持者的处境与维护英国社会、政治秩序者相比是不利的。

保守派对比法国的政治动乱的各种宣传就是为了表明，稳定的英国

政府保护私有财产、保有社会自然区隔以及抑制人自私自利和过度热忱的本性是必要的。政府的建立不应依照一些抽象的法则与纲领来作为评判标准（像法国那样），而应该依照它的有益影响、服务社会的能力、满足代际相承的社会需求来做评判。评估任何一个特定的政体，对其实用性、便利性和经验的考量远比纯粹的理论重要得多。尤其对于英国宪政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并不容易被重塑，也不应该随意被转变。法国人强调的平等也必须予以拒斥，因为人类在身体条件与智力层次方面的不平等是不证自明的。所以人可以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享有不同级别的权利，这既顺其自然也不可避免。不平等实际上是自然的，也是天命。上帝用贫富之别来回报勤勉惩治懒惰，只有不受约束的穷人才希望通过攻击现有的社会秩序而从中获利。如果应用外力强制消弭人与人之间自然的社会区隔，那么社会各阶层包括勤勉的穷人都要遭受苦难。[11] 法国社会的无序状态似已证明这一观点。

既然人类依自然天性拥有不同数量的财产，既然建立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护个人私有财产，那么保守派宣传家要论证的所有观点就是人不可能如法国政治诉求宣称的那样，依自然和不可让与的权利而在国家体系中享有平等。正是因其财产的多寡人才被赋予了权力的，最富裕的贵族阶级因此拥有了与其财富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富裕之人显然更可能具有可靠的判断力、丰富的学识和行为能力来统率他人。所以只要坚守财产决定等级与权力分工的自然法则，英国举世闻名的宪政原则与英国人所珍视的公民自由权利就能得以存续。尽管现存的选举体系有众所周知的违规行为，但这一体系发展出的下议院是由选举产生的，它代表着国家的最高权力与合法利益，它比起法国的任何一个立法机构都更有效。既然在议会里能有一席之地的都是最富有、最出色的人，那么他们怎么被选举出来并不那么重要。的确，保守主义者一直坚信英国得益于它的政治体系，而在整个体系中，被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财产。阿瑟·扬不是唯一一个对国家提出警告的，他说：“从法国经验推断得出的主要结论，要用大写写就，让人读，那就是：若人被代表，则财产将被毁

灭（IF PERSONS ARE REPRESENTED，PROPERTY IS DESTROYEDif persons are represented，property is destroyed）。”[12] 如果公民权被彻底扩大，那么英国的议会就会像法国国会一样被一群贪权图利的恶意阴谋家蜂拥占据。就像法国那样，他们将把有产者踢到一边，篡夺他人财产，强行抹平人类社会中所有的自然区隔。法国现代民主以人民主权论为纲，逐渐损毁社会层级，破坏了政治稳定。因其感染力，英国的激进主义者正处于引领一群处在脆弱社会秩序边缘的无知、无产者释放自由意志走法国道路的危险中。[13]

大量保守派宣传家们力图清晰阐释英国的混合型政府以及完美的制约与平衡的均衡宪法体系给国家带来的益处。这一体系因其有能力代表国家一切重要领域诸如经济、宗教、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而尤其受到赞赏。他们谴责那些攻击宪政的激进党人是头脑不灵光、坏心眼的家伙。他们总是被拿来和法国雅各宾派做对比，也被刻画为野心勃勃、蛊惑人心，嫉妒统治精英阶层得到的荣誉与正当财富的阴谋家。只有那些无所事事、放荡闲混的英国人才会被法国革命信条鼓舞和诱骗，他们尽是些窃贼、骗子、醉汉和无产的社会乞丐。英国雅各宾派的目标就这样被蓄意歪曲，他们所采信的理念后果也被过度夸大。议会改革被描述为通向法国式革命的第一步，它将导致君主政体和贵族政治的瓦解。他们谴责攻击政治特权是袭击私有财产、抹平所有社会区隔的前奏。激进派正在狂热地争取人的平等权利，它必然效仿法国，同时也会导致富人财产被掠夺，并毁了穷人生活。[14] 为了适用法国革命纲领，他们必定要斥责上帝对尘世的安排。此亵渎行为的唯一后果就是造成社会混乱与暴民统治，如同法国那样。为了还击此类威胁，无数的布道辞与宗教手册印制出来，告诫现存的社会阶层都应该接受宗教的约束，教导勤劳的穷人们要培养节制、节俭、勤勉、顺从与谦恭的美德。让他们知晓能给他们指导和安慰的是宗教而非政治变革。尽管穷苦的人无法期待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巨大物质满足，但他们会在天堂得到嘉奖。[15] 这样的结果显然比法国如今所收获的否定宗教信仰的社会更可取。

[1] *Burke's Corr* .，vi，141.To Charles-Alexandre de Calonne，25 Oct.1790.

[2]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Burke's Works* ，ii，284.

[3] Burke's Reflections were，in large measure，a reaction to Richard Price's celebrated lecture to the Revolution Society on 4 November 1789.This lecture，*A Discourse on the Love of Our Country* ，with its radical and pro-French Revolution sentiments，was published early in 1790 and went through six editions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4] *Burke's Corr* .，vii，219.To Grenville，10 Sept.1792.

[5] J.C.D.Clark，*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Cambridge，1985），pp.199-276；Ian R.Christie，*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1984）；H.T.Dickinson，*Liberty and Property* （London，1977），pp.270-318；J.A.W.Gunn，*Beyond Liberty and Property* （Kingston and Montreal，1983），pp.164-93；and Thomas Philip Schofield，"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Britain in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Historical Journal* ，29 （1986），601-22.

[6] Gayle Trusdel Pendleton，"English Conservative Propaganda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802"，unpublished Ph.D.thesis （Emory University，U.S.A.，1976），pp.160-71；and Gayle Trusdel Pendleton，"Towards a Bibliography of the Reflections and Rights of Man Controversy"，*Bulletin of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85 （1982），65-103.

[7] Susan Pedersen，"Hannah More Meets Simple Simon： Tracts，Chapbooks，a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5 （1986），84-113.

[8] Robert Hole，"British Counter-Revolutionary Popular Propaganda in the 1790s"，in *Britain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Conflict*，*Subversion and Propaganda* ，ed.Colin Jones （Exeter，1983），pp.53-69.

[9] H.T.Dickinson，"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Militant Loyalism 1789-1815"，i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H.T.Dickinson，p.110；Marilyn Butler，*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Oxford，1975），pp.88-123；Betty T.Bennett，*British War Poetry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 1793-1815；and Herbert M.Atherton，"The British Defend Their Constitution in Political Cartoons and Literature"，in *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Culture* ，II，ed.Harry C.Payne （Madison，Wisconsin，1982），pp.3-31.

[10] Nancy Uhlar Murray，“The Influe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Rivals，1789-1802”，unpublished D.Phil thesis （Oxford University，1975），pp.44-79，108-109，122-123，212-307；John Walsh，“Methodism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A Histo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Great Britain*， eds.Rupert Davies and Gordon Rupp （London，1965），i，303-308；and Deryck Lovegrove，“English Evangelical Dissent and the European Conflict 1789-1815”，in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xx （1983），266.

[11] See，for example，*A Serious Caution to the Poor* （London，1792）；William Paley，*Reasons for Contentment*，*Addressed to the Labouring Part of the British Public* （London，1793）；*Advice to Sundry Sorts of People*，*by Job Nott* （London，1792）；and *A Few Plain Questions and a Little Honest Advice to the Working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1792）.

[12] Arthur Young，*The Example of France*，*a Warning to Britain* （London，1793），p.44 note.

[13] Sir William *Ashurst's Charge to the Grand Jury of Middlesex* （London，1792）；*A Few Plain Questions to the Working People of Scotland* （Edinburgh，1792），pp.8-9，11；*The Englishman's Catechism* （London，1792）；and *Thoughts on the New and Ol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edience* （London，1793），p.32.

[14] *Facts*，*Reflections*，*and Queries*，*Submitt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ssociated Friends of the People* （Edinburgh，1792），p.28.

[15] Susan Pedersen，“Hannah More Meets Simple Simon： Tracts，Chapbooks，and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25 （1986），84-113.

三、抗击法国革命纲领之战

英国政府以及时的调度、坚定的决心和充沛的精力来努力阻止颠覆性的法国革命纲领在英国的传播。1792年5月和11月分别发布的王室公告，在于敦促地方行政官员控制具有颠覆性言论的文献的传播并及时扑灭激进风波。1792年末与1793年初，保皇派组织在英国上下迅速地扩展开来，政府虽然没有建立相关的组织，但是它一定鼓励支持了保皇派的行动，而保皇派的组织确实对于抑制激进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1] 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政府也开始镇压激进派组织的运动，这些组织受法国大革命鼓舞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非常活跃。镇压很有效，许多激进派领导人被逮捕，之后不是被监禁就是被流放。与此同时，老百姓的日常活动也由一系列镇压措施而受到严格压制。英国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但是为了粉碎内部颠覆的威胁，它也必然会冷酷无情地行动。[2] 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法国事件与英国国内激进运动的内在联系，但是它并不打算干涉法国内政也没准备向法国发动战争来抵制大革命的威胁。尽管如此，英国最终还是卷入了与新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长期的激烈冲突之中。就是因为1792年这场战争，它确实驱使更多的英国激进保守派人士相信，务必要彻底从源头拔除法国革命纲领这个毒瘤。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英国的大臣们曾流露出希望法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对手能因内乱而削弱它的竞争力的心愿。甚至到1792年2月末，威廉·皮特本人还是相信，法国革命实际上有助于增进长久和平的愿景。[3] 1792年年末，当奥地利计划介入法国内乱时，英国政府拒绝支持“反革命”的行动，并且发布官方声明，宣布保持中立。因为法国革命军队在各条战线上的卓越战绩，才促使英国政府在几个月之内重新考量保持中立的真正利益所在。南尼德兰被侵占并且联合省也受到威胁。接着，法国国民公会于1792年11月19日，正式发布《博爱与互助法令》，宣称向

各国愿意争取自由平等的人民提供援助。英国这才开始恐慌，既担忧法国会破坏到欧洲整体势力的均衡，又害怕法国有意对其邻国输出革命。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最初只关心法国将吞并南尼德兰区以及对联合省的征服。[4] 1792年12月31日，英国政府宣布它“将不再漠不关心地坐视法国直接或者间接地使她自己成为低地国家的君主，或者是整个欧洲的权利与自由女神”。[5] 然而整个英国的保守派观点更担心的是来自扩张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威胁。当1793年2月战争爆发以及整个90年代，更多的宣传手册都在强调发动一场“反革命”之战的需要，它并非是为重现欧洲势力均衡之所需。[6]

英国一向法国宣战，大量的仇外和反高卢主义的宣传就随之而来，要知道，反高卢主义曾是英国社会一个长期的特征。反复宣传的内容是，自17世纪后期起，法国一直企图普世的统治，致使英国为了保卫她的宪政、她的贸易以及欧洲的势力均衡而卷入了一连串代价高昂的战争。正是法国人鼓励了斯图亚特王室奉行危险的天主教政策，也正是法国人支持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叛乱，他们还煽动了美国革命。法国已经用武装暴力掀翻了自己国家的政体，现在它正威胁着整个欧洲，屠杀、镇压及荒芜即将在欧洲蔓延。因此，每一个有爱国心的英国人都应该起而战斗，反抗法国公开的敌意或者秘密险恶的行动。如果他们要保卫自己所珍爱的一切自由，那就必须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法国人最初被刻画成嗜血和无法无天的恐怖分子，后来则被刻画为残酷的军事侵略者。当法国入侵了瑞士，甚至派兵侵入埃及并威胁英国领土的时候，许多之前曾是大革命的崇拜者们这时都加入意识形态运动的行列共同讨伐法国的军事侵略。英国危难之际，只有忠诚和团结，才能从法国革命纲领及武装侵略的灾祸中保卫自由、财产及宗教信仰。[7]

支持对法战争的洪流般的宣传手册，坚定地宣扬英国正在试图捍卫“欧洲的公民自由，反对即将毁灭一切的暴政”，[8] 尤其要护卫英国已建立的政治、社会秩序。这场战争被视为必需，因为它是为了“保卫现

存能使人民享有安全与繁荣，保有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宪政”。[9] 它同时是“一场保卫个人财产的战争”，[10] 也是为了捍卫这个国度使其“远离混乱、革命、暗杀与掠夺”。[11] 的确，这场战争有别于之前单纯为了保卫或获得财富，或者均衡欧洲势力的竞赛：“为了民族的存亡，我们拿起武器。为了保卫宗教信仰我们抵制无神论；为了维持正义和安全我们抗击普遍的掠夺；为了护持人性我们拒斥野蛮和残忍；是为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是为了合法的自由权利；是为了使文明社会的公民有别于强盗或野蛮人。英国之剑已经出鞘，为了上帝与我们的国家，为了捍卫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和所有我们的一切而战。”[12]

一般说来，英国政府和保守派的政治主张首要关心的是抵制法国革命的蔓延之势，但也有一些讨论，即是否需要对敌开展意识形态之战以在法国境内根除革命。英国政府一向关注法国革命对打破整体欧洲均衡造成的影响，但也意识到正是法国的内政使法国自身处于危险境地。他们认识到，是革命造就了活力充沛、富有进攻性的法国；正是法国人力图输出的革命信条试图颠覆她敌人的体制；正是法国体制跟她对手体制相左，才为寻求尽如人意的和平制造了困难。基于此，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承认，终结法国的无序，建立一个政府是相当重要之事，此政府要能“保卫其人民之普遍利益，使其免受该国前几年施行原则所必然导致的暴虐后果之害”。[13] 对威廉·格伦维尔（William Grenville）来说，瓦解法国大革命就是捣毁“那个向全欧洲传播革命信条颠覆所有文明社会……的老巢”，[14] 而对乔治三世来讲，英国的胜利可以被看成“上帝明示的为了正义的干涉，是为了摧毁圣言的敌人，是为了所有国民的福祉”。[15]

这些态度都鼓励了英国政府支持波旁王朝在法国的复辟。英国政府还提供资金用以支持流亡的波旁王室，但它小心地避免承认普罗旺斯伯爵为法国国王。由于法国保皇党人为联盟事业开展了必要的军事行动，并可协助英国削弱法国共和政体的力量，因此英国为法国保皇党人提供

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和经济的支持。不过英国大臣们很快发现，支持保皇党是一项极富争议的政策，它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保皇派肯定不能以自身的力量取得胜利，而英国的援助又很有限，并且经常延误。但英国依然向法国西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来支持反抗大革命的运动，一直持续到1800年。[16]

威廉·格伦维尔很可能是最坚定的反法国大革命的政府内阁要员，他很支持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但是他依然认为完全重归旧政体并不可行也非适当。他认可大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旧制度的极度不公而导致，承认如果完全重返旧制度，很容易引起另一场革命。他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剔除旧制度的恶习，建立一个参照英国模式的有限君主或君主立宪政体。这样，法国君主的权力无疑要受代议制体系的限制。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格伦维尔和他的内阁同僚们极其反对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几乎任何变革。他们尤其不能接受法国对于君主、教会及流亡人员财产的掠夺。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充公财产都应该被归还。总体而言，对于法国应该建立何种新政体，英国政府并没有阐释清楚。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认定如果没有有产阶级与法国全体人民的支持，那永不会有稳定的新政体。所以根本任务是团结法国人一致抵抗大革命的极端行为，支持建立有限君主制，具体的宪法形式可留待日后再细作打算。[17]

当然，像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证明其不切实际的一面。英国政府充分联系实际认识到，必须放弃将推翻法兰西共和政体作为此番战争的目标之一。多数内阁成员准备在法国内部寻找任意一种稳健的政权，打算与之协商共建和平。几乎没有英国人打算为复辟法国君主制而死战。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例外情况。少数激进的保守党人仍然绝对支持战争，一再游说英国必须发动一场“反革命”运动来推翻法兰西共和国及大革命的纲领。埃德蒙·柏克、威廉·温德姆（William Wendham）和约翰·鲍尔斯（John Bowles）是最大声疾呼这一战略的人，不过，一个保皇复辟派仍然得到成打宣传手册和一些报纸期刊如《泰晤士报》《真正英国人》

的支持。[18]

尤其是埃德蒙·柏克，长期致力于讨伐雅各宾主义。他深信干涉法国内政的正当合理，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如此这般地威胁到了整个欧洲文明："我们正在与一种政治体制作战，就其本质而言，此政体对其他所有政府都造成危害，它制造和平或者造就战争。但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都服务于它的颠覆目的。用它那种武装斗争学说来看，我们正处在战争中。"[19] 因此，对于来自法国的威胁不得不以攻击的形式予以反击："我细思，只有发动对雅各宾派和雅各宾主义的全面战争，才是我们将欧洲从可怕的革命中拯救（而英国是欧洲的一分子）出来的唯一可能之途。"[20] 在某处，他又写道："我只有一个指导方针，就是消灭法国的雅各宾主义，同样它也是当下政治军事事业中唯一有价值之事。"[21] 如此坚定的信念支持他力促英国人民支持反法国的正义而又必需之战。他不相信法国人可以自救："如果要治愈那些疯子，就必须像对其他疯子一样，先制服他们。"[22] 尽管柏克强烈支持联合流亡分子及其他保皇党共同抗敌，他确信并没有机会在法国国内取得"反革命"的胜利。雅各宾主义必须从外部被粉碎，而这只能由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反革命"联盟来达成。[23] 但他否认对法国普通民众本身有任何敌意，他只是力促英国用尽全力将法国的雅各宾主义连根拔掉。这是一场殊死战："你们是敌人，要么屈服，要么征服，只有一个选择。如果剑已从你手脱落，那敌人的屠刀就会将你的喉咙穿透。对雅各宾主义，没有中间道路，没有权宜之计，没有妥协可言。"[24]

约翰·鲍尔斯与柏克观点一致，认为法兰西共和国绝不可能与欧洲其他政府共存，他也进行了长期的宣传攻势，以赢得更多对法之战的支持。他坚称法国正试图推翻欧洲所有的君主制，这些政权别无选择，只有发动战争来抵制法国革命。[25] 只要法国在雅各宾理念统治下，和平就不可能获得。他谴责那些没能意识到法国威胁程度的人们："（他们）只考量了法国的武装力量，却忽略防范大革命的思想资源，是这些

思想壮大了法国的实力，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缺陷。他们只顾对付法国军队，却似乎从来没有深入法国军人的思想深处与法国的纲领作战。”[26] 在鲍尔斯看来，只有终止大革命，恢复法国君主制，和平才能再现。[27] 他也意识到，英国不可能将某种政体形式强加给法国，但她一定要成立一个坚实、稳定、永久和可靠的政府。[28] 只有古老的波旁王朝有点像能实现这些目标的样子。

埃德蒙·柏克同样希望法国政府能够“没有例外尽可能地”恢复“此前的基础”。[29] 他想要复辟波旁王朝、恢复贵族阶级统治地位并归还他们全部被没收的财产。他还想要严厉惩处雅各宾派，但他并不期望恢复旧制度中的每一个特征。专制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复辟既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也不能实践法治的真谛。只有有限君主制才能造福社会，但此类君主政体需要有活力的贵族阶级与教会复兴来支持。法国的新政体也需要从法国人民那里获取信心。[30]

极富战斗力的保守派们，如埃德蒙·柏克和约翰·鲍尔斯，虽然他们富有热情、决心及献身精神，但最终他们并没有说服政府采信其观点，当然，他们未能在18世纪90年代实现他们最珍贵的希望。尽管皮特明确地表明英国没有能力支付柏克所热衷的战争，威廉·格伦维尔作为外交部长最终仍然认同柏克的信念——英国确实要与法国大革命决一死战。但是格伦维尔担心持久的战争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并且结果也不确定。1797年，他在论述法国大革命威胁的性质与程度时写道：“无望全面根治。邪恶已经深深扎根于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因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它势力大增，甚至全面的‘反革命’行动也无法与之抗衡。恐怕可以预见下个世纪让人忧心的是宪政与政府形式之战，是君主政体、贵族统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斗争，正如此前若干世纪是宗教之战与领土扩张导致的战争一样。”[31]

---

[1] For loyalist activities see Robert R.Dozier，*For King*，*Constitution*，*and*

Country：*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xington，1983）；H.T.Dickinson，“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Militant Loyalism 1789-1815”，in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ed.H.T.Dickinson，pp.103-125；and H.T.Dickinson，“Popular Loyalism in Britain in the 1790s”，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d.Eckhart Hellmuth （Oxford，1990），pp.503-533.

[2] For a recent assessment of the extent of the government’s repressive measures，see Clive Emsley，“An Aspect of Pitt’s Terror： Prosecutions for Sedition during the 1790s”，*Social History* ，6 （1981），155-184；and Clive Emsley，“Repression，‘Terror’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ngland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0 （1985），801-825.

[3] William Cobbett，*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xix （1816），826.

[4] T.C.W.Blanning，*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London，1986），pp.131-159；and Michael Duffy，“British Policy in the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in *Britain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ed.Colin Jones，pp.11-26.

[5] William Cobbett，*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xx （1817），255.

[6] Gayle Trusdel Pendleton，“English Conservative Propaganda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802”，pp.176，407-414，442-448；and Nancy Uhlar Murray，“The Influe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he Church of England and Its Rivals，1789-1802”，pp.28-35.

[7] See，for example，*The Alarm*，*Being Britannia’s Address to Her People* （London，1793）；[William Jones，] *One Penny-Worth More* （London，1793）；*Ten Minutes Reflection on the Late Events in France* （London，1793）；*An Antidote against French Politics* （London，1793）；[Rev.Dr.Hawkes，]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England*，*on the Subje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ath，1794）；George Hill，*Instructions Afforded by the Present War*，*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and R.B.Nickolls，*The Duty of Supporting and Defending Our Country and Constitution* （York，1793）.On the reaction to Napoleon’s threat to Britain，see *The Warning Drum.The British Home Front Faces Napoleon* ，eds.Frank J.Klingsberg and Sigurd B.Hustredt （Los Angeles，1944）；and Betty T.Bennett，*British War Poetry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 1793-1815.

[8] *British Critic*，xii（1798），552.

[9] George Hill，*Instructions Afforded by the Present War*，*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p.6.

[10] William Vincent，*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Associated Volunteer Companies*，p.10.

[11] Rev.William Agutter，*An Address to Every Subject on the Late Important Victories*（London，1798），p.3.

[12] Thomas Hardy，*Fidelity to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the Duty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Edinburgh，1794），pp.33-34.

[13] British Library.Loan 57/107.Dundas to Richmond，8 July 1793.

[14] Public Record Office.Foreign Office Papers.FO 72/27.William Grenville to St.Helens，9 Aug.1793.

[15] The Letters of George Ⅲ，ed.Bonamy Dobrée（London，1935），p.256.

[16] W.R.Fryer，*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1794-1797（Manchester，1965）；Harvey Mitchell，*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Oxford，1965）；and Maurice Hutt，*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2 vols.，Cambridge，1983）.

[17] Michael Duffy，“British Policy in the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in *Britain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ed.Colin Jones，pp.14-16.

[18] Gayle Trusdel Pendleton，“English Conservative Propaganda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802”，pp.411，414.

[19] “Letters on a Regicide Peace”，*Burke’s Works*，v，164.

[20] *Burke’s Corr*.，vii，437.To the Duke of Portland，29 Sept.1793.

[21] Ibid.，vii，517-518.To Loughborough，12 Jan.1794.

[22]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Burke’s Works*，ii，529.

[23]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Burke’s Works*，ii，529；and *Burke’s Corr*.，vii，167.To the Abbe de La Bintinaye，3 Aug.1792.

[24] *Burke's Corr*.，viii，104.To William Windham，30 Dec.1794.

[25] John Bowles，*The Real Grounds of the Present War with France*（2nd.edn.，London，1793），p.21；and John Bowles，*The Dangers of a Premature Peace*，pp.13-14.

[26] *The Anti-Jacobin Review*，i（July 1798），28.

[27] John Bowles，*Reflection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p.9.

[28] John Bowles，*Objections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War Examined and Refuted*（2nd edn.，London，1794），pp.71-72.

[29] *Burke's Corr*.，vii，389.To the Comte de Mercy-Argenteau，c.6 Aug.1793.

[30] Ibid.，vi，317，414，423.To Richard Burke，5 Aug.and 26 Sept.1791；and to the Chevalier de La Bintinaye，2 Oct.1791.

[31] William Wickham，*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Wickham*（2 vols.，London，1870），ii，6.

参考文献与延伸阅读

Barrel，John 2000：*Imagining the King’s Death*：*Figurative Treason*，*Fantasies of Regicide* 1793-179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tlett，Thomas（ed.）2003：1798：*A Bicentenary Perspective* .Dublin：Four Courts Press.

Baxter，J.L.and Donnelly，F.K.1974：‘The Revolutionary“Underground”in the West Riding：Myth or Reality？’，*Past and Present* ，64，124-132.

Baylen，J.O.and Gossman，N.J.（eds）1979：*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British Radicals*：*Volume* 1，1770-1830.Brighton：Harvester Press.

Bennett，Betty T.1976：*British War Poetry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1793-1815.New York：Garland Publications.

Bewley，Christina 1981：*Muir of Huntershill*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ndman，David 1989：*The Shadow of the Guillotine*：*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British Museum.

Birley，Robert 1924：*The English Jacobins from* 1789 *to* 180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E.C.1963：*The Association*：*British Extraparliamentary*

Political Organization，1769-179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hstedt，John 1983：*Riots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England and Wales*，1790-181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oth，Alan 1977：‘Food Riots i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 1790-1801’，*Past and Present*，77，84-107.

Booth，Alan 1983：‘Popular loyalism and public violence in the northwest of England，1790-1800’，*Social History*，8，295-313.

Booth，Alan 1986：‘The United Englishmen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industrial north-west of England’，*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31，271-297.

Brown，P.A.1965：*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nglish History*.London：Frank Cass.Reprint of 1918 edn^

Butler，Marilyn 1984：*Burke*，*Paine*，*Godwin*，*and the Revolution Controvers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Craig 1982：*The Question of Class Struggle*：*Social Foundations of Popular Radicalism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Blackwell.

Cannon，John 1973：*Parliamentary Reform* 1640-183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ristie，I.R.1984：*Stress and Stability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

Claeys，Gregory 1989：*Thomas Paine*：*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Unwin Hyman.

Claeys，Gregory 1995：*Political Writings of the* 1790*s* .8 volumes.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Claeys，Gregory 2007：*The French Revolution Debate in Britain*：*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Coats，A.V.and MacDougall，P.（eds.）2011：*The Naval Mutinies of* 1797：*Unity and Perseverance* .Woodbridge：Boydell.

Cobban，Alfred（ed.）1960：*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London：A.& C.Black.2nd edn.

Collins，H.1954：‘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In John Saville（ed.），*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03-134.

Cone，Carl B.1968：*The English Jacobins* .New York：Scribners.

Cookson，J.E.1982：*The Friends of Peace*：*Anti war Liberalism in England* ，1793-181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okson，J.E.1997：*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Oxford：Clarendon Press.

Curtin，Nancy 1994：*The United Irishmen*：*Popular Politics in Ulster and Dublin* ，1791-1798.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rvall，F.O.1934：*Popular Disturbances and Public Order in Regency England*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avis，M.T.（ed.）2002：*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1792-1799.6 volumes.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Dickinson，H.T.1977：*Liberty and Property*：*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Methuen paperback，1979.

Dickinson，H.T.（ed.）1982：*The Political Works of Thomas Spence*.Newcastle upon Tyne：Avero Publications.

Dickinson，H.T.（ed.）1989：*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Basingstoke：Macmillan.

Dickinson，H.T.1994：*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Basingstoke：Macmillan.

Dickinson，H.T.2011：'Thomas Paine and His British Critics'，*Enlightenment and Dissent*，27，19-82.

Dickinson，H.T.（ed.）2013：*Ire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60-1805.Volumes 4-6.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Dickson，David，Keogh，D.and Whelan，K.（eds.）1993：*The United Irishmen*：*Republicanism*，*Radicalism and Rebellion*.Dublin：Lilliput Press.

Dinwiddy，J.R.1971：*Christopher Wyvill and Reform* 1790-1820.York：Borthwick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Borthwick Papers No.39.

Dinwiddy，J.R.1973：'The"Patriotic Linen Draper"：Robert

Waithman and the revival of radicalism in the City of London，1795-1818’，*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46，72-94.

Dinwiddy，J.R.1974：‘The“Black Lamp”in Yorkshire 1801-1802’，*Past and Present*，64，113-123.

Dinwiddy，J.R.1975：‘Bentham’s Transition to Political Radicalism，1809-1810’，*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36，683-700.

Dinwiddy，J.R.1979：‘Luddism and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counties’，*Social History*，4，3-63.

Dinwiddy，J.R.1980：‘Sir Francis Burdett and Burdettite Radicalism’，*History*，65，17-31.

Donnelly，F.K.and Baxter，J.L.1975：‘Sheffield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1791-1820’，*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0，398-423.

Dozier，Robert R，1983：*For King*，*Constitution and Country*：*The English Loyalist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Elliott，Marianne 1977：‘The“Despard Conspiracy”Reconsidered’，*Past and Present*，75，46-61.

Elliott，Marianne 1982：*Partners in Revolution*：*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Elliott，Marianne 2012：*Wolfe Tone*.Livepool：Livepool University Press.

Emsley，Clive 1978：‘The London“Insurrection”of December 1792：fact，fiction or fantasy？’*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7，66-86.

Emsley，Clive 1979a：‘The home office and i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on 1791-1801’，*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4，532-561.

Emsley，Clive 1979b：*British Society and the French Wars* 1793-1815.London：Macmillan.

Emsley，Clive 1981：‘An Aspect of Pitt’s“Terror”：prosecutions for sedition during the 1790s’，*Social History*，6，155-184.

Fennessy，R.R.1963：*Burke*，*Paine and the Rights of Man*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Freeman，Michael 1980：*Edmund Burke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Radicalism* .Oxford：Blackwell.

Gahan，Daniel 1995：*The People’s Rising*：*Wexford* 1798.Dublin：Gill and Macmillan.

Gee，Austin 2003：*The British Volunteer Movement* 1794-1814.Oxford：Clarendon Press.

George，M.Dorothy 1927-1929：‘The Combination Laws Reconsidered’，*Economic History*，a supplement to *The Economic Journal*，1，214-228.

George，M.Dorothy 1959：*English Political Caricature*：*A Study of Opinion and Propaganda* 1793-183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l，C.1913：*The Naval Mutinies of* 1797.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Ginter，D.E.1966：‘The Loyalist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1793 and British Public Opinion’，*Historical Journal*，9，179-190.

Goodwin，Albert 1979：*The Friends of Liberty*：*The English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Hutchinson.

Gough，Hugh and Dickson，David（ed.）1990：*Ire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Dublin：Irish Academic Press.

Graham，Jenny 2000：*The Nation*，*the Law and the King*：*Reform Politics in England* 1789-1799.2 volumes.Lanham，Maryla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Halévy，Elie 1972：*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 Radicalism*.London：Faber and Faber ^ Reprint of 1934 ed.

Hammond，J.L.and B.1979：*The Skilled Labourer*.London：Longman.Reprint of 1920 ed.

Hampsher-Monk，Iain 1979：‘Civic Humanism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The Case of 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18，70-89.

Handforth，P.1956：‘Manchester radical politics，1789-1794’，*Transactions of the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Antiquarian Society*，66，87-106.

Harris，Bob（ed.）2005：*Scotland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nburgh：John Donald.

Harris，Bob 2008：*The Scottish Peopl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Harvey，A.D.1978：*Britai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Batsford.

Hawke，David Freeman 1974：*Paine* .New York：Harper and Row.

Hole，Robert 1983：'British Counter-revolutionary Popular Propaganda in the 1790s'，In Colin Jones（ed.），*Britain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Conflict*，*Subversion and Propaganda* ，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53-69.

Hone，J.Ann 1982：*For the Cause of Truth* ：*Radicalism in London* 1796-182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wson，C.B.1975：*The Jacobin City*：*A Portrait of Norwich in Its Reac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8-1802.London：Blackie.

Jones，Colin 1983：*Britain and Revolutionary France* ：*conflict* ，*Subversion and Propaganda* .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Klingsberg，F.J.and Hustredt，S.B.（eds）1944：*The Warning Drum*：*The British Home Front Faces Napoleon* .Los Angeles：Williams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Knight，Frida 1957：*The Strange Case of Thomas Walker*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Laprade，W.T.1909：*Eng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

1797.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ocke，Don 1980：*A Fantasy of Rea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William Godwin*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ottes，Günther 1979：*Politische Aufkl　rung und plebejisches Publikum*：*zu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englischen Radikalismus im sp　ten 18 Jahrhundert* .Munich：R.Oldenbourg Verlag.

McCalman，Iain 1988：*Radical Underworld*：*Prophets*，*Revolutionaries and Pornographer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cFarland，E.W.1994.*Ireland and Scotland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cCord，N.and Brewster，D.E.1968：'Some Labour Troubles of the 1790s in North East England'，*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3，366-383.

McDowell，R.B.1940：'The Personnel of the Dublin Society of United Irishmen，1791-1794'，*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1，12-53.

McKenzie，L.A.1981：'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nglish Parliamentary Reform：James Mackintosh and the *Vindiciae Gallica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14，264-282.

Main，J.M.1966：'Radical Westminster，1807-1820'，*Historical Studie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2，186-204.

Marshall，Peter H.1984：*William Godwi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Meikle，H.W.1969：*Scotland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Frank Cass.Reprint of 1912 edn.

Miller，N.C.1968：‘John Cartwright and radical parliamentary reform 1808-1819’，*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3，705-728.

Miller，N.C.1974：‘Major John Cartwrigh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Hampden Club’，*Historical Journal* ，17，615-619.

Mitchell，Austin 1961：‘The Association Movement of 1792-1793’，*Historical Journal* ，4，56-77.

Money，John 1977：*Experience and Identity*：*Birmingham and the West Midlands* 1760-180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O’Gorman，F.1967：*The Whig Par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Macmillan.

Osborne，John W.1972：*John Cartwrig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kenham，T.1968：*The Year of Liberty*：*The Great Irish Rebellion of* 1798.London：Hodder & Stoughton.

Patterson，M.W.1931：*Sir Francis Burdett and His Times* 1770-1844.2 vols.London：Macmillan.

Philp，Mark 1988； *Godwin’s Political Justice* .London：Duckworth.

Philp，Mark 1991：*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ole，Steve（ed.）2009：*John Thelwall*：*Radical Romantic and Acquitted Felon*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Prochaska，F.K.1973：‘English State Trials in the 1790s：A Case Study’，*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3，63-82.

Rapp，Dean 1982：‘The Left-Wing Whigs：Whitbread，the Mountain and Reform，1809-1815’，*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1，35-66.

Roberts，Michael 1939：*The Whig Party* 1807-1812.London：Macmillan.

Rose，R.B.1960：‘The Priestley Riots of 1791’，*Past and Present* ，18，68-88.

Royle，E.and Walvin，J，1982：*English Radicals and Reformers* 1760-1848.Brighton：Harvester Press.

Seaman，A.W.L.1957：‘Radical Politics at Sheffield，1791-1797’，*Transactions of the Hunter Archaeological Society* ，7，215-228.

Schofield，Philip 2006.*Utility and Democracy*：*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eremy Bentha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mith，A.W.1955：‘Irish Rebels and English Radicals 1798-1820’，*Past and Present* ，7，78-85.

Spater，George 1982：*William Cobbett*：*The Poor Man’s Friend* .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yth，Jim 2000：*Revolution*，*Counter Revolution and Un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ck，W.A.2013：*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Thomas Paine* .London：Pickering and Chatto.

Spence，Peter 1996：*The Birth of Romantic Radicalism*：*War*，*Popular Politics and English Radical Reformers* ，1800-1815.Aldershot：Scholar Press.

Stern，Walter M.1964：‘The Bread Crisis in Britain，1795-1796’，*Economica* ，31，168-187.

Stevenson，J.1971：‘The London“Crimp”Riots of 1794’，*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6，40-58.

Stevenson，J.1974：‘Food Riots in England 1792-1818’，In J.Stevenson and R.Quinault（eds），*Popular Protest and Public Order* ，London：Allen & Unwin，33-74.

Stout，G.D.1949：*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Leigh Hunt’s Examiner* .Saint Louis：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Thale，Mary（ed.）1983：*Selections from the Papers of 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1792-17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D.O.1977：*The Honest Mind*：*Thought and Work of Richard Pri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is，M.I.1970：*The Luddites*：*Machine Breaking in Regency England* .Newton Abbot：David & Charles.

Thomis，M.I.and Holt，P^1977：*Threats of Revolution in Britain* 1789-1848.London：Macmillan.

Thompson，E.P.1968：*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Todd，Janet T.2000.*Mary Wollstonecraft*：*a revolutionary life* .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Tomalin，Claire 1974：*The Life and Death of Mary Wollstonecraft* .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Veitch，G.S.1965：*The Genesis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London：Constable^ Reprint of 1913 edn.

Vincent，Emma 1994：'The Responses of Scottish Churchme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802'，*Scottish Historical Review* ，73，191-215.

Wall，Maureen 1965：'The United Irish Movement'，In J.M.McCracken（ed.），*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Bowes & Bowes，5，123-140.

Wallas，Graham 1951：*The Life of Francis Place* 1771-1854.4th edn，London：Allen & Unwin.

Wells，Roger 1977a：*Dearth and Distress in Yorkshire* 1793-1802.York：Borthwick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Borthwick Papers，No^52.

Wells，Roger 1977b：'The revolt of the south-west：a study in

English popular protest’，*Social History*，6，713-744.

Wells，Roger 1983：*Insurrection*：*The British Experience* 1795-1803.Gloucester：Alan Sutton.

Wells，Roger 1987：*Wretched Faces*：*Famine in Wartime England*，1793-1801.Gloucester：Alan Sutton.

Western，J.R.1956：‘The Volunteer Movement as an Anti-Revolutionary Force，1793-1801’，*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71，603-614.

Wharam，Alan 1992：*The Treason Trials*，1794.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Gwyn A.1968：*Artisans and Sans Culottes*：*Popular Movements in France and Britai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London：Edward Arnold.

索引

（译者按：条目后的数字指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dams，Daniel，丹尼尔·亚当斯，7

Adams，William，威廉·亚当斯，74

Address to the Nation （I.CS），“告全国人民书”，13，16

Alien Office，境外处，37

American Colonies，美洲殖民地，4

Ancient Constitution，古代宪法，4，14，69，70

Anglicans，圣公会教徒，6，32

Anti-Jacobin，*The*，《反雅各宾》，30

Anti-Jacobin Review and Magazine，《反雅各宾评论》，30

Antoinette，Marie，玛丽·安托瓦内亚，26

army，军队，35，47，65，67

Ashley，John，约翰·阿什利，10，24，40，51

Assembly，National，国民议会，7

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berty and Property，“保护自由和财产协会”，33-35

Association movement，联合运动，4，20

Attorney General，总检察长，39

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54

Barlow，William，威廉·巴罗，38

Barnsley，巴恩斯利，60

Bastille Day，巴士底狱日，8，32

Bath，巴斯，34，35

Belfast，贝尔法斯特，45，47，48

Bell tavern，贝尔酒馆，9

Bentham，Jeremy，杰里米·边沁，72

Berkshire，伯克郡，68

Berwick，贝里克，68

Binns，Benjamin，本杰明·宾斯，10，40，50，51，52

Binns，John，约翰·宾斯，10，23，40，51，52

Birch，Samuel，塞缪尔·伯奇，40

Birmingham，伯明翰，1，12，13，31，32，34，36，41，66，67，77

Birmingham SCI，“伯明翰宪法资讯社”，13

Black Lamp disturbances，“黑灯风潮”，55，57，58，61

Bolton，博尔顿，60，77

Bone，John，约翰·博恩，11，51

Booth，Alan，艾伦·布斯，34

Botany Bay，博特尼湾，21，22，38

Bowles，John，约翰·鲍里斯，30，34

Bradford，布拉德福德，36

Brand，Thomas，托马斯·布兰德，63，69，73

Bristol，布里斯托，1，13，77

Britain，不列颠，1，4，6，7，8，14，15，16，19，24，25，26，27，28，32，33，34，44，47，49，50，54，62，63，64，77

Brooks，Samuel，塞缪尔·布鲁克斯，74

Broomhead，William，威廉·布鲁姆海德，12

Brougham，Henry，亨利·布鲁姆，66，73

Burdett，Francis，弗朗西斯·博迪托，62，67，68，69，72，73，74，75

Burgh，James，詹姆斯·伯格，12，21

Burke，Edmond，埃德蒙·柏克，8，14，25，29，30，32，63

Cabinet，*The*，《内阁》，19

Cambridge，剑桥，19

Cambridge Intelligencer，《剑桥情报员》，19

Canning，George，乔治·坎宁，30

Cannon，John，约翰·坎农，44

Canterbury，坎特伯雷，67，68

Carlisle，卡莱尔，67

Cartwright，John，约翰·卡特赖特，4，7，8，14，62，68，69，70，74，75，76，77

Catholic Committee，天主教委员会，45，46

Catholics，天主教徒，45，46，48

Channel fleet，英吉利海峡舰队，55，56

Cheap Repository Tracts，《便宜小智库》，30

Cheetham （or Chetham），威廉·奇登，William，51

Chelmsford Chronicle，《切姆斯福德时报》，31

Cheshire，柴郡，51，60

Church and King clubs，“教会与国王俱乐部”，32-34

Cintra，Convention of，67《辛特拉协定》

Cleary，Thomas，托马斯·克利里，76

Clubs，俱乐部，见 societies 条目

Cobbett，William，威廉·科贝特，39，62，67，68，70，71，74，75，76

Cochrane，Thomas，Lord，托马斯·科克伦勋爵，73，75

Coigley，James，詹姆斯·考格力，39，49，51，52，53

Coleridge，Samuel Taylor，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64

Collins，Henry，亨利·科林斯，10

Coltman，John，约翰·考特曼，66

Combe，H.C.，H.C.库姆，62

committees of secrecy，秘密委员会，40，43，63

Commons，House of，下议院，5，7，15，20，27，40，67，68，70，75

Constitution，宪法，4，5，14，15，26，27，34，42，71

Constitutional societies，立宪社，4，12-13，51

Convention，National，国民公会，21-2，38

Cookson，J.E.，J.E.库克森，66

Cooper，Thomas，托马斯·库珀，12

Copenhagen House，哥本哈根庄园，23，24

Coventry，考文垂，68

Creevey，Thomas，托马斯·克里维，73

Crossfield，Dr Robert，罗伯特·克罗斯费尔德医生，11，52

Crown and Anchor tavern，“皇冠与铁锚”酒馆，33，68

Crown Office，公诉署，39

Cruickshank，lsaac，伊萨克·克鲁克香克，30

Cumberland，坎伯兰郡，33

Darvall，F.O.，F.O.达沃尔，58

Defenders，Catholic，天主教捍卫者，47，56

Derby，德比，11，12，19，66

Derby Mercury，《德比信使报》，19

Derbyshire，德比郡，51

Despard，Colonel Edward，克罗纳尔·德斯帕德，39，40，52，54，58

Dickinson，H.T.，H.T.狄金森，7，17，18，29

Dinwiddy，John，约翰·丁威迪，44，57，59，60，68

Directory，French，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督政府，51，64

Dissenters，非国教徒，6，12，13，32，44，66

Dixon，James，詹姆斯·迪克森，52

Dozier，Robert，罗伯特·多奇尔，34，36

Drennan，Dr William，威廉·德伦南医生，45

Dublin，都柏林，21，45，47，49，50，52

Duckett，William，威廉·达克特，49

Dundas，Henry，later Viscount Melville，亨利·邓达斯，后来的梅尔维尔子爵37，68

Dundee，敦提，12，50，52

Eaton，Daniel Isaac，丹尼尔·艾萨克·伊顿，11，20，30，39，40

economical reform，经济改革，4，5，8，70，71，73

Edinburgh，爱丁堡，1，12，21，22，38，39，50

Edinburgh Review，《爱丁堡评论》，71，74

elections，选举，3，9，13，75

Elliott，Marianne，玛利安·艾略特，49，54

Emmet，Robert，罗伯特·埃米特，49

Emsley，Clive，克莱夫·埃姆斯利，38，41，50，65

England，英格兰，7，8，24，38，45，48，49，50，52，60，

69，77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政治正义论》，17，20

Erskine，Thomas，托马斯·厄斯金，38

Europe，欧洲，7，8，63

Evans，Thomas，托马斯·埃文斯，51，52

Examiner，*The*，《观察家》，71，74

Example of France，*A Warning to Britain*，*The*，《法国的例子：给不列颠的警告》，30

Exeter，埃克塞特，36，67

Falkner，Matthew，马修·福克纳，40

Federal constitution，联邦宪法，6

Fitzgerald，Lord Edward，爱德华·菲茨杰莱尔德爵士，46，48

Flanders，佛兰德斯，35

Flood，Henry，亨利·福拉德，7，8

Food prices，食品价格，9，53

Ford，Richard，理查德·福特，37

Fox，Charles James，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29，70

Foxite opposition，福克斯反对派，21，29

France，法国，6，7，8，11，19，23，24，26，29，32，34，35，37，39，42，47，48，49，51，54，56，59，60，62，64，66，67，70，71

franchise，投票权，3，4，5，7，9，13，15，28，46，73，76-77

Gales，Joseph，约瑟夫·盖尔斯，11，19，40

Galloway，Alexander，亚历山大·格罗威，52

GeorgeⅢ，乔治三世，3

George，M.Dorothy，多萝西·乔治，41

Germany，德国，64

Gerrald，Joseph，约瑟夫·杰拉尔德，11，21，22，38

Gill，Conrad，康拉德·吉尔，56

Gifford，William，威廉·吉福德，30

Gillray，James，詹姆斯·吉尔雷，30

Ginter，D.E.，D.E.金特，34

Glasgow，格拉斯哥，1

Gloucester，格洛斯特，77

Godwin，William，威廉·戈德温，17，20，23，43，68

Goodwin，Albert，阿尔伯特·古德温，21，22，24，44，53

Government，政府，3，4，5，6，10，15，21，25，31，33，35，36，37，38，39，40，41，43，44，45，46，48，50，51，52，53，54，55，56，58，59，60，64，65，66，67，70，71

Grey，Charles，查理斯·格雷，20

Groves，John，约翰·格罗夫斯，38

habeas corpus，suspension of，《暂停人身保护令》，40

Halifax，哈利法克斯，60，76

Hamburg，汉堡，53

Hammond，J.L.and B.，J.L.and B.哈蒙德，58

Hampden Club，“汉普顿俱乐部”，75-77

Handforth，P.，P.汉德弗斯，12

Hardy，Thomas，托马斯·哈代，9，10，38

Harrison，John，约翰·哈里森，13

Harvey，A.D.，A.D.哈维，65，68，69

History of the Boroughs，《选区史》，7

Hodgson，Richard，理查德·霍奇森，10，24

Hodgson，Solomon，所罗门·霍奇森，20

Holcroft，Thomas，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7，38

Hole，Robert，罗伯特·霍尔，30

Holland，荷兰，64

Holt，Daniel，丹尼尔·霍尔特，40

Holt，P.，P.霍尔特，44

Home Office，内政部，37-38，56

Hone，J.Ann，安·霍恩，53

Hookman，John，约翰·胡克曼，30

Horsley，Samuel，塞缪尔·霍斯利，30

Huddersfield，赫德斯菲尔德，60，77

Hull，赫尔，13，68

Hunt，Henry，亨利·亨特，62，74，76

Hunt，Leigh，利·亨特，71，72，74

Hustredt，S.B.，S.B.斯特拉德，64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a Reform in Parliament，《议会改革不可避免之后果》，30

Ireland，爱尔兰，39，44-49，52，53，56，62，70

Irish radicals，爱尔兰激进派，37，44-53

Italy，意大利，64

Jeffrey，Francis，弗朗西斯·杰弗里，71

Jewson，C.B.，C.B.朱森，12

Jones，John Gale，约翰·盖尔·琼斯，11，23，41，67

Justices of the Peace，治安官，37

King，国王，5，15，27，31，33，67

King，John，约翰·金，37

Klingsberg，F.J.，F.J.格林斯堡，64

Lancashire，兰开夏郡，34，50，51，53，58，59，60，66

Lee，William，威廉·李，57

Leeds，利兹，1，11，12，60，62，77

Leeds Mercury，《利兹信使报》，66，74

Leicester，莱斯特，12，13，31，66，77

Leicester Chronicle，《莱斯特时报》，66，74

Leicester Herald，《莱斯特先驱报》，19，40

Lemaitre，Paul，保罗·勒麦特，74

Liberty of the subject，臣民自由，3，4，6，14，21，28，66，70

Lincoln，林肯，33

Liverpool，利物浦，1，13，34，66，68，77

Locke，John，约翰·洛克，14

Lofft，Capel，卡佩尔·洛夫特，69

London，伦敦，1，2，4，9，11，21，31，34，35，36，37，39，50，51，53，54，58，62，67，68，69，76

London，Bishop of，伦敦大主教，30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伦敦通讯社，9-11，12，13，16，17，18，19，22，23，31，38，50，51，52，56，57，67，74，75

Lords，House of，上议院，5，15，27

Lottes，Gunther，冈特·洛特，11

Louis XVI，路易十六，26

Loyalist associations，效忠派社团，30，31，32-36

Luddites，卢德分子，55，58-61，66，73，77

Lynam，George，乔治·利那姆，38

McCord，Norman，诺曼·麦考德，23

McDowell，R.B.，R.B.麦克道尔，46

Mackintosh，James，詹姆斯·麦金托什，15，64

Madocks，W.A.，威廉·迈德克斯，73

Main，J.M.，J.M.梅因，75

Manchester，曼彻斯特，1，12，17，32，33，34，35，36，39，51，52，60，66，67，76，77

Manchester Chronicle，《曼彻斯特时报》，31

Manchester Herald，《曼彻斯特先驱报》，12，19，31，34，40

Manchester Mercury，《曼彻斯特信使报》，31

Margarot，Maurice，莫里斯·马格利特，9，11，22，38

Marylebone Fields，马里波恩场，24

Mealmaker，George，乔治·米尔梅克，50，52

Melville，Viscount，梅尔维尔子爵见 Dundas，Henry条目

Members of Parliament，议员，4，5，29，53，63，69，73，74，75

Metcalfe，William，威廉·梅特卡夫，38

Middlesex，米德尔塞克斯，62，68，70

Miller，N.C.，N.C.米勒，77

Mitchell，Austin，奥斯丁·米切尔，34

Montgomery，James，詹姆斯·蒙哥马利，40

Moore，Peter，彼得·莫尔，73

Moral and Political Magazine，《道德与政治杂志》，19

More，Hannah，汉娜·莫尔，30，34

Muir，Thomas，托马斯·缪尔，21，38

Mutinies in the navy，海军兵变，55-57，61

Napoleon，拿破仑，64

Nares，Robert，罗伯特·内尔斯，30

National Debt，国债，65

Natural rights，自然权利，4，5，6，7，14，17，18，28，69

Navy，Royal，皇家海军，55-57

Neilson，Samuel，塞缪尔·尼尔森，45

Nepean，Evan，埃文·内皮恩，37

Newark Herald，《纽瓦克先驱报》，19，40

Newcastle，纽卡斯尔，12，35，62，67，77

Newcastle Advertiser，《纽卡斯尔广告人》，31

Newcastle Chronicle，《纽卡斯尔时报》，20，31

Newcastle Courant，《纽卡斯尔报》，31

Newfoundland，纽方兰，33

Newspapers，报刊，见 press 条目

Nore，诺尔，55，56

Norfolk，诺福克，33

Northern Star，《北极星》，48

Northmore，Thomas，托马斯·诺斯莫尔，75

Northumberland，诺森伯兰郡，33

Norwich，诺维奇，12，18，21，22，31，62

Nottingham，诺丁汉，11，12，19，68

Nottingham Review，《诺丁汉评论》，74

Nottinghamshire，诺丁汉郡，51，58，59

O’Connor，Arthur，阿瑟·奥康纳，39，40，46，47，48，49，51，52，53

Oldfield，T.H.B.，T.H.B.奥德菲尔德，7，8

Oracle，《预言报》，31

Orange Order，“橙带党”，46，48

Oswald，James，詹姆斯·奥斯瓦德，43

Paine，Thomas，托马斯·潘恩，14，16，17，18，20，21，23，30，31，35，40，43，69

Paley，William，威廉·佩利，30，34

Palmer，Thomas Fyshe，托马斯·菲舍·帕默，38

Parker，Richard，理查德·帕克，56

Parliament，议会，3，4，5，6，8，16，21，28，29，36，40，41，43，58，60，62，65，66，67，68，70，73，74，76，77

Patriot，*The*，《爱国者》，19

Patriotic Society of Manchester，“曼彻斯特爱国社”，12

Patronage，庇护权，5，44，65，70

Paymaster of the Navy，海军出纳，68

Peace，Friends of，“和平之友”，66

Perceval，Spencer，斯宾塞·波西瓦尔，73

Perth，珀斯，50

Petitions，请愿，4，11，12，13，20，21，66，68，76-77

Phillips，Richard，理查德·菲利普，19，40

Pig's Meat，《精饲料》，20

Pitt，William，威廉·皮特，5，37，56

Place，Francis，弗朗西斯·普莱斯，10，68，72，74

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议会改革方案》，72

Playfair，William，威廉·普莱费尔，30

Plymouth，普利茅斯，13

Political Register，《政治纪事报》，67，68，70-71，74，75

Politician，The，《政治人》，19

Politics for the People，《大众政治》，20

Poor Man's Friend，The，《穷人的朋友》，31

Population，人口，1-2

Portland，William Henry Cavendish Bentinck，3rd Duke of，波特兰公爵，37

Portsmouth，朴茨茅斯，13，35

Portugal，葡萄牙，67

Post Office，邮局，37

Potteries，波特里斯，66

Powell，James，詹姆斯·鲍威尔，38

Press，出版物，2，3，4，6，16，19，20，30，31，34，50，64，70-72，74

Preston，普雷斯顿，77

Price，Richard，理查德·普赖斯，4，6，7，8，14，29，31，32

Priestley，Joseph，约瑟夫·普里斯特利，12，13，31，32，40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政府的原则》，30

Prochaska，F.K.，F.K.普罗查斯卡，41

Property，defence of，保卫财产，27，28

property，redistribution of，财产分配，15-18

Protest against T.Paine's Rights of Man，*A*，《对托马斯·潘恩〈人权〉的抗议》，30

Protestant Ascendancy，新教势力，44，46，48

Protestants，新教徒，45，46，48

Pullar，George，乔治·普拉，74

Reading，雷丁，68，77

Reasons for Reformation，《改革的理由》，70

Reeves，John，约翰·里夫斯，30，33，34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反思法国大革命》，26，29

Reform of parliament，议会改革，4-5，7-8，12，13，14，15，16，17，18，20，21，22，23，24，26，62，67，69，70，71，72，73，74，75，76，77

Reformation Society of Manchester，“曼彻斯特改革社”，12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大不列颠宪法评论》，43

Revolution，American，美国革命，6，14，69

Revolution，French，法国革命，1，2，6，7，8，12，14，25，26，29，63，64

Revolution of 1688，光荣革命，3，6，14

Revolution Society，“革命社”，6，7，8，31

Revolution Society of Norwich，“诺维奇革命社”，12

Rhodes，Ebenezer，埃比尼泽·罗兹，66

Richter，John，约翰·里克特，74

Rights of Man，《人权》，14，16，20

Riots，骚乱，22-23，24，32-33，34，55，60，67

Rochester，罗切斯特，68

Romilly，Samuel，塞缪尔·罗米利，73

Ronkesley，William，威廉·罗克力，57

Roscoe，William，威廉·罗斯科，66

Rose，Richard，理查德·罗斯，32

Rowlandson，Thomas，托马斯·罗兰森，30

Russell，Thomas，托马斯·罗素，45

Salford，索尔福德，34

Scotland，苏格兰，20，21，38，49，50，51，52，53

Seaman，A.W.L.，A.W.L.塞曼，12

Secretary of State，国务大臣，37

Seditious Meetings Act，“危及治安集会处置法”，9，23-24，40-41

Sharp，William，威廉·夏普，7

Sheffield，谢菲尔德，21，23，24，3 1，57，60，66，77

Sheffield Iris，《谢菲尔德信息报》，40，66，74

Sheffield Register，《谢菲尔德纪事报》，12，19

Sheffield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谢菲尔德宪法资讯社”，11-12，17，22

Short Hints upon Levelling，《短评“拉平”》，30，

Sinclair，Charles，查理·辛克莱，22

Skirving，William，威廉·斯格文，21，22，38

Smith，William，威廉·史密斯，62

Societies，political or radical，社团，政治或激进，2，4，6，12，15，18，20，22，41，43，75-77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宪法资讯社”，4，7，8，11，12，22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人民之友协会”，8

Society of the Supporters of the Bill of Rights，“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4

Sons of Liberty，“自由之子”，5l

Southampton，南安普顿，35，68

Southwark，萨瑟克，1

Spater，George，乔治·斯巴特，71

Spence，Thomas，托马斯·斯彭斯，11，15，18，20，30，40，43，69

Spies，间谍，37-38，44，53，54，59，60

Spithead，斯皮特海德，55

Star，《星报》，33

Statesman，《政治家》，74

Stirling，斯特灵，12

Stockport，斯托克波特，11，12，77

Strand，斯特兰德，9

Strikes，罢工，22-23，55

Strutt，William，威廉·斯特拉特，66

Suffrage，见franchise条目

Sun，《太阳报》，31

Sussex，苏塞克斯，35

Sussex Weekly Advertiser，《苏塞克斯广告人周报》，31

Switzerland，瑞士，64

Tandy，Napper，纳伯·坦迪，45

taxation，征税，2，5，8，9，16，59，65，70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宣誓条例和市镇社团法案”，6，7，32

Thale，Mary，玛丽·塔勒，10，11，13，l6

Thelwall，John，约翰·赛尔沃，11，15，17，19，20，23，24，38，40，43

Thomis，M.，M.托米斯，44，58

Thompson，Edward P.，爱德华·汤普森，44，56，57，58，59，60

Thoughts on English Government，《考量英国政府》，30

Tierney，George，乔治·蒂尔尼，8

Tone，Theobald Wolfe，西奥博尔德·乌尔夫·托恩，45，47，48

Tooke，John Horne，约翰·霍恩·图克，8，14，19，38，62，69，72

Tower of London，伦敦塔，54，67

Trade unions，工会，22-23，41

Treason trials，叛国罪，21-2，38-39

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叛逆法”，24，40-41

Treasurer of the Navy，海军财政总管，68

Treasury，财政人员，65

Tribune，*The*，《论坛报》，20

True Briton，《真正英国人》，31

Tyne Mercury，《泰恩信使报》，74

Tyneside，泰恩赛德，20，23

Ulster，阿尔斯特（北爱尔兰），45，46

Union Society，“联合社”，76-77

United Britons，“不列颠人联盟”，51

United Englishmen，“英格兰人联合会”，38，50，51，52，53，57

United Irishmen，“爱尔兰人联合会”，21，45-54，56，57

United Scotsmen，“苏格兰人联合会”，5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6

Veitch，G.S.，G.S.维奇，44

Village Politics，《乡村政治》，30，

Vincent，William，威廉·文森特，30

Volunteers，志愿军，36，65

vote，投票权，见 franchise 条目

Waithman，Robert，罗伯特·威瑟姆，68

Wakefield，Gilbert，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39，40

Walcheren，瓦尔特伦，67

Wales，威尔士，7，8

Walker，Thomas，托马斯·沃克，12，34，39，40

Wall，Maureen，莫林·沃，49

Walsh，James，詹姆斯·沃尔什，37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美国独立战争，5

War with France，对法战争，8，35，59，64-67，70，71，77

Wardle，G.L.，G.L.沃德尔73，76

Watson，Richard，理查德·沃特森，30

Watt，Robert，罗伯特·瓦特，50

Wedgwood，Josiah，约西亚·韦奇伍德，66

Wells，Roger，罗杰·威尔斯，23，38，44，53，56

Western，J.R.，J.R.韦斯顿，36

Westminster，威斯敏斯特，33，62，68，74，75

Westminster Association，“威斯敏斯特协会”，4，13

Westminster Committee，“威斯敏斯特委员会”，74-75

Westmorland，威斯特摩兰郡，33

Whigs，辉格党人，8，29，53，62，73

Whitbread，Samuel，塞缪尔·怀特布莱德，73

Wickham，William，威廉·维克汉姆，37

Wilkes，John，约翰·威尔克斯，4，68，69

Wiltshire，威尔特郡，36

Wollstonecraft，Mary，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5

Woolwich Arsenal，伍尔维奇军械库，54

Worcester，武切斯特，68

Wordsworth，William，威廉·华兹华斯，64

Wyvill，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怀威尔，4，8，62，69，70，74

York，Frederick，Duke of，约克公爵，68，72

York Courant，《约克报》，31

York Herald，《约克先驱报》，74

Yorke，Henry Redhead，亨利·雷德黑德·约克，12，20，22

Yorkshire，约克郡，36，51，53，57，58，59，60，66

Yorkshire Association，“约克郡协会”，70

Young，Arthur，亚瑟·扬，30

译后记

傅雷对待翻译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杨绛回忆说他在一次翻译会议上拈出诸多翻译实例，一一指出谬误严苛批评，完全忘记例句也是有主人的，不但大家下不来台，甚至气得一位老翻译家大哭。杨绛懂傅雷，理解他的耿介。不过，她的宽厚有她自身的经验做底子，而我在这本小册子翻译过程中的部分经验竟与之相重合，不免对其宽厚心生感激。杨绛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译事不易，已是共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我竟然断断续续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翻译，每隔一段时间拿出译文来看看就汗流浃背一回，直到再也躲不过deadline才冒险携带着捉拿不尽净的虱子跳蚤示人。

这种紧张并非全然来自语言使用的障碍。今天人们可以仰赖各种语言资讯工具，某种程度上跨越交往障碍，从此地到达彼地。但正如陆谷孙所言，翻译是借助于书籍、词典一类的桥梁工具，从一种文字出发"抵达"另一种文字的旅行。然而，无论工具多么精良，真正的"抵达"都非易事。在语言思想史上曾经一度流行一个假设，人们猜测地球人与外星人曾经对话，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之间的转译是他们的对话语言。但是，史家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与航海学家本·芬尼（Ben Finney）合作，研究了欧洲人与玛雅人相遇后的情况，发现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语族间交流极为困难。他们据此指出，上述假设的历史前提是错误的。这个结论揭示出，语言的差异其实是附着并潜藏在词汇、语法背后的文化差异。语言塑造我们的思维习惯，表达了我们观察、沟通、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犹如上古巫师沟通天地般，要尽可能精确传递彼此的信息，前提是他自己首先要艰辛勘察语言的两端。

在我看来，史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更是需要经由三层转换才有可能达到深度的沟通。史家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他向文献与遗存提问，并依据它们的特殊“语法”去理解它们，力图重新回到现场，理解往昔，这是“翻译”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译者对史著所依据的史料的理解与翻译。通常认为，针对一段史料，只要依据正确的语法、逻辑，辨识出词汇在语境中的意义，然后将文句的意思用译者的本土语言明白晓畅表达出来，即是不错的翻译。然而实际情况可能稍有不同。如果译者对史料的理解与史家的理解有所偏差，便会背离史家在第一层次上的“翻译”。比如，本书中有一段材料：

The equality insisted on by the friends of reform is AN EQUALITY RIGHTS...The inequality derived from labour and successful enterprise，the result of superior industry and good fortune...

语言工具书告诉我们，“industry”有“工业”“产业”，也有“勤勉”的含义。如果我们按照语法惯例与词汇的常用含义，轻易地将其理解为“工业”“产业”，通常就会将“superior industry”译成“优势产业”之类。但回到历史现场来看，这段材料出自1792年，“industry”在当时的涵义与用法并不同于今天。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在《关键词》中清晰梳理了该词汇含义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今天它所具有的“工业”及其衍生涵义是在19世纪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一词汇在1792年的用法并不是指“工业”“产业”，而是那时用得更为普遍的“勤勉”之义。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翻译“语句”，还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如此才能在史料的层次上展开与著述者的对话，以达成更为准确的理解。

最后，翻译是否能表达原作意思，本土语言能否像原作语言一样表示和传达各种信息，既取决于译者对语言结构的正确掌握，也取决于译者对该著作乃至史家本人的理解。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常常很困惑，纠结于对某个词汇、某段文字或者某个术语的直译或者意译。有

时，在某种程度上，意译更明白晓畅，也更能表现译者的理解水平，但为了尽可能传达史家选择该词汇或者术语的原意，我便生生采取僵硬的直译。比如，在论证伦敦通讯社对下层社会的影响时，我将该句翻译成："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通讯社曾做过多少努力，去吸引非熟练工或者赤贫之人"；而非更晓畅的译法："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通讯社曾对非熟练工或者赤贫之人有多大的吸引力"。在我看来，后者虽然表达清晰，但只是对知识和信息的提炼。前者虽然不够通俗，但"做努力"与"去吸引"却表达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既传递出史家构建历史现场的努力，也还原了历史自身的动态图景。又如"class"一词，大约在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它开始具有了现代意涵，指涉特别的社会阶层，尤其当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盛，它成为描述"阶级"的固定名词。因此对"middle class"这一描述社会地位的术语，我也考虑再三，最终选择了两种译法：当它指涉19世纪之前的社会群体时，我选择用"中等阶层"，而指涉19世纪之后的社会群体及其运动时我采用"中产阶级"。

尽管有以上的努力，我仍然不敢确信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并传递了史料和原著的意涵。但这本著作是值得译介的。丹尼尔·罗什曾说："要想了解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首要的是研究英国的思想和文化"。因为"不与别的国家比较，就不可能理解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除了"对文本的比较"之外，我们也需要了解大量社会交往，"必须研究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出现的实实在在的交流，而不光是思想领域内的交流"。这个论断不但对理解"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有效，实际上对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同样有效，尤其当激进主义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再一次兴盛之时，英国的历史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观察、思考自身所处的时代提供珍贵的经验证据。

哈里·狄金森教授在其长达六十年的史学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将对政治精英与中等阶层、社会下层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对政治行

动与政治理念、信仰的研究结合起来。狄金森教授将这种路径称为“人民政治”（Politics of the People）研究，它关注的是中下等阶层民众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这本著作探索的既是行动又是理念，也包括了政治精英与群众在大革命危机与1793—1815年英法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英国政治体系所面临的又一次巨大危机。爱尔兰已经在尝试革命，英国也正走近革命之途。这场危机还导致保守思想家跟激进思想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声势浩大的辩论。英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此类思想论战，譬如17世纪中期内战期间的论战，但这一次的规模还要巨大。这便是本书的主题。它是狄金森教授的早期作品，不过此次中译，作者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史料与新的研究结论，同时附录一篇新近完成的论文，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英国国内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另外，此次中译版，我们还为本书添加了一些人物肖像图和当时流行的政治讽刺画，来加强论证效果与阅读感受。

本书所选插图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肖像画，共八幅。他们是书中提到的、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几位人物，分别是埃德蒙·柏克、托马斯·潘恩、威廉·科贝特、弗朗斯希·博迪托、约翰·卡特赖特、理查德·普赖斯、西奥博尔德·乌尔夫·托恩，还有一幅爱尔兰激进主义者的群像。

第二类图像是十二幅政治讽刺漫画，均选自著名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的画作。

写到这里，终于到了可以画上句号的时候。这本小书的翻译见证了我这一年多来高浓缩的生命经验。一如既往，我感激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感谢哈里·狄金森教授给予我的信任与友谊。他所践行的史家志业令我感佩，对我个人在问学之路上的提携与帮助更将是我终生宝爱的记忆。这本小书虽薄，却也凝聚着人间至诚感佩的情谊。每当我懈怠、拖延，情绪失控无法工作时，是外子王东杰的不断鼓励令我重拾信心继续往前；当译完全书之后，也是他与我一道朗读译文，以最大可能确保译

文的通达晓畅。我还感念每一个给我温暖致意的朋友，倘列成一张表单，则将是长长的一串人名。在这些人名中，他们诸位不得不提：王亚兰、王晓玲姐妹是我这一年新近结识的朋友，她们与我一同陪伴狄金森教授在蓉的时光，与狄金森教授结下深厚情谊；杨晓敏是我多年好友，每当我遇到问题，她总是第一个给我抚慰，让我安心；蔡军剑、吴孜祺、李思磬、赵灿鹏与我相交数年，总是以其智识与热诚给我最大的鼓励与信心；好友王曼力在这本小书的翻译过程中帮我查找资料、梳理词汇，助我顺畅翻译，我们在2008年地震中结下友谊，这些年里共同度过许多艰难时刻，难以忘怀。他们不知道这种情感慰藉让我多么感激。有时候人生途中友情来了也会走了，朋友聚了也会散了，无论世界如何流动，当时的温暖会永驻心间。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谭徐锋、潘永强先生及诸位同仁，是他们专业、热忱的鼓励与帮助，才有此书的面世。

辛旭

2016年4月21日

中国学人和学生们从这份薄薄的小册子里可以窥见1790年代那些勇敢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在政治改革的努力中所遭遇的诸多困难和苦痛，不过，也要清楚知道，除爱尔兰那些武装颠覆国家的激进主义者外，只有个别激进分子被判刑处死。这本小书还将让我们看到英国是如何避免发生暴力革命，逐渐学会通过进化方式缓缓取得进步的。英国的主要宪法与政治制度是从1689年至今逐渐发生嬗变的。相反，法国在1789年以迅猛而又暴烈的革命终结了强有力的君主统治，却在国内暴力与国外战争连绵多年之后，于1815年复辟。由1789年大革命制造的这种分流，从来都未复原。

——哈里·狄金森

上架建议 历史/欧洲近代史

新 史 学 天猫旗舰店

ISBN 978-7-303-21264-4

9 787303 212644 >

定价：45.00元

法国大革命史译丛

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

路易十六出逃记

[美] 谭旋 (Timothy Tackett) 著
赵雯婧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陛下，您不能通过

　　大革命的第三年夏天

　　军队和人民

　　国家的命运

第二章 法国的国王

　　国王与大革命

　　决定逃跑

　　计划逃亡

　　风险

第三章 逃亡的国王

　　崩溃

　　回到巴黎

　　事后调查

第四章 我们伟大的城市——巴黎

　　不忠的路易

　　“无套裤汉”的诞生

　　国王不是必需的

　　1791年巴士底日

第五章 国家之父

　　结束革命

过渡期
君主制的命运
战神广场屠杀事件
第六章 各省的恐慌和镇压行动
博爱的意义
外部的敌人
内部敌人
法律与权宜之间
第七章 国王的审判
人民的国王
血泪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我们的责任是服从
第八章 事件之后
复立为王
恐怖危机
结语 出逃事件的影响
参考书目
译后记
返回总目录

致谢

我在法国的初步研究是在加州大学一个总统奖学金的支持下展开的。本书的主体部分是我在北卡罗莱纳国家人文科学中心工作时完成的。这个出色的研究机构的融洽氛围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干练协助，对书稿的完成有非常大的帮助。我在此无法一一列出帮助我构思、研究、写作这本书的所有朋友、同事、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的名字，但是我要特别感谢Jack Censer、Helen Chenut、Maria Chenut、David Garrioch、Carla Hesse、Jeff Horn、Marilee Jaquess、David Jordan、Thomas Kaiser、Jo B. Margadant、Ted Margadant、Jeremy Popkin、Joyce Seltzer、Donald Sutherland、Jean Tackett以及我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国大革命本科生课程班上的所有同学们。感谢Philippe de Carbonnière、Alain Chevalier和Luc Passion帮助我搜集插图。第六、七、八章的早期版本首先在1999年3月的法国历史研究年会，在2001年2月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André Burguière and Patrice Gueniffey研讨会以及在2001年10月于马里兰大学举办的“暴力和法国大革命”国际研讨会上发表。最后，感谢Nicolas Tackett制作索引。



《逮捕抛弃国家的国王一家》，瓦伦的居民和国民自卫队队员在拱门下拦住了国王的马车，而轻骑兵和龙骑兵刚赶到保卫国王一家。在这一天晚上，不同时段发生的事件凝缩成了这一个单独的场景。

序言

1789年夏天在法国开始的那场革命，已经被公认为是西方文明史上的转折点之一。虽然这次革命的起因复杂多样，但革命一开始，就很快与启蒙主义那些崇高的人道主义理念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宗教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被统治者对政府拥有控制权。大部分革命者也都做出承诺，要以非暴力手段推进政治变革，正如一位早期的领导人所言，“仅仅通过理性、正义和民意的力量”[1]。这些理念在很多方面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宣传的观点相似，并很快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中得到体现，此宣言随后成为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

虽然有这样理想主义的开端，1789年的大革命还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中转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1793年夏天，一个践行极权主义且极端不宽容的政权已经出现，并且将恐怖和暴力作为施展权力的常规手段。未经许可的搜查、未经控告的逮捕，以及对自由言论的镇压——贯彻这些手段的系统和高效，超过了法国历史上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法定诉讼程序，在有利于判定连坐犯罪的时候经常被抛在一边。一个“犯罪嫌疑人法令”以未经证实的控告为基础来攻击个人。截至1794年夏天，已经有上千人被送往断头台——有些人是通过遭到歪曲的审判制度，有些未经审讯便被草率处死。

为何1789年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革命会蜕变成1793—1794年的大恐怖，对此任何解释都必须考虑到如下一系列因素：存在于法国和欧洲许多地区之间的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对手蓄意要发动一场反革命；围绕

在革命领导人之间的严重的党派之争；以及一种异乎寻常的阴谋恐惧的出现——无论阴谋真的存在或仅仅是想象——都进一步推动了党派之争，并使得流行一时的暴力合理化。但是对于大恐怖之起源的完整解释，必须也要仔细考量一个事件带来的影响：1791年7月21日，当时在位的法国国王曾经试图逃走。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试图逃离首都，放弃了以他的名义建立的新政府，这一戏剧性的尝试启动了规模超乎寻常的一系列行动和反应，对于社会的每个因素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并最终波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关于这个事件的描述，即国王逃往瓦伦，以及这一事件是如何改变了法国的历史。

注释

[1] Antoine-François Delandine，*Mémorial Historique des Etats généraux*，5 vols.（n.p.，1789），3-4.

第一章　陛下，您不能通过

这并不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小镇。这是一个小型的居民聚集区，位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贡森林（Argonne Forest）的两条山脉之间，横跨在埃尔（Aire）河两岸。有大约一千五百个灵魂在这里从事他们的“工作与时日”[1]，他们要么是店主或者手艺人，要么是在周围乡村地区的小麦地和果树林里工作的农民。如同其他遍布全国的许多小城镇一样，这里是一处穷乡僻壤。[2] 一条从南边进入瓦伦（Varennes）的重要道路，从城堡教堂的拱门下勉强通过，然后曲折地穿过这座小镇，经过河上一条狭窄的木桥。自这座小镇向北有一条道路通向三四十英里[3]之外的色当（Sedan）要塞和蒙特梅迪（Montmédy），在那里的边境处就是如今的比利时，当时尚且属于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如此，这条道路路面非常粗陋，而且养护不善，在路上频繁出没的基本上只有当地的农民和军事人员。对于绝大部分的居民来讲，瓦伦就如同一个商业和文化上的死胡同，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在1791年7月21日的晚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事件确实发生了。[4] 在夜里十一时左右，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睡得很熟了，月亮尚未升起，整个小镇笼罩在漆黑和寂静之中。唯一可见的灯光来自一家叫作金色手臂（Golden Arm）的小旅店，这家店位于老城区的主路旁，就在拱门之下。有一伙年轻人还在那里喝酒谈天：有几个城外来的访客，正在楼上的房间里打发时间；有一队最近刚到达城里的讲德语的骑兵，驻扎在附近的一所女修道院里；还有四个本地人，都是志愿国民自卫队的队员。这些队员里包括小旅店的主人让·勒布朗（Jean Le Blanc）、勒布朗的弟弟保尔、学校教师的儿子约瑟夫·彭森（Joseph Ponsin）以及市长的

儿子朱斯坦·乔治（Justin George）。乔治的父亲当时正在巴黎，担任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的代理人一职，而这里的四个人也很有可能一直都在讨论关于大革命的最新消息。他们同样可能会对那些德国人提出些问题，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这座小镇里，以及最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军队在附近区域活动。

就在这时，两个陌生人闯进了旅店。其中一名异常高大而且自信的男人，自称名叫德鲁埃（Drouet），立刻开口询问旅店店主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是否是忠诚的爱国者。得到了他们的肯定答复之后，他告诉他们一个惊人的消息。他是大约在西南方向三十千米以外的一个小镇圣梅内乌尔德（Sainte-Menehould）的驿站马厩主管，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看到法国国王和王后，以及整个王室家族正乘着两辆马车行进，他们在他的马厩更换了马匹。在跟镇长商议过之后，他和他的朋友纪尧姆（Guillaume），就骑着马跟踪王室家族前进（他们两人从前都是骑兵）。他们刚刚经过了停留在路边的国王一家，后者就停在去往瓦伦的路上，几百步的距离之外。他很确定那就是国王本人，并且他正在逃往奥地利边界。为了国家和大革命，他说，一定要拦下国王和他的家人。

这样一个故事自然很难令人信服。但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并且德鲁埃的紧张和自信本身很有说服力，使得在场的人开始采取行动。勒布朗兄弟匆忙赶去唤醒其他的国民自卫队队员以及几位住在附近的镇议员，然后回家取自己的火枪。与此同时，德鲁埃和纪尧姆还有其他几个人迅速赶到河边，用一辆装满家具的马车堵住了木桥。

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议员让-巴蒂斯特·骚塞（Jean-Baptiste Sauce）是市镇的行政长官（town manager），在市长乔治暂居巴黎期间，由他负责代理日常的政府工作。他的谋生职业是食品商兼蜡烛制造者，当时三十六岁，高高的个子，微微有点驼背，头已经有些秃了。虽然他受的教育极为有限，只能以一种简易音标拼写的方式来写字，但他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具有一种沉静而卓越的风度，赢得了市民的尊敬。勒布朗兄

弟带来唤醒他的消息使他十分震惊，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可能穿戴整齐，抓起一盏灯笼，然后派他的两个儿子以呼叫火警这种传统的方式去把镇上的其他人叫醒。大约在11点20分的时候，骚塞、乔治、彭森、勒布朗兄弟，还有从圣梅内乌尔德来的两个人已经同其他大约六个人在旅店附近的街道上会和。与此同时，德鲁埃描述过的那两辆马车，正在两位骑手的陪伴下咔哒咔哒地行进到拱门下面。

几名自卫队员拿着火把，其他人举起火枪，迫使赶车人停下车。骚塞走进第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轻便马车，发现车里有两名吓得发抖的女人。她们告诉骚塞，她们的身份证明文件在后面那辆车的人手里。这位食品商接着走近第二辆车，这辆车要大得多，由六匹马拉着，上面高高堆满了行李。他提着灯笼靠近车窗，仔细地向里面窥视。车里看样子坐着六个人。其中有两个孩子——一开始他并不能分辨出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三位穿着中产阶级服饰的女人，一个大约二十岁，模样十分漂亮，另外两位年纪略大，举止也更加优雅；还有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长着大大的鼻子和双下巴，打扮得像是商人或者是法定代理人。骚塞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国王，但是他感觉这一位跟他看到过的国王画像有几分相似之处。

不顾他们的抗议，骚塞把这几位旅行者的护照拿到旅店里仔细查看。几位市镇官员聚在一起，他们读到的是一位俄国男爵夫人的身份文件，证明这是准备前往法兰克福的科尔夫夫人以及她的随从，这份文件由外交部长和国王路易十六本人签发。虽然这份文件对于随行人员的数目含糊其辞，并且瓦伦也并不在从巴黎到德国的最佳路径上，但文件看起来合乎规矩，骚塞和他的同事们倾向于让他们通过。但是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自身名誉的德鲁埃态度很坚决。他知道他认出的就是国王。他还在圣梅内乌尔德看到一个贵族骑兵队长对马车行礼，并像服从指挥官那样执行命令。如果这些市镇官员听任国王一家逃亡到境外，那他们就将成为叛国者的共犯了。此外，德鲁埃宣称，这份护照是无效的，因

为上面没有国民议会主席的签字。其实主席的签字并不是法律规定的，但是在场的人都不确定这一点，最后这些市镇官员们决定权且拖延时间。



《让-巴蒂斯特·德鲁埃》



《让-巴蒂斯特·骚塞》

马车里的人被告知，时间太晚了，无法妥善检查他们的证件，并且前方的道路路况很差，在夜间行进并不安全，最好是等到天亮之后再出发。虽然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一行八位旅行者和三个穿着黄色制服的随从还是不得不下车，他们在食品商的家里得到了殷勤的接待。他们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街道，被领到了距离小旅店只有几步远的骚塞的店

铺，挤挤挨挨地爬上木质的楼梯，来到他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套房。开始这些人一口咬定他们最初的说法。其中一位年长些的女人宣称她就是科尔夫男爵夫人，他们正急着赶路，一定要放行他们通过前往德国。但是这个男人与国王的相似之处引起了骚塞的好奇心，他突然想起当地有一位法官雅克·德泰（Jacques Destez），后者娶了一位来自凡尔赛的女人，德泰曾经在一些场合见过王室家族。骚塞走到街上，来到这位法官家中，将他唤醒，带回自己家。德泰几乎还没有走进楼上的房间就跪倒在地，激动地颤抖着弯曲的身体。“哦！国王陛下！”他叫道。

这简直就是童话故事里的情节：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本人，就在他们的小镇上，在食品商的卧室里。这里还有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以及他们十二岁的女儿和五岁的儿子——法国王太子，王位的继承人——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还有孩子们贵族出身的家庭女教师图尔泽夫人（Madame de Tourzel）。每个人都惊讶得愣住了。骚塞年长的母亲不久之后进屋，抽泣着跪倒在地上，她从来没有想象过能有一天亲眼见到国王和小王太子。意识到自己的微服出行已经被揭穿，路易十六现在开口说话了。“是的，我是你们的国王，”他说道，“我现在是来跟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我忠诚的孩子们，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5] 接着他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他把市议会的成员们一一拥在怀里，拥抱了他们。他向他们求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被迫逃离巴黎的王宫，一些狂热的革命者，雅各宾党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城市。更糟的是，这些煽动者已经有数次威胁到他整个家族的生命安全。他现在告诉大家，其实他并无意要逃亡到德国，而只是想到国境线附近的蒙特梅迪城堡去。在那里远离了巴黎的暴徒们，他才可以再次夺回对国家的控制，终结现在的混乱和据他所说越来越猖狂的无政府状态。“在被迫生活在首都的匕首和刺刀中之后，我已经一路来到了乡间，来寻求你们一直享有的自由和宁静。如果我留在巴黎，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死。”[6] 小镇的居民必须为他准备好马匹，帮助他完成他的旅

程。

被这一时刻的情感所征服，也对君主制度那虔诚的神秘感和王室家族在场的光环感到敬畏和震撼，几位城镇长官决定提供帮助。如果有必要，他们说，他们可以亲自陪伴他到蒙特梅迪去。等到天一亮，他们就会组织自己的国民自卫队来护送他。他们回到市政大厅来着手安排，依然处于头晕目眩之中。他们怎么可能违抗来自路易十六本人的命令，来自一个统治法兰西超过八百年的家族之继承人的命令？

但是，当他们离开了国王，当他们经过彼此讨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身所在的处境可能意味着什么之后，他们产生了别的想法。

大革命的第三年夏天

因为瓦伦的居民已经跟两年之前完全不同了。在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个市镇已经卷入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事件，这些事件触及了整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且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这里的居民观照自身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的方式。1789年3月，在一系列复杂的联合事件（尽管他们对这些事件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发生之后，所有二十四岁以上并且纳税的城镇居民——占绝大多数——都受邀参加一个国民选举，这个选举是为了指定代理人参加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代表大会，而三级会议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了。[7] 瓦伦既是市政选举的地点，同时也是次级地区选举的地点，这是他们自己的市长做出的选择。市长从前是一位律师，他开始时是代理人之一，后来成为全职代理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3月的选举大会要求收集一些市民想要提交给国王的意见声明。虽然瓦伦市民的意见清单后来遗失了，但它应该跟保存下来的蒙特福孔市（Montfaucon），一个仅仅六英里之外的小镇的清单没有太大的不同。[8] 同整个法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市民先是过分地颂扬召集选举的路易国王，然后，同杂乱无章的要求改进本地情况的需求一起，他们还提出了造成沉重负担的许多赋税应该降低或者免除；所有的行政当局应该分权，并且把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议会；还有，应该有更多的经费投入教育。但是，无论提出了哪些具体的需求，瓦伦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市民开始系统地审视自己的生活，争论哪些机构和惯例应该改进或者废除，这些行为就其本身而言已经可以算是一场革命了。它极大程度地唤起了民众的期待，期待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教会机构的普遍改革。

在接下去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瓦伦的市民惊异地看着自己曾经帮助建立起来的三级会议转变成了一个国民“制宪”大会（National “Constituent” Assembly）。新召集的大会不仅开始着手起草法兰西的第一部宪法，还策划了大规模的针对法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改革，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在意见清单中曾经表达过的愿望。1789年8月初，攻陷巴士底狱以及战胜想要推翻革命的阴谋的消息传来，引发了一场全城范围的大规模庆祝活动。[9] 活动包括礼炮齐鸣、燃放焰火、市政广场的盛大舞会，甚至还向穷人分发面包——就像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上会发生的那样。还有一个非常罕见的“点亮全城”活动，家家户户都在晚间把蜡烛或者灯笼放在窗台上。对于一个尚且不习惯公共照明的社会，这样一场烛光的集中展示确实可能会产生令人震惊的景象。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这还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件。很快瓦伦的市民就被要求选举他们自己的市政和地区政府机构，以及参与到日复一日的新法律履行过程中。他们开始同国民议会有了经常性的接触，以寻求建议和消息、同他们的代理人联系、派出一个“游说团体”，有时甚至对于起草宪法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在除了他们自己最切身的家庭和地方事务之外的每件事都需听从他人——贵族、神父和王家行政官——支配长达几个世纪之后，他们现在被邀请，或者说被强迫参与到他们自己的政府乃至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去。这样一个过程带来了一种掺杂着狂热激情的参与感和地方自主性。这还逐渐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即法兰西认同感，这取代了原先狭隘的埃尔河谷、阿尔贡森林世界认同感，而这之前曾经是这里的居民观照世界的重要标准。伟大的启蒙运动、理性解放和重新评价的滚滚浪潮曾经席卷了18世纪欧洲大城市的文化精英，但对于瓦伦的人民来说显得着实遥远。也许只有伴随着大革命本身的制度革命，伊曼纽尔·康德启蒙运动的口号“ ***sapereaude*** ”——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对于广大的法国小镇和乡村居民来说才有了切实的意义。正是在这种逐渐累积的自信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的认同感上，我们才能理解在整个地区类似于德鲁埃和骚塞这样，各式各样的行政首领们在7月21—22日的行为。

但是其他两种制度上的产物也在形成1791年瓦伦人民的大革命心理上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在1789年夏天，面对着无政府主义的威胁和旧制度倒台后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行动，这个市镇首次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10] 成立了两支“国民自卫队”，即“猎人”和“投弹手”，拥有各自的制服、旗帜和鼓手，听从自己选出的长官指挥。当这三百名左右、年纪从十六岁至五十岁的强壮男性在大街上和城市广场周围操练队列，还伴着当地音乐家的即兴演奏的时候，你无论怎么形容瓦伦人心中涌上的骄傲之情，也是不为过的。最初他们只携带很少的真枪实弹，比如打猎用的火枪或者家里代代相传的古老枪支。但是经过新制服的盛装打扮之后，穿着翠绿色制服的猎人队和皇家蓝与白色制服的投弹手队，都感受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目标意识和重要之感。[11] 穿制服的长官这种重要身份，从前几乎是贵族阶层的专属特权，现在却几乎人人都触手可及了——即使是小旅馆掌柜让·勒布朗或者是律师的儿子朱斯坦·乔治。实际上，7月21日领导瓦伦卫兵的长官之一，年轻的埃蒂安·拉代（Etienne Radet），后来在战争时期很快转变成为正规军的一员，最终以拿破仑麾下将军的身份出现。

1790年的春夏，瓦伦的自卫队队员以及他们来自整个地区的伙伴们集合在一起参加了一系列的集体行动或者说“联合”庆祝活动。[12] 其中之一，于1790年7月1日，有大约三千名自卫队队员来到了瓦伦，他们互相交流、列队行进，并发誓要效忠于国家。两个星期之后，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一周年之际，朱斯坦·乔治、埃蒂安·拉代，还有其他一些瓦伦自卫队队员一起，一路行进到了巴黎，参加了盛大的国家联合庆典，地点在首都西部的战神广场，即现在的埃菲尔铁塔所在地。在那里他们曾经见到过路易十六——当然是隔着相当远的距离——目睹他宣誓要忠于宪法。人们可以设想，当同样一位国王一年之后出现在他们的城镇，背叛

他曾经宣誓要保卫的宪法时，他们肯定会回想起一年前的那副场景。

在大革命期间的新社会思潮中，第二个不仅在瓦伦，而且在整个法国的城镇都具有相当重要性的社会机构，是当地的民间社会团体，或者说“俱乐部”。或许是在他代理人父亲的影响力之下，朱斯坦·乔治于1791年3月25日帮助建立了宪法之友会在当地的分会。这个俱乐部最初有四十四名成员，是当时瓦伦所属的默兹省（Meuse）新建立的行政部门中第一个类似的组织。[13] 他们很快就同巴黎的宪法之友总会，即通常所说的“雅各宾俱乐部”，建立了直接的从属关系。俱乐部表面上的目的是支持并宣传国民议会传下来的事业，但是在瓦伦以及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雅各宾派很快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使命，即成为大革命的看门狗，对抗着它一切已知或者可能的敌人。

在6月危机发生之前的几个月，俱乐部就展开了针对本地神职人员的详细审查。一年之前国民议会决定对天主教会进行彻底整顿，这一行动被称为“教士民事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1791年年初，代表们要求所有治愈灵魂的神父们正式宣誓在大体上效忠于宪法，在细节上效忠于神职人员改革。4月，瓦伦教区的神甫梅坦（Methains）就因拒绝进行这样的宣誓而被当地的大革命官员们正式解除了职能。神父坚称这个国家无权将他免职，试图在耶稣受难日上主持弥撒，但是雅各宾党人和国民自卫队进入教堂，用武力制止了他。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瓦伦的领导们有特别反对圣职者或者反宗教，但是他们显然不愿意让拒绝效忠宪法的人有权教育当地的孩子们或者掌管忏悔室。周围地区的教区神父们几乎有一半拒绝了规定的誓词，这更加深了在本地区已经有了协商好的反革命行动这一怀疑。[14]

实际上，几乎从大革命一开始，由在巴黎发生的事件所引发的千禧年将至的乐观主义就伴随着恐惧和焦虑。从21世纪的视角出发，我们有时会忽略民主的最初经验一定曾经显得多么令人惊惧且动荡不安，即使是在那些狂热支持者的眼里。很难相信，那些旧制度的贵族阶级和大僧

侣们不会操纵种种事件，不会再次试图攫取权力，或者为他们所失去的寻求报复。事实上在1791年6月之前已经有三次近乎恐慌的浪潮席卷过瓦伦，都与人们对那些想象中的敌人的恐惧有关，或许这些敌人已经被前特权阶层所收买。1789年8月瓦伦居民听说有一伙土匪正从北方逼近，受了很大的惊吓。虽然这些传说中的土匪从未现身，但相应的防御措施已经实施起来，组成了镇上的第一支国民自卫队。仅仅一年之后，又有谣言四起，说奥地利的军队已经杀过边境，于是附近城镇集合了五百名国民自卫队队员来协助保卫瓦伦。第三次恐慌出现在1791年2月，有谣言说另一伙土匪穿过北方的边境正在逼近。虽然这次警报也同样毫无依据，但是瓦伦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使得地方行政机构增援了大量枪支和弹药，甚至还有四门加农炮来保卫瓦伦。[15] 接连而来的恐慌时期使得当地居民很好地一次次实际动员起来，在危险真正降临之时，这样的提前准备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瓦伦市政厅当时拥有该地区最大的武器装备之一，在7月21日的危机来临之时，这些武器都已经准备就绪。

除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土匪或者奥地利军队的恐惧，一个更加切近的威胁就是驻扎在瓦伦以及附近的几个城镇里的大量王家军队，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德国或者瑞士的雇佣兵。市民与士兵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也往往是紧张的。当地居民经常需要自掏腰包负担这些士兵的食宿，而年轻士兵的不守规矩也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惯于狂饮作乐，调戏当地的妇女。驻扎在村庄里的军队偶尔还会被用来强迫催缴滞纳税款。从1789年10月开始，市政府就对于在瓦伦驻扎的一支说德语的骑兵先遣队表示抗议。[16] 这支队伍于第二年2月撤离，但是六个月之后布耶（Bouillé）将军就又派来了大约六百名步兵。这些步兵刚刚参与了临近城市南锡（Nancy）的一场臭名昭著的镇压活动，镇压普通士兵对于他们贵族出身的长官的抗议，而对于这次抗议很多市民爱国者都公开地表示同情。这些步兵在瓦伦的出现带来了巨大的紧张气氛。直到市政

领导在城市边缘的一处废弃的圣方济各女修道院中给这些步兵找到住处，紧张的气氛才得到缓解。

这些步兵于1791年2月撤离。但是在6月初，布耶将军宣布他又将派来一支由六十名说德语的轻骑兵组成的先遣队。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此举是为了保护国王逃亡行动的大规模部队调动的一部分，布耶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场阴谋。虽然这支依然驻扎在女修道院的小分遣队几乎没有引起瓦伦市民的立即关注，但很多居民看到大量信使和运送军火的马车，听到整个地区流传着大部队正在行进的传闻时，他们的疑心都在与日俱增。确实，默兹地区的官员们都在这样一段和平的时期内，十分困惑地关心着以下情况："步兵队和骑兵队前进又后退，前一天来了，第二天又离开，前进，撤退，在没有明显的必要性或者用处的情况下更换营地。" [17] 1791年6月20日，有四十名驻扎在瓦伦的轻骑兵向西方出发，据推测应该是去接收一批来自巴黎的"财宝"或者是一保险柜的钱来支付军费。第二天，布耶将军的小儿子和另一个军官来到紧邻河东岸的帝王旅馆过夜，他们声称这是为了准备接待布耶将军本人来访，而来访的目的尚未说明。

当地的恐慌到底扩散到了多大的范围，现在已经不得而知。骚塞本人6月21日清早写了一封信，欢迎轻骑兵的到来，将他们的到来作为自己城镇的重要地位的表征。他已经跟指挥官交谈过，对方向他保证战争不太可能会发生。但是瓦伦的其他市民，尤其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们，对此深表怀疑。一种不断增长的针对贵族的偏见，使得指挥部队的贵族军队成为大家普遍怀疑的对象。就在6月21日危机发生的当天晚上，一位不知名的雅各宾俱乐部成员还给巴勒迪克（Bar-le-Duc）地区官员们写了一系列的信件。他详细说明了城里所有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他还详细描述了一位名叫弗朗索瓦·德·戈格拉（François de Goguelat）的人的来访——此人是国王组织逃亡行动的另一位主谋——戈格拉就国民自卫队的事情询问了骚塞，还打听了市政领导人们的

政治观点。有一种非常可疑的观点——也许只是非常接近真相——他甚至推测出军队正在谈论的神秘的“财宝”也许正是国王本人，国王很快就将被那些未指明的恶人从巴黎诱拐而来。[18]

如果在德鲁埃出现的那天晚上，乔治和他的朋友们在金色手臂旅店里讨论的正是这些军队所带来的各种谣言和恐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法国东南部边境处的这座毫无特色的小城瓦伦，确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制度上、军事上，以及心理上——去迎接6月21日晚上的危机，这远远超过了策划国王逃亡行动的人们的设想。

军队和人民

6月22日一大早，甚至在市政官员尚在争论如何应对突然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法兰西国王的时候，整个瓦伦的市民都已经开始动员起来。那天晚上的事件发生的确切顺序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每个人都注意到了混乱、骚动和许多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了。但是几乎没有时间将这些记录下来，而对于那天晚上的事件的解释，也是在事隔许多天，甚至许多年之后，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多少有些彼此不一致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无论如何，在骚塞的两个儿子在整个城镇奔跑，惊呼火警的时候，很明显有人已经开始敲响河对岸教区教堂的大钟。教堂钟声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不同的节奏和音色能够召集民众，乃至宣布婚礼或哀悼死亡。但是急促而重复的叮叮当当声是警报，正如其名，只能意味着有危险和紧急情况发生。很快所有人都聚集到街上，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几分钟之内，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们就叫醒了鼓手，后者开始以同样急切的节奏敲起了“战争召集”。人们边走边穿着衣服，带着火枪冲到市中心或是正在分发枪支的市政大厅。

听到国王到来的消息，他们的好奇心和惊讶与焦虑不相上下。部队的调动和财宝的说法的含义突然之间都豁然开朗。那些尚未体会到一国之君的突然出现的魔力的人，很快就意识到了阻止国王的逃亡行动可能会带来报复，以及最近进入该地区的军队很显然会展开攻击。幸运的是，最直接的危险就是那些德国骑兵，而他们依然驻扎在瓦伦城里，不会构成威胁。他们看上去要么在呼呼大睡，要么尚酩酊大醉，显得完全无害。但是也有人看到他们的指挥官上马过河，向北方逃去，年轻的小布耶和他的同伴紧随其后。每个人都知道指挥官会通知布耶将军本人，

很快他们就会发现布耶的整个军队都来到了他们身后。[19] 国民自卫队指挥官派分遣队去往通向这个城市的各个要道，用马车或者原木或者犁或者手头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来设立路障。他们还派出信使，向周围的城镇紧急求援。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似乎有一件在早晨变成了现实，有大约40名轻骑兵出现在瓦伦南边的入口，身后还跟着一批骑兵。市民很快就知道了轻骑兵的指挥官是戈格拉和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他们跟德国骑兵交谈了几句，后者很快就惊呼起来“国王！王后！”[20] 接着他们越过了路障，挥动着军刀，用刀背将国民自卫队驱散，最终来到了骚塞的房子门口，摆成战斗队形。[21] 接下来的时刻紧张而茫然，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激起了“极其恐惧的焦虑”。轻骑兵们高高地骑在马背上，戴着饰有羽毛的头盔，佩着手枪和军刀，很明显地对众人构成威胁。骚塞走了出来，在他的杂货店门口发表了一场勇敢的爱国演说，宣称他知道这些骑兵“是十分值得尊敬的公民，也是十分勇敢的战士，不会参与这么一场只会导致流血的暴力事件”[22]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些骑兵懂得多少法语，国民自卫队和骑兵之间的僵持仍在继续。最后，先是一名接着是两名军官要求跟国王对话。当戈格拉过了一会儿出来，准备组织突围的时候，国民自卫队已经准备好防御了。他们将四门小加农炮布置在街上，上下瞄准这些骑兵，并且大声呼唤周围房屋的居民打开房门，让仍然留在街上的市民进去避难，只将骑兵队伍留在火力范围内。看到这样危险的景象，戈格拉命令自卫队将他们的加农炮转向一边，但是有一名国民自卫队队员开枪了，将这位贵族从马背上轰了下来。受伤的戈格拉男爵被抬进金色手臂旅馆，后面紧紧跟着那个打伤了他的国民自卫队队员——后者不住地道歉，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其他的男男女女转而去说服那些群龙无首的骑兵们。经过一些更加紧张的时刻并且诱以免费的美酒，德国人最终被劝服下马，很快跟市民拥成一团，发誓要效忠当地的国民自卫队指挥官。[23]

对于瓦伦的市民而言，戈格拉以及轻骑兵的出现在很多方面都意味着一个转折。通过这次暴力的威胁行动，瓦伦市民前所未有地坚信，国王的逃亡不仅仅代表着君主想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寻找一个远离巴黎的避难所，还暗示着一个巨大而危险的阴谋，其中牵涉外国士兵，或许还有外国军队。另外，花费在市领导骚塞身上的努力一定是十分强大的。就在几天之前，戈格拉曾经以十分有力的爱国之情诱使他大体汇报了城镇和国民自卫队的情况，即使其他市民依然疑心重重。现在这位杂货商渐渐明白，他被一个贵族所操纵，犯下了错误。“在爱国主义的掩饰之下，”他后来这样写道，“戈格拉对我隐瞒了他罪恶的叛变。我只能对此表示出我最深切的憎恨。”[24] 这段经历对于骚塞后来对国王立场的转变，无疑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无论如何，增援力量很快就从四面八方赶到。大约在午夜过后半小时，有人派出了三四名骑着马的治安官，他们很快就在各个村庄之间奔波呼喊着：“武装起来，武装起来！”之后骚塞也马上向当地最大的军事中心凡尔登（Verdun）送信求助：“快！请派你们的国民自卫队带着加农炮来。国王和王室家族现在都在这里。快点！赶紧来帮我们！”[25] 甚至在信使到达之前，有些临近的村庄就听到了瓦伦教堂的钟声，很快，民兵们就开始列队向瓦伦进发，敲着战鼓，旗帜迎风飘扬。在位于北方两英里处的蒙特布兰维尔（Montblainville），最早的信使大约在午夜一点来到瓦伦。虽然对目前紧急状况的确切含义仍然不甚清楚——信使在消息尚未完全充分得到理解之前就疾驰而去通知别的村庄了——然而人们听到了武装起来的呼声，大约有一百人在刚过一点半的时候徒步到达了瓦伦。当他们得知这场危机的确切性质之后，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就像在之前的动员行动中那样，妇女和儿童也很快赶来，带着整车整车的食物和供给。[26]

在阿尔贡森林里一座附近山头上的蒙特福孔，在接近三点钟的时候得到了消息。那里的居民后来回忆起，前一天晚上一切显得是那么平

静，而他们得知这个“既突然又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又是多么震惊。但是，他们也抓起了能召集来的任何武器，在天亮之前赶到了瓦伦。消息在五点一刻的时候传到了凡尔登，地区领导在派出约四百名自卫队队员和法国常规军之前，也把消息传递了下去。南方二十英里之外的特里奥（Triaucourt）在大约同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在阿尔贡西侧的奥特里（Autry）也在大约一小时之后得到消息，这些消息既有直接来自瓦伦的，也有从其他两个城镇辗转而来的。事实上，很多地区一听到消息之后就马上敲响了自己教堂的大钟，并另外派出信使通知住在其他农庄和小村子里的朋友和家人。一个连锁反应就此启动，使这个消息以一种令人惊异的速度传播出去。到早晨的时候，来到瓦伦的武装力量有的来自屈西（Cuisy）、塞普特萨尔热（Septsarges）和比蒙特福孔更远一些的贝坦库尔（Bethincourt），还有来自默兹河畔的达纳武（Dannevoux）和西弗里（Sivry）以及比默兹河还要远的当维莱尔（Damvillers）。在那天早晨，消息来到了南边四十五英里之外的圣迪兹尔（Saint-Dizier），以及西边七十多英里之外的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今香槟沙隆）和兰斯。在东边差不多同等距离之外的梅斯（Metz）和蒂永维尔（Thionville）大约在下午时分得到了消息。所有这些城镇都很快向瓦伦派出了分遣队。[27]

6月22日早晨，有几千人出现在了瓦伦这个阿尔贡地区的小镇上：带着火枪的自卫队队员，随便抓着什么武器的农民，还有尽力为男人准备食物和面包的女人。虽然有那么几个不太守规矩的人闯进了当地居民的家，搜寻食物和饮水，但是绝大部分到达者都秩序井然，静静等待着他们确信一定会到来的袭击。一位年长一些的爱国贵族，从前曾担任过国王军队里的指挥官，开始在现场系统地布置防御工作。围绕着城镇的一周大部分都布置了路障，瓦伦中心地区的那座木桥也被拆掉了一部分。天亮之后不久有六十五名轻骑兵从北方到达，但是当时人们都已经用火枪武装了起来，骑兵队被迫等在城外，只有指挥官德隆（Deslon）

队长被放进城里面见国王。[28]

国家的命运

与此同时，市议会正在同城里的贵族和当地法庭的法官一起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正在苦苦思索应该如何对待国王。这些平素以店主、小商人和小律师为主业的一小群人，突然发现自己背负着如此的重担，即一个名副其实的最高法院——这个国家的命运也许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在凌晨两点钟再次召集会议之后不久，他们派出了一名信使——理发师芒然（Mangin）——去国民议会通报国王出现的消息，并征询他们的建议。但是他们知道等到巴黎的回复也许需要几天时间，而他们不能无限期地推迟他们的决定。他们一开始答应过要帮助国王一家继续他们的旅程，但是骑兵队的到来以及他们的指挥官咄咄逼人地威胁着要以武力强行带走国王，都使得他们的合作精神和善意大幅度减退——特别是当他们在指挥官中间发现了戈格拉，并意识到他的诡计和谎言之后。

此外，通过他们自己的思考，以及雅各宾党人和其他在市政大厅里的爱国人士的迫切意见，议会成员开始仔细地思考国王的这次逃亡究竟意味着什么。路易告诉过他们，他不会离开这个国家，会一直待在蒙特梅迪。但是国王确实依然还掌控着形势吗？对于国王对巴黎气氛的感受，他们觉得十分诧异，这同他们自己从报纸上以及同市长的通信中获得的印象完全不同。他们都听说过路易的顾问有多么靠不住，还有对他施加影响是多么容易，无论这些意图本身是如何有价值。如果后来人们断定国王是受了误导，他们这个城镇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他们自己会如同德鲁埃所说的那样，被指控犯下叛国罪吗？而且，就算国王最后并没有穿过国境，他不在巴黎会对国民议会和新宪法的生死存亡有什么样的影响？大部分议会成员都狂热地支持宪法，正如他们支持国王那样。

内战或者外国入侵的可能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尤其是对瓦伦这样紧邻边境的城镇而言。

他们同这个问题搏斗了多长时间，在两难的忠诚问题上徘徊了多久，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在某个时刻——也许就是在骚塞给凡尔登送信求助的时候——他们明白地放弃了护送国王去蒙特梅迪的想法，转而决定拖延时间，等待足够的武力支持来保卫城市。但无论如何，在夜晚行将结束的时候，骚塞和一小部分议员觉得有责任向路易说明他们已经改变了决定。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一个食品商、一个制革工人和一个小镇法官正式告知国王他们决定违抗他的命令，因为他们不能允许他继续他的旅程。在王室在场的情况下他们艰难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他们告诉路易，“他们脆弱而急切的感受，就像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忽然发现了自己的父亲，但是却恐怕他们现在又要失去他了”。他们向他保证，“他深受人民的热爱，他王权的威仪存在于所有人民的心中，他的名字挂在所有人民的嘴边；但是他的居所在巴黎，甚至那些远在外省的人民都急切而焦虑地呼唤他回到巴黎去”。他们还表达了对于“他的离去可能导致的流血事件”的恐惧，以及他们确信“国家的救赎依赖于宪法的完成，而宪法又取决于他的返回”。地方议会的结论被迫精简到只剩重点，因为门外聚集着越来越多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持续不断地呼喊着：“国王万岁！国家万岁！去巴黎，去巴黎！”[29]

起初国王和王后似乎并没有明白，甚至都没有在听，他们只是不停地问马匹和随行人员是否已经备好，好让他们继续余下的旅程。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求助于骚塞的妻子，告诉她这个小镇能借助帮助国王获取多大的好处，希望她能对丈夫施加影响。骚塞夫人回答说，在小镇居民的记忆中，她非常热爱国王，但是她也爱自己的丈夫，因为他要对此事负责，她害怕他放走国王一家之后自己会受到惩罚。另一个说法——或许是真的，或许是杜撰的——则是国王向在场的自卫队队员之一老热罗代尔（Géraudel）求情，而后者就职业来说仅仅是一名樵夫。国王再

次发誓说他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国家，他所期待的都是国家的福祉。但是据说热罗代尔是这样回复的："陛下，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够信任你。"[30] 最近两年以来的大革命已经改变了一切。

当德隆队长于大约五点钟到达骚塞家住宅的时候，他立刻询问国王他应该做些什么。但是当时的路易显得既逆来顺受又听天由命："我没有什么可命令你的，我现在是个囚犯了。"德隆试图和王后以及另一位军官说德语——王后的母语——讨论另一种能够解救国王一家的军事方案。但是在场的市民立刻大吼起来："不要说德语！"德隆只好退回到城外，跟他的部队一起等待着最终根本没有到来的命令。[31] 无论如何，当一个小时之后，国民议会和拉法耶特（Lafayette）将军于前一天早晨派出的两名信使到达了瓦伦，局势就被彻底改变了。来自巴黎的国民自卫队军官巴永（Bayon）和将军的助理之一罗默夫（Romeuf），一直在日夜追踪着国王一家的行踪——他们还不清楚国王一行依然在按自己的计划前进，还是已经被绑架了。他们的指示是官方的，并且是对"所有国民自卫队的军官和队员或军队"下达的。如果信使们成功地追上了国王一家，"官员们必须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发生绑架行动，并阻止国王一家继续前进，另外马上通知立法机构"[32] 。面对着两个大革命时期的国家中央权威发出的互相矛盾的命令——国王的意愿和国民议会的意愿——瓦伦的人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遵从国民议会。信使们随即来到骚塞家二楼，对国王和王后宣布了命令。玛丽-安托瓦内特勃然大怒。"太无礼了！"她冷笑着把命令丢在地上。路易显得更加不动声色，但也同样十分悲伤，他只说了一句话："法国再也没有国王了。"[33]

实际上国民议会只明确要求要拦下国王和王后并通知议会。但是瓦伦的人民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必须马上把国王一家送回巴黎去。"除了宪法要求国王和议会必须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之外，每个人都很担忧瓦伦当地的军事状况。他们依然担心布耶将军会发动攻击，而国王一旦被送到别处，他们就可以指望自己的城镇或许能够幸免于难。

所以当早晨七点半的时候，当太阳高高升起，气温逐渐升高，市政官员和国王一家都因整夜没睡而近乎筋疲力尽的时候，两辆马车调转车头，穿过拱门，向城外的山脉开去。在两千名国民自卫队队员的护送下，国王、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开始了回到巴黎的艰苦跋涉。

可以说，国王突然出现在法国东南部一个小镇的那天晚上，是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富有戏剧性和最痛切的时刻。对于当地的居民而言这一经历是难以忘怀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重塑了他们的人生。德鲁埃很快就被选入了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这在很大程度上跟他那天晚上的表现有关。骚塞则被狂热的爱国者当作邪恶的化身而追踪了很多年。他的妻子在1792年躲避外国入侵者时藏入了一口井，不慎失足而死。实际上，整个瓦伦都在后来不断受到各种反大革命组织的灭城威胁。“瓦伦，不幸的瓦伦，”一个末日预言这样说道，“你们的废墟将很快被深深犁进土地。”[34]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国的爱国者们写来了潮水一般的感谢信。国民议会奖励瓦伦一笔总计约20万法郎的巨款，分发给当地的市民。将会有许多雕塑、旗帜和手绘彩盘向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致敬，“来自国家，充满感激”，并且在国王一家被国民自卫队拦下的金色手臂小旅店那里，将会竖立起一座纪念塔。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将会在整个19世纪一次次地来到骚塞楼上的小房间去朝圣，直到那里跟整个市中心一起在1914年8月德国人的进攻中成为废墟——然后又在四年之后的阿尔贡之战中被美国人再次粉碎。[35]

除了对瓦伦居民的影响之外，那天晚上的事件最终成为法国大革命史乃至法国君主制度的转折点，随即对巴黎，对国民议会，以及对整个欧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章节将会关注在以上范围更大的语境中，瓦伦之行是怎样影响了整个王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群体的生活。

注释

[1] works and days，原为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描绘普通人日常劳作的长诗，后泛指日常的工作与生活。——译注

[2]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and Beauvalet-Boutouyrie* .

[3]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4]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的话，以下这些叙述来自瓦伦1791年6月23日至27日的官方记载，Fournel，310-329页；以及德鲁埃的自述，来自 *AP* 27：508-509页；以及Aimond的著作， *Enigme* 以及 *Histoire de Varennes* 。这两部著作是由当地出色的历史学家完成的，资料来源是已经在1914年被毁掉的瓦伦档案馆的文件，以及当地人的口头以及书面证词，这些证词目前已经遗失。

[5] Fournel，311.

[6] Fournel，322；Fischbach，91.

[7] 这一段和以下一段，参见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288-313.

[8] AD Meuse，L 2144.

[9]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292-293.

[10]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292-293.

[11] Ibid.，293；Ad Meuse，L 1266.

[12]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298-299.

[13] Aimond，*Enigme* ，38-39；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08-310；Aimond，*Histoire religieuse* ，112，192；Boutier and Boutry.

[14]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04-308；Tackett，*Religion*，*Revolution*，*and Regional Culture* ，343.

[15] Aimond，Enigme，42-43；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01-302.

[16] 这一段以及下一段，参见Aimond，*Enigme* ，31，44-45；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299-300，315-316。

[17] *AP* 27：544.

[18] Aimond，*Enigme*，39-41，111；骚塞的来信，1791年6月21日，AD。

[19] Raigecourt，187-195；Aimond，*Enigme*，126.

[20] 原文为德语。——译注

[21] Choiseul-Stainville，90-92；Damas，230-232.

[22] Fournel，321.

[23] Fournel，323；*AP* 27：508.

[24] 骚塞的来信，1791年6月21日，AD Ardennes，L 78。

[25] Lesort，10-11；Pionnier，108.

[26] AN D XXIX bis 36 （I），dos. 370.

[27] Lesort，10-12；Bimbenet，187-193，235-238；Fournel，335；Pionnier，108；AD Marne，I L 329；AD Aisne，L 605；AD Haute-Marne，L 274.

[28]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326，Aimond，*Enigme*，149-152；Fournel，324.

[29] Fournel，311-312，325.

[30] 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325，Aimond，*Enigme*，143.

[31] Damas，237.

[32] *AP* 27：358.

[33] Choiseul-Stainville，101；Tourzel，201；Aimond，*Enigme*，154-156.

[34] AN D XXIX Bis 38，dos. 388.

[35] *AP* 29：532-534；Lenôtre，passim.

第二章　法国的国王

站在这场舞台中心的就是路易本人，波旁王朝的第五位君主，在瓦伦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刚满三十六岁。他是一个令人好奇、神秘莫测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他的家族中在他之前或者之后的国王完全不同。甚至那些十分了解他的同时代人，也都觉得他难以接近、难以沟通、令人捉摸不透。不知道是由于胆怯和不确定，还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的考虑，他很少说话，既沉默又神秘。

据大家所说，他曾经是一个羞怯而沉默寡言的孩子，有些缺乏自尊心，在招摇、谄媚和才智的世界里从来都没有如鱼得水过，而这些是巴黎西南处十五英里的王家宫殿凡尔赛宫中宫廷生活的精髓部分。他是上一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孙子，在四个兄弟之中排行第二，跟他的兄弟相比，他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下风。他的同时代人总是错将他的羞怯和迟缓当成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并且这种错误的印象往往又被他的外表所加强了。尽管他从来自德国的母亲那里继承了金发碧眼，但也从自己的父亲那儿遗传了一种肥胖的趋向，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同对食物和美酒的衷心热爱混合在了一起。即使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很少关心自己的外貌，以一种缓慢而蹒跚的步伐走路，那副模样跟宫廷式的优雅恰成对照。王后的侍女之一，康庞（Campan）夫人对此的形容非常典型：“他的步态很沉重，没有高贵的风度。他根本不重视衣着，而且无论他的发型师每天付出多大努力，他的头发因为他漫不经心的举止也总是乱糟糟的。”[1]


LOUIS SEIZE
ROI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NÉ À VERSAILLES LE XXIII AOUST M.DCC.LIV.

《旧制度末期的路易十六》　路易体格魁梧，体态伛偻，长着肥厚的双下巴，脸上带着昏昏欲睡的神情。他跟自己仪态优雅的凡尔赛朝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沉迷于锁匠或者石工这样的活动，也使同时代的人感到困窘。据说他的锁匠导师曾经告诉他说，这样的爱好“并不符合人们对于君主消遣习惯的通常想象”[2]。既符合公众的期待，又符合他王室前任们形象的消遣，就是他对打猎的热爱。在青少年时期，他几乎每天都在巴黎周边广阔的王家森林里漫游，每条小道和旁路他都烂熟于心。当上国王之后，只要出现了适合打猎的好天气，他就不惜取消跟外国大使的会议，即使是在作战的时候。[3] 每次出征他都会留下详细的记录，列出每一只他射中或是被他的猎狗扑倒的牡鹿、熊、兔子和燕子，在这场时间跨度长达十四年的动物大屠杀中，牺牲品的数目多达20万。[4]

尽管有朝臣和大使们的暗讽，以及他本人的担忧，但是路易其实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他的教育一直都得到了特殊的关照，特别是当他的父亲和兄长去世，他本人成为法国王太子，王位的直接继承人的时候。他有条不紊地致力于学习，有时甚至躲在书房逃避那些他缺乏风度也没有兴趣参加的宫廷活动。并且他取得的成就也并不平庸。最终他掌握了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凭借对于细节的良好记忆力，他在天文、地理和历史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他导师的帮助下，他尝试着翻译了英国历史学家吉本（Gibbon）的作品。他终生都有阅读的习惯，经常对他详细阅读过的报纸发表评论，并在1777年购买了一部著名的狄德罗《百科全书》。他也非常喜欢地图，对法国地理有很深的研究，并谋划着要做一次穿越他整个王国的旅行。[5] 实际上，他对于事实和数据非常痴迷，这可以通过以下事实展现出来，即他详尽的打猎数据，和以一种近乎一个会计或者本笃会修士的精确记录下来的长长的清单和列表，记录着漫长岁月中所有的宫廷侍从和猎狗看管的名字和职位，记录着从他12

岁起骑过的所有马匹的名字和详细信息（一共128匹），还有王家园林中所有他观测到的动物，以及他日常生活预算的每一个细节。他还记了一本详尽的私人日记，但这也同样是他所有日常活动的事实记录，其中打猎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任何个人情感或者想法的痕迹。[6]

在他的导师认为是王权所必不可少的责任和义务方面，路易接受的教导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位波旁先祖都要多，这些教导在他尚是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作为王家版的教义问答仔细抄写了下来。[7] 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他也深受宗教训导的影响，他像近代早期的那些法国君主一样重视基督教的虔诚与道德。他的导师曾让他宣誓“将我信仰的宗教戒律深深印在我心中”，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他每天参加弥撒，年复一年地履行复活节义务，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下的那样。他的君权来自于神授这一点是清晰而毋庸置疑的：“我知道我能够继承王位是上帝的恩赐。”他在自己的“教义问答”第一页这样写道。也许是来自他导师的教导，或许是基督徒的责任感和家长制作风，他获得了一种强烈的信念，即国王应该对他的人民负责。“我的人民应该知道我首要的关心和愿望就是减轻并改善他们的状况……王子的慈悲应该模仿上帝的慈悲。”这种观点他在大革命之前和大革命之中都曾反复重申过。[8] 同时，他似乎显示出了一种心理上的需要，希望得到人民的欣赏，对于他代表他们做出的努力，他也希望能获得人民的溢美之词。1775年，在他登上王位一年之后，他在兰斯接受加冕礼时得到的热情款待使他深受影响——他也将1786年从巴黎去港口城市瑟堡（Cherbourg）的行程称作他统治时期最欢乐的时刻，驾着马车列队迎接民众的欢呼。在他的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刻，如果没有听到民众按惯例高呼“国王万岁”或者高呼时有气无力，他就会深觉悲痛。[9]

如果他曾经从他的导师那里或者自己的阅读中习得了启蒙运动对于“公共设施”或者“公意”的强调，很显然他也是从家长式统治的术语角

度出发来理解这些概念的。国王在做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公意”，但是只有君主本人的意见才是最终裁决，才称得上是“法律的本质”[10]。他除了坚信君主要对人民的福祉负责之外，还对一种等级分明的阶级社会抱有强烈的感受，而这种等级社会是早已为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所摒弃的。他还很明显地具有双重观点，两种互相矛盾的目标——一方面是大众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保持王家的特权和威仪。这困惑了整整一代人，当人们提到18世纪后期的君主时，往往将他们称作“开明君主”。这种分裂的目标所固有的困难之中也掺杂了路易本人的性格问题，他的缺乏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严重了。他病态地在自己的判断和顾问们的不同意见之间游移不定——一方面赞成改革，另一方面想要保持威严和传统——经常会觉得做出决定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过程。根据他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后来陪同他一起去瓦伦的图尔泽夫人的说法，他“极其缺乏自信，总是很容易被说服，别人对事情的理解要超过他本人”。“他的心，”康庞夫人在他死后这样写道，“能使他看到真相，但是他的原则、偏见、恐惧，以及特权者和虔诚者的喧嚷，往往使他胆怯，迫使他放弃在对人民的热爱驱使下原初打算采纳的想法。”[11]

1770年，国家政策和国际联盟体系为他选择了一位妻子，即未来的王后，这使得他的身份认同感变得更加复杂了。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奥地利女大公玛利亚-特蕾西亚的女儿，在十六个孩子中排行倒数第二，比路易还要小一岁。她一头金发，有哈布斯堡（Hapsburg）家族特有的鹰钩鼻和厚厚的下唇，即使算不上美丽动人，也是优雅而富有魅力的。她仅仅受过一点初步的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只稍带一点德国口音，但是她几乎不会正确地拼写，对历史、地理或文学都近乎一无所知。去维也纳将这个十四岁小姑娘培训成为未来法国王后的导师，形容她非常聪明，但是也极端任性，对学习或者是严肃的谈话一类事情只能保持非常短暂的注意力。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不般配的一对：肥胖、内向、缺乏安全感的路易，以及优雅、活泼、自信的年轻公主。[12] 这对

夫妻潜在的不合还包括在婚姻的头七年中一直困扰他们的性生活失调，路易的生殖器畸形使得他们的夫妻生活既痛苦又艰难。一段时期过后他们仍然没有孩子，于是开始流传出这样的说法，玛丽觉得她的丈夫既烦人又令人生厌。随即有流言蜚语开始传播——玛丽四处卖弄风情，而路易缺乏男性能力。这种羞辱只可能会再次抹杀一个男人的尊严，尤其是路易的王室前辈们正是以性能力卓越而著称的。[13]

这场灾难性的婚姻在1777年获得了一点转机，当时距离路易登基已经过去了三年，玛丽的大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来到凡尔赛，试图改善他们的关系。国王被说服接受了一次小手术来改善他在夫妻生活中的表现。同时，年轻的王后也受到了兄长的严厉斥责，命令她为了她家族的国际战略，应负担起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责任。[14] 约瑟夫的婚姻辅导成就斐然：接下来的八年玛丽怀孕了五次，最终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活了下来。当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路易完全被欢乐和对妻子的感激之情所征服，他对朝臣骄傲地宣布说要努力孕育更多的子孙。[15]

特别是路易有了子嗣之后，总是非常关心此事的法国民众对路易的爱戴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对前一任君主路易十五的统治深感失望——他没完没了的风流韵事，以及国际事务的广泛失败——很多人显然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国王身上，盛赞他的诚恳、履行责任时的努力、对妻子的忠实以及对宗教的虔诚。他的温和、谦逊、远离宫廷，以及对外表的漫不经心——都使得民众对他更加喜爱。1778年出版的《秘密回忆》一书中有过这样的说法："没有人能比路易十六更自然，更亲切可爱。"也有很多故事流传着他对待宫廷仆人是多么仁爱而又亲密，当他打猎归来的时候，"既没有剃须也没有扑粉，身上的衣服也乱糟糟的"[16]。这种强烈的正面形象在大革命的早年得到了延续甚至是增强。

另一方面，王后却从来没有改变，乃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她即位没多久就获得的明显的负面印象。怀孕和监督孩子们学习，多少使她的行为有所收敛，减轻了她初到法国宫廷的那几年中永恒的寻欢作乐之气。

尽管如此，她也从未觉得在法国的生活十分称心如意，并且总是不喜欢跟凡尔赛宫廷联系在一起的没完没了的公共仪式。她组织了一个私下的小社交圈子，围绕在她身边的是一小群富有魅力的年轻男女，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图瓦（Artois）伯爵（国王最小的弟弟）、朗巴勒（Lamballe）公主和美丽的波利尼亚克（Polignac）公爵夫人。王后被人们鄙夷地称作“奥地利女人”，成为无穷无尽的流言和嘲讽的对象。甚至还有一些胡编乱造的乱伦和女同性恋色情作品是以她为主角的。在俗艳的“项链事件”中，据说王后参与了一场数目庞大的王室诈骗案，这进一步抹黑了她的公共形象。[17] 因为国王对宫廷生活毫无兴趣，王后又十分排外，很多古老的贵族家族感觉被边缘化或受到了排挤。这些家族中的部分年轻成员很快就将在大革命中拥抱那些改革措施。[18]

虽然跟玛丽的性生活有关的大部分传闻都是彻底的谎言，但是确实有一位她的男性密友跟她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她第一次遇到瑞典伯爵，军官阿克塞尔·冯·费森（Axel von Fersen）时，他们彼此还都是青少年。她当时还是王太子妃，而他正在欧洲进行游学旅行。后来他离开了几年，在罗尚波（Rochambeau）将军麾下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但是只要军情允许，他就会定时回到凡尔赛宫中。王后从没有被法国人迷住过，却迅速地被这位英俊的外国人所吸引，他有着沉静保守的风度，与宫中的其他年轻人迥然不同。在王后的帮助下，费森拥有了自己的法国军团，并在巴黎有了一处居所。在1786年生下最后一个孩子之后，国王和王后开始再次分居，或许就是在那段时间她和瑞典伯爵的关系变得特别亲近起来。我们也许永远无法确知他们是否真的是情侣。费森在宫中的言行总是极其谨慎，但是他们在凡尔赛附近森林中的小特里阿农宫（Petit Trianon）中有过无数次的单独会面。对国王夫妇非常了解的大臣圣普利斯特（Saint-Priest）伯爵对此事确定无疑，将费森称为王后“有名无实的爱人”——就像蓬巴杜夫人曾被称作路易十五的“有名无实的情妇”一样。不管他们身体接触的程度究竟如何，这两人之间确实有着深

刻而密切的情谊——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费森写给他妹妹的私人信件中——这份情谊在1791年国王一家出逃时将会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19]

国王与大革命

从18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国王、王后乃至整个法国都被卷入了一段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法国参与美国独立战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花费巨大，再加上效率低下和不够充分的税收体系，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日渐增强的经济危机当中，只得尽力支付所有的账单。在旧制度和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中，国王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可以永无止境地争论下去。但是路易对这一系列事件最具渗透性的影响，与其说来自于他做了什么，不如说是由于他没有做什么：因为他极度缺乏领导力、他的犹豫不决和前后不一。



《**1785**年的阿克塞尔·冯·费森伯爵》

在他统治的早期时期，即他的祖父在1774年去世之后不久，年轻的国王看上去是以相当的努力和责任感来专注履行他的职责的。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报告，与议员们交谈。他同外交部长的通信尽管有时显得尴尬笨拙，但依然显示出了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把握能力。他密切地关注着发生在美国殖民地上的革命事件，而且多少对法国介入此事的策略做出了贡献，为了“支持那些向我求助的被压迫的人们”，但最重要的是指挥打击英格兰，“我家园的对手和天然的敌人”，因为它过去“践踏了法国的荣耀”。[20] 但是他非常依赖两位年长议员的建议和决定，这两位就是在他刚当上国王时对他进行指导和教育的莫勒帕（Maurepas）伯爵和韦尔热纳（Vergennes）伯爵。但是随着这两位导师在1781年和1787年相继去世，8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变得更加棘手，其余的大臣之中阴谋和内斗也愈加激烈，国王开始在不同的顾问之间辗转求助，并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手头任务的力不从心。年复一年，他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捕猎，记录在他的日志中的“猎物”数目急剧上升。[21] 在原则上他依然希望为“他的子民”争取最好的，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愿望，他却一直不确定且摇摆不定。18世纪80年代末期，那些在他身边的人发现他变得整日昏昏欲睡。他从前一直沉默寡言，现在似乎变得更加不善表达，寂静无声，甚至在重要的辩论中昏然入睡——还打起了呼噜。[22] 在统治的后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激进的大臣和临时代理的大臣之间摇摆不定，在为一场激烈而彻底的革命而努力和采取反对革命的紧缩措施之间摇摆不定。最后，在1788年年中，先是大主教洛密尼·德·布里埃纳（Loménie de Brienne）然后是瑞士银行家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占据了支配地位，路易被说服采取意义重大的行动，为磋商目前不断恶化的形势召开三级会议。但是政策上的不断起伏波动不但在整个国家造成了一种深深的不确定和动荡感，还——通过前后不一致的改革措施——使得人民学会并习惯了存在产生巨大变革的可能性。

18世纪80年代后期也见证了王后政治影响力的大幅度增加。在他执

政的第一年，路易有计划地把玛丽隔绝在所有的政策决定和会议之外——遵从国王反奥地利的导师的意见，至少王后相信是这样。但是她通过自己的能力，早就施展过一种间接的影响力来成就或者毁灭个别大臣。她在宫廷阴谋中的参与，毫无异议地对于倡导改革的大臣杜尔哥（Turgot）1775年下台和内克1781年第一次下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那时，她那身为皇帝的兄长曾经对她的“胡乱干预”表示过不满，特别是当这对奥地利的立场没有丝毫帮助的时候。但是约瑟夫二世和他能干的大使梅西-阿让特伊伯爵（Mercy-Argenteuil）成功地让王后逐渐理解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策略，也使得她逐渐理解了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并将她培训成为在法国政权心脏地带活动的名副其实的奥地利间谍。[23] 在大革命即将发生之前，因为路易失去了他最信任的导师，也被各种均告失败的改革措施弄得既困惑又迷茫，他开始依赖玛丽在各方面给他提供意见。从1788年开始，他邀请她参与一些会议。甚至当她不在场的时候，有时他也会在讨论中离开房间去征询她的意见——这使得大臣们既惊愕又困惑。并且，与路易不同，王后从来不被犹豫不决或不能确定所困扰。她毫不犹豫地断定这些所谓“爱国者”和自由大臣提出的改革，是对她所信奉的一切事物的诅咒。她坚定果断地反对一切改革，而这最终也开始对国王产生影响。[24]

在大革命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尽管出现了一系列极其重大的事件，如成立国民议会，巴黎攻陷巴士底狱的人民起义，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特权的镇压，以及取消“封建制度”，国王却依然在法国各个阶层的人民中间受到广泛的欢迎。他在7月23日发表演说，坚持保守的贵族立场，并拒绝承认国民议会的存在，这使得爱国的代理人们深感失望。但是在接下来一连串匆忙的事件发生之后，局面开始朝着对大革命有利的方向发展，人们也就很快原谅了国王。大部分爱国者都仍然确信他的本意是好的，他争取的是整个民族的最大利益，这只是一个听信了谗言的好国王的经典案例罢了。后来的发展似乎提供了证据表明路易一度抛开了他那

个阶层的一切“偏见”，真心实意地支持大革命。在攻陷巴士底狱一周年那天举行的联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上，对于君主的正面印象再次得到了加强。就是在这里，在几十万名欢呼的民众面前，朱斯坦·乔治、埃蒂安·拉代和其他来自瓦伦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见证了路易在“祖国祭坛”之前举起手，宣誓表示支持新宪法。每个人都知道，对路易这样十分的虔诚的人来说，这样的宣誓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于是胜利的愉悦很快就传播开来，大革命已经成功，并且君主确定无疑地站在人民这一边，恰如其分地配得上“法国国王”这一称号。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这一流传很广的场景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一种美好想象的产物。早在1789年6月初，路易就被爱国代理人们对他的长子悲惨地去世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激怒了。1789年9月国民议会没有能够授予他绝对否决权，他对此也十分不满。但是对于路易和王后来说，那一年的关键无疑是可怕的“十月事件”（October Days）。在10月5日和6日，几百名巴黎妇女，后来还有几千名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队队员在凡尔赛游行，强迫国王将他的居所搬回巴黎。王家随从们都不能忘记王后一大清早在宫殿走廊里奔走逃命的景象，她身上只穿着晨衣，侍女和孩子们紧紧跟在她身后。[25] 我们已经无法确知那些追逐她的人是想要伤害她，还是只想跟她谈谈，讨一些面包吃。但是玛丽本人确信她刚刚极其惊险地逃脱了一场谋杀。王室一家当天下午坐着缓慢的马车驶回巴黎，一大群粗野而吵闹的男女就跟在他们身后——王家卫兵耸立的长矛尖举在人群上头——只会让这样的体验更加可怕可厌。

一家人沉默而愠怒地搬进了指定给他们的居所——在巴黎中心地区的卢浮宫建筑群中最西端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他们拒绝出门，甚至拒绝到毗连的花园里散散步。[26] 在这一事件过后几个星期，国王给他的表亲西班牙国王写了一封意义极其重大的信件——这封信直到20世纪才为历史学家所发现。在这封信中事实上他

坦白而自觉地断绝了同大革命的一切关系，抗议攻陷巴士底狱之后发生的“那些通过胁迫和恐吓强迫我做出的所有有违国王尊严的举动”。不管他曾经受到了怎样的诱惑，想要同一场改革运动合作，现在他又完全回到了传统形象上独裁主义的君主身份上来了：“看在我自己的份上，看在我孩子们的份上，看在我全家人的份上，我一定要确保在我的王室家族中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而得到确认的王权，无论如何都不会消亡。”并且他庄严地宣称，他6月23日发布的保守宣言只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27] 他和王后二人开始相信只是一小撮巴黎的激进分子，即雅各宾党人攫取了对国家的控制，而数量庞大的外省民众依然全力支持国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事件来向他表现出自己的爱与忠诚罢了。但是在眼下，这只是国王的一种策略，一种“最坏的办法”：耐心地等待，等待邪恶走完自己的过程，那些革命者采取的不可能的民主和社会平等计划最终会摧毁他们自身。“他使自己相信，”圣普利斯特这样写道，“国民议会将会自己犯下错误，最终名誉扫地。国王自身的软弱使得他不能自拔地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对于他的性格来说，要让他免于直面日复一日的反对派的需求，实在是太困难了。”[28]



《**1790**年**7**月**14**日，路易在战神广场宣誓效忠宪法》　国王站在台阶上（图中右上），面朝拉法耶特，他身边围绕着国民议会主席、市长巴伊和抱着王太子的王后。

我们现在知道了，国王的誓言和他在国民议会面前的各种表现——当他看上去似乎是在支持他们的行动时——大部分是由爱国的领导者们精心编排的，尤其是拉法耶特侯爵，他既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年轻英雄，也是1790年最具影响力的革命领袖。诚然，坚定不移从来都不是路易的特长，并且他对情况做出评估的时候更是经常摇摆不定。1790年春天，国王一家终于敢于冒险走出杜伊勒里宫，到花园里四下活动，甚至坐马车进城。6月的时候他们被允许驾车去王后位于巴黎西部城外的圣克鲁（Saint-Cloud）城堡，在乡下度过的时光似乎振奋了他们的精神。国王也被他自己在联盟节上受到的狂热欢迎，以及随后整整一周的庆祝活动所深深打动。他每天骑马出去巡视他的部队和国民自卫队，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和真诚高呼着“国王万岁”，这点燃了他心中对于人民的热爱和欣赏的期待。[29]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和王后二人似乎是被伟大的演说家兼大革命领袖米拉波（Mirabeau）伯爵下了咒语，后者那时将自己秘密出卖给了君主，他坚持说只要稍作妥协就可以让国王重新掌握权力，成为一位更加强有力的立宪君主。[30]

但是米拉波在1791年突然去世了，而且在那之前很久，王后（如果不是国王）就已经对他彻底丧失信任了。[31] 随着几个月的时间过去，尤其是随着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路易转而越来越依赖于他的妻子，寻求建议和指导。关于玛丽是否真的考虑过与大革命这个恶魔暂时妥协，这个尚不能确定。在这个时期她几乎从始至终都在给维也纳的兄弟和在奥地利的知心密友梅西-阿让特伊（Mercy-Argenteuil）写信抱怨，说她感觉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都成了“造反的暴民”——或者有时她会改用中世纪的说法“诸臣”——的俘虏。这些人厚颜无耻地要求与贵族乃至王室平起平坐，这简直使她气得发狂。“这些怪物们，”她在1790年6月给梅西的信中这样写道，“如今已经越来越粗野无礼了。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在描述中，她一直用怪物 和恐怖 这些字眼来形容革命者。当1791年1月西班牙大使跟她交谈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站在一个已经到了

忍耐极限的女人面前”。她对他说话时，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如果路易不驱逐那些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恶魔，那就是对他自己，对他的国民乃至对整个欧洲的失职，无论这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32] 在王后的影响下，路易开始以他自己独有的笨拙而自欺的方式，日益投入一场双面游戏中，这不仅对国王本人来说异常危险，对于大革命和法国也都将是灾难性的。

决定逃跑

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确知，路易是在何时和怎样的情况下做出逃离巴黎的重大决定的。在他离开王宫的那天晚上，他在书桌上留下了一份亲笔写的声明，其中倾诉了他的满腹委屈，并试图给他逃离巴黎、不再与大革命领导人合作的行为寻找合理性。他苦涩地抱怨了被国民议会剥夺的所有王权：对军队、外交和外省事务的直接控制权，签发赦免令，还有事实上完全否决任何他不同意的法律的权力。对于国民议会大幅度削减他的个人财政预算，他也感到十分愤怒。这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生活方式，也让他觉得减少了君王的威仪。在联盟节的庆祝活动上，他被迫同国民议会的主席而不是他的家人坐在一起，这也使他因感觉受到轻慢而满怀愤懑。接下来就是国民议会对法国天主教会的彻底重组，然后要求神职人员宣誓忠于宪法，他也觉得这些举措都是强迫他接受的。尤其是后面的这几条，撕碎了传统而虔诚的王权意识——特别是当这些法令1791年春天遭到罗马教皇的正式谴责的时候。[33]



《**1791**年**2**月**28**日发生在杜伊勒里宫的争执》　在这幅倾向于爱国者的绘画中，路易十六正在跟拉法耶特交谈（图中右后方），表现出支持国民自卫队强迫赶来支持国王的反大革命贵族解除武装。事实上，路易对于王权保卫者们的遭遇十分不满。

对于一个波旁家族的国王，一个同天主教有着紧密联系的绝对王权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一个有上千年传统的规则的继承人来说，这些理由并不充分。是否就是这些理由促发了国王的逃亡行动，我们尚不能确定。事实上，许多路易反对的法律是在逃亡计划成型一年多以前就已经颁布的。至少从1789年7月开始，许多朝臣、部长最后是王后本人，都在力劝路易远离首都危险的暴民，在忠诚的军队保护之下，撤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但是路易一直拒绝这样的计划。在十月事件期间，路易拒绝了圣普利斯特精心计划的、撤退到凡尔赛南部二十英里外的朗布依

埃（Rambouillet）的建议。同样，在1790年春天，当他全家都在居住在圣克鲁的时候，他也拒绝了逃亡到贡比涅（Compiègne）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提议。[34]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还是那个老问题，即他总是很难下定决心。同时他也很担心一旦逃亡，会给其他家庭成员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最小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不久后就流亡国外，还有他两位年长的姑妈，路易十五的两个女儿，也在1791年年初设法离开法国到罗马去“朝圣”。但是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和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都还留在巴黎。但是无论如何，发生在1791年的两起戏剧化而暴力的事件——两者都深深影响了国王和他住在杜伊勒里宫的家人——似乎在路易下定决心尝试逃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发生在2月28日的那起复杂而令人困惑的事件始于知名的攻陷文森（Vincennes）王家监狱的行动，该监狱位于首都的西边，传说当时这里已经变成了秘密囚禁爱国者的新巴士底狱。当拉法耶特将军带着人数众多的国民自卫队分遣队去制止骚乱的时候，新的流言传播开来，说国王现在无人保护，他的生命随时可能遭到威胁。随着暴力袭击的威胁愈演愈烈，大约三百名狂热的居住在巴黎的贵族青年——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是当时已被解散的王家卫队的成员，或者是保守的国王俱乐部的成员——冲向杜伊勒里宫，试图保护他们的国王。

进入杜伊勒里宫之后，他们开始故意激怒并侮辱守在那里的爱国者自卫队。为了避免发生血腥的对抗事件，国王介入其中，要求他的“捍卫者”放下手中的武器，静静地离开此地。但是当他们服从之后，许多人却遭到了愤怒的自卫队队员的殴打和逮捕。国王的双方协定被推翻了，同时他的尊严也遭到了公开侮辱，这使他感到极为愤怒。“我忠心的仆人们，”后来在逃亡的那天晚上，他这样写道，“就这样被粗暴地拖出了王宫。”并且他自己，也被迫“尝尽了辛酸苦难”。[35]

更加威胁到国王和他的家人的事件发生在1791年4月18日。那是从

国王一家计划回到圣克鲁城堡庆祝复活节时开始的。大批群众聚集在杜伊勒里宫的东门之外阻止国王离开，并且这些人很快得到了国民自卫队的支持，而这些自卫队队员本应该帮助开路的。这些人正确地推测出国王是要逃避同倾向大革命的、“遵从宪法的”神职人员一起参加复活节仪式，所以他们拒绝离去，自卫队队员也拒绝听从命令，尽管拉法耶特本人也在苦苦哀求他们。在此过程中，国王的几名仆人和朝臣被抓了起来，并受到了绞刑的威胁，而国王本人也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直接针对他的嘲讽，人们甚至还威胁要罢免他的王位。路易又一次感到不能自已的挫败和愤怒。“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据说他这样评论道，“在给了整个国家自由之后，我自己本人却被剥夺了自由。”最终，国王一家被迫从马车里出来，重新回到杜伊勒里宫，“被迫返回他们的监狱”。几位关系密切的观察者感觉4月18日的这次事件是使得国王相信他们一家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并有必要立刻逃亡的关键因素。在跟瓦伦的杂货店店主骚塞以及后来跟国民议会解释他的行程的时候，国王都直接地提到了这起事件。[36]

但是分别发生在深冬和早春的这两起事件还造成了另外一个影响。自从2月28日之后，国民自卫队接到命令，禁止贵族们进入杜伊勒里宫，无论他们传统的头衔听上去有多么吓人，除非他们有特殊的个人或行政问题要同国王磋商。4月18日事件见证了更加严格的限制，驱散了大部分与国王关系密切的贵族亲信，还有这个家庭的随行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这些人都拒绝宣誓效忠。虽然路易和玛丽过去一直没有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严格地执行宫廷礼仪，但大革命的磨练却使他们前所未有地密切依赖贵族出身的追随者们的支持和陪伴。现在，突然之间，宫殿里就显得空空荡荡了。在曾经的“伟大”帝国，男男女女簇拥着两位统治者，沐浴在他们带来的光芒之中，现在这里只有大革命自卫队和一伙出身低微的仆人，来回奔忙着干活。对于国王夫妇来说，1791年春天解散宫廷看起来确实是既没有必要又极其残忍的一项打击，他们认为这是专

门用来羞辱并隔离他们的，“拒绝陛下拥有被忠心于他的人簇拥着这样简单的安慰”。“将国王一家扣押做俘虏并不能满足他们，”贵族代理人艾兰·德·巴佐热（Irland de Bazôges）这样写道，“他们现在想要把那些继续忠实于他、能给他带来些许安慰的人都驱散。”实际上，在逃离的时刻留下的那份声明中，路易特别抱怨说他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宫廷显要”[37]。

无论是这些暴力行为促使国王做出了这一最终决定，还是仅仅强化了他之前的决心，在1791年4月中旬的时候事情似乎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现在对于国王来说这一点更加确定无疑，”阿克塞尔·冯·费森4月18日这样写道，“现在必须行动，而且必须尽可能快地行动。”[38]

计划逃亡

国王夫妇1791年6月采取的计划是在此之前9个月由主教帕米耶（Pamiers）和布雷特伊（Breteuil）男爵构思出来的，后者从前是国王的保守派大臣，当时正流亡在瑞士。这个提议与最初计划的逃亡目的并不相同，并不是只把国王撤离到一个远离巴黎的安全地带——例如朗布依埃或者鲁昂——而是要确保他能一直逃亡到边境，这样他就可以得到或者至少是威胁说得到了外国部队的支持。这一行为的基本假设是一旦国王离开了首都，远离巴黎的雅各宾党人和国民议会中的激进分子，就会找到数目庞大的追随者。身边有忠诚的卫士，还有外国势力的支持——这个想法接下来认为——届时来自整个国家的其他法国人都会前来支持他。在这样新的力量形势之下，国王就将有能力同整个宪法制度重新协商，并将大革命引向结束。[39]

在1790年10月末国王已经同意考虑这样一个计划，至少是将其作为一个有可能性的方案，而谋士们开始着手构思详细的安排。从一开始，布耶侯爵——总部位于梅茨（Metz）的法国东北部队的将军——就全权负责准备在前线接待国王。从巴黎逃跑以及经由陆路的长途跋涉将由王后，或者不如说是由冯·费森一手操办。玛丽和她的瑞典伴侣之间的关系在那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并且这两个人组织的密谋跟整个大革命时期孵化出的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世故而复杂，充满欺骗性。

夜复一夜，在整个冬天和1791年的春天——甚至在国王真正接受这个计划之前——费森和玛丽就在宫中秘密地见面，共同构思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确定无疑是整个事件中最令人心惊胆战的部分：逃离杜伊勒里宫，逃离伟大的、丰富的、可疑的首都巴黎。虽然关键的事务依然需

要征询路易的意见，并且毫无疑问他还是一位拥有否决权的国王，但是在这件事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上，他已经逐渐地把自己的权威让渡给了王后。在此过程中，以及在当时那种极端的环境下，费森事实上已经成为王室家族某种程度上的实际代理人。每周都有几个晚上，费森乔装成平民来到王宫，穿着双排扣长礼服，戴着最受欢迎的阶层中的某些人常戴的圆边帽。他对于自己跟王室家族关系的描述或许完全没有言过其实。“如果没有我，”他在跟自己在瑞典的密友陶贝（Taube）男爵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们就不可能逃走。他们只信任我。除了我，他们不可能依靠其他任何人的判断力来完成这样一个计划。”[40]

从一开始费森就清楚，这个计划如果想要成功，只能依靠外国的支持。国王的个人预算非常有限，但是他需要大量的金钱来支付雇佣兵的军费，以及维持他一家必要的生活开支，直到情况有可能会变得“正常”。这个计划还要求有相当数量的奥地利军队在边境集合，“要有足够的数量，能够作为一个集结点，让那些对当前事件不满的、心怀善意的各方过来参与到我们中间”[41]。但是主要由王后推动的跟外国政权的长期谈判，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沮丧的。许多周边国家的君主，虽然对国王一家的窘境抱有同情，但是对于做出承诺却表示犹豫，除非其他大国也同意参与其中。王后对于自己的亲哥哥利奥波德本人的谨慎态度尤其感到失望，后者在1790年约瑟夫去世之后成为奥地利皇帝。最后直到1791年6月底，利奥波德才直接表示，同意提供钱和军队方面的全力支持。但即使这时皇帝也特别指出只有当国王逃脱之后，并处于一个可以独立做出行动的地位之时，他才会提供援助。想要获得这样一种地位的愿望，大大推动了国王的逃亡行动，但也使事先的行动规划变得更加困难。[42]

对于逃亡行动的过程，布耶和费森最初都大力建议国王一家分成几个小组，乘坐小型的不引人注意的交通工具，以便快速地冲向边境。而这一建议正是国王的弟弟“大亲王”所采取的策略，在国王夫妇逃亡的当

天晚上，他化装成一位英国商人，毫无阻碍地逃到了布鲁塞尔。[43] 但是国王和王后坚决不同意分开行动，也不同意不跟他们的孩子或者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一起走。王后还坚持要带着孩子们的两位保姆，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他们很快又加上了一位家庭密友达谷（d'Agoult）侯爵，作为出现问题时的“向导”和发言人，还有其他三位伪装成马车夫的贵族作为保镖。最后，参与行动的总共有十一个人，这样就不可能只乘坐一辆马车了。[44]

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费森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个复杂的旅行方案，而为了保证这些人能顺利地被秘密运送到边境，他必须成功找出这样一个方案。为了构建一种伪装，瑞典人得到了一位俄罗斯男爵夫人科尔夫夫人的帮助，她当时正打算在6月带着女儿离开法国。男爵夫人将声称，她“不小心毁掉”了她的护照，并要求官方再颁发一份副本给她，而这份文件将会给国王一家使用。同样由科尔夫夫人出面订做了一辆四轮双座篷盖马车——这辆马车拥有大大的车轮以及粗大的悬挂式弹簧，将要带着国王一家奔向安全之地。这辆马车的制造由男爵夫人的一位“朋友”监督——这位朋友不是别人，就是费森本人——特殊设计的车辆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才完工，一共花费了接近6000法郎，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这辆马车极其巨大，涂成了黑色，带有明黄色的边框，着实是奢侈的典范，非常适合国王使用，虽然只是一位拙劣地计划着逃亡的国王。这辆马车还拥有皮革和塔夫绸内饰、装有衬垫的座椅，内嵌许多装行李的小隔间、野餐用具、酒瓶架、紧急修理工具箱，还有一个皮革包裹的便壶。同时还准备了一辆小一些的双轮轻便马车，以供两位保姆使用。[45]

为了把这所有十一个人从杜伊勒里宫转移到城外的驿道上去，费森构思了一个复杂精巧的方案，以一种准备军事战役的方式和谨慎态度，来安排所有人、马车和马的行动。方案提出要使用杜伊勒里宫内一些鲜为人知的走廊和空房间，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位于底层的一个房间，房

间内有一扇直接通往外面庭院的小门。这间屋子在4月18日之前，已经由国王的手下清空，准备用作国王一家外逃的秘密集合场所。还另外有一扇小门，连接着这个房间和通往王室套房的楼梯，这扇门是给王后的首席侍女准备的。国王一家使用的房间中有几间也经过了重新布置，以确保王室成员能够更方便地走到后面的通道，也使得国王一家的房间远离守卫在外面的仆人和卫兵。[46]

与此同时，王后和几位可信的侍女也在为乔装打扮成“科尔夫夫人一家”准备道具，包括给五岁的王太子做的小裙子，以及给国王准备的财务代理人穿的服装。除了这身衣服之外，国王似乎只带了一套耀眼的红金双色套装，那还是他在1786年去瑟堡的路上穿着的，他原本打算在边境挂帅指挥他的王家军队时穿这身衣服。但是，无论如何，贵为法国的王后，是很难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的，玛丽费了很大的力气，事先偷运出去自己的全部行头，包括大部分的钻石和珠宝，几件家具，以及一只特别设计制造并且塞得满满的化妆箱。为了掩盖这一系列的行动，他们还小心安排了许多的活动和借口。但是不走运的是，收集和运送王后细软的“必需品”还是被发现了，并引起了王后一位侍女的怀疑，而且这位侍女不仅是爱国者，还是国民自卫队长官的情妇。最终，国王一家不得不做出了那个致命的决定，即把逃亡的日期推迟一天，避开那名侍女值班的日子。[47]

事实上，如果他们曾经希望能够不受注意地溜走，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猝不及防地、不受猜疑地抓住那些革命者。整个1791年上半年，特别是在4月18日之后，国王夫妇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个欺骗政策。在抓紧一切时机向外国的各位国王秘密谴责大革命的同时，他们想方设法诱使革命者们相信，他们是全力支持国民议会的。4月19日，路易十六本人亲临国民议会，这是一年多以来的第一次，并且重申他已经接受了宪法；四天之后，他给自己所有的大使送去了一条内容类似的、十分高调的消息。在那之后不久，国王和王后同接受宪法的神职人员一起参加了

复活节弥撒，尽管国王本人对“主张分裂的”教会持有强烈的反感。费森已经跟布雷特伊男爵解释过，国王已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他的计划，并使得乱党（指革命者）对他的真实意图一无所知。自此之后，他表面上将会认可并彻底地拥抱大革命以及革命领袖们。他将会表现得完全依赖他们的决策，并预先考虑到那些乌合之众的愿望以使得他们保持安静，最终为成功逃离巴黎创造出必要的信任感”[48]。

与此同时，布耶将军也对当地的爱国者执行了类似的欺瞒政策。他的司令部在位于巴黎东部约180英里处的梅茨。时年52岁的布耶男爵弗朗索瓦-克劳德-阿木尔（François-Claude-Amour）因为深入参与了七年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当时已经在法国相当地臭名昭著。他也是平息最近发生的南锡兵变的英雄——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衡量，也可以说是反派头目。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一些大革命政治领袖在接近他，把他当作潜在的盟友加以拉拢。但是因为帕米耶主教首先带了国王的一封信给他，要求他的协助，因此，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完全地决定效忠于王室。在费森访问梅茨之后，他也派了自己的长子和副官到巴黎，并为国王的边境之旅制订了非常详尽的计划。[49]

置，以便国王撤退。布耶一开始考虑过贝桑松（Besançon）和瓦朗谢纳



《弗朗索瓦-克劳德-阿木尔·德·布耶男爵》

首先有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修建防御工事的位置，以便国王撤退。布耶一开始考虑过贝桑松（Besançon）和瓦朗谢纳

（Valenciennes）两个地方，但是他最终还是推荐了位于卢森堡西南部的城堡小镇蒙特梅迪。选择这里不仅是因为这个城堡处于布耶的直接管辖之下，还因为这里在面对巴黎的西南方向，以及北方边境的方向都有牢固的防御工事。但是，因为害怕遭到围攻，国王本人并不会待在城堡里，而是选择了蒙特梅迪北部的托内尔城堡，这里离奥地利边境只有不到两英里。保护国王的部队总计有差不多一万人，分别分布在防御工事内部和周围。[50]

至于国王一家的逃跑路线，布耶最初的提议是走最近的路，穿过兰斯、武济耶（Vouziers）和斯特奈（Stenay）——这条路线在实际逃跑路线的北边。这条路不仅是最近的，并且经过的地区绝大部分都是贫穷而居民稀少的乡村，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激进分子的主要据点。但是路易在去兰斯参加自己加冕礼的一路上曾经走过这里，他十分担心自己会被沿途的当地革命者认出来。最终，他们选择了更靠南边的一条道路：穿过蒙米拉伊（Montmirail）、马恩河畔沙隆（Châlons-sur-Marne，1998年后改称香槟沙隆）、圣梅内乌尔德（Sainte-Menehould）以及克莱蒙（Clermont），并且小心地避开了以“极端分子”而著称的凡尔登。[51]这条道路一经选定，布耶就指派弗朗索瓦·德·戈格拉去勘察道路，后者坐着一辆普通的邮政马车，手里握着表出发了。戈格拉当时四十五岁，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队工程师兼地图绘制师，他还是一位地位显贵的君主主义者，曾经做过王后的私人秘书。因为国王一行的行进速度必须尽可能快，一路上需要频繁更换马匹，戈格拉这一路上还记录了沿线的驿马站。但是，经过克莱蒙之后，因为要绕开凡尔登，他们必须转而向北，离开王家驿道。因此，为了完成这最后一段路程，必须要从军中抽调备用的马匹，安排在瓦伦城外一处隐密的位置。但是他们的这位同谋对瓦伦的政治氛围所知不多，戈格拉悄悄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是十分笨拙地——询问了当地的几位市民，其中就包括副市长骚塞。戈格拉得出的结论是这座城市非常地“安全”。布耶本人将会带着马

匹和数量庞大的护卫队等待在丹镇（Dun）附近的最后一个驿马站，这里距瓦伦大约十五英里，到蒙特梅迪的路程差不多也是十五英里。[52]

给国王准备护卫队这件事儿给筹划此事的人员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他们都想要在路易一离开巴黎之后就派军队保护他，但是向首都附近派兵这样的举动实在太危险了。并且，如果过早地提前布置护卫队，也许反而会使群众注意到国王一家的马车。最终，经过国王和王后的同意之后，他们决定在国王一家到来之前几小时派出规模不大的一队骑兵。如果有必要，这些骑兵可以跟当地人解释他们是被派来护送军饷的。但是一般来说，所有这些分遣队都得到通知，要远远地跟随并照看着国王的马车，只有当国王被人认出来，可能遭遇了麻烦的时候，他们才能出手干预。[53] 到了什么程度军队才能出面，可能是这整个计划中最为微妙的问题了。对此，布耶只能交给他年轻的陆军军官们自行决定，而这些年轻军官大部分都在最后一刻才得到国王到达的通知。

经过争论，他们最终决定把最早的一个护卫队安排在松韦斯尔（Somme-Vesle），这是位于沙隆东部的一个小镇。这个护卫队的指挥官的职责之一，是给沿线的其他分队送信，只要国王一行经过就通知下一站。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国王经过之后封闭道路，阻止来自巴黎的信使传播警报。[54] 这么一个性命攸关的位置，布耶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克劳德-安托万-加布里埃尔·德·舒瓦瑟尔-斯坦维尔（Claude-Antoine-Gabriel de Choiseul-Stainville）公爵来担任，后者当时只有三十岁，并且相当缺乏经验。虽然大家公认舒瓦瑟尔本人忠心耿耿，也相当尊重他的高贵血统，但是费森和王后都对他轻浮的名声表示了审慎的态度，敦促布耶将军另寻其他人选。在一封信中，费森将他形容为“一个头脑混乱的年轻人”[55]。

但是相对于军官来说，布耶本人更为担心的是军官们将要带领的军队是否忠诚。在整个冬天以及接下来的1791年春天，当地的爱国者社团都势头凶猛地招募了大批驻扎在当地的法国军人，并且这些军人对自己

军队长官的忠诚和动机都产生了强烈的怀疑——这些军队长官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于越来越不受信任的贵族阶层。各处的军队长官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下变得越来越无组织无纪律，他们中甚至有人开始宣称，自己只会遵守得到他们自己认可的命令。在这样的情况下，布耶认为他别无选择，只能完全地依赖于外国雇佣兵来完成计划。[56] 他请求杜伊勒里宫准备充足的资金，以确保他的瑞士和德国部队能得到很高的报酬，并且还能给结账日留出足够的数目。费森和王后东拼西凑了差不多一百万里弗——其中大部分来自费森自己的腰包——他们将这笔钱裹在一卷卷的白色塔夫绸里，大胆地用船运到了梅茨。然而，逃亡计划在春天遭到了更加严重的威胁，支持大革命的新任陆军大臣将布耶手下最好的外国部队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省。[57]

但是布耶要操心的还有国王本人是不是靠得住这个问题。他自己曾经设想过要不要邀请达谷侯爵跟他一起逃亡，以弥补国王本人缺乏旅行经验的问题。然而，在最后关头，国王一家又抛开了达谷，以给女家庭教师图尔泽夫人让出位置，而图尔泽夫人一听说这个逃亡计划就提出要带着她的报酬一起上路。布耶还担心，国王可能永远下不了足够的决心去执行这么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很可能会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而作为同谋的布耶只能束手就擒，被控以叛国的罪名。[58] 而国王一再推迟出发的日期，更加深了布耶这样的恐惧。逃亡的日子起初定在5月底，然后变成了6月初，接着再一次又一次地推迟到6月12日、15日，乃至19日。[59] 更加不幸的是，布耶一直到6月15日才知道国王一家又再次更改了出发的日期，改到了20日。当时，布耶将军已经下达了所有的指令，他的部队也开始行动，准备就位了。这些不得不修改的命令，最后东拼西凑在一起，很可能会造成许多微小的错误和矛盾，最终影响整个庞大计划的顺利实施。其中问题最严重的可能是，一个骑兵分遣队将会被迫在途中露宿一夜，这会引发当地居民的强烈不安和巨大怀疑。[60]

尽管对于国王的逃亡制订了如此详尽的计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国王真的到达蒙特梅迪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却似乎并没有人关注过。布耶声称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国王的打算。路易可能会同他的保守派前部长布雷特伊男爵一起，在当地建立一个临时政府，指派布雷特伊担任首相。布雷特伊当时已经流亡到了瑞士，他被命令起草一份政策文件，并马上到蒙特梅迪去跟国王汇合。但是提前送到卢森堡以便递交给国王的这份政策文件后来再也没有打开过，并且很显然是被毁掉了。[61] 从路易离开时放在桌面上的声明来判断——这份声明中提到了他本人在1789年6月23日的演说——路易很显然是想要维持国民议会的。但是他依然将国民议会称作“三级会议”，并提议说贵族可以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以此来重新赢得他们过去的特权。在其他方面，他暗示了想要推翻大革命的大部分成果，恢复他从前的大部分王权，取消教士民事组织法，重新夺回大革命分子手里的教会财产，并最终废除1789年10月之后通过的一切法案。在路易的心目中，这种彻底的“反大革命活动”会心平气和地在蒙特梅迪的国王以及他的反对者们之间进行协调，而后者是他本人尽管蒙受了许多羞辱，依然愿意去宽宏大量地原谅的。一旦局势平稳下来，他就会从边境附近的堡垒里撤回，选择一个跟巴黎保持安全距离的居住地——比如说，在“从前的”首都北部七十五英里处的贡比涅（Compiègne）。[62]

风险

但是路易的子民会温顺地接受这样的安排吗？从国王逃亡之后那一段时间的反应来看，肯定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会的。很难想象国王真的顺利逃脱而没有引起一场内战的情形。王后和布耶将军都已经设想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发生。不仅如此，玛丽王后和将军还推测出路易可能很快就会被迫撤退进入奥地利边境，以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甚至已经在计划劝说他这么做了。[63] 虽然路易本人很想长时间地待在境内，但是一旦国王一家明显身陷险境，他肯定会马上越过边境线进入别国领土，哪怕只是临近边界处——或者是国王身边那些很了解如何操纵他的人开始给他施加这样的压力。虽然路易可能曾经希望，要为了国民的幸福而行动，但是他的胜利逃亡很明显会引起一场全面的内战，甚至可能是国际战争——而因此卷入无尽的痛苦中的，正是那些被他称作“我的孩子们”的人民。

奥地利大使梅西-阿让特伊十分清楚这一点。在整个冬天和春天的漫长通信过程中，梅西反复恳求王后向国王反映逃亡会带来的后果，以及一旦失败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局面。梅西声称，国王和王后大大低估了大革命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目前阶段，逃亡已经不太可能了。每个村庄都会是你们前进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我一旦设想行动失败会是一场怎样的灾难，就忍不住瑟瑟发抖。”他明白当时的情况令人沮丧而不快，且国王已经丧失了他大部分的权力。但是这位奥地利外交官力争国王一家最好还是静待风暴平息。“如果您能坚持待在巴黎，大革命分子制造出的那些疯狂的产物迟早肯定会自己崩塌。”但是，选择“这样极端的行动（逃亡）几乎已经不可避免地注定了

国王一家的命运”[64]。

那么，这些就是路易的逃亡所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确实高得惊人。成功逃亡可能会引发内战，而逃亡失败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并且可能会使得君主制度走上绝路。

注释

[1] Campan，113.

[2] Bachaumont，104.

[3] Hardman and Price，243-244，297.

[4] Nicolardot，112-113.

[5] Hardman and Price，294；Nicolardot，207；Campan，113；Padover，16-17；Saint-Priest，2：49-50，62-63.

[6] Nicolardot，117，120，151-160，189-214，233.

[7] Falloux，passim；Padover，15-16；Hardman，20.

[8] Falloux，1，7，27，35；Nicolardot，49-50；Hardman and Price，167.

[9] Bachaumont，57-59；Padover，128-129；Lever，184-195.

[10] Falloux，98.

[11] Tourzel，103；Campan，114.

[12] Zweig，4-6，82-83；Girault de Coursac and Girault de Coursac，21-22；Saint-Priest，2：62；Hardman，24.

[13] Bachaumont，79；Zweig，21-24；Padover，33-36，96-104.

[14] Nicolardot，62；Arneth，4-18；Padover，96-104.

[15] Bachaumont，155；Arneth，20-21；Zweig，136-137.

[16] Bachaumont，126.

[17] Bachaumont，67，143，165，226；Saint-Priest，2：65-66；Zweig，34-38，187，Chap. 10；Hunt， *Family and Romance* ，Chap. 4.

[18] Wick，Passim.

[19] Saint-Priest，2：67，72，80，84，90，92；Zweig，226-247.

[20] Hardman and Price，263，288.

[21] Nicolardot，107，112-113；Padover，135.

[22] Saint-Priest，2：48-50；Fersen，82-83. See also Bachaumont，36；Padover，89.

[23] Arneth，2，38-39，110；Bachaumont，226；Padover，92-95.

[24] Campan，224；Lescure，270；Saint-Priest，2：77，82-83.

[25] Saint-Priest，2：88-90.

[26] Saint-Priest，2：90-91.

[27] Mousset，228.

[28] Saint-Priest，2：24-25；also Arneth，126-127；Feuillet de Conches，2：46-48；Tourzel，105，142.

[29] Tourzel，78，80，102；Tackett，*Becoming a Revolutionary*，297-298.

[30] Arneth，129，132；Campan，279.

[31] Arneth，134，139；Tourzel，158.

[32] Tourzel，81；Arneth，126-127，129；Feuillet de Conches，2：41-42；Mousset，241.

[33] *AP* 27：378-383.

[34] Tourzel，20-21；Saint-Priest，2：14，83，93；Campan，267-268，273-274；Bouillé，228.

[35] *AP* 27：383；also Feuillet de Conches，2：10-11；Tourzel，160-161；Mousset，264；Legendre，letter of March 2，1791.

[36] Tourzel，173-176，185；Feuillet de Conches，2：46-48；Arneth，155；Campan，286；*AP* 27：552-553.

[37] *AP* 27：383；Tourzel，160-161，163，174；Irland de Bazôges，letter of March 4，1791；Mousset，249.

[38] Fersen，97，103-105.

[39] Bouillé，215-216；Bouillé fils，17-19，21-22.

[40] Fersen，113.

[41] Feuillet de Conches，2：38-40；Fersen，82.

[42] E.g.，Arneth，165，169，151，162，177-179；Tourzel，176.

[43] Louis XVIII，45-77.

[44] Bouillé，240；Fersen，128；Bouillé fils，39；Damas，207.

[45] Bouillé fils，43；Tourzel，193；Bimbenet，36，51；Choiseul-Stainville，44.

[46] E.g.，Bimbenet，44，57-62；65-82；Choiseul-Stainville，75-77；Weber，324-325.

[47] Choiseul-Stainville，50，52；Tourzel，190-92；Campan，286-90；Feuillet de Conches，2：14，127-128；Bimbenet，26，40-44.

[48] *AP* 25：201，312-13；Fersen，87；also Fersen，108；Tourzel，179；Arneth，155；Feuillet de Conches，2：48-49.

[49] Bouillé，202，226-233，247-249，215-216；Bouillé fils，17-19，21-22，24-25，56-59；Heidenstam，44-45.

[50] Bouillé，219-220，240，255；Bouillé fils，37-39，44，87；Fersen，121.

[51] Bouillé fils，37-39；Fersen，118，121；Tourzel，196.

[52] Campan，282；Fersen，121；Bouillé，251；Choiseul-Stainville，55-56，58；Bouillé fils，70-71；Damas，207.

[53] Bouillé，253；Damas，205-206 and 208；Choiseul-Stainville，63；Fersen，130.

[54] Bouillé fils，72-73；Choiseul-Stainville，49.

[55] Fersen，136；Bouillé fils，70-71.

[56] Bouillé，243-246；Bouillé fils，33-41，62-63，80.

[57] Fersen，130；Bouillé，220-222，242；Bouillé fils，64-65；Damas，203-205；Choiseul-Stainville，37；Aimond，*Enigme*， 131.

[58] Bouillé，254-255，252；Fischbach，205-206.

[59] Choiseul-Stainville，38，55；Bouillé，222；Fersen，101，109，128，132，136.

[60] Fersen，137；Bouillé fils，77-79；Bouillé，254-255；Choiseul-Stainville，42-43；Damas，208.

[61] Bouillé，223；Fersen，110；Choiseul-Stainville，34，53，55-56.

[62] Feuillet de Conches，2：101-125；Lefebvre，*Recueil de documents*，274-284；Fersen，128；Choiseul-Stainville，34；Bouillé，223.

[63] Bouillé，200-201；Arneth，152-154，171；Feuillet de Conches，2：129-130；Campan，290；Choiseul-Stainville，53. *AP* 27：558.

[64] Arneth，152-154；Feuillet de Conches，2：55-59，127-128，63.

第三章　逃亡的国王

在逃亡前一天，国王夫妻面临的挑战既明显又严峻：如何让他们以及全家人不受察觉地从一个拥有多达两千名工作人员的宫殿里溜出去——国民自卫队队员、家政人员、政府工作人员——这些人的生活就是围着国王和王后团团转。而关于他们准备逃亡的流言已经在巴黎流传了一段时间，这就使得逃亡变得更加困难。随着王后的侍女的告发，杜伊勒里宫的内外都增加了额外的守卫。确实，出于浓厚的怀疑氛围，国王一家必须将表面上的若无其事维持到最后一刻。因此，王后一整天都小心谨慎地照常行事。她参加弥撒；她做头发；她带着孩子跟几个侍臣一起驾马车去蒂沃力宫（Tivoli）；她跟全家包括国王的弟弟和妹妹一起吃晚饭，然后准备就寝。但是她的女儿，十二岁的长公主觉察出了父母之间不同寻常的紧张气氛。尤其令她难以理解的是，以公主生病为借口，除了首席保姆布瑞尼埃夫人（Madame Brunier）之外，她自己所有的侍女都被打发走了。[1]

其实，她的双亲此时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逃亡做最后的各种准备。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是选出三名专业的士兵来护送他们逃走，并负责一些具体的实际事务，同时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为此，当时已经被遣散的王家护卫队前指挥官达谷伯爵招募了三个最出色的手下。弗朗索瓦-弗洛伦·德·瓦洛里（Françios-Florent de Valory）、弗朗索瓦-麦尔科伊尔·德·穆斯蒂耶（François-Melchoir de Moustier）和让-弗朗索瓦·麦尔登（Jean-François Malden）都是不知名的外省小贵族，已经在王家护卫队里服务了差不多二十年之久。他们三个都目睹了自己的护卫队在十月事件中如何遭受巴黎群众的羞辱。从那之后，他们就经常参加巴黎的保

守贵族的小团体活动，这些人还匆匆参与了2月28日保卫国王的活动——虽然他们声称并不是自愿参加的。他们都曾宣誓要效忠于国王，甚至在被大革命者逮捕，遭到严酷的审问之下，他们依然也要对“他们的主人”保持忠诚。“完全献身于我的国王，”瓦洛里这样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质疑他的命令，我发誓要奉献给他我的忠诚、我的顺从、我的尊敬和爱。”路易本人在6月17日召见了穆斯蒂耶，并命令后者给他自己和其他两名同伴去找来私人通讯员的制服：短外套、及膝皮短裤和圆边帽。在逃亡那一天的晚饭之前，国王和王后命令这几个人从卢浮宫的后侧走廊偷偷进入他们的房间。在那里，国王给了他们具体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之前的几个月里费森和布耶研究出来的。这三个人一直声称，在那条晚上之前他们一直对逃亡一无所知，并且我们也没有理由去质疑这一点。[2]

与此同时，费森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快速行动，启动人员、马车和马匹进入安排好的预定位置。6月20日白天，他访问了自己的银行家和瑞典大使；他秘密地穿过杜伊勒里宫，取了几个包裹放在四轮马车上；他一直照料着最后时刻购买的马匹、鞍具和马鞭，以及不同的马车的最终启动——这些活动经常是分阶段进行的，以避免引起怀疑。那天晚上大约六点，费森的德国马车夫巴尔塔萨·沙贝尔（Balthasar Sapel），驾驶着那辆巨大的黑色逃亡马车从马车作坊出发，来到一位富有的英国商人位于克里希街（Rue de Clichy）的住宅。接近八点时，一辆准备用来接两位保姆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停在宫殿对面河岸的塞纳河边。大约与此同时，一辆普通的小型出租马车被遗弃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靠近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处，这是给费森本人准备的，他过一会儿就会来开走这辆车。九点半的时候，瓦洛里和穆斯蒂耶在克里希街跟沙贝尔汇合，一起驾着那辆四轮马车在城市西部的郊外迂回穿行，接着转过城墙外侧新建的北部林荫大道，停在位于巴黎东北部角落的圣马丁海关大门附近。接着，瓦洛里骑马去了邦迪村，为第一个驿马站准备马匹。[3]

在王宫内部，逃亡行动的第一阶段是在大约下午三时开始发动的。被布耶派到巴黎传递最后一个消息的舒瓦瑟尔公爵坐马车出发，去往松韦斯尔的驿马站，在那里跟早些时候派出去保护国王的一队骑兵汇合。陪伴舒瓦瑟尔的大概是这整个逃亡活动中最格格不入的参与者，王后的理发师让-弗朗索瓦·奥提耶（Jean-François Autié），大家都称他为“列奥纳多先生”。在最后几天，王后觉得如果没有一位合适的理发师，那么在蒙特梅迪的日子就会艰苦得令人难以想象。在舒瓦瑟尔出发之前不久，她召见了列奥纳多，问他是否愿意遵照她的一切命令。当这位理发师满腔热情地做出了肯定的答复时——对于一位王后，除了这样还能怎么答复呢？——她告诉理发师跟着舒瓦瑟尔先生一起出发，并要逐字逐句地执行他的一切指令。这位时年33岁的理发师，并不知道他当时要去哪儿，也没有带换洗的衣服，甚至都不可能来得及临时取消他当天下午的约会，就这样震惊而懵懂地跟着舒瓦瑟尔踏上了东去的道路。[4]

在大约10时30分，国王一家终于开始行动了。晚餐结束之后，路易拥抱了他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并将他送上向东去往布鲁塞尔的逃亡之路——他成功逃脱了，这是这对兄弟的最后一次见面。然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图尔泽夫人悄悄离开去唤醒两个孩子，并且通知他们的保姆当天晚上就要准备出发。这两位王家保姆，布瑞尼埃夫人和纳维尔夫人（Madame de Neuville）当时的震惊并不在列奥纳多先生之下。但她们是完全忠于国王一家的，随时准备跟随他们到任何地方——事实上，在十月事件中，是纳维尔夫人抱着王太子冲出了凡尔赛宫的城墙。王后、图尔泽夫人和保姆们领着或抱着孩子，静静地从后面的楼梯走到底楼，进入由国王的贴身侍卫搬空的那个黑暗的房间。保姆很快地帮孩子们乔装打扮，王太子和他的姐姐都打扮成了小女孩。孩子们收拾停当之后，麦尔登领着保姆们回到楼上，走出正殿，渡过塞纳河，上了停在那里等待着她们的马车。一个雇来的马车夫将会把她们带到克莱村（Claye），这是计划好的逃亡路线上的第二站，她们将会在这里紧张

不安地等待一整夜。[5]

回到底楼那个黑暗的房间，王后静静地打开了通向外面的门，这把钥匙是她几个星期前通过一个诡计弄到手的。一轮凸月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可能还遮掩在云里。王后仔细计算过他们离开的时间，正好是在大批仆人下班离开王宫的时候。[6] 在每天晚上都成群结队离开的大批男男女女中间，守卫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乔装打扮过的逃亡者。图尔泽夫人哆哆嗦嗦地抱着睡意朦胧的王太子，牵着他姐姐的手，看似漫不经心地走过庭院，朝着王宫东侧大街上那一排亮着灯的马车走去——每天夜里这个时候，这里都有车等着那些离开杜伊勒里宫的人。费森本人则打扮成一名普通的司机，正坐在那辆出租马车里等待着。接下来他们在城里稍稍兜了个圈，等其他的家庭成员也准备好要离开的时候，大约在深夜十一时，他们又回到了最初的地点。图尔泽惊讶于费森这个瑞典人竟然能如此逼真地模仿一个巴黎马车夫的样子，他吹着口哨，时不时地停下来跟其他的车夫交换烟草，随便聊天。而公主记得的却只有“时间从来没有过得那么慢过”[7]。

费森回来之后不久，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就已经乔装打扮完毕，穿过一扇隐藏在护壁板上的秘门，溜出了自己的房间。她走出王宫，径直来到坐在出租马车里等待着的费森面前，接着费森把她带到了那扇正确的门前。本来接下来国王就该动身了，但是在最后一刻拉法耶特将军和巴黎市长巴伊（Bailly）突然出现了，没有经过通知就直接闯进了王宫，于是路易只得跟他们交谈了几句。只有到了十一时三十分之后，这两位巴黎的领导人终于离开了，路易才得以假装去就寝，打发走了他的仆人，然后走到楼上，乔装打扮，接着由麦尔登搀扶着来到外面等待着的马车上。出于一贯的黏液质的性格，他甚至在穿过庭院的时候还停下来系鞋带扣。最后一个要离开的就是王后本人了。出于某些原因，她差点撞上正准备离开王宫的拉法耶特将军。但是将军当时被他周围随从手举的火把照得眼花，又正巧心不在焉在想些别的事情，因此没有注意到

那个独自走在阴影里的女人。经过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时刻之后，王后自己终于也登上了出租马车。[8]



《**1791**年**6**月**21**日凌晨**12**点**30**分，路易十六离开杜伊勒里宫》 提着灯笼的国王带着逃亡的人穿过杜伊勒里宫的庭院，跟等在外面坐在出租马车上的费森汇合。而实际上，这些逃亡的人几乎都是单独离开的。

当时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比计划的时间晚了一小时。一家人在小小的马车里拥作一团的时候，费森开始发动马车穿过巴黎，麦尔登扮作男仆坐在车后。他们走得很慢，唯恐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费森并没有径直驾车到圣马丁门，而是先沿着克里希街往西北方向走，确定停在那里的四轮大马车已经离开了。他也很小心地避开了位于巴黎东北方向的那些

地区，在那些地方的居民疑心总是很重，而且深夜大街上也还是有人在活动。终于到达圣马丁门之后，费森又花了好几分钟时间十分紧张地寻找穆斯蒂耶、沙贝尔和四轮大马车的踪影，最后发现车停在暗处，比他预计的停车地点要远上许多。找到大马车之后，费森和其他两位保镖马上把乘客都转移到了大马车上，将小出租马车推进一条水沟里，然后踏上了一路向东出城的道路。这些各式各样的的延误已经使得他们比计划时间落后两小时了。那是一年中最短的一个夜晚，黎明的曙光已经开始隐约地出现了。费森冲着他的马车夫大吼起来，催着他加快速度："快一点，巴尔塔萨！"与此同时，沙贝尔自己也想起了这一点："赶紧的，快一点！你的马可并不累，催它们走快一些！"半小时之后他们到达位于邦迪的第一个驿马站时，瓦洛里已经等在那里了，带着准备替换的马匹。[9]

在这里，费森离开了队伍。他已经以高度的审慎和机智完成了逃跑密谋中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任务，指挥国王一家近乎奇迹一般地逃出了杜伊勒里宫和巴黎。接下来他打算独自骑马向北，进入奥地利和荷兰，接着沿着国境线的外侧前进，在蒙特梅迪跟国王一家再次汇合。"再见了，科尔夫夫人。"他跟乔装打扮过的王后简短地道别，然后骑马去往勒布尔热（Le Bourget），同时国王一家依然一路向东。[10]

下一站是克莱，在那里两位保姆乘坐的小马车跟他们汇合了，旅行者全体终于到齐。在太阳开始缓缓升起的时候——这大约是四点过后——车队开始穿过法兰西岛和香槟地区那些起伏的平原。并不能说他们这群人一点都不显眼。双轮小马车是黄色的，黑色的四轮大马车也有着黄色的边框，还有穿着鲜明的黄色外套的三个保镖——瓦洛里骑着马走在前面，麦尔登坐在大马车的车顶上，穆斯蒂耶骑马跟在最后——这一队人马一路上所到之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吸引了当地人的目光。[11] 诚然，这是从巴黎去往德国的主干道，富有的旅行者乘坐着豪华的马车，这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景象。但是当他们继续前行去往洛

林（Lorraine）的时候，围观群众就开始特别地关注这三位保镖。很显然穆斯蒂耶选择黄色的制服只是一个纯然的巧合，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的侍卫制服真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位亲王是一位非常受人厌恶的反大革命的武装领袖，也是在法国的这一地区拥有无数领地的大封建领主。[12]

接下来的路程是法国的主要公路之一，笔直而宽阔，一向维护得很好，两侧都种了树，一半的道路路基上铺着石头，其他的则是碎石——道路高高隆起在田野上。部分道路是在1785年刚刚完工的。跟其他富有的长途旅行者一样，王国一家每到达一处驿马站，就会更换马匹和车夫。瓦洛里总是骑马远远走在前面，以通知下一个驿马站的站长早点准备好马匹，等后面的马车一到就换上。他们要求每个驿马站准备十匹或者十一匹马——六匹马拉四轮大马车，两匹拉双轮小马车，还有两匹给瓦洛里和穆斯蒂耶当坐骑。每一站都会派出一两个马车夫或者说“向导”，骑马跟在一匹拉车的马旁边，将这一队人带到下一个驿马站，然后自己再回到上一站。路易带了一口袋金币，时不时地就会拿出来给瓦洛里，用来支付马车夫的费用和小费。[13] 他们在路上的行进速度差不多是每小时九到十英里，但是在每个驿马站都要花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而全程有十九个驿马站，因此他们行进的平均速度接近每小时七英里。[14]

气温逐渐升高，马车平稳地驶过田野，马匹的更换也十分顺利，旅行者们感到了一阵解放的欢欣。当时的天气炎热而潮湿，但是他们一路上并没有遇到雨。大约是在埃托日（Etoges）附近的一个地方，大马车的一个车轮撞上了路标石，四匹马绊倒了，弄坏了它们的缰绳。修理工作花掉了大约四十分钟，这使得他们更加赶不上安排好的时间进度了。[15] 但是，除此之外，旅行一路上畅通无阻。这段旅程最危险的部分似乎已经被他们远远甩在了身后，现在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赶到松韦斯尔，在那里就会有人照料他们，如果需要的话，舒瓦瑟尔的骑兵也会保护他

们。

在马车里，国王一家用手吃了一顿愉快的野餐式的早餐，“像是猎人们或者是平民阶级的旅行者们那样”，穆斯蒂耶这样形容。他们还互相交流了逃离杜伊勒里宫的经历。现在国王一家的逃亡肯定已经被人发现了，拉法耶特将会多么羞愧和尴尬，王后还对此评论了一番。国王拿出了他的地图和事先准备好的旅行日程，大声地念出每一个路过的城镇或驿马站的名字。这是他第三次离开巴黎到别处旅行，也是他1786年去瑟堡的辉煌旅程之后的第一次。他现在已经沉浸在对地理和清单的热忱之中了。王后负责指派他们各自都要扮演什么角色——在凡尔赛附近的小特里阿农宫，她也曾经热衷于跟侍臣们玩类似的游戏。图尔泽夫人将成为科尔夫男爵夫人，王太子和公主则是她的两个孩子。伊丽莎白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将扮成她的两个侍女。王后和国王的妹妹已经按照这样的身份乔装打扮过了，穿着简单的晨衣、短披风和相配的帽子。至于国王本人，他穿着平民的外衣、一件褐色的背心和小小的圆帽子。他将成为杜兰先生，男爵夫人的营业代理人。[16]

但是旅行者们很快就厌倦了角色扮演和必须严格隐姓埋名的苛刻。特别是路易，他从来都不擅长假装成别人。不管怎样，他依然相信离开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煽动人心的报纸和狂热的暴民，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的；国王和王后现在应当获得恰如其分的尊重。天气越来越热，他们放下了遮阳板，摘下帽子和面纱，看着外面在田野里劳作的农民。这些农民也看着他们，好奇这些坐着奇怪的黄黑两色马车旅行的有钱贵族的身份。在一段长长的上坡路上，类似从拉费泰苏茹瓦尔（La Ferté-sous-Jouarre）到马恩河谷（Marne Valley）的一路，在马匹拉着车艰难地往山上走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下车来步行了。后来，国王开始在驿马站下车四处走动，让自己透透气，甚至停下来跟围观的人交谈，询问天气和庄稼的情况，就像他年轻时候曾经跟凡尔赛宫外的劳工聊天那样。保镖和保姆对国王的无忧无虑一开始表示担忧，在一个驿马站，穆斯蒂

耶还试图将他与那些探头探脑的乡下人隔离开。但是，路易告诉他的保镖“不用担心，这样的小心谨慎是没有必要的。这段旅行现在看起来已经平安无事了”。最后，保镖们得出结论说国王一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以他们自己就没有必要再操心了。[17]

然而，其实国王已经被人认出来了。一个名叫弗朗索瓦·皮卡尔（François Picard）的马车夫确定，在蒙米拉伊（Montmirail）的驿马站换马的时候他看到了国王。又过了三站之后，在尚特里比耶尔热（Chaintrix-Bierges），驿马站站长让-巴蒂斯特·德·拉尼（Jean-Baptiste de Lagny）和他的女婿加布里埃尔·瓦莱（Gabriel Vallet）都认出了国王。他们两人都参加过1790年的联盟节。在这里，可能还有当地人记得，国王全家都在驿马站附设的小旅馆里走出来透气，留下两个装饰着王家纹样的银质小碗给人欣赏。无论如何，拉尼派瓦莱去给大马车带路到马恩河畔沙隆去，这位女婿一到那儿，就把这个消息偷偷说给那里的驿马站站长听，这位站长跟瓦莱他们全家人都很熟悉。[18]

当他们大约下午四点驶入沙隆的时候，旅行者们原本应该警惕起来的。沙隆是位于巴黎和蒙特梅迪之间最大的城市，当地肯定会有在凡尔赛见过国王和王后的贵族。但是路易看上去并没有比他在经过那些小驿马站时更加小心谨慎。除了驿马站站长维耶（Viet），还有其他好几个人也认出了他。“几乎每个人都认出了我们，”伊丽莎白公主后来回忆说，“许多人因见到了国王而感谢上帝，并且祝福国王一路平安。”[19]不知道民众是确实十分高兴看到国王离开巴黎，还是仅仅太过震惊不知道如何反应，维耶和他的马厩帮手只是沉默地帮国王换上了新的马匹，目送马车驶出了城。市长当时就得到了消息，但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过了几小时之后，当巴黎来的信使带来了国王一家逃走的消息，并传达了议会的命令要求阻止他们，市政府才匆忙开始采取行动。[20]

在离开沙隆一路向东走向洛林边境的过程中，国王一家的心情都极

度乐观，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过了最后一个大关，马上就要投向舒瓦瑟尔公爵和他的骑兵们的保护了。国王手头有详细的旅行日志，所以他知道他们已经比原计划的时间安排落后三小时了。但是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无论如何，在松韦斯尔附近一个位于离村庄不远的主路上的驿马站进入视野时，他们欢乐的兴致就突然中断了。在他们面前开阔的一望无际的农田里，并没有任何军队的踪影。瓦洛里小心地打探了消息，发现骑兵确实在这里驻扎过，就在驿马站附近一个小池塘边上。但是骑兵队已经被当地的农民弄得心烦意乱，一小时之前，他们刚刚离开了。刚开始国王一行认为舒瓦瑟尔可能只是把他们沿着大路带到了远处一个安静些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驿马站时，舒瓦瑟尔和他的骑兵却依然不见踪影。当国王一家在刚刚降临的暮色中驶向圣梅内乌尔德城，远处就是阿尔贡森林那漆黑的暗影时，他们，用图尔泽夫人的话来形容，已经深陷“极度的焦虑”之中。[21]

崩溃

在之前的日子里，国王的逃亡行动计划得十分顺利，除了路易在最后时刻决定将出发时间推迟一天所导致的变动。当费森和国王一家做好了准备工作，成功逃出巴黎的时候，布耶将军也早已安排军队做好了一系列的准备活动，迎接国王一行。将军本人于6月16日离开了位于梅茨的司令部，并通知当地的军官，他要到前线去监视奥地利军队的行动。同时他下达命令，集中大量的战士和给养输送到蒙特梅迪。6月20日他到达斯特奈，这是位于默兹河畔的一个军事重镇，地处蒙特梅迪和瓦伦之间。他的小儿子和另一个军官雷格古尔（Raigecourt）伯爵已经被派去瓦伦，带着一队驿马跟已经驻扎在那里的大约四十名德国军人汇合。为避免引人怀疑，他们将马匹栓在河西岸一家小旅店的马厩里，当接到国王即将到达的通知后，再将马匹牵到瓦伦的最南边。6月20日夜里，老布耶和几名军官偷偷往南骑了大约八英里，在一个约定好的位置，一个叫作丹镇的小镇北侧等待着国王一家的到来。与此同时，德国骑兵的其他特遣部队在指挥官达马（Demas）和安多万（Andoins）的率领下从南部出发，分别在克莱蒙和圣梅内乌尔德就位。6月21日早晨，弗朗索瓦·德·戈格拉本人带着四十名骑兵从圣梅内乌尔德出发，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到达松韦斯尔，跟等待在那里的舒瓦瑟尔公爵以及理发师列奥纳多汇合。[22]

然而，所有这些事先安排好的计划，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处于平民的密切注视之下，并且这些民众绝不是消极被动的。在整个6月，瓦伦的居民们并不是仅有的对该地区不明原因的部队活动越来越表示担心的人。对于“南锡的屠夫”布耶将军以及在战场上指挥的贵族军官

的怀疑，随着说德语的雇佣兵人数越来越多而日益增强。人民看到，在每个经过的分遣队中，都有大量的这类雇佣兵。军队没有充分地预先提醒民众将会有骑兵出现，而这进一步加强了紧张气氛。直到最后一刻，城镇的领导人才被告知已经派出部队来护送从巴黎运送到前线的军饷。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减轻当地人的恐惧。明明从头到尾有一个单独的护卫队就足够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骑兵呢？为什么指挥官只派出了说德语的部队？是不是有战争即将爆发了——对于这个边境地区来说，这一直是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并且，如果真的是这样，一支德国部队在贵族指挥官的带领下将会倒向哪一边？于是，十分讽刺的是，正是派出保护国王的护卫队，在国王必须穿越的地区的民众心中激起了广泛的怀疑。

在蒙特梅迪，显而易见需要准备一个很大的军营——还要烤18 000条面包做军粮——这也带来了“怀疑和焦虑”。“在和平时期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满街都是军官，到处都部署了哨兵——在当地人心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23] 就在瓦伦南部的克莱蒙，当地人目睹了一天有150名骑兵骑马穿过城市，第二天又有180名，并且还突然宣布要在当地驻扎过夜。几乎没有人相信运送保险箱的故事，有传闻说这个“宝藏”是王后偷运出来给她的哥哥奥地利皇帝的——又或者说这个宝藏其实就是王后本人。[24] 在西边更远处的圣梅内乌尔德，民众也同样看到了不经通报就突然接连出现的两个骑兵队。第二队是一队龙骑兵，他们在安多万的指挥下，于6月21日上午九时左右在市中心的大型广场上下马，在那里等待了一整天，与此同时他们紧张的指挥官在街上来回踱步，时不时地骑马出城去往地平线的方向观看。在指挥官不在场的时候，当地人试图跟这些说外语的骑兵交流，给他们买酒，打听他们在此地区出现的“真实用意”。许多战士被他们接到的奇怪命令搞糊涂了，开始怀疑他们的长官是否真的值得信任。到了下午结束的时候，怀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当地国民自卫队的队员开始武装起来，准备迎接一场莫名的

灾难。[25]

与此同时，松韦斯尔关键性的前沿阵地上，更加灾难性的事件正在显露出来。在那里，舒瓦瑟尔公爵的轻骑兵并没有在城里等待，而是在开阔的乡间。这里跟大革命开始之后的许多法国农村地区一样，农民们变得不愿意向他们的封建领主缴纳税金了。骑兵到来的时候，戴着高高的装饰着羽毛的头盔，那副模样灿烂动人而又令人恐惧。恐慌情绪开始在那里蔓延，据说这些骑兵是来夺取农民的钱或者庄稼的，于是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手中抓着干草叉和镰刀，喊叫着威胁着这些骑兵。在下午时分，从过路的旅客那里听到了骚乱情况之后，国民自卫队从沙隆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来打听情况。舒瓦瑟尔和戈格拉试图跟每个人讲道理，告诉他们保险箱的事情。虽然自卫队显然接受了这样的说法，平静下来回沙隆去了，但是当地的农民依然不相信，他们还在恐吓威胁这个骑兵队。[26]

在这个时候，舒瓦瑟尔对于迟迟不到的国王一家也开始表示担心。戈格拉仔细计算过路上的时间，根据他的算法，国王一家两点钟就应该已经到了。在给布耶的一封信中，费森甚至说过国王两点半就能到达松韦斯尔："我可以保证这一点。"最终，接近傍晚的时候，年轻的公爵做出了一系列轻率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对整个逃亡计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对在场的农民感到烦躁不安，并且担心国王是否没能安全逃出巴黎，也害怕如果国王到达，驿马站附近的混乱状况也可能给国王带来危险，舒瓦瑟尔决定撤退，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沿着道路撤退到稍远一点的地方，而是选择一路撤退到了五十英里之外的布耶位于斯特奈（Stenay）的司令部。更加要命的是，他接着给其他等待在他后面的骑兵分遣队送去了消息："看起来宝藏有可能今天到不了了。我已经离开去跟布耶将军汇合了，你们明天会收到新命令的。"最后，在送信的人选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选了王后的理发师，列奥纳多先生。[27]

在接下来的八小时中，舒瓦瑟尔公爵和他的小分队将会朝着东北方向前进，穿过乡村而不是走大路，在一个又一个村子里突然出现，引起一片恐慌，接着一头扎进了阿尔贡森林，并且在里面迷路了。与此相反，列奥纳多先生迅速担负起了他作为军队情报员的职责，坐着他的小马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接连经过了圣梅内乌尔德、克莱蒙和瓦伦，一路散布着暗示国王可能不会来的消息。在前两个城镇，安多万和达马很高兴有这么一个理由可以让他们的军人解下马鞍回住所休息，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当地人的恐惧情绪。但是他们两人都在几名军官和士兵的陪同下留在驿马站，等着看后面的情况。在瓦伦，指挥官和军队都过夜休息去了。只有雷格古尔和小布耶依然守在旅馆的窗户旁边，等待着或许有命令召唤他们栓在楼下马厩里的驿马。[28]

在国王的马车队进入圣梅内乌尔德长长的主干道，开进中心广场的时候，他们因为找不到舒瓦瑟尔而引起的焦虑情绪并没有得到缓解。他们确实看到了骑兵，但是这些骑兵看上去正在休息，没有骑马也没有武装，有些甚至还在小旅店里喝酒。更让他们担忧的是一伙一伙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许多正扛着火枪，在市政厅那典雅的砖石和石灰岩建筑前面的王家广场对面打转。旅行者们当时一定觉得他们误打误撞地闯进了正在城市广场上演的一出戏里，而全城的市民似乎都聚在这里看戏。他们肯定也意识到了每个人都转过头来注视着他们，特别是盯着两位保镖，他们俩看上去完全就是孔代亲王的人。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一条向右倾斜的街道上，国王一家找到了驿马站以及早就在那里准备马匹的瓦洛里和马厩助手。换马的过程又快又顺利。在等待的时候，王后急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把安多万叫到大马车前。这名军官试图自然地走上前去，但是当他看到国王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行礼了。他悄悄地说：“计划没有成功，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必须离开了。”说完他就迅速地走开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图尔泽夫人后来回忆道，“深深刺穿了

国王的心。”[29]

驿马站站长让-巴蒂斯特·德鲁埃来到现场的时候，他的马厩帮手们几乎已经完成了换马的工作。这位站长当时28岁，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他曾经在骑兵队里服役七年，退役之后回到家乡，在自家的田地里劳作，并经营这个由他的寡母拥有的驿马站。他雄心勃勃，自信满满，但是发现自己被迫从事的是农活和体力劳动这样的苦工，跟他青年时代的辉煌履历比起来真是相当落魄了，这也给了他很大的挫败感。[30] 现在，当他看到大马车并且认真地打量里面的乘客时，他震惊地认出了法国王后，他和同伴们一起在凡尔赛附近驻扎的时候曾经见过她一次。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国王，但是坐在王后身边的那位体格魁伟的男人的面孔，立刻让他觉得跟最近刚开始流通的纸币上印着的路易十六的画像惊人相似。在目送两辆马车开走之后，他开始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国王刚刚从这里经过了。一开始，就像尚特里比耶尔热和沙隆的人一样，没人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该想些什么。但是仅仅在几分钟后，安多万吹响了喇叭，召集他的龙骑兵上马，准备撤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了整件事情的真相。这完全是一个阴谋，骑兵队护送的并不是保险箱，而是国王本人，他不是在逃亡就是被绑架了。[31]



《德鲁埃在圣梅内乌尔德认出了国王》　在一家叫作**Au Fuiard**（逃亡）

的小旅店里，国王品尝着圣梅内乌尔德的招牌菜肴猪蹄，其他人在一边等待着。德鲁埃拿着一张纸币上的画像做对比，认出了国王。实际上，国王在圣梅内乌尔德期间并没有走下马车。

在那之后，在圣梅内乌尔德发生的事情的先后顺序就有些模糊不清了。当地的国民自卫队立刻组织了起来，挎着火枪，敲着鼓，列队站在道路两侧，阻挡住了骑兵的去路。与此同时，其他的市民开始跟骑兵交谈，游说他们背叛自己的长官。在安多万试图劝阻市民的时候，他手下一名骑在马上的军官突然向空中开枪，并冲破自卫队的阻挡骑马逃出了城，躲避开了后面一路追逐他的枪声。现在教堂的钟声大作，整个形势变得混乱不堪，安多万和其他的军官被解除了武装，并出于安全的考虑被锁在监狱里。德鲁埃被叫到市议会，在紧邻暴乱现场的议会大厅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他讲完自己知道的情况之后，市镇领导们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如果国王真的逃出了巴黎，那只可能意味着他要逃到边境，也许会带回一支外国军队来进攻自己的国家，终结大革命。必须警告其他位于通往边境的路线上的城镇，阻止国王。他们要求德鲁埃本人，作为镇上最出色的骑手之一，马上骑马去追赶国王。这位驿马站站长马上招呼了自己的朋友让·纪尧姆（Jean Guillaume），一位前骑兵，一起动身去追赶国王一家。但是现在距离他们已经有足足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了。当德鲁埃和纪尧姆接近克莱蒙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派去给国王一家带路的马车夫，他告诉他们大马车和双轮小马车离开了主路，转向北方去了。两位骑士于是调转马头，向着瓦伦的方向狂奔而去。[32]

大约在一小时之前，九时三十分左右的时候，国王一行的车队慢慢地翻过了阿尔贡的山丘，停靠在克莱蒙的驿马站。那时候天已经差不多黑了，驿马站又位于城镇的边缘，所以几乎没有人看到他们。十分迅速地更换了马匹之后，一直等候在附近的达马伯爵十分谨慎地上前跟国王一家交谈，并跟瓦洛里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提醒国王一家在克莱蒙的

军队引起了当地人的普遍不安，并保证自己将会在国王的两辆马车开出一段距离之后跟随在后面——这也是布耶将军在信中曾经吩咐过的。但是车队穿过城镇，转而向瓦伦行驶的一路上，他们的行踪已经清晰地暴露了。接下来在克莱蒙发生的事情跟在圣梅内乌尔德大同小异。并没有人认出国王夫妇，但是每个人都看到了孔代亲王信使的黄色制服，并认为这一定跟最近两天不明不白驻扎在他们城镇里的军队有某种关系。大约一小时后，当国民自卫队穿上制服集合完毕之后，那位从圣梅内乌尔德逃出来的军官到达了克莱蒙，告诉达马国王一行已经被认出来了，并且在他们离开之后已经爆发了全面的骚乱。当指挥官试图重整队伍时，大部分人已经喝得醉醺醺，并且被当地人说服了，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他只能跟很少几名骑兵一起逃走，快马加鞭赶去警告国王。[33]

与此同时，大马车的乘客们正在长长的埃尔河谷中平稳地前进，并且由于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即使又紧张又焦虑”依然在黑暗中打起盹来。[34] 如果他们那时知道了从后面逐步逼近的一波波恐慌和暴动，恐怕还会更加紧张。由圣梅内乌尔德和克莱蒙的事件，以及舒瓦瑟尔公爵骑马狂奔过阿尔贡的村庄所引发的局部浪潮规模较小，而不久之后，官方信使和市民涌上法兰西的街道，宣布国王失踪的消息，引发的则是更加可观的怒火狂潮。

十一时到达瓦伦之后，等待着他们的是又一次不安和失望的打击。布耶和舒瓦瑟尔曾说过会在第一排房子附近的路边树丛里安置一批新的马匹，但是瓦洛里和穆斯蒂耶骑马找遍了沉睡中的村庄，一直走到路边都没有发觉驿马的踪迹。他们甚至在村庄入口处敲开了几户人家的门，但是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旅行者们要求马车夫放弃寻找驿马，继续前进去丹镇，但是克莱蒙来的马车夫严格执行自己驿站长的命令，除非马匹得到了充分的喂食和休息，不然不会去比瓦伦更远的地方。在他们搜寻马匹和跟马车夫争执的过程中，又有半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在他们依然停在道路旁的时候，德鲁埃和纪尧姆骑马一路小跑着经

过他们进了城。[35]

最后马车夫终于同意一边继续找寻驿马，一边向瓦伦的中心地区前进。他们缓慢地穿过一片漆黑的街道，只有双轮小马车上的灯光照亮。接下来他们听到了各种声音，呼喊，有人在嚷嚷着：“着火了，着火了！”图尔泽夫人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刻：“我们觉得我们一定是被人出卖了。我们沿着街道前进，心中的悲伤和痛苦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他们穿过小旅店金色手臂旁边的拱门，在那里，有人拦住了他们。[36]

回到巴黎

对于国王一家和他们的支持者来说，在瓦伦的那一夜只能说是一场漫无边际的折磨，是他们最可怕的噩梦——如同图尔泽夫人形容的那样，是“八小时死亡一般的等待”。也曾经过有充满希望的时刻：城镇的官员们看上去似乎愿意帮助他们，舒瓦瑟尔和戈格拉奇迹一般地出现了，接下来达马和德隆带着他们的骑兵队也赶到了。一直到最后，他们还抱着希望，认为没准布耶将军就在附近，他马上就会赶来护送他们。路易的军官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建议，要拆散他们一家，但是被路易坚定地拒绝了，他害怕有人会伤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久之后，城镇议会就改变了心意，拒绝让他们继续逃亡，这真是一个苦涩的打击。而最后从巴黎来的信使出现了，命令他们返回首都，带给他们最后的羞辱并宣告了他们逃亡行动的失败。

他们试着拖延了一段时间。他们请求让孩子们多睡一会儿，也让自己能够多休息一段时间。一位保姆甚至假装发作了非常严重的胃痛。最后，他们在恳求之后只得到了一会儿时间，得以单独在一起整理思绪，编出一个共同的说法，并烧掉随身带着的文件。最后，在大约早晨七点半的时候，国王一行从骚塞的店里被人带走，送上两辆马车，掉头开回巴黎。一家人被河对岸聚集在街道和广场上的人山人海吓呆了，群众推推搡搡争着要看国王和王后一眼，并且不停地呼喊着：“国家万岁！国王万岁！回巴黎去！”依然殷勤有礼的舒瓦瑟尔公爵搀扶王后登上四轮大马车。她转过头来问他：“你觉得费森先生是不是已经逃走了？”公爵回答说他认为是这样。在那之后不久，舒瓦瑟尔就被拖进了人群，遭到了痛打，并跟达马和其他军官一起被关进了凡尔登的监狱。只有狡黠的

戈格拉带着包裹着绷带的枪伤设法逃出了城，数天之后才在奥地利边境被捕。当几辆马车沿着回巴黎的道路慢慢爬上山坡的时候，国王一家依然凝视着河对岸，猜测布耶将军到底怎么样了。[37]

就在那个时刻，将军远在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之外。在当天清晨四点，他的小儿子和手下军官放弃了在丹镇之外的漫长等待之后，在差不多到达斯特奈的地方追上了布耶将军，并告诉了他这些灾难性的消息。他又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召集起手下的大部分德国骑兵，大约三四百人，骑上马返回瓦伦。在接近城镇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上百名充分调动起来的农民和自卫队队员，这些人敲着鼓，高举旗帜，朝着四面八方行进。有那么几次，布耶将军一行人不得不抽出军刀以开战相威胁，人群方才让出路来。当他们最终到达瓦伦高处的山上时，已经是九点或者九点半了。他们也没有再接着走下去。

布耶后来解释说，当时桥已经被拆掉了，他们没有办法过河。但是瓦伦骑兵队的指挥官在几小时之前刚刚骑马涉水过了河，并且这条路实际上在前方几英里处就转向了埃尔河的右岸。更加有可能的情况是，将军知道了当时国王已在两小时的路程之外，并且已经被几千名荷枪实弹的自卫队队员包围了。遭到了当地人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也担心着长途向南行进之后马的状况，而且可能还开始怀疑自己手下的骑兵是否可靠——实际上，这些骑兵几小时之后就投靠了爱国者——布耶将军调转马头，返回了斯特奈。他在自己的小酒馆里匆匆喝了一杯咖啡，就召集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大约二十名军官，流亡到了几英里之外的奥地利比利时。[38] 两天之后，几个月以来跟布耶一起密切合作的柯林林（Klingling）男爵给他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信。他对“我们崇高阴谋”的失败表示痛心疾首。“要打败命运是多么困难！像瓦伦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镇的官员居然阻挡了国王的去路，这是多么奇怪的宿命啊！哦，我亲爱的，如果我们能够救出国王，就算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啊！”[39]

在布耶将军开始撤退的时候，国王一行人刚刚到达克莱蒙。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这趟返回巴黎的可怕的旅程。跟6月21日一路顺利地逃到瓦伦相比，回程既沉重又漫长，拖拖拉拉地走了四天。夏天最热的天气现在已经稳定地保持下去了，而且马车前进的速度太慢，掀不起一丝凉风。路边跟随围观的群众为数众多，荡起了漫天的尘土，使得气氛更加凄凉了。瓦洛里当时被捆绑着双手，坐在大马车的车顶上，他回忆过当时的痛苦："我们被太阳烤熟，被灰尘窒息。"[40]

当他们刚离开瓦伦的时候，伴随在他们身边的是六千名国民自卫队队员，遵照一种类似的命令排成两列，由巴黎的自卫队队员和信使拜翁（Bayon）带领着。但是在他们一路向西的时候，乡下人从各个方向源源不断地出现：男人、女人、孩子，经常是整个村庄全体出动，坐着运货马车或者是徒步，带着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武器。这些人数量众多，从路上满溢出来，散布在周围的田野上，像一大群蜜蜂那样紧紧跟随着，这让旁观者感到十分震惊。保镖穆斯蒂耶后来回忆说，这些"数不清的群众"，"男女老少都有，带着火枪、军刀、干草叉、长矛、斧头或者镰刀"。代理人佩蒂翁（Pétion）在旅途的后半程一直陪伴着国王一家，他的回忆大同小异：除了自卫队队员之外，还有"老人、女人和孩子，有些带着镰刀或者长长的烤肉叉，其他人带着棍棒、刀剑或者是古老的枪支"[41]。有些人赶来仅仅是想要看看国王和王后，他们之前不但没有见过，也从没有想象过能见到他们俩。其他的城镇或者乡村自卫队队员，则是赶来保护国家和国王的——最初曾有谣言说国王遭到绑架了。这差不多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的旗帜和五颜六色的新制服派上用场，之前都只是在城里广场附近游行的时候才有机会穿。人群有时甚至是欢欣鼓舞的，特别是当国王的车队经过前一天晚上发生过恐慌的那些地方。人们兴高采烈，载歌载舞，为了国家和国王的健康而频频举杯。市长们发表了精彩的演讲，模仿着他们之前在国民议会的辩论中听到过的花言巧语。忠诚的图尔泽夫人震惊地听到很多当地的权贵滔滔不

绝地指责国王，急不可耐地教训他这样抛弃自己的子民，使他们陷入恐慌是多么轻率的行为——即使他只是听信了叛国者的劝告。她认为，这些城镇的官员“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并羞辱国王一家。用刻薄的谩骂来摧毁不幸的国王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42]。

然而当时依然有非常严重的恐慌情绪。布耶将军和他手下的四百名骑兵一路向着瓦伦飞奔而去，在沿途乡村群众的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很快在各个村庄之间传播开来，并随着此地区其他部队的活动而越发增强。很快就有传闻说，有上千名士兵，甚至可能是整个奥地利军队，在一位邪恶的将军带领下来到了洛林和香槟地区，要为抓住了国王一事惩罚当地的民众。[43] 跟随国王的滚滚人潮被变幻无常的流言所驱使，节日般的欢乐情绪转眼就可能变成复仇的愤怒和欲望。通常情况下怒火并不是向着国王——整整一路上都能听到“国王万岁”的呼喊声——而是指向那些被认为影响了国王或者是绑架了他的人。然而，民众在拿王后当靶子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多少异议。玛丽的性生活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非常粗野的评论，人们还非常嘲讽地议论着王太子的“亲生父亲”。当玛丽给一位特别善良温顺的自卫队队员送去一块鸡肉的时候，有人大喊着鸡肉里肯定下了毒，让那个年轻人绝对不要碰它。但是仇恨首当其冲地针对着那三名保镖，他们当时正非常显眼地坐在马车夫的座位上方，依然穿着醒目的黄色制服外套，而这正是旧制度最可恨的一切的象征。民众认为是他们撺掇了这次逃亡，于是他们不断地遭到语言上的攻击，并挨了不少的石子和粪便。有那么几次，民众试图接近大马车来动手殴打他们，但是被国民自卫队队员推开了。[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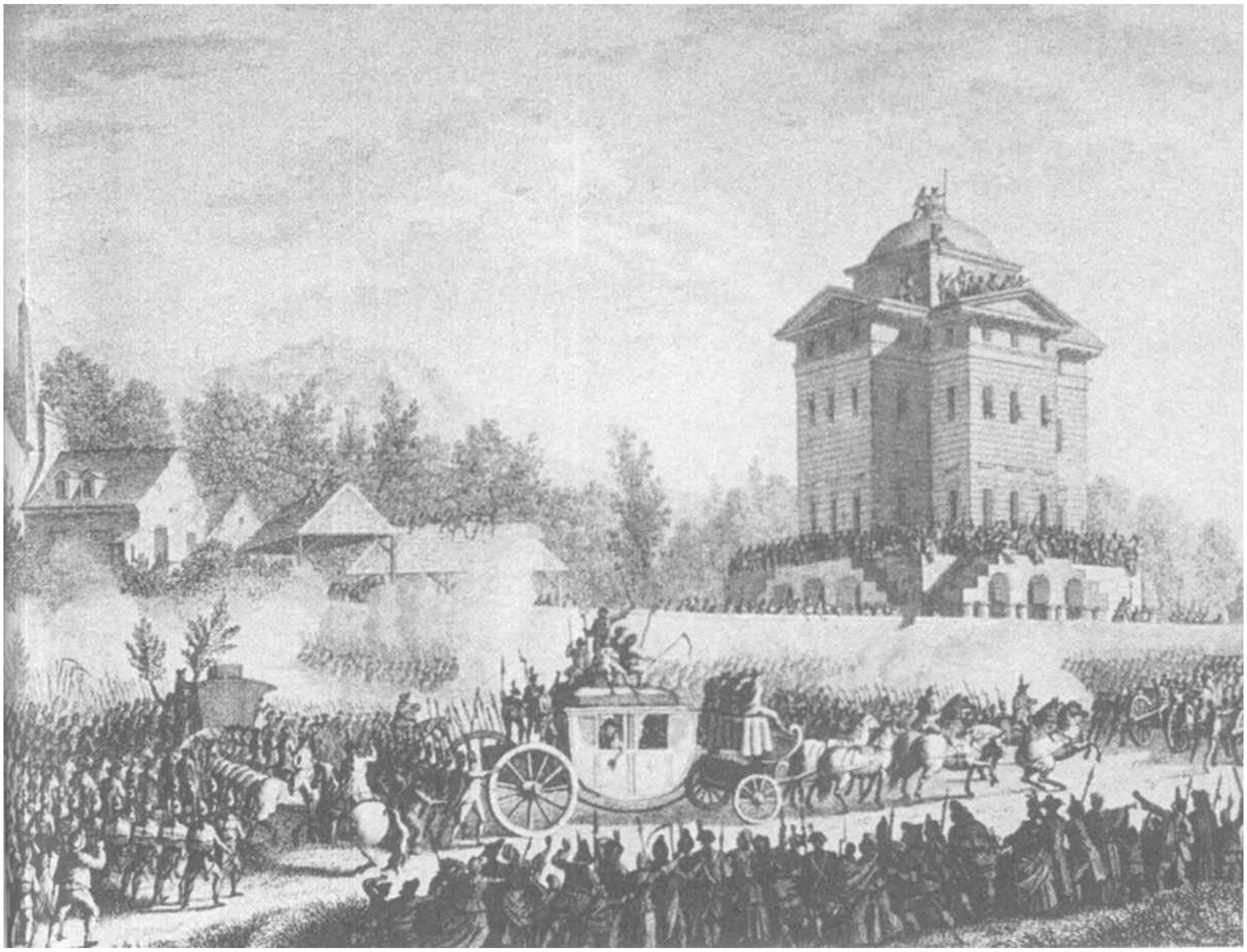
骚塞本人陪同马车一路走到了克莱蒙，然后回到瓦伦，以防布耶可能会攻击这里。车队接着顺着大路来到了圣梅内乌尔德，这里的市长同样发表了演说，并且德鲁埃和纪尧姆——他们在夜里回到了家——十分招摇地参加了游行。在城镇的西部住着一位当地的贵族达皮埃尔伯爵

（Dampierre），他目睹了市长在圣梅内乌尔德的演说之后，试图骑马接近大马车，跟国王一家交谈。自卫队队员推开他之后，他大吼着“国王万岁！”一边朝天开了几枪，然后骑马返回他的城堡。当地人早就十分仇恨这位伯爵，有人跟踪了他，开枪将他打下马，并在田野里杀死了他。不知道国王有没有看到这场残暴的屠杀，但是三位坐在车顶上的保镖惊恐地看到了这一切。[45]

在那一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国王一行终于到达了马恩河畔沙隆，他们已经差不多四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完全难以形容，”一个目击者这样说，“他们那筋疲力尽的样子。”[46] 但是国王他们知道，在这里可以暂时忘记压力和疲倦，好好休息几小时。市长和当地的官员在城门处迎接国王一行，并设宴款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在一个从前的地方官员的豪宅里住下。大约二十一年前，玛丽-安托瓦内特在从巴黎到奥地利旅行时，曾经在这所住宅里住过一个晚上。很明显这里的官员非常同情处在困境之中的国王。当天晚上甚至有几个人表示要帮助他逃亡，但是路易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人，所以这一计划也就流产了。第二天早晨，国王和王后参加了基督圣体节弥撒，但是仪式还没有完成，另一队刚从兰斯到达此地的国民自卫队就催促着他们赶紧出发了。有新的消息说，瓦伦和圣梅内乌尔德已经遭到了野蛮军队的洗劫焚烧。自卫队队员们坚持应该把国王尽快带回巴黎。[47]

在上午晚些时候，他们再次出发了，带着庞大的自卫队，艰难而缓慢地前行着。现在护送他们的差不多有一万五千到三万人，他们取道马恩河谷，而不是走逃亡那天晚上走的更加快捷的穿过蒙米拉伊的那条路。他们在埃佩尔奈（Eperney）停下来吃晚餐，但是街上爆发了一起骚乱，图尔泽夫人差点被拖进了人群之中，他们只得急急忙忙地再次上路。[48] 在接近早晨七点半的时候，他们正行进在开阔的乡间绕开河流，就在这时随从人员突然停住了，人群安静下来，停在前面的道路旁。巴黎的国民议会派出的三名代表已经抵达，正在步行接近他们。代

表的前面是国民议会的警卫。议会代表们已经得知国王在大约二十小时之前被拦在瓦伦，于是他们立刻派出了三名代表，这三人经过精挑细选，分别代表议会中不同的政治派别。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走在最前面，他是一名温和的雅各宾党人，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演说家。当年他只有二十九岁，而且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纪。在他后面的是杰罗姆·佩蒂翁（Jérôme Pétion），年纪略大一些，他是一位狂热的民主党人，也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和激进的雅各宾派的亲密伙伴；最后是玛丽-查理·德·拉杜尔-莫布尔（Marie-Charles de Latour-Maubourg），他是一位君主主义者，也是拉法耶特的朋友。在漫长的惊恐和不安之后，马车里的女人看到这些人出现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动。她们曾经如此鄙夷过这些人，但是他们现在几乎就是安全的象征。伊丽莎白公主握着代表们的手，恳求他们保护那三位保镖，最近一直有人威胁着要将他们处以私刑。在说了一些表示安慰的话之后，巴纳夫正式宣读了国民议会的命令，命令委托他们确保国王安全回到巴黎。他接着又爬上了大马车的车顶，在落日余晖鲜明的照耀下，再次给民众宣读了这一命令。这是法国大革命中另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它清晰地标志着主权已经从国王那里转移到了国家。[49]



《国王一家即将到达巴黎》　国王的大马车和保姆坐的小马车正在穿过勒鲁尔的海关大门，这里就在通向香榭丽舍大道的出口北边。蒙马特高地被描绘得高度夸张，呈现在背景处。

这三位代表由军官马蒂厄·杜马（Mathieu Dumas）陪同，他是一位温和的爱国者，也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老兵。杜马现在接管了国民自卫队的分遣队，他在规模巨大的队伍中重建了一些秩序。在把两个孩子移坐到女人们的膝头之后，巴纳夫和佩蒂翁挤着坐进了大马车，而个子更高的莫布尔跟保姆们一起坐进了双轮小马车。他们在小镇多尔芒（Dormans）过夜，直到午夜过后方才就寝。第二天，在穿过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的时候，杜马在桥梁那里使了一个计谋，使他们得以摆脱大部分庞杂散漫的随从人员。接下来他们很快到达了莫城

（Meaux），并在那里的主教宅邸中度过了6月24日的夜晚。但是在这一夜城里又聚集了更多的人，有自卫队队员也有围观群众，所以最后穿过夏日的热浪驶向巴黎的那一段旅程一如既往地缓慢而拥堵。佩蒂翁写道："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漫长而累人的一天。"[50]

当一行人穿过巴黎郊区的时候，他们的情绪明显变得积极起来。发生了几次针对大马车的集体攻击事件，或许主要是针对那几个保镖的。巴纳夫和佩蒂翁开始担心乘客们的安全，他们大声召唤自卫队队员们保护他们，这些队员中有些人是刚从巴黎赶到的。在他们终于到达城墙的时候，有两名军官受伤严重，而杜马几乎被推下了马背。拉法耶特将军带着数量庞大的一支骑兵分遣队在城墙那里迎接了他们。[51] 随从大军被引向了城市的外围，避开了工人阶级居住的社区，通过香榭丽舍大街从西北方向进城。整个巴黎都在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国王一起前进，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挤在大街上观看国王缓缓向前，还有上百人爬在树上和房顶上。坐在马车里的人看上去筋疲力尽、蓬头垢面。有人在为那三位代表以及德鲁埃和纪尧姆欢呼，还有从瓦伦一路长途跋涉过来的自卫队队员，他们在游行中占据了前方显眼的位置。但是更重要的是，人群默不作声并拒绝脱帽，明显表示出对国王的鄙视之情。类似的表示还有，有些国民自卫队的队员列队站在街道旁，上下颠倒地持着火枪，枪口指向地面。跟在外省地区不一样的是，在巴黎，传统的呼喊"国王万岁！"一声也没有响起。[52] 对于一向对民众的欢呼十分敏感的路易来说，这个时刻只能意味着巨大的伤感。



《国王一家回到杜伊勒里宫》　大马车穿过路易十五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正准备进入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几乎所有的围观者都没有脱帽，这明显表示出了对国王的斥责。注意右侧那个女人正在对面前脱帽的男人怒目而视。

在道路的尽头，他们穿过了巨大的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进入了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在宫殿入口处附近停住了。在当时的情形下，法纪已经差不多荡然无存，人群朝大马车奔涌而来，试图抓住那三名保镖。杜马和佩蒂翁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跟其他几名军官一起得以将这三个遭到痛打血流不止的人带到安全的地方。与此同时，国王一家很快地走下马车，毫发无损地进入杜伊勒里宫。仅仅在五天之前，他们还在希望能够永远地离开这里。[53]

事后调查

“多么奇怪的命运啊！”柯林林男爵曾经这样惊叹过。只要在死寂的黑夜里再走十五英里，往丹镇的方向前进一两个小时，国王一家就会得到布耶将军和他手下数百名骑兵的保护。从国王被抓住的那一刻起，参与并目睹了一路到瓦伦的逃亡过程的人，都在自省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到底该归咎给谁。甚至那些爱国者也在详细地思考，命运奇异的安排是怎样在法国国王接近逃亡成功的时候阻止了他，虽然逃亡失败对于这些爱国者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事实上，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都曾经在脑海中构建出许多的平行宇宙，如果路易真的成功抵达了蒙特梅迪，一切将会变得多么不同。如果杜伊勒里宫的那个侍女并没有开始疑心，从而导致国王一家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如果拉法耶特那天深夜没有到杜伊勒里宫跟路易闲聊；如果舒瓦瑟尔公爵能够在松韦斯尔附近的草地上多等上一个小时；如果德鲁埃在他的田地里多待上一会儿而不是那么快返回驿马站；如果驾车去克莱蒙的马车夫能够被说服或者被贿赂甚至是被逼迫着在瓦伦继续前进而不是坚持要换马，又将会发生什么？这一连串的“如果”可以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因为确实，在瓦伦发生的“事件”——像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那样——是由一些几乎不能确定的子事件构成的，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完全改变事情最终的走向。

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后退一步，观察那些独立的行动和反应的细枝末节，就可能会发现有两个主要的因素造成了发生在瓦伦的事件。第一个就是这整个冒险活动的中心人物——路易十六本人——的性格和行为。国王一惯的优柔寡断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对于整个

大革命的起源和走向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我们目前讨论的事件中，如果能尽早而坚定地决定逃亡，肯定会大大提高成功的几率。甚至是在1791年4月之后，路易似乎已经决定了要逃亡，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却依然被一再推迟，虽然所有的计划最迟在5月初就已经全部就位。行动只要推迟一天，这个复杂的密谋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事实上，王后的一位侍女确实在6月发现了这个计划。行动只要推迟一天，那些法国士兵——在爱国俱乐部那些日益强大的影响下——就更倾向于拒绝听令于他们的贵族军官，更可能会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拒绝接受的任何行动。在动身之前的几个月，布耶将军变得对他手下的军队越来越缺乏信任，对整个计划也越来越抱悲观态度。[54] 最终，他决定依靠那些外国军人，那些说德语的骑兵，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一直在观察他们行动的村民和市民的疑心。但是即使这样，逃亡计划还是有可能成功的，如果国王没有挑衅他的命运，一路上拉下马车窗的遮阳板，也没有随意地走出马车，公开出现在所有围观者面前的话。当然，这样的行为与国王未能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和广泛的诉求密切相关，他认为他所憎恶的大革命变革是由国民议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和他们对巴黎“乌合之众”的蛊惑控制而引起的。

但从这个意义上说，瓦伦事件失败的第二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在于大革命在法国人的态度和心理上引起的彻底转变。一种新的自信、自立，与整个国家而不仅仅是局部地区的认同感——这也是我们在小镇瓦伦观察到的转变——现在已经渗透到了大部分法国人之中。正是诸如此类的发展，从侧面解释了为何在圣梅内乌尔德和瓦伦这样的区区小镇，官员竟敢采取行动阻止国王。虽然德鲁埃和骚塞的个人行为不应被低估，但是如果没有市镇地方议会和全体市民的支持，这样的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些雇佣骑兵在逃亡发生之前的几天里不同寻常、难以解释的行为，以及人民对于带领这些军队的贵族军官的普遍怀疑，更加大大加强了他们支持这些行动的意愿。在国王的车队到达之前，圣梅内乌尔德

和克莱蒙的情况就已经接近发生叛乱的临界点。梅西-阿让特伊警告过国王夫妇，考虑到大革命发生后的新的心态，“每个村庄都会是你们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真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为何逃亡会失败，而是它怎能会如此接近成功。国王一家能够不受察觉地逃出杜伊勒里宫，从警觉而充满怀疑的巴黎成功离开，这堪称是惊人的成就。还有，他们顺着主干道一路顺利地逃到了离奥地利边境仅仅十几英里的地方，这一切都表明了布耶将军尤其是阿克塞尔·冯·费森出色的组织能力。他们齐心协力，差一点就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逃亡行动。

注释

[1] Madame Royale，in Weber，313-314；AN D XXIX bis 38，dos. 389；Bimbenet，44.

[2] Valory，257-259；Moustier，4；Bimbenet，92-128；Louis XVIII，40-41.

[3] Bimbenet，28-29，51，57-62；Moustier，6-7.

[4] Choiseul-Stainville，69-74；Aimond，*Enigme*， 56；Lenôre，270-276.

[5] Bimbenet，8-11，65-82.

[6] Aimond，*Enigme*， 57；Lafayette，3：77；Weber，325；*Almanach de la ville de Lyon*， xix.

[7] Tourzel，191-192；Weber，314-316. 根据某些说法，图尔泽夫人走出王宫的时候是跟麦尔登或费森，甚至可能是和王后本人在一起的；Lenôre，41-42。

[8] Choiseul-Stainville，75-77；Bimbenet，35-36，92-103；Tourzel，192；*AP* 27：553；Aimond，*Enigme*， 56-57.

[9] Tourzel，193-194；Choiseul-Stainville，78-79；Aimond，*Enigme*， 58；

Bimbenet，57-62.

[10] Bimbenet，61-62；Choiseul-Stainville，78-79.

[11] Bimbenet，8-12，36，51.

[12] Aimond，*Enigme*， 8-9.

[13] Valory，270；Bimbenet，82-92；*AP* 27：552-553；Vast，15；Arbellot and Lepetit，18.

[14] Aimond，*Enigme*， 13.从巴黎到瓦伦大约有146英里，他们一共花了20.5小时，即每小时7.1英里。考虑到路上一共停靠了19个驿马站，他们的时速大约是9.2英里。

[15] Fournel，356；Lacroix，128；Weber，316. Vast，24-25；Aimond，*Enigme*， 65-66，74.

[16] Tourzel，193-195；Weber，315；Moustier，9-11；Vast，1；Pétion，194.

[17] Bimbenet，65-82，92-103，115-128；Moustier，11；Aimond，*Enigme*， 64-65.

[18] Aimond，*Enigme*， 64-65，68-69；Vast，16-19，27，39-41.

[19] Weber，316；Aimond，*Enigme*， 74-76；Vast，41-43.

[20] Vast，62，67-69，72；Aimond，*Enigme*， 76-78；AN D XXIX bis 36（1），dos. 370.

[21] Tourzel，195-197；Valory，270；Vast，97-99；Aimond，*Enigme*， 79.

[22] Bouillé，256-257；Damas，209，212-213；Bouillé fils，79，86，122-129；Raigecourt，187-195；Bimbenet，238-239；Aimond，*Enigme*， 106-110.

[23] Bimbenet，177-178.

[24] Damas，107，210，214，218；Vast，175；Aimond，*Enigme*， 96.

[25] Bimbenet，183-185；Lagache，449-453；Buirette，546-550；Vast，101-107；Aimond，*Enigme*， 33，84-86.

[26] Choiseul-Stainville，80-84；Damas，233-234；Aimond，*Enigme*， 80-

81.

[27] Fersen，138；Choiseul-Stainville，80-84，109-110；Damas，233-234；Bouillé fils，95-98；Aimond，*Enigme*， 80-81.

[28] Damas，218-221；Bimbenet，183-185；Raigecourt，187-195；Aimond，*Enigme*， 108-110.

[29] Tourzel，197；Valory，270-274；Moustier，13；Lagache，451；Fournel，340-341；Buirette，547-548；Vast，107，111-118；Aimond，*Enigme*， 84-87.

[30] Laurent，248-249.

[31] *AP* 27：508；Buirette，547-548；Vast，111-119；Aimond，*Enigme*，87-91.

[32] Bimbenet，183-185；Lagache，452-453；AN D XXIX bis 37，dos. 386：report of municipality of Sainte-Menehould，July 28，1791；Buirette，547-553.

[33] Damas，221-229；Valory，276-277；Tourzel，196；Weber，316；Bimbenet，187-193；Lagache，453-454；Aimond，*Enigme*， 103.

[34] Weber，316.

[35] Valory，258，279-285；Moustier，15-18；Weber，316；*AP* 27：508-509；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17-318.

[36] Tourzel，198.

[37] Choiseul-Stainville，105-108；Damas，239；Tourzel，202；Campan，298-299；AD Ardennes，L 12 and 78；AN D XXIX bis，dos. 385；Fournel，326；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28；Aimond，*Enigme*， 156-159.

[38] Bouillé，241-246；Bouillé fils，122-135；Bimbenet，238-239；Planta de Wildenberg，444-446；Aimond，*Histoire de Varennes*， 328-329；Aimond，*Enigme*， 161-166.

[39] Fischbach，209.

[40] Valory，312；Pétion，197；Tourzel，209-210. On the weather：Guittard de Floriban，64-66.

[41] Moustier，26；Pétion，191-192；Buirette，555-556.

[42] Tourzel，203；Aimond，*Enigme*， 167-168；Buirette，555-556.

[43] Buirette，561-562；Nicolas，60-61.同时参见该卷第六章。

[44] Valory，295-296；Pétion，194；Dumas，1：497-499；Nicolas，61-62.

[45] Fischbach，87；Valory，298-299；Buirette，556-559；Lefebvre，“Le meurtre du comte de Dampierre，” 393-405.

[46] AD Marne，1 L 329：letter of municipality of Neuf-Bellay.

[47] Tourzel，204-205；Valory，300-306；Nicolas，60-62；Aimond，*Enigme*， 171-173.

[48] Tourzel，205-206；Gillet，37-42；Aimond，*Enigme*， 173-175.

[49] Dumas，1：489-490；Pétion，192；*AP* 27：428；Aimond，*Enigme*，175-176.

[50] Dumas，1：490-493；Pétion，193，201；Tourzel，206-211；Aimond，*Enigme* ，177-179.

[51] Dumas，1：500-502；Tourzel，211；Pétion，202.

[52] Pétion，202-203；Tourzel，211；Valory，312；Roger，71；Rabaut Saint-Etienne，*Pr écis*， 248.

[53] Valory，315-323；Moustier，52；Pétion，203-204；Dumas，1：503；Tourzel，212-215；*AP* 27：527-528；Aimond，*Enigme*， 179-180.

[54] Bouillé，220-222，225-226.

第四章　我们伟大的城市——巴黎

路易和他的家人在6月25日回到的这座城市，也将是他们最终被囚禁的城市，自身就是一个宇宙，跟这个王国中的其他城镇或地区有着天翻地覆的差别。巴黎当时有70万人口，是整个基督教世界中第二大的城市，也是当时全世界十个最大的城市之一。如果一个人爬上了巴黎圣母院的塔楼——这座大教堂位于这个大都市中心的塞纳河上的一座小岛上——他可能就会对这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复杂世界的非凡多样性有所了解。[1] 从这个有利的角度，一个观察者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巴黎的许多建筑名胜，早在18世纪就已经有大量游客蜂拥而至参观这些建筑：哥特式的司法大楼，就在从前的巴黎高等法院的西边；雄伟的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横跨河流，向北延伸而去；法兰西学院巴洛克式的圆屋顶就在沿着河边更向西一点的地方；就在它的对面，是卢浮宫巨大的右岸建筑，以及一路向西延伸的部分，即杜伊勒里宫。除了这些民用建筑的塔楼之外，天主教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修建了至少两百座各式尖顶和塔楼，其中有许多当时已经被大革命收为己用，一同被没收的还有许多神职人员的财产和收入。一般来说，在城市的西部和其他几个地方，游客也可以分辨出几个色调明显更白的社区，在绿色的植物中间点缀着较新的建筑。这里大概就是整个欧洲贵族家庭最集中的地区。尽管大革命已经将这些家庭从前享有的法律和政治特权扫荡一空，但是他们——与那些神职人员不同——巨额的财富和文化影响力大部分都保留了下来。

除了这些壮观的财富和权利纪念碑之外，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显得更加暗淡和俗丽，是一堆胡乱堆叠在一起的小而多层的建筑物，有

些摇摇欲坠，有些互相支撑在一起。在东部市郊可以看到巴黎特有的工人阶级的聚集区：特别是在圣安多万区，从现已不存的巴士底广场一路向东延伸到乡村；在圣马赛尔街区，这些聚集区沿着比较小的比弗尔河（Biévre River）蜿蜒而下，与从东南方向过来的塞纳河缠绕在一起。费森在6月21日清晨驾车带着国王一家离开这座城市时，曾经小心避开的正是这些地区。但是在城市的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的住宅，通常直接与宫殿和教堂毗邻。这里就是数量众多的巴黎平民的住宅，他们最近开始自称为“第三等级”。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些人，数量大约有十万，他们分散在城市各处，职业分别是政府工作人员、专业人士、商人、店主或者是熟练的工匠，过着舒适而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出生在城市，事实上全部的男人和大部分的女人都受过教育。此地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已经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有的中产阶级加起来都要多，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地革命领袖的核心力量。但是大部分巴黎人过的都是更加不稳定的生活。这些人是雇佣工人、商店售货员、洗衣女工、街头小贩、男仆、临时工和娼妓（据估计有大约4万人）——他们要么就业不稳定，要么失业、穷困潦倒。许多人都是移民，他们带着各式各样的穿着打扮和口音，来自这个王国的许多不同地区，甚至来自其他别的国家：一些有本钱和才能的人立刻找到工作，过上了稳定的生活；那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则漂浮在社会边缘，生活动荡而悲惨。如此数量众多的大人物和小人物、富有的人和赤贫的人、学问高深的人和文盲——以及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人——同时并存，这赋予了这个城市非常特殊的个性。事实上，塞巴斯蒂安·梅西埃（Sébastien Mercier），那位18世纪晚期的巴黎观察家，曾经恰如其分地将这个城市描述为“人类的大熔炉”。[2]

尽管国王更倾向于认为1789年以来巴黎的动荡不安是一小撮雅各宾派和捣乱分子造成的结果，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大革命对巴黎社会的

各个阶层都有影响。1790—1791年经过这座城市的外国游客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了这种转变的外在表现：街头随处可见有人评论政治，讨论甚至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几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戴着三色的爱国徽章或帽徽；宣传大革命的报纸和小册子到处售卖或是分发；在剧场和歌剧院的幕间休息期间，有人唱起了爱国歌曲。[3] 这种巴黎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大革命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与两年多之前对瓦伦的农民和市民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多不同。几乎在任何地方，国民议会都以人民、主权、和平等名义对旧制度的体系进行猛烈攻击，这鼓励着男男女女更加普遍地质疑权威和不公正。但是在巴黎，民主、和平等具有腐蚀性的逻辑迅速地将部分人推向了一个千禧年之愿，那就是对整个世界进行彻底的变革。

这种特殊的激进性，首先跟这座城市在18世纪曾被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战场的经历有关。法国最高法院反对君主制的财政和宗教政策的政治斗争，詹森教派的不同政见者反对天主教会的运动，以及启蒙主义哲学家反对教权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思想斗争，在巴黎，任何一个方面都比法国或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程度更甚。事实上，这座城市是举世公认的启蒙主义运动的首都，吸引了来自整个大西洋世界的知识分子来到它的沙龙、咖啡馆和编辑室。这些复杂而又经常互相冲突的运动影响了巴黎人的许多方面，有助于在这些不同寻常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巴黎人中间培养一种批判性的和独立思考的氛围。

但是巴黎的激进化也跟最近的事态发展有关。到1791年初，巴黎已经充斥着数十种日报和无数的不定期刊物，这些出版物几乎阐明了政治上的每一种立场。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区，辩论的基调和内容越来越受到一群极具天赋的激进作家的影响，比如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让-保罗·马拉（Jean - Paul Marat）、尼古拉·德·博内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路易丝·卡利奥（Louise Kéralio）和她的丈夫弗朗索瓦·罗伯（François Robert）——他提倡更广泛的民主和平等主义

原则。 [4] 法国的大部分报纸，无论是否激进，都对绝大多数的男男女女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他们很少接触印刷文字。然而，在巴黎，不仅人们的文字素养高得出奇，而且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有其他能够接触最新政治评论的途径。这座城市有七百多家咖啡馆，经常光顾的人会听到每天夜间都有人大声朗读各种报纸和小册子，并有自命的“首席演说家”对上面的文章发表评论，而这些人已经在这样的地方占据了主导地位。 [5] 另一些人则由游荡在大街上的数百名卖小册子和报纸的小贩提供消息——或者是错误的消息。这些小贩不断地大声喊着报刊上的头条消息，或者对这些消息发表自己耸人听闻的解释，以期多卖出几份报纸。在巴黎的威廉·肖特（William Short），托马斯·杰斐逊的受保护者兼美国众议员，非常惊讶于这些流行的报纸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些报纸，”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说道，“被沿街兜售，卖报人在巴黎的每个角落大声叫卖，将报纸廉价出售或者是赠送给那些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的人。”梅西埃对这些卖报人的潜在影响力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文盲。“简单的立法提案变成了正式的法令，整个社区都被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激怒。在被这些小贩的虚假宣传误导了一千次之后，老百姓还是依然相信他们。”[6]

最后，自从大革命开始以来，巴黎的激进主义就受到了政治团体异常扩张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地的爱国者俱乐部在瓦伦及其周边地区产生的影响。在巴黎，在国王逃亡的那个时期，至少存在五十个这样的社团。 [7] 这些社团中有少部分——像外省的大多数俱乐部那样——是相对精英的，它们的会费过高，使得会员基本上局限在中上层阶级。著名的雅各宾俱乐部就是这样，它位于离国民议会和杜伊勒里宫不远的塞纳河右岸，整个王国的“宪法之友”就是脱胎于这个俱乐部。然而，巴黎的许多俱乐部都是为了吸引地位更加低微的社会成员而设立的，这些人是国民议会通过财产资格限制而被排除在投票和办公场所之外的“消极公民”。

在招募中下层阶级参与政治活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巴黎的团体比“人权之友社”（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Rights of Man，在历史上更知名的称呼是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更加积极了。他们在塞纳河左岸拉丁区附近、出版区的中心集会，成员由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像德穆兰、马拉、罗伯和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那样的人——还有当地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个规模可观的分遣队，其中有男有女。从一开始，科德利埃俱乐部开展的日程就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促进民主和平等的扩展，捍卫普通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根除那些大多数成员认为对大革命造成威胁的阴谋。[8] 但是在1790—1791年，巴黎出现了三十多个民主协会团体“博爱社团”（fraternal society），这个俱乐部只是其中资格最老而最著名的一个。其中一些团体是围绕着渴望在这个城市的特定社区发挥领导作用的个人而发起的。而另外一些——比如贫困人群博爱社团——是在1791年年初由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自己发起的，目的是动员大众支持他们的平等主义政治。所有的博爱社团都吁求所有人都应该具有选举权并有资格担任公职，而不仅仅是那些有财产的人。有些团体还允许妇女参加，这些妇女呼吁更普遍地增强女性爱国人士的地位和作用。1791年春天，弗朗索瓦·罗伯和科德利埃俱乐部试图将这些团体的活动统一在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协调之下。由此，人权之友社想要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个以巴黎为根据地的政治俱乐部网络，跟雅各宾派的全国性网络非常类似。[9]

第二套城市协会系统围绕着巴黎的四十八个新区（sections）发展起来。在1790年春，新区取代了过去的（旧）区（district），被设计成选举的单位，用于定期选拔官员。但是直到1791年年初，他们都在几乎连续不断地开会，自以为控制了一系列的社区事务，并经常对当天的政治事件发表意见。虽然会员仅限于男性“积极公民”，但是领导层与当地的社区联系密切，这赋予了他们某种草根性的特质。事实上，许多有大量工人阶级选民的区域都采取了平等主义和民主政治的立场，跟科德利

埃俱乐部和各个博爱社团的立场类似。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在他们开始互相交流并举行联合会议来协调政策后变得更加强大。到1791年春，各个区和博爱社团都成为越来越独立于国民议会和普通的巴黎市政府的影响机构。[10]

在国王逃亡之前的几个月里，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使得巴黎的社区变得更加紧张和疑心重重。整个冬天和春天，工人们的罢工和其他集体行动，使得这座城市陷入了几乎是持续性的混乱之中。男女工人的生活部分地受到了物价飞涨的影响，而物价上涨是由于政府大量印发纸币而引起的。然而，动乱也可能与革命过程本身有关，因为熟练的工人们将同样的平等主义逻辑应用于劳动制度，而其他人用这样的劳动制度对抗政治和社会制度。1791年3月，国民议会正式废除了行会制度，这使得许多熟练工人受到了鼓舞。行会制度曾经给工匠大师赋予了许多权力。然而，在国王逃亡行动的前几天，议会通过了一项对工人们十分不利的法令，这就是著名的勒夏普利埃法（Le Chapelier Law），这项法令宣告工人协会和集体谈判都是非法行为。[11]

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也同样因持续不断流传的反革命阴谋的谣言而感到不安。人民的恐惧被已经移民的贵族咆哮不停的声明所引发，他们威胁要从莱茵河的对岸入侵，也被大革命头两年里孵化出的那些十分真实、广为人知的阴谋所引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贵族人数众多，他们中的许多都拥有自己的保守主义俱乐部和出版社，与国民议会中本来就有的保守少数派紧密相连，这更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1790年年底成立了一个君主制俱乐部，其成员主要来自贵族和神职人员，这似乎是一个阴谋，试图恢复旧制度的所有弊端。也许更令人不安的是教士民事组织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和要求神职人员宣誓所引起的宗教分裂，在首都及其郊区，大约有34%的教区神职人员拒绝了宣誓。就像对于瓦伦的人来说那样，对于巴黎人，“不听话的”神职人员成为潜伏在他们中间的反对大革命力量的可见象征。对于这些神职人员或贵族筹划

的阴谋的恐惧，是整个冬天和春天巴黎骚乱的主要原因。[12]

控制这个紧张而动荡的城市的责任落在了市政的两个关键人物身上，他们都是在1789年7月由国民议会自身选出来的：市长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 Bailly）以及国民自卫队指挥官拉法耶特侯爵。巴伊是享有盛名的天文学家、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成员，也曾经是伏尔泰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巴伊作为国民议会特别有能力的第一任主席已经赢得了政治上的名望。而侯爵就相对要年轻得多——在瓦伦事件发生时只有三十三岁——他为人所知不仅是因为在美国革命中的功绩，也因为他在大革命前夕就参与了一系列自由主义事业。1791年，巴伊和拉法耶特手下有超过5万名国民自卫队队员可供调遣。这些兵力中大约有1万人（其中大多数之前是军人）是在营房中永久性服役、领工资和生活的。其余的是自愿的公民士兵，只有在轮换或紧急情况下才上岗。因为志愿者们需要自己购买制服，并且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少量的训练，所以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中产阶级。[13] 纵然总的兵力看上去数量惊人，而且比旧制度体制下存在的任何东西规模都要大，但是它也不是没有自身的问题。困扰着军队的不听领袖指挥这一问题，也同样对国民自卫队产生了影响。4月18日，一些自卫队的分遣队队员拒绝国王一家离开杜伊勒里宫——即使有拉法耶特的正式命令——正反映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4月18日的事件之后，将军得到了自由地改革部队的权利，他还加强了相关方面的纪律，要开除不听命令的自卫队队员。[14]

1791年上半年，自卫队一直处于活跃状态，每天都要调停各种工人抗议活动、市场争斗，以及反对神职人员或者贵族的暴乱，据传闻说后者正在策划反对大革命的活动和内战。巴黎的观察者和外国游客都被无休止的混乱、始终存在的威胁和不断攻击这座城市的暴力行为所困扰，而2月28日和4月18日的暴力事件仅仅是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每天都有骚动发生，”英国特工威廉·迈尔斯（William Miles）写道，拉法耶特和他的下属“像许多小邮差一样不停地到处跑”。英国大使乔治·格兰

威尔·高尔伯爵（George Granville Gower）汇报称“这个国家在绝对的无政府状态下吃力地运转着”。威廉·肖特认为，无休止的骚乱“给巴黎社会带来了一种阴暗和焦虑，使得它的居民生活得极端痛苦”。上了年纪的巴黎市民吉塔尔·德·弗洛里班（Guittard de Floriban）也有同样的感觉。“难道我们就不能快乐地，”他恳求道，“简简单单地和平相处吗？所有这些暴力让我感到不知所措和沮丧。”[15] 在瓦伦事件发生前夕，巴黎早已处在爆发的边缘，过一天算一天。

不忠的路易

几个月以来，巴黎一直流传着谣言，说有人要密谋绑架国王。一名代理人早在1月就报告了有这样一种威胁，2月乃至整个春天，报纸上开始刊登类似的报道。尽管这些阴谋的细节一般都是相当模糊的，但是通常的假设是会有人——外国势力、“那些贵族”甚至可能是王后——将会不顾国王本人的意愿，强行绑架他。[16] 在逃亡的前夕，激进的记者斯坦尼斯拉·弗隆（Stanislas Fréron）报道称，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事实上曾经试图逃走。马拉发表文章，将这个故事含糊不清地演绎了一番，点缀以他一贯的末日预言。在国王的一名仆人告发之后，拉法耶特和他的副官们增加了王宫的守卫。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个城市里已经有太多的谣言，然而却没有一个成真，所以没人把这个新的告发事件太当回事。[17]

无论如何，在6月21日早晨七点，杜伊勒里宫的仆人们拉开国王的帘子，发现床上居然没有人，他们全都惊呆了。起初，他们希望国王只是去了王后的房间，但是当他们发现她的床根本没有人睡过，并且孩子们和伊丽莎白公主也不见了之后，整个宫殿就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仆人很快地换上了便服，逃之夭夭，担心他们会被指控为同谋。[18] 当拉法耶特和巴伊到达的时候（另有传言泄露消息说他们起初根本就不能相信这件事），消息已经传出了杜伊勒里宫，并以惊人的速度沿着街道四处流传开来。[19] 一位巴黎人回忆那次经历：“我听到有轰鸣声渐渐接近，类似于风暴中波浪发出的声音。越接近，那声音就越大，并且以更大的力量掠过。”年轻的治安官菲利克斯·福尔孔（Félix Faulcon）是来自普瓦捷市（Poitiers）的代理人，他在自己的房间写东西时听到了街上

和隔壁房子里传来的叫喊声，接着就捕捉到了“国王不见了”这几个字眼。另一名代理人，律师兼历史学家安托万·蒂博多（Antoine Thibaudeau），是被塞纳河附近鸣响示警的大炮声惊醒的。

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守在窗前，从街对面的房子或者楼下的人那里打听消息。在八时到九时之间，随着消息的传播，每个教区都响起了教堂的钟声。当不祥的鼓声开始传递集结的命令时，人们边穿制服边冲过街道，加入他们的国民自卫队队伍。[20]

许多人匆匆赶到杜伊勒里宫去亲眼看热闹。八点半的时候，一大群人冲进大门，爬上了通往王室房间的楼梯，对那些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警卫和仆人们发出恐吓和辱骂。指派给国王妹妹的士兵被推搡到墙边并遭到威胁，直到人们看到一扇新发现的修建在书架里的秘门。有报道称，人们毁坏了王室的肖像画和王后房间里的大量家具。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呆呆地聚在一起，谈着闲话。当市政官员抵达、敦促需要封锁房屋以保存证据时，人群顿时就散开了。[21] 在其他地方，巴伊和拉法耶特在试图前往市政厅的时候被充满敌意的人群包围了，后者认为他俩应该对逃亡事件负责。但是将军表现得坦然自若，在只有很少几名卫兵陪同的情况下带领市长走到了安全地区。但是，杜伊勒里宫的夜间守卫指挥官奥蒙公爵（Aumont）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被一大群人逼到走投无路，并且遭到了殴打，衣服也被撕破，最终才被一队民兵救了出来。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区，有谣言开始传播，说监狱里关押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逃脱出来袭击人民，因此地方军队必须马上进城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大屠杀。[22]



《在得知国王出走之后，人们纷纷赶到杜伊勒里宫》　**6**月**21**日上午，市民和国民自卫队穿过新桥，往卢浮宫的方向走去。在右边可以看到圣热尔曼-奥赛尔教堂的塔楼。

但是总体来说，在最初的震惊和激动过后，整个城市都还算平静。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对这种比较温和的反应发表了评论。“这里非常的平静，”西班牙大使写道，“还有一种麻木的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得了中

风一样。”报纸《喋喋不休》（*Le babillard* ）的自由记者写道：“巴黎从未如此深受打击又这样保持平静。尤其是普通民众，他们依然保持着秩序。”年轻的德国作家康拉德-恩格尔贝特·厄斯纳对大街上坚定和乐观主义的氛围感到惊讶：“人们走来走去，充满了好奇心，但是没有任何破坏或者混乱。愤怒与其说是通过痛苦，不如说是在有趣的玩笑中表现出来的。人们互相询问，跟从未见过的人交谈，讨论，说笑。这件大事影响了整个社会，将上百万人从日常生活中撕扯出来，他们不再关心那些琐碎小事，同时也更加接近彼此。”[23] 在短期之内，暴露出来的阴谋比之前的谣言和对阴谋的恐惧破坏性要小得多。

很明显，民众如此克制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市政当局立即采取了有力的行动。在当天上午十点，巴伊就匆忙召集了市议会，在接下去的六天里，他们都会夜以继日地连续开会。[24] 议员们很快就跟国民议会确定了联络人，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派出官员来往于彼此之间。他们还试图跟社区委员会建立密切的联系，邀请每一个委员会都在市政厅派出两名代表，以确保市议会跟地方机构的沟通。通过这种方式，议会为了应对此次危机而颁布的新法令很快就通过街头巷尾的喇叭传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另外，巴伊和市议会议员们还迅速调查了那些哪怕十分牵强的指控——关于可能的越狱或者是有“敌人”准备从周围的山上轰击这座城市。因此，恐慌一旦出现，就很快地被消除了。[25]

在市长联系他们之前，许多区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许多地方碰巧正是要在那一天早晨开会，选举新的立法机关。当发生紧急状况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立刻宣布召开常设会议，并动员他们所在社区的国民自卫队。这是第一次，那些卑微的“消极公民”——因为没有足够的财产而无法获得投票权的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居民中有人闯入了政府的弹药库，为自己夺取武器。有些区则更进一步，声称已经完全控制了当地的民兵，拒绝拉法耶特的监管，并怀疑他参与了国王的失踪事件。将军和市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对各区的激进主义持怀疑态度，

这一次他们终于有机会重申他们对所有警卫力量的控制，阻挠独立的准军事组织的建立。但是在国家危机期间，市政当局只能容忍各区的常设会议，并默认其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单位的主张。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先例。在瓦伦事件发生之后的一年内，区将会演变成激进的武装“无套裤汉”的主要制度基础，而“无套裤汉”又将成为推翻国王的重要力量，也将在巴黎的恐怖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26]

对大革命来说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民众对待国王态度的巨大转变。在大革命的头两年里，路易在绝大多数巴黎人的心目中都保持着非常正面的形象，无论他们属于哪种政治派别。当年2月，当国王的几位年长的姑妈移民去罗马之后，巴黎市场区的博爱社团的几位女性成员写信给路易：“我们爱你，将你视作我们敬爱的父亲。我们想要告诉你，你的家人抛弃了你，我们为此感到多么伤心。”一个月之后，当路易从一次严重的感冒和喉咙疼痛中恢复时，整个巴黎都流露出了非比寻常的情感和善意。巴黎圣母院的感恩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民众的欣喜之情，在此活动中鸣响了礼炮，并且用一种特殊的灯光整夜照亮了城市。6月21日之前最严重的敌对情绪来源于国王拒绝听“遵从宪法的”神职人员做弥撒。这件事引起的严重的不满情绪直接导致了4月18日的事件，并且从那之后，激进的媒体对待路易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但是，国王似乎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改正（但是，正如我们所知，这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的逃亡计划）。大部分巴黎人已经准备引述那句经过了时间考验的老话“好国王听了坏建议”，并打算将他的“错误”归咎于来自贵族或者是王后的影响。[27]

但是这一切都被国王的逃亡改变了。使巴黎人目瞪口呆的不仅是路易的离开，还有他留下的宣布与大革命断绝关系的信，声明他之前对新法律的默许是被迫的。厄斯纳为他看到的聚集在街上阅读、讨论国王信件副本的人的数量所震惊。在此，在国王亲手写下的便条中，他明确表示，这次逃亡活动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受了什么顾问的影响。

现在真相大白，路易对法国人说了谎。他在一年之前刚刚庄严地许下的誓言——在上帝面前宣誓国家会支持宪法——原来是不真诚的。[28]

事实上，在6月21日之后，已经很难找到哪怕一张报纸——除了那些最保守的保王党——愿意对国王发表任何正面的评价。《巴黎编年史》（*The Chronique de Paris* ）提到了国王的“背信弃义”，在策划逃亡行动时的“残暴而黑暗的伪装”。一向态度温和的《佩尔勒日报》（*Journal de Perlet* ）对比了国王之前的声明和他的最新宣言。编辑质问道：“人们还如何能够相信国王说的任何事情？”[29] 严肃的反应，名副其实的潮水般的嘲讽，以及对于国王的反感和厌恶，给当时的旁观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报道甚至开始评论国王的怯懦行为，他放弃了自己的朝臣和保王党，把他们都丢给了愤怒的民众。在洪水般泛滥的文章和小册子里——在之后的三个星期里出版了一百多种——他被冠以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叛国者”“骗子”“懦夫”，或者仅仅是“虚伪的路易”。“试着想想你所能想到的最侮辱人的措辞，”巴黎的学者兼书商尼古拉·吕奥（Nicolas Ruault）这样写道，“就是这样你也还是低估了当时实际说出的那些话。”瑞士作家埃蒂安·杜蒙（Etienne Dumont）说：“没有一种耻辱的绰号，没有被人毫不留情地反复提起，伴着冷血的嘲笑。”[30]



《被带回猪窝的猪一家》　这是返回杜伊勒里宫的另一个视角——只在右侧的远处可以隐约看出。变形扭曲的国王一家正坐在玩具马车里前行。

巴黎的激进分子们，本身就已经对阴谋诡计过分敏感，此时更是感到特别烦躁不安，简直是遭到了侮辱。他们怎么能如此盲目，被瞒天过海，对这么一个史上最大的阴谋视而不见？“我们相信了国王的甜言蜜语。”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抗议道，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作家，也是巴黎的一位政治人物。“我们被蒙骗了。曾经仅仅质疑国王的承诺都像是罪恶。但是现在这位‘爱国的’国王逃走了……撕下了他的伪装。”人们不停地将国王称作“背誓者”，这是指他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威廉·肖特发现每个巴黎人都这样称呼他：“叛国者路易、不忠的路易。”“他逃走了，”《巴黎编年史》这样写道，“背弃了他所有的不忠实的承诺。他挑选的逃亡时机几乎就是在起誓那天的一周年。他在天地和国家面前发誓，而正是这个国家曾经原谅了他早先所有的错误。”方济各会的修士改编了伏尔泰的著名戏剧《布鲁图斯》（*Brutus*

）中的一段：

请记住这一天，在奥古斯塔的祭坛前
路易发誓说他将会永远忠实而公正。
但是这就是人民和君主之间的纽带啊
当他背叛了自己的誓言，也就割裂了我们。[31]

当时社会上对国王的愤怒之情，最明显的表现体现在对待国王象征的方式上。在瓦伦事件发生之前，路易的小画像几乎悬挂在巴黎每个家庭和店铺的墙壁上。但是现在，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画像就都被摘下来了，其中很多甚至毫不掩饰地被扔进了垃圾堆。[32] 事实上，国王的肖像经历了一种惊人的变型。总的来说，他被画成了一种动物，大部分情形下是一头猪。这明显地暗示他有暴饮暴食的毛病——这曾经被看成是一种简直讨人喜爱的特质，现在却被描绘得令人厌恶。从那之后的好几个星期，“猪国王”无处不在，出现在报纸上、小册子上、招贴画和雕像上。经常出现的是猪的一家：一个猪王后和形态不一的其他王室猪成员，陪伴着像猪一般的路易。在逃亡发生之后不久，有人甚至在杜伊勒里宫的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头很大的猪背信弃义逃走了。如果有人找到了他，请速将他还给他的钢笔，将会提供一点微薄的报酬”[33]。

“无套裤汉”的诞生

6月22日深夜，巴黎人得到了失踪的国王将要回到住所的消息。在大约十时三十分的时候，差不多在二十四小时之前从瓦伦派来的理发师芒然（Mangin）终于到达了巴黎。在骑马穿过街道的时候，他高喊着：“国王找到了！国王已经被拦下来了！”在长途骑行之后，他满面尘土，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交给国民议会一张书面报告，并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了在他的家乡发生的事情，他的描述多少经过了篡改，也并不十分准确。许多巴黎人跟着他进了国民议会，接着又冲出去将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朋友们听，这就进一步歪曲了原本的叙述。但是大家依然领会到了抓捕行动的精髓，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大部分人那个时候已经入睡了，但是纷纷被喧哗声惊起，冲到窗边乃至街头，急切地询问事情的细节。接下来的一整夜，人们都在思考这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可能的走向。他们都曾以为那时国王一家肯定已经逃到了国外，马上就要宣布开战了。在洛林地区一个小镇抓住国王显得简直不可思议，这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欢喜、自信和力量。这再一次证明了命运，也许就是上帝本身，确实是站在大革命这一边的。[34]

碰巧的是，第二天就是圣体节（Corpus Christi），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圣餐礼仪式而举办的，也是天主教礼拜仪式上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为此人们已经提前计划了好几周——像往常每年这个时候一样——抬着圣体穿行在这个城市的五十二个教区里，穿过装饰着五颜六色的挂毯、鲜花和其他装饰的街道。人们将会唱起宗教赞美诗；国民自卫队的游行队伍将会走在神职人员的身后，接着是各个工人团体的宗教博爱社团，手中高举着他们的旗帜。夜里将会有篝火和焰火，还会有一场名副其实

的狂欢。[35]

但是目前，庆祝活动已经转变成了全市范围的庆祝国王被俘的活动。在所有的游行队伍中，最壮观的是围绕着圣热尔曼-奥赛尔教堂的游行。这座教堂是一座哥特式建筑，位于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官方教区东侧。在最初的设想中，游行队伍包括国王和他的家人，以及一个人数众多的国民议会代表团，还有几百名来自国民自卫队的精英，由拉法耶特将军亲自率领。但是随着国王的失踪以及他被捕的消息，传统的宗教音乐有很大一部分被一批爱国歌曲所取代了。旁观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首充满活力和乐观的流行歌曲，它一遍又一遍地在整个城市里响起："啊，一切都会好，一切都会好的！"（Ah，ça ira！　a ira！　a ira！）当时在现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爱国神父托马·兰代（Thomas Lindet）向这位不知名的作曲家表示祝贺，"因为他帮助法国人激发了勇气，重新点燃了他们天性中的热情"。也没有任何人忽略了此事的象征意义，即在游行队伍中代替了失踪国王位置的，是国民议会的代表——国王本人仍在坐在马车里，在返回巴黎的半途中，没准正走在香槟区的什么地方。一份报纸指出，国民议会代表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一定的胜利。热烈的掌声和幸福的呼喊声跟国民自卫队的音乐声混合在一起"[36]。

不知道是事先计划好的还是即兴之举，很多跟在国民议会代表身后游行的自卫队队员跟随代表返回会议大厅，要求也允许他们宣誓效忠于宪法，而就在一天前，议会刚要求所有的军人代表执行过同样的宣誓。短暂的晚餐时间过后，全城的自卫队队员都出现在大厅里，同样要求宣誓。这一事件可能部分是由拉法耶特策划的，在他未能成功阻止国王逃亡之后，他急于想重新获得爱国者们的好评。[37] 但是将军并没有料到事件后来非同凡响的发展。就像在当天的早些时候重组他们的游行队伍那样——将一种宗教行动转化成政治行动——来自整个巴黎的普通市民穿过越来越浓的暮色，向议会大厅前进。他们要么跟邻居结伴，要么跟

工人博爱社团的伙伴一起，要求也同样允许他们宣誓。音乐家们在大厅右侧空空荡荡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那里理论上是给保守派和贵族代表准备的，但是通常他们都不会出现。乐队又再一次奏响了“一切都会好”的曲调，还有各种各样的爱国歌曲。一队又一队的市民穿过烛光照亮的大厅，从一扇门进去，又从另一扇门出来，他们跟着歌曲的曲调一起唱着，在经过议会主席的面前时举起手，高喊着“我宣誓！”他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到达大厅时依然穿着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奇装异服。这里有穿着亮蓝色或绿色白色相间制服的自卫队队员，还有穿着各式朴素的中产阶级服装的男人们，他们穿着短裤、带搭扣的鞋子，戴着三角帽。但是这里也有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妇女们穿着围裙、戴着帽子，男人们穿着工人的长裤——他们现在被称作“无套裤汉”。他们六个人排成一排穿过大厅，有屠夫、煤矿工人和卖鱼的女人，面包师的长矛尖上挑着面包，来自中央市场的矮壮的搬运工带着大大的圆帽子——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有些女人在宣誓时高高举起手中的婴儿，仿佛下一代人也包括在这次效忠国家的共同宣誓活动中。行进的节奏很快，但也至少持续了两个小时。吉塔尔（Guittard）估计有超过15 000人，其他人觉得更有可能是50　000人。平民人数众多的东部郊区，即圣安多万和圣马赛尔尤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玛丽-让娜·罗兰当时三十七岁，是一位地方官员的妻子，也是一位热情的激进革命者，她声称几乎整个圣安多万的民众都出动了，队伍穿过城市的一端，几乎都延伸到了两英里之外的圣安多万区。[38]

在长时间的不确定和恐惧之后，这个多彩的节日夜晚标志着紧张情绪的释放，似乎也增强了一种团结和自信的新意识。无疑地，部分由博爱社团和更加激进的区动员起来之后，普通民众也开始具有了一种初步的政治意识。有些人扛着写有“不自由，毋宁死”字样的旗帜，其他人续写了“一定会胜利”的歌词，内容是要将贵族和国王送下地狱。虽然总体来说他们的效忠行为是由国民议会操纵的，但是他们也清楚地表明了自

己的态度，即如果国民议会的决定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是绝不会屈从的。“好代表们长命百岁！”有人这样高喊着，“但是其他人就当心点儿罢！”[39] 另外，虽然大家的情绪大都非常愉快，但是他们依然带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怪武器，从镰刀到干草叉，从棍棒到长矛。许多长矛上戴着明亮的红色“自由帽”——这种帽子现在是爱国工人最喜爱的帽子。但是帽子的下面就是锋利的尖刺和钩子，这些东西最初是设计用来刺杀骑兵的马匹的，但是最近上面挑着的，往往是在近来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的头颅。几乎可以确定，有些长矛是在最近两天从地方军械库中非法夺取来的。 [40] 自从令人痛心的1789年“十月事件”过后，这样的武器是第一次出现在议会中。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个非同寻常的夜间游行标志着无套裤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良好组织的政治力量。在不久后的将来，这就会是国民议会和整个法国都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一种力量。

国王不是必需的

在过去的一千多年时间里，巴黎人总是拥有一位国王。按照这个理论，每当有一位国王去世，另一位国王，即前国王最亲近的男性继承人就会立刻出现，夺走王权——“国王去世了；新国王万岁！”——即使这里的新国王仅仅是个孩子，而王权要由其他人代理。但是现在，对于数目众多的巴黎人来说，王权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了。当路易从瓦伦被带回巴黎，穿过城市的街道，重新进驻杜伊勒里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疑惑，即君主乃至于君主制度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书商尼古拉·吕奥在给他兄弟的一封信中审时度势：“我们必须决定该拿这个国王怎么办，现在他只是名义上的国王了。这个问题极度微妙，也非常尴尬。”[41] 在巴黎的每个人都开始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应该继续让路易当国王，但他也只是个傀儡；他应该被剥夺一切权利，直到宪法完成实施，然后再将王位交还给他，他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放弃；他应该被流放，离开巴黎乃至离开这个国家；他应该因叛国罪被投入监狱并得到审判；他应该被废黜，王权应该交给年幼的王太子，后者应该按照大革命的理念悉心教育。但是巴黎人自从国王逃走的那一天起就处在困惑之中，有些甚至开始走得更远。他们扪心自问，是否君主制本身真的不可或缺，如果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法国人独立地在一个没有国王的共和国生活。

当然，这并不是巴黎人第一次提到“共和国”这个词。在大约一年之前，未来的议会成员路易·拉维贡特里（Louis Lavicomterie）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人民和国王”的文章，在其中公开提倡一种没有君主的政府制度。小说家兼历史学家路易丝·卡利奥是一位激进的出版商，她很快

就在她的报纸《国家信使》（*Mercure Nationale* ）中谈到了这种观点。这一观念后来被她的丈夫弗朗索瓦·罗伯在年底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更进一步地阐明。1791年春天，共和政治的观念已经在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风行一时。虽然在这些讨论中，总是会有一些推测性和学术性的成分。激进分子的首要任务依然是要向所有人敞开投票权，无论他们的收入如何。而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法国政府的想法，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年轻的沙特尔公爵（Chartres）——未来的路易·菲利普，1830年的“法国国王”——描述了爱国观众观看伏尔泰的戏剧《布鲁图斯》时的反应。当一名演员念出台词“噢，要自由而不要国王”时，只有很少的人鼓掌，大部分人开始高呼“国王万岁！”同时“第三声部”也响了起来，喊出“国家万岁，法律万岁，国王万岁！”[42]


D'or
Loterie Royale De
ON
LATI
RE
DEM
AIN

《覆盖王室标志的巴黎人》　在国王逃亡之后的几天里，人们把彩票办公室的“王室”字样和金冠酒店上的王冠涂黑，并摘下公证人办公室悬挂的鸢尾花纹章。

但是瓦伦逃亡事件使得大部分巴黎人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消息发布的几小时之内，一场针对王室象征的普遍攻势就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任何带有一点国王或者王权意味的东西都被移除、被扯下、被遮盖，或者被污损。以任何形式提到王室的机构——比如王后旅馆或者王冠公牛饭店——都会发现他们的招牌被移除并且被毁掉了。公共建筑或者公证处的波旁家族纹章被一种煤烟和油的混合物涂成了黑色。人们催促士兵和警卫从他们的制服上拿下代表王室的鸢尾花徽章；国王的半身胸像被推倒，其他更大的不能移动的王室雕像被盖上了黑布；甚至是像“暹罗国王路”这样的街道也被重新命名，改成了更有爱国气氛的名字。[43] 玛丽-让娜·罗兰看到这种新观念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这个城市的大众街区，她因此感到十分惊喜。“大众对此持有一种健康而正确的理解，”她在6月22日这样写道，“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说起‘共和国’这个词。”[44]

除了平民百姓自发地对君主制的象征进行攻击之外，还有大量的巴黎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和激进报纸的编辑公开地表示拥护共和国。在短短几天之内，几名最先进的记者已经公开声明支持这个提议。布里索（Brissot）在猛烈抨击路易十六的时候特别强调，后者“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了他的王冠。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把一名暴君转变成一种自由的事业”。《真理之友》（*Friends of Truth* ）的作者兼创始人尼古拉·德·博内维尔开始为创建共和国而进行军事行动。他和他的朋友，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孔多塞侯爵（Condorcet）和盎格鲁—美国自由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创办了一份致力于共和理想的报纸。“只有当6月21日事件发生的时候，”西耶斯修士（Sieyès）在写给潘恩的信中说

道，“我们才突然看到了共和派的出现。”[45]

从一开始，这一党派最具效率、最有活力的领导力量来自科德利埃俱乐部（Cordeliers Club），其成员包括许多非常积极地投身于新岗位的记者。就在国王逃走的当天，俱乐部就决心对整个君主立宪制的构想提出质疑，这一构想是国民议会在两年前详细制订的。俱乐部成员们似乎采取了一种双重战略。一方面，他们敦促代表们重新起草宪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除非经过适当的通知和教育，大部分法国市民可能会反对这样的措施，因此成员们支持举行一场全民公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场普遍的辩论。他们在向大会提交的正式请愿书中这样写道：“立法者，你再也不能指望去激励那些根本不信赖一个被称为‘国王’的国家公务人员的群众。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我们以祖国的名义恳求你，要么立刻宣布法国不再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或者，至少等待所有的部门和主要的议会都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发表他们的意愿。”[46] 此后，这个俱乐部就如同一阵具有活力的旋风，席卷四野并阐释其理念。会员们印制了海报，张贴在这个城市每个角落的墙壁上。他们还敦促所有与他们有紧密联系的巴黎博爱社团配合他们的努力，讨论并采取同样的立场。此外，他们还组织了一场全市范围的游行，意在向国民议会提交请愿书。[47]

6月24日的游行是大众激进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无套裤汉”政治化的另一个信号。在某些方面，它可以被看作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治游行——以其形式和精神领先于19、20世纪的伟大巴黎政治游行。通过大众社区网络的联系，来自巴黎各地的人们步行至旺多姆（Vendôme）广场的指定地点集合。在前一天，穿越议会大楼的圣体节游行的胜利，成为组织者们发起这场新游行的基础。从这个层面上讲，旧制度的宗教游行与新形式的大众民主文化之间存在着另一种迷人的联系。男人、女人和儿童——据目击者描述，多数来自工人阶层家庭——他们组成游行队伍穿过街道，互相挽着手臂，七八人成排并驾齐驱，时而放声高歌，时

而摇旗呐喊。许多人在他们的大衣上佩戴着眼睛臂章或徽章，象征着他们的俱乐部以及寻找阴谋家的使命。吉塔尔·德·弗洛里班，一位上了年纪的资产阶级业主，住处距离科德利埃俱乐部不远，他目睹着成千上万的人走过。起初，他害怕发生暴力和骚乱。但后来他注意到，参与游行的人都很冷静且组织有序。与前夜议会楼前的游行不同的是，没有人携带武器，甚至连棍棒和手杖都没有。当游行的队伍穿过塞纳河上的新桥时，吉塔尔·德·弗洛里班跟随着他们，朝着胜利广场而去，在那里与来自巴黎东部的数千人汇合。在议会大楼以北的旺多姆广场，他们遇到了拉法耶特。拉法耶特显然已经得到了通风报信，并且召集了一大批武装着大炮和火枪的国民自卫队。但游行人群保持平静，只宣布他们希望向国民议会提交一份由三万人签名的请愿书。紧张的对峙之后，来自游行人群的七名代表被允许发表诉求声明。[48]

国民议会推迟至第二天才阅读请愿书，对此游行者倍感失望。当请愿书被呈上时，据一名科德利埃俱乐部的成员称，只有一名秘书“以没有人可以听到的方式”诵读，之后递交给了一个委员会，等待立即被遗忘了。在接下来的三周里，巴黎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博爱社团继续着他们的运动。据统计，在6月21日至7月17日，人们共起草了17份请愿书，每一份都被国民议会拒收或忽视。贯穿这段时期的是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博爱社团持续不断的夜间辩论，讨论国王和他应得的命运。玛丽-让娜·罗兰每天晚上都会去观看并参与辩论——许多这样的聚会诚邀女性的加入——她被亲眼目睹的准千年变化震惊了。几年前，巴黎的平民百姓无论被政府告知什么，都只会“愚昧地歌唱阿门”，而现在他们已日渐开明，准备好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并要求“正义的统治”。“我们在一天之内前进了十年。”[49]

此外，大众社团发起的共和运动显然也深受其他两个事件发展的影响。首先，此时正值一系列工人示威活动频发的时期，同时代的人们认为这些工人运动比他们以前见过的任何游行活动都更具组织性、更富激

情。7月的第一周，国民自卫队几乎每天都被派出来镇压工人们的抗议和罢工——例如，由熟练制帽工、泥瓦匠和街头工人试图发起的罢工运动——国民议会最近颁布的《勒夏普利埃法》已经把这种罢工明确认定为非法行为。几乎同时，市政府在国民议会的支持下，开始废除公共工程体系，这个体系作为工人失业救济，启动于1789年，现在却被认为太过昂贵因而遭到取缔。这些行为引起了民众极大的焦虑和愤怒，在6月下旬和7月初，工人组织了几次抗议游行，许多人再次聚集在旺多姆广场。虽然这些工人运动不一定与政治事件有关，但它们强化了危机氛围，并为“无套裤汉”运动注入了活力。[50]

其次，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博爱社团，以及一些巴黎更为激进的区，越来越把愤怒集中在国民议会本身。大家对国民议会无视他们的请愿感到非常失望，他们也越来越怀疑这些国民议会代表在他们撤退后对国王和王后的待遇依旧，继续使其和仆人、顾问一起留在王宫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更加令他们感到愤怒和沮丧的是，在七月的第二周，有消息泄露称，国民议会代表将要免除国王的罪行。[51] 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博爱社团的成员们越来越倾向于各种多疑甚至偏执的观点，他们感觉到国民议会正在暗地策划着阴谋诡计。有传言说，国民议会代表们已经“背叛了法庭”，他们篡改伪造国王的私人证词——尤其是路易关于他从来没有打算离开这个国家的声明。甚至还有一些传言，说大多数国民议会代表正计划刺杀以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一小部分赞同科德利埃俱乐部立场的国民议会激进分子。在危机中，国民议会推迟了新立法机构的选举，现在有人指责国民议会代表们正在利用目前的形势来维持权力，就像17世纪英国长期议会的议员们那样。[52]

7月12日，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联盟者起草了又一份请愿书。议长夏尔·德·拉梅特（Charles de Lameth）仅仅读了几行就断然宣称其“违反宪法”，之后请愿书再一次被国民议会拒绝。出于对这种怠慢的愤怒，一如他们所熟识的旧制度统治时期上流社会展现出的优越高傲

姿态——拉梅特本人曾经也正是一位这样的伯爵——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决心绕过国民议会，直接向法国人民上诉。他们起草了一份“全国演说”，在全国各地发表和流传，并很快得到多数邻近博爱社团的支持。到目前为止，激进分子们仍非常谨慎地依法行事，严格遵守国民议会颁布的请愿法令，并在每次组织街头游行前及时上报市政府。然而，这个新的演说可以看作一个名副其实的起义号召，预示着1792年夏天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的召开。请愿者召集了新政权的行政单位法兰西八十三省，使其纷纷派代表前往巴黎，在那里组建新的“行政当局”，取代国王——甚至取代国民议会——“直到国家能决定前国王的命运，制定新的统治模式”。他们还谴责国民议会代表拒绝举行新的选举：“任意延长任期，滥用职权。”法兰西各省应立即且单方面重新举行选举，取代现在这些“丧失了国家公信”的国民议会代表。最后，他们还敦促地方行政人员通过男性普选权来组织选举，无视国民议会颁布的以纳税资格决定选举权的法律。[53]

在同一时期，许多激进的报纸在咖啡馆被高声朗读，在整个城市的街道上被高声呼喊——它们甚至更直接地推动了起义。布里索大声疾呼，反对国民议会及其对国王的态度，高呼其“丑恶、荒谬、残暴”。弗雷龙（Fréron）和博内维尔预言且呼吁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反抗。可能是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的皮埃尔-加斯帕尔·肖梅特（Pierre-Gaspard Chaumette）发表的一篇文章，更加直言不讳。作者提醒国民议会的代表，1789年巴士底狱监狱长在反对公众意见时遭到了被叛乱的人群斩首的命运。“有时候，”他写道，“叛乱是最神圣的义务。”[54]

1791年巴士底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的纪念日陷入了剑拔弩张的危机漩涡之中。虽然在6月21日之后出现了取消纪念活动的声音，但最终巴黎政府官员决定坚持原来的计划。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和新生的无套裤汉并不能代表全部的城市复杂人口群体。事实上，大批巴黎人民，包括国民议会中的多数代表，都为经常性的工人和政治激进分子街头示威游行而感到心惊胆颤。很少有人对路易十六的出逃感到高兴，可以说大多数人都对国王感到相当愤怒。但是，来自群众持续的暴力或暴力威胁，以及科德利埃俱乐部毫无掩饰地呼吁人民起义来反对国民议会，使巴黎民众感到恐惧，也使他们更加警惕制宪会议发生剧变。现在，城镇官员和士绅希望1790年联盟节的重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复苏前一年的魔力和团结，为相当数量的公民提供对抗共和派示威的手段。正如一位温和的记者所说，这将是对“想要摧毁君主制的狂热分子，只会为共和制呐喊的奸诈无赖”的响亮回应。无论如何，城市西端的“战神广场”得以翻新，这个伟大的体育场现在可以容纳比一年前还要多的人，广场中央的“祖国祭坛”也因此而得到改造。[55]

7月13日晚上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里举行的一场盛大音乐会拉开了全城庆典的帷幕，前来参加的不仅有各个革命流派的显要人物，还有两年前带领巴黎人民攻占伟大的中世纪城堡的领导者。拥护革命的神职人员在感恩仪式上歌唱着赞美诗，作曲家弗朗索瓦-约瑟夫·戈塞克（François-Joseph Gossec）组织了一场名为“攻占巴士底狱”的音乐盛会。[56] 欢庆活动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直到在市政府和市长巴伊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从已被拆毁的巴士底狱的十点钟方向出发，穿

过整个城市，朝着阅兵场行进。长长的游行队伍由来自政府部门、司法部门、军队以及四十八个省的行政官员组成，其中穿插着乐队、成排的鼓手和国民自卫队，还有一列象征旧制度的游行队伍运载着如虔诚圣物般的巴士底狱模型。三小时里，歌舞游行将陆续穿过整个城市：穿过市政厅，沿着塞纳河右岸，穿过杜伊勒里宫附近的河流，穿过圣热耳曼的左岸区，进入体育场。当所有人都就位时，大约两点，又有一次盛大的赞美诗演唱，由新当选的“合乎宪法规定的”巴黎主教担任指挥。盛典伴随着总司令拉法耶特在他的白马上指挥着国民自卫队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而结束。[57]

在某些方面，庆典活动似乎是成功的。大多数见证者都认为游行队伍的规模至少和1790年一样庞大，甚至可能更大。所有人都感叹这天的好天气。晨曦初照，天朗气清，和煦而美好，与一年前令人不快的大雨形成鲜明对比。[58] 但是，较之前一年，群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尖锐的政治分歧如今割裂了巴黎人民。国民议会只派出了二十四名代表参加，他们声称忙于辩论，然而在1790年的游行中，他们悉数到场。更加明显的是，国王和其他王室成员都缺席了，甚至没有人考虑要求路易十六重申他对宪法的宣誓。一些目击者也注意到祖国祭坛上由不知名的艺术家们，在庆典前的最后时刻打造出的明显变化。一处名为“伏尔泰的胜利”的浅浮雕，暗指仅仅几天之前，为纪念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举行的反教权游行庆典。目击者还注意到另一处纪念作品——瓦伦人民英雄德鲁埃纪念碑。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国王”这个词已经从祭坛上抹掉，现在只剩下“国家，法律，［空白］”。事实上，象征着君主的所有标志也都从国民自卫队的旗帜上消失了。在游行庆典中的数个时刻，人们甚至高呼：“不再有路易十六，不再有国王！”[59]

另外还有种种有关紧张形势和暴力事件的报道，这在一年前是闻所未闻的。前来参观的克里奥尔贵族昂利-保林·巴侬·德巴桑（Henri-Paulin Panon Desbassayns）因佩戴着一枚象征旧制度贵族地位的圣路易十字徽

章，而遭到了游行人群的谴责侮辱和严厉处罚。两名向国家祭坛投掷石块的神职人员拥护者遭到了更加恶劣的对待。游行活动早有传言称，国民议会将在人民聚集在“战神广场”时占得先机，投票宣布免除国王罪行，于是一些人穿过市区，冲回议会大厅。事实上，几个颇受欢迎的社团和俱乐部成员，包括科德利埃俱乐部在内，甚至没有参加庆典仪式。他们在当天早些时候召集了自己的游行队伍向国民议会行进，表明了他们将继续反对国民议会的政策，并向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提交了另一份请愿书。他们再一次要求国民议会代表不得对国王的罪行妄下定论，必须征求法兰西人民的意见，举行全民公决。这一次，他们更为激进。他们主张，真正的国家统治主体将不再是国民议会，而是“人民”。如若不承认这一现实，他们坚持，可能会引发内战。[60]

显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国民议会的代表身上。他们在仅仅几个月前还被全民誉为“国家之父”，现在却遭到发动暴乱且疯狂叫嚣的少数巴黎人的责骂和威胁。如今，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

注释

[1] Mercier，34，108，328. 下文大部分来源于此书。

[2] Mercier，34；Tulard，33-35，44-49；Roche，chap. 1；Godechot，67-70，83.

[3] Thompson，100-101，118-119.

[4] 特别参见Censer，chap.2。

[5] Mercier，70.

[6] Short，20：585；Mercier，402；Andress，177.

[7] Boutier and Boutry，40.

[8] Mathiez，4-10.

[9] 尤其参见Mathiez；Bourdin；Monnier，4-6。

[10] 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parts 2 and 3； and Kaplan，*La fin des corporations*， chaps. 13-15.

[11] Burstin，“La loi Le Chapelier”； Andress，122-135.

[12] 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Andress，chaps. 2-4；Pisani，1：191-199； Tackett，*Religion*，*Revolution*，*and Regional Culture*， 354.

[13] Godechot，245-48；Burstin，“La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87-289，293-295；Carrot，1：41，69-71.

[14] Andress，110-111；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54；Gower，82.

[15] Miles，1：209；Gower，80；Short，20：348；Guittard de Floriban，45.

[16] Gaultier de Biauzat，letter of January 29；*Ami du peuple*， February 14 and March 10 （感谢Jeremy Popkin对我的提示）；还有 Legendre，letter of February 2；Ruault，221，233-234；Vernier，letter of May 1；Colson，192.

[17] *AP* 27：370-372；Aimond，*Enigme*， 52-53；*L'orateur du peuple*， vol. 6，no. 45 （ca. June 20）；*L'ami du peuple*， June 21 （在国王的逃亡行为广为人知之前就已经问世）.

[18] AN D XXIX bis 38，dos. 389；Bimbenet，14-15，17，35-36，44.

[19] Lacroix，1-2；Leclercq，582-583.

[20] Leclercq，581；Faulcon，421；Thibaudeau，139-140；Colson，194；Ferrières，360.

[21] Bimbenet，14，35-36；Ruault，246；Panon Desbassayns，186；Leclercq，581.

[22] Lacroix，4；Oelsner，18；*Chronique de Paris*， no. 173，June 22；*Le babillard*， no. 18，June 22；Leclercq，585.

[23] Mousset，273；Short，20：562；*Le babillard*， no. 18，June 22；

Oelsner，38.

[24] Lacroix，1-2，5，11.

[25] Lacroix，3，14-15，22，25，179；Bourdin，241；Panon Desbassayns，186.

[26] Lacroix，1-2，5，7，13，22，53，141-142，185；Charavay，ix；Burstin，“La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56-257；Genty，105；Bourdin，241-244；*Le patriote françois*， no. 683，June 22；Mathiez，51，64.

[27] Bourdin，235-237；Guittard de Floriban，34；Short，19：635；Gower，71；Censer，111-115.

[28] Oelsner，21.

[29] *Chronique de Paris*， no. 173，June 22；*Journal de Perlet*， no. 692，June 28.

[30] Leclercq，672-676；*Chronique de Paris*， no. 173，June 22；Roland，2：316；Ruault，246-247；Dumont，222.

[31] AN D XXIX bis 35，dos. 365；*Le patriote françois*， no. 683，June 22；Short，20：585；*Chronique de Paris*， no. 173，June 22；Mathiez，51；Mousset，273.

[32] Oelsner，21；*Chronique de Paris*， no. 173，June 22.

[33] Leclercq，675-676；Duprat，146-188；Hunt，*Family Romance*， 50-51.

[34] *AP* 27：24-26；Panon Desbassayns，188；*Chronique de Paris*， no. 174，June 23；Rabaut Saint-Etienne，“Correspondance，” 265；Gaultier de Biauzat，2：370-371.

[35] Lacroix，49-50，100；Burstin，257-258；Panon Desbassayns，189；McManners，2：122-123.

[36] Lindet，286；*Chronique de Paris*， no. 175，June 24；*AP* 27：444；Thibaudeau，150-151.

[37] *AP* 27：448，453-454；Reinhard，119-120.

[38] *AP* 27：453-454；Lindet，286；Faulcon，433；Thibaudeau，149-151；Roland，2：309；Guittard de Floriban，65；*Journal de Perlet*， no. 689，June 25；Oelsner，21-22.

[39] Roland，2：309.

[40] 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57.

[41] Ruault，248.

[42] Aulard，*Histoire politique*， 84-89，105-111；Mathiez，34-41；Morris，2：168；Hesse，83-98；Pegg，435；Louis-Philippe，16.

[43] Roland，2：316；Ruault，246-247；Panon Desbassayns，186；Oelsner，21；Lombard-Taradeau，361；Lindet，293；Lacroix，46；*Chronique de Paris*， no.173，June 22.

[44] Roland，2：302.

[45] *Le patriote françois*， no. 683，June 22；Mathiez，85-86；Pegg，435-445；Whaley，35-37；Bourdin，245-248；Kates，157-164；Baker，304-305.

[46] Mathiez，47.

[47] Mathiez，48-50；*Le babillard*， nos. 19 and 21，June 23 and 25；Lacroix，96-97，117；Bourdin，241-242.

[48] Guittard de Floriban，65；Bourdin，259-260；Mathiez，51，53-54，123-125；*Lebabillard*， no. 21，June 25.

[49] Mathiez，87；Roland，2：322，325；Braesch，193-195.

[50] Rudé，83；Mathiez，86，233，328；*Chronique de Paris*， no. 180，June 29；*Le babillard*， nos. 23 and 25-26，July 5 and 8-9；*Journal de Perlet*， no. 700，July 6；Guittard de Floriban，68.

[51] Mathiez，86-87；Bourdin，260.

[52] Short，20：585；Bourdin，260；Ruault，250；Mathiez，88；Roland，2：329；*Chronique de Paris*， no. 197，July 16；Gower，109.

[53] Mathiez，95，96-97，100，108.

[54] Mathiez，109.

[55] *Le babillard*， no. 32，July 15；*AP* 27：589-595；Lacroix，285；Panon Desbassayns，201；*Journal de Perlet*， no. 710，July 16.

[56] Lacroix，309-310；*Chronique de Paris*， no. 195，July 14；*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July 13-14，1791.

[57] Lacroix，324-328，344-345；Guittard de Floriban，72；Panon Desbassayns，201.

[58] Ruault，251；Guittard de Floriban，72；Gower，106.

[59] Mathiez，110；Lacroix，345-348；Roland，2：327n.

[60] Lacroix，350；Mathiez，112-115.

第五章　国家之父

两年多以来，代表们一直在国民议会工作，起草宪法，自上而下地重组国家。[1] 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是一群具有卓越才能的人。1789年王权政府修订了选举制度，选出了国内各地方、地区和国家各个阶层的精英人士。其中有近300名贵族，他们大多数都拥有爵位和巨额财富，代表了法国最富权势的一些家族。还有数十名贵族主教和大主教，以及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区神父。还有大约600名第三等级的代表，他们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平民，其中有律师、法官、医生、商人、土地所有者和政府雇员。第三等级的代表大部分都有资产，而且很多人都有市政工作的经验。虽然这些国民议会的代表们来自不同阶层，但有一个文化共同点，即他们大都接受过法律培训。大概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学习过法律，甚至有几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数一数二的优秀法律人才。

在大众阶层的平民代表、少数自由贵族和神职人员的支持之下，革命的前几周见证了一个非比寻常，几乎不可思议的神奇时刻。面对多数贵族阶级拒不妥协以及王室政府几近放弃权力的情况，在巴黎人民的支持下，代表们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从整个18世纪的改革理念中汲取整合观念想法。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在法国激进变革的道路上，走得远比之前预料和想象的更加深远且疾速。到了1789年6月中旬，他们组成了具有自主权的国民议会，在戏剧性的“网球场宣誓”中庄严宣布——制定国家的第一部宪法。几周后的8月4日之夜，被称为法国历史上的“神奇一夜”，在夜间会议上，革命议员们投票决定废除旧制度的大部分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整个封建特权和等级特权体系。此后不久，他

们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包含了两年之后在美国通过的《权利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十月事件”后，随着国王路易十六随家人一起离开凡尔赛去到巴黎，他们也将会场搬到了杜伊勒里宫北面一个改建过的室内骑马场中，承担起了重组国家的艰巨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以前的政权之后，他们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所有的体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院、法典、赋税体系、武装军队和教会组织等。

结束革命

随着革命进入第二年，代表们情绪和观念的微妙变化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过度疲劳的问题。对于那些认真履行职责、定期出席会议、参与委员会讨论、阅读其他代表们无尽的建议书、保持与其所属选区通信联系的代表们而言，无休止的责任很容易导致精疲力竭，使他们心生厌倦。在到达首都巴黎之前很少有人习惯这样的生活节奏，所以现在很少有人能负担起秘书的工作。其中一位代表写道："我们的大脑已经不能自如地应对如此紧张强烈和持续不断的运作了。"另一位认为他们被"无穷尽的工作、不间断的会议和无休止的斗争反复折磨"。他们在信件中描述自己饱受头痛、失眠和体重下降的煎熬，已是"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到1791年年初，旷工现象急剧增加。大多数的贵族和很多神父直接停止出席议会，实际上，在近1200名代表中只有400名还定期出现在国民议会中。[2]

工作繁重和过度劳累也促使了革命第二年激烈的派系冲突。议员让-弗朗索瓦·康普马博士（Doctor Jean-François Campmas）写道："国民议会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有效率，它已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沦为政治热情的牺牲品。"自1789年年底以来，最进步的代表们，晚间已经开始在会场以北一到两个街区的大型废弃修道院里单独开会。在这里，宪法之友社——因在圣雅各修道院集会被称为雅各宾派——早已在国民议会会期之前，就各种问题进行了辩论，并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策略，在许多方面展现出现代政党活动的雏形。不久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附属社团组织——正是这个全国性组织吸引了瓦伦的爱国者于1791年年初纷纷加入。然而，仅在创立后几个月，雅各宾派发现自己与一支名为"1789俱

乐部”的政治团体出现政见分歧，后者由国民议会中政见主张较为温和的代表组成。这两个爱国“俱乐部”常常因激烈的个人私怨和政治对抗而剑拔弩张。拉法耶特早因“八十九人”（Eighty-Niners）而离开了雅各宾派，他曾在1971年5月向他的好友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哀叹道：“即使在那些自诩为爱国者的人们之中没有杀戮和流血，他们对于派系争斗的热情也已然走到了尽头。”[3]

代表们面临的挑战也因一系列意外的发展而变得复杂起来。1790年春，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外交危机，首先引发了法国面临国际力量干涉内政的威胁，这个威胁在国王出逃前夕一直是国民议会关注的主要问题。战争的前景似乎特别不容乐观，平民士兵和贵族官员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这种敌意又遭遇了布耶将军积极筹划的路易十六的出逃——这些原因致使法国军队处于崩溃边缘。更为令人不安的是，国民议会制定了关于教会的法律《教士民事组织法》，并要求神职人员按照规定宣誓，不可以提出任何条件或增加限制。这在一些地区遭到了反对，也使这个国家的敌对情绪汇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大多数爱国代表把这项立法看作对教会组织必要且理性的改革，但是一部分人民坚信国民议会正试图改变法国的天主教信仰。危机的严重性落到了国民议会代表们身上，他们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和亲近的朋友——逐渐开始攻击国民议会的宗教政策。

与此同时，代表们不得不面对日益频发的骚乱和暴动。在代表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面包骚乱、劳工抗议、国民自卫队的不服从——这种巴黎“无政府状态”的日常威胁使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质疑他们之前曾殷切拥护的民主立场。曾经被认为是革命救世主的巴黎人民此时在许多温和派眼中俨然已成为忘恩负义、反复无常、十分危险的群体。加上科德利埃俱乐部和激进的新闻报刊不负责任地煽动报道，使他们显得更加可怕。从1790年到1891年的冬天，一群温和的雅各宾派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平息大众激进主义的法令。这些措施包括从国民自卫队中排除贫穷公

民；制定并实施限制新闻出版的法律；颁布《勒夏普利埃法》（Le Chapelier law），禁止工人组织和工人罢工。[4] 这个团体的领导者是来自格勒诺布尔市的青年律师安托万·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和他的亲信，贵族夏尔·拉梅特和亚历山大·拉梅特（Alexandre Lameth）——他们两个都是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还有倡导自由主义的巴黎高等法院法官阿德里安·杜波（Adrien Duport）。对于巴纳夫和他所属的团体而言，现在是结束革命的时候了，应该让法国人民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重建稳固且良好的公民秩序。



《安托万-皮埃尔-约瑟夫-马里·巴纳夫》 温和的雅各宾派领导者，也是后来的斐扬派（**Feuillant**）领导者。

然而，结束一场革命就像开始一场革命，点点滴滴都很艰辛。所有



《热诺姆·佩蒂翁》　激进的雅各宾派领导者。

温和派倡导的措施，都会遭到国民议会中由热罗姆·佩蒂翁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领导的一小群激进派雅各宾党人的竭力反对。虽然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充满激情，但践行苦行僧式生活方式的罗伯斯庇尔也像佩蒂翁一样，拒绝放弃对普通百姓的权利和性本善的信仰。事实上，这两个人和他们在国民议会中的追随者都认为革命尚未成功。民主和选举权应该扩大到每一个男性公民，无论其地位和经济条件如何。

但是在1791年春天，罗伯斯皮庇尔和他的盟友不再占据优势。正如一位前激进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温和派的时机已经到来”[5]。对遏制巴黎大众的影响力并结束革命的渴望，甚至还迫使许多温和派成为国王权力和威望的拥趸。西班牙大使已经在1790年年底洞察到了这一政策趋势。他在12月宣布：“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正通过秘密中间人寻求与君主制达成谅解和共识，并且承诺迅速恢复秩序。”到1791年4月，巴纳夫和温和派基本上已经停止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活动了，正如罗伯斯庇尔怀疑但又无法证明的那样，他们甚至与路易十六进行了秘密谈判。[6] 多数人希望稳固君主制，因此国民议会中众多爱国代表对国王抱以异常积极的态度，他们还一厢情愿地希望由他们评估决定路易十六的每一个行动。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国王的突然出逃奔向自由，对于他们的打击就显得更加残酷。

过渡期

6月21日上午九时，国民议会主席宣布了国王出逃的可怕消息，代表们个个瞠目结舌，惊愕失色。有一位议员生动地回忆起当时“每一张脸上都写着惊慌失措”，他们都试图弄懂这件事背后真正的含义。让-弗朗索瓦·高提耶·德·比耶扎（Jean-François Gaultier de Biauzat）会议期间不停在自己的腿上划着“愿上帝此时能够帮助我们”[7]。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们都听闻过国王会被诱拐的预言。但总是会有数十个未被证实的谣言四下传播，而且，就像法学家们学习将证据分类分析一样，他们也学会了剔除大部分的故事。即便告之以真相，代表们也会视其为不能相信的传言。他们越把君主视为宪政制度的关键，就越能说服自己国王值得信赖。

一群尴尬的官员很快到达国民议会大厅，他们企图自我辩解，并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最终负责杜伊勒里宫安全事务的拉法耶特带着“阴沉且低落的愁容”也走了进来。巴黎市长巴伊和此前负责调查谣言的几名代表也发表了声明，承认了他们的失败。事实上，这些饱受质疑的传言现在看来比大多数代表以为的更具实质性。王后的侍女在这对王室夫妇出逃前的几周非常恐惧，她十分明确地通知了官员们即将到来的出逃行动。据说在她指示的地点附近部署了超额的驻守警卫，但国王一家仍魔法般地消失了。有些代表猜测，拉法耶特本人是知情的，或者他有意让出逃成功。[8] 更有甚者，大家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些传言。我们姑且相信拉法耶特回忆录的真实性，他当时直接向路易提出了这些报告和传闻，但国王做出了如此“郑重且有力的否认，以致拉法耶特以性命打赌国王绝不会离开”。像身边其他人一样，他愿意相信国王不会说谎。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给警卫留下需要特别警惕的印象。[9]

无论如何，代表们很快就克服了他们的惊慌。他们勇敢地提醒着彼此所经历的一切，比较了目前的情况和1789年夏天的形势，当时遭遇的困难和障碍几乎无法逾越。他们宣布自己是永久性的议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全天候会面，在长椅上过夜，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10] 面对史无前例的危机，他们抛开派系争端互相靠拢。从前的雅各宾派激进分子巴纳夫也来到了他的老对手拉法耶特的战线，这给代表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这正义和慷慨的行为震惊了国民议会，大家叫停了所有的互相指责。所有以前那些分歧的观念、激情、对抗或攻击在这一天都转变成了空前的团结。”第二天早上，6月22日，几乎所有的军方代表——多数是国民议会中保守派的成员——走向前来，举起手中的刀剑，单膝跪地，庄严宣誓效忠宪法。誓词令人瞩目，因为它不再提及国王。第二天晚上，纷杂的巴黎人民游行队伍穿过国民议会时，也发下了同样的誓言。[11]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一连串的议案和法令被提出，大部分都获得一致通过。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拦下出逃的国王一家。拉法耶特本人早在6月21日代表召集之前就派出了信使。现在，国民议会也这样做了，派遣并命令信使沿着主要道路阻断国王和他的家庭成员。在法语中，“阻断”和“逮捕”这两个意思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这个模棱两可的命令所有人都心领神会。[12]

代表们尽可能快地采取措施维持政府的运作。法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国王或摄政空缺的时候，迫于此种困境，国民议会被委以重任。议会一致通过且全体毫无争议的法令，无需征得国王“批准”，同时，先前投票通过、等待国王批准的法令也都即刻生效。有人建议设立国民议会执行机构“公共安全委员会”来应对紧急情况，但代表们选择通过随时待命的现任部长和大臣来协调工作，并要求其宣布效忠国民议会。所有人都照此执行，他们被安排在临近的大楼里，以便与代表们保持密切联系，并

直接与相应的委员会协调政策。另外还通过了一些法令，以确保财政部长在没有君主签名的情况下还能继续支付国家账单，或者确保外国大使可以通过外交部长直接与国民议会处理事务。[13]

所有这些在几个小时内临时制定的法令被认为是紧急的应对措施。然而，并没有人知道国王是否会被找到或者回来。事实上，政府的迅速重组构建了一场虚拟的二次革命，虽然只是临时性的，但却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改变都完全合法，因为自1789年以来，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就曾宣布自己是“制宪议会”，有权建立一个新政府。但实际上，他们总是寻求路易来批准他们的宪法或其他法令。夏尔·拉梅特在他的两次演讲中对这一点做出了详细说明，提出他们行动的另一个正当理由，一个基于权宜之计的理由。他宣称：“目前，我们不得不同时承担起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危急时期，人们无法像和平时期那样严格遵守法律……一时不公好于眼睁睁看着国家遭受损失。”[14] 这种观点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许多方面，瓦伦危机期间所做出的决定预示着另一个权宜之计，即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

代表们很快意识到了国王的离开所带来的国际影响。不仅仅是瓦伦和圣梅内乌尔德的人民，人们普遍怀疑这次王室出逃是假借外国势力入侵之手，以武力结束革命的计划的一个环节。因此，国民议会开始动员全国为战争做好准备。国民议会召集了当时在巴黎的主要军事指挥官们，要求其宣誓效忠宪法、法律和国民议会；“国王”一词再次从誓词中被除去。当华盛顿的朋友——约克镇战役的英雄让-巴蒂斯特·罗尚波（Jean-Baptiste Rochambeau）将军也到来并宣誓时，代表们兴奋不已。军事指挥官们被要求与部长以及国民议会委员会合作，制订应急计划。[15] 鉴于法国军事力量薄弱，代表们号召全国各地的志愿国民自卫队为正规军提供支持服务。全国八十三省，每省至少选出3000名市民，成为全民大动员的第一次军事储备力量，这些列入征兵名单的人民“已准备好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维护宪法”。早在1793年至1794年，国民议会

的另一个机构就曾派出四个代表团前往边防省区，督查战争准备情况以及检验军团的忠诚。所到之处，代表们被授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公共秩序，保障国家安全”[16]。

代表们同样担心法国内部的和平问题，特别是维护国民议会周围大都市稳定的问题。鉴于巴黎在过去六个月中几乎持续不断的骚乱，大多数议员预测将要爆发更加严重的恐慌或暴力冲突。巴纳夫回顾了巴黎1789年7月的危机和下层阶级引发的巨大混乱，直到“资产所有者和那些真正依附于这个国家的公民”负责起来控制了局势。代表们迅速组建了一支武装自卫队，部署在国民议会厅周围，禁止除代表以外的其他人进入。他们主要针对巴黎人民，发出维护秩序的呼吁：“国民议会……通告所有公民，维护宪法、保卫国家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和秩序来维持。”巴黎人民绝不会对于国王的失踪无动于衷，他们发动了几起暴力事件。然而很大程度上，在国王出逃后的几天，他们都显得异常冷静。代表们对此感到惊讶且无比感激。菲利克斯·福尔孔（Félix Faulcon）写道：“这似乎是一个奇迹，是出人意料的幸运。我饶有兴趣地认为这是神圣的天意在眷顾着宪法。”[17]

起初，大家都认为国王实际上是遭到了绑架或诱拐。6月21日之前的传言通常涉及有人强迫或通过欺骗手段使国王出逃。甚至没有人会考虑君主默认这种冒险的可能性。但一份“声明”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这份“声明”由路易亲笔所书，并在其中解释了他的行为。最早有一位部长提及了这份“声明”的存在，并于6月21日下午两点正式在国民议会宣读。由代表们的发言和信件来判断，这个声明几乎与最初国王失踪的消息一样令人震惊和受伤。[18]

随着声明内容的公开，除极右派之外几乎没有人还愿意为国王辩解了。代表们被路易这个打破先前宣誓的声明吓到了。巴斯奎亚（Basquiat）曾经是国王的坚定捍卫者，代表他几乎所有的同僚发表意见：“路易十六，这位优点总是能够遮盖缺点的国王，顷刻间放弃了他

所有的承诺和誓言。这个由他亲笔书写并签名的声明，已向整个宇宙宣布国王对人民的荣誉和义务完全没有价值。”路易明显无视他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这让代表们感到愤怒，因为他的这种行为很容易导致“内战和可能更大的灾难”。许多人都大失所望，经常以“坦诚和忠实的方式”支持革命的国王现在却可以否认一切。他们一直相信路易“不会轻易食言，不会背叛人民的信任”。国王“欺骗了我们，”另一位代表写道，“欺骗了所有曾经如此崇拜他的法国人民。”路易仅仅几周前还被称为“敬爱的国王”“人民的国王”，现在却被形容成“傻子”“白痴”“愚蠢”“可怜”“懦弱”“怪物”“一个国王的可悲借口”。[19]

甚至连温和派中的极右代表都对国王的不计后果表示深恶痛绝，如拉法耶特回忆的那样：“他们遭到了双重冒犯，一方面没有被预先提醒，另一方面被弃而不顾，也使其自身暴露在各种各样的危险之中。”保守派分子费里耶尔（Ferrières）侯爵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国王）弃人民的暴怒而不顾，不仅抛弃了贵族阶层、神职人员和国民议会的全部右派代表，还有他的亲密朋友、忠诚仆人和部长大臣。这种行为非常残忍。”趁热打铁，一些代表最初准备公开审理国王的出逃罪行，以摄政取而代之，或者直接废黜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法国现已准备好，”教区神父托马·兰代（Thomas Lindet）给他的哥哥写道，“举出一个能够完全没有国王的例子。当有人审查那些玷污了他们王权的傻子和流氓的名单时，就会有人很想推翻他们全部。”安托万·杜兰（Antoine Durand）认为，这次经历“治愈了法国人视君主为神的荒谬的偶像崇拜行为”[20]。

然而，6月22日晚，王室被抓获的惊人消息使得一切再次陷入质疑之中。经过整整两天的迷乱，大多数国民议会的代表们都断定国王已经逃出了国境。但是当瓦伦的理发师芒然冲进大厅传达国王被拦下的消息时，所有的代表都站在长凳上欢呼起来。最初他们厌恶国王的时候，有些人曾深思过，最好让路易逃走，从而彻底摆脱他。然而，路易的被捕

让大多数人都感到宽慰。费里耶尔立即写信给他的妻子，“你可以想象这个消息带来的喜悦”。高提耶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他所在选区的全体选民，并做了感恩祈祷。“计谋失败了，”新教牧师让-保罗·拉博·圣-埃蒂安（Jean-Paul Rabaut Saint-Etienne）写道，“感谢我们的宿命之星，我将继续仰望它。”[21]

但欢庆的心情稍纵即逝。国王回到巴黎的进展缓慢，气氛变得紧张而阴沉。代表们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应对眼前的危机、保持冷静、重组政府，召集全国人民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他们在冲击和背叛中最初的反应是，数量多到令人震惊的代表们已经准备好把路易及王室统治从政府中全部剔除，用摄政甚至共和国取而代之。这样的想法在国王缺席或者已经出逃国外的情况下更容易实现，但现在国王回来了，就在距离杜伊勒里宫几百码[22]之外。他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国王出逃事件对宪法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苦苦为之奋斗了近两年时间，成功已近在咫尺。这个问题，正如其中一个代表所说，“我们直到现在也不敢考虑”[23]。

然而这些问题似乎永无止境，从既没有先例也没有宪法给予任何指导的基本程序问题到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接连不断地困扰着代表们。如何审查一位国王？国王已经犯下了罪行吗？国王是否有可能犯罪？即使在法律层面没有犯罪，路易又能否重新赢得信任并重新掌控行政权力？许多代表在讨论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过程中痛苦不堪，感觉自己濒临崩溃，不堪一击。他们曾在新的君主立宪制度上寄托了所有的希望。他们越来越急于推出这部宪法，从而结束革命，停止正在蚕食法国社会的纷乱骚动和无政府状态。但是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样的宪法还可行吗？正如他们中一个人所说的那样，“我们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很难想象“我们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把自己从国王出逃所造成的窘迫境地中解脱出来”[24]。

第一轮辩论于6月25日下午开始。国王已从瓦伦回来，距离到达巴

黎只有几小时，国民议会被迫需要做出一个初步决定来处理目前的情况。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在得知国王已被拦住后，国民议会空前的团结立刻摧枯拉朽般土崩瓦解。保守派和一些极端保守的贵族认为国王应立即恢复原来的权力。他离开宫殿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且无论如何，他都会受到王室豁免权的庇护，这正是两年前国民议会投票通过的。正如保守派发言人皮埃尔-维克托·马卢埃（Pierre-Victor Malouet）所说，“其他任何处理办法都会完全歪曲你们所创建的宪法”。另一方面，极左派代表认为路易应该在新创立的国家上诉法院接受审判。罗伯斯庇尔辩论道：“无论他的地位和身份如何，任何一个公民在服从于法律规定时，都不会认为自己降低了身份。”[25]

经过了多番争论后，国民议会最终选择了一个折中立场。国王出逃瓦伦的责任将由国民议会自己确定，议会本身将化身为事实调查法庭。国民议会的两个常设委员会——研究委员会和报告委员会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进行监督和管理。除王室成员以外，所有参与逃亡且被俘的人员，包括三名护卫，以及保姆图尔泽夫人、舒瓦瑟尔和戈格拉和其他主要指挥官将被关押，接受详细审查。不过，国王和王后将会得到优待并在他们的宫殿里接受询问。审讯之后将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议所有证据，并向国民议会全体成员提出建议。与此同时，国民议会做出继续中止国王权力的关键决定。他的法令批准权依然被搁置，所有的行政权力都由部长和国民议会委员会来行使。[26]

国民议会选出了三位代表，都是著名的法律精英，由他们对国王夫妇进行询问。与国王的面谈是在6月26日晚上，仅仅在他返回巴黎之后二十四小时。不过，王后将同代表们的会谈推迟到了第二天，据说是因为她当时在洗澡，但事实上，她是为了确保自己的证词与国王的吻合。他们在骚塞先生的卧室里精心准备的说辞，和从瓦伦归来途中向巴纳夫和佩蒂翁叙述的完全一致。国王从来没有打算离开这个国家，而是前往蒙特梅迪，在那里可以确保他和他的家人的安全，避免在巴黎遭受的威

胁和侮辱。他与外国势力没有任何联系。他在旅行期间惊讶地发现法国各地的人民都支持新宪法。因此，正如兰代所说的那样，他“准备放弃个人对革命的不满情绪”并与之合作。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事实陈述毫无疑问是准确的。然而，否认与外国政府的联系显然是个谎言。[27]

向全体国民议会宣读面谈结果之后，整个案件就交由特别委员会审议，这个委员会是由七个常务委员会的成员联合组成的。[28] 之后6月27日到7月13日，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整个事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人们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审议结果。常设会议昼夜不停地开了近128小时后终于结束了，国民议会恢复了正常的业务秩序。按照议会代表劳伦-弗朗索瓦·勒让德（Laurent-François Legendre）的说法，漫长的等待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委员会完成对事件的详尽调查。但是对于居住在巴黎并且认识很多代表的美国政治家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来说，这种拖延更多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司法因素。他似乎很清楚，随着国王安全返回杜伊勒里宫，国民议会中的温和派代表已经恢复了他们维护君主制的长期战略。莫里斯于7月2日写道：“我发现国民议会的意图是，尽可能地掩盖国王的出逃并努力使其被人遗忘。”就这名美国人来看，国民议会的计划非常拙劣并且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它在各个方面都不具说服力，甚至可能摧毁君主制。”实际上，巴纳夫—拉梅特—杜波（Barnave-Lameth-Duport）一派正再次与王室进行秘密谈判。他们寄希望于拖延时间，以允许他们动员各省为国王赢得舆论支持。[29]

但无论动机是什么，国民议会和整个国家现在正处于一个名副其实的过渡期。实际上，国家政体已然变成“共和君主制”，这个王国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国王，国民议会掌握了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权。议会本身将对国王出逃瓦伦事件问责。教区神父兰代以尖刻的方式形容现在的局势：“行政权力现在只能间接行使。最高行政官员（国王）必须将自己局限于吃喝和睡觉，这是他能够完美履行的义务。”[30]

在这段时间里，国民议会收到布耶将军从他的流亡地卢森堡寄来的一封信。按大多数人的理解，布耶将军的这封信是提前设计好，用于出逃计划失败后挽救国王地位的一种手段。布耶现在承担了国王出逃的全部责任。这封信除了对革命和“你们那邪恶的宪法”充满蔑视与不屑外，满纸嘲弄和傲慢。他声称，国王和王后并不是真的想离开，而是在4月18日的暴力事件发生后，迫于民众的压力和威胁，国王夫妇才被说服逃离躲避。“我安排了一切，决定了一切，指挥了一切。我独自下达的命令，与国王无关。把你们血腥的狂暴和愤怒单单指向我吧。”[31] 这封信基本上扭曲了事实。尽管代表们不知道出逃计划的所有具体细节，但他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国王本人已经多次签署下达为这次出逃而进行的军事预演的命令。[32] 然而，布耶将军的这封信很快被国民议会中希望维护君主制的温和派牢牢抓住，在这方面，温和派代表们的伎俩比将军曾希望的出色得多。

虽然代表们之间的正式辩论大部分已经结束，但在国民议会之外掀起了熊熊燃烧的愤慨。特别是两大派系的代表们在过渡期展现出了异常的积极主动和毫无耐心。6月28日，一大群保守派成员聚在一起讨论现在的形势，贵族艾兰·德·巴佐热（Irland de Bazôges）将这些人称为“少数派中最睿智和开明的人们”，他们对多数派架空国王并夺取国王的行政权力感到义愤填膺。实际上，国王现在是自己宫殿里的囚徒。但他们相信，路易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本应允许他随时随地自由出行。根据莱维公爵（Lévis）的说法，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在事实并非如此的情况下，软弱地谎称自己认可宪法，并且“以自己现在被束缚之名，想要享受他曾给予他人的充分自由”。一些更坚定的极端保守派分子，如沃德勒伊侯爵（Vaudreuil），甚至愤怒地认为国王已经放弃了他6月21日的声明。比国王还要保王且毫不妥协的侯爵借此机会宣布，反对国民议会通过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教士民事组织法》和对贵族阶层的打压。经过漫长的辩论，293名保守派代表正式抗议架空国王，其中超过250人

起誓联合抵制国民议会未来所有的选举和投票。[33] 毫无疑问，保王党代表的抗议助长了阴谋理论在巴黎民众中的盛行。现在，一些人确切地认为，这“250名代表”早已在国王出逃前就参与了整个事件的密谋。

与此同时，另一个政治派系——雅各宾俱乐部正在热切地关注和评论当前事件。它的所有成员，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长期以来一直视揭露和谴责阴谋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34] 但是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大体上赞同和支持国王，认为国王通常扮演着弱势但充满善意的角色。现在，随着国王出逃瓦伦事件的发生，很多俱乐部成员不仅感受到国王深深的背叛，而且还惊骇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愚昧和盲目，居然从未预感到背叛，从未发掘出这个深深隐藏在他们之中的最危险的阴谋家。也许正是这种内疚感，甚至是屈辱感，导致许多雅各宾派成员对国王的出逃异常愤怒并做出激烈反应。

然而，俱乐部成员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6月21日的晚间会议上，两派之间展开了尤为紧张的对抗。激进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首先抵达，满腔怒火地抨击指责他的同僚：“我的同事们，国民议会的成员们，几乎全部都是反革命分子——有些人因为无知，有些人因为害怕，有些人因为愤恨抑或是自尊心受到伤害，但其他人却是因为腐败。”[35] 但温和派代表不久后也抵达会议现场，有两百多人，他们下定决心重新夺回掌控权。夏尔·拉梅特和拉法耶特侯爵，巴纳夫和西耶斯修士等昔日的宿敌都呼吁在危机当下建立一个神圣联盟。当罗伯斯庇尔的同盟者，科德利埃俱乐部激昂的演说家——乔治·丹东（Georges Danton）指责拉法耶特叛国时，亚历山大·拉梅特站了出来，为他辩解。在博爱社团辩论的高潮，巴纳夫向全体雅各宾派附属俱乐部发起呼吁，请求全力支持国民议会：“我们唯一的向导，必须是国民议会。”这个提议赢得了热烈的欢呼。温和派代表对于事态发展的转折欣喜若狂。弗朗索瓦-约瑟夫·布歇特（François-Joseph Bouchette）写道：“现在，既没有君主保王派，也没有‘八十九人’，每个人都重新变成了宪法之友。”[36]

然而，俱乐部内部的局势依然紧张，国王事件持续激发着人们的高涨情绪。在国民议会等待的时候，雅各宾派几乎每天都在激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像激进派代表皮埃尔-路易·勒德雷尔（Pierre-Louis Roederer）这样的少数发言者积极主张共和制，但这种要求并非多数人所期望的，因此很快遭到了温和派的猛烈抨击，称其公然与社会大众普遍支持的宪法相对抗。然而，没有人愿意为路易的行为辩护，俱乐部的很多非国民议会代表人士纷纷要求对国王进行审判，并且实行摄政统治。

随着温和派代表中很多人厌倦了出席这些愤懑的夜间会议——巴纳夫和亚历山大·拉梅特似乎从6月22日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或者他们已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了国民议会委员会的工作之中，整个俱乐部似乎都倾向于对“背信弃义的国王”进行绝不宽恕的处理，即使俱乐部对外宣布了对君主制勉强的支持。[37]

君主制的命运

国民议会的大辩论最终于7月13日启动，被委任起草关于瓦伦事件之建议的“七个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正式报告。在三天的时间里，有十七位代表谈到国王和君主制的命运，其中九位赞同委员会的王国无罪立场，八位持相反意见。[38]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国民议会中最优秀的演说家，并且大部分都仔细准备了辩论词。温和派的领袖们深谙议会辞令和雄辩谋略，他们个个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为自己所持的观点据理力争。他们的对手皆是雅各宾派中的极左分子，后者也提出了强有力的论点，但更主观，有的甚至自相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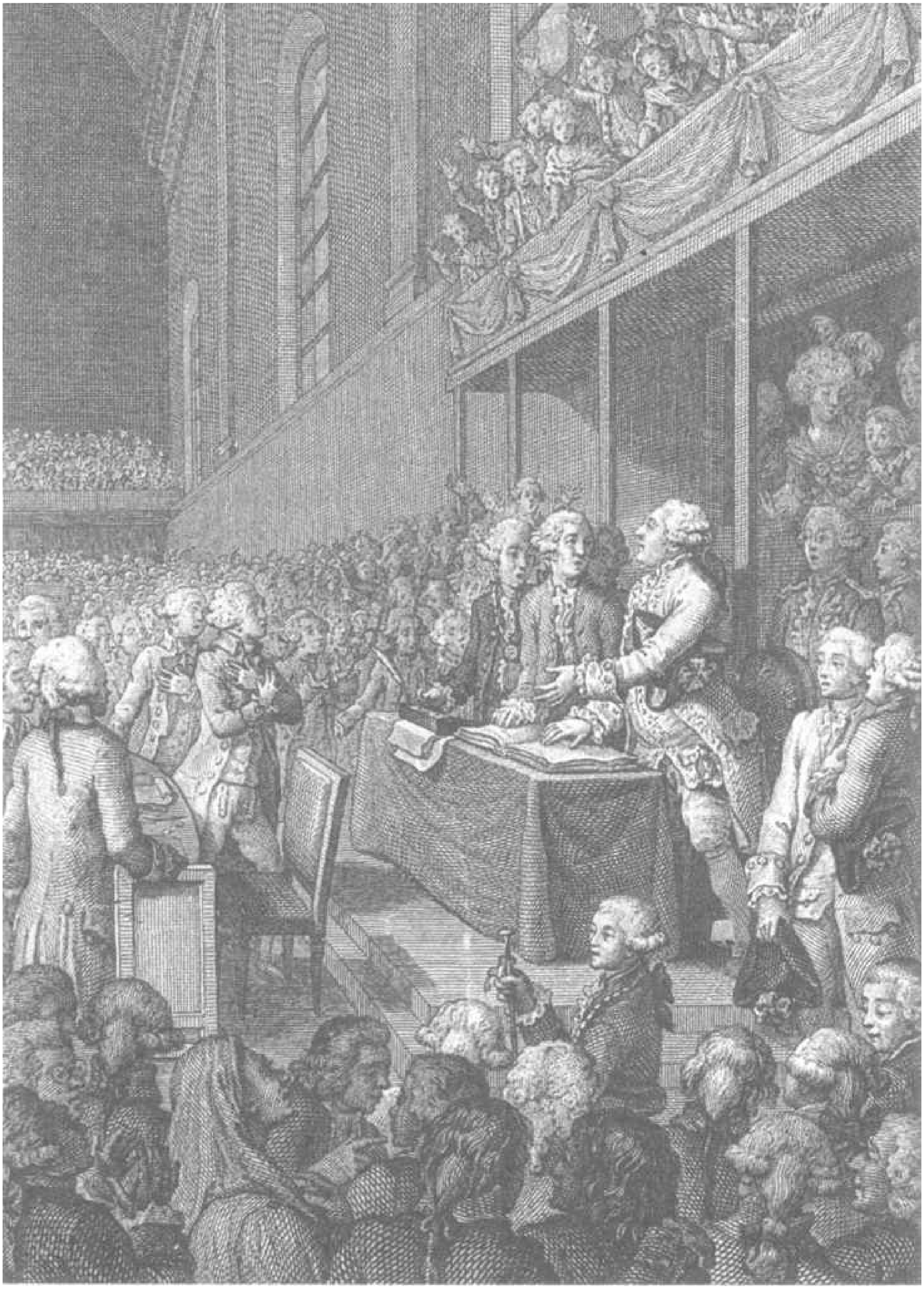
为了陈述他们的观点，委员会从法国东部选了一位三十三岁的地方法官亚森特·米盖·德·南托（Hyacinthe Muguet de Nanthou）。[39] 米盖最大限度地利用布耶将军的信证实路易确实是被“绑架”的，即使他的身体是自由的，但精神已被“恐吓和压力”所“诱拐”。可以肯定的是，从道德或政治角度来看，人们永远不会赞同国王自私轻率且不负责任的行为。但代表们应当遵循法律而不是情绪，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法律上，国王没有犯罪。即便他在6月21日发表的“声明”非常不明智，但这份“声明”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在他离开法国并拒绝回国时，他的出走才能成为罢黜他的理由，而在这一点上，就他的证词来看，他从来没有打算这么做。然而，即使路易犯了罪，他也不能被起诉，因为国民议会已经在两年前投票通过了王室豁免权。[40] 米盖争论道，从最初的宪法辩论中，代表们已经决定了法国必须是君主制。“如此庞大的帝国，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它将自然趋向分崩离析。”事实上，“君主制度的确立不是为了国王，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在这样的政权体制之下，宣布国王无

罪至关重要。国王一旦被起诉，任何派系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微小利益而攻击他，那么就会像一百五十年前的英格兰那样，法国也将受到内战和混乱的持续威胁。国王出逃事件中真正的恶棍，以及委员会的提议法令中提到的仅有的责任人是布耶将军和他的属下。法国必须按照美国对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的待遇，在法律范围内对这些人全部提起控诉。奇怪的是，委员会几乎没有提及阿克塞尔·冯·费森（Axel von Fersen），也一点儿没提到国王和王后。

激进派采取了一系列策略驳斥委员会的立场。其中，佩蒂翁和其他几位发言者攻击了对方认为王室拥有豁免权的观点。国王理所当然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否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对人民施以无数暴行的新的尼禄或新的卡利古拉出现。国民议会在1789年投票通过的王室豁免权仅仅适用于国事活动，而不能够适用于路易决定逃离法国并放弃自己职责这样的个人行为。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激进派发言人跳过了委员会以法律为基础的论点，呼吁采取更高的道德法则。他们怎能接受他们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一个公然欺骗国民议会和整个国家的人？“有多少次，”佩蒂翁问道，“路易十六宣誓他忠诚和热爱宪法？他难道没有被传唤，没有走进这个国民议会的大厅，声称自己忠诚于宪法吗？他难道没有宣布他会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吗？”“这样的举动只是为了催眠麻痹法国人民，从而更容易欺骗他们。”马克-亚克西·瓦迪耶（Marc-Alexis Vadier）对此极度愤怒，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他是一位严酷的雅各宾派人士和未来恐怖主义的领袖，在国民议会中鲜少发言。几周前，他还信誓旦旦地给自己选区的选民写信，否认了所有关于国王即将出逃的传言。现在他不仅感到遭到背叛，而且深感被羞辱。他严厉地抨击路易这个“带着王冠的匪徒”，这个“虚伪逃亡的国王，怯懦地抛弃了他的职责和王位，导致国家行政瘫痪，将我们推入内战和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深渊中，再抛掷一纸背信弃义的声明，将宪法撕个粉碎”[41]。

几位发言者提出了关于公众信心和合法性的根本政治问题。罗伯斯

庇尔直言不讳地表示：政府如何在一个不被信任的人的领导下发挥作用？弗朗索瓦-尼古拉·布佐（François-Nicolas Buzot）预言道，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你永远不可能妄想获得国内的和平”[42]。所有激进分子都感觉到了国民议会代表对共和制的强烈恐惧，他们煞费苦心地声称自己并不希望废除君主制。但是，他们总结说，国王必须以某种方式来接受对自己行为的裁决：无论是通过常规法庭审判，还是通过全民公决，或者召开国民公会。



《**1790**年**2**月**4**日，国王在国民议会上讲话》　路易站在国民议会主席的身旁，宣布他意图支持宪法。从这幅画中的场景可以看到，保守派贵族成员们在议会大厅的“右”侧，高呼“国王万岁！”并且双手在胸前合十。国民议会的代表们站在“左”侧，从图上看不出太多的情感流露。女性观众在包厢里欢呼。

温和派强烈反对几乎所有激进派的论点，并逐一进行反驳。他们否认了舆论不支持国王的说法。不能仅凭巴黎人民的一腔怒火来判断民意，他们受到了少数煽动性新闻记者和俱乐部成员的激怒和蛊惑，“这些人，刚愎自用，不择手段，一心只想破坏宪法”。有人辩解道，无论国王的错误多么严重，大多数法国人对君主制依然深感眷恋，正如路易-皮埃尔·普鲁农（Louis-Pierre Prugnon）所说，人们认为国王“必然是神圣的”[43]。无论如何，社会必须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公众不稳定的情绪和意见。巴纳夫在辩论中巧妙地利用了代表们对巴黎最近频发的民众示威游行的担忧和恐惧，在这些示威活动中，很多矛头直指国民议会。不管他们如何否认或掩饰，那些呼吁对国王进行审判的人的的确确是想建立共和制，而共和制则意味着暴徒统治和无政府状态。到那时革命必将终止，社会稳定的基础岌岌可危，个人财产也将受到损害。[44]

然而到最后，温和派认为守法主义和恐惧战术可能还不够。7月15日，委员会的最初意向被通过成为法律，但前提是必须承诺进一步修改，明确说明这位国王或未来任何一位国王可能被废黜或被取代的根据和理由。第二天晚上，7月16日，修正案的最终版本被引入并通过。法案决定，路易不会被立即恢复原职，他的权力将会被一直暂停，直到宪法制定完成并且由他正式签署表示接受和认可。如果他拒绝签字，他将会被立即废黜，他的儿子将在摄政统治下成为新的国王。此外，代表们还投票通过了另外两个未来可能废黜国王的理由：一是领导军队反对法国整个国家和人民，二是撤回之前对宪法的宣誓。这些行为都将被视为

放弃王位。很显然，如果关于背叛宣誓的法律在一个月之前就已存在，路易就会失去他的王冠。[45]

最终投票结果并未被记录在案。安托万·蒂博多认为，许多代表原本计划反对免除国王的罪行。但是在听取了辩论以及各种修正案通过之后，几百人中只有八人反对委员会的议案。[46]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代表们为什么会这么投票。在给选区人民的信中，他们努力地向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解释他们的决定。许多人抱怨这种选择是多么令人苦闷和烦恼。他们细数了堆积如山的理由，对米盖或巴纳夫等人的论点进行了详细概述，有时甚至逐字逐句引用发言，但却没有指出以下哪些是最具决定性的论点——遵守法律至关重要；国王没有犯罪；国王免于被起诉；共和制绝不会在法国这样的大国实行，即使实际上从未有代表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议案；对国王进行审判或处置将导致内部起义和外部战争。[47]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位代表反对审判国王，是因为他们确信国王有罪并将因此被送上断头台："起诉国王绝不是儿戏，任何被这样起诉的国王肯定都会掉脑袋。"[48] 在公开的辩论中有一个特别普遍但从未被提及的主题，那就是代表们害怕不得不废除他们长期致力于并倾注满满心血和情感的宪法。对于菲利克斯·福尔孔来说，激进派取得胜利将意味着"宪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造成了很多的斗争和牺牲；宪法的完成将终止剧烈的动荡并以公众的幸福取而代之，宪法将不复存在！"勃艮第酒商克劳德·冈特雷（Claude Gantheret）用他简洁的写作风格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为宪法工作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甚至使我想要去改变它。"[49]

然而，很多代表在个人信函中表达了对现实的深深幻灭之感和对未来的无限悲观。尽管冈特雷投了从众的一票，但他承认自己无法忘记教区神父昂利·格雷古瓦（Henri Grégoire）的话：即使国王签署了宪法，一个已经三番四次食言的人又怎能信任？杜兰承认，想到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会有深深的"恐惧感"。兰代投了维护国王的一票，他向他的弟弟

——未来的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吐露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厌恶之情：“我们想要一个国王。然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愚蠢的人，一个机械的人，一个叛徒，一个伪君子，一个被人民憎恨的人，并且以他的名义继续恶棍统治。”他确信，巴纳夫和其他一些人把反对国王的民众抗议归咎于少数记者的煽动和蛊惑，是错误和不公正的。巴黎的平民百姓明显地藐视国王。“我们对一个如此堕落的领导者能有怎样的期待？很难想象在这种状况下能够长期维持和平局面。”[50]

战神广场屠杀事件

在过去的几天中，不停讨论的巴黎人民密切地关注着代表们的辩论，几乎很少谈论其他事情。长时间的过渡期里，国民议会迟迟不宣布立场，这鼓励着不计其数的人自行思考当前的问题，忠于一派或另一派，支持或反对保留现在的国王，支持或反对建立共和制，很多人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7月15日傍晚，国民议会的投票结果在整个城市中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开来，引发了早已聚集在咖啡馆、街区和广场上的人们激烈的争论。大量的巴黎人，特别是来自城市繁华地区的巴黎人，大力支持国民议会这一决定，他们担心任何其他解决方案都会太过冒险和不确定。据说在巴黎北部的圣马丁咖啡馆，有一百多人因这个决定而雀跃欢呼。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这项判决反应激烈，他们指责国民议会“软弱无能”，甚至与国王串谋犯下“叛国罪”。坐落于左岸的普罗可布咖啡馆（Café Procope）是伏尔泰与其他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著名地标，此时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在这里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呐喊比赛。巴黎王宫和国民议会外的庭院里挤满了“数不清的骚乱人群”，他们高声呼喊着自己的不满和抗议。访问法国的克里奥尔人巴侬·德巴桑（Panon Desbassayns）为巴黎民众的意见冲突和不断发酵的党派主义感到震惊和恐惧：“双方都变得如此愤怒，以致他们将对手视为有私人恩怨的仇敌。”书商尼古拉·吕奥写道：“百姓怒不可遏，从国民议会前的广场到最小的咖啡馆，整个城市涌动着可怕的骚动。人们对国王和七委员会的愤慨之情似乎压倒了一切。”[51]

在这种混乱的自发行动中，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各种博爱社团迅速开始动员起更有组织的回应。他们的数千名支持者——来自消息发布城区

和整个巴黎的“无套裤汉”——很快就聚集前往国民议会，再次提交当天早些时候制定的请愿书，并敦促议会代表们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五名示威者被允许进入国民议会的大厅，当他们从一排排国民自卫队的队员身旁穿过时，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亲口告诉他们，很不幸，国民议会已经做出了决定，现在请愿书已经毫无用处。游行人群沮丧而生气，一部分人涌入富裕的右岸地区，强行打断正在演出的歌剧并要求关闭歌剧院，以此作为“哀悼”的标志——就像他们在1789年7月的暴动中所做的那样。其他人涌入附近的巴黎王宫，参加激进派俱乐部“真理之友”当晚发起的一场巨型户外集会。集会发言者的反对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声称如果没有全民公投，他们将永远不会接受国民议会代表们的判决法令，这明确表示了他们不再接受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大约九点钟之后，数千名示威者前往雅各宾俱乐部，极力主张其成员应采取同样的立场。[52]

在这里，人们发现雅各宾派的成员们就如何应对新法令而出现了分歧，正处于讨论中。当数百名示威者成功破门而入时，大厅里顿时一片混乱。震惊于人群的压迫战术，并对激进分子继续反对国民议会的决定而感到愤怒，几乎所有在场的代表们都走了出来，声称要完全抵制俱乐部。其余的人最初试图与科德利埃俱乐部以及其他博爱社团进行谈判，承诺拟定和提交一份他们自己的请愿书。但是，大众社团现在要求建立共和制并废弃国民议会，而雅各宾党人——包括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以及其他少数留在俱乐部的代表，拒绝否定他们所属的国民议会。当天晚上人群退去后，谈判仍在继续，并持续进行到了第二天。但最终，雅各宾党领导人放弃了关于请愿的全部想法，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盟友们不得不自行推进。[53]

国民议会的成员们满怀愤怒和焦躁，密切地关注着这些事件。几天以来，国民议会大厅外的广场成为所有反对赦免国王的人群的聚集点。尽管大规模的国民自卫队已严阵以待，但是代表们始终没有痛下战书，

他们从充满叫嚣谩骂、指责代表们背信弃义，有时甚至挥舞起长矛的愤怒人群队伍之间，走向他们的席位。[54] 如此这般的放肆和混乱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持续数月之久，现在掌控着国民议会的温和派被彻底激怒了，他们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对抗示威队伍，彻底摆脱来自民众的威胁。7月16日，市长巴伊被召唤到国民议会前，大会公开斥责其纵容群众的行为。夏尔·拉梅特尤为坚定和强硬，他认为，所有的动乱都是由少数麻烦制造者煽动而引起，这些人可能得到外部反法势力资助，故意误导巴黎人民背弃自己的最佳利益。他严厉地批评市长和市政领导们“对这种混乱视而不见”，并要求他们用“宪法允许的一切手段找到并惩罚煽动者，而且应保证全体公民的和平与安宁”[55] 。

整个7月16日下午和晚上，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及其盟友决定，无论雅各宾党人是否支持，他们都将在第二天举行大型的请愿签字仪式，为此他们做出了精心的计划。来自整个城市的激进分子将于早晨七点在拆毁的巴士底狱附近的露天广场集合，然后穿过城区前往战神广场，这条路线正是三天前市政和国家领导人在7月14日的欢庆活动中走过的。这里的象征意义似乎很明显：博爱社团正在取代那些他们不再承认其权威的行政精英。反对党领导人也渴望维持和平示威，并且发出声明称没有人携带武器，甚至没有一刀一棒。然而，一些人明显地预感到了麻烦，据说为了防范自卫队队员的阻挠和驱赶，他们在口袋或围裙里装满了石块。有几个男人在他们的外套里藏着手枪。[56]

游行队伍最终没能穿越城市。拉法耶特和他的下属已经获悉了激进分子的计划，并部署了国民自卫队在前一天晚上严加监控，随时随地驱散在街上聚众开会的人群。第二天一早，7月17日，星期日，当大众社团和社区团体试图在巴士底广场会合时，他们发现数百名自卫队队员已经占领了该区域并竭力阻止他们前进。经过一段时间的惊慌失措后，示威者放弃了集体游行的想法，并采取一切可能的路线分散前往战神广场。[57]

尽管组织者付出了努力，但是白天还是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有几次人们向街道上的自卫队队员投掷石块，还有一个人甚至试图向拉法耶特射击——虽然手枪最终未能开火。然而，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体育场，它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中午，在博爱社团及其支持者开始到达之前，邻近战神广场的社区中有一群人发现两个人隐藏在广场中央的祖国祭坛下。这两个人分别是一名年轻的假发制作商和一名安着假肢的年长男子，被发现时正蹲伏在一堆食物、酒和一些木工工具旁。后来有评论员相信，这两人可能只是计划在游行队伍穿过祭坛签署请愿书时，从祭坛下钻孔窥探前来的女人们。然而，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谣传他们要用炸弹对付爱国者。人群中的一些人试图押送这两个人到地方当局进行质问。但其他人——在一群住在附近的船夫、洗衣工和其他工人的带领下——抓住这两名男子并将其拖拽至路灯旁，砍下了他们的脑袋。[58]

请愿签字仪式一旦开启，一切似乎就能平稳且顺利地进行下去了。由于雅各宾派已经放弃了这个场地，新闻记者兼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坚定拥护者——弗朗索瓦·罗伯坐在祖国祭坛的台阶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开始起草一份新的请愿书，他曾在前一年12月发表过一篇有关共和主义道路的文章。新的请愿书强烈谴责路易十六，并宣布人民的意愿是结束王权和君主体制。请愿书表示，国民议会现在深受反对废黜国王的250名保守派代表的影响。虽然罗伯谨慎地避开了“共和制”这个词，但其请愿书含义却非常明确：敦促代表们“重新考虑他们的法令”并“召集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以确保“对有罪的一方（国王）进行审判，他的职位应由行政部门的一个新的组织来替代”。这显然是呼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通过全民公投来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中央权力机构。[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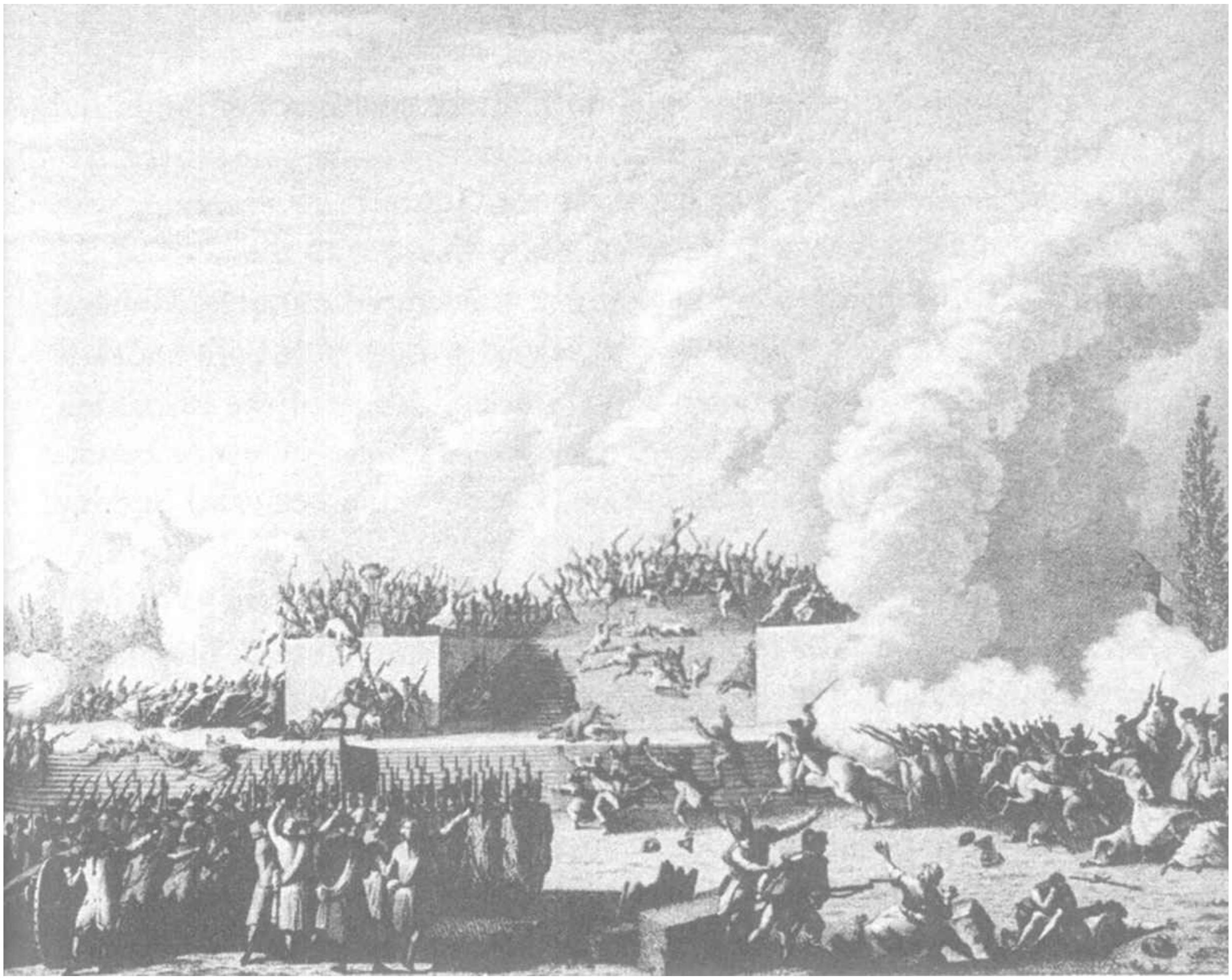
请愿书被迅速复制出七八份，并放置在体育场周围的不同位置；很快人们排起了长队前来签名或做标记。在19世纪，请愿书未被破坏之前，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我们可以从检查过原始文件的人们那里得知，在签字仪式中断时，已有约6000人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代表了全

部各阶层的巴黎人口：少数专业人士、地方官员和国民自卫队队员，以及大量下层阶级公民，有男有女，其中许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其他大约5万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也出来围观了整个活动，在炎炎夏日来一次周日户外郊游。[60]

但在国民议会看来，绝大多数民众的和平请愿，并不能掩盖早些时候的谋杀行为，也不能抹杀其对革命领导权的完整性构成的潜在威胁。大会在下午一开始的时候就再次下达针对巴伊市长和市政委员会的问责信，要求“尽可能以最有力、有效的措施，制止这种混乱，并找到其煽动者”。“现在是时候了，”来自法国西南部的代表，年轻的雄辩家米歇尔-路易·勒尼奥（Michel-Louis Regnaud）代表怒喝道，“要体现出法律的完整严谨性。”事实上，如果是由他来决定的话，他“会要求立即发布军事管制法令”[61]。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和来自国民议会的持续压力，市政委员会最终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市长在一次演讲中将整个事件与外部势力和特工人员联系在一起：“这明显是一起反对宪法和国家的阴谋，得到了那些试图分裂我们的外国势力的资助。”正是他们，“隐藏在各种伪装身份之后，大肆煽动着民众运动”[62]。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市长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或者仅仅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极力为自己辩护。但在下午五点半，让·西尔万·巴伊，开明的院士和科学家，伏尔泰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的朋友，命令在市政厅的上空升起军事管制的红色旗帜，并发布使用武力驱逐民众的法令。

六点半，在市政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和两支武装步兵和骑兵队伍的陪同下，巴伊市长从市政厅出发了。参加活动的目击者称，当他们穿过城市时，大部分巴黎人民都为之欢呼，但四下也有愤怒的嘘声，特别是在他们穿过塞纳河进入左岸区之后。在体育场附近他们与已经到场的拉法耶特将军和另外一支国民自卫队分遣队会合。[63] 此时，体育场内的示威者和看热闹的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已抵达。但是，官方军事管制法令明确规定：只有在市长连续三次发布驱散人群的命令后，才能

使用武力。示威活动的组织者敦促大家保持冷静，不要离开，直到市长发出三次命令中的第一次。



《**1791**年**7**月**17**日，战神广场上宣布军事管制法令》 军队和自卫队队员在国家祭坛上攻击共和主义请愿者，祭坛上一个人高举着请愿书。巴伊佩戴着他的市长肩带，站在左侧最显著的位置，靠近军事管制法令的红旗。

当第一批武装自卫队穿过大看台进入通往体育场的通道时，许多示威者开始大声抗议：“拒绝刺刀，拒绝红旗！”不久之后，一些人从周围的看台上向自卫队队员投掷石块。此后发生的事情有些混乱，目击者的说辞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过了一会儿，枪炮声响起，子弹从巴伊身旁擦过，击中一名骑兵的臀部，骑兵应声跌落下马。震惊于群众们的暴力反抗，自卫队紧接着快速进入，伴随着密集的战鼓鼓点，他们占据了体育场内的位置，从北侧直面中央祭坛。没有任何正式的驱散命令

遵照法律明文规定的那样发布。士兵们称，他们起初多次朝着空中鸣枪以示警告。但是，随着雨点般密集的石块砸在他们身上，还有一些示威者试图毁坏他们的战鼓，自卫队开始向人群开火。首当其冲的是看台上的人们，紧接着还有体育场上的一些人。不久，第二列自卫队队员从祭坛的另一侧朝北进入，以钳形队型前进，控制住了很多示威者。很显然，有些骑在马背上的士兵们甚至追击体育场外的人们，将他们驱赶到周围的田野和花园里。铁骑践踏了一些人，其他的人被他们用军刀砍倒了。根据当时在场且一点儿也不赞成抗议者的老人尼古拉-塞莱斯坦·吉塔尔·德·弗洛里班的描述，军队的武力驱散至少持续了三分钟。恐慌在人群中爆发和蔓延，“为了自救，人们四下逃窜，妇女和儿童被撞倒遭到踩踏”。他报告称，许多伤亡人员都是围观的群众，“各种各样的人只是被好奇心和周末美丽的天气吸引到这个地方来的”[64]。

当军队最终停止袭击时，体育场内或周围的田野上，躺着数十名或受伤或死亡的男女。没有人仔细核算过具体的伤亡人数。巴伊本人在第二天的报告中声称只有十二名示威者和两名士兵遇害。当听到巴伊的声明时，一向都很谨慎冷静的吉塔尔被激怒了：“他的数据不对！这太离谱了！每个人都知道死了很多人！”一位附近的居民参观了体育场外的医院，他证实在医院里看到“到处都是已经死去或将要死去的人”。同时代的各种统计数据范围从几十人到两千多人不等。但是，弗朗索瓦·罗伯声称，他当时与玛丽-让娜·罗兰及其丈夫成功逃离现场并躲藏了一段时间，目睹了大约有五十人死亡，更多人受伤。这是巴伊在恐怖统治时期接受审判时依据的数字，它可能代表了历史学家们最准确的估算。[65]

国王的出逃和国民议会为应对此事件做出的努力，导致了巴黎郊区的流血事件。即使是那些支持国民议会决定的巴黎人——毫无疑问这是很大一群人——都对战神广场的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吉塔尔写道，没有人会忘记“这次可怕的暴行”[66]。

注释

[1] 此段以及下一段，参见Tackett，*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chaps. 1-4。

[2] Maupetit，21 （1905）：213-214；Geoffroy，letter of June 19，1791；Périsse Du Luc，letter of September 12，1790；Vernier，letter of December 6，1790；Tackett，“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162-169.

[3] Campmas，letter of August 24，1790；Lafayette，3：175.

[4] Tackett，“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164；Michon，chap. 8.

[5] Basquiat de Mugriet，letter of May 31，1791.

[6] Mousset，255-256；Feuillet de Conches，2：48-49；Gower，79；Michon，chap. 8.

[7] Thibaudeau，143；Gaultier de Biauzat，2：367；*AP* 27：358；Lombard-Taradeau，360；Toulongeon，2：2n.

[8] *AP* 27：369-372；Maupetit，22 （1906）：475；Faulcon，423. See also Carrot，1：73.

[9] Lafayette，3：75-76.

[10] *AP* 27：359，esp. speech by Camus；Faulcon，429-430；Lévis，5 （1929）：273.

[11] *AP* 27：410-412；Geoffroy，letter of June 22；Toulongeon，2：2n and 8n；Thibaudeau，146-147；Roland，2：307.

[12] Thibaudeau，153；*AP* 27：359.

[13] *AP* 27：363，365-366，369，386，521；Gower，96.

[14] *AP* 27：360，423.

[15] *AP* 27：478；Faulcon，422；Maupetit，22 （1906）：475；Rochambeau，1：380；Dumas，1：486-487；Geoffroy，letter of June 22；Basquiat de Mugriet，letter of June 24；Thibaudeau，141.

[16] *AP* 27：394-395，400.

[17] *AP* 27：362；Faulcon，427；*AP* 27：370；Fricaud，letter of June 24；Thibaudeau，153；Lévis，5 （1929）：272；Ferrières，362.

[18] *AP* 27：365，386；Faulcon，424.

[19] Basquiat de Mugriet，letter of June 24；Fricaud，letter of June 24；Lepoutre，431，487；Ménard de La Groye，395；Durand，letter of June 26；Gantheret，letter of June 24；Faulcon，440-442；Pétion，191；Bouchette，600-601.

[20] Lafayette，3：99；Ferrières，368；Lindet，287；Durand，letter of July 3；Lafayette，3：100.

[21] Ferrières，361；Gaultier de Biauzat，2：370；Rabaut Saint-Etienne，“Correspondance，” 265；*AP* 27：24-26.

[22] 1码等于3英尺，即0.9144米。——译注

[23] Legendre，70-71.

[24] Gaultier de Biauzat，2：384；Gantheret，undated letter （July 1791）；Thibaudeau，161-162.

[25] *AP* 27：517，538.

[26] *AP* 27：520-521，536-543，617-618.

[27] Lindet，289；*AP* 27：543-544，552-553；Lafayette，3：95.

[28] *AP* 32：545-570.

[29] Legendre，letter of July 2；Morris，2：211；Roger，74. 官方的司法问询是从7月11日才开始的：Bimbenet，3。

[30] Lindet，293.

[31] *AP* 27：602-660；Bouillé，252-253.

[32] *AP* 27：565；AD Aisnes，L 12 and L 78.

[33] Irland de Bazôges，letter of June 29；Lévis，5 （1929）：276；Vaudreuil，letter to his constituency：AN D XXIX bis 36 （1），dos. 368；*AP* 28：91-98.

[34] Walter，97；Tackett，“Conspiracy Obsession，” 704-706.

[35] *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 no. 82.

[36] Aulard，*Jacobins*， 2：533-538；Bouchette，599；Lafayette，3：84；Gaultier de Biauzat，2：369；also Faulcon，430；and Roland，2：304.

[37] Aulard，*Jacobins*， 2：554-626.

[38] *AP* 28：231-336.

[39] *AP* for July 13-16：28：231-247，255-271，316-336，377-378.

[40] *AP* 8：642.

[41] *AP* 28：245，258；Arnaud，241. 瓦迪耶在这之前只发言过六次。

[42] *AP* 28：326，362.

[43] *AP* 28：260-261，317-318.

[44] *AP* 28：330.

[45] 参见戈蒂耶在奥拉尔的演说，*Jacobins*， 3：15。

[46] Thibaudeau，167. 玛丽-让娜·罗兰认为，大约有四十名代理人反对委员会7月15日的提案：Roland，2：328。

[47] 例如，参见Gaultier de Biauzat，2：381-382；Basquiat de Mugriet，letters of July 9 and 10；Roger，75-76；Thibaudeau，161-162；Dubois，373-375；Maupetit，22 （1906）：480-482。

[48] Arriveur in Dubois，373；Faulcon，443-444.

[49] Faulcon，443-444；Gantheret，undated letter （July 1791）； also Durand，letter of July 17.

[50] Gantheret，undated letter （July 1791）； Durand，letter of July 17；Lindet，297-298.

[51] *Le babillard*， no. 34，July 17；Panon Desbassayns，202；Ruault，249. *Journal de Perlet*， no. 711，July 17；Roland，2：331-332；Morris，2：219-220.

[52] Mathiez，116-120；Lacroix，386-387，391；Aulard，*Jacobins*， 3：

16；Roland，2：331-332；*Chronique de Paris*， no. 197，July 15.

[53] Aulard，*Jacobins*， 3：15-18；Mathiez，122-128，340-343；Lacroix，392，394-395；Bourdin，277；Braesch，142 （1923）：201-202，143 （1923）：10-13；Roland，2：333-334；*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113.

[54] Thibaudeau，162；Gaultier de Biauzat，2：386；Legendre，letters of July 16 and 18；Gouvion to Bailly，July 15：BN Ms. Fr. 11697.

[55] *AP*， 28：363-364，372；Lacroix，367.

[56] Mathiez，125-127，129-130，344-345；*Le babillard*， no. 35，July 18；Roland，2：334.

[57] Lacroix，399；*Le babillard*， no. 35，July 18；Roland，2：334.

[58] Mathiez，136-144，269-270，345-347；Guittard de Floriban，73-74；Ruault，258；*Chronique de Paris*， no. 199，July 17；AN F7 36881 （Seine）.

[59] Mathiez，131-136；Lacroix，431-432.

[60] Braesch，143 （1923）：36-39；Lacroix，432；Mathiez，136-138；Rudé，90-91.

[61] *AP*， 28：380；Lacroix，402；Mathiez，138.

[62] *AP*， 28：399-401.

[63] Lacroix，403-407；*AP*， 28：399-401；Mathiez，274，279-281，350.

[64] Guittard de Floriban，73-74；Alexandre，140-141；Ruault，253-54；*AP* 28：399-401；Lacroix，407；Mathiez，144-148，274-282.

[65] Guittard de Floriban，74；*AP* 28：401；Lacroix，432；Ruault，253-254；Roland，2：337，339；Carrot，1：82；Mathiez，148，269-270；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58.

[66] Guittard de Floriban，74.

第六章　各省的恐慌和镇压行动

对于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巴黎人以及之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在战神广场上发生的大屠杀是国王出逃后最具戏剧性的事件。然而，巴黎人口在1791年只占法国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城镇和村庄中，常驻人口有2800万或2900万，巴黎约有70万人。在不离开塞纳河岸的情况下，很难理解瓦伦事件在辽阔的法国领土上——从北海到地中海，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布列塔尼半岛到阿尔卑斯山——会产生如此全面的影响及一系列的后续反应。

在巴黎以及外省地区，国王出逃继而被捕的消息引起了异常的轰动。教区神父兰代写道："法国遭受了电击般的重创。它以惊人的速度从王国的一端传向另一端。"[1] 最初，消息由官方信使从首都巴黎发出。拉法耶特将军一获悉君主已于6月21日清晨消失，就立马委派一些值得信赖的下属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各个道路骑行追捕，以全力寻找和阻止王室出逃。几个小时之后，国民议会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派出自己的信使携带代表们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向国王最可能的出逃方向——奥地利和德国边界追去。[2] 紧接着，一批非官方的信使也从首都被派出。国民议会的几名代表雇用私人骑手，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他们的选区，这些骑手在所经之处任意地散布着这个消息。一些巴黎俱乐部，甚至临近地区的俱乐部似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法国北部的圣康丁市（Saint-Quentin）最先从四国区（Quatre-Nations Section）得知了此事，很可能是由科德利埃俱乐部从中教唆和煽动的。巴黎的报纸也敏锐地利用这起突发事件，编辑加工成各种版本的新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各个省份派发。[3]

一旦消息突破首都的重重围墙，它就会通过地方的通信网络迅速产生共鸣，这与两年前“大恐慌”（Great Fear）的传播方式极为相似，由各种各样的人——有的骑在马背上，有的坐在马车里，还有的徒步行走——传播至全国各地。碰巧在旅途中的人们和临时的地方信差纷纷加入官方信使的队伍中。通过非官方渠道听到消息的市民和村民变得越发紧张，因为有时会出现各种混乱和奇异的说法。巴勒迪克（Bar-le-Duc）的市民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焦虑感也在逐步累积，同时我们等待着更多的消息传来。”出于担忧，官员们把自己的信使派回道路沿线，以寻求确切的信息和更多的细节。很快就有一群骑手冲向各个方向打探，所有人都与路过的人交换着或真或假的消息。[4]

到了6月21日星期二的午夜，国王失踪的消息已经在一个变形虫形状的区域内沿着主要道路传播，延伸至巴黎城外约一百英里的地区。[5]信使们在通过城门时，遇到了过分热心的守卫卫兵的阻拦——他们几乎暂停了所有的行动。由于这番耽搁，使者们几乎刚走过东边的马恩河畔沙隆和北边的康布雷（Cambrai）。但在周三结束的时候，他们以每小时大约五六英里的速度不分昼夜地飞速疾驶，“如同火炮发射轨迹上的尾焰”。王室出逃的消息已经到达了北部的大部分边界地区，东部的梅茨和南锡，西部的鲁昂和南部的穆兰（Moulins）。[6]一名使者——可能是受布列塔尼地区国民议会代表的委托——甚至到达了位于卢瓦尔河口的南特市。截至周四，事件覆盖范围已经到达与德国和瑞士相邻的东北边界以及从敦刻尔克到拉罗谢尔的大部分大西洋海岸地区——不包括布列塔尼半岛。早上五点左右，骑手们进入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到了当天晚上十点半，他们已经到达了全国第二大城市里昂。星期五黎明时分，这个消息传到了波尔多大海港，并一路沿着加隆河到达图卢兹，信使大约在晚上八点抵达了这里。星期六，在第五天结束时，信使们到达马赛和地中海，沿着海岸向东远至土伦港（Toulon），向南远至距离西班牙边境不到20英里的佩皮尼昂

（Perpignan）。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终于抵达布列塔尼半岛的一端——布雷斯特（Brest）。但是要传到位于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中央高原最偏远的山村，还需要一两天的时间。但是奥蒙村（Aumont），这个只有沿着山路穿过热沃当（Gévaudan）东南部山区才能到达的地方，在接下来的一周开始时仍未被通知到。[7]

一旦路易和他的随行人员被认出并被拦截，另一波新闻就从瓦伦以同样的方式传播出去。理发师芒然带着他的消息夜以继日，快马加鞭，不到二十四小时就抵达了国民议会。但在其他地方，第二次新闻浪潮的速度往往稍微缓慢一些，也许是因为它主要由地方信使链来传播，直到6月23日官方通知才从首都巴黎分程传递出去。它仅在国王被捕后的第五天就到达了波尔多，第六天到达图卢兹，第七天早上到达佩皮尼昂。在多个信息来源的交替传播之下，人们困惑于消息发生的先后次序和不可思议的逆转，许多城镇在获悉国王从杜伊勒里宫失踪的几小时之后——在某些地方甚至是之前——就得知了国王在瓦伦被抓捕的消息。[8]

这是那些会对人们的情感产生强烈影响的事件之一，人们会深深铭记当他们最初听到这一消息时自己在哪里，正在做什么事情。根据不同的使者们到来的日期和时间点，人们或在田间劳作，或在他们的商店里工作，或在参加圣体节游行，或半夜在家中熟睡却被教堂的钟声唤醒。在一些城镇，市民正在召开公民大会，他们被召集起来选举新的立法机构，这时，“国王失踪的悲惨事件使每个人都陷入混乱”[9]。几乎在任何地方，公民还在用动人的文字描述着国民议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人们陷入了强烈悲痛、惊慌失措和难以置信的情绪之中。在南部小镇奥赫（Auch），人们“高涨的情绪已达到顶峰”；在巴黎北部的博韦（Beauvais），“每个人都对这场使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可怕事件充满了强烈的悲伤之感”；在法国中部的沙托鲁（Châteauroux），“人们感觉自己跌落不幸的深渊，并且备受折磨”。蒙莫里荣（Montmorillon）的雅各宾党人对瓦伦事件前夕的回想一定可以准确地代表大多数其他人的感

受。革命终于接近尾声了，反革命的威胁也已经消失，希望近在眼前，现在就要恢复正常的生活了："但是国王的失踪粉碎了我们所有的希望，并警告我们不要指望他还能回来。"[10]

博爱的意义

直面这一全国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紧急状况的，是新成立的地区政府的官员们。大革命给行政管理系统带来了戏剧性的重组和民主化，旧制度下由国王任命的三十多名行政长官被数千名民众选举出的官员所取代。正是他们供职于法国一直延续至今的新的行政划分体系：83个省、500个区和4万个大大小小的市镇。这些官员很少或完全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因此前一年一直在接受大规模的在职培训。他们时常在国民议会传达给他们的涉及经济、财政、宗教和农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大量新法律和指令面前头痛不已。然而，在大多数地方——尤其是省、区以及大城镇一级——新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他们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和支持革命，并且已经做好准备，充满信心并下定决心要尽其所能履行职责。

突如其来的危机催促着官员们行动起来，迅速组织了紧急委员会，将各个区域的不同权力中心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在典型的区域性首府——里昂、博韦或奥赫——省级当局召集了来自区政府和地方市镇议会，以及主要法院、爱国俱乐部、国民自卫队和常备军的代表。如果一个城镇被划分成多个邻里社区——就像大城市那样——或者如果恰逢选举集会，那么这些社区团体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因此，在东北部的小城蒂永维尔（Thionville），一百多人在几分钟内挤进了市长的办公厅，这是当时这里最大的集会空间，许多人在接下来的三天不分昼夜地逗留在此。[11]

无论这种集合的方法是不是最有效的危机管理手段，但它确实提供了当时亟需的众志成城的团结意识。特别是在多层级政府并存的大区

中，往年在省和区，或区和市镇，或省和市镇之间常常出现激烈的对抗和斗争。[12] 但是现在，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突发状况，团结一致和通力合作成为各地官员的首要选择。许多爱国者向国民议会提交的信函可以证明这种新出现的融合感。位于英吉利海峡的迪耶普（Dieppe）的领导人写道："在这个城镇里实现了不同权力机构之间最大程度的联合和统一。"在里昂，爱国者相信他们的安全取决于"所有权力的迅速统一，以及这种力量激发出的普遍信心"[13]。为了强化共同使命感，圣康坦市要求所有男女佩戴特制的丝带，上面印着"团结起来！不自由毋宁死！"的字样。实际上，在许多城镇，地方当局下令所有公民佩戴革命帽徽——三色的公牛眼睛徽章，以此来表明自己全心全力求团结。当时这个徽章已经成为巴黎爱国者的象征之一。[14]

更加戏剧性的团结象征是，几乎所有地方的人们在得知国王失踪后组织的情绪激昂的宣誓。法国中部小镇瑞亚克（Juillac）的居民生动地回忆起这个消息到来的那一刻，当时他们正聚集在一起召开选举大会。起初，所有人都呆愣在"哀痛的沉默之中"。突然，议会主席站起身来，单手举向天空，发出慷慨激昂的誓言："我发誓将凭借自己的最后一滴血，誓死捍卫国家、法律和国民议会。我发誓不自由毋宁死！"紧接着，所有在场的人立刻起身，举起手，齐声高喊："我也发誓！"然后，所有人离开了房间，带着一种新的使命感，走向市政厅，在那里，当地的雅各宾俱乐部和国民自卫队的成员也宣读了类似的誓词。[15]

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里，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男女老少、国民自卫队队员、士兵，甚至包括一些爱国贵族和神职人员——全都高声且清晰地喊出了自己的誓言。甚至在6月23日巴黎发表类似宣言之前，他们就怀着一腔热忱自发这样做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以"国民议会"替换了以前惯用的宣誓誓词中的"国王"。在接近奥地利边界的瓦朗谢纳（Valenciennes），人们纷纷"发誓为捍卫自由和全民族的福祉而流血牺牲"。图尔市的宣誓仪式在卢瓦尔河畔举行，"一千种声音"在一个誓言

中合并在了一起，他们发誓即便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宪法。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圣马洛城墙下，有4000名武装自卫队队员以及2000名妇女和儿童宣誓效忠国家和宪法。在法国中南部的卡奥尔（Cahors），女性和男性一样发表誓言，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单独的席位："站在庭院里的女性模仿着旁边的男性，以动人的方式重复着他们的手足之情和爱国之情。"[16]

在危机时刻，法国人几乎可以说痴迷于宣誓，所有的人都在说着几乎每个人都熟悉的象征性语句。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种庄重严肃的誓言不仅保留着一种宗教特征，而且依旧是进入军队、神职人员队伍或法院的必要行为。受过教育的人都熟悉这种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宣誓传统——这种传统在革命初期，被国民议会激动人心的誓言赋予了新的迫切性。1789年6月17日国民议会成立时的宣誓以及三天后的网球场誓言已经广为流传，鼓舞着全国人民充满激情地仿效。更为普遍的是1790年2月和7月的宣誓浪潮——后者是全国庆祝联盟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早些时候的宣誓则在大家平静的时刻宣读，略显深奥和抽象。现在法国人发现他们面临着外敌入侵和战争的真正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如此剑拔弩张的时刻，他们常常附上"不自由毋宁死"作为誓言的结尾。对于那些即将生活在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的人们来说，国王以往是国家团结的纽带，现在，宣誓被赋予了额外的意义。它是爱国联盟看得见的象征，也是人们为了国家社会的更高利益而共同努力和牺牲的意愿。通过这种方式，1791年6月的巨大宣誓浪潮，在缓解焦虑和灌输共同使命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7] 这是法国民族主义出现的一个信号。

外部的敌人

但是，拥护誓言和为国家而死的决心本身并不足以应对危机。整个法国的紧急委员会都面临着必须对社区可能遇到的各种危险做出快速回应的挑战。国民议会最初的法令只提供了粗略的行动纲要。6月22日印发的公告命令行政官员暂停一切人员、武器装备、军需品、贵重金属和马匹的跨边境流动，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法律和法令以及保卫国家”[18]。但是，不同区域的地方人民在解读和执行这些法令时，方式各有不同。

对于毗邻边境和海岸沿线的城镇来说，最直接的担忧是来自国外的威胁。对于巴黎和外省的很多人来说，国王出逃的含义显而易见。无论路易是出于自愿或是被诱拐，每个人都预料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一旦王室离开法国，战争似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恶果。对于距离边境只有几英里的梅济耶镇（Mézières）而言，“国王想要出逃成功只能由奥地利皇室的权威来确保，后者对法国发动战争的意图昭然若揭”。多勒市（Dole）接近瑞士和德国边界，市政官员们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应该考虑自己可能要陷入战争和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并且他们发布了动员整个社会的详细指令，在执行这些指令的过程中，所有公民将为保家卫国而贡献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19]

边境或沿海地区的领导者们几乎在得知危机的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国民自卫队和正规军，建立防御战线以防外敌入侵。斯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主动在莱茵河上下游派驻自卫队。靠近卢森堡的法国北部边境城市龙韦（Longwy），下令敦促所有边界社区武装自己，并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普罗旺斯在与意大利接壤的各个地方都建立

了防护警戒，在佩皮尼昂，特遣队受命保卫接近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山口和地中海沿岸要道。大西洋沿岸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波尔多和迪耶普暂时关闭了他们的港口，远瞻性和行动力远远超出了巴黎的指示。鲁昂在英吉利海峡从勒阿弗尔（Le Havre）到勒特雷波尔（Le Tréport）的省界建立了观察所。布列塔尼当局沿着南部海岸部署了信号链，以迅速传达可疑讯息。[20] 即使在离海岸或边界还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民兵们也应召巡逻街道并驻守城门和桥梁。锈迹斑斑的大炮也被投入使用，用来守卫地方军火库和公共财产保险箱。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市政厅、法院、省和区的办公大楼——都部署了防御工事，以阻止那些让人担心的随时而来的威胁发生，尽管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威胁。[21]

法国东北部地区的形势尤其紧张。这是国王在他企图出逃时穿过的区域，无须什么神机妙算也能够断定他已经前往奥属尼德兰边界。由于布耶将军和他的全体参谋人员已经逃往敌方，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无领导状态，行政当局不得不临时介入并尽可能地发挥作用。[22] 沿着边界地带从梅茨到济韦（Givet）和洛克鲁瓦（Rocroi），市民志愿者组成的部队和爱国士兵们一起冲上前沿堡垒，这些防御工事自三十年前上一场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破损失修状态。在色当市，行政人员甚至组织了一个专门为保卫祖国而举办的特别纪念活动，这个纪念活动十分合宜地正遭逢圣体节。庆典结束后，大约三千名公民联合附近驻扎的步兵，一起开始修复城墙和护城河以保卫城镇。[23]

但尽管大批公民队伍可以帮助支撑防御，但他们对武器问题无能为力。几乎所有的市政当局都发现他们的火枪和火药储备严重不足。布耶将军秘密地从洛林的大部分要塞中转移了武器军备，将他们集中在蒙特梅迪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国王。当地方行政官员们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许多人都断定这是一起阴谋的一个环节——在外敌入侵前削弱内部防御能力。在法国东北部的每个地方，在瓦伦事件发生后的每一个小

时、每一天，人们开始严阵以待敌军的到来。所以，如果有些人已经看到了他们，这也不足为奇。[24]

席卷法国东北部的入侵恐慌的来源是可以被精确认定的。6月22日早晨，仍然寄希望于拯救国王的布耶将军，命令一个由法国资助的瑞士步兵团从梅茨向西行进至距瓦伦只有十英里的默兹河。事实上，当那天晚上该团到达目的地附近时，大多数瑞士士兵发生了叛变并拒绝向前推进，他们宣称没有拿到向法国人民开战的报酬。军官随后逃跑，其余瑞士部队井然有序地撤退到了凡尔登。但是，这一事件就发生在极度紧张的时期，几百名全副武装讲德语的士兵跨越国界，行进了很远的距离，这种可疑的行动在当地居民中引发了不小的骚乱。[25]

6月22日下午晚些时候，凡尔登当局向周围的村庄发出通知，称一支军队正在向瓦伦行进，所有能够召集的国民自卫队必须挺进默兹并在必要时烧毁所有桥梁，以阻止敌方进攻。此后不久，惊慌失措的瓦伦领导者们发出了他们的紧急呼救。[26] 几小时之内，之前传播国王被捕消息的信使链再一次启动，宣布“敌方”部队即将到来，战争迫在眉睫。在接下来的第二晚，国民自卫队动员起来，跨越全国各个区域前来支援瓦伦。

一些城镇和村庄在转达请求援助信息时，总是夸大其实。在恐惧和紧张的气氛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误解和沟通不畅。但是，那些吓坏了的官员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夸大描述，以确保形势的严峻程度足以唤醒他人、得到援助，同时也能够为自己的极度恐慌增添佐证。因此，当克莱蒙的市民在传达瓦伦的请求“飞速武装前来支援你的兄弟”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这个消息，宣布战斗已经在爱国者和“敌人”之间爆发了。当消息向南传到下一个村庄时又被进一步渲染，称现在正在发生激烈的战斗，有许多法国公民已经被杀害。第二天早上，当消息传到默兹省南部边缘时，“敌人”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威胁不再是来自法国雇用的瑞士兵团，而是来自“帝国”本身，一支正在入侵的奥地利

军队，据说现在已经跨越默兹河迅速前进。[27]

与此同时，这则消息向西横穿阿尔贡森林，抵达圣梅内乌尔德。这个小镇刚刚从一个疲惫和难熬的夜晚中恢复过来。与达马的德国龙骑兵对抗，国王和王后的突然出现，以及舒瓦瑟尔公爵的跨国骑兵就在该镇的北边激战并且造成了破坏，都使得这里的公民正处于极度的惶恐之中。现在他们听到，或者想象他们听到奥地利士兵已经攻占并摧毁了瓦伦，直接向西挺进，并且很快就会来到圣梅内乌尔德——或许正在计划着惩罚他们，就像惩罚瓦伦那样——因为他们都参与了抓捕国王。圣梅内乌尔德的人民急切地呼吁着请求支援，他们写道："帝国军队已经洗劫了瓦伦，以祖国的名义，我们恳求你前来帮助我们。快！我们缺乏武器和弹药，尤其缺乏人手。"[28]

到6月23日早上，传闻中的入侵产生了一波恐怖浪潮，与1789年的"大恐慌"没有什么不同。到了九点，消息到达马恩河畔沙隆，此时王室刚刚返回巴黎。谣言迅速传遍了整个城镇——奥地利军队已经到达城门外。不久之后爆发了骚乱，人们拼命寻求武器来自保。市政厅的门被推倒，市长被愤怒的人群包围，被迫打开市政军械库，然后从一个二楼的窗户跳了出去，继而逃生。恐惧于想象中的奥地利士兵和市民呼吁行动的吵闹抗议，官员们动员了整个省的国民自卫队，敦促所有公民都前来援助："拿出勇气来！让我们敢于捍卫我们的自由！"[29]

对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入侵法国是为了夺回国王这一点现在看起来已经显而易见。基于这一点，恐慌紧随着国王的返程队伍一起回到巴黎。街上到处都是国民自卫队，有时其中还掺杂着妇女和儿童，他们向瓦伦或克莱蒙或沙隆挺进，施以援手，或是当发现敌人已经"撤退"时返回自己的家园。成千上万的人正匆忙地加入到护送国王回巴黎的队伍中——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奥地利抢走。天气炎热干燥。无数的行军男女在香槟北部的垩白土壤中扬起了层层尘土。灰尘、混乱、鼓声以及夜晚或黄昏沉重缓慢的脚步声，很容易让人草木皆兵，以为最令人担

心的入侵军队就在山的那边，或者在河对岸的树林里。

在两天之内，这个可怕的消息几乎传遍了整个香槟，以及洛林省、皮卡第省和法兰西岛的部分地区。在洛林，位居要塞的梅茨市在两天时间内第二次动员国民自卫队前往凡尔登。梅茨以北的蒂永维尔（Thionville）也得知了外敌入侵的消息，但是并不清楚袭击会从哪个方向来。人们预期位于东部稍远处的德意志邦国将要入侵法国，因此打算毁坏摩泽尔河（Moselle）上的所有桥梁。与此同时，到处敲响的教堂警钟加剧了恐慌，钟声从一座村庄传递到另一座村庄，一直涌向西北方的沙勒维尔和北部边界。当兰斯市的公民听到传言后，他们继续向西边的苏瓦松（Soissons）和拉昂（Laon）传播消息，到6月24日早上，恐惧已经跨越瓦兹河冲入皮卡第省。现在威胁已经大到史无前例。据说，国王已经被四万到五万奥地利军队拦住了——还有人说六万。他们已经摧毁了瓦伦和圣梅内乌尔德，并且已经跨过沙隆，所经之路沿途蹂躏践踏，所到之处“肆意烧杀”[30]。前一天的下午，有关东部外敌“入侵”的谣言煽动巴黎的“平民百姓发生了暴乱”[31]。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法兰西王国的其他四个地区也遭受了类似的入侵大恐慌。西比利牛斯山区的士兵和走私者之间的一场枪战引发了西班牙军队越过边界和三个山谷向法国西南部进军的谣言。很快，来自波城到巴约纳以及更北的波尔多地区的几十个团体加入国民自卫队与敌人对抗。[32] 顺着中部大西洋海岸，“圣伊莱勒德里耶（Saint-Hilaire-de-Riez）附近出现了几艘无名帆船”的消息促成了一份英国入侵的报道，并在普瓦图省的大部分地区广泛传播。[33] 在布列塔尼半岛地区，国民自卫队和正扬帆移民到泽西岛的贵族在圣马洛附近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斗。这场战斗引发了另一个谣言——四十艘英国船只已经运送六千人的军队登陆法国，现在正沿着海岸线向西移动。从雷恩和布雷斯特（Brest）动员而来的国民自卫队迅速因“入侵者”而会合，共同抵御外患，保家卫国。[34]

然后，几乎和它们爆发时一样迅速，各种恐慌又突然间消失了。来自“入侵地”的紧急消息很快就清楚地表明了没有外国军队出现——或者他们出现过，但现在已经“撤退”了。国民议会采取种种措施来谴责这些毫无依据的消息。同时谣言也遭到了一些当地行政管理者的怀疑。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入侵”恐慌都发生在1789年“大恐慌”基本没有触及或完全未曾触及的地区。但是一旦谣言传播到先前经历过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大恐慌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常常对之报以怀疑。例如，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一个曾遭到大恐慌洗礼的城市，区领导人认为，传闻宣布的入侵是如此不可思议和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他们怀疑这个消息肯定来自敌人的捏造和虚构，它是一个扰乱国家的阴谋。他们不仅拒绝散布传言，而且开始着手调查虚假信息的来源。[35] 尤其是精英阶层，早期普遍暴力和无政府状态的记忆，似乎使他们对遭遇假想敌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慌产生了“免疫”能力。

内部敌人

在法国的其他地区，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发生暴乱的地方，国王的突然消失引起了人们对潜在的外部入侵的畏怯。但这场危机也暗中滋生了对内部敌人——密谋反革命的恐惧。阴谋论的世界观在革命时期并不罕见。数百年间，人们将粮食短缺归咎于不同的群体暗箱操作以谋取利益，或者是为了报复之前遭受的种种不公而进行的流氓攫取。尽管当时已出现了基于合理的“科学”解释的新分析模式，例如，把饥荒与气象条件、交通不便联系起来，大多数人依然把自身所经历的一切不如意与一些个体故意为之的密谋行动结合起来。[36] 即使是更加开明的外省社团人士，这样的假设在大革命的背景下也并非绝无仅有。爱国者们很清楚，1789年以来发生的转变，已经非常成功地特别激起了两个阶层团体的强烈反对——贵族和神职人员。

尽管有一小群自由贵族早已卷入大革命的洪流中，但贵族阶层中的绝大多数对革命事件本身都心怀不满。他们不仅对国民议会攻击自己的特权感到生气，更因1790年6月“贵族”地位遭到抵制而感到愤怒。在他们的社会种族观点中，制定法律取消贵族阶层的存在简直是无稽之谈。就像一位男爵说的那样，“一个简单的法令可以使一棵橡树变成一棵松树”[37] 。可以确定的是，1789年夏天以后，大部分外省贵族时刻保持着警惕，谨言慎行。他们希望退休后能够回到城堡庄园或别墅中，顺利地度过风暴时期。但是仍有一些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嘲笑当地爱国者，不承认国民议会或“人权”的存在，并预测最近的变化不会持久。当他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交活动和自我怜悯时，对自己的约束就更少了，往往会对革命和革命者做出毁灭性的预言和居高临下的评论。这些由无能的

愤怒和沮丧而生发出的预测，总是会被仆人和邻居偷听到。这些话继而被添油加醋地传到社区，轻松转化为密谋反叛的证据。

阴谋论的诠释更易让人相信，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逃亡大军跨越了莱茵河，反革命分子逃离了法国，投身于结束革命的征程。现在看来，当时的军队对国家显然不能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军官，普通士兵很少。但1791年春天，对于爱国者来说，现实的威胁实在太难以估测。很难相信那些一直在社会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突然停止了他们对事件的影响和号召力。许多人确信逃亡贵族的领袖阿尔图瓦伯爵（Artois）和孔代亲王（Condé）正秘密地拉拢着各省的贵族。[38] 在路易十六出逃的几个月前，皮卡第省的一位市民向国民议会举报贵族聚集在附近的一座城堡内，他声称并坚信“阴谋正在孵化，反革命的邪恶意图正在酝酿”。在洛林南部，有报道称一位阴谋策划者正“挨家挨户”地拜访当地贵族，试图煽动他们“推翻宪法”。一封来自普罗旺斯的信声称，一个庞大的逃亡贵族网络正在形成，他们是一个具有“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的虚伪协会，立誓服从阿尔图瓦伯爵的指令。[39] 这些情况是否能说明确实存在着阴谋，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从这样的信件中可以看出，1791年春天透露的种种迹象都暗示着整个外省的贵族阶层都参与了反革命活动。

1791年以来，法国社会中酝酿的宗教危机更加剧了这种恐惧。那年春天之前，几乎一半的教区神父拒绝用国民议会指定的誓词立誓，这些“倔强难驾驭”的神父被下令替换。法国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和南部边缘地带，这些不安分地区的许多领导人都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并遭到围攻。无论哪里有拒绝发誓的现象出现，都能激起管理者对暗中勾结和隐秘阴谋的猜测，认为可能是由居住在国外并与逃亡贵族有密切联系的反叛主教发起的。早在1791年5月，巴黎东北部拉昂省（Laon）的领导们就已经开始深信“誓言危机”在本区域创造了“危机局面”，他们确信，神父的抗议行为与“国内外的煽动和密谋”密切相联。[40]

因此，当国王的出逃失败时，大多数爱国者就已经认定内部的阴谋将摧毁革命，毫无疑问，这个阴谋的策划者们还勾结了外部的敌人。一个城镇的领导人写道："王室的消失激起了人们对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愤慨。一些人的大胆言论，贵族阶层流亡出逃，神职人员拒绝宣誓，都指向一种犯罪阴谋的存在。"[41] 如何应对这样的威胁是领导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党人未来几年将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左右为难。一方面，大多数官员都遵从平等正义和法治观念，即贵族、神职人员与普通人一律平等。毕竟，这种理想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作为有财产群体的成员，官员们深刻地记得革命开始的第一个夏天——充斥着混乱和无序——他们感到焦虑不安，因为被指控的"嫌疑犯"本应由法院而非暴徒来处理。1791年6月和7月的官方指令中充满了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告诫。例如，奥赫的官员敦促每个人都应表现出"对法律的完美服从，公民！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否真的能够自由，还是我们会受到无政府状态的新枷锁的束缚"[42] 。

另一方面，公平正义和法律法规的价值依赖于新宪法的持续实施。管理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国王的骤然出逃和能够感知的密谋给革命的存续带来了威胁。会不会在真正的危急时刻到来时，不合法的镇压行为将因其出发点是捍卫国家利益而被合理正当化，正如夏尔·拉梅特所说的那样，"一时的不公正总比失去整个国家好得多"？按照这种理念，国民议会为了"维护法律秩序和保卫国家主权"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都变得模糊不清和尚有余地了。他们的镇压行为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成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43]



《**1791**年**6**月**25**日，国王出逃的密谋者的模拟像在斯特拉斯堡市被焚烧》

此外，地方官员并非毫无作为。他们总是考虑到辖区人民的意见，这些人的猜忌心理和对暴力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在6月21日之后的几天里，城市群众和国民自卫队这两大群体迫使地方领导人采取了更为严酷的镇压措施。在众多的社区中，国王逃亡继而在瓦伦被捕的消息引发了民众对当地贵族和神父的暴力袭击。[44] 有时，当局会立即采取措施和行动，转移民众的暴动情绪。卡奥尔（Cahors）的地方贵族在这方面显得创意十足，也许是想要为7月14日的庆祝活动预热，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的“联盟”仪式。仪式上有游行的自卫队和乐队，还有神职人员的爱国演讲。这些激发了人们对胜利的歌颂，以及在场男男女女对国家和法律的忠诚宣誓。在斯特拉斯堡市，以布耶将军和他的下属柯林林（Klinglin）、赫曼（Heyman）为原型的“稻草人”引起了一场喧闹。

他们被装在行进的马车上，然后在中央广场欢呼的人群前被烧毁。[45]

但对许多官员来说，对公众压力的默许似乎是英勇的表现。布列塔尼半岛的行政人员在描述这一困境时体现出了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他们在6月底写道："民众的不安和不满已达到极端程度。置身于骚动和暴乱中，我们不可能坐视不管。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他们失控，必须抚慰和包容这种盛怒的情绪……保持我们对公众舆论的支持，否则我们就无法有效地治理国家。"[46]

也许没有哪个问题比防守城市堡垒更能引起普通民众的担忧。这些据点的钥匙由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掌控，后者通常都是贵族阶层。布耶将军和他的所有追随者犯下的叛国罪加剧了人们对这些军官的怀疑。在斯特拉斯堡，在凡尔登，在敦刻尔克，在拉罗谢尔（La Rochelle），实际上在几乎每一个沿着海岸线或是靠近边界的要塞城市——行政管理者迫于民众的要求，都采取了控制当地城堡或避难所的防御措施。正如康布雷的城镇官员所述："人们认为神父和贵族是诱拐国王的始作俑者。"因此，官员们对防守城市深感压力，"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公众舆论十分危险，因为公众舆论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基本要素"[47]。

各种形式的不受法律支配的行动也来自国家自卫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全国各地，动员当地民兵组织是行政人员收到国王出逃消息时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国民议会曾颁布法令规定：当国家遭遇外敌入侵时，被列入花名册的国民自卫队队员要时刻做好准备参加战争。同时，法国几乎所有地方的男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应征入伍的洪流之中。在里昂，仅仅来自城市的新士兵就有八百多名，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拉罗谢尔，"街头或社区自发举行的公民会议确定了六个新连队的成立"。即使在南部的小村庄库萨克（Cuxac），农民自卫队也被称为"燃烧着拯救国家的梦想与渴望"[48]。

大多数自卫队都坚决拥护革命的目标。他们发誓要维护宪法以对抗所有的敌人，瓦伦的经历加深了他们对贵族和顽固派神职人员的怀疑。

出于“谨慎原则和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拒绝将部队托付给那些与革命利益相对立的个人”，因此，几个兵团迅速驱逐了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贵族。[49] 此外，如果他们想要更好地履行职责，获取自认应得的地位，这些新招募的民兵显然需要武器和弹药。国民自卫队对步枪和火药的大力搜寻，不仅有利于反革命分子的武装解除，而且可以把更多的武器交到爱国者手中。[50] 在6月21日之后的几天里，几乎所有外省的自卫队都成立了用于镇压的突击部队。[51]

法律与权宜之间

为了应对民众的压力，行使国民议会赋予的自由处理权——为保卫国家而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全国各地的行政人员实施了一系列反对“内部敌人”的举措。其中很多措施不仅触犯了法律，还违背了《人权宣言》。然而，这场危机的出现前所未有，而且阴谋的危害如此真实，以至于官员们决定应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来挫败法国社会中敌人的奸诈阴谋”[52]。

因此，几乎所有地方的官员都开始私自拆阅邮局寄来的信件，尽管法令一再强调这些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53] 洛林一个小镇的议会仔细地阐述了这种行为的合理性：“我们内部和外部的敌人们将会用尽千方百计来实现他们对国家的邪恶图谋。因此，在没有透露任何家庭秘密的情况下，我们在邮局仔细检查任何可疑的信件，也许是谨慎和明智的选择。”[54] 实际上，不同城镇对可疑信件的定义差别很大。一些官员审查了所有寄往或来自外国的信件。还有一些地方，官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顽固派主教发出的邮件，或者任何可疑的贵族或神父接收的信件上。尽管爱国者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从这些满纸喋喋不休的家长里短中发掘阴谋，但检查过的大多数信件中毫无发现和收获。大量的信件资料堆积在国民议会研究委员会的档案馆中，从来没有被递送过，它们对1791年的国民议会代表和今天的历史学家都没有什么启发。但是，偶尔，拆开的信件会对个人产生重大影响。有一份看似普通的便条，是由一个逃亡贵族邮寄给他的商业代理人的，后者居住在奥尔良附近，被称为裴迪先生（Monsieur Petit，意为“小先生”）。这封信被截获并被公布于众，导致这位代理人遭到近乎致死的刑罚，并被长期监禁在监狱里。

惊恐的裴迪如是写道：“每时每刻，我好像都听到暴徒们在呼唤着一个新的牺牲品。”[55]

许多官员还批准对游客进行非法逮捕。通过广义地界定国民议会禁止个人越境的标准，行政人员开始拦住不明身份的旅客——无论他们在哪里被发现——尤其是看起来像贵族的人，或者是那些穿着怪异、讲话奇怪，看起来有点紧张的人。显然，这不是旅行的好时候。国民议会收到了大量受害者的上诉，他们在危机之中被囚禁，有时囚禁甚至长达数周，宪法保障人身权利的保护令遭到践踏。两个比利时商人在去意大利的路上因为操着明显的外国口音，被卡奥尔的守卫打倒在地。市民为这种逮捕行为辩解道，因为担心“外国军队即将入侵，为了拯救宪法免于毁灭……我们感到有必要采取非同寻常的防范措施”。不管怎样，两人直至8月中旬仍在狱中，为遭受到的厄运而悲痛欲绝。在其他地方，当局草率地逮捕了一名穷困潦倒的单簧管演奏者，一名前往布鲁塞尔的王家马厩的医生，一名在镇上“徘徊潜行”并“遭到了所有人的怀疑”的可疑伯爵。[56]

然而，通常外省的爱国者们不太担心路过的外来人员，而是更担心当地居民，他们对一些当地居民的反革命行为产生了不信任感。在法国各地，政府官员和自卫队都仔细地检查了附近的庄园，以及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所属的修道院和教堂。他们极力寻找着反革命分子秘密集会的证据和用于反革命活动的武器和弹药。无论如何，这些武器也是爱国者们自己所急需的。

在许多外省的城镇中，“嫌疑犯”第一次作为行政词汇得到了广泛使用。这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不信任，嫌疑犯的“可疑意图”——就像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官员所说——往往非常不明确。在许多情况下，嫌疑犯的产生似乎是由个体做出的具体陈述而定，无论是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还是在瓦伦事件之后，他们都会因邻居认为他们是“因反对革命的理念而臭名昭著的公民”，而被定义为嫌疑犯。几个月前，在与朋友

共进晚餐时，一名妇女因“贵族优越感暴发”而被囚禁。依照“嫌疑犯”的判定标准，凡尔登附近的一名神父因公开地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如果国王逃脱了，就不会有场灾难”而被逮捕，他的这句话完全被断章取义了。在旺多姆，两名顽固派神父几乎被愤怒的人群绞死，仅仅因为他们侮辱了一名支持革命的神父。很不幸，在布雷斯特，官员们无法从大众的仇恨中拯救出一名贵族，因为他在歌舞厅的墙壁上留下了嘲讽一场革命仪式的“淫秽涂鸦”。在国王失踪的消息传来后不久，这位贵族遭到了杀害，他的头颅被当街示众。[57]

在其他地方，由于与移民的联系为人所知，或者因为他们自己表达了想要离开法国的意愿，一些人引起了当局的不信任。人们已经看到了裴迪先生与逃亡贵族的通信被截获后的悲惨境遇。一位名叫鲍贝特（Boubert）的年轻人在向亲戚借钱以资助自己移民之后被跟踪并被逮捕。[58] 更为普遍且毫无疑问的恐惧则是由那些传说中的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的秘密聚会所引起的。在紧邻巴黎北部的圣德尼（Saint-Denis），关于“贵族和顽固派正在秘密聚会”的报道，促使区当局在凌晨两点搜查了一名贵族的家。这位贵族声称，他的客人们来访只是为了庆祝五旬节。事实上，这次突袭既没搜到武器，也没看到神秘的陌生人。另一次相似的搜索经历发生在肖蒙昂韦克桑地区（Chaumont-en-Vexin）的一个庄园里——当时庄园的主人一家正在玩惠斯特牌——搜查者发现了九把古董猎枪和一个冯特努瓦战役（Fontenoy）中留下作为纪念的长矛，所有这些都被军械库没收充公。[59]

在某些情况下，对个别贵族的攻击似乎是出于早在革命之前的长期敌对。受到瓦伦事件的触动，兰斯附近几个村庄的自卫队占领了安布利侯爵（Ambly）的城堡，后者是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他们找不到多少武器，就强迫侯爵的妻子给他们出钱买枪，然后还带走了侯爵那吓坏了的小孙子，声称要收养这个小男孩作为他们的“吉祥物”。在这种情况下，自卫队似乎是在故意找安布利侯爵的麻烦，一方面因为他是国民议会中

一名颇有声望的保守派代表，同时也是出于对封建特权的怨恨，这种怨恨积累于村民与他们的领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斗争。[60] 更加暴力的情况发生在里昂附近的乡村，对坡雷米尤（Poleymieux）领主吉兰·杜·蒙泰（Guillin du Montet）的袭击。早在1791年之前，吉兰由于对农民粗暴无礼和拒绝接受革命，已经遭到了很多人的憎恨。瓦伦危机爆发后不久，一百多名居民抢空了他留在城堡里的大量武器。当他愤起抵抗时，一场枪战爆发了，直到城堡被席卷一空、吉兰也惨遭杀害后才结束，他的尸体被撕成碎片，抛入了燃烧起熊熊烈火的城堡。[61] 坡雷米尤事件很快被广泛传播，整个法国的人们都陷入了惊骇和恐怖之中。然而这种极端的暴力行为在危机时期并不多见。据悉，国王出逃后只有四位贵族被杀，其中至少有三人是因为长期的积怨而遭到了憎恨和报复。[62]

大多数情况下，地方领导人和自卫队进行的镇压运动是在锁定具体的目标“嫌疑犯”之后，一桩案件接一桩案件逐步实施的。但也有些时候，当局害怕存在着真正的阴谋或屈服于公众的压力，下令不经审判就搜查或逮捕整个嫌疑群体。这里对“嫌疑人”的判定并不是根据这些男人或女人的某些不恰当行为，而是因为他们来自某个特定的社会或政治团体。这种推理逻辑在普通民众中非常普遍。在入侵恐慌最强烈时期的瓦伦，一群农民和自卫队队员扑倒了一名试图与爱国者合作的骑兵指挥官。“他是一名军官！他是一个贵族！他一定是个叛徒！”他们喊着，用一种简单的逻辑，减轻撕毁一名军官的制服的罪恶感。[63]

以这种方式对嫌疑人进行分类的官方行为就更为明显了。诸如此类的集体起诉最明显的目标就是那些拒绝效忠宪法宣誓的神职人员。在那些深陷于与大量顽固分子的斗争的地区，当地爱国者对国民议会关于“宗教自由”的法令和包容安分守己的顽固分子的政策，感到极其不耐烦。拒绝宣誓难道不是对宪法的冒犯和对国家的威胁吗？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推动“意见自由”，正如一个小镇上的居民所争论的那样——但

是“亲爱的上帝，那些极端和狂热的意见，只会造成人们被屠杀、村庄被焚烧、王国被摧毁的景象！”在某些地区，对顽固派的压制的的确确是彻底的，不像在以前的革命中所执行的那样。当听到国王出逃的消息时，南特市的官员下令立即驱逐该地区所有的顽固派，并逮捕任何涉嫌参与反革命活动的神父。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些地区领导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认为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可能引发新的宗教战争的潜在威胁因素，而所有顽固派无一例外都是“国家的敌人” [64] 。短时间内，他们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非法逮捕或驱逐了全国至少九个省中的数百名拒绝宣誓的神父。[65]

全面镇压的第二大目标是贵族阶层。在位于法国中央的谢尔省（Cher）和安德尔省（Indre）中，顽固派相对少见，且不被认为存在威胁，但是瓦伦的消息引起了人们对该地区的贵族正在组织反革命挑衅行动的担忧。几个区都派出了自卫队，系统地搜查每个城堡和庄园，迫使其交出武器。布尔日（Bourges）甚至命令所有的贵族居民留在城里，并派警卫严守城门以确保没有人能够逃出，防止“那些信奉的原则与大众意愿相违背的人们采取联合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策都是和平实施的，国民自卫队收到了特别指示，“要以一种不使用暴力的合理且礼貌的方式行动”[66] 。

然而，在镇压贵族的一系列行动中，没有哪个地方比布列塔尼省更加血腥和暴力。在这里，官员发现他们自己不仅困扰于管控着顽固神职人员比例最高的地区，而且苦恼于因革命前夕外省政治活动而加剧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随着国王出逃，在地方行政官员的鼓励下，布列塔尼的国民自卫队在乡村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恐怖活动，他们袭击了可疑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寻找武器，并间或摧毁庄园。在一个地区，当局放权给普通民众，肆意追捕这两大可疑群体的所有成员，他们写道：“我们的敌人正在尝试着最后一搏。仇恨和狂热将前所未有地激起争端和麻烦，为了阻止他们得逞，我们可以采取任何措施。”遵照

这些命令，自卫队开始大肆闯入每个庄园，“从宪法的敌人那里夺去他们可能用来推翻国家的所有手段”。邻近一个地区的领导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下令没收移民贵族的所有财产。由于国民议会6月21日颁布的法令禁止任何人携带金钱或贵重金属跨越国境，因此，将缺席贵族的财产没收充公似乎是正当合理的，因为这些钱财有可能被送出国以支持反革命运动。[67]

随着行政当局对镇压活动的鼓动和纵容，以及群情喧扰的紧张局势被外敌入侵的恐慌推至沸点，布列塔尼成为几起特别暴力的事件的发生现场。在雷恩（Rennes）东部的地区，瓦伦的消息驱使三千到四千名武装城市民兵到村庄寻找反对革命的顽固分子。沮丧于没有找到某一位曾支持那些唱反调的神职人员的贵族，自卫队烧毁了他的城堡，接着该地区的其他几个城堡和庄园也被付之一炬。随着国王出逃的传言，上百名自卫队队员组成的另一支部队被派往瓦纳（Vannes）附近的勒普利克洛（Le Préclos）城堡，据说那里聚集着一群可疑的贵族。他们在凌晨四点到达，用战鼓和枪声唤醒了当地的居民，爱国民兵们用马车带走了十八个人，将他们的双手捆绑在背后，被当作“战俘”推进了当地的堡垒。位于布列塔尼半岛北部海岸附近的拉罗什-代里安（La Roche-Derrien）的领导者也开始解除他们地区所有“前特权享有者”的武装。显然，没有人抵抗，直到自卫军抵达塔隆城堡（Tralong），那里脾气暴躁的罗曼（Roumain）伯爵举起一支17世纪的大口径短枪和一个可以发射石块的陈旧装置——“布列塔尼比利”，以疯狂的射击迎接了他们。几名民兵受伤后，另一批自卫队前来支援，爱国者们冲进城堡，杀死了罗曼伯爵。[68]

随着6月和7月的危机消退，以及中央政府收到外省越来越多的报道，国民议会开始批评那些公然进行集体镇压的事例。坎佩尔省（Quimper）的官员可能迫于巴黎的压力，谴责朗代诺区（Landerneau）大肆逮捕贵族和顽固分子的行为，这些被捕的人们“唯一

的罪行只是可能有反对宪法的意见，但从未做过任何扰乱公共秩序的事情”。这种镇压行为违反了法律和人权，只会给当前的形势火上浇油：“这种方式煽风点火，恐吓个人并威胁到他们的财产，更加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它严重损害了自由和宪法的原则。”但是朗代诺区有力地捍卫了自己的行为。危急的形势和拯救革命的根本目标使他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合理化了。“很快就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宣称，“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在敌人犯罪和谋杀之前抓住他们。”顽固分子和贵族太过危险而不能被信任，甚至是那些——或许尤其是那些——隐藏在“爱国主义的虚伪面具”后的人们，也不能被信任。直到最后，朗代诺区的官员仍不知悔改：“我们既服务于人类，也服务于宪法，将那些会制造麻烦和混乱的人分离出来……我们强烈谴责他们，并将永不停息地追逐他们，直到胸腔中的神圣之火净化法国的每一个角落。”[69]

朗代诺和坎佩尔之间的辩论是全国各地的法国人面对国王出逃危机时，所遭遇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即使在20世纪，在自由民主文化根植于人心的社会中，战争时期和恐怖主义威胁也会创造出超越“预防性镇压”要求的法律困境。那些生活在威权统治下的男男女女，才刚刚开始学习平等正义和公民权利的意义，1791年6月的事件形成了极其令他们困惑和费解的问题。革命党人被迫在原则与权宜之计之间，法治与“公共安全”需求之间，个人自由与社区防御之间，维护人权与保护国家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在他们暗中摸索着试图努力走出这些困境的过程中，许多外省的公民在这些镇压行动中徘徊——因结社而获罪，因未经证实的怀疑而获罪，并未经正常程序就遭到长期监禁——这些都是恐怖政策的明显预兆。

注释

[1] Lindet，290.

[2] *AP* 27：359；also AD Marne，1 L 329.

[3] AD Ardennes，L 78；AD Aube，L 315；AD Aisne，L 605；AN D XXIX bis 36 （2），dos. 378.

[4] AD Meuse，L 2188*；AD Aisne，L 605；AD Ardennes，L 12；AD Vosges，L 479；Fischbach，110-111；*AP* 27：662-663；David，25.

[5] 以下大部分根据AN C 124-131，AN D XXIX bis 33-38，以及当地的多种专著。另参见Reinhard，81-82，432；Arbellot and Lepetit，71.

[6] AN C 126 （2） （Huningues）. 消息从巴黎经过312英里传到里昂大约需要58小时，即每小时5.4英里。

[7] AN C 124 （2），dos. 404B （Aumont）.

[8] 例如多勒市，AN D XXIX bis 35，dos. 366。

[9] AN C 124 （2），dos. 404B （Auxerre）；Gaugain，1：239-240；Roux，443-445.

[10] Brégail，97-98；Baumont，74；AN D XXIX bis 36 （1），dos. 368 and 370；Bruneau，160-161.

[11] Schneider，19.另参见Wahl，381-382；AN D XXIX bis 36 （1），dos. 369 （Beauvais）；D XXIX bis 35，dos. 361 （Argentan）.

[12] Legendre，letter of June 13，1791；and Bouchette，632.

[13] AN D XXIX bis 35，dos. 366；D XXIX bis 36，dos. 374.

[14] AC Saint-Quentin，I D 3；Baumont，74-75；Lecesne，1：160；Fischbach，67.

[15] AN C 126 （2）.

[16] AN D XXIX bis 36 （2），dos. 378；C 130 （1） （Tours），C 126 （2） （Grèves-de-Tallon）；Sol，2：82-83.

[17] Tackett，*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147-148，152-154，277；Hunt，*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21，27；Langlois，2：389-393.

[18] *AP* 27：359.

[19] AC Mézières，BB 23，deliberations of June 22；AN D XXIX bis 35，dos. 366.

[20] Fischbach，124；Vidal，1：204-205，214；Rouvière，360-361；AD Gironde，3 L 10；AN D XXIX bis 35，dos. 366；D XXIX bis 36，dos. 377；F7 368218 （Morbihan）.

[21] Biernawski，146；AN D XXIX bis 36 （2），dos. 373.

[22] AD Meuse，L 386.

[23] AN C 130 （Sedan）；also *AP* 27：662；AD Meuse，L 386；AD Meurthe-et-Moselle，L 212；AD Ardennes，L 78.

[24] 关于瓦伦本身显而易见的恐惧，参见Lesort，12。

[25] Bimbenet，240-248；also Bouillé，258；and Bouillé fils，122-129.

[26] AD Meuse，L 385-386 and ED 407，1 B 1；Fournel，336-337；Pionnier，111-112.

[27] AD Meuse，L 385-386；Lesort，15，17；AN D XXIX bis 36 （1），dos. 368 （Baudonvilliers）.

[28] AD Marne，1 L 329；Buirette，552-554.

[29] AD Marne，1 L 329；and inquest into the riot，AD Marne，10 L 220.

[30] AD Marne，1 L 329；AD Haute-Marne，L 274；AD Ardennes，L 78；AD Aube，L 315；AD Aisne，L 605；Pionnier，110；Fischbach，113-114.

[31] Letter from deputies Le Carlier and L'Eleu，June 25：AD Aisne，L 605.

[32] Gower，104；AD Gironde，12 L 13；*AP* 27：686；AN C 127 （1）（Mont-de-Marsans），C 128 （2） （Orthez and Pau），C 129 （2） （Saint-Sever）.

[33] AN C 128 （2），dos. 433 （Noirmoutier）；Biernawski，148；AN F7 368218 （Morbihan）.

[34] Binet，119-120；Gower，103；*AP* 27：663；AN F7 368218 （Morbihan）；Panon Desbassayns，195；AD Gironde，12 L 13；AN D XXIX

bis 35，dos. 366 （Mayenne）.

[35] AD Aisne，L 605；AD Meuse，L 385；also the reactions in Troyes and Nancy：AD Aube，L 315；and AD Meurthe-et-Moselle，L 1239.

[36] Kaplan，*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1-2，62；Tackett，“Conspiracy Obsession，” 695-699.

[37] Gauville，46.

[38] AN D XXIX bis 37，dos. 382.

[39] AN D XXIX bis 33，dos. 345.

[40] AD Aisne，L 604 and L 198；Tackett，*Religion*，*Revolution*，*and Regional Culture*， 276-279.

[41] AN C 130 （2），dos. 455 （Vienne）.

[42] Brégail，97-98；also Millot，200；and AN D XXIX bis 36 （1），dos. 369 （Beauvais）.

[43] *AP* 27：362.

[44] Bouvier，100-101；Gaugain，2：239-240；AN D XXIX bis 35，dos. 361 （Argentan）.

[45] Sol，2：80-81；Fischbach，200-204.

[46] AN F7 368218 （Morbihan）；Binet，116.

[47] Pastoors，1：91；also Fischbach，67，73-74，121-122；AD Meuse，L 385；AD Ardennes，L 78；Rochambeau，1：383；Fougeray Du Coudrey，111；David，25.

[48] Wahl，395；David，25；AN C 125 （2） （Cuxac）.

[49] deliberations of Sézanne，AD Marne，1 L 329.

[50] 参见，例如AN D XXIX bis 35，dos. 365。

[51] Dupuy，200-205；also AN D XXIX bis 36 （1），dos. 367 （Landerneau） and dos. 369-370 （Rochefort）.

[52] AN D XXIX bis 34，dos. 349 （Cahors）.

[53] *AP* 8：273-275，278-279；17：695-696. See also Shapiro，48-55.

[54] Deliberations of June 25，AC Pont-à-Mousson，1 D 4.

[55] AN D XXIX bis 35，dos. 366 （Boiscommun）；also D XXIX bis 35，dos. 365 （Longwy）；D XXIX bis 38，dos. 389 （Geneva）；D XXIX bis 35，dos. 361 （Auxonne） and dos. 362 （Boulogne-sur-Mer）.

[56] AN D XXIX bis 35，dos. 364 and 367 （Cahors）；AD Aisne，L 605；AN D XXIX bis 36 （2），dos. 376 （Senlis） and 373 （Painbeuf ）.

[57] Rouvière，367-369；AD Aisne，L 604 （Soissons，June 24）；AN D XXIX bis 36 （1），dos. 367；AD Meuse，L 386；Louis-Philippe，43-47；Henwood and Monange，102.

[58] AN D XXIX bis 36 （2），dos. 375 （Neufchatel）；D XXIX bis 33，dos. 344 （Neuf-Brisach）.

[59] AN D XXIX bis 35，dos. 363；and D XXIX bis 36 （2），dos. 373 （Saint-Cyr-sur-Char）. Also the inspection of a chateau near Fuligny：AD Aube，L 315.

[60] AN F7 36827 （Marne）；and *AP* 29：587.

[61] Wahl，387-392；AN D XXIX bis 36 （2），dos. 374；*AP* 29：422；and Viola，129-148.

[62] Lefebvre，“Le meurtre du comte de Dampierre.”

[63] AN D XXIX 81 （Varennes）.

[64] AN C 125 （2） （Chalonne）；D XXIX bis 35，dos. 361 （Argentan）；D XXIX bis 36 （1），dos. 367 （Landerneau）；Binet，106-107.

[65] Tackett，*Religion*，*Revolution*，*and Regional Culture*， 276-279；AD Gironde，12 L 13 （July 2）.

[66] Bruneau，161-163；Wahl，385-386.

[67] Dupuy，200-205；Binet，116-118；AN D XXIX bis 35，dos. 365 （La

Roche-Derrien）；F7 368218 （Morbihan）.

[68] Dupuy，201-205；Binet，116-17；AN D XXIX bis 36 （1），dos. 369-370；F7 368218 （Morbihan）；and D XXIX bis 35，dos. 365.

[69] AN D XXIX bis 36 （1），dos. 367.

第七章　国王的审判

在国王归来后的三周内，巴黎的市民不断地提到外省发表的意见。对于科德利埃俱乐部来说，在决定国王的命运之前进行一次全国公投是非常必要的，俱乐部的成员们也非常希望全国大部分的民众能够支持共和国。另一方面，温和派一方则深信首都内外的法国人均一致支持君主立宪。同时，国民议会推迟对该问题的决策，等候内地的反应，即代表们在其写给选民的信中积极征求的反应。[1] 简而言之，人人都知道巴黎不代表法国，大多数国民看待国王的观点，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法国人开口。

最终法国人会出声。在全国运动的声音和怒火之下，国民自卫队集结，边防防御军队的支持，预防性的镇压——各地的人们开始思考国王的命运，是他的行为引发了这一系列后续。如何向他们解释路易十六的突然失踪？国民议会努力要完成的新宪法有什么意义呢？在革命派希望建立的新世界中是否有这位国王，乃至任何一位国王的一席之地呢？

人民的国王

不仅是巴黎，甚至全国各地的民众都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不安。一直以来，在情感和传统上，大家都和国王保持着强烈的联系。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免于责难和诟病，就连现任国王的两位先祖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也常常是智者们和大众阶级苛刻评论的对象。然而关于君主的神话——与个别君主的名声相背离——却拥有着非凡的活力。它建立在一系列古典和历史传统以及世俗传说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十七八世纪君主通过他们的军事实力和宫殿、王室宫廷生活的辉煌而形成的宏伟形象上。在法国的儿童和成年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相对于坏国王或者无能的国王而言，君主制的存在和好国王的理想，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下层阶级的民众直到旧制度的末期仍然坚信“国王的触摸”，即国王拥有神奇的魔力，能够治愈寻常的皮肤病、淋巴结核。而首位波旁王朝君主亨利四世的美德——他的实力、他的善良以及他对人民的仁爱，在大革命初期谈及理想政权时，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事实上，从1788年至1791年，路易十六本人也常被人拿来跟“好国王亨利”相提并论。[2]

可以肯定的是，在178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王室的形象在不断演变。几个世纪以来，赞颂国王英明伟大的辞藻不胜枚举：国王是伟大的战士，是首席大法官，是封建最高君主。但是在大革命前夕，对国王的描述“人民之父”——这个称谓至少可以追溯至16世纪——已经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了。毫无疑问，这种形象是由路易十六自己推动建立起来的。他一直以身为人父的成就感而自豪，尤其是经历长时间的性功能障碍和心理挫败之后，而且他对抚养自己的孩子抱有极大的兴致。他在国

民议会中也不断引用身为人父的比喻。在瓦伦时亦是如此，他在骚塞先生的公寓中向他“忠诚的孩子们”表明身份。当然，作为父亲的身份，与国王的形象一样，拥有复杂且模糊的意味。这或许意指“一家之主”，从法律和传统角度看，他对妻儿拥有绝对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模仿着无所不能的圣父的宗教理念。但是随着人父国王的形象逐渐被18世纪晚期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们所接受，这一形象也开始与所有的家庭情境剧中的文学风格挂钩。这个时期的戏剧和小说，都在高唱“好父亲”的赞歌，这样的父亲不独裁，而是和蔼温柔，与妻儿平等相处，像对待朋友和同伴那样与家人相处。[3]

在1789年的申诉名单，即成千上万的法国人在等级会议选举期间所发布的声明中，对于路易十六的尊重之情也是不容置疑的。各地的人们仍然用尊重和荣誉的称号尊称他为“陛下”，或以其他正式的称号来称呼他。“诚挚恳求陛下”满足这样那样的企求，这样的表达一如既往。申诉名单中半数以上的人在申诉的开篇仍然对统治君主表示赞扬，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提到了他为人父的美德。很多人也提到了他的善良，四分之一的人对他的公正表示肯定——尽管没人提起他的军事实力。更有五分之一的人特别使用了“神圣”一词形容国王。



《这种形象对于所有的法国人来说多么珍贵！》　**1789**年，农村各个年龄的民众跪倒在路易十六的画像前。

虽然这个词也偶尔用于说明诸如“神圣的财产权”或“神圣的宪法”等抽象概念，但除此之外并没有用它来描述具体个人的情况。[4] 这是王室神秘感的文化力量使然，加上对于路易集结等级会议的感谢——这一举动也使得在大革命的前两年，大多数的爱国人士都对国王十分宽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从1789年10月起——甚至可能更早——路易下意识地执行了一种欺骗政策。即使他公开接受了由国民议会递交给他的法律条文，私下里还是向西班牙国王表示他是迫不得已才签署的。但当时的法国民众并不了解这一点。决心加强君主立宪制的温和派

爱国人士，竭尽所能地说服国王发表精心安排的演讲 [5] ，从而提升路易的形象。如果我们通过递交给国民议会的诸多信件评判的话，在大革命的前两年里，路易的人气甚至有所提升。1790年2月国王向众议员发表演讲后不久，西部小镇埃尔内（Ernée）这样的有记载：“这个愉快祥和的日子，值得永远铭记，这一天最好的国王、法国自由的修缮者、国家最温和的父亲，出席了我们的议会，并对所有的劳工给予了认可。”特鲁瓦（Troyes）的领导人们则几乎同样热情地地阐述了他们对于国王的效忠：“一个寻常父亲的孩子们，听从国王的言语，紧密地团结在他的身后，支持他的决定。国王陛下如父的爱心需要我们爱的证明。”[6]

毫无疑问，大革命大大削弱了国王的权威。宪法将他原本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权力，转化为首席执行权，其公共权力甚至不如大西洋彼岸刚刚出现的美国总统的权力。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君主特有的神秘光环仍未幻灭。他们始终坚信，国王支持大革命，而且君主的愿望与国民的愿望终会彼此呼应。1791年上半年，来自雅各宾俱乐部的批判言论有所减少——一些人敦促国王禁止不服从管束的神职人员出入他的宫廷——这些言论被一片热情和尊敬的话语所压倒。距离巴黎不远的库德雷（Coudray）小镇，对2月28日在王宫发生的暴力行为表达了不满，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好国王神圣人格”的侮辱。 [7] 同年3月，当路易由于喉咙疼而病倒之时，成百上千的市政委员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们为祝愿他身体康复而举行了大型集会活动，当得知他痊愈后，法国的几乎每个城镇都举行了感恩庆祝活动。“掌管国王陛下命运的神明也不想让我们最强大的支持者难过，他是我们幸福的锚。我们的教堂里回响着感恩的祈祷”（拉瓦尔，位于法国西部）；“作为伟大的亨利的子女，我们将永远保持对这位波旁王子的忠诚，因为他的名字是如此的宝贵，他对法国是如此的珍贵”（贝莱，位于法国东部）；“愿上帝保佑这位国家偶像”（博格斯，位于法国中部）。几周后，普罗旺斯的小城沙特阿伦纳

尔（Châteaurenard）在市政厅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国王的肖像，当地最近当选的市长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演讲。他认为这位法国君主与人民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因此甚至很难将路易同其他的君主归为一类："其他的国王通过恐吓手段追求无边的权力，而路易十六却是从他优秀的品德中获得自信；其他国王要求得到尊重和顺从，而路易十六却只想要得到法国人民的爱戴；其他国王希望凌驾于国民之上并驱使之，而路易十六却一心只想成为国民之父；其他国王想要限制国民的自由，而路易十六却在恢复我们的自由。他是国民的朋友！他是民众之王！"[8]

直到国王出走瓦伦前夕，外省各个地区绝大多数的法国民众仍然对国王本人怀抱爱戴甚至是敬畏之情。他们仍然认为君主是统一的核心和整体，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血泪

也许正是出于他们对君主强烈的依附之情，众多法国人在国王出逃之后的痛苦日子里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经历。在6月21日到7月底，国民议会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不同人士的超过650封信件——这些信件来自每个地区，来自大大小小的各个城镇，甚至还有一定数量来自乡村。

这种大规模来信表面上的目的是向国民议会重表忠心，因为目前的情况无疑是自大革命开始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然而很多信件包含了在危机时刻，对于君主的态度不断变化的肺腑之言。市政和行政委员会、爱国俱乐部、国防组织、妇女委员会、地区法庭以及未指明的“民众”组织，都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由当地精英起草，且得到成百上千的民众签字支持。整体而言，这些反馈信件反映了一段时间内各省的民众意见，因为在瓦伦事件发生数周后，全国的民众都在试图与国王和国王的住地进行联系。[9]

在事件刚刚发生之后的几天，即刚刚得知国王失踪，又尚未听到国王被捕的消息时，民众的反应大多取决于收到消息的方式和来源。巴黎俱乐部的请愿书以及激进报纸的报道，对于国王的失踪表示出了非常激烈的情绪。但是国民议会早期的宣告则含糊不清得多，从未提及国王的反革命宣告，给王室成员遭到了绑架这一说法提供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许多外省团体更愿意接受这种设定，让路易从这种怀疑中受益。总而言之，在初期，有三分之一发言者坚持他们对君主的积极和同情态度。[10] 他们痛斥“绑架国王和王室成员的恐怖犯罪行为”；说“这些带走最好的国王的人是恶魔”；说“现在的法国是被抛弃的孤儿”。与罗伯斯庇尔关系紧密的雅各宾派，对此事件初期的反应尤为强烈。“他们从我们身

边夺走了国王，”这些人感叹道，“这位国王似乎只为国民而活，他常常向国民议会表达敬意，他的爱国行为充满了坦率和真诚。”当他们得知国王被找到了，而且已经回到巴黎时，很多外省的小镇自发地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分钟的时间之内，鲁昂市政厅大院里“围满了大量民众，男女老少都被此事件的消息吸引至此。他们自发地跳起舞蹈，表达心中的喜悦，直至凌晨三点”。各处都出现了教堂钟声、烟火、感恩祈祷以及公众庆祝活动，正如利摩日描述的，这些活动标志着他们将“心中的悲伤”转化为“极致的喜悦”。[11]

总的来说，直到6月底外省的民众才开始认识到整个事件的严重性，一场真正的良知危机开始席卷整个法国。随着国民议会进入为期三周的空位期，对国王的处理事宜被延期考虑，因此国民议会的官方声明不再是各省的首要信息来源。小镇上充斥着来自首都的不同俱乐部以及巴黎报纸的通函和请愿书，特别是大量的报纸，这些都扩展了信息来源的范围。正如旺多姆爱国俱乐部所言：“公共报纸不断帮我们拓展观点。与所有的法国民众一样，我们都在密切关注着他们的出版物的规律节奏。”[12] 在国民议会最初的报告中，很多有关国王出逃的信息都被忽略或遭到审查。还是通过报纸和宣传册，外省的民众初次了解到，巴黎民众在6月25日拒绝接受王室家族回归，以及科德利埃俱乐部早期为废除国王的主张所做的努力。直到此刻，他们才了解到国王的个人主张，他暗中背弃早期的誓言，不承认他以前签字生效成为法律的大革命条款。土伦（Toulon）当地的领导者们首先看到了国王于7月1日发表的信函。而四天后，贝尔热拉克（Bergerac）的民众看到此信后，在镇上的广场上公开焚烧了一份信函的副本。[13]

在评估这些数量庞大的信息时，各地的爱国俱乐部起到了关键作用。到1791年年中，共有几百个这样的俱乐部成立。其中有约四百个直属于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14] 但是尽管各省的俱乐部密切关注着首都雅各宾俱乐部的辩论，他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总部的决策。英国代理人

威廉·迈尔斯（William Miles）对于全国上下不同团体之间持续不断的思想交流表示震惊，这种情形让他想起“圣保罗教堂的耳语廊”——伦敦大穹顶教堂里面的环形走廊，游客们无论站在何处都能听到其他人讲话的声音。由于巴黎的雅各宾派无法达成共识，外省的俱乐部在讨论的规模和主题上变得更加独立。数十个社团开始通过外省俱乐部的通讯网络流传地方审议副本，使得思想和提案得到迅速的传播。来自各地姐妹团体的新传单和请愿书，甚至不经过巴黎，每天在波尔多、贝尔热拉克、巴勒迪克等地流传，这些传单似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激进。[15]

在这段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过渡时期，国王似乎不赞成大革命，国民议会尚未表态，各地的人们开始对新宪法的基本假设进行全面的重新评估。不仅在当地的政治俱乐部，而且在各种行政理事会议以及为了应对危机而设立的各种特别会议上，民众们都在进行思考和辩论，并通过了正在审查中的选项。在图卢兹（Toulouse），“每个人都设法公开发表自己对国王问题的意见，无论这些意见有多么大胆”。在图尔市，正如一位市民所描述的，辩论很快就集中在“君主制有史以来所讨论过的最有趣和最尖锐的问题。啊！我们该如何描述，在紧张与恐惧中所感受到的快乐。我们见证了羞涩的年轻人畅谈他们的想法，胆大的年轻人表达着他们的热情与急躁，成熟人士则仔细斟酌给出更多的建议。多么令人感动的现象！”[16]

眼下盛行的观点是坚决地反对君主制。在6月下旬的关键时期，即国王在瓦伦被拦下的消息传来之时，以及7月中旬国民议会发布消息时，外省地区只有六分之一的证词表达了对落跑国王的同情。[17] 就连那些常常表现出同情心的人也发表了苛刻的评论，将国王的举动与他容易听信谗言的性格弱点关联在一起。“君主不幸、软弱、容易受人蒙骗和利用，”其中一个城镇委员会写道，“我们宁愿相信路易十六是因为软弱以及盲目屈从于奸臣之言，才抛下自己的职责，背弃热爱他的人民；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来意志，而是屈从于他周围之人的欲望和无穷无

尽的野心。出于这些可能性，我们将保持沉默，对他本人不予批评。”[18]

相比之下，约五分之三的通信都对君主给出了负面的评价。[19] 在他们充满愤怒和苦涩的声明言论中，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俱乐部成员以及国民自卫队，都在谴责国王的一系列恶行。路易没有考虑行动对法国民众的后果，就擅自逃离王宫的做法，遭到民众的谴责。这个曾经被他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依靠的人，“以懦弱的态度抛下了王位，背叛了他的誓言”。他“抛弃了全世界最令人钦羡的宝座，这种做法可能会将法国引向绝路”。尽管路易一再否认，但是大多数通信都确信国王的真正动机就是要逃离法国，然后寻求国外势力的支持，对抗自己的国家。“国家的最高统帅竟然预谋离开本国，投奔许诺给他金钱、援助和军队的外国，以便重新获得他想象中本应属于他的权力。”“他徒劳地试图将外国的刀剑架在我们身上。”这种行为只会引发战争，并被冠以“叛国”的罪名。国王放弃了他的王位，“前往外国的领土，将我们肥沃的土壤变为一片血海。他或许会使法国陷入分裂、对外战争和内战之中。”即使他是听信了他人的谗言，但是不可否认他也“背负着背叛国家的责任”。他最终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就是想要重新凌驾于“军队之上”，并复辟旧制度“从前的制度”。“鉴于他秉承专制主义的原则，路易将始终是我们自由的敌人。”[20]

而国王发表的著名“宣言”更是前所未有地激怒了外省各地的爱国主义人士，即国王向全世界宣布他此前对宪法的宣誓并非出自本意。在大革命的氛围中，充斥着对于透明与真实的向往，或许没有什么比违心的誓言更罪过的事了，而这恰恰是路易承认自己做过的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形容他“背信弃义”，是一个不忠诚的人，一个违背自己誓言的叛徒。“他竟然如此狡猾，背叛自己宣誓的誓词，违反最神圣的原则，这一点让我们震惊。”他“懦弱且不忠诚”、“背信弃义”、“违背誓言”，“他佯装出的善良只是伪装”。[21] 多个团体甚至直接将自己的誓言与国王的

虚假宣誓进行对比，向国民议会表示，他们绝不会像国王一样，而是将永远秉承“对宣誓的信仰”。对于南特的雅各宾派来说，路易已经让自己背负了“永恒的耻辱”。他们不再将他与好国王亨利联系在一起，而是将他与查理九世等同，即那位邀请了新教领袖参加1572年圣巴托罗缪日[22]婚礼，却只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的国王。[23]

除了一小部分爱国人士团体对路易，以及大批民众对其进行的粗暴谴责表示些许同情之外，还有四分之一的民众在通信中对国王只字未提：无视君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隐晦诅咒。[24] 大部分人的答复明确表示，他们现在决定效忠于国民议会。诺曼底圣洛（Saint-Lô）的雅各宾组织在了解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后，描述了他们在6月下旬的心理变化过程。“起初，我们无法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因为一句话就摧毁了我们全部的希望：‘国王已经放弃了我们！’我们犹豫过，也试图为他的所言辩解过——那么他的诺言是不是完全成为虚无？他的誓言仅仅都是徒劳了吗？但是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先生们，你们才应该是掌权人。仍然有人倾听国民的声音。我们曾反复庄严宣誓要接受新法令。自由国家的命运不应再受到国王行为的影响。”如今被称为“国家之父”、“国民之父”、“自由的修缮者”的是国民议会的议员们，而这些带有父亲头衔的称呼从前几乎都是国王专属的。通信中充斥着将这些议员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英雄人物相提并论的说法：他们是新的吕库古（Lycurgus），赋予人民法律；他们是反抗“尼禄和喀提林”的罗马参议员们。还有其他的作家们引用宗教的著作赞美国民议会：“你们的努力让神明感动。”就算是死的那一天，他们也会将头转向巴黎的方向，“并宣誓：为了上帝和国民议会”。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们宣布无论结果如何，都愿意追随国家之父——即使是要将国王处决或废黜。他们暗示到。他们会保持“对国家、对法律、对行政权力的忠诚，但首先你要选择如何去组织这种权威”。“我们尊重你们谨慎而坚定的判断，无论是惩戒路易十六的罪行还是赦免他。”[25]

这些陈述中大部分都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情色彩，表示曾寄托在国王身上的希望破灭了。法国北部拉巴塞（La Bassée）的雅各宾派表示，直到6月21日，他们还以为路易十六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君主。曾经他与他之前的六十五位国王显得如此不同。但是一夜之间，仅仅一个举动，就让他“完全失去了他的名声”。路易一向以沉默寡言而著称，而这曾经被视为智慧和谨慎的沉默，如今却被说成“要么是愚蠢，要么是背信弃义所致”。就连此前对国王的尊称“陛下”、“国王陛下”，也夸张地跌落至对他直呼其名——“路易”或“波旁路易”——以此来强调国王不再被视为一个永恒的王位的化身，而是一个有着缺陷，甚至堕落的不正当个体。放弃誓言之时，即是路易违背“庄严宣誓”之时，他抛弃了“不顾他的罪行，依然爱他，视他为偶像的，宽宏而敏感的民众”。事实上，偶像的形象，即“一位曾经被全法国人视作偶像的国王”，现在一次又一次的在外省通信的措辞中，已经永远地被摧毁了。[26]



《颠覆的偶像》　一位穿着王室袍子的法国女性正打算摧毁路易十六的半身像。在她的身后，卫兵、民众以及无套裤汉们表示即使已经不再相信现在的国王了，他们仍然愿意支持君主制直到流干最后一滴血。

一些写信的人甚至开始重铸大革命的历史，以及国王在这段历史中的地位。法国中部一个小镇的领导们想知道，是不是路易根本没有“从

专制主义的原则中有所动摇”。他们做出了一份详尽的解读，重新解释1789年以来这两年，国王企图“在国民议会中创造一个专制的堡垒。他动用力量迫使众议员们在网球场避难。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勇敢行为（即那些冲破了巴士底狱的人民），如今的巴黎早已成为一座巨大的坟场”。凡尔赛的雅各宾派认为，这位“狡诈的国王”绝对应该为“过去两年内法国所受的苦难”负责，就像他最近“准备对国家进行冷血屠杀一样，而这个国家的国民一直认为他是善良的人”。只是最近，法国南部阿莱（Alès）的民众才回想起“我们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合唱团歌颂他的丰功伟绩。因为对他的绝对信任，我们将他视为一位拯救我们民权的人”。但是“与成为我们的慈父相比，他更愿意成为暴君，甚至是杀害我们的刽子手。啊，绅士们啊！我们的心已碎，我们的眼中流满了血泪”[27]。

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在6月下旬至7月初，大多数团体做出的陈述在关于如何处置国王的问题上没有直接的立场，只是愿意服从国民议会的决策，无论这个决策是什么。但是有四分之一的通信者态度较为激进。[28] 他们觉得自己被深深地欺骗了，他们觉得路易的行为应受谴责，以至于他们再也不相信他在政府的职能权力，他们催促国民议会采取措施惩罚他。尽管这些人鼓励国民议会废除路易的王位或者让其在全体国民面前接受公开审判，但是这里边大约一半的人依然准备维持现状。[29] 蒙托邦镇（Montauban）的领袖们则对应该采取的措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表示仍然支持君主制，但是面对“一位不愿意执行法律的国王时，法国应该怎么做？一位出逃的国王放弃了宪法赋予他的至高无上的职位，违反了自己曾经接受了的誓言，践踏了他最神圣的信条，给民众树立了欺骗的先例：这便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惨景。”最终他们诉诸一条关于王室权威的契约，以证明他的豁免权已经被剥夺了：“一位违反了宪法的君主，破坏了宪法章程，因此根据规章赋予其的权力也应被剥夺。”利摩日的雅各宾派则提出了更为直接的逻辑：“路易十六不应继续坐在法国国王的宝座上，因为在各地声讨他的民众心中，他已不配为王。”在南特，民众团体呼吁进行法国版的1688年光荣革命，当时的英国议会废黜了詹姆斯二世，拥立了威廉和玛丽。他们这样写道，英国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废黜一位不忠于国家法律的国王，并不意味着要推翻君主制本身”[30] 。

然而所有这些提议却立刻形成了一系列的难题。是否能像南特的民众建议的那样，由国民议会直接废黜路易？或者是否能在奥尔良的新高

级法庭成立之前先对他进行审判？如果法院判定国王无罪该怎么办呢？以及如果废黜国王，谁由谁来代替他呢？国王的合法继承人，年幼的王太子路易·夏尔只有五岁，而选择一位值得信赖的摄政王似乎也是一个难题。最有可能成为摄政王辅佐王子的是奥尔良公爵，即国王那位支持大革命的表兄。但是很多爱国主义人士并不信赖这位公爵，正如他们不信任路易一样。面对这些难题，或许更好的办法是修改宪法本身。一小部分通信者提出了各种限制国王权力的计划，比如布雷斯特的议员们提议，使之成为“自身权利之傀儡”。里昂的领导人们则表示“你永远不会看到路易十六重拾他失去的信心。如果我们必须要拥立一位在王位上昏睡的国王，绝不能允许他拥有过多可以滥用的权力”。有人建议废止国王否决立法权的权力，如果让一位“懦弱而容易遭到欺骗的国王”掌握了这种权力，那么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其他人则建议将所有真正的职权交给由立法机关或者人民选出的国民议会，让法国更接近英国的议会体系。第戎的雅各宾派表示：“如果保留君主制，那么国家必须限制其权力，使得人民免受专制主义的威胁。”[31]



《亨利四世对于路易十六的现状感到震惊》　好国王亨利惊讶地发现他的后代竟然变成了一头猪。漫画家用国王过度纵饮的嗜好隐喻他的名声，说他在酒桶里**“**淹没他的耻辱**”**。贴着**“6**月**21**日的酒**”**、**“**贵族统治的酒**”**等标签的空酒瓶散落一地。

但是事实上法国是否应该保留君主制呢？很明显，全国上下有一部分团体，像多尔俱乐部，就思考过逻辑链条上的下一步：“剪断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整体消除君主制。[32] 以18世纪的欧洲为背景，这是一个惊人的假设，　直面几乎所有的当代思想，对于像法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且不切实际的。只有少数团体准备采取这样的集体态度。那些以非凡的雄辩措辞和对路易十六及整个政权的愤怒谴责为自己辩护的人，经常寻求来自共和时期的罗马古典英雄的灵感。似乎没有人提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与法国相比，他们觉得美国人口太过稀少，且发展程度不高。

法国西南部圣克劳小镇（Saint-Claud）的国民自卫队对这位“野蛮国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把他的信任、荣耀和他的国家卖给外国人”，同时“在他的心中藏有一个坐视法国人民陷入大屠杀的恐怖计划”。然后他们列举了12个世纪以来“利用自己的权杖毁灭国家的国王”，然后敦促国民议会推翻现代的“塔克文”（Tarquins）——最后一位罗马国王——然后建立共和制度。附近尼奥尔镇的俱乐部成员则呼吁遵循契约理论。路易十六“违反了他与国家签订的条约；他背叛了他的誓言，因此协议被打破，由此国家终止其政治生存的权利是无可厚非的”。最后他们总结道：“如果我们必须要和‘塔克文’斗争，请不要忘记所有真正的法国人都宣读了布鲁图斯——这位带领他们反抗、推翻帝制的罗马领袖的誓言。”阿拉斯（Arras）的国民自卫队吟诵道：“国民们，同胞们，命运之书已经开启！伟大的事件推动伟大的抗争；但是暗中计划的残暴罪行，却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命运。让我们忘了我们拥有国王这件事吧，他将会成为过去时。”[33]

一小部分外省城镇的爱国主义者是如何达成共识的，这一点我们尚不得而知。例如在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与科德利埃俱乐部有联系的巴黎爱国者玛丽-让娜·罗兰定期向当地爱国领导人之一寻求如何支持共和国的建议。[34] 阿拉斯和沙特尔（Chartres）的共和主义党派分子可能受到其各自的激进代表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的言辞影响。但其他城镇的人们似乎在信件和请愿书从巴黎抵达之前就已经独立地采取了这些立场。事实上，启发各省采取行动对抗君主制的灵感并不是来自巴黎，而是来自蒙彼利埃（Montpellier）。

这个位于地中海附近的小省会城市兼大学城，其共和主义起源仍然相当神秘。在他们1789年发表的不满声明中——几个将会成为激进分子的人签署了这份声明——市民在支持国王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35] 第一个取消君主制的行动发生在6月27日，仅在小镇获悉路易在瓦伦被捕之后一天，已经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巴黎共和派请愿书到来之

前。该行动是由二十四岁的内科医生，刚刚才从蒙彼利埃医学院毕业的雅克·古戈（Jacques Goguet）向当地爱国社团提议的。大多数的当地领导人对此提议表示欣然接受。不仅仅是俱乐部，镇、区和行政管理人员也通过了这个提案。[36] 在6月29日批准的最终版本中，向国民议会提交的请愿书是严肃而且简洁的。该俱乐部成员认为，当前的君主“已经堕落了，我们十分鄙视他，以至于不再恨他或畏惧他了。我们向法庭留下了复仇之剑。我们只要求今后，法国人不应再拥有国王，只有国民自己”。再一次，这个提议也引用了罗马典故：“为了让我们成为真正的罗马人，能做的就只是仇恨以及驱逐国王。其中第一项已经成为事实。我们等待你们的行动达成第二项。”最后他们总结道：“今天，所有的偏见已经被摧毁，人民已经觉悟。大众的意见允许你们，恳求你们，把我们从邪恶的国王手中解救出来。”[37]

这份请愿书不仅被送到了巴黎，于7月6日在雅各宾派面前宣读，而且有数十份副本直接在全国的爱国主义俱乐部之间流传。无论哪里收到此请愿书，它似乎都会成为严肃而激情的讨论的话题。波尔多地区早在7月2日就拿到了这份请愿书；图卢兹和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在7月4日和5日阅读了它。到7月10日它已经到达远在法国东北角的斯特拉斯堡。法国西部的普瓦捷在两天后开始就此进行辩论；而瓦伦附近的巴勒迪克于7月13日阅读了它，7月15日它又在利摩日被阅读。最终，只有五家俱乐部完全认可了请愿书。[38] 有些人最初坚持请愿书的请求，但后来又重新考虑并决定等待国民议会的决定，或选择废黜现任国王，而不是君主制本身。即使大多数人拒绝了蒙彼利埃请愿书，但还是有一小部分人频频发表支持共和的决定。普瓦捷和波尔多的共和小分队都在大力讨论他们的决策，如果没有国民议会颁布的证明国王无罪的条文打断了这些讨论，这些小分队可能早已占了上风。[39]

我们的责任是服从

国民议会决策的消息和发生在“战神广场”的枪击事件突然结束了紧张的政治重估期。面对这场新的危机，地方精英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肯定了他们对七月法令的坚持。在巴黎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些法令都成为大规模示威或暴力行为所针对的目标。那些发动了大革命，成功地带领这个国家穿越重重困难，获得胜利的众议员们，依然在各省的爱国人士中拥有极大的尊重和威望——这让巴黎的激进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非常失望。

然而，很多公民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十分苦恼。市民和地方行政官在致国民议会的信中经常提到个别代表的发言，这些发言已被阅读、比较和仔细权衡过了。“罗伯斯庇尔、瓦迪耶、萨乐（Salle）、杜波和巴纳夫”同时出现在一个城镇的清单上——这表明辩论双方的选择都已被充分考虑过了。一些小组逐步叙述了他们的整个思考过程，审查了所有可能应对此危机的解决办法，排除了那些似乎行不通的办法，然后对国民议会的最终决定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太多复杂的事情了！”一个小镇的选民在思考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境时这样写道，“国王似乎有罪，但他有法律豁免权。如何才能指控他呢？如何才能让他接受审判？”[40]

接受国民议会决策绝不是支持国王的同义词。对路易的支持率继续急剧下降，从危机初期的31％下降到17％，7月下旬下降到了7％。到最后阶段几乎没有人提起“一位好国王接受了坏建议”的老借口。只有一封来自法国中部小镇的陈情信提到了国王的“神圣”角色。可以肯定的是，7月中旬之后，五分之一的陈情信明确地谴责路易。但是也有近四分之三的人不再提及他。[41]许多外省领导人显然更愿意“用沉默的面纱掩盖

他的出逃这一悲惨事件”。绝大多数写信人的主要目标是重申他们对国民议会的忠心，因为国民议会是大众意愿的终极代表。议会代表们再一次被捧上了天，被歌颂为“国家之父”或者是以罗马人为模范的英雄。无论以前当地爱国者的观点如何，现在他们都一再宣称——他们觉得有义务跟随国民议会：“服从是任何一位优秀公民的义务。”来自布列塔尼北部一个城镇的雅各宾派写道：“而且我们现在都需要做出表率。”几乎各地的爱国者都认同：“你曾说过，每一声呼唤都能传遍祖国大地：‘这就是法律！’为此，我们已经做好赴死的准备。”即使此前他们曾表示要对国王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如今“大众的意愿”已由国民议会决定，“此前可能仅仅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现在就有可能被定为犯罪了”[42]。

当他们就政治形势和国民议会的决定发表评论时，大多数通信者对君主或君主制的热爱远不及对共和政体的恐惧，也不如他们对巴黎共和派“煽动性”行动的愤怒。他们一再回到对国民议会本身的争论——其中许多人将其归因于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等各位哲学家——在法国，共和国是不切实际和行不通的。在瑞士或古希腊这样的小城市国家，这样的政府也许是可行的；但若是在一个大国，这就很容易导致混乱。“这个国家太辽阔了，因此无法变成共和国。迟早周边势力会插手进来为我们收拾残局。”那些提议成立共和国的人被认为是“既没有经验教训，没有历史道德感，也没有考虑周全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更没有考虑法国习俗、人口、地理和态度各个方面的事实。”“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即使人口众多，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中心，一个执行最高行政权力的单一场所，从这里出发，王权的杠杆——就像新的阿基米德定律一样——可以撼动国家的所有地区。”[43]

如果国民议会撼动君主制，似乎会导致整个法国陷入混乱，许多法国公民对这样的前景感到恐惧。大多数情况下，巴黎的抗议运动在各省都引发了强烈的负面反应。巴黎人群的骚乱被反复地提及，这些事件似乎只是为了清楚地证实在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情况下把权力交给人民是

十分危险的。“巴黎公民的请愿让我们愤慨不已”；“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焦虑。我们担心，在混乱的人群的压力下，将之错误地称为‘民族的声音’，可能会使你被迫牺牲你的原则”。到处都充斥着人们无尽的谴责：“无政府的深渊”，“无政府主义的可怕灾难”，“那些误入歧途的平民的愤怒”。[44] 许多外省的代表们怀疑首都的抗议活动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或外国势力的煽动，密谋要破坏宪法。“隐藏在爱国主义面具背后的是这样的阴谋者，只想传染给我们不和谐的疾病。”“无政府主义的许可”是由“怪物”、“叛徒和顽固派神父”，国家的敌人所推动的，他们“将自己推翻宪法，把国家推向混乱的祸心隐藏在爱国主义的外衣之下”[45]。

尽管最终被说服支持这一决定，但少数几个外省团体发出信函——可能只有八分之一——表明他们并不完全满意国民议会的决定。[46] 在某些情况下，当地公民最初是反对法令的，他们只是在仔细了解了辩论过程后才扭转了这一立场。“要是我们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一位坦率的官员写道，“我们应该会明确地决定对国王采取行动。但是立法者不得不对抗这样的情绪，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屈服。”最后，国民议会让他们相信，君主立宪制是唯一能够“维护大国稳定所需的能量和团结，并提供派系党争的影响不能逾越的壁垒”的体制。另一群公民同意：“当国王用对他最神圣承诺的背叛来回应我们的爱和信心后，我们都希望国家的法庭能够对这一罪行进行裁决。”但是国民议会“凌驾于当下的这些考量和激动情绪之上，并通过7月15日的法令，宣布了一项关于国家基本法的新声明”。波尔多附近一个小村庄的领导人们更加直言不讳：“起初我们不赞成你们的法令，认为这与你们的原则不一致。”但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宁可背负一个毫无价值、虚伪狡诈的国王，也不愿被迫面对恐怖的国内外战争。”[47]

其他人则表示，虽然他们会遵守法令，但是仍然对国民议会的决定存有疑虑。布列斯特布雷顿海港的官员认为，国家现在掌握在这样的人

手里，“他的出逃和他的宣言表明，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布列塔尼的另一个城镇同意接受路易作为他们的国王，“只因为我们需要遵守法令”。而蒙彼利埃的领导人曾大力推动共和国成立，他们是以一丝讽刺的态度接受这些法令的：“在社会中，人只能在不同的枷锁之间选择。”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置于“法律的光荣和有益的枷锁之下”。有几个团体明确表示，他们遵守国民议会的法令是有条件的，一切都取决于国王的良好行为。他们会接受路易，“只要他继续用他的权力维护宪法”，只要他认识到国王“应该要服务于人民而不是要让人民为其服务。”还有一小部分人大肆批评国民议会。佩里格（Périgueux）的雅各宾派并不确定最近的法令是否“符合良知的呼唤和国家的普遍意愿”。他们警告议员们不要忘记，“你们只是实现人民意愿的机构”。如果未来他们希望得到民众的服从，那么他们不能忽视“维护人民的普遍信任”的重要性。事实上，有差不多十几个被调查者同意接受这些法令，只要国民议会立即留心其替代人。现在正是让代理人回家，找其他人取代他们的时候。否则，就像一个小镇直言不讳所警告的那样，“你们的坚持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固执”[48]。

*　　*　　*

路易十六出逃瓦伦这一事件已经动摇了法国外省社会的根基。过渡期结束之后，经过激烈的辩论，舆论已果断地转而反对在位的君主。至少从巴黎发出的恶言恶语已经在整个国家蔓延开来。尽管只有一小部分城镇采取集体的立场，赞成废黜国王或建立共和国，但赞成这种立场的个人已经出现，并几乎在王国所有地区都开始推行他们的观点。到处都有人讨论这个想法，并考虑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基础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变化最终被大多数人拒绝了。所有发表声明表示服从的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暗示或明确地表示他们准备服从国民议会代理人的决定，即使这一决定涉及国民议会本身对权力的永久假定。实际上，没有一封信谴责6月21日国民议会暂停国王的职务。十四个月后，一个新的国民大

会将创建一个共和国，在巴黎以及在外省，很多法国人已经开始考虑在没有现任国王的法国生活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是根本没有国王。

注释

[1] 参见，例如Legendre，71；Geoffroy，letter of June 22。

[2] Thelander，472-475；Goubert，27-30；Bloch，224-226.

[3] Goubert，30；Hunt，*Family Romance*， chap. 2.

[4] Markoff，370-375；and *AP* vols. 1-8.

[5] Egret，390-395；Gottschalk and Maddox，114，205-206.

[6] AN C 104 （1） （Troyes）.在这份档案中，还有很多类似的陈述。

[7] Kennedy，260-261，266-267；AN C 125 （2） （Coudray）.

[8] AN C 125 （1） （Chateaurenard）；Bruneau，164；Dubois，330；Gaugain，1：239；Gower，69.

[9] 我只分析了以集体的名义起草的声明，个人寄来的信件不在此范围内。这样的声明少则由三四人，多则由上百人共同签署。大部分这样的陈述是在AN C 124-130（按城镇或部门的字母顺序归档）中找到的。该资料库得到了特定的部门档案和地方研究文件的补充。这份资料库中共有来自392个社区的662份声明。Paul Girault de Coursac的“瓦伦事件之后的公众舆论研究”（“L'opinion publique après Varennes”）也使用了AN序列的资料库，但Paul Girault de Coursac得出的数据和结论都与我的明显不同。

[10] 在这一时期的72份陈述中，有22份（31%）显然对国王抱有同情的态度，21份（29%）对国王不满，26份（36%）压根没有提到国王，还有3份（4%）态度模棱两可。

[11] AN C 124-130，letters of Privas，Montrichard，Chateauroux，Arras，and Limoges；*Ville de Rouen*， 33. See also AD Haute-Marne，L 274 （Saint-Dizier）.

[12] AN C 130 （2），dos. 454 （Vendôme）.

[13] AN C 130 （2） （Toulon）；Labroue，147.

[14] Boutier and Boutry，16 and passim.

[15] Miles，1：250；Labroue，152；AD Meuse，L 2188*；AD Gironde，12 L 13.

[16] Connac，64-65；AN C 130 （1），dos. 449 （Tours）.

[17] 在这一时期收到的共计265封信中，有116封来自雅各宾俱乐部。在这265封信中，有44封（17%）表达了对路易的同情；有3封（1%）态度不明确。

[18] Labroue，27-28；AN C 125 （1），dos. 406 （Brioude）.

[19] 共有155封，占265封信的58.5%。其中，有88封（56%）来自雅各宾党人。

[20] AN C 124-130，letters of Lauzun，Vesoul，Condom，Nevers，Dole，Mirambeau，Fécamp，and Le Puy.

[21] AN C 124-130，letters of Montfort-l'Amaury，Alès，Toulouse，Niort；Pommeret，140-141.

[22] 圣巴托罗缪（Saint Bartholomew），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传说在传道时被暴徒剥皮而殉道。圣巴托罗缪日在每年的8月24日。——译注

[23] AN C 129 （2） （Saint-Paul-les-Trois-Chateaux） and C 128 （2）（Nantes）.

[24] 共有63封，占265封信的24%。其中，有18封（29%）来自雅各宾党人。

[25] AN C 124-130，letters of Aix-en-Provence，Marennes，Colmar，Collongues，Castelnaudary，and Crévy.

[26] AN C 124-130，letters of La Bassée，Besançon，Mirambeau，ibid.；Millot，205.

[27] Kennedy，274；AN C 124-130，letters of Le Puy and Alès.

[28] A total of 62 （23.5 percent） of the 265 letters. Our list of such radical

Jacobin archiv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found over 60 asking that the king be deposed：Kennedy，273. However，most of the locations are not mentioned by the author，and they have not been counted here.

[29] A total of 32 （52 percent） of the 62.

[30] AN C 128 （1），dos. 431 （Montauban）；Fray-Fournier，39-40；AN C 128 （2），dos. 433 （Nantes）.

[31] Legendre，letter of July 10；Wahl，397-398；Mathiez，93；Hugueney，137.

[32] AN C 126 （1） （Dole）.

[33] AN C 129 （2） （Saint-Claud）；C 128 （2） （Niort）；Lecesne，1：158.

[34] Roland，2：305，319.

[35] *AP* 4：44-58.

[36] Chobaut，548-551；Duval-Jouve，1：177；Peronnet，142.

[37] AN C 128 （1） （Montpellier）.

[38] Those of Béziers，Pézenas，Perpignan，Bar-le-Duc，and Strasbourg.

[39] Chobaut，554-556；AD Gironde，12 L 13；AD Meuse，L 2188*；Roux，364；Fray-Fournier，39-40；Thibaudeau，138.

[40] AN C 124-130，letters of Belleville and Chateauroux.

[41] Of 325 letters received during this period，only 22 （7 percent） were sympathetic to the king；67 （20.5 percent） condemned him，and 236 （72.5 percent） made no mention of him. The one town describing the kingship as “sacred” was Bourbon-Lancy：AN C 125 （1）.

[42] AN C 124-130，letters of Etain，Aire，and Alès；Pommeret，141.

[43] AN C 124-130，letters of Abbeville，Montreuil-sur-Mer，and Fontenay-le-Comte.

[44] AN C 124-130，letters of Caen，Grenoble，Etampes，and Péronne.

[45] AN C 124-130，letters of Castres，Josselin，Pons，and Bourges.

[46] A total of 39 （12 percent） of the 325.

[47] AN C 124-130，letters of Besançon，Troyes，Argentan，and La Teste.

[48] For example，Legendre，letter of July 19；AN C 124-130，letters of Lamballe，Montpellier，Quimper，Macon，Périgueux，Charolles，and Saintes.

第八章　事件之后

随着外省的男男女女结束了对国王命运的争论，一股镇压浪潮席卷了巴黎市。战神广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周多之后，军事管制的红色旗帜依然飘扬在市政厅上空。掌控国民议会的温和派爱国者追击所有被视为“捣乱分子”的共和主义者。代理人们匆忙通过了一项新的反暴乱法令来加强镇压力度。任何想要通过文字或著作来煽动暴乱的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这项法律在起草时甚至被赋予了追溯效力，以制裁7月17日示威期间及之前的行动。[1] 而仅仅三天之前，这些立法者中还有很多人曾表示对国王进行追溯性处罚是非法的。

尽管这些调查是在市法院和巴黎警方的官方指挥下展开的，但依然受国民议会研究和报告委员会的监督。战神广场事件后的几天内，超过两百人因向国民自卫队投掷石块或恶语相加以及其他各种“罪行”而锒铛入狱。甚至连政府也在追逐共和派领导层、博爱社团的主要发言人以及一些激进报纸的编辑——如马拉、丹东、德穆兰、卡利奥（Kéralio）和罗伯等人。[2] 正如许多外省官员在应对国王出逃危机时所表现的那样，国民议会和巴黎领导人对最近颁布的严酷法令毫无疑惧。他们下令警卫和警察关闭出版社及政治俱乐部，这是自君主专制废除以来首次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一个早在旧制度时期就基本被废弃的秘密警察线人系统又被重新启动了，他们分派线人们在酒馆或街角窃听私人谈话，获取可能袭击政府的信息。他们以全市人口普查为伪装，派市政特工到巴黎各地的公寓搜寻可疑的人或文件。类似的监禁和起诉一直持续到8月。许多人在没有见到法官的情况下被单独拘禁数周，有些人甚至没有被告知被捕的理由，以至于人们怨声载道。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之

一科琼·德·拉帕朗（Cochon de l'Apparent）则坦然接受了这些行为背后的逻辑。“在危机的非常时刻，”他辩解道——与夏尔·拉梅特相呼应——“当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非法逮捕是合理的。”[3]

现在，广泛进行的密谋行动被认为是出于反对大革命的而组织的，所以似乎更有必要被镇压。这完全不可能，或者只是温和派试图自我说服，战神广场的请愿者们一定不是自愿反对国民议会的法令，他们一定是被外部势力腐化或误导了。尽管自革命开始以来代理人们一直在提出类似的指控，但大多数人长期以来都拒绝以阴谋论解释这次事件。1790年年底，国民议会代表高提耶对近期可能会发生暴动的预测做出回应，这些预测事实上并未成真：“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他们。”他写道：“你已经看到，这些怀疑完全没有根据。没有什么能比（关于密谋行动的）虚假公告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恐慌了。”但现在，似乎每个人都陷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不仅在他们的言谈中，还在他们寄给朋友和选民的信件中，他们反复谈及潜在的反革命阴谋和由外国势力提供的资金：“巴黎受到一大批获得资助的外国特工的影响”；“普鲁士和英国的黄金已经遍布首都，以腐蚀普通民众中不那么开明的一部分”。一些温和派甚至相信，他们在国民议会上的激进对手们——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其他人，都收受了这些间谍组织的钱财。[4]

虽然毫无疑问在巴黎存在着间谍，但是在1791年的夏天，人们并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将外国特使与共和主义煽动者联系起来。不可避免的是，整个巴黎民众都强烈反对国民议会的行动和解释。玛丽-让娜·罗兰和她的丈夫，曾秘密庇护了克利奥和罗伯免受警方的追捕，他们对事态的转变感到愤怒和沮丧。罗兰夫人写道，所有可用的手段都被用在一个普遍的“针对优秀爱国者的迫害体系”中，以此来玷污他们的声誉，这些手段包括“充斥着谣言的册子、密探、偏颇和伪造的证词”。美国人威廉·肖特也深感震惊，他在给杰斐逊的信中写道：“每天，打着众所周知的为了公共利益的幌子，公然违反自由真正的原则。”“根本没有真正的

人身保护令存在……很难从监狱中释放无辜的人。”[5] 与此相对应，许多共和派人士确信，他们的国民议会对手们现在已被贵族或外国政府操控。

现在巴黎人按照不同的街区，对这一事件产生了两极分化的态度，要么同情那些战神广场的示威者，要么支持镇压。例如，在圣马塞尔，在此居住的、曾在7月17日向请愿者开火的国民自卫队队员遭到了唾弃或攻击，并有人威胁要毁掉他们的房屋。巴黎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巴伊市长和拉法耶特将军，受到了大部分市民的赞扬和拥护。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已经成为极端暴力的象征和人们的仇恨对象”[6] 。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可怕分裂，戏剧性地说明了这种分化的程度。在危机当中，几乎所有坐在俱乐部中的国民议会代理人都在会议中途退场，声称这个社团现在掌握在想废黜国王的不守规矩的外人手中。只有少数代理人，包括佩蒂翁和罗伯斯庇尔，仍然忠心耿耿。到了夏天，大约六十名属于国民议会的激进分子渐渐地回归俱乐部。但是，由巴纳夫和拉梅特兄弟领导的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正对面的废弃斐扬（Feuillant）女修道院创建了一个敌对的俱乐部。他们拒绝一切促成和解的努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雅各宾派和斐扬派两个俱乐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争夺在巴黎，甚至在全国各地的权力和影响力。这个夏天，在各个城镇展开的许多选举新立法机关的集会，成为雅各宾派或斐扬派地方支持者之间竞争的标志。[7]

在大革命初期的光辉岁月里，爱国者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把握住了一个人民幸福且民族团结的新时代，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回忆。在国王出逃以及随后的共和运动中，巴黎被怀疑和仇恨的氛围所笼罩。曾经被认为拥有共同目标的人们，现在却彼此指责对方与反革命分子或外国势力勾结。两家敌对俱乐部的成员，甚至不敢在公开场合被人看到互相之间有接触，哪怕对方是曾经最亲密的朋友。拉博·圣埃蒂安（Rabaut Saint-Etienne）是法国南部的一位新教牧师，也是宪法委员会

的重要成员，因被指控与国王——或英国人或奥地利人同谋而饱受折磨。和他的许多同伴一样，他受到了左右两派的夹击和围攻，按照高提耶的说法：一方是“派系”激进主义者，另一方是“路易十六伪善的朋友以及虚伪的宗教狂热者”。西奥多·韦尔涅（Theodore Vernier）觉得“一把剑正悬在我们头上”。如此情形下，代表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疲力竭。布歇特（Bouchette）向佛兰德斯的一位朋友哀叹道：“甚至没有人能描述我们的耐心是怎样消磨殆尽的。绝大多数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们，都盼着能赶紧离开。我们这里的生活糟透了。如果这样的情况再不快点结束，我们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8]

复立为王

代理人们意识到随着他们在起草宪法上花了太长时间——已经过了两年多——公众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被迫要尽快完成这项任务。强有力的宪法委员会和相关的修正委员会已经开展了数月的工作，试图将自大革命开始以来草率通过的大量法令分类，确定哪些措施确实是“合乎宪法的”，哪些措施只是“立法”。然而，整个过程由于国民议会内部可怕的派系斗争而拖延了几个星期。掌控着这两个委员会的斐扬派相信，共和派的危险远远大于君主制的潜在威胁。自6月下旬以来，巴纳夫、杜波和拉梅特兄弟重新启动了与国王的秘密谈判。在陪同王室从瓦伦返回时，巴纳夫对王后提出了一项协议。他和他的朋友们承诺竭尽全力保护君主制并巩固国王的权威，作为回报，他们只要求路易接受宪法，并取得奥地利帝国对法国新政府的认可。[9]

但是，当斐扬派试图推动宪法的变革，巩固国王的权力并且限制民主时，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遭到佩蒂翁、罗伯斯庇尔以及雅各宾派的强烈反对。雅各宾派现在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国民议会中不结盟的一派开始怀疑巴纳夫和他的朋友的动机。普瓦图的温和派法官蒂博多认为，斐扬派领导人一心只想使自己成为新政府的部长大臣：“我们对这些曾经自称是坚定的爱国者，而现在却变得野心勃勃的阴谋家表示怀疑。”其他人也十分惊讶，以前看起来如此强硬的民主党人竟突然扭转了他们的立场。[10] 最后，这两派（连同他们的盟友）打了个平手，只对之前通过的宪法做了少量修改。

最后，9月3日，双方斗争得精疲力尽之后，代理们达成了最后协议，宣布立宪结束，宪法完成。当天晚上九点左右，一个由二百多名代

理人组成的代表团，举着火把，在国民自卫队步兵和骑兵的护送下，将文件呈交给了杜伊勒里宫的国王。路易在他的大会议厅与部长们见面，并宣布他准备审查宪法。每个人都意识到，如果路易否决了新宪法，国民议会将不得不废黜他的王位，并辅佐王位继承人——年幼的王太子处理一切问题。“现在一切将要明朗，”布歇特写道，“究竟国王会是国家的朋友还是敌人，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决定。”[11]

代表们在焦急地等候，紧张的局势还在持续发酵，迫于此情形，路易仔细阅读了宪法草案并认真考虑他应该做出什么选择。他清楚地知道，自6月底以来，已有二百多名贵族、神父代表、议会代表拒绝参加国民议会的所有辩论，拒绝承认该草案。但最终，9月13日，路易宣布他将确实接受新宪法。第二天，他出现在国民议会面前，签字并宣读誓言。他还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解释他的立场，尽管这份声明出自他的一位部长之手，但经过路易的签字，就如同他亲口所言一般。声明中，他试图再次解释出逃瓦伦事件。他完全无视了自己在6月21日亲手写下的声明，声称他只是想摆脱巴黎的派系和暴力：“我希望把自己从所有冲突的政党中分离出来，并确定哪个立场才能真正代表国家的意志。”他承认，他仍然不确信新政府拥有“一切控制和统一如此庞大的法国的方方面面所必须的力量”。然而，他表示愿意试一试：“我认为只有经验才能判断它是否可行。”并且他宣誓要尽全力执行宪法：“我会接受的，”他承诺道，“我会确保它的执行。”[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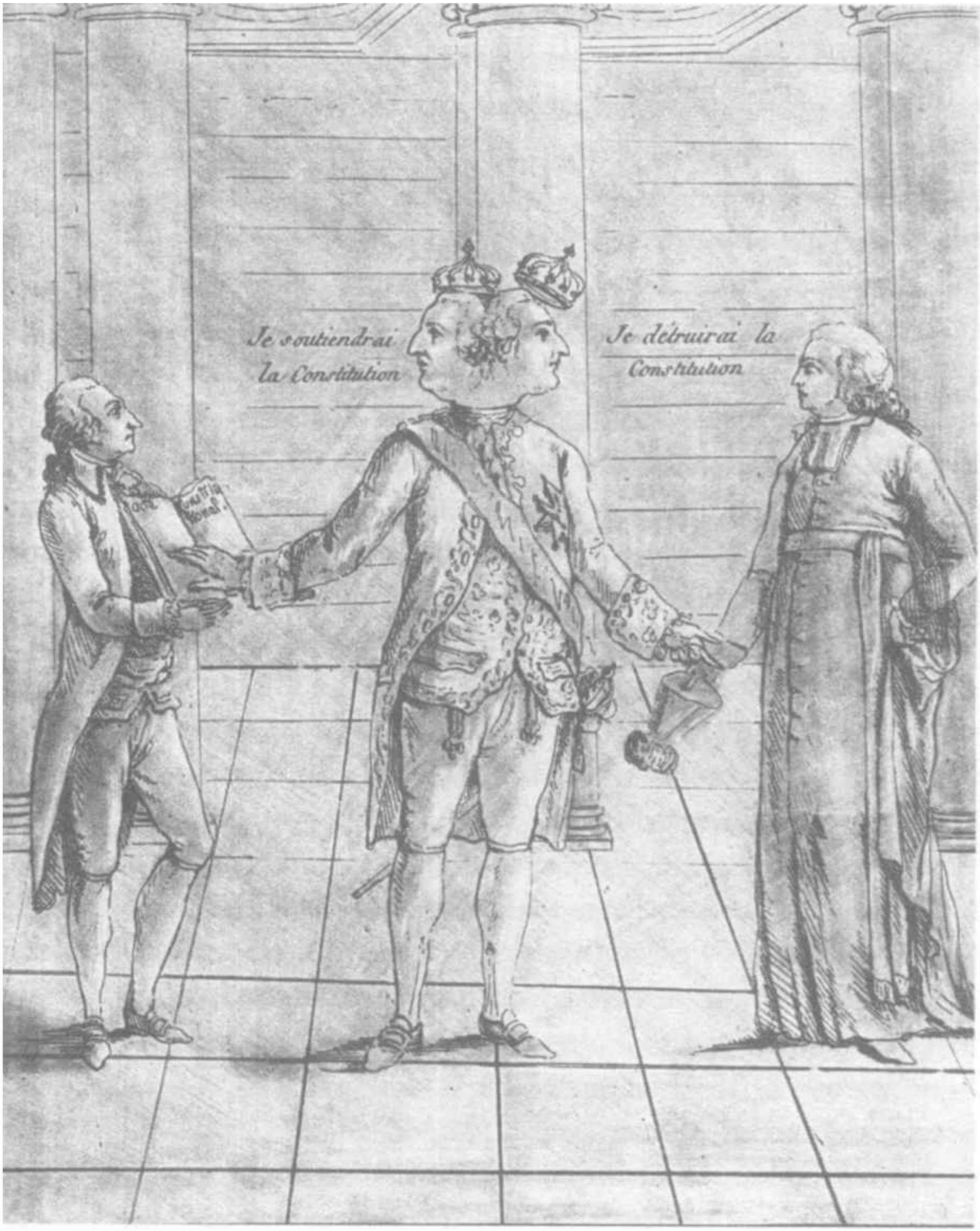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不管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还是部长们的建议，国王提议大赦因大革命而被定罪或起诉的人。“为了消除仇恨，缓解革命所带来的种种麻烦，让我们忘记过去。”国民议会立即批准了国王的提议。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无论是等候审判还是已经定罪的在押政治犯都被释放了。共和派激进分子、反革命贵族、顽固的神父，以及那些被国王出逃牵连的人——都立即获得了自由。在“崇高的阴谋”中拯救国王的三个关键人物——舒瓦瑟尔公爵、戈格拉和达马，近三个月来第一次离开

牢狱。[13] 此后不久，这三人都加入了横跨莱茵河的移民大军。

路易也获得了行动自由，重新成为君主立宪制的“首席执行官”。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国王夫妇一直被禁足在王宫之中。他们被日夜看守，严格限制与他人会面，甚至被禁止关闭房门，除非更换衣服时。外国大使不允许与国王接触，只能与外交部长联系。然而，现在国王被允许恢复“正常”生活，并可以在首都内自由行动。甚至在为期一周的庆祝宪法完成的庆典中，他还出席了多场诸如音乐会、舞会、焰火晚会和灯光秀之类的活动。据报道，当他穿行在城市中，依然能够得到人们的欢呼，甚至听到他最爱的“国王万岁”的呼声。同时，国民议会投票决定将“国王”这个词重新列入正式宣誓中，所有官员和军官都必须遵此宣读。[14] 9月底，随着“行政”权力开始生效，国民制宪议会正式解散。存在了两年零三个月后，国民制宪议会将其权力移交给了一个全新选举而出的团体——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的代理人手中。至少在理论上，大革命已经结束了。至少在理论上，国王的出逃也已经被原谅和遗忘了。

但它能真的被遗忘吗？虽然路易现在郑重宣誓保护宪法，但不要忘了，仅在几周前，他曾单方面废除了对同一宪法的宣誓。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不会重蹈覆辙呢？就像全国各地的男男女女们一样，代表们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在许多人相信，或者说愿意相信，国王已经改变了他的处事之道，并真诚地愿意遵守游戏规则。根据来自布列塔尼的代理人勒让德（Legendre）的说法，国民议会“现在被说服了，相信国王经过痛苦经历的启发，将无条件地接受和拥护宪法”。他的同伴韦尔涅对此表示赞同：“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仍然认为国王是真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代理人都同意这种乐观的看法。蒂博多十分担心那些再次环伺君主身边的贵族，会对其产生邪恶的影响：“‘先接受宪法，’他们会这样告诉国王，‘然后等到时代变了，你可以再说你是被迫这样做的，别无选择。’”福尔孔也在沉思，国王“可能又发了另一个虚假的誓言，一个

他可能根本没有打算效忠的誓言”。一位名叫兰代（Lindet）的神父冷笑着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国王已经发誓要维护宪法。但他只会在时机适宜之时坚持他的誓言。”[15] 随后的几周里，代表们很容易看到一幅广泛流传的关于国王的讽刺漫画。在漫画里，路易被描绘成拥有两个头颅的古罗马两面神“雅努斯”（Janus）。一张脸赞许地看向一位议员，宣称：“我会维护宪法。”另一张脸则注视着着一位流亡神父，宣称：“我会破坏宪法。”



《雅努斯国王》　国王一面承诺维护宪法——同时在他的王冠滑落之时——又一面破坏宪法。

这种怀疑还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国王和王后保证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他们出逃之后仍然和以前一样狡猾。他们迅速恢复了与欧洲其他国家首脑的秘密通信，私下否认了他们公开支持宪法的声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这方面的行为尤为值得注意。很难说王后在从瓦伦归来途中与巴纳夫的对话是否是严肃认真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她继续与格勒诺布尔的年轻代理人举行秘密会议。她使出一个老练的谄媚者所能使用的所有诡计，诱使这个年轻人高度肯定她的坦诚，以及她对他同情自己的深深的感激之情。但是，她一次又一次地用密语偷偷给冯·费森或奥地利的大使，或者她的哥哥——奥地利的皇帝写信，信中她否认了自己对巴纳夫承诺的一切。她对出逃后公众对王室的“不敬”表示愤怒，谴责代理人是“畜生”、“流氓”和“疯子”。她还谴责整个宪法是“完全不切实际和荒谬的”。[16]

不仅仅是王后，国王也在继续着双面表演。在他出逃失败后仅几周的时间，路易设法递给奥地利皇帝一封亲笔函。他写到，很遗憾，他没能在6月21日“恢复自由”，“和那些真正为国家命运考量的法国人并肩作战”。他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囚犯，他希望他的内兄了解到这个实情。在信中，他第一次敦促奥地利皇帝来“援助法国国王和国家”。[17] 其中隐含着的强烈暗示是他希望奥地利对法国进行军事干预。到9月，或许在决策摇摆不定的情况下，他可能稍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在给他的两个流亡兄弟的秘密信件中，他认为最好的策略是等待，让革命政府在自己的荒谬中走向崩溃。他叮嘱两位王子不要挑起战争，担心这样的行为可能给国家带来不良后果。但他也宣称，坚信“人权”的概念是“完全疯狂的”。尽管现在有些平民“妄想提升自然赋予他们的地位”，但是他仍然坚信他与贵族之间的联系是“他王冠上最古老且最美丽的珠宝”[18]。

到1791年12月，国王似乎再次转变了态度。在给流亡的“外交部长”布雷特伊（Breteuil）男爵的信中，他建议设立“由军事武装力量支持

的欧洲主要政权议会”。他认为这是“重建一个更理想的局面，确保困扰我们的邪恶势力不会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最佳手段。现在，显然，他已经放下了对战争的道德疑虑。他似乎在推动大国直接干预，推翻他发誓要捍卫的宪法。[19]

这就是1792年初的情况。换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点，路易十六或许可能已经完成了他的和平统治。他甚至可能被后人评价成一位比一般君主更优秀的君主。他无疑希望为他的人民提供最好的服务。受到空前规模的财政危机的影响，他以自己不确定和不一致的方式，试图对其政府进行全面改革。“从未有一个国王能为国家做这么多事情。”他在1789年6月23日对国民议会以最大的诚意这样宣称。但是当他发表这个演讲时，他的改革愿景和正在听他演讲的这些爱国者们的改革愿景已经大相径庭。事实上，一部分出于爱国者的一厢情愿，一部分是王室的欺骗，“公民国王”的神话才存活了这么久。现在，在事件的压力下，在他的王后的影响下，路易重拾他从小接受的价值观，包括君权神授、社会的等级性以及人生而不平等的理念。这是他与参与大革命的男男女女们相背离的地方。

恐怖危机

法国大革命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对那些参与了此事件的人们以及整个法国来说都甚是严酷。挣扎了两年多才完善的1789年宪法，原本人们希望它可以成为“世界各国的模范”，却只持续了11个月。[20]根据宪法组建的新的立法议会，却在一开始就深陷雅各宾派和斐扬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中，无力挣脱。甚至比第一批的代理人数量还多，“立法议员们”困扰于国王的背叛，特别是路易用他的否决权阻止了针对流亡贵族和顽固神职人员的条例。不断有传言称，王后秘密组织了一个“奥地利委员会”，暗中破坏新政权。事实上，这些传言并非子虚乌有。[21]1791年8月在德国皮尔尼兹夏宫（Pillnitz）签署的联合协议强化了这种担忧。在这里，王后的哥哥利奥波德——也许是由于路易的紧急请求——敦促所有欧洲国家使用武力来“恢复”法国的君主制。立法议会十分害怕外国势力和法国朝廷暗中勾结密谋造反，同时在雅克·布里索（Jacques Brissot）等人的煽动下——掀起一场伟大的运动，在整个欧洲传播大革命理想—— 1792年4月代理人们公然向奥地利宣战。不久，他们发现自己同样陷入了与普鲁士之间的冲突。就这样，立法议会将国家推向了全面的对外战争中，而这正是他们的前任极力希望避免的。

起初，法国在战争中节节溃败。到1792年夏季，大家在瓦伦事件发生时所担心的外敌入侵已经成为现实。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突破了法国的边境堡垒，占领了凡尔登和瓦伦，并缓慢而有条不紊地向巴黎进军。面对德国军队的攻击，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国王已经背信弃义，巴黎人在当年8月发起了第二次革命。在1791年7月共和派首次提出，并获得了参与运动的群众们的支持后，巴黎人以及外省的国民自卫队也掀

起了反对君主制的斗争。8月10日，路易和他的家人被迫撤离杜伊勒里宫，叛乱分子在城市中心卷起腥风血雨，造成近千人死亡。第二次革命带来了一股新的民主浪潮，几乎所有的法国人，无论财富地位如何，都获得了选举权和任职权。六个星期后，匆忙组建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正式宣布废黜国王，并于1792年9月21日创建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幸运的是，法国军队表示愿意支持新的共和国。国王的出逃激发了民族主义热情和自信，使得法国军队在距离圣梅内乌尔德几英里的瓦尔密（Valmy）战役中击败了普鲁士军队，之前，正是在圣梅内乌尔德，德鲁埃首次认出了出逃的国王。最终，同样是这支军队越过法国边界，入侵并“解放”了整个西欧地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陷入了彼此猜疑、自相残杀和近乎无政府状态的时期。随着内战和农民起义在全国大片地区爆发，大部分欧洲国家与法国相继开战，激进的“无套裤汉”为改善经济条件而报复政敌，共和派政府发动了比1791年更为疯狂的镇压。在这场风暴结束前，有一万八千多名来自各个社会团体的人士遭到司法审判，而在内战和非官方的报复性劫掠中还有数万人死亡。

在所有的处决中，没有比对路易十六本人的处决更具戏剧性、更重要的了。在1792年的最后几周，经过数月的监禁，国王在国民公会面前接受了审判。整个诉讼过程中，他和他的律师坚称，依据1791年的新宪法，他有权免于被起诉，而在新宪法签署之前，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文来限制国王的行为。他仍然狡辩出逃瓦伦只是一次“旅行”。而且他巧舌如簧，拒绝接受任何关于他要为法国流血事件负责的指控。“我已经提供了大量证明，表明我对人民自始至终的热爱，”这一点应该为所有人所了解，“我问心无愧。”但是，在审判开始前不久，革命者们发现了一个秘密保险箱，隐藏在杜伊勒里宫的木建部分后面，里面藏着国王的私人文件。其中许多文件都出自路易本人之手，它们提供了大量国王过去欺骗大家的证据：他反对和阻挠革命的努力，以及他与某些反革命分子

的勾结。[22] 大部分对国王的正式指控都是直接依据这些文件。起诉书中最长的一条指控涉及路易未遂的出逃，他用以执行这个计划所支出的公共资金，以及他遗留在桌子上谴责宪法的声明。[23]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国民公会几乎全体一致投票通过国王“阴谋反对自由和国家安全”的罪名成立。其后不久，几乎没有任何翻盘的余地，路易被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面对聚集在革命广场（即后来的协和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巴黎人，路易十六毫无畏惧地走上了断头台。直到最后他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到1795年，1791年仲夏夜逃离巴黎的六名王室成员及随从中，仅有两名苟活于世。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叛国行为更为恶名昭彰，远甚于她的丈夫（她甚至将法国的战争计划偷偷传递给了奥地利），同年10月，她步路易后尘，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王的妹妹，伊丽莎白，仅因为她的姓氏波旁和对王兄的忠诚而获罪，于1794年5月被斩首。一年多后，被保王派称为“路易十七”的年幼王太子，在狱中病逝。他的姐姐本来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命运，然而剧情就是如此讽刺，她于1796年因交换战俘让-巴蒂斯特·德鲁埃而被释放了。让-巴蒂斯特·德鲁埃是一位在阻止国王出逃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人，也是国民公会的成员、投票处死路易的人。他两年前和法国军队执行任务时曾被奥地利抓获，回到巴黎后又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惊异的险境，他徘徊于法国、牢狱和政治中，结了婚，在另一个外省城市获得了新的身份。最终，于1824年在那里安然长逝。[24]

但总的来说，我们故事中出现的主要爱国者的结局并不理想。陪同王室返回巴黎的两位代表都没有在大革命中幸存。随着斐扬派的失败和自己卸任返回老家，巴纳夫于1793年底因“君主主义”而被逮捕并处决。佩蒂翁一度担任过巴黎市长，最终与他的朋友罗伯斯庇尔分道扬镳，逃离了国民公会，在法国南部藏匿时自杀身亡。1791年年底，哲学家兼院士让·西尔万·巴伊退出了政坛，但他依然因为参与了7月17日的枪击事件

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处决地正是当年事件发生的战神广场。拉博圣·艾埃蒂安（Rabaut Saint-Etienne）、孔多塞（Condorcet）、布里索（Brissot）、玛丽-让娜·罗兰、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以及许多主要革命派系的领导人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拉法耶特将军和他的朋友拉杜尔·莫布尔（Latour-Maubourg）以及昔日的政敌亚历山大·拉梅特曾一同被关在奥地利的监狱，苟延残喘了五年，最终活了下来。曾经逮捕过国王并将其引至阁楼之上的瓦伦杂货店老板骚塞先生也在大革命中幸存了下来。但他的生活却并不幸福。他不仅被保王派视为眼中钉，同时还被革命党人怀疑是君主制的同情者。他在普鲁士入侵期间颠沛流离而且失去了第一任妻子，随后背井离乡，于1825年寂寥死去。[25]

1791年，大部分保王党的结局远远好过他们的爱国主义对手。9月大赦获释出狱后，舒瓦瑟尔、戈格拉、达马和三名保镖很快投靠了流亡在外的布耶将军和他的儿子们。除了布耶外，所有人都在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幸存了下来，1814年后重返法国，被保守的复辟政府奉为英雄。阿克塞尔·冯·费森也在大革命中幸存。凭借一身非凡的胆略，他于1792年2月从流亡地布鲁塞尔潜回巴黎，在杜伊勒里宫见了王后最后一面。18个月后，他被玛丽遭到处决的消息压垮，回到了瑞典。“要是我能够和她一起死该多好！”[26] 他在给妹妹的信中绝望地写道。他终生未娶，即使在瑞典拥有显赫地位，也一直对王后怀着深切的情感。1810年6月20日，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民众起义中遭到屠杀。此时距离他发动那场著名的、几乎改变了法国命运的国王出逃事件，已经过去十九年了。

注释

[1] *AP* 28：402-405；Lacroix，441-443；Mathiez，193-194；Gower，110.

[2] Gower，108；Andress，207-208.

[3] AN D XXIX bis 31 B，dos. 321；D XXIX bis 33，dos. 348；D XXIX bis

34，dos. 349-350；*AP* 28：543；Mathiez，201-205；Reinhard，153.

[4] Gaultier de Biauzat，letter of December 23；Basquiat de Mugriet，letter of July 19；also *AP* 28：365；Bouchette，614；Durand，letter of July 24；Maupetit，22 （1906）：480；Thibaudeau，166-167；Lepoutre，494；Faulcon，445；Legendre，73-76；Dubois，373.

[5] Roland，2：335；Short，20：654-655，674.

[6] 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62；Ruault，254.

[7] Burstin，“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258-262；Aulard，*Jacobins*， 3：25 and following；Reinhard，283，301；Tackett，“Les députés de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142.

[8] Rabaut Saint-Etienne，“Correspondance，” 269-270；Gaultier de Biauzat，2：389；Vernier，letters of August 6 and 23；Bouchette，623.

[9] Sagnac，“Marie-Antoinette et Barnave，” 209-213.

[10] Thibaudeau，183-184；Maupetit，23 （1907）：92. See also Lindet，310-311；Vernier，letters of August 3 and 15；Legendre，letter of September 3. By September only sixty to seventy people were said to be attending the Feuillant Club；Périsse Du Luc，letter of September 2.

[11] Bouchette，632；Thibaudeau，200.

[12] *AP* 30：620-621，635；Sagnac，“Marie-Antoinette et Barnave，” 223.

[13] *AP* 30：621，632-633，646.

[14] Campan，291-292；Lafayette，3：94；Gaultier de Biauzat，2：399-400；Roger，79；Maupetit，23 （1907）：114-115；Lévis，5：284；Colson，203；Faulcon，261-263；Short，21：106.

[15] Legendre，letter of August 31；Vernier，letter of September 19；Thibaudeau，182-183；Faulcon，455，461-463；Lindet，318；also Gaultier de Biauzat，letter of September 27.

[16] Sagnac，“Marie-Antoinette et Barnave，” 212-241.

[17] Arneth，185.

[18] Girault de Coursac and Girault de Coursac，263-270. Note，however，that Louis was suspicious of his brothers，and it is uncertain to what extent he would have divulged his full sentiments to them.

[19] Sagnac，*La Révolution*，337；also Price，445-447.

[20] Legendre，letter of September 5，1791；Lepoutre，501.

[21] Goetz-Bernstein，29-30，154-158；Kaiser，263-270.

[22] See esp. Jordan，72-73，108-114，126-136.

[23] *AP* 55：3-5. There were thirty-three articles in the indictment.

[24] Lenôre，327-349.

[25] Lenôre，302-307.

[26] Söerhjelm，*Fersen et Marie-Antoinette*，320-322.

结语　出逃事件的影响

所有带着对于更好的未来的期盼，开启了1789年的人们，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声名远赫还是地位卑微，平民还是国王，是否拥有了他们应得的命运？两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都在努力探寻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和恐怖行为。法国的社会环境中，甚至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政治文化中，是否有一些因素导致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发生？法国大革命的起始与恐怖统治之间，国民议会和公共安全委员会之间，攻占巴士底狱与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路易十六出逃事件警示我们，不要对事件仅仅进行简单的线性关联。它使我们意识到法国大革命是顺势发展且不可预测的——也许大多数历史事件都有这一特点。如果事件的走向稍有不同，法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又将如何发展？如果路易十六及其家人成功逃到蒙特梅迪，之后在奥地利部队支援下跨越边境避难，那么后续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呢？事实上，6月20日、21日这两天，当所有人认为路易十六再也不会回来了，战争迫在眉睫的时候，无论是巴黎，还是国民议会，甚至整个法国社会，都前所未有地迅速团结起来。如果路易十六没有返回，战争爆发，那么团结是否会持续下去？也许法国会立刻成立共和国——6月21日那天，即使拉法耶特和杜邦·德·内穆尔（Dupont de Nemours）这样的温和派人士也如此建议。如果当时事态如此发展，这一恐怖事件是否会得以避免，或者至少影响大大减弱？或者，在别的平行世界——当然，可能性更小——路易十六拒绝了王后的劝说，根本没有出逃；抑或，路易十六认可了当时法国人民热切期望的君主立宪制，法国会朝着真正的民主和平发展吗？——会更接近美国独立战争的发展

路线吗？当然，这一系列“假设”是无法预测或证实的，然而这些反思强调了路易十六出逃对法国大革命和某些重要事件的潜在影响。

法国人于1789年成立的自由主义政权，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刚刚在大西洋彼岸建造的体系相似，并不是注定会失败的。毫无疑问，在国王出逃前夕，国民议会领导人面临着一系列极其困难的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其中一些问题显然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议员们决定改革天主教会，迫使许多神职人员宣誓效忠誓言，这使法国神父和平民十分不满。其他困难似乎是由革命进程本身的性质引起的。1789年以后，对于权威的质疑不断增加，是法国发展进程中最为典型的问题。这个问题迅速渗透到许多社会层面。军队、国民自卫队、行会、税收员，在城市的公民文化中，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拒绝遵守旧制度或新政府制定的规则，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通常极具破坏性。与此同时，社会转型遭到既得利益者和社会地位遭受攻击的人们的反对。到了1791年春季，自愿流亡在莱茵河对岸的顽固贵族和基督徒们威胁要通过暴力和武力手段来恢复旧制度。

议会的领导人也已认识到这些问题。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重建贵族权利或取消教会改革，但他们努力促进信仰自由，向那些不接受宗教改革的人妥协，并试图通过常规法院系统有序地处理与贵族和顽固派的争端。议会还尽可能快地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行政和司法结构。到1791年6月，大部分组织架构都已经就位并正常运转，可以说它们大大减少了——尽管绝不会消除——各省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并抑制了公民顺从度的下降。此外，议会可以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平民对新政权的高度支持。瓦伦公民对六月危机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

1791年春，议员们希望随着宪法的完善、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建立，法国大革命可以走向结束。建立君主立宪制，最终恢复一定程度的稳定，这一情况并非不可能；只要新制度下的君主全力支持，法国的暴力和恐怖时期也并非无可避免。6月初，大部分法国人的确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巴黎之外地区的人们——仍然认为他们

的“国民国王”支持革命。他们仍然认为路易十六可能会领导建立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在宪法接近完成之关键时刻逃出巴黎，并且正式否认他曾做出的支持革命的庄严宣誓，路易十六的行为导致了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从短期来看，他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法国人民。严重焦虑，担心暴力事件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想象中他国入侵的恐慌等情绪席卷了法国各地。爱国者们认为此后必将发生战争，他们迅速采取行动，尽其所能地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国王的出逃也促进了政治国家的全面重构。在收到消息后的几天内，所有人都意识到国王并没有被绑架，他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出逃的，这给很多人带来了残酷的冲击。他们曾将路易十六想象成一位好父亲，现在他们感到了一种深刻的遗弃和背叛。有人极度苛刻及愤怒地称路易十六为骗子、懦夫、叛徒、暴君。巴黎人民的反应尤其强烈，科德利埃俱乐部和博爱社团迅速发起了一场废除国王和君主制的民众运动。持续的请愿、游行和街头示威构成了巴黎流行激进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信号，“无套裤汉”也由此作为政治力量出现。但在法国的许多地区，在国民议会未公开宣判的三周不确定期内，一小部分人——数量远远超过历史学家的估计——认真考虑了驱逐现在的国王，甚至是建立共和国的可能性。

国王出逃大大强化了世界阴谋论者的看法。在国民议会深入研究这件事情时，一个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的全面阴谋昭然若揭，这一阴谋涉及巴黎市民、军队以及德国移民等诸多参与者。在这个厚颜无耻的欺骗模式中，路易十六的配合也是必要的一部分。自革命开始以来，从未有大量证据证实在最高层面存在着巨大的阴谋。几乎在法国的所有地方，危机发生之前就已遭到怀疑的贵族和顽固的神父，现在成了极度被质疑的对象。受到国王出逃的启发，大批贵族移民境外，加入反革命军队，这种移民潮进一步加剧了猜疑的流行。

革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内化了这种“偏执”的观点。斐扬

派的巴黎成员不仅怀疑顽固的神父和移民贵族，还怀疑那些推动民主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团体。利用权宜之计，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敌人——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敌人——那里拯救革命。爱国者的领导者们轻而易举地违反了他们刚刚宣布过的正义的法律和“人权”。他们首次突破国家支持的暴力的界限，大力推动武装镇压战神公园的示威活动。从那以后，法国的所有公民都遭到围剿，人们被毫无缘由地定罪。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保护令、司法程序——这些宪法保障的权利都以为革命、为国家服务的大前提之名被割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易十六出逃之后的几周内发生的事情，在心理影响和流程方面都预示着之后的雅各宾专政。

路易十六试图逃离革命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引发”1793—1794年国家暴力事件的大规模扩张。1791年的夏天，还没有公共安全委员会，没有革命法庭，也没有断头台。在整个危机期间，只有少数人丧生。所有人都担心的战争实际上并没有开始。8月底，议会自发试图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并恢复法治。然而，这次单独的事件，即路易十六出逃及其产生的后果，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不管是好是坏，它都促使法国走向了一个危险的未来轨道。

参考书目

页下注及参考书目中使用的缩写说明

AC Archives communales of

AD Archives départementales of

AHRF Annales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française

AM Archives municipalesof

AN Archives Nationales，Paris

AP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recueilcompletdesdébatslégislatifsetpolitiques des chambresfrançaises. Première série*（*1787-1799*）， ed. Jérôm Mavidal et al.，82 vols.（Paris，1867-1913）

BM Bibliothèquemunicipale of

BN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

RF Révolutionfrançaise

主要资料

手稿

国家档案

C 124-131：国民议会秘书处收到的信件。

D XXIX bis 31-38：调查委员会收到的信件。

F^7 3688^1 （Seine）：内政部档案。

F^7 3682^{18} （Morbihan）：同上。

省级档案

Series L：archives of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in the departments of Aisne，Ardennes，Aube，Gironde，Haute-Marne，Marne，Meurthe，Meuse，Moselle，and Vosges.

其他档案和图书馆

Bailly，Jean-Sylvain. Letters to divers. BN Manuscrits français 11697.

Basquiat de Mugriet，Alexis. Letters to the municipality of Saint-Sever. AC Saint-Sever，II D 31.

Campmas，Jean-François. Letters to his brother. BM Albi，ms. 177.

Durand，Antoine. Letters to the municipality of Cahors. AM Cahors，unclassed box of letters from Revolutionary deputies，held in BM Cahors.

Fricaud，Claude. Letters to Jean-Marie Gelin. Copies in the private archives of Dr. Robert Favre.

Gantheret，Claude. Letters to Pierre Leflaive. Private collection of Françoise Misserey，Dijon.

Gaultier de Biauzat，Jean-François. Letters to the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 of Clermont-Ferrand. BM Clermont-Ferrand，mss. 788-789.

Geoffroy，Claude-Jean-Baptiste. Letters to Jean-Marie Gelin. Private archives of Dr. Robert Favre.

Irland de Bazôges，Pierre-Marie. Letters to Henri Filleau. AD Deux-Sèvres，Fonds Beauchet-Filleau，unclassed register of “Lettres politiques，1788-1790.”

Legendre，Laurent-François. Letters to electors and municipal officials in Brest. AM Brest，Series D，unclassed.

Périsse Du Luc，Jean-André. Letters to J. B. Willermoz. BM Lyon，Ms. F. G. 5430.

Vernier，Théodore. Letters to municipality of Lons-le-Saunier. Copies AC Bletterans，unclassed dossier of “Lettres de Vernier.”

报纸

L'ami du peuple

Chronique de Paris

Le babillard

Le patriote françois

Journal de Perlet

L'orateur du peuple

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

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

其他印刷物

Alexandre，Charles-Alexis. “Fragments des mémoires de Charles-Alexis Alexandre sur les journées révolutionnaires de 1791 et 1792.” Edited by Jacques Godechot. *AHRF* 24（1952）：113-251.

Almanach de la ville de Lyon. Lyon，1791.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recueil complet des débats législatifs et politiques des chambres françoises. Première série（*1787-1799*）. Edited by Jérome Mavidal et al. 82 vols. Paris，1867-1913.

Arneth，Alfred von，ed. *Marie-Antoinette*，*Joseph II und Leopold. Ihr Briefwechsel.* Leipzig，1866.

Aulard，Alphonse，ed. *La société des Jacobins*：*Recueil de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club des Jacobins de Paris.* 6 vols. Paris，1889-1897.

Bachaumont，Louis Petit de，et al. *Marie-Antoinette*，*Louis XVI et la famille royale. Journal anecdotique tiré des 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1763-1782.* Edited by Ludovic Lalanne. Paris，1866.

Bimbenet，Eugène. “Pièces justificatives.” In *Fuite de Louis XVI à Varennes.* 2d ed. Paris，1868.

Bouchette，François-Joseph. *Lettres de François-Joseph Bouchette*（*1735-1810*）. Edited by Camille Looten. Lille，1909.

Bouillé，François-Claude-Amour，marquis de. *Mémoires du marquis de Bouillé.* Edited by François Barrière. Paris，1859.

Bouillé fils，Louis-Joseph-Amour，marquis de. “Le mémoire inédit de M. le marquis de Bouillé（Comte Louis），lieutenant-général，sur le départ de Louis XVI au mois de juin 1791.” In *Mémoires sur l'affaire de Varennes.* Paris，1823，17-136.

Campan，Jeanne-Louise-Henriette de. *Mémoires sur la vie de Marie-Antoinette.* Edited by François Barrière. Paris，1855.

Choiseul-Stainville，Claude-Antoine-Gabriel，duc de. *Relations du départ de Louis XVI*，*le 20 juin 1791*. Paris，1822.

Colson，Adrien-Joseph. *Lettres d'un bourgeois de Paris à un ami de province*，*1788-1793.* Edited by Chantal Plantier-Sanson. Paris，1993.

Damas，comte Charles de. “Affaire de Varennes：Rapport de M. le comte Charles de Damas.” In *Mémoires sur l'affaire de Varennes.* Paris，

1823，197-241.

Dumas，Mathieu. *Souvenirs du lieutenant-général comte Mathieu Dumas.* Edited by Christian-Léon Dumas. 3 vols. Paris，1839.

Dumont，Etienne. *Souvenirs sur Mirabeau et sur les deux premières assemblées législatives.* Paris，1832.

Falloux，Albert de，ed. *Réflexions sur mes entretiens*［*du futur Louis XVI*］*avec M. le duc de La Vauguyon.* Paris，1851.

Faulcon，Félix. *Correspondance.* Vol. 2：*1789-1791.* Edited by G. Debien. Poitiers，1953.

Ferrières，Charles-Elie，marquis d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Edited by Henri Carré. Paris，1932.

Fersen，Axel von. *Le comte de Fersen et la cour de France. Extraits des papiers.* Vol. 1. Edited by Baron R. M. Klinckowströ. Paris，1877.

Feuillet de Conches，Félix-Sébastien，ed. *Louis XVI，Marie-Antoinette，et Madame Elisabeth. Lettres et documents inédits.* 6 vols. Paris，1864-1873.

Fischbach，Gustave. *La fuite de Louis XVI d'après les archives municipales de Strasbourg.* Strasbourg，1879.

Gaultier de Biauzat，Jean-François. *Gaultier de Biauzat，député du Tiers état aux Etats généraux de 1789. 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 Edited by Francisque Mège. 2 vols. Clermont-Ferrand，1890.

Gauville，Louis-Henri-Charles，baron de. *Journal du baron de Gauville.* Edited by Edouard de Barthélemy. Paris，1864.

Girault de Coursac，Paul，and Pierrette Girault de Coursac，eds. *Louis XVI à la parole.* Paris，1989.

Goguelat，François de. *Mémoire de M. le baron de Goguelat，lieutenant-général，sur les événements relatifs au voyage de Louis XVI à*

Varennes. Paris，1823.

Gower，Earl George Granville Leveson.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English Ambassador at Paris，from June 1790 to August 1792.* Edited by Oscar Browning. Cambridge，1885.

Guittard de Floriban，Nicolas-Célestin. *Journal de Nicolas-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1791-1796.* Edited by Raymond Aubert. Paris，1974.

Heidenstam，O. G.，ed. *Marie-Antoinette，Fersen，et Barnave. Leur correspondance.* Paris，1913.

Lacroix，Sigismond，ed. *Actes de la Commun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2e série.* Vol. 5：*21 juin-31 juillet 1791*. Paris，1907.

Lafayette，Marie-Joseph-Paul-Yvres-Roch-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Mémoires，correspondance，et manuscrits.* 6 vols. Paris，1837-1838.

Lagache，M. de. “Relations de M. de Lagache，adressées à Louis XVIII.” In Marc Bouloiseau，“Deux relations de l'arrestation du roi à Varennes.” *AHRF* 44（1972）：449-455.

Lefebvre，Georges，ed. *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aux séances des Etats généraux.* Vol. 1，Part 2：*La séance du 23 juin.* Paris，1962.

Legendre，Laurent-François. “Correspondance de Legendre，député du Tiers de la sénéchaussée de Brest aux Etats généraux et à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1789-1791）.” *RF* 39（1900）：515-558；40（1901）：46-78.

Lepoutre，Pierre-François. *Député-paysan et fermière de Flandre en 1789. La correspondance des Lepoutre.* Edited by Jean-Pierre Jessenne and Edna Hindie Lemay. Villeneuve d'Ascq，1998.

Lescure，Mathurin de.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inédite sur Louis XVI，Marie-Antoinette，la cour et la ville，de 1777 à 1792.* Paris，1866.

Lévis，Pierre-Marc-Gaston，duc de. “Lettres du duc de Lévis，1784-1795.”

Edited by the duc de Lévis-Mirepoix. *La revue de France* 4（1929）：227-274，425-444；5：258-295，418-442，614-649.

Lindet，Thomas. *Correspondance de Thomas Lindet pendant la Constituante et la Législative*（*1789-1792*）. Edited by Amand Montier. Paris，1899.

Lombard-Taradeau，Jacques-Athanase de. “Lettres（1789-1791）.” Edited by L. Honoré. *Le Var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2（1925-1927）：230-248，255-278，322-342，347-367.

Louis XVIII. *Relation d'un voyage à Bruxelles et à Coblentz en 1791*. Paris，1823.

Louis-Philippe. *Mémorial des pensées et actions du duc de Chartres… écrit par lui-même en 1790 et 1791*. Paris，1830.

Maupetit，Michel René. “Lettres（1789-1791）.” Edited by Quéruau-Lamérie.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historique et archéologique de la Mayenne*，2d ser.，17（1901）：302-327，439-454；18（1902）：133-163，321-333，447-475；19（1903）：205-250，348-378；20（1904）：88-125，176-203，358-377，446-472；21（1905）：93-124，204-223，325-363，365-388；22（1906）：67-95，213-239，349-384，454-493；23（1907）：87-115.

Ménard de La Groye，François-René-Pierre. *Correspondance*（*1789-1791*）. Edited by Florence Mirouse. Le Mans，1989. Mercier，Louis-Sébastien. *Tableau de Paris*（1781）. In *Paris le jour*，*Paris la nuit*. Edited by Michel Delon. Paris，1990. Miles，William Augustu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89-1817*. Edited by Charles Popham Miles. 2 vols. London，1890.

Morris，Gouverneur. *A Di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Beatrix Cary Davenport. 2 vols. Boston，1939.

Mousset，Albert. *Un témoignage de la Révolution，le comte de Fernan Nunez，ambassadeur d'Espagne à Paris，1787-1791*. Paris，1923.

Moustier，François-Melchoir de. *Relation du voyage de S. M. Louis XVI lors de son départ pour Montmédy et son arrestation à Varennes.* Paris，1815.

Nicolardot，Louis. *Journal de Louis XVI.* Paris，1873.

Oelsner，Konrad-Engelbert. *Flucht Verhö und Hinrichtung Ludwigs XVI，nach der Schilderung eines deutschen Beobachters.* Edited by A. Cartellieri. Leipzig，1911.

Panon Desbassayns，Henri-Paulin. *Voyage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90-1792）. Journal inédit d'un habitant de l'Ile Bourbon.* Edited by Jean-Claude de Guillermin des Sagettes. Paris，1985.

Pétion，Jérôme. “Voyage de Pétion au retour de Varennes.” In *Mémoires inédits de Pétion et mémoires de Buzot et de Barbaroux.* Edited by C. A. Dauban. Paris，1866，189-204.

Planta de Wildenberg，chevalier de. “Arrestation du roi Louis XVI à Varennes.” In Marc Bouloiseau，“Deux relations de l'arrestation du roi à Varennes.” *AHRF* 44（1972）：440-448.

Rabaut Saint-Etienne，Jean-Paul. “Correspondance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89-1793）.” Edited by Armand Lods. *RF* 35（1898）：78-89，157-177，259-277.

——*Précis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oise.* Paris，1792.

Raigecourt，comte Charles de. “Exposé de la conduite de M. le comte Charles de Ragecourt à l'affaire de Varennes.” In *Mémoires sur l'affaire de Varennes.* Paris，1823，187-195.

Rochambeau，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comte de. *Mémoires militaires，historiques，et politiques.* 2 vols. Paris，1824.

Roger，Jean-Pierre. “Lettres du constituant Roger.” Edited by R. Rumeau. *RF* 43（1902）：68-82.

Roland，Marie-Jeanne. *Les lettres de Madame Roland.* Edited by Claude Perroud. 2 vols. Paris，1901-1902.

Ruault，Nicolas. *Gazette d'un Parisien sous la Révolution. Lettres à son frère，1783-1796.* Edited by Christiane Rimbaud and Anne Vassal. Paris，1976.

Saint-Priest，François-Emmanuel Guignard，comte de. *Mémoires*：*Règnes de Louis XV et de Louis XVI.* Edited by baron de Barante. 2 vols. Paris，1929.

Short，William. “Letters.”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Julian P. Boyd. Vols. 19-22. Princeton，1974-1986.

Thibaudeau，Antoine-René-Hyacinth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Edited by H. Carré and Pierre Boissonnade. Paris，1898.

Thompson，J. M. *English Witness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1938.

Toulongeon，François-Emmanuel，vicomte de.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puis la Révolution.* 7 vols. Paris，1801.

Tourzel，Louise-Elisabeth de. *Mémoires de Madame la duchesse de Tourzel.* Edited by Jean Chalon. Paris，1969.

Valory，François-Florent de. “Précis historique du voyage entrepris par S. M. Louis XVI le 21 juin 1791. De l'arrestation de la famille royale à Varennes，et de son retour.” In *Mémoires sur l'affaire de Varennes.* Paris，1823，243-324.

Ville de Rouen. Analyses des délibérations. Rouen，1905.

Weber，Joseph. *Mémoires de Weber，frère de lait de Marie-Antoinette，reine de France.* Paris，1847.

次要来源

Aimond，Charles. *L'énigme de Varennes.* Paris，1936.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Varennes-en-Argonne.* Bar-le-Duc，1928.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Meuse et le diocèse de Verdun*（*1789-1802*）. Paris，1949.

Andress，David. *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Popular Disse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oodbridge，England，2000.

Arbellot，Guy，and Bernard Lepetit. *Atl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oise.* Vol. 1：*Routes et communications.* Paris，1987.

Arnaud，Gaston.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riège，1789-1795.* Toulouse，1904.

Aulard，Alphonse.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oise.* 3d ed. Paris，1905.

Baker，Keith. *Condorcet*：*From Natural Philosophy to Social Mathematics.* Chicago，1975.

Baumont，Henri. *Le département de l'Oise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90-1795*）. Paris，1993.

Beauvalet-Boutouyrie，Scarlet. *Dictionnaire démographique des communes de la Meuse，1800-1982.* Bar-le-Duc，n.d.Biernawski，Louis. *Un département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oise. L'Allier de 1789 à l'an III.* Paris，1909.

Binet，C. “Les répercussions de la fuite de Louis XVI en Bretagne.”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Bulletin historique et philologique， 1911，93-122.

Bloch，Marc. *The Royal Touch.* New York，1989.

Bourdin，Isabelle. *Les sociétés populaires à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1937.

Boutier，Jean，and Philippe Boutry. *Atl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 6：*L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Paris，1992.

Bouvier，Félix. *Les Vosges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89-1800. Etude historique.* Paris，1885.

Braesch，Frédéric. “Les pétitions du Champ de Mars.” *Revue historique* 142（1923）：192-209；143：1-39，181-197.

Brégail，M. *Le Ger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Auch，1934.

Bruneau，Marcel.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départements du Cher et de l'Indre.* Paris，1902.

Buirette，Claude.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Sainte-Menehould et de ses environs.* 2d ed. Sainte-Menehould，1882.

Burstin，Haim. “La loi Le Chapelier et la conjoncture révolutionnaire.” In *Naissance des libertés économiques.* Edited by Alain Plessis. Paris，1993.

——“Problèmes du travail à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44（1997）：650-682.

——“Une Révolution à l'oeuvre. Le faubourg Saint-Marcel（1789-1794）.” Doctoral thesis，University of Paris I，1999.

Carrot，Georges. *Le maintien de l'ordre en France.* 2 vols. Toulouse，1984.

Censer，Jack Richard. *Prelude to Power*：*The Parisian Radical Press，1789-1791.*

Baltimore，1976.

Charavay，Etienne. *Les assemblées électorales de Paris，26 août 1791-12 août 1792*. Paris，1894.

Chobaut，H. “La pétition du club de Montpellier en faveur de la république.” *AHRF* 4（1927）：547-563.

Connac，Emil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Toulouse et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Haute-Garonne.* Toulouse，1901.

David，Philippe. *Un port de l'océan pendant la Révolution. La Rochelle et son district，1791-1795.* La Rochelle，1938.

Dubois，Eugèn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in.* Vol. 1：*La Constituante*（*1789-1791*）. Bourg-en-Bresse，1931.

Duprat，Annie. *Le roi décapité. Essai sur les imaginaires politiques.* Paris，1992.

Dupuy，Roger. *La garde nationale et les débuts de la Révolution en Ille-et-Vilaine*（*1789-mars 1793*）. Paris，1972.

Duval-Jouve，Joseph. *Montpellier pendant la Révolution.* 2 vols. Montpellier，1879-1881.

Egret，Jean. *Necker，ministre de Louis XVI.* Paris，1975.

Farge，Arlette. *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 siècle.* Paris，1992.

Fougeray Du Coudrey，R. *Granville et ses environ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Granville，1920.

Fournel，Victor. *L'événement de Varennes.* Paris，1890.

Fray-Fournier，A. *Le club des Jacobins de Limoges.* Limoges，1903.

Gaugain，Ferdinand.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s la Mayenne.* 4 vols. Laval，1919-1921.

Genty，Maurice. *Paris，1789-1795. L'apprentissage de la citoyenneté.* Paris，1987.

Gillet，P. *Louis XVI et sa famille à Epernay aux retour de Varennes.* Epernay，1968.

Girault de Coursac，Paul. “L'opinion publique après Varennes.” *Découverte*， no. 22（1978）：3-28；no. 23：3-26；no. 24：3-28.

Godechot，Jacques. *La prise de la Bastille.* Paris，1965.

Goetz-Bernstein，H. A. *La diplomatie de la Gironde. Jacques-Pierre Brissot.* Paris，1912.

Gottschalk，Louis，and Margaret Maddox. *Lafayett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From the October Days through the Federation.* Chicago，1973.

Goubert，Pierre. *L'ancien régime.* Vol. 2：*Les pouvoirs.* Paris，1973.

Hardman，John. *Louis XVI.* New Haven，1993.

Hardman，John，and Munro Price，eds. *Louis XVI and the Comte de Vergennes*：*Correspondence*，*1774-1787.* Oxford，1998.

Henwood，Philippe，and Edmond Monange. *Brest. Un port en Révolution*，*1789-1799.* N.p.，1989.

Hesse，Carla. *The Other Enlightenment*：*How French Women Became Modern.* Princeton，2001.

Hugueney，Louis. *Les clubs dijonnais sous la Révolution.* Dijon，1905.

Hunt，Lynn.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1992.

——*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1984.

Jordan，David P. *The King's Trial*：*Louis XVI vs.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1979.

Kaiser，Thomas. “Who's Afraid of Marie-Antoinette？ Diplomacy，

Austrophobia，and the Queen.” *French History* 14（2000）：241-271.

Kaplan，Steven L. *The Famine Plot Persuas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1982.

——*La fin des corporations*. Paris，2001.

Kates，Gary. *The Cercle Social*，*the Girondins*，*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1985.

Kennedy，Michael L. *The Jacobin Club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The First Years*. Princeton，1982.

Klaits，Joseph.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Absolute Monarchy and Public Opinion.* Princeton，1976.

Labroue，Henri. *L'esprit public en Dordogn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Paris，1911.

Langlois，Claude. “Le serment révolutionnaire，1789-1791：Fondation et exclusion.” In *Le serment.* Edited by Raymond Verdier. Vol. 2. Paris，1991，389-395.

Laurent，Gustave. “A propos de Drouet.” *AHRF* 21（1949）：247-251.

Lecesne，Edmond. *Arras sous la Révolution.* 2 vols. Arras，1882-1883.

Leclercq，Henri. *La fuite du roi*（*avril-juillet 1791*）. Paris，1936.

Lefebvre，Georges. “Le meurtre du comte de Dampierre（22 juin 1791）.” In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oise*. Paris，1963，393-405.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La fuite du roi*. Paris，1951.

Lenôre，Georges. *Le drame de Varennes*，*juin 1791*. Paris，1905.

Lesort，André. *L'esprit public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Meuse au moment de l'arrestation de Louis XVI à Varennes*. Paris，1908.

Lever，Evelyne. *Louis XVI*. Paris，1985.

Markoff，John. “Images of the K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ary Demands*：*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ahiers de Doléances of 1789.* Edited by Gilbert Shapiro and John Markoff. Stanford，1997，369-376.

Mathiez，Albert. *Le club des Cordeliers pendant la crise de Varennes.* Paris，1910.

McManners，John. *Church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2 vols. Oxford，1998.

Michon，Georges. *Essai sur l'histoire du parti Feuillant. Adrien Duport.* Paris，1924.

Millot，Jean. “La fuite à Varennes，conséquences dans l'ordre public et le domaine politique à Besançon.” *Académie des sciences，belles-lettres et arts de Besançon. Procès-verbaux et mémoires* 172（1957）：197-214.

Monnier，Raymonde. “Paris au printemps 1791. Les sociétés fraternelles et le problème de la souveraineté.” *AHRF* 64（1992）：1-16.

Nicolas，Raymond. *L'esprit public et les élections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la Marne de 1790 à l'an VIII. 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n province.* Chalonssur-Marne，1909.

Padover，Saul K. *The Life and Death of Louis XVI.* New York，1939.

Pastoors，A. *Histoire de la ville de Cambrai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89-1802.* 2 vols. Cambrai，1908.

Pegg，Carl Hamilton. “Sentiments républicains dans la presse parisienne lors de la fuite du roi.” *AHRF* 11（1934）：435-445.

Péronnet，Michel. “Le club de Montpellier appelle la république.” In *La république en Languedoc et Roussillon，1792-1958. Colloque de N îes，4 et 5 septembre 1991.* Nîes，1993，139-165.

Pionnier，Edmond.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à*

Verdun（*1789-1795*）. Nancy，1905.

Pisani，Paul. *L'église de Paris et la Révolution.* 4 vols. Paris，1908-1911.

Pommeret，Hervé. *L'esprit politiqu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s C* ô*es-du-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1789-99.* Saint-Brieuc，1921.

Price，Munro. “Louis XVI and Gustavus III：Secret Diplomacy and Counterrevolution，1791-1792.” *Historical Journal* 42（1999）：435-466.

Reinhard，Marcel. *La chute de la royauté.* Paris，1969.

Roche，Daniel. *The People of Paris*：*An Essay in Popular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1987.

Rouvière，François.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e département du Gard* . Vol. 1. Nîes，1887.

Roux，marquis Marie de. *La Révolution à Poitiers et dans la Vienne.* Paris，1910.

Rudé，Georg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1959.

Sagnac，Philippe. “L'état des esprits en France à l'époque de Varennes（juin-juillet 1791）.” *Revue de l'histoire moderne* 12（1909）：149-175.

——“Marie-Antoinette et Barnave d'après leur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RF*， n.s.，3（1935）：207-241.

——*La Révolution*（*1789-1792*）. Paris，1920.

Schneider，René. *Au lendemain de Varennes. Un épisode de la Révolution en Moselle.* Metz，1989.

Shapiro，Barry M.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Paris*，*1789-1890.* Cambridge，1993.

Söerhjelm，Alma. *Correspondance secrète. Marie-Antoinette et Barnave.* Paris，1934.

——*Fersen et Marie-Antoinette*. Paris，1930.

Sol，Eugéne. *La Révolution en Quercy*. 4 vols. Paris，1926.

Tackett，Timothy.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Princeton，1996.

——"Conspiracy Obsession in a Time of Revolution：French Eli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Terror：1789-1792."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2000）：691-713.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Society*，*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Edited by Michael Adcock et al. Melbourne，1996，162-169.

——"Les députés de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1791-1792." In *Pour la Révolu- tion françoise. En hommage à Claude Mazauric*. Edited by Christine Le Bozec and Eric Wauters. Rouen，1998，139-144.

——*Religion*，*Revolution*，*and Regional Culture*. Princeton，1987.

Thelander，Dorothy R. "Mother Goose and Her Goslings：The France of Louis XIV as Seen through the Fairy Ta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4（1982）：467-496.

Tulard，Jean. *Nouvelle histoire de Paris. La Révolution*. Paris，1789.

Van Kley，Dale K.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From Calvin to the Civil Constitution*，*1560-1791*. New Haven，1996.

Vast，Albert. *Sur le chemin de Varennes. Vieux souvenirs du 21 juin 1791 d'après de nouveaux documents et les relations de témoins oculaires*. Paris，1907.

Vidal，Pierr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dans le département des Pyrénées-Orientales*. 3 vols. Perpignan，1885-1888.

Viola，Paolo. *Il trono vuoto. La transizione della sovranità nella*

rivoluzione francese. Turin，1989.

Wahl，Maurice.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e la Révolution à Lyon，1788-1792.* Paris，1894.

Walter，Gérard. *Histoire des Jacobins.* Paris，1946.

Whaley，Leigh. “The Varennes Crisis and the Division amongst the Radical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rance* 38（1989）：34-44.

Wick，Daniel L. *A Conspiracy of Well-Intentioned Men*：*The Society of Thir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1987.

Zweig，Stefan. *Marie-Antoinette*：*The Portrait of an Average Woman.* New York，1933.

译后记

《路易十六出逃记》，原书名为*When the King Took Flight*，是专攻法国大革命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谭旋（Timothy Tackett）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全书以“路易十六出逃”这一在法国大革命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焦点，通过大量的历史档案、官方文献、回忆录和民间通信，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一重重导致了这一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民众情绪，乃至种种阴差阳错的时机巧合。第三等级的崛起、革命情绪的涌动，以及逐渐丧失王权威仪和实际权力的国王本人，加上与跨国婚姻所带来的境外势力的参与，推波助澜，使得路易十六出逃一事看似不可避免，然而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法国民众的强烈反抗情绪，以及随即导致的跌下神坛的王权，暗示了之后法国大革命不可阻挡的进程。

谭旋在本书中的视角独特，文笔流畅而富有趣味性，尽可能展示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全貌，特别关注了往往作为一个群体背景出现的法国公民，描述了他们的情感反应和精神状态，追踪并解释了这些情感变迁与革命进程之间的关系。翻译此书，对于文学专业的我来说，是一个兼具挑战性与娱乐性的过程。在此我郑重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庞冠群副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亦师亦友的谭徐锋博士容忍我的无理拖延，感谢我的恩师罗湉，感谢无微不至的父母、生活不能自理的配偶和猫。书中的所有谬误，皆由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的本人负责。

赵雯婧

2018年6月